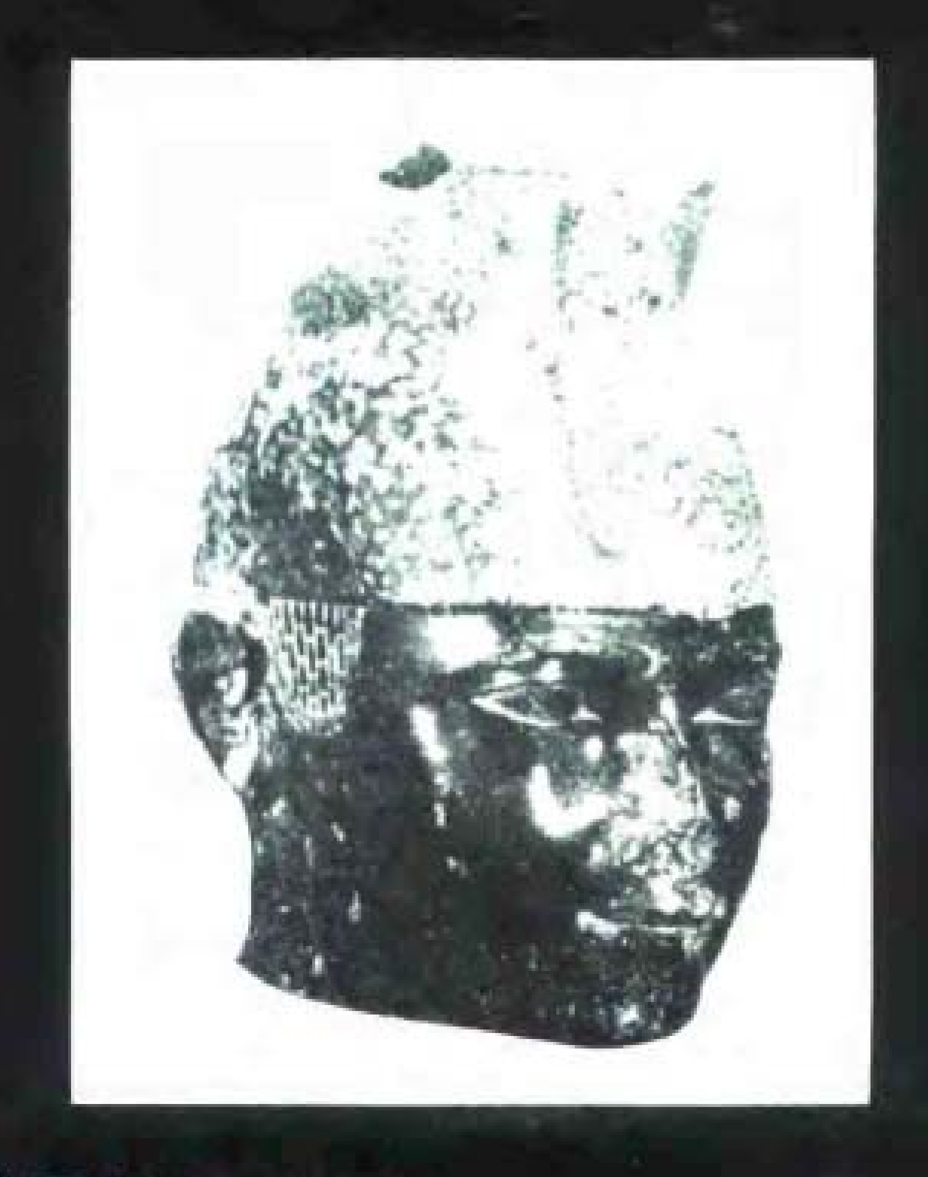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二卷

非洲古代文明

主编：G·莫赫塔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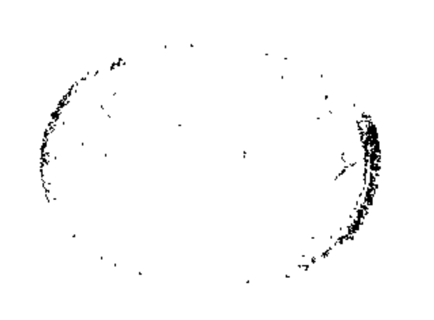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二卷

非 洲 古 代 文 明

G. 莫赫塔尔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英文本 1981 年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一次出版
巴黎 75700，丰特诺亚广场 7 号

THE UNESCO PRESS: ISBN 92-3-501708-4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II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Africa

EDITOR G.MOKHTAR

冯世则　吴壬林　校
李　活　谭之清

责任编辑：杨　达
责任校对：燕桂珍
地图绘制：周定国　张凤娣
封面设计：林胜利

非洲通史　第二卷
非洲古代文明
G.莫赫塔尔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 4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41.75 印张　字数 900(千)
1984 年 12 月第一版　　198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统一书号：11220·5　　定价：(精)8.00 元
11220·6　　(平)7.20 元



非洲通史　第二卷

非洲古代文明

ROSS卜印

《非洲通史》中文版出版说明

第 二 卷

《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八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

《通史》的编写工作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负责，委员大多为非洲人。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此书史料丰富，为我国史学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方便，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我公司接受教科文组织的委托，承担《通史》各卷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在本卷的翻译、审订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新华社、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特别是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大力协助和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参加第二卷审订工作的有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屠尔康、吴慎娴、陈续、葛佶、徐济明等同志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陆庭恩、郑家馨等同志。各章译者姓名则分别列于章末。我公司参加本卷译稿编审工作的有刘山、于一等同志。

本卷涉及多种学科，翻译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国内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查阅书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年12月

向提供图片者致谢*

马达加斯加艺术和考古博物馆〔28.1，28.2〕
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11.4，11.5(右下)〕
巴黎原子能委员会〔5.13〕
A. 巴达维：《埃及建筑史》，洛杉矶，1966〔3.2〕
L. 巴卢：《马格里布及撒哈拉的史前人类》〔17.1，17.2，17.3〕
阿尔及尔巴多博物馆〔17.1，17.2，17.3，19.1，19.2〕
L. 比夏特：《萨胡-拉国王之墓》，第二卷，来比锡，1973，4.1
M. 博维斯：〔17.1，17.2〕
A. 布雷克：〔4.5〕
E. 布雷西亚：《赤陶》II(1934)，第3，7-18期〔7.3，7.4〕
大英博物馆〔11.5(右上)〕
H. 布鲁格施：〔导言 3〕
开罗博物馆〔导言 4，6.2，7.2，7.6，7.7，10.3〕
J. 卡帕特：〔5.6〕
芝加哥大学〔4.2，11.1，11.2〕
科尔亚-比歇-夏泰尔〔4.5〕
德洛姆，17.3
C.A. 迪奥普：《黑人文明以前》、《神话或历史现实》现代非洲出版社〔1967，1.1，1.2，1.3，1.4，1.5，1.6，1.7，1.8，1.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
阿利纳里出版社(罗马)(29773号)，〔6.5〕
德拉巴孔尼尔出版社〔导言 3，2.1〕
来比锡出版社〔11.6，11.7，11.8〕
埃塞俄比亚考古研究所〔13.1，13.2，13.3，13.4，13.5，14.1，14.2，14.3，14.4，14.5，14.6，14.7，14.8〕
法国赴苏丹考古团〔3.9，5.3〕
A.H. 加德纳：《法老埃及》，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导言 2〕
亚历山大希腊罗马博物馆〔6.3，6.8，6.9，7.3，7.4〕
牛津格里菲斯研究所 1954〔导言 5，2.9〕
F. 欣策，1971a(见参考书目)

* 方括号〔 〕内阿拉伯数字为章次及图片编号。

F.L. 凯内特〔2.5，2.6，2.7，2.8〕
喀土穆博物馆〔10.4〕
卢浮宫博物馆〔1.19〕
巴黎卢浮宫古埃及石椁展室，摄影档案
巴黎梅尼尔基金会〔6.7，6.9，7.3，7.4〕
梅尼尔·希基·罗伯逊－阿拉德·皮尔逊博物馆，编号，1991〔7.5〕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2，3.4，4.3，4.4，5.8，5.9，5.10，5.11，5.12〕
苏丹民主共和国文化和新闻部〔9.1，9.2，9.3，9.4，9.5，9.6，9.7，9.8，9.9，9.10，9.11〕
G. 莫赫塔尔：〔2.3，5.14，5.15，12.7，12.8〕
阿尔及尔古代博物馆〔17.4〕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导言.4，3.1，10.1〕
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4.2，11.1，11.2〕
奥托诺兹〔5.14〕
J. 皮雷纳：《埃及古代文明史》，第一卷，纳夏泰尔出版社，巴黎，1961〔2.1，3.1，3.5，3.6a、b，3.7，5.4，5.5，5.6，5.7〕
波兰出土文物〔7.1a、b、c〕
P. 萨拉马〔19.9，19.11，19.12，19.13，19.14，19.15，20.1，20.2，20.3，20.4，20.5〕
伦敦东方和非洲问题研究所
W.S. 欣尼教授：《麦罗埃：苏丹的文化》，伦敦，1967〔11.3，11.4，11.5(左上，中，左下)〕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3.4，11.8〕
的黎波里博物馆〔20.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历克西斯·沃龙佐夫〔8.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1977年7月号）〔导言.1〕
费城大学博物馆〔1.4〕
华沙国家博物馆〔12.1，12.2，12.3，12.4，12.5，12.6〕
K. 韦塞尔，《科普特艺术的肖像画法，尼罗河畔的基督教》，雷希林豪森出版社，1963〔7.7〕
马萨诸塞州，沃斯特艺术博物馆〔11.3〕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5〔4.1〕

纪 年 说 明

经一致同意，采取下列方法来书写日期。史前日期，可用两种不同方法来写。

一种方法是参照现在的纪元，即距今的日期，以＋1950 年为基准年；凡有关＋1950 年的日期都是负数。

另一种方法是参照基督纪元的开始。凡有关基督纪元的日期均以＋号或－号在日期前表示。在提到世纪的时候，便以“我们纪元前”或“我们纪元”来代替基督纪元。

现举例如下：

（i） 距今 2,300 年＝－350 年

（ii） 公元前 2,900 年＝－2,900 年

公元 1,800年 ＝＋1,800 年

（iii） 公元前五世纪＝我们纪元前五世纪

公元三世纪＝我们纪元三世纪

目　录

插 图 目 录[*]

* 标题前阿拉伯数字为章次及插图编号。

图 片 目 录*

* 标题前面的阿拉伯数字为章次及图片编号。

导 言

G. 莫赫塔尔
(J. 韦库泰协助)

[1]

《非洲通史》本卷所论述的这一大陆的历史，始于新石器时代之末，即大约我们纪元前八千纪，迄于我们纪元七世纪之初，包括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的非洲史，长达9000年左右。现经过再三考虑将它划分为四个地理区：

（1） 尼罗河走廊、埃及和努比亚(第一至十二章)；

（2） 埃塞俄比亚高原(第十三至十六章)；

（3） 日后称为马格里布的地区，及其内陆撒哈拉(第十七至二十章)；

（4） 非洲其余地区及印度洋中属于非洲的各个岛屿(第二十一至二十九章)。

这一划分，是按当前分区研究非洲历史的做法而决定的。本书的结构，如能按照非洲大陆主要的生态区域来安排，看来更为合理。生态区域为同一地区的人群提供了同样的生活环境；一区之中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自然条件，足以阻绝区内文化上的或其他方面的交流。

这样划分的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便将全然不同；从北到南，它将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是从我们纪元八世纪以来便称为马格里布的岛，它的地质、气候和一般生态都基本上属于地中海区域，加上宽广的亚热带地带，即撒哈拉，以及属于地壳结构上的特例的尼罗河谷。其次一个地区是巨大的亚热带河流盆地与赤道河流盆地，及其大西洋海岸。然后，东去则有埃塞俄比亚高原以及面向阿拉伯和印度洋的非洲之角。最后是巨大的赤道湖泊地区，它把尼罗河、刚果河和尼日尔河三盆地与南非结成一体，包括马达加斯加以及非洲附近的印度洋诸岛。

这样划分，虽比本书将不得不采取的前一种划分法较为令人满意，但可惜是不可能的。事实是，研究非洲古代史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受到过去研究方法的束缚。本书所采用的这种强加于他们的割裂的划分法，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殖民时期；历史学者，无论是关心当地的利益的殖民者，抑或是考虑本民族的过去的殖民地人，都不能不受到过去强行划定的领土界限的限制。想要研究一国与相邻各国的关系是困难的，甚至不可能；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邻国和他所关心的国家往往属于一个整体。 [2]

过去遗留的这一沉重的桎梏并未全然消失；一部分是由于因循守旧——一旦陷进去，便往往不能自拔——同时也是由于非洲若干地方的历史文献（包括考古报告、典籍和肖像等），在收集、整理和出版时都遵行一种脱离非洲现状的、自行其是的方针，人们无法提出异议。

撰写《非洲通史》这一卷，必须依靠推测，其程度也许较前一卷尤甚。一般说来，史料缺乏，年代确切的史料尤其缺乏，因而本卷所涉及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模糊不清。这种情况既表现在各个地区考古所获的史料极不平衡，也表现在典籍和图画方面，唯有诸如尼罗河流域、马格里布这样一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除外。诉诸推测，原是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献而采取的办法；每逢有确实无误的事实可资凭借，自然就另作处理了。

需要着重指出的另一点是，通过考古工作而为历史学者提供的史料极不完全。发掘工作不是在整个大陆上全面铺开进行的。在沿海地区、北非海岸的内陆，尤其是从入海口上溯直达第二瀑布的尼罗河流域，发掘点的密度很大，而其他地方发掘点则很少。

考古提供的资料既告不足，可惜又没有外来的旅行者以及历史事件或史实的同代人的报告来加以补充。这片大陆的严酷的自然条件和它的幅员之广，从古代到其后一段时间，一直阻碍着人们从外部深入内地。一片大陆，人们通过环绕它的海岸线航行而对它的历史作出了重要发现，就我们当前所知来说，这种情况唯见于非洲（参阅第十八章及二十二章），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这些情况说明，从我们纪元前7000年到我们纪元700年间的非洲史，何以仍然大部分属于推测。但是，这些推测决不等于凭空杜撰；史料虽然少而不全，却是确实存在的。撰稿人的任务，便在于搜集、估量和鉴别这些史料。研究各个地区历史的专家，无论这一历史多么支离破碎，他们还是从可资利用的文献作出合理的推断，进而把所得的结论加以综合，写入本书。今后出现进一步的史料时，他们所提出的推测自然还可以重新审查，但3我们相信，它们必能为后来的历史学者指出研究方向，鼓励他们前进。

阵阵迷云，仍然掩盖着非洲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使人无法看清；而其中最为扑朔迷离者之一，是这片大陆的古代居民问题。直到今天，我们对他们仍然所知极少。种种截然相反的设想，常常以科学性虽然确凿、数量上却嫌不足的观察作为根据；当体质人类学正处于迅速发展的现阶段，实在难于加以验证。例如"一祖论"本身（参见第一章），便仍不过是一种研究中的假设。此外，在奥莫河谷或奥杜瓦伊峡谷发现了前人类或原人（参见第一卷），主要在南部非洲又发现了具有鲜明的人类特征的生物，这二者之间横亘着一段巨大的空白；这就必然使我们感到，那种认为进化一贯在原地进行、连续不断的观点，在没有获得确实的证据或发现中间环节之前，只不过是一种观点而已。

对我们纪元前8000-5000年这一关键时期的非洲人口密度作某种估量，很有必要。因为这实际上是后来发生了分化的文化的诞生期。而且，人口密度的高低，会促进文字的产生或使之并无必要。古埃及和同一时期的非洲其余部分相比较，其独特之处也许主要便在于这一事实：第一瀑布与三角洲之间，尼罗河两岸人口密集，为了协调生死攸关的灌溉体系，单这一项便逐渐迫使人们使用文字。相形之下，阿斯旺瀑布以南是一个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占有这个地区的各个人类集团长时期互不依靠，文字的使用便非急需。由此可见，对于这一时期的人口密度之仍然只能进行推测，是令人遗憾的。

最后，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化都很大的生态分布，起了重要作用。新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潮湿期于大约我们纪元前2400年时告终；这已是有史时期，第五王朝的法老们正统治着埃及。当非洲伟大的文明破晓之际，它所处的气候环境以及连带而来的农业环境都与后

来不同；研究这些文明与它们周围各民族的关系时，这个方面必须计及。我们纪元前7000–2400年这段长达4600年的时期——亦即本卷所论述的时期的一大半，环境与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期起的情况很不相同。这种看来与现代很相似的气候条件，给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打下了深深的印记。社会生活，在南部或北部的巨大亚热带沙漠地带不同于、也不可能同于巨大的赤道森林；群山之间不同于大河盆地；沼泽地不同于大湖区域。这些主要生态地区对各区之间道路的开辟有着至为重大的影响；对于从马格里布或多山的埃塞 4 俄比亚或尼罗河流域到刚果河、尼日尔河与塞内加尔河等中央盆地的道路是这样；对于从大西洋海岸通向红海和印度洋的道路也是这样。然而，对这些道路却仍然很少调查，人们只是猜想，或不如说是"假设"，而远非真有所知。如果对它们进行系统的考古研究，当能为我们带来有关非洲历史的大量知识。事实是，我们唯有在确实发现了这些道路、而且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之后，对我们纪元前8000–2500年之间多次人口迁移的研究才能取得丰富的成果；这些迁移是紧接着气候的最后一次大变化发生的，而且大大地改变了非洲大陆上人类集团的分布状况。

就这些道路来说，其中某些道路主要经过哪些地方我们迄今所知极少。甚至还可能存在着某些我们根本还不知道的道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未系统地研究过由卫星拍摄的照片。如果进行系统的研究，当能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了解横贯非洲大陆的古代交通干线，以及交通上虽居次要、但为进行历史研究却同样重要的另一些道路；也有助于我们正确指导和顺利进行野外发掘，从而在现场核实历史事实，这对于估量古代几个主要的文化区如何相互影响等等是十分必要的。也许就是在这个领域里，今后的研究有希望带来最大的成果。

不难看出，《非洲通史》第二卷的各章，更多的是为今后的研究列举了出发点，阐述确凿的史实部分则较少。遗憾的是，确凿的史实唯见于若干地区，为数极少；与非洲大陆广袤的幅员对比，这类地区就太小了。

尼罗河从南方的加扎勒河到北方的地中海一段，在古非洲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来自以下诸因素：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其次是它与大陆其余部分相比，在生态方面有其特殊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富于——当然是相对而言，但在非洲已属独一无二——年代确切的原始史料，这就使我们得以纵观它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即我们纪元前3000年到我们纪元七世纪的历史。

埃及：地理位置

尼罗河谷大部与红海及印度洋海岸平行，若干与其走向相垂直的低洼地带使它与这些海岸相通；由于若干山谷始于乍得地区的提贝斯提及恩内迪高原而止于尼罗河谷，因而尼罗河谷从北纬8度以南到地中海这一段，向西也同样是一片平川旷野。最后，开阔的三角洲、 5 利比亚的各处绿洲和苏伊士地峡则使它和地中海连成一片。东西南北，四通八达，尼罗河走廊于是成为优越的连结点：不仅与它四邻的非洲地区相连结，而且也和相距更远的阿拉伯半岛、印度洋、以及地中海东西两侧等地的古代文明中心相连接。

然而，这一地理位置的作用也因时而异。在非洲，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是一段潮湿期，它于我们纪元前2300年前后于北半球告终。在这一段历我们纪元前七千纪至三千纪的时期中，尼罗河东西两侧享有有利于人类居住的气候条件；因此，大陆上东西之间的接触交往也就与南北之间所建立的接触交往同样重要。

及至我们纪元前2400年后，非洲从北纬30度到15度的地带干燥起来，尼罗河谷随之成为非洲的地中海海岸与如今称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之间的主要通道。原料，制品，无疑还有思想的南北交流，都是通过这一河谷进行的。

显然，由于气候变化，尼罗河谷中段的地理位置，恰如埃及的地理位置一样，在我们纪元前7000-2400年时期，其重要性，或更确切地说其影响，都不同于此后的时期。这段时期中，北半球的人类集团和文化，东西之间和南北之间都可以自由交流。这是非洲诸文化的形成及各自分别发展的最初时期，也是东西之间即尼罗河谷与中东诸文明之间，以及西非与东方之间自由交往最为容易的时期。

但从我们纪元前2400年到七世纪，尼罗河谷成了大陆上优越的南北通道。黑非洲和地中海之间的种种交流，正是经由尼罗河谷而得以实现。

尼罗河流域古代史的史料来源

尼罗河流域处于这片大陆的东北角，它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便来自这一地理位置。尽管如此，它之所以没有仅仅成为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题目，或至多属于历史研究上的一段前奏，却是因为它同时又是整个非洲最富于古代史料的地区。这些史料使我们有可能考查和估量地理因素从大约我们纪元前5000年以来在非洲历史全局上所起的作用。它们也使我们不但得以相当准确地了解埃及本土的历史事件，而且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加扎勒沼泽地以北的尼罗河中游和下游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宗教文化。

我们占有的史料来自考古，因而一属于无声——至少表面上如此——二属于文字性质。前者、尤其是涉及最早时期的部分，新近才搜罗和集中起来，仍然不完整、也不均衡，而且数量既小，利用也差。另一方面，文字史料在利用上却有着悠久的传统。

事实上，早在商博良之前好久，神秘的埃及便已唤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古希腊人的后裔早在我们纪元前六世纪便提醒人们注意他们与尼罗河流域之间在习俗和信仰上的差异。由于希罗多德的著作，他们的观察所得得以流传至今。托勒密王朝诸王对埃及文化的独创性大为惊奇，而又想了解自己的这些新臣民，于是于我们纪元前三世纪下令就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为他们编写了一部法老埃及史。一个埃及出生的人——曼涅托，受命主持撰写这本埃及通史。他获准动用古代的档案，并且能读懂它们。他这部著作如果能完整无缺地留传下来，今天便不至于会有这么许多疑案。亚历山大图书馆不幸被焚，这部书于是失传，唯有为别的书所引用的部分段落保存下来；这些书虽然总是出于为基督教辩护的目的，却给埃及历史保存了一个可信的轮廓留给后人。曼涅托记下的三十一个王朝，实际上至今仍是埃及相对编年史的坚实基础。

我们纪元六世纪，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时，最后一批埃及神庙被封；种种法老文字，无

论其为象形体、僧侣体或通俗体，通通被排斥。只有口语在科普特语中得以留存，书面语却逐渐失传了。直到 1822 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52 年）译解了这种文字，人们才再一次得以理解由埃及人自己写下的种种古文件。

使用这些古埃及书面史料，必须谨慎，因为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其中绝大多数文件的撰写，都是出于某一特定的目的：或列举某一法老的丰功伟绩，表明他业已充分完成他在人世的使命，按诸神的旨意（神称为"马阿特"）维持天下大治，抵抗日愈危及治世的恶势力；或确保值得后人感恩戴德的各代法老永受崇拜、世世不忘。埃及神庙中作为装饰 7 用的某些冗长的铭文和历史肖像，以及例如第十八王朝时在凯尔奈克的神庙、第十九王朝时在阿拜多斯的神庙刻下的祖先名讳表，均属于这两类文献。

书吏根据祭司或王室官员起草的文件，编写上述王室名单，从而可以判定当时曾有完善的档案。不幸的是，这类文献只有两份留存至今，而且都已残缺。它们是：

巴勒莫碑。碑文中最大的断片如今存于西西里岛上巴勒莫市的博物馆中，因此而得名。这是一块闪长岩石板，双面雕刻，上面有从第一王朝到第五王朝（约在我们纪元前 2450 年前后）的全部埃及法老的名字。自第三王朝起，巴勒莫碑不但按朝代顺序列举了法老的名字，而且逐年记录了历代大事，成为一部确切可靠的编年史；这样一件无可比拟的文物遗留至今而残缺不全，尤其令人遗憾。

《都灵纸草抄本》。藏于同名城市的博物馆中，其重要性与巴勒莫碑不相上下。这是一张从埃及有史时起直到我们纪元前约 1200 年的全部法老名单，附有他们的全部事迹，以及按年代排列的各个法老的统治时期，年月日俱全。不幸的是，这份文件在十九世纪首次发现时虽然完整无缺，却因处理不善，在运输中破碎了，费去许多年才得以修复，但至今还有许多部分残缺。《都灵纸草抄本》的特点之一，是它把历代法老分组排列。在每一组之后，书吏都把这组法老的统治期加到一起记下来。曼涅托的埃及王朝史，无疑便取材于此。

埃及的纪年法

埃及人的纪年法与我们不同，没有采用诸如以基督诞生之年以前或以后、或希志若干年*、或奥林匹亚多少届**那样连续不断或周而复始的体制，因而巴勒莫碑、都灵纸草抄本和文物建筑上的法老名单对埃及历史就更为重要了。他们的纪年法以法老本人为依据，文件上的每一日期，都是按文件起草时的当朝法老来计算的。例如，某一碑文的日期便可能是"某法老十年，'阿赫特'季(Akhet)二月，八日"；而当下一位君主登基，年代便又再 8 从元年开始。这就表明，得知全部法老的**名字**及每一法老**统治年代**的数目，对于确立埃及的历史编年的重要性。如果上举的两大文物，都曾得以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便能为我们

* 希志(Hegira,源于阿拉伯文 hidjrah,旧译"希志来")，原义为"迁徙"，指穆罕默德于我们纪元 622 年 9 月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穆罕默德死后，其信徒为纪念此事，遂以"希志"为伊斯兰教历纪元，并以迁徙发生的当年阿拉伯太阴年的岁首(我们纪元622年 7 月16日)为该历纪元元年元旦。——译者注

** 奥林匹亚(Olympiad),古希腊人的纪元法，以四年为一届，以举行奥林匹亚竞技会之年为每届之首年。据后人推算，首届奥林匹亚始于我们纪元前 776 年。——译者注

提供这一最基本的史实。不幸，事情未能如此，而其他一些文件虽然有用，为我们填补了这两大文物中的若干空白，我们仍然未能全部掌握埃及法老的确切名单。每逢巴勒莫碑和都灵纸草书二者上面都无案可稽时，不仅某些时期的继承顺序一直争议不决，甚至某些朝代的历时久暂也都无从获知。我们至多知道和某一法老有关的最早一个日期；但是，很可能在载有这一日期的文物建筑落成之后，他的统治还在长期延续。

虽有上述的空白，把我们掌握的史料提供的全部时间加到一起，总数仍达4000年以上。这就是直到大约1900年为止，头一批埃及学家所采用的埃及史长编。然后，人们终于悟到古埃及历史不可能如此之长。对文件和文物建筑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首先，某些历史时期有若干个法老同时在位，因而存在着并列的若干朝代；其次，间或有的法老让他的一个儿子共同执政。由于每一君主都按照自己的朝代来标明自己的文物建筑的日期，时间上便发生某些重叠。把同时并存的朝代、同时执政的君主与正式君主的统治时期相加，所得到的年代总和势必过大。

若不是古老的法老历的一个特点提供了编年法的确切的轮廓，上述问题便很可能无从解答。把法老历和一种不变的天文现象联系起来观察，埃及年表便不难推算出来。此处指的是索西斯星——即我们所说的天狼星——在赫利奥波利斯-孟菲斯一线的纬度上和太阳同时升起这件事，亦即所谓"索西斯的偕日升"；埃及人在古代便观察到这个现象。这些观察提供了"索西斯"的日期，这就是今天埃及纪年的依据。

与古代的多数民族相同，埃及人起初似乎采用阴历，主要用以确定各个宗教节日。但与这种天文历同时，他们还有另一种历法。作为一个农业民族，农业活动的节奏便是他们长年生活的节奏：播种、收割、归仓、准备新的种子。在埃及，河谷农业的节奏决定于尼罗河，它的变化定下了各种劳作的日期。因此，河谷的古代居民还另有一种自然历法，它与宗教性质的阴历并行不悖，这一事实就不足为怪了。这种自然历法的根据是一桩按期发生、周而复始、对他们的生活十分重要的大事，即尼罗河水的涨落。

这种历法每年的头一个季度，埃及语称为"阿赫特"，尼罗河开始泛滥。河水逐渐升起，淹没了夏季里晒得干旱的土地。大约有四个月期间，田野浸透了水。下一季中，田野逐渐从水中露出，就可以播种了。这一季叫"佩雷特"(Peret)，意思是"出"——毫无疑问，这个词既指土地"出"水，也指幼芽"出"土。播种一旦结束，农民便等候作物萌芽，然后等候庄稼成熟。第三季也就是最后一季，称为"舍毛"(Shemou)，埃及人收割庄稼，并把它们贮藏起来。收获之后，他们只消收拾田地，等待新的泛滥如期来临。

也许、甚至十分可能的是，埃及人有很长一段时期对这种历法是满意的。新的一年随着新的泛滥而至。河水升起，阿赫特季于是开始，一直延续到河水退落，而这又标志着佩雷特季的开始。谷物成熟，等候开镰，这时佩雷特季告终，舍毛季来临，后者直到河水再次泛滥时终结。这一季可能长，那一季可能短，于农民其实无所谓；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劳作，而这是要随着这三个季度的更迭而变化的。

埃及人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出于何种原因，把尼罗河的泛滥与太阳和索西斯星同时在地平线上升起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的呢？这的确难以判断。这一联系无疑既来自反复的观察，又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索西斯星(天狼星)埃及语作"西皮代特"，即"尖星"，后来被

尊为埃西斯女神；据认为，尼罗河的泛滥是由她的眼泪决定的。我们由此也许可以看到把一颗神星与河水的上涨联系起来的极古老的宗教的反映。无论古埃及人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把泛滥的开始、也就是把新年的第一天与一种天文现象连在一起，便为我们推算他们漫长的历史提供了确切可靠的办法。

在孟菲斯这个地方的纬度，河水极其缓缓地升起的时间是七月半左右。看来，埃及人不消观察几年便能明白，尼罗河每隔 365 天重复泛滥一次。于是，他们把凭经验划分为三季的一年改划为 12 个月，每月 30 天，又以四个月为一季。然后，把五个多出的日子（埃及语称为五个“赫里欧雷尼佩特”，即一年中多出的五天；希腊人称为“闰日”）加上去，一年得 365 天，为古代最佳的历法。但是，这一年却仍不完整。地球绕太阳一周，实际上不止 365 天，而是$365\frac{1}{4}$天。埃及的钦定年因此每距四年便比天文年落后一天，而且只是在相距 1460 年之后，即所谓的“索西斯期”，日出、索西斯星升起、以及河水开始泛滥这三种现象才在钦定年的头一日同时发生。 10

钦定年与天文年之间这种逐渐增加的差距，带来两种重要后果：现代的天文学者于是得以推定埃及人是在什么时候采用了这种历法的；这个日期当然一定与某一索西斯期之始相一致。这些现象——泛滥之始与索西斯星的偕日升——同时出现，在我们纪元前五个千纪中不过三次，即我们纪元前 1325-1322 年，我们纪元前 2785-2782 年，我们纪元前 4245-4242 年。过去曾长时期认为埃及人采用上述历法是在我们纪元前 4245-4242 年之间；如今，普遍认为应为其次一个索西斯期之始，亦即在我们纪元前 2785-2782 年之间。

埃及人采用这种固定的阳历，其另一个后果是使由尼罗河本身涨落的节奏决定的**自然**季度与政府使用的**钦定**季度逐渐产生差距，因为后者是以 365 天为一年。差距初时几乎微不足道，每四年不过一天；后来却逐渐增加到一周、一月、两月，终而使钦定年的终始竟是在佩雷特季中期。这种差异不能不为埃及的书吏所觉察。我们掌握的文献中，有些便十分正式地指出索西斯星偕日升的实际时间与钦定年的开始二者间的距离。这些记录使我们得以推定以下几个历史年代，其间误差不出四年：

（1）　塞努斯雷特三世的统治时期，必然是在我们纪元前 1882-1879 年。

（2）　阿门霍特普一世九年是在我们纪元前 1550-1547 年。

（3）　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时期，是在我们纪元前 1474-1471 年。

把这些日期和我们掌握的史料——都灵纸草抄本、巴勒莫碑、标明各代年月的古建筑——所提供的有关日期结合起来，我们就基本上掌握了埃及的年表，而且这是古代东方所有年表中最可靠的。据此，埃及古代史始于我们纪元前 3000 年。曼涅托所划分的各个时期的日期便可标明如下：

第三至第六王朝(古王国时期)：约我们纪元前 2750-2200 年

第七至第十王朝(第一中间时期)：我们纪元前 2200-2150 年

第十一至第十二王朝(中王国时期)：我们纪元前 2150-1780 年

第十三至第十七王朝(第二中间时期)：我们纪元前 1780-1580 年

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新王国时期)：我们纪元前 1580-1080 年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三王朝(第三中间时期)：我们纪元前1080-730年

第二十四至第三十王朝(新时代)：我们纪元前730-330年。

11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于我们纪元前332年征服埃及，标志着法老埃及史的告终和希腊时期的开始(参见第六章)。

尼罗河流域的环境

这里引用一下希罗多德描述埃及的文章结尾处(II,35)的一句话，也许是适宜的。他说："不单是埃及的气候为它所独有，也不单是尼罗河的作用异于他处的河流，埃及人本身的举止习俗似乎也与世人通常的行为相反。"(引自A.德塞林库尔的译文。)当然，希罗多德写下这句话时，心中想到的不过是地中海沿岸诸国。尽管如此，埃及在非洲各国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却也属实。而这一点全由于尼罗河。没有这条河流，便不会有埃及。自希罗多德以来，这句话一再被人重复；它是一条真理。

事实上人们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尼罗河严格制约着居住在它两岸、靠它维持生存的人类社会。不过，这种制约成为无可摆脱时，埃及文明已有700年历史。埃及人因而有时间来逐步适应尼罗河的生态所加的限制。

从新石器时代之末，即大约我们纪元前3300-2400年，包括撒哈拉在内的西北非洲气候较为湿润。在此期间，埃及并不专赖尼罗河为生。河谷东西两侧仍然伸展着广阔的草原，有许多动物可供猎捕，也利于大量饲养牲畜。如巴勒莫碑所示，这时，农业仍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畜牧业——乃至狩猎——的地位至少与它相等。根据巴勒莫碑文推断，王国的显赫人物对中央政府应付的税，并不是根据他们可能拥有的土地带来的收益，而是根据交给畜牧人放牧的牲畜头数。对这一基本财富，每两年便普查一次。古王国第四王朝末年至第六王朝(我们纪元前2500-2200年)陵墓中的壁画表明，畜牧业当时在埃及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我们因此可以料想，人们想方设法控制了尼罗河——这是埃及文明的根本成就，这一成就使埃及文明得以繁荣昌盛——起初大约还不是想要更好地利用它来从事农业，而主要是为了防止河水泛滥造成损失。人们有时不免忘记，尼罗河水一旦越出河床，并非唯独带来好处，也可以造成水灾。毫无疑义，河谷的居民当初学会修堤筑坝，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村庄；学会挖沟开渠，是为了晾干他们的田地。他们于是慢慢地积累了经验。而当北纬30 12 度至15度之间的非洲的气候逐渐变得象现在这样干旱，使尼罗河谷的紧邻地区——埃及和努比亚地区都成为一片沙漠时，这种经验就十分重要了。从此以后，河谷的全部生活便受制于尼罗河的涨落。

埃及人运用他们多少个世纪以来逐步完善起来的筑堤坝开沟渠的技术，一点一点地发展了由灌溉盆地组成的灌溉体系，不仅保证自己得以在日益沙漠化的气候中继续生存，而且获得了扩张的可能(参见第四章及第八章)。这种灌溉体系原则上简单明了，操作却很复杂，而且要求同时进行。它利用了尼罗河洪水千百年来沿两岸形成的两条较高的土脊。两岸居民为了提防洪水有时来势过猛，逐渐加固了这些天然屏障，又加修贮水坝，这是真正

的人工堤。它们无疑起源于最初的居民为在洪水期间防护村落而修建的堤坝。

与此同时，沿着河流平行的方向修筑了堤坝，其结果是把埃及划分成为一系列盆地；这一体系也就以灌溉盆地为名。盆地中的土地一片平坦，每逢河水升起、洪水到来，整个盆地都被淹没；在堤坝内挖掘的与河流平行的渠道，把各个盆地一一灌满。经过一段时间，待田野已经浸透之后，再把水放归尼罗河。此外，利用河谷的自然坡度修了一系列运河，把上游河水引向地处下游的某些地势较低、但为特大洪水所不及的地区。

埃及人积累经验、逐渐学会而建成的这一体系，有若干优越之处。它保证全部耕地均匀分摊河水和淤泥，使河谷中原会继续荒芜的部分土地得到灌溉；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控制了河流和泛滥。通过盆地贮水和把上游河水经由运河分导至下游地区，便减缓了流速，以免数以百万立方米计的洪水一涌而至，所经之处万物连根拔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同时，流速既缓，便使洪水中挟带的泥土在田野上更多地沉积下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独特的灌溉体系乃是埃及文明的根基所在。它表明人类是如何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得以逐渐克服巨大的困难，成功地改变了河谷的生态。 12

通过人类的参与而造成新的生态，必须付出相当巨大的劳动。每当洪水退落，便要修理河堤、加固横坝、疏通运河。这种一年一度的集体劳动，在原始时期多半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的。进入有史时期，便由中央政府组织和监督进行。政府如果未能及时保证完成维修这一体系的各项细致工作，下一次洪水便可能把它冲刷净尽，使河谷复归于原始状态。埃及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便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要维持全体居民的生计，不能只靠灌溉体系运转正常。尼罗河洪水的特点之一是水量年年不同，差别甚大。有时大到所过之处一切全遭毁灭，有时小到不足供灌溉之用。1871-1900 年这三十年间，水量足够埃及所需的年头不过半数，可为一例。

经验很快就教会了埃及人：河流无常，不可一味依赖。为了补充周期性的匮乏，有必要储备粮食，供应居民：而且保证无论情况如何，都有足够的种子供下一季播种，这一点对于未来尤其重要。这种储备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王朝的粮库在全国各处分设粮仓。丰收时期限制消费、尽可能大量储存粮食以防河水不足或过大。政府于是从大自然手中接过担子，承担起一项极端重大的责任。

人类深刻改变了自然强加于他的环境条件，从而对尼罗河流域文明的出现和传播起了重大作用。埃及并不仅仅是**尼罗河的恩赐**，它首先是人类的创造。尼罗河流域人类学方面的问题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尼罗河谷的开拓

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如果尚未直接占据尼罗河谷，至少也已占据了它的邻近地区，尤其是俯瞰河谷的一片台地。旧、新石器时代中潮湿和干燥时期的交替(参见第一卷)，使人口密度有增有减，但总的事实是，从我们所能追溯的时间起，埃及便一贯有人类生存。

这些人属于什么种族？人类学上很少有这类曾经引起如此热烈讨论的问题。但这不是

14 一个新问题。1874年便已有过关于埃及人是"白种人"或"黑种人"的辩论。一个世纪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开罗主办的一次学术讨论会证明讨论并未结束，而且看来也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从体质角度为"黑种"下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定义殆非易事。新近，一位人类学者对于能否找到确切办法来判别某一骨骼属于什么种族表示怀疑——至少对于极古老的、例如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骨骼是如此。体质人类学者传统上应用的标准——面部标志、四肢长度、等等——如今不再为大家所公认；我们于是和前人一样，转而按照头发的性质和皮肤的颜色来识别"黑种"，当然这是按黑色素的成分而科学地测定的。但是，这两种标志的价值也旋即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一些年来，我们已经丧失了"红种"这一概念；此后如果仍按这种速度发展下去，我们就很快要面临不得不放弃"白种"和"黑种"的概念这样一种严重危险。尽管如此，把文明带进尼罗河谷的那些居民是否属于某个单一的、纯粹的种族，是十分可疑的。河谷居民的历史本身便否定了这种可能。

人类进入一座空空如也或唯有野兽的河谷，并非一蹴而就。他们在那儿逐步拓地而居，经历了几千年，在此期间无论是人类集团的密度或气候的变异都迫使他们寻求更多的资源或较大的安全。由于整个尼罗河谷，尤其是埃及位于非洲大陆东北角，它不可避免要成为不仅来自非洲别处、也来自中东——还不说来自更远的欧洲——的人们长途迁徙的终点。无怪人类学者曾经认为从他们拥有的几具非常古老的尼罗河谷居民的骨骼中能辨认出克鲁-马农人、亚美种人、尼格罗种人、卢科德姆人，等等，尽管我们接受这些名词时必须小心在意。是否存在过一种埃及种族，尚属疑问；如果有的话，也是各种种族的混合，其基本成分随时间和空间而异。如果能从河谷的每个部分，以及历史的每个时期得到相当数量的人类遗骸——事实是远远办不到——的话，这倒是可以验证的。

但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埃及和努比亚都一直存在着某一种类型的人，不过这种人不能称为一个种族，因为它在上埃及与下埃及略有不同。在南方比在北方肤色深些，总的说来，又都比包括北非在内的地中海盆地其余地区肤色深些。头发黑面卷曲，面部略呈圆形，没有胡须，在古王国时期有时留着唇髭。身材一般比较苗条。这是常见于壁画、浮雕

15 和法老塑像而令人眼熟的一种人类类型；我们尤其不可忘记，这些都是肖像；它们所描绘的都是死者本人，不是某种抽象的概念，远是埃及人在丧葬方面的信仰所规定的。

如果不考虑留传下来的肖像的总体而只取其中某一部分作为根据来判断埃及人属于某一种族，这样做诚然是容易的，但同样容易的是，也可以挑选另一些例证来推翻这种结论。事实上，显而易见，埃及艺术作品中那些常见的个人肖像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他们的"侧像，面型或直或凹，有时如塞索斯特里斯三世那样，颧骨高耸；肥胖、常是卷唇；有时鼻子略呈弓形（例如赫梅欧姆、佩比一世、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最常见的却是鼻大而直，例如凯夫伦，在南方特别常见的是扁平的鼻子和较厚的嘴唇"（让·约约泰）。

这些不同的外貌表明，我们在尼罗河谷遇见的并非一个种族，而是一种人类类型，它是由河谷所特有的生活条件和生活习惯、同样也是由混血形成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贝莱德村长"的雕像；这座像被发现时，距离雕成已有4000多年，却与当时赛加赖村村长一模一样。十分可能的是非洲种族，无论其为黑为白，在古埃及人中占压倒优势；但限于我

们目前的知识，还不可能作出进一步的判断。

文字和环境

以图画来象征事物，这一方法久已放弃，但如以象形文字体系为标准，则埃及是第一个使用文字的非洲国家。据碳-14测定法所示，可以推定它的发明是在安拉蒂亚时期、亦称纳加达一世时期（参见第一卷），大约在我们纪元前4000年，即有史时期之始。因而这是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之一。它发展得很快，据埃及有史时期的头一件文物即纳尔美尔片岩板所示，那时，这种文字系统便已经确定下来，时期可以推定为我们纪元前3000年。此外，符号中所用的动植物也都基本上是非洲本土的。

埃及文字基本属于图画字，与古代许多文字属同一类型。但是，以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为例，原先的图画符号朝着抽象的形式迅速发展，埃及的文字体系在整个历史上却始终不变。

埃及文字中，任何一种能画得出来的物体或生物都用作一个文字符号：要写"鱼叉"或 16 "鱼"这个字，书吏只消画一把鱼叉或一条鱼。这称为词符号，因为一个符号便代表了一个词。整个法老文明时代，这一原则一直沿用，书吏们于是有可能根据需要随时大量创造新的词符号，用以表示这一体系初建立时尚未得知的生物或物品，例如马或马车。图画文字也能表示**动作**。例如动词"跑"或"游泳"，书吏只需画一个人在跑或在游泳即可。

图画体系尽管有许多巧妙办法，却表达不出"爱"、"记忆"、"成为"一类的抽象词。为克服这一困难，埃及人只得越出纯粹的形符范围，采取另外两条原则：一是**谐音**，一是**会意**。正是由于这三者——纯粹的形符、谐音和会意——**同时并用**，才使得今天要译解象形文字如此之难。在埃及文字中，有些符号音义合一，有些只表明一个词的音，有些又只表明一个词的意义。

谐音原则是简明的：例如口语中"棋盘"这个字读作"men"。按照这个原则，代表棋盘的形符既可用于指这一物件本身，也可按**读音规则**随意指其他的同音词，亦即所有读作"men"的词，其中包括"稳定"这个抽象词。同样地，代表"锄"的形符读作"mer"，可以用来表示动词"爱"，因为"爱"也读作"mer"。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形符便成为音符。"棋盘"和"稳定"都作"men"，"锄"和"爱"都作"mer"。由于一对一的这类简单的同音词相对地说为数较少，因此这种新发明的办法的作用也就有限；于是书吏们把它加以推广，进而用以构成复合词。举一个例子，"建立"这个抽象动词读作"semen"，没有单个的同音词；他们便利用两个形符的音值：一种编织物，读作"(e)"，棋盘读作"men"，把这两个形符拼到一起，语音作s(e)+men=semen；这个复合词便意为"建立"、"开办"。发展到这个阶段，埃及书吏便掌握了一种工具，能利用形符把埃及语言中无论多少复杂的词从语音上表达出来，只消把这个词划分为若干个音、每个音又都能用一个读音近似的形符来标示即可。在我们纪元前3000年左右的"泰尼特"时期，象形文字便已发展到这个阶段，这表明在此之前它已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时期。

这样一种体系有着若干缺点。它必然需要使用相当大量的符号；如所周知，常见的便

达四百以上，这就使读者不知道应当怎样识别。就以一只小船这样一个图形来说，这是相当简单的。但是，是应当认作帆船、大船、小船、小艇，还是别的什么呢？此外，也不可能一 17 眼便认清某一形符是当作词符来使用、专指它所代表的物件呢，还是当作音标来使用的。

第一种困难较易克服。书吏采取了一种习惯做法：在专指某事物本身的词符后面，加上一条垂直的线。解决第二种困难，则是靠一套逐渐形成的复杂体系，埃及学学者称之为“声旁”。它包括24个词符，其中每一个都仅有一个辅音，书吏们逐渐把它们用来作为读音符号。举一个例子，代表放面包的垫子的符号，读作“hetep”。习惯上，在把这个词符用于标音时，就在它后面加上两个符号：“面包”，读作“t”；“坐位”，读作“p”。这两个符号向读者表明，这个词符在此读作“hetep”。

这24个符号显然起着我们的字母的作用。由于它们表示了埃及语的全部辅音，而埃及语又和阿拉伯语及希伯来语一样，均不写元音，它们其实便已是字母表的萌芽。因此，埃及语中已没有什么词不能利用这些符号来书写。但埃及人从未朝着这个方向跨出最后一步；他们远不是仅仅使用这种简明的、几乎是字母的符号，而是把自己的书面语进一步复杂化了，至少外观上是如此。他们除用作音标的符号和声旁之外，又加上了新的纯属表意的符号，把它们置于词尾，使人们有可能一望而知这些词属于哪一词类。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例如“打击”、“杀”，后面接着一个图形：一只持有某种武器的人手。表示抽象概念的动词，例如“思考”、“爱”，后面便有表示一卷纸草的图形。同样地，例如“盆”这个名词，后面便有表示“水”的表意符号，即三条横书的波状线；外国的国名后面则有表示“山”的符号，从而与一片平旷的埃及相区别，如此等等。

如果说埃及人一直未曾采用一种简化的书写法——我们所获得的文稿之中，用字母拼写的只有一种，而且年代很晚，很可能是由于埃及各个邻国所用的字母拼写法的影响——这种保守无疑由于形象本身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表示形象的符号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形象具有一种潜在的魔力。直到我们纪元前1700年，书吏们有时还把表示危险动物的形符故意弄得残缺不全，至少对他们认为属于危险的一些动物，便照此办理，如断掉蛇尾，去掉某些鸟的脚。形符具有魔力这一点遍及一切。例如一个人有意害人时，便把这个人的**名字**从一切雕刻或书写中仔细地凿去或擦去。实际上，名字便是这个个人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便是**这个人本身：毁灭了名字，也就毁灭了人。

有词符、有多音节的音标、有声旁、有限定性的表意符号——形形色色，有的发音， 18 有的又不发音——由这样一种错综的体系构成的象形文字诚然可谓复杂，但同时却也富于启发性。表意符号把词划分得清清楚楚；句子之中严格的词序——动词、主语、宾语——便于理解；现代的译者所遇见的困难，是由于许多词的确切含义我们有时还不明白。但既有了表意符号，我们便知道应当把它们划入哪一词类。

常有这样的暗示，说埃及象形文字若非东方侵略者带入尼罗河流域，便是埃及人自已借自美索不达米亚。至少可以说，就我们从有史时期之始、即约我们纪元前3000年左右的法老埃及的文字中所见，看不出这样一种借用的迹象。相反，倒是可以一步步追溯它缓慢地逐步形成的各个阶段：从纯粹的图画文字到复杂的音符，到声旁，终而至于意符。有些用来标音的符号所表示的物件，在写第一批文件时已经不复使用；这就证明这种文字创

始于史前时期，那时这些物件是使用的。最后、也许是最重要之点是，这一古老象形文字的全部符号，都取自尼罗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动植物，从而证明这种文字纯然起源于非洲。如果要接受埃及文字的创造有外来影响的学说，至多只能说是使用文字这种念头方面的影响；但即使这一点也未必可能。埃及之有文字，是在我们纪元前四千纪；为时如此之早，考虑到这一点，问题也就清楚了。

推动象形文字在尼罗河流域得以发明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无疑是河谷居民需要以协作的方式统一行动，防止周期性地威胁着他们的灾难，其中之一便是尼罗河的泛滥。一户人家、一群人家、乃至一个小小的村庄都无力作出充分准备，防御河水猛涨；但如有大量的人群齐心协力，情况便不如此。埃及的地形结构也有利于结成这样的集体。河谷上下宽狭不一，或则仅容河流通过，或则向四外扩展，形成一处处大小盆地，有的相当宽阔。这些天然盆地各成一个地理单元，都具有相当的潜力，可以发展农业。看来它们早就具有一种倾向，即迅速发展成为小小的政治实体，由本处盆地中最大的居民区掌权，这个居民区的保护神祇便成了盆地全体居民的保护神祇。这很可能便是州的起源，当有史时期破晓之际，它们即已形成。

上埃及(亦即赛伊德)划分成一系列界线分明的自然盆地，在地理上与下埃及亦即三角洲很不相同，二者形成鲜明对照。在后一地区，尼罗河本身分成若干支流，把土地分割为若干单元；它们与上埃及迥然不同，但彼此之间的差别却不如赛伊德的各区之间那么明显。 19

此处必须提醒：“上”“下”埃及这两个传统名词不可误用于法老国家的形成时期。就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王朝前的文化来说，我们所称的上埃及往南不超过卡卜地区，往北止于法尤姆邻近之处。它的政治中心在底比斯盆地的奈卡代，但后来却往北下移至阿拜多斯地区，这是又一个天然盆地，它将在埃及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下埃及始于法尤姆，在北部以三角洲为终点。在这样古老的年代，它延伸到什么地方，我们所知甚少。但看来它没有达到海边。它的中心位于现代的开罗-赫利奥波利斯地区。

在法老埃及的这个摇篮，南部各盆地的势力至少与北部相匹敌。而且，由于南部各盆地独具的特色，它的力量要组织得更好些。因此便不难了解，何以南部联盟竟能征服北部各州的联盟，而在整个河谷推行一种统一的文化。

南部各盆地各有一个相应的小小的政权，它们都具有充分人力来承担为本州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集体工程，例如加固河岸，他们终于把它逐渐修成了真正的河堤（参见上文），然后又兴修堤坝来防护村庄。劳动要有成效，就必须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即使不曾促成文字的创造，至少也必然促进了文字的迅速发展。为了保证完成必须在一定时限——收获之后，河水再次上涨之前——以内完成的任务，便有必要给分散相当广的大量人群发布命令，分配工作，安排先后顺序，准备工具(即使是极其原始的工具)，就地为劳动者准备伙食——这一切都要求具有哪怕是最简单的行政机构。要使机构有效率，便要能够预见、计划和指导工程的各个阶段，而这种指挥中心有时又必然远离进行工程的地点。若不是有文字这一无可比拟的工具来记录最基本的数据——人数、食粮、要修建的堤坝高度——尤其是把命令迅速下达全州各地，很难想象这一切如何能办到。

美尼斯于我们纪元前3000年从政治上统一埃及，必然进一步加速行政管理和文字这二者的发展。实际情况是首脑人物所要关心组织的已不再是仅仅涉及局部地区居民得失的20 一些工作，而是事关全国利害的工程。这个国家的特点之一是它的领土极长，结果是发布命令的首都便总是和国内很大一部分地区相距甚远。此外，由于洪水量的变化无常（参见图片导言. 4），中央政府的职责之一便是在丰收之年尽量储存粮食，以补救总是会突然发生的灾荒。因此，国家的领袖——在此时期也就是法老——必须知道国家有多少储备，以便需要时可以在灾荒最为严重的地区或是配给或是分发存粮。这是埃及经济组织的基础，实际上也是埃及得以生存的基础。这就要求有一种复杂的会计制度，把消费品和人员的出入增减计算清楚。由此可以说明古代埃及文明中书吏所起的重要作用。

书吏于是成为法老制度中的关键人物。从第三王朝（大约我们纪元前2800年）起，国家的最高级官员在令人为自己造像时总是要肩挎文具匣；古王国的王公们也总是要把他们的雕像塑成盘腿而坐的书吏模样（参见图片导言. 4）。有一段著名的传说，说国王本人竟亲手执笔，准备记录一位先知要告诉他的话。魔力总是与文字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愈益增加了书吏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得知事物的名称，也就得到了驱使它们的力量。埃及文明全仗书吏；有了文字，埃及文明才得以发展。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将埃及和努比亚尼罗河谷加以对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字在埃及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存在的原因。努比亚位于第一瀑布以南，居民的构成与埃及相同。但努比亚人一直不愿使用文字，虽然他们与埃及河谷长时期保持着联系，不会不知道使用文字。不使用文字的原因似乎在于生活方式的差异。埃及人口稠密，国家命脉全靠灌溉和控制尼罗河，这种需要把他们束缚于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其中每一个人都对国家的发展分担某种特定的职责。

另一方面，努比亚居民在历史的破晓时期所具有的物质文明若不超过、至少也等于上埃及，但他们分成了较小的集体，而且相距较远。这些集体较为独立，也更加流动，因为畜牧业要求人们经常迁居。努比亚的尼罗河谷比埃及的河谷狭窄，农业十分有限，畜牧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至少与农业相等。努比亚人因此对文字不觉得有什么需要，他们的语言此21 后长期停留在口语阶段，极少使用书面语。偶或一用，看来也只限于宗教目的，或是当他们臣服于某一君主制的中央政权之时（参见第十章，第十一章）。

两处居民的种族成分相似，做法却不相同，这就突出表明了一种反常的事实：一处居民采用了、也许甚至是创造了一种文字系统；另一处居民则虽知道有这种文字，却弃而不顾。控制尼罗河的迫切需要所强加于河谷下游居民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文字的出现和发展，又转而使他们创造了世界上头一批伟大的文明之一。

非洲埃及——兼收并蓄的国度

我们纪元前3700年左右发生了一桩大事，尼罗河谷两个文明中心的物质文明趋于统一；或者准确一点说，南部中心在保持自己的特色的同时，部分吸取了北部中心的文明。北部文明之向南方渗透，常被认为和两件事有关：一是文字的发明，另一是在埃及出现了

比当地人先进的侵略者。

就文字来说，上文已经讲到埃及的文字纯粹起源于尼罗河谷、亦即起源于非洲的说法不仅不能排除，而且很可能反映了实际情况。至于外来的、主要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的侵入有何影响，证据却极其不足。埃及文明虽然出自独创，并且渊源久远，却也不能掩盖它曾接受了种种外来的影响这一事实。它的地理位置就规定了它具有这样一种倾向。

新石器时代末期以及整个王朝前时期(埃及文明便于此时形成)的相对湿润的气候，使红海和尼罗河谷之间的阿拉伯沙漠具有某种不妨称之为可渗透的性质。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顺便提一下，其重要性有可能是被夸大了——无疑正是通过这条途径传到埃及的。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关于埃及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与撒哈拉东部文化的接触，我们所知极少。刻在王朝初期片岩板上的若干符号，使我们多少得以推想利比亚沙漠居民与尼罗河流域居民之间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向北的一面，埃及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之间经由苏伊士地峡发生的联系，看来在极早的古代不如古王国成立之后那么密切。但同样也有曾和巴勒斯坦接触的极其古老的踪迹可寻，而关于奥西里斯死神的传说，便可能产生于三角洲文明中心与林木覆盖的黎巴嫩海岸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出现的年代必然极其古老。

和南方的关系似乎一目了然，要清楚得多，但其重要性却难以估量。从我们纪元前四世纪起，第一瀑布以南的人们(参见第十章)便与尼罗河下游交往密切。在王朝以前和王朝初建时期，两地人群曾就制陶技术和涂釉陶器（埃及的彩釉陶器）的技术进行了大量交流。他们有同样的神话，使用相似的武器，同样相信人死后灵魂继续存在，他们的丧葬仪式也有相似之处。通过这些接触，埃及人必然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和非洲更远处的各族人民发生关系；根据从最古老的埃及墓中所发现的许多象牙和乌木制品就可以推知这一点。即使我们承认在古代乌木的生态分布界限比今天还要往北，但距下努比亚仍然很远，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证据，证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埃及有过接触。除象牙和乌木之外，香料——它很早便已出现——和黑曜石这两种不产于尼罗河流域的东西，埃及人也可能都曾进口。通过这种贸易，技术和思想便都更易于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因为如上所述，埃及人有不少的非洲人血统。

22

由此可见，无论我们转向东南西北哪个方向，都能看到埃及人接受了外来的影响。但这绝未深刻影响到埃及固有文明的独创性，它在尼罗河两岸逐渐形成，然后转而影响它周围的地区。

我们所掌握情况中的模糊之点

要估计外来影响对尼罗河谷早期文明可能起过的作用，就需要通过考古充分掌握这一整个地区远古时期的知识。

必须具有十分全面的知识，才能把在埃及发掘到的古代文物和邻近地区的文物互相比较，明确有哪些是属于输入或模仿；这是发生过大规模交往的唯一切实可靠的证据。

但是，虽然我们对我们纪元前四千纪的上埃及和下努比亚(位于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

的考古成果相当清楚，尼罗河流域的其余部分情况却并非如此。特别是对于王朝以前和王朝初建时期的三角洲，除了位于沙漠边沿地带的个别地点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关于在此期间从亚洲经由苏伊士地峡或地中海岸传来的影响的一切说法，都属于推测性质。

研究第二和第六瀑布之间的尼罗河上游，我们也遇到同样的困难。尼罗河谷中属于埃及的部分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接触和贸易，必定就在这一地带进行；因此，我们对这片广大地区从考古学角度来说竟一无所知，就更加令人遗憾。这种无知使我们无从把新生的法老文明的成就，与尼罗河上游以及与尼罗河以东、以西和以南各个地区萌发的文明的成就互相比较。第五和第六瀑布之间新近的发现初步表明，王朝以前时期的上埃及与北纬十七度以南的苏丹之间如果未曾有过直接接触，至少是在葬具和日用家具的形状和装饰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妨说，从空间角度看，我们知识不足，从时间角度看也是如此。法老文明历时3000多年，但我们对其中大约三分之一即长达千年左右的一大段时间中埃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或所知极少。法老们的历史分为强盛时期和衰落时期(参见第二章)。每逢皇室兴隆，权集中央，便有许多文件文物留存下来，使我们确有把握说明当时的重大事件。这些时期通常称为古王国(我们纪元前 2700-2200 年)、**中王国**（我们纪元前 2000-1800 年）和**新王国**(我们纪元前1600-1100年)。另一方面，每逢中央政权削弱，我们知识的源泉便缩小乃至枯竭；法老历史因而有些篇章全告阙如，埃及学学者称之为中间时期。一共有三个中间时期。第一个我们纪元前 2200-2000 年，第二个我们纪元前 1800-1600 年，第三个我们纪元前 1100-750 年。此外，再加上迄今仍所知甚少的法老王朝初期（我们纪元前 3000-2700 年），埃及历史中便共有十个世纪以上的时期若非一片空白，至少也很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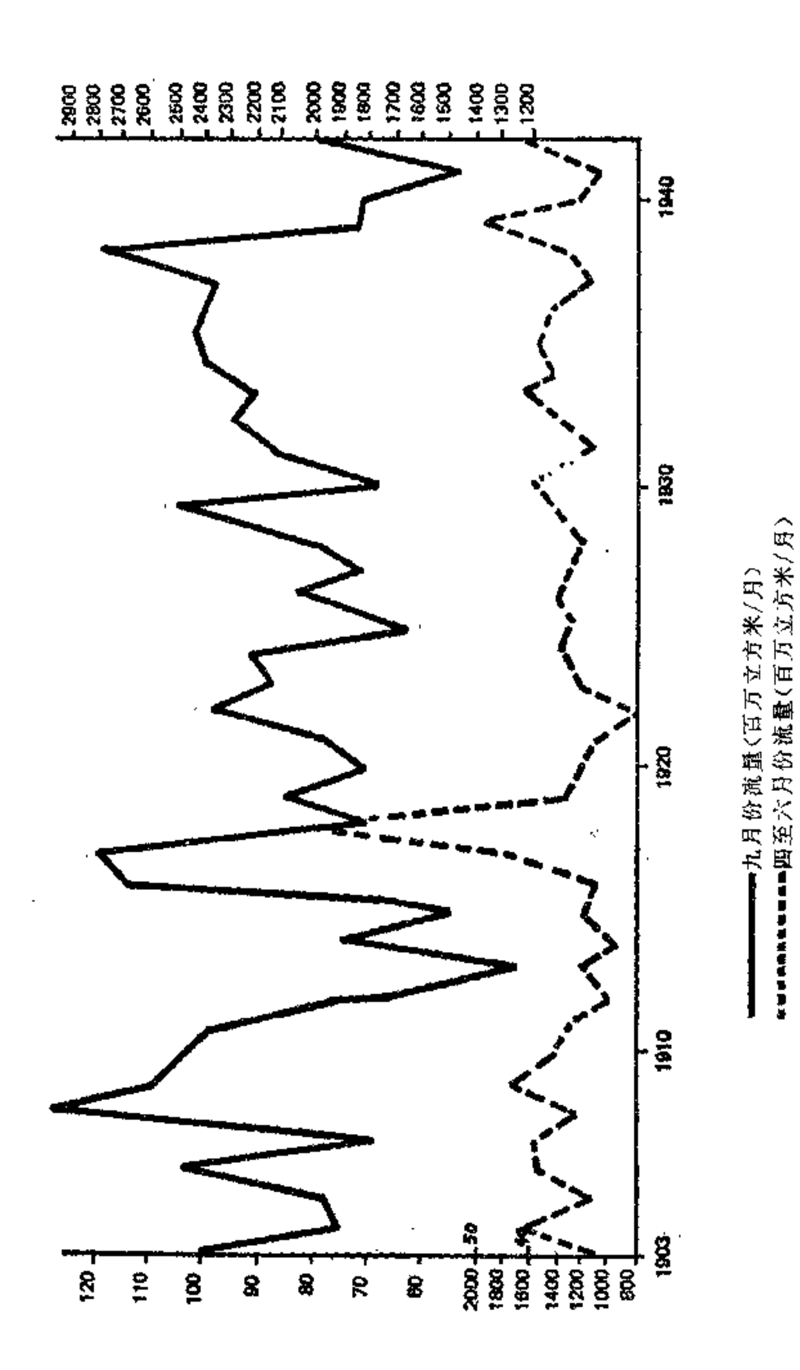
结　论

我们对法老文明的了解虽然存在上述不足之处，这一文明在古代非洲历史中却居于领先的地位。通过它的建筑、它的典籍以及它使昔日的旅行家产生的兴趣，给我们留下大量的材料，使我们得知古代非洲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否则我们是根本无法问津的。

法老文明尽管极其突出，但若要复现非洲大陆的历史，我们关于古代埃及和努比亚的知识很可能还是微不足道的。尼罗河谷四邻各国的古代遗址一旦更好地加以调查，更为人们所了解时，埃及和尼罗河苏丹便将为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提供进行对比和确定年代所不可或缺的资料，从而复现往昔生活的情景，研究文化的交流；正是这种交流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构成了非洲历史的纵经横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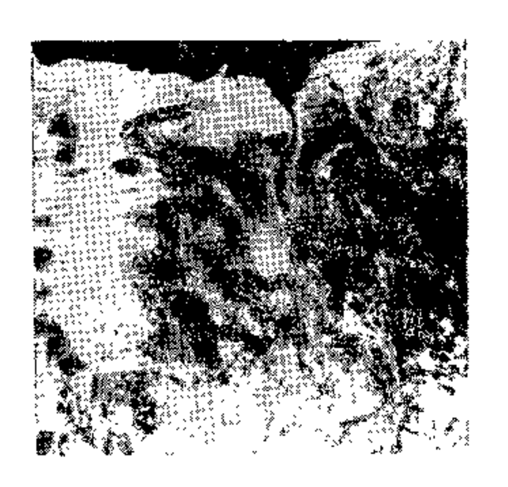
（冯世则译）

24



导言插图.尼罗河水的季节性变化(摘雅克·贝桑松:《人类与尼罗河》，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57年，第79页)

25



图片导言.1 尼罗河洪水骤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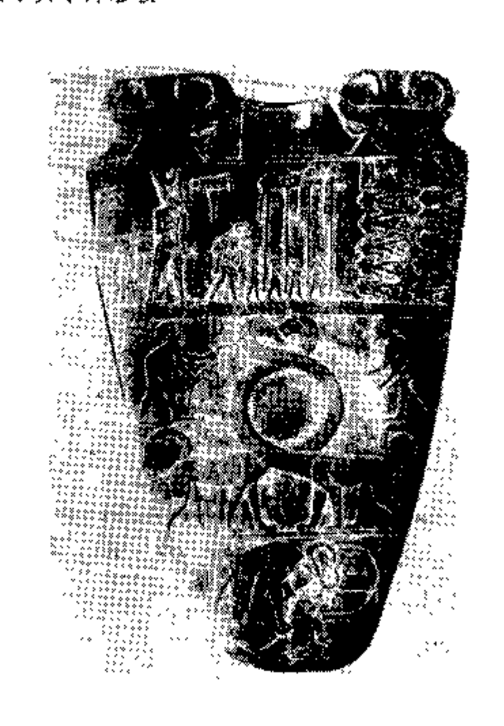


图片导言.2 巴勒莫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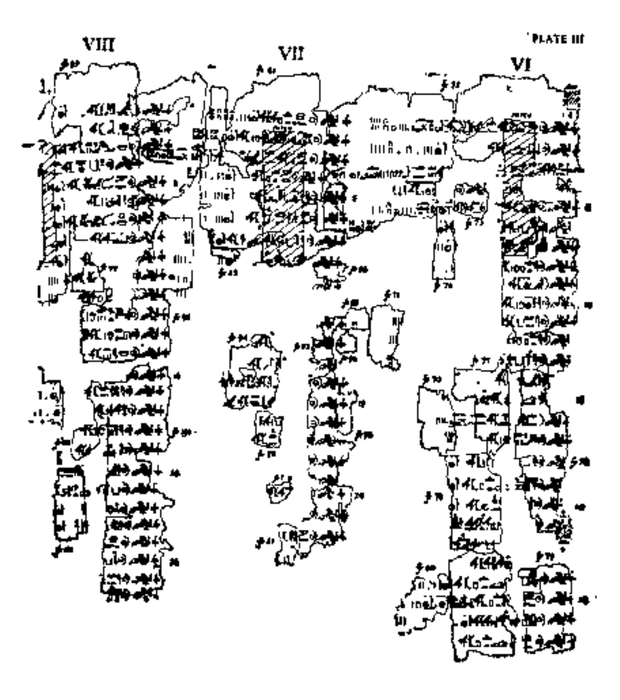
图片导言.3 纳尔美尔片岩板







图片导言.4　盘坐的书吏雕像　　26



图片导言.5　都灵纸草书

27

古埃及人的起源

1

谢赫·安塔·迪奥普

自从利基教授的研究成果、即人类发源于非洲的"一祖论"假设被普遍接受以后，已经有可能用全新的见解提出人类在埃及、乃至在全世界的生息繁衍问题。15万余年之前，已有和今天的人类形态相同的生物存在，他们出现于尼罗河发源处的大湖地区，而不见于其它地方。这种观念、以及限于篇幅难以在这里一一综述的别的一些观念，构成了已故的利基博士于1971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七届泛非史前史会议提出的最后报告的主要内容。① 这就意味着，恰如古人所猜想的那样，全人类同出一源，而且都发祥于月亮山麓。人类正是从**此处**出发而遍布全球，这一点完全出于一切料想之外，乃是对新近的各种假设的挑战。从这点出发便引出两桩至关重大的事实：

（1） 最初的人类必然属于同一人种，而且都是尼格罗种人。按格洛吉尔氏定律，在温暖潮湿的气候中进化的热血动物，会分泌出一种黑色素（真黑色素），② 而人类看来也不例外。因此，人类如果起源于约在大湖地区那种纬度的热带，从最初起便必然具有棕色色素；只是由于在其它气候中产生分化，原来的人种后来才分成了不同的种族。

（2） 早期的人类由此外移，分布于其他大陆，只有两条道路可循。这就是撒哈拉与尼罗河流域。此处只讨论后一地区。

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王朝时期，整个流域逐渐为这些尼格罗种人所占据。

28

从体质人类学角度对古埃及人种族提出的论据

人们很可能以为，人类学者们既然是很据生理学方面的证据来进行研究，他们的发现应当能提供可靠而确切的结论，消除一切怀疑。但事情绝非如此。单就他们所采用的标准的武断性来说，在科学上就引起了许多琐屑无益的纠缠，而且任何结论都非加上某种限定条件便无法接受。这就令人不禁有时怀疑，如果我们未曾从这个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也许反而较易于求得答案。

尽管这些人类学研究的结论未能充分揭示事实真象，但有一点还是一致肯定的：从最古老的史前时期直到王朝时期一直存在着一个尼格罗种族。此处不可能全部转述这些结论，

① 《第七届泛非史前史及第四纪史研究会议记录》，1971年12月。

② 蒙塔古（M.F.A. Montagu），1960年，第390页。

好在埃米尔·马苏拉德博士在他的《埃及历史及史前史》(人种学研究所，巴黎，1949年)第十章中已有扼要的介绍，我们就从中摘引一二如下：

> 福西特女士认为，所收集到的涅加达赫人颅骨的一致性足以证明曾经存在一种涅加达赫种人的假设是有根据的。按颅骨总长度、耳廓高度、面部的长和宽、鼻长、头指数和面指数，这一种人似接近尼格罗种人；按鼻宽、眼窝高、腭长和鼻指数，似又近于日耳曼人；因此，王朝前时期的涅加达赫人很可能有些特征与尼格罗人相似，另一些特征则与白种人相似。(第 402-403 页)

值得指出，埃塞俄比亚人和达罗毗荼人的鼻指数，似都近于日耳曼人，虽然两者都属黑种。

这些尺度使人们得以就尼格罗人种和日耳曼人种这两大极端之间任意作出选择，由此可见所采用的标准的伸缩性。下面有一个例子：

> 汤姆森·麦基弗和兰德尔·麦基弗曾试就阿姆拉、阿拜多斯及侯等地收集到的各种颅骨中尼格罗种成分所占的比重，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他们把这些颅骨分作三组：(1) 尼格罗种颅骨 (面指数低于 54、鼻指数高于 50：亦即短阔面和阔鼻)；(2)非尼格罗种颅骨 (面指数高于 54，鼻指数低于 50：长狭面和狭鼻)；(3)中间颅骨 (面指数或鼻指数可划归上述两组之一者，加上少数与两组之一极其接近的颅骨)。尼格罗种人的比例，看来在王朝前时期的早期男性占 24%、女性 19%；王朝前时期的后期男性占 25%、女性 28%。 [29]
>
> 基思对汤姆森·麦基弗和兰德尔·麦基弗用以区分尼格罗种和非尼格罗种颅骨的标准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把同样的这些标准用于测量任何一组当代英国人的颅骨，其结果必会发现其中有 30%左右为尼格罗型。(第 420-421 页)

可以断言，基思论述的逆定理也可以成立；就是说，如果把这些标准用于当代黑非洲的一亿四千万黑人，那就至少有一亿黑人会被抹上一层白皮肤。

还不妨指出，尼格罗种、非尼格罗种与中间型的区别是不清楚的；事实是，“非尼格罗种”并不意味着白种，尤其不是“中间型”。

“法尔肯伯格在一本新作中再次展开了关于埃及居民的人类学研究，他对分属从王朝前时期早期直到现代的 1787 个男性颅骨加以考察，把它们主要分为四组”(第 421 页)。将王朝前时期的颅骨分类划入这四组，这一时期分类结果如下：“尼格罗种人36%；地中海种人33%；克鲁-马格诺种人 11%。其余 20%不属以上任何一种，但接近于克鲁-马格诺种人或尼格罗种人。”尼格罗种所占比例显著高于汤姆森·麦基弗和兰德尔·麦基弗所说的比例，而基思则认为他们所说的比例太高。

“法尔肯伯格的这些数字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呢？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决定这一点。但如这些数字准确的话，王朝前时期的居民便远非如埃利奥特-史密斯所说的那样为一纯粹的种族，而是至少包含三个截然不同的种族成分——三分之一以上为尼格罗种，三分之一为地中海种，十分之一为克鲁-马格诺种，而五分之一为程度不同的混血种”(第 422 页)。

这些结论的要点在于尽管它们各有出入，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却证明，在王朝前时期埃及居民的基础是黑人。因而这些结论与那种认为尼格罗成分只是在后来才渗入埃及的理论

互不相容。恰恰相反，事实证明这一种族成分与埃及历史相终始，一直处于优势；特别是——此处需要再次提起注意——“地中海种”并不与“白种”同义，埃利奥特-史密斯所谓“棕种亦即地中海种倒比较近于事实。”“埃利奥特-史密斯把这些原始埃及人划为他所谓的棕种的一个分支，这种人种也就是塞尔基说的‘地中海种或即欧非人种’。”在这段文字中，“棕种”一词指肤色，不过是“尼格罗种”的婉辞。事情于是清楚了：原来埃及居民全都是尼格[30]罗人，③唯一例外，是在王朝初期渗入了若干白种游牧民族。

皮特里对埃及种族的研究中，介绍了一种大量存在的因素，可据以划分种族，这不能不令人惊异。

> 皮特里……仅仅利用埃及人留下的肖像进行研究，发表了关于王朝前时期和王朝初期埃及人种族的论文。除肥臀人之外，共分出六种不同类型：鹰钩鼻型，代表白皮肤的利比亚种；“辫状胡须”型，属于某一入侵的种族，可能来自红海海岸；“尖鼻”型，大致可以确定来自阿拉伯沙漠；“翘鼻”型，出自中埃及；“突出胡须”型，出自下埃及；“狭鼻”型，出自上埃及。这样一来，以图像为根据，在我们所探讨的时期中，埃及便曾有过七种不同的种族类型。看了下文将会明白，骨骼的研究不会给这些结论提供多少根据。（第391页）

上述这种分类方式，表明了用来判别埃及种族的标准的武断性质。即使如此，有一点是明确的：人类学远未证明有过一种白色的埃及人种，而是倾向于说明情况恰恰相反。

尽管如此，在当前的一些课本中，这一问题却被压下不提；多数情况下只是简单生硬地断言，埃及人是白种，而老实的外行们便得到了一种印象，以为这种论断肯定是以坚实的研究为根据的。但如本章已经表明的那样，并不存在这种根据。于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便被引入歧途。当前，许多权威学者避开了这个难题，一味谈论什么红皮肤和黑皮肤的白种人，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逻辑之处。“希腊人称非洲为‘利比亚’，纯属用词不当，因为除所谓的利比亚人外，非洲还有许多别的民族，利比亚人属于北部或地中海沿岸一带白种人中的一种，因而与棕(或红)皮肤的白种人(埃及人)相去很远。”④

一本为中等学校编写的教科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判别黑种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皮肤颜色(因为存在着黑皮肤的‘白种人’)而是他的容貌特征：厚唇、扁鼻……。”⑤正是通过对基本定义的这种歪曲，把埃及种族抹成白色。

我们大可回想一下上世纪和本世纪初的人类社会学理论家们的吹嘘，他们那种精妙的[31]面相分析法甚至在欧洲、尤其在法国，也找出了种族间的层次等级，而事实上当时只有一个民族，如今则更加浑然一体了。⑥今天的西方人珍视自已的民族团结，小心翼翼地避而不

---

③ 使用所述方法，对于这一种族的色素还可作进一步研究。事实是埃利奥特-史密斯常常在尸体上发现一片片残余的皮肤；导致皮肤损坏的木乃伊制作法当时还未使用。

④ 德佩德拉尔(D.P. de Pedrals)，第6页。

⑤ 《地理》，五年级课本，1950年。

⑥ 贡普洛维茨(L. Gumplovicz)在他的著作《种族斗争》(1883年)中断言，组成一个民族的各个阶级，总是表现为不同的种族，其中有一个种族通过征服其他种族而建立了自已的统治。G. 德拉普格(G.de Lapouge)在18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假设了不下一打的“人类社会学根本规律”，其中典型的如：“财富分配律”断言，在欧罗巴-阿尔卑斯人种杂居的国度中，财富的多少与头指数大小恰成反比；“城市指数律”——阿蒙在研究巴德纳新兵时大为赞扬，这条规律断定，

用这样一种制造分裂的假设来考察自己的社会，但却不假思索地继续把这一套老办法应用于非欧洲社会。

原始历史时期人的形象及其在人类学上的价值

弗林德斯·皮特里从另一角度研究人的形象，表明古埃及人属于黑种。他认为他们是阿努人。人们知道，从原始历史时期起便有这种人存在，他们的名字以三根杠子这样一种形式"写"在从我们纪元前第四千纪末期保存下来的极少的几篇铭文中。当地的土著总是以某种表明其统治地位的特殊图案加以表示，在偶或发现的其他种族的画像中找不到这种图案；其他种族都被画成处于仆奴地位、从外地渗入尼罗河流域的异族分子（参看皮特里的著作中划归为一类的特拉·内特⑦ 和斯科皮奥王："斯科皮奥王……属于阿努人之前的种族，此外，他也崇拜明神和塞特神。"）⑧。

下文将会讲到，明神和埃及的主要神祇一样，在埃及本土的传说中称为"伟大的尼格罗人"。 32

皮特里约略地论述了与土著黑种人争夺尼罗河流域的种种不同类型的外族人之后，对阿努人，亦即土著黑种人，描述如下：

> 除属于北部和东部的这些类型外，还有土著种族阿努人，一称安努人（书写为三根杠子），他们是史有明文的居民的一个部分。如果把用一根杠子来表示的名称都包括进去，问题就纠缠不清；但如我们只限于追索用三根杠子来书写的安努人，便会发现他们占据了埃及南部和努比亚，而且这个名称也用于西奈和利比亚。关于南部埃及人，我们拥有一件极重要的史料，这便是阿拜多斯早期神庙中发现的一位酋长特拉·内特的肖像，是一种用粗糙的手法塑造在绿釉陶器上的浮雕。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名片，名字前面有他的住址，名片全文如下："赫门城，阿努宫，特拉·内特"。赫门是图菲厄姆神的名字。在它对面的埃尔门特则是南方的安努的宫殿，称为安努门蒂。南部的下一个地方是昂提（杰费莱茵），再下一处则是奥尼特塞尼（伊斯纳）。⑨
>
> 阿梅利诺按照地理位置顺序，把安努族黑种人沿尼罗河流域修筑的城堡列表如下。

[illegible] }＝ 安特＝(伊斯纳)

城市居民中的长头型要比邻近农村居民为多；"等级划分律"则表述如下："任何地区，社会等级愈高，头指数愈低而长头型比例愈高"。这位作者还在《社会选择》中毫不迟疑地断定，"封建时期的统治阶级几乎毫无例外属于各种'欧罗巴人'。因此，穷人之处于社会的底层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由于他们天生的低劣。"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宣称，法国革命必须看成是阿尔卑斯山种短头型人对北欧种长头型人的造反。我们从这种说法可以得到证明，德国种族主义并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A.居维利埃(A·Cuvillier)，第155页〕。

⑦ 皮特里(W.M.F.Petrie)，1939年，图1。

⑧ 同上，第69页。

⑨ 同上，第68页。

[hieroglyphs] }= 安＝南部的“昂”
（现名埃尔蒙西斯）

[hieroglyphs] }= 丹代拉，传说为埃西斯女神诞生地

[hieroglyphs] }= 提尼斯州一座也称为“昂”的城市

[hieroglyphs] }= 称为北部的“昂”的一座城市，即名城赫利奥波利斯

33 沿尼罗河定居的安努人共同的祖先，称为安尼或安，这个名字是由 [hieroglyph] (khet)这个词表示的；从《死者书》的最早几份开始，这个词便用以指奥西里斯神。安尼神 [hieroglyph] 的妻子是女神安内特 [hieroglyph] ；恰如埃西斯是奥西里斯的妹妹一样，安内特也是安尼的妹妹。

普莱特已经证明，安神与奥西里斯是同一神祇；[10] 应当提出，阿诺人(？)也把奥西里斯称为“奥西里斯・安尼”。安努神有时写作 [hieroglyph] ，有时又写作 [hieroglyph] 。如今在尼罗河上游定居的奥纳克部落与古代的安努人是否有血缘关系呢？这个问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作出回答。

皮特里认为，有可能把下述两种人加以区分：其一是以特拉・内特和斯科皮奥王（他的头饰证明，他当时便已是一位法老）为代表的王朝前时期的人；另一种是王朝时期的人，他们以隼为崇拜对象，很可能以纳尔美尔[11]、哈塞赫姆、萨内凯、佐瑟[12]等法老为代表。如果比较一下复制图片中所表现的他们的相貌，不难看出这两种人其实同属一个种族，都是黑种人。

耶拉孔波利斯第63号（按日期先后编号）墓中的壁画，描绘着当地土生土长的黑人战胜侵入尼罗河流域的异族人的情景。皮特里便是这样解释这幅画的：“下面是在耶拉孔波利斯的那艘黑船，它属于黑人，这些黑人正在击败红种人。”[13]

阿拉克山的燧石刀刀柄上描绘着类似的战争景象：“也有黑种人战胜红种人的战斗。”[13]但是，这把刀不是在原地发现，而为一个商人所有，因此它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不如前面讲到的一些东西。

以上所述种种，表明原始时期人的形象、甚至王朝时期人的形象，都与西方人类学者中普遍存在的埃及人种的观念格格不入。可以说任何地方的当地人种类型；只要大致清晰，都显然属于尼格罗种人。甚至连侍候当地酋长的普通自由民也不是印欧人和闪米特人，这两种人毫无例外都是以被征服的外国人出现。发现极少的一些画像，他们总是带着显著的

34 俘虏标志，双手或是反绑在背后，或是尽力高举。[14] 有一尊王朝初期的小坐像，塑的是一个印欧种的俘虏，长辫下垂至膝，双手绑在身上。这个雕塑品本身的特征表明，它原是一

[10] 阿梅利诺(E.Amélineau)，1908年，第174页。
[11] 图片1.2。
[12] 图片1.3。
[13] W.M.F.皮特里，1939年，第67页。
[14] 图片1.11。

件家具的腿，用以表现被征服种族的形象。⑮这些雕塑有意识地雕得奇形怪状，与王朝初期的另一些塑像一样，表示当时人们把头发编成皮特里称之为猪尾巴的辫子。⑯

皮特里在阿拜多斯的卡王（第一王朝）墓中发现一块饰板，上面有一个印欧种的俘虏，双手反绑，戴着镣铐。⑰埃利奥特-史密斯认为画的是一个闪米特人。王朝时期也有文物留下来，如图片 1.9 和 1.14，表现印欧和闪米特俘虏。对照之下，埃及法老们典型的尼格罗种人的相貌（如法老世系的真正始祖、第一王朝的纳尔美尔；第三王朝的佐瑟——这时埃及文明中所有技术性成分已全都可以看到；大金字塔的建造者、喀麦隆型的基奥普斯⑱；第十一王朝的奠基人、肤色十分黑的门图荷太普；⑲塞索斯特里斯一世；阿莫斯·尼弗塔里女皇；以及阿梅诺菲斯一世），表明埃及社会的各阶级全都属于同一个黑色种族。

表示印欧和闪米特类型的图片1.15和1.16，特复制于此，这是为了和黑种的法老们迥然不同的容貌两相对照，从而清清楚楚地表明，如果不把利比亚和托勒密这两个外来的王朝计算在内，则整个法老世系中便绝无印欧和闪米特这两种人的任何痕迹。

人们常把霍连海布墓上所刻的黑种妇女和同处刻着的埃及妇女的形象相对照。这种对比是不伦不类的：她们之间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差异，不是种族的差异；这种巨大的差异，同样存在于达喀尔出生的塞内加尔贵族夫人与老茧手、八字脚的古代非洲农妇之间，也存在于后者与古埃及城市中的贵妇之间。

黑种人中，有两种不同类型：

（1） 直发型，亚洲以达罗毗荼人为代表，非洲以努比亚人和图布人或泰达人为代表。三者的皮肤均漆黑发亮。

（2） 赤道地区的卷发型。

埃及居民的构成成分中，这两种类型都有。

35

黑色素量测定

在实验室里通过显微镜分析直接测定古代埃及人的肤色，从而判断他们的种族归属，这种可能性在实践中是存在的；我怀疑考察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们的聪明睿智是否忽略了这种可能性。

皮肤颜色的黑色素（真黑色素）这种化学物质，总的说来是不溶解的，能保留在几百万年前遗留下来的动物化石的皮肤中。⑳因此，有充分根据相信从埃及木乃伊的皮肤中完全能够获得这种化学物质，尽管也还存在着一种顽固的说法，说由于防腐香料的浸渍，木乃

---

⑮ 图片1.5。

⑯ 图片1.8。

⑰ 图片1.7。“印欧”一词通常是指一种语言，不是指某一种族，但在不引起误会的情况下，本章均用这个词而不用“雅里安”一词。

⑱ 图片1.12。

⑲ 图片1.13。

⑳ 尼科洛斯(R. A. Nicolaus)，第 11 页。

伊的皮肤已不堪任何分析。[21] 黑色素虽以表皮为主要所在处，但在真皮与表皮分界处进入真皮的黑色素细胞，即使在表皮已大半毁于防腐剂的情况下，也能查出白皮肤种族所没有的黑色素量。我本人所分析的样品，取自埃及马里埃塔出土的木乃伊，[22] 在巴黎人类博物馆体质人类学实验室进行。这种方法完全适用于开罗博物馆中保存得非常好的图特摩斯三世、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等国王的木乃伊。近两年来我一直在央求开罗博物馆馆长提供类似的样品以资分析，但没有结果。制作这种标本，不消几平方毫米的皮肤就够了。标本的厚度只有几个微米，用乙基甲酸盐擦光之后，可以用自然光或紫外线照明进行观察；在光照下，黑色素的微粒发出荧光。

简单说来，在显微镜下观察和估计黑色素量这种实验方法，使我们可以判定古埃及人无疑属于黑色种族。

骨骼学测定

体质人类学中公认的划分种族的各种标准中，骨骼测定（与颅骨测定相对比）在区分黑人白人方面也许是最少导致错误的方法。按照这一标准，埃及人也属于黑种。这一研究是由德国的卓越学者莱普西乌斯于十九世纪末期完成的，所获结论至今仍然有效。体质人类学领域中此后在研究方法上的种种进展，并不损及他所提出的“莱普西乌斯标准”，这一标准以整数标出典型埃及人的身体各部分的比例，说明他们短臂，属于尼格罗种人或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及大洋洲的身材矮小的黑种人体型。[23]

血　型

有一件事实值得注意：直到今天埃及人，尤其上埃及人，与西非大西洋沿岸的居民一样都属于B血型，而不属于未经混血杂交的白色种族所特有的A2血型。[24] 研究一下埃及木乃伊中A2血型的分布情况，想来饶有兴味；而当前的技术条件已有可能进行这种研究。

古代经典作家对埃及人种所持的观点

对于与古埃及人同时代的希腊和拉丁作家来说，埃及人属于什么种族并不成为问题。埃及人是尼格罗人：厚唇、卷发和细腿。古典作家们对一个民族所属种族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提出的论证如此一致，恐怕难以贬低或置而不顾。下面所举的一些论证把问题说到了家。

（1）“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我们纪元前480（?）-425年）。

---

[21] 佩蒂格鲁（T.J. Pettigrew），1834年，第70-71页。
[22] 迪奥普（C.A. Diop），1977年。
[23] 封丹（M.E.Fontane），第44-45页（见复制件：T）。
[24] M.F.A.蒙塔古，第337页。

关于科尔奇迪人的起源,[25] 他写道:

> 从种族上看，科尔奇迪人就是埃及人，这是一桩显而易见的事实。……好几位埃及人士告诉我，他们认为科尔奇迪人是塞索斯特里斯军队的后裔。我自己的想法也正如此，根据有两条，首先是他们的黑皮肤和卷发（说真话，这其实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因为另一些民族也有这样的）；其次也比较可靠的是，全人类之中，唯独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自古以来就实行割礼。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自己承认，他们这种风俗是向埃及人学来的；而塞尔莫东河与帕塞尼奥斯一带的叙利亚人和他们的邻居马克隆人则说，他们是新近向科尔奇迪人学来的。实行割礼的也就唯有这些民族了，而且能观察到，他们割礼的做法和埃及人相同。但是埃及人本身和埃塞俄比亚人这二者是谁把这种习俗教给了对方，我却说不清，因为这种习惯在他们之中显然渊源久长。至于说这种习俗是从与埃及人的往来中学来的这一层，我认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所有与希腊贸易的腓尼基人都不再象埃及人那样给阴部动手术，也不再给自己的后代施行割礼了。[26]

37

希罗多德多次反复提起埃及人所具有的尼格罗人的特征，每次都以此作为一种观察所得的事实，来论证某些或较简单或较复杂的论点。例如，为了证明伊庇鲁斯所属多多娜地方的希腊神殿发源于埃及，他的论证之一如下："……而当他们补充说，那只鸽子是黑色的时，他们的意思是要我们明白，那位妇女是埃及人。"[27] 这里所谓的鸽子——按原文，实际上是两只——象征着两位埃及妇女，据说是从埃及的底比斯分别带到希腊的多多娜和利比亚（朱庇特·阿蒙绿洲）去建立两地的神殿。希罗多德不赞同阿纳克萨戈拉斯的意见，不认为尼罗河洪水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的山上积雪溶解。[28] 他相信埃塞俄比亚无雪无雨，"那里天气酷热，把人都烤得变成黑色了"。[29]

（2） 亚里士多德，我们纪元前 389-332 年，科学家、哲学家，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

亚里士多德在一本次要著作中，怀着令人意外的稚气试图证明生物的生理和伦理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却给我们留下埃及-埃塞俄比亚种族的论据，从而证实了希罗多德的论述。他说："太黑的人是懦夫，比如说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但是，肤色太白的人也是懦夫，这点我们可从妇女身上看出来。勇士的肤色介于二者之间。"[30]

（3） 卢西安，希腊作家，我们纪元 125(？)-190 年。

卢西安的论证和上举两位作家的论证同样一清二楚。他介绍了两个希腊人，利西努斯和蒂莫劳斯的一段谈话。　38

---

[25] 我们纪元前第五世纪希罗多德访问埃及时，一个黑皮肤的民族——科尔奇迪人仍然住在亚美尼亚黑海海岸的科尔奇斯地方（位于古代海港特拉布宗以东），四周都是白皮肤的民族。

古代学者对这个民族的来源困惑不解，希罗多德在他所写的埃及的历史这本著作第二卷《音乐之神》中，试图论证科尔奇迪人即埃及人。此处引文即出于此。希罗多德以塞索斯特里斯在被他征服的国家中所立的记功碑为根据，证明这位国王曾经远征达色雷斯和西徐亚等地区；看来在希罗多德当年，这些记功碑仍然还矗立在这些地方（卷二，第 103 页）。

[26] 希罗多德(Herodotus)，卷二，第 104 页。埃及女人和黑非洲许多民族一样，都施行阴蒂切除。参看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志》，卷十七，第一章。

[27] 希罗多德，卷二，第 57 页。

[28] 塞内卡(Seneca)，《自然问题》，卷四，第 17 页。

[29] 希罗多德，卷二，第 22 页。

[30]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容貌》，第 6 页。

利西努斯(讲起一个埃及青年的模样)："这孩子不只是黑，而且厚嘴唇，两条细腿……头发梳成一条小辫拖在后面，表明他不是一个自由民。"

蒂莫劳斯："但是，利西努斯，这却是出身真正高贵的埃及人的模样。所有生而为自由民的孩子都把头发编成辫子，直到成年。这和我们祖先的习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老年人用个金发卡子把头发别在脑后，倒是体面的。"[31]

（4） 阿波罗佐鲁斯，我们纪元前第一世纪，希腊哲学家。

"埃及普托斯征服了黑脚人的国家，按自己的名字给它取名叫埃及。"[32]

（5） 埃斯奇里斯，我们纪元前525(？)-456年，悲剧诗人，希腊悲剧创始人。

在《乞援人》中，赞纳奥斯领着两个女儿(唤作赞内兹)逃走，他的哥哥埃及普托斯领着两个儿子（唤作埃及普蒂阿兹）在后面追赶，想要强迫一双堂姊妹嫁给这两个堂兄弟。赞纳奥斯攀上一座小山，登高瞭望在远处海面上划船的埃及普托斯一家子，讲了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他们："我看见了船上的人，四肢黑色，穿着白衣。"[33]

此后数行，在诗第745节，还有对埃及型的人的类似描写。

（6） 亚历山大的阿基里斯·塔蒂乌斯。

他把三角洲的牧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相比，说他们肤色发黑，象是混血种。

（7） 斯特拉波，我们纪元前58年至约我们纪元25年。

斯特拉波访问了埃及以及罗马帝国的几乎每一国度。他赞同埃及人和科尔乔人同属于一个种族的理论，但他认为到埃塞俄比亚和科尔乔的移民都是从埃及去的。

"埃及人在埃塞俄比亚和科尔乔安居下来。"[34] 斯特拉波对埃及人种的见解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从另外方面找寻埃及人比印度人肤色更黑的原因，据以驳倒混淆"印度和埃及种族"的任何企图。

（8） 西西里的迪奥多鲁斯，约我们纪元前63年至我们纪元14年，希腊历史学家，奥古斯都大帝同时代的人。

按迪奥多鲁斯的说法，到埃及殖民的，大约是埃塞俄比亚人("殖民"一词，按雅典人的用法，指在人口过剩时，部分人口移居其他地方)。

39 埃塞俄比亚人说，埃及人是他们的殖民地人民之一[35]，是由奥西里斯领进埃及去的。他们宣称，在宇宙之始，埃及是一片大海；尼罗河洪水泛滥，从埃塞俄比亚带来大量肥沃土壤，最后把海填满，成为大陆一部分。……他们补充说，埃及人的法律大部分是从他们的作家和先辈得来的。[36]

（9） 迪奥吉尼斯·拉尔蒂阿斯。

他就斯多噶学派创始人芝诺（我们纪元前333-261年）写了下面一段话："芝诺系姆纳

---

[31] 卢西安(Lucian)，《航海记》，第2-3节。
[32] 阿波罗佐鲁斯(Apollodorus)，卷二，《因纳丘斯家族》，第3、4节。
[33] 埃斯奇里斯(Aeschylus)，《乞援人》，第719-720节。亦见第745节。
[34] 斯特拉波，《地理志》，卷一，第三章，第10节。
[35] 着重点是我加的。
[36] 迪奥多鲁斯(Diodorus)，《世界史》，卷三。埃塞俄比亚文明之渊源久远，已由最古老也最受崇敬的希腊诗人荷马在《伊里亚特》与《奥德赛》两部史诗中证实：
"朱庇特今天由众神全体扈从接受了埃塞俄比亚人的献祭供奉。"（《伊里亚特》，卷一，第422节。）
"为访问神圣的埃塞俄比亚，昨天，朱庇特去到大洋岸边。"（《伊里亚特》，卷一，第423节。）

西斯或德梅斯之子，塞浦路斯岛上西蒂乌姆地方人。这是一个希腊城市，接受了一些腓尼基殖民者。"在他的《人传记》一书中，雅典的蒂莫修斯说芝诺是歪脖子。提尔的阿波罗尼乌斯则说他体格瘦削，很高很黑，因此，克里西普斯的《谚语》一书卷一中说，有些人称他为埃及葡萄藤秧。[37]

(10) 安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约我们纪元33-100年，拉丁史家，朱利安皇帝的朋友。

在他有生之年，恰逢罗马帝国衰落，古典社会告终。从埃斯奇里斯和希罗多德出生到安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逝世，共约九个世纪；在此期间，生活在白色种族的汪洋大海中的埃及人不断与外种族婚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埃及十户中有一户拥有一个白种亚细亚或印欧奴隶。[38]

使人注意的是，种族杂交的程度虽然如此之高，竟然仍未消除原来种族的根本特征。确实，安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就这么写过："……埃及人绝大多数是棕色或黑色，一副瘦削干巴的模样。"[39] 他还证实了上面引用过的关于科尔乔人的论证："这些土地以外则是卡马里蒂[40] 的内陆地区，而水流湍急的法西斯河形成科尔乔人的国界，他们是一个起源于埃及的古老种族。"[41]

简略回顾一下古代希腊-罗马作家就埃及人所属种族所作的论证，可以看出他们意见一致的程度是很明显的，既难以贬低，又无法掩盖，而当代的埃及学却犹豫不定，不是贬低就是掩盖。

其中的一个例外是一位正直的学者沃尔内所作的论证。他于我们纪元1783和1785年间、亦即贩卖黑奴的高峰时期在埃及旅行，就真正的埃及种族、亦即产生历代法老的同一种族（科普特人）作了如下的论述： 40

> 他们全都面庞虚胖、眼皮重垂、厚嘴唇，总之，属于地道的黑白混血人面孔。我原想这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及至去参观狮身人面像，它的模样却给我提供了解开这个谜的线索。观察它的头部，无处不表现着典型的黑种人特征，我记起了希罗多德那段名言："就我看来，我认为科尔乔人乃是埃及的殖民者，因为他们和埃及人一样，也是黑皮肤和卷发。"换句话说，古埃及人是地地道道的尼格罗人，与非洲其它土著民族同属一种；根据这一事实便能懂得，在与罗马人和希腊人血统混杂若干世纪之后，他们的种族为什么会必然失去原来的全黑肤色，而保留着原来的脸型特征。甚至可以把这一结论推而广之，从原则上论断：相貌是一种记录，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用来作为辩论或阐明民族起源的历史证据……

沃尔内在论述这个意见之后，引证了诺曼人为例：诺曼人征服诺曼底900年后，相貌仍旧与丹麦人相象；他又说：

> 但回头再说埃及，它对历史的贡献提出许多哲学上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代科

[37] 迪奥吉尼斯·拉尔蒂阿斯(Diogenes Laertius)，卷七，第1页。
[38] 埃及显贵人士喜欢他们的姬妾之中有一个叙利亚或克里特女奴。
[39] 安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卷二十二，第16节 (23)。
[40] 指聚一种称为"卡马尔"的小船行劫的海盗帮。
[41] 安米西努斯·马塞利努斯，卷二十二，第8节 (24)。

普特人的野蛮和愚昧便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他们曾被认为是埃及人的天才和希腊人的聪慧结合而生；这一黑人种族如今成了奴隶，成为我们蔑视的对象。而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甚至我们的口头语言无不有他们的功绩。然后我们再想想，正是在以自由和人类的最伟大的朋友自许的民族中间，最野蛮的奴役却得到了批准，而且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黑种人的大脑是否与白种人有相同的性质。㊷

对沃尔内的这一论证，商博良的哥哥商博良-费吉用下面一段话作了回答。"黑皮肤和卷发这两项生理特征，并不足以标明一个种族是尼格罗人；沃尔内关于埃及古代居民属于尼格罗种的结论显然是勉强的，不能接受的。"㊸

从头到脚都是黑色，再加一头卷发，仍不足以说明他是尼格罗人！这点倒足以向我们表明埃及学自从作为一门科学出现以来所采取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有些学者坚持说，41 沃尔内企图把讨论转移到哲学领域去。但是，我们只消再读读沃尔内的文章便知道：他只不过是以他的眼睛和良心都无法回避的赤裸裸的事实作为证据，从中引出结论罢了。

埃及人眼中的埃及人

举出这个问题的主要有关观点，绝非浪费时间。古埃及人是怎样看待他们自己的呢？他们把自己划归哪一个种族呢？他们怎样称呼自己呢？法老时代的埃及人给我们留下的语言和文字对这些问题都提供了确切的回答，而学者们却情不自禁地加以贬低、歪曲和"解释"。

埃及人当时对自己只有一个称呼：[象形文字] =kmt=尼格罗人（按词义本身翻译）。㊹这是法老语言中用以指黑色的最有力的一个词，因此所用的象形字是烧焦了一头的一段木头而不是鳄鱼的鳞甲。㊺当代人类学著作中广为使用的词根 kamit 即来源于此。圣经中所用的词根 kam 很可能也源于此。因此，如今在埃及学的术语中使这个词作"白色"解，便必然歪曲事实。在产生这个词的法老国家母语中，它的含义是"煤黑色"。

埃及语中，集合词的形成是把一个名词或形容词变为阴性单数。"Kmt"即来自形容词 [象形文字] =km=黑色的；因此，它的准确意思便是尼格罗人或至少是黑色的人。这个词是个集合名词，因而它是说法老埃及的整个民族是黑色民族。

换言之，纯粹从语法角度着眼，如果要用法老语言表达尼格罗人，除埃及人用以自称的这个词外，别无它词可用。进一步来说，法老语言还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词，[象形文字] kmtjw=尼格罗人，黑色的人（按词义本身翻译）=埃及人，作为"外国人"的反义词，这个词来源于同一词根 km，埃及人也用它来表明他们自己是**一个与所有外国人不同的民族**。㊻

㊷ 沃尔内(M.C.F.Volney),《叙利亚和埃及旅行记》，巴黎，1787年，卷一，第74-77页。

㊸ 商博良-费吉(J.J.Champollion-Figeac)，1839年，第26-27页。

㊹ 这一重要事实，非洲方面是由索苏·恩索甘(Sossou Nsougan)发现的。本章的这个部分由他编写。至于这个词的含义，则见《埃及语词典》，卷五，1971年，第122、127页。

㊺ 同上，第122页。

㊻ 同上，第128页。

这些便是埃及人用以自称的两个指民族的形容词，而在法老语言中两者都可解释为“尼格罗”或“黑色”。学者们很少提到这两个词；而每逢提到时，总是把它们译为委婉词，例如“埃及人”，完全不提它们的词源意义。[47] 他们宁愿使用这个短语：Rmt kmt＝黑色人国家的人，或黑色国家的人。 42

埃及语中，词后往往缀以限定词，用以说明该词的确切含义。对于此种特殊短语，埃及学学者们提出：km＝黑色，这种颜色修饰跟随其后的限定词，而这一限定词的意思就是“国度”。于是他们宣称：译文应为“黑色的土壤”，因沃土为黑色，或应译为“黑色的国度”，而不是象我们今天心中想着黑非洲白非洲时所说的“黑种人的国家”。事情也许就是如此。但如果我们把这一规则严格应用于 ＝kmit,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此处的‘黑色’这个形容词修饰的是指全体埃及人民的限定词，用‘一男’‘一女’两个符号表示全体，它们后面的三划则表示复数”。因此，如果还有可能对 ＝kme 表示怀疑的话，对这两个表示民族的形容词 ＝kmt 和 kmtjw 便无法再怀疑了，除非他们毫无根据地加以论证。

值得特别提起注意的是，古埃及人从未想到过把这些修饰语用于努比亚人和非洲其他居民，以便把他们与自身加以区别；这也正如帝国全盛时期的罗马人未能用“颜色”形容词来把自己和多瑙河彼岸的日耳曼人区分开来那样；后者在发展上虽然还处于史前时期，与罗马人却是同一种族。

就体质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双方都属于同一种族，因而只限于用文明程度或伦理观念不同的词语来加以区分。就文明的罗马人看来，属于同种的日耳曼人是野蛮人。埃及人则使用 ＝nahas词来指努比亚人；而 nahas[48]在埃及语中是一个民族的名称，与颜色毫无关系。把这个词译作“尼格罗”是故意的曲解，而当前的出版物几乎都是这样做的。

神的称号

43

最后，埃及的主要善神都毫无例外地以黑色或尼格罗为称号，而所有的恶神又都形容为 desrêt＝红色；我们还知道，非洲人也把这种称号用于白种民族，几乎可以肯定埃及人并不例外，但本章仅陈述最无可争论的事实。

这些神衹的姓如下：

＝Kmwr＝“伟大的尼格罗”，指奥西里斯[49]

＝km＝黑色＋神名[50]

＝kmt＝黑色＋女神名[51]

---

[47] 福克纳(R.O. Faulkner)，1962 年，第 236 页。

[48] 《埃及语词典》，第 123 页。

[49] 同上，第 124 页。

[50] 同上，第 125 页。

[51] 同上，第 123 页。

km(黑色) 这一修饰语用于哈索、阿匹斯、明神、托特等等。[52] set kmt＝黑女人＝埃西斯。[53]另一方面，“seth”，即不毛的沙漠，用 dešrēt 这个词＝红色来形容。[54]荷拉斯为了创建文明而与之斗争的野兽，特别是河马，形容为dešrēt＝红色。[55]同样地，被托特所扫除的凶神恶煞则为 Des＝ ＝dèsrtjw＝红色的家伙；这个词在语法上是 Kmtjw的反义词，其结构所根据的规则与“nisbés”同。

圣经中的证据

圣经告诉我们：“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Mizraim，即埃及)、弗和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腓拉、撒弗他、拉玛和撒弗提迦。”[56]

一般说来，闪米特的全部传说(犹太的和阿拉伯的)都把古埃及与各个黑人国家划为一类。

这些证言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些人(犹太人)当年与古埃及人不但相邻、有时甚至杂居共处，歪曲埃及人的种族形象，对他们绝无好处。而且，认为这是曲解事实也是站不住脚的。[57]

44

文化上的根据

根据历史记载，埃及与当代黑非洲之间在文化方面有数不清的共同之处。此处只讨论一下割礼和图腾崇拜两项。

按上文所引希罗多德的文章，割礼源于非洲。考古学证明这位历史之父的判断是正确的；埃利奥特-史密斯研究了保存完好的木乃伊，断定早在原始历史时期、即我们纪元前4000年以前，割礼已经在埃及人中通行。[58]

直到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人的图腾崇拜仍然奉行不衰。[59]普鲁塔克也提到了这一点。阿梅利诺[60]、洛雷特、莫雷特以及阿道夫·赖纳赫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埃及存在图腾崇拜，从而驳斥了动物崇拜论点。

> 如果我们认为图腾这一概念是指一种原始崇拜物，通常表现为某种动物，部落认为自己与之有着一种特殊的、定期予以正式重申的密切关系，作战时高举着它，仿佛一面旗帜；如果我们同意对图腾下这样一种最低限度的、却是合适的定义，那就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图腾崇拜象埃及那样地盛极一时，埃

---

[52] 请注意，set＝kem＝沃洛夫语中的“黑妻”。
[53] 《埃及语词典》，第492页。
[54] 同上，第493页。
[55] Dešrēt＝埃及语的“血”；deret＝沃洛夫语的“血”；同上，第494页。
[56] “创世纪”，第10章，6－7节。
[57] 迪奥普，1955年，第33页脚注。
[58] 马苏拉德(E. Massoulard)，1919年，第386页。
[59] 朱韦纳尔(Juvénal)，《讽刺》，第十五卷，第1－14节。
[60] 阿梅利诺，见前引著作。

及正是研究图腾崇拜最好的地方。[61]

语言的密切关系

沃洛夫语[62]——非洲最西部大西洋沿岸的一种塞内加尔语言——也许和科普特语同样与古埃及语近似，新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研究。[63]本章提出充分材料，表明古埃及语和非洲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亲属关系，这种论断并非假设，而是一种确立的事实，当代的学术研究不能撇开不顾。

如下所示，这种亲缘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埃及语	科普特语	沃洛夫语
[hieroglyph]	=kef=抓住，拿起一条（某种东西）[64]	（赛义德方言）keh=驯养[65]	kef=捉住猎物
	PRE 现在时	PRE 现在时	PRE 现在时
	kef i	keh	kef na
	kef ek	keh ek	kef nga
	kef et	keh ere	kef na
	kef ef	kef ef	kef ef } na
	kef es	keh es	kef es } na
	kef n	keh en	kef nanu
	kef ton	keh etetû	kef ngen
	kef sen[66]	keh ey	kef nañu
	过去时	过去时	过去时
	kef ni	keh nei	kef(on) na
	kef(o) nek	keh nek	kef(on) nga
	kef(o) net	keh nere	kef(on) na
	kef(o) nef	keh nef	kef (on) ef } na
	kef(o) nes	keh nes	kef (on) es } na
	kef(o) nen	keh nen	kef (on) nanu
	kef(o) n ten	keh netsten	kef(on) ngen
	kef(o) n sen[67]	keh ney[68]	kef(on) nañu

	埃及语	沃洛夫语
[hieroglyph]	=feh=走开	feh=急急忙忙跑掉

如下所示，动词形式是相对应的，含义则相同或近似。埃及语全部动词形式亦见于沃

[61] 赖纳赫(A. Reenach)，1913年，第17页。
[62] 沃洛夫语，Walaf,常写作"Wolof"。
[63] C.A.迪奥普，1977年。
[64] 兰伯特(R.Lambert)，1925年，第129页。
[65] 马伦(A. Mallon)，第207-234页。
[66] 德巴克(A.de Buck)，1952年。
[67] 同上。
[68] A.马伦，第207-234页。

洛夫语，例外者不过两种。

埃及语	沃洛夫语
feh-ef	feh-ef
feh-es	feh-es
feh-n-ef	feh-ôn-ef
feh-n-es	feh-ôn-es
feh-w	feh-w
feh-wef	feh-w-ef
feh-w-es	feh-w-es
feh-w-n-ef	feh-w-ôn-ef
feh-w-n-es	feh-w-ôn-es
feh-in-ef	feh-il-ef
feh-in-es	feh-il-es
feh-t-ef	feh-t-ef
feh-t-es	feh-t-es
feh-tyfy	feh-ati-fy
feh-tysy	feh-at-ef
	feh-at-es
feh-tw-ef	mar-tw-ef
feh-tw-es	mar-tw-es
feh-kw(i)	fahi-kw
feh-n-tw-ef	feh-an-tw-ef
feh-n-tw-es	feh-an-tw-es
feh-y-ef	feh-y-ef
feh-y-es	fey-y-es

埃及语	沃洛夫语
=mer=爱	mar=舔[58]
mer-ef	mar-ef
mer-es	mar-es
mer-n-ef	mar-ôn-ef
mer-n-es	mar-ôn-es
mer-w	mar-w
mer-w-ef	mar-w-ef
mer-w-es	mar-w-es
mer-w-n-f	mar-w-ôn-ef
mer-w-n-es	mar-w-ôn-es
mer-in-ef	mar-il-ef
mer-in-es	mar-il-es

[58] 引申义=热爱（由此产生动词 mar-maral），就是仿母畜舔新生幼仔的样子。这一限定词也可能表示一个人把手放到口边，但这两种含义并不矛盾。

mer-t-ef	mar-t-ef
mer-t-es	mar-t-es
mer-tw-ef	mar-tw-ef
mer-tw-es	mar-tw-es
mer-tyfy	mar-at-ef
mer-t̲-tysy	mar-at-es
	mar-aty-sy
	mar-aty-sy
mer-kwi	mari-kw
mer-y-ef	mar-y-ef
mer-y-es	mar-y-es
mer-n-tw-ef	mar-an-tw-ef
mer-n-tw-es	mar-antw-es
	mar-tw-ôn-ef
	mar-tw-ôn-es

埃及语和沃洛夫语的指示词

47

埃及语和沃洛夫语指示词之间，语音上有如下的相对应处。

埃及语		沃洛夫语
		ep ⟶ w
=pw	(ipw) ⟶ bw	p ⟶ b w ⟶ w
=pwy	(ipw) ⟶ bwy	p ⟶ b̄ w ⟶ w y ⟶ y
=pn	(ipn) ⟶ bané	p ⟶ b̄ n ⟶ n
	(ipn) ⟶ balé	p ⟶ b̄ n ⟶ l[70]
=pf	(ipf) ⟶ bafe	p ⟶ b f ⟶ f
=pf3	⟶ bafa	p ⟶ b̄ f ⟶ f 3 ⟶ a
=pfy	(ipfy) ⟶ bafy	p ⟶ b f ⟶ f y ⟶ y
=p3	⟶ bâ	p ⟶ b 3 ⟶ â

[70] 对于这一重要规律的解释，详见下文。

=iptw ⟶ baṯw		p⟶b ṯ⟶t w⟶w
=iptn ⟶ { batné Batalé		p⟶b t⟶t n⟶n n⟶l
=iptf =iptf⟶batafé		p⟶b̄ t⟶t f⟶f

语音上的这些对应，既不能看成一般性的类同，也不能归因于人类思维的共同法则。48 因为这些对应是规律性的。它们贯穿于整个语言体系的显著之点：其一是两种语言的指示词，其二是两种语言的口语。正是由于运用此种规律，才有可能表明印欧语族的存在。

我们还可进一步通过比较，表明这两种语言的大多数音素保持未变，而不多几处的变化都是极其令人感到兴趣的，现列举如下。

（1） n（埃）⟶l（沃）的对应

埃及语	沃洛夫语
n	l
=nad̄=问	lad̄=问
=nah=保护	lah=protect保护
=ben ben=涌出	bel bel=涌出
=teni=上岁数	talé=重要
=tefnwt=由拉神唾液中诞生的女神	tefnit="唾出"一个人 teflit=唾沫 tefli=唾者
=nebt=头发辫	let=plait头发辫 nâb=暂时把头发辫上

（2） h(埃)⟶g（沃）的对应

埃及语	沃洛夫语
h	g
=hen=阴茎，阴蒂	gen=阴茎，阴蒂
=hwn=少年	gwné goné } =少年
=hor=Horus荷拉斯	gor=vir（?男性?）
=hor gwn=青年时的荷拉斯	gor gwné=青年男子(m,ă,m)

现在要准确论述埃及语音素的元音伴随问题，尚为时过早。但是，通过与非洲其他语言作比较研究来重新发现古埃及语的元音的道路已经敞开。

结　论

49

非洲国王在位每隔一段时间——或长或短，但大约八年左右——便被象征地或当真地处死。王权的这种情况使人联想起法老通过塞德节而获得新生的庆典；使人联想到埃及的图腾崇拜、割礼仪式，以及黑非洲的宇宙起源说、建筑、乐器等等。[71] 古埃及属于非洲文化，恰如古希腊罗马属于西方文化一样。非洲人文学科全书写作必须以这一事实为基础。

为要写这样一部著作的这样一章，处处都以委婉及调和为准则，是多么地艰难。因此，为了避免牺牲科学的真实，我们为准备本书的写作提出了三点要求，都在1971年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72] 根据前两点，我们于1974年1月28日至2月3日举行了开罗学术讨论会。[73] 在这方面，我想提到会议总结报告中的某些段落。J. 韦库泰教授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负责撰写本书导言。经过充分讨论后，认识到传统上把埃及居民平均划分为黑种、白种及其混血种三个部分的看法是无法确立的。"韦库泰教授同意，不应对百分比试作估计，因为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可资验证，这种估计便无甚意义。"关于埃及文化这个问题，"韦库泰教授表示，他认为埃及人的书写方法、文化和思想方法都是非洲式的。"

勒克朗教授则"确认埃及人的性情和思想方式体现了非洲的特性。"

关于语言方面的问题，报告说，"与前此讨论的那些问题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与会者发表的意见大多一致。迪奥普教授的报告提纲以及奥邦加教授的报告都被认为是很富于建设性的。"

同样，讨论会也否定了法老时期的埃及语是一种闪米特语的看法。"索内龙教授旁征博引，提醒大会注意奥邦加教授继迪奥普教授之后所建议的研究方法，认为很有意义。埃及语保持为一种稳定的语言，至少已有4500年。埃及位于外来的各种影响汇集之处，从外国语言中有所假借是意料中事；但在总数多达好几千的词汇中，闪米特词根不过数百。不50能把埃及语和它在非洲历史上的源流孤立开来，它的起源无法从闪米特语得到充分解释。因此，预期在非洲将会发现与之有关的语言是十分合理的。"

埃及语和非洲各种语言之间具有一种亲缘关系、亦即非偶然性的关系，这一点已获得确认。"索内龙教授指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相当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古埃及语和沃洛夫语的第三人称单数后缀代词之间的相似，不可能纯属偶合。他希望能利用当代语言为出发点，作一番努力，复现古非洲语。"

报告的总结部分说："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的研究提纲提出了具体要求，但并非所有与会者普遍象谢赫·安塔·迪奥普和奥邦加教授那样准备了经过苦心研究的论文。讨论中因而确实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

[71] 见C.A.迪奥普，1967年。

[72] 见"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总结报告"，1974年3月30日至4月28日。

[73] 关于古埃及居民和辨读麦罗埃手稿的讨论会，参看《研究及文献》第一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

于是在开罗为非洲史的编纂工作写下了新的一页。讨论会建议，应就种族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那时以来进行了这种研究，但对过去的讨论并未提出任何新的东西。这种研究告诉我们，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只承认居民的存在，种族这一概念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每逢遇见遗传性疾病的传递问题时，种族一词又不得不按其最经典的含义使用，因为遗传学告诉我们，“镰状细胞贫血只见于尼格罗人。”事实是，这些“人类学者”早已从盛行的人类“一祖论”中在自己的头脑里得出若干结论，却没有勇气把它们确切地讲出来。因为如果人类起源于非洲，那么，最先必然是尼格罗人，然后通过突变和适应，才于旧石器时代初期欧洲最后一次冰川时期之末变成白人。何以格里莫尔德尼格罗种人首先占据欧洲达1万年之后，克鲁马农人——白种人的原始类型——才于我们纪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这一层如今也就比较易于理解了。

在貌似客观的研究中显然存在着思想意识方面的立场问题。历史上和社会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因素是表现型，就是看得见的个人或民族，而不是基因型。就当代遗传学来说，一个祖鲁人有可能与沃斯特*具有“同样的”基因型。难道这是说我们今天所目击的历史竟会把这两个表现型、即两个个人的民族和社会活动等同起来吗？当然不会——这种等同虽然在社会方面是不存在的，在人种方面却存在。

本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使我们有必要从一个较为科学的立场出发，重写世界历史，把[51]过去长时期中居于优势地位的尼格罗－非洲成分概括进去。这就意味着如今已有可能从坚实的历史基础上编成一套尼格罗-非洲人文学科全集，面不是凭空杜撰。最后还有一点，唯真理才是革命。假如这话果真，不妨补上一句：唯有以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才能持久。把事实盖上一层面纱，无助于人类的进步。

非洲各族人民昔日真情实况的再度发现不应当成为分裂的因素，而是应当有助于他们的团结，使整个非洲大陆的每一民族，从南到北，共同结成一个整体，从而使他们能够为人类的更大利益共同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而这个目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想是一致的。[74]

冯世则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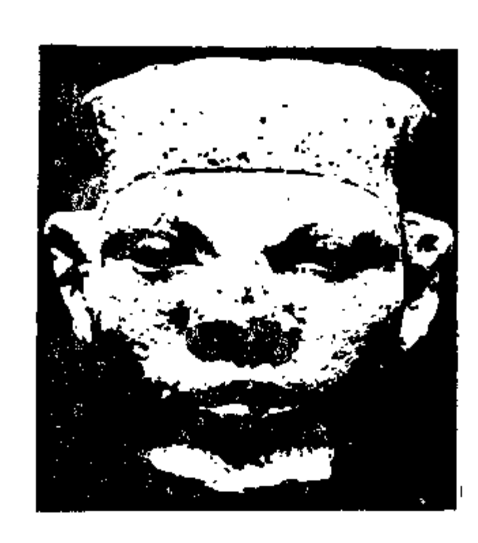
[74] **本卷编者注**

谢赫·安塔·迪奥普教授在本章中所阐述的各项意见，也就是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4年于开罗举行的“关于古埃及的居民”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和申述的意见 讨论会记录概要附于本章之末。本章中提出的各个论点并未为对于这一问题感到兴趣的全部专家所接受(参见前面的导言)。 **加麦尔·莫赫塔尔**

* 沃斯特，南非联邦总理，白色种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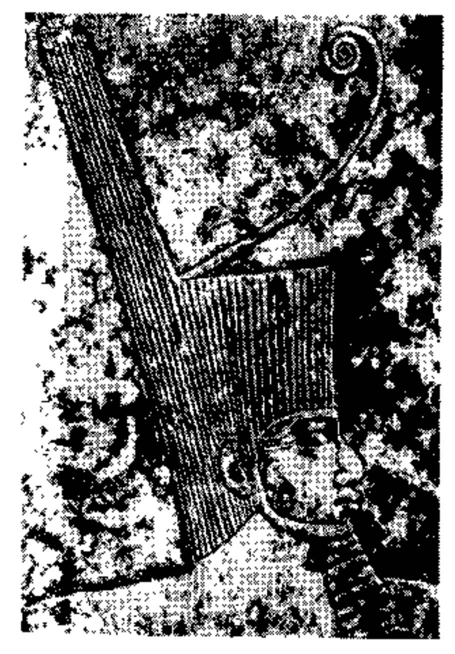


图片 1.1 泰拉奈特的原始时期人像：埃及最早的居民阿诺族的一位尼格罗贵族



52

图片 1.2 埃及的第一王朝的一位法老，传说为纳尔美尔



图片 1.3 第三王朝法老左塞，典型尼格罗人。从此时起开始了利用经过修整的石料从事建筑的伟大时代：赛加赖的梯形金字塔及陵墓建筑群。在他统治下埃及文明在技术方面的种种创造都已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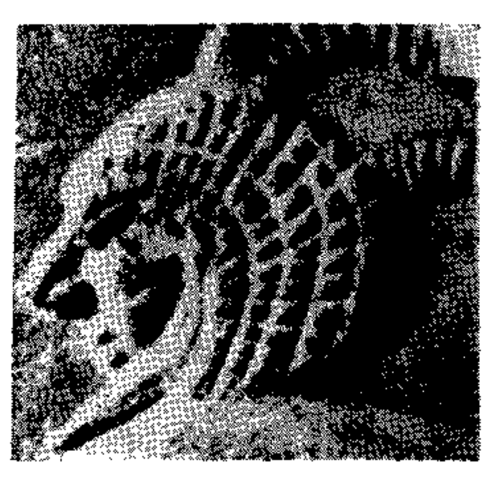


图片 1.4 埃及第一王朝耶拉孔波利斯地方的一个门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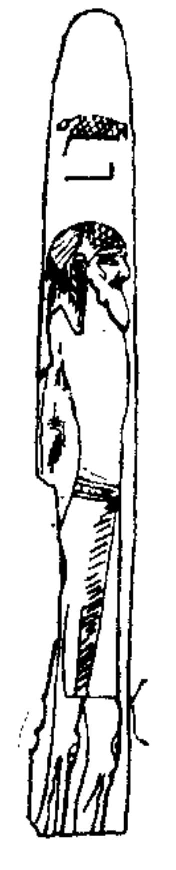
53



图片 1.5 利比亚囚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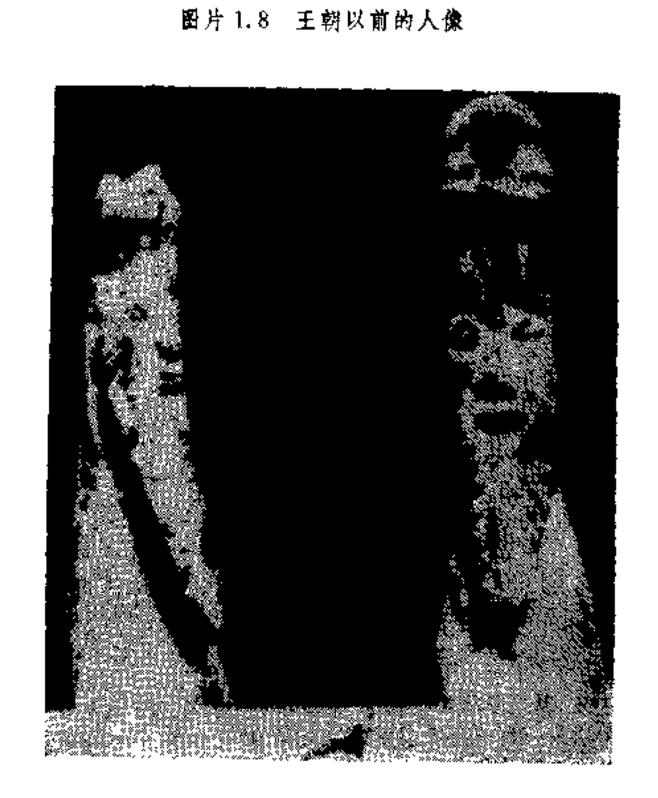


图片 1.6 外国人



图片 1.7 闪米特俘虏

图片 1.8 王朝以前的人像







图片 1.9 印欧俘虏

图片 1.10 印欧俘虏



图片 1.11 印欧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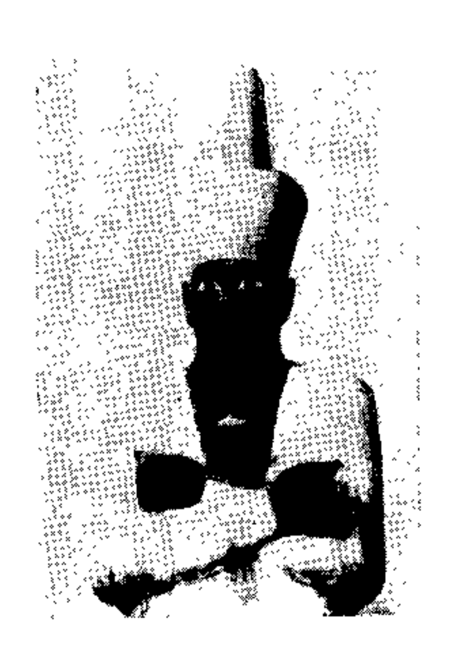


55




图片 1.12　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基奥普斯，大金字塔的建造者

图片 1.13　法老时期的闪米特俘虏；西奈石刻



图片 1.14　法老门图荷太普一世



图片 1.15　印欧种族的四个类型（宙斯、托勒密、萨拉皮斯、图拉真）。请与第二第三族群的埃及人比较



56

图片 1.16　两个闪米特人。闪米特人和印欧种族的人一样，全然不见于埃及统治阶级之中；他们都是作为俘虏而进入埃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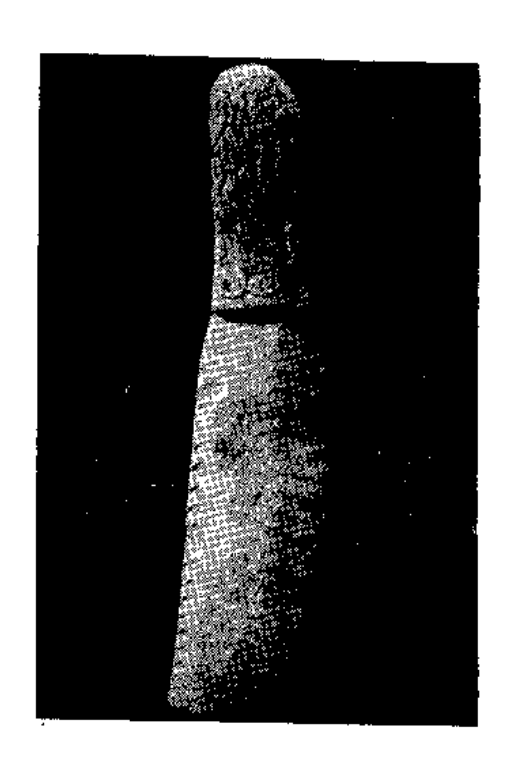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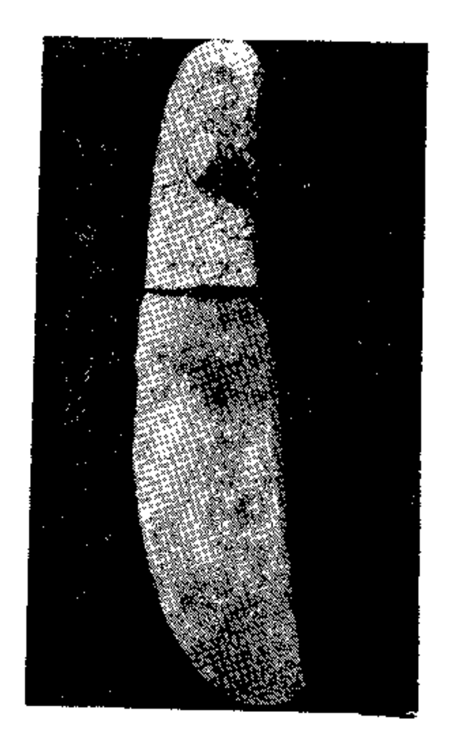
图片 1.17　拉美西斯二世和一个现代的巴图西人

57



图片1.18 十九世纪时期第一支法国科学考察队初次所见的狮身人面像。侧影属于典型的尼格罗面型。据认为是法老凯夫伦（约我们纪元前2600年，第四王朝，吉萨第二金字塔建造者）的雕像





图片1.19 阿克拉山刀柄，反正两面图

第一章附录

“关于古埃及居民和辨读麦罗埃手稿”讨论会报告①

开罗，1974年，1月28日至2月3日

报告概要②

讨论会分两个阶段举行：第一阶段自1974年1月28日至31日，探讨“古埃及居民”；第二阶段研究“辨读麦罗埃手稿”，于同年2月1日至3日举行。

与会者名单如下：

阿卜杜勒加迪尔·M.阿卜杜拉教授（苏丹）
阿布·巴克尔教授（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N.布朗夫人（法国）
F.德博诺教授（马耳他）
J.德维斯教授（法国）
谢赫·安塔·迪奥普教授（塞内加尔）
加拉卜教授（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L.哈巴希教授（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R.霍尔瑟尔教授（芬兰）
J.戈登-雅盖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S.侯赛因教授（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凯撒教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J.勒克朗教授（法国）
G.莫赫塔尔教授（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R.纳杜里教授（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Th.奥邦加教授（刚果人民共和国）
S.索内龙教授（法国）
T.塞维-泽德尔贝格教授（瑞典）
P.L.欣尼教授（加拿大）
J.韦库泰教授（法国）

卧策教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克诺罗索夫教授、皮奥特罗夫斯基教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及基-泽博教授（上沃尔特）也曾接到大会邀请，但未能出席，表示歉意。

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起草人J.德维斯教授按照委员会的决定出席讨论会，起草了讨论会的最终报告。

文化研究处程序专家、委员会主任的代表莫里斯·格莱莱先生和文化研究处莫尼克·梅尔塞夫人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席了讨论会。

---

① 本附录原应作为本卷附录，置于“结论”一章之后。

② 此报告系讨论会最终报告的节略本，由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起草人应委员会之托、作为本卷附录而作。讨论会的记录，已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研究及文献》丛书第一卷，于1978年在巴黎出版。

一、关于古埃及居民的学术讨论会

59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J.韦库泰教授和N.布朗夫人各准备了一篇论文⑧，作为讨论的基础。讨论过程可区分为三个阶段。

（一）　扼要介绍论文内容。

（二）　多数与会者陈述初步意见。

（三）　一般性讨论。

一、扼要介绍论文内容

1．韦库泰教授就自己的书面论文中详尽论述的一些重点提请注意，并进一步作了若干的发挥。

（1）体质人类学尽管新近获得进展，除对努比亚一地外，相对来说迄未能提供多少可靠的数据。可供使用的资料不足以就古埃及的居民以及其后可能经历的各个阶段作出初步结论。此外，这些资料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均不一致，对它应作何解释，历史学者又往往意见不一致。研究方法本身现在已成为问题。不过，颅测定法不能满足这种研究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如今意见已普遍一致。

对若干地区尚未作任何深入的研究。如王朝前和王朝初期的整个三角洲和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上埃及，情况均如此。新石器和王朝初期的第二至第六瀑布之间的地区，所知情况极少。同样，存在于古代撒哈拉、达尔富尔和尼罗河之间的联系也迄未进行多少研究。

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落后于在北非和叙利亚-巴勒斯坦获得的成果。

现在掌握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北埃及居民不同于南埃及居民的论断。同样，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空白，可能是由于这个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尚嫌不足。

（2）肖像研究这种方法尚未得到充分和令人满意的应用；已经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以文化标准为根据。但是现有的肖像资料，从第十八王朝以后具有极其重要的特征。

（3）两种极端对立的理论要点如下：

（甲）早在王朝前时期，生活在古埃及的人是“白种人”，尽管他们的色素为暗色，甚或是黑色。尼格罗人从第十八王朝以后才出现。

一部分人认为，从王朝初期以后，居民一直未变；另一部分人认为外国人进入非洲，使文化生活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

（乙）古埃及“从其新石器时期的幼年直到本地人建立的王朝的终结”，居民一直是黑种非洲人。

2．布朗夫人报告她的调查研究结果。

（1）考虑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尼罗河流域的历史编写工作过去一直以这样的假说为根据：认为尼罗河流域埃及一段是已开化的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物，而流域的南面一段则是黑种人居住、处于原始状态，唯有人类学者才感兴趣，布朗夫人希望，今后对于整个流域的历史研究，应该更为平衡。这将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史学方法，扩大调研范围，包括新的研究方法。布朗夫人认为，近20年左右以来，一直在努比亚进行的研究工作，乃是重新探索本学术讨论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第一步。

60

（2）过去一贯是从北到南、从“较文明”到“较不文明”的地区来探索尼罗河流域历史的发展；为摆脱这种传统观点，布朗夫人提请讨论会注意位于北纬23度至乌干达境内尼罗河发源处之间的尼罗河地区。她的分析考虑到沿北纬十度的分界线——伊斯兰教的势力至此而止——认为这一分界线具有根本性的生态的重要性。

北纬23度到10度之间，尼罗河河道可以通航，显然有可能发挥类似它在北面的埃及所起的作用。但事情并未如此，其主要原因无疑在于这一段河道的生态条件。

⑧　这些文件均附于1974年最终报告。

布朗夫人根据这一事实，全面论述了整个这一地区的定居和游牧的居民所分别作出的贡献。

但在追溯了自穆斯林阿拉伯人到来时起的居民变化史之后，她特别集中评价关于阿拉伯人到来之前这一地区人口移动情况的假设。她强调指出，尼罗河流域便于和西非及南撒哈拉的交通，因而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假设：该区所出现的文明有可能是地道的非洲文明，而非介于地中海地区与黑非洲之间的文明。

这一地区以西的达尔富尔在十七世纪之前的社会及政治结构，我们所知极少。尽管如此，作为经济发展的地区性中心，达尔富尔起了重要作用。

东边由卡吉人居住的散纳尔地区，是"黑色苏丹王国"的一个中心；它原来的居民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斯林。

尼罗河与红海中间地区住着贝札人，当地的生态条件不良，只能勉强养活居民。

北纬10度以南，生态条件全然不同。这个地区的居民与世隔绝，无论考古发掘或口头传说，都没有提供多少有关他们的材料。对于这一地区的居民和历史所作的种种假设，都没有多少确切的证据。只有再往南去的东非湖泊交错地区，才进行过比较彻底的历史研究。

二、与会者陈述初步意见

（一） 塞维-泽德尔贝格教授介绍了1960年至1964年间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在苏丹进行的考古发掘。这些发掘证实，尼罗河流域与北非和撒哈拉之间曾经有过接触。他们的出版物④涉及的题材包括七千幅岩画，和对1546具人类遗骸的分析。范·尼尔森(第九卷)阐明了A族群、C族群、新王国族群等等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其所以不同，决定于是仅仅使用颅测定法抑或兼用人类学的以及技术上的办法。肖像和体质人类学上的研究结果均表明，撒哈拉人和南部族群都曾有移居于此地，这些人和古埃及人都曾有过相当多的联系。关于中石器时期的研究，仅限于对不到100具骨骼进行了比较。就努比亚地区而言，未能得到确实可靠的结论，但新石器时期的研究能得到较为准确的数据。 61

塞维-泽德尔贝格教授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以种族的区别作为古代埃及的居民或任何其他类似研究的基础。今后应当另取别的研究方向。不同的文化，彼此同时但互相隔绝，然而却可能属于同一技术复合体。这一新方法证明埃及文化乃是非洲文化。而如果进一步观察，显然还存在许多别的问题。纳加达一世和纳加达二世便不与努比亚或当时的苏丹属于同一技术复合体。在苏丹，从卡萨拉到乍得、从瓦迪哈勒法到喀土穆是一个单一的巨大的技术复合体单位。A族群在第一和第三瀑布之间的地带，还可能包括更远的地区，构成另一个为时较近的技术复合体。

（二） 谢赫·安塔·迪奥普广泛论述了他的观点，他归纳其中要点，提出了一项书面材料。

（1） 从人类学观点看，自利基教授的发现以来所进行的研究已得出结论：人类的出现，首先是在非洲尼罗河发源处地区。按格洛吉尔氏定律，在温暖潮湿的气候中进化而来的热血动物有着一种黑色色素(真黑色素)，这条定律据认为既适用于其他物种、也适用于人类。因此，地球上最初的人类在种族上是同一的，都属于尼格罗人。人类从这一原始地区扩散到世界其他区域，唯有两条道路：尼罗河流域及撒哈拉。

在尼罗河流域，这一扩散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原始历史时期之间，是沿着自南而北的方向逐步进行的。

甚至马苏拉德教授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古埃及居民很可能至少包括三种不同的种族成分：尼格罗种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地中海"种族及克鲁-马农种类型。迪奥普教授由此推论，埃及在王朝前时期的居民基本上为尼格罗人；这一理论与尼格罗成分是在后来才进入埃及的理论相对立。

埃利奥特-史密斯发现了附有皮肤碎片的骨骼，它们的年代很久，是在制作木乃伊的习俗出现以前。迪奥普教授宣布，这些皮肤碎片中含有黑色素，其数量足以确定它们是尼格罗人的皮肤。

④ 见斯堪的纳维亚赴苏丹努比亚联合考察队的出版物（尤见其中卷一，《岩画》；卷二，《陶器前时期遗址》；卷三，《新石器时代及A族群遗址》；以及卷九，《人类骸骨》）。

为了寻求确切的证据，迪奥普教授研究了正在达喀尔进行实验分析的若干标本。这些在马里埃塔发掘的木乃伊身上的皮肤取样，在表皮和真皮之间都有相当数量的黑色素；迪奥普教授邀请与会的专家观察这些标本。如同对化石动物的皮肤的观察所示，黑色素可以维持几百万年(尽管多次有人提出相反的结论)，但在白色皮肤中却绝不存在。迪奥普教授希望能给他机会，对开罗博物馆所藏的法老们的木乃伊皮肤作类似的研究。

62 他接着说，要进行彻底的人类学的研究，还得进行骨骼测量和血型检验。值得注意的是，例如说，今天的埃及人，尤其是上埃及的人，和西非居民一样属于同一血型，即B型；而不属于A2型。A2血型是白色种族的特征之一。

（2） 肖像研究：迪奥普教授以一幅重要的肖像画以及他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所作的解释为基础，坚决主张没有必要对一些细节进行争论，例如同一坟墓中的尼格罗人与其它人——后者系贵族——有细微区别。他认为画法上的这种差别来源于社会地位的差别。普通人与统治阶级成员在肖像画上是有区别的。

（3） 迪奥普教授接着谈到**古代著作中**所提供的证据，指出希腊和拉丁学者都把埃及人描写为尼格罗人。他引证了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卢西安、阿波罗佐鲁斯、埃斯奇里斯、阿基里斯·塔蒂乌斯、斯特拉波、狄奥多勒斯·西库卢斯、迪奥吉尼斯·拉尔蒂阿斯、以及安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等人的话为证。他说，当代的学者们拒不考虑这些文章。相比之下，十八世纪的一位学者沃尔内倒谈到古埃及居民是尼格罗人。此外，《圣经》中的传说也认为埃及人是含的后代。迪奥普教授认为，埃及学这门科学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埃及学如要否定他在上面举出的种种事实，那就要对许多问题作出答案。

（4） 迪奥普教授然后转而谈到埃及人的自我描述。他们只用一个词自称：KMT，⑤这是"法老语言中用以指黑色的最有力的一个词"，迪奥普教授把它译为"尼格罗人"。因此，这一象形符号不写为鳄鱼鳞甲，而写为一块烧焦的木头。

（三） 德博诺教授对第一卷的资料作了详尽的评论。

（四） 勒克朗教授强调埃及文化的非洲性质，但指出必须如韦库泰教授那样，把"种族"和文明加以明确的区分。

埃及的体质人类学尚处于幼年。虽然如此，却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信赖尚特、埃利奥特-史密斯、塞尔基或德里博士等人已经全然过时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于现代的研究所得，已有若干重要的新的论文，例如维耶钦斯基的论文。⑥在努比亚进行工作的一些小组也对体质人类学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其结果是向以考古资料"贫乏"见称的努比亚，在这个方面看来似乎要比埃及更为人们所了解。⑦考古调查队如今十分重视骨学研究，这一革新大可欢迎。⑧

文化研究方面，岩石雕刻——从红海到大西洋，各处的岩石雕刻表现了很大的同一性——值得细加考查。这些遗迹是由一代代的文化集团、猎人、牧人等遗留下来的。

古埃及的居民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在现阶段试图用一种概括的方法求得解决，还为时过早。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分别的、精确的研究来寻求答案。为此目的，必须有此次学术讨论会中尚无代表出席的若干学科的专家们通力合作。如今的与会者全属"一般性的历史学者"，专长于编辑综合由专家提供的数据，而这种数据目前还很不足。

63

无论如何，过去那种求助于已经完全过时的权威、例如莱普西乌斯或皮特里的办法，总归是一种倒退。不妨承认他们"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性，但是，从他们的时代以来，埃及学已经大有进展了。

至于肖像方面的证据，唯一的问题是查明埃及人在与别的民族相处时如何自称。他们自称为RMT(Rame)，也就是"人"；对其它民族他们一概认之为遍布四方的群氓，也就按东南西北来定名。例如赛加

⑤ 其后常用的"Hamite"(含米特人)一词即源于此词。此词亦以"Ham"形式见于《圣经》。

⑥ 《埃及地理学会学报》，第31期，1958年，第73-83页。

⑦ 勒克朗教授此处系指尼尔森、斯特劳哈尔、阿梅拉戈斯、罗加尔斯基、普罗明斯卡、谢姆拉和比利等人的研究工作。

⑧ 参看新近一篇重要论文：D.P.范杰尔文、D.S.卡尔森及G.J.阿梅拉戈斯("努比亚古代居民的种族史及生物-文化适应")，JAH(《非洲历史杂志》)，第十四卷，第4期，1973年，第555-564页。

赖的俘虏雕像（第六王朝，我们纪元前2300年）一部分是北蛮子（亚洲人、利比亚人），另一部分是南蛮子（努比亚人、尼格罗人）。典型的北方人（白种人）和南方人（尼格罗人）都踩在法老脚下，可作这种提法的佐证。

（五） 加拉卜教授谈到了可以确认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我们纪元前第三千纪之间与非洲民族变动有关的各种因素。

在东北非洲尼罗河流域及绿洲发现了大量第二洪积期的石器。加拉卜教授在中石器时期埃及居民中至少区分出六个种族群，但他们却由同一种文化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旧石器时期的人种多少属于同一种族，就是"高加索种"；非洲最早的尼格罗型人是阿塞拉尔人和恩图曼人。旧石器时代后期，从大西洋到红海都有尼格罗人出现。但是，最初的埃及人中却发现了布须曼人的遗迹；这种人由于逐渐适应地中海区域的生态条件，有一些特征已经改变。直到今天，埃及居民中仍然有"布须曼人"类型的痕迹。新石器时代之前并无真正的尼格罗文化出现。

（六） 阿卜杜勒加迪尔·M.阿卜杜拉教授认为，确实证明古埃及人是黑种人或尼格罗种人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曾到达的文化的高度。

肖像研究方面的证据表明，纳帕塔文化的创造者与埃及人毫无共同之处；两者躯体特征迥然不同。如果埃及人是黑色，那么，纳帕塔文化的创造者是什么颜色呢？

谈到语言时，阿卜杜拉教授申言KM(Kem)的意思并不是"黑色"，其派生词也不是指个人的颜色。他还通过语言学上的论证，阐明了他与迪奥普教授不同的理论。他的结论是，埃及语言并非一种纯粹的非洲语言，而是属于原始的闪米特语族，这一点可以举出大量例子充分加以证明。阿卜杜拉教授认为，迪奥普教授举出的例证，既难以令人信服，又不足以导致结论。他说，把一种语言与一种种族构成或某一个人硬扯在一起这种做法是冒险的。把一种死语言与若干活语言相比较，必然得不出什么结论；所指出的类似之处，不过出自偶然。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对古代非洲语言的发展变化并无所知。为了支持语言亲属关系这种理论而举出的证据，与其说足以表明古埃及语和现代非洲各种语言的亲属关系，倒远不如说是更适于表明古埃及语传布于整个非洲大陆这种理论。为什么要假定古埃及语和沃洛夫语密切相关、而不是和——比如说——麦罗埃语有密切关系呢？纳帕塔语和麦罗埃语之间有天壤之别。

阿卜杜拉教授希望，研究应以最严谨的方式进行。

（1） 他认为在某一种族集团、某一社会经济制度与某种语言之间确立必然的相互关系是做不到的。

（2） 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研究得到科学上可靠的结论。历史几乎没有明显的例子表明，在发生重大民族迁移的同时发生重大的文化变迁。

（3） 就体质人类学家而言，"尼格罗"一词的概念今天还不明确。一具骨骼并不能提供皮肤颜色的证据。在这个方面，唯有人体组织和皮肤本身才是重要的。

（4） 开展古病理学和葬礼习俗的研究十分重要，刻不容缓。

（七） 索内龙教授在阿卜杜拉教授和迪奥普教授二人就语言学方面的问题热烈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发言，试作调停。他说，埃及语中的KM（阴性为KMT）意思为"黑色"；阳性复数为KMU(Kemou),阴性复数为KMNT。

KMTYW这一形式只能指以下二者："Kmt的那些"，"Kmt（'黑色的国家'）的居民"。它是一个派生的形容词(nisba)，来自业已变成专有名词的一个地理术语，不一定能"察觉"它原来的意义（试比较Frank, France, French）。

埃及人指称"黑人"，会用Kmt或Kmu，但不会用Kmtyw。任何情况下，他们从未用过这个形容词来指称非洲内陆的黑种人，而黑种人是他们从新王国以来就知道了的；另外，一般说来，他们也不用颜色的名称来区分不同的民族。

（八） 奥邦加教授发言时又回到由迪奥普教授开始的语言学的论证上来。⑨

（1） 奥邦加教授首先以伊斯特万·福多尔教授⑩新近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批评了格林伯格教授的研究方法，指出自费迪南·德索绪尔的研究成果发表以来，学术界已经公认语言学上的证据乃是确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在文化上是否相关的最好而易见的方法。奥邦加教授力图证

⑨ 奥邦加教授把发言全文交给了报告起草人，附于讨论会最终报告后，作为附录之二。

⑩ I.福多尔：《非洲诸语言的分类问题》（匈牙利科学院亚非研究中心，布达佩斯，1966年），第158页。

明在埃及语(古埃及语和科普特语)及现代的尼格罗-非洲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脉相承的亲族关系。

进行任何比较之前，须先防止混淆语言的类型关系（此种关系并不表明所比较的诸语言来自某种共同的早期方言）和亲族关系。例如近代英语从类型学角度看，与汉语很近似；但从亲族观点看，则此两种语言便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语族。奥邦加教授也认为，混合语言这种观念在语言学上纯属胡诌。

亲族关系有赖于通过比较类似语言之间的词素与音素，发现并确立语音规律。在这种形态、词汇和语音一致性的基础上，便可以探索出早先所共有的形式。理论上的"印欧"语便以这种方式得以抽象地复现，而且用作一种研究工作中的模式。由此表明了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宏观结构，为此后分别沿着不同方向发展进化的多种语言所共有。

(2) 奥邦加教授提请讨论会注意语法上若干重要的类型学上的相似之处：以后缀-t构成阴性，以后缀-w (ou,u)构成名词复数。他然后分析完整的词形，指出古埃及语和为数相当多的非洲语言之间在词形上的类似；在埃及语和沃洛夫语之间则存在着全面的对应之处。奥邦加教授根据这一系列论证引出这样的结论：形态、词汇和句法上的类似，总和起来，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古埃及语和现代的尼格罗-非洲诸语言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而这样一种类似的对应关系，在闪米特语、柏柏尔语和埃及语之间是不可能有的。

65

他继而比较了以动词-名词搭配以表达"to be"的方式。在这方面，班图语中通用的古老形式与古埃及语中最古老的形式是相同的。对否定词素、未来时态的强调形式以及连接虚词的分析所导致的结论，与前举各例相同。因此，奥邦加教授认为将来有可能找出一种共同的语族结构。

(3) 最后，奥邦加教授谈到语言比较中他认为最令人感到兴味的一个方面。

他把某些词——palm(手掌)、spirit(精神)、tree(树)、place(地方)——在不同语言中的形式做比较，并把某些小音素作比较，找出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KM(Kem)在古埃及语中意为"黑色"，在科普特语中成为kame、kemi、kem；在班图语中成为ikama(意为因曝露于高热而变焦)，在阿泽尔语中为kame(未燃尽的煤或炭)。又如Romé，在古埃及语中意为"人"，在班图语中成为lomi。在上面所比较的几种不同语言中，同样的音素起着同样的作用。

奥邦加教授从这些比较作出推论，认为将来有可能发现一种类似"印欧"语系的"尼格罗-埃及"语系。在这种情况下，并考虑到这些语言所具有的无可否定的共同文化背景，应当说今后的研究具备了一种可靠的发展基础。

(九) 戈登-雅盖教授申言，对埃及地名的研究也许可以用来证明至少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没有外国居民大规模地迁入或侵入埃及。众所周知，地方的名称寿命极长，一个长期住在同一地区的语言集团，总会给该地区留下一些地名。地名的多少取决于这类人口的多少及其在该地区处于优势地位时间的久暂。埃及居民中如果有较多的外来人口长期居住，必然会给这个国家的地名上留下痕迹。但事实却非如此。埃及的地名极其一致，其来源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可以从埃及语言本身中寻得解释。直到托勒密时期以及更后的阿拉伯征服之后，才有希腊和阿拉伯词源的地名在大量埃及语地名中出现。只有在一些边沿地区，如努比亚、西部绿洲及东部三角洲——这些地方与讲其它语言的邻近民族有直接接触——才能找到可以从某些外国语中追寻出其语源的地名。

(十) 德维斯教授暂时脱离其报告起草人地位，向讨论会报告一项肖像研究中所获得的意外成果。⑪

66

三张画稿中⑫有为黑种埃及人所作的画像，值得探讨。在排除了可以归之为圣经的传说(含的后裔)及有意仿古的寓喻笔法(冥王、黑暗)之后，还剩下占某种比例的埃及人，其相貌和着色都是按尼格罗人画的。诚然，此中有一些是奴仆，但另一些却是自由埃及人，而所选择的场景特别令人感到兴趣。有几个自由人——约为在场者的三分之一——围绕着约瑟的桌子，约瑟正举行宴会，招待他的坐在另一桌的以色列兄弟们；另一部分人则正在参与把约瑟卖给波提乏的事，波提乏画成一个白种人。这些人像的细

⑪ 这项范围极为广泛的国际性学术研究，将写成一部三卷著作，其中有两卷已经出版。这一研究系由梅尼尔基金会(休斯敦，美利坚合众国)进行的，它在巴黎的一个单位整理了一大批肖像画材料。

⑫ 巴黎，国家图书馆，新收藏品：拉丁2334(VI-VIIe?)，梵蒂冈希腊747(XIe)，梵蒂冈希腊746(XIIe)。

节，都以现实主义的笔法画成，最突出的是这些黑种埃及人所穿的具有特色的服装（在十一世纪旧约前八卷中特别讲到）。那些尼格罗人多手持长矛，穿着一张“豹皮”，右肩裸露，和留着胡须、缠头巾的埃及人画得显然不同。德维斯教授认为，由于拜占庭和埃及在法蒂玛时期往来相当频繁，又由于从这一时期以后表现手法远较古老的画件更为写实，以上这些观察所见就更加值得注意。

这些文献是很难解释的；它们既表现了拜占庭文化背景，又表现了《圣经》的传说。但无论如何，它们还是反映了“北方人”对埃及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与标准的“白皮肤”理论却不一致。

三、一般性讨论

讨论表明，若干与会者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按目前掌握的知识情况，就整个古埃及史或在某些情况下就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作宏观分析是可取的。另一些与会者则认为较为明智的办法，是就一个学科或几个学科进行地区性的深入的微观分析。

（一） 对已获得的成果按年代顺序进行分析

谢赫·安塔·迪奥普教授在讨论这一点时首先发言。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人类种族原有的单一性已经逐渐丧失；在这方面埃及居民的单一程度既不高于也不低于世界其它部分的居民。目前一般认为，人类于530万年前已出现于非洲。

现代人大约于我们纪元前15万年前出现，逐渐分布于尼罗河流域当时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部分。当时生活于埃及的人是黑种人。

迪奥普教授不接受与此相反的观点，即韦库泰教授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王朝前时期埃及居民变动的那些意见。迪奥普教授指出：具有相当深的色素、甚至黑色素的33%的“白种”埃及人，实际是黑种人；33%的混血种人也是黑种人；加上马苏拉德博士曾经提及并承认为黑种人的又一个33%的居民，则整个王朝初期的埃及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实际上都是黑种人。

他继而重申他前已大致阐述过的、关于其血统已经逐渐混杂的埃及黑种居民的总的见解。

对讨论中的另一问题，迪奥普教授用明确的措词申言，只是在波斯人占领时期，上埃及的黑种居民方才开始后撤。

他在发言的结尾作了两点一般性的论述。其一是关于negroid（尼格罗人）一词的使用；他认为这个词既无必要，又带贬义。其次，他泛论针对他的观点提出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些论点是错误的，不以事实为根据，缺乏批评的严肃性。

与会者之中，有一位对迪奥普教授的理论持全面反对态度。 67

与会者之中，无人明确表示支持往昔那种认为埃及居民是具有深色、甚至黑色素的“白种”人的理论。讨论会以默契的方式丢弃了这种旧理论。

对迪奥普教授阐述的种种理论，会上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这就表明学术界中存在着分歧，虽然没有明确讲出来，但分歧却很深。在涉及某些程序问题时，提出的批评超越了预定的辩论范围。

关于极其久远的古代的情况——比法国人仍然称之为“新石器”时代为早的古代，与会者一致认为很难求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德博诺教授提到，在若干不同地区（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埃及）发现的砾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相似。阿舍利时期的情况亦复如此，这一时期非洲若干地区的双面岩心工具都类似。

另一方面，在东非发现的桑戈工艺，愈往北则愈不多见。在阿布·安杰湾（苏丹的萨伊岛），还有程度不同的成套工具。过了瓦迪哈勒法再往北，若干特点显然消失。及至埃及。这项工艺便只剩下唯一一种类型上的特色在底比斯和开罗附近的代赫舒尔之间保留下来。

旧石器时代中期，通过打击石块来取得勒瓦卢瓦石片的方法，在埃及和位于它以南或以西的地区之间，差别很大。

在旧石器时代，埃及在石头工具制造方法方面与非洲其它部分隔绝原因至今不明，也许是由于气候和生态条件的变化，于是产生了自己独创的制作法（塞比勒、后勒瓦卢瓦型、或哈瓦拉、哈里杰型）。

此外，东北非的阿特利人在这同一时期侵入。他们的遗迹直到南部撒哈拉都有发现。他们到达了锡

瓦绿洲，又有很大一批人到达哈里杰绿洲，后来扩散到尼罗河流域，底比斯曾发现他们留下的遗迹。属于同一时期的文物在瓦迪哈马马特(东部沙漠)、伊斯纳(与哈里杰遗物混在一起)、达拉、开罗附近的戈哈迈尔山、以及远至东部三角洲的瓦迪图米拉特(与后勒瓦卢瓦遗物混在一起)等处都能见到。很可能在这同一时期曾发生过小规模的民族混合，外来者不久便都为本地的居民所同化。

另一起侵入埃及的异民族是巴勒斯坦的纳托菲亚人，这同样令人感到饶有兴味。早已确切证明，他们到达了开罗附近的哈勒万。新近的发掘证明，这些人居住在一片较大的地区。在法尤姆以及东部沙漠中从法尤姆沿东西方向横贯尼罗河流域的一条带状地区，发现了可以判定是属于这些纳托菲亚人的石器。

索内龙教授认为，鉴于底比斯山区旧更新世地层中存在的切凿过的卵石，可以推定从远古时起便有人类在尼罗河流域居住。

加拉卜教授认为，旧石器时期的埃及居民是高加索种人，并进而指出新近的发掘已经提供证据，表明在王朝前时期的居民中已有属于"桑人"类型的人存在。

关于古埃及有现代人生活一层，欣尼教授表示同意，但未提及他们的肤色；他判断尼罗河流域有最初的居民，时间在约两万年以前。此后，不同的人类集团从不同地区来到埃及，增加了当地的人口，也改变了人口构成。

关于新石器时期和王朝前时期的讨论同样活跃。阿布·巴克尔教授强调指出，埃及人从未与其他民族相隔绝。他们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种族，难以同意新石器时期埃及居民全部为尼格罗人的意见。新石器时期的埃及居民乃是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种人的混合，他们曾被称为含米特人，其实是不对的。

68

纳杜里教授持同一论点。新石器时期，来自撒哈拉各地的移民渗入早已在三角洲西北部定居的居民，各种不同的种族群于是交相混合。从那时起直到王朝时期，埃及的居民一直延续不断。层次分明地埋藏着大量古代遗物的迈里姆德遗址表明，这个地方的拓居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韦库泰教授就古代埃及的居民坚定地申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尼罗河流域的居民从来就是各个种族的混合；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外来成分一直为数很大，在王朝前时期尤其如此。

在王朝以前时期及王朝时期的初期，又有一批新的移民加入了当地居民；他们来自东北部，称为闪米特人。纳杜里教授和阿布·巴克尔教授一样，认为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注意：在第一王朝时期，在阿拜多斯修筑了若干城堡，其目的很可能是制止自南而北的移民。

阿布·巴克尔教授提到基奥普斯的黄发碧眼的妻子这件事作为例子，证明埃及曾有"非黑色"的人。迪奥普教授把这个孤立的事例看作一般规律的一个例外。

讨论过程中，奥邦加教授补充了若干重要论点，着重指出涉及埃及居民的古代著作的重要性。希罗多德在一段关于科尔奇人的文字——这段文章当代的学者没有异议，对手稿的对比研究也没有否定它——中通过一系列有力的论证，力图证明科尔奇人和埃及人相似："他们说话和埃及人一样，唯独他们和埃及人这两个民族通行割礼，他们象埃及人一样纺织亚麻布。"除这些相似之处外还有更重要的共通特征：黑色素和卷发。

勒克朗教授坚持指出，古代作家使用"烧焦的脸"一语(埃塞俄比亚语)指努比亚人和尼格罗人，但不指埃及人。奥邦加教授回答说，希腊人曾用"黑色的"(melas)一词形容埃及人。韦库泰教授提出疑问：希罗多德究竟是在哪一篇文章中断定埃及人为尼格罗人。迪奥普教授回答说，希罗多德在三种情况下讲到他们：谈到科尔奇人的起源，提到尼罗河洪水的来源，以及探讨宙斯-阿蒙神殿。

勒克朗教授认为，埃及人的一致性不在于种族方面而在于文化方面。埃及文明稳定不变长达3000年之久；埃及人自称为REMET(科普特语作Rome)，而且清清楚楚地自别于与他们不相同的南方和北方的各个民族，在画像中尤其如此。奥邦加教授不认为埃及人使用REMET一词就是把自己和邻国之间划了一条种族上的界线；他认为埃及人自别于其他民族，恰如希腊人自别于其他民族一样，希腊人把其它民族都称为野蛮人。

勒克朗教授提出，埃及文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古代非洲特征是值得研究的。他举例说，狒狒用作托特神的象征，荷拉斯在礼拜奥西里斯时所穿的法衣"豹"皮在肖像画中也颇为常见。但在他看来，其文明之稳定长达3000年的埃及人既非白种人，也非尼格罗人。

索内龙教授对埃及居民纯属同一种族这种看法、尤其是断言从最初的人类出现于埃及直到王朝前时期为止一贯存在一个种族这一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当前所获得的各种证据之中，没有哪一项可以作为

69

根据来怀疑埃及居民是混合种族。

对谢赫·安塔·迪奥普和奥邦加两教授所提出的理论——即从最初起直到波斯人入侵为止，尼罗河流域居民为单一种族——持不同意见的专家们的结论是：埃及居民的基本部分于新石器时期就在那里定居，他们大部分源于撒哈拉，包括北部和南部撒哈拉人，彼此肤色不同。迪奥普和奥邦加两教授反对这种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大意是尼罗河流域纯为黑种人所拓居，他们迁移的方向是自南而北。

（二） 有否带来重大后果的移民进入尼罗河流域

讨论会关于这一题目的记录十分混乱，多次讨论未能得出结论。

一般而论，与会者认为"大规模的移民"这一理论难以解释至少在喜克索时期以前的尼罗河流域开拓问题。从那时起这里与近东地区已开始发生语言交流（霍尔瑟尔）。另一方面，有几位专家认为，与流域内的紧邻地区显然发生过人口交流；然而，对于地理和生态因素给这种人口交流带来的天然和人为的障碍所起了什么作用，看法却又极端歧异。

但无论怎样，与会者一致认为埃及同化了这些种族不同的移民。这样看来，与会者含蓄地承认尼罗河流域居民的基本成分一般保持稳定，这3000年中，受到移民的影响程度有限。

但是，当讨论到以后一些时期时，却发现在理论上无法达到这种广义上的一致意见。

关于旧石器时期，谢赫·安塔·迪奥普教授提出假设，认为人类渐次在尼罗河流域定居，远达孟菲斯所在的纬度。阿布·巴克尔教授说，关于这一时期的材料太少，尼罗河流域北部有可能根本无人居住。另一方面，奥邦加教授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前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一直不断有同一种族的人前来居住；埃及人本身的口头传说中着重讲到了这一点。他们说大湖地区是他们的发祥地，而努比亚则是和他们的国家完全相同的一个国度。

在中石器与新石器交替时期（韦库泰教授的意见）、或是新石器时期（哈巴希教授和加拉卜教授的意见），看来有大量的人口从撒哈拉向尼罗河流域迁移。韦库泰教授表示希望，目前人们所知极少的这些人口迁移的日期能够准确地加以测定，有关的古代遗物也能收集起来，加以研究。

谢赫·安塔·迪奥普教授对这一点作了较详细的回答：对西部撒哈拉的放射性碳测定表明，距今30,000-8000年，是一段气候潮湿的时期，这期间断断续续地间有若干干燥时期；同样，相继而来的干燥时期的日期测定，也已逐渐确切。对东部撒哈拉应当进行同样的日期测定；把古代气候研究所得的成果和对坟墓与雕刻研究所得的成果综合起来，韦库泰教授所要的史料也就可以得到了。

哈巴希教授根据已知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支持关于撒哈拉移民的理论。赛维-泽德尔贝格教授认为，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大部分属于撒哈拉文化和苏丹文化的技术复合体；尽管如此，很可能仍有大量人口移入，尤其是在新石器次洪积时期之前及其末期。 70

迪奥普教授另有一种假说，不同于那种认为主要在新石器时期有移民从撒哈拉进入该流域的假设。他认为埃及居民是由南而北地扩展的。他重申已在讨论中多次提到的想法，即在卡普萨时期，这一文化遍布于从肯尼亚直达巴勒斯坦的广大地区。

就王朝初期和王朝前时期而论，迪奥普教授和韦库泰教授一致认为在尼罗河流域远达三角洲最南端的埃及居民都属于同一种族。关于人口的迁移是自北而南的假设，两位专家的看法是部分一致的，韦库泰教授感到这种理论难以苟同，迪奥普教授则断然否定。在进一步确切判定这些人口的属性上，产生了歧异。迪奥普教授认为他们是阿努人，并认为皮特里提到的阿拜多斯神庙的图画中的人象和他们同属一个种族。

在王朝时期，尼罗河流域埃及地段居民的稳定性已由其文化的稳定性获得证明。迪奥普教授表明，埃及历法早自我们纪元前4236年起便已使用，而且从最初起便以1461年为一周期。他认为在波斯入侵以前，这种稳定性只遭到一次威胁，这就是我们纪元前1450年发生的一场极其强烈的地震。它引起一系列的人口迁移，从而影响了东地中海盆地周围所有国家的平衡。一些海上民族于是进攻埃及三角洲，与此同时赫梯人在北非消失，原始的柏柏尔人出现于北非。除了这一巨大动荡之外，埃及民族史上的唯一重大插曲便是法老纳尔美尔大约于我们纪元前3300年自南而北征服埃及，统一全国，这件事未必与人口的迁移无关。

对这一分析没有进行讨论，但提出了别的分析。赛维-泽德尔贝格教授根据在努比亚发掘的文物，论

证法老时期的埃及在哪些时期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与南方隔绝。在努比亚，埃及最古老的文化于第一王朝末期，或许于第二王朝初期逐渐消失。继承它的C族群直到第六王朝才出现。这就意味着从我们纪元前2800-2300年之间存在着大约500年的空白，迄今无任何史料可供研究。从这种情况来看，法老埃及与南方频繁的联系显然或遭破坏，或被中断。

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一例：在下努比亚未能发现自我们纪元前1000年至公元初期这一段时期的古代遗物。在该地区发现的麦罗埃遗物，最早者属于基督纪元第一世纪；可见埃及与南方的交往，从我们纪元前2800年到麦罗埃时期变化很大。

韦库泰教授与勒克朗教授指出，自第十八王朝以来，出现了一种尼格罗人外貌的画像，这与早期有过的任何画像全然不同(例如胡伊墓或雷赫米墓)。这些新居民是怎样得以在埃及肖像画中出现的呢？这是埃及人与南方接触的结果还是由于更南方的居民向北移动而进入努比亚呢？欣尼教授认为，不能以此项资料为依据来臆测有移民由南而北，从而影响了埃及的人口。

71 勒克朗教授认为，除上文业已讲到的十八王朝的例子外，直到栋古拉的库什人于第二十五王朝时在埃及出现为止，没有再发生什么重大变化。顺便说明，他倾向于认为这种情况与其归之于人口的迁移，不如看作是埃及居民生活上某种特定影响的暂时的增长。

讨论过程中有两件重要事实得以澄清，而未引起什么严重争论：

(1) 关于史前时期的尼罗河三角洲⑬，有一个具有双重性的问题。

第一，如德博诺教授指出的那样，这一地区不同于上埃及，由于迈里姆德、欧迈里、米迪-赫利奥波利斯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尚未完成，对该地区所知甚少。

从史前史期和远古时期存留下来的已发现的人类遗骸，与在上埃及所发现者不同。

第二，就王朝时期以前的情况来说，现已查明对下埃及或三角洲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人的因素，不同于该地区以南尼罗河流域那些产生影响的人的因素，这一点看来是确切无疑的。

(2)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所大力进行的考古研究工作，已有可能对努比亚北部古代居民的基础层加以研究。而位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其余部分，由于多种不同的原因，情况却非如此；对这些地方王朝以前时期及古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所获成果要比努比亚北部少得多。有些专家之所以采取保留态度，不愿作出最后定论，部分原因大约即在于此。

会上的讨论往往是一位接着一位地发表彼此矛盾的论点，而另一因素无疑使这种讨论愈加复杂化。这显然是由于奥邦加教授所使用的一句话引起的，虽然没有人对之发表评论。奥邦加教授认为：单一的文化基础必然意味着单一的种族基础，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无论这两个概念本身是否容易使人把它们相提并论，事实是讨论过程中却没有把它们加以足够的区分，结果是所达到的结论便不如所预期的那样明确。求得共同点的可能性很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如果暂不涉及种族问题，则两个论题终于得到了几乎是一致的结论，至少可作为供进一步研究的一种假设。

埃及境内尼罗河流域居民受大规模移民的影响最深大约是在新石器时期。这方面当前有两种说法：一谓移民主要自北而南，来自整个东部撒哈拉地区；另一谓这种移民是沿尼罗河自南而北；自王朝初期以来，埃及居民十分稳定。无论是影响埃及政治生活与军事局势的各次人口迁移，或者是埃及对外贸易关系带来的各种后果，也无论是埃及人口转而务农的内部安置、或是邻近地区人口的渗入——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埃及居民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种族上的稳定性与文化上的高度稳定性同时并存。

但是，居民究竟如迪奥普教授所说属于单一种族，还是如另外几位专家所说是混合种族，在讨论这两种假设的过程中，双方意见截然不同。

72 (三)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

讨论过程中多次发现，迄今为止用于表述不同种族的术语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

部分专家主张，"Negro"("尼格罗人")、"black"("黑种人")和"negroid"("尼格罗种人")等名词不

---

⑬ 霍尔瑟尔教授提请与会者注意下述著作：D.G.雷德:《古代(我们纪元前五至四世纪)下埃及(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一本论文集，原载《古埃及学报》，1960年(译自俄文)。

应当使用，因为种族这一概念已经过时；应当努力排除有关种族的提法，从而促进人们团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代表格莱莱先生于此插话，再次对这些专家进行解释。他提醒与会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促进各国之间在文化领域内的互相了解与合作；教科文组织决定举办这次学术讨论会，其目的不是要导致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关系紧张，而是要就目前知识水平许可的范围内阐明和澄清存在着疑问的若干问题之一，这就是从种族起源和人类学的观点弄清古埃及人的拓居问题。因此，所需要的乃是比较不同的学说，评价它们的种种科学论证，全面了解情况，必要时指明存在的空白。他着重指出，尼格罗人、尼格罗种人、黑种人等名词迄今总还在使用；尽管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对它们的正确性提出怀疑，它们还是出现在所有科学著作中，也就如"Hamitic"("含米特人")或"Chamitic"("查米特人")这些词经常出现一样。他还说，《非洲通史》一书的各位作者将使用这些业已为读者所习惯的词。无论一般的看法如何，这些既用于学术著作、也用于通俗读物的字眼绝非言之无物，也总会或隐约或直率地含有贬义或褒义。他支持一位专家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问题的出版物所作的发言。教科文组织没有摒弃种族观念；这个组织已制订一项特别规划来研究种族关系问题，加紧工作，努力反对种族歧视，已就这个重大问题出版了若干书刊。因此，讨论会在研究古代埃及居民问题的过程中，在尚无任何新的说法来代替它们时，不能率尔决定放弃这些名词；把人们区别为白、黄、黑种的这些名词是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也是埃及学学者用以区分埃及居民所一向沿用的。此外，如果历史学家们当前仍在使用的这些传统术语需要修订，也不能仅仅为非洲史，而是要为整个世界加以修订；如果讨论会认为这一问题确属重要，不妨把它在国际范围内提出来，请历史学界的学术团体加以审议。在制订新的术语之前，黑种人、尼格罗人、含米特人等等当前通用的名词的含义应进一步加以明确。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由韦库泰教授首先引起的，他回顾说，这个问题是荣克在其著作中提出来的。荣克使用了"尼格罗人"一词，是指第十八王朝肖像画中出现的一种类型，后来受到埃及人的嘲讽。荣克使用尼格罗人一词，主要是指亚非一带的人，所强调者是肤色和某些面貌特征。

韦库泰教授倾向于认为，有必要以更为具体的标准来代替这种旧概念，给黑色种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他特别提到血型标准和肤色深浅的确切含义，以及例如努比亚人是否应认作尼格罗人。

对于这些问题，与会者表态各不相同。其中好几位表示希望，"种族"这个新近曾几度引起强烈的感情冲动的词，应当慎于使用。奥邦加教授回答说，种族这个概念在科学研究上是成立的。种族的研究并不一定要涉及种族主义。 73

讨论表明，要给这几个审议中的词提出合乎科学的涵义是困难的。更有甚者，讨论也许还表明了另一种情况，即不止一位专家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使用这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被认为包藏着一种危险的或轻蔑的含义。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不能指望历史学者或考古学者对这一问题从根本上作出解答，而只能寄希望于体质人类学专家。

相当多的与会者赞同塞维-泽德尔贝格教授的意见；希望由现代体质人类学专家来研究关于种族的术语。一种严密的、合乎科学的定义将不仅对非洲有用，对亚洲甚至更加有用；混杂人口、混合人口、人口族群等等概念，同样需要更确切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接到了这方面的请求，因为努比亚正在进行的研究有此需要。

格莱莱先生说，如果用以区分一个人属于黑种、白种或黄种的标准竟如此值得争论，如果所讨论的这些概念竟如此含混、甚至也许如此主观或无法摆脱习惯的思想模式，那就应当把想法坦率地说出来，而且按照新的科学标准重新审订世界史的全部术语，以求人人使用同样的术语，而术语具有同样的含义，可以避免误解而有助于互相了解和达成一致。

但是，迪奥普教授和奥邦加教授提到人类学者为判别尼格罗人而确立的一系列标准，就失之考虑不周了。这个标准是：黑色皮肤、颚部前凸、卷发、扁平鼻（面部和鼻部的这些特征是不同的人类学者极其专断地选定的）、尼格罗型骨架（指上下肢长度比例）。按照蒙特尔的意见，尼格罗人面部扁"平"。阿布·巴克尔教授评论道，果真如此，埃及人就确实不可看作尼格罗人了。

迪奥普教授继而具体说明，颅骨测定从未能提供任何统计数字，可据以判断何种大脑体积为何种种族的特征。

他认为黑色人种又分为两种，一种头发平直，另一种头发卷曲；如果皮肤为黑色，那末他在上面所列举的其他根本特征很可能同时存在。最后，就血型而论，白色人种的特征是A2型，黑色人种则大多为

B型，为数有限的一小部分为C型。

欣尼教授回答说，他为参加这一学术讨论会作准备时曾与美国专家商谈，他们告诉他，骨骼研究具有某些重要性，但其本身并不足以作为一种判别种族的依据，而迪奥普教授认为充分可靠的这些标准，不管对或不对，美国的专家们已不再把它们作为是一种依据了。

奥邦加教授认为在黑色人种中可分出两类，一种头发平直，另一种头发卷曲。奥邦加教授又回到讨论会所面临的问题：如果认为种族这个概念能够成立，又如果黑色人种这个概念也并未否定，那么，这个种族与古代埃及人之间的关系又应如何认识呢？

迪奥普教授认为，人类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业已提供充分的基础，可以据以作出结论。尼格罗-格利莫尔德种人大约出现于我们纪元前32,000年；白色种族的原始类型克鲁马农人大约出现于我们纪元前20,000年；黄色人种的原始类型商斯拉德人大约出现于我们纪元前15,000年的马格德林时期。至于闪米特种人，作为黑种与白种的混血种，则属于一种社会现象，体现着城市环境的特征。

74 他因此毫不怀疑，尼罗河流域的最初居民属于黑色人种，这是人类学者和史前史专家们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所肯定的。迪奥普教授认为，只是由于心理的和教育的因素，才不承认这是真实的。

由于在努比亚进行的研究是着眼于一般性的探索，所以研究的成果对当前的讨论便很少有什么用处。迪奥普教授不主张成立什么委员会去核实一些显然的事实，现时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把它们正式加以承认罢了。在他看来，当前可资利用的全部资料，包括那些十九世纪期间的肤浅研究所得到的资料，都证明远古时期的埃及人是黑皮肤，而且直到埃及丧失独立为止情况一直不变。对于向他提出的种种问题，迪奥普教授回答说，考古学所提供的种种例证已经足以证实他的理论。韦库泰教授认为1939年以前的人类学文献科学性不足，因而其可靠程度值得怀疑，他表示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迪奥普教授的这种论断受到许多与会者的批评。

主要的批评意见是索内龙教授提出的，他评论说，从有史以来直到今天的尼罗河流域居民总数，作一个合理的估计，应有几亿人。如今所发掘的遗址不过几百处，所研究的遗骸不过2000来具；所获得的数据如此不足，而要据以作出如此雄心勃勃的概括全面的结论，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既然可资利用的例证不能为我们描绘出历史的全貌，可取的办法是等待一下，首先对普遍性的特点进行严密和足够全面的调查，以求取得大家公认的证据。

（四） 肖像研究的可靠性

这一领域中也有两种对立的意见。迪奥普教授认为，既然埃及人是黑种人，他们的肖像画——此前他一直没有引用它们来加强自己的论证——就只能绘成黑种人。得到加拉卜和勒克朗教授支持的韦库泰教授认为，自十八王朝以来的埃及肖像画中方才出现具有黑色人种特征的肖像，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因此，这些肖像就意味着至少是从十八王朝以来埃及人便与在种族上和他们不同的民族有交往。

迪奥普教授指出，他在初步陈述意见时曾提出一组全部根据雕刻绘制的人像画，他认为这些全是黑色人种，或者显现出黑种人社会的面貌特征。他请求与会者对这些图画作具体的评论，并请他们举出自法老时代早期以来具有高贵威严姿态的白种人的画像加以比较。若干位与会者回答说，要从埃及肖像中寻找可与希腊雕像相比的东西，从来不成问题，而希腊雕像只是一个例子。韦库泰教授说，可能举出多件绘画，其中的人都画成了红色而不是黑色，但迪奥普教授不会承认他们是非黑色人种。纳杜里教授不否认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居民中有黑种成分，但说似乎很难说全部人口都是黑种。

75 韦库泰教授说，纳尔美尔法老像的摄影复制品是经过相当放大的，相貌很可能走样，说这个人象是黑种人，未免有主观判断之嫌。塞维-泽德尔贝格教授也持这种看法，他说，那张照片完全可以看作是拉普兰人的相片。

韦库泰教授并不否认埃及整个历史中可能有黑色人种成分，他本人进一步举出若干例子，证明雕塑和绘画都刻画了黑色人种。但他对这些事实提出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这些例证都是从整个法老时期不加区分地抽取出来的，没有指明出处；第二，选择这些例子是为了证实一个论点。迪奥普教授就此回答说，他有意识地只提出雕刻的物件或雕刻的场景，以期避免老是纠缠在讨论肤色的意义。但限于条件，他只能利用他在达喀尔获得的资料。资料的范围很全面，包括从古王国起直到法老时代的终结为止，这些文物确实证实了一种论点，而任何相反的论点也必须以“非黑种”的埃及人的肖像来加以证实。

在就肤色问题进行的漫长讨论中，以韦库泰教授、索内龙教授和塞维-泽德尔贝格教授为一方，迪奥普教授为另一方，再度意见分歧。讨论中双方互不退让。双方唯一显著的同意之点是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尤其要借助专门的实验室进行研究。

韦库泰教授承认，古王国时期的埃及雕刻中确实有表现黑色人种的作品，而且举例加以证实。但他不认为它们是以代表整个埃及居民；无论如何，在当时的雕刻中也有面貌特征十分不同的埃及居民。

韦库泰教授认为难以理解的是，如果埃及人确实认为自己是黑种人，何以他们很少——如果不是从来没有的话——使用炭黑、而是用一种红色来描绘他们自己。迪奥普教授认为这种红色是用来标志黑色的埃及种族的，而妇女之被涂成黄色则说明了美国人类学者提请人们注意的一桩事实：那就是在若干经过研究的种族群中，妇女的肤色通常总是较男人为浅。

（五） 语言分析

与前此各个议题的讨论情况相反，与会者就这个题目所发表的意见相当一致。会议认为，迪奥普教授的报告以及奥邦加教授的报告都是很富于建设性的。

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迪奥普教授申言，埃及语不属于闪米特语；阿卜杜拉教授对此评论说，过去倒是经常有人发表相反的意见。

迪奥普教授与阿卜杜勒加迪尔·M. 阿卜杜拉教授两位就语法和语义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前者说，他读作 KMT 的词根来自 KM，即“黑色”，他认为这是个集合名词，意思是“黑种人、亦即尼格罗人”。后者则采取普遍接受的读法，把这个词读作 KMTYW，翻译为“埃及人们”；它是 KMTY “埃及人”的复数形式，自 KMT 变来的一个衍生形容词，其含义为“黑色的国度，亦即埃及”。这后一种读法和翻译得到了索内龙教授的赞同。

索内龙教授转而讨论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提请讨论会注意奥邦加教授根据迪奥普教授的意见提出的研究方法。埃及语言保持稳定，为期至少 4500 年。埃及位于外来影响辐集之地，从外国语言中有所假借，属于意料中事。但在几千个埃及词中闪米特语词根不过数百。不能把埃及语和非洲大陆割裂开来，它的起源也无法仅仅从闪米特语的角度获得充分解释；因此，预期会在非洲发现与之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也就是十分正常的了。 76

但是，既要以严谨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就必须正视历史上有长达 5000年的一段空白这一难题，因为这正是把古埃及语和现代非洲的各种语言隔开的那段时期。

奥邦加教授指出，一种既未由书面形式加以固定、而又正常发展的语言有可能保留着某些古代的形式；他在讨论会第一天交流意见时曾就这方面举出若干例子。

索内龙教授指出，研究这一问题所曾使用的方法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古埃及语和沃洛夫语中第三人称单数加后缀的代词十分相似，绝不可能纯属偶然；他希望能以当代非洲语言为出发点，作出努力，复现古代非洲语言。这将便于和古埃及语互相比较。奥邦加教授认为这种方法是可以接受的。迪奥普教授认为重要的是应通过语言的比较得出一种研究方法，同时他从自己所想到的举出一个具体例子。他认为以丁卡人、努埃尔人和希卢克人及其语言为一方，以沃洛夫人及其语言为另一方，他们在种族上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方面也是如此，虽然程度上要差一些。这两个种族群的氏族中都有用塞尔加尔语姓氏的。更具体一点说，迪奥普教授相信他从努比亚山区的考考人中已发现了古埃及语和沃洛夫语之间的最明显的关系。

韦库泰教授提及一件饶有兴趣的事：在塞贝克-荷太普墓中绘有三个尼罗特人，他们无疑是丁卡人或努埃尔人的祖先。

（六） 创建一种学科之间的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会议一致同意有必要尽可能细致地研究尼罗河流域四周的全部地区，这样就有可能对会上提出的问题提供新的资料。

韦库泰教授认为有必要适当重视三角洲的古代生态研究，以及巴卢教授称之为“非洲肥沃新月”地带的广大地区。

谢赫·安塔·迪奥普教授主张探寻从达尔富尔西迁的民族抵达大西洋海滨的各条道路，往南沿扎伊尔河谷，往北沿约鲁巴河两岸趋向塞内加尔。他还指出，较目前更为细致地研究埃及与非洲其余地区的关系可能有很大收获。他提到在沙巴省发现了我们纪元前七世纪的奥西里斯小雕像。

有人认为，对尼罗河流域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些重大事件，诸如叙利亚人洗劫底比斯城、或我们纪元前525年波斯人的入侵，对整个非洲大陆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一有意义的假设也应加以研究。

四、总结论

可以预计，不同与会者对讨论会的总成果的评价将各不相同。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的预备工作文件提出了具体要求，与会者所准备的发言并不全都比得上77 谢赫·安塔·迪奥普教授和奥邦加教授经过辛勤研究而作出的报告。讨论中因此确实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

尽管如此，有很多理由认为，讨论还是十分富于建设性的。

（1） 在许多情况下，讨论清楚表明了交流新的科学情报的重要意义。

（2） 讨论使全体与会者深切认识到研究工作中迄今为止在研究方法上一直采用的标准还存在缺点。

（3） 讨论引起与会者注意若干新的研究方法；使用这些新的方法，讨论会所面临的问题便可以用一种较为科学的方式来加以探讨。

（4） 这第一次讨论会无疑为进一步的国际讨论和学科际讨论打下了基础，为已经证明确属必需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出发点。大量建议表明，与会者希望提出一项未来的研究计划。

（5） 最后，这次讨论会使得过去迄无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比较和对照的专家们，得以知道除自己所习惯的一套以外，还有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获取资料的源泉和进行研究的方针。从这一点来看也证明本届讨论会无疑是富于建设性的。

五、建议

讨论会请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有关团体注意下列建议。

（一） 体质人类学方面

希望：

（1）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国际性的调查工作，或向足够数量的各国大学征询意见，或征询具有国际声望的专家，或举行学术讨论会，以求按照最严格的科学原则确定非常精确的标准，以此为各个种族下定义，并辨别发掘所获骨骼的人种类型；

（2） 取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若干成员国的医疗机构的合作，以求在尸体剖检中就骨骼的骨骼学特征进行统计观察；

（3） 对全世界各博物馆中所藏人类遗骸再作检验，并迅速研究新近在埃及、尤其是在三角洲发掘获得的遗骸，以期丰富可以利用的资料；

（4） 埃及有关部门就力之所及，为对尚可检验的皮肤残片的必要研究工作提供方便条件；并请这些部门同意设立一个体质人类学专业机构。

（二） 移民问题研究

建议进行下列研究工作：

（1） 对三角洲开始有人居住的最早时期作系统的考古研究。这一研究工作不妨从分析三角洲土壤的岩心样品着手进行。研究这一地质取样并测定其年代的工作，可以在开罗和达喀尔同时进行。

78 （2） 把埃及附近的撒哈拉地区和绿洲作对比调查。调查应同时包括对岩画、图画和所有可能得到的古代资料的研究。也可同时进行地质取样调查并测定其年代。

（3） 对尼罗河流域本身进行调查，与在北部努比亚所进行者大致相同；即研究非法老时期的坟墓，

研究古代物质文明，总的说来，研究整个流域的史前史。

（1） 研究埃及肖像画中的古非洲遗迹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本届讨论会上已经举出狒狒和豹皮两例。无疑还能发现别的事例。

（三） 语言学

讨论会建议对面临消失危险的若干非洲语言立即进行研究，刻不容缓；已经提出的考考语是这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同时，应在国际范围内争取比较语言学专家的合作，以期完全掌握非洲各种语言和古埃及语言间一切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

（四） 学科际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本届讨论会恳切希望：

（1） 在若干地区进行地区性的学科际研究，优先顺序如下：

达尔富尔

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地区

撒哈拉东部边沿地带

北纬十度以南尼罗河地区

第二至第十瀑布之间的尼罗河流域。

（2） 就面临绝种危险的考考人紧急进行学科际研究。

二、辨读麦罗埃手稿

（一） 勒克朗教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准备了一项初步报告。⑭

（1） 为纳帕塔文化和麦罗埃文化所使用的麦罗埃语至今仍然不懂，虽然麦罗埃文字已经译释出来。

这些手稿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以一种没有计划的方式逐渐收集起来的。对麦罗埃文字的研究过程表明，系统的研究工作仅在近几年来方才着手进行。考古方面的研究今后很可能发现更多的此类铭文，在第二和第四瀑布之间地区迄今尚未发现这种铭文，通往红海方面的交通道路、西部的大河谷、科尔多凡及达尔富尔等地也未曾发现。

坚持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有理由希望，总有一天会发现用两种语言写成的铭文。

（2） 研究成果已在迄今出版了十三期的《麦罗埃通讯》中全部发表，这份杂志可以迅速公布有时还处在试验阶段的成果。定期举行了专家会议——1970年12月于喀土穆，1971年9月于东柏林，1972年6月和1973年7月于巴黎：上述最后一次会议的讨论结果已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出版的《情况通报》第34期。

用计算机来分析麦罗埃语也已有若干年，结果在这一领域中获得了可观的和迅速的进展。

通过对这种文字节、句的编排，已有可能着手研究分析这种语言的结构。已编就的词汇索引计有13,405个单词，并已设计出一种向计算机提出问题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通过利用其含义明确、或可推知的词，已在试将这种语言和埃及语或努比亚语比较。

（3） 勒克朗教授在发言的最后部分列举了现在遵循的研究方针：

欣策教授正致力研究结构问题；

申克尔教授正致力改进将由计算机加以记录的数据；

阿布杜勒加迪尔·M. 阿卜杜拉教授正致力于一项调查，将就此作简短发言；这项调查已经取得了若干成果，足以证实国际小组的研究成果。

今后的努力方向包括将麦罗埃语言和非洲其他语言相比较，找出它在一组非洲语言中、特别是与努

⑭ 这一初步报告见本届讨论会最终报告附录之四（1974年）。

比亚语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另外也要把它和埃塞俄比亚地区周围地带所讲的语言作比较。最后，将麦罗埃语言和全部非洲各种语言相比较，也是一种可取的办法。

讨 论

（二） 阿卜杜拉教授证实，他赞同为记录麦罗埃语言所采用的音标体系，以及为把原文录音而设计的方法。他提醒讨论会注意我们对这一语言的知识还不完整，如对代词体系、指示代词的用法以及前缀和后缀的性质几乎一无所知。弄清麦罗埃语言和哪些其他语言有关系，至为必要。

阿卜杜拉教授赞成对这种语言进行剖析，以便研究它的组成成分。他着重指出，构成个人姓名的一些成分的灵活性，姓名中的这些成分具有社会的含义；某些成分在同一家族的几个成员名字中重复出现；某些子女的名字中包含有取自其父名和母名中的成分；某些名字是头衔；另一些名字中包括着地名。

（三） 欣尼教授说，有三种研究方法可供采纳：搜求一份用两种语言合写的原文；对这种语言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与其他的非洲语言作对比研究。

曾经把分属苏丹北部和M族群的两种主要的非阿拉伯语加以直接比较，结果一无所获。麦罗埃语言可能有助于进行这种对比研究。

（四） 以观察员身分与会的卡科西教授强调指出研究文献资料的必要性。他说，布达佩斯有得自阿布辛拜勒附近一处遗址的若干献祭铭文的残片；他建议今后把这些残片纳入《麦罗埃铭文汇编》之中。

（五） 谢赫·安塔·迪奥普教授对所取得的进展表示十分满意。在发现两种文字对照的手稿以前，他建议利用计算机进行研究的方法；由克诺罗索夫教授领导的列宁格勒小组便是利用这种方法而得以部分80地译释了马雅象形文字的。多数手稿都是借助两种或多种语言对照的遗文才译释出来。解决麦罗埃文字的正确办法，应是按下列方式将多种语言的对照与计算机的潜在能力结合运用。

（1） 纯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麦罗埃文字与尼格罗非洲的各种语言之间设定某种关系，从而创造出多种语言的格局。

（2） 目前，已有22,000个麦罗埃词能以某种准确程度读出；因此，应由一个适当的语言学家小组仔细地选定一百种非洲语言，而在穿孔卡片上为每种语言列出一个500词的基本词汇表；所选的词汇最好是指称人体各部分、亲属名称、宗教术语和与物质文明有关的词，等等。

（3） 为计算机编制程序，使之能辨认例如三个相同的子音、两个相同的子音，等等。

（4） 以所获得的成果为基础，把各种语言的结构按这种方式排列起来加以比较。

由于对麦罗埃语法迄今为止所知太少，这种方法要比把语言结构任意加以比较较为合理。这种方法也比等待对麦罗埃语言的内部结构进行非比较性的研究得出成果有效得多。

勒克朗教授支持这种研究和工作程序，认为它很可能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他认为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为实际存在的特征编制索引，而且对并不存在的特征（缺乏若干结构或若干序列）编制程序也有用处。

过去用以译释其他语言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用以解开麦罗埃语言之谜呢，格莱莱先生就这一点提出问题。他说明，邀请克诺罗索夫教授和皮奥特罗夫斯基教授来参加会议，也和邀请霍尔瑟尔教授与欣策教授一样，是为了提供这方面所需要的情报。

勒克朗教授说，1973年夏季在巴黎和伦敦举行的会议上，对这一问题作了十分广泛的研究。对莫亨约达罗文字和马雅文字所进行的研究尚未超出可供研究的假设这一阶段。

但是，迪奥普教授希望不要放弃把比较法与结构研究同时进行的想法。索内龙教授赞成这个建议，并就此机会着重指出麦罗埃语研究小组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工作的重要性。

接着讨论了与苏丹的各种语言特别有关的问题。塞维-泽德尔贝格教授强调说，研究这些语言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除了可以和麦罗埃语进行比较之外，对这些语言的了解将有助于发展非洲语言学。他在讨论的这个阶段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建议书大纲。他还强调指出，有可能以少量经费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秘书处，加速历史资料的收集，用计算机加以处理，然后把这些科技情报重新印发。

最后，讨论了建议书的内容。迪奥普教授希望麦罗埃语研究小组所进行的出色的工作将能在国际的充

分合作下继续下去，希望能在苏丹系统地编辑词汇表，希望非洲其他一些地区也能在奥邦加教授的配合下进行同样的编辑工作。索内龙教授对各条建议都全部接受。由于尚不能确定这项工作对于麦罗埃语言的译释最终能起什么作用，他希望非洲各种语言的研究工作能独立进行；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已部分地纳入了全面的规划，也还是应有自己独立的目标。这项工作看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从一开始起便有必要建立一套彻底的科学方法，而且要经过严格的评议和审核。奥邦加教授赞同这个想法，并建议把现已掌知的麦罗埃文字的语法特点编制成一份表格。勒克朗教授认为这个建议可以立即付诸实行。哈巴希教授希望不要忽视考古调查的必要。 81

在回答奥邦加教授就研究方法提出的一项建议时，格莱来先生说，一待负责这一工作的国际研究小组成员有了定局，便可决定要采取的方法。他解释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正在喀土穆对各种苏丹语言进行的研究，并准备按照正常的手续拨给研究经费。教科文组织给一个非洲语言学研究项目提供了经费并给予指导，为此目的，新近还通过了一个十年计划。

建议

（一）（1） 会议对巴黎的麦罗埃研究小组与许多其他国家学者合作所完成的工作表示满意，并认为这项研究工作是有充分根据的，可望取得良好的成果。

（2） 会议一致通过，建议采取下列措施以推进这个研究项目：

1） 增加经费，以求加快计算机处理过程，并将所获得的资料加以修改提高，分发给各个主要的麦罗埃研究中心。

2） 可能时，编制麦罗埃语人名、地名、头衔名的词汇表，将语言结构加以分类，争取与非洲各种语言的语言学者合作。

3） 以现有的档案材料《麦罗埃语铭文汇编》为根据，编印一套完整的麦罗埃文集，附以文献书目、图片、复印件和音标。

4） 编制完整的麦罗埃文词汇表。

（3） 鉴于本研究项目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成果在科学上是正确可靠的，而且将能继续获得进展，又鉴于本项目的整个经费中的大部分已从不同来源得到解决，会议认为亟需提供经费解决下列问题，以求保证继续和完成这一研究项目：

1） 秘书处和人事经费，以便把科学资料汇编成集，印刷出版；

2） 对收藏品和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的费用；

3） 专家旅费；

4） 卡片打孔和计算机时间费用。

（二） 研究工作的下一步应是对非洲各种语言进行结构和词汇方面的比较研究，首先要研究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的语言，其中有一些语言在逐渐消失。最好的办法是对喀土穆大学的苏丹学生、尤其是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学生进行语言学方面的训练。

这样一种训练对许多别的目的也有用处。这样一个项目将能补充已在苏丹进行的富有价值的工作之不足；这就需要和喀土穆大学谈判，并为必要的奖学金提供经费。

（三） 此外，在更大范围内对所有非洲语言进行调查，收集关键性词汇，是一种可取的办法。这种调查应和麦罗埃文研究小组合作进行，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联合遴选专家，加以指导。词汇的收集，应从大约一百种语言中选定的范畴内挑选，每种语言以五百字左右为限。 82

所收集的这些词汇，一旦经过计算机处理，便可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不但可以用于译释麦罗埃语，而且可以解决当代非洲语言学中许多别的问题。

（冯世则译）

84

2 法老埃及

A.阿布·巴克尔

欧洲冰河时期的结束，给地中海以南地区带来剧烈的气候变化。雨量的减少，促使撒哈拉非洲的游牧民族移居尼罗河流域，以取得水久性的水源。尼罗河流域真正有人定居大约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约我们纪元前7000年)。那时埃及人已进入畜牧和农业社会。他们在改进石制工具和武器的同时，还发明并使用陶器。这对我们描述新石器时代埃及各种文化的全貌有很大帮助①。

在有史时期开始之前不久，埃及人在所谓铜石并用时代学会使用金属②。在这个阶段，金属逐渐取代燧石。黄金和紫铜也初次出现，但青铜到中王国时期才使用，铁的使用直到法老历史的末期才明显普及。

史前史

位于非洲东北角的埃及，同幅员辽阔的整个非洲大陆相比，当然是个小国家，但是它却产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大自然把这个国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从阿斯旺起到现代开罗地区止，傍依尼罗河的狭长的肥沃地带称之为上埃及，而几千年来尼罗河水源源向北流入地中海因淤泥沉积而成的宽广的三角形地带，我们叫做下埃及或者三角洲。

第一批移民的生活是艰苦的。不同人群为了夺取沿尼罗河两岸和三角洲相当有限区域里的土地，必定发生激烈的竞争。只有最强悍最能干的人才能生存下来。这些来自西方、85 东方和南方的人，无疑属于各种不同的族群。各种自然条件的障碍及血统的不同，使定居在沿河流不同地域的人群最初互不往来是不足为奇的。从这些人群的分布，我们能看出埃及各州或者地域划分的起源，它们是形成有史时期埃及政治结构的基础。但是，尼罗河给沿岸各居住区提供彼此交往的便利，有利于促使语言和文化的逐步统一。统一的语言和文化最后掩盖了各个族群的特性。

史前时期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对土地的控制(见导言)。早期埃及人最初定居在冲积平原露出地面的岩层上，或者沿沙漠边缘的高地上。他们设法平整附近的土地，准备耕种，排干沼泽，修筑堤坝，以拦阻洪水的侵袭，并逐渐懂得利用渠道灌溉的好处。但这种工程需

①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卷,第二十五章,"尼罗河流域史前史"。
② 上书第二十八章，"我们纪元前五世纪以前金属的发现和传播以及社会制度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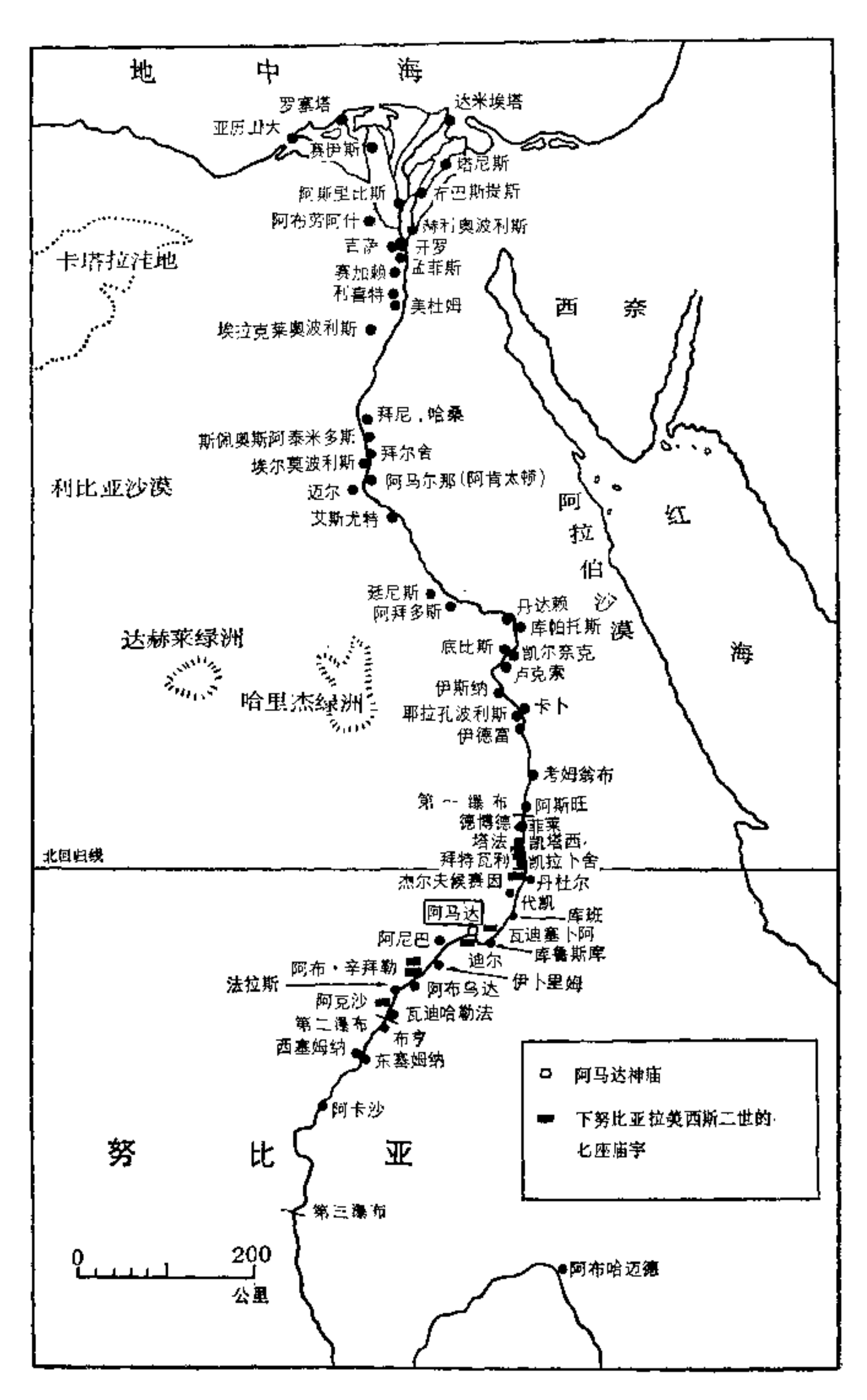


插图 2.1 尼罗河——从第三瀑布至地中海

要大规模地组织劳力，这就导致各个地区发展地方政治结构。

关于埃及政治统一的某些情况，也许可以从一些早期文献的片断中推测出来③。这种记载说明，在混沌而遥远的过去，三角洲各州显然建立起各自的联盟。这个地区的西部几个州一向是在共同崇拜荷拉斯神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而三角洲东部各州则联合在安迪蒂神（即杰杜之神，后来被统一于奥西里斯神）之下。据说西部各州征服了东部各州，在埃及北方建立起统一的王国，于是整个三角洲都崇拜荷拉斯为主神，并逐渐传播到上埃及，压倒了上埃及联盟的主神塞特④。

古朴时代（我们纪元前 3200-2900 年）

我们知道有历史重要性的第一桩大事是两个史前王国的合并，更确切地说就是上埃及征服下埃及。上埃及的统治者在传说中叫做美尼斯，而考古资料似称他为纳尔美尔。他建立了埃及 30 个王朝或统治家族的第一个王朝。埃及历史学者曼涅托（我们纪元前 280 年）把亚历山大大帝以前的绵延的帝王世系划分为 30 个王朝。美尼斯王室住在上埃及的廷尼斯，它是圣城阿拜多斯所在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就在建有奥西里斯神殿的阿拜多斯附近，皮特里发掘出最初两个王朝国王的巨大陵墓。很清楚，是南方王国控制了整个国家。

在获得首次胜利后不久，纳尔美尔就在邻近两国交界处的孟菲斯建立了都城⑤。

88 对古朴时代最早两个王朝的国王本身（见第一章），我们的了解仍然是比较模糊的，至于各个国王的统治情况所知更少。但是这个时期无疑是一个为巩固王朝而艰苦奋斗的时期。在第一王朝建立以后的 300 年间，依旧沿袭王朝前时代后期的文化。但是在第三和第四王朝时，政治上实现了统一，新国家已经相当稳定，并足以显示出埃及独有的特色；它以一种新教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埃及国王被认为不同于凡人，实际是统治一般人的神。这种把法老神化的理论⑥，可能是在王朝早期故意制造出来，用以巩固单一君主对两块国土的统治地位。从第三王朝起，人们大可这样说，国家的元首既不是上埃及人也不是下埃及人，而是一位神。

按正统的王权理论，法老就是国家，并负责国内各项活动（见第三章）。而且，他是所有神的高级祭司，每天要到各个神庙去祭祀。实际上他当然不可能做到所有被认为他应做的事情。他必须有几个辅弼者，如内阁大臣、各州官员、军队将军和神庙祭司执行他神圣的意旨。确实，在理论上他具有无上的权力，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实行他意志的自由。他是长期存在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形成的信仰和积习的化身。国王的生活实际上规范化了，甚至散步、沐浴都要按照为他规定的一套仪式和守则行事。

当然，在精致的王冠下面，法老自然也有和常人一样的思想感情，也有爱和恨、抱负和怀疑、愤怒和欲望。从古代埃及历史的开端到终结，艺术和文学按照一个理想的标准、一

③ 金字塔文，见 1969 年福克纳(R.O. Faulkner)的英译本。

④ 对这一现有争论的理论提出基本资料的是泽特(K.Sethe)。

⑤ 海斯(W.C.Hayes)，1965年；德瑟瓦尔(J.L. de Cénival)。

⑥ 关于法老神化的实际概念，查阅波泽纳(G. Posener)的著作，1960年。

个格式来描述埃及的神王。虽然如此，我们仍能从中了解到各个国王本人具有的独特个性，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都知道古代有一些民族对埃及人的信仰极感兴趣，他们对自己祖先失去信心转而求教于埃及哲人。在多神教消失之前对埃及智慧的一定程度的尊敬一直存在。

新石器时代的埃及人象当时的其他民族一样，把周围的自然当作神灵，相信大地与天穹充满着无数精灵。他们相信这些精灵寄托在人间的动植物身上，或者寄托在体积形状奇特的物体上。可是随后，他们不再把动物或物体本身看作神，因为他们逐渐相信这些东西是有形的表现，或是抽象的神力寄托所在。被选中为神的动物或物体可以是和善有用的兽类，如母牛、公羊、狗或猫，或者是凶恶可怕的动物，如河马、鳄鱼或眼镜蛇。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人总是对选中为神的某种东西表示崇敬并加以奉献；他们崇拜母牛，但同时屠宰它以供肉食。他们也崇拜鳄鱼，但是为了自卫也会杀死它。 89

这些都是地方的神，在本地区是至高无上的神，是不容争议的主宰。但有一个例外，如某城镇的首领掌握权势，该城镇的地方神的地位也随着抬高。倘若这个首领登上王位，并进而统一了南北诸王国，这个地方神也就被奉为全国之神。

此外，原始埃及人认为太阳、月亮、星星、天空和尼罗河的洪水都有神力。他们必定害怕这些现象，感觉到它们的威力，所以崇拜它们，把它们当作有威力的神，称它们为宇宙诸神，如太阳叫"赖"，天空叫"努特"，海洋叫"农"，大气叫"苏"，大地叫"杰卜"，洪水叫"哈匹"⑦。

这些神可以是人形也可以是动物的外形，对它们的崇拜不限定于任何地方。女神同样在宗教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受到普遍的尊敬。但是女神数不超过12个，虽然有几位女神如哈索、埃西斯、娜斯和巴斯泰特在全国都具有重大作用。一般认为哈索与荷拉斯有关、埃西斯与奥西里斯有关，娜斯是三角洲史前都城的保护女神，而巴斯泰特(即猫女神)在第二王朝以后在下埃及的第十八州受到普遍的崇拜。

古今各地人民都没有象古代埃及人那样相信人死后尚能发挥重大作用，对信徒的生活会产生巨大影响⑧。信仰来世无疑是由于埃及的自然条件所致，因为那里土壤干燥，气候酷热，有利于保持尸体不烂。这就必然促使他们相信人死后生命继续存在。

在历史的进程中，埃及人终于形成一种信念，即认为他们的肉体包含各种永生的成分。其中之一就是"巴"，其外形是一只人头鸟，相貌如死者，并具有人的双臂。人死后就成"巴"，祭司在丧葬仪式上的祈祷和祭品供奉，帮助死者转化为"巴"或灵魂。第二种成分叫做"卡"，它是每个人一出生就寄存于其躯体中的监护神。当克努姆神（阿斯旺的公羊神、人的创造主)用软泥塑造人的时候，每个人造成两个模型：一个是他的躯体，另一个是他的"卡"。这个"卡"与本人完全一模一样，一生与本人同在，可是它在本人死之前先到来世。埃及人在坟墓中放入大量我们称为殉葬品的东西(完全与死者生前所有的东西一样)就是供奉给"卡"使用的。虽则人们相信它大部分时候在坟墓里，但是也能够离开坟墓。因此，大墓地是众"卡"的城市，正如市镇为活人聚集所在。第三个重要成分叫"伊卜"，就是 90

⑦ 关于埃及信仰问题的详尽系统的介绍，见基斯(H.Kees)，1941年。

⑧ 关于埃及人墓葬信仰的详尽的基本著作见H.基斯的著作，1926年；第二版，1956年。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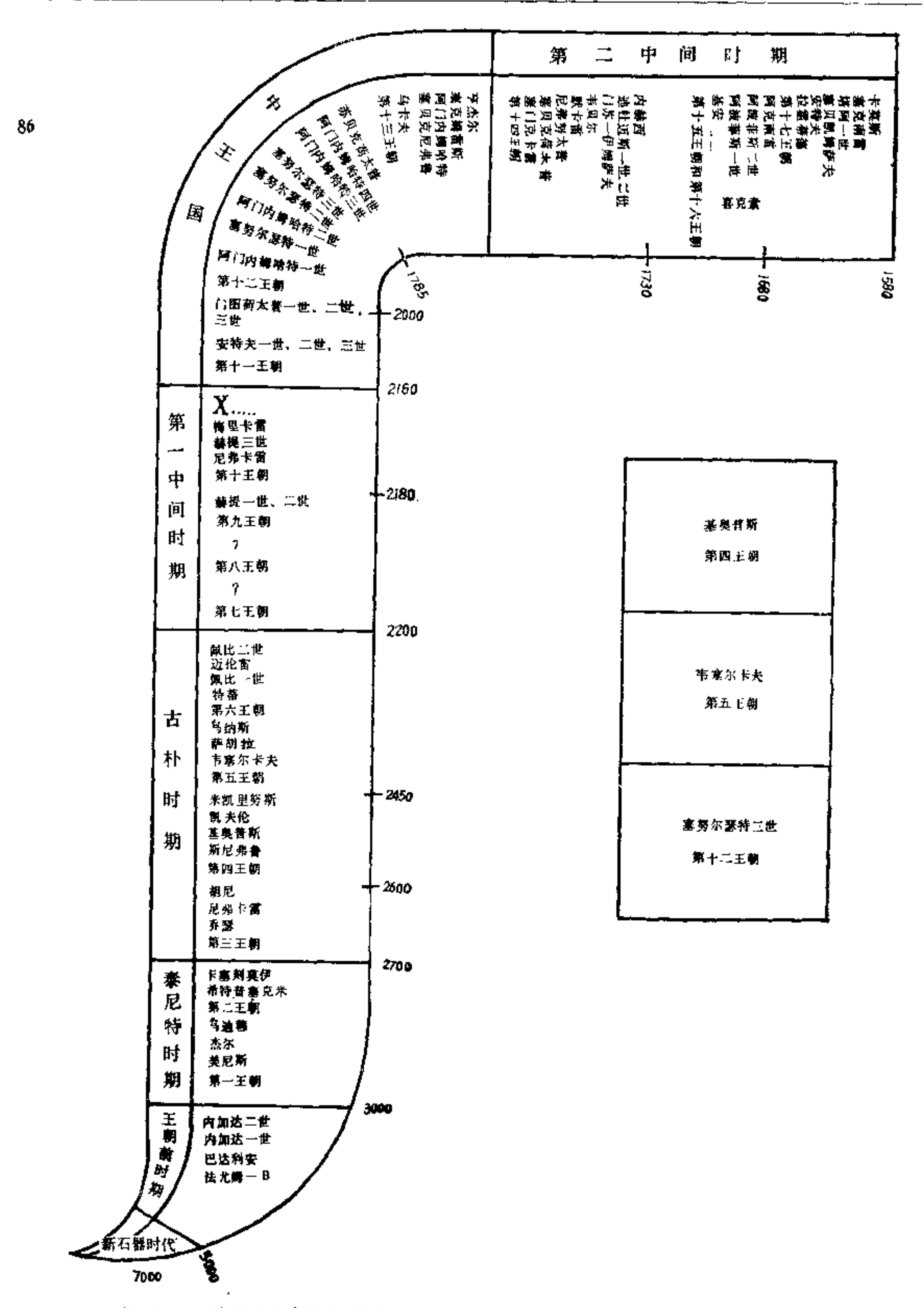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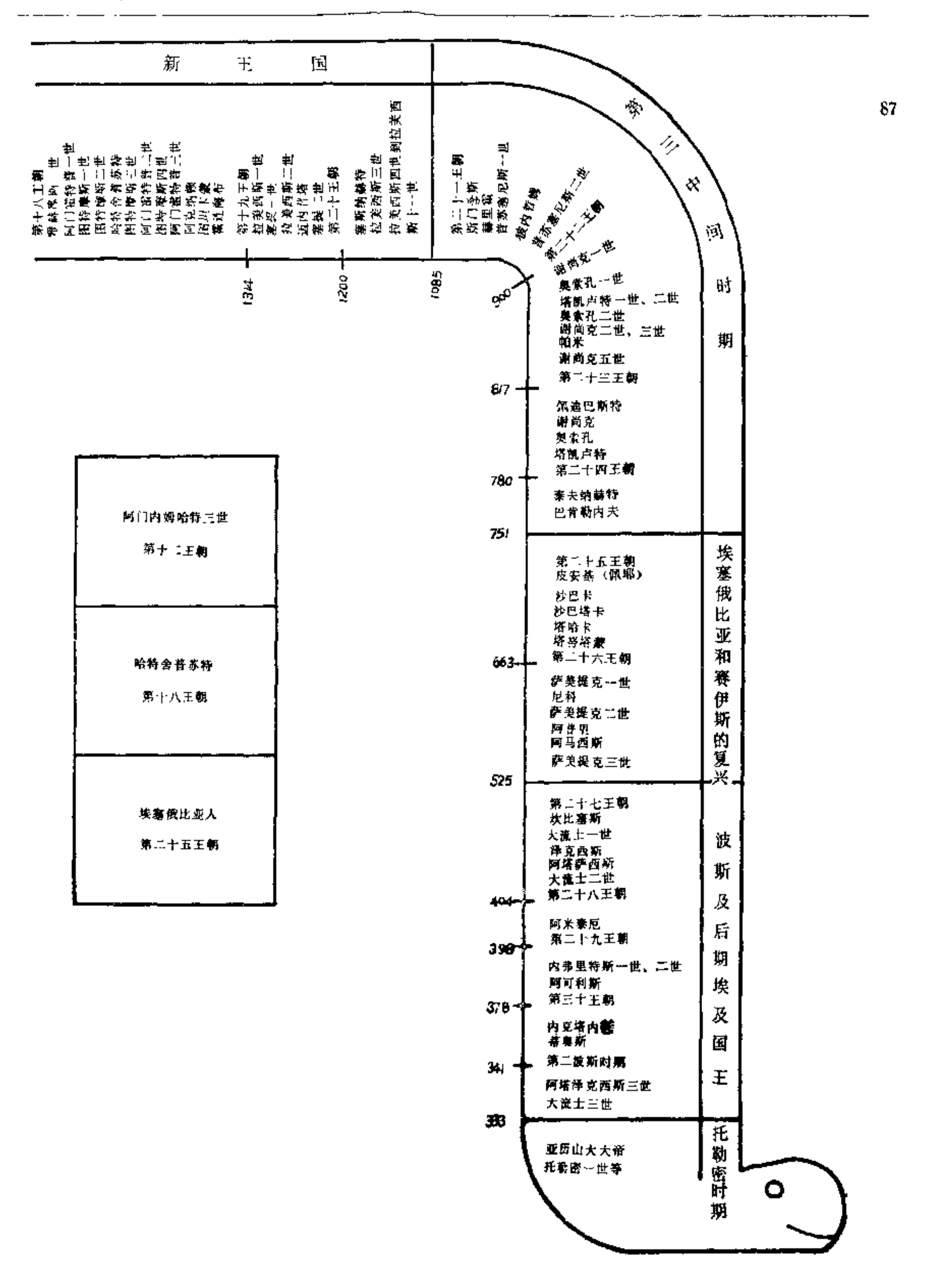


插图 2.2 埃及古代史年表(年份均为我们纪元前)*

* 图中乔瑟(Djoser)、乌纳斯(Unas)、塞努尔瑟特(Senursert)、本文中为佐瑟(Zoser)、乌尼亚斯(Unjas)、塞努斯雷特(Senusret)。——译者注

87


新王国
第十八王朝
第十九王朝
拉美西斯一世
拉美西斯二世
第二十王朝
塞斯纳赫特
拉美西斯三世
1344
1200
1085
第三中间时期
第二十一王朝
斯门代斯
普苏森尼斯一世
普苏森尼斯二世
第二十二王朝
谢尚克一世
900
奥索孔一世
塔凯卢特一世、二世
奥索孔二世
谢尚克二世、三世
帕米
谢尚克五世
第二十三王朝
817
佩迪巴斯特
谢尚克
奥索孔
塔凯卢特
第二十四王朝
780
泰夫纳赫特
巴肯勒内夫
751
埃塞俄比亚和赛伊斯的复兴
第二十五王朝
皮安基（佩耶）
沙巴卡
沙巴塔卡
塔哈卡
663
第二十六王朝
萨美提克一世
尼科
萨美提克二世
阿马西斯
萨美提克三世
525
波斯及后期埃及国王
第二十七王朝
大流士一世
阿塔萨西斯
大流士二世
404
第二十八王朝
阿米泰尼
398
第二十九王朝
内弗里特斯一世、二世
阿可利斯
378
第三十王朝
341
第二波斯时期
阿塔泽克西斯三世
大流士三世
333
托勒密时期
亚历山大大帝
托勒密一世等
阿门内姆哈特三世
哈特舍普苏特
第十八王朝
埃塞俄比亚人
第二十五王朝

心脏。人们认为它是感情的中心，是每个人的良心，它指导人们一生的行为。第四个成分叫"阿赫"。埃及人认为它是一种神性或者超自然的力量，人死后才能得到。他们相信天上灿烂的星星就是死者的"阿赫"。最后就是躯体本身，叫做"喀哈特"或者外壳。外壳是要腐烂的，但是它可以用香油涂抹，以适当的方式将它持久保存，使其与"卡"和"巴"一起，死后也能永生。

除了这些关于在坟墓和大墓地里来世生活的想象外，埃及人还逐渐形成不少关于来世和"巴"的命运的观念。其中太阳神和奥西里斯神这两种观念流传颇广。去世的法老，由于他本身就是神的化身，最初人们认为只有他与众神同在，与太阳神(荷拉斯或赖)和奥西里斯神同样神圣。但是在中王国时期，这种观念被有权势的贵族所利用，再往后全埃及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都享有这种权利。

这种情况可以从墓室祷文看出来。保存下来的年代最早的祷文就是所谓金字塔文，它是用象形文字写在第五王朝最后一个法老乌尼亚斯和第六王朝一个国王的金字塔墓室墙壁上的。当金字塔文被第一中间时代的地方首领和小王侯擅自使用，以后又被中王国贵族擅用时，许多祷文的经咒和仪式都被省略、窜改或另加解释，以便适用于没有头衔的人。这些祷文通常称为石棺文[9]，大多数用草写的象形文字写在中王朝时期典型的长方形石棺的内壁上。经咒用黑墨写，头衔用红色写。在新王国时代，除许多新经咒外，大多数石棺文的经咒，都写在一卷卷纸草上，放在死者制成木乃伊的躯体上。这些包含 200 诗节左右的祷文，被称为《死者书》[10] 这可能引起误会，实际上不曾有过这种书；写在每张纸草上的诗节，按卷幅大小、买主的兴趣和抄写僧的判断而有所取舍。一般大小的《死者书》约有40到50个诗节。除此之外，新王国时期的祭司还发展和推广了另外几种或多或少相互有关联的墓葬书，写在纸草上或刻在墓壁上。这些墓葬书中有两种叫作《冥间人书》(伊姆杰瓦特)和《门书》。这是一些奇异的指南书，描写太阳在夜间经过地下的情况。

古王国(我们纪元前2900-2280年)[11]

第三王朝

上边已着重指出，最初两个王朝(古朴时期)的国王看来主要关心的是征服土地和巩固王朝。我们认为把国王神化的新教义实际上是在第三王朝时开始的，而且直到这时埃及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王朝的开国君主是佐瑟王，他显然是一位坚强能干的统治者。但是他的声名远不如他的臣民伊姆荷太普，后者作为建筑师，医生，祭司，巫师，作家和谚语创作者，从他生前直到现在都享有盛誉。他死后 2300 年，成为医药之神，希腊人称他

[9] 关于"石棺文"，单独印行的原文版由德巴克 (A. de Buck)出版，1935-1961 年。其英译文见 R.O. 福克纳，1974 年，1978 年。

[10] 《死者书》的法文译文见巴尔盖(P. Barguet)的著作。芝加哥东方学院出版了一本英文注释本，是完整本，见艾伦(T.G.Allen)。

[11] 英文著作见史密斯 (W.S.Smith)；法文著作见旺迪埃(J. Vandier)："古代王国"和"古代王国的终结和第一中间时代"，载于德里奥东(E. Drioton)与 J.旺迪埃的合著，第 205-238 页和第 239-249 页。

为伊梅夫塞斯，把他比作希腊的阿斯克莱比奥斯。他作为建筑师的杰出成就是梯形金字塔，就是他为法老在赛加赖建造的宏伟墓葬综合建筑，占地15公顷，是一个长554米宽277米的长方形建筑。这个建筑物有堡垒似的围墙，他在建筑学上的重大革新是改用石块来代替砖头。

第三王朝的其他国王与以前两朝的国王一样，情况模糊不清，但在赛加赖为塞克姆开特国王（他也许是佐瑟王的儿子和继承人）建造的未完成的规模宏大的梯形金字塔，以及在吉萨以南沙漠中的扎维耶阿尔扬挖掘出来的一个巨大的未完工的陵墓，都充分表明佐瑟王的金字塔综合建筑并非独一无二。第三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是胡尼，在他之后就是第四王朝的创立者斯尼弗鲁。在开罗南面约70公里的美杜姆的金字塔就是为胡尼建造的。这座建筑原来造成梯形，经过不断扩大和改变设计才成为真正的金字塔（也许是斯尼弗鲁完成的）。 92

第四王朝

第四王朝是埃及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开始于斯尼弗鲁的长期而生气勃勃的统治。从巴勒莫碑上有关他的一部分编年史⑫来看，他在南征努比亚人，西战利比亚部落的战役中都获得胜利。他并且保持与叙利亚海岸交通畅通（特别是运输木材），年复一年地大兴土木，在全埃及兴建庙宇、堡垒和宫殿。斯尼弗鲁统治24年，他也许属于王族的一个小小的旁支。为了使他的地位合法化，他娶胡尼王的长女希太普赫累斯为妻⑬，使王族血统注入新的王朝。

他在代赫舒尔建造两座金字塔，南边一座是长菱形，北边一座为真正的金字塔，大小近似吉萨的胡夫大金字塔。

斯尼弗鲁以后继位的胡夫（基奥普斯）、哈夫雷（凯夫伦）和曼库雷（米凯里努斯）主要因他们在现代开罗西南10公里的吉萨耸起的高地上所建立的三座金字塔而被人怀念。胡夫的金字塔是人类建造过的最巨大的单一建筑物⑭。其工艺的高超，计算的精确，结构的精美，为世界七大奇迹之冠。胡夫的儿子和孙子的金字塔，虽然较小，但是其建筑风格和附属建筑物的布局与胡夫的金字塔相同。

第四王朝的王统几次中断，原因是胡夫几个王妃所生的王子之间的王位之争。在凯夫伦之前，胡夫的儿子戴德弗尔做了八年国王。凯夫伦统治结束时，另一个儿子曾篡夺王位，做了一个短时期的国王。第三次中断可能是在该王朝最后一个精干的国王舍普塞斯卡夫之后发生的。 93

---

⑫ 见导言。

⑬ 在吉萨发现的希太普赫累斯王后的墓里挖掘出精致的家具，说明古王国时期埃及工匠的巧妙技艺。见雷斯纳(G. A. Reisner)，1955年。

⑭ 我们知道，金字塔本身是太阳的象征。它内部建有安葬国王木乃伊的拱顶墓室，金字塔就建在墓室拱顶之上。它只是构成整个国王墓地的综合建筑的一部分。整个墓地除了金字塔之外，还包括平地上的下庙，一般称之为“谷地庙”，以及一条从下庙通向建在沙漠高地上的综合建筑上部的甬道；综合建筑包括金字塔本身和建筑在塔东面的墓庙，整个区域有围墙环绕。见爱德华兹(I. E. S. Edwards)著作。

第五王朝

这个王朝是由于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力量增长才产生的。根据《韦斯特卡纸草书》上记载的传说[15]，第五王朝的头三个国王是“赖”神和赫利奥波利斯的一位祭司的妻子叫作拉杰迪德的女人所生。这三兄弟叫韦塞尔卡夫、萨胡拉和尼弗里尔卡雷。萨胡拉为后人所知，主要是因为在赛加赖以北阿布西尔他的墓庙里装饰着精美的立体浮雕。我们知道，虽然第五王朝的王室金字塔远比第四王朝巨大的陵墓要小，建筑也较差，但是毗连金字塔的墓庙都是装饰着大量着色立体浮雕的精美建筑，其中有些浮雕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个王朝的大多数国王，在金字塔综合建筑附近建有宏伟的供奉太阳神的庙宇，庙顶上竖立着巍峨的方尖塔。

除了巴勒莫碑上记载的许多庙宇的建造和捐献之外，第五王朝的法老们致力于保卫埃及边疆，扩大与邻近各国的贸易关系。在他们的墓庙墙上记录着对西方沙漠的利比亚人、西奈的贝都因人和巴勒斯坦南部的闪米特等民族遣派讨伐队的情形。在萨胡拉和伊塞西统治时代，埃及曾派遣大型海船访问过巴勒斯坦海岸。埃及的船舶还到过索马里海岸的蓬特地方，在那里购买珍贵的没药、乌木和动物以及其它货物。他们与叙利亚的雪松交易一直很旺盛。埃及的运木船队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密林覆盖的黎巴嫩海岸的古代比布鲁斯港。人们知道埃及与比布鲁斯港的贸易关系从最早的王朝起就已经存在(见第八章)。在第四王朝时，那里建造了一座埃及庙宇，在市镇里和古港湾地区发现过刻有古王国几个法老名字的物品。

94 第六王朝

没有迹象表明，从第五王朝转变为第六王朝，国内发生过政治动荡。第三个国王佩比一世长期而朝气蓬勃的统治，显示这个朝代是强盛的。埃及国王放弃单纯的防御战术，率领精锐部队深入敌国的腹地，这还是第一次。埃及将军乌尼统率的大军把敌人驱赶回本土，向北直到卡美尔，尔后运用远在巴勒斯坦海岸的埃及舰队登陆的军队在最后五次战役里把他们围而歼之。

有些迹象表明，佩比一世可能曾任命其子迈伦雷为共同摄政王，因为有五年以上时间他显然不是单独执政。在这段时间里，他竭力在努比亚扩充和巩固埃及的势力，而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亲自到第一瀑布去接受努比亚地方首领们的效忠。

佩比二世在他的哥哥迈伦雷去世时只有 6 岁。他在位达94年之久，在经过历史上罕有的漫长统治后，于 100 岁时去世。国王年幼时，由他母亲和舅父执政。佩比登位第二年，埃利凡泰恩的地方长官哈库夫远游归来。他曾游历努比亚，到达亚姆州，带回来许多珍宝，并

---

[15] 写于中王国时期。见勒费弗尔(G. Lefebvre)，1949 年，第 79 页。《韦斯特卡纸草书》的记载是虚构的。第五王朝的最初几个国王是第四王朝国王的后代，见博尔夏特(L. Borchardt)著作，1938 年，第 209-215 页。但是，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看来确曾在第四王朝到第五王朝的过渡阶段起过重大作用。

献给国王一个会跳舞的俾格米人。8 岁的国王非常高兴，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哈库夫，要求他务必十分小心把这个俾格米人好好地送到孟菲斯。[16]

佩比二世漫长的统治在混乱的政局中结束。政局混乱可以追溯到第六王朝的开端。当时上埃及的一些地方长官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敢于在所属地区建造自己的陵墓，而不是建造在国王金字塔附近的大墓地里。中央权力的旁落由此加剧。由于国王对各地无力控制，权力日益落入地方的强大统治者手中。从佩比二世建造巨大建筑物以后，没有出现类似建筑，由此可见王室的贫困。随着政权的迅速瓦解，贫困遍及社会各个阶级。到底因为分裂的力量太大，任何法老都无法克服，还是佩比二世长久而无力防范的统治加速了垮台，尚难明了。但已弄清楚的是，古王国几乎在他去世后立刻瓦解，而后开始一个我们称之为第一中间时期的混乱时期。

95

第一中间时期

佩比二世死后，埃及在突然爆发的封建混战中崩溃了。接着开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混乱和内战频仍的时代。沿尼罗河流域，地方首领们在混乱局势中彼此厮杀，正如曼涅托在其所著埃及史中所述，第七王朝有 70 个国王一共统治了 70 天。这也许指的是因第六王朝垮台而王位虚悬在孟菲斯建立的暂时代替国王的应变政权[17]。

关于第七王朝的情况所知极少，纵然我们获得一份国王姓名的记载，但关于他们在位的先后还是有争论的。可是，不久一个新的王室在中埃及的埃拉克莱奥波利斯出现了，它曾试图继承孟菲斯文化。第九和第十王朝的这些国王们显然控制了三角洲，而在此之前，这里已成了沙漠游牧者抢劫的场所。但上埃及则分裂为类似过去的分散政权，各州由当地的统治者控制。埃及此后历史的特点在于底比斯政权的成长。这个政权注定在第十一王朝时兴起，先控制上埃及，不久控制全国。

古王国时期这个国家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成就达到最高水平，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它垮台之后的埃及情况，要算哲人伊布韦尔描写得最好。他的著作似乎是追述第一中间时期，[18] 在新王国的纸草上保存下来，这些纸草现在存放在莱登博物馆。这篇文章叙述了第一中间时期前期发生的社会革命和不存在任何中央政权的情况。

> 一切都毁灭了。人杀死他的兄弟，他母亲的〔儿子〕；到处瘟疫流行，血流遍地。少数无法无天的人曾大胆夺走王家的土地。一个外国部落来到埃及。各地沙漠中的游牧人群都成为埃及人。埃利凡泰恩和廷尼斯在上埃及〔占统治地位〕，由于内乱，不付租税……到处盗贼横行……门户、梁柱和墙壁都付之一炬，人们不再向北航行到〔比布鲁斯〕，有了雪松又有何用？黄金匮乏，到处田园荒芜……

96

[16] 地方长官哈库夫把国王这封信的原文刻在他在阿斯旺的陵墓的墙上。原文由布雷斯特德(J.H. Breasted)译出，1906年，第 159-161 页。"跳舞的神侏儒"在人种学方面的问题已由道森(W.R.Dawson)进行研究，1938 年，第 185-189 页。

[17] 关于第一中间时期(简写为FIP)还存在许多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般叙述可见施皮格尔(J.Spiegel)和斯托克(H.Stock)的著作。精辟的概述可见 E.德里奥东和 J.旺迪埃的著作，第 235-237页和 643-645 页。

[18] 对他的著作的写作日期尚有争论。现姑且定在第二中间时期，见范塞特尔斯(J. Van Seters)，1964 年，第 13-23 页。但是这个新定的日期尚未被人接受。

> 法庭的法律废弛……从来一无所有的人现在成为富翁，无寸土的人现在极为富裕，
> 而巨富反成穷汉……⑲

可是在这种混乱局势中却产生了某种积极的价值观，即启发人们重新强调个人特性，例如，强调社会地位平等和普通人的尊严。这样，在混乱中，埃及人逐渐形成一套确认个人地位的道德标准。这种情况从第十王朝的叫作《能言善辩的农民的故事》⑳的著名纸草中就看得很清楚。文章说到一个贫苦农民，被有钱的地主剥夺他所有的东西以后，仍然坚持他的权利：

> 不要掠夺穷人的东西，你知道他原就是弱者，他的财产是受苦人〔呼吸所赖〕，谁拿走它，就是堵塞他的鼻孔。指定你当审判官，判断两个人谁是谁非，然后惩罚强盗。〔但是〕请看，你竟是强盗的袒护人。人们信任你，而你却成了罪人。指定你充当受苦人的堤坝，保护他免于淹死，〔但是〕请看，你却成了淹没他的湖泊㉑。

很明显，埃及人的民主思想是一方面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在统治者面前平等。丧葬方面的宗教仪式的民主化，也许是最令人注目的变化。在古王国时期，只有王室显贵或受宠于法老的人，才肯定他们在死后成神。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当时有势力的人物可以擅用国王墓葬的祷文，把它刻在自己的棺材上。有钱的平民埋葬时也有体面的仪式和纪念碑。阶级障碍就这样在人死时消除了，这种情况的出现，确实得感谢奥西里斯神。

奥西里斯是三角洲的一个神，很早就为人所知，对他的崇拜很快普及全国。他受到普遍崇拜，主要并非由于他的崇拜者在政治上取得高位，而是由于他在丧葬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到第十一王朝，对他的崇拜在阿拜多斯牢固地建立起来。这个大城市在整个埃及历史中始终是崇拜已死国王的中心。阿拜多斯的祭司们没有政治野心，这样就使奥西里斯与其他某些神不同，其他神受崇奉时间的长短决定于国王登位后加以倡导和在位时间的久暂。97 在埃及历史的后期，对奥西里斯和埃西斯的崇拜比以往更加普遍，并传播到希腊诸岛、罗马、甚至到达德意志森林地区㉒。在埃及本国，任何供神的寺庙都有供奉伟大死神的神殿，并在他的复活日举行某种祭祀仪式。

中王国（我们纪元前2060-1785年）㉓

虽然埃及人隐约地看到民主的价值，但是这种观念没有维持多久。它在混乱的局势中似乎很清晰，但是及至全国发展到第二个伟大时期——中王国恢复了繁荣和秩序时，就又变得模糊了。埃及又一次用武力统一起来。在这以前，默默无闻、毫不重要的底比斯结束

⑲ 根据加德纳(A.H.Gardiner)的著作，1909年。

⑳ 原作的法译文见勒费弗尔著作，1949年，第47-69页。新近的英文译文由辛普森(W.K. Simpson)译出，1972年，第31-49页。

㉑ 根据威尔逊(J.A.Wilson)文章，此文见普里查德(J.B. Pritchard)的著作，第409页。

㉒ 关于奥西里斯传说最全面的叙述，由普鲁塔克(Plutarch)汇集成《埃西斯和奥西里斯》一书出版。英文版格里菲思(J.G. Griffith)译，法文版阿尼(J.Hani)译。

㉓ 见E.德里奥东和J.旺迪埃合著，1962年，第7章，第239页-281页；W.C.海斯，1971年；温洛克(H.E.Winlock)，1947年。

了埃拉克莱奥波利斯的统治，宣布占有埃及全国，在战争胜利中把上、下埃及重新统一为一个王国。

国王门图荷太普是第十一王朝的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的伟大成就在于重新组织全国的政府。除偶尔有小规模的反叛外，所有对王室的反抗都被镇压下去。但是，中王国的政治环境毕竟不同过去，古王国和平安全的政治环境已成陈迹。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统治时间很长，他在代尔拜赫里所建的墓庙，是这一时期底比斯最伟大的纪念物。他的建筑师在那里创造了一种新颖实用的建筑形式。这是一种有柱廊的台式结构，石台上筑起金字塔，位于廊柱厅中间[㉔]。

门图荷太普二世以后，王室开始衰微。在第十一王朝最后一个国王统治下，某个姓阿门内姆哈特的人(他是国王的大臣，还有其它头衔)大约就是第十二王朝的建立者——国王阿门内姆哈特。他是一连数代强大君主的第一个。

阿门内姆哈特一世采取了三种重要措施，他的后代谨守不渝。他在孟菲斯南方不远之处建立起叫伊赛塔维(意为两个国土的君主)的新都城，从那里能更巩固地控制下埃及；他开创先例，让儿子坐在他的御座旁边共同摄政，在发生了一次危及他生命的宫廷政变以后，也许他认为这是比较适宜的措施(关于这次阴谋，他在训谕儿子塞努斯雷特一世的遗诏中曾痛切地提到)[㉕]；他计划征服努比亚，在比以往试图选择的地点更远的南方建立贸易站。他可能是凯尔迈(第三瀑布附近)筑垒贸易站的建立者。自塞努斯雷特一世起，该地似乎一直是埃及势力的中心。

塞努斯雷特一世以他父亲为榜样，同时由于他自己的魄力、才能和远见得以实现一套使埃及富裕和扩张的计划。由他本人或他的得力将领率领的几次远征军，巩固了埃及对下努比亚的控制。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第二瀑布的下面筑起布亨要塞[㉖]。国王对西方的活动似乎只限于派兵征伐特门夫的利比亚人和保持与沙漠绿洲的交通。对西方和北方各国的政策是保卫边境和继续与西亚各国通商。

以后的两个国王，阿门内姆哈特二世和塞努斯雷特二世对巩固和扩大国外征服地区显然不感兴趣[㉗]。但是塞努斯雷特三世再次征服和统治下努比亚，并把它降为埃及的一个州，因而为后世所称道。他的继承人阿门内姆哈特三世长久而繁荣的统治，突出表现在那个使法尤姆的农业和经济大大发展的宏伟灌溉计划上。这项计划是：让尼罗河水通过渠道流入法尤姆绿洲的一个大湖中；这条渠道穿过开罗以南约80公里处与尼罗河流域相毗连的沙漠群山中一个狭窄的缺口，在渠道上筑坝，借以控制尼罗河水上涨时流入湖中的河水，同时挖掘灌溉沟渠和建筑堤堰，因而使大量土地得到开垦。

在阿门内姆哈特四世时，王族显然开始失去振兴力量。在他短暂而无所作为的统治以后，接着是苏贝克·尼弗鲁女王更短促的统治。这个王朝就在短促更迭中结束了。

㉔ 见纳维勒(E. Naville)的著作。

㉕ 关于这个王朝的建立问题可参阅G.波泽纳，1956年。

㉖ 见最近对布亨发掘和研究的详情，此项工作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为的是挽救努比亚的历史遗迹：见卡米诺斯(R.A.Caminos)著作，1975年，和史密斯(H.S. Smith)著作，1976年。

㉗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瀑布南边米尔吉萨堡垒——努比亚巴滕哈杰尔地区最大的要塞——是塞努斯雷特二世建造的(见韦库泰(J.Vercoutter)著作，1964年，第20-22页)：从这点看，在他统治期间，努比亚仍在埃及控制下。

第二中间时期[28]

第十三王朝有几个法老的名字反映出下埃及居住着大量亚洲人。西亚广泛的移民活动，迫使埃及东北方的大批人群向南移居，这就无疑使下埃及的亚洲人逐渐增加。这些南下人群的首领们，埃及人称之为“希卡-卡苏特”(Heka-Khasouta)，意思是“外国统治者”，曼涅托所称“喜克索”一词就是由此而来，这个词现已成为对这些人的总称。

喜克索人到我们纪元前约1729年才真正开始向第十三王朝政权挑战。到我们纪元前1700年，他们已成为组织严密、配备精良、英勇好战的人民。他们征服三角洲的东部，包括哈特韦特(阿瓦里斯)城在内，在该城重新建筑堡垒作为都城。一般认为，喜克索人控制埃及不是由于一亚洲民族的军队突然袭击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是由于几个西亚民族，主要是闪米特族，在十三王朝衰落的年代不断渗透的结果。确实，他们的国王大部分有闪米特人的名字，如阿纳特-赫尔、塞姆肯、阿穆或贾库布-赫尔。

喜克索人的占领无疑对埃及人民有深远的影响[29]。他们把马匹、战车和盔甲引进埃及。过去从来不需要这些装备的埃及人，最后成功地使用这些装备来反对喜克索人，并把他们赶出国境。埃及人受外国人统治，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耻辱震撼了他们古老的唯我独尊的思想和靠神灵庇护的安全感。在底比斯地方长官的指挥下，他们发动解放战争。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少数记载，大部分是关于被占领150年后第十七王朝后期诸王对亚洲压迫者作战的事迹。雅赫摩斯最后将入侵者赶出三角洲，占领他们的都城阿瓦里斯，并追击到巴勒斯坦，包围沙鲁亨要塞。随后向北进军，袭击扎希的土地(腓尼基海岸)，喜克索人的统治终于崩溃。

新王国(我们纪元前1580-1085年)

第十八王朝[30]

被后世颂扬为新王国之父和第十八王朝创立者的国王雅赫摩斯，显然是个具有非凡的精力和才能的人。他的儿子阿门霍特普一世是一个能继承父业的杰出人物，他竭力推行其父的内外政策。虽然他也许对王国的内政比对外征战更加关心，但是他还是抓紧时间巩固和扩大在努比亚的征服地区，使它远达第三瀑布。他在位九年中，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不敢轻举妄动。

看来阿门霍特普一世对他的伟大声誉受之无愧，他最后象他母亲雅赫摩斯-尼弗塔里一样，被奉为底比斯大墓地有称号的神祇。[31] 他之后是图特摩斯一世、图特摩斯二世，然后

---

[28] 关于埃及历史中极不清晰的这一时期的情况见冯·贝克拉特(J. von Beckerath)1965年出版的一书。

[29] 关于喜克索人和他们占领埃及的一些问题及其后果，见范塞特尔斯(J.Van Seters)著作，1966年。

[30] 见E.德里奥东和J.旺迪埃著作，1962年，第9章，第335-342页；第10章，第390-414页。见詹姆斯T.G.H. James)著作；W.C.海斯著作，1973年。

[31] 见切尔内(J. Černý)著作，1927年，第159-203页。

是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女王依次嫁给她的两位异母兄弟图特摩斯二世和图特摩斯三世。在她统治的第五年，国势强盛，因而宣称自己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使其统治合法化㉜，她宣称她父亲是全国之神阿蒙-赖，阿蒙-赖装扮成她父亲图特摩斯一世来到她母亲身旁。在她统治下太平无事的20年是埃及昌盛时期。她集中精力于国家内政和大规模的建筑事业上。最值得她引以自豪的两个成就是远征蓬特和在凯尔奈克神庙里筑起两座巨大的方尖塔，把它们奉献给"父亲"阿蒙-赖。

哈特舍普苏特死后，图特摩斯三世终于能自己主宰一切。据他自述，他30多岁时已很成熟，有一次他作为一个年轻祭司在他父亲主祭的凯尔奈克的庙会上诵经，阿蒙的神像把他选拔出来，根据神谕，选他为王。他登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倒哈特舍普苏特的塑像，只要出现她的名字和图像，就将它抹掉。他复仇的怒火一旦平息，立刻组成一支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击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地区城邦联盟在美吉多城的联军，以挫败它们背叛埃及统治的企图。图特摩斯三世以惊人的速度前进，猛扑敌人，把他们赶进城去，使之困守在城内。美吉多城一经降服，远至黎巴嫩南部的整个地区都在埃及的控制之下。图特摩斯三世在国外一共进行了17次战役，使埃及人的军威在以后许多年里为叙利亚和北美索不达米亚所慑服。埃及牢固地建成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大国。任何朝代都没有给我们提供象刻在凯尔奈克神庙墙上的图特摩斯三世编年史这样完整的记载。其他细节有的由他的将军们记录，有的事件甚至编入民间故事，象杰胡蒂将军奇袭约巴城的故事，说他把士兵装在袋子里，偷运进被包围的城市，情节很象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 101

图特摩斯三世之后有两位办事干练、精力充沛的法老，即阿门霍特普二世和图特摩斯四世。后者与米塔尼王国关系密切，因为他娶了那个王室的女儿为妻。这位贵妇用她的埃及名字漠特姆瓦，在纪念碑上以法老的正宫王后和阿门霍特普三世母亲的身分出现。

阿门霍特普三世继承父亲王位时大概已经娶了王后泰伊。这位年轻国王登极的时候，由于将近200年国内外无比的成就，国家的政治权力达到顶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加之世界相安无事，故法老和人民能够享受欢乐和豪华的生活。阿门霍特普三世对保持在国外的威力似乎不感兴趣，虽然他确曾慷慨赠予努比亚生产的黄金，以求保持北方附属国和同盟国对他依附。泰尔阿马纳的信件足以证明，㉝在他的统治将终结的时候，由于缺乏强大的军事力量，致使一些有权势的人阴谋独立，并背叛埃及政权。但是，阿门霍特普三世对此似乎并不十分关心。他以艺术的创造者和扶植者而获得显赫的声名。我们应该感谢他给我们留下被认为是新王国所有建筑中最美丽的卢克索神庙，还有凯尔奈克的其他宏伟建筑，以及在埃及和别的地方例如努比亚的索利卜的许多建筑。

对阿顿的崇拜是在阿门霍特普三世时开始的，但是对阿顿崇拜的增强似乎很少影响对其他神祇的崇拜，直到他统治的晚期，也许是在他统治的第三十年之后，可能是他儿子阿

㉜ 关于"哈特舍普苏特问题"和女王受图特摩斯三世"迫害"之事，记载甚多；关于这个问题和如何认识的详细论述，见于E.德里奥东和J.旺迪埃著作，1962年，第381-383页。

㉝ 在首都档案局的遗址找到的377片楔形文字书板，内容主要包括阿门霍特普三世和阿克纳顿与哈提、阿扎万·米塔尼亚、亚述、巴比伦尼亚、塞浦路斯各地国王以及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城市统治者的通信记录。关于这些文字见奥尔布赖特(W.F. Albright)的著作，1973年。

门霍特普四世(后来称阿克纳顿)成为共同摄政王的时候才产生影响。新国王阿门霍特普四世体质虚弱，造物主没有赋予他军人或政治家的气质，他只关心心灵和精神的事情，或者毋宁说只关心他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他特别喜欢得到“生活在真理中”的称号，因而追求与自然更密切协调的关系；在宗教方面，追求与他所崇拜的神有更直接更合理的关系。㉞

阿门霍特普四世年轻狂热，改行非常激烈的政策，对信奉阿蒙的祭司进行直接打击。102 其原因也许不光是宗教的，同时也有政治理由，因为在底比斯，信奉国神阿蒙-赖的高级祭司拥有极大的财富和权力，以致明显地威胁国王。阿门霍特普四世最初仍住在底比斯，他在该地凯尔奈克阿蒙神庙的东边，建有一座宏伟的供奉阿顿的神庙。以后，由于人们对他在底比斯进行宗教改革的不满，明显地激怒了他，随决心离开这个城市。他在中埃及的泰尔阿马纳建造一座新的宫邸。到他登位第六年，他和他的家属率领一批随从官员、祭司、军队和工匠，迁往他称作阿克太顿（意即阿顿的地平线）的新官邸，在那里住了14年光景，直到死去。他改名为阿克纳顿，或者叫阿顿的侍奉者，并赐予王后以尼弗-尼弗鲁-阿顿的尊号(意即阿顿是美中之美)。

阿克纳顿不满足于宣称阿顿是唯一的真神，他还攻击较为古老的神祇。下令特别要把阿蒙的名字从所有碑文上抹掉，甚至私人名叫阿蒙的(譬如他父亲的名字)也要抹掉。他进一步下令解散祭司和分掉寺院产业。阿克纳顿此举激起最强烈的反对，因为寺院的产业是政府赐予的，正式作为报答他们为国事祈祷而存在。

在四周爆发骚动时，阿克纳顿深居在都城，礼拜唯一大神。礼拜太阳神阿顿，实际就是崇拜太阳的创造力。供奉时不设神象，礼拜在庙殿外露天进行，把香花、水果放在祭坛上。这种信奉阿顿的宗教比传统宗教要简单得多，它把重点放在真理和个人自由上。这种宗教与对自然的爱密切相连，因为太阳给予生命的力量，表现在所有生物上。国王谱写的颂歌㉟首先表达出对生活的自发的欢乐和对体现着阿顿精神的所有创造物的热爱。

阿克纳顿不赞成传统的一成不变的肖像画法，坚持自由的自然主义。画家在自然主义绘画中追求的是表达眼前的形象，而不是永恒的空间与时间。他就是这样叫画家描绘他自己和他家庭不拘礼节的姿态，譬如拥抱、吃饭、与孩子们一起嬉戏等。对公众他并不想掩盖他的私人生活，因而使当时的埃及人感到震惊，子民们觉得这种毫无掩饰的生活，贬低了神王的地位。

阿顿教派的革命在阿克纳顿死后就不能继续下去。他的共同摄政王和继承人塞门克卡雷几乎立即主动与阿蒙祭司进行和解，达成协议，重新承认阿蒙的地位。塞门克卡雷在位103 不到3年，由图坦卡顿继承王位，他最后改名为图坦卡蒙。㊱我们知道这位年轻法老死时才18岁，在位的时间至少9年，估计他约在8岁时就登位了。这两位国王的来历虽尚有争论，但都是由于娶了阿克纳顿的女儿才得到王位继承权。图坦卡蒙在位时，甚至在他去世后，对抛弃阿顿还有点迟疑，尽管这时已恢复了阿蒙的地位；在图坦卡蒙继承者国王阿

㉞ 关于阿门霍特普四世-阿顿和他统治时期的情况，近来出版许多著作，包括奥尔德雷德（C.Aldred）的著作，1968年。

㉟ J.A.威尔逊的译文可在普里查德(J.B. Pritchard)的著作中找到。第369-371页。

㊱ 1926年发现这位年轻法老基本上完整的坟墓，哄动一时，出现大量文章，有的叙述特别详尽。见卡特(H.Carter)、梅斯(A.C. Mace)和德斯鲁谢斯-诺布莱库特(C. Desroches-Noblecourt)等著作。

伊短促的统治时期，阿顿在众神中继续保持其地位。只是到霍连海布时，才开始以过去迫害阿蒙同样的固执态度迫害阿顿。

第十九王朝[57]

霍连海布出身于中埃及一个小城镇的地方贵族世系。他长期担任埃及军队的指挥官和政府官吏，因而对从阿克纳顿当朝以来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有机会进行估量。一旦登极，他就迅速提出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的改革。他还下令加速征集国家赋税，消灭文武官员的腐化现象。

霍连海布对一位名叫帕-拉美西斯的军官极有好感，授予他高官，并择定他为王位继承人。可是帕-拉美西斯年事已高，在位仅两年便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共同摄政王塞提一世。塞提一世是连续好几个好战国王的第一个。这些国王竭尽全力，恢复埃及在国外的威望。塞提一世刚登位，就碰到由赫梯人怂恿甚至支持的叙利亚城邦联盟的严重威胁。他打败了这个联盟，使埃及再次控制巴勒斯坦。塞提在击退利比亚人进攻之后，又一次率领埃及军队到叙利亚北部与赫梯人第一次交战。他占领了迦叠什。虽然赫梯人被迫暂行撤退，但是他们在叙利亚西北部的势力并未衰竭。战争由塞提的继承人拉美西斯二世继续进行。

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下，王室宫邸和行政中枢迁到三角洲东北部一个名叫珀拉美斯的城市，在那里建立了适合于结集大量步兵和战车的军事基地。拉美西斯二世执政第五年，他率领四支大军与赫梯国王穆塔瓦利斯调集的强大亚洲人联军作战，以实现他父亲的遗愿，使埃及再度占有叙利亚北部。然而在奥龙特斯河岸迦叠什城附近的这场著名的战役中，拉美西斯带领的先头部队中敌埋伏，眼见一支部队被赫梯人战车击溃，不得不在绝境中杀出一条出路。他仍然设法调集兵力，挽回败局，获得一些尚属疑问的胜利。关于这场战役的详细情况，以及这次战役前后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某些更为成功的战役，在下努比亚的阿布辛拜勒和迪尔的拉美西斯二世的石筑庙宇的墙上，在阿拜多斯和在凯尔奈克的神庙里，在卢克索神庙后来加建的塔门上，还有在称为拉美西姆的他的墓庙里都刻有铭文。这两国间的战事持续多年，事实上直到拉美西斯在位的第二十一年才与赫梯国王哈图西利斯签订了一项令人瞩目的和平条约。此后两强间保持友好关系，拉美西斯娶哈图西利斯的长女为妻，他们的婚礼被广泛宣称为和平与兄弟情谊的象征。这样一来，埃及势力就沿着海岸扩展到叙利亚北部城镇拉斯舍姆拉(乌加里特)。虽然赫梯人在内地仍保有权力，但在奥龙特斯河流域他们的势力却近乎终结。与哈图西利斯逝世同时，又出现一场海上民族大迁移的新危机。[58] 大批移民从整个东地中海区域、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四面八方汹涌而入，很快压倒了赫梯王国。上了年岁的拉美西斯自从缔结和约后又统治了67年，对来自国外不祥的迹象掉以轻心。他的精力充沛的继承人迈内普塔登极时，发现自己面临着严峻的局势。

104

---

[57] 见E.德里奥东和J.旺迪埃的著作，1962年，第9章，第349-356页和第10章，第418-422页；R.O.福克纳的著作，1975年。

[58] 关于"海上民族"，见尼比(A.Nibbi)的大胆的见解。

大批好战的海上民族进入海岸地带，到达三角洲以西地区，并和利比亚人联盟，威胁着埃及。迈内普塔登位后第五年和他们遭遇，大战于三角洲西部，使入侵者遭到惨重的挫败。在迈内普塔的碑上也记录了他在下叙利亚-巴勒斯坦境内的战绩，并列举征服的许多城市和国家的名字，包括迦南、阿斯克伦、杰济尔、耶诺姆以及在埃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提到的以色列。

第二十王朝[39]

迈内普塔死后，出现剧烈的王位争夺。王位被五个统治者一个接一个地占有，但还不能确定他们的先后次序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二十王朝的第一个国王塞斯纳赫特在位两年，恢复了秩序，他的儿子拉美西斯三世继承王位后统治31年，竭尽所能恢复新王国的荣誉。在他统治的第五年和第十一年，决定性地打败了入侵的利比亚西部的游牧民族。在他执政的第八年，击退海上民族从陆地和海上的周期性入侵。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战争都是防御战，除了一次抵抗海上民族的陆战外，都是在埃及边界上或国境内进行的。只要有一次失败，就意味着埃及作为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的结束。因为这些侵略者不仅仅打算掠夺财富或政治上加以控制，而是渴望得到土地的整个民族，带着战士、家属、牧群及动产前来，要占领富饶的三角洲和尼罗河流域。

105

拉美西斯三世在治理国家内部重重的弊端上，与抵御外敌相比，没有取得多大成绩。这个国家的劳工纠纷、政府人员骚动、通货膨胀麦价不断上涨和青铜与黄铜跌价等问题苦于无法解决。后继的国王从拉美西斯四世到拉美西斯十一世的统治日益衰落。随着阿蒙派祭司渐渐得势，王室权势式微，越来越不稳定，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位高级祭司赫里霍登上王位，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

衰微时期[40]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王朝

第二十一王朝时期，三角洲塔尼斯王公们[41]和底比斯的赫里霍王朝一致同意下把埃及划作两半各自分管。赫里霍去世，统治三角洲的斯门季斯似乎曾控制埃及全国。这个时期有一个新的政权兴起，这就是来自法尤姆的一个利比亚后裔的家族。也许他们原是埃及军撤离时定居在那里的雇佣兵。[42]不管怎样，这个家族的一个名叫谢尚克的成员夺取了埃及的王位，开创了一个历时约200年的王朝。

第二十二王朝末期，埃及分裂为彼此争吵的小王国，并受到亚述人和强大而独立的苏

[39] 见E.德里奥东和J.旺迪埃的著作，1962年，第9章，第356-366页和第10章，第432-439页。
[40] 见基钦(K.A.Kitchen)的著作。这个混乱时期的世系和年代，比尔布赖尔(M. Bierbrier)作了研究。
[41] 见约约泰(J.Yoyotte)的著作，1961年，第122-151页。
[42] 见赫舍尔(W. Hölscher)的著作。

丹的威胁。其后有一个名叫佩迪巴斯特的人，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虽然曼涅托把这个第二十三王朝叫作塔尼特，但是该王朝的国王仍然使用第二十二王朝法老的名字，如叫谢尚克、奥索孔和塔凯卢特。在这两个王朝期间，埃及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维持着和平关系。106 所罗门甚至娶埃及公主为妻。可是所罗门的继承人登位后第五年，谢尚克攻打巴勒斯坦。埃及虽不力图占领巴勒斯坦，但它恢复了一些过去的势力，并从大量增加对外贸易中得到好处。

第二十四王朝只有一个国王，名巴肯勒内夫，希腊人称他为博霍里斯，他是泰夫纳赫特的儿子。泰夫纳赫特可能曾与撒马利亚的荷齐埃订立反对亚述人的条约。博霍里斯竭力支持以色列国王，与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作战，可是在我们纪元前720年，他的军队在拉菲亚地方被打败。当苏丹国王沙巴卡入侵埃及时，他的王朝便告终了。

苏丹人的第二十五王朝㊸

约在公元前720年，埃及遭受另一次入侵，但这次入侵来自南方。一个名叫皮安基的苏丹人，他的首都在第四瀑布，统治着从第一到第六瀑布的苏丹。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向法老王权挑战。这时在赛伊斯有一个叫泰夫纳赫特的人成功地统一了三角洲，占领了孟菲斯，并包围埃拉克莱奥波利斯。皮安基得到情报说，中埃及埃尔莫波利斯的统治者与泰夫纳赫特配合作战，派遣一支军队入侵埃及。皮安基无疑是个勇敢的统治者。他在作战中的骑士气概，他严格避免接触被俘虏的公主，喜爱马匹，谨慎地执行宗教仪式和拒绝与被他征服的王公们打交道(因为他认为他们在礼仪上不洁净：不行割礼，并且是食鱼者)，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性格。这个王朝存在60年，经过许多次战役之后，被亚述人所消灭。

赛伊斯王国㊹

一个名叫萨美提克的埃及人把埃及从亚述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公元前658年，萨美提克在吕底亚国王该基斯和希腊雇佣军帮助下，肃清全部亚述霸主的残余势力，建立起一个新的王国，即第二十六王朝。这个王朝的国王极力扩张贸易以恢复埃及的地位。上埃及成为丰产的农业地区，下埃及成为农产品的销售地。

波斯时期㊺

在萨美提克三世统治时期，埃及终于被坎比塞斯领导下的波斯征服。由于被波斯占领，埃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实际上就此终止。第二十七王朝由波斯国王统治。第二 107

㊸ 也见第十一章。全面论述见冯·蔡斯尔(H. von Zeissl)的著作。这个时期情况的更多细节，见第十章。

㊹ 见E.德里奥东和J.旺迪埃著作，1962年，第13章，第574-600页。关于对非洲历史极为重要的赛伊斯干预努比亚的情况，见索内龙(S. Sauneron)和J.约约泰著作，1952年，第157-207页。

㊺ 关于这个时期的主要研究者是G.波泽纳，1936年。

十八王朝是本地人建立的朝代，国王叫阿米泰厄，他趁大流士二世统治衰败的时机，组织起义取得王位。第二十九王朝和第三十王朝依靠与雅典和斯巴达结成同盟，努力维持独立达60年光景。

波斯人第二次控制埃及开始于公元前341年阿塔泽克西斯三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在伊瑟斯战役中打败了波斯，于我们纪元前332年侵入埃及，这个王朝很快就灭亡了。

（吴壬林译）

108

图片 2.1 a 凯夫伦



图片 2.1 b 左图的放大细部

图片 2 2 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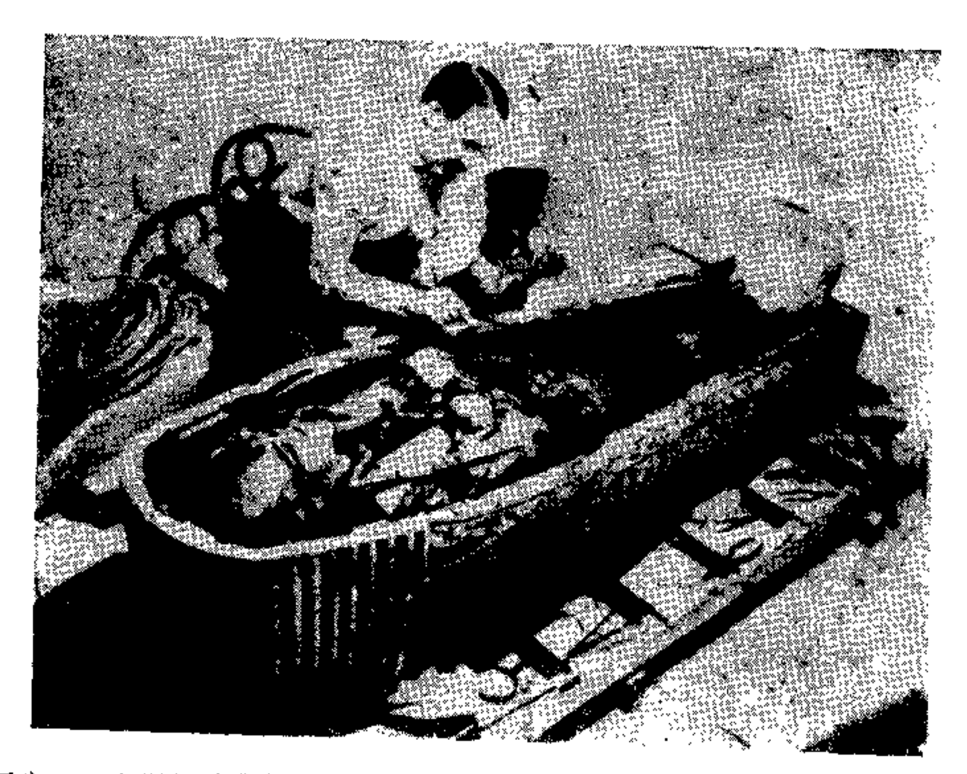


图片 2.3 阿克纳顿向太阳顶礼



图片2.4－2.9 图坦卡蒙的珍宝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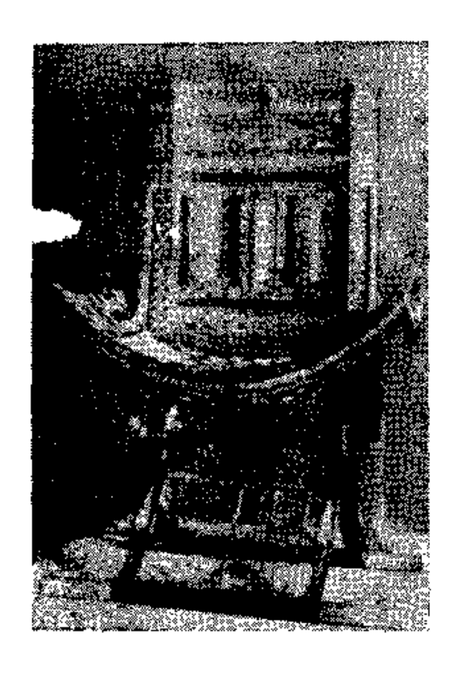


图片2.4 发现图坦卡蒙坟墓的考古学家H.卡特，要打开一个石棺和三层石柩(一个套着一个)，最内层放置木乃伊



图片2.5 图坦卡蒙厚重的金制葬殓面具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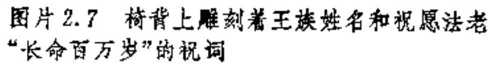


图片2.6a 法老的王座：座腿之间残缺的透雕细工表明“两个国家的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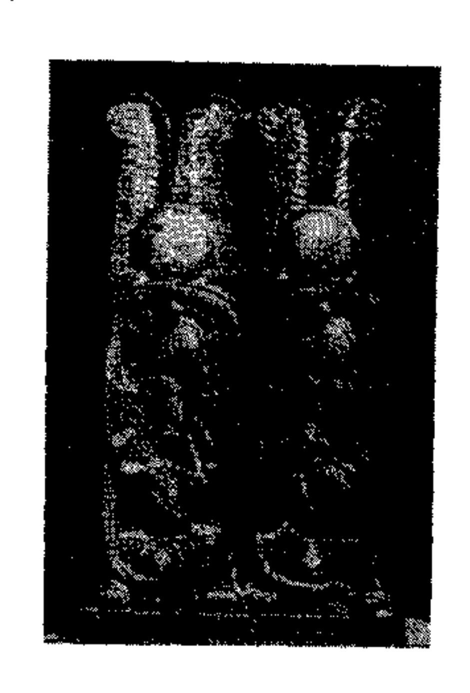
图片2.6b 金装王座的靠背：国王梳装打扮，安开萨娜蒙王后为他作最后的装点

图片2.8 双涡漩花形的油膏盒，可能用于某种典礼



图片2.7 椅背上雕刻着王族姓名和祝愿法老“长命百万岁”的祝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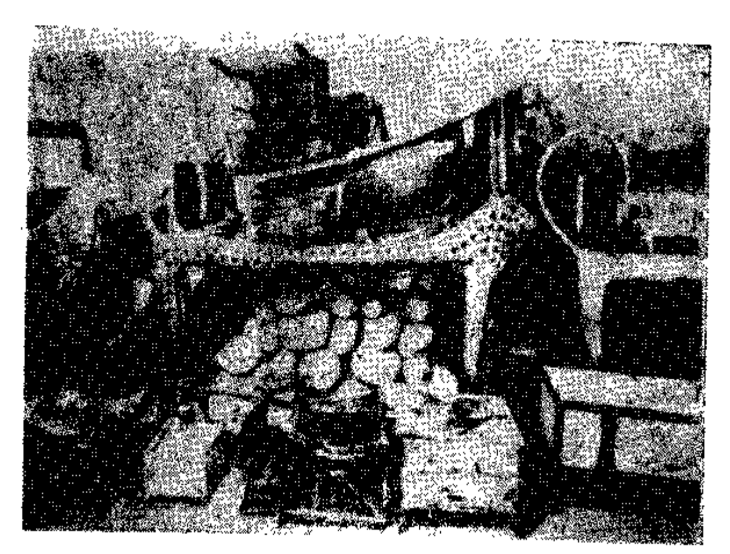




111



图片2.9 库房入口处的阿努比斯神



图片2.10 前厅内部，左边是哈索的躺椅

3 法老埃及：社会、经济和文化

J. 约约泰

经济与社会

田野和沼泽

我们纪元前3000年左右建立的法老王国以及嗣后一个所知极少的时期，无疑在经济上有相应的重大发展。我们在泰尼特时期王室和私人的坟墓里能看得到这方面的一些证据：建筑物越来越大，许多艺术品也显得更加豪华，工艺技巧日臻完善。但是我们还无法了解：到底是协调灌溉的需要是形成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还是国家在泰尼特诸王领导下统一起来，加上文字的发展，才有可能通过合理调整基本建设工程和保证有组织地分配食物资源，来协调各地区的经济。事实是直到十九世纪，埃及的繁荣和生命力还是同种植谷物（小麦、大麦）紧密联系的。在实行现代的长年灌溉方法之前，一直存在一种修筑堤坝、控制和分配洪水和淤泥的盆地灌溉系统。显然这种灌溉系统早在中王国时期就已经存在，我们可以假定，甚至在更早的时代就已形成①。当然，这种系统只能提供一年一熟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耕作周期短，大量人力可用来从事宗教和宫廷的重大建筑工程。古代人也有挖渠引水或掘地下水汲水长年灌溉的。但长期以来，人类用两腿和双肩肩担背荷，是我们所仅知的提水的“机器”，挖渠引水只用于浇灌蔬菜、果树和葡萄园（但在新王国时期由于发明“夏杜夫”*，也许有些地方能做到谷物一年两熟）②。当尼罗河水位特低时，许多盆地因缺水而贫瘠，水位特高时又淹没土地和房屋，由于人们不知道如何贮水，也就不知道如何减轻这两种情况所造 成的恶果。但是谷仓和水路运输的发展，使人们能保证食物供应，把食物从这州运往那州，或把今年的食物储备到来年。平均的年产量还是不错的，剩余谷物供应大量的政府官员和中等规模的雇工场所（造船厂和武器制造厂，附属于某些寺院的纺织厂等）。寺院当权者和高级官吏通过对食物的控制（控制方式在各个时期不同），掌握着任意恩赐的权力。

谷物制成的面包和啤酒是主要食品，但是古埃及人的食物品种繁多。文献里所列的糕

---

① 关于灌溉技术的文字记载很少。最早提到盆地（hod）灌溉的可参考的资料在中王国石棺文中发现。见：德巴克(A. de Buck)，1935-61年，第138页b到c。

② 见1973年赫尔克(W. Helck)和奥托(E. Otto)为《威尔珀纸草书》提出的独创性的解释。

* “夏杜夫”(shaduf)即桔槔，一种汲水的工具。——译者注

饼和面包的品种就多得惊人。象今天一样，菜园提供蚕豆、鹰嘴豆和其它豆类，还有洋葱、韭菜、莴苣和黄瓜；果园供应枣子、无花果、埃及榕坚果和葡萄。葡萄的精心培育，主要是在三角洲和绿洲，酿制成各种美酒。养蜂供应蜂蜜。用芝麻和纳布克*榨油。橄榄树是在新王国时引进的，成活不多，不很成功。

法老埃及没有把整个流域改造成耕地和果园。他们还利用沿三角洲北部边缘和米里斯湖岸的广阔的沼泽和湖泊，沙漠边缘以及尼罗河河曲地段的低洼地。在这些地带，人们可猎捕到大量的各种野禽。人们用拖网、鳗篓、钓丝和筐篮捕鱼，因为尼罗河有品种极多的鱼类；尽管有些州禁止捕鱼食用，或者限制捕鱼的种类，鱼在人们的食物里仍占一定位置。人们还采集可食的土杏仁、纸草心和印度莲仁（波斯时代以后传入）作为补充食物。最后，沼泽地还可以作为饲养母牛和公牛的牧场。

虽然气候潮湿对于饲养牛群并不特别有利，而牛群在这种条件下减少，还得经常从努比亚和亚洲输入补充，但牛在这个国家的生活和宗教观念中却相当重要。祭神和显贵的食用都必须备有牛肉。解牛是一种艺术，牛的脂肪被广泛用来制作加香料的油膏。我们知道，古王国的埃及人试图饲养许多动物品种如直角大羚羊、羚羊、瞪羚羊等，甚至想驯养 114 鹤和鬣狗，但是这种尝试既费劳力，效果又差，所以只好放弃，以后在谚语和巫术仪式中，沙漠的反刍动物成为不能驯服的动物的象征③。与此相反，他们饲养家禽，尤其是尼罗河鹅，却非常成功。山羊（对尼罗河流域本来稀少的树木十分有害）、绵羊（在休耕地上和沙漠边缘饲养）和猪（尽管有些禁例）的肉在人们的食物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有史时期开始后很久，我们看到饲养羊的类型起了变化：早期有扭曲的横角公羊，它们是克努姆、贝斯、赫尔希夫以及其他古代神的化身，在我们纪元前2000年左右渐渐被卷角公羊所代替，用于祭奠阿蒙神。这类公羊，来自非洲还是亚洲，至今尚有争论。埃及人驯养特别成功的两种非洲动物——驴和家猫，在我们看来是与法老埃及的过去密切有关。早在古朴时期就已使用驴子，不是用作坐骑，而是用以驮物（奇怪的是也用来供奉恶神塞特）。到古王朝末期中王国初期家猫才出现（人们把家猫当作危险女神的一种较和平的形象来崇拜）。

采矿和工业

贵族和卫士为了运动和改换一下日常食品，在沙漠地区猎兔和较大动物，但这种活动并没有多大经济意义。沙漠向人们提供各种矿物资源：阿拉伯沙漠的绿色和黑色染料，早在史前时期就用来涂饰眼睛；美丽的硬石（如图拉的精致石灰石、锡尔西拉的沙岩、阿斯旺的花岗石、哈特努的雪花石膏、艾哈迈尔山的石英岩、哈马马特的硬砂岩）④用于建筑和雕刻，还有次宝石如西奈的绿松石或努比亚的肉红玉髓和紫水晶石。釉料（如上釉的块滑石和埃及的石英芯彩釉陶器）早已发明，因面使许多制品看起来象绿松石或天青石。由

---

③ 《赞津纸草书》，3、8－9；见卡米诺斯(R. A. Caminos)，1954年，第382页。论直角大羚羊的宗教意义，见德夏安(Ph. J. Derchain)。

④ 硬沙岩(有的著作中误为片岩)是一种“粒细、质密、坚硬、晶状的石英矿石，外观很象板岩，一般呈不同深度的灰色”：卢卡斯(A. Lucas)，第419-420页。

* 纳布克(nabk)，一种油料作物。——译者注

于和亚洲的接触，新王国埃及人得以改进制玻璃的技术，成为掌握这种技术的能工巧匠。

这个国家从周围贫瘠的土地里得来的另一种财富就是黄金，它产于阿拉伯沙漠和努比亚。黄金这种永存不朽的象征，在当时并不象在后来的文明时代那样在经济上起主要作用，但还是被看成财富的基本标志，而且比银子的价值更高，虽然银是输入的金属，往往很稀少，而且在古王国时期比黄金还珍贵。沙漠里还有若干铜矿。除了西奈的铜以外，质量相当低，因而埃及不久就依赖亚洲的铜。应该注意的是，法老时期金属制造技术的改革，常常落后于近东。青铜器时期和以后铁器时期的出现比其他地方都要晚些。金属比较稀少而珍贵，于是以木料和燧石代替金属制造农具，用硬石代替金属作雕刻工具。金属工具和武器由政府部门贮藏和分配。⑤ 115

古埃及虽然必须从亚洲邻国输入金属和木材，但它在工业上却有两个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法老们输出纺织品，埃及亚麻制品在当时精美无比。纸草当时用途很广——缝帆篷、制绳索、做衣裳鞋袜，尤其是能制造出一种非常柔韧、光滑的书写纸；它是书吏权力的来源，而那时东地中海各地广泛使用字母书写，因此国外也大量需要这种纸张。大量栽培这种植物，也许是沼泽地消失的重要原因。那些地方原是鸟类、鳄鱼和河马出没之地，古代人认为这些动物为埃及原野增加景色。

运输的发展是法老政权进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公牛只用于耕种和拖曳葬礼柩车；驴更耐劳，饲养较易，它是田野和沙漠路上驮重的理想牲畜（我们知道马匹是在第二千纪时引进的，是仅供战士使用的奢侈品；车轮在经济价值上潜力很大，这个原理早在古王国时代就已知道⑥，但未加利用）。虽然知道用驴队运输的方法，驴子的运输效率毕竟较低，但运输仍以驴为主，以骆驼为辅，骆驼是在波斯时期之后才慢慢在农村推广。大量物品的长途运输是利用河流和运河，因小舟和大船迅速可靠。埃及很早就已发达的航行技术，使其经济有可能集中化并取得惊人的建筑成就（金字塔、庞大的寺院、巨型雕像、方尖塔）。此外，甚至在很早的时候，帆船就在红海和地中海上行驶（认为最初是由腓尼基人教会埃及人驾驶船只的说法没有证据）。特别是搬运用于神圣建筑物需要的巨大石块，法老的工程技术发明了各种非常简单的巧妙方法，例如利用湿泥的润滑性移动简单的木橇（无车轮亦无滚筒）；利用尼罗河水上涨，装载着大块石料的木船顺流而下，或利用芦席编成浮锚⑦。象这些建设方法，现代人根本难以想象，具有熟练工艺技术和其他效率观念的人也会为之目瞪口呆，研究工作正在进一步探索法老科学的奥秘⑧。 116

大多数农业和制造业的方法是在第三千纪时期发明的，在引进国外技术发明方面，埃及似乎是迟钝、犹豫甚至保守的。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和研究结果，似乎可以说早期的卓越成就，为尼罗河流域的居民提供了解决主要困难的办法，并使他们得以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即“法老专制政治”。这种制度的缺点与当时的宗教观点相比已显得不太重要。这种宗教观点，在埃及被外国征服以后，已证明其传统和社会准则无力应付新

---

⑤ 在第十三王朝时，燧石制的箭和标枪头总模仿金属模型制造的，象在米尔吉萨的堡垒里发现的武器那样，也是根据古代传统技术制造的。见维拉（A.Vila），第171-199页。

⑥ 在第六王朝坟墓里发现装在车轮上的攻城用梯子；见史密斯(W.S.Smith)，1949年，第212页，第85图。

⑦ 见戈荣(G.Goyon)，1970年，第11-41页。

⑧ 最近的著作，见薛瓦利埃(H.Chevrier)，1964年，第11-17页；1970年，第15-39页；1971年，第67-111页。

的挑战，但仍在寺院里保存下来长达几世纪之久。

经济和社会制度

在叙述法老时代的生产方法时最好少用抽象的术语。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记载⑨，我们只能作简略的说明。

根据现有文献的一些一般性资料，对外贸易、开矿和采石都由国家经营。我们从文献中知道，大部分商业交易商品量不大，只是个人之间的交易；职业经纪人很少，他们通常是国王或寺院的商业代理人。没有根据认为存在着企业资产阶级和私人经商者。有些作者有时使用“国家社会主义”一词，这是不确切的，是对时代的误解，但总的说来，生产和分配确实掌握在国家手里。

通观现有资料，我们的确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任何事情都出自国王。当然，从原则上说，全部决定权和全部物质资源都属于国王。他负有宗教的责任，保证永恒的秩序和埃及的安全以及人民在今生与来世的幸福；为此，他不仅要运用国王的权威，而且要维持对众神的崇拜，其结果是他和寺院分享经济特权。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法老主持寺院的祭117祀和管理国家大事，他是唯一的祭司，唯一的战士，唯一的法官和唯一的生产者，但实际上他把权力授予整个统治集团。酬劳官员的方法是把土地分配给他们，土地收益归他们所有。事实上，在所有时期，国王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更多地是从理论上说的。

当然，去蓬特、比布鲁斯、努比亚以及沙漠各地寻找外地商品和石料的考察队，通常是由国王派遣、由政府官员率领的。寺院的建筑同样是政府的职责；而在对外扩张时期，例如掠夺被兼并的库施领土以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保护国，也由国王直接过问。相反，开发埃及土地则不单独依赖国王。王室领地与神的土地并存。神拥有田地、羊群和作坊等等（在崇拜阿蒙神的全盛时期，神还拥有矿产），并有自己的一套官僚等级制度。神有时被国王赐予特许状，豁免一定的税收和贡赋，这最足以说明寺院是土地、人员、工具的“所有者”。此外，至少从第十八王朝起，还赐予战士以世袭的土地占有权。高级官员被赐予土地自己经营。古王国时代坟墓中雕刻的家庭生活的图象表明，他们的家产包括自己的羊群、工匠和自己的船队。我们不知道私人财产是如何继承的，但是肯定有些财产可以继承；人们只能希望把官职传给儿子，“家庭动产”则可以自由赠送他人。但实际上，在各个时期个人占有的土地都很有限而且很分散，因此，大量的财产并不表现为地产，这一点当局是了解的。小土地所有者查明是存在过的，尤其是在新王国时期，所谓“穷人土地”一词，实际是指独立的小农的土地，他们和在王国或在神的土地上耕种的佃农有明显区别。在大征服时期被赶入埃及的外国人数量相对地不多，是些专业人员（巴勒斯坦葡萄培植专家、利比亚买卖牲口的商人），或定居的军人。属于私人所有的奴隶通常只是家庭的奴仆，虽然奴隶确实存在，但人们认为奴隶劳动（有时是罪犯的劳役）为农业提供的人力非常有限（虽然后来把供死者役使的巫术“应答者”当作大批买来的奴隶⑩，致使人们相信在拉

⑨ 精辟的注解和书目，见詹森(J.J. Janssen)，第127-185页。

⑩ 切尔内(J.Černý)，1942年，第105-133页。

美西斯统治下，使用奴隶劳动才可能完成灌溉和改良土地的巨大工程)。实际情况是，大量的农业人口似乎固定在土地上，只有在无力交纳赋税的情况下他们才逃离土地。 118

我们可以设想，在村庄里，家务活动占主要地位。男人负担大量田间劳动。在集镇、王室领地和寺院里，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行会有时有很严密的等级制度。种类很多，计有面包师、陶工、花匠、铸工、雕刻匠、制图人、金匠、担水工、各种看守人、饲狗者、牧羊人、山羊牧人、牧鹅人等等，都为国王和寺院工作，手艺父子相传。我们比较了解居住在“国王谷”(位于现在的代尔迈迪纳)邻近一个村子中的工人社会，他们在挖掘和修饰法老和王后陵墓时是怎样生活的。艺术家和挖掘工都受公家雇用，由一个王家书吏指挥，由国王指定两个人监督。[11]他们领取规定的谷物津贴，谷物有时直接由寺院的收入中拨给，还配给鱼类、蔬菜或其它食物。他们这个社会中有小规模的劳务和物品的交换，遇有纠纷内部自行裁决(向地方神求得神谕裁决者除外)。他们的地位很高，自信心很强，倘若迟迟不发给他们配给物品，足以引起罢工。

文职人员

生产的组织和分配，公共秩序的管理，一切活动的监督，是在君主（即法老或割据时期的当地首领)管辖下的文官或寺院的责任。这些官员从书吏中招募，因为书写的知识，是取得一切知识和较高技术的门径；正如人们在《对专业人员的讽刺》和书信体散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有权有势，生活舒适。书吏成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受托人，他们掌管所有的专业活动（在新王国时期最高级军官本身就是书吏)。他们可以是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或仪式专家，许多人兼有几种才能。他们接受相当严酷的训练，信奉高尚的道德准则，慈悲为怀，对平民有一定程度的藐视；尊重社会秩序，把它看作宇宙和谐的完美表现。只要他们避免做出违反日常工作守则的行为，就能按自己的等级取得适当的报酬。报酬分很多种，至少在十二王朝是如此[12]，如授与土地，配给食物，作为祭司从寺院的正规收入中得到收益，王室赠予和国王直接给予奖品或丧葬礼品。他们中最高级的人物的生活方式在今生和来世都是美好的，且不说他们的势力，单是他们的财富就使他们有任意恩赐的权力。 119

官衔表和家谱都清楚地表明，在武士或祭司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书吏等级。统治阶级是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官僚体系。每个优等生，在正常情况下都能找到官职，如果工作胜任，表现突出，得到国王的赏识就能青云直上，因为国王在理论上是独掌提拔之权的人物。

然而人们通常至少把一部分职权传给他们的儿子。我们不应过分相信那种认为每个官员都是由国王从布衣中擢拔出来的轻率的说法。我们知道由高级官员建立的几个王朝；在第一千纪的底比斯，我们还见到几个家族同时分占“阿蒙王室”官吏和祭司的高位。当然，应该说明，这类事是发生在继承权相当重要的时期。

---

[11] 见瓦尔贝尔(D. Valbelle)著作。

[12] 典型的文字见G.戈来，1957年。

法老的历史看来是一部高级官吏与国王之间反复进行斗争的历史，高级官吏意图建立世袭和自治的政权，而国王则紧紧抓住委任官吏的权力不放。这样，当南方诸州世袭“大首领”或最高长官建立的王朝强大起来时，古王国就消灭了。到了第二中间时期，高级官职成为私产，可以买卖。当底比斯祭司和南方军事将领勾结起来附属于由阿蒙高级祭司建立的王朝时，新王国就告终了。在利比亚时期，三角洲重演上埃及在第一中间时期所经历过的分裂过程。这些变动的经济含义及其原因和后果难以肯定，但是可以说，每当中央政权衰落地方分裂的时期，内部斗争就要扰乱农村安宁，国际影响就要削弱，边境安全也受到威胁；同时寺院建设就要减少，而且规模也较小，艺术作品的质量下降。

政治组织

埃及社会公认的理想就是强大的君主制度，认为这是使国家富强的唯一方法。君王是国事的化身：“法老”这个词来自“珀奥”(per-ao)，它在古王国时期指君主的“伟大王室”，包120括他的宫殿和臣僚，到了新王国时期单指国王个人。他与常人不同：传说中他是天命注定的，他的名字上加了四个教名和称号，他周围的仪仗，他出现和决定国事时隆重的仪式和场面，神殿中他的无数画像和周围的装饰以及尊号表，他的庆祝圣典和陵墓的样式（如孟菲斯的金字塔和底比斯的崖墓）——所有这些都强调其与众不同。越来越多的个人采用以前只能由国王采用的坟墓样式[13]、肖像画法和墓葬祷文，十分明显地表明国王的权威不断削弱和受到某些社会压力。此外，普通人实行一夫一妻制似乎是惯例，而神的化身国王却普遍娶几个妻子，有时和他的姐妹、甚至女儿结婚。

王位继承问题有些方面仍待探索。子承父位当然合乎习惯，也符合奥西里斯和荷拉斯的神话模式即符合子葬父并为父死报仇的典型，而世袭原则有时（如第十二王朝）造成继承人过早加冕的情况。但是不要以为王位的传递单纯根据长子继承权，由男性传给男性。少数君王在谈到他们的祖先时强调他们的父亲自由选择他们作为副将和假定继承人（如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三世和四世）。但是国王在追述“合法性”时所惯用的话都是千篇一律的，不管他是老王的长子还是暴发户。每个统治者都继承“赖神的权威，苏神的职责，杰卜的王位”，因之是创造和主宰世界之神的直接继承人；每个国王都是本乡的神所“挑选”的。国王是太阳神亲自指示才出生的，注定要登上王位（据神婚的生动传说）[14]，而在新王国时期，新国王须由阿蒙的神谕指定或承认，才能保证其王位的合法性。可见，直接“神权”的重要性超过王朝的合法性。事实上，每个国王登位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以登极大典来制造和维持君王的权威，每次典礼国王都以祭司或法律制订者的身分出现，履行斋戒、举行涂油礼，以同样的装饰使其重新具有“国王的仪容”。就这样把他比作神祇，有时他在世时就把他当作真实的神加以崇拜，例如阿门霍特普三世或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人像121就是供人膜拜的。法老充当超自然的角色，但是不曾认真要求自己具有超自然的才能；相

[13] 国王死后殡葬办法的演变和平民逐渐僭取王室墓葬特权的现象，发生过好几次。第一次从古王国时期开始，到第一个中间时期由于王权衰落而更加速；那时曾突然发生葬礼特权的民主化，这一点已不再有争议。

[14] 布鲁纳(H.Brunner)，1964年。

反，他仍然是依赖神供奉神的真实的人⑮，有四位妇女成为法老：奇怪的是前两个（尼托克里斯和塞贝克尼弗鲁）的出现标志王朝的结束，另外两个（哈特舍普苏特和塔沃斯雷）被后代当作篡位者。国王的母亲、妻子和女儿都得到许多荣誉。中王国、尤其是后期的几个王后，如阿门霍特普三世的元配王后泰伊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元配王后尼弗太里都授以特殊的尊号。阿美西斯在位时的阿霍特普或阿门霍特普一世在位时的雅赫摩斯－尼弗太里似乎在政治或宗教事务上发挥过决定性的影响。礼拜"阿蒙神妻"是公主和王后们的职责，这说明妇女和女性在礼拜宇宙神中的主要作用。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埃及王统观念中存在过母系政权⑯，特别是有人认为在雅赫摩斯时代王权正常由女性继承的说法很难证实。

研究一下遗留下来的大小官吏的职称表和少数立法与行政文献，我们对政府的组织就会多少有些准确的概念，包括各州政府，祭司的等级制度和他们各自承担的宗教义务，王室和祭司对可耕地、畜群、矿产、粮食、财库、河运、法庭等的管理制度。从专家的角度来说，这些文献也许不能算是严格的组织图表——显然随着各个时期而异——但是它们确能说明当时掌握了复杂的管理技能和文书与会计工作的卓越技术（标题、括号、纵横表格等等）。这种文牍工作确有效能。埃及在国外的力量也许应更多地归功于它的先进组织而不是它的侵略行动，而它的伟大建筑所以能长久保存下来，肯定要归功于书吏大规模调度劳力和笨重材料的能力。

这个行政制度的最高职位是"特加蒂"（Tjaty），或者用埃及学的传统术语来说，即宰相。宰相负责公共秩序，被比作托特神，即"太阳神赖的心脏和舌头"；他是位于法老之下的全国最高法律权威和司法大臣。有些宰相连续在几位法老下任职，必然控制了国家的政治生活。而且宰相（在新王国时期这种官职有两个）还不是国王唯一的顾问，甚至不一定是最主要的顾问。许多显贵自夸曾秘密地受国王咨询或被指定经办特殊任务。在国家扩张时期，努比亚总督（荣誉"王室子孙"）直接向国王负责，在他自己管辖区里几乎如君王一般。事实上，政府的等级制度似乎不足以说明大臣的政治权力。有几个著名人物，如建筑家阿门霍特普原是哈匹的儿子和招兵书吏，是由于他的才智而逐步上升到神的地位；还有哈莫伊斯，他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和普塔的高级祭司⑰，无疑与当时的宰相有同等势力。以法老君主专制制度为基础，形成在各州派驻代表的制度，由他们负责解决重大政治冲突；被贬黜的各种高级官员，其中不但包括森穆特和哈特舍普苏特的其他亲信，还有曾在比较贤明的君主底下任职的个人（两个王公和阿门霍特普二世在位时努比亚总督乌瑟萨泰特），他们都是政府危机的无声见证人。

122

军事组织

国王负责国家安全。理论上说，所有胜利和征服的荣誉都是他的。拉美西斯二世把他

⑮ 波泽纳(G. Posener)，1960年。
⑯ 有关资料见格罗斯-默茨(B. Gross-Mertz)著作。
⑰ 有关这个人物的情况，见戈马(F.Gomaa)新近的论文。

曾单独与卫士站在迦叠什作为资本用文字和图象大肆宣传，重申君王是秉承神的意志的唯一救世主，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事实上他是依靠军队建立了他的王朝的。当然，早在金字塔时代，埃及已经有一个专职的陆海军司令部，指挥训练有素、队列整齐的军队。但是在第三千纪时邻近民族对它并不形成严重的威胁。外族的不断侵袭使努比亚人口减少，这对埃及有利；在农村大量征兵，获得战争的胜利，足以恐吓和掳掠利比亚和亚洲边境的居民；而"沙漠侦察兵"监视着饥饿的贝都因人的行动。孟菲斯军队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和宏伟建筑工程的事迹已很清楚。"青年精锐部队"担任国王的亲兵，督促金字塔的石料运输，监督重要的采集队去西奈矿山或东部采石场。一支专业的辅助军团叫作塞门蒂（采金部队）⑱，它勘探和开采努比亚和沙漠中的金矿，而"通事们"远离家乡为亚洲或非洲的货物去谈判——或去掠夺。在第一个中间时期，王国分裂为敌对的公国，改进了军事组织：在王公个人扈从队和从各州征来的特遣队中增添了从努比亚或亚洲阿默斯招募来的辅助性的突击部队。123 在第三千纪时期法老军队已具有两大明显的特点：军队作为监督者或劳动力参加重大经济建设工程，和使用从国外招募来的精锐部队。埃及要维持秩序和保持威望，自然重视军队，但是并没有好战倾向。

新王国时期是发生大规模国际冲突的时期，埃及当然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充职业军队。分成战车兵和步兵两个兵种，再划分为几个大兵团，由各种等级的军官指挥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之服务。这个巨大的军事机构抗击亚洲各帝国和公国，似乎成功地解决了由阿顿异教徒引起的危机。士兵被赐给小块土地，在拉美西斯统治时，把许多俘虏——努比亚人、叙利亚人、利比亚人、从事掠夺的海上民族——编入军队，也同样赐给土地。尽管同化相当迅速，利比亚人（也许与他们同种族的入侵者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却建立起自主的力量，最后由他们的首领登上法老的王位。尽管如此，这个利比亚梅什维什战士统治的埃及不能适应新的军事技术，而亚述却组织起强大的战争机器。在帝国间新的冲突中，赛伊斯国王们不再依靠这些战士，宁愿依赖从爱奥尼亚人、卡里亚人、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中招募来的新定居的军人；在与波斯帝国的最后几次战争中，埃及的几位末代法老象他们的对手一样，通过国际冒险家招用希腊雇佣军。国防机构的崩溃既未消除法老是唯一胜利者的古老神话和对过去征服外国的怀恋（见塞索斯特里斯的史诗），也没有使人忘怀对内战时期的洋洋自得的回忆（见珀图巴斯提斯组诗）。国防机构的崩溃是埃及中兴后的弱点，不过它的经济和文化并没有衰落。

宗教和道德观念

神 话

法老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或许也是它的弱点之一，肯定是它所创造的光辉的世界形象和统治世界的力量。这种清晰的形象表现在神话、礼仪、艺术、语言和智慧的作品中。

⑱ 关于这个不著名的采金部队，见约约泰（J. Yoyotte）著作，1975年，第44-55页。

只要想到埃及精神的这一特性，就能解释下文对法老神话简短而不全面的总结何以既不能清楚地提供众神的等级和谱系，又不能系统地提供宇宙的起源和宇宙志。为了解释自然界的力量和自然现象，埃及神话吸收了世代相传的种种形象和传说。可能有几种“唯一”的神，例如苍天是液体的穹幕，是母牛的肚子，是女人的身体，是大母猪等等。这样就存在好几种宇宙起源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地方经过若干世代以不同方法综合而成为几个大的体系，每一综合体系都能通过特定的礼拜仪式各自鲜明地表现出来，而形成各自的宇宙观。所有这些体系有共同的主要特色。当前的世界是在为造物主铺平道路之后由太阳加以组织和得以维持的。为造物主铺平道路的是在“农”即原始洪水里游泳的女神（迈斯娜、娜斯），或者是另一些更早的神（乌杰杜德或者在伊德富和伊斯纳的“死神”），或者是第一块干地（普塔－泰南）。造物主处于混沌的中心，是一个“不活动”的潜力，他出现以后便借助于“他的手”（第一个女神）开始生殖繁衍的过程，并把本身派生成一对一对的神祇：“苏神”（大气）和“特夫努特”（火力）都呈狮子般的形状，“杰卜”（大地）和“努特”（天空），以后是全体九尊神，更正确地说是从造物主本身分出的许多神的形状。宇宙的这种结构是根据造物主的意图和他的神言建成的，依据神言的声音赋予形状，例如人（鲁迈，“rome”）出自他的眼泪（拉迈，“rame”），鱼（雷穆，“remu”）也是来源于此。

124

“赖的眼睛”是太阳神的力量，它是有生命力也有毁灭力的辐射光，以女性的形象出现，有时与女神相混淆；当造物主分裂为二时，动物世界便通过女神而繁衍生殖。女神既是配偶又是女儿，她梳成王家的发式，或戴王冠，也可能呈现眼镜蛇或狮子的形状，或者是一支火把和燃烧着的香。创世之初只是驱退原始的黑暗，实际上在每天日出时反复进行。如同在开始阶段，造物主每天必然碰到仇恨的力量：巨龙阿波庇斯威胁着要吸干天河或者用它的邪恶的眼睛[19]阻止太阳的运行，神秘的乌龟和无以命名的“敌人”在东方狂怒。在每天黎明之前，太阳一定要在世界边缘的池塘里沐浴，洗净从黑夜和死亡那里带来的污秽。太阳在每天运行中上了年岁，于是在一夜之间它跨越另一个世界在另一条河上神秘地使自己再生。在新王国时期，幻想的作品如《阿姆·杜阿特之书》或《门书》，就表现了赖神的“肉体”再生的状况，描写它下属的神（善神和恶神）常去的岸边景色，这些神具有不可思议的模样和力量。

这时的世界是很不安定的。到晚上，月亮——第二只神的眼睛代替了另一只眼睛，但是它不断衰退，被一个凶煞神用刀砍劈，这个神叫托特或洪斯，后来被含糊地看成为太阳神本身[20]；有的说砍月亮的叫塞特，形状是一只公猪，或者一只直角大羚羊……。还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提到“右眼”是个燃烧着的女神，她远远飞离太阳，必须把她带回来。有一种传说，清楚地把她的逃跑说成是阴谋反对老年“赖”神的意志，企图去毁灭人类。由于下界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叛乱”，人们失去原始的平等[21]。“赖神的眼睛”的怒火周期性地发作，“强有力”的塞赫迈特就用疾病折磨人们，尼罗河水位就下降，加剧“当年的灾荒”。

125

---

[19] 这个神话主题，新近由博格豪茨（J. F. Borghouts）著作，第114-150页加以精辟论述。

[20] 选文见索内龙（S. Sauneron）和J. 约约泰的著作，1952年。古代对月亮神的描述，见G. 波泽纳著作，1960年。

[21] A. 德巴克，1935-1961年，第462-464页。

“赖神”宽恕人的那次叛乱，授以魔法使他生存下来，但他从此离开人间，由一个神圣王朝统治世界。在此期间，塞特杀死了奥西里斯，但在埃西斯和阿努比斯(以药料涂尸者)的照料下救活过来，奥西里斯遂成为所有死去国王的至善典型，以后又成为所有死人的至善典型。他也是每晚死去的太阳的形象，从他身体中流下的淋巴液被认为是每年上涨的河水(尼罗河涨水的许多说法之一)。塞凯-奥西里斯又是埋种下去会抽芽的种子。塞特被拒于奥西里斯的陵墓和圣殿之外，长期以来人们把他崇拜为神，把他看作生命中的残酷的力量，一种凶神恶煞，帮助赖神恢复秩序反对捣乱者阿波庇斯的助手。[22]直到我们纪元前八世纪左右，一种新的狂热才把奥西里斯和埃西斯从丧葬仪式中除外——关于他们的神话在丧葬仪式中原是来世观念的基础；并把塞特降低到阿波庇斯的地位，把他当作魔鬼的化身和入侵者的保护神。

协调是团结的先决条件；团结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要求再次统一。塞特是奥西里斯的儿子荷拉斯的对头也是他不可缺少的对手。根据最初的传说，每一个国王在他自已身上体现着荷拉斯和塞特的和谐一致，好比南北两块平原或者尼罗河流域的黑土和沙漠里的红土一样，必须重新统一。根据神话，荷拉斯的眼睛被塞特挖出，由托特加以治疗。这个神话使许多礼拜仪式增加了光彩，人们把每一次供奉，每一次富有营养的五谷的增产，以及月亮本身(必须补足以保证达到丰产与完善的任何东西的象征)都比作治愈的眼睛的复明。

与神圣的秩序相适应，不但要有一个结构完整和节奏和谐的物质世界，而且要有一套道德秩序——马阿特，即赖神战胜他的敌人时所申明的真理与正义的标准；为了人类的幸福，各种制度的运行和个人的行为应符合这个标准。“赖神靠马阿特而生存”，托特是学者之神，是赖神的司帐，是众神的裁判官，“因马阿特而快乐”。[23]

126 神

上述种种教义和形象都为寺院所接受。赞美诗歌颂宇宙的秉性和造物主的奇异远见，都采取同样的主题，不论是原始时代的女神如娜斯，大地之神如普塔，或者甚至是阿蒙-赖、克努姆-赖、塞贝克-赖都是如此。著名的神话——如赖神的眼睛、荷拉斯的眼睛、奥西里斯的激情——以及礼拜的基本方式在所有居民中心都是同样的。但是各个城镇的“保佑神”各不相同，各有自已的名称、传统的形象、动物的化身及相关的神祇；如埃利凡泰恩、伊斯纳和其它地方的克努姆神，科普托斯和艾赫米姆的明神，埃尔蒙西斯的蒙特神，底比斯的阿蒙神、苏迈努、法尤姆和其他地方的塞贝克神，孟菲斯的普塔——塞凯神，赫利奥波利斯的赖-哈拉赫提-阿图姆神，赛伊斯的娜斯神，布巴斯提斯的巴斯特神，布托的乌阿吉特神，卡卜的奈赫贝特神等。有许多地方的本地神名叫荷拉斯，有许多女神是形象可怕的塞赫迈特或和蔼可亲的哈索。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的神话中曾经提到的神祇在古代是否已散布到全国呢？有可能；无论如何史前时期各地不同宗教的存在可以大体上说明是一种多

---

[22] 特维尔德(H. TeVelde)。

[23] 文献把自然秩序的混乱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骚乱联系起来。但马阿特是一种道德和司法概念，尽管这是相当普遍的理论，但是此种概念并没有明显地将世界的物质秩序包括进去。

神教，许多神祇是从一种宗教派生出来的，其统一性是明显的。看来这种宗教是通过把某些神与其他神等同起来，把众多的神归并为少数几个类型：一个最高的神，通常是太阳神，常明确地以“赖”的称号来统一(如阿蒙－赖、蒙特－赖、哈鲁埃利斯－赖等等)；一个配偶女神叫赖的眼睛(如穆特＝巴斯特＝塞赫迈特＝哈索，等等)；一位战士，即荷拉斯－安胡尔类型的神的儿子；一位奥西里斯类型的死神(如塞凯、塞夫，等)。新王国的神学家把每一个“最初”的城镇说成是造物主在创世时期游荡中停留过的地方，并认为国家的三位主神——代表空气的阿蒙神、代表太阳的赖神和代表下界的普塔神是同一位神在宇宙间和政治上的体现。由于神祇众多造成理论问题上的混乱，引起许多神学上甚至哲学上的推测：普塔“用荷拉斯的心”思想，“用托特的舌头”授封；西阿神代表“知识”，胡神代表“秩序”，这些都是太阳的主要特性；四种精灵是赖(火)、苏(空气)、杰卜(土)和奥西里斯(水)；不可思议和无限广大的神是“天空、大地、农以及在它们之间的每一种东西”，如此等等。至少从新王国起，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认为神祇有统一的必要，这种要求是由于崇拜全国所有的神祇，而有关它们的许多神话、名称和偶像很相似以致无法区别而引起的。著名的阿克纳顿主张只有能看得到的太阳光轮是唯一的真神，这种主张仍然是埃及思想的主流，但就打乱传统来说是一种异端邪说；过去的传统由于考虑到难以理解的神秘性，是接受各种形式的神祇和思想并把它们调和起来的。

寺 院

127

每一位神创建他的市镇，保佑他自己治下的区域以及区域之外的整个埃及。国王同时与全体神祇都有联系。国王既是太阳的嗣子又是荷拉斯的接班人，他的责任就是要维持根据天意所创立的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要支持受威胁的一切神灵，使其免于陷入混乱，要避开女神的愤怒，要与神永远协和以保证流年顺利、尼罗河水上涨、五谷蔬菜丰登、六畜兴旺、叛乱平定、四境平安、百姓幸福、道德高尚、秩序井然。为了实现这个希望，祭祀这门学问就使用巫术的言语、姿势、祷文、塑像和建筑形式以及种种手段来保证死者来世幸福。早期祭司主持的仪式除礼仪外还有一套口头诵祝的固定的语言，并用咒语重述神话中的先例以增加强制力量，把这些仪式的程序和祷文刻画在寺院的墙上以保持仪式永久有效。同样，在寺院周围的圣地内国王的许多塑像和私人的肖像也是为了使他们永远侍奉神，与神同住，从而得到额外的生命力。建筑家仿照宇宙建造寺院，使其具有永久价值：尖塔象征太阳升起的山，黑暗的圣殿是太阳睡觉的地方，廊柱代表原始沼泽，从那里产生万物，墙壁的基础象征埃及的土地。高耸的砖筑围墙把寺院及其花园和礼拜堂围起来，以隔绝可能污染圣地的秽物；要求执事祭司和有权势的人入内务必进行斋戒，并遵守关于食物、衣着和性生活等戒律。为了表示法老确实参加礼拜仪式，镌刻在墙上的图画描绘他顶礼膜拜的情况、还有一系列图画描绘埃及各州、洪水涨落和各种小神支持经济活动的情景。神的偶象——换言之人们通过它与神交往的形象——整天保持圣洁、接受香火、穿着衣裳、供以祭品，然后唱赞歌唤其苏醒，重显神威，恳求他以仁慈济世。在盛大的节日里，神在游行行列中出现，从太阳光中取得神力，拜访已故国王的陵墓和过去的神

祇，并重演一次世界形成的神话故事。[24]

128 总之，寺院首先是国王在高级祭司的协助下举行高级国家巫术仪式的场所，借以保证万事顺遂(首先保证百姓足食)。神祇是世界的主要推动者，距离虽远，仍感到近在每个凡人身边。在新王国时期，老百姓来到寺院的旁门前，或在乡村小礼拜堂，或在能感觉到神存在的古老文物遗址旁，向神祈祷（著名的文物如吉萨的巨大斯芬克斯像通常认为是代表太阳和胡伦的偶像，胡伦是从迦南人借来的治疗百病之神)。赞美诗刻在石碑上，表明小百姓对当地神祇的信仰；伟大的阿蒙神是“公平的裁判者，他听取人们的召唤和恳求”，人们恳求他保佑身体健康和事业兴隆。一些真实姓名告诉我们，在整个历史阶段，各阶级的人们都声称自己受最伟大神祇的直接庇护。而且，尽管埃及的宗教神祇众多，各有专司，祭司们又严守统治国家生活的秘密，但这种宗教特别宽容，人人都可以信奉。在新王国时期，埃及宗教兼并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神祇，把保护妇女和婴儿的神贝斯封为东苏丹的常住神，接受了努比亚的主神德登并把它埃及化，承认阿蒙即努比亚人的山羊神，坚决要库施人崇拜底比斯的神，后来把埃及神与希腊众神等同起来，因而在托勒密王朝时代受到农村地区希腊移民的欢迎。

另一方面，把埃及等同于有组织的理想世界，对法老的子民了解外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他们把非洲各民族和闪米特族以及外国城市和王室都看成是制造混乱、随时准备扰乱宇宙万物的力量。(在象形文字记载中，把所有外国都描写成多山的沙漠!）在寺院大门的两侧竖立着两块相对的石碑，南边的一块镌刻着国王消灭努比亚人，北边的一块镌刻着国王征服亚洲人。[25]在进入寺院内部的甬道两旁刻画着用法术力量歼灭危害秩序的“叛乱者”；在新王国时期，雕刻在外墙上的巨幅系列画，表示胜利的战役和献给神的战利品，也是为了以历史轶事说明君主与神一贯合作，维护宇宙的均衡。这种观点的一种有趣表现是，这种针对亚洲、努比亚和利比亚的君主和民族的巫术仪式，其目的并不想毁灭他们，而是想消除他们的敌对情绪，因而使这种教条的“沙文主义”意味有所减轻。

伦 理

129 完美和谐的秩序已经建立，并由国王加以维持。因此理想的时代就是“赖神时代”。以后时期的祭司甚至幻想曾有一个失去的黄金时代，那时蟒蛇不咬人，蒺藜不刺人，墙垣不倒塌，道德规范统治世界。[26]完善的制度不是乌托邦，不是人们试图创建新的规则所能实现的；它存在于开天辟地之时，当人们符合道德规范时它将重现。这就是说，孟菲斯高级官员(如哲德夫胡，普塔荷太普)和后来许多书吏(阿尼、阿梅内莫普)所写的《教导》中所宣讲的道德观，以及稍后时期刻在寺院里的祭司守则，基本上是承袭上述思想，而那种教导对于发展人们的创造性很少裨益。那些文献同千篇一律的自传和标准化的程式相比很少阐明

---

[24] 我们对寺院象征性设计和装饰以及礼拜仪式的理解是基于希腊和罗马时代建筑和装饰的巨大建筑物(如在伊德富、奥姆波斯、丹达赖，菲莱等地)，关于一般资料见S.索内龙和斯蒂埃林(H. Stierlin)的著作。

[25] 见德斯鲁谢斯-诺卜莱库特（C. Desroches-Noblecourt)和库恩茨(C.Kuentz)著作，第49-57页和注释178-179(第167-168页)。

[26] E.奥托，第93-108页。

新的发现；倒是那些有才能的雕刻师不受传统的约束，刻上个人名字的作品反而显得十分突出。

日常伦理观念把德行与理性、正直与礼貌、肉体罪恶与品质卑劣等同起来。从现实的心理出发，它赞扬对上等人要驯服，对下等人要仁慈。人们认为，世事的成功是德行的必然结果；虽然死后报应的观念早已产生，但为了逃避神的审判，在安葬仪式上使用巫术可以限制这种审判。人们十分重视教育大家好好做人：说话要有节制，举止要文静，待人接物要温和，埃及的雕塑艺术完美地表现了这种理想。所有过分行为都招来损害：一时冲动侵犯别人，就要为自己招来祸殃。但在某些圣贤的思想中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感情，希望个人德行能达到完美的境地。心地正直胜于按时礼拜。人们从神身上找到"人生的道路"。不应低估埃及文化对于圣经的影响。尽管一般多谈社会行为准则，较少谈到慈善的同情心，但是对他人的关心是深切的。历代国王和书吏给我们留下社会伦理方面有益的教训：全心全意地照顾国王及其子民的利益，不要牺牲弱者使强者得利，别让自己腐化堕落，不可在斤两尺寸上弄虚作假。埃及还发扬人类尊严的概念："不要对人施加暴力……他们都是赖神的眼睛所生，是他流出的血"；在《韦斯特卡纸草书》上写的一个著名的故事，说到一位巫师拒绝在犯人身上进行危及生命的实验，"因为不容许对神的子民有这样的行为"。

一幅图画可以代表官方思想体系中的理想的秩序，从各方面来看，这幅图画是指南北两部分重新统一时的国家，那时有强大的王朝和认真的政府来保证普遍繁荣与和平。在第一个中间时期，内战频繁。野蛮人的侵袭和社会环境的突然改变引起焦虑。一个号称安胡的作家哈赫佩尔－松卜在他的《论述》中说，"变化来到了，事情已非去年可比"，必须找到"新词汇"来解释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于是产生了一种悲观主义的文学，其中著名的有《尼弗尔提预言》，此书引起危机竟导致第十一王朝告终；还有和喜克索时代前夕唱诗班领班伊布－乌尔所著的《箴言》[22]，《尼弗尔提预言》和后来出现的《陶工的启示》以及许多驱除邪恶的故事，都斥责颠覆道德秩序的行为，其目的只是为了加速救世国王和道德秩序最后胜利的到来。相反，《亡命之徒与他的灵魂对话》对葬礼的效用表示怀疑，而《竖琴师之歌》则要人们"及时行乐"。在传统的作品中有时也出现一些逗人欢乐的话。如果能把世俗文学更好地保留下来，它可能比国王和祭司的石刻铭文显示更为多样化的思想境界。有些故事如《爱情之歌》，葬礼祈祷室中描述家庭生活的生动有趣的场面，陶瓷碎片上轻松愉快的素描，显示在法老的循规蹈矩的教化以外，埃及人民象今天一样是非常快乐、能干、幽默和友好的人民。

130

法 律

我们已经知道，宗教和伦理着重维护严格的纪律，这种纪律有利于整个平民社会，有利于王室人员在政府和在宗教仪式中独特的活动。艺术本身对一般比个别更感兴趣，对典型的例子比个别自发的事例更感兴趣。从这点来看，法老的法律始终坚持以个人为对象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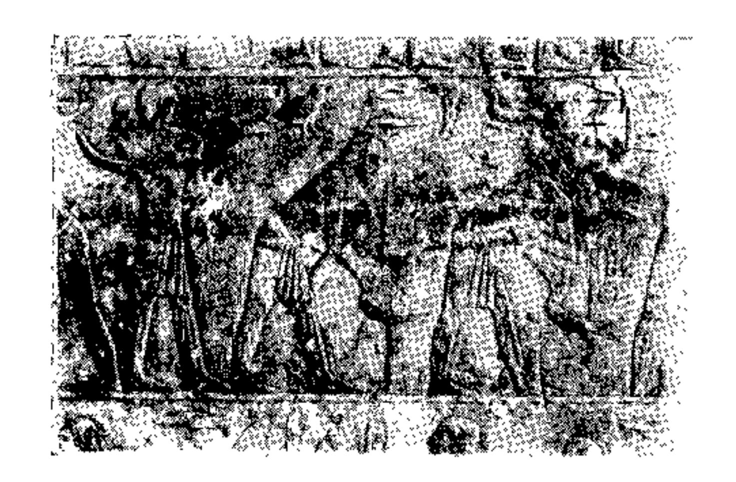
[22] 范塞特尔斯(J. Van Seters)，1964年，第13-23页。

更加使人诧异。在国王旨意以及法律程序和刑罚方面，一切阶级的男女在法律面前似乎人人平等。家庭只限于父母及其子女，妇女享有同等的财产所有权和司法减免权。总之责任绝对由个人承担。大家庭没有法定的实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由他的血统关系所决定。在法律方面，法老埃及与传统的非洲迥然不同，而令人惊奇地成为现代欧洲社会的先驱。

131 丧葬信仰与实践

死后生活的信仰与实践同样因人而异。每个人根据他的财产状况，为自己的配偶和夭折的孩子的来生提供需要的东西。儿子应参加父亲的丧礼，并保证妥善安葬。人(或神)除肉体以外，包含几个成分——卡、巴和其他不大为人所知的东西——对这些成分的性质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还模糊不清。举行葬礼意在保证这些“灵魂”生存下去，但是埃及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灵魂生存与制成木乃伊保存躯体连在一起，并为死者精心安排使其死后生活至少与生前同样方便和快乐。坟墓由上层结构和地下室组成，上层结构向在世的亲属开放，地下室安放死者尸体以及巫术品和家用物品。有钱人的子孙与几代祭司订约，付给固定津贴，由祭司父子相传负责供奉祭品；有权势的人还使用口头或书面的强制力量以及雕刻和绘画的神像来确保按时供奉。在祈祷室里——长方形坟墓或葬室——举行最后的安魂礼和奉献礼；其他图像画出理想世界工作和欢乐的场面；大小雕像用作众多替身。在棺材板上、墓室石头上，供木乃伊保存的《死者书》上都载有入葬时诵读的祷文和经咒，这些经咒能使死者运用其一切官能，避开另一个世界的危险和完成他的神的归宿。与神学相似，埃及人关于死后生命的信仰有许多不同观念同时并存：作为太阳的伴侣而永生；居住在坟墓内，每天黎明时苏醒；化作“巴”遨游太空，享受熟识的物品，与奥西里斯一起生活在无比幸福的天堂。总之，凡是得到隆重墓葬的人将改变他的地位：他与诸神同列，与奥西里斯同列，和所有的国王(每个国王都是一个奥西里斯)同列。

(吴壬林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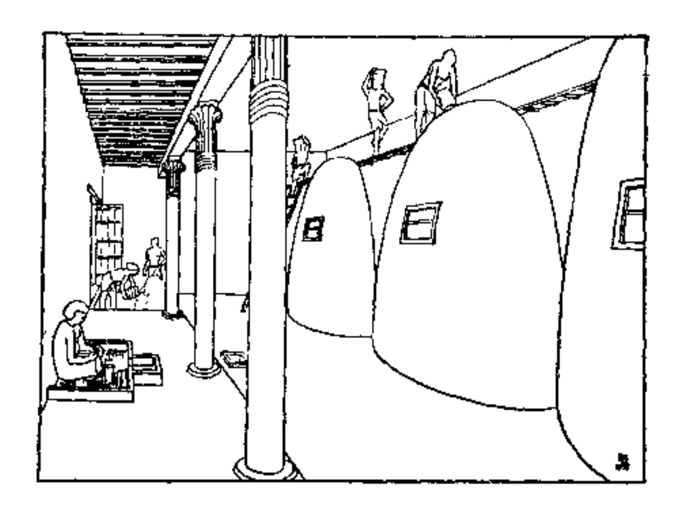


图片 3.1 收获谷物

132



图片 3.2 堆干草



图片 3.3 谷物入仓



133

图片 3.4 结帐



图片 3.5 收获和压榨葡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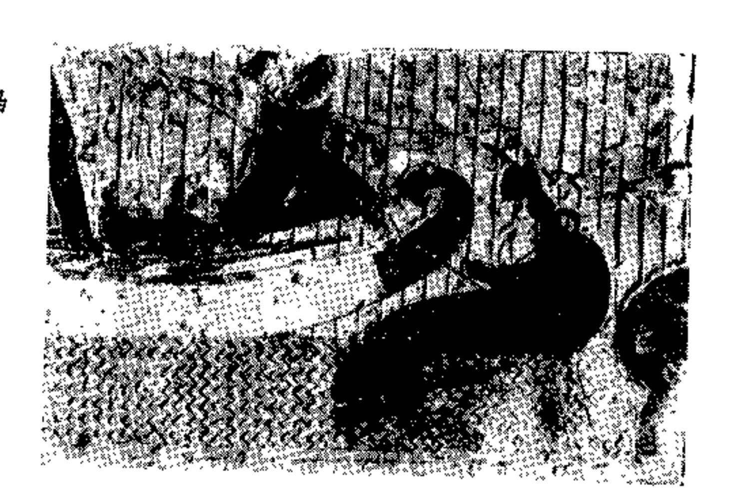
图片 3.6 驯养鹈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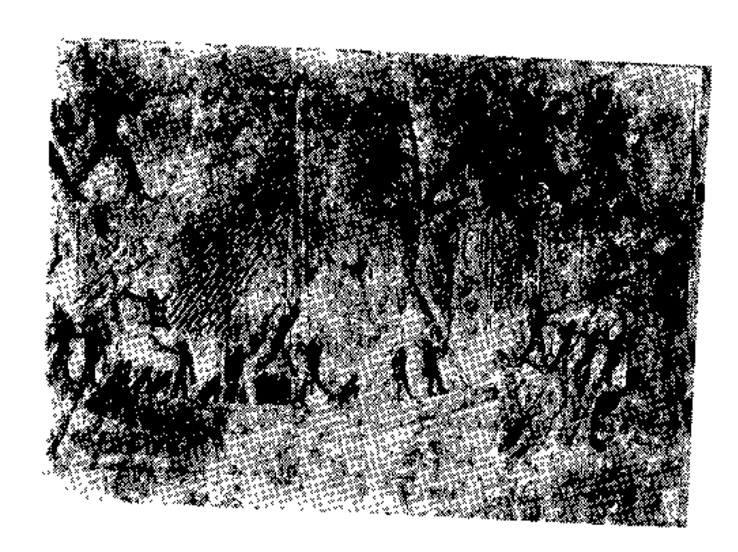


图片 3.7a 捕鱼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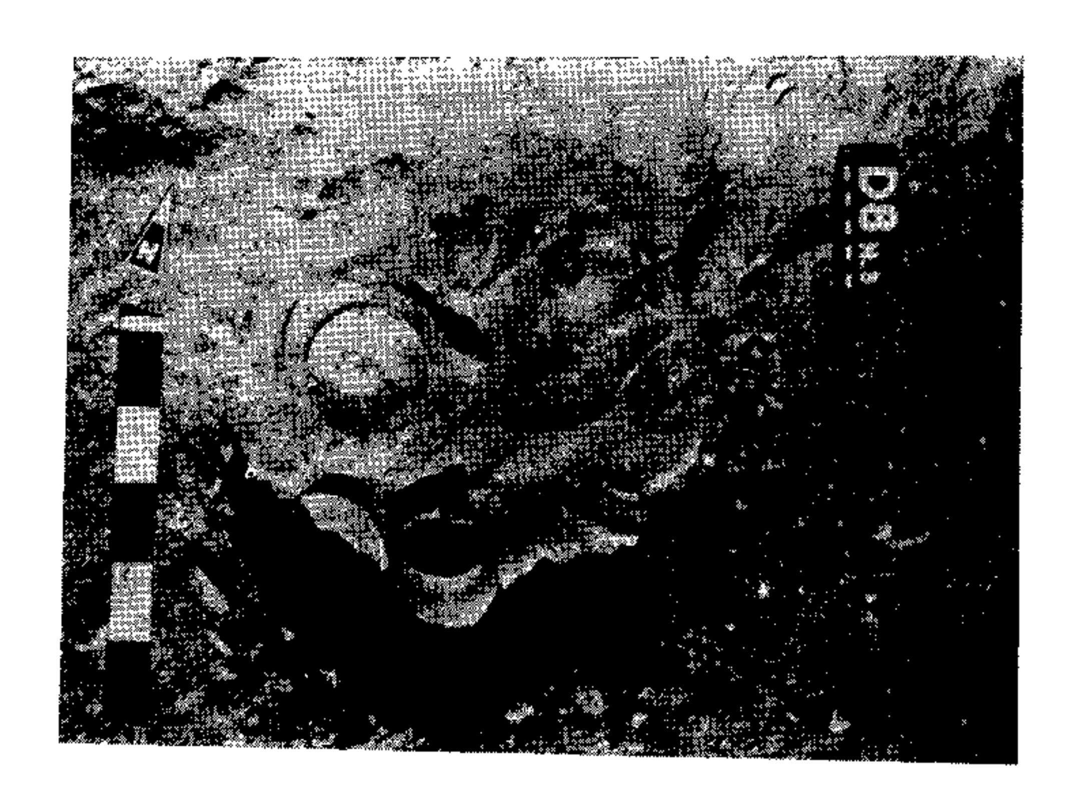
图片 3.7b 捕猎河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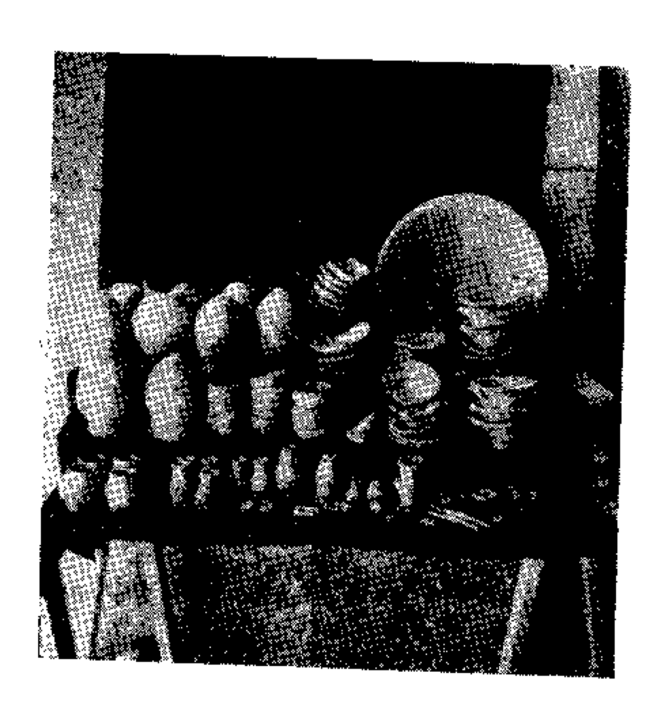




图片 3.8 海军作战

135





图片3.9 法国考古团在苏丹发掘的文物

4 埃及和非洲其他部分的关系

A. 哈迈德·扎耶德
（*J.* 德维斯协助）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考古研究并未发现埃及同麦罗埃以南的非洲有过接触的明确证据。当然这并不排除根据假设提出的理论，但是在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之前，必须仍认为是假设。

几年前，传说在遥远的非洲大陆中心地区发现埃及的文物：在扎伊尔卢阿拉巴河与卡尔梅恩戈恩戈河的汇合处附近，发现我们纪元前七世纪的一尊奥西里斯小雕像；在赞比西河的南部发现另一尊雕有图特摩斯三世（我们纪元前1490－1468年）时期的涡漩花饰的雕像。可是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文物的环境，便表明我们目前还不能断定在我们纪元前七世纪或十五世纪时埃及和上述地区发生过关系①。A.阿克尔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就作出结论，说拜占庭埃及与现代加纳之间有过接触。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在情况不明的基础上就可以作出结论说，在古代，埃及和非洲大陆其它地区之间不存在联系。由于这方面资料缺乏，而一些结论有时证据不足，我们应该更严格地注重科学的精确性，并只依靠我们确信有科学依据的事实。

例如，有人认为在某些方面，埃及的文明对其它非洲文明的影响确实存在。即便这点已被证实，但还不能把这种影响作为古代接触的证据。埃夫·L.R.梅罗维茨以阿肯人选择秃鹰作为自我创造的标志来证明埃及的影响②，她还强调普塔神和阿肯人的奥多曼科马神的关系，两者都是雌雄同体，他们在创造自身以后又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世界。虽然这是有趣的联系③，但不能认为这就是古埃及与古阿肯或贝宁湾地区之间存在过接触的结论性证据。同样，研究整个非洲文化的许多著名学者很早就认为崇拜蟒蛇可能起源于埃及。但这种看法忽略了古代文化与自己的环境密切关联，完全有可能从他们自己的观察中选择崇拜的对象。另外还有一些假设，例如J.勒克朗④曾提到这样的意见，认为崇拜蟒蛇是由印度传到麦罗埃，也许还传到非洲其它地方。这说明采取慎重态度是多么重要。

在讨论古代埃及和非洲大陆其它地区联系的痕迹之前，不论对这种联系是肯定、假定或者否定，我们必须注意，不管我们对古代埃及人民最后采取什么论点⑤，埃及和它的周

---

① 见勒克朗(J. Leclant)，1956 a，第31-32页。

② 见梅罗维茨(E.L.-R. Meyerowitz)，第31页。

③ 这里须加注意的是：自我创造问题并不限于普塔（半神半人，是所有工匠的保护神）。赖神和其他神祇也是一样。一个与此相关联的普通神话肯定存在于埃及各地居民或存在于不同时期。

④ 见J.勒克朗，1956 b，第10章。

⑤ 见本书第一章和开罗学术讨论会的总结。

围文明之间在年代和技术上显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⑥。就地理看埃及文化虽属非洲的一部分，但它同西方及南方区域是隔离的。埃及明显地不信任它的北方邻邦，当它们构成威胁时更加如此。在文化上，法老埃及感到与它的邻邦步伐不一致。它在发展上肯定超越它的邻邦，但原因还不清楚。从那时起，即使政治上的一致持久存在，但由于他们生活方式的深刻差异，也使埃及与它的邻邦逐渐分离。如果我们考虑到埃及人和南方邻邦种族相同这个事实，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思考为什么他们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异——假如我们能发现其原因的话——这样就会说明在尼罗河流域采用文字对于促进社会和文化的统一起了多大作用。研究工作应该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和使用文字书写这个事实仅仅与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即与一个民族的精神有关的重大偶然现象，还是某种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统一达到一定阶段时不可避免的产物？

1974 年的开罗学术讨论会，着重讨论埃及在法老统治 3000 年间种族和文化的稳定性。138 尼罗河流域下游象块海绵，在三十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除几次受到外族强大压力的困难时期外，从周围各地区吸收移入的居民。在西方和南方，不同程度上彼此相关的人民，或者由于埃及的边境城堡不得不住在原处，或者被认为可以任意利用来提供食物或人力以保卫该流域。除了埃及这种特殊意识之外（可能原是社会上等阶级所独有，后来逐渐发展而成的），很难了解埃及人怎样对待他们的紧邻。那些膦邦——象埃及人所接触的其他民族一样——在人力和财力方面为法老文明作贡献，被认为是义不容辞的。纳贡从一开始便是埃及邻邦臣服的标志，不纳贡，便会遭到讨伐。可是邻邦的态度也不是永远屈从和退让。埃及也并不能一直对它们发号施令，它和非洲的关系在各个世纪都有所不同。

西方邻居：撒哈拉人和利比亚人⑦

一般认为在王朝前时期，埃及与撒哈拉经常性的交往衰落了。关于这种交往，甚少了解，有时有人声称它根本不存在⑧。在王朝时期，埃及肯定对撒哈拉发生过影响，虽然对此了解仍很不够⑨。

据最近研究，对埃及人来说，在王朝时期撒哈拉人实际上主要是利比亚人，他们逐渐聚集在北方一个最广袤而荒凉的沙漠里。在新石器时代情况不同，当时沙漠迅速扩展，在王朝时期沙漠更加扩大，迫使利比亚的牧羊人和猎人回到他们先前住处的周围，或者为饥饿所迫去敲尼罗河的天堂之门，使那里的人不得不防御他们。他们的压力不断加大，但除139 了三角洲西部以外很少取得进展，因为那里无疑自古就是撒哈拉居民，而且同属一个种

⑥ 在于戈(H.-J. Hugot)的著作中(1976 年，第 76 页)指出，当埃及在我们纪元前约 3,200 年统一时，撒哈拉正处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他明确地否定这样的假设，即有时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埃及人可能是从撒哈拉移来的（第 73 页）。

⑦ 在此，我要对古代利比亚专题文章的作者 T. 古斯丁斯基教授表示感谢，他盛情地把那篇文章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大方便了本章的写作，我曾几次采用其内容。

⑧ 在开罗学术讨论会(1974 年)最后报告的几节里谈到。最有希望的现代调查之一是以从大西洋到红海的石刻和图画为基础的。这项研究虽然明显地与史前时代特别有关，但获得了大量精确的资料。

⑨ 见 H.-J. 于戈，1976 年，第33 页。作者对仓促作出结论的那些人提出告诫(第 82 页)，例如，那些人从研究撒哈拉石画的某些主题（公羊与太阳光轮，巫师与兽形面具等等)来发现第十八王朝的影响。他说："这表明工作过分草率和简单化，忽略运用科学证据来证实假设的科学态度。"

族。在沙漠包围中的巨大绿洲里——哈里杰、达赫莱、费拉菲赖和锡瓦——埃及贵族从事狩猎活动。他们这样做，是担负原来由国王承担的义务。他们攻击和消灭沙漠里的居民（甚至无害的野兔也在所难免）是想帮助维持宇宙秩序，因为沙漠属于塞特神和原始混沌状态，经常威胁着要回到大地并毁灭由神的意志决定而由法老负责的人间秩序（马阿特）。因而狩猎不单纯是特权阶级的娱乐，它还有深远的宗教意义。

向南往乍得或向北往费赞和尼日尔必须通过这些绿洲，然而至今，我们不能证实这些道路在王朝时期是经常使用的。

对这些道路当然应该进行探索，且不说这些道路固有的经济意义。考古学和地志学应该有可能找出埃及人是否曾利用这些非洲的交通要道，去提贝斯提、达尔富尔、加扎勒河和乍得，或者去费赞和盖达米斯。

至迟从第十九王朝以后，利比亚人就成为经常向埃及提供人力和士兵的后备来源。利比亚俘虏以羽毛头饰为标志，享有战士尤其是战车兵的良好声誉，他们常常被通红的烙铁打上烙印，不使用于规模庞大的集体工程或家务劳动[10]，而是被编入军队。他们在军队中的比例在以后几个世纪中越来越大，并且同其他外来移民——努比亚人编在一起。利比亚人饲养牛群，他们为埃及人的消费供应牲口[11]，或是作为贡品，或者是从他们那里掳掠来的战利品。这样，他们发挥的经济作用比得上努比亚人。

当然，埃及的史家严厉地指责利比亚人的侵犯[12]，在我们纪元前十三和十二世纪，与古王国时期一样，利比亚人为衣食所迫企图进入埃及。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建立起一系列堡垒抵御他们，并俘虏了最大胆的入侵者。利比亚人在两次企图重新返回三角洲西部（他们是从那里被赶走的）失败后，于我们纪元前十二世纪得到拉美西斯三世的允许，可以在那里定居。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在埃及的军事防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我们纪元前十世纪和此后近两个世纪里，利比亚人建立的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王朝统治埃及。这个新情况 140 在上埃及引起强烈反应，上埃及人企图在纳帕塔王国支持下把他们赶出去。这种黑皮肤战士和政界人物与白人战士和政界人物之间的对立，是埃及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局面的开端。而努比亚人的直接反应是由佩耶（即皮安基）建立了埃塞俄比亚王朝。

当考虑埃及和其它国家的关系时，不管是不是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切不可遗忘三角洲当时所起的作用仍然几乎一无所知这一点。在埃及的这一地区，考古发掘的资料很少，因此我们只能作一些揣测。

在王朝时期，三角洲经常受到来自西部、北部或东北部邻国移民的侵扰[13]，有时大量涌入。这种情形经常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埃及的生活。只要回想起埃及和比布鲁斯（极其重

---

[10] 斯尼弗鲁曾夸耀俘虏了 11,000 名利比亚人和 13,100 头牛。

[11] 铭文提到输入几万头有角牲口、羊、山羊和驴子。

[12] 从我们纪元前 3000-1800 年，根据埃及编年史家说，他们能阻止利比亚人入侵。在这段长时间内提到的远征军，都是从埃及到利比亚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揭示了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从我们纪元前 1800-1300 年，埃及资料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13] 开罗专题讨论会特别着重指出，三角洲的古代历史尚待发现。事实上对于史前时期和原始历史时期北部埃及的了解只限于现在的开罗一带，再往南一点就不清楚了。古王国的资料也颇缺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沿海地带有广大地区可能在埃及范围之外。事实上，在第四千纪期间，当埃及国家形成时，下埃及从赫利奥波利斯到法尤姆（包括该地），上埃及从法尤姆以南到卡卜。因此几乎没有包括三角洲在内，而上埃及据说更为非洲化，它的界线在沙石出现的地方（正确地说是努比亚），表示由此已进入另一个世界，人种和政治上都不同，即塔-塞提的世界，称为弓之国。

要的木料供应地）的关系，喜克索插曲，古代希伯来人退出埃及，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袭击，就足以理解三角洲在法老埃及时代经常是一块多事的地方。特别是为了要扩大同非洲、亚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埃及必须强有力地控制三角洲的沿海地段。从法老时期开始，埃及对北方和东北所实行的商业和军事政策，就在某种程度上与对南方的政策相反，对南方，埃及一直想建立联系并深入非洲大陆腹地。在研究埃及这一整个时期的历史时，必须牢记这个重要矛盾。埃及是个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国家，它必须控制一片通往地中海和红海北部的有利空间，从红海北部到尼罗河的第一瀑布以北在这一地区内建立起良好的水陆运输线路，才足以保证尼罗河西部和东部经济区之间不可缺少的连接。然而，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埃及人可能曾被吸引沿着尼罗河向内陆伸展，至少远达第四瀑布地区。他们141 当时也许碰到过本书其他章节中所描写的那种困难。他们也可能想穿越通向尼罗河左岸的古老河谷到达乍得，或者到盛产象牙的埃塞俄比亚。向南伸展的主要障碍也许是广阔的沼泽地带，它使埃及人难以到达和跨越，致使尼罗河流域发源地区在整个古代成为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今天尽管我们能够很容易追溯到埃及与北部关系的历史，以及红海与尼罗河之间的运输路线，然而有关古埃及与遥远南方内陆的关系，考古所得的资料却极为贫乏。

因此，我们目前只能依靠文字记载、语言学、人种学或者简单的常识作各种可能的推测。但是长久以来埃及学学者一直把埃及历史看作是属于地中海和白种人的范围，现在有必要改变研究方法和所依据的材料，特别是改变研究工作者的思想，这样才能把法老国家重新纳入非洲的范畴。

南部的邻居：埃及人、上尼罗河流域人，他们同非洲的关系

最近考古发掘的资料（一般尚未发表）非常明显地说明，喀土穆地区和下尼罗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十分近似，但难以说明其原因。

然而到了古王国时期，这种明显的近似不再存在。早在第一王朝时期埃及已建有保卫南部的堡垒抵御南边的邻邦。在他们漫长的共同历史中，政治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冲突越来越把第一瀑布以北地区和第四瀑布以南地区相互隔离开来。不过，埃及人和他们称之为涅赫西人的南部邻邦之间的关系尽管复杂多变，却从未完全断绝。

埃及人对于下努比亚和更南的尼罗河地区始终很感兴趣，这是因为前者是黄金的产地，后者是经由白尼罗河、撒哈拉谷地或者达尔富尔通往非洲内陆的道路。在整个埃及历史中，通向南方始终是最关心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明，埃及人为什么那末重视控制西部的绿洲，因为它是和尼罗河平行的通向南方的另一条道路。

142 从古王国初期起，苏丹就象利比亚一样，是埃及人力⑭、牲畜和矿物的来源地⑮。以

⑭ 法老斯尼弗鲁宣称，他从南方叫塔-塞提的地方带回 7000 人（塞提是古代的弓）。见加德纳（A. H. Gardiner）著作，1950年，第 512 页。塔-塞提意为“携带塞提弓的人的国土”。令人感兴趣的是，一直到刚果河流域，所有苏丹部落的人都携带这种弓。

⑮ 从我们纪元前 2500 年起埃及人就在瓦迪哈勒法以南的布亨建立熔炉，熔炼当地的铜。

箭术闻名的努比亚人在埃及军队里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也作为农业劳动者被带入埃及（例如在中王国时期，法尤姆地方一些村庄就叫努比亚人村），很快被埃及的社会－文化生活所同化。可能到了第一王朝之末，努比亚发生了变化，非常可能从此打乱了它与埃及的关系。G族群的缓慢兴起（似乎到了第五王朝时期才完成这一过程），使我们对这些关系的了解中断了五个世纪之久。

埃及人在第五王朝之末开始同苏丹建立关系。就在这个时期设立一个新的管理政治和经济的官职，叫作南方总督。这个长官负责保卫埃及南大门，组织贸易，便利商队往来。这个官职要求有一定的条件，包括具有贸易知识和懂得当地居民的语言。在第六王朝时期，南方总督乌纳斯，负责从努比亚各地区征募士兵：从伊尔泰特、马贾、亚姆、瓦瓦特、和卡乌等地来的涅赫西（即努比亚人）。

在古王国结束时，埃及和苏丹的贸易关系中断。然而在米拉的伊德富王公陵墓墙上的铭文，提到把谷物运往瓦瓦特以防饥馑。这件事足以证明埃及同努比亚的关系在那个时期仍继续存在。而且在第一中间时期努比亚士兵还在一些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在留存下来的有一队40个努比亚弓箭手的彩色木制模型，这说明埃及人对苏丹士兵很重视。

可是，这一时期在下努比亚发展的C族群，也象第一中间时期的动乱一样，可能是造成埃及和苏丹关系衰落的原因。

C族群仍然很少为人所知。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他们是逐渐渗入尼罗河流域的，但是，现在人们相信他们正是A族群的后裔。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民族和埃及人的关系一直不好。在阿戈达特（厄立特里亚）巴拉卡湾旁边的凯坎山附近发现的几件陶器现在陈列在喀土穆博物馆。这些陶器和在下努比亚发现的C族群的陶器很相似。C族群人民曾否约在第十二王朝期间由于某些尚未明了的原因（干旱，埃及军队到达努比亚）而放弃下努比亚呢？这些民族当时可能曾经离开在瓦迪阿拉基河谷的家园，到今天贝札部落居住的红海山地去。同样，在科尔多凡以南努巴丘陵地带，现在居住着一些讲努比亚语的民族。因此可以假定苏丹经历了一场C族群从北方向南和向西的移居活动。 143

在南方，凯尔迈帝国较少受到埃及直接的入侵影响，但从我们纪元前2000年起却受到埃及文化方面的影响。然而，它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直到我们纪元前约1580年帝国消灭。埃及人逐渐把这一从我们纪元前2000年就知道的文化名为库施，但是到我们纪元前1700年以后他们把这个名字用来专指在第二瀑布以南建立的王国。

在中王国初期，埃及国王因受到亚洲贝都因人的威胁，似乎曾向苏丹的居民要求援助。第十一王朝的创立者门图荷太普可能是黑皮肤人。如果确是如此，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向苏丹求援，并可以证实在第一中间时期中断了的埃及和苏丹的关系已经恢复。很可能有一些埃及人越境到达苏丹。从在布亨发现的石碑上[16]，我们得知在中王国时期有几个埃及家族长期居住在努比亚。他们仍用埃及姓名，但崇拜当地的神[17]。那个时期的国王在

⑯ 见韦库泰（J. Vercoutter），1957年，第61–69页。近来对J.韦库泰在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年份表有争论。J.韦库泰现在认为这石碑更象属于第二中间时期，几乎与喜克索同时。

⑰ 见G.波泽纳，1958年，第65页："这个国家（库施）是法老国家的殖民地。有许多世纪，它的风俗、语言、信仰和制度都受到埃及文明的影响。努比亚的整个历史带有北方邻国的痕迹。"

努比亚建造了14座堡垒，以保卫他们的边境和商队。

当喜克索人夺取了埃及的北部和中部时，库施加强了它的独立性和力量。库施王国成为法老的潜在危险。新近发现的埃及文献表明，在推翻喜克索人的战争中，第十七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卡莫斯得到报告说，俘获了一个由喜克索国王派往库施的信使，请库施王与之结盟，共同反对埃及人。在第十八王朝时，对苏丹的压力又一次变得十分强大，双方关系扩大到空前规模[18]。与此同时在第二和第四瀑布中间地区埃及化的趋势增强。到了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期间，这一地区坟墓的式样改变了。埃及式的坟墓代替了古塚，造小型金字塔的坟墓(例如在代尔迈迪纳所发现的)代替了石墓。此后布亨城和阿尼巴城的建设仿效埃及的城市。同样在苏丹坟墓中还发现雕刻着巫沙布提和圣甲虫。王公们墓上雕刻的肖像和名字都是典型的埃及式样。在图坦卡蒙统治时期，阿尼巴王公赫卡尼弗的墓[19]很象埃及石墓。辛普森甚至假定这个陵墓上面原来盖有与代尔迈迪纳坟墓同一式样的金字塔。在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统治下，代拜拉王公祖蒂希特普的坟墓与底比斯城的坟墓相仿。

144

在此之前努比亚同埃及的关系从未这样密切。我们纪元前1400年索利卜的寺院建立起来。苏丹人在军事上，有时在行政方面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在埃塞俄比亚王朝统治埃及时期，苏丹人所起的作用达到顶峰。尼罗河上游的居民虽已埃及化了，但并没有变成埃及人。他们的文化虽具有埃及的形式，但仍保持其不同的特点，甚至到第十三王朝时仍是如此。

后一种文化使埃及成为具有更多非洲色彩的国家，这在《圣经》里有所记载。第一处，上帝保佑希伯来人免遭亚述人的袭击，使亚述国王作了一个梦，让他害怕埃塞俄比亚国王提尔·哈卡[20]反对他。第二处，希伯来国王赫泽基亚寻求与法老和他的人民结成联盟[21]。

这些是最后的伟大的团结时刻。

亚述人征服底比斯和麦罗埃帝国在南方兴起恰恰是在同一时间。这个地区越来越需要防御来自北方的攻击，因此埃及军队此后召募大批的希伯来、腓尼基和希腊雇佣军。由于缺乏必要的研究，尼罗河流域的新帝国和埃及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知极少，但可以肯定关系很坏。

蓬特

正如对非洲历史的其它问题一样，为了确定传说中蓬特国土的位置，曾花费大量笔墨，但那些文章的质量不一定都很高。埃及至迟在新王国时期与这个国家发生过关系，在代尔拜赫里发现的图象说明了这一点。人们曾推测这个国家位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赞

[18] 这个时期埃及的肖像画在描绘非洲黑人时有重大变化，原因不明。有许多假设，其中之一大意是那时埃及人扩大了与大陆其他部分的接触。

[19] 见辛普森(W.K.Simpson)，1963年。

[20] 《列王记》，19：9，和《以赛亚书》，37：9。

[21] 见里奇霍尔(W. Reichhold)。作者对《以赛亚书》第十七章中关于遣派一位特使到黑人法老那里去那一段有趣的话翻译如下："去吧，你们这批行动迅速的使者，去往高大乌黑的人民那里，去往威镇四方的人民那里，去往强大而无往不胜的那个国家，那个河流纵横的国家"。

比亚地区等等地方㉒。今天几乎一致认为蓬特的位置是在非洲之角，虽然它的确切边界仍然难以确定㉓。一个有吸引力的见解，说它位于非洲海岸从索马里北部的波伊蒂亚莱河到瓜尔达富伊海角这一地带。这是一个多山地区，有阶梯形的种植园，这使人回忆起代尔拜赫里图象中所描绘的情景。在这些台地上种着许多树，包括生产香料的香脂植物。 145

在今天称为戈卢因的地方有一个可能曾停泊过哈特舍普苏特女王船队的小港，就是在那里古代埃尔法斯河流入海洋。这个小港的位置以及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的船队驶向蓬特的说法使人认为埃及曾利用海路与外地交往。近来，R.赫佐格试图否定这种说法，认为埃及与蓬特的关系限于陆地往来，这个论点引起强烈的反响㉔。

最近的研究㉕，在古赛尔（位于贾苏斯干河口处）以北的红海海岸发现埃及和蓬特接触的遗迹。有一块碑文发现者将其内容翻译如下："上下埃及国王赫帕卡尔㉖被赖神的儿子亨提赫提神所爱，塞索斯特里斯被普温特〔蓬特〕的情妇哈索所爱"。另一碑文中有这样一段："……愿蓬特的宝藏平安地到达那里，平安地回来。"这些碑文加上其他证据，证实到达蓬特的远征队是由海上去的。遗憾的是，发现这些碑文的地方并不能指明蓬特土地的地理位置。

因此，看来主要在下列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即埃及的船只曾驶往蓬特，其目的在寻求过去由阿拉伯半岛南部所提供的贵重香料和其它许多产品。曾有人试图找出这些船只航行的路线㉗。

有人认为有几个法老企图到达更远的地区。《哈里斯纸草书》上曾描写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派往蓬特的一支远征队："船队越过穆加德海"。这支船队到达瓜尔达富伊海角以南，可能远达印度洋的哈丰海角。但是这个地区风暴凶猛，这条航线相当危险。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作出结论，瓜尔达富伊海角是去蓬特船只的最南点，而蓬特的南部边界就在这个海角附近。至于它的北面边界，可以说各个世纪都有变化。

P.蒙泰对这个问题另有一种看法，他写道：㉘蓬特的疆土肯定在非洲领域，因为根据赛伊斯时期的石碑记载，如果蓬特山区下雨，就会影响尼罗河区。蓬特的区域还扩展到亚洲，因为"亚洲的蓬特"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这是在索利卜发现的唯一例证（到现在为止尚未发表）。根据这两种迹象，我们可以把这个神的土地的两岸看成曼德海峡的两岸。另一证据是香脂树在阿拉伯费利克斯和在非洲生长得同等茂盛㉙。

我们能够追溯到埃及和蓬特关系中连续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统治之前。那时，埃及人对蓬特所知极少。他们从中间人那里买到香料。这些人为了抬高香 147

㉒ 见赫佐格(R. Herzog)，1968年，第42–45页，书中列举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说法。

㉓ 同上。

㉔ 例如见基钦(K.A.Kitchen)，1971年。但是，新近在蓬特与埃及之间的几个国家的考古发现，不能证明R.赫佐格的论点就是错误的，如果不对他的假设进行彻底研究的话。

㉕ 见阿卜杜拉·哈利姆·赛义德(马纳伊姆)〔Abdel-Halim Sayyd〕，1976年。

㉖ 这是指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约在我们纪元前1970–1930年），而埃及文献提到远征蓬特是在古王国时期，比这里所指的时期要早得多。

㉗ K.A.基钦曾试图这样作，1971年。

㉘ 见蒙泰(P.Montet)，1970年，第132页。

㉙ 见K.A.基钦，1971年，第185页。作者指出，如果只是由于蓬特特产的动物中有长颈鹿的话，这个论点是难以接受的。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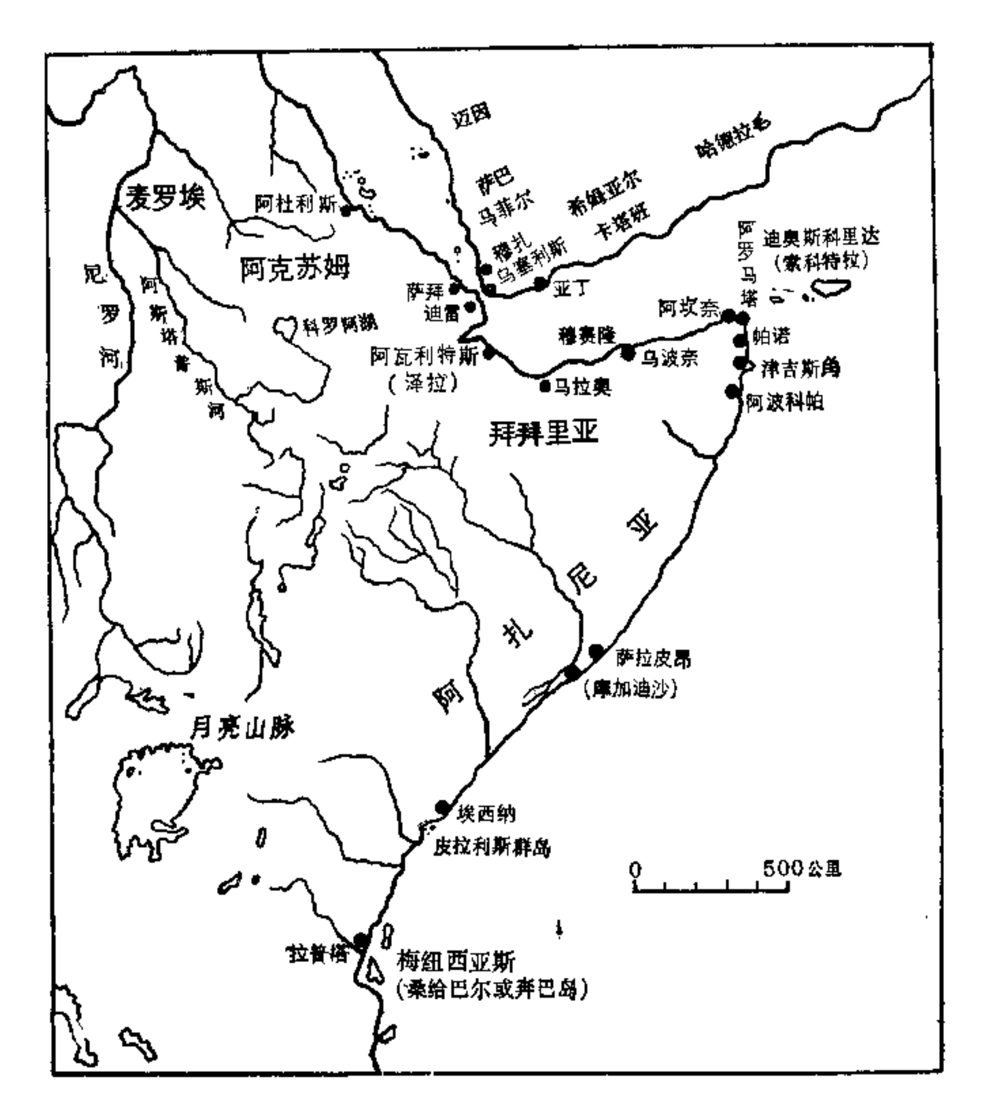


插图 4.1 古代非洲之角和邻近地区

料的价格，广泛传播关于这个国家的种种传说。仅少数埃及人航海到蓬特，他们被称为勇敢的人。在古王国时有一个阿斯旺人说："我和我的主人，领主和财政官，代表胡伊神和塞提神的领主和财政官，一同去库施、比布鲁斯和蓬特共 11 次"㉚。第二阶段始于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期，根据修饰代尔拜赫里寺院的艺术家的绘画来看，有一支五条船的船队被派去运回香脂树。佩里胡和他的妻子(她是畸形的)㉛、女儿以及一群当地人一起迎接船队和互致问候，礼物和产品都来自蓬特，并清楚地画着三棵大树种在阿蒙神的花园里，树高到牛能在树下走动㉜。树下堆放着其他礼品，如象牙、玳瑁壳、长角牛和短角牛，"树根裹着原来泥土的没药树，如同现代高明园丁那样的移植树木，还有干香料、乌木、豹

㉚ 见布雷斯特德(J.H.Breasted),1960 年，1,361 段。

㉛ 主要由于她臀脂过多。

㉜ 见狄克森 (D.M.M.Dixon),1969 年，第 55 页。作者发现哈特舍普苏特远征队带回到她寺院里的没药树种植成功只是暂时的。"尽管有部分和暂时的成功，但移植试验失败了。失败的真正原因只有在弄清这种生产香料的植物之后，才能明白。这一点根据传统的埃及说法是办不到的。同时，有人认为为了商业上的利益，蓬特人可能故意阻挠埃及的试验。"倘若这成功是暂时的，哈特舍普苏特之后的一些国王就不会继续输入这些树，但事实却不然，例如阿门霍特普二世仍输入这些树(见底比斯第 143 号墓)，拉美西斯二世和三世也都命令这么做。

皮、狒狒、黑猩猩、灵猩、一只长颈鹿等……。”

在代尔拜赫里同一寺院的一间内室里，有一幅哈特舍普苏特的圣诞画，画中她母亲雅赫摩斯被蓬特香料的香味熏醒。这里，把蓬特这个国名和她的降生相联系，是埃及女王和蓬特(它的人民崇拜阿蒙神)之间关系友好的明证。

有关这批船队的画告诉我们蓬特的风土人情，它的动植物和居民以及建筑在棕榈树、乌檀树和香脂树丛中的很多锥形的茅屋。

从各寺院里描绘蓬特的绘画来判断，在哈特舍普苏特女王政权以后没有什么新东西可报道。那时的文献提到蓬特人到达埃及。此后蓬特人被列为被征服的民族，但考虑到蓬特相隔遥远，这似乎不可能。法老要求蓬特的酋长们进贡，他命令一位下属官员接待他们并 148 收受其贡品。有一些证据说明蓬特人和埃及人在红海港口进行贸易，从蓬特来的货物在红海和尼罗河之间通过陆路运输(见底比斯阿蒙－摩西墓和第 143 号墓)。

到了拉美西斯四世统治末期，与蓬特的关系终止。但是对蓬特的记忆，仍留在埃及人的心中。

在这些说明古代关系的证据中，也许还应该补充一件事实，那就是现代索马里人叫头靠为“巴奇(barchi)”或者“巴基(barki)”，这个叫法与古代埃及人的叫法相同。此外，索马里人叫新年为法老节。

非洲的其余部分

一个民族或者他们的领袖尽力和其他各国建立关系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归根到底可以归纳为简单的几句话。各种“需要”是探索和努力建立巩固关系的动力。埃及需要非洲的物产：象牙、香料、乌木，更经常的是木材。就木材来说，近东显然是另一个来源。固然，使用来自非洲内地的木材早已成为事实，但对埃及的文物还是有必要作全面的估价。

埃及同非洲的关系，常常被认为是单方面的，即埃及文化扩展到国外。这就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在物质上有赖于非洲出售给它的某些物产。因此，影响是相互的。在这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调查研究的任务是艰巨的。从遥远的王国时代到埃及出现希腊人时代，这期间生态发生了变化；需要根据考古学和语言学进行长期辛勤的探索，才能从古代文献和画象中重新勾画出古代货物交换的情景，而这些文献和画象充其量只能提供间接的证据。近年来从考古学获得的知识，例如关于很久以前黑曜矿的贸易（它在史前时代是价值很高的矿物)，提醒我们研究问题应该耐心和慎重，但同时也给我们以希望，可以由此获得我们今天所梦想不到的成果。

法老尼科二世时期(我们纪元前 610－595 年)，非洲海岸的一支海上考察队引起研究工作者的注意，但是对于希罗多德在一个世纪以后所报告的这些事实的历史准确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

> 利比亚除了与亚洲接壤的边界外，明显地被海所包围，就我们所知，这一点首先被埃及国王尼科斯证实。当他完成了从尼罗河到阿拉伯湾的运河时，他派遣腓尼基人乘船前往，责令他们回航时要经过赫拉克勒斯柱进入北部海而后到达埃

149　及。于是腓尼基人从红海出发，驶过南部海；每当秋天来到，不论船到达利比亚什么地方，航行暂停，上陆播种，等待收获，到谷物收完，他们又继续航行。如此两年过去，到了第三年，才绕过赫拉克勒斯柱回到埃及。他们说(我虽然不信，但是有人相信)在环行利比亚时，太阳在他们的右边。

关于利比亚的最初知识就是这样得到的。[33]

当然，上述的利比亚指的是全部非洲大陆，赫拉克勒斯柱就是直布罗陀海峡，而腓尼基人是从他们本国出发，它刚被尼科二世征服。因此，问题仍未解决。J.约约泰[34] 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和它描写的内容。在法国新近还成立一个名为蓬特协会的机构，目的是乘坐按照古代埃及技术特地建造的船，再次进行象希罗多德所描写的非洲旅行。但是有许多怀疑论者认为希罗多德这条航线不符合环绕非洲的航路，甚至有人否定这件事的全部真实性。如同汉农的航行一样，研究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争执，也许还远远没有结束。

尼科二世，在法老世系中出现很迟，他还作了其他很多工作。后世认为他曾建筑第一个伟大的运河工程，但是这条运河经过的路线在历史学家中仍然是个疑团。这条路线也许想要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看来更象是从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这条运河确实通航了好几个世纪。在伊斯兰地区，这条运河对埃及和阿拉伯之间的交往起很重要的作用。

哈库夫代表佩比二世从事的远征引起了互相矛盾和难以令人接受的结论。我们能把这次远征说成是为满足好奇心和对外国物产的爱好吗？哈库夫（下文还要提到[35]）从亚姆地方带回一个会跳舞的矮人献给佩比二世。由此往往从站不住脚的假设得出结论，说那个矮人是俾格米人[36]；用这样一个独特的例子，来证明埃及、上尼罗河和乍得之间关系的存在。150　哈库夫的远征是历史事实，而其他许多事情则或多或少属于传说或虚构。[37]首先，对俾格米人古代的聚居地了解太少，在上尼罗河流域发现大量俾格米人的这种假设是危险的[38]。其次，说这个矮人是俾格米人没有证据，最后，亚姆地方究竟在哪里仍未能肯定。[39]

如上所说，把它说成是科学好奇心或者对外国物产的爱好，既不能证实，又前后矛盾。人们常常从埃及图画中出现非洲动物而作出论断，根据目前我们的知识，这绝对不能作为埃及与非洲腹地存在关系的最终证据。类人猿、图斯的神圣动物，荷拉斯礼拜奥西里斯的仪式中祭司所穿的法衣和法老的外衣所需的黑豹皮，可能来自邻近各国或者从商人的偶然交易中得来。必须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要调查编年史，调查埃及古籍和图象中涉及各种动物的数量和质量的意义，我们才能对埃及人对非洲知道多少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埃及和非洲的关系不管是由于需要还是出于好奇心，目前所收集的证据还远不足信，而且众说纷纭，就我们目前的知识来说，很难作出任何结论。但是在我们面前有许多途径，可以

---

[33] 见希罗多德，IV，42。

[34] 见J.约约泰，1958年，第370页。

[35] 见本书第8、9、10、11章。

[36] 见P.蒙泰，1970年，第129页。他对这个主题发表的见解要谨慎得多："在哈库夫以前，一个叫巴韦尔德的旅行者带回一个会跳舞的矮人，是蓬特地方的土著。"

[37] 见吉居斯(M.Girgus)。

[38] 关于俾格米的居住地有多种说法，见普雷奥(C.Préaux)，1957年，第284-312页。

[39] 见R.赫佐格，1968年，他的意见是哈库夫到达的地区是斯瓦迪沼泽地带或达尔富尔丘陵地带。见塞维-泽德尔贝格(T.Säve-Söderbergh)，1953年，第177页。他认为亚姆国土是在第二瀑布以南，并认为尼罗河以南的"利比亚"绿洲，可能作为远征队南去的整休站，这种远征队是未来的达尔富尔商队的先驱。

进行有成果的研究。

因此，虽然提出一些假设并强调需要作进一步研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读者切不可有这样的印象，即假设与尚待研究的东西是可以接受的，更不能认为是得到证实的。

埃及人能否利用尼日利亚的锡，这是可以怀疑的，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怀疑过。在古代有两个已知的遥远的锡的产地：康沃尔和东印度。假设诺克锡制品来源于包奇的古代锡矿，而在尼罗河流域有销售市场，这难道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假设吗？[40]目前这还是纯粹学术上的假定，但它是一个值得调查的问题，因为如果能得到证实的话，就将对古代埃及与非洲更南部地区发生过关系提供有力的证明，而这点现在还难以理解。为此必须从各个方面并依靠所有学科的帮助认真考察在达尔富尔和加扎勒河等往来必经地区可能留下的各种遗迹。在这方面，跟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几乎每件事都等待去做。人类学家经过长期和艰苦的调查研究，可能对这个难题提供较多的证据。 151

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埃及人发明的有柱脚的头靠曾否随着埃及文明的扩展传到非洲其他地区[41]。对此仍须谨慎，切不可随声附和。非洲独有的这种和其他种头靠都来源于埃及吗？远离非洲的其他文化有没有这些头靠？这些头靠的产生是否出自人类本能，因而有可能是由相隔甚远的不同地方自行发明的呢？

在另一领域，有些研究人员轻率地作出结论，认为非洲任何形式的神圣王室都来源于埃及，这是古代埃及和它的非洲的创业者[42]有婚姻和历史关系的结果。这种结论是正确的吗？难道我们不可以认为他们是在各不相同的时间自己发展起来的吗？

崇拜山羊(阿蒙的神圣动物)是经过什么路线传播的呢？这种动物在库施，在撒哈拉，在约鲁巴人和丰人中间都受到尊敬。对目前所有这些相似和出现的事物都必须记下来，不要急于下结论。[43]

在许多方面可以指出古代埃及的技术、风俗习惯或信仰和非洲较近代出现的一些技术、风俗习惯和信仰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最明显和最引人注意的一个例子是人体的灵魂（古代埃及称为卡），埃及人和今天许多非洲社会都很重视。例如在班图人、乌勒人或阿肯人中间，他们心目中人死后灵魂的形状，很容易使人同法老时代埃及人的观念联系起来。[44]

早已有人指出，多贡人把巫术陶器埋入地下。决不是只有他们采取这种做法。有人把这种习俗与埃及人的习俗相比，他们把刻着敌人名字的陶器碎片盛在碗里，埋在特定的地点。还有埃及的埋葬仪式和巴克里所描述的十一世纪加纳国王的仪式相仿佛。 152

几十年来，在或多或少科学性的研究中积累下来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几乎不胜枚举。语言学也为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可是目前在这方面多半是提出某种可能性，肯定的

---

[40] 反对此一假定的意见，见谢弗(Schaeffer)在《埃及考古学杂志》发表的文章。在他看来，埃及人用的锡来自叙利亚。

[41] 关于古代埃及人柱脚头靠的一项解释和使用头靠所显示的人种上的近似，见帕林德尔(G. Parrinder)书中哈米(E. T. Hamy)的见解，第61页，文中为我们提供了非洲头靠的很好实例。这个头靠现存英国博物馆。另一个在费赞发现：见丹尼尔斯(C.M.Daniels)著作，1968 b。

[42] 见奥利弗(R. Oliver)和马修(G. Mathew)著作中亨廷福特(G. W. B. Huntingford)的见解，第88-89页，和戴维森(B. Davidson)著作，1962年，第44页。

[43] 见温赖特(G.A.Wainwright)，1951年。

[44] 见索内龙(S.Sauneron)，巴黎，1959年，第113页。他指出此种联想是有趣的，但主张应该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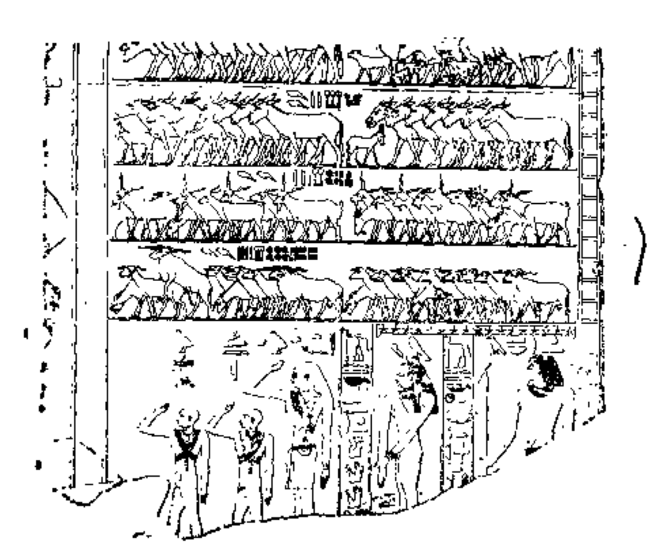
结论很少。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埃及的文明很可能对较近代的非洲文明有过影响，至于影响达到什么程度仍然很少了解。在试图估计这种影响时，也应当考虑非洲文明反过来对埃及有多大影响。绵延五千多年的影响并不能证明这一期间都有接触；同样，接触的一些痕迹也不能证明接触连续不断。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

总的说来，法老时代埃及和非洲大陆的联系是今天非洲编年史学家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要求为大量科学或哲学的假设提出证据，例如，古代埃及人毫无例外都是黑皮肤这种假设能否成立，扩散主义的理论能否成立。它也对研究方法提出疑问，例如，关于某些发明的传播，铜或铁以及通常用来写字的纺织品如何传播等等。凡此种种都令人怀疑（迄今许多人安于假设），一个孤立的研究工作者，没有有关学科的帮助，能否在如此广阔的领域里获得成功。

无论从哪种观点看来，这个问题都是对非洲学者的科学态度、精确性和坦荡胸怀的重大考验，他们将在外国研究人员的帮助下，努力争取比过去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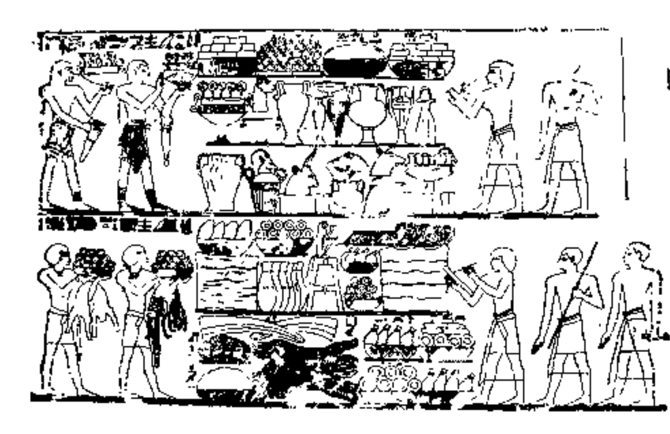
（吴壬林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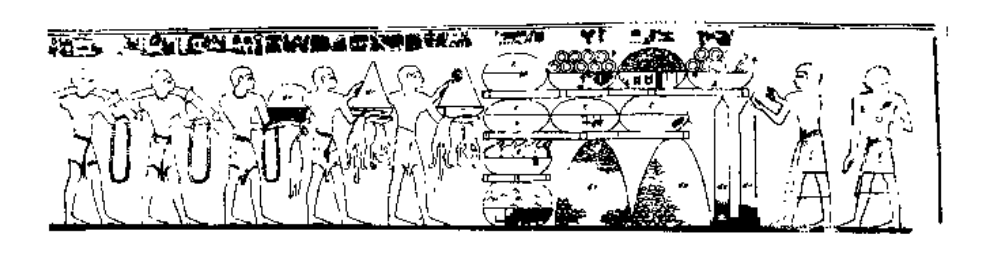
图片4.1 古王国利比亚战俘的贡品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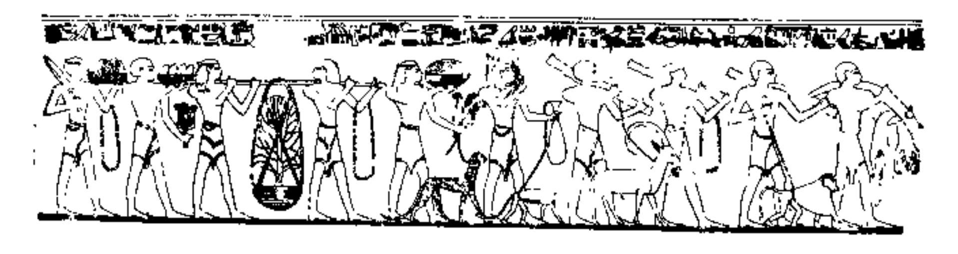
图片4.2 塞提一世杀死利比亚的一个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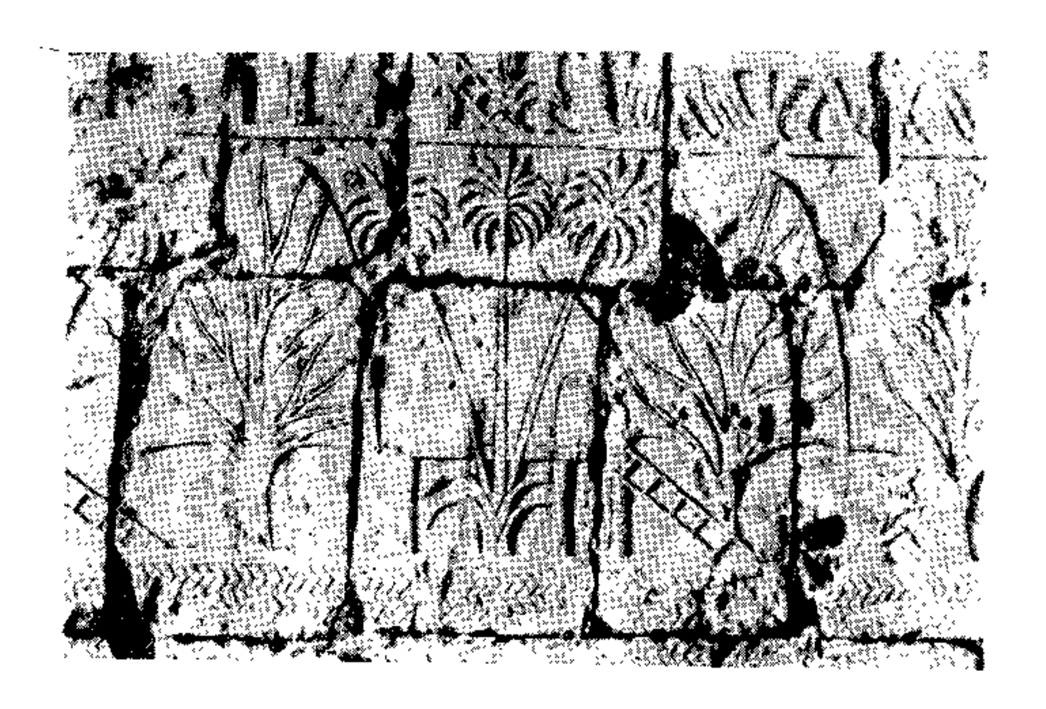


图片4.3 雷赫米赖墓壁所绘的努比亚贡品





图片 4.4 蓬特的贡品



图片 4.5 蓬特地方的房屋

5 法老王朝时期埃及的遗产

155

R.纳杜里
(J.韦库泰协助)

不难发现，法老王朝时期的埃及在历史、经济、科学、艺术、哲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世界作出了宝贵贡献。这些领域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专家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遗产的重要性，虽然往往无法确定它是怎样传给相邻或后来的文化的。

可以确定，对人类历史至关紧要的这一遗产(至少是有关它的种种证据)，大部分首先传到古希腊－古罗马(希腊更早一些)，然后才传给阿拉伯人。但在我们纪元前1600年或在此前后，希腊以前的人和希腊人都和埃及人并无接触；他们和埃及人建立密切关系是在我们纪元前七世纪，那时希腊的冒险家、旅行家、后来还有移民纷纷来到地中海盆地，尤其是来到埃及。同时，希腊人和他们的祖先在我们纪元前第一和第二千纪就已接触了小亚细亚的文明，进而接触古美索不达米亚世界(前者与后者一脉相承)。因此，要确定这种或那种发明创造或技术的文化策源地即首先出现在亚洲或埃及(两者的关系很密切)，往往极为困难。

此外，由于难以确定远古时期历史事件的年代顺序，关于某一思想首创于谁的判断也极不可靠。碳-14测定法过于含糊，误差常达一两个世纪；在知识始终迅速传播的历史背景下，它无法判定首创者究竟是亚洲世界还是非洲世界。最后还有一点，不约而同地作出某种发明的可能性也不能忽视。只需举一个例子：很有理由相信(见导言)，文字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几乎是同时出现，而不一定是一种文明影响另一种文明的结果。

尽管这样，埃及为后来兴起的文明、特别是非洲古代文明所留下的遗产却不可低估。

史前时期埃及的贡献

156

埃及取得的最早和最显著的进步之一是在经济方面。新石器时代末期，即在我们纪元前5000年左右，古埃及人逐渐改造了尼罗河流域(见第一章)，当地居民于是从采集食物的经济进步到生产食物的经济。人类在尼罗河流域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重要过渡，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农业的发展使古埃及人得以聚集成为村落，过一种安定的、一体化的生活，而这种状况不仅在史前时期促进了他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而且在王朝时期也是如此。

过去曾经认为亚洲在新石器革命时期起了独一无二的主要作用(见本书第一卷第二十七章)，但这一点并不能肯定。不管情况怎样，这个新石器革命在尼罗河流域产生的初步结果之一便是使古埃及人开始思索他周围的自然力量。他把这些东西——特别是太阳和河

流——视为神灵，寓形于种种事物、特别是人们最熟悉的走兽飞禽之中。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他们创立了社会内部合作的原则，因为如果村民内部没有这种合作，农业生产将受到限制。这又导致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社会内部实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劳动专业化。耕种、灌溉、农业、工业、陶器制作和其他许多有关方面出现了专业劳动者。大量的古代遗迹是他们悠久传统的见证。

法老王朝时期的文明有一个突出之点，那就是发展的延续性。一旦有所发明，便在埃及整个历史的进程中代代相传，不断改进。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就是这样地在王朝前时期（我们纪元前3500－3000年）继承和丰富，后来又在这个历史时代的鼎盛时期保持下来的。石刻技术足以证明这种情况。

早在我们纪元前3500年，尼罗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继承者埃及人利用当地的燧石矿，特别是底比斯地方的燧石矿，制成质量无与伦比的工具，有好几百件足资证明，阿拉克山刀（见第一章）便是其中一例。燧石上压制而成的精细而整齐的沟纹使刀的表面具有纤细柔和的皱纹，而且十分光洁。制作这种武器，需要特别高明的手工工艺。这种技艺在埃及保存下来，拜尼·哈桑一座坟墓中的一幅画描绘出中王国（我们纪元前1900年前后）时期的工匠仍然用弯曲的石片制作这样的刀。

157　这种工艺也见于石瓶的雕刻。新石器时期的这种技术也是通过王朝前时期和古王国时期，一直传到古埃及历史结束之时。埃及的石刻匠人使用各种各样的石料，甚至最坚硬的品种，诸如玄武石、角砾石、闪长岩、花岗岩、斑岩进行雕刻，其得心应手也就如用质地比较松软的石灰质雪花石膏、片岩、蛇纹岩和皂石那样。

埃及的石雕技术后来传入地中海世界。克里特石瓶的雕刻技术如果不是从埃及直接学来，肯定至少是传自象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这样一些备受埃及文化熏陶的地区。甚至古代米诺亚地方所雕刻的瓶子，其形状也表明它们发源于埃及。

石匠的硬石手艺传给了雕刻家，这可以从埃及的一些伟大的硬石雕刻作品，从开罗的闪长岩凯夫伦石像到用黑玄石制作的阿匹斯神牛大石棺看出来。这种技术后来又传给了托勒密时期的雕刻家，再后则复见于罗马帝国的雕塑艺术。

新石器时期的这些变化在埃及城市规划的发展中得到了典型的反映。尼罗河流域一个最古老的村庄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证，这便是尼罗河三角洲西部边缘的迈里姆德·拜尼·塞拉迈。

远古的埃及人相信来世和永生，我们于是看到重要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这些发展可以追溯到整个新石器时期和铜石兼用时期，包括从王朝前时期到王朝时期初期。它们导致了法老时期传统文化的建立和发展。

有史时期

在有史可稽的埃及法老王朝时期文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主要的潮流。第一个是物质文明遗产。第二个是比较抽象的文化遗产，它也是从最遥远的过去传下来的。它们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埃及的文化现象。物质的遗产包括手工艺和科学（几何学、天文学与化

学)、应用数学、医药、外科学及艺术品。文化方面包括宗教、文学和哲学。

工艺方面的贡献

如上所举，古埃及人在工艺方面的贡献既见之于石器，也见之于金属、木、玻璃、象牙、骨等许多其他材料的制品。他们探索和利用了这个国家各种自然资源，并且逐渐提高了制造诸如斧、凿、锤和锛等等石器和铜器所需的技术。这些工具以高超的技术设计而成，供建筑以及工业中钻孔或固定木头石块等之用。他们还制作了弓、箭、匕首、盾和飞镖。 158

有很长一段时期，甚至在有史时期，从新石器时代继承下来的工具和武器继续用石头来制造。尼罗河边沿上的石灰石峭壁，含有大量体积大、质量优的燧石，在铜和青铜的用途已经发现了很久之后，埃及人还继续使用这些燧石。而宗教仪式往往要求使用石制器具，这对于石刻技术、特别是劈石技术的长期流传，关系很大。

法老王朝结束以前，很少用铁来制作金属瓶，因此，埃及的金属制造技术只限于使用金、银、铜以及象青铜和黄铜之类的铜合金。埃及人开采和加工铜矿的遗迹已在西奈、努比亚和布亨发现，古王国时期的法老们在那些地方设有炼铜工厂。

在西奈和努比亚，埃及人是同当地居民同劳动的，加工金属的技术因此易于从一种文化传到另一种文化。法老文字影响了原始的西奈文字；它以后者为中介而对字母的发明起了重要作用，可能正在此时。制铜技术首先在尼罗河盆地、然后越出这一盆地而广泛传播，可能也在此时。

早在王朝时期初期（我们纪元前3000年），埃及人就知道金属加工的所有基本技术，如锻、锤、铸、压模、焊和铆等等，并非常迅速地掌握了这些技术在制作铜工具时使用。除工具外，我们还发现了属于我们纪元前2300年的埃及的大铜雕像。为时更早一些的——我们纪元前2900年时期——文献提到这种类型的雕像，而最早期的一些马斯塔巴内的图画描绘了若干工场把金银合金铸成首饰的情景。黄金和铜的加工虽然并非起源于埃及，但是埃及对这种工艺的改进和推广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是无可怀疑的。

如我们在本章开始时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要确定某一特定的技术是源于亚洲抑或非洲文化，往往是困难的。但是由于在陵墓中发现的艺术作品，埃及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工匠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大量材料。例如，人们可以在陵墓地上和地下部分墙上的绘画或浮雕所描绘的工场中，看到木匠和家具工在制造家具、武器和船只，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如老虎钳、锤子、锯子、钻子、锛、凿子和木槌以及使用这些东西的方式都逼真而详尽地表现出来。我们于是得知埃及的锯是拉锯，而不是现代人用的推锯。对于研究技术史以及技术的留传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尚待充分研究的资料宝库。 159

除了这些图画作品以外，古埃及人还在他们的陵墓中留下了工场的模型，里面有手艺人的模特儿正在制作各种东西。这些模型是极为宝贵的材料，有助于历史学家理解这些技术及它们的发展情况。此外还发现了手制的或用工具制作的大量工艺品，证明古埃及有种类繁多的企业。例如，他们使用了宝石和次宝石，如金、银、长石、玉青石、绿松石、紫

晶和光玉髓之类的东西打造首饰，把它们极为精巧地镶在王冠、项链和其他装饰品上。

亚麻的种植迅速导致古埃及人获得手工纺织亚麻制品的高超技能。他们从新石器时期（我们纪元前5000年）开始就已学会织造亚麻布，尼罗河流域文明的出现恰好也是在这个时候。妇女们纺麻技术很高，经常同时用两个锭子操作。埃及纺麻的特点是纺出的纱挺长，这就需要一种技术，能把锭子置于距离纤维原料若干英尺的地方。为了增大这个距离，妇女坐在高凳上。她们的织机最初是平放的，后来从中王国时期开始，织机便垂直安置了，这使她们能纺出非常长的织物，以供制作日常穿着的宽大衣服以及葬礼中的木乃伊裹布和尸布之用。

对于法老们来说，纺织品是在国外特别受欢迎的商品。最好的布是亚麻布，它是在寺院中织造的，特别有名。托勒密人监督纺织车间的劳动，检验产品质量，他们的中央政府无疑遵循着法老们过去所规定的规程，组织对国外的销售。埃及纺织工匠手制的商品质量优良，给国王带来巨额收入。这种情况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表明了埃及文化借以留传的方式之一。

木材、皮革和金属加工业也臻于完善，这些行业的产品一直完好地保存下来传到现在。

埃及手艺人生产的其他东西有银瓶、木棺、梳子和经过雕琢的象牙柄。古埃及人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能把野草织成垫子，把纺过的棕树纤维制成结实的鱼网和绳索。陶器制造始于史前，初时粗糙，后来发展成为较为精致的带有红边黑边的陶器，然后成了磨光刻花陶器。这些器皿用来贮存各种东西，有些则用于装饰。由于埃及人的某些信仰，特别是永生观念，必须为死者创造大量的、经常是用作装饰的葬物，有的成了高度完美的艺术品。

160

玻璃制造技术如果不是埃及发明，至少也是由它传播给世界文明的。诚然，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文明同样在很早的时候便熟悉上釉，而这种技术便是制造玻璃的基础，但是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曾把这种技术传到国外。因此，人们充其量也就只能认为玻璃制造技术是不约而同地分别在亚洲和尼罗河流域发现的。

埃及人肯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表现出他们长于制造玻璃。玻璃珠子似乎在王朝前时期（我们纪元前3500年）就已出现，虽然不能肯定它们是工匠们有意制造的。第五王朝（我们纪元前2500年）便确实有了玻璃，从新王国（我们纪元前1600年）时期开始向外传播。玻璃当时不仅仅用于制造珠子，而且用以制造各种形状的容器，从雅致的高脚酒杯到鱼形的花瓶。它们通常是彩色的，而且总是不透明的。透明玻璃是在图坦卡蒙（我们纪元前1300年）统治时期出现的。从大约公元前700年起，称作雪花石膏的埃及多色玻璃的瓶子传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腓尼基人加以仿制，把这种瓶子的制造发展成为一种工业。

在后来的时期，用彩色玻璃铸成的象形文字的形符被嵌入木头或石头中，制成铭文。法老王朝时期的玻璃制造者的技术传给了希腊时期的工匠，他们发明了吹制玻璃。亚历山大城于是成了制造玻璃器皿的主要中心，它的产品远销中国。奥雷利乌斯曾经对输入罗马的埃及玻璃器皿征收关税。麦罗埃帝国后来也曾从亚历山大进口玻璃器皿，但最重要的是采用了它的制造技术，并把它们传播到上尼罗河流域。

当时最重要的工业之一，是古埃及人发明的纸草生产工业。埃及的植物中，作用最重要者莫过于纸草。它的纤维用于造船和填塞船板间的空隙、用作油灯的灯芯、制作垫子、篮子、绳子和供系船及下锚用的粗绳。泽克西斯曾想在赫勒斯滂河*上架起一座浮桥，他们用来系住浮桥的绳索就是在埃及制造的，原料便是纸草纤维。在早期的建筑中，人们把纸草的茎捆在一起用作房柱，后来，古希腊-罗马的建筑师即以之作为模型建造单一的或成组的柱，柱顶形同待放或已放的花朵。但是纸草主要用于制造"纸草纸"("papyrus")，"paper"(纸)这个字就是从此而来；无疑，它与古埃及的"paperaâ"一字系同源词，"paperaâ" 161 的意思是"〔住在〕伟大住所(王宫)的他"，这个字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流传给我们的。

纸草制造法，是从这种植物的茎中抽出细条，一层层地交叉铺起来，加压晒干之后，便成了大大的一张。

把20张这种还潮湿的纸接在一起，就成了3-6米长的纸卷。可以把许多纸卷接起来，长达30-40米。埃及的书就是这些纸卷做的。阅读时左手执卷，一边看一边展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书卷就是直接从这种纸卷来的。

古代使用的所有书写材料中，纸草纸肯定最为实用。它柔软而轻，唯一缺点是不结实。时间一长，就易受潮，而且也很容易着火。据估计，登记一座埃及小寺院的财产目录，每月需要10米纸草纸。在托勒密王朝，地方公证人员每天使用6到13个纸卷、即25-57米。所有的大庄园和王宫及所有寺院都有登记簿、财产目录和图书馆，这表明当时至少有几十万米纸草纸。但是至今发现的只有几百米。

从第一王朝(我们纪元前3000年左右)到法老王朝之末这段时期的埃及人所使用的纸草纸，后来为希腊人、罗马人、科普特人、拜占庭人、阿拉米人以及阿拉伯人所采用。相当大的一部分希腊和拉丁文献是靠纸草纸传给我们的。纸草纸卷是埃及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毫无疑问，纸草纸是埃及法老王朝时期为后来的文明留下的主要遗产之一。

所有这些工业都取决于技术和工艺，因而出现一批手工艺人，制造法也有改进。全世界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品中都有成百、甚至成千件各种埃及古物。

古埃及人具有用石料进行建筑的传统，他们在这个方面对世界作出的技术贡献也是不小的。要把大块花岗岩、石灰石、玄武石和闪长石石料按各种建筑所需要的形状加工，而且打磨光洁，决非轻而易举。

寻找修建纪念碑的石料，勘探矿床，搜寻纤维、次宝石和颜料，所有这些活动都促使埃及技术传到亚洲和非洲。

为了采石，埃及人不惜深入浩瀚的沙漠，有时离开尼罗河竟远达100公里。用以雕刻开罗博物馆所藏著名的凯夫伦像的玄武石，便来自努比亚沙漠的采石场，位于阿布·辛拜 162 勒西北约65公里之处。早在埃及历史的初期(我们纪元前2800年)左右，便已有了若干这样的采石场。

埃及采石技术因石料不同而异。开采石灰石，是在尼罗河岸上一条宽阔的始新世峭壁上挖出一条条走廊，取出精致美观的大石块用来建造大金字塔，然后再用花岗石给金字塔

* 即今之达达尼尔海峡。——译者注

砌一层表面。上埃及卡卜地区和努比亚的沙岩，则用露天方式开采。开采质地坚硬的石头，他们首先围着石块刻一条槽，然后在槽中凿出若干深深的小洞，把一根根木头楔子打进去；然后把木头楔子弄湿，木头膨胀，便足以使石块沿着这条槽裂开。人们今天开采花岗石，仍然使用这种技术。这是否埃及的遗产呢？

埃及石工的工具不过几件：木槌和铜凿，用来开采石灰石和沙石这类质地柔软的石头；镐、凿和硬石锤，用来开采花岗岩、片麻岩、闪长岩和玄武岩这类变质岩。如果采石场离尼罗河太远，就派出一支远征队，人数有时多达14,000，包括官、兵、搬运夫、采石工、书吏和医生，配上种种装备，足够在埃及境外停留一段长时间所需。他们必然曾对传播埃及文明、特别是在非洲传播，作出贡献。

王朝时期初期的石工所掌握的技术，使古王国时期（我们纪元前2400年）的埃及人能在坚硬的岩石中开凿他们的最后安息之地。远在这以前，即从我们纪元前3000-2400年，修筑作为死者住所而设计的坟墓，已经在墓穴之上建立起高大的上层建筑物，随着岁月流逝，建筑学发展变化，终于导致梯形金字塔、以及正规的金字塔相继出现。

埃及的木工技术突出表现于造船方面。尼罗河流域唯一方便的通道当然就是河流，由于日常生活的需要，埃及人从最初起就成为熟练的水手。从史前时期以来，船模型就在他们最早期的艺术品中占有显著地位。他们相信，人死后和生前的生活一模一样，难怪他们的坟墓里放有船的模型，要不就在墓壁上画上造船的景象和河流的风景。有时，他们甚至把真船埋在坟墓附近，准备给死者使用。赫勒万地方第一、第二两个王朝的一处墓地以及在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金字塔附近的代赫舒尔的另一处墓地，情况就是如此。而不太久之前的一次发现尤其特殊。1952年，在沿着大金字塔的南边一带发现了从岩石中挖出的两个大坑，上面覆盖着石灰石大石板。坑里发现基奥普斯本人使用的那种船，船身已经拆开，但是桨、舱、舵一应俱全。其中一条已从坑中运走修复，另一条尚待从墓穴中搬出。

基奥普斯这只已经修复的船如今陈列在一个特别的博物馆里。它由1224块木料组成，发现时已被部分拆散，分作13层堆放在坑里。船长43.4米，宽5.9米，容量大约40吨。两侧的板厚13-14厘米。它的吃水深度难以准确估计，但是与船的体积相对而言，显然是非常小的。基奥普斯的这只船虽然确实具有船架的雏形，但没有龙骨，船底平，船身狭窄。最突出的情况是，建造这只船没有用钉子，一块块木头全是用榫头联结起来的。构件、板、船骨和交叉部件都用绳子绑在一起，这就便于重新安装。它的中部有一个大而宽敞的舱，船头有篷。没有桅杆，不是用桨划就是用纤绳来拉，虽然早在基奥普斯统治年代以前很久，埃及就使用了帆。由于采用了这种结构方式，埃及人得以对红海和幼发拉底河进行两栖军事远征：只需把单个的部件装配起来，然后捆到一起。事实上，埃及军队随身带着拆成零件的船，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可以从这些埃及船只的宽度和长度之间的比例、以及吃水浅的情况看出，它们是为了在河上使用而设计的。主要的要求是容量尽可能大而又不易搁浅。尽管如此，在第五王朝之始、很可能甚至在这以前，埃及人就知道如何使他们的船只适于海上航行。从萨胡拉地方的船能看出，为了在海上使用，船头和船尾的高度大大减低了。基奥普斯的船的头尾高耸于吃水线之上，这样的船在地中海或红海的浪涛中难以驾驶。此外，埃及船舶工程

师还给船只装上一条粗绳，它越过船桥，把船尾同船头牢固地绑到一起，从而使整个结构大大加固。这条粗绳也起龙骨的作用，保证整个结构十分结实，减少从中部断裂的危险。

埃及的船只经过这些改进，能够通行法老们所开辟的最远的航海线，不论是通向巴勒斯坦、叙利亚、塞浦路斯和克里特的地中海上的航线，还是通往遥远的蓬特的红海航线。我们不可认为埃及人在这方面受到了腓尼基人的影响。相反，海上航行中率先使用了帆（埃及的帆桁和帆可以调整，从而控制船的速度）、并发明了舵的很可能倒是埃及人，虽然限于我们当前所掌握的情况，这一点还无法证实。但有一点是确实的：自古王国时期起，埃及人便给船尾上起定向作用的大桨装上了垂直的棍子，实际上把它们变成了舵。 164

科学上的贡献

法老王朝时期的埃及人对科学和应用数学作出了贡献。为了实现某一具体项目，往往综合利用若干学科的丰富知识，于是在物理学、化学、动物学、地质学、医学、药学、几何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制作木乃伊

木乃伊的制作是古埃及人天才的一个突出例证。这表明他们掌握了许多门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医学和外科学。他们对这些科学的知识，都是长期经验的积累。例如，在埃及某些地区、特别是奈特龙洼地出产了氧化钠这一化合物，埃及人把这种物质的化学特性用于实际，借以满足他们对来生的信念提出的要求。古埃及人相信人的生命在死后还会继续下去，而且通过保留尸体这种实际行动来突出表达这个信念。现代对氧化钠这种物质的分析表明，它是由碳酸钠、碳酸氢钠、盐和硫化钠混合而成。可见古埃及人懂得这些物质的化学作用。制作木乃伊时，把尸体放在氧化钠中浸泡70天，通过鼻腔把脑子吸出，还通过在尸体一侧的切口把内脏去掉。进行这类手术，必须通晓解剖学，木乃伊之能保存良好，表明他们具有这种精深的知识。

外科学

毫无疑问，埃及人通过制造木乃伊而获得的知识使他们在历史的早期就掌握了外科技术。通过《史密斯纸草书》，我们对埃及外科学已有比较充分的了解，这个《纸草书》是古王国——我们纪元前 2600-2400 年——时编写的外科学原著的副本。这个《纸草书》实际上是一篇骨外科学和外科病理学论文，对 48 个病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作者对每一病例的论述一般都是这样开头的："关于〔某个病例〕的指导"；下面是临床指导："如果观察到〔某些病状〕。"叙述通常简明而确切。然后是诊断："据此，应该说这是〔这或那种伤〕"，根据这个病情，"我可以治愈此症"，或"这是不治之症"。如果可以治疗，下面便有对治疗方法的详细说明，如："第一天，用绷带把一小块肉敷上，然后用两条布绑上，使伤口愈合……"。 165

《史密斯纸草书》中所载的好几种疗法今天仍然在使用。埃及外科医生知道怎样缝合伤口，怎样用木片或纸板来使断裂的骨头复位。有时，外科医生只是建议听其自然。有两个

病例，《史密斯纸草书》中指示病人保持惯常的饮食。

《史密斯纸草书》讨论的病例，大多数是关于头部或面部的表面伤口。其他的则是关于骨和关节损伤，如颈或脊椎骨挫伤，关节脱位，颅骨和胸骨穿孔以及鼻、颌、颈骨、肱骨、肋骨、颅骨和脊椎骨的各种骨折。现代的人们对木乃伊的研究揭示了当时的外科手术一些情况，如古王朝时期的一只下颚钻了两个排脓的孔，把由于斧劈刀砍骨折的颅骨成功地重新接上。还有证据表明曾有用一种矿物胶泥填料补牙的牙科手术，有一个木乃伊口中有一种金线做的齿桥，把两枚松动了的牙齿联结起来。

《史密斯纸草书》有条不紊的论述，证明了古埃及外科医生技术之高明，完全可以设想这种技术由随军远征出国的医生在非洲和亚洲逐渐传播，后来又传给古希腊-罗马人。而且，人们知道，一些外国君主，如亚洲巴赫坦的王公巴克特里亚以及坎比塞斯本人，都有埃及医生；希波克拉底斯"曾到过在孟斐斯的伊姆荷太普寺院的图书馆"，希腊的其他医生后来也到过那里。

医 药

医药知识可说是古埃及对人类历史作出的最重要的早期科学贡献之一。文献详细记载了埃及医生的职称和他们不同方面的专长。事实上，古代近东和古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都承认古埃及人在医药方面的能力和声望。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伊姆荷太普，他是第三王朝国王佐瑟的宰相、建筑师和御医，名声经历整个埃及古代历史和希腊时期而不衰。埃及人把他奉作神明，称为伊梅夫塞斯；希腊人把他变成了自己的医药之神阿斯克莱166比奥斯。事实上，在治疗和处方方面，埃及医道对希腊世界的影响显而易见。考古发掘中曾发现外科手术用的一些医疗器械。

《埃伯斯纸草书》、《柏林纸草书》、《埃德温·史密斯外科学纸草书》和其他许多纸草书——这些古埃及医学文献是古埃及医学的书面证言，它们说明了外科手术的技术，也详细记载了治疗方法。

这些文献是古王国（我们纪元前2500年左右）的原著的抄写本。《埃德温·史密斯外科学纸草书》是高度科学的，与此相对照的纯内科学的文献却是以巫术为基础。埃及人把疾病视为诸神或恶魔作祟，这就为乞灵于巫术提供了根据，同时也说明何以有些治疗办法与其说是医药处方倒不如说是一篇咒语。《埃伯斯纸草书》便是其中一例。

这种情况原为其他古代文明所共有，但埃及医学并不因此而不值一顾。它是一种具有条理性的医道的开端，特别是在观察病症方面；这一医学得以流传下来，无疑是由于它的重要性。埃及医生研究病人的情况，确定病人诉说的症状，然后作出诊断，进行治疗。所有流传下来的文献都记载着这个程序，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认定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如果病情不清楚，则分两个阶段进行检查，中间相隔几天。埃及医生所曾鉴定和准确描述、并能治疗的疾病有胃病、胃肿胀、皮肤癌、鼻炎、喉炎、心绞痛、糖尿病、便秘、痔、支气管炎、尿潴留、尿失禁、血吸虫病、眼炎等。

埃及医生用来治疗病人的药物和办法有：栓剂、油膏、糖浆、饮剂、油剂、按摩、灌肠、泻剂和泥敷剂，甚至还有吸入剂，并把这些疗法教给了希腊人。他们的药典中有各种

各样的草药，可惜这些草药的名称翻译不出来。我们从希罗多德的著作中知道，埃及医学技术和医药在古代享有很高的声望。通过这些著作传下来的埃及古代医生的名字将近100。包括眼科医生和牙医，其中赫西－赖可以说是最古老者之一。他生活于我们纪元前2600年左右，属第四王朝时期。他们还有兽医专家。医生们在治疗中使用了各种器械。

数学（算术、代数和几何学）

数学是古埃及人所曾研究的一个重要学科。他们巨大的建筑和雕塑的准确尺寸充分证明了他们讲求精确性。若不具有起码的数学修养，他们的文物决不能达到这样完善的地步。

从中王国（我们纪元前 2000-1750 年）传下来两份重要的数学纸草书，《莫斯科纸草书》 167 和《莱茵纸草书》。埃及的计数法以十进制为基础。为了表达所需要的数目，把数的符号加以重复，需要重复多少次就重复多少次（几个一，几个十，几个百，几个千）。没有零这个数字。有趣的是，埃及用以代表 $^1/_2$、$^1/_3$、$^1/_4$ 等等分数的符号来源于有关荷拉斯和塞特的神话，神话说荷拉斯神的一只猎鹰的眼睛被塞特神挖了出来，切成许多小块。这些小块就用来表达某些分数。

埃及数学可以分作算术、代数和几何这三项来讨论。

埃及行政部门需要算术知识。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机构的效率高低决定于能否确切知道各个州、各个领域中有什么情况。因此，无怪乎书吏们花费大量时间详细记录有关地区的耕地面积，能提供多少产品以及如何分配，工作人员的人数和质量等等。

埃及的计算方法是简单的。他们把所有的运算都化作用一系列的二（加倍）来乘和除。这是一种缓慢的办法，但不需要记忆，而且使乘法表变成多余。在除法方面，如果被除数除不尽，书吏就用分数，但是只限于分子为一的分数。分数的运算也用一系列的加倍来进行。纸草书上记录着用这个方法得到合乎比例的若干等份的许多例子。书吏在运算之末加上一句套语："正是如此"，相当于我们的"QED"（证毕）。

埃及的数学论文中所提出和得到解答的全部题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偏僻地区孤处一隅的书吏日常工作中必须解决的具体问题，例如按照因等级高低而大小不一的比例把七个面包分给统治集团中的十个人，或计算建造一个斜面所需的砖数。因此，这基本上是一套实用的演算法，不具有什么抽象性质。难以判断这样一套方法中有什么东西可能传给了邻近的文化。

是否可以说古埃及已有代数学，这一点还不十分清楚，科学历史专家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看法不同。《莱茵纸草书》所谈到的某些问题可以列式如下：一个数（埃及文为 ahâ）加上（或减去）这个或那个数（n），结果为（N）。此数是什么？按代数，可以用 $x\pm\frac{x}{n}=N$ 来表示，这使得一些科学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埃及人使用了代数计算法。但是撰写《莱茵纸草书》的书吏对这类题目提出的解答办法通常是简单的算术；可能使用了代数的唯一情况是 168 一个除法问题，它含有一个四次方程式。书吏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现在的代数学者一样；但是他不是以抽象的符号例如 x 作为计算的基础，而是用数字 1 作为基础。因此，埃及是否曾经有过代数这一问题，取决于人们是同意还是否定可以不用抽象的符号来进行代数运算。

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和斯特拉波一致同意，几何是埃及人发明的。几何之所以出现显然

是由于必须计算尼罗河年年泛滥而流失或增加的土地面积。事实上，埃及的几何象数学一样，是以经验为根据的。古埃及论文的首先和主要的任务是给书吏提供一个公式，使他们能迅速弄清一块田地的面积、一座谷仓存粮的数量或一个建筑项目需砖几何。书吏们从不采用抽象的推理来解答具体问题，而只是以图形提供实际的解决办法。尽管如此，埃及人却完全知道如何计算三角形或圆的面积、圆柱体积、金字塔或截去顶端的金字塔的体积、可能他们也懂得如何计算半球形体积。他们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是圆面积的计算。他们的办法是把直径减少九分之一，将得数自乘；这等于是以 π 之值为 3.1605 进行计算，要比其他古人以 π 之值为 3 要精确得多。

事实证明，几何在土地勘测方面具有很大的实际用途，在埃及起了重要作用。有些陵墓中的画，画着测量小组忙于检查土地界石是否已经移动，然后用一根带结的绳子——当代测量员使用的卷尺的前身——丈量耕地面积。最早的纸草书（我们纪元前 2800 年左右）提到了测量员的绳子，称为“努”(nouh)。中央政府有一个地籍办公室，它的档案在孟斐斯革命(我们纪元前 2150 年左右)期间被抄，后来在中王国时期(我们纪元前 1990 年左右)恢复如初。

天文学

我们现在掌握的关于埃及天文学的文献远不如关于数学的材料(《莱茵纸草书》和《莫斯科纸草书》)或外科学和医学所提供的材料(《埃德温・史密斯纸草书》和《埃伯斯纸草书》)。但是有理由相信，关于天文学的文献的确是存在的，《卡尔斯堡 9 号纸草书》谈到预计月亮盈亏的方法；虽然它无疑是在罗马时期写的，所根据的资料却要早得多，而且全未受古希腊的影响；《卡尔斯堡 1 号纸草书》的情况也是一样。不幸的是，早些时候的资料已不复存在，因此，埃及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只得从以观察为基础的实际运用来加以推断。但是这种贡献决非微不足道。

169

我们已经看到（见导言），埃及的历法一年分为三季，每季四个月，每月 30 天；共为 360 天，然后年底再加 5 天。这个 365 天的历法是古代最准确的，也是我们自己历法的来源，因为儒略改革(我们纪元前 47 年)和格雷戈里改革(1582 年)都以它为基础。与这个民用日历同时，埃及人还有一种宗教上专用的阴历，能够相当准确地预告月亮的盈亏。

自拿破仑远征埃及以来，欧洲人就对法老王朝时期建筑物的方位之精确感到惊奇；特别是金字塔，它的四面分别向着四个基本方向。大金字塔偏离正北不到一度。要达到如此的精确度只有通过种种天文观察：观察北极星当时的方向，或观察一颗恒星的中天；或一颗恒星每隔 12 小时所形成的角的平分角，即一颗恒星升落的角的平分角；或一颗恒星的最大偏离度(据佐尔巴说，同大熊座的距离为 7)。无论取哪一种办法，要准确测定建筑的方位，就必须作精确的天文观察。埃及人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他们拥有一整队天文学者在宰相的管理下进行工作，而他们的职责便是观察夜空，注意星星、特别是天狼星的升起，而主要是确定夜间的钟点的消逝。埃及人认为夜间钟点长短因季节而不同。夜晚总是在日落开始，日出结束，共计 12 个小时。传下来的表格上表明，夜间的每一钟点都以一个星座或一个一级恒星的出现作为标志，10天一变，月月如此。这些表一共记录了 36

个这种星座或星星，亦即黄道十二宫的十度，其中每一个十度都标志着一旬的开始。

这个办法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三王朝(我们纪元前2600年左右)。除了这些表以外，神职人员——天文学家们拥有简单的观察仪器：一根测距棍和一个附有铅垂线的直角尺，需由两个观察员合作使用。尽管这不过是一种初等技术，观察的结果却是准确的，金字塔的方位之准确就是明证。某些坟墓里绘有象征天空的图画。各种星星分别用图形来表示，从而能够辨认出埃及人所认识的一些星座。大熊座叫做公牛腿，大角星周围的星以结成一对的一条鳄鱼和一只河马来表示；天鹅座以一个伸开双臂的男人来表示；猎户座以一个一边跑一边回头的男人来表示；仙后座以一个伸出双臂的人来表示；天龙座、昴星座、天蝎座和白羊座也都各由其他形象来表示。 170

白天的钟点也因四季不同而有所差异，为了确定白天的时刻，埃及人使用了一个日规时计：把一根棍子垂直插在一块有刻度的板上；再加上一根铅垂线。这个仪器用于测量灌溉农田的时间，因为水必须公平分配。除日规时计外，埃及人早在我们纪元前1580年便造出了水钟，放在寺院里。希腊人借鉴了这种水钟并加以改进，成为古代的漏壶。

建筑学

古埃及人在建筑工程中应用他们的数学知识，开采和运输了巨大的石方，然后一块块砌上。他们从远古以来就使用土坯和各种石料，已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我们纪元前三千纪初期，他们就第一次使用沉重的花岗岩。第一王朝时期阿拜多斯的某些坟墓的地面就是用花岗岩铺的。第二王朝时，他们用石灰石修建墓墙。

在第三王朝时期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埃及建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因为修建了头一个全部用石料的建筑物，即赛加赖的梯形金字塔。它是佐瑟国王巨大的坟墓建筑群的一部分。

包括这一梯形金字塔在内的整个建筑群的总建筑师是伊姆荷太普，他很可能是佐瑟国王(我们纪元前2580年左右)的宰相。在修建这座梯形金字塔时，头一次使用了经过修整的石块。石块体积不大，外形看来极象早些时候用于殡葬建筑的土坯，不过是用石灰石来仿制的。同样，嵌入壁中的圆柱和天花板的托梁，都是早些时候建筑中使用过的成捆的枝条和横梁的石头仿制品。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埃及建筑学属于头一批使用经过修整的石料来修造层列建筑物的建筑学之一。

埃及发明了许多建筑形式，金字塔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典型。首批金字塔都是梯形的，直到第四王朝(我们纪元前2300年)，它的形状才逐渐成为三角形。从这个时期开始，建筑师放弃了第三王朝时期使用的小石块，而改用大块石灰石和花岗石。

在罗马征服以前，民用建筑还是继续使用土坯，连皇宫也是如此。从拉美西斯在底比斯所造的附属建筑物到努比亚的一些大堡垒都使用了它，足以说明这种材料用途之广，它可以派上最精致的用场，例如泰尔阿马纳的阿门霍特普四世的宫殿，它的过道和装饰有图画的天花板都是用这种土坯造的。在建筑方面的另一个贡献是圆柱的创造。最早的圆柱是和墙连成一片的，后来才单独竖立。 171

古埃及人创造这一建筑技术，很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例如，圆柱这一概念的产生，

便从观察芦苇和纸莎草等得到启发。他们把圆柱的柱顶砍成荷花、纸莎草和其它植物的形状，这是建筑方面的又一创新。呈荷花、纸莎草和棕榈叶形以及凹槽形的古埃及圆柱，在其他文化的建筑中都被采用了。

古埃及人很可能在第二王朝(我们纪元前 2900 年)时发明了拱顶。开始是砖砌的，及至第五、六王朝，便用石头来砌了。

吉萨大金字塔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的规模之大，表明了古埃及人的建筑和管理才干。走廊向上通往用花岗岩砌就的国王的墓室；墓室南北两侧有两个通道或出口直达塔外，以便通风。这些东西的建造是他们善于发明创造的良好例证。

且不谈用坚硬的石料做成的巨大方尖碑是如何凿成或竖立起来的，单是金字塔的墓室和走廊的精确的比例、尺寸和方位就表明了古代埃及人从很早开始就拥有了高超的技术。

埃及人使用了杠杆、滚木和木制十字杆来运输这些石块。他们的巨大的建筑物，全靠人的双臂的力量来完成；除了各种形式的杠杆外，没有使用任何机械。

埃及人通过开运河修堤坝而获得的建造和灌溉方面的技术知识，在与建筑有关的其他方面也表现了出来。

到我们纪元前 2550 年，他们已拥有足够的技能在开罗附近多岩石的干涸河床上用石方筑成一道水坝。后来，他们的工程师在阿斯旺第一瀑布附近的岩石中开凿出可供船只航行的水道。种种证据证明，约在我们纪元前 1740 年，他们就在努比亚塞姆纳的尼罗河上建造了一道拦河坝，以利于与南方通航。最后，在同一时期，他们修建了一条与第二瀑布平行的坡道，船只通过斜坡在尼罗河的泥浆上滑行。这条绵延数公里的坡道，是希腊科林思地峡的船用滑坡的前身；它确保了第二瀑布不再成为航行的障碍。

埃及建筑学还有另外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就是花园设计和城市规划。埃及人酷爱花园。连穷人也会在他们房屋的狭小庭院里想方设法种上一两棵树。而一旦致富，他们的花园的面积和豪华程度便可以同他们的住宅媲美。在第三王朝(我们纪元前 2800年左右)的时候，只要是高级官员，就可以拥有面积达两英亩半以上的花园。园内总有池塘，这是埃及花园的特色，而整个花园便以一个、有时是几个池塘为中心而安排布置。池塘可以养鱼，蓄水浇花草，给附近的房屋提供新鲜清凉的空气。房子的主人往往在池边盖一座小巧玲珑的木亭，傍晚时可以去那里呼吸新鲜空气，用冷饮招待朋友。

172

这些人造的池塘有时很大。斯尼弗鲁的王宫内的人工湖就大得可以行船，身着薄衫的年青妇女伴随他划船。阿门霍特普三世在他的底比斯宫内开凿了一个大水池。埃及人对园林的这种爱好后来传给了罗马人。

人们认为，希腊对城市规划富有才能，其实埃及人在这方面的创造更早一些。早在我们纪元前 1895 年，塞索斯特里斯二世统治下，就给卡洪城修建了长方形的城墙。城内既有行政用的建筑物，也有居住用的建筑物。已发掘出近 250 所工人住房，它们是沿着一条 4 米宽的街道一排排建起来的，这条街道通向一条 8 米宽的中央大街。每座住房占地 100-125平方米，全是平房，各有 12 个房间。城市的另一地区是显要人物的市区住宅，房间有时多达70间；另一些比较简朴，但也比工人住宅大得多。这些房屋也是沿着同城墙平行的直线街道建造的。街道中心都有一条排水沟。

努比亚的大堡垒都是按这一原则设计建造的。新王国时期的一些城市，例如泰尔阿马纳，也采用了这个规划：城内街道成直角交叉，虽然城市本身不象卡洪城那样呈长方形。

当然不能冒然断定埃及所有城市的规划都和卡洪或泰尔阿马纳一模一样。这二个城市是按照一位君主的命令短期内建造起来的。凡是经过一段长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城市，外观必定比较杂乱。但城市规划的合乎规矩以及房屋的标准化都说明了埃及城市规划的倾向。它们是不是希腊城市规划的先驱呢？这个问题值得一提。

虽然埃及无疑在建筑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很难判断它在这方面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肯定，许多文化的建筑师曾用过，而且仍然在用柱廊、金字塔和方尖塔，这些建筑无疑起源于埃及。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就没有某种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代、而且是通过希腊为中介而传给我们的影响呢？也很难说赛加赖的圆柱群和拜尼·哈桑的原始陶立克圆柱不是希腊圆柱以及后来的罗马古典艺术的远祖。至少有一点似乎已成定论：法老们的建筑传统首先是通过麦罗埃、然后是通过纳帕塔进入非洲的，他们传播了诸如金字塔和塔门之类的形式以及使用经过修整而形状规整的小石块的建筑技术。 173

文化贡献

埃及法老王朝时期在这方面的遗产是抽象的。它包括埃及人在文字、文学、艺术和宗教方面的贡献。

文　学

埃及人发明了一种象形文字体系，其中许多符号都源于他们的非洲环境。因此，可以断定这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而非来自假借(见导言)。

古代埃及人最初用形符来表达概念，不久，这些符号就转而用于表示语音，后来并经缩写而简化；可以说这就向字母符号迈进了一步。

西奈曾出现一种与此不同的文字，借用了相近的形符。同这种闪米特文字的文化接触也许曾有助于发明真正的字母，它曾为希腊人所借用，并对欧洲产生了影响。除此之外，古埃及人发明了书写的工具(参看关于工艺的一节)。他们发明的纸草传给了古希腊-罗马，由于这种纸分量轻，有柔韧性，而且做成纸草“卷轴”，可以几乎无限加长，因而肯定在传播思想和知识方面起了作用。法老王朝时期便有一大批作品，它们涉及埃及生活的各方面，从宗教理论到文学，如故事、剧本、诗歌、对话录和评论文章。文学堪称古代埃及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尽管无法确定邻近的非洲的文化究竟从埃及文学学到了什么，一位现代人类学者还是识别出来在苏丹赤道省的尼罗河流域居民当中所流传的一段神话渊源于埃及；而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也发现了这则神话。

埃及文学作品中一些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名篇是在第一中间时期和中王国初期写的。一位著名的埃及学学者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认为，这种文学是思想和社会达于成熟的早期迹象。他把这个时期说成是人们的良知的黎明时期，这时，人便能够就一些抽象的问题同自己的灵魂进行辩论。这个时期的文学的另一个例子是由一位雄辩的农民作者所写的 174

一本书，他对社会和土地情况表示不满。这可以被看作是早期向社会革命和民主迈出的一步。

在中埃及的拜尔舍发现了四具木制棺材，上面刻着："我创造了四面的风，让人人都能呼吸……我引起洪水泛滥让穷人和富人同样受益……我创造了人，让他和他的邻居地位平等……"。这是埃及文学情调的一个好例子。

最后，还可以说由于阿拉伯文学中那些绝妙的故事，埃及文学的某些样品一直传到今天。的确，阿拉伯文学有时看来是起源于埃及的口头传说。例如《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和法老王朝时期的故事"雅普的战利品"相似，"水手辛巴达"也与中王国法老王朝时期的故事"船沉遇难的水手"相似。

艺 术

在艺术领域，古埃及人以种种方式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如雕刻、绘画、浮雕和建筑(见图片 4－6)等等。他们把现世的事务与活动同对来世的希望结合起来。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很强，因为它表达的是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认为即令生命的一切迹象停止，也不过是表面上的死！因为人在各方面仍然继续存在。但是为了继续存在，需要借助于肉体，办法是把肉体制成木乃伊，如果办不到，就通过造像。大小塑像、浅浮雕和坟墓内的绘画都是为了使死者的生命继续存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体的一切细微之处都被极为精确地塑造和绘制出来。为了使雕像的目光炯炯有神，它们的眼睛都是镶嵌的，甚至眉毛都用铜或银做成。眼球是用白石英石，瞳仁则用树脂。埃及艺术家们有时制造金雕像或锤制铜雕像，加一个木质底座。这就要求在金属的造型方面技术高超，富有经验。从各个遗址发现的、可以追溯到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雕像体现了这种技术。

在较次要的艺术方面，古埃及人制造了大量的避邪物：雕刻的圣甲虫和印章，还有装饰品和珠宝。它们体积虽小，但同样精美。毫无疑问，在非洲、近东、甚至欧洲传播得最广泛、最受人珍重的恰恰是这些小物件。常常是由于这些东西的广为传播，才有可能发现埃及在远古时期同其他国家的联系。

古埃及的全部艺术品并不是专为艺术本身，而主要是体现埃及人的信仰：人在现世的生活，死后还会重复。

宗 教

宗教可以看作埃及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之一。因为古埃及人就以下几方面提出了若干理论：生命的创造，自然力的作用以及人类社会对它们的反应；诸神的世界及他们对人类思想的影响，王权的神圣性质，神职人员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对永生和冥府生活的信念。

埃及人这种抽象的，冥思苦想，深刻地影响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也长远地影响了埃及以外的世界。史学者们认为，埃及宗教对古希腊－罗马宗教在某些方面的影响特别显而易见：女神埃西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家喻户晓，备受崇拜，便是一个例子。

法老王朝时期遗产的传播。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的作用

把法老时期的遗产传播到世界各地去，起了一种特殊而又重要作用的是腓尼基。

埃及对腓尼基的影响，可以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接触中追溯其来龙去脉。在王朝前时期和王朝初期，当贸易和探险开始扩大以满足当时的巨大需要时，这种关系已经变得很明显；甚至发明文字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部分原因也是经济和宗教因素的作用所致。这就是说，为了进口例如为建造神龛和宗教建筑所必需的木材等重要原料，同腓尼基的往来是必不可少的。

埃及商人在比布鲁斯修建了自己的寺院，他们同这个城市的贸易关系非常密切。埃及的文化和思想以腓尼基人为媒介，传遍了整个地中海盆地。

埃及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圣经》里的智慧所产生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见第三章)。至于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在公元前的整个 2000 年(包括中王国和新王国)以及后期诸王朝，埃及和它们的商业和文化关系一直不断。随着埃及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扩张，关系自然加强。拉斯舍姆拉、盖特奈和美吉索等等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遗址所出土的雕像、狮身人面像和装饰图案，都表现了埃及的艺术风格。埃及和这些国家和地区交换礼物，促进了文化和商业关系的扩大。

176

应该指出，叙利亚本地艺术受到了埃及艺术的影响，这是埃及同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之间的交往的直接结果。在叙利亚东部的米塔尼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例如壁画中便有埃及女神哈索的形象。看来，埃及的艺术影响从叙利亚传播到邻近的社会；这表现于若干铜碗的象牙柄以及碗上装饰图案的埃及主题，特别是对埃及服装、带翅的圣甲虫和鹰头狮身像的仿制。

腓尼基和叙利亚艺术中所见的埃及艺术影响，实际上是同当地的艺术特点以及其他外国因素相结合的，无论是圆雕还是浮雕都是这样。这一点不仅见于叙利亚，而且还见于塞浦路斯和希腊发现的腓尼基古物；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世界传播文化，从事商业，把埃及文化的因素传到了其他地区。

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的闪米特文字里保留着埃及象形文字的痕迹。试将埃及的一些典型的象形文字、西奈的初期文字符号和腓尼基字母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西奈初期文字受到埃及象形表意符号的影响，他们把这些表意文字加以简化，这个做法可以说是向字母符号迈进的一步。西奈初期文字可以说是向腓尼基字母、因而也就是向欧洲字母迈进的一步。

法老王朝时期的这个巨大遗产首先传给近东的各个古代文化，接着又通过古希腊-罗马世界传给现代欧洲。

埃及和地中海东部世界在有史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接触，使法老王朝时期文明的实物传播到远至安纳托利亚和前希腊-爱琴文化世界。例如在基西拉岛发现了一只杯子，上面有第五王朝第一个法老乌塞卡夫的太阳庙的名字，而在安纳托利亚的多拉克则发现了一把镀金安乐椅的残片，上面有舒雷的头衔。

除了法老王朝时期的埃及同地中海的这些关系以外，埃及同非洲内地也有文化联系。这种关系在史前的最早阶段和有史时期都存在。法老们统治下的埃及的文明渗透了邻近各国的文化。通过比较研究，证明黑非洲同埃及之间文化上有着共同的因素。例如王权和自然力之间的关系，从过去的库施领土上的考古发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库鲁、努里、巴尔卡尔山和麦罗埃都建有国王的金字塔。这证明埃及在非洲的影响多么重要。

177 遗憾的是，我们对麦罗埃文和麦罗埃帝国的版图范围一无所知，无法判断这个帝国对它以东、以西和以南的古代非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刘幼兰译）

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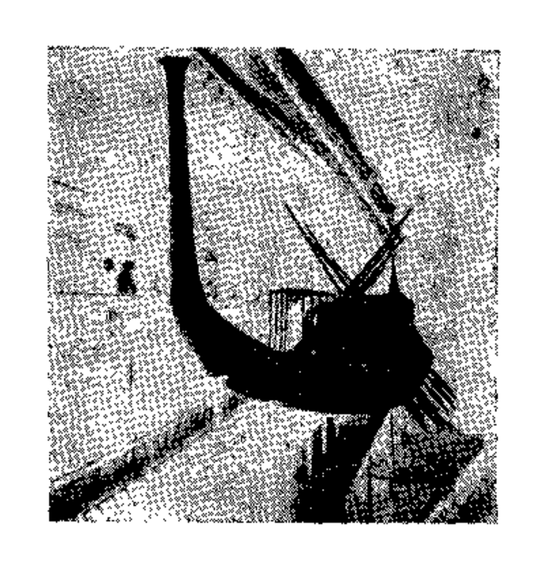


图片 5.1 女神哈索

图片 5.2a 凯尔奈克：阿蒙之船的安放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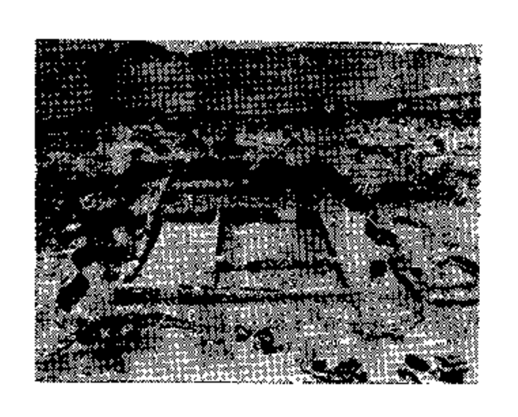
图片 5.2 b 吉萨：基奥普斯之船的安放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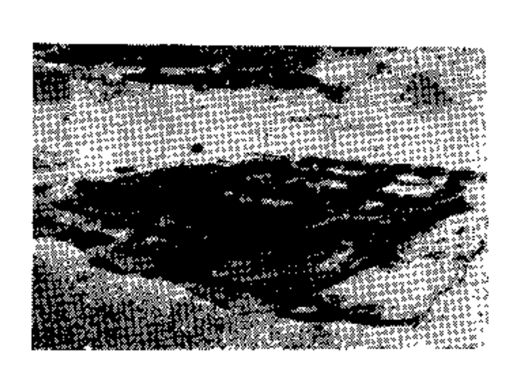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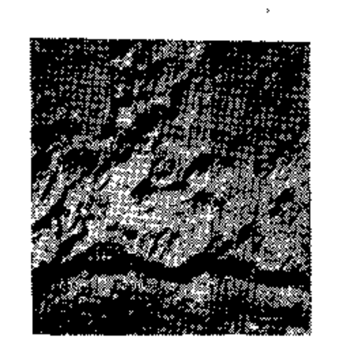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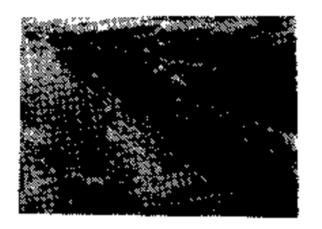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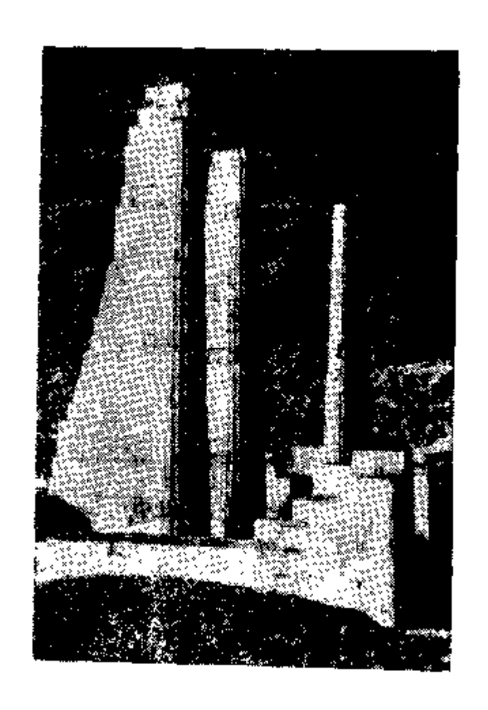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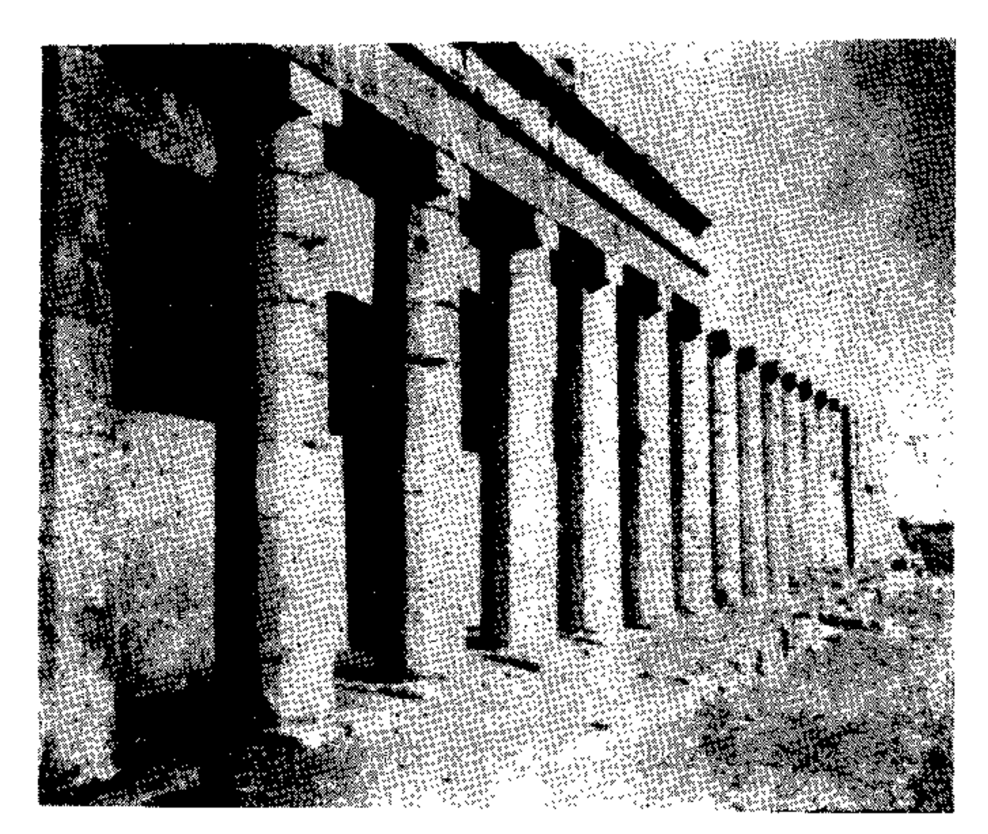
图片5.3 法国考古队在苏丹的发现



图片 5.4 在代赫舒尔的斯尼弗鲁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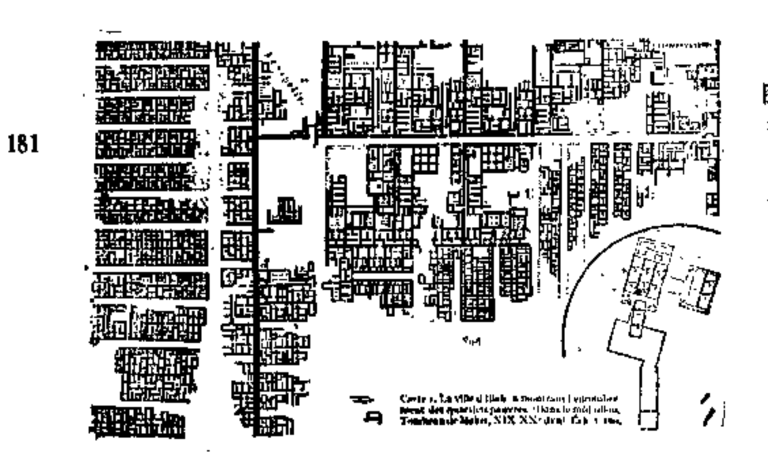


图片 5.5 赛加赖神庙的圆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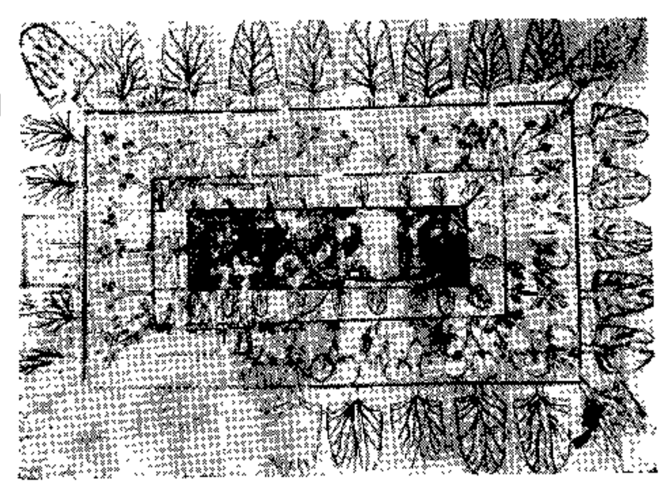


图片 5.6 代尔拜赫里的原始陶立克圆柱

181



图片5.7 城市规划：伊拉洪(卡洪)城，据皮特里。可以看出贫民区拥挤情况(插图：马克特的陵墓，第十九-二十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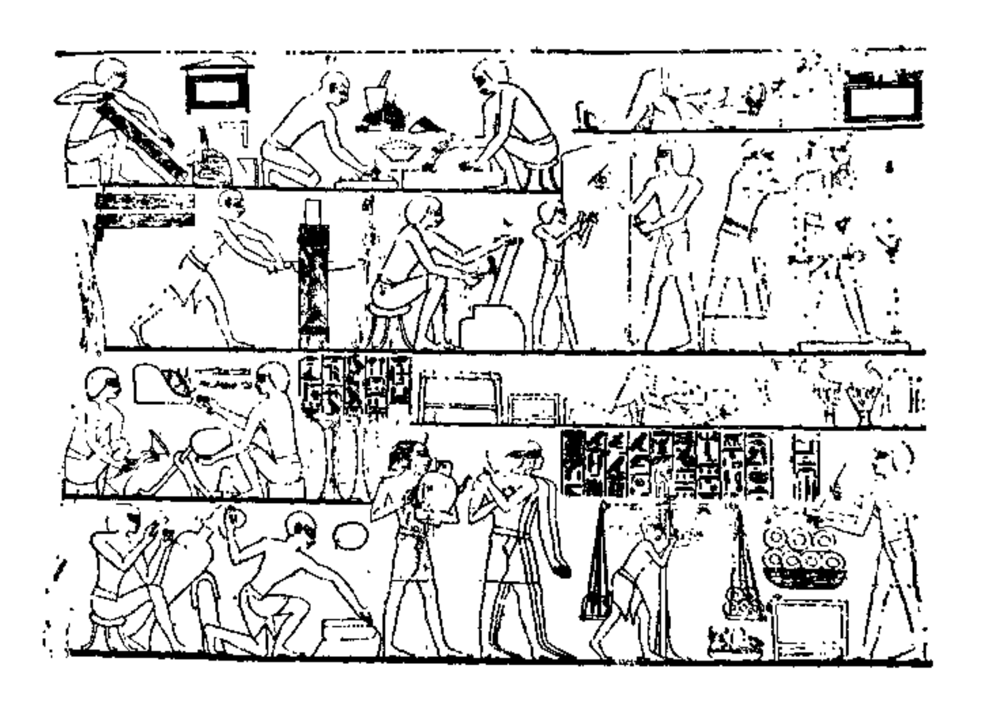


图片5.8 一个埃及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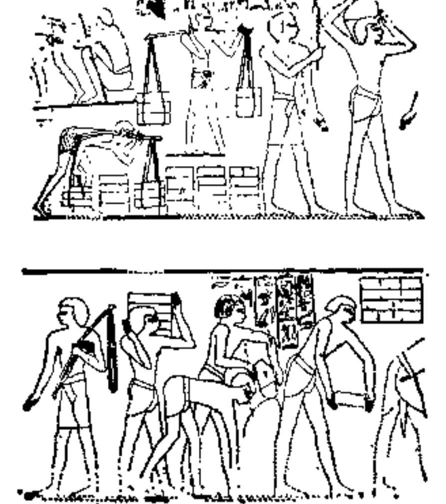
图片5.9 制造金属瓶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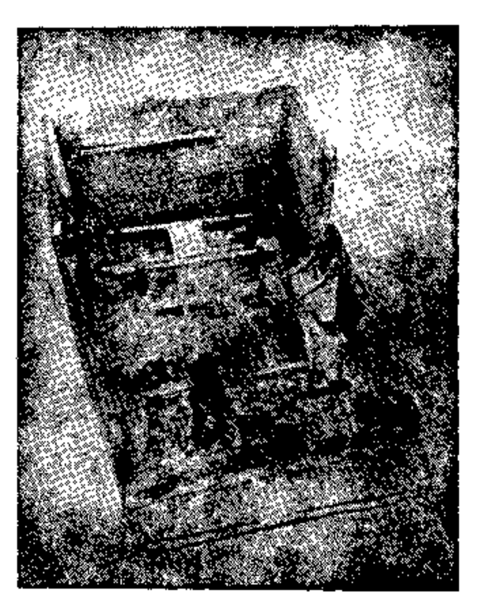


图片5.10 家具木工在干活

图片5.11 制砖



图片5.12 第十二王朝时期的纺织工厂模型，约在我们纪元前2000年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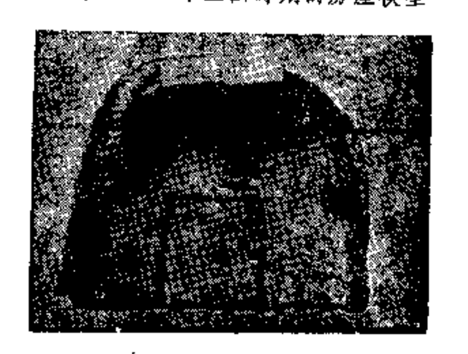


图片5.13　拉美西斯二世(浸泡技术)

图片5.14　制啤酒(古王国时期)



图片5.15　中王国时期的房屋模型





希腊统治时期的埃及

184

H.里亚德
(J.德维斯协助)

当亚历山大逝世时，他的帝国包括马其顿、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中海东岸和埃及，其疆域向东延伸直达亚洲的旁遮普。他于我们纪元前332年死后，由他部下的三个将军建立的三个王朝已巩固下来，控制着整个帝国，这三个王朝是：在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在亚洲原波斯帝国疆土上建立的塞琉西王朝以及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托勒密家族统治埃及长达三个世纪之久，这一时期与埃及历史上以前的各个时期大不相同，至少从生活和政治地理的外貌来看是这样。此后埃及沦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①。

埃及：一个新型的国家

埃及在托勒密王朝十多位帝王的统治下，起初由于执行一系列新政策，显然带有外国统治的印记，但随后这个三角洲②的新主人就象过去一样逐渐被同化了③。

埃及大概从托勒密二世起定都于亚历山大，都城位于沿海一带，这在埃及的历史上还是首次。为保障都城的安全，必须在地中海东部拥有优势的军队和海军。遭受进攻的危险来自两方面：叙利亚的敌人和努比亚人。因此，托勒密王朝不得不采取一种代价高昂的军事政策。首先，它不仅要给雇佣军分配土地，而且还要付出大量的现金；其次，它还必须 185 从相当远的外地寻求必需的物资以供军用。为获得充足的木材来造船，它必须限制埃及国内的建筑工程，在尼罗河流域发展王家林场，并从爱琴海及各岛进口木材；它还必须为造船厂④进口焦油、树脂和铁。这样就形成了此后1000多年埃及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长期性的特点。发展海运事业最为壮观的景象是在非洲沿海一带直到索马里⑤建立猎象基地，和不惜巨资建造为运送象群而设计的船只。埃及之所以需要象群是为了对抗敌对的塞琉西王朝，

① 这是通常所用的时限。参见塔恩(W. Tarn)的著作，1930年，从第1页起；比伯(M.Bieber)著作从第1页起说这一时限为我们纪元前330-300年；她还提到其他一些作者，例如德罗伊森(Droysen)认为是从我们纪元前280年起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止；拉居厄尔(R.Lagueur)认为这一时期开始于我们纪元前400年。

② 普雷奥(C.Préaux)，1950年，第111页，正确地指出三角洲在埃及对外关系中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③ 这点在王朝的创始人托勒密·索特尔一世(我们纪元前367-283年)、其子托勒密二世菲拉代尔弗斯(我们纪元前285-246年)和托勒密三世尤尔杰蒂斯(我们纪元前246-221年)统治时期尤为明显，他们是整个家族最杰出的武士，同时也可能是最杰出的政治家。

④ C.普雷奥1939年的著作着重指出其规模的宏大：我们纪元前306年，托勒密一世拥有船只200艘，而托勒密·菲拉代尔弗斯则在帝国境内部署了船只400艘。

⑤ 勒克朗(J. Leclant)，1976b，第一卷，第230页。托勒密·菲拉代尔弗斯在阿西诺伊、苗斯霍尔莫斯及贝雷尼塞开辟港口，他还兴修了由尼罗河至红海的道路(C.普雷奥著作，1939年)。

后者过去一直在亚洲获取象⑥。还必须到印度去物色驯象人，对猎获的野象加以训练。这件事情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它在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在托勒密三世当政时期希帕勒斯发现了季候风的规律，这就缩短了去东印度群岛的航期，减少了危险和耗费。同亚洲的贸易关系自然也就得到了发展。⑦托勒密王朝还竭力改善红海与三角洲的关系。大流士一世开凿的运河将尼罗河东岸一条支流与苦湖连接起来，在托勒密·菲拉代尔弗斯当政时期把这条运河挖深，便于大船行驶。托勒密·菲拉代尔弗斯还建立了从底比斯地区的科普托斯到红海上贝雷尼塞的航线。

托勒密王朝的对外政策需要大量支出，因而国库必须有大量的收入才能使收支平衡。解决这个问题的部分做法是对经济施行严格的控制，并监督出口，某些出口货物由王家专营，有步骤地发展。亚历山大城的巨大粮仓储存谷物，以供国王向北方出口换取战略原料之用，并经常对亚历山大城众多居民分给谷物作为报偿，特别在粮食短缺的时候如此。为了增加出口商品的生产，就需要实行一套政策，由王家拨款开垦处女地，但统治者对埃及农民的福利依然漠不关心。至少在开始阶段，他不再采取埃及法老们调整生产的做法，而只是掠夺国库所需要的产品。⑧

186

弥补军备及进口货物巨额支出的另一个办法是向地中海各地出口非洲的产品：从埃及以南地区和非洲之角买进象牙、黄金、翎毛和鸵鸟蛋运到地中海各地去转销。将来自印度洋的其他一些货物，如贵重木材、染料、丝织品和宝石，转运到希腊及其殖民地、意大利、东地中海整个地区、甚至远到黑海地区去销售（有些货物是经过亚历山大人加过工的）。由此又一次可以看出，这些商业活动对文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托勒密王朝甚至还很可能出卖奴隶，虽然与同一时期的迦太基相比，数量肯定要少一些。⑨

还曾试图减少用于购买大批希腊侨民所需要的特种商品的费用。托勒密王朝为满足希腊人的嗜好和习惯，强行引进一些新作物品种，如香料，但埃及农民拒绝种植这些新植物。

上述这些政策只有在经常保持战备状态和长期控制东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效果。但托勒密王朝绝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牢牢掌握这些王牌，从第四代帝王以后，它的控制力量就逐渐松驰了，埃及又重新逐渐回复它传统的经济状态。

但事实仍然是，托勒密王朝强有力地促进了埃及的经济，使其有利于国家和希腊的统治阶级，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人为的力量。

三角洲和亚历山大地区的加工业特别发达。曾经特别致力于获得羊毛和引进阿拉伯及爱尔兰绵羊。纺织厂除纺织亚麻外还学会了使用这种新原料的技术，而且能生产14种不同的毛织品。亚历山大有专营纸草的加工业；纸草是埃及的特产，生长于首都附近三角洲的沼泽地区。埃及在法老时期就已懂得制造玻璃的技术，到托勒密王朝时期技术更加精湛，新的工艺更为完善。亚历山大城以制造玻璃器皿的中心闻名于世，长达数百年之久。亚

⑥ C.普雷奥，1939年。

⑦ "托勒密·菲拉代尔弗斯企图改变阿拉伯商队的路线。这条路线运输来自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本身及由阿拉伯人经手来自印度的货物。这种政策也是对亚历山大城有利。"——引自伯南德(A. Bernand)著作，第258-259页。

⑧ 纸草当然是其中产品之一。

⑨ J.勒克朗，1976 b，第230页。

历山大的金属制造技术也很高明，能制造金、银、青铜器皿，这里生产的镶嵌花瓶得到很高的评价。

亚历山大不仅出口它本身生产的产品(纺织品、纸草、玻璃和珠宝饰物)，而且转口输出来自阿拉伯半岛、东非和印度的货物。

在三角洲发展这类工业生产所付出的部分代价必然是奴隶制度的发展。⑩ 187

为了应付所有这些财政问题，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货币。⑪而要扩大与希腊统治下的其他地区的贸易，这种货币就必须与不同于埃及的希腊货币制度相联系。因此埃及就建立了一整套新的财政制度。银行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亚历山大城建立了中央国家银行，在各州首府设立分行，各主要村庄设立支行。这些国家银行办理各种银行业务。此外还有私人银行，它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次要作用。国家专营企业的业务和庞大的财政管理机构花钱甚多，给居民造成很沉重的负担。⑫这种高度统一的经济对于埃及人自己没有丝毫好处。

在农业方面，本地人和外国人经常发生冲突。有些冲突的结果是，农民遁入寺院或者逃亡外乡。

托勒密王室被认为是当时最富有的国王。当然他们的财富是由属于统治阶级的大批希腊人所共享的，他们都过着很舒适的生活。例如，王室和亚历山大的希腊人兴之所至甚至可以很容易地从首都以外的地方弄到各种花卉和水果。⑬

托勒密·菲拉代尔弗斯首先认识到这种制度的负担太重，埃及人也许负担不起。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埃及国王和法老的继承人。例如，我们知道，他曾参观法尤姆的土地开发工程。他以后的国王在国外遭到失败以后，更多地采取这类做法。

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也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外国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地位与本地人大不相同，他们的地位非常优越。宫廷高级官员和政府官员都是外国人，军官和士兵也都是外国人。在农业方面，外国人比本地人有更多的机会占有土地。在工业方面，他们是承包人，而不是工人。大部分国家和私 188 人银行由外国人经营管理。简言之，他们富，本地人穷。埃及人要借钱借粮，通常得向外国人去借；要租一块地，通常也是外国人的地，其它事情也是如此。因此，本地人成了外国人手中的驯服工具。除了正常工作外，埃及人还必须完成许多义务。他们必须在运河及堤坝上服劳役，有时是在矿场和采石场服劳役。外国人受到特殊优待，一般免除劳役，某些等级的外国人还享有税收上的特权。不过对局势的这种看法也不宜过分夸大。有些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例如曼涅托，由于富有并与希腊人合作，设法在统治阶级当中挣得了一席地位。

考古学有时承认，一些与该社会有关的发现，很难加以解释，例如E.伯南德曾经发表过一篇由一个受过希腊教育的本地诗人写作的一个黑奴的墓志铭。⑭

---

⑩ C.普雷奥，1939年。

⑪ 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在流向埃塞俄比亚的尼罗河各支流河谷寻找金矿的活动增加。据斯特拉波(Strabo)的描写，采矿条件极为恶劣。所产黄金数量不能满足需要，金价不断上涨(同上书)。

⑫ 最初的成功消失、处境困难时，赋税几乎总是要加重(同上书)。

⑬ 关于托勒密王朝的整个经济情况，见最近出版的威尔(E.Will)的著作，从第133页起。

⑭ 伯南德(E.Bernand)，第143-147页。

大批希腊人来到埃及的最出人意料的后果之一就是埃及的某些宗教信仰传播于希腊世界。

希腊人初到埃及时有他们自己的神祇和宗教信仰，与埃及人的神祇和宗教信仰大不相同。但很快就出现了一种趋势，把某些希腊神与埃及神结合起来形成新的三位一体：塞拉皮斯是圣父，埃西斯是圣母，哈波克拉特斯是圣子。在埃及人看来，塞拉皮斯就是他们早已信奉的神奥西尔-哈匹或叫奥西拉皮斯（塞拉皮斯这个名字就是从他而来的）。在希腊人看来，塞拉皮斯的形象是一个有胡须的老人，很象他们的宙斯神。希腊人和埃及人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信奉塞拉皮斯。埃西斯本来纯粹是一个埃及女神，但从此以后却画成身着希腊长袍，胸前打着一个特别的结。哈波克拉特斯就是埃西斯的儿子荷拉斯，被画成一个小孩，把一个手指头含在嘴里。

最能集中表现这种新宗教的就是建立在亚历山大城以西的塞拉佩昂寺院。关于这所寺院的外形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我们从罗马史学家的著作中了解到，这所寺院建筑在一个很高的台地上，要攀登100级阶梯才能到达。早在我们纪元前三世纪，对塞拉皮斯的信奉就迅速传遍了爱琴海诸岛。到第一世纪，各地人民都向塞拉皮斯和埃西斯祈祷奉为救世主。这种信仰传播甚广，崇拜埃西斯神达到巴比伦尼亚的乌鲁克，崇拜塞拉皮斯神竟远达印度。在希腊世界的所有神祇中，也许万神殿里的埃西斯是最伟大的神。在佐斯发现的一首赞美埃西斯的诗歌这样说："妇女尊我为神明。男人应该爱女人，夫妻结合，良缘缔立。妇女育儿女，儿女爱双亲。此乃我的命令。"[15]当基督教盛行的时候，只有埃西斯神被保留下来；她的雕像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形象。

189

让·勒克朗强调黑非洲人在传播信仰埃西斯女神方面所起的作用[16]，他在最近的一部著作中谈到，在雅典发现的一世纪一位信奉埃西斯女神的祭司的雕刻头像也许是一个混血种人[17]。

"埃及近旁"的海岸名城

亚历山大城是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个城市十分繁荣，它不仅是埃及的都城，也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应该着重指出，军事上战败、政治上并入马其顿帝国的埃及，使亚历山大大帝极为倾心，他要使埃及成为实行他最著名的城市计划的地点，也许曾想把帝国的首都建在这里。另外，埃及的学术很受人尊重，因而很快就吸引帝国的学者来亚历山大城居住。在托勒密王朝时期，亚历山大也许被看作是地中海区域的文化都城。人们谈到亚历山大的时候，好象它不在埃及，而是邻近埃及的一个地方。斯特拉波描写这个城市如下："这个城市的主要优点是，它是全埃及唯一既适合海上贸易又适合内陆贸易的地点，因为它有良好的海港，又有河流便于运输内陆的货物，并将所有货物集中到那个地方，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18]可是斯特拉波短短数语只着意渲染了这个城市位置优越，

[15] W.塔恩，1930年，第324页。
[16] J.勒克朗，1976 b，第282页；并见小斯诺顿(F.M.Snowden,Jr)，1976年，第112-116页。
[17] J.勒克朗，1976 b，注30。
[18] E.伯南德的著作中引用，第92页。

却未描述亚历山大城的全貌。

建设这个城市和它的港口实际上需要大量的劳力和很长的时间。⑲

我们纪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从孟菲斯出发前往阿摩尼厄姆（锡瓦）绿洲向宙斯-阿蒙神庙出名的圣僧求教，中途经过这里，选定作为新城的地址。这一狭长地带，北临地中海，南面是马里奥蒂斯湖，距三角洲的沼泽地区很远，但距尼罗河的支流坎诺皮克河则很近，地理位置极好，使亚历山大大帝大为惊异。这里有一个名叫拉科蒂斯的小村庄，外面有法罗斯岛拱卫，使其不致受到海浪和风暴的冲击。建城规划由建筑师迪诺克拉蒂斯制订，工程立即开始，这个未来的城市使亚历山大的名字永垂不朽。亚历山大逝世时，城建工程进展不大，约到托勒密二世在位时（我们纪元前285-246年），这个城市才告建成。 190

该建筑师设计了一条名叫埃普塔斯塔迪翁的大堤，把法罗斯岛与大陆连接起来，长七视距尺(近1200米)。这条大堤现已被两旁的淤泥所掩埋。

大堤建成后形成两个港口，东面的一个大一些，叫"马格纳斯港"；西面的叫"尤诺斯托斯港"，意思是安全返航港。还有第三个港口在马里奥蒂斯湖旁，可与内地进行贸易。

这座新城市是按照当时最现代化的希腊城市设计的。它的主要特点是突出直线条，绝大部分街道笔直，纵横交叉成直角。

托勒密一世索特尔当政时期，孟菲斯城仍起主要政治作用，但在亚历山大的尸体运到(据说如此)新都城之后，⑳托勒密二世就把王朝的权力中心永远设在这里了。

城市分区。据亚历山大城的菲洛(我们纪元前30年到我们纪元45年)记载，全城五个区以开头的五个希腊字母命名。可惜我们对这些区的情况所知甚少。王室地区差不多占全城的三分之一，靠近东面的港口。这里是全城最引人入胜的地区，有王宫，周围是花园，园中有壮丽的喷泉和在笼中豢养着的从各地弄来的动物。这个区还有著名的博物院、图书馆和王家陵墓。

城市居民分区居住。希腊人和外国人住在东城，犹太人住在戴尔塔区，靠近王室居住区。当地埃及人住在西城的拉科蒂斯区。整个说来，居民流动性很大，但各种族或社团的流动性又有很大差别。

这个城市中各阶层的人都有。首先是国王及其宫廷人员，高级官员和军队，还有学者、科学家和文化人、富商、小店主、手艺人、码头工人、水手和奴隶。但是亚历山大城的居民主要还是当地的埃及人，包括农民、手艺人、小店主、牧羊人、水手等。

大街上可以听到多种语言。各种方言中希腊语当然最流行。当地人居住区讲埃及语，而犹太区主要讲阿拉米语和希伯来语，其他闪米特语也可以听到。 191

亚历山大城尤以某些建筑物闻名于世，其地址今已难以确定。这个希腊城市的某些最重要的部分今已沉没海底，其它部分则已深埋于现代城市的地下。因此，当谈到这座古城的某些建筑物时，我们往往是依靠古代作家的记述和考古学家的发现。

在法罗斯岛的东南部，东海港的进口处，矗立着一座著名的灯塔叫作法罗斯，被视为

---

⑲ 仅举一个例子，这里有大型蓄水池，积储淡水供居民使用。十九世纪初，人们在这里还可以看到300个大蓄水池(同上书，第42页)。

⑳ 同上书，第299页。亚历山大墓始终没有发现，不知是否存在。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古代所有灯塔都以亚历山大的灯塔命名，造形也大体相似。

这座灯塔在十四世纪时全部被毁，因此我们关于这座灯塔的外形及结构的了解来源于少数几种经典书上提到的资料和一些阿拉伯历史学家的描述。㉑

古钱币和镶嵌图案使我们对这座灯塔的形状有所了解。这座灯塔大约在我们纪元前280年托勒密·菲拉代尔弗斯当政时期由奈德斯的索斯特拉图斯设计的。高约135米，主要由石灰石建造。其檐壁和装饰品一部分是大理石，一部分是青铜。

这座灯塔直到我们纪元642年阿拉伯征服时才停止照明。从那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灾难，而到十九世纪时达到极点。我们纪元1480年，马穆鲁克素丹嘎伊特贝用这座灯塔倒塌的岩石筑了一座要塞，作为海岸防御工事的一部分，以对抗当时威胁埃及的土耳其人。这座要塞仍在，以素丹的名字为名。

马纳拉赫(al-manarah)这个阿拉伯词的含义既是灯塔也是尖塔，而亚历山大灯塔常被看作是伊斯兰清真寺尖塔的原型。这种看法还没有完全证实，但灯塔的尺寸比例和某些尖塔的尺寸比例确有令人感兴趣的相似之处。

博物院以及它的巨大的图书馆是托勒密王室在亚历山大城的特别重要的成就。它是托勒密一世索特尔根据一位雅典的避难者法鲁姆的迪米特里厄斯的建议开始兴建的。博物院192 这个名称来源于缪斯*(Muses)，对她们的崇拜是笃信科学的象征。斯特拉波对这些建筑物的描写如下："王宫也包括博物院，博物院里有一个散步的场地，一个会议室和一个大厅，博物院的语言学家在大厅里一起进餐。有一笔总的资金供养全院人员和一位由国王、这时是由恺撒任命的主持院务的祭司，"㉒由此可见科学家和文化人都住在院里。他们在这里食宿，无杂事干扰，可全力从事研究工作。院的组织很象现在的大学，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住院的学者不必讲课。㉓

到我们纪元二世纪，亚历山大博物院的院士仍是人们所羡慕的头衔。

法鲁姆的迪米特里厄斯曾建议托勒密·索特尔创建一个图书馆，通过购买和有计划地抄写原稿搜集当时所有的典籍，很快就搜集到20多万册。这些文化宝藏交给当时希腊世界著名的专家管理。㉔

塞拉佩昂寺院的图书馆较小，藏书45,000册。

象亚历山大这样大规模的博物院在希腊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唯一可与亚历山大的图书馆相比的是佩尔加蒙的图书馆。一些经典作品如埃斯奇里斯的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平达和巴基利季斯的颂诗，以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籍能保存下来，主要应归功于亚

㉑ 我们纪元1166年，阿布-哈吉·优素福·伊本·穆罕默德·巴拉维·安达卢西到亚历山大城旅游。他对于这座灯塔的大小作了精确的描写。按照设计，灯塔的底部是正方形，每边8.35米；第一层高56.73米；第二层是八边形，高27.45米；第三层是圆柱形，高7.32米(同上书，1966年，第106页)。这位阿拉伯作者提供的这座灯塔的大小与传说中的亚历山大灯塔不一致。

㉒ 斯特拉波，17.1.8。

㉓ 象我们的大学一样，博物院有时也受到批评。一位亚历山大的居民抱怨说："在人口稠密的埃及，那些文人，酷爱妖书的人，〔原文如此〕在缪斯的饲养场里吃得越来越肥，进行没完没了的争论。"引自E.伯南德的著作，1966年。

㉔ 来自昔兰尼的卡利马胡斯（我们纪元前310-240年）是当时的著名专家之一，他把图书馆的全部藏书编目120卷。

* 缪斯(Muses)是希腊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的九位女神。——**译者注**

历山大城的图书馆。

这类文化设施吸引了希腊世界的学者。也确有很多学者到亚历山大城来，并且在博物院对古代事物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发现。

有些诗人既当秘书又是廷臣。卡利马胡斯的著名挽歌《贝雷尼塞的一绺头发》以及其他许多著作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贝雷尼塞是托勒密三世尤尔杰蒂斯的妻子，她向众神发誓，如果她的丈夫能从叙利亚战争中平安归来，她就献上她的一绺头发。她丈夫归来之日，王后果然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但第二天王后的这绺头发在寺院里不见了。恰在这时，星相家科农在天上发现了一个新的星座，于是他就把它命名为"贝雷尼塞青丝"，并且编造了一段神话，说那是众神从寺院里把那绺头发拿走放到天上去的。这个星座直到今天还叫做"卡玛·贝雷尼塞"。卡利马胡斯在他的挽歌中把星相家的奉承加以歌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 193 首诗是卡特勒斯(约我们纪元前 84-54 年)的拉丁文译作。

地理学家、宇宙志学家和天文学家对亚历山大的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某些发现主要应归功于埃及，而不仅仅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贡献。

地理科学之父埃拉托色尼约在我们纪元前 285 年生于昔兰尼。托勒密约在我们纪元前 245 年授予他图书馆长的职位，他担任这个职位直到逝世。他最杰出的贡献就是测量地球的圆周，根据夏至时在亚历山大城的日晷上投射的日影和在赛伊尼(阿斯旺)的日晷上没有日影这两者的关系加以推算。他测算的结果是，整个地球的圆周长 252,000 视距尺（即 46,695 公里)，这个数字比地球实际周长(40,008 公里）大七分之一。埃拉托色尼还编制了 675 颗星的目录。

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约我们纪元前 63-24 年）是最早全面论述埃及地理的学者，生于卡帕多西亚，大半生在罗马和小亚细亚度过，最后定居于亚历山大城。虽然他是罗马时期的学者，但他的著作的核心来源于希腊文化。他的地理学论文共十七卷，最后一卷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描述埃及的地理情况。

地理学和天文学要有相当高深的数学知识。博物院的杰出人物中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德（我们纪元前 330-275 年)，他第一个受命主持数学系，并且写了一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现象》)和著名的几何学论文(《原理》)，这篇论文一直是几何学的基础，已译成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叙拉古的阿基米德（我们纪元前 287-212 年）是欧几里德学派的数学大师之一，他发现了直径和圆周的比率，螺旋理论和重心律。但他对数学和力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发明了阿基米德螺杆，直到今天埃及仍用这种装置汲水。

原籍珀加的阿波罗尼乌斯是一位大几何学家，他约于我们纪元前 240 年从帕尔米拉来到亚历山大城，在数学学校工作。他以卓越的圆锥曲线论文而闻名于世。他也是三角学的 194 奠基人。

起初，亚历山大城的数学学校主要依靠尤多克苏斯和毕达哥拉斯的弟子们，但从第三世纪后该校就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成为希腊数学的主要中心。

西奥夫拉斯特斯生活在托勒密一世当政时期，由于他的植物历史学和植物生理学的著作而被看作是科学的植物学的奠基人。

历史学家狄奥多勒斯·西库卢斯于我们纪元前59年访问埃及。他的第一部希腊文历史

著作《历史文库》就是记述埃及的神话、国王和习俗的。据他说，人类最早出现于埃及。他说(据该书1,10)："宇宙初开，人类最早产生于埃及，因为这个国家气候适宜，也因为有尼罗河的自然条件。"

医师也到这个博物院和图书馆来工作，这里学术空气自由，使他们能通过解剖尸体而对解剖学的研究取得进展。

希罗菲拉斯出生在小亚细亚，他于我们纪元前三世纪上半叶到埃及；他首先发现心跳和脉搏的联系，并把动脉和静脉加以区别。他对身体某些部分所定的名称至今仍然沿用，例如十二指肠和窦汇。

另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也生于小亚细亚，他在亚历山大城工作时对心脏的解剖有所发现。

亚历山大医校也久负盛名。在米兰保留下来的一位医师的韵文讣告说："伟大的埃及是他的祖国。"㉕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埃及人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来自三角洲塞曼努德的一位埃及人曼涅托，在我们纪元前三世纪初是最著名的祭司学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埃及编年史》若能全部保存下来会成为研究古代埃及史最好的资料。该书现存的一些片断，有按朝代编排的国王人名录，并记载着每一位国王在位的年限，这种方法现代的历史学家仍然采用。

然而，博物院和它的图书馆终于惨遭破坏。一般认为，第一次灾难发生在尤利乌斯·恺撒进行的亚历山大战役，他放火烧毁了停在港口内的船只，以防落入敌人之手。大火延烧到书库；但也有人认为火没有烧到图书馆，只是烧毁了一些书店。

罗马征服埃及之后，衰落和毁坏相继而来。博物院和图书馆从此遭难。很多学者离开了这个国家，书籍流入罗马。我们纪元270年，奥雷利安皇帝破坏了博物院和图书馆所在的亚历山大城布鲁基翁区的许多地段。此外，基督教的传播和胜利又给它们以摧毁性的打击。195 认为博物院和图书馆继续存在到第五世纪以后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因此，十三世纪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历史学家阿布·法拉吉·伊布利(欧洲人称他的名字为贝贝布里乌斯)指责阿穆尔·本·阿拉斯烧毁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也是没有根据的。

埃及对希腊文化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托勒密王朝努力发展埃及与印度洋的关系。至于陆地勘察，他们是否有过系统探测尼罗河航道的政策，并利用这条河流作为深入南方和经商的通道，尚无定论。尽管如此，但可以肯定对埃及南方进行过勘察。费拉德尔菲亚的舰队指挥官蒂莫塞尼斯访问过努比亚；197 阿里斯托曾经勘察阿拉伯海岸；萨图拉斯沿非洲海岸直达瓜尔达富伊角以南。这些勘察的情况都记录了下来，为阿加萨基季斯等学者的著作提供了资料。㉖

㉕ A.伯南德，1966年，第263页。

㉖ 见C.普雷奥的著作，1939年，第356页。对那时访问过的人所作的描述，着重于观察到的他们的习俗，用来描写他们的一些名称也反映了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些特点后来载入古代和中世纪拉丁文的文献，有些也载入阿拉伯文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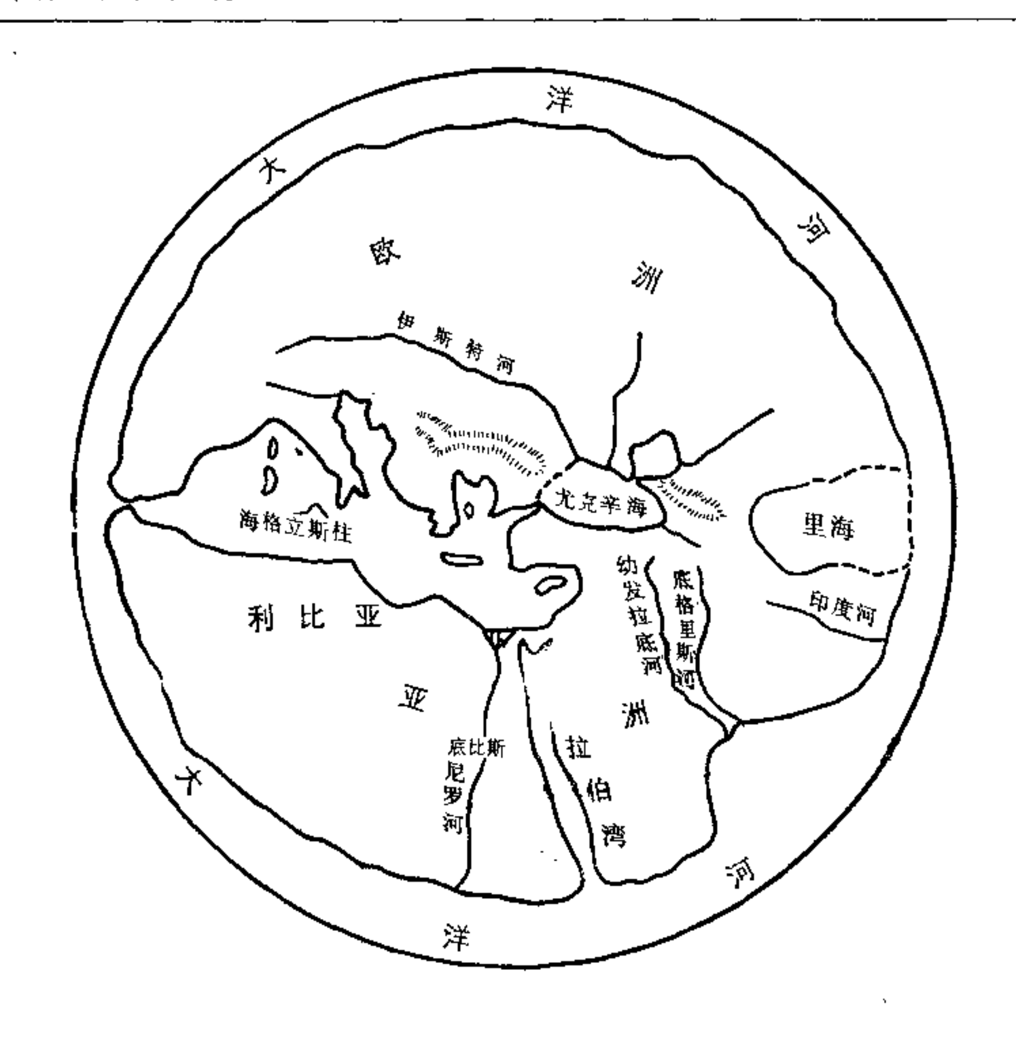


插图 6.1 根据赫卡塔伊斯叙述绘制的世界地图

此外，这些勘察家还沿着前人著名的路线进行勘察。大约在我们纪元前500年，最早访问埃及的希腊地理学家米利都的赫卡塔伊斯首先对世界作了系统的描述。可惜他的地理论文只留下一些片断。他在埃及旅行最远达到底比斯，在他的论文中很可能对埃及作了详细的描述。赫卡塔伊斯认为地球是一个圆形平面体，以希腊为中心。他把世界划分为两大洲：欧洲和亚洲。亚洲包括埃及和整个北非，当时北非的名称是利比亚。他设想，尼罗河在南方与大洋河连接，而大洋河则环绕整个世界。哈利卡纳苏的希罗多德大约于我们纪元前450年曾访问埃及。他深入南方到达埃利凡泰恩，把该地描述为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共九册，第二册专讲埃及。他是第一个提到麦罗埃这个名称的地理学家，实际上他看到的麦罗埃人是在阿斯旺。

希罗多德也认为地球是平的，但他与赫卡塔伊斯不同的是，他不认为地球是圆的，也不认为大洋河围绕地球。他把世界划分为三大洲：欧洲、亚洲和利比亚（即非洲）。他说非洲的四周全是海，只有它与亚洲相连接的地方是例外。

此后很久，在我们纪元前59年，狄奥多勒斯访问了埃及，并在他的第一本书里描写了尼罗河的全程。他认为，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河中有很多小岛，其中一个叫麦罗埃。狄奥多勒斯的第三本书是专讲埃塞俄比亚的，实即现在的苏丹。斯特拉波跟狄奥多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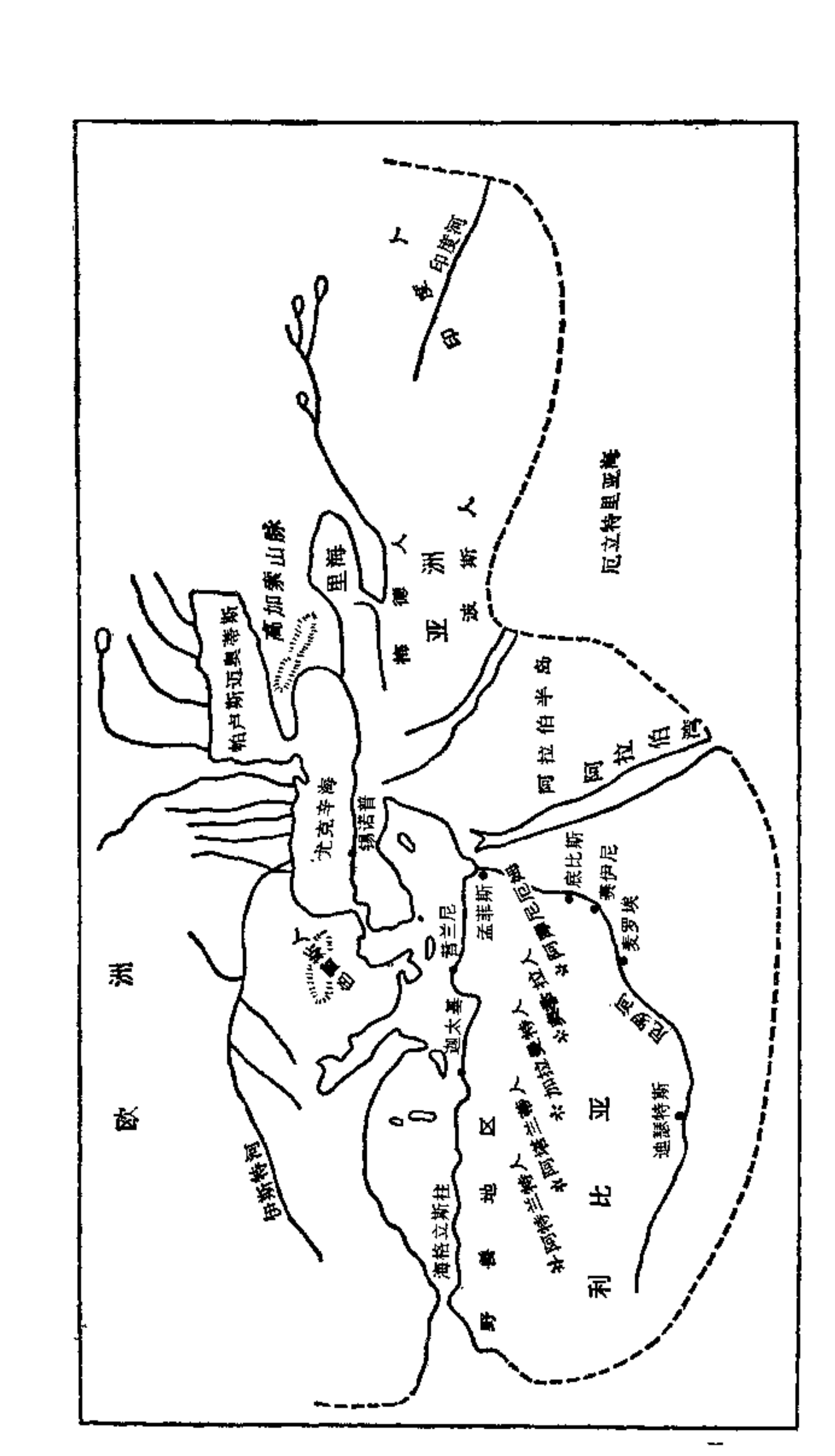


插图 6.2 根据希罗多德叙述绘制的世界地图

斯一样，也把麦罗埃地区当作一个岛，并对该地居民作了详细的描述。

希腊人通常把访问第一瀑布看作是一项成就，再向南深入一点就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埃及建筑物上作为值得纪念的巨大功绩㉗，而学者们则对阿斯旺(当时叫作赛伊尼)以南的尼罗河河谷有很大的兴趣。麦罗埃的精确纬度早在托勒密·费拉代尔弗斯时期即已为人所知。㉘如前所述，埃拉托色尼曾在赛伊尼工作，他曾计算过从麦罗埃到赤道的距离。他也 198 曾很详细地描述过尼罗河的航行情况，并对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至少有间接的了解。他的发现以及其他许多勘察者的发现都已载入后人的著作，最早载入斯特拉波的著作，后来又载入普林尼的著作；普林尼很喜欢对非洲内地及尼罗河流域作绘形绘色的描写；最后还载入伟大的宇宙志学者托勒密的著作中，他后来编了一份包括希腊统治时期埃及文化遗产的很系统的资料。这些作家又把这些知识传入拜占庭以及西方或穆斯林文化，有时还加上部分或全部的传说和观察所得加以润色。因此，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就为未来一个长时期提供了尼罗河中游的基本知识。的确可以说，尼罗河中游是"吸引天文学者和宇宙志学者的磁极"，而军事远征通常总是与科学使命相辅而行。㉙

更令人惊异的是，埃及人吸收希腊文化十分缓慢。看来埃及人不愿对文化压力屈服。他们对托勒密王朝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不象希腊人那样对君主趋奉备至㉚。但希腊文当时享有国际地位，比埃及文容易书写。在正式场合，每个人都讲希腊语。但考古学家注意到，㉛已发现的纸草书中用古埃及通俗文字写的和用希腊文写的几乎一样多。希腊法律反映到埃及的法律文件中去很慢，而埃及的历法却逐渐盛行于希腊。更重要的是，埃及全部文化遗产利用希腊文这一新的语言媒介而得到广泛传播，否则是不会传播很广的。

在艺术这个领域里，可以这样说，埃及甚至黑非洲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而令人惊异。希腊人象他们在雅典时一样是戏剧的爱好者，在埃及建筑的剧院反映了他们的爱好。然而他们看到埃及的寺院，使他们喜爱宏伟的建筑。同样的倾向也表现在雕刻艺术中：已发现一个高 51 厘米的塞拉皮斯神的头像，在亚历山大城的希腊-罗马博物馆里也有许多巨型雕像。

起初，在埃及的希腊人的艺术风格和爱好当然和幅员广大的帝国其它地方的希腊人完全相同。亚历山大工艺场的产品的确与希腊的产品有些相似，这说明受到外来风尚的影 199 响。在亚历山大博物馆里有很多这类艺术作品。最著名的艺术品之一是亚历山大的头像，它属于利西普斯流派的传统。但在亚历山大城也有所革新，最重要的一种新技术考古学家用意大利语称为"斯富马托"(sfumato)，即以光线的明暗来表现出面部柔和的轮廓，而不太注意表现头发和面颊。头发和面颊通常用灰泥制成模型，这种材料性质柔软，容易制成模型，为亚历山大城的艺术家们所乐用。当这些发颊部分加上去时，通常都要涂色。雕塑家和画家们以埃及各阶层的人为模型觅取灵感，这可从绘制神像看出来。埃西斯神像穿着

㉗ C.普雷奥，1957 年，从第 310 页起。

㉘ 同上书。

㉙ 同上书。

㉚ C.普雷奥，1939 年。

㉛ 这两种纸草书的主要区别是它们涉及的主题不同。希腊文纸草书涉及的主题内容广泛，埃及文纸草书主题有限。但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关于寺院管理和埃及家庭生活的丰富资料来源。

一套紧身服装，乳房之间挽一个独特的花结，头上戴一顶埃及式的皇冠，但身体的造型则完全是希腊式的。希腊女神中最为人崇拜的是阿芙罗狄蒂。表现这位女神的小型雕塑往往是各种姿态的裸体像：她从海中升起，梳理头发，弯身解开一只翘起脚的鞋带，或用双手把身体下部的披风拢在一起。

在希腊的英雄人物中，常为人绘画的是希拉克利斯的形象。在亚历山大发现的各种碗和灯上绘有他劳动的图象，表现他与狮子、公牛和亚玛孙族女战士搏斗的情况。

在法老时期的埃及，把尼罗河画成一个肥胖的男子，胸前佩带尼罗河流域生长的莲花和纸草。希腊人把尼罗河画成一个壮健的有胡须的男子，或采取坐的姿势，或倚着河马、鳄鱼或一尊狮身人面像，这些都是埃及的象征。王室显贵的图象也画成这种样式。我们纪元前四世纪和三世纪的绘画一直遵循希腊模式，但从我们纪元前二世纪起，埃及风格和希腊风格的绘画同时并存，例如在亚历山大城安富希的一个陵墓就有两种风格的绘画。这座陵墓的主墓室，从入口处开始，其建筑式样和壁画都混合着埃及和希腊两种风格。

另一座安富希陵墓上的棕榈树素描具有一世纪的特色。这座重新装饰过的安富希陵墓具有更多的埃及色彩，绘有埃及风格的新图画。

镶嵌工艺首先出现于东地中海，很可能首先出现于亚历山大城。有几条带有图案花纹的镶嵌路面就是在亚历山大及其周围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条路镶嵌着“索菲洛斯”的名字，而且在中央的长方形内有一个以桅樯为背景的妇女头像。头像有船头形头饰，被认为是亚历山大城的象征。中央长方形的四周是华丽的边饰。这条路在戴尔塔区的东部，是第二世纪铺设的。

200

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埃及产品丰富多采，风格多样，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表现日常生活场面和刻划埃及人和黑非洲人的小雕像，这些小雕像或则幽默风趣，或则奇形怪状[52]，也有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品。用青铜、大理石、陶土、石膏制成的小像是供普通人玩赏的，但有些较有价值的作品保存下来，证明这类题材在当时很流行。

贝斯是希腊人信奉的诸神中道道地地的埃及神。他的雕像状貌怪异，后来给他配了一个同样丑陋可笑的妻子，叫作贝萨或贝塞特。在埃及的希腊人对于所有非希腊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因而他们定购各种表现黑人的日用品、奢侈品或装饰品。制作工艺的维妙维肖有时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表现了雕刻家的观察力而不是他们的爱好。有时表现的内容是些街头小景，例如有一座小雕像是一个青年黑人熟睡在酒罐旁。在各种日用品如水罐上都绘有黑人。画上的姿态表情没有显出恐惧感或不健康的异国情调，黑人常与象画在一起，或者与鳄鱼搏斗，画中也有矮人，那是沿袭古代关于俾格米人的文艺题材。雕像中有黑人摔跤手，跳舞姑娘，变戏法者，讲演者和乐师，证明雕刻家的题材不仅是来源于生活，而且这种场面都是群众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些很高雅的黑人头像和肖像，证明黑非洲的上流社会人士曾经在托勒密王朝的都城亚历山大居住或者路过。[53]亚历山大人之所以对黑人感兴趣，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托勒密王室对过去通向黑非洲的撒哈拉大绿洲感兴趣。

---

[52] 巴达维(A.Badawy)，1965年，第189-198页。

[53]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F.M.小斯诺顿的著作，1976年，第187-212页。

通过埃及的希腊艺术，黑人的形象比以前更广泛地传播到地中海世界。

希腊统治时期的埃及：与利比亚的关系

希腊文明的某些特点由埃及经过昔兰尼加即利比亚的东部传入北非。[34]在这以前，希腊文明早已出现于昔兰尼加。我们知道，我们纪元前631年泰奈地区多里斯岛上的希腊人即已移居昔兰尼加，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昔兰尼。此后，又建立了四个殖民地：昔兰尼港(后称阿波罗尼亚)，陶基拉，拜尔盖(今称迈尔季)和尤希斯珀里迪斯。这些殖民 201 地，特别是昔兰尼，是希腊文明的产物，并曾经历了希腊每一个城市通常发生过的那些政治变革。昔兰尼建立之后，随即开始了巴提亚王朝的统治，大约在我们纪元前440年该王朝由于内部纷争而结束。此后是常见的贵族统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昔兰尼加便成为一片混乱与争斗的国土。

那时，整个古代世界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现而处于大动荡的前夕。亚历山大大帝于我们纪元前332年秋天入侵埃及，并向西推进到普拉托尼厄姆(今马特鲁港)，他的目的是到锡瓦绿洲向宙斯-阿蒙神庙的圣僧求教。昔兰尼，也许还有其他城市，误解了亚历山大的意图，想要阻止他入侵昔兰尼加，保卫自己的独立，于是派遣使者到普拉托尼厄姆向亚历山大申辩，说他们的城市本来就是效忠于他的。但他们不能永远保持独立，我们纪元前332年亚历山大死后，当时任埃及总督的托勒密抓住昔兰尼内部斗争的机会，兼并了昔兰尼加，这个国家随即开始了希腊统治时期。除一个很短的时期独立外（约我们纪元前258-246年），昔兰尼加在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下由我们纪元前332年持续到我们纪元前96年；那时统治昔兰尼加的托勒密·阿皮翁（托勒密·尤尔杰蒂斯二世之子）把它赠送给罗马人，并与克里特一起划为罗马的一个省。

希腊统治时代开始时，昔兰尼加是一个由许多小村庄组成的国家，很少城市。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城市重新命名，有些城市改为托勒密王朝的名字。昔兰尼仍保持原名，但陶基拉改名为阿西诺伊(今图克拉)，拜尔盖的港口命名为托勒密(今图勒迈塞)，并取代拜尔盖而成为首府。尤希斯珀里迪斯为一新城市所取代，命名为贝雷尼塞(今班加西)，这是为纪念托勒密三世的妻子昔兰尼加公主贝雷尼塞。昔兰尼的港口升格为城市，命名为阿波罗尼亚(今苏塞)。

昔兰尼加是各族人民杂居之地。城市居民除希腊人外（他们或为正式公民，或享有部分公民权)，还有非希腊人，主要是犹太人和许多其他外国人。农村居民(“乔戈伊”)是当地的利比亚人和以前的雇佣兵，他们因分配到土地而在这里定居下来。

这些“乔戈伊”耕种昔兰尼加的可耕地。土地又分为王室土地(盖巴西里凯)、城市土地(盖波利蒂凯)和当地利比亚人的土地。这种社会结构造成当地利比亚人和定居的希腊人之间的冲突。

希腊统治时期的昔兰尼加是一个经济上很重要的国家，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的谷仓之 202

[34] 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叙述，本章的作者得到穆斯塔法·凯米尔·阿卜杜勒·阿利姆博士的协助。

一。据说，在我们纪元前330-326年饥荒期间，昔兰尼曾向宗主国希腊的各城市赠送八十万迈丁尼*谷物。本书已经较详细地谈到昔兰尼加的羊毛，它的养马业，以及著名的昔兰尼加西耳菲姆(Silphium)，后者是巴提亚国王专营的物产，很可能也是托勒密王朝专营的物产。

向希腊城市赠送这批谷物还不是说明昔兰尼加的希腊人与希腊本土的希腊人关系密切的唯一证据。如所周知，昔兰尼加的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对于希腊人的文化生活也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我们纪元前第四世纪。由于昔兰尼加与雅典的密切文化接触，才有可能使哲学以及其他许多分支学科得以在昔兰尼加高原繁荣发展。一个被称为昔兰尼学派的哲学派别就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这是由阿里斯蒂珀斯(约我们纪元前400-365年)创立的苏格拉底学派的一个支派，其祖父老阿里斯蒂珀斯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同伴。这种文化活动和它所产生的硕果在希腊时代依旧十分明显，我们只需举出如所周知的卡利马胡斯(我们纪元前305-240年)和埃拉托色尼(我们纪元前275-194年)就够了，他们和其他人一起离开昔兰尼加到亚历山大城，推动后者科学和文学的发展。他们在学院、博物院和图书馆的活动增加了亚历山大城的创造性的文化财富，使这个城市成为希腊统治时代具有吸引力的主要文化中心。甚至雅典的新学院也是昔兰尼加人卡尼亚德斯(我们纪元前305-240年)创立的，他是怀疑论学派哲学的主要学者之一。希腊的教育制度在昔兰尼也象在其它希腊城市一样被保存下来。今天还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体育馆和古希腊青年受训的碑文。

在昔兰尼发现了许多哲学家、诗人以及希腊九女神缪斯的塑像。德摩西尼的半身像虽是罗马的复制品，它的发现却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说明在昔兰尼的希腊人对这位希腊大演说家非常尊重。

在昔兰尼的许多大理石雕像中发现有些是亚历山大城的精美雕刻。有几件希腊统治时代创作的雕像与著名的亚历山大希腊艺术极为相似。因此昔兰尼在某种程度上是模仿亚历山大的雕刻技术，就不足为奇了。从昔兰尼加的半身雕像中也可以看出昔兰尼加的希腊雕刻与亚历山大的希腊雕刻有相似之处。把昔兰尼加的丧葬半身像与埃及的木乃伊雕像加以比较，就可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极为相似。即便是罗马时代的雕刻作品，也不能否认是来源于托勒密王朝时期的雕刻艺术。

昔兰尼出产涂彩釉的希腊陶器和赤陶小塑像。这些小塑像是由当地的手工作坊生产的，开始时它们复制或仿制希腊赤陶器，但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类小塑像是很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们反映昔兰尼加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203

在宗教方面，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信仰也传到了昔兰尼加，从已发现的大量的对托勒密国王和王后的献词碑文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昔兰尼加的各城市也信仰塞拉皮斯神，在昔兰尼加和托勒迈塞还发现了埃西斯和奥西里斯的神庙。

希腊人和埃及人的这种共同信仰很可能由昔兰尼加传到了的黎波里塔尼亚，虽然在罗马时代以前托勒密王朝从来不曾统治过的黎波里塔尼亚。在大雷普蒂斯发现了塞拉皮斯和埃西斯的圣殿；有趣的是，在塞卜拉泰信奉埃西斯女神还有专门礼拜仪式。对埃西斯和塞拉皮斯这两个神的信仰必定向西方传播得更远，因为信仰埃西斯女神的风气变得更为普

* 迈丁尼(medimni)，古希腊容量单位，约等于1½蒲式耳。——译者注

遍，而信仰塞拉皮斯神开始给古代世界以过美好生活的新希望。

上述希腊统治时期昔兰尼加的情况只是希腊人的情况，因为有关当地利比亚人以及他们受希腊文明影响的资料很少，而且很难找到。我们知道，从肥沃的沿海地带被赶往内地的利比亚土人并不欢迎希腊人。然而希腊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北非的这个地区，正是北非使希腊文明得以繁荣发展达三世纪之久。

麦罗埃十分繁荣，而尤以埃加梅尼斯及其继承者执政时期最为昌盛，这主要是由于它同埃及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迄今为止，在麦罗埃的寺院和金字塔中还很少发现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痕迹。[35] 埃加梅尼斯在下努比亚的代凯建筑的寺院纯粹是埃及式的构思。他死后，其木乃伊葬于麦罗埃附近的金字塔中，它的装饰场面都取材于《死者书》。他的继承人阿泽克拉蒙在德博德(距菲莱不远)附近建筑了一座埃及式的寺院。

麦罗埃人的生活与埃及人很相似。我们只能从考古学的发现中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情况，因为我们还不能阅读麦罗埃文,[36] 也没有掌握象古埃及墓中壁画所提供的那样丰富的日常生活的资料。

也象埃及一样，麦罗埃的国王被认为是神的化身。王后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有时自己行使统治权。祭司有很大的权势，寺院拥有很多财产。麦罗埃的正式宗教思想多来源于埃及，但也有他们自己信奉的神灵。

麦罗埃的丧葬习俗既有当地色彩，又具埃及传统。我们从已发现的丧葬用具中了解 204 到，灵床属于安加里布 (angareeb) 型，与古埃及的灵床很相似，这种灵床今天在尼罗河流域仍然沿用。

麦罗埃人多以务农为主。他们使用夏杜夫(shadouf) 和萨基赫 (sakkieh) 来灌溉土地，直到今天这两个国家仍使用这两种工具从低处汲水到高处浇地。

在这两个国家中发现的工具和武器如板斧、锄头、斧头、凿子以及许多小物件如镊子等也很相似。所有这些工具都是青铜制造的。然而在麦罗埃也发现了大型的铁制工具。在城市附近往往有大堆大堆的铁矿渣，这说明炼铁和用铁是很普遍的。铁矿石是用木炭在简陋的熔炉里冶炼的，在尼罗河沿岸生长的阿拉伯胶树用来烧制木炭。

在埃及和苏丹发现的物件也很相似。然而有些东西，如头靠和一些乐器完全是埃及式样，而这些东西可能是来源于麦罗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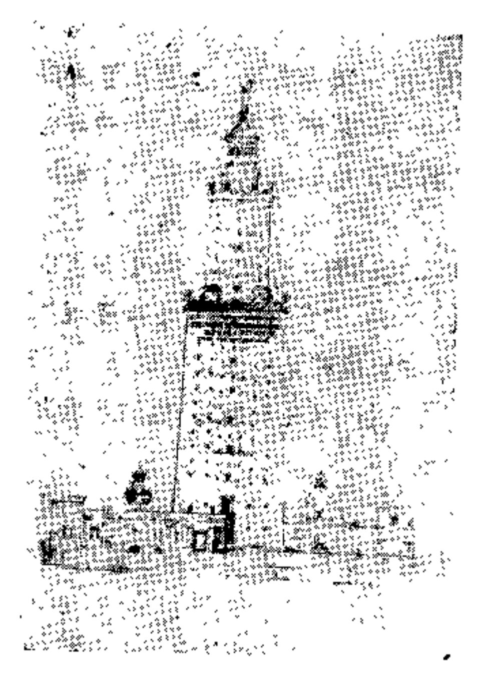
(杨 达译)

---

[35] 见F.欣策和U.欣策(F. and U. Hintze)的著作，1967年，第23-28页。

[36] 见本书第十章。

205



图片 6.1 亚历山大城的灯塔



图片 6.2 埃西斯女神的浮雕像，背后为其子哈波克拉特斯

图片 6.3 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



图片 6.4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图片 6.5　乌利西斯躲在公羊腹下，避开波吕斐摩斯



图片 6.6　亚历山大城安富希陵墓的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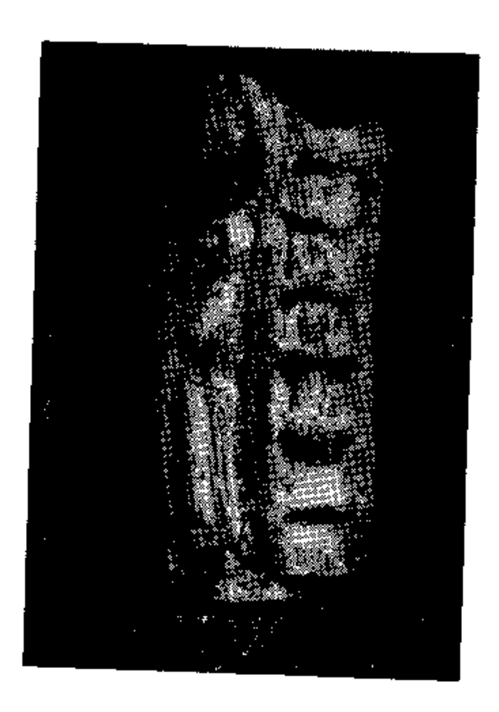
207



图片6.7 巴尔萨马里姆的青铜像



图片6.8 奇形怪状的头像



图片6.9 “点街灯”的黑人小塑像(残片),直身行走,穿着束腰外衣,左臂扛着一个短梯子(缺右臂和双足)

罗马统治下的埃及

208



S.多纳多尼

罗马：对埃及从盟邦到统治者

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转移到罗马的统治之下。自从托勒密·菲拉代尔弗斯以来，亚历山大与罗马之间的关系一直融洽无间。托勒密王朝各代君主之中，他是与罗马签订友好条约的第一人，并在我们纪元前273年派去一名大使。半个世纪以后，当罗马与汉尼拔交战时（我们纪元前218-201年），托勒密·菲洛帕特仍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而在安提俄库斯三世于我们纪元前168年入侵埃及的时候，罗马则以拯救埃及的独立作为报答。不过，罗马取得了这种地位以后，实际上已经能够并且习惯于控制埃及的事务，在托勒密王朝末期，这种作法就更加露骨了。我们纪元前51年到我们纪元前30年之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与罗马的将军们阴谋勾结，目的便可能是让他们维护她的王国的利益。她无条件地支持她的朋友马克·安东尼；但屋大维于我们纪元前31年击败了安东尼，使她永远丧失了王位。

新的主子对待埃及的态度，清楚地说明了罗马帝国极为重视这个新的省份。它在埃及驻有三个军团，将近15,000人。托勒密王朝最后几代君主统治时期，国内大乱，底比斯即因此在我们纪元前88年遭到毁灭，罗马军团的职责就是恢复对埃及的控制。第一任罗马长官科内利乌斯·加卢斯带领队伍越过第一瀑布，进入上埃及。在他之后的长官佩特罗尼乌斯重新征服了下努比亚省，称之为12申（因为经过测量它计有12申），是从赛伊尼（阿斯旺）到耶拉锡卡米诺（穆哈拉克）大约有120公里。这块土地原属于托勒密王朝，但是麦罗埃（如今在苏丹）的统治者长期以来便已将它并入自己的王国版图。罗马皇帝的亲信加卢斯长官对他个人的成就过于自信，终于因此丧命；这件事情足以表明当时已尊称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何以特殊重视征服埃及。他小心翼翼地把埃及置于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不让元老院对它有任何管辖权。实际上，后来甚至明确禁止元老院成员进入埃及，而且严格地执行这条规定。这位罗马皇帝于是从托勒密王朝手中接过了埃及，并且力图在组织机构中取代他们在埃及的地位。他掌管了埃及的宗教，不久就被誉为许多寺院的建立者，这些寺院中保存得最好的是努比亚境内的德博德、塔尔米斯、丹杜尔和普塞尔基斯等地的几座。他也关心埃及人的生活，军队不仅维持治安，而且修复疏浚在托勒密王朝最后几代的混乱中被严重破坏了的水道网。这样使用军队原属于一种例外措施，可是后来竟成为一条

209

规定，在梅罗（我们纪元54-68年）、图拉真（我们纪元98-117年）、普罗布斯（我们纪元276-282年）统治时期都沿用下来。

罗马的行政管理

罗马皇帝沿袭了托勒密王朝对埃及的行政管理办法，把它当作一片广袤的私产，全部收入都由皇帝处理。奥古斯都的这种剥削方式，很快就成为他对埃及制定的全部政策的起点；尽管他的继承人斥责罗马驻埃及的长官征税过重，并提醒他不能杀鸡取卵，然而这种政策却一直延续未断。

罗马皇帝对埃及直接行使权力，表现于当地长官由他个人任命，而且总是委任一位骑士(不是元老院成员)来掌握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且也直接任命其它官员(地方财政长官兼管行政,procuratores)①，让他们以罗马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有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细节足以表明埃及的特殊性质：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唯独这个国家以罗马皇帝朝代纪年而不以执政官任期纪年。这样就将古老的托勒密和法老统治时期的传统长期保存下来，并使这位罗马委派的国家元首带有一种帝王的气味，这在帝国任何其他地方的组织机构中是看不到的。

罗马皇帝的剥削中包含着一项托勒密王朝的剥削所没有的新内容。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埃及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诚然也是归于一个王室，但这个王室的全部利益都在埃及，而罗马皇帝却将埃及当作粮仓，惯于从那里征调小麦散发给罗马平民，借以取得他们的拥戴。埃及既成为帝国粮仓，它的土地的果实便被白白拿走，并不通过正常的贸易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补偿。埃及从一个独立国家变成一个省份，实际上给它的组织结构带来了别的更为重要的变化。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相当详细地加以描述，因为从埃及所特有的珍贵的纸草抄本文件中，我们得以知道许多有关埃及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情况。这些都是公务或私人文件，埃及的干燥土壤把它们完好地保存了好几千年。一个半世纪以来，学者们便从这些文件研究埃及的语言学和历史。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是以原始记录为根据，史家的著述因而准确而详细，这在古代史的其他领域中是罕见的。

210 政府的行政单位称为诺姆(现在称为州)，其下划分为两个邦，它们各由若干个村组成。上埃及各州合而为一个更高一级的单位，即塞拜德，与赫普塔诺米斯（即中埃及的七个州)和尼罗河三角洲一些州相类似。一个州由一名斯特拉特戈斯(strategos，旧日的托勒密军事司令官衔）管理，另有一名皇家书吏（也是托勒密的一种官衔)，作为他的行政管理人员。小一些的行政地区则按照更古老的传统由低级官员主管。

中央政府则是新建的。它的核心部分设在老皇城亚历山大，它取代了孟菲斯而成为首都。政府的全体官员完全以皇帝直接委派的罗马公民充任。首先是长官，他是包括财政、军队和法庭等在内的各个部门的首脑。对他的权力的唯一限制，是人们在反对他的决定时可以向皇帝本人提出申诉。为了协助长官完成职责，设有一个政务会，成员也都是罗马骑

① 或“代表”：“pro”=代替；“curare”=管理。

上。裁判官、监察官和副监察官协助他施行司法工作，采邑②税务官帮助他管理交给皇帝个人的款项，还有一名骑士负责管理寺院。埃及的州分成组，由三名埃皮斯特拉特吉(epistratege)管理，他们都是授予地方行政长官头衔的骑士。按照罗马的传统组织制度，军事司令官也就是行政负责人，特别应是司法负责人。这就深刻地影响了埃及原有的司法机构；按照埃及当地法律规定，凡案件的有关文件使用的是本地语言，则由本地法官审判，否则便由希腊法官审判。如今却只有长官是唯一的法官；显然他可以授权别人，特别是授权给斯特拉特戈斯代理，但须由他一个人负责。他每年在国内巡行一次，解决最难的案件，称之为审判会，在靠近亚历山大城的培琉喜阿姆，在孟菲斯和在法尤姆的阿西诺伊举行。审判中对罗马公民使用罗马法，对其他的人则用外国法，后者照顾到埃及的风俗习惯，但有时也有例外。

这些例子可以说明，罗马人之进入埃及这件事本身便足以改变托勒密时期的典章制度。但从奥古斯都初期以来，在其他方面还有更大的改进余地。托勒密政府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它的大多数官员是受薪的，薪金的来源是按照职责轻重授权经营规模大小不同的农庄。军队同样是一种世袭机构，拥有世袭经营耕地的权利。这种耕地的面积按照某些标准(看官员是希腊人或埃及人，是否有马匹要喂养等)而定。在托勒密时期，这一制度已经无 211 可避免地受到破坏。到罗马时期，就完全改变了。领取薪俸的官员让位给受封荣誉爵位的地方官员。同时，由负有相同责任的人组成了机关。斯特拉特戈斯有执政官员和指挥官相助，乡村书吏有地方教会的长老协助。

虽然国家不再为地方政府提供经费，负担它的种种开支，却通过分配土地扩大了那些小型和中等规模的私人采邑，而在这之前，这些土地一直是属于王室或享有用益权的人（这种土地叫克莱鲁伊，用来支付政府官员的费用）。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土地所有者阶级，地方长官即从他们之中选出。地方长官不给薪俸，而作为一种义务来尽他们的职责。在此之前所授予的产权，乃是给予他们的补偿。罗马帝国委托这个地产所有者、候补行政官员的阶级维护帝国的权益，也就是偏宠一个社会集团，支持它来反对别的社会集团。托勒密王朝统治初期，希腊人曾占有特权地位，我们纪元前217年的拉菲亚战争，埃及的国家军队受到很大打击，这种地位就大为下降，在王朝最后的艰难年代里，这种地位就更加每况愈下。

罗马占领者出于自己的需要，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按昔日的习惯恢复了希腊人的特权地位，而把这一事实在法律上规定了下来。埃及人要交纳人头税（即卢格拉菲阿，只要是活人就要交纳），希腊人却可免交。省会居民的税额少于村民，农民不能离开他们的耕地(伊迪阿)。因此，出身于受到希腊教育的家庭，就成为头等要事。而要证明自己属于这种出身，必须能够拿出文件证明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进过希腊学校。在托勒密王朝时期，这种学校是对社会开放的；托勒密王朝之后，只允许城市人入学，而且由国家控制。一个人要能够自称是希腊学校毕业生，家谱必须经过详细调查。他的这种身分一旦得到证明，他就被看作属于说希腊语的市民阶级，而与村民截然不同，后者大多是农民和埃及人。在

② Ousia，即采邑。

这样的新的社会制度下，埃及人失去了自己的权利；这种安排的主要目的是组成一个巩固的中等阶级，他们与帝国的前途休戚相关。

在此顺便说一下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的自治城市（波利斯）是享有特殊地位的，例如上埃及的托勒密和三角洲的古老而光荣的瑙克拉梯斯③。被称为第三自治城的亚历山大，仍然212 是地中海的最大港口，人口和重要性都可以和罗马相匹敌。然而它的元老院被取消了，还成了奥古斯都·亚历山大舰队的海军基地，罗马军队驻扎的尼科波利斯也和该城近在咫尺。亚历山大人的俏皮话一向是出名的辛辣有力，他们和自己的新主子的关系从来就不融洽，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

罗马统治下的埃及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罗马统治的这些基地没有受到触动。外省则在“罗马式的和平”中过活，其代价是缴纳以麦赋（阿诺纳）为基础的各种捐税，这是周期性叛乱和反抗的根源。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提比利乌斯（我们纪元 14-37 年），将驻守在埃及的军队减少到两个军团。在他之后的继承人统治下，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和住在该城的许多犹太人之间第一次发生骚乱，双方从此互相敌对，不是发生流血事件，就是向罗马皇帝控诉对方。有一部称为《亚历山大城殉教者纪实》的文献，以辩护口吻记载着有关犹太人受审的事迹。罗马曾试图强行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敌对双方都不满意，都认为自己吃了亏。

朱迪亚发生的暴乱，使政府和居住在埃及的犹太人之间关系恶化了。韦斯帕西安（69-79 年）在叙利亚当上皇帝，亚历山大表示拥戴，他于是调走了尼科波利斯的罗马军团去围攻耶路撒冷。图拉真统治时期（98-117 年）耶路撒冷遭到破坏后，埃及的犹太人奋起反抗，包围了亚历山大城，造成了令人难忘的不幸事件。后人称之为犹太人战争。马修斯·图尔博将军击败了叛乱分子，此后，亚历山大城便不复存在犹太人聚居地了。

不过除了这些特殊的事件外，帝国在其初期的一百多年还算是相对的平静和繁荣。尼禄皇帝（54-68 年）派了一些考察队员到麦罗埃王国去，该王国与罗马有和平的贸易关系；韦斯帕西安在亚历山大城非常得人心，当地人认为他具有奇迹般的权力；图拉真（98-117 年）将在埃及的驻军减少到一个军团，这说明局势是平静的。他还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扩大与东方的贸易，以此同经过不属于罗马控制的国家进入叙利亚的陆上贸易通道相竞争。这些措施都对亚历山大城有利，因为它仍然是整个地中海的主要港口。除此以外，当埃及遭到饥荒时，图拉真送来了急需的小麦。从而一度颠倒了埃及必需向罗马缴付小麦税的原则。

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117-138 年）对埃及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我们纪元 130 年和 131 年，他与他的妻子到埃及进行了一次相当长的旅行。他为埃及修复了由于犹太人战213 争而被破坏的亚历山大城；为了纪念他的宠臣安蒂努斯，他在中埃及修建了一座城市安蒂诺波利斯。据说，根据神示，哈德良将遇到某种暗藏的危险，安蒂努斯于是舍身救

③ 自塞提时期以来为希腊人的聚居地。

主，在这里自己溺死了。这个年轻的烈士被加以神化，并与奥西里斯神视为一体。以溺死而把人加以神化完全符合埃及人的习俗。当然，建立这座城市也有其实际原因：将它列为“波利斯”亦即自由城市，使它成为地处埃及内地与罗马友好的中心，也成了红海与尼罗河谷之间的商队路线的起点。

古代遗留下来的纸草书中所详细记载的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情况表明，罗马偏袒中等阶级的政策必然带来恶果。老百姓贫困不安，开始骚动。头一个迹象就是在哈德良的继承人安东尼·庇护统治时期（138-161年），罗马驻亚历山大的长官被暗杀，他本人不得不亲自到埃及去恢复秩序。他的儿子马库斯·奥雷利乌斯(161-180年）是一位哲学家和慈善家，他所面临的局势就更加严重了，这时三角洲的牧牛人(鲍科洛人)发动了一场猛烈的叛乱。这次叛乱是由一位名叫伊西多的祭司带头的。据说，叛乱分子举行吃人肉的仪式，从而煽动起一种神秘的激情，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英勇作战都是为了争取减轻他们生活中的痛苦和在种族上获得承认。这一次，亚历山大人都站在罗马一边，因为他们享有埃及人所没有的特权。叛乱分子与卫戍部队相持不下。阿维迪乌斯·卡修斯将军不得不将他的军团从叙利亚调来，即使如此，他还是不能在战场上打败牧牛人，而是靠在牧牛人中间制造内讧，才终于取胜。我们纪元175年，谣传皇帝死了，在亚历山大城让自己的部队拥戴自己称帝的也就是这位阿维迪乌斯·卡修斯。在埃及发生这类事件还是第一次，其结果没有造成太多的麻烦，因为马库斯·奥雷利乌斯赦免了这位鲁莽的将军。

尽管塞普蒂米乌斯·塞韦鲁斯（193-211年)作了改革，给亚历山大恢复了被奥古斯都取消的元老院，即立法会议，这件事表明了亚历山大城又有了自治权，可是罗马与埃及之间的紧张状态还在不断加剧。他的继承人卡拉卡拉（211-217年）访问亚历山大城，市民们对他的嘲弄引得他勃然大怒，他借口征集该城的青年入伍，将他们集合在一起后，立即下令将他们全部屠杀。然后，部队离开了在尼科波利斯的军营，驻扎到城里，迫使市民屈服。

这场血洗部分地抵消了这位皇帝在我们纪元212年批准安东尼宪法这一闻名于世的措施所带来的影响。这部最高法律规定，凡居住在帝国范围内的人都是公民，因此取消了一直存在于罗马公民和埃及人之间的鸿沟。在这以前，除了从国外调来的官员以外，埃及很少有罗马公民。要有，也是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20年或25年，退休后获得罗马公民权利的埃及人；他们然后回到老家，成为大城市里少数显要人物集团的成员。 214

宪法在原则上取消了帝国居民的双重身分。一般法律都采用罗马法，社会的总的结构于是也相应地完全改变了。不过，如果说有哪个国家对于这种社会变革比起其它国家感受较小的话，那就该是埃及了。在宪法上有一条规定，凡是代迪蒂西(dediticii)，即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后投降的人，都得不到公民权，而埃及人被认为有过这种行为。皇帝们再次偏宠希腊化的城市中等阶级，歧视当地农民。卡拉卡拉竟降下一道旨意，公然规定埃及人唯有给公共浴室送燃料或赶牛供屠宰时，才许进入亚历山大城。这实际上是禁止埃及人进入这座城市。但那些愿意而且能够到亚历山大城生活并接受希腊人同化教育的埃及人则可以例外。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歧视的经济基础。

整个行政制度也随着宪法而改变。亚历山大城恢复元老院的时候，一次普遍的改革也

改变了城镇的地位。大城市成为自治市，直接管理所属的省。公务机关不再由埃皮斯特拉特吉中用抽签的办法选出富裕而有才能的人来掌管，而是由每个城镇的元老院(立法会议)的成员来管理。每个元老院议员必须轮流掌管行政，而且还得提供开支费用。有些遗留下来的纸草书载有高级委员会会议的全份报告，记录着普赖泰纳斯（元老院议员）关于由谁担任公职的决定。有些合格的人选企图逃避这一职责。牧牛人的叛乱以及接踵而来的制度上的腐败使整个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这些荣誉实际上成了不可忍受的负担，昔日的显赫也已丧失殆尽了。

埃及不再是帝国的粮仓。从二世纪以来，这种职能已经转而由"阿非利加"（现在的马格里布)承担。这只能意味着埃及已经资源枯竭。种地人再也负担不起国家要求缴纳的赋税，于是开始了一场丢弃农庄向沙漠里逃亡的运动，并蔓延开来，造成了愈来愈大的危险。

第三世纪中叶，发生了一系列极其惹人注目的事件。一个名叫马库斯·尤利乌斯·埃米利亚努斯的埃及长官在262年自称皇帝，统治不过几个月就被罗马皇帝加利努斯打败。在边境上出现外族向国内侵犯，有时甚至占领一片片国土。因此，克劳迪乌斯二世（268-270年）统治时期，一位名叫蒂马格尼斯的埃及人将帕尔米利亚人请进国内来就不是偶然的事了。这些人住在一个富庶的商队城镇，与帝国结盟，但保留着自己的独立。他们的王后齐诺比亚没有和罗马人公开破裂，但是她派来一支7万人的军队，给罗马军团造成了很大215 麻烦，当地人民既然站在入侵者一边，罗马军团打了胜仗也没有用处。甚至当奥雷利安掌握住了局势将帕尔米利亚人驱逐出境时，由一个名叫菲尔穆斯的人领导的一部分反罗马的居民，仍然与留在埃及的入侵者联合起来。他们还同已经令人谈虎色变的布勒米人结盟。这些人是游牧人，当时已扩散在下努比亚，也常离开他们统治的沙漠，在上埃及出现，胁迫耕民。

普罗布斯将军(276-282年）接替奥雷利安指挥部队后，成功地控制住帕尔米利亚人、布勒米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埃及游击队，然后极力改善国内局势，这时国家已经濒于崩溃，以传统的行政机构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对居民已不再有什么吸引力，甚至肆意劫掠的布勒米游牧人都受到欢迎。这就清楚地说明，必须使社会成员获得新的信心，从内部把社会巩固起来。普罗布斯击退了入侵的野蛮人成为皇帝之后，随即派遣军队挖掘运河、改善农业，其目的无疑就在于此。

埃及的危机不过是在界限分明的小范围内反映出帝国全局的更大的危机。有勇气面对这一更大问题的人是戴克里先(284－305年)，他改造了国家的整个制度。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广，因此在这里除有关埃及的部分以外，其它就不加论述了。新皇帝对于局势看得很清楚，他放弃了四面敞开、无法防止布勒米人以及与之有着血缘关系的另一个非洲游牧民族入侵的努比亚，条件是由他们卫戍帝国的南部边疆，为此还送给他们若干笔钱。他们的小国王，（雷久利，巴西利斯科)把这称为贡金，因此得意洋洋。

埃及本身现在分成三个省，每一个省以前都是由一个埃皮斯特拉特吉管辖。北部的两省，即三角洲和赫普塔诺米斯（七个州），现分别称为埃及·朱庇特和埃及·赫拉克勒斯，由一名文职总督治理。总督无权指挥武装部队。南部的一个省是塞拜德，由于它容易受到

侵略，设一名军事指挥官兼管民政和军事。埃及失去了作为单独一个省份的特点，变得和帝国其它部分一模一样。通过任命一个城市税务官员负责财政，使埃及的行政管理与其它省份完全一致起来。与此同时，施行了一种新的征税制度，大致说来，是规定一个税额，在连续15年期间固定不变。这与任意而突然地征税办法造成的混乱状态相比是一种进步，但如要使这一变革具有实际意义，就必须使征税和生产财富的整个体系之间取得平衡。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开始是缓慢地、后来则日益明显地形成种种固定的模式，当征税过重时，就给纳税人提供了庇护所。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国家不得不禁止人员流动，谁都不允许离开自己的行业。农民必须留在原来的土地上务农，于是成为附属于田地的农奴；享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民们也是如此，他们被紧紧地束缚在自己的职位上，充当纳税人和行政官员。不久，社会各阶层的人便都发现他们必须逃亡。只有明确地掌有政治权力的人才能自全。不那么走运的人们自然就会投身于豪门周围的集团，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他们，依靠他们的保护来对付税吏。政府则用尽一切法律手段来对抗这种使社会逐渐以大地主为中心来组成、并由他们统治的局面。但法律却无能为力，因为没有计及引发这一趋势的内在原因。及至大地主们获得了权力，以代为收缴应向国家交纳的赋税的收税人自居时，财产制度就完全变了样。帝国初期，中等阶级的实力原在于小土地所有制，现在却完全为贵族采邑——和贵族权力——所取代，原来的城市行政单位于是解体，成为迥然不同的经济单位。 216

基督教对埃及社会的影响

显然，上述过程是在长时期中发生、并与另一过程——基督教在埃及兴起——并行发展的。从广阔的历史角度看，这后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埃及与古代世界其余部分之间的宗教交流之一。尼罗河谷的迷信的传播范围和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埃西斯和奥西里斯（后者亦称塞拉皮斯，是同一观念的不同表现形式）成为到处受崇拜的神祇，为相隔很远的民族带来了相同的得到拯救的神秘希望，也使他们产生了同样狂热的信仰。

这种狂热崇拜对群众的思想感情的影响，官方难以控制，因此这种迷信常常受到非难。奥古斯都虽然在埃及建立了寺院，但并不掩饰他对这些神祇的嫌恶。埃及人支持他的敌人安东尼。谣传说，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之间的关系甚至威胁到罗马帝国的霸主地位。安东尼在阿克蒂厄姆战败，也是埃及神祇一场公开的失败。卡利古拉改变了对外国神祇的态度，提图斯（我们纪元 79-81 年）曾以一只公牛向阿匹斯神献祭；他的继承人多米西恩（81-96 年）是埃及神祇的热烈崇拜者，自从他化装为信奉埃西斯女神的祭司逃脱危险以后，他就对埃及神祇抱着一种迷信的感恩图报心情。从此以后，奥西里斯神的受难，埃西斯女神的悲哀以及她的配偶的复活都成了受苦人们的希望，他们从中认识到神与人性相通，也认识到超凡入圣的途径。

埃及在宗教方面的这种经历，可能有助于另外一种救世宗教的传播，而基督教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便具有普救众生的性质。又特别在埃及这样一个国家里，人们对死后如何的关心从来便是宗教信仰中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许多世纪以来埃及就有一个犹太人聚居地， 217

早在托勒密·费拉代尔弗斯时期，他们便是推动把圣经译为希腊文（译本称为塞普图埃金特）的一个动力。所以，埃及的各部分居民看来从很早的时期起便对基督教经典的根源有所了解，而这又很可能曾在这一新的宗教最初传入时有助于它的传播。

对于这一切，我们实际上所知道的还很少。看来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传播与其它宗教如诺斯替教或摩尼教的传播相似，它们的经文原本早已在埃及地下挖出的纸草书或羊皮文稿上都保存着。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异教徒世界里发生了危机，传统的宗教已不再能满足当地人精神上的需要。按照埃及的宗教规律，宗教仪式应采用本地语言；基督教也和诺斯替教及摩尼教一样，采用了科普特语的这一州或那一地区的方言。这不仅意味着传教士直接向被排斥于统治阶级的希腊文化之外的最卑微的阶级传教，而且也意味着，在宗教生活中当地群众和当地文化被置于首位；这二者都没有从安东尼宪法得到任何好处，而且也被排斥于帝国的各种新公民之外。从官方观点看来，土著埃及人是不可靠分子，不值得花费力气去同化；但在基督教徒眼中，希腊人无非是异教徒，因此是被轻视的对象。

罗马皇帝对基督教徒的不断迫害，反映了基督教徒的人数和重要性，这看来奇怪，似乎自相矛盾，但并非不常见的现象。迪修斯(249-251年)所施加的迫害，在埃及留下了一系列独特的记录。他命令给那些曾当着官员实行对皇帝焚香致敬的异教徒发放证书。拒绝这样做的人，则被认为是基督教徒，要作为不忠的臣民加以惩罚。但在人们记忆中迫害基督教徒最利害的是戴克里先(303年)，从而造成了所谓的殉教者时代，亦称科普特时代。他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之严酷真是无所不为，但这已是最后一次努力，说明要反对一种已经扎了根的运动是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几年以后，君士坦丁在米兰(313年)承认人们有权成为基督徒，并且开始长期致力于同化基督教会，使之适应帝国的需要。从那时以后，基督教在埃及的历史，就与亚历山大和帝国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

218

埃及在基督教帝国内的突出作用

罗马帝国在西奥多修斯统治下正式成为基督教国家，埃及此后的历史也就直接受到皇帝们的这种官方态度的影响。皇帝们越来越认为自己有权从君士坦丁堡颁布在帝国范围内应宣讲或采用的教义。统一法制的要求，不久就同坚持以正教统一全国宗教的要求结合起来。

作为一种宗教的基督教是以某些信仰条文为依据的；从基督教出现的最初几个世纪起，基督教徒之间便因对这些条文的不同看法和解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教会还不能公开活动的时候，信徒之间的这种争吵并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可是基督教徒终于在帝国臣民中占了大多数，他们中间的内讧就成了国家大事。他们的争论毒化了他们的派系之间的关系，常常在神学的幌子下，威胁到公共治安，以至君士坦丁也不得不常常加以干预以求解决。君士坦丁既讲究实用又惯于独裁，他认为宗教讨论无非是左道邪说，应该加以消除，而让一种由上谕规定、确切得到公认的认识取而代之，这种认识是符合真理的，当然也是合法的。他的继承者们都照此办理，君士坦丁堡朝廷和亚历山大教廷

之间于是经常关系紧张，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正教，亦即真正的信仰。

这些宗教上的争论，往往使得发自内心、备受敬重而又精心维护的地方传统与官方抽象而漠不相关的决定发生冲突。亚历山大和安条克这两个最古老的基督教主教教廷原来就有很高威望，一些主教的个人品德又进而使之得到加强。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希腊-罗马世界中这两个文化首都发生的神学争论往往难以同帝国的观念、有时甚至难以同罗马主教的观念相协调。

亚历山大的基督教，在早期和随后的正常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点，使它与埃及其它部分的基督教颇不相同。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浸透了希腊文化，这一点甚至在它接受基督教这一新的宗教的方式上都表现得很明显。改信基督教并没有成为信仰上的一场革命，而不过是设法肯定某些新的概念，并将它们融合于古典哲学和语言学的广阔范畴之中而已。第一世纪时，犹太人菲洛便曾竭力赋予《圣经》以一种符合希腊文化并具有普遍性的内容。亚历山大人既然在自己的城市中有此先例，就组织了迪达斯卡莱昂(Didaskaleion)，据说这是由一个名叫潘代努的人建立的，此人在改宗之前原属斯多噶派，因此精通希腊哲学。在塞普蒂米乌斯·塞韦鲁斯的迫害下，这个学院不得不暂时关闭，但在一些有名望的人的领导下又重新开放。这些人中有博学多识的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约 145-210 年）和他的学生奥里根（185-252年）。在奥里根的诱导下，人们对哲学的探讨和语言学的兴趣都达到了顶点。奥里根既接受了基督教，又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安莫尼乌斯·萨卡的学说，把二者熔为一炉。正处于成形期中的基督教被嫁接于古典文化之上，从而得以继承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虽然这二者原来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在这方面尽力最多的正是上面列举的这些出色人物。这是埃及对于新生的基督教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但埃及国内的非希腊人对此却无兴趣，他们的宗教生活更多地出于本能。至于亚历山大的主教，他与当地教士的关系处于一种特殊的局面，因为在早期教会中，教士们常常形成非常强有力的派系。主教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威，他必须依靠亚历山大城以外的埃及各省的主教，而他们又转而靠他来授予圣职。

219

这种利害关系和立场观点的冲突，引起了非常严重的争端。利科波利斯(艾斯尤特)的梅莱修斯主教支持严格的教律，拒绝接受经受不起迫害时期的考验的人进入教会，这便触发了第一场严重的争论。

另一次争端是由学者之间和哲学派别之间的不同意见所引起的，它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争论之点是关于基督的人性和神性这双重性的问题。他所具有的是合两性为一、亦即单一的神性——他的人性不过是外在的表现——，抑或是互相分离的两性？叙利亚的阿里乌教士选择了第二种答案，这便激怒了教会正式重作答辩，对他严加谴责。正教最热心的捍卫者是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圣阿萨纳修斯（293-373 年），他在这次风涛中巍然不动，甚至而对那些支持阿里乌教派的皇帝们也寸步不让，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承认他是教会的捍卫者。半个世纪以后，另一位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西里尔(412-444年)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内斯托里乌斯的学说，而且成功地顶住了皇帝西奥多修斯二世。在这次辩论中，西里尔纠正了先前神学家们的断言，他强调基督以一体而具有两种本性。他死后，尤蒂基斯修士在西里尔的继承者迪奥斯丘勒斯支持下走得更远，他坚持说基督只有一种本性。451 年，卡尔

西顿宗教会议谴责了这种学说。由于亚历山大人以他们的主教们的渊博和圣洁而自豪，这一学说对他们随后便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这一哲学-神学运动后来称为基督一性论。

220　卡尔西顿宗教会议(451年)宣布确信两种本性密切结合于基督一身，并以此作为教条，从而明确地结束了这一问题的争论；此举在亚历山大城引起了一场危机，一直持续到穆斯林征服埃及时为止。从卡尔西顿宗教会议时起，亚历山大城有了两位主教。一位是梅尔凯特教派的主教（梅尔凯特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文 malik，意即国王），他是由君士坦丁堡任命的，向国王负责，主管行政、司法和执法大权；与他并列的还有一位敌对的一性论教派主教，埃及人心目中认为他才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神学真理（即基督只有一个本性）的卫道者。梅尔凯特教派主教的权势全靠皇帝的承认和支持，一性论教派和他势均力敌，支持这位主教的是越来越反对拜占庭的民族感情。

信徒之间剧烈的、有时是血腥的内讧，主要发生在亚历山大这座城里。发生的这些常属丑闻的事件传到了外省，但就事实而言，尼罗河谷的基督教徒同耽于思辩的亚历山大人正好相反，他们成功地表现了自己的求实精神，他们的实践对教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埃及的基督教徒认为世俗生活是产生罪恶的来源与场所，他们有计划地结成宗教团体，脱离尘世。也许，这种行为在埃及的异教徒和犹太人中都有过先例（如菲洛所写的"治疗学家"的那些德行高尚行为），但如今这种宗教团体已成为新宗教的支柱。被称为修道院制度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它的第一位杰出代表人物是底比斯的保罗（234-347年），这位隐士和他的门徒安东尼（251-356年）脱离世俗，并组织了一批人隐居修道。最后一位、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人物是帕科米乌斯（276-349年），他以极大的实干精神组织了若干宗教团体，各自分担某些工作和责任，他们遵守戒律，过着一种组织得很完善的集体生活(科诺比阿)。还有阿特里巴的谢努特（348-466年）主持的白修道院，男女修士无不严守戒律。他在埃及完成的这套制度，后来在中世纪的欧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显然，这样地结成大团体过隐居生活决不单纯是出于宗教信仰，无宁说，这是我们业已知道的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的社会问题在宗教生活中的表现。"逃亡"这个词具有宗教和财务的双重含义(逃亡者，既指隐士也指再也无力交付赋税而逃避的人)；人们热衷于到沙漠里去生活，乃是对日常生活中的苦难的控诉。此外，许多有关修道院生活的资料说明，修道院是规模庞大的机构，拥有土地、牲畜、作坊、仓库和经营农业的设备。修道院尽管

221　有可能既富裕而又活跃，但修道士个人却是贫穷的，终日沉思默想、忏悔祈祷。这种情况与大庄园之所以会取代小农庄的原因是很近似的。修道士们满足于修道院的生活，不仅是为了宗教上的追求，而且也是出于那个时代普遍出现的另外一种深切的愿望，那就是逃避艰苦的日常生活以及逼人太甚的政府，寻求保护。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按当时的记载修道士人数如此之多，成千上万。人们进入修道院逃避国家的压榨、或至少是借以减轻由于国家失职而给公民带来的痛苦，其影响所及，使得基督教会当局逐渐取代了民政当局。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竭力阻止行政官员去当修道士，也就是事出有因了。

显而易见，这个社会对于希腊文化传统，无论就其古典的形式而言，或就其在君士坦丁堡表现出来的新形式而言，都不如过去那样乐于接受。罗马时代丰富多采的传统在当地发展起来，这就是被相当笼统地称之为科普特艺术。民族文学现在只以宗教作为主题，使

用本国方言，而虔诚的经文大量出现，则标志着民族传统得到了发展，也许，过去历史学家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充分的公正评价。

但是，亚历山大人主要在神学方面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后来却与六世纪的修士们的反抗不谋而合。君士坦丁堡对埃及日益施加重大压力，强迫接受卡尔西顿宗教会议的教义以及君士坦丁堡随后颁布的其它许多教条。在埃及，许多情况结合在一起，使得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的富有而又有权威的官方教会名声扫地，同时还使得遭到迫害的一性论教派大受欢迎。五世纪时，一性论教徒在教义上从叙利亚得到巨大的支持，到六世纪，他们又与其它受迫害的叙利亚人联合起来。一种疲塌情绪笼罩了埃及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埃及人坚信他们的立场正确而公道，由于不少有关基督在埃及生活时的伪经文，这种信念更形加深。拜占庭人于是成了令人厌恶的外国人，代表着一种不受欢迎的占领者政权。

纸草书非常准确地记下了不同阶层人们的情绪。到处一片恐惧、穷愁和厌倦。政府贪婪无能，国内争吵不休、四分五裂，又与君士坦丁堡互相猜疑、离心离德，这个国家终于民穷财尽、经济力量枯竭就不足为奇了。

没有过多少年，拜占庭政权的脆弱性就在两次军事失利中暴露无遗。

萨珊王朝国王霍斯罗二世想削弱拜占庭的势力。萨珊人已经统治了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阻碍着拜占庭在红海上的贸易。他们如今从三方面发起进攻：一路指向安纳托利亚和拜占庭，一路指向阿勒颇和安条克，再就是指向亚喀巴和埃及，于615年到达尼罗河三角洲。波斯人一旦占领埃及，犹太人便立即起义，他们终于从罗马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性论教会也于此时重新公开出现，此后若干年内，它成了唯一的官方教会。 222

629年，赫拉克利乌斯重新征服埃及，这不过使拜占庭人的占领苟延时日。他们力图严密控制这片殖民地，但实际上已经控制不住。632年，拜占庭决定强制推行既非卡尔西顿宗教会议的、又非罗马的或一性论教派的新的正教，由梅尔凯特教派主教施行恐怖统治。从639年起，穆斯林步步进逼，埃及人于642年终于屈服于答应建立较为公平的经济和财政制度的新的征服者。随着阿拉伯的占领，埃及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吴慎娴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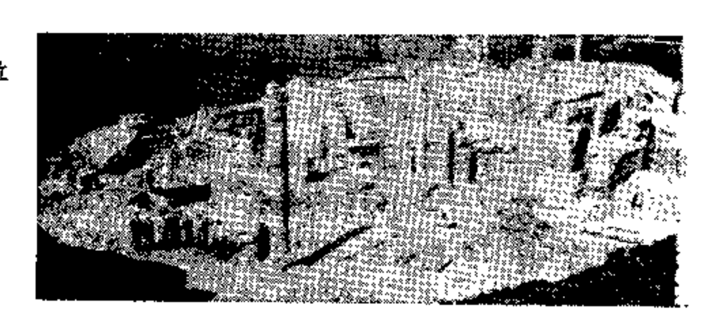
图片7.1 波兰考古队在亚历山大城考姆迪卡的发掘场

223

a) 罗马浴室及火坑供暖系统



b) 罗马戏院，大理石的坐位和圆柱(部分修复)



c) 罗马戏院周围的走廊





图片7.2 韦斯帕西安塑像的头部



图片7.3　黑人角斗士的小立像，身穿短袖束腰外衣、戴胸甲和头盔，手执盾和短剑



图片7.4　手执双刃斧的黑人武士

图片7.5　陶瓦：黑人跪着吹奏一种乐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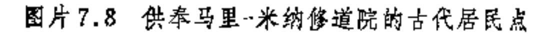
图片7.6　特特拉奇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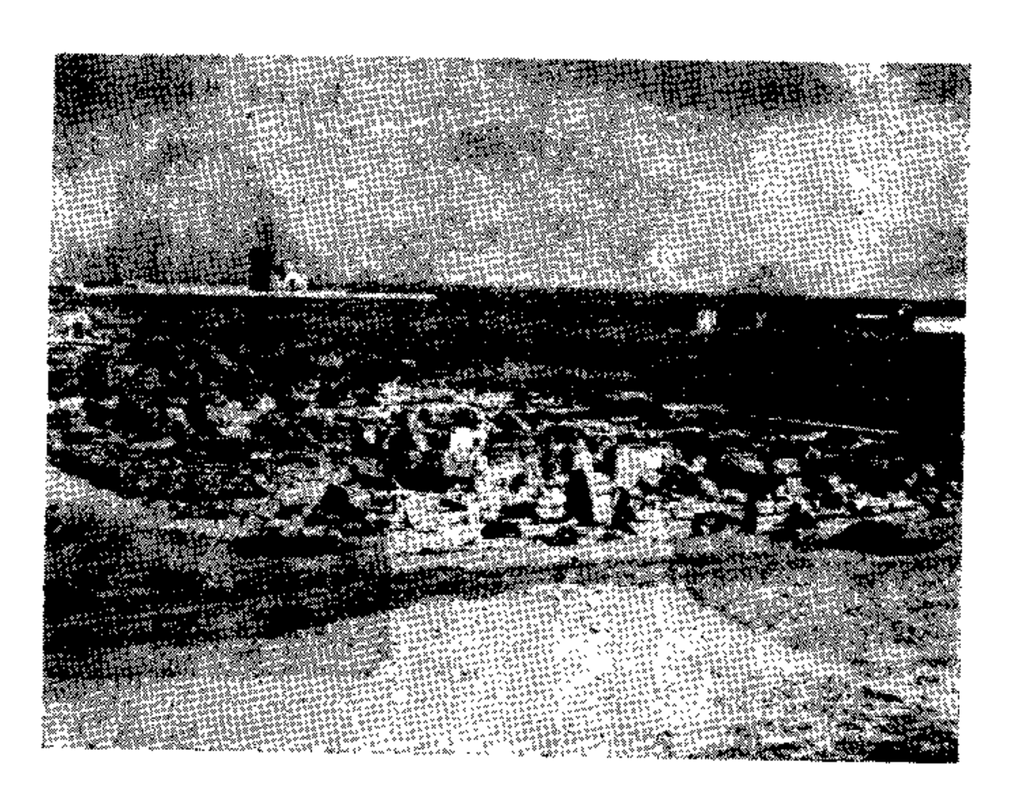
225



图片7.7 博乌特画



图片7.8 供奉马里-米纳修道院的古代居民点





努比亚的重要性：中非和地中海之间的纽带

S. 亚当
(J. 韦库泰协助)

看一下非洲地形图，就可以看出努比亚的重要性：它是把中非大湖地区和刚果盆地同地中海连接在一起的一条纽带。尼罗河流域沿努比亚“走廊”而下，大部分与红海平行，西边是撒哈拉，东边是阿拉伯沙漠或努比亚沙漠；它使地中海的古代文明直接与黑非洲相接触。因此在离喀土穆不到200公里的麦罗埃发现了奥古斯都的精致的青铜头像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尼罗河是穿越这些沙漠地带的可靠途径，但其航程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容易。从阿斯旺到乌姆杜尔曼附近，多处瀑布使尼罗河自北向南的航行很困难，有时简直不能通行。而且，尼罗河的两个巨大河套使航程大为增长，有时它们本身就是主要的阻碍：例如，在阿布哈迈德和迈利克干河之间，尼罗河不是向北而是向西南流，因此在一年中有很多时间，逆流而行就不得不在顶风和急流中挣扎前进，当然顺流而下要容易得多。再往南，是广阔的苏德沼泽地区，虽然不是不能通行，但是不利于文化或经济交流。

不过，总的看来，在非洲，努比亚不仅是南北之间，而且还是东西之间易于沟通的地区之一。在努比亚南部，青尼罗河、阿特巴拉河和它们的支流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山麓平原和直抵红海海岸的洼地，都是通向埃塞俄比亚高原、红海和印度洋的方便之路。在西部，现已干涸而过去畅流的迈利克干河和霍瓦尔干河在第三和第四瀑布之间注入尼罗河，并和科尔多凡平原及达尔富尔平原一起，为努比亚提供了一条通向乍得洼地的方便路线，而且还可以从乍得洼地通往尼日尔河流域和西非。

这样，努比亚就成了横跨非洲的一个十字路口；它不仅是非洲的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之间的文化汇合场所，而且也是近东、远东和地中海欧洲文化的汇合场所。

最近几年，有一种倾向，即把“努比亚”这个词只用来指这一地区的北部，也就是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地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拯救努比亚”运动即使没有造成这种倾向，也是加强了这种倾向。但是努比亚并不止于贫瘠多石的巴滕哈杰尔，它还向南延伸得很远。远在1820年，科斯塔斯在他的“埃及描述”中，把努比亚确定为“在尼罗河流域第一瀑布和散纳尔王国之间的那一部分”。这个王国的首都在喀土穆以南280多公里。但是，即使用这种比较广阔的看法，也把努比亚的真正范围说小了。

历史上，大多数古代埃及文献证明，来自北方的旅行者都是从卡卜稍南的地方进入努比亚。位于底比斯和阿斯旺之间的埃及的一个州，古埃及语长期称作塔塞提，即“弓之国”；用象形文字写成的文件中，传统上就用这个词来指我们现在称之为努比亚的地方。因此，在 230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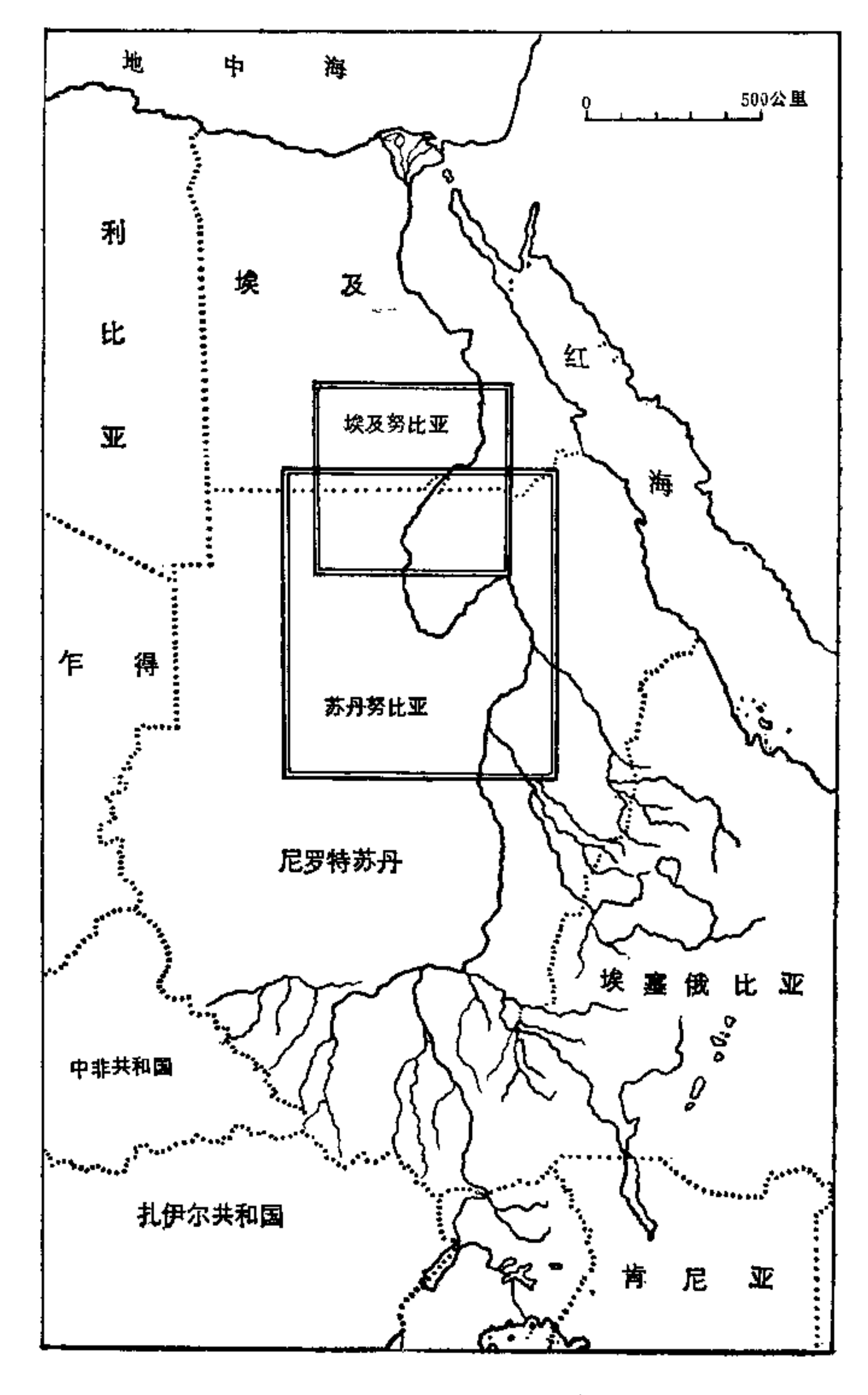


插图 8.1 尼罗河流域和努比亚“走廊”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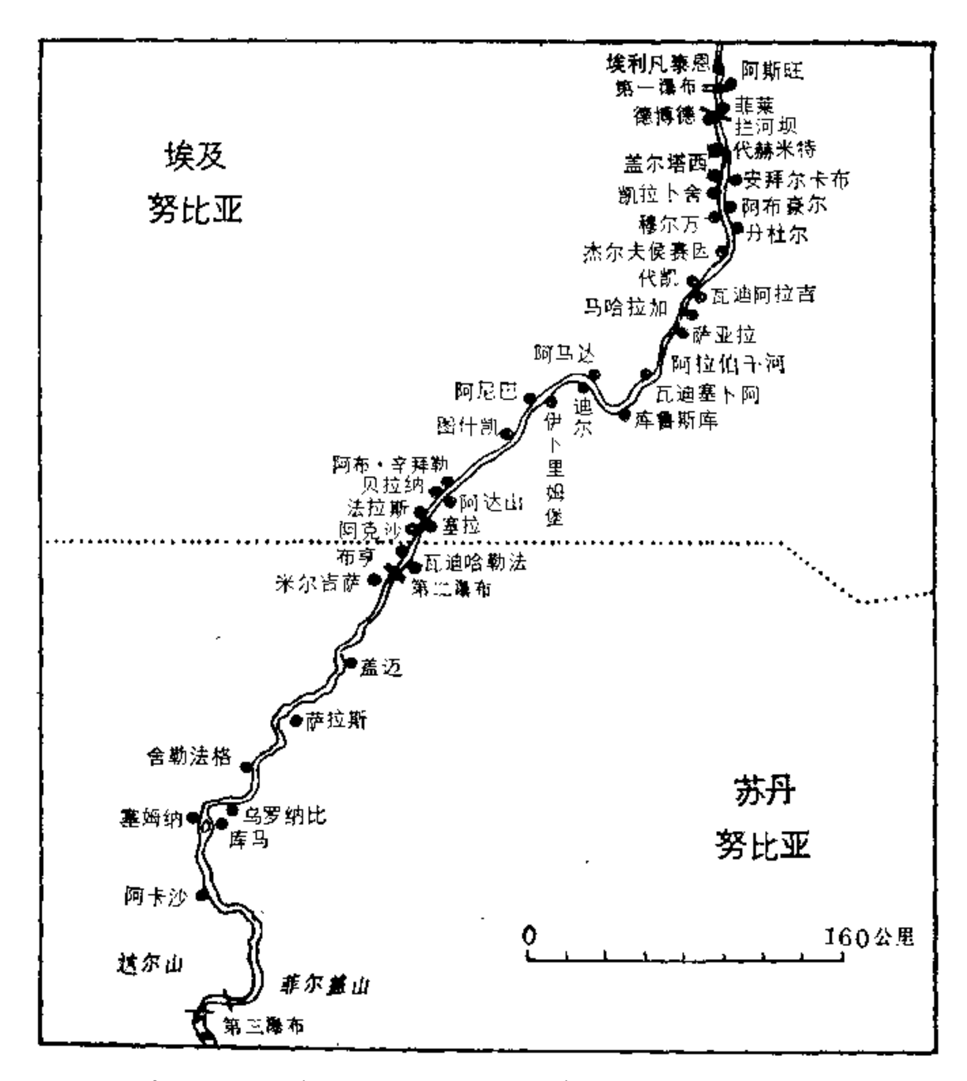


插图 8.2 古代努比亚(据K.米契洛夫斯基，1967b，第29页)

最早的年代里，大努比亚是从尼罗河流域的多沙地区开始的；在这里，“努比亚沙粒”替代了北部的石灰石结构。最初，大努比亚还包括第一瀑布。它南面的界限就更难确定，但是考古研究已经表明，我们纪元前四千纪以后，南自埃塞俄比亚高地的边缘，北达尼罗河埃及部分这一整个地区，普遍存在着同样的或彼此有关的文化。因而更精确地解释科斯塔斯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历史上的努比亚定位于当今埃塞俄比亚西部和西北部边界与埃及之间那部分尼罗河盆地，包括尼罗河流域本身、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的一部分，以及北纬12度以北的这两条河的全部支流，如阿特巴拉河，赖海德河和丁德尔河(见地图)。

弄清努比亚的地理界限是很重要的，这使我们能复查已经知道的有关这一地区的情况，并更清楚地了解它在连接中非和地中海地区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

但是，我们对努比亚各部分的认识大不相同。在建造或建成阿斯旺的一些水坝以前所进行的考古调查，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下努比亚即阿斯旺和巴滕哈杰尔(第二瀑布)之间的地区的考古知识，远非尼罗河流域其它地区可比。但是应该指出，在1896年建造阿斯旺的第一个水坝以前，没有进行过发掘工作，河流附近和第一个水库范围之内的所有的古代遗

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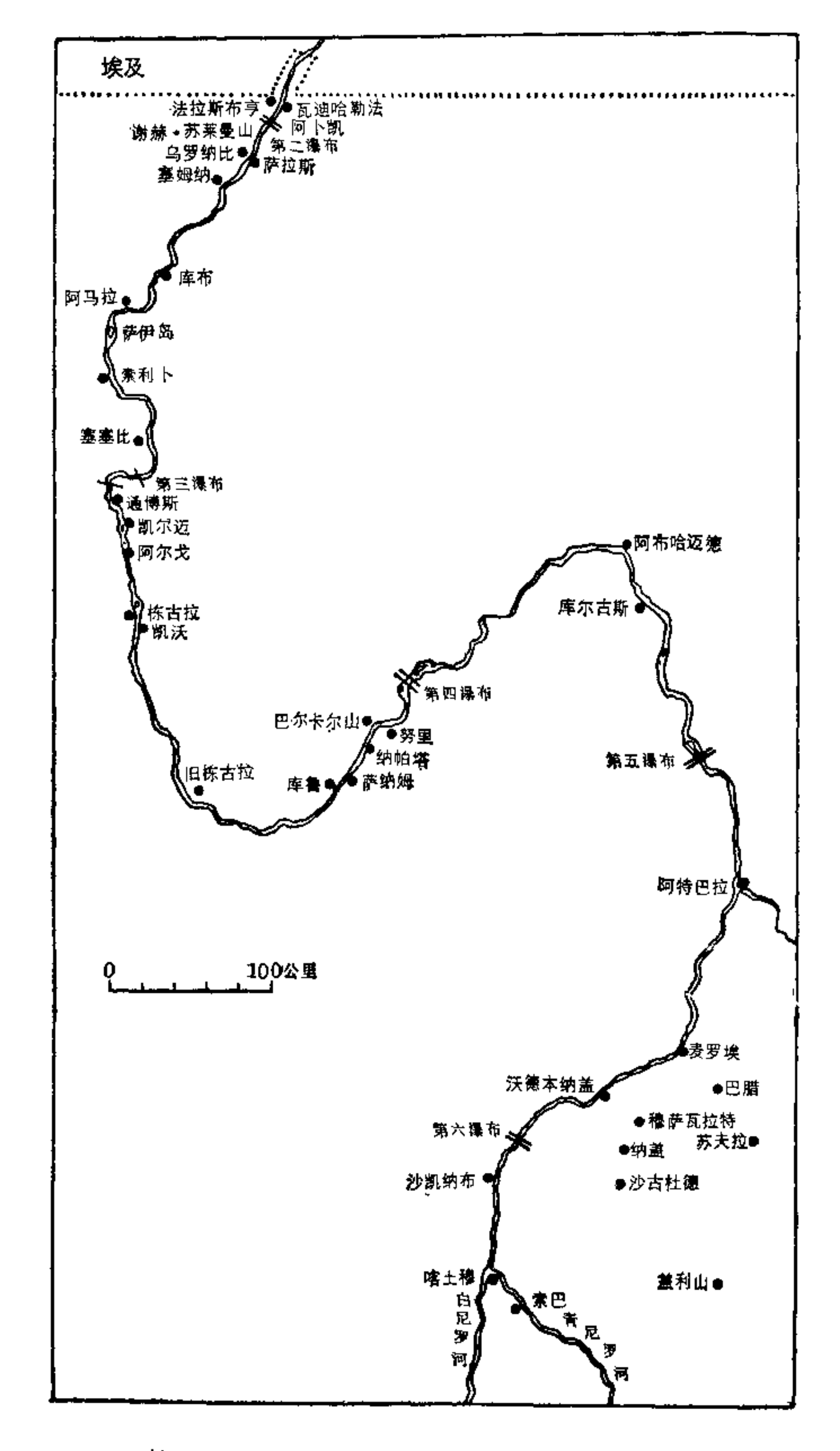


插图 8.3　上苏丹努比亚（据F.欣策和U.欣策，1967，第26页）

址，在还不了解它们的数目、性质或重要性以前就被毁坏了。只是到1902年这个水坝最初建成的时候，才调查了这里的古迹；此后，在每次建坝之前进行考察，就成为一种正规性的措施。最后一次，即1928-1938年间，出版了50多册有关"埃及"努比亚的遗迹和考古的书，其中有许多是对开本。在舍拉勒的新水坝，即阿斯旺高坝蓄水之前，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工作，考察地区远及巴滕哈杰尔。有关这最后一次考察工作的全面性报告即将发表。

因此完全有理由说，下努比亚的历史和考古已经相当明确；一旦所有这些正在进行中的历史、考古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公布于世，我们对努比亚这一部分在联结北方和南方中所起的作用就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关于巴滕哈杰尔以南的努比亚的情况就很不一样，而且很不令人满意。从考古的、因面也就是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除了几个很小的地区以外，绝大部分地区现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确实，在第二和第四瀑布之间的一 231 些重要的"法老"遗址，已经或者将要发掘。若干较明确的"苏丹"遗址也是这样，如（从南到北）杰贝勒穆亚以及喀土穆、纳盖、穆萨瓦拉特、苏夫拉、沃德本纳盖、麦罗埃、加扎勒、纳帕塔、栋古拉和凯尔迈或这些地方附近的几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可是对这些遗址都没有进行彻底考察，而且对于曾经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并对研究努比亚在非洲的影响极为重要的象凯尔迈和麦罗埃那样的一些主要地方，几乎尚未动手。

除了考古方面的研究以外，古代法老的文献以及有些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献也提供了关于努比亚早期文明史的少许资料，使我们对于努比亚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但是这些来源并不能弥补关于努比亚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和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几条大河流域——第二瀑布以南的尼罗河本身，青尼罗河，白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还有象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等边远地区，以及向东通向红海和埃塞俄比亚的路线，都是这种情况。

总之，由于努比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应该比其它任何非洲国家提供更加明确的有关中非和北非以及东非和西非之间相互联系的历史资料。但是，除了努比亚北部以外，我们占有的资料太少，无法深入研究，因此我们对于这种联系的性质、重要性和持续时间的知识也就非常缺乏。

有一个事实给古代地中海地区所有观察家的印象很深刻：努比亚向来是黑人居住的地方。埃及人经常把努比亚居民描写成比他们自己的肤色黑得多的人。希腊人，后来还有罗马人，都称他们为"埃塞俄比亚人"，也就是"深褐色皮肤"的人；最初的一些阿拉伯旅行者称努比亚为"黑人之国"。在中世纪的文献中，把"努比亚人的长官"这一称号写成"尼格里特人的长官"，居民被称为"尼格里特人"。最后，在法拉斯的壁画里，努比亚人的黑色皮肤与天堂里的人物——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的淡肤色迥然不同。

但是我们并不想介入关于努比亚人是否起源于"尼格罗人"或是"含米特人"的纯人类学方面的辩论，即使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纪元前1580年以前的埃及绘画中，从下努比亚来的涅赫苏人（他们和埃及人只是肤色不同）的外形画成和库施人截然不同，当时库施人在尼罗河流域出现，可能是入侵，或者更可能是因为当时埃及人和涅赫苏努比亚人在更远的南方地区同他们有所接触的缘故。这些新来的"库施人"不仅肤色很黑，而且面部有许多特征，这些特征在中非和西非还可以看到；他们和古代及当代的努比亚人完全不同。

232 由于努比亚居民具有非洲的语言和文化，他们所处的位置正好能使他们成为沟通邻近几种密切相关的文化的有效媒介。关于努比亚大约从我们纪元前7000年到我们纪元700年期间的悠久历史，将在以后几章（第九至十二章）中详细阐述，我们在这里只简单地叙述一下历史上努比亚与近邻文化关系的某些方面。

大约从我们纪元前7000年以后，特别是在接近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潮湿时期，从埃塞俄比亚高地的边沿到卡卜地区，甚至向北远及中埃及，整个努比亚地区看来具有共同的物质文明。只是到将近我们纪元前3000年的时候，尼罗河流域下游的埃及部分和上游的努比亚部分的文明才有明显的区别。在这以前，人们发现从南面的喀土穆到北面的艾斯尤特附近的马图瓦尔，丧葬习俗、陶器、石器和以后出现的金属工具，即使不完全相同也非常相似。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各个不同地区在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丧葬仪式以及一般的生活方式包括狩猎、捕鱼、畜牧和与之相联系的原始农业是多么类似。

在将近我们纪元前3200年的时候，埃及出现了文字，然而在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亚，却仍然保持着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口头文化。到我们纪元前2800年，文字在埃及已经普及。这可能是出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的需要，而且也是由于灌溉的发展，以及农业的普遍发展代替了狩猎、捕鱼和畜牧业的结果。这种情况逐步扩大了大努比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差异。

在南部，努比亚的尼格罗居民以他们的口头文化保持着一种以小单位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他们并不感到文字的需要，然而他们肯定知道文字的存在，因为他们仍然与法老世界有接触，有时还相互厮杀。埃及迫于灌溉的需要，逐渐发展成为高度集中的君主形式的组织，因为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在必要时迫使居民执行使整个尼罗河下游宜于耕种所必需的集体任务：建筑和维修与河流平行的堤防，平整“盆地”，挖掘渠道并建造水坝，从而能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经常变化的洪水水位（见第一章）。因此，在尼罗河流域就这样自然地形成了并且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的社会：一种是在努比亚，虽然也有一些农业生产，但以畜牧为主，也许还是半游牧的社会；另一种则基本上从事农业，致力于土地的精耕细作，政治上中央集权。这两种“独特化”的文化，在我们纪元前约3000年以前原本近似面并存，到这时便逐渐在经济上相互补充，这是促进它们之间交流的一种发展。

233 遗憾的是，极难找出这两种社会之间产生联系的细节。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后，我们对于它们之间关系的知识完全是依靠埃及的资料。而且，文字材料给人错误的印象，因为它们往往只记述军事远征；至于考古文物，除了下努比亚外，很不充分，因为它只限于在埃及找到的努比亚遗物，或者最多不过是在阿斯旺和第二瀑布之间努比亚遗址中发现的埃及文物。

尽管如此，这种资料表明，上尼罗河和下尼罗河流域之间的接触是密切的。一定不能忽视它们共同的文化来源，而这毕竟是一种宝贵财富。第一王朝和泰尼特时期的埃及陶器在远至南方的达尔瀑布、甚至比这更远的一些地区发现，这表明南北之间曾经相互交换这些产品。因为在努比亚发现了埃及的物品如花瓶、珍珠、护身符，而在同一时期埃及的墓葬品中，也使用从南方来的大量的乌木、象牙、香料，可能还有黑曜石。这种贸易可能曾

促进思想和技术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但是我们的知识还很不完整，因而不能气量这种影响的重要性、甚至范围。仅举两例：珠子和护身符的涂釉技术是起源于北方还是南方？它象是在两个社会中几乎同时出现的。

就赤色陶器而言，情况也是如此。这种陶器带有一条黑边，是古代整个尼罗河地区的陶工艺术的显著特点。它似乎首先在第四和第六瀑布之间的尼罗河上游出现，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它首先在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出现。但是要确定它的时期，那就太没有把握了。

另一方面，用一种浅黄色的矿物粘土做成的陶器，即专家们所说的“基纳陶器”，无疑是埃及产品，它所采用的原料和制陶技术，无疑都是埃及的。从我们纪元前四千纪末到三千纪初，这种陶器至少是大量地输入下努比亚。在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亚遗址中经常发现这种陶器，这表明在底比斯地区和下努比亚之间曾经有过兴旺的贸易。基纳陶土适宜于制作盛液体或固体的大型容器，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它们盛的是什么——植物油，动物油，还是干酪？但是它们清楚地表明，埃及和努比亚走廊之间的交易是频繁的，这种关系可能比法老们约在我们纪元前 3000 年之后惯于向塔塞提即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弓之国”发动的那类袭击有更大的历史重要性。

但是，在最早的埃及文献中所述及的这些袭击(见第九章)，提供了南方和北方沿尼罗河流域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双重接触的初步资料。尽管这些接触的情况还不很清楚，它们却说明了“努比亚走廊”作为非洲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纽带的重要性。 234

到我们纪元前 3200 年，在第一王朝统治下，埃及人已经对努比亚有了充分的知识，敢于派遣一支军队远及第二瀑布的源头。我们不妨对这次远征的原因做一次无把握的猜测。第一，需要找到埃及正缺乏或日益稀少的原料，尤其是木材。过去，尼罗河两岸必然森林密布，但这时森林已经日益稀疏，而且由于尼罗河下游日益受到控制，灌溉系统及其盆地网逐步扩大，森林正在逐渐消失。

埃及军队干涉努比亚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希望保持对南方通道的畅通，香料、树胶、象牙、乌木和豹子不是来自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而是来自比那里更远得多的南方。然而当时下努比亚的人口稠密，这一点我们从 A 族群墓葬地的数目和规模可以看出来（见第九章）。

与我们几年前的认识相反，这些下努比亚居民不是来自北方。他们是定居在第一瀑布和第三瀑布之间的新石器时代部落的后裔。但是他们可能与第四和第六瀑布之间的上游地区的居民有关，这是根据考古学家对这两个地区的家用物品作出的判断。这些人中，有的仍然是猎人和渔民，但是住在河流附近的则主要从事农业，而远离尼罗河两岸的大草原地区的居民则主要以畜牧为生，甚至还可能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因为当时的气候仍然处在潮湿期，这种气候到非洲新石器时代末才结束。“努比亚走廊”并不限于狭窄的尼罗河流域，而可能是从河的两岸扩展到相当宽广的地区，因此当地的居民如果愿意，就能截击向南通过陆路或沿河而上的埃及商队。

总之，在绝大部分古代法老文献中，还保留着许多有关这一地区的种族名和地名，由此可以发现埃及人对下努比亚感兴趣的证据。但是这些名词涉及的范围大约不超过 325 公里的一段流域，从北部的埃利凡泰恩到位于布亨的第二瀑布的第一湍滩处（这类遗址现在

已淹没在高坝的水中)。埃及人如果不是在王朝前时期末期斯科皮奥国王本人统治的时候，就是在第一王朝杰尔国王统治的时候确曾到达这个地区。

从A族群遗址挖掘出来的出土文物中，有关南北之间接触的资料到我们纪元前2700年左右突然中断，至少在下努比亚是这样。除极少几个努比亚人的坟墓或村落留下以外，当地居民似乎突然抛弃了他们的土地。过去在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的稠密人口为何忽然消失，至今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是因为法老们把这个国家的产品掠夺一空，还是努比亚人主动退向流域两岸的大草原或更南的地方？这些问题特别难以回答，因为实际上对第二瀑布以南的地区或对尼罗河两岸附近还都没有进行考古考察。

235

因此，关于大约我们纪元前2700-2200年之间的这一时期的知识，我们不得不依靠从埃及文字资料中找到的很少线索。这些资料报道了努比亚的塔塞提地区的军事战役，这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地区被放弃。我们从中知道，在斯尼弗鲁统治时期（约我们纪元前2680年），法老的部队俘虏了11万人和20万头牛；这些数字证实，在该地区被抛弃以前、A族群时期末期人口众多和他们的社会中畜牧业规模巨大，这种规模有时可与当今东北非的"畜牛综合企业"相比拟。但是我们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大量的牲畜，除非那些人开发了当时河流两岸宽阔无垠的许多干旷草原和热带草原以及尼罗河流域本身。

1961-62年一项考古学的重要发现，有助于对努比亚走廊这段情况不明时期的历史背景有略多的了解。在布亨发现了埃及古王国的一个村落和法老的一些印章，有些是第四王朝末期的，但是大部分属于第五王朝。这个村落与一批炼铜的熔炉在一起。

这个发现首先表明，埃及人并不完全依靠亚洲的铜，特别是西奈的铜。他们已经在非洲的努比亚彻底勘探金属。其次，它表明，那时埃及人已经能够或者被迫把冶炼技术引入尼罗河上游地区，这件事具有重大意义。在布亨的发现证明了这时候非洲已经生产铜。但是，要生产铜，首先就必须发现矿脉，然后从矿脉中采矿，建造特殊的熔炉，并向熔炉提供适宜的燃料，制造熔化锅，铸成金属，并在最后制成铸块之前，至少要把它们精炼到某种程度。即使努比亚人不积极参与炼铜，他们看到这一系列工序，至少也会获得炼铜的基本知识。在我们纪元前第三千纪中期所采用的这种早期的冶金术，可能是对大约500年以后（约我们纪元前2000年），他们在制造铜器和冶炼黄金方面所显示的技术的最好解释。

这一情况不明的时期，在略早于我们纪元前2200年时结束，我们还是从考古学和文字记载中得到这方面的资料。在古王国最后王朝第六王朝的埃及文献中，有几处关于远征上努比亚的记载(见第九章)。这一王朝初期，这些远征显然是贸易性质的，和平的：埃及人想在努比亚取得王家建筑所需的稀有石料或仅仅是木材。他们采用的方法以后也曾采用，即同时寻找稀有的或笨重的货物和木材。他们采伐上游的木材造船，然后用这些船把沉重的货物运回埃及；这些船回到埃及后被拆掉，再把木材派作其它用途。显然，这种贸易也促进了双方思想和技术的交流。埃及的万神殿甚至多了一个新的非洲神——德登香料神。为了改进与南方的交往，埃及人在阿斯旺第一瀑布的湍滩处开掘了可以通航的水道。这种我们纪元前三千纪创始的政策，中王国和其后的新王国的法老们都曾继续执行。

236

埃及远征队除取道尼罗河这条路线以外，也走陆路。那时这些路当然不是沙漠中的道

路，因为新石器时代潮湿期刚刚结束，向南去的旅途如果不是树木荫翳，也一定有充沛的泉水和水穴，因为人们经常使用象驴群之类的驮畜，需要不断为它们供水。他们沿着某一条所谓绿洲路线，用驴子运输香料、乌木、某些油类、豹皮、象牙等来到埃及。新近的一些发现表明，至少有一条道路的起点是达赫莱绿洲，而哈里杰绿洲当时还是一个湖泊。遗憾的是，埃及文献没有告诉我们，埃及人用什么来交换他们带回来的货物；更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讲明是从哪里得到供应的。文献中提到若干非洲地名，但是专家们还是不能肯定这些地方的位置。通过系统的考古勘察，还可以发现许多新的情况，勘察的地段不限于第二瀑布以南尼罗河流域的努比亚部分，也许更重要的是流域以西的几条陆路，这些道路把一连串的“利比亚”绿洲同塞利迈以及通向恩内迪、提贝斯提、科尔多凡、达尔富尔和乍得湖的一些河谷或洼地连接在一起。

不论埃及人是沿尼罗河走水路还是走陆路，看来从上述很早的时候起，他们就已经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相接触，而“努比亚走廊”在这些交往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佩比二世统治时期，即将近我们纪元前2200年时，埃及远征队从很远的南方带回一个“跳圣舞的矮人”(见第九章)。用来描述这个人的词是丁尼格(deneg)，而在象形文字的文献中，一般称矮人为奈莫(nemu)。我们完全可以怀疑“丁尼格”一词是否确指俾格米人，回答很可能是肯定的。如果确实如此(“deneg”一词译作俾格米人，现在已被普遍接受)，那么古王国的埃及人当时一定已经与这个赤道森林中的种族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即使俾格米人当时的居住地比今天的住处向北扩展很多(这是可能的甚至很可能如此，因为第三千纪的气候不同)，这个地区还是离努比亚的南部很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王国的埃及人与中部非洲有交往，而努比亚和它的居民在这些交往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237

总之，埃及和中部非洲之间的交往可能追溯到很久以前，因为“丁尼格”一词出现在金字塔的文献中。当然，这些文字是什么时候写的，意见还很不一致。但是即使我们做最保守的估计，它们也不会比第五王朝更晚，而且很可能要早得多。

由此可见，最晚在第六王朝，埃及人就知道有俾格米人存在。这一点已被第六王朝时期的一篇文献所证实，该文谈到在第五王朝倒数第二位国王伊塞西法老时代，一个“丁尼格”就已经到达埃及。在蓬特地方发现这个俾格米人，这点表明他的故乡一定远离努比亚南部，因为蓬特一定是在厄立特里亚或索马里沿海的某个地方。“跳舞矮人”也一定是在这里由第三者给埃及人弄来的。上述两种情况说明，俾格米人有可能在埃及出现，这就意味着尼罗河下游地区和赤道以南非洲之间有过交往。

由于共同的利益和法老们需要毫无阻碍地得到遥远非洲的资源，埃及和努比亚建立起来的和平关系，到第六王朝末佩比二世统治时期开始恶化。在佩比二世统治末期的文献中，就透露了埃及远征队和努比亚走廊的居民之间的冲突。例如，一个埃及远征队的首领在南下途中被杀死，他的儿子不得不发动一次攻击才找回尸体，把它运回埃及按仪式埋葬。

显而易见，由于这种紧张状态，加上将近我们纪元前2400年出现了开始影响气候的一些变化，就必然会导致人口的迁移。我们纪元前2400年以前，在北纬15度和30度之间的整个地区比今天潮湿，因而适于居住。虽然按这个地区范围来说，人口并不稠密，但

是它必然曾供养为数很多的居民。

可是气候逐渐变得干燥，驱使居民迁往更宜于居住的地区，南方，当然还有尼罗河流域。埃及的古代绘画似乎把这些迁移情况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约在我们纪元前2350年，即在第五王朝，古埃及坟墓上首次出现以骨瘦如柴的牧羊人为主题的日常生活的画面。看到那些饥饿的游牧或半游牧的牧羊人从日益变成沙漠的地方逃走，到埃及寻找食物和工作，的确令人神往。

238 过去曾探寻我们纪元前2300年左右在努比亚走廊出现的所谓C族群的遥远策源地(见第九章)，现在看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事实上这些人就在附近，只是由于气候条件变化而被驱赶到尼罗河流域定居。但是这些来自日益变成沙漠地区的移民，必然不得不与那些已经住在尼罗河边的居民斗争。这种对抗在第六王朝末期的文献中可能有充分的反映。

无论如何，考古方面的资料已经证实，这些新的居民是A族群的直接后裔。他们保持与尼罗河下游地区相互交易的传统，后来又成为非洲文化同埃及文化和地中海文化的媒介。

据现有考古学所了解的情况，从我们纪元前2300年起，努比亚走廊的居民分裂成几个"氏族"。他们虽然密切相关，但各有自己的物质文化——陶器，各种式样的器具，武器和工具；也有各自的埋葬仪式——坟墓的式样，坟墓的安排，墓穴内外的随葬品等。然而，类同之处大大超过了不同之处，它们都是家畜饲养业占重要地位，广泛使用带黑边的赤陶器，"土丘"式的坟墓等。

从我们纪元前2200-1580年，阿斯旺和巴滕哈杰尔之间（见地图）的C族群居民与埃及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或者是因为埃及直接统治着这个地区（约我们纪元前2000-1700年），或者是因为许多埃及人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永久性居民（约我们纪元前1650-1580年），他们很可能是在新的库施王国中服役（见下文第九章）。由于他们继续与自己的家乡底比斯地区保持着联系，因而有助于传播埃及的思想和技术。

从巴滕哈杰尔再往南，是凯尔迈王国，这个王国的名字是以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要的中心地区命名的(见第九章)。它的文化与C族群文化仅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到目前为止，在已发掘的很少几个遗址中的出土文物表明，它不仅同埃及有联系，而且从我们纪元前1600年以后也同亚洲的喜克索人有联系。喜克索人看来和凯尔迈王国有直接交往。

"凯尔迈"管辖区的北部边界很容易确定：就在巴滕哈杰尔。但是南部边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从最近（1973年）在喀土穆以南的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之间发现的凯尔迈陶器看来，即使凯尔迈王国本身并没有伸展到当今的吉齐拉，它的影响确实达到那里，因而和尼罗河的苏德地区有密切接触(见地图)。

特别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肯定凯尔迈王国向赤道非洲延伸多远，因为它可能是历史上所知道的第一个非洲"帝国"，曾经有过很发达的文化，非但对东方和西方各国、对尼罗河上游和中非的南方各国也同样能发生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接受凯尔迈王国的范围是从第239 三瀑布伸展到白尼罗河这个假设，那么它不仅控制了尼罗河流域所形成的南北干线，而且也控制了从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地区到红海和印度洋的东西通道。因此它的位置正好可以传

递来自埃及或来自喜克索人的技术和思想，我们知道，正是通过喜克索人，那些技术和思想与非洲这些地区的文化相联系。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目前仍在凯尔迈遗址中占主要地位的大型建筑物起源于埃及还是努比亚的问题(见第九章)；虽然砖是根据法老技术制造的，但是建筑物的设计与当时尼罗河下游地区的建筑结构很不相同。在我们知道更多史实之前，还是把它们当作受埃及影响的“库施人”的作品较为合适。库施王国的名字是在我们纪元前2000年后的法老文献中出现的，凯尔迈看来曾经是库施王国最重要的城市中心。

我们只需强调一点：这个王国通过它的技术，特别是冶金术，可能曾大大地影响了邻近的文化，它的首都规模很大，其政治势力有可能使它的影响达到很远的地方。遗憾的是，对这个王国的边远地区很少或者还没有进行考古勘察，因此以我们现有的知识，只能对凯尔迈王国在传播思想、技术或语言方面的作用进行推测。

我们已强调库施王国的物质力量，看来这是肯定的。这一点已经由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从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到阿门内姆哈特三世，对它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所证实。从塞姆纳往北到代拜拉(见地图)修建的一系列堡垒，用来对付库施军队，保卫埃及南疆，可以生动地说明“凯尔迈”对埃及的潜在威胁。所有这11座堡垒，墙厚6至8米，高10至12米，有突出的圆形棱堡，河边的通道保护得很好，不仅保卫了尼罗河，而且还可以作为沙漠战役或向南作战的军事基地。这类远征在第十二王朝的最初六个法老的整个统治时期是常见的，同时也证明了凯尔迈人民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也许他们本身就受到从更远的南方来的种族集团的压力。建筑新的阿斯旺水坝的悲惨后果之一，就是这些筑垒艺术的杰作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毁灭。

我们纪元前2000-1780年之间埃及人对从北到南的通道所做的改进，确实证明了努比亚走廊当时仍然是非洲、尼罗河下游地区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的主要通道：使第一瀑布的可通航的水道保持畅通，在第二瀑布不可通行的湍滩建造一条与之平行的“道伊尔科斯”(doilkos)，即把船只从陆地上拖曳过去的纤道，在塞姆纳建造了一个水坝以利于在巴滕哈杰尔的一些较小的湍滩上通航。这一切都表明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决心尽一切可能使通向南方的道路更加完善。 240

当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确定塞姆纳为埃及边界的时候，他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防御力量，以抵抗可能来自南方的强大侵略者的攻击，不过有一个著名的文献记载着他的命令，指示这些防御工事不得妨碍埃及人和努比亚人都能获得很多利益的商业往来。

关于我们纪元前1780-1580年间的动乱时期，即被埃及学家称之为第二中间时期的一些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是这段时期对库施王国来说似乎是一个黄金时代，它的首都凯尔迈看来曾利用埃及统治者的控制日益削弱的时机，增加尼罗河下游和上游地区的贸易量而从中获利。

不应低估这种贸易的重要性。从凯尔迈和埃及的堡垒中都发现了用来封信的无数印泥戳记以及从北方运来的其它各种物品；与以往认识的相反，埃及堡垒在第二中间时期并没有放弃，或者可以说，它是在相当晚的阶段才放弃的，而且放弃的时间也不长。在中王国时期，驻军实行定期轮换；在第二中间时期，据守堡垒的人成为努比亚的永久性居民，他

们带有家眷，死后就地安葬。他们甚至很可能逐渐承认库施国王的宗主权。那些埃及人既是这个社会的成员，他们就肯定会大力传播自己的文化。

在喜克索时期(我们纪元前 1650-1580 年)，非洲的库施王国和埃及之间的交往看来是最密切的。沿努比亚走廊都能发现刻有当时统治埃及的亚洲国王名字的圣甲虫宝石和印玺。在凯尔迈当地发现很多，以致有一段时间人们曾认为在上埃及投降后努比亚曾受喜克索人的蹂躏。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中尼罗河的非洲人曾经和尼罗河三角洲的亚洲人有过很密切的联系，因而当第十七王朝的底比斯法老们着手重新征服中埃及和下埃及时，喜克索国王自然要向他的非洲盟友求援，并且建议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埃及法老(见第九章)。

总之，底比斯的上埃及和凯尔迈的库施人之间的关系既是敌对的，又是相互补充的。从我们纪元前 1650-1580 年，为库施国王服务的底比斯人把他们的技术专长带到中努比亚，还有许多埃及人驻在下努比亚的堡垒里，保证了库施与北方的喜克索统治者之间的联系。241 而且第十七王朝末期的几个法老在统一上埃及的内战中和赶走喜克索人的战争中都雇用了梅扎人去打仗。这些从努比亚沙漠来的非洲士兵与沿尼罗河定居的涅赫苏人属于同一种族，实际上也具有同一种文化。

因此，在整个第二中间时期，在埃及能找到努比亚人，在努比亚也能找到埃及人。这一点必然有助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努比亚走廊逐渐变成一座熔炉，把非洲和地中海文化溶合而产生出一种混杂的文化。但是这些非常密切的交往却对凯尔迈的第一个库施王国的发展起了戏剧性的影响。

第十八王朝，即图特摩斯王朝的法老们，亦即曾经重新统一埃及和赶走喜克索侵略者的那些法老及其继承人和后代，意识到在南部边界以外的一个统一的非洲王国对于埃及是危险的：喜克索人和库施人的联盟曾使底比斯的抱负几乎无法施展。此外，即使在喜克索人退往巴勒斯坦以后，亚洲的威胁还是存在。埃及为了保护自己，便开始执行一种有计划地干涉近东的政策。

正如后来的历史所清楚证明的，埃及自己的资源，不论是人力还是原料，都不如小亚细亚的潜在力量。底比斯的法老们知道，塞姆纳以南的非洲具有埃及所缺乏的丰富的原料和人力，因而他们在没有完全控制努比亚走廊以前是不会安心的，因为它是到达非洲那一地区的唯一通道，而那里的资源对他们的亚洲政策来说又是如此必不可少。

人们常认为，埃及军队在控制努比亚走廊方而并没有什么困难，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们获得成功以前，从雅赫摩斯到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新王国的每一个法老都曾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战役。

努比亚人的抵抗看来曾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反抗埃及对他们国家的控制，另一种是或大量放弃其土地，逃往南方。这个国家的人口逐渐减少，我们从上努比亚和下努比亚的坟墓愈来愈少就能看到这一点。这种情况促使法老逐步向南推进，以便取得非洲的物资，这些物资对他们统治近东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在图特摩斯一世时代，征服了第二瀑布和第四瀑布之间的整个地区。埃及人当时已经直接控制了通向达尔富尔、科尔多凡和乍得的沙漠道路；或者是从萨伊岛走，通过塞利迈

和霍瓦尔干河；或者是从当今的德巴走，经过迈利克干河。但是他们也能去非洲大湖地区：或者从阿布哈迈德出发（这个地区已发现图特摩斯一世和三世的石头碑文，名字周围饰有漩涡花纹），沿着尼罗河走；或者从库尔提抄近路穿过拜尤达沙漠，经过在第五瀑布的瓦迪穆盖达姆和瓦迪阿布道姆再走上尼罗河这条主要道路。这条路除了近得多以外，还免去在库尔提和阿布哈迈德之间从东北向西南逆流而上的困难，也避免了在第四和第五瀑布航行的许多困难。 242

新王国的法老们是否真正利用这些特殊的机会深入非洲，我们不能肯定，还是因为对这些路线没有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如西部的干河（霍瓦尔和迈利克）、第四瀑布和第五瀑布之间的尼罗河以及拜尤达沙漠。但从图特摩斯四世统治时期起（约我们纪元前1450年），坟墓和建筑物上的尼格罗人形象有显著的变化，意味着埃及远征队或者代表埃及的中间人确实利用过这些道路。

在法老陵墓和建筑物上雕刻着的尼格罗人完全是一种新的形象，有时象当今尼罗河流域的希卢克人和丁卡人（塞贝克荷太普的陵墓），或者象现代苏丹的科尔多凡和纳巴山区的居民。

第二瀑布和第四瀑布之间的尼罗河流域尽管遭到法老的占领，但对几处当地人所作的很彻底的人类学研究，并不能证明当时努比亚在人种方面有重大变化。相反，这些研究表明，当地人的体质类型显示出明显的持续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没有获得更多的资料以前，可以认为新王国的肖像画中出现的尼格罗人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遇到埃及人；而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埃及人和尼格罗人在我们纪元前1450-1200年之间，在非洲的中心地区有过直接的接触，即使仅仅是在短暂的军事远征中的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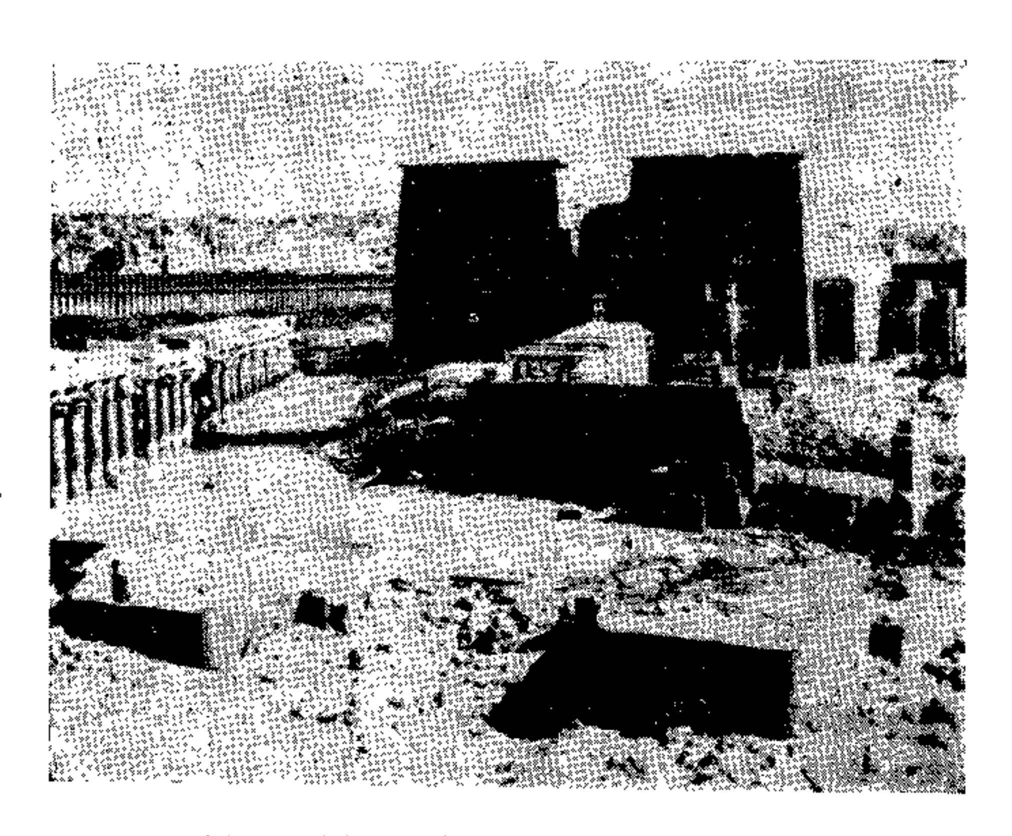
这篇简短而概括的论述表明，努比亚由于地理位置处在中非和地中海之间，它所起的特殊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媒介作用，到我们纪元前1800年就相当显著了。本文也提出几个肯定的要点：埃及非常需要非洲资源，加上努比亚对北方文化的兴趣，随使两国间产生连续不断的交往，这种交往在我们纪元前1200年到我们纪元700年整个期间有时密切，有时较少，但从未中断。

纳帕塔王国（我们纪元前800-300年）和麦罗埃帝国（我们纪元前300年到我们纪元300年），巴拉纳和古斯图勒（X族群）的文明（我们纪元前300年到我们纪元600年），以及我们纪元600年以后的一些基督教王国，都把努比亚看作中非洲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之间的重要纽带。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象在他们以前的喜克索人一样，都曾发现努比亚的黑非洲世界。不同的文化在这个交叉路口相遇，并混合在一起，正象它们在我们纪元前7000-1200年那样逐步形成一种文明，这种文明基本上具有努比亚的面貌，但却明显地受到埃及的影响。 243

各种技术和思想通过努比亚的制品从北方传到南方，无疑也从南方传到北方。必须再次强调指出，遗憾的是，在尚未对北纬20度以南的非洲作更为彻底的考古考察之前，还不能充分说明这种相互交流的详细情况。目前这些资料很不完全，甚至会给人们以错误的印象，因为北方的作用显然被夸大了，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南方的情况知道得太少。关于尼罗河两岸以及北方和南方之间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有许多揣测，但是在我们获得更详细

的资料，了解我们纪元前7000年到我们纪元700年之间尼罗河流域的苏德地区、科尔多凡、达尔富尔、乍得和通向埃塞俄比亚的东部道路以及尼罗河和红海之间的地区所存在的"黑色"文化以前，种种揣测还要继续存在。

（于 一译）



图片 8 1 菲莱附近阿吉尔基亚岛上重建中的努比亚遗址



纳帕塔王朝以前的努比亚（我们纪元前3100-750年）



N. M. 谢里夫

A 族群时期

我们纪元前第四千纪末期，努比亚已经有了盛极一时的卓越的文化，考古学家们称这种文化为 A 族群文化。[①] 从 A 族群墓中出土的埃及所产的铜器（迄今在苏丹发现的最早的金属器具）和陶器表明，A 族群文化的全盛时期同埃及的第一王朝（我们纪元前 3100 年）处于同一时代。A 族群文化同努比亚的另一些文化一样，是用一个字母表示的，因为当时没有文字，而有文字的民族对 A 族群文化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也不能把它同任何已经被发现的特定地方或重要中心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却是一个繁荣的时期，当时人口有相当大的增长，便是繁荣的标志。

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确切无误的 A 族群遗迹，迄今为止限于北起第一瀑布、南至巴滕哈杰尔（石腹）之间的努比亚。但再往南，苏丹北部几个遗址的地面上发现了类似 A 族群使用的陶器。从乌姆杜尔曼桥附近的一座坟墓中[②] 出土的一个瓦罐同在法拉斯发现的一座A 族群坟墓中的一个瓦罐一模一样。[③]

从种族角度来说，A 族群人的体质特征同王朝前的埃及人很相似[④]。他们是半游牧民族，大概放牧绵羊、山羊，也有一部分牛。他们通常住在小帐篷里，逐水草而居。

A 族群属于铜石并用时期的文化，这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属于新石器时代，但是使用少量的铜制工具，这些都是从埃及运进的。A 族群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从有关的人们的坟墓中发现的陶器。可以辨认出这些陶器分若干类型，但是“A 族群陶器一致的特色是制作精巧，富于艺术性的装饰和设计胜过同时代大多数文化的制陶艺术。”[⑤] A 族群文化的典型是一种精美的薄陶器，里面涂黑釉，外面有仿照篮子图案绘制的红色花纹。与这种陶器一起发掘出来的还有一种尖底大肚坛子[⑥] 和带有“波浪形突起”把手的罐子和埃及出产的石竹色圆锥形坛子[⑦]。

247

① 雷斯纳(G.A.Reisner)，1910-1927 年。
② 阿克尔(A.J. Arkell)，1949 年，第 99、106 页和图片 91-100。
③ 格里菲思(F. L. Griffith)，1921 年，第八号，第 1-13 页。
④ 埃默里(W.B. Emery)，1965 年，第 124 页。
⑤ 申贝(B.Schönbäck)，第 43 页。
⑥ W. B. 埃默里，1965 年，第 125 页。
⑦ 同上，第 12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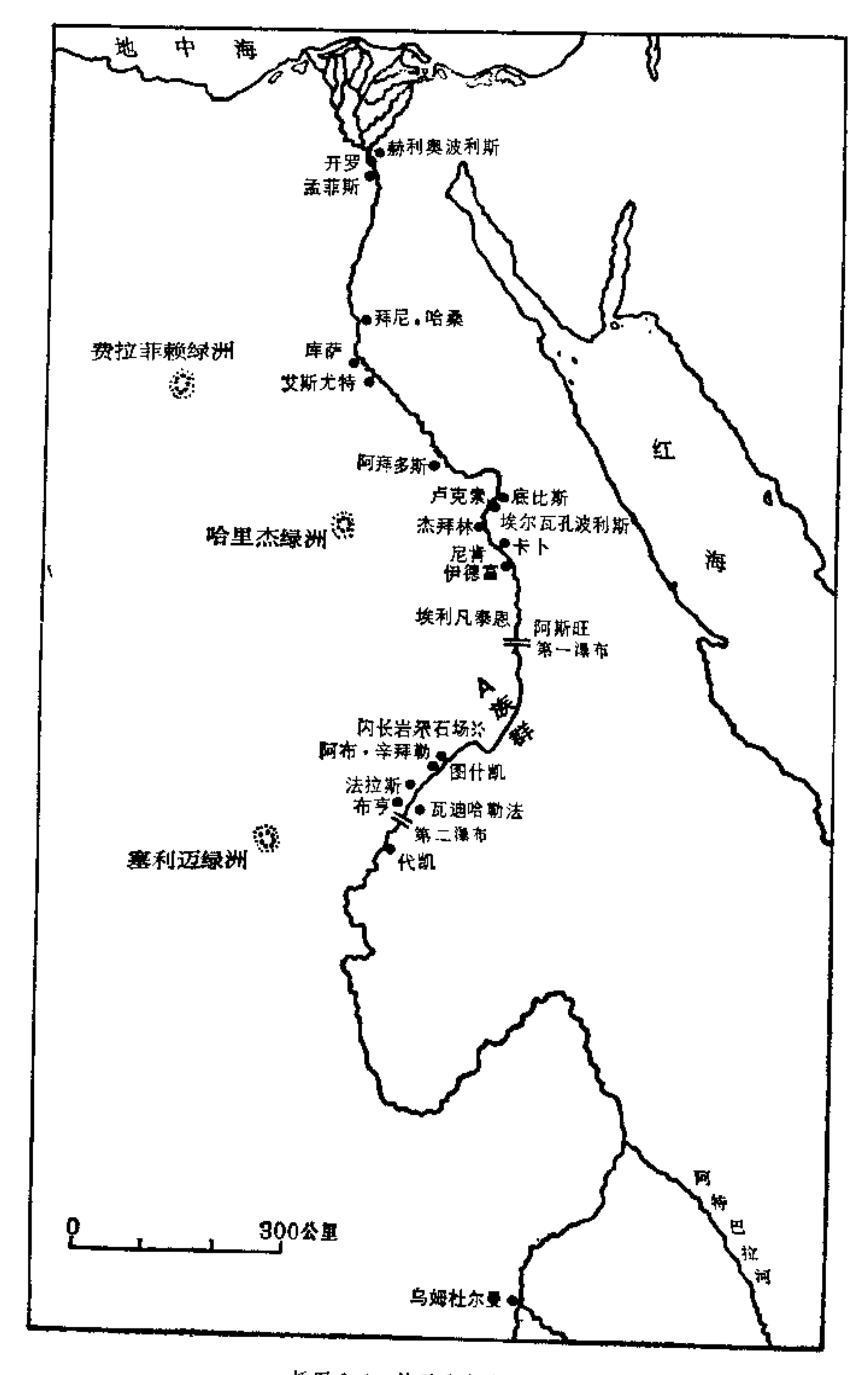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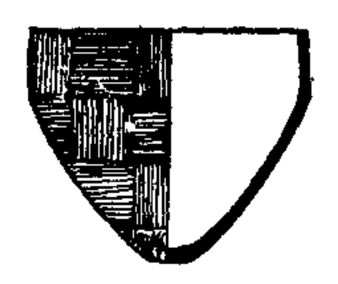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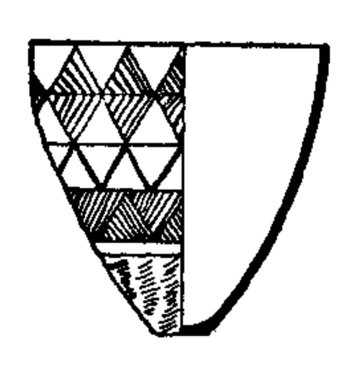

地 中 海
赫利奥波利斯
开罗
孟菲斯
拜尼·哈桑
费拉菲赖绿洲
库萨
艾斯尤特
阿拜多斯
红
卢克索
底比斯
哈里杰绿洲
杰拜林
埃尔瓦孔波利斯
卡卜
尼肯
伊德富
海
埃利凡泰恩
阿斯旺
第一瀑布
A 族 群
闪长岩采石场
阿布·辛拜勒
图什凯
法拉斯
布亨
瓦迪哈勒法
第二瀑布
塞利迈绿洲
代凯
阿
特
巴
拉
河
0
300公里
乌姆杜尔曼

插图 9.1 埃及和努比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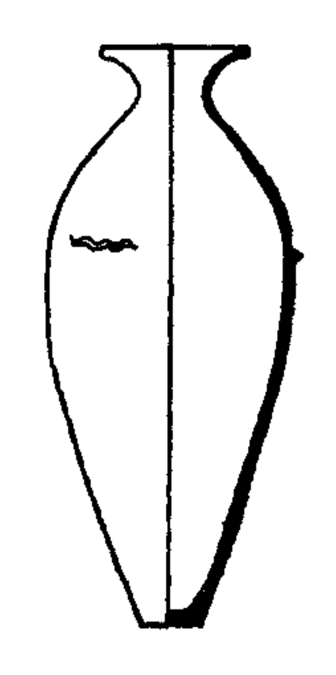


插图 9.2 A族群陶器

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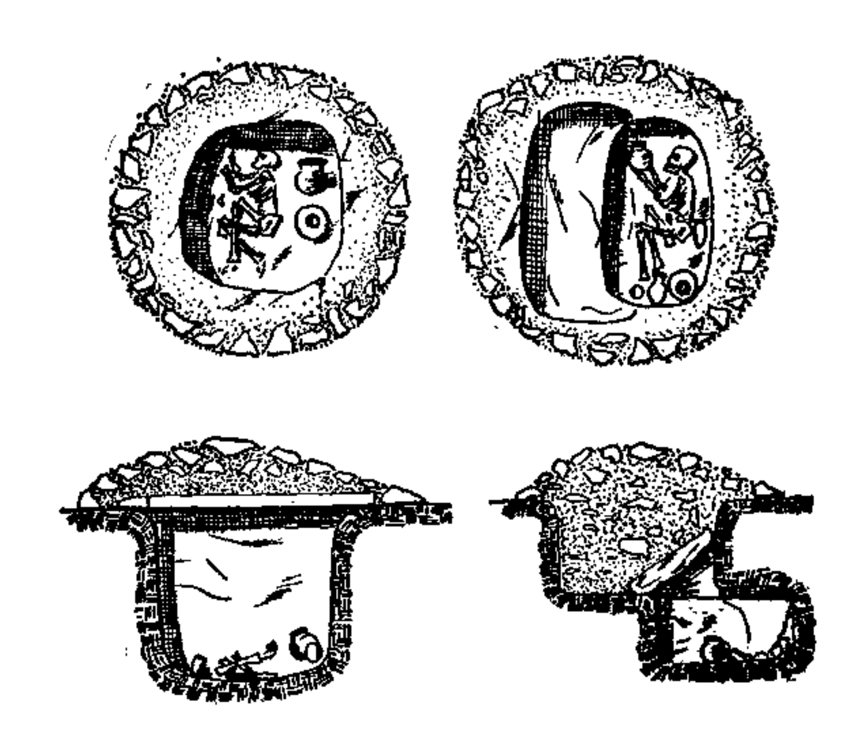


插图 9.3　A 族群埋葬方式(据W.B.埃默里)

至于A族群的埋葬习惯，我们已知有两种坟墓。第一种是一个约 0.8 米深的简单的椭圆形土坑，另一种是一个约 1.3 米深的椭圆形土坑，在其一侧有个凹下去的墓穴。尸体用皮革的寿衣裹着，右侧向下，放在墓穴里，通常是头朝西。除了陶器以外，殉葬品中还有椭圆形或扁菱形石板、鸵鸟羽毛扇子、雪花石膏磨石、铜斧、铜钻、木制飞镖、骨制手镯、泥塑女性偶像、贝壳念珠、玛瑙和涂蓝釉的冻石。

248 A 族群的终结

据认为，A 族群一直在努比亚延续到埃及第二王朝解体之时(我们纪元前 2780 年)，其后是一个明显的文化衰落和经济贫困时期。这个时期从埃及第三王朝的建立（我们纪元前 2780 年）持续到第六王朝（我们纪元前 2258 年)。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与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处于同一时代[⑧]。在努比亚发现的这个时代的文化被早年在那里工作的考古学家命名为 B 族群。他们声称，在埃及古王国时代，下努比亚居住着与以前的 A 族群截然不同的土著[⑨]。虽然有些学者[⑩]认为这种假设是成立的[⑪]，别的人却不赞成[⑫]。而现在人们普遍认

⑧ 同上，第 124、127 页。
⑨ G. A. 雷斯纳，1910-1927 年，第 313-348 页。
⑩ W. B. 埃默里，1965 年，第 127-129 页。
⑪ 特里格(B.G. Trigger)，1965 年，第 78 页。
⑫ 史密斯(H.S. Smith)，1966 年，第 118 页。

为，是否有过这样一个B族群是值得怀疑的⑬。

人们发现，属于所谓B族群文化的坟墓，继续体现着A族群的特征。由此可见这些坟墓大概是贫困的A族群人的坟墓，那时他们的文化已趋于衰落。这些在某些方面有别于A族群的B族群遗物的新的特征，也许正是A族群文化全面衰落和贫困的结果。致于衰落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埃及实现全国统一、建立了由一个君主统治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后，对努比亚一再采取敌对行动造成的。

埃及人在努比亚

从远古时代以来努比亚就以盛产黄金、香料、象牙、乌木、油类、半宝石和其它奢侈品而为埃及人所向往。为了控制这块土地上的贸易和经济资源，埃及人作了不懈的努力⑭。努比亚的历史因此同埃及的历史几乎无法分开。出自埃及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国王霍尔阿哈时代的乌檀纪念碑，看来是为了庆祝对努比亚的一次胜利而刻制的⑮，但是这位国王对努比亚采取的行动的性质迄今还不得而知，可能不过是为了保卫第一瀑布一带的埃及南部边境而策划的一次军事行动⑯。在法拉斯的A族群坟墓（属于第一王朝的第三和第四个统治者杰尔和瓦吉的统治时期）中发掘的埃及制造物也表明，甚至早在遥远的古代，这两个国家便已经有了接触⑰。 249

关于埃及征服努比亚的最早记载，是现在在喀土穆的苏丹国家博物馆古迹园里展出的一宗十分重要的文献。这是原来刻在一座小山顶上的一块沙石板上的图画。小山叫谢赫·苏莱曼山，位于尼罗河畔的瓦迪哈勒法城以南大约七英里处⑱。石雕的年代属于上面提到过的第一王朝的第三个国王杰尔统治的时期，画面所表现的是杰尔国王在尼罗河对努比亚人发动的一次战役。

画面的最右边是一条第一王朝时的那种小船，船尾竖起，船头也高高翘起。船下漂浮着许多尸体，有一个人(也许是努比亚人的首领)悬在船头。船的左侧有两个象形文字中表示村庄的轮形符号，画的是有十字路的村庄，用以表明这是城镇。在这两个城镇符号左面，我们可以看到标志水波的符号，大概表示战场在瀑布地区。再过去，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双手反剪着，手里拿着一张弓，埃及语称为塞提，意思是塔塞提(弓之国)，指的是努比亚。在这个人的背后是国王杰尔的名字，背景大概是宫殿的门面⑲。

关于埃及在努比亚采取的敌对行动的另一份史料是从耶拉孔波利斯（伊德富以北、尼罗河左岸的考姆艾哈迈尔）发掘出来的一块石雕残片，上面刻着第二王朝的卡塞赫姆国王跪在象征努比亚的一个战俘身上。但埃及人真正征服努比亚看来是在第四王朝创始人斯尼

---

⑬ 欣策(F.Hintze)，1968年。
⑭ B.G.特里格，1965年，第79页。
⑮ 皮特里(W.M.F.Petrie)，1901年，第20页和图片1、2。
⑯ 塞夫-泽德尔贝格(T.Säve-Söderbergh)，1941年。
⑰ F.L.格里菲思，1921年，第1-18页。
⑱ A.J.阿克尔，1950年，第27-30页。
⑲ 谢里夫(N.M. Sherif)，第17-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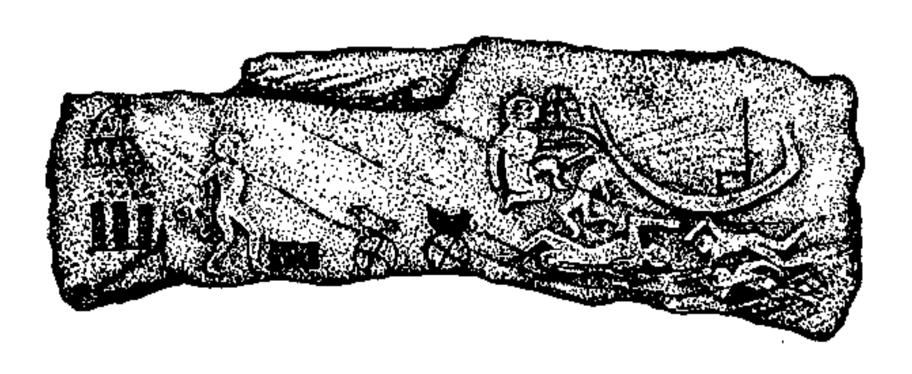


插图 9.4 谢赫·苏莱曼山发现的杰尔国王的石雕

250 弗鲁统治时期。巴勒莫石碑[20]告诉我们，斯尼弗鲁国王摧毁了努比亚人的国家[21]，虏获了7000名战俘和20万头牛羊。

经过卡塞赫姆和斯尼弗鲁的军事行动，努比亚人看来承认了埃及的霸权，因为埃及人这时掠夺努比亚丰富的矿物资源看来已无甚困难了。他们在图什凯以西的闪长岩矿床开采石料供雕刻王室人物的肖像。一支又一支远征队把吉萨大金字塔的主人基奥普斯、戴德弗尔以及萨胡拉这几位第五王朝（我们纪元前2563-2423年）君主的铭文刻在那里的岩石上。为了有效地开发他们征服的这块国土上的矿物资源，埃及人把努比亚变成了殖民地。考古学家最近在第二瀑布南面一点的布亨的发现表明，在第四和第五王朝时期，布亨存在过纯粹埃及人的殖民地。现在发现的炼铜炉和炉内残存的铜矿石表明，这个埃及殖民地的工业之一是采铜业，也说明该地区的某个地方有铜矿。那里的纸草书和瓦罐封盖上也发现有第四王朝和第五王朝几个国王的名字。[22]

此外，埃及人很可能已经把他们的统治范围扩大到第二瀑布以南，至少扩大到远至布亨南面大约130公里的代凯。本章作者在代凯发现的古王国碑文表明，埃及人当时正在努比亚的这一地区探寻矿物。[23]

根据在第一瀑布附近发现的关于迈伦雷国王的两件文物[24]也许可以推定，第六王朝时代（我们纪元前2434-2242年）的埃及南部疆界在阿斯旺一带。然而，看来埃及人甚至在那个时期也对努比亚各部落施加了某种政治影响，因为这两件文物表明，迈伦雷国王曾经到第一瀑布地区接受过梅朱、伊尔泰特和瓦瓦特三个部落酋长的朝拜。这三个部落的位置大致在第一瀑布以南。

第六王朝统治时期的努比亚一片和平景象；埃及人认识到这块国土上商业潜力的重大价值及其对增进埃及本土人民经济福利的重要意义。阿斯旺的能干的君主很好地组织和经营贸易，从而使阿斯旺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它既是南北方之间的贸易中心，又是一个边陲要塞。阿斯旺地区尼罗河西岸的陵墓中铭刻的这些君主的碑文，为考古学者提供了关于努比亚当时情况的许多有价值的材料。这种证据表明，看来努比亚曾经分为若干个地区，

---

[20] 布雷斯特德(J.H. Breasted)，1906年，第一卷，第146页。
[21] 加德纳(A.H. Gardiner)，1961年。
[22] W.B.埃默里，1963年，第116-120页。
[23] F.欣策，1965年，第14页。
[24] J.H.布雷斯特德，1906年，第一卷，第317-318页。

每个地区都有独立的统治者。

这些阿斯旺贵族的碑文中有一篇涉及哈库夫的生平事迹最能说明问题。哈库夫是迈伦雷和佩比二世统治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商队队长。他先后四次率队出使亚姆。亚姆的确切位置虽然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在第二瀑布以南。这几次探险活动有三次[25]是在迈伦雷国王统治时期进行的。第四次是在佩比二世统治时期。第一次出使，哈库夫和他父亲奉命“探索一条通往亚姆的道路”；他们用了七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第二次，哈库夫独自出使，前后经历八个月时间。这一次他取道埃利凡泰恩的路线（以尼罗河西岸的阿斯旺地区为起点的一条沙漠之路），返回时经过伊尔泰特、迈海尔和泰雷雷斯。哈库夫探明，伊尔泰特和迈海尔是在同一个统治者的管辖之下。他第三次出使走的是沙漠绿洲的路线。这次出使他获悉亚姆的酋长已前去征服利比亚，于是他也随后赶到利比亚，设法平息了这位酋长的怒气。他在出使归来时“带回了300头驮驴，满载着香料、乌木、油类、豹皮、象牙、树干和其他许多好东西”。哈库夫经过北面已经统一在一个酋长之下的伊尔泰特、塞图和瓦瓦特等区域时，是由亚姆派兵护送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探险时，哈库夫从亚姆为年轻的佩比二世国王带回了一个会跳舞的矮人，国王十分喜爱这个矮人。 251

但是从佩比纳赫特（他是在佩比二世国王手下任职的另一个埃利凡泰恩君主）的陵墓中我们得知，尽管埃及人和努比亚人总的来说关系是友好的（这对双方肯定都有益处），但是在第六王朝时期努比亚境内的和平有时遭到严重的破坏。看来有几个时期局势动乱，埃及人被迫使用武力。有一次佩比纳赫特奉命前去“镇压瓦瓦特和伊尔泰特”。可以说，他不辱使命，因为他杀了大量的努比亚人，抓了许多俘虏。他后来又第二次远征南方，目的是“安抚这些国家”。这一次他把两位努比亚酋长带到了埃及朝廷。

C族群时期

在埃及古王国解体前夕，[26]或在埃及学家所谓的埃及历史上第一个中间时期（我们纪元前2240-2150年）[27]，下努比亚出现了一种自成一体的新文化（它的遗物具有不同的特征，埋葬习惯也不同），考古学家们称之为C族群。C族群文化同其祖先A族群文化相似，也属于铜石并用时期。C族群在尼罗河流域的这一地区一直存在到我们纪元前十六世纪努比亚完全埃及化时为止。C族群文化的北部界线在埃及的北库巴尼耶村[28]，但它的南部边界却尚未断定。虽然在南面远至第二瀑布地区南端的阿卡沙发现了C族群文化的一些遗迹：由此看来，C族群的南部边界大概在巴滕哈杰尔地区之内。 252

迄今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说明C族群文化的起源，或者它所属的种族。由于缺少确实的证据，考古学家们便提出了几种假设[29]。一种理论认为，这种文化有可能是它的前辈A族

---

[25] 同上，第一卷，第333-335页。
[26] B.G.特里格，1965年，第87页。
[27] A.J.阿克尔，1961年，第46页。
[28] 荣克(H.Junker)，1919-1922年，第35页。
[29] 比塔克(M.Bietak)，1961-1965年，第1-82页。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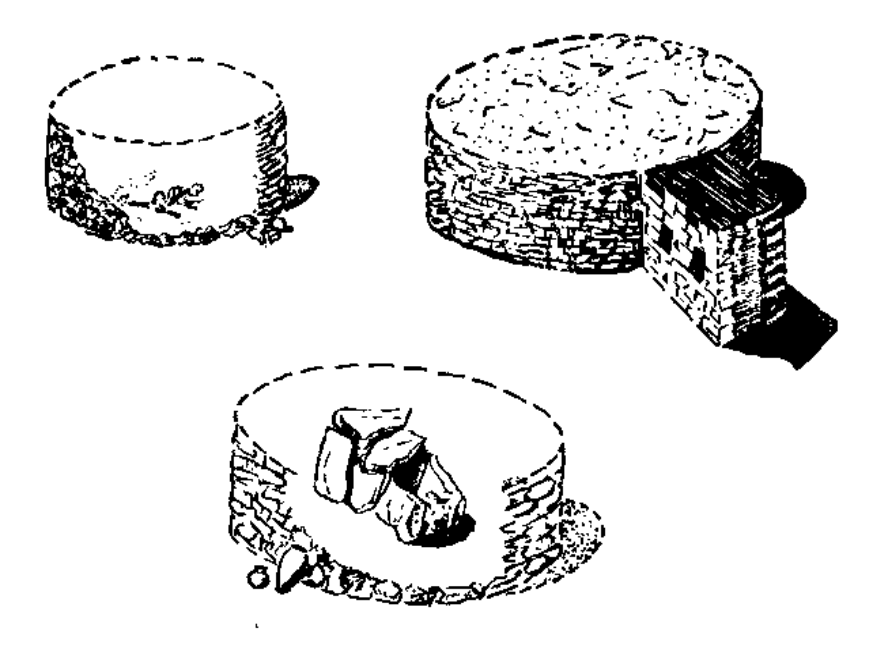


插图 9.5　典型的C族群坟墓(据施泰因多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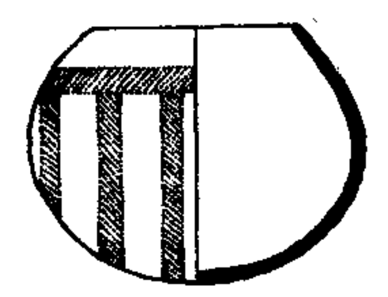
群文化的继续，因为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30] 另一种理论则断言C族群文化起源于一个新民族。他们到达努比亚，给它带来新的影响。持这种理论的人对于这些新来的人故乡在哪里和他们来自何方的问题又有不同的见解。人们引用了文化资料和解剖学资料来支持这种种论断。一些人说，这些新人是从东部的沙漠或阿特巴拉河流域迁移到下努比亚的。[31] 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来自西部，尤其可能来自利比亚[32]。最近有人提出一种理论，反对这种移民说，认为C族群文化是当地文化演进的结果。然而，当地古代的情况还有大量东西有待于探索。在对这片地区进行广泛的科学考察之前，这些理论仍然不过是些假设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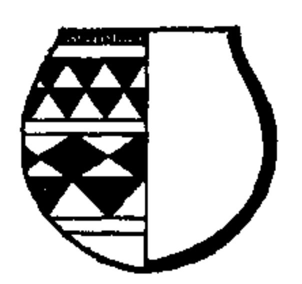
看来很明显，C族群基本上是游牧民族，居住在小帐篷里或偶尔在村庄里定居。在瓦迪哈勒法地区发现的房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圆形的，墙壁用石头砌成，上面抹泥；另一种是用土坯建造的方形房屋[33]。C族群人的基本特征是根据描绘牛的大量岩画以及他们在葬礼中突出牛的地位这一点推断出来的。

C族群最早的埋葬方式的特点是在圆形或椭圆形墓穴上面用石头砌成小小的上部结构。尸体经常用皮革的寿衣包起来，以半卷屈姿势右侧朝下放在墓穴里，头朝东，下面常常垫一个稻草枕头。这种坟墓后来由另一种取而代之，这是在长方形墓穴(常常是圆角的，里而有时衬有石板)上面用石头修建大型上部结构的另一种坟墓。此外，C族群地区还发现了时间更晚一些的第三种埋葬方式。我们发现，它的特色是在石头修建的上部结构的北面或东面常常修建一座砖结构的小祈祷室。埋葬形式通常是南北向的。牲畜也埋葬在坟墓里。有时上部结构的四周放了许多涂有红黑两色花纹的牛或山羊颅骨。随葬品中有各式各

[30] G.A.雷斯纳，1910-1927年，第333页。
[31] 弗思(C.M.Firth)，第11-12页。
[32] W.B.埃默里和柯万(L.P.Kirwan)，1935年，第4页。
[33] T.塞维-泽德尔贝格，1965年，第48页。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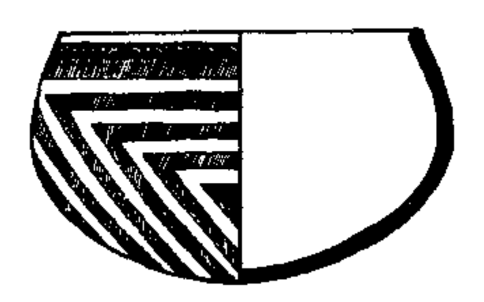


插图9.6 C族群陶器

样的陶器、石头、骨头和象牙手镯、贝壳耳环、骨头和彩陶念珠、皮便鞋、作臂环和护身符用的珍珠母圆盘。在C族群坟墓中有时还可以发现青铜镜和武器（匕首、短剑和战斧）[34]。

尽管同埃及的接触越来越多，C族群文化继续沿着自己的方向发展，既没有采纳埃及的技术，也没有采纳它的宗教信仰和文字。C族群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的陶器。这种陶器是手工制作的，大多呈碗形，外层装饰着压印或雕刻的、常以白色颜料充填的几何图案。典型的C族群石器是用绿岩（软宝石）磨制的小马。

255

中王国

埃及中王国的统治者们平息了内乱，统一全国。随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埃及南面的国家，亦即努比亚。这一行动始于由底比斯人建立的第十一王朝几位国王们在位之时。从上埃及的杰贝莱因寺院发现的一片石雕残片上，描绘着门图荷太普二世打击他的敌人的情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敌人中有努比亚人。在第一瀑布附近发现的门图荷太普三世的石刻碑文，提到“乘船去瓦瓦特”的一次远征。瓦瓦特是尼罗河流域的舍拉勒－瓦迪哈勒法地段。此外，第十一王朝的埃及人大概占领了努比亚远至南方的瓦迪哈勒法的广大区域，有一些资料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在第二瀑布以南、尼罗河西岸的阿卜杜勒·加迪尔村北面和西面的两座小山上有几处粗石刻，提及安特夫、门图荷太普和塞贝克荷太普（都是第十一王朝常见的名字），讲到采石、打猎和抄写工作。[35]然而，无论第十一王朝时期的努比亚情况如何，真正占领了努比亚南至塞姆纳的广大地区是第十二王朝时期（我们纪元前1991－1786年）的事。埃及王国在这里建立了巩固的南部边界。第十二王朝的第五个国王塞努斯雷特三世引人注目的石碑就矗立在塞姆纳，它成了一座明确无误的边界标记。石碑上明文规定，不准任何一个努比亚人“经陆路或乘船到下游去，也不准努比亚的任何畜群到下游去，除非是去伊肯做生意或是许可同他们办理的正当事务”。[36]如今得知，伊肯便是塞姆纳以北大约40公里处的米尔吉萨要塞。[37]

有几件文物表明，对努比亚这一地区的长期占领是第十二王朝创始人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开始的。据认为，他有部分努比亚血统。阿门内姆哈特国王的家世可以从现在保存在列宁格勒博物馆的一部纸草书推定。这部纸草书的唯一目的是证明他之登上埃及王位是合乎法统的，据它上面的记载，第四王朝的斯尼弗鲁国王曾找来一名祭司同他谈天消遣。当这位国王问及前途时，祭司预言埃及将经历一段多灾多难的困苦时期，而这个时期的结束有待于“出现一位来自南方的国王，他名叫阿梅尼，是一个塔塞提〔即努比亚〕女人的儿子”。阿梅尼即阿门内姆哈特的简称[38]。在下努比亚的克罗斯科发现阿门内姆哈特在位第二十九年时的一块石刻碑文，上面记载说他的军队曾开到克罗斯科，目的是“推翻瓦瓦特”。他留

256

---

[34] 同上，第49-50页。
[35] A.J.阿克尔，1961年，第56和58-59页。
[36] A.H.加德纳，1961年，第135页。
[37] J.韦库泰，1964年，第62页。
[38] A.H.加德纳，1961年，第1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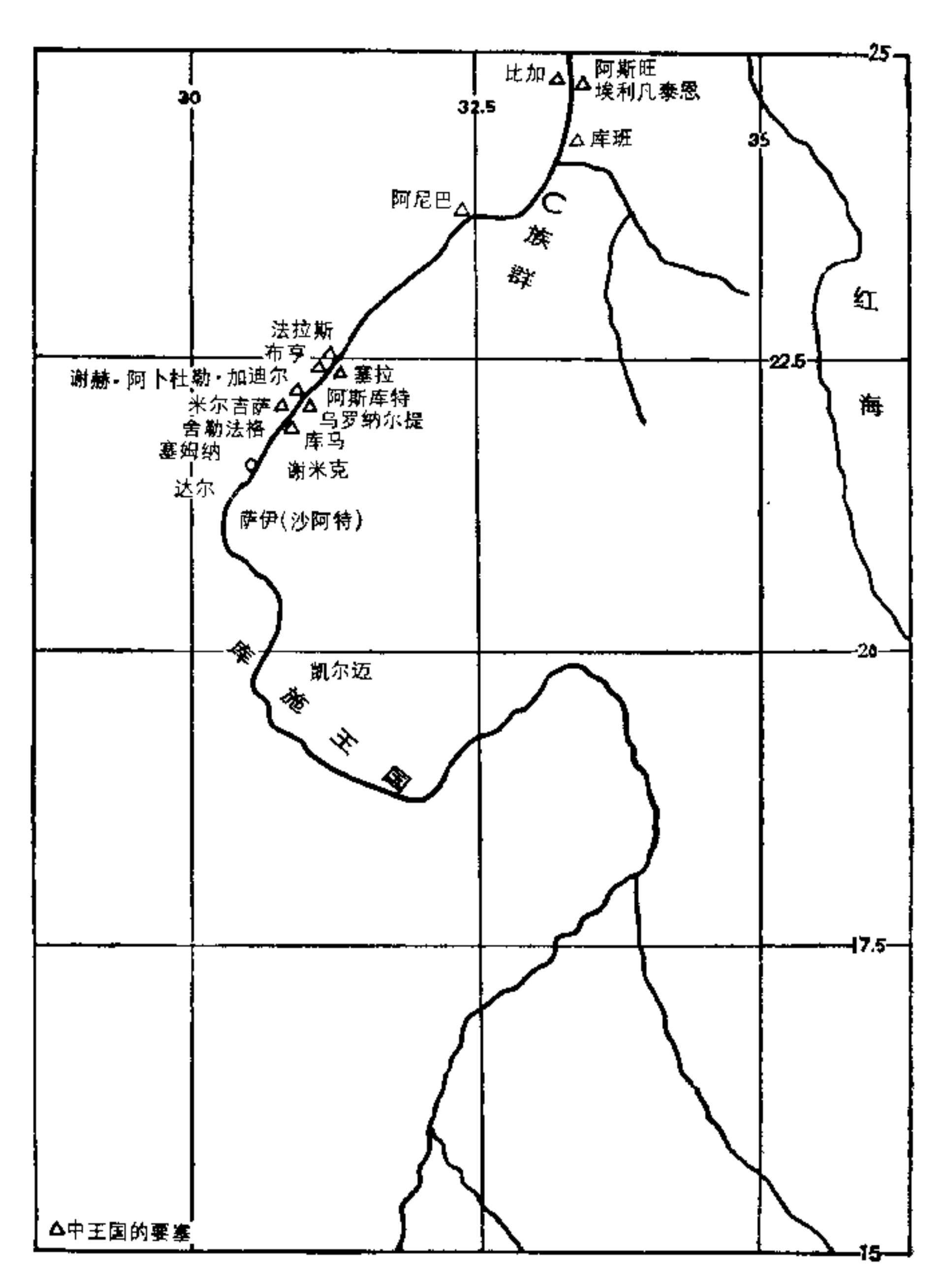


插图9.7 我们纪元前1580年的努比亚

给儿子的遗训，使我们如闻其声："我征服了瓦瓦特人，俘虏了梅朱人"[39]。阿布·辛拜勒西面发现的同一位国王的碑文再次表明，他在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埃及人曾在下努比亚开采石料。

对努比亚的占领始于阿门内姆哈特一世，而由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塞努斯雷特一世完成的[40]。一位名叫门图荷太普的军官于塞努斯雷特执政第十八年在布亨立了一块巨大的石碑，碑文描绘底比斯战神蒙图正把从努比亚十处地方抓来的一队捆绑着的战俘献给这位国王。战俘们分别代表这十处地方的居民，每个俘虏的头和肩下刻一个椭圆形框格，加上各自的地方名称。这块沙石石碑上提到的被征服的地方中包括库施、沙阿特和谢米克。沙阿特即现在的萨伊岛，[41]在布亨以南大约190公里。据最近发现的一段碑文，谢米克是萨伊岛下游40公里处的达尔瀑布地区。

"库施"这个地名虽然不久以后被埃及人用于称呼南方的一个大国，但是它最初是努比亚一个范围有限的地区，在中王国时代才为人们所知晓。[42]我们如今已经得知，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献每逢列举地名总是从北而南，[43]如果布亨的这块石碑也是如此，则库施不仅在沙阿特以北，而且也在谢米克以北。现在我们知道，谢米克便是萨伊岛以北的达尔岛或达尔瀑布地区。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断定，库施的位置在达尔以北，第二瀑布或塞姆纳以南的某处。[44]

表明塞努斯雷特一世打败努比亚的第二件文物，是从埃及的拜尼·哈桑君主阿梅尼陵墓中发现的碑文提供的。由于塞努斯雷特一世的胜利，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完全控制了塞姆纳以北的地区。这段碑文告诉我们，阿梅尼同国王本人一道乘船南下，"经过库施，到达世界的边沿"。[45]

埃及人之所以占领努比亚部分领土既有经济上的也有国防上的原因。经济上，他们一方面希望获得皮革、象牙和乌木，另一方面又希望夺取努比亚的矿物资源。[46]为了王国的安全，他们需要保卫南部边界，使之不受努比亚人和东面的沙漠居民的侵犯。他们的战略是在位于第一瀑布地区的埃及本土边界同塞姆纳以南的国家（这是对他们的真正威胁的根源所在）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区，以便控制尼罗河上的交通和消除库施对他们国家的威胁。

258

第十二王朝的国王们被迫在占领区修建要塞，其数量之多和坚固程度清楚地表明了埃及中王国对努比亚占领的防御性质。卢克索的拉美西姆附近一座坟墓中发现了一份中王国晚期的纸草书，[47]其中列出了从南面的塞姆纳到北面的舍拉勒之间17个努比亚地区要塞的名称。这些要塞分为两部分。第二瀑布以北的一组要塞目的在于牢牢地控制住当地居民，[48]即C族群人；在第二瀑布至塞姆纳的高地上修筑的另一组要塞目的在于援救航行遇

[39] J.H.布雷斯特德，1906年，第一卷，第483页。
[40] A.J.阿克尔，1961年，第59-60页。
[41] J.韦库泰，1958年，第147-148页。
[42] 波泽纳(G.Posener)，1958年，第47页。
[43] 同上，第60页。
[44] 同上，第50页。
[45] A.H.加德纳，1961年，第134页。
[46] B.G.特里格，1965年，第94页。
[47] W.B.埃默里，1965年，第143页。
[48] A.H.加德纳，1961年，第135页。

险的船只和保卫边境。[49] 就连给这些要塞定的名字也表明它们显然是为了防御而修建的，例如："击退部落民"、"镇压……"、[50]"限制沙漠居民"、"击退伊努人"和"击退马塞乌人"。

从布亨的要塞可以看出这些要塞多么坚固，而为了使它们坚固，当年曾作出多大的努力。布亨要塞在阿斯旺水坝落成之后已被淹没，但在这之前它是努比亚地区保存得最好的要塞之一。这座中王国时期的庞大堡垒作长方形，面积为172米×160米，一层防御工事套着一层防御工事，层层工事都经过精心设计。[51] 这座要塞的防御体系是一道4.8米厚、至少10米高的砖墙，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座塔楼。这道主墙下面是一个砖砌的壁垒，垒周围有一系列留着双排箭孔的圆形堡。环绕整个要塞，在岩石上开凿出一条干沟，深6.5米，宽8.4米，内岸用砖加高。要塞东面有两个大门，正对尼罗河，第三个大门在西侧，面向沙漠，层层设防。

伴随着中王国的瓦解和喜克索人(亚洲的一些部落)入侵，埃及人失去了对努比亚的控制。这些要塞被当地人劫掠一空，付之一炬。看来，他们是抓住埃及中央政府瓦解的机会重新取得了独立。

凯尔迈(我们纪元前1730－1580年)

我们已经讲到，塞努斯雷特三世把埃及中王国的南部疆界确定在塞姆纳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但是美国考古学家G.A. 雷斯纳1913至1916年期间在凯尔迈（第三瀑布北面不远、塞姆纳以南直线距离150英里处）进行的重要的发掘工作揭示了一种文化，后来人们称之为凯尔迈文化。从此以后，这种文化一直是学者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的题目。 259

古代凯尔迈的遗址是两座引人注目的大建筑，当地人称之为西杜富法和东杜富法。前者是一座坚固的土坯结构，后者是一座举行葬礼的礼拜堂，也是用土坯建造的，它周围是一大片坟场。二者都是典型的中王国时期建筑物。雷斯纳在西杜富法发现了若干雪花石膏花瓶碎片，上面有第六王朝的佩比一世和佩比二世以及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和塞努斯雷特一世的王名饰纹。在东杜富法旁边出土的一块刻石，碑文记载说，国王唯一的朋友安特夫曾被派到伊内布去修缮一座建筑物，碑文中使用了Amenemhet maa kheru这个词，意思是理应登上王位的阿门内姆哈特之墙。在这座礼拜堂附近的一个坟丘中发现了赫普泽菲亚(埃及的艾斯尤特王子，他的陵墓也在那儿发现)的雕像的下半身、他妻子森努韦的雕像和其他官员和国王的雕像的碎块。雷斯纳根据这些发现得出结论[52]：（1）西杜富法下面的墙壁是古王国一个贸易点的墙；（2）在中王国时期，西杜富法是埃及人为保护自己在努比亚的利益而在阿斯旺和凯尔迈之间修筑的一系列要塞中最南面的一个据点；（3）凯尔迈是埃及总督的府第所在，第一任总督可能是哈皮杰法；（4）埃及的总督们是以埃及方式安葬在东杜富法附近的墓地的；（5）当喜克索人侵入埃及时，凯尔迈的这座前哨要塞被努比亚人

[49] A.J.阿克尔，1961年，第61页。
[50] A.H.加德纳，1961年，第135页。
[51] W.B.埃默里，1960年，第7－8页。
[52] G.A.雷斯纳，1923a。

摧毁了。

雷斯纳对在凯尔迈发现的考古证据首先遭到荣克的质疑[53]。作为一个要塞，西杜富法太小，而且它距离设在塞姆纳的最近的埃及要塞足有400公里，孤处一隅，未免太危险。此外，各个房间里发现的石墨、氧化铜、赤铁矿石、云母、树脂、水晶、玛瑙、鸵鸟蛋壳之类的原料也表明，西杜富法是一个设防的贸易点而不是一个行政中心。

雷斯纳关于那片墓地的见解(认为它是埃及总督们的埋葬处)的依据仅仅是在一个大坟墓里发现了哈皮杰法和他妻子的雕像。凯尔迈的这些大坟墓中的埋葬方式完全是努比亚式的。在这里，人们不把死者制成木乃伊，而是把他同他的妻子、孩子和仆人一起埋葬在同 260 一座坟墓的一张床上。鉴于这些坟墓的结构和埋葬方式都非埃及式，而且知道埃及人最怕被安葬在国外，主要是担心得不到恰当的葬礼，因此人们很难相信具有哈皮杰法这样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人会以与埃及的宗教信仰截然不同的方式安葬在异国。此外，在所谓的哈皮杰法的坟墓中发现的东西中间有大量的无疑属于第二个中间时期亦即喜克索时期的随葬品[54]。塞维-泽德尔贝格和阿克尔[55]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座坟墓中发现的雕像，是第二个中间时期的埃及商人用来向当地的凯尔迈王公们换取努比亚商品的。

至此，雷斯纳提出的关于西杜富法以及东杜富法周围墓地的理论基本上被否定了。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杜富法仅仅是埃及的一个贸易点，它附近的墓地是当地王公的坟场。

欣策重新研究了就凯尔迈问题提出的种种理论。他认为，这些理论“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使人们怀疑它们是否正确[56]”。首先他指出，荣克提出的用以否定雷斯纳的解释的论据，同样可以否定荣克本人提出的关于西杜富法是一个设防贸易点的推测。欣策还认为，当时埃及不大可能在努比亚的这个地区建立一个设防的贸易点；如果认为凯尔迈是库施的政治中心(反对雷斯纳的见解的一些人持这种看法)[57]，事情便尤其如此。因为在中王国时期，库施一向是埃及的敌国。欣策所重新研究过的各个学者的见解都一致认为这个墓地是努比亚人的墓地，东杜富法是附属于这个墓地的葬礼礼拜堂，因而他认为法老不大可能为了修缮努比亚的一处坟场的礼拜堂而派遣一名埃及官员到“讨厌的库施”去。最后，欣策强调了塞维-泽德尔贝格已经指出的一点，即这个墓地属于第二个中间时期；就是说，它的存在时间晚于西杜富法，因此，人们所设想的中王国时期的西杜富法总督们不可能埋葬于此。

欣策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断然放弃了在凯尔迈有“一个埃及贸易点”的设想。在他看来，凯尔迈不过是“当地努比亚文化的中心和当地一个王室的宫廷”。西杜富法是当地的库施统治者的住所，在新王国开始时为埃及军队所摧毁。

261 这个理论是简单的，但看来较接近于事实，从墓地发现的证据尤其能表明这一点。在这些坟墓中发现的物品的年代和这些坟墓的建筑方式和葬礼都表明，这些坟墓不是为中王国的埃及总督建造的。但要证明西杜富法是当地库施统治者的宫廷，却还需要有力的证据。

---

[53] H.荣克，1921年。
[54] T.塞维-泽德尔贝格，1941年。
[55] A.J.阿克尔，1961年，第71页。
[56] F.欣策，1964年。
[57] A.J.阿克尔，1961年，第72页。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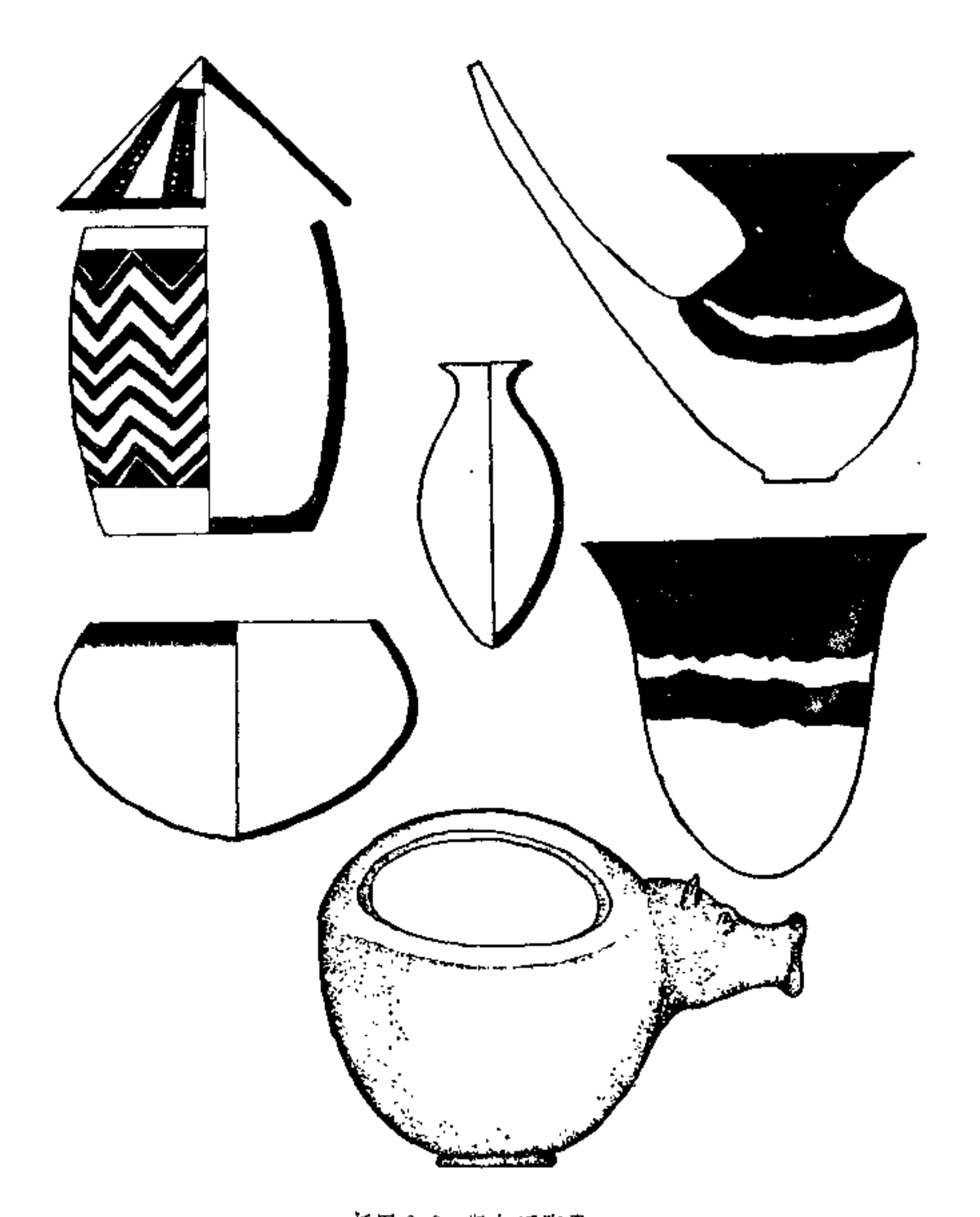


插图9.8 凯尔迈陶器

关于中王国时期凯尔迈有过一个普通的埃及贸易点的可能性，还不能象欣策所主张的那样轻易地排除。雷斯纳挖出的遗址是迄今在栋古拉地区发掘出的唯一的遗址，而且就连这唯一的遗址也还没有充分发掘。栋古拉地区有许多凯尔迈遗址；在对它们进行有步骤的考古研究以前，凯尔迈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仍是未知数。

库施王国

库施这个地理名词，与凯尔迈是有联系的[58]，而且在凯尔迈发现的古墓清楚地表明，它们埋葬的当地强有力的统治者同埃及的历代喜克索国王有贸易和外交关系，从这两点看来，凯尔迈很可能是库施王国的首都。库施王国的兴旺繁荣是在埃及历史上的第二个中间时期（我们纪元前1730-1580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文献现在已经得知确实有过这样一个王国，它的统治者称为库施大公。为埃及第十七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很可能也是举起有组织的抗击喜克索人斗争旗帜的第一个国王卡莫斯树立的第一块石碑[59]描述了当时尼罗河流域的政治形势。这块石碑表明：在库施有一个独立的王国，其北部疆界划定在埃利凡泰恩；在上埃及有一个埃及人的国家，它位于从南面的埃利凡泰恩到北面的库萨之间；最后在下埃及有一个喜克索王国。另一块石碑[60]告诉我们，卡莫斯在绿洲之路上截获了喜克索国王阿波菲斯送给库施统治者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帮助对付埃及国王。此外，在布亨出土的两块石碑表明，名叫塞佩德赫尔[61]和卡[62]的两位官员曾在库施统治者手下供职。库施王国曾在喜克索人入侵埃及、埃及中王国随即瓦解之后控制了埃利凡泰恩以南的整个努比亚，而当图特摩斯一世征服了努比亚，一直打过第四瀑布时库施也就崩溃了。

263

凯尔迈文化

典型的凯尔迈文化遗址是在努比亚境内往北最远到米尔吉萨一带地方发现的[63]，这表明第二瀑布是凯尔迈文化同C族群文化之间的边界。凯尔迈文化的特色是：使用陶工转盘制造薄陶器，表面十分光洁，红质而黑顶；动物形的和带有动物图案的容器；特别的铜匕首、用象牙和云母镶成图案的木器和缝在皮帽子上的装饰品。虽然在凯尔迈发现的许多器具无疑表现出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但是也不能否定它们受到了埃及的工艺和设计技术的影响[64]，有人认为，这些物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埃及工匠制作的[65]，但当然也可以说，这些物品是学到了埃及技术的当地工匠为适应当地的爱好而制造的。

在宗教方面，凯尔迈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它的殡葬方式。坟墓的特点是一个用土堆成的

---

[58] G.波泽纳，1958年，第39页；A.J.阿克尔，1961，第72页。
[59] 哈巴希(L.Habachi)，1955年，第195页。
[60] T.赛维-泽德尔贝格，1956年，第54-61页。
[61] 费城，10984。
[62] 喀土穆，No.18。
[63] J.韦库泰，1964年，第59页。
[64] B.G.特里格，1965年，第103页。
[65] A.J.阿克尔，1961年，第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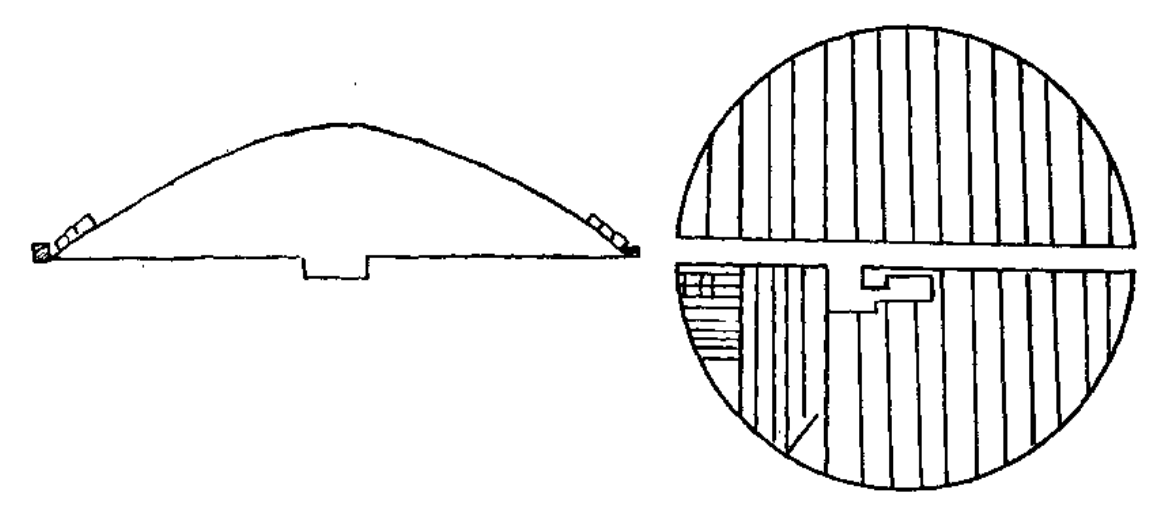


插图 9.9 凯尔迈埋葬方式

圆丘，周围砌着一圈掺杂有白卵石的黑石块。其中一个大坟(KIII)的墓室是圆形的，四周一道砖墙，直径足有90米[66]。两道东西走向的墙壁并排穿过坟室的中心，构成了一条中央走廊，把坟丘分成两部分。其他许多平行的墙壁从走廊两侧成直角向外通到南北两面的围墙。走廊南侧的墙壁中间有一条过道通向主墓室左侧的门廊。在凯尔迈，灵柩放在右侧的一张床上。床上有一个木枕头、一把鸵鸟羽毛扇和一双草鞋。床边和墓室四周的墙角下放了大量的陶制容器。凯尔迈最惊人的埋葬习惯是用活人殉葬。这座坟墓的主人就有二三百人陪葬，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被活活地埋在中心走廊里。 265

新王国(我们纪元前1580－1050年)

埃及人一旦从喜克索人统治下解放出来，重建了国家，便再度把注意力转向南部边境，埃及这一次对努比亚的征服，是它的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

上面提到过的卡莫斯的第一块石碑说明，他处在下埃及一位国王和库施的另一位国王之间。这块石碑还说明，他的朝臣们对于埃及南部边境的状况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埃利凡泰恩。但是第二块石碑上有一段碑文[67]表明，卡莫斯在进攻喜克索人之前就向努比亚人发动了战争。鉴于朝臣们谈到埃利凡泰恩的边境是安全和巩固的，很可能是卡莫斯仅仅向努比亚人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讨伐。这种说法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下埃及的图什凯附近发现了卡莫斯这位国王的名字。

对努比亚的占领是由卡莫斯的继承人、埃及第十八王朝创始人阿莫斯完成的。关于他和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们在努比亚的军事行动情况的主要来源是海军将领雅赫摩斯的自传。雅赫摩斯(埃巴纳的儿子)是一位地位低下的舰长。他的自传刻在他在埃及卡卜地方的坟墓的墙上。我们由此得知："国王陛下诛灭亚洲人之后曾到亨特亨尼费尔(努比亚一个地

[66] G.A.雷斯纳，1923a，第135页。
[67] T.塞维－泽德尔贝格，1956年，第57页。

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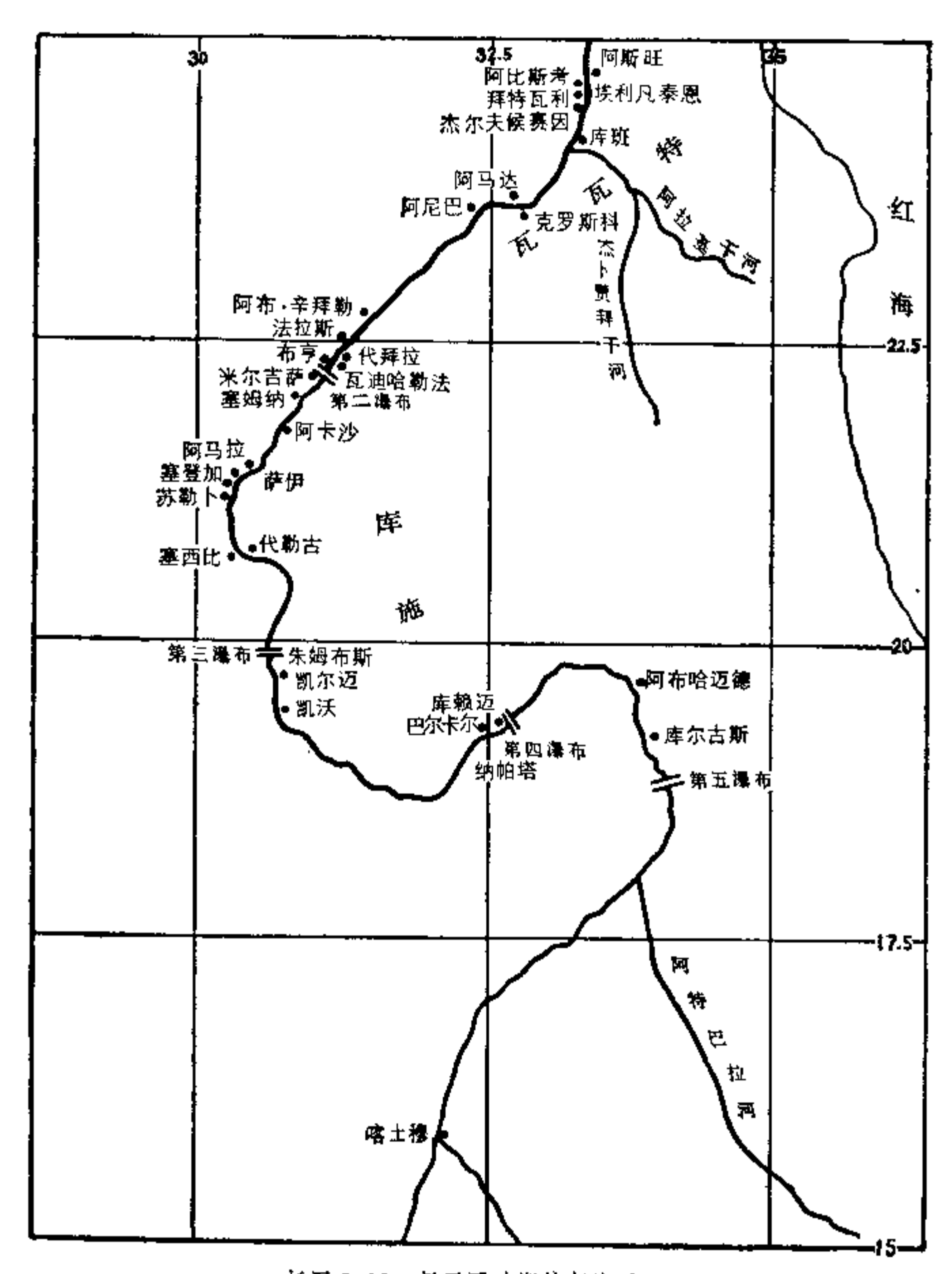


插图 9.10 新王国时期的努比亚

区，位置不明）平定努比亚人。”阿莫斯乘胜重建和扩大了布亨要塞，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寺院。他有可能甚至打到了上游距布亨190公里的萨伊岛，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他的雕像和关于他本人和他妻子的碑文[68]。

然而，最后征服苏丹北部地区的是图特摩斯一世(我们纪元前1530-1520年)；库施王国从此失去独立。他抵达第三瀑布地区南端的通布斯之后，随即在那儿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然后继续向南推进，实际上占领了凯尔迈到库尔古斯（阿布哈迈德以南50英里)之间的整个地区，在那里留下了一块纪念碑，也许还修建了一个要塞[69]。这样，努比亚就完全为埃及所控制，努比亚历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就此开始，这个时代给它以后几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生活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266

第十八王朝统治下的努比亚

阿斯旺和菲莱之间一块岩石上发现的图特摩斯二世元年雕刻的碑文告诉我们[70]，图特摩斯一世死后，努比亚发生过一次暴动。据碑文记载，一名信使给国王带来库施发生叛乱以及库施的首脑和他北面的几个王公共同谋反的消息。碑文还说，国王派去了一支远征队，叛乱分子被镇压下去。这次惩罚性行动之后，努比亚恢复了和平，其后几年一直平静无事。

图特摩斯二世的继承者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在位时期一片和平景象。努比亚境内从她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古迹是她修建的雄伟的寺院，座落在布亨一座中王国时期的城堡内。[71] 这座寺院是奉献给布亨的圣主、鹰头神荷拉斯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显示着最卓越的第十八王朝风格与技巧的浮雕，而且墙上的色彩仍然保存得很好。后来图特摩斯三世篡夺了这座寺院，篡改了原来的设计，彻底而无情地刮掉了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的王名饰纹和画像。

这座寺院是用努比亚的沙石建造的，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个前院和一座长方形建筑物，建筑物的南北东三面各有一排圆柱。哈特舍普苏特女王还在尼罗河西岸的法拉斯（恰在现代埃及与苏丹之间的边界上）修建了一座奉献给哈索女神的寺院[72]。

凯尔奈克巨大的阿蒙寺院墙上雕刻的图特摩斯三世编年表向我们表明，瓦瓦特曾纳贡八年，库施曾纳贡五年。显然，努比亚的贡赋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入国王的金库[73]，而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期间，和平局面仍在延续。他在位的第二年在西塞姆纳用石头重建了塞努斯雷特三世的已遭到破坏的土坯寺院，把它奉献给努比亚的代德万神，克努姆神和被奉为神明的塞努斯雷特三世。这座寺院是整个尼罗河流域保存得最完好的托勒密王朝以前的独立式寺院之一，墙壁上布满了浮雕、象形文字铭文和绘画。这些雕刻无疑都出自第一流工匠之手。[74] 267

[68] J.韦库泰，1956年；1958年。
[69] A.J.阿克尔，1961年，第84页。
[70] J.H.布雷斯特德，1906年，第一卷，第119－122页。
[71] 麦基弗(D.R.MacIver)和伍利(C.L.Woolley)。
[72] F.L.格里菲思，1921年，第83页。
[73] A.J.阿克尔，1961年，第88页。
[74] 卡米诺斯(R.A.Caminos)，1964a，第85页。

图特摩斯三世还在东塞姆纳、乌罗纳尔提、法拉斯、也许还有萨伊岛等处的要塞里建造了一些小寺院。

阿梅诺菲斯二世继承了图特摩斯三世的王位。在他统治时期，努比亚的局势平静。他建成了他父亲图特摩斯三世开始建造的阿马达(下努比亚的一座重要城镇)寺院。阿梅诺菲斯二世执政的第三年在这座寺院里竖立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他从亚洲战役凯旋的事迹：带着"他用自己的大棒打死的"七位王公的尸体。他下令把其中六个王公的尸体吊在首都底比斯的城墙前面。这块石碑还告诉我们，第七个王公的尸体"用战船送到努比亚，吊在纳帕塔的城墙上，目的是使人们永远看到国王陛下的神威"。[75]

在菲莱附近的科诺索岛，我们发现继阿梅诺菲斯二世即位的图特摩斯四世统治时期留下来的一宗文献，记录着为平定努比亚的一次叛乱而进行的成功的远征。这个记录的时间是图特摩斯四世在位第八年。

图特摩斯四世的王位由他儿子阿梅诺菲斯三世继承。阿梅诺菲斯三世于执政第五年时带兵攻打了努比亚，一直打到卡雷。他在尼罗河西岸、瓦迪哈勒法以南220公里的索利卜*建立了一座在整个努比亚最雄伟的寺院。这座寺院是他在世时为他本人建立的。阿梅诺菲斯三世还在尼罗河西岸、索利卜以北13英里的塞代因加*为他的皇后泰伊建造了一座寺院。

阿梅诺菲斯四世（我们纪元前1370－1352年）的宗教革命在埃及造成政治动乱，但还没有破坏努比亚的和平，建筑事业仍然一如既往地进行。阿梅诺菲斯四世改名为阿克纳顿之前，在代勒古对面的索利卜以南的塞塞比*，在同一地基上修建了三座一组的寺院[76]，都修在一座有城墙的小城镇里，其中包括奉献给新神阿顿的一座小寺院。看来位于现代的栋古拉对面的凯沃地区的杰马通城也是他修建的。他的继承人图坦卡蒙也在凯沃修建了一座小寺院[77]。图坦卡蒙在位时期的努比亚总督胡伊在法拉斯修建了一座寺院和一个有围墙的居民点。[78]

第十八王朝的解体给埃及带来了动乱，但是看来没有影响努比亚的和平与稳定。总的来说，整个第十八王朝统治时期，努比亚一直在和平环境中发展。

第十九王朝统治时期的努比亚

从阿克纳顿时代起，埃及内外交困，国势愈益衰弱。阿克纳顿耽于幻想，他发动的宗教运动给帝国带来了很多害处。此外，他以后的法老都软弱无能，完全没有能力为当时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全国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完全有理由担心会发生公开的内战和全面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个危急时刻，埃及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救星。这个人是一位名叫霍连海布的将军。他是个有能力也有经验的领导人。在图坦卡蒙在位时期，霍连海布在旧政

268

[75] A.H.加德纳，1961年，第200页。
[76] 费尔曼(H.W.Fairman)，1938年，第151－156页。
[77] 麦克亚当(M.F.L.Macadam)，1949年，第12页。
[78] F.L.格里菲思，1921年，第83页。
* 索利卜(Soleb)、塞代因加(Sedeinga)、塞塞比(Sesebi)在插图10中分别为苏勒卜(Suleb)、塞登加(Sedenga)和塞西比(Sesibi)。——译者注

权恢复以后到努比亚去了一次。[79]后来他篡夺了埃及王位，又一次到了努比亚。为纪念这次行动，在上埃及的锡尔西拉修建了一座石结构的寺院，寺院墙上的图文说他这一次努比亚之行是一次军事远征，但是看来不如说是这个篡位者为了解他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地区的地位是否稳固而进行的视察。然而，霍连海布赢得了努比亚对埃及政府的忠顺。前朝老臣、努比亚总督帕塞尔在霍连海布手下继续担任原职这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第十九王朝的真正创始人拉美西斯一世（我们纪元前1320－1318年）继承了霍连海布的王位，他即位的第二年在布亨的哈特舍普苏特寺院立了一块石碑，碑文告诉我们，他增加了寺院中的祭司和奴隶的人数，增建了新建筑物。

拉美西斯一世死后，他的儿子塞提一世（我们纪元前1318－1298年）继承王位。他开采努比亚的金矿充实国库，以支付他的庞大的建筑计划。为了增加瓦迪阿拉基矿区的产量，他在从下努比亚的库班通往东南的大路上挖了一口井，但是没有挖出水来，增加这一地区黄金产量的努力也就归于失败。塞提一世在上努比亚的西阿马拉（瓦迪哈勒法以南约180公里）修建了一座城镇。卡雷马附近的巴尔卡尔山上（古埃及的圣山）的伟大的阿蒙寺大概也是他修建的。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塞提一世曾在努比亚用兵。看来没有发生过需要发动重大军事远征的事，但是这并不排除可能向努比亚派去过执行惩罚任务的小部队。

塞提的王位由他儿子拉美西斯二世（我们纪元前1298－1232年）继承。我们有大量的材料表明，这个统治了很长时期的法老曾在努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这些材料没有提供时间和地名，因而用处不大[80]。一般而论，看来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的努比亚还是平静的，他在努比亚全境的大量建筑活动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得知，拉美西斯二世在执政第三年时曾在孟菲斯同他的官员们商讨开辟瓦迪阿拉基地区开采当地金矿的可能性。这件事他父亲曾作尝试，但是没有成功。当时在场的库施总督向国王说明这件事的困难，讲述了他父亲曾如何设法为给这条道路供水而终于一无所成。但国王下令再作努力。事实证明，这一次成功了，在他父亲塞提一世挖过的深度以下仅仅12腕尺的地方挖出了水。人们于是在库班——由此通往瓦迪阿拉基矿区的大路已离开尼罗河河谷——竖立了一块纪念这项成就的石碑。 269

拉美西斯二世在努比亚大量从事建筑活动。他在下努比亚的拜特瓦利、杰尔夫侯赛因、瓦迪塞卜阿、迪尔、阿布·辛拜勒和阿克沙，以及上努比亚的阿马拉和巴尔卡尔都修建了寺院。

在阿马拉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81]表明，城镇是塞提一世建立的，寺院则是拉美西斯二世所修建的。这座城镇在第十九王朝和第二十王朝期间一直有人居住。据认为，阿马拉曾经是库施总督的官邸所在。[82]

阿布·辛拜勒寺是就尼罗河左岸一块巨大的沙岩上开凿而成的，是全世界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者之一，它的建筑艺术无疑也是举世无双的。[83]这座大寺院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地

[79] A.J. 阿克尔，1961年，第94页。
[80] W.B. 埃默里，1965年，第193页。
[81] H.W. 费尔曼，1938年；1939年，第139－144页；1948年，第1－11页。
[82] A.J. 阿克尔，1961年，第94页。
[83] W.B. 埃默里，1965年，第194页。

方，大概是因为很久以前这个地方就被认为是圣地。这座庙宇是奉献给初升的太阳之神赖-哈拉赫提神的。赖-哈拉赫提的形象是鹰首人身，头上戴着一个日轮。

阿布·辛拜勒庙正面有四尊就天然石雕凿的巨大坐像，分列大门左右，每侧两尊。它们头上戴着埃及的双王冠，都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形象。进门便是大殿，里面有两排四方形柱子。柱前有若干尊国王的立雕像，也戴着双王冠。大殿四周30英尺高的墙壁有壁画和铭文，描绘着宗教仪式和这位法老在叙利亚征讨赫梯人和在南方征讨努比亚人的情景。大殿西北两面有几道门通向一些贮藏室，壁上只有宗教方面的浮雕。从大殿穿过西墙正中的一道门还有一座小殿，有四个方柱支撑着屋顶，周围墙上的浮雕描绘的也是宗教活动。这个圣殿的前面还有一个房间，它的西墙有三个门，两侧的两个门通向两个较小的房间，墙上没有铭文，中间的一个门通向至圣殿，拉美西斯二世被当作神衹，和埃及三位至尊的神——底比斯的阿蒙-赖神、赫利奥波利斯（太阳城）的赖-哈拉赫提神和古都孟菲斯的普塔神——一起在这里供着。270

努比亚的行政管理

新王国时期，埃及在努比亚的行政机构首脑是努比亚总督。这个职位从开始起就称为“南方总督”，同时享有“王子”的封号。前一个封号是真正确定其职务的头衔。图特摩斯四世时代，努比亚总督与王储同名，两人都叫阿梅诺菲斯。为了区别，努比亚总督被称为库施王子。后来，这个新称号便授给了阿梅诺菲斯以后的历任总督。这并不意味着努比亚的历任总督都是王室成员；但是它有可能表明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以及总督享有的极大权力。这些官员是从显然忠诚于法老的可靠的人中间挑选的。他们直接对法老负责，都是能干的行政官员。

努比亚划分为两个大区。从尼肯（在上埃及）到第二瀑布这个地区称为瓦瓦特，其南面从第二瀑布到第四瀑布之间的整个地区则称为库施。总督之下设有许多行政部门，显然都是仿照埃及的行政部门设立的。这些为统治努比亚所必需的行政部门的负责官员们协助总督工作。努比亚的城镇设镇长管理，这些镇长对总督负责。总督的部属中有一名库施弓箭队司令和两名副总督，一名管瓦瓦特，另一名管库施。总督手下有一支负责内部治安的警察部队、各个城镇的驻军和一支护送开发金矿的队伍的小部队。努比亚总督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把努比亚的贡品亲自准时送交在底比斯的宰相[84]。此外，努比亚总督也是这个国家的宗教首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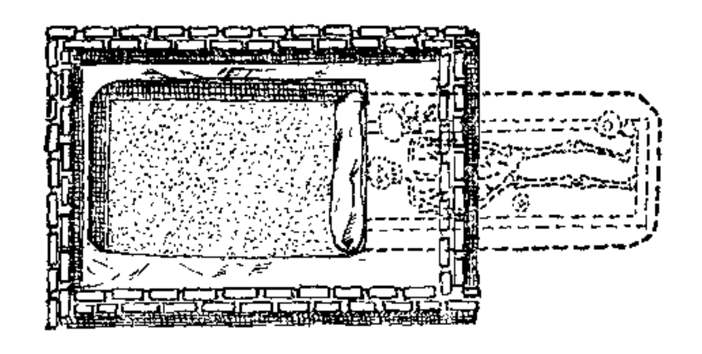
当地的部落酋长也参加努比亚的行政管理工作。当时埃及的政策是允许当地诸侯保持他们在各自地区的主权，以赢得他们的效忠。[85]

努比亚的埃及化

埃及在新王国时期占领努比亚。努比亚人在被占领初期曾起来抵抗。但不久便在埃及

---

[84] A.J. 阿克尔，1961年，第98页。
[85] B.G. 特里格，1965年，第10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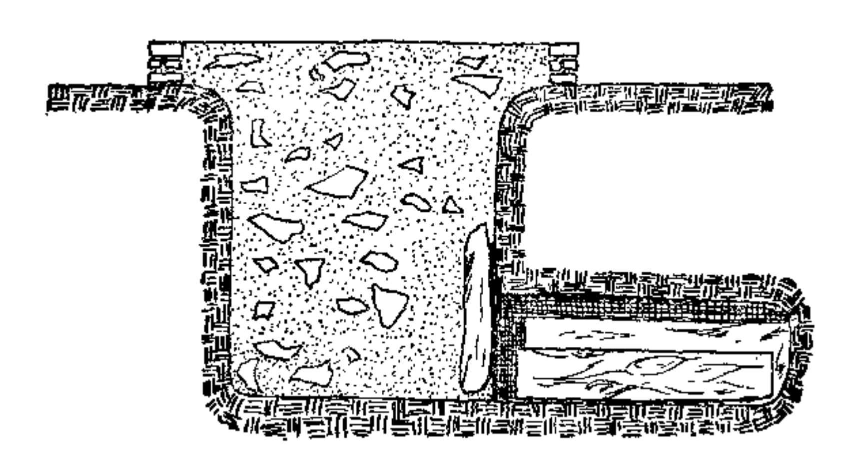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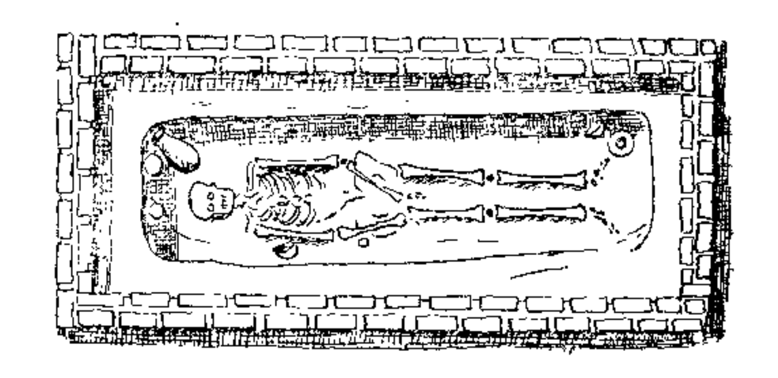


插图9.11a 新王国时期的埋葬方式(据W.B.埃默里，196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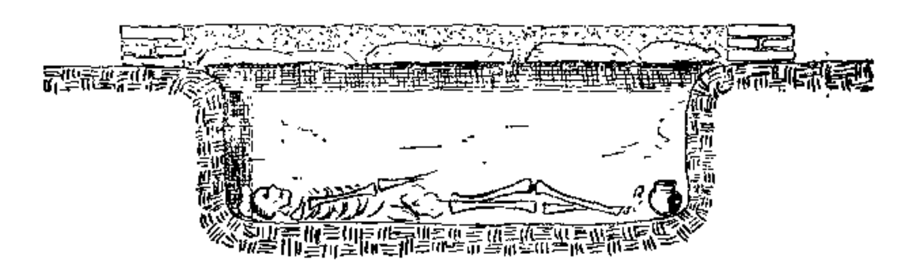


插图9.11b 新王国时期的埋葬方式(据W.B.埃默里，1965年)

政府的统治下安定下来，和平建设他们的国家，建设的规模是空前的。我们已经提到，第
271 十八和十九王朝的国王们在努比亚全境到处都修建寺院。这之后，许多城镇便围绕着这些寺院发展起来，成为宗教、商业和行政中心。埃及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了努比亚，建立了一个纯属埃及式的行政体系，大批的埃及书吏、祭司、军人和工匠来到了努比亚；终于使努比亚完全埃及化了。当地人皈依埃及的宗教，崇奉埃及的神祇。古老的埋葬习惯为埃及的葬礼习俗所代替。死者不再以半卷屈的姿势侧身放在墓穴里，而是后背朝下平躺在地上或者放进木棺。这个时期的坟墓有三种⑯；第一种是一个普通的长方形土坑；第二种是在石头上凿出的竖坑，下面有一个墓室；第三种是一个长方形的坑，从一侧掘进，挖出一个墓穴。这些坟墓中的随葬品是当时典型的埃及物品。努比亚人也采用了埃及在艺术和建筑方面的技术。

实际上从第二中间时期起努比亚即已开始的埃及化，只是这时大大加快，达到了顶峰。努比亚人在文化上被埃及生活方式所同化，首要的因素是新王国时期法老政府在努比亚奉行的政策。如上所述，埃及的官方政策赢得了当地酋长们的忠诚和支持。他们的子弟是在埃及的宫廷中受教育的，“他们在那里听惯了国王侍从中埃及人的谈吐，这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语言”⑰。这样，他们就大大地埃及化了，这当然有助于确保努比亚的王公们对埃及和埃及文化的忠诚。首领本人转而信仰一种外来的宗教，而且接受了这种文化的教条作为日常生活的准则，他的臣民自然也会效法他的榜样。埃及化的对象，首先是当地上层人物；他们为努比亚淳朴的普通人的迅速埃及化铺平了道路。

塞拉大公杰胡蒂－霍特普是与埃及上层人物生活方式相同的当地王公之一。塞拉即古代的泰海特，在瓦迪哈勒法以北。杰胡蒂－霍特普生活在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在位时期，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王公封号，后来传给了他弟弟阿门内姆哈特。我们根据阿门内姆哈特的小雕像（现在陈列在苏丹博物馆里）得知，他在成为“泰海特”大公之前曾在布亨城当书吏。这表明，新王国时期当地的受教育阶级是同埃及人一起参加努比亚的行政管理工作的。

273 杰胡蒂－霍特普的坟墓是在瓦迪哈勒法城以北大约20公里、尼罗河以东一英里处的代拜拉村发现的⑱。其墓穴从一座沙岩小山上开凿出来，设计和装饰完全是埃及式。墓中浮雕描绘了杰胡蒂-霍特普大公在他的农场里视察工作，以埃及方式接受农奴的敬礼，乘马拉的战车用弓箭射猎，以及同他的客人一起进餐等场面。要不是他把自己的努比亚姓名和埃及姓名一起刻了出来，人们就无法辨认出他并非埃及新王国的贵族。坟墓入口处的大门侧柱雕刻的象形文字提到了荷拉斯，以及大约是哈索女神、法拉斯夫人古代的伊卜谢克女神，和守护坟地的狗头神阿努比斯。⑲

努比亚的经济

我们主要根据各个寺院的墙上刻写的贡品清单，和负责为法老们运送努比亚货物的埃

⑯ W.B.埃默里，1965年，第178页。
⑰ T.塞维－泽德尔贝格，1941年，第185页。
⑱ 塔比(H.T. Thabit)，第81－86页。
⑲ T.塞维-泽德尔贝格，1960年，第30页。

及官员坟墓中图画上的努比亚货物，推断出新王国时期努比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这时，埃及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紧在努比亚采矿；所开采的矿物有玛瑙、赤铁矿、天河石、绿松石、孔雀石、花岗岩、紫水晶。但努比亚的主要物产是黄金。图特摩斯三世国王在位时期，仅瓦瓦特一地每年进贡的黄金便达550磅[90]。努比亚的黄金产于东部沙漠中的瓦迪阿拉基和杰布贾拜干涸河道周围盛产贵金属的地区的金矿，以及分布在南至阿布哈迈德的尼罗河流域的金矿[91]。

埃及从努比亚进口的其他货物有乌木、象牙、香料、油类、牛、豹子、鸵鸟蛋和羽毛、豹皮、长颈鹿和长颈鹿尾蝇拂、猎犬、狒狒和粮食。到第十八王朝末期，努比亚的贡品中有一部分已是制成品。在图坦卡蒙统治时期的努比亚总督胡伊的陵墓中，我们发现南方的贡品中包括盾牌、工具、床和扶手椅。[92]

新王国的解体

新王国解体前夕，努比亚开始在埃及本土的内部政治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既是由于努比亚拥有大量的财富，也是由于它的军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埃及国内秩序混乱，国力削弱，政治腐败。各派势力争权夺利。他们都充分认识到努比亚在他们活动中的重要性，因而努力争取努比亚行政当局的支持。第十九王朝的国王拉美西斯－西普塔登基之后头一年，就为任命塞提为努比亚总督一事亲自去了努比亚[93]。他常常派出代表给努比亚高级官员送礼。第十九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迈内普塔－西普塔甚至被迫派一名官员去努比亚索取贡品[94]；在法老握有实权、真正控制着帝国时，送贡品原是努比亚总督的职责。

274

第二十王朝时期，埃及国内局势严重恶化。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时期（我们纪元前1198-1166年），国王的后宫发生了一起阴谋废立的大案。共谋者之一是努比亚弓箭队队长的妹妹。她曾劝说她哥哥协助实现这个阴谋。但努比亚总督显然仍然忠于法老。第二十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拉美西斯七世统治时期，艾斯尤特地区爆发过一次叛乱。国王倚仗库施总督帕奈赫西和他的军队把这次叛乱镇压下去，恢复了上埃及的秩序。继这次起义之后，一个叫赫里霍的人成了底比斯的阿马尔寺的祭司长。看来，赫里霍成为祭司长是由于帕奈赫西和他的努比亚军队的支持。可以想见，他是帕奈赫西的追随者之一。拉美西斯十一世在位第十九年，赫里霍在帕奈赫西死后被任命为努比亚总督和底比斯的宰相。他于是就成为上埃及和努比亚的实际主宰。他在拉美西斯死后当了国王(我们纪元前1085年)。

埃及从此为一个新的王室所统治。然后埃及便陷入一片动乱，努比亚也开始了黑暗时代，一直持续到我们纪元前第八世纪库施骤然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时为止。

（陆幼甫译）

---

[90] F.欣策，1968年，第17页。
[91] J.韦库泰，1959年，第128页。
[92] 戴维斯(N.G.Davies)和A.H.加德纳，第22页。
[93] J.H.布雷斯特德，1906年，第三卷。
[94] D.R.麦基弗和C.L.伍利，第26页，图片12。

275



图片9.1 凯尔迈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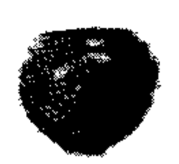
图片9.2 首饰



图片9.3 凯尔迈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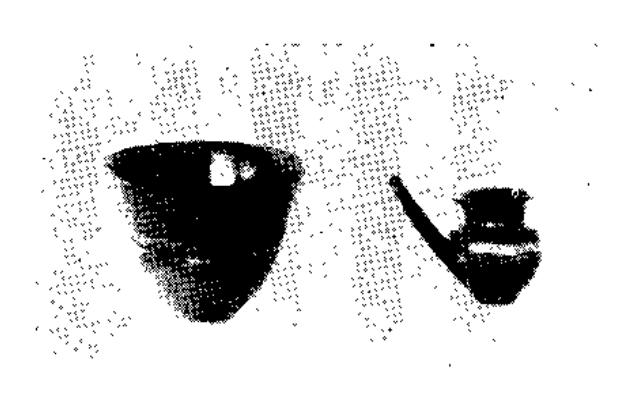




图片9.4 凯尔迈陶器

276

图片9.5 凯尔迈陶器



图片9.6 凯尔迈陶器





图片9.7 凯尔迈陶器



277





图片 9.8 凯尔迈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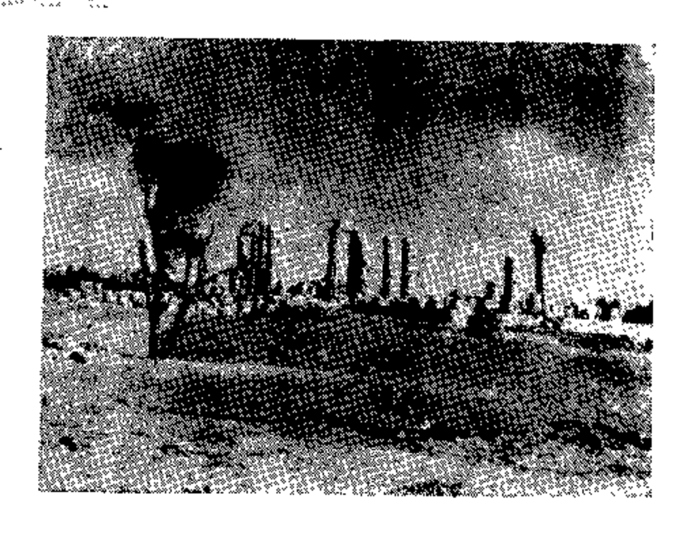
图片 9.9 中王国在布亨要塞西侧的防御工事





图片 9.10 凯尔迈的东杜富法，前面是一座坟墓

图片 9.11 阿梅诺菲斯三世在索利卜修建的庙宇



库施帝国：纳帕塔与麦罗埃

278



J.勒克朗

由于沙漠及尼罗河第二、三、四瀑布的阻碍，尼罗河中游栋古拉及其毗邻的盆地今天完全与世隔绝，但在过去，这儿却是财富和强大政治结构的中心。这就是埃及史称的库施，它是个富庶繁荣的王国，给我们纪元前第二千纪上半叶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即所谓的凯尔迈文化。但是，对于这个仍然很少为人知道的地区，由于没有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埃及新王国（我们纪元前 1580－1085 年）统治的那段光辉然而短暂的时期之后的情况却无法确定。非洲同地中海世界的联系似乎中断了将近三个世纪，努比亚的情况几乎毫无记载。但是从我们纪元前九世纪末开始，我们发现它的复苏。G.A.冯·雷斯纳从第四瀑布以下纳帕塔附近库鲁大坟地① 发掘出了一系列王公的坟墓，先是土丘，后来则是石头建筑的墓室。

苏丹对埃及的统治：第二十五王朝，或称“埃塞俄比亚”王朝

这些王公的后裔把埃及和苏丹联合为一个国家，在通史中称为埃及的第二十五王朝，或称“埃塞俄比亚”王朝②。长期以来，由于某些人名以及阿蒙神及其祭司们的地位与埃及相似，这一王朝一直被当作底比斯地区埃及逃亡者的后裔。后来发现的一些撒哈拉型的箭头又使人们认为这一王朝起源于利比亚。事实上它是土生土长的，可能是古代凯尔迈君主们的后裔。

最初一些统治者的名字不详。后来，当努比亚至少还占领着上埃及部分地区的时候（大约在我们纪元前 750 年），一位阿拉拉，其王位由卡什塔继承。后者的名字看来是来自“库施”一词。在埃利凡泰恩发现了他的石碑，上面带有埃及人专用于王名和神名周围的装饰图案。

280

佩耶（皮安基）之碑

随着大名鼎鼎的国王皮安基（这个名字下文作“佩耶”）③ 的继位，使我们进入了历史的

① 邓纳姆(D.Dunham)和贝茨(O.Bates)。

② 勒克朗(J.Leclant)，1965 年，第 354－359 页。

③ 原来把这个名字写成皮安基，是根据象形文字中“croix ansée”的符号，按埃及语读作安克（ankh），但这一符号在麦罗埃文中，仅当作意符，意为“生命”，相当于麦罗埃文的词根“P(e)y (e)”，“Peye（佩耶）”这一拼写即由此得来，今天一般都采用这个译音。参阅海勒(A.Heyler)和勒克朗，第 552 页；普雷斯(K.H.Priese)，1968 年，第 165-191 页；维特曼 (C.Vittmann)，第 12-15 页。

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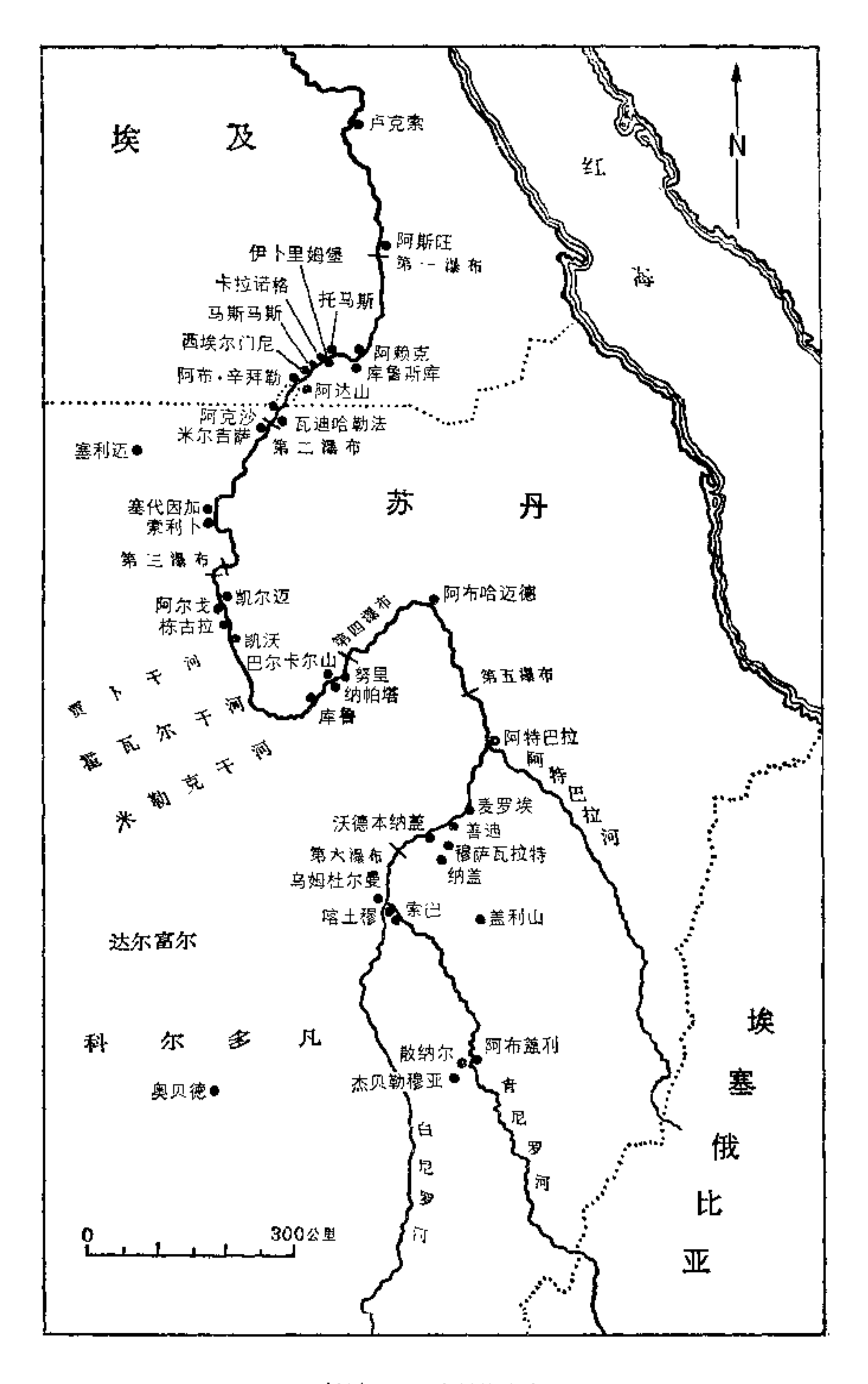


插图10.1 麦罗埃遗址

主流。十九世纪中叶重新发现了根据他的命令在纳帕塔所刻的碑文之一，现保存于开罗博物馆，称作“胜利之碑”④。这是古埃及留下来的最长也最详尽的碑文之一。碑的正反两面及两侧共有159行象形文字，叙述了同王在宫中的决策以及他几次讨伐主宰着埃及中部和三角洲地带的利比亚诸王的情况。虔诚的插话和叙述一段接着一段：讲到佩耶懂得如何实行宽大；他极其爱马，当他发现埃尔莫波利斯马厩里的马匹都死了时，便勃然大怒，却未加追究。另一方面，他拒绝会见“那些不洁的人”，即三角洲那些吃鱼的君主；然后，欢欣鼓舞之声未绝，他却突然直接撤回苏丹。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卡什塔的亲女儿大阿梅尼尔季斯被任命为底比斯“阿蒙神的神圣教后”⑤。另一块在1920年发现的佩耶大石碑⑥规定库施帝国为联邦性质，并宣布阿蒙为至高无上的神：“纳帕塔之阿蒙，使朕君临万民。朕曰，‘汝其为王’，受朕此命者即为王；朕曰，‘汝勿为王’，受朕此命者即勿为王。底比斯之阿蒙使朕君临埃及。朕曰，‘衣王者之裳’，受朕此命者即衣王者之裳；朕曰，‘勿衣王者之裳’，受朕此命者即勿衣王者之裳，……诸神授人君位，万民授人君位，而朕乃阿蒙所授者也。”

沙巴卡国王

我们纪元前713年，佩耶之弟沙巴卡继承王位。他把远至三角洲地带的尼罗河流域全部置于库施帝国统治之下⑦。据传他曾把抵抗他的赛伊斯君主博霍里斯活活烧死。埃及诸王年表的编纂者把他称为第二十五王朝的开创者。这时，亚洲已开始受到亚述人的压力，叙利亚－巴勒斯坦、特别是耶路撒冷的诸王和诸城市的呼吁日益紧迫⑧。中东的国际政治于是把库施人引向了亚洲。但沙巴卡初期似乎同亚述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在苏丹和埃及执行大兴土木的政策。他之后的两位国王，即佩耶的两个儿子沙巴塔卡（我们纪元前700年－690年）和光荣的塔哈卡（我们纪元前690年－664年），进而扩大了这种做法⑨。 281

塔哈卡国王：反对亚述人的斗争

遍布尼罗河流域的许多建筑物上都能找到塔哈卡的名字。他在巴尔卡尔山脚下为自己建筑了一座圣殿。这是一座砂石结构的高台，俯瞰着宽阔肥沃的纳帕塔盆地。在努比亚的其他一些地方，例如凯沃，也能看到他的名字。他在底比斯地区的凯尔奈克寺院的四面建立柱廊，并在其间修了大量小礼拜堂，供奉阿蒙和奥西里斯神。孟菲斯和三角洲地带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塔哈卡放弃了库鲁的传统大坟场而在努里建立了一个足以与阿拜多斯·奥西

④ 布雷斯特德(J.H.Breasted)，1906年；K.A.普雷斯，1970年，第16-32页；J.勒克朗，1974年，第122-123页。
⑤ J.勒克朗，1973 b。
⑥ 喀土穆博物馆，第1851号；G.A.雷斯纳1931年，第89-100页及图片五。
⑦ 埃及人和努比亚人把这一政治组织称为“库施”，自中王国时期以来，这一名称习惯上用以指尼罗河中游地区。这一名称见于圣经，说英语的作者于是用Kushite（库希特）作形容词。而按法语史学界的传统，却把与此相应的埃及第二十五王朝称为“埃塞俄比亚王朝”（参见本章注1）。本书不用“埃塞俄比亚”这种提法，以免和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混同。
⑧ 蔡斯尔(H.von Zeissl)，第21-26页。
⑨ J.勒克朗，1965b，索引第407页。

里昂⑩相比拟的纪念碑，在塞代因加还发现了一个刻有他的某些头衔和称号的墓⑪。表现他坚定地大步前进的几座质地极好的雕像向我们显示了他的相貌；在雕刻精美的花岗石上还饰以金制装饰品。雕像表情庄重，有个多肉的鼻子，嘴宽而唇厚，加上短而有力的下巴，增加了脸部的非凡的力量。各种文献、特别是格里菲思在凯沃所发现的一系列大石碑，进一步表明了这位国王的政策：建立神殿，向神殿奉献豪华的餐具、礼拜用品、贵重物资、捐款和人员的任用。他在位的第六年，尼罗河洪水高涨后退落，从而为夸耀王国的 282 繁荣提供了机会，于是举行了特别庆典⑫。由于纪念母后阿巴莱的驾临⑬，国王扩大了庆祝的规模。

塔哈卡接受了亚述人的战争挑衅。他的名字隐约带有威胁性地出现在《圣经》中⑭，明显地表现出库施地方的黑武士所造成的恐怖。阿萨哈登（我们纪元前681－669年）侵略埃及的企图失败了，直到我们纪元前663年，他的继承者阿苏巴尼帕尔才率领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攻陷并洗劫了底比斯。

塔努塔蒙国王：苏丹对埃及统治的告终

那时塔哈卡早已由他的侄子、沙巴塔卡的儿子塔努塔蒙继承王位。被称为"梦想之碑"的石碑连续记载着一系列事情：两条蛇的出现（显然是指埃塞俄比亚王权的象征双蛇头饰）、塔努塔蒙在纳帕塔加冕、他的北征、攻占孟菲斯、纳帕塔的建筑工程、沙漠中的一场征战以及随后当地诸王公的被征服等。但实际上，库施人已被亚述人击败退向南方，他们对埃及的统治遂告结束。从此以后，埃及转向了地中海，它的统一是由三角洲的一位君主、赛伊斯地方的萨美提克一世来完成的，他把埃及从亚述人手中解放了出来。萨美提克一世在位的第九年（我们纪元前654年），设法使自己的女儿尼托克里斯入选为底比斯的神圣教后⑮。

双重君主制

埃及与苏丹连接起来成为非洲的一个大国，为时达50年之久，这段时期需要略加论述。库施王国是以双重君主制的面目出现的。它的国徽是一对蛇饰：两条蛇直竖在法老头上，护卫着这位君主。从总的风格来讲，第二十五王朝的国王们的服装和气派都沿袭了以前的埃及法老。而且，如果他们还算不上法老的后裔的话，至少也以法老的后继者自居。 283 他们的纪念碑的式样也是典型的法老式。碑文是埃及文，恢复了纯粹的古典传统。但他们的容貌更接近于含米特牧人，有着明确无误的黑色血统，高高的颧骨，大下巴，厚嘴唇。

⑩ D.邓纳姆和O.贝茨，1955年，第2卷，第6-16页。

⑪ 塞代因加第WT 1号墓；吉奥吉尼（M.S.Giorgini），第116-123页。

⑫ 高涨是由于降雨量特大造成的。这次"洪水冲走了牛"，淹没了全国，但是由于阿蒙神的保佑，防止了其他本会随之而来的灾害，消灭了啮齿类动物和蛇，驱逐了蝗虫，也防止了来自南方的狂风。

⑬ 麦克亚当（M.F.L.Macadam），1949年，碑文IV，第18-21页。

⑭ "列王记"下，第19章，第9节；"以赛亚书"，第37章，第9节。

⑮ 卡米诺斯（R.A.Caminos），1964年，第71-101页。

他们也佩戴典型的苏丹装饰品。流行的头饰是一种紧紧的帽子，一直套到颈上。帽子的下垂部分遮住鬓角，由一条头带打成一个厚厚的结把帽子系住，带子两头则分垂肩后。耳环和项练上的垂饰都用公羊头——阿蒙神的神羊——作装饰。阿蒙事实上是这一王朝的至高无上的神，有四处主要神庙加以供奉——纳帕塔、托雷(可能在萨纳姆)、凯沃和普努布斯(阿尔戈岛上的塔博)。由公主们献身充当阿蒙神的乐师，为各个神庙服务。在这一帝国的苏丹部分，库施法老的随从往往还包括他们的母亲、妻子、姊妹和堂姊妹。埃及本部情况不同，虽然他们有底比斯的神圣教后为助手——神圣教后是立誓守贞、以阿蒙神为唯一配偶的公主们。这些阿梅尼尔季斯们和谢佩努佩特们被赋于类似王室的特权，组成了一种由姨母传位给侄女的平行的王朝；但是她们并不与前者齐名，其职能也不与尼罗河洪水相关。她们领导着一个重要的机构，但是她们的权力受到底比斯城代表法老的行政长官的限制。

第二十五王朝的名声是显赫的；古典作家们为它撰写了一整套传说。确实，这一时代的艺术具有强大的活力。库施人继承过去最好的传统，给它注入了新的引人注目的力量。

纳帕塔：库施帝国的第一个首都

库施人在亚述人打击下从埃及撤回，他们此后的历史就更难以确定，甚至编年顺序也十分模糊。库施王国存在了1000年，变得越来越非洲化了，国家的名称就是采用该地的古名。在正统的埃及学眼中，这1000年是个漫长的衰落过程，在此期间，法老们的影响逐渐削弱。但事实上库施文化是一种起源于非洲的文化，有时倾向于坚持自己的特色，有时则向埃及文明看齐。确切说来，这种文明本身是属于非洲的，但不时反映出地中海的影响，特别在亚历山大城建立以后更是如此。

开始时首都仍在圣山巴尔卡尔山麓的纳帕塔。后来，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公元前六世纪，迁到了遥远的南方的麦罗埃。库施帝国的版图很难肯定，迄今仍弄不清其所属各地区之间的界限。位于北陲的无人居住的下努比亚，一直是麦罗埃人同埃及的统治者互争之地，无论埃及的统治者是赛伊斯人*、波斯人、托勒密人或是后来的罗马人，情况都是如此。从我们纪元前1085年左右埃及新王国告终时开始，该处成了默默无闻的地带。这块孤处热带沙漠中条件很差的地方，看来直到纪元初大部分仍然无人居住。它后来的复苏可能是由于引进了萨奇亚(水车)的结果(见第十一章)。帝国的腹地努比亚本土，沿河上下(纳帕塔、栋古拉和凯尔迈诸盆地)的情况一直显得同“麦罗埃岛”的草原地区很不相同。东边的布塔纳有着许多未经发掘的遗址，商队所经过的道路以及红海沿岸地区也还有待于考察。考古发掘还不足以为我们指明库施帝国在南方草原以及非常肥沃的吉齐拉地区的疆界。但一般都认为它包括苏丹中部，并延伸到远至青尼罗河上的散纳尔和白尼罗河上的库斯提，而且杰贝勒穆亚发掘出来的遗物也应加以考虑。在西方它的影响至少应达到科尔多凡，而一旦对尼罗河－乍得湖间的广阔草原地带进行发掘，还很有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发现。 284

纳帕塔地区努里墓地[19]的坟墓，对于弄清纳帕塔王朝诸王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它的

[19] O.邓纳姆和O.贝茨。

* 指由塞提王所建立的第二十六王朝。——译者注

头几代统治者仍旧十分埃及化。同第二十五王朝的国王们一样，他们的墓室上修建了埃及式的金字塔。这种金字塔的样式更容易使人回想起新王国末年显贵们的坟墓，而不是第四王朝那些王室的金字塔。墓室和坚实的花岗岩石棺的装璜全都是埃及式的。四周都刻有可以追溯到金字塔传统的祷文。墓中倖免于盗墓者之手的设备，如祭器、神像和塑像等，也与埃及相同。

关于头两位国王的情况，除名字外知道得很少。他们是塔哈卡的儿子阿特拉纳萨（我们纪元前 653 - 643 年）和阿特拉纳萨的儿子森卡马尼斯肯（我们纪元前 643 - 623年），在巴尔卡尔山找到了他们的精美雕像的残片。关于森卡马尼斯肯两个儿子和继承人、安拉马尼（我们纪元前 623 - 593 年）以及后来继位的阿斯佩尔塔(我们纪元前 593-568 年)的情况知道得要多些。凯沃有一座安拉马尼石碑[17]叙述了这位国王巡视各州，他对各州庙宇的供奉，一场很可能是对布勒米人的讨伐，母后纳萨尔萨的来临，以及国王的姐妹们分别在四大神庙中献身为阿蒙神供圣职等情况。

285

这位国王的兄弟和继位者——阿斯佩尔塔留下的两大篇碑文已在多年前发现。在位第一年时的“即位或加冕铭文”[18]记载着：军队在巴尔卡尔山附近集结；领袖人物们决定祈求纳帕塔阿蒙神的指示；神意指定阿斯佩尔塔为王，并特别突出他是“王家姊妹”的后代；国王接受王权标志，向神致谢和祈祷；军队欢呼迎接他以及他向神庙献礼等情况。这就足以表明库施君主在武装部队和宗教方面的基础。他在位第三年时的阿潘纳金公主之碑保存在卢浮宫博物馆中，讲的是任命一位公主当女祭司。雷斯纳在巴尔卡尔山进一步发现了一块碑文，记载着国王为早已死去的佩耶的儿子卡柳特祈求冥福的祷告堂奠基的情况。另一方面，某些学者们把“逐出教籍之碑”归之于阿斯佩尔塔时期，这就值得怀疑了，碑上国王的名字已经磨灭。晦涩的铭文描述了某一家族的成员如何搞阴谋暗杀而被逐出纳帕塔的阿蒙神庙，神如何判处他们火刑，以及国王如何要求祭司们防止这种罪行。

萨美提克二世的远征和纳帕塔的陷落

阿斯佩尔塔是萨美提克二世同时代的人，这是历史上少数真正巧合的事件之一，几乎是1000年间唯一的一次。我们纪元前591年，亦即阿斯佩尔塔在位的第二年，库施的国土遭到埃及远征军的侵略。这支远征军由阿马西斯和波塔西姆托两将军率领[19]，并有希腊和卡里亚族雇佣军参加，在它的攻击下，纳帕塔终于陷落。

迁都麦罗埃

从此以后，库施人力求远远离开他们的强大的北方邻居。把首都从纳帕塔迁到离第六

---

[17] M.F.L.麦克亚当，1949 年，第 44-50 页；图片 15-16。

[18] 霍夫曼(I.Hofmann)，1971 a。

[19] 索内龙(S.Sauneron)和 J.约约泰 1952 年，第 157-207 页。巴克里 (H.S.K.Bakry) 发表了这一碑文的新版，第 225 页脚注，图片 56-59。

瀑布不远的麦罗埃。南迁的原因无疑是埃及入侵的结果，虽然对这次入侵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估计不足。现已证明，阿斯佩尔塔事实上是第一位麦罗埃国王。但是纳帕塔仍是这一王国宗教上的首都，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直到第四世纪之末，国王们死后仍继续埋葬在努里墓地。

我们纪元前525年，波斯的威胁加剧了。我们知道努比亚国王对坎比塞斯的使节们的答复是，"如果波斯人能象我这样轻易地拉开这张大弓，那么就把他们的优势兵力开来对付埃塞俄比亚人吧。"[20]坎比塞斯没有接受这一忠告，结果是他的军队在巴滕哈杰尔受阻，遭到重大损失，只得撤退。尽管如此，波斯人仍然把库施居民算作自己的臣民。新近在苏萨发现的大流士壮丽的雕像，上方刻着波斯各族人民名称的山墙上还专为库施留下一块空白[21]。可以想象得到，努比亚领土有一条狭长地带留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而大流士和泽克西斯的军队内有由库施人组成的兵团。有的文献中提到了黄金、乌檀、象牙甚至儿童等。看来，原来由埃及征收的这些贡赋流入了波斯波利斯和苏萨。 286

对迁都作进一步的解释，则可能是出于气候上和经济上的考虑。麦罗埃草原远比处在沙漠包围中的纳帕塔盆地宽广。夏季降雨区完全可以耕种，于是除畜牧外还可以从事农业。在一些主要遗址周围都挖有巨大的灌溉水池（哈费尔）。麦罗埃是红海、尼罗河上游以及乍得之间商路上的理想的商品集散地，商业想必兴旺。更为重要的是，树木和灌木较多，这就为冶炼努比亚沙岩中找到的铁矿石提供了必需的燃料。炉渣堆证明了制造业的发展程度，但最近的权威们指责说，把麦罗埃描绘成非洲的伯明翰则未免过于夸张[22]。

仍然有若干世纪的情况模糊不清，历史学家们除了发掘王室坟墓之外，别无他法。G.A.冯·雷斯纳在发掘之后把偶然获得的成果拿来与根据金字塔所提供的确实情况拟订的国王名单相比较，后来曾几经修改，今后有可能还要继续修订。埋葬在努里的最后一位国王是纳斯塔森（略早于我们纪元前300年），此后的国王和王侯们就埋葬在麦罗埃的墓地。但也有一些国王仍回葬巴尔卡尔山。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可能在努比亚北部，曾经先后有过两个王朝与麦罗埃王朝并列：一个是紧接着纳斯塔森之后，另一个则在我们纪元前一世纪[23]。

只有少数几篇主要的碑文提供了某些线索，但这种线索至多不过是东鳞西爪。所使用的埃及文退化了。更确切些说，我们需要透过那些奇异的象形文字字符来了解这个语言（实际上即古埃及通俗文字）的当时情况的注解，以及麦罗埃语（库施人自己的语言）的影响。 287

我们有几块阿曼诺特耶里克国王（略早于我们纪元前400年）的碑文。其中最佳的一段描述了这位"强壮的41岁"的国王当选的情况。大部分是讲出师远征、宗教庆典、一次火炬演习、母后来访、建筑物的修复以及向神庙献祭等活动情况。

我们还有哈西奥蒂夫的碑文。这一著名碑文的部分内容是关于典礼，另一部分是关于他反对各式各样敌人的战役。被莱普西乌斯搬到柏林去的纳斯塔森的碑文也是如此。如果

---

[20] 希罗多德，第3卷，第21章。
[21] 佩罗特（J.Perrot）等人合著，第235-266页。
[22] 见下文参考书目，特别是特里格（B.G.Trigger），1969年，第23-50页，和安博恩（H.Amborn），第74-95页。
[23] 关于麦罗埃年表，见下文参考书目。

有一碑文中的名字确实是四世纪后半叶埃及一个昙花一现的小小国王哈巴巴什的话，那么纳斯塔森碑文便可能偶然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巧合。纳斯塔森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202,120头牛和505,200头小牲畜。我们但愿能弄清这些碑文所提到的人们都是"何许人也"。战利品经常是大量的；因此，我们显然需要到尼罗河－乍得草原地区去寻找那些种族集团。石碑的雕刻质量很高，从而证明保持或重新受到埃及的直接影响。

希腊化的埃加梅尼斯

希腊史书证实了"埃加梅尼斯"在此后几十年中的复兴。西西里的狄奥多勒斯㉔叙述了库施祭司的权势，甚至可以在国王不受人民爱戴时迫使其自杀之后，又讲到了一位通晓希腊文化的国王埃加梅尼斯如何敢于进行反击，处死一些祭司。但是埃加梅尼斯究为何人，存在着疑问。麦罗埃三位国王：阿卡卡马尼、阿尼卡马尼、还有阿克瓦马尼，其中究竟谁是他呢？阿尼卡马尼是在穆萨瓦拉特-苏夫拉建筑狮庙的那位国王㉕。狮庙里可以读到用漂



插图10.2　萨奇亚(《考古杂志》，1977年秋季·第17卷，第3期)

㉔ 狄奥多勒斯·西库卢斯（Diodorus Siculus），第三卷，第6章。关于祭司们实际能处死国王的断言未能证实。

㉕ 欣策(F. Hintze)，1976年。

亮的托勒密时代埃及文写作的赞美诗，想必有埃及的艺术家和书吏参与其事。同时，我们还发现纯麦罗埃式的浮雕：头饰、装饰品和王室徽章都具有当地色彩，面容也不同于埃及类型。在崇拜法老埃及的诸神的同时，也崇拜纯属麦罗埃的神：狮神阿潘德麦克[26]和斯博迈克。无疑仍存在着与埃及的关系，因在菲莱和下努比亚的代凯都有埃及人和努比亚人共同供奉的神庙。但是我们纪元前三世纪末托勒密时代埃及南方的一些叛乱，可能得到努比亚一些小国王的支持。托勒密五世不得不对这个国家进行讨伐，而托勒密六世在“三十二申”建立了殖民地[27]。

麦罗埃语言及书写方式

从沙纳达凯特女王（约我们纪元前 170－160 年)起，典型的当地母权制看来已全面建立起来[28]，而在纳盖地方以她命名的一座大建筑物上所刻的铭文中，我们看到了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麦罗埃象形文字。

这些象形文字借自埃及，但意思不同，它们的写读顺序也同埃及文相反。这可能证明是有意要和埃及相区别。这些象形文字中夹杂着一种经常缩写的草书，这些符号看来部分是来自当时的埃及人在公文和私人文件中所使用的通俗文字。不论真相如何，这种至今还不知道其含义的麦罗埃文字的象形体系完全不同于埃及文。所使用的 23 个符号代表辅音、若干元音和音节，字与字间通常用“冒号”隔开。1909年英国学者格里菲斯找到了音译的关键。后来把碑文分为不同的类型，可以进行比较的表达方式——特别是那些从墓碑中摘出来的表达方式——并列到一起。碑文开头是向埃西斯和奥西里斯祈祷，其中包括死者及其母亲(一般在名单首位)和父亲的名字，还有某些血亲和姻亲的名字，都加上很多官衔和显赫的品级，有地名和诸神的名字，但是很难再进一步辨认。通过研究，特别是冠词用法的研究，已能把碑文分成段 (Stichs) 以便于分析。曾经对动词下过一番工夫，发现了一个词缀体系。近年来，电子计算技术已有可能把已音译出来的碑文，连同对它们的详细分析，系统地记录下来[29]。但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仍然不可能翻译出已发现的 800 多个铭文。　289

头一批麦罗埃长篇文字，见于约在我们纪元前第二世纪在位的塔尼达马尼国王的两个石碑上。麦罗埃编年纪事的不确切性在这个阶段特别严重，竟至——如上文所讲到的那样——使某些学者认为纳帕塔曾另有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看来这是极不可能的。此后，两位王后阿曼尼雷纳斯和阿曼尼夏海托高踞显要地位。她们的丈夫们被遗忘了，我们甚至不知道阿曼尼夏海托的丈夫的名字。有些年，王位也由一位国王，即阿曼尼雷纳斯王后和特里特卡斯国王之子、前王子阿基尼达德所占有。但重要的是，这两位王后中究竟何人居

㉖ 扎布卡尔(I.V、Zabkar)。

㉗ 希腊人称菲莱以南长约 12 申(约 120 公里）的地区为多德卡斯亨。“三十二申”(约 320 公里)究竟应该从菲莱算起，还是从过去已划定的这一地区南端算起是有争议的。

㉘ 参阅海科克(B.G. Haycock),第 461-480 页；卡茨纳尔逊(I.S. Katznelson)，1966 年，第 35-40 页(俄文)；M. F. L. 麦克亚当，1966 年，第 46-47 页；德桑热(I.Desanges)，1968 年，第 89-104 页；1971 年 7 月，第 2-5 页。

㉙ 巴黎麦罗埃研究小组已开始用电子计算机把麦罗埃的碑文汇集成《麦罗埃铭文汇编》。见下文参考书目，特别是在喀土穆发表的文章，1974 年，第 17-40 页。

先。她们都是"干大基"(Candace)。"干大基"是根据古典作家的惯例给麦罗埃称号"克德基"(Kdke)的标音[30]。

290

罗马和麦罗埃

这两位王后之一曾与奥古斯都有过一段著名的交涉。麦罗埃于是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这种场合是少见的。阿斯旺遭到麦罗埃人劫掠之后（奥古斯都雕像可能就是在这一次被掳走的，现已发现雕像的头是埋在麦罗埃一座宫殿的门槛下），埃及的罗马行政长官佩特罗尼乌斯率领一支讨伐远征队于我们纪元前23年攻陷纳帕塔。罗马人在普里米斯(伊卜里姆堡)长期驻军，扼阻麦罗埃人[31]。我们纪元前21年或20年，在萨摩斯商订和约，奥古斯都当时正在那里。罗马看来撤退了守军，放弃向麦罗埃征收贡赋，并把罗马与麦罗埃帝国间的分界确定于耶拉锡卡米诺(穆哈拉克)。根据斯特拉波、普林尼和戴恩·卡修斯的说法，同罗马侵略者进行谈判的是一位独眼的"男人模样"的干大基；她究竟是阿曼尼雷纳斯，还是阿曼尼夏海托，这一层不知今后是否弄清。

麦罗埃帝国的全盛时期

一系列建筑物证明，基督纪元前后一段时期是麦罗埃文明的几次高峰之一。凯沃的T庙内刻有阿基尼达德和阿曼尼夏海托王后的名字，人们认为近来在靠近尼罗河的沃德本纳盖发现的宫殿便属于这位王后[32]。在麦罗埃北部墓地今天还能看到她的精美的坟墓[33]。这一金字塔及其小礼拜堂——它的塔门按传统面向东方——是这一古老城市的名胜之一。其中精美的珍宝在1834年被意大利冒险家弗利尼掠走，今天仍旧是慕尼黑和柏林的博物馆收藏的珍品。浮雕上也有类似的装点：王妃和王公们显示着一种过分的奢华，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联想起希腊世界边境地区即帕尔米拉的文明——由富商所创造的文明。除奢华之外，这些浮雕还显示着他们凶暴的一面：囚犯被狮子撕成碎块、挑在矛尖上或正被猛禽吞食。

阿曼尼夏海托的女婿及继承者纳塔克马尼和他的妻子阿曼尼泰雷王后(我们纪元前12年至我们纪元12年)也都是热衷于建筑的人。他们的名字在库施的建筑物上出现得最多，这一点已无争议。这些建筑物遍布帝国各大城市，说明这个王朝处于极盛时期。在北方第二瀑布以南，这位国王和王后在阿马拉建立了一所庙宇。庙里浮雕是埃及式的，其中唯一的非埃及因素，是麦罗埃王冠的细节——一条带子紧紧束住头上的帽子，末端松垂脑后。人们久已认定，紧挨着第三瀑布的阿尔戈岛上的两尊巨像，便是纳塔克马尼本人的雕像[34]。他们也修复了佩特罗尼乌斯远征时破坏的纳帕塔，特别是阿蒙庙。在麦罗埃本土，

291

---

[30] 参见注28。

[31] J 德桑热，1949年，第139-147页；和普拉姆利(J.M. Plumley)，1971年，第7-24页。地图1幅，插图11幅。

[32] J.韦库泰，1962年，第263-299页。

[33] D.邓纳姆和O.贝茨，第4卷，第106-111页。

[34] 韦尼希(S. Wenig)提出，如今应当承认这两座雕像是阿兰斯努菲斯神与塞比尤迈克尔神。1967年，第143-.41页。

纳塔克马尼及其妻子的名字连同阿里坎卡罗尔王子的名字一起见于宏伟的阿蒙神庙中。沃德本纳盖地方的南庙是他们造的。他们特别关心麦罗埃以南草原地带的大城镇纳盖。阿蒙神庙正面入口处造了一座塔门，它的装璜既受到埃及的影响又具有麦罗埃的特色。但最著名的建筑物还得数纳盖的狮庙，庙中的浮雕属于麦罗埃艺术最典型的代表作。这位国王、王后和王子的金字塔已在麦罗埃找到。国王和王后喜欢把自己的肖像和阿里坎卡罗尔、阿里卡卡塔尼或谢拉卡罗尔三位王子中的一位画在一起，情况因建筑物而不同。可能这三位王子是省一级的总督，他们的肖像分别出现在所管省的主要庙宇中。谢拉卡罗尔看来是在基督纪元后不久继承其父母登位的。在布塔纳以南的盖利山有一处石刻，表现他在太阳神的庇护下战胜无数敌人。

麦罗埃及其周围的国家

几年之后，便发生了《使徒行传》（第 8 章第 28-39 节）中所记载的一则著名轶事：门徒腓列在从耶路撒冷到加沙的路上，使"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太监，他是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手下担任总管银库的大臣……"㉟改宗基督教。无论这一论证价值和意义如何，它表明麦罗埃的名声远近皆知。

长期以来，研究者曾想从另一个方向寻找麦罗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狮神阿潘德麦克有一个雕像，戴着一副三头狮子面具，长着四条手臂㊱，而纳盖的浮雕从莲花中伸出一条蛇来，这些都使人想到了印度。蛇的颈部成为人体，只有一支胳膊，这就是戴着三王冕的阿潘德麦克的面具。在穆萨瓦拉特－苏夫拉的废墟中，有许多大象的雕像值得注意，其中更为奇怪的是有一头象竟用作一堵宽墙的顶。最近的研究，倾向于放弃与印度发生过联系的假设，而从库施王国本身寻找纯属于当地、因而也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根源㊲。 292

这一遥远的国度继续吸引着罗马人。尼禄约在我们纪元 60 年派遣两个掌管百人的头目循尼罗河而上，两人回来时都说，这片土地太贫穷，不值得去征服㊳。穆萨瓦拉特有一面墙上刻着一段用拉丁文写的铭文，罗马钱币也传到了努比亚和苏丹的一些地区，虽然数量很少。在麦罗埃找到一个克劳迪乌斯时期的钱币；在卡拉诺格发现了一个尼禄时代的；远至科尔多凡（奥贝德）还发现了一枚戴克里先时代的；在散纳尔则发现了另一枚四世纪中叶的钱币。这些少量的遗物，同麦罗埃浴室的发现、几百个墓中的青铜器以及最近在塞代因加发现的一套华丽的玻璃器皿具有同样的重要性㊴。

㉟ 《圣经》（耶路撒冷版）法文版脚注称：这一地区指"第一瀑布以上：努比亚或埃及苏丹"，即我们在本章注 7 中所说的库施国。

㊱ 见本章注 26。

㊲ 见后文参考书目。关于可能与印度有联系的问题，参阅阿克尔（A.J. Arkell），1951 年；I.霍夫曼，1975 年。

㊳ 关于尼禄派出的远征队，资料来源见 F.欣策，1959 a。

㊴ 参阅《东方世界》第 40 期，1971 年，第 252-255 页，附图 43-47；J.勒克朗，1973 年，第 52-68 页，表 16；米哈洛夫斯基（K.Michalowski）引 J.勒克朗，1975 年，第 85-87 页，表 19。

* 《圣经》对埃塞俄比亚的译名。——译者注

麦罗埃同菲莱的埃西斯庙的关系保持得最长，他们向这位女神的圣殿定期派遣使者，贡献丰厚的祭礼。庙里保存着大量用埃及通俗文字、希腊文和麦罗埃文刻的铭文。这些铭文使我们得以确定麦罗埃最后几位统治者之一的唯一年代：特科里迪亚马尼（我们纪元246-266年）曾于我们纪元253年派遣使节去菲莱。我们对麦罗埃最后几个世纪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在文化上，当地的成分变得越来越重要。尼罗河流域、红海及尼罗河-乍得草原之间的各条商路是帝国的经济支柱，但对它们的控制可能已不太容易保持。王室的金字塔明显地愈见其小和贫穷，而来自埃及和地中海地区的物品的稀少则表明外来影响已被阻绝。这是这个国家衰落的原因或结果。

麦罗埃的衰亡

麦罗埃人在此以前一直能击退游牧部落的入侵，此后却成为招引邻居们入侵的牺牲品。这些邻居有南方的阿克苏姆人，东方的游牧部落布勒来人和西方的努巴人。几乎可以肯定，推翻麦罗埃帝国的正是以上三者中的最后一种人。埃拉托色尼在公元前200年第一次提到他们。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有间接的证据。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上发展起来的阿克苏姆王国，约于我们纪元330年迅速到达实力的顶峰。埃扎纳[40]——后来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国王——吹嘘曾率领一支远征军“讨伐努巴人”，到达阿特巴拉河(与尼罗河)汇合之处，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埃扎纳进行征伐之时，麦罗埃王国已经崩溃。从此以后没有用麦罗埃文的碑文。麦罗埃语言让位于今日努比亚语前身的那种语言可能也在这时。此后的陶器虽仍然保留着千年来的传统，却也有了新的特点。

293

某些权威得出的理论是：库施王族逃向西方，定居于达尔富尔，因为那里似乎有麦罗埃文化传统的痕迹幸存[41]。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如对这些地区以及苏丹南部加以考察，当能使我们比较了解埃及的影响是如何以麦罗埃为媒介而传至非洲内陆的。十分肯定的是，库施的荣耀在中非和西非的某些传说中得到了反映。萨奥人有一种传说，说是东方人给他们带来了知识。技术知识传播开来，某些部落用库施帝国的那种失蜡方法铸造青铜。但是最说明问题而且意义也最为重大的是，铁的冶炼之传播到非洲大陆看来应归功于麦罗埃[42]。

不论麦罗埃影响之渗透非洲其他地区具有何等重要性，库施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因为足足1000多年之中，先是在纳帕塔、后来在麦罗埃，有一种独具一格的文明一直在发展繁荣；而且，尽管它相当一贯地披着薄薄一层埃及式的纱巾，它的非洲式的本质却一直保留不变。

---

[40] 柯万(L.P, Kirwan),1960年，第163-173页；I.霍夫曼，1971 b，第342-352页。

[41] 特别是A.J.阿克尔，1961年，第174页。根据废墟和名字方面的迹象得出这种假设。但是它看来未能超出纯假设的范围。

[42] 见本章注22以及后文参考书目。

麦罗埃灭亡后的努比亚："X 族群"

可以认为来自西方或西南方的努巴人是努比亚语的"传播者"，达尔富尔某些山区以及上下努比亚一些地区今天使用的语言，都源出努比亚语。

如上所述，努巴族的若干群占据了麦罗埃王国的南部，考古发掘所获得的一种相当非洲式的陶器证实了他们曾在那里生活。他们的墓都是坟丘，其中在巴尔卡尔山附近的坦加西[43]和乌沙拉的一些已经发掘，其余的还有待于考察，特别是沿尼罗河西岸一带。看来，这些努巴人是我们纪元 570 年前后由于一性论派主教朗吉诺斯的教化而信奉基督教的。麦 294 罗埃王国北方的残存物所示的年代，在某种程度上看来并不一样。自从雷斯纳 1907 年考察以来，麦罗埃灭亡以后的文化阶段定名为 X 族群，这就是直接了当地承认对它一无所知。这一文化分布于整个下努比亚，远达南方靠近第三瀑布的萨伊和瓦瓦。它在这一地区继续演变，历时从四世纪上半叶至六世纪中期，亦即直到基督教传入和努比亚的基督教诸王国迅速兴起时为止。

十九世纪初，努比亚考古工作中孜孜不倦的先驱者伯克哈特就已注意到阿布·辛拜勒以南几英里的巴拉纳和古斯图勒一些巨大的古墓，经英国考古学家埃默里和柯万在1931-1933年的发掘[44]，这些古墓显示了 X 族群小国王们的野蛮的奢华。死者按古代凯尔迈的习惯躺在担架上，周围是他们的妻子、奴仆和披着漂亮马衣的马。沉甸甸的王冠和银镯上镶着彩色宝石，许多地方都令人想起埃及或麦罗埃的遗物，例如带着巨大王冠(阿提夫)的阿蒙神的公羊头，头饰的花边，或者埃西斯的半身像。散放地上的银器则明显地反映出亚历山大城的影响：发现的水罐，杯子，祭碟中有一个盘子，上面刻着赫尔姆斯神坐在一个球上、身边有一只秃鹰，还有巨大的青铜灯和镶有雕花象牙板的木箱。但陶器仍然是传统的麦罗埃式样，可见一种地道的努比亚技术在这 1000 年中一直没有失传。

诺巴德人，还是布勒米人？

X 族群究竟是诺巴德人还是布勒米人？布勒米人[45]是好战的游牧者，习惯上把他们同沙漠东部的贝札人各部落视为同一种人。至于诺巴德人或诺巴特人，在经过许多争论之后，被认定为努巴人。本文作者倾向于把他们当作巴拉纳和古斯图勒的主人。无论是否如此，关于布勒米人或诺巴德人，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他们的名称，看来还不如使用"X 族群"或"巴拉纳文化"较好。

古代文献以及墓碑上的铭文，使我们得以确定主要的历史轮廓。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声称，三世纪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把边界撤回到第一瀑布的时候，他鼓励诺巴特人离开

---

[43] 欣尼(P.L. Shinnie)，1954 b；L.P.柯万，1957 年，第 37-41 页。
[44] 见下文参考书目，特别是 W. B.埃默里和 L.P.柯万，1938 年。
[45] 卡斯蒂利奥尼(L.Castiglione)，1970 年，第 90-103 页。

295 绿洲地区而定居在尼罗河上，打算把他们当作防止布勒米人入侵埃及的屏障。但事实上约在450年西奥多修斯在位之时，布勒米人和诺巴德人曾袭击菲莱。他们最终被先由马克西米努斯指挥、后来又由弗洛勒斯长官指挥的军队赶了回去。

基督教传入后，他们获准到菲莱的埃西斯庙朝拜，并且在某些重要的节日还允许他们借走这位女神的像。伊卜里姆堡可能是这种朝圣路程上的一个驿站，因为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看来象埃西斯的彩色陶瓷小神像。直到我们纪元535-537年间，查士丁尼手下的将军纳尔赛斯才封闭菲莱的寺庙，赶走了最后一批祭司。

就在这同一时期，福音开始在努比亚传播。如果我们相信以弗所的约翰的话，皇后西奥多拉支持的一性论派的传教士朱利安，比皇帝派遣的正教使者走得更远，他在我们纪元543年成功地使诺巴德国王改变了信仰。在卡拉卜舍庙中，一块用希腊文刻的残碑上——可惜这一碑文没有日期——诺巴特国王西尔科吹嘘他在神的帮助下征服了布勒米人。布勒米人从此在历史上消失。

（屠尔康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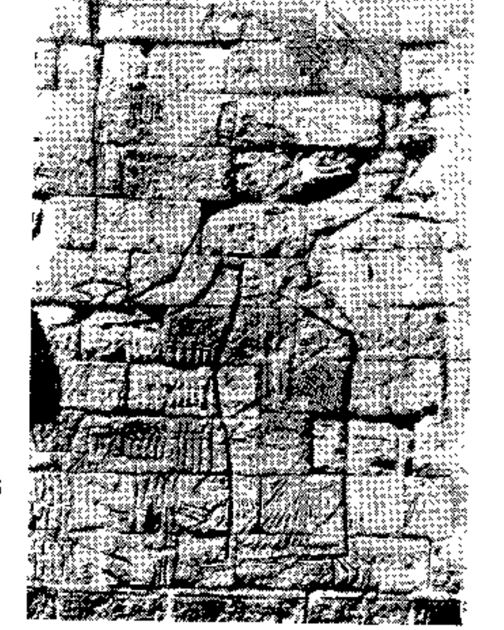
图片 10.1 a 阿斯佩尔塔国王的埃塞俄比亚黑花岗石雕像

296



图片 10.1 b 雕像头部的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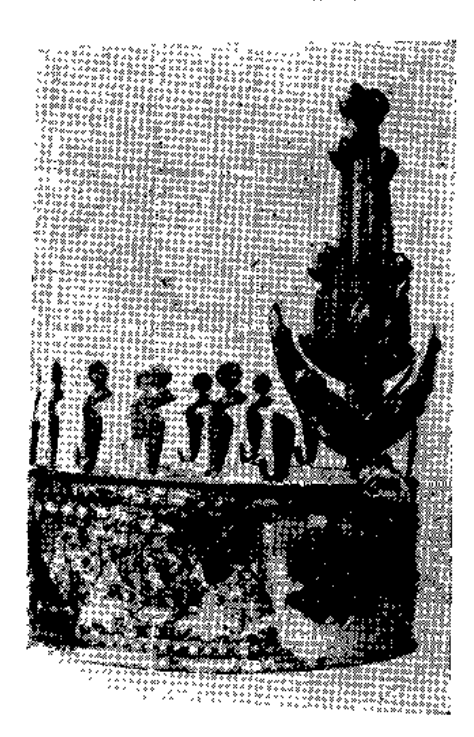
图片 10.2 麦罗埃金字塔中阿曼尼夏海托女王的浮雕

297

图片10.4 喀土穆地区塞代因加的青色彩绘玻璃器皿



图片10.3 巴拉纳王冠



298

11 纳帕塔和麦罗埃的文明

A.A.哈克姆

(I.赫尔贝克和J.韦库泰协助)

政治组织

王权的性质

我们纪元前八世纪至我们纪元四世纪间，努比亚和苏丹中部地区政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看来是其异常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个国家不同于许多古代王国，并没有由于新旧王朝的暴始暴终而发生动乱。的确，可以说这个国家基本上是由同一世系的国王按同样的传统绵延不断地统治的。

直至前不久，人们还普遍认为纳帕塔王朝起源于国外，或是利比亚①、或是埃及底比斯大祭司的后裔②。但是这种看法的论据不充分。大多数当代学者倾向于认为该王朝起源于本地③。除了通过国王塑像表现出的人体方面的特征之外④，还有许多其他特点，如选举制，太后所起的作用，丧葬习俗以及其他一些迹象等等，都清楚地表明这种文化发源于本地，而且没有受到外来影响。

上述迹象对我们概括库施帝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和性质很有帮助。

麦罗埃政体的一个特征是通过选举产生新的国王。从我们纪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到我们纪元前一世纪西西里的狄奥多勒斯等古典作家在描写“埃塞俄比亚人”——当时对库施帝国居民的统称——时，对这种与其他古代王国大不相同的习惯无不表示惊讶。这两位作者坚持认为，选择新的国王的方式是通过神示。狄奥多勒斯断言，“祭司事先从候选人中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人们把他们抬起来列队游行，由神选择，承认神所选择者为王。……他们立即象对待神那样称呼和尊敬他，因为神的意志把王国委托给了他。”⑤ 299

狄奥多勒斯的这段话，无疑得之道听途说，所说的不过是包括宗教仪式在内的新王登

① 雷斯纳(G.A.Reisner)，1918-1919年，第41-44页；并见1936 b,第61-64页；以及许多他的论文；亦参见格里菲思(F.L.Griffith),1917年,第27页。

② 马斯佩罗(G.Maspero),第169页；迈耶(E.Meyer),第52页；柯托(S.Curto),1965年。

③ 迪克森(D.M.M. Dixon)列举了不同意见，1964年，第121-132页。

④ 参阅勒克朗(J.Leclant),1976b。

⑤ 狄奥多勒斯·西库卢斯(Diodorus Siculus),第3卷,第5节；德桑热(J. Desanges),1968年,第90页。

基的正式典礼。他和向他提供情况的人都并不真正知道选择国王的实际过程。

幸运的是，若干纳帕塔碑文详尽地描述了选择国王以及加冕仪式的情况，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继承王位的程序。年代最早的一些碑文是关于皮安基（佩耶）国王（我们纪元前751－716年），年代最晚的碑文是关于纳斯塔森（我们纪元前335－310年）的。可能有一些加冕碑文为时更晚，但由于使用的是麦罗埃文，而麦罗埃文至今尚未翻译出来，因而也就无法肯定。纳帕塔加冕碑文是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王权的特征以及其他有关制度的最好的资料。这些碑文虽然使用了同时代的埃及象形文字，但与新王国时期类似的碑文的通常写法仍有很大区别。因而，必须把这些视为纳帕塔本国文化的产物。⑥

这些碑文中，以关于阿马尼－奈特－耶里克（我们纪元前431－405年）、哈西奥蒂夫（我们纪元前404-369年）和纳斯塔森（我们纪元前335-310年）等三段碑文为时最晚。它们表明，这几位国王力求严守传统习惯，宣布自己是坚持祖宗成法的。另外，这些碑文讲到的细节也比先前的碑文为多，虽然它们所用的文字很难懂。这些碑文在题材上的一致性，令人惊异，有时甚至连措词也都是一致的。据碑文所载，国王在受命之前是同王室其他兄弟们一同在麦罗埃生活。他在麦罗埃登基，然后再去北边的纳帕塔举行大典，三位国王的情况都是如此。事实上，阿马尼－奈特－耶里克以肯定的口吻说，他是41岁时由军队的首领们推选为国王的。在去纳帕塔举行加冕仪式之前还先打了一仗。他到纳帕塔后便去王宫得到了塔-斯提王冠，以进一步确立他的王权。然后他才进入神庙去举行大典。在那里，他（对着神像或神龛）请求神赐予他以王权，而神则答应他的请求。这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王位的继承早在国王进入神殿之前就已决定。在他以前的一些碑文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塔哈卡（我们纪元前689－664年）的继位便是由居住在埃及孟菲斯的谢比库（我们纪元前701－689年）决定的。塔哈卡从他的王室兄弟中被挑选出来，然后开始北方之行。途中肯定到过纳帕塔，并在去底比斯之前曾到杰马通（凯沃）表示敬意。⑦

300

坦韦塔马尼（我们纪元前664－653年）碑文所叙述的典礼中最重要的情节是，他并不住在纳帕塔城，而是在城外的某处，大概和王室兄弟们以及他的母亲卡尔哈塔一起生活。他先在这个地方被宣布为国王。接着他便带领一支庆祝队伍朝北向纳帕塔前进，然后又继续到达埃利凡泰恩和凯尔奈克。从这一情况来看，坦韦塔马尼动身前所住之处应在纳帕塔的南边，即麦罗埃。可见关于继位的决定是在纳帕塔以外的地方作出的。而这正是当时的正常做法。安拉马尼（我们纪元前623－593年）的石碑是在杰马通发现的，他的碑文也用类似的语言描述了他在杰马通举行庆祝活动的一些情节，并且还谈到他象前国王塔哈卡一样，把他的母亲也带来参加这一典礼。⑧

阿斯佩尔塔（我们纪元前593－568年）在其著名的碑文中增加了一些大典的细节：证

⑥ 关于皮安基的征服之碑以及坦韦塔马尼的梦想之碑见布雷斯特德（J.H.Breasted），1906年，第406－473页。塔哈卡之碑、安拉马尼国王之碑以及阿马尼－奈特－耶里克的大碑文已由麦克亚当（M.F.L.Macadam）译出，见1949年，第1卷，第4－80页。关于阿斯佩尔塔选举之碑、马迪肯王后供奉之碑、阿斯佩尔塔国王开除出教之碑、哈西奥蒂夫年表以及纳斯塔森国王年表的情况，见沃利斯·巴奇（E.A.T.Wallis Budge），1912年。

⑦ M.F.L.麦克亚当，1949年，第1卷。

⑧ 同上，第46页。

实他继承了他哥哥安拉马尼的王位，他是由24名高级文武官员从他的王室兄弟中挑选出来的。为了证明王位应由他继承，他谈到了阿蒙－赖神的意志，并提到了自己的祖先，申言根据他的母系，他有权世袭王位。尽管碑文用很长的篇幅歌颂阿蒙－赖神，祭司的作用显然有限。阿斯佩尔塔还谈到他进入神庙内庭的许多细节，说他在那里看到许多前国王的王杖和王冠，并被授予他哥哥安拉马尼的王冠。这与关于阿马尼－奈特－耶里克以及纳斯塔森的记载相同。

从这些碑文可以得出两条重要结论。一是朝拜各个神庙的北方之行是国王即位时必须举行的加冕大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纳帕塔的阿蒙神庙在这一庆典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始终受到尊重。所有这一切情况对雷斯纳首先提出、最近又为欣策所重新陈述的关于曾有过两个独立的纳帕塔王国的理论，有直接关系。⑨

雷斯纳提出这一理论，是为了解释王室墓地的数目。他的基本假设是王室成员的葬礼同首都密切相关；国王的葬地不会距离王宫很远。因此，最早的王室墓地库鲁以及后来的努里，就是到纳斯塔森时代为止的王室成员的墓场，而这一时期的首都为纳帕塔。我们纪元前300年左右纳斯塔森统治时期结束，此后首都迁移到麦罗埃，南贝格拉维亚和北贝格拉维亚这两处便成为王室墓地。但是，在纳帕塔的巴尔卡尔山，有两个金字塔建筑群，就考 301 古学和建筑学的角度来看，雷斯纳相信第一金字塔建筑群的年代与纳斯塔森时期紧相衔接；第二金字塔建筑群则始于我们纪元前一世纪，终于我们纪元前23年或之后不久罗马人侵入纳帕塔之时。他认为两个金字塔建筑群分别属于从纳帕塔进行统治的两个独立的王室分支。但主要的统治王室却在麦罗埃。⑩

不过，大多数学者都已放弃了这个把王国一分为二的看法。⑪对国王继位过程和加冕大典细加考察，便表明雷斯纳的假设站不住脚。难以想象一国的君主在本国首都宣布即位，然后需要去另一个独立王国的首都加冕，而且根据雷斯纳的假设，这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王国的首都。另一方面，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种加冕仪式后来废除了，因为希腊作家证明，如比翁⑫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加冕仪式一直持续到我们纪元前二、三世纪；而按照狄奥多勒斯·西库卢斯的说法，则持续到我们纪元前一世纪。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纳帕塔在麦罗埃王国里起着重要作用。国王们根据传统去该地接受加冕，而且有的国王还埋葬在那里。

对有关的全部碑文进行的分析表明，王位由王族世袭，不同于法老时代或其他古代东方所通常遵循的父死子继的方式。在纳帕塔和麦罗埃，国王是从其王室兄弟中挑选出来的。挑选权操于军队首领、高级官员和氏族头人。任何被选者如果被认为能力有问题或不孚众望就很可能被淘汰。通过神示加以确认，无非是对已经决定的人选予以形式上的批准，具有某种象征的性质，专为公众而设，目的在于使他们相信新的君主是由神所亲自选中。

另外，理论上王冠显然是由国王的弟兄继承，然后再传到下一代。纳斯塔森之前的27

⑨ 欣策(F.Hintze)，1971b。

⑩ G.A.雷斯纳，1923 b，第34－77页。

⑪ 韦尼希(S.Wenig)，1967年，第9－27页。

⑫ 比翁(Bion)写过几篇关于地理和自然史方面的论文，其中只有几个片断为某些古典作家所了解。大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第6卷中特别提到比翁所绘制的尼罗河沿岸的一系列城市。

个国王中，14人是前国王的弟兄。当然，这个或那个国王篡权夺位时又当别论。但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篡位的国王也力图证明其行动合理合法。还有一些迹象表明，王位继承权可能更多地属于母系后代，而不属于王室中的父系的后代。从许多碑文都能看出太后在
302 挑选新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中一些特色与非洲大陆各地的王国和酋长国的情况十分相似。⑬

所有这些加冕典礼都证明，在纳帕塔和麦罗埃，王权是神圣的。国王被尊为多种神明的共同养子。至于在多大程度上把国王本人也视为神或神的化身，这一点现在仍不清楚。但是，既然国王由神选中，他的行动也就是由神通过习惯法来加以指导。从中我们得到一种高度发展的君权神授的概念。由神所指定的国王根据一神或众神的意志来主持公道、裁决是非。这种概念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君主专制制度的实质。虽然在理论上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但他必须严格按习惯法进行统治，不得背离。除此之外，他还受到许多戒律的约束。斯特拉波和狄奥多勒斯·西库卢斯曾举出若干事例：祭司们以执行神的指示为名，勒令国王自杀⑭。他们说，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埃加梅尼斯时期（约在我们纪元前250－125年）。埃加梅尼斯受过希腊教育，摆脱了迷信思想，处决了那些擅作指示的为首的祭司，国王自杀的风俗于是从此消失⑮。

纳帕塔和麦罗埃的统治者在碑文中采用了"法老"这一传统的头衔，在他们的种种头衔中从来找不到一个意为"国王"的麦罗埃字。"kwr"（读如盖雷）这一头衔只是在萨美提克二世叙述征服库施的过程中提到阿斯佩尔塔国王时才见到⑯。虽然这一头衔肯定是对库施国王的通常称呼，但库施的石碑上却是不允许提及的。

干大基：太后的作用

至于早期的王室女性成员所起的作用，现在仍不十分清楚。但许多迹象表明，她们在国内居于显赫的地位，担任重要职务。当库施国王统治埃及的时候，国王的女儿把持着底比斯阿蒙神的首席女祭司这一位置。使她有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势。库施国王失去埃及，从而也失去了首席女祭司这一位置之后，王室的女性成员仍继续在纳帕塔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阿蒙神庙的祭司中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

塔哈卡和安拉马尼的碑文有关太后在国王本人的入选和加冕大典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描
303 写，使人毫不怀疑太后的举足轻重和特殊地位。太后还可通过一种复杂的收养制来施加影响，即以库施女主的身分收儿媳为养女。根据这一制度，纳萨尔萨收养了安拉马尼的妻子马迪肯。不久安拉马尼逝世，他的兄弟阿斯佩尔塔继位。阿斯佩尔塔的妻子赫努茨哈比特最后又为纳萨尔萨和马迪肯共同收养。纳斯塔森（我们纪元前335－310年）的石碑上而一

⑬ 例如在克法、布干达、安科拉，在希卢克人中以及在莫诺莫塔帕和其他地方的情况都是如此。

⑭ 斯特拉波(Strabo)，XVII，2、3；狄奥多勒斯·西库卢斯，III，6。

⑮ 狄奥多勒斯，同上。非洲多有根据祭司或长老的命令处死国王的类似做法。参见弗罗贝尼乌斯(L.Frobenius)。

⑯ 索内龙(S.Sauneron)和约约泰(J.Yoyotte)，1952年，第157-207页，第一次确认"kwr"是麦罗埃语对"国王"的尊称。现代阿卢尔语的ker(长者品格)一词可能起源于这个麦罗埃词。参见海科克(B.G.Haycok)，第471页，No.34。

部分图画是纳斯塔森的母亲佩莱克斯和他的妻子萨卡克手中各持一个“西斯特拉姆”*。“西斯特拉姆”似乎是她们职位的标志。安拉马尼的碑文说，他把自己的四个姐妹分别献给四个阿蒙神庙，充当“西斯特拉姆”的演奏者，在神前为他祈祷。

画像证实太后地位的提高。神庙墙上的宗教画中，太后居于突出的位置，仅次于国王本人。而在金字塔礼拜堂的壁画上，王后出现在已故的国王身后，国王才是受祭奠的主要人物。

后来，这些王后——无论是国王的母亲或妻子——都开始掌管政治大权并自立为君主，甚至还采用了国王的种种称号，如“赖之子”、“两国之主”、“赖之子及国王”等[17]。她们有许多人出了名。人们得知，希腊罗马时代麦罗埃是由一系列干大基，即摄政王后统治的。

干大基这个名称来源于麦罗埃文 Ktke(克特基)或 Kdke(克德基)[18]，意为太后。另一个称号“盖雷”(qere)意为统治者，只是在麦罗埃文出现之后才开始使用。据我们所知，只有四个王后采用过这一称号。她们是：阿曼尼雷纳斯、阿曼尼夏海托、纳威德马克和马莱克里巴尔。按定义，她们都是干大基。[19]值得注意的是，在努里的王室墓地里，从塔哈卡(卒于我们纪元前 664 年)到纳斯塔森(卒于我们纪元前 310 年左右)，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哪位王后的葬礼达到执政君主葬礼那样高的规格，而且在此期间也从未听说有哪位王后曾经执过政。已证实的最早的执政王后是早在我们纪元前二世纪初期的沙纳达凯特。她死后以最高的王室葬礼葬在北贝格拉维亚。很有可能，太后的称号和地位起初并无什么特殊之处。她受托抚养王室子弟。塔哈卡在其碑文中便提到他同王室兄弟们与母后阿巴尔一起生活，直到 21 岁。而王位的继承人就是从这些神一般的青年中挑选出来的。这样，太后便处于一种权势极大的地位，这一点从她在加冕大典中的特殊作用以及以儿媳为养女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某个阶段，王后们的权势超过了儿子或丈夫。这样她们就抓住一个有利的时机，把全部权力夺到自己手中。从沙纳达凯特起，便出现了一系列执政的女王。但自我们纪元前一世纪的阿曼尼雷纳斯开始，情况似有新的变化。从许多重要的纪念碑中都可以看出，国王的第一个妻子和他的长子关系密切。这表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同摄政，因为国王的妻子在国王死后常常成为执政的干大基。不过，这种制度实行不过三代人，好象在公元一世纪的前半叶，纳塔克马尼、阿曼尼泰雷和谢拉卡罗尔之后便告结束。这一切都说明，这是当地一种体制所发生的内部变化，而不是模仿外国办法，譬如模仿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克利奥帕特拉。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体制在漫长的若干世纪中是如何愈来愈变得复杂的。

304

在库施发展起来的这种王位继承制，与呆板严格的直系继位制度相比，确有某些长处。它消除了由平庸猥琐或不受拥戴的人继承王位的危险，收养制保证有新鲜血液输入王室。这种制度内在的种种检查和控制措施、太后的突出地位以及坚持王位的合法继承的做法则

---

⑰ F.欣策，1959 a，第36-39页。

⑱ 麦罗埃语专有名词常省去“n”;参见 F.L. 格里菲思，1911-1912 年，第 55 页。

⑲ M.F.L.麦克亚当，1966 年。

* “西斯特拉姆”(sistrum)，古代一种乐器，有一个金属框，附以若干金属短棍或环，摇晃作声，尤其用于埃及。——译者注

确保了同一王室的统治延续不绝。纳帕塔和麦罗埃能许多世纪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上述这一切可能起了相当作用。

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

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情况的了解还是支离破碎的。由于明显地缺乏有关私人的传记性记载，我们收集不到关于种种头衔和职位及其意义和职权的情况。

行政的中心人物是国王，极权专制的独裁者，他的话就是法律。他不把自己的权力委托给任何人，也不同任何人共掌大权。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象统管所有神庙的大祭司或宰相之类可以在手中集中某种权力的官员。王宫便是行政管理体制的中心。据最近对这方面证据的一次调查[20]，似乎唯有麦罗埃可以认作王宫和行政管理中心所在的城镇。皮安基对自己住处的位置讲得很含糊，而孟菲斯显然是直接继承他的王位的埃及第二十五王朝诸王的首都。但是，塔哈卡清楚地表明他是和他的王室兄弟们与母亲一起生活。另外一些碑文清楚表明这些王室弟兄住在麦罗埃。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唯独在麦罗埃、特别是在西贝格拉维亚墓地，人们发现有若干儿童和婴儿的坟墓，殉葬品表明他们都是王室子孙。而库鲁和努里的其他王室墓地却没有这样的坟墓，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室住在麦罗埃，这肯定也就是国王的永久性住处。

305

中央的行政管理由一批高级官员主持。阿斯佩尔塔的两块石碑上保留了这些人的埃及头衔。除军事指挥官外，我们在这些头衔中还发现有财政主管人员，掌玺人，档案主管人员，粮仓主管人员，库施书吏长以及其他书吏等等[21]。至于这些头衔是否与持有这些头衔的人的实际职能相一致，或者不过是把埃及的职衔生搬硬套，则难以确定。但不管怎样，这些官员不但管理国家，而且在遴选新的国王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麦罗埃文字一旦译出，也许会揭示这个重要问题的真象。

这些碑文在关键时刻好几次提到军事首领。他们承担着宣布新王继位和举行传统的加冕大典的任务。其实，他们可能在挑选国王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猜想：大多数军事首领很可能便是王室成员，甚至有可能是长辈人物[22]。按照习惯，国王是不上战场的，而只是在宫殿里把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某位将军。皮安基在埃及的战役，阿马尼-奈特-耶里克在布塔纳讨伐雷赫雷哈人的战争以及纳斯塔森的战役情况都是如此。然而，我们不知道这些将军后来的情况如何。即令打了胜仗，他们也仍旧从此湮没无闻，而国王则把全部胜利的光荣归于自己。

关于各省的行政管理情况，在许多地方仍可看到王室宫殿的遗迹。每个宫殿都是一个小小的行政管理单位，为首的也许是掌管该处仓库和帐务的主要掌玺人[23]。

然而，对于后来可能开始于我们纪元前一世纪末的那一阶段，我们便据有关于省一级

---

⑳ 阿里·哈克姆(A.M.Ali Hakem)，1972 a，自第 30 页起。

㉑ 冯·施泰因多夫(G. von Steindorff)，第 3 卷；舍费尔(H.Schäfer)，1905-1908年，第 86、103、104 页，

㉒ E.A.T.沃利斯·巴奇，1912 年，第 105 页起。

㉓ M.F.L.麦克亚当，1949 年，第 1 卷，第 58 页。

行政官员的记录，足以勾画出这个国家北部省份的轮廓：罗马征服了埃及，后来企图继续南进努比亚，虽然遭到挫败，却引起了一片动乱。为了对付边境上的这种形势，王国在下努比亚设立了一个特别行政管理部门，从而促使这个北部省份迅速发展。这一行政部门的首领称帕卡尔（Paqar 或卡尔"qar"），在宫廷中地位显赫。如果可以认为第一个担任该职的人便是建立这一制度的人的话，他还可能是位王子。第一个担任该职的是特里特卡斯和阿曼尼雷纳斯的儿子阿基尼达德。他曾抵挡过罗马对努比亚的侵犯。曾经获得这一头衔的还有阿里坎卡罗尔，阿里卡卡塔尼和谢拉卡罗尔（盖利山石刻画中的国王）[24] 以及纳塔克马尼和阿曼尼泰雷（我们纪元前 12 年至我们纪元12年）的三个儿子。在纳帕塔、麦罗埃和纳盖的碑文中都曾发现过他们的名字，冠以帕卡尔（pqr）头衔。[25] 但是，所有这些人物无一与下努比亚有关。这种头衔似乎是对王子的统称，而非北部长官特有的名号。 306

但是，在提到其他次要部门时，"帕卡尔"这个头衔也出现了好几次。提到的次要部门有塔凯特小镇的塔兰赫布（taraheb）和安哈兰兰布（anhararab）以及法拉斯地区的首领哈兰朋（harapen）[26]。我们可以推断，帕卡尔便是麦罗埃下努比亚的省长。排在帕卡尔之后主管行政事务的官员是帕夏（peshte）[27]。这一头衔最初见于我们纪元前一世纪的文献，我们纪元三世纪时，这个职位似乎变得更加重要。

帕夏的管辖区域为"阿金"，相当于整个麦罗埃努比亚，南部直至纳帕塔。帕夏这一头衔如何授予——是世袭或者由国王任命，还是由帕卡尔委派，情况还不清楚。但是，持帕夏头衔的人数之多，表明其任期时间较短。与帕夏头衔有关的其他头衔，有一些在宗教界，包括外省的乃至纳帕塔或麦罗埃的宗教界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帕夏之下设有两个重要职务，这就是帕姆-埃特（pelmes-ate,水军将军）和帕姆－埃达布（pelmes-adab,陆军将军）。这两个将领似乎负责管辖努比亚为数不多、但又至关重要的水上和陆上通道，以保证与埃及的贸易畅通无阻，并把守边境以及防止游牧民族向尼罗河东西两侧的侵袭。这些将领有若干下级官员、书吏、祭司和地方行政人员的协助。我们不知道其他省区是否也有类似的行政管理制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布塔纳由于环境和居民情况的特殊，需要实行一种不同于尼罗河流域或下努比亚的行政管理形式。遗憾的是，除了既作为宗教机构、又肯定是行政单位的牢固基础的那些显赫的寺院之外，我们没有什么记录可资研究。

全盛时期的麦罗埃王国国土辽阔而交通设施可能极差。要使行政管理能够运转，省长肯定必须把权力分散下放。国家边缘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首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则更为松散。这个国家在后期还包括了一些公国。普林尼曾写道，在麦罗埃地区除于大基外，还有其他 45 个埃塞俄比亚国王各据一方[28]。另一些古典作者也谈到过臣属于麦罗埃国王的一些霸主的情况[29]。 307

麦罗埃南面有森布里蒂人。据说他们是埃及难民，由麦罗埃君主手下的一位王后统治

[24] F.欣策，1959 a，第 189-192 页。
[25] A.J.阿克尔，1961 年，第 163 页。
[26] F.L.格里菲斯，1911-1912 年，第 62 页。
[27] 同上，第 120 页及索引。它相当于埃及文的p.s,nsw，psente；M.F.L.麦克亚当，1950 年，第 45-46页。
[28] 普林尼，186。
[29] 参见比翁和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收入马勒(C.Muller)著作，第三卷，第 463 页，第四卷，第 351 页；塞内卡(Seneca)，8、3。

着。但在尼罗河左岸(在科尔多凡)，居住着由独立于麦罗埃之外的几位小诸侯统治的许多努巴族部落[30]。东部沙漠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那里居住着许多文化和语言都不同于麦罗埃的游牧部落。

许多碑文表明，麦罗埃的国王经常率领军队讨伐这些独立的和半独立的少数民族，其目的部分是为了征服他们或是为了惩罚这些人的侵袭劫掠，或是为了掳获牛和奴隶。文献中讲得最多的是雷赫雷人和马贾伊人。这些人可能居住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地区，有可能是贝札人的祖先。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库施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它后期包括若干以某种形式依附于麦罗埃国王的公国。[31]

经济和社会生活

生态学

库施王国各地的地理环境多种多样，各不相同，因而作为王国基础的经济活动也就十分广泛。王国的领土自下努比亚延伸到散纳尔南部和吉齐拉平原南部的杰贝勒·穆亚，包括位于尼罗流域和红海之间的大片土地。同样，尼罗河西岸的大片土地也可能处于麦罗埃的势力下，尽管范围如何尚不知道。在这广阔的地区中，有的干燥贫瘠，有的在夏季降雨量相当可观。努比亚经济活动的基础，是属于尼罗河流域常见的那种以单一河道为其唯一水源的类型的农业。就可耕地而言，有些地方全告阙如，而另一些地方也只是沿河窄狭的土地，但在上努比亚却扩展为一处处盆地。这种依靠河边土地耕作的方式一直沿着尼罗河及其支流向南延伸。下努比亚的这种地理条件对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尼罗河的水位较低，加之努比亚又位于降雨区以外，这种生态308条件不适于发展足以养活大量人口的农业。事实上曾有人认为，纳帕塔时代前期的下努比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毫无人烟，只是从我们纪元前三至二世纪起，由于萨基亚(水车)的传入[32]，这个地方才开始有人居住。

上努比亚的泛滥平原，如凯尔迈盆地、莱蒂盆地和努里等处，或由于尼罗河洪水、或由于条件许可处采用了提水工具而可以耕种，若干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城镇于是得以在诸如巴尔卡尔、凯沃、塔博、索利卜和阿马拉等地发展起来。农业经济在这一地区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塔哈卡，哈西奥蒂夫和纳斯塔森的碑文中好几处特别提到了枣树和葡萄种植园。

但从我们纪元前五世纪中叶起，这一地区遭受了旱灾和沙漠的侵袭，这表明该地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致使内地牧场面积缩小。这种状况可能诱使沙漠东部的游牧民迁移进入尼罗河流域，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阿马尼－奈特－耶里克（我们纪元前431－404年)以

[30] 斯特拉波，XVII，1、2，引埃拉托色尼语。
[31] 甚至在纳帕塔时期库施帝国也带有联邦色彩，参见第10章。
[32] 特里格(B.Trigger)，1965年，第123页。

及后来的国王统治期间波及到麦罗埃北部的战争，可能便是这样发生的。这些因素使得上努比亚的重要性在麦罗埃王国后期大为降低。

从阿特巴拉河与尼罗河主要河道汇合点往南，尼罗河不再是贯穿沙漠地带的唯一重要的河流。尼罗河的各条支流（如阿特巴拉河、青尼罗河、白尼罗河、丁德尔河、赖海德河等等）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都为人们提供了同样的发展农业以及进行其他经济活动的可能，而所提供的可耕地还更广。另外，这些支流之间的土地夏季降雨量相当丰富，从而成为广阔的牧场以及适宜耕种的田地。布塔纳和位于阿特巴拉河、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之间的麦罗埃地区实际上便是麦罗埃王国的心脏地区，其主要经济活动是游牧或半游牧形式的畜牧业。

农业和畜牧业

纳帕塔王国崛起时，畜牧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与农业一起成为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人们除了饲养长角牛和短角牛以外，还养了绵羊和山羊，以及少量用以负重的马和驴[33]。骆驼的引进则为时较晚，约在我们纪元前一世纪末[34]。 309

养牛业在王国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王室从纳帕塔迁往麦罗埃，可能便是由于需要靠近主要牧场，因为降雨区的边缘是在新首都的南边。迁移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北部地区集中放牧，渐渐导致尼罗河两岸水土流失。不论是何种情况，国家中心在四世纪的南迁，显然给养牛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一段时期之后，这种历史便又重演：牛群毁坏了草地，也毁坏了灌木丛和树木，导致又一场干旱。自我们纪元一世纪起，麦罗埃南面的牧场无法再维持早先的稠密的游牧人口，他们于是被迫向西或向南迁移。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可能就是麦罗埃王国没落和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养牛业在库施帝国所占据的首要地位，已从许多方面得到证实。诸如画像、葬礼仪式、以及人们所用的比喻，例如说：一支没有首领的军队就如同一群没有牧人看管的牛[35]。

献给神庙的祭品主要是牲口。国王、贵族和寺院祭司的财产多少似乎也是用拥有多少牲口来衡量。从斯特拉波和西西里的狄奥多勒斯等古典作者留下的记载来看，麦罗埃社会之具有由畜牧业带来的特点是无可怀疑的，它在很多方面与后来的非洲畜牧社会相似。

在纳帕塔和麦罗埃的全部历史中，北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始终受着气候以及尼罗河谷极其狭窄、缺乏肥沃土地这两方面的影响。当地居民之所以没有象他们北边的埃及邻居那样感到有必要搞一套单一的灌溉系统、并因此带来种种社会和政治后果，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土地，而不是努比亚的这一地区不懂得灌溉。在凯尔迈高原便曾发现过我们纪元前十五世纪的古代灌溉工程的遗迹。当时主要灌溉机械是夏杜夫(shadūf)，后来为萨基亚所取代。萨基亚在努比亚语中称为科莱(Kolē)[36]。它只是在麦罗埃时期的下努比亚出现过，但确切年代难以确定。我们纪元前三世纪的代凯和加迈遗址，看来是发现有萨基亚痕迹的最早

[33] 库鲁有一处马的坟场：邓纳姆(D.Dunham)和贝茨(O.Bates)，第110-117页。

[34] 阿里坎卡罗尔国王(我们纪元前25-15年)墓中发现了一个青铜骆驼。参见D.邓纳姆和O.贝茨，表49。

[35] M.F.L麦克亚当，1949年，第一卷，(铭文)9。

[36] 从舍拉勒到塞卜阿之间许多地名都带有这个字。如科莱杜尔、洛莱塞格、阿里斯曼-科莱、苏卢维-科莱等等。参见蒙纳雷·德维拉德(U.Monneret de Villard)，1941年，第46页起。

的地方[37]。这一灌溉机械的使用对农业、尤其是在栋古拉地区的农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
310 响。萨基亚这种水车由水牛或其他牲口带动，可把水提到3至8米的高处。它比用人力带动的夏杜夫既省力又省时。

如果我们相信希罗多德的话，那么甚至在该国的南部也是以畜牧业为主的。至少在我们纪元前六世纪末是如此。在希罗多德笔下，麦罗埃居民绝大多数以养牛为生，农业却相当落后[38]。考古工作也多少证实了这种看法，因为在年代为纳帕塔时期以及之后，即我们纪元前六至五世纪的杰贝勒穆亚的B地层中，没有发现农业活动的任何痕迹。[39]

随着帝国中心的逐渐南移和水浇地面积的增加，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麦罗埃王国的全盛时期，麦罗埃地区进行集约耕作。沟渠网和蓄水池（hafirs）的遗迹就证明了这一情况。在这一期间，麦罗埃国王和祭司的标志之一便是做成犁或锄的形状的权杖，与埃及广泛使用的很相似。

当时种植的谷类主要有大麦和小麦，但最主要的是一种当地品种的高粱，叫做达瑞（durra）。另外，还有小扁豆，叫兰斯埃斯库兰塔（Lens esculenta），黄瓜，甜瓜和葫芦。

所种植的经济作物中，最主要的要算棉花。古埃及不知道种棉花，但许多迹象表明，尼罗河流域棉花的种植是我们纪元前从库施帝国开始的。属于早期的证据很少，但约在我们纪元前四世纪时，植棉和纺棉的知识在麦罗埃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人甚至认为，纺织品的出口是麦罗埃的财富来源之一[40]。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在其碑文中曾经吹嘘他在麦罗埃毁掉了若干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园[41]。

我们掌握的资料中没有谈到有关土地占有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情况。但是，根据村落社会的传统形式一直继续到十九世纪这一情况，我们可以设想在纳帕塔和麦罗埃时期也存在着同一形式的村落。国王被视为土地的唯一主人。这种情况在许多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从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土地占有方式。所以对了解作为土地主人的国王与土地的耕种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土地制度并不能提供什么有用的启示。

农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经营果园和葡萄园。当时许多果园和葡萄园属于寺院所有，由奴隶种植。

总的说来，纳帕塔和麦罗埃时期的各种农业分支与古埃及相同，只是分支间比例不
311 同；畜牧业占据的地位超过农业，菜园和果园的种植则较差。但是棉花的种植比埃及开始得早得多。根据已有的材料，农产品从未出口，因为产量还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消费需要。

矿产资源

远古时期，人们认为库施帝国是所知道的古代世界中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一名声与

[37] O.贝茨和D.邓纳姆，第105页；赫佐格（R.Herzog），1957年，第136页。
[38] 希罗多德，III，22-23。
[39] 艾迪生（F.S.A.Addison），第104页。
[40] 克劳富特（J.W.Crowfoot），1911年，第37页，实录第19号。
[41] E.利特曼（E.Littmann），1950年，第116页。

其说是由于王国中心地区的财富，不如说是由于尼罗河以东边境地区的矿藏。

库施是古代世界主要黄金产地之一。黄金的开采地位于尼罗河与红海之间，主要位于北纬18度以北。在那里可以找到许多古代采矿的痕迹。开采黄金肯定是麦罗埃帝国的一个重要生产行业，看来寺院也拥有大量的黄金。塔哈卡向他治下的不计其数的神庙之一所赠送的黄金，九年之中便达110公斤。[42] 最近在麦罗埃和穆萨瓦拉特－苏夫拉进行的发掘工作发现，有些寺院的墙壁和雕像都包上了一层金箔。黄金生产和出口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富强的主要源泉之一，而且也大大地影响着该国与埃及和罗马的关系。有人计算，古代库施生产的纯金约达160万公斤[43]。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来看，黄金也肯定为游牧民所珍视。例如纳斯塔森国王曾经从麦罗埃附近与他交战的各族人手中搜刮了近300公斤黄金。[44]

虽然在墓地也发现了无数件银质和铜质制品，贡献给神庙的物品中也常常有银制品，有的工艺水平还相当高，但银和铜都不象是在当地开采的，想必是从外国进口而来。

另一方面，沙漠东部地区则富有紫晶、红玉、红锆石、金黄色宝石，绿柱石等等宝石或半宝石。虽然这些采矿场并不全都处于麦罗埃王国控制之下，但至少其产品最后都要通过麦罗埃的贸易渠道，因而也就提高了麦罗埃作为古代最富国家之一的声望。

关于铁的冶炼问题

麦罗埃古城附近和布塔纳等其他一些地方所发现的大堆矿渣，引起人们就铁在麦罗埃文明史中的重要性作种种推测。有人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地方有关铁的冶炼和加工的知识是从麦罗埃传来的。早在1911年，赛斯就宣称麦罗埃一定是"古代非洲的伯明翰"[45]。直至前不久，这种观点还在学者中盛行，并且为绝大多数有关非洲历史或苏丹历史的著作所接受[46]。 312

人们普遍接受的这一观点，近年来遭到一些学者的辩驳。他们对此提出了若干强烈的反对意见。[47] 他们指出，坟墓中发现的铁制品数量极小。温赖特早就注意到，我们纪元前400年左右的铁制品只发现过极少的残迹。而且一直到我们纪元320年麦罗埃衰亡时，铁器也决不是常见的用品。另一方面，泰莱科特以肯定的口吻宣称存在着我们纪元前200年的炼铁迹象，而安博恩对墓地中发现的所有金属物品进行仔细地分析表明，即使在后期，铜制品也还是多于铁制品。他的结论是，比较更为可能的是这些出土的铁制品用的是进口的铁，有可能是由努比亚当地的铁匠加工的。但能确切判断确有铁匠存在的，只有麦罗埃时代以后的X族群文化。总而言之，不能根据各种铁制品的加工推断出当时已具有关于铁的冶炼的知识。

---

[42] 韦库泰(J.Vercoutter)，1959年，第137页。

[43] 奎林(H. Quiring)，第56页。

[44] H.舍费尔，1901年，第20-21页。

[45] 赛斯(A.H.Sayce)，第55页。

[46] 温赖特(G.A.Wainwright)，1945年，第5-36页；A.J.阿克尔的许多著作，最新的一本1966年出版，自151页起；P.L.欣尼，1967年，自160页起；卡茨纳尔逊(I.S.Katznelson)，自289页起，并见其他人的著作。

[47] B.G.特里格，1969年，第23-50页；泰莱科特(R.F.Tylecote)，第67-72页；安博恩(H.Amborn)，第71-95页。

安博恩认为，麦罗埃的矿渣堆是其他行业剩下的，与铁无关。假如说这些矿渣堆真是炼铁剩下的废渣的话，那么麦罗埃周围的地区就应该遍布炼铁炉。然而，直至最近人们还没有发现该地有任何这种炼铁炉的痕迹。[48]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现在远未结束，尚需进行更多的考古工作，才能证实麦罗埃曾经炼铁。墓场中发现的铁制工具和铁制物品很少，不足以表明当时曾大规模生产铁，也令人怀疑麦罗埃曾是非洲的伯明翰这样一种理论。另一方面，这既不意味着这一地区不知道铁的冶炼技术，也不意味着在邻近的其他非洲地区未曾有过这种实践。麦罗埃的铁的问题是非洲历史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利用所有的现代技术对此进行详尽彻底的调查是值得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估价麦罗埃对非洲铁器时代所起的作用。

城镇、工艺及贸易

尼罗河流域年年洪水定期泛滥，促进了永久性定居点的发展，并使之终于发展成为城镇。这一情况又转而促进了手工艺的发展。有一些尼罗河流域的城镇中心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而发展成为与内地和其他商业城镇进行贸易的通道。其中有许多城镇中心还成了行政管理和宗教中心。[49]

有人提出，下努比亚的城镇是随着政治局面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且也和麦罗埃人关心他们与埃及交界的北部边境地区密切相关。麦罗埃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被派到下努比亚地区，许多士兵们便在当地定居，发展经济以求自给。他们与埃及贸易，从中得到好处。于是在下努比亚发展起若干大城镇和繁荣的地方村落。地处战略要冲的伊卜里姆堡或阿达山等便是如此。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以当地的显要人物或世袭军政职务的家族为中心。诸如卡拉诺格那样的城堡，或穆萨瓦拉特－苏夫拉的“长官宫殿”，便是这批贵族们的宅邸。

普林尼以比翁和尤巴的说法为根据，仍然坚持以他们所使用的名称来称呼尼罗河两岸位于第一瀑布和麦罗埃城之间的许多麦罗埃城镇[50]。

最北端的麦罗埃文物建筑是代凯的阿克马尼礼拜堂，古代称为普塞尔基斯。但距离最近的边境城镇好象是位于瓦迪塞卜阿以南，在那里人们发现了一个大的居民点和所属墓地的遗迹。这一地区其他主要城镇有靠近今天的阿尼巴城的卡拉诺格以及它对面的伊卜里姆大城堡。虽然这些地方尚存的建筑物大部分都属于麦罗埃以后时期了。

帕科拉斯的法拉斯城曾经是称做“阿金”省的主要行政中心。阿金省相当于下努比亚。在那里已发掘出一些官方建筑物，其中有我们纪元一世纪时用土坯建造的“西宫”和河边上的一座堡垒。

法拉斯以南很少有麦罗埃居民点。这一地区条件较差，河谷十分狭窄，供应不了多少人口。只有栋古拉附近土地才较为开阔，古代居民点的遗迹也逐渐增多。今天的栋古拉城对

[48] H.安博恩，第83-87以及92页；P.L.欣尼和F.Y.肖斯在1977年多伦多第三届国际麦罗埃会议上发表的一封信对安博恩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事实上最近已在麦罗埃（贝格拉维亚）发掘出炼铁炉。

[49] A.M.阿里·哈克姆，1972b,第639-646页。

[50] 《植物史》,VI,178，179。

面是凯沃，这个大城镇中有许多神庙，表明该城历史悠久。经过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麦罗埃文物建筑和石碑。

从凯沃溯流而上直到纳帕塔，看不到什么重要的遗址。纳帕塔在王家典礼以及宗教活动中的位置上面已经着重谈过。该城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正好位于一条商路的北端，而这条商路绕过三个几乎无法航行的瀑布。所有来自该国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来自非洲内地的商品都必须由此通过。纳帕塔城的遗址虽然部分尚未发掘，但库鲁、努里和巴尔卡尔山的王室墓地以及巴尔卡尔山和萨纳姆的神庙都已经考察过了。因此，我们可以评定纳帕塔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库施历史早期阶段的王室和宗教中心。直到纳斯塔森时期为止，纳帕塔周围的墓地一直是王室成员的陵墓所在。纳斯塔森时期以后，王陵一般都在麦罗埃，但有些国王仍愿意葬在巴尔卡尔山。 314

尼罗河谷的第二个重要城镇中心是柏柏尔以北5英里的丹盖尔。在那里发现了砖砌建筑物和城墙的残迹。遗址本身看来就处于麦罗埃通往北方的重要通道上。

在麦罗埃地区发现了许多麦罗埃居民点的遗迹。麦罗埃地区大体相当于位于阿特巴拉河和青尼罗河之间的今天的布塔纳平原[51]。

虽然第一次提到麦罗埃城的是凯沃神庙内我们纪元前五世纪最后25年中的阿曼纳泰里科碑文，最深发掘层的情况表明，早在我们纪元前八世纪时，该地就有一个庞大的居民点。希罗多德（第二卷，第29页）说这是个大城市，而且发掘情况也证实该城占据的面积很大，有中心部分，四周还有郊区，可能还有一道城墙。麦罗埃不仅许多世纪中是首都和王室所在地，而且由于位于商队通道的交叉口并且起着港口的作用，还是国家的主要经济和贸易中心之一。该城区的大部分是许多覆盖着红色碎砖块的土墩，有待考古学家去发掘。[52]而现已发掘和考察的那一部分，足以表明全盛时期的麦罗埃是一个大型城市，具有城市生活所有的特征。因此，麦罗埃应列为非洲大陆早期文明的最为重要的遗址之一。该城已发掘部分中的主要遗址有王城，内有宫殿、王家浴室和其他一些建筑物，以及阿蒙神庙。王城附近发掘出埃西斯神庙、狮庙、太阳庙、许多金字塔建筑，以及埋葬非王室成员的墓地。

离麦罗埃不远的地方是沃德本纳盖遗址，其中至少有两座神庙的废墟。最近发掘出一座很大的建筑物，也许是座宫殿，还发现了一座蜂窝状建筑物，可能是座大型地下仓库。 315 这一发现以及附近许多分散的土墩，表明这个作为干大基的住处和尼罗河码头的城市的重要性[53]。

至于其他重要遗址，应提出下面几个：瓦迪哈瓦德的巴萨。巴萨有一座神庙和一个由许多石雕狮像围绕着的大型蓄水池（哈费尔）。最有意思的特征是这一城市的兴建不是漫无目标随意修建，而是根据当时乔木灌木丛生的地形进行的严格规划[54]。从许多方面来看，位于离尼罗河颇有一段距离的瓦迪巴纳特地方的穆萨瓦拉特-苏夫拉是一个格外重要的遗

---

[51] A.M.阿里·哈克姆，1972b。
[52] 由卡尔加里大学和喀土穆大学最近（1972-1975年）发掘出一系列新的庙宇。
[53] 参见J.韦库泰，1962年。
[54] J.W.克劳富特，1911年，第11-20页。

址。它的主要特色是拥有一座“大围场”，它周围有许多建筑物和围墙圈起来的地方，中央是一座神庙，建于我们纪元前一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大围场”有不少大象的雕像，数目之多足以表明它们在某方面对该国的重要性。那里还有一些庙宇，最重要的是为阿潘德麦克神建造的狮庙。F.欣策[55]新近进行的发掘工作为了解麦罗埃的历史、艺术和宗教等许多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但还有许多方面仍然是未解之谜。

麦罗埃的各城镇除了具有行政管理和宗教职能外，同时也是手工业和贸易的重要中心。迄今没有人对麦罗埃经济历史的这些方面进行过专门研究，但现有的证据表明当时的技术和工艺已有高度水平。建造和装饰这么多纪念碑、宫殿、神庙、金字塔等等，需要专门的建筑工艺。虽然埃及的影响初期显而易见，但从我们纪元前三世纪起的许多当地东西中可以看到，麦罗埃的工匠和艺术家已经摆脱了外国的模式，创造了具有高度独创性的、独立的艺术传统。

陶器是麦罗埃文明的所有产物中最为著名的一种。它的名望要归功于它的质地和装璜。制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一种是妇女手工所制的陶器，它们在形状和风格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体现着根深蒂固的非洲传统[56]；另一种是男人用旋轮制造的陶器，它们的形状变化较多，易于随风格而变化。这些区别导致下列结论，即很早以来旋轮制造的陶器就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工艺，它为市场生产商品，因此受当时流行款式的变化和麦罗埃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需要的影响，而普通老百姓则继续使用妇女们在家中制作的传统陶器。

316　人们主要从王室成员的坟墓中发现了大量的珠宝饰物，这是又一门高度发达的工艺。同其他的制品一样，珠宝饰物早期都仿效埃及款式，唯后期才具有麦罗埃独特风格。使用的主要原料有金银和次宝石。制品种类从饰牌到项链、手镯、耳环、戒指等等。珠宝饰物的式样相当多，有些显然从埃及的式样受到启发，但也有另一些却显示着麦罗埃工匠和艺术家的传统。另一种有关的工艺是象牙雕刻。这种材料麦罗埃既多又容易得到，因此雕刻匠以此创造了自己的技术和传统就不足为奇了。牙雕的主题主要是动物（如长颈鹿、犀牛、鸵鸟等）。

细木工匠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家具，特别是床，但也有木制首饰盒、保险柜、甚至还有乐器。纺织工人织出了棉麻纺织品，制革工人加工出皮革制品。所有这些行业产品的残品在各种墓中均已有发现。

这一切情况表明，当时在麦罗埃存在着一个较大的工匠阶级，其中包括艺术家，建筑师和雕刻家。由于麦罗埃碑文中的这些行业的名称尚未翻译出来，我们迄今仍不知道当时这些行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可能有埃及那样的为神庙服务的作坊[57]，也可能是在宫廷中组织的作坊。

对于红海、尼罗河上游和尼罗河-乍得湖草原之间的商队通道来说，库施帝国是一个

---

[55] 参见F.欣策，1962年；1971a。

[56] P.L.欣尼，1967年，第116页指出，今天不仅苏丹而且非洲许多地区仍制造这种式样的陶器。

[57] 在凯沃的T庙发现了我们纪元前七或六世纪的这类作坊。参见M.F.L.麦克亚当，1949年，第一卷，第211-232页。

理想的货物集散地。因此，外贸在麦罗埃的经济以及政治中便自然发挥重要作用。它与埃及存在着商业关系的证据很多，可据以估计当时贸易的规模、商品和商业通道的情况。另一方面，它与非洲其他地方的贸易情况我们却只能推测，而且有许多问题仍未找到答案。自古以来，努比亚的主要出口货物是黄金、香料、象牙、乌木、油料、次宝石、鸵鸟毛以及豹皮。虽然其中有些货物出产于麦罗埃境内，其他货物却显然来自距麦罗埃很远的南方各国。

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埃及和地中海世界，也许后来还有阿拉伯半岛南部。主要的贸易通道是沿着尼罗河向前伸展的，但在某些地段，也越过草原，例如在麦罗埃与纳帕塔之间和纳帕塔与下努比亚之间的地区。麦罗埃地区肯定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商队通道。同时它也是商队去红海地区、埃塞俄比亚北部、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等地的通道的出发点。麦罗埃国王经常为控制这片巨大的通道网操心，因为游牧部落常常袭击商队。统治者们在一些战略要冲——如在麦罗埃和纳帕塔之间的巴朱德草原——修建要塞以保护这些贸易通道。另外，他们还沿着通道挖掘水井。

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很少，还不能全面研究对外贸易在麦罗埃整个历史中的发展情况，而只能推测说，随着托勒密王朝对非洲其他地方的商品需求量日益增长，麦罗埃的对外贸易于古希腊时期初期达到顶峰。后来在我们纪元前一世纪初，主要的贸易通道从尼罗河一线移到红海，这使麦罗埃的直接出口量下降，因为许多商品都可以从埃塞俄比亚北部——这时阿克苏姆刚刚在那儿崛起——得到。麦罗埃王国的最后几个世纪恰值罗马帝国发生危机的时期。这种危机使麦罗埃和埃及之间的贸易量先是急剧下降，后来几乎彻底中断，依靠这一贸易发展起来的许多下努比亚城镇衰落了。此外，在这一期间，无论是罗马还是麦罗埃都无力抵抗布勒米和诺巴德游牧人的袭击，保护这些贸易通道的安全[58]。 317

社会结构

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几乎不可能说清麦罗埃的社会结构。我们现在只知道当时存在着一个上层、或者说统治阶级。它包括国王及其亲属、占据着宫廷和省级政治军事职务的贵族以及很有势力的神庙祭司这三部分人。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是以战俘充当的奴隶，资料中经常提到他们。根据一些间接的证据可以推测到，除了占麦罗埃人口大多数的耕种者和牧民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由工匠、商人、各种下级官吏和仆人组成的中间阶级，但是我们对其社会地位一无所知。在获得更多的证据之前，要想阐述麦罗埃社会及其生产关系是做不到的。

从碑文和其他文献中可以看出，军事活动在该国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远非无足轻重。但军队如何招募、如何组织则很难说。看来除王室卫队是常备军以外，需要时还动员全体男性居民。罗马时期的记载表明，军队分为步兵和骑兵，但麦罗埃士兵的军纪不如罗马军团。麦罗埃曾与居住在沙漠东部的游牧部落多次交战，但这些游牧部落从未被彻底征服，一

[58] 对衰落原因的分析见 I.S.卡茨纳尔逊，自第249页起。

且时机有利，他们便立即入侵麦罗埃的农业地区。与此同时，麦罗埃还发动了许多场侵略战争以扩大地盘和掠夺战利品（牛和奴隶），这肯定是统治阶级和祭司们一宗重要的财源。

318　国王经常把很大一部分战俘、有时甚至连同新占领的土地一起献给寺院。奴隶所占的比例肯定很大，在罗马时期，黑奴曾被卖到埃及和地中海国家。修建金字塔、寺院、宫殿和其他纪念物以及种植寺院的果园和菜园都使用了奴隶劳动。开掘和修建灌溉渠和蓄水池塘的工程可能也使用了奴隶。麦罗埃奴隶制的发展情况与东方一些专制国家相同，但发展速度较慢，而且从未成为生产的主要基础，原因是奴隶劳动力的使用范围较小。碑文中提到的妇女常常多于男子，这表明主要形式是家奴制。

宗　教

总的特征

麦罗埃人正统宗教思想大部分来源于埃及，神庙中供奉的神多数与埃及相同。早期的麦罗埃国王以阿蒙为地位最高的神，他们的王权便来自阿蒙神。阿蒙神庙中的祭司们势力很大，至少在埃加梅尼斯国王之前是这样。他似乎打破了祭司们的绝对控制权。但即使是后来的国王，至少在碑文中也还是表白对阿蒙神及其祭司们的崇敬，不时向他们奉献黄金、奴隶、牲畜、地产等礼物。

除了崇拜诸如埃西斯、荷拉斯、托特、阿兰斯努菲斯、萨蒂斯这些埃及神及其固有象征之外，也崇拜完全属于麦罗埃当地的神，如阿潘德麦克狮神和塞比尤耶迈克（斯博迈克）神等。对这些神的正式崇拜为时较晚，始于我们纪元前三世纪，这些神原先似乎只在该国南部地区受到崇拜，后来埃及的影响开始削弱而为具有浓厚的麦罗埃特色的文化所取代，这时他们才显赫起来。应该指出，在碑文中出现麦罗埃文的字体和语言，也正是这一时期。

战神阿潘德麦克是麦罗埃人心目中一位极其重要的神。他被描绘为狮首人身。而在神庙中，尤其是穆萨瓦拉特-苏夫拉神庙的仪式中，狮子占据着一定地位[53]。在这同一地方，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为埃及人所不知道的麦罗埃神，叫做塞比尤耶迈克，他可能是当地主要的神，因为人们把他视为造物主。人们还谈到纳盖的一些女神的情况，但她们的名字以及她们在麦罗埃众神中的地位仍然无人知晓。

存在着两套神祇，其一来源于埃及，另一起源于当地。这种情况也反映在神庙的建筑风格上。

319　阿蒙神庙

宗教的象征主义在古埃及神庙的设计中起着重要作用。神的崇拜表现为种种繁文缛

[53] 扎布卡尔(L.V.Zabkar)。

礼，神庙的每一部分在礼拜过程中各起某种特定作用。大厅、庭院、内室、礼拜堂等各个部分都是沿着一条中心线建造的，为仪式的进行提供了一条长廊。皮安基和塔哈卡以及他们的继位者便在栋古拉地区建造了这样的神庙。在纳帕塔，奉献给阿蒙-赖神的神庙中最重要的一座建在巴尔卡尔山。另一方面，早期的加冕碑文中却没有提到麦罗埃有阿蒙神庙。

但在我们纪元前一世纪末，麦罗埃城荣幸地建造了一座阿蒙神庙。庙前用麦罗埃文字刻上了一篇长长的碑文。其中提到的最古老的名字是阿曼尼卡巴勒国王（我们纪元前65-41年）和阿曼尼夏海托女王（我们纪元前41-12年）。这座神庙可能是麦罗埃王国后期最重要的一座阿蒙-赖神庙。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在麦罗埃、穆萨瓦拉特苏弗拉、纳盖和沃德本纳盖等地建造了一些与此类似面规模较小的阿蒙神庙。麦罗埃的阿克苏姆庙* 的作用与纳帕塔的巴尔卡尔山庙相类似，必然曾向纳帕塔的显赫地位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并且终于取而代之。甚至在早期阶段，麦罗埃还未建造阿蒙神庙时，纳帕塔也并未完全垄断宗教中心的地位。因为那时还存在着其他种类的神庙，它们控制着整个布塔纳的宗教生活，影响直达布塔纳以北的地区。这些便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狮庙。

狮 庙

狮庙之得名，是由于此种神庙周围有大量的狮像。它们或是立体狮像，守卫着神庙的通道和入口；或是浮雕，刻在显眼的位置上。狮子的形象象征着麦罗埃的主要神祇阿潘德麦克。但并非每座狮庙都是为阿潘德麦克建造的。虽然各种权威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神庙的存在⑩，但具体描述时却给它们取了各种不同的名称⑪。因此就有阿匹斯神庙、埃西斯神庙、太阳神庙、奥古斯都头神庙、弗雷斯科殿等等名称。使用这些名称有时导致误解和错误的结论⑫。而用“狮庙”这个名称则可以避免进一步的误解，因为狮子的形象是它们最 320 显著的特点。在巴尔卡尔、凯沃、麦罗埃、纳盖等处的阿蒙神庙中，都有一些公羊雕像，而不见任何狮像，尽管阿潘德麦克狮神可能是人们所崇拜的众神之一，而且他的像与其他神像同时出现。虽然在狮庙的浮雕上经常出现羊头人身的阿蒙-赖神和克努姆神的像，但是却没有在任何狮庙中发现过一个公羊雕像。

狮庙的分布和种类

除了现已查明的32座狮庙外，还有14处遗址几乎可以肯定也原是狮庙所在。这些数字再加上纳莱特、提尔等地与神庙名连在一起的祭司头衔的出现次数，狮庙的数目肯定十分庞大。这些狮庙似乎遍布于麦罗埃全境。对狮庙分布状况加以研究，便发现了两个明显

---

⑩ 加斯坦（J.Carstang）等人，第57页；M.F.L.麦克亚当，1949年，第1卷，第114页；F.欣策，1962年，1971a。

⑪ 波特(B.Porter)和莫斯(R.Moss)，自第264页起。

⑫ 例如：太阳庙是赛斯根据希罗多德的提法而命名的。关于那里有一张“太阳供桌”的报道，使一些人认为麦罗埃特人崇拜太阳。埃西斯庙和阿匹斯庙等名称也可能导致同样的错误结论。

* 疑为阿蒙神庙。——**译者注**

的事实。第一是发现有四个地方各有几座神庙：纳盖有八座，穆萨瓦拉特-苏夫拉和麦罗埃各有六座，巴尔卡尔山有三座。

同一地点有几座神庙，表明该地在宗教上的重要性。王国建造的最为精致、也许是起着主导作用的神庙是穆萨瓦拉特-苏夫拉的那些神庙和麦罗埃的太阳神庙(M250)。另一方面，纳盖的神庙数目比任何地方都多，而巴尔卡尔则有最古老的可以测定年代的狮庙。第一座是(B 900)由皮安基（我们纪元前 750-716 年在位）建造，原有两个大厅，后被改为一座有塔门的单厅式的狮庙。第二座是 B 700，由阿特拉纳萨（我们纪元前 653-643 年）开始动工建造，尔后由森卡马尼斯肯(我们纪元前 643-623 年)竣工。

第二个事实是，这两种神庙的地区不相同，可以说，阿蒙神庙基本上是在纳帕塔地区，而狮庙则基本上是在麦罗埃地区。在麦罗埃地区发现的那些阿蒙神庙只是在我们纪元前一世纪以后才开始建造的。

所有的狮庙可以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由两间大厅组成，其中最早者是土坯结构，没有塔门；另一类只有一间大厅，庙前多数有塔门，虽然早期的这类神庙没有塔门。

可以用当地的两种情况来解释第二种狮庙的出现。狮庙 B900 后来按照第二种狮庙的格式重新翻修，从这一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二种狮庙是在第一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在巴尔卡尔[63] 和凯尔迈[64] 两处有几座小型的单厅式建筑物，第二种狮庙的造型可能就是来源于此。属于这一类的典型例证，多半能在麦罗埃阿斯佩尔塔时期的 M250 地层以下找到；也能在穆萨瓦拉特苏弗拉属于我们纪元前 500 年的第 100 神庙的地层以下找到。[65]

狮庙设计所受到的另一种影响可能来自埃及。存在着不同时期建造的礼拜堂，或位于其他神庙的围墙之内，或位于沙漠的边缘。它们是船只或神像在各种宗教仪式队伍行进途中的停歇处。大多数礼拜堂内有多间大厅，建筑工艺非常精致[66]。底比斯第二十五王朝的一个特点是在凯尔奈克和其他一些地方建造或附加了各种小礼拜堂[67]，但它们一般并不反映出狮庙设计的特点。可见这种建筑设计多半起源于当地。这种建筑风格简单朴素，适应布塔纳这样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技术水平不高，建筑材料缺乏，不可能修造象阿蒙神庙那样精致的建筑物，至少早期情况是这样的。人们料想，在布塔纳和其他地区的游牧社会，拜神方式原来就简朴，这种简朴风格的神庙，也许便反映了这一点。

虽然阿蒙庙和狮庙这两种神庙初看起来似属两种不同的宗教，只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就可以看出麦罗埃实际上只有一种宗教。因为如果两种宗教并存，人们在宗教上就必须具有高度的宽容精神，而这在当时殆不可能。这样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和连续不断的教派战。但这却又不见于任何记载。事实上，阿蒙庙中所供奉的众神似乎也曾在狮庙中供奉，不同之处只是有些神在某些神庙中的地位更为突出些。总之，所供奉的神中，阿蒙-赖或者三位一体的奥西里斯这样的埃及神同阿潘德麦克、曼杜利斯、塞比尤耶迈克等起源于当地的

[63] G.A.雷斯纳，1918 年，第 224 页。
[64] 同上，1923 a，第 423 页。
[65] F.欣策和U.欣策，1970 年。
[66] 巴达维(A.Badawy)，1968 年，第 282 页。
[67] J.勒克朗，1965b，第 18 页。

神都混在一起。[68]各种神庙的不同设计，所显示的与其说是宗教信仰的不同，毋宁说是宗教仪式的不同。与加冕典礼有关的宗教仪式需要阿蒙神庙这样的设计，以便能容纳宗教队伍和庆祝活动。这种宗教习惯把各种不同的当地神祇和信仰兼容并蓄而不发生冲突，从而也使这个由各种不同的因素组成的王国能长时间保持团结一致。

（葛 佶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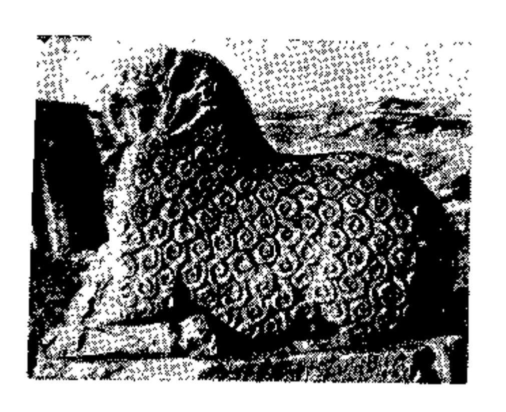
---

[68] J.勒克朗，1970 b，第141-1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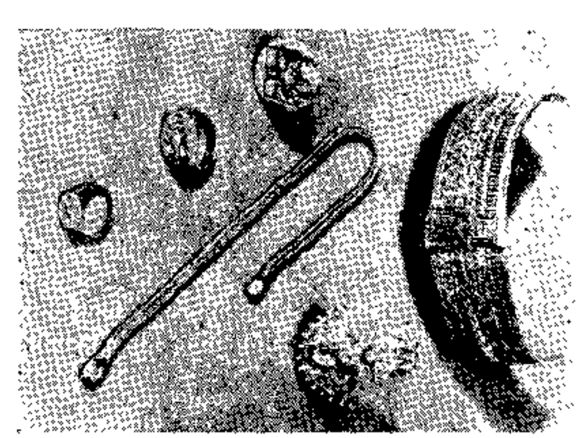
322



图片 11.1 麦罗埃的纳塔克马尼国王金字塔，前方是礼拜堂及塔门的废墟



图片 11.2 纳盖的花岗石公羊



图片 11.4 阿曼尼夏海托女王的金首饰



图片 11.3 砂石装饰板，表现阿里坎卡罗尔大公杀敌的情况（可能在二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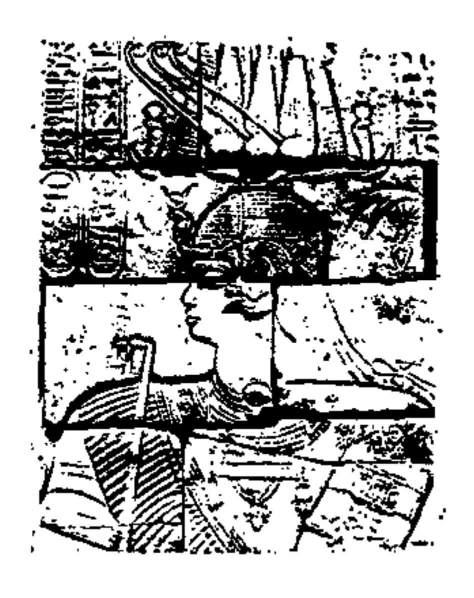
323



图片11.5 各种麦罗埃陶器
上左}
上右}：带有漫画人像的彩陶罐
中：画狮子吃人彩陶罐
下左：彩陶罐，绘有狮神阿潘德麦克的头
下右：赤陶罐，绘有一圈图画，画的是坐着的青蛙，中间是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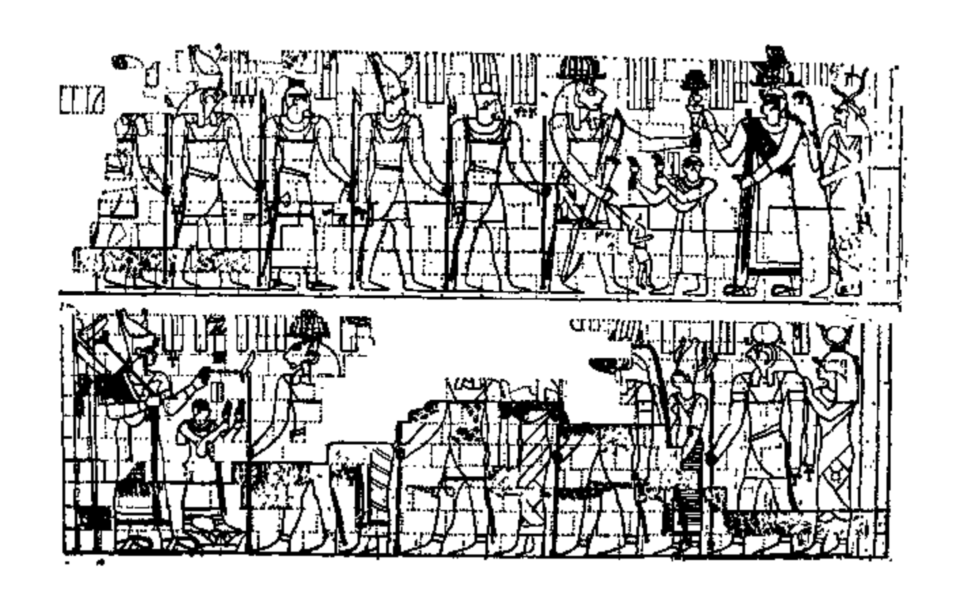
图片 11.6 麦罗埃出土的各种青铜碗



图片 11.7 穆萨瓦拉特-苏夫拉狮庙的阿尼卡马尼国王像



图片 11.8 穆萨瓦拉特-苏夫拉狮庙的麦罗埃神塞比尤耶迈克



图片 11.9 阿潘德麦克神及其率领下的麦罗埃其他诸神

326

基督教在努比亚的传播

12

K. 米哈洛夫斯基

努比亚基督教时期早期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事件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形成的。其一是麦罗埃王国的衰微——这个国家从我们纪元前三世纪到我们纪元三世纪曾占有努比亚。另一个因素是它的北方邻国埃及的罗马化以及随后的基督教化。麦罗埃王国覆亡之后，在努比亚北部，在第一瀑布和第二与第三瀑布之间的达尔地区，有一个诺巴德人的国家崛起。这个国家是在诺巴德人和布勒米人之间经过一系列长时期的斗争之后出现的。前者终于把布勒米人(或称贝加或布加)驱赶到东部沙漠中去，控制了尼罗河流域。

各个国际考古工作队作为抢救努比亚古代文物运动之一部分而进行的发掘工作，为这一时期的努比亚历史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

波兰人在法拉斯的发掘工作，证实古代的帕科拉斯是诺巴德人的王国临近灭亡前的首都。这里是历代君主宫廷的所在地。后来这些宫殿改成了最早的大教堂①。

物质文明的遗物表明，诺巴德人的社会里生活水平两极分化，相差极其悬殊。广大群众相对来说是贫困的。由于历史上缺乏精确的界说，第一个发现他们的文明遗迹的英国考古学家G.A.雷斯纳② 对他们简陋的墓葬无以名之，使用了"X 族群文化"这个名词。与平民的低水平相反，统治阶级、王族和宫廷显贵则致力追求麦罗埃艺术和文化传统。这个社会的少数上层统治者的物质文明最具有代表性的遗迹，是 1938 年W.B.埃默里③ 发现的著名巴拉纳人古墓群的奢华墓葬品，以及前面提及的努比亚君王们在法拉斯的宫殿。

巴拉纳文化和X 族群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直到晚近才弄清楚。④ 这个问题不久以前学者们还在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X 族群是努比亚历史上的一个谜；⑤ 他们把巴拉纳古墓群归之于布勒米人的首领，⑥ 把那个时期的其他东西归之于后期麦罗埃艺术和文化。⑦ 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把整个时期称为"巴拉纳文明"。⑧

329

波兰人在法拉斯的发掘，导致发现诺巴德君王宫殿下的一座基督教教堂，这座教堂是用土坯建造的，因此最迟应在五世纪末之前。诚然，把它的时期定得这么早，最近曾有人提

① 米哈洛夫斯基(K.Michalowski),1967 b，第 49-52 页。
② 雷斯纳(G.A.Reisner)，1910-1927 年，第 345 页。
③ 埃默里(W.B.Emery)和柯万(L.P.Kirwan),1938 年。
④ K.米哈洛夫斯基，1967 a,第 194-211 页。
⑤ L.P.柯万，1963 年，第 55-78 页。
⑥ W.B.埃默里，1965 年，第 57-90 页。
⑦ 格里菲思(F.L. Griffith),1926 年，从第 21 页起。
⑧ 特里格(B.G. Trigger),1965 年，第 12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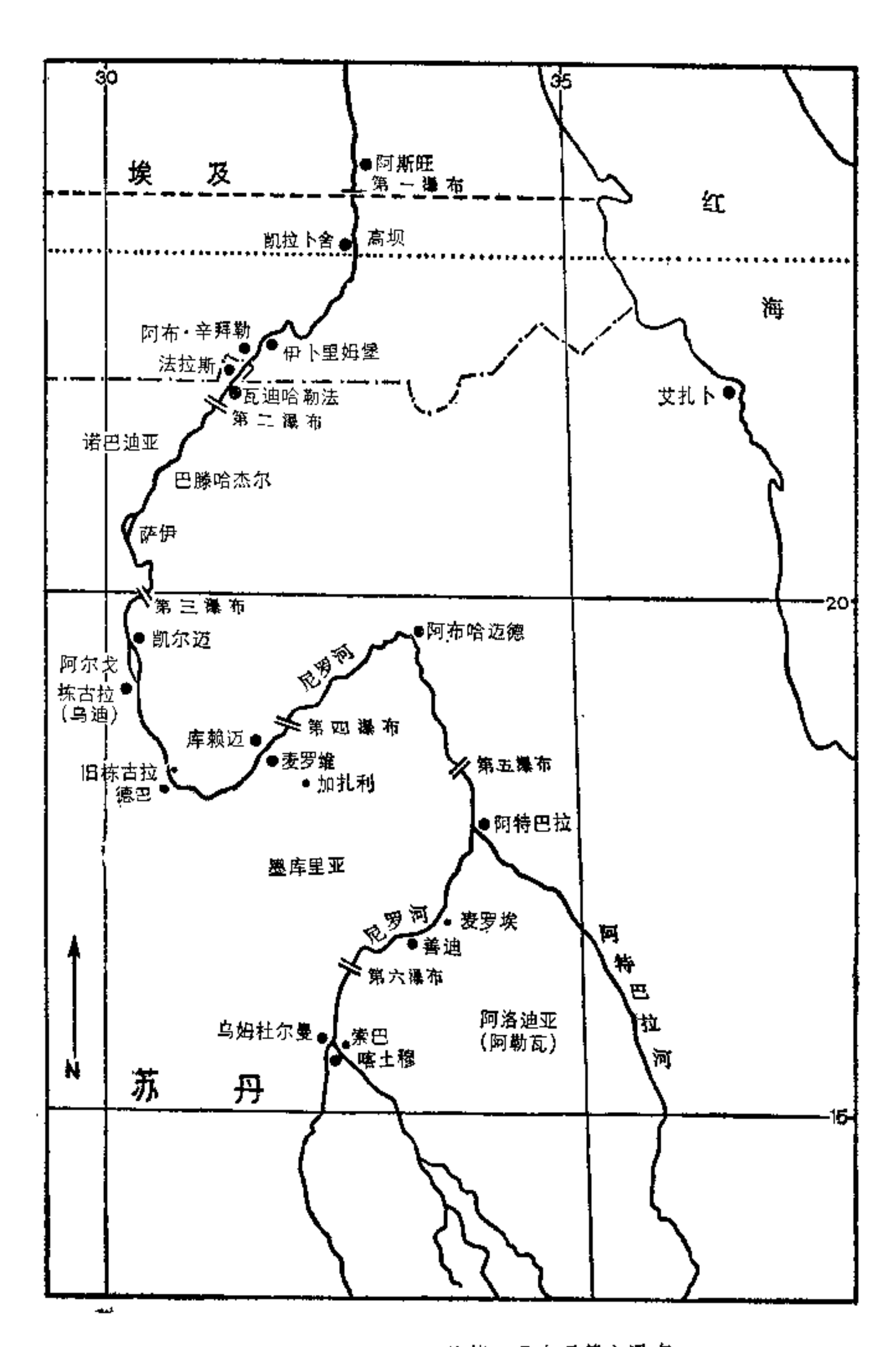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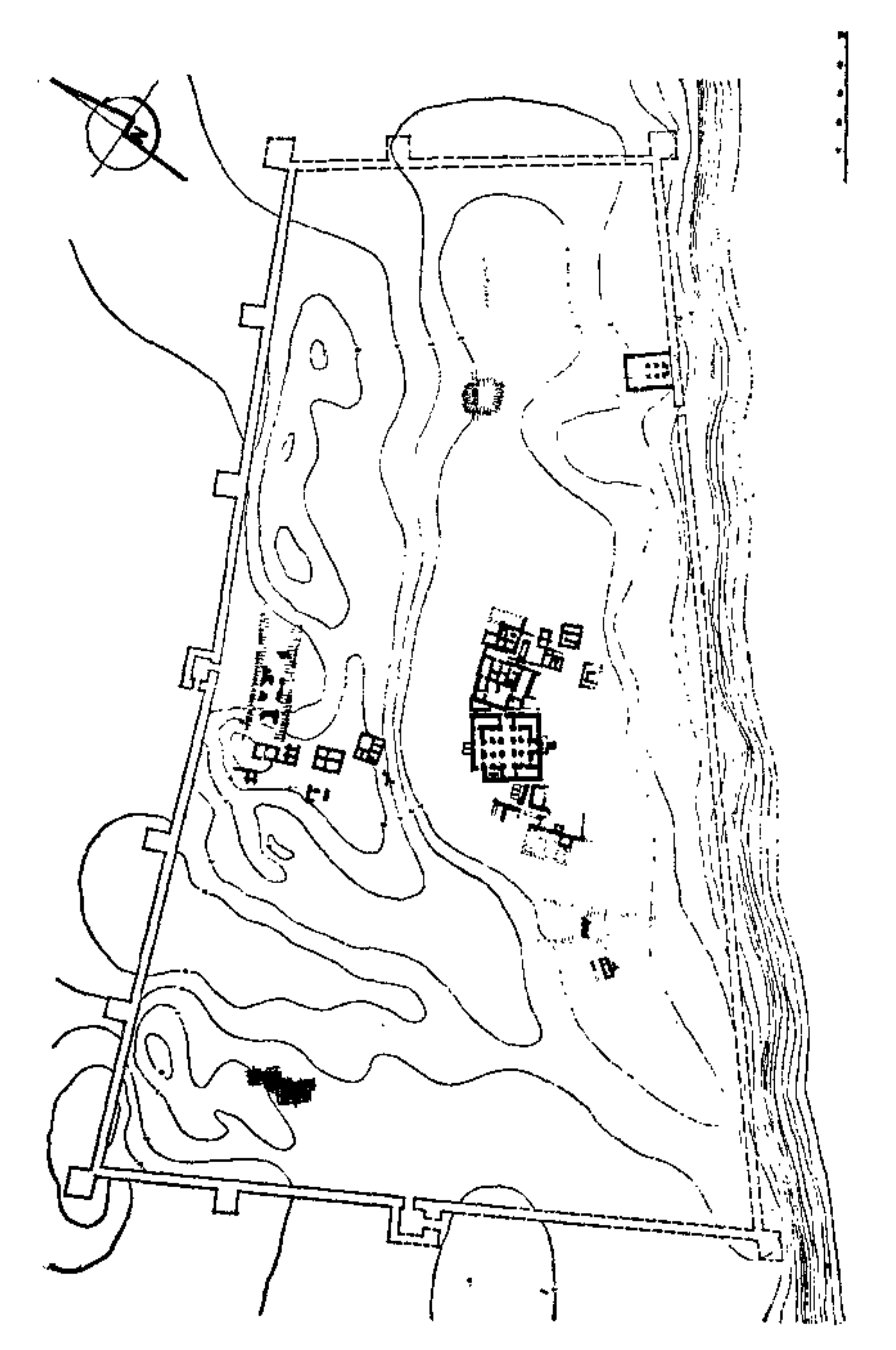


插图 12.1 尼罗河——从第一瀑布至第六瀑布

328



法拉斯 I． 围墙内遗址总平面图
中间——大孔蚴；左上角 —大教堂遗迹；右下角——河门教堂
插图 12.2 法拉斯平面图 I

出反对。[9] 但事实是，在X 墓葬群中间找到了基督教式的坟墓；[10] 迈纳尔提岛的X 族群居民点也发现有十字纹饰的基督教式油灯和陶器。[11] 这是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很早以前，甚至在拜占庭的西奥多拉女皇派出以尤利亚诺斯教士为首的传教团在努比亚正式传播基督教以前，这一宗教信仰就已经传到诺巴德人那里，使许多穷人改变了信仰。关于基督教信仰早就进入努比亚的更进一步的论据是，自从五世纪末以来当地就有修道院和修士的居所。[12] 因此可以肯定，基督教在成为努比亚国教之前就已逐渐渗入。根据以弗所的约翰的说法，这种正式的皈依发生于我们纪元 543 年。[13]

诺巴德国家之早期基督教化，有许多因素。三世纪时仍然敌视基督教的罗马帝国，以及第四、第五和第六世纪的基督教帝国，都迫害那些不服从官方强制性宗教法令的人。于是，也许有许多埃及人，还有努比亚人，逃离埃及，他们可能把自己的信仰带给了居住在阿斯旺以南的诺巴德人。商队南行经过阿斯旺，除了其他东西以外，也带去了宗教信仰。同样，拜占庭外交在第五和第六世纪所起的作用也绝非次要。当时拜占庭在红海正面临着波斯的威胁，急于同阿克苏姆保持良好关系。524 年，他们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使阿克苏姆得以派遣布勒米人和诺巴德人参加计划中的也门远征。教士们当然积极参与了这些交易和交往。

按照西奥多拉女皇的命令，教士尤利亚诺斯只给那个国家的君主们施基督一性论教派 331 的洗礼。但由于信奉基督教的埃及的影响，当地的人民早就为新的信仰所吸引，很早就接受了这种洗礼。早在六世纪中，边远地区尼罗河岸上有一所教堂就是为平民基督教社会服务的。改宗基督教是诺巴德统治者们的一项重要政治行动。他们当时已没有一种具备完善教义的宗教来使人民为他们效忠，而基督教现在则给他们打开了通向埃及的道路。从四世纪起，埃及就有主教在菲莱岛上定居。[14] 通过埃及，他们能够到达地中海和当时的文化中心——拜占庭。

诺巴德（阿拉伯语叫努巴）人的王国称为诺巴迪亚，它的疆域自菲莱起直达第二瀑布。它的都城是法拉斯。六世纪时南方远及古麦罗埃之处出现了另一个努比亚国家，其首都是旧栋古拉。这个国家后称墨库里亚（阿拉伯语作墨库拉）。努比亚北部信奉的是基督一性论派教义，墨库里亚则由于查士丁尼皇帝于 567-570 年派去一个传教团，而改宗东正教的王教徒派。[15]

波兰人从 1964 年起在旧栋古拉进行发掘的结果，辨认出了四所教堂和基督教式的皇宫。[16] 其中一座建筑物的修造可以上溯至七世纪末或八世纪初。在它底下发现了一座用土坯建造的早期教堂。这个宗教建筑并不是大教堂，却有五个会厅，由 16 根高达 5.20公尺的花

---

⑨ 格罗斯曼(P.Grossman)，第 330-350 页。

⑩ 塞维-泽德尔贝格(T. Säve-Söderbergh)，1963 年，第 67 页。

⑪ 亚当斯(W.Y.Adams)，1965 a，第 155 页；1965 b，第 172 页。

⑫ 雅各比尔斯基(S.Jakobielski)，1972 年，第 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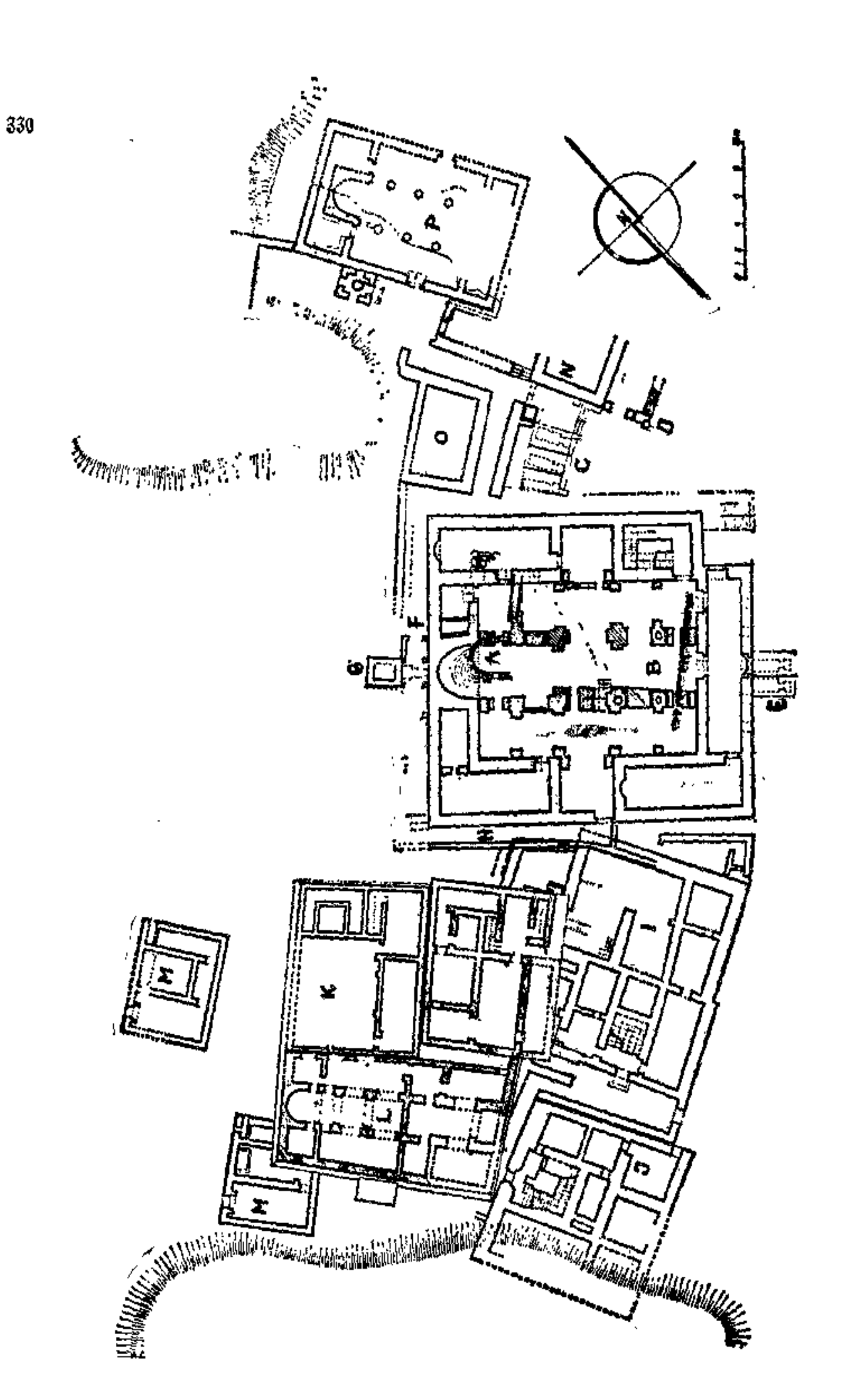
⑬ L.P.柯万，1939 年，第 49-51 页。

⑭ 蒙纳雷·德维拉德(U.Monneret de Villard)，1938 年；默尼尔(H.Munier)，1943 年，第 8 页起。

⑮ U.蒙纳雷·德维拉德，1938 年，第 64 页；L.P. 柯万，1966 年，第 127 页。

⑯ K.米哈洛夫斯基，1966 年，第 189-299 页；1969 年，第 30-33 页；S. 雅各比尔斯基和奥斯特拉兹 (A. Ostrasz)；S.雅各比尔斯基和克尔齐泽尼克(L.Krzyzaniak)；K.米哈洛夫斯基，第 163-166页；S.雅各比尔斯基，1970 年，第167 页起；第 70-75页；马顿斯(M.Martens)，1973 年，第 263-271 页；S.雅各比尔斯基，1975 b，第 349-360 页。

330



法拉斯II。波兰考察队(1961-1964年)发掘出来的基督教建筑物：A．土坯建的教堂；B．大教堂；C．八、九世纪主教们的坟墓；D．支撑十字架的支柱；E．十世纪主教们的坟墓；F．贷款者们的纪念礼拜堂；G．贷款者坟墓；H．北走廊；I和J．旧修道院和宫殿；K．北修道院；L．修道院内学堂；M．房屋；N．主教们的住宅(可能是一所修道院)；O．尚未查明的建筑物；P．孔姆南坡的教堂；Q．彼特罗斯主教的坟墓

插图12.3 法拉斯平面图II

岗岩柱子支撑着。十一世纪时有一位阿拉伯旅行家曾热烈描绘说：栋古拉是个重要的都城，至少从它的建筑物来说是如此。根据发掘出的遗迹的规模来看，这一叙述是与史实相符的。

最后，在660－700年间，墨库里亚人也接受了基督一性论派教义，这件事带来了重要的后果。580年前不久，一个拜占庭传教团在诺巴德人的支持下来到了阿洛迪亚。传教团领导人朗吉诺斯主教注意到，这个国家的人早已由阿克苏姆人部分地变成了基督徒。因此到临近六世纪末，努比亚的三个王国都已是基督教国家：北部是诺巴迪亚；中部是墨库里亚；南部是阿洛迪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到现在也并不完全清楚，至少在它们独立的第一阶段是如此。[17] 332

直到不久前，努比亚基督教的历史是埃及学、古代史和古基督教史的一部分，尤其经常是埃及科普特教派历史的一部分。雨果·蒙纳雷·德维拉德的代表作[18]写入了1938年时已知的关于努比亚基督教的全部情况。他论述中世纪努比亚的四卷著作[19]出版后为人们提供了翔实生动的材料；直到现在还有助于研究工作者考查许多细节。他在书中论述了考古发掘的成果，但也曾仔细检阅阿拉伯典籍，后者至今仍常是用以核实努比亚历史上重要事实和努比亚诸王年表的唯一原始记录。其中最重要的几种是亚库比（874年）、马苏迪（956年）、伊本·豪卡勒（960年前后）、塞利姆·阿斯瓦尼（970年前后）、阿布·萨利赫（1200年前后）、麦金（1272年）、伊本·哈勒敦（1342-1406年），特别是马克里齐（1364－1442年）的著作。[20]

自从蒙纳雷·德维拉德的研究结果问世以来，又进一步积累了许多考古发现，特别是1960－1965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努比亚战役"，对阿斯旺高坝（即高水坝）上游即将为尼罗河水淹没的大块土地进行考察，大有收获。水库中水面缓缓上涨，使努比亚北部某些地方的发掘工作得以一直延续到1971年。而在淹没范围以外的伊卜里姆堡，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

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往往特别有价值，使努比亚基督教的问题重新受到广泛的注意。《库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苏丹努比亚的第一批发掘报告，关于埃及努比亚的报告发表于《埃及古文物局年鉴》。其他一些报告则作为独立的丛书出版[21]。新的发掘总结发表了。考古研究转移到了即将淹没的地区以南之处。

出现了一种研究努比亚基督教问题的新途径，特别是在下列诸人的著作中：W.Y.亚当斯（主要是关于陶器分类）[22]，B.特里格[23]，L.P.柯万[24]，P.L.欣尼[25]，J.M.普拉姆利[26]， 333

---

[17] W.Y.亚当斯，1965年，第170页。

[18] U.蒙纳雷·德维拉德，1938年。

[19] 同上，1935－1957年。

[20] 凡梯尼(G.Vantini)提出的关于努比亚基督教历史的最重要的阿拉伯与基督教书籍的书目表。

[21] T.塞维-泽德尔贝格，1970年；阿尔麦格罗(M.Almagro),1963－1965年；K.米哈洛夫斯基，1965c。

[22] W.Y.亚当斯，1961年，第7－43页；1962a，第62－75页；1962b,第245－288页；W.Y.亚当斯和诺德斯特龙(H.A.Nordström),第1－10页；W.Y.亚当斯，1964a，第227－247页；1965a,第148－176页；1965b，第87－139页；1966a，第13－30页；1968年，第194－215页；1967年，第11－19页；T.塞维-泽德尔贝格，1970年，第224，225，227，232，235页；1972年，第11－17页。

[23] B.G.特里格，1965年，第347-387页。

[24] L.P.柯万，1966年，第121－128页。

[25] 欣尼(P.L. Shinnie),1965年，第263－273页；1971a,第42－50页。

[26] 普拉姆利(J.M. Plumley),1970年，第129－134页；1971年，第8－24页。

K.米哈洛夫斯基[27]，S.雅各比尔斯基[28]和W.H.C.弗伦德[29]。J.勒克朗每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努比亚最新发现的详细报道，特别值得注意[30]。

1969年在埃森的许格尔别墅举行的努比亚基督教问题第一次讨论会提供了丰富的情报(其中部分属于假说性质)，已由E.丁克勒编纂为一本专集出版。[31]第二次讨论会于1972年在华沙举行，其成果于1975年出版[32]。

尽管努比亚不同于埃及、并非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但两者之间无疑确实存在着由尤利亚诺斯和朗吉诺斯教士的传教团结成的关系。努比亚政府的组成，如其命名法所示，是严格地以拜占庭官僚制度为模式的。虽然616年波斯对埃及的入侵在努比亚北部边界止步了，但是有证据表明，北部的王国曾遭到驻扎在第一瀑布以南的萨珊王朝部队的侵犯。无论如何，霍斯罗二世的入侵打断了努比亚和当时信奉基督教的埃及之间的直接联系，特别是打断了努比亚教士和正式受权监督努比亚教会的亚历山大主教区之间的接触。641年，埃及沦于阿拉伯人统治之下。基督教努比亚于是一连几个世纪与地中海文化隔离开来。

最初阿拉伯人并未重视征服努比亚，只是袭扰它的北部地区。因此，埃及一旦降服，他们就同努比亚签订了一项名为巴克特(baqt)的条约，规定努比亚人每年进贡奴隶和某些货物，阿拉伯人则为他们提供适当数量的食物和衣着。在基督教努比亚七个世纪的独立期间，双方原则上均以条约为有效，但也发生了不止一次的武装冲突。例如几乎在条约刚一签订，阿卜杜拉·伊本·阿卜·萨拉总督于651－652年就袭击了栋古拉；但这并没有打断努比亚和穆斯林埃及之间经常的贸易往来[33]。

北部和中部努比亚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国家，这无疑是来自埃及的阿拉伯人与努比亚人最初几次边境冲突导致的结果。马克里齐引用较早的阿拉伯材料说，在七世纪中叶，整个中部和北部努比亚，远至阿洛迪亚边界，都由同一个国王夸利杜鲁特统治[34]。基督教方面的史料则似乎证明，努比亚的联合是国王默库里奥斯促成的。默库里奥斯于697年登上王位，据传曾将基督一性论教派引进墨库里亚，在栋古拉建立了联合王国的首都。

334

直到今天，努比亚基督一性论教派的问题还不完全清楚，有关该王国与东正教王教徒派教会的关系尤其如此。有可能王教徒派教义仍然以某种方式残存于王国内地。众所周知，马里斯省，即从前的努比亚北部王国，直到十四世纪时还是由一个王教徒派的主教管辖。作为常驻塔法的总主教，他统治着一个大教区，把整个努比亚都包括在内。不但如此，除八世纪以外，亚历山大城总是有两个大主教，一个属于基督一性论教派，一个是王教徒派[35]。

两个努比亚王国的联合使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繁荣兴旺。继承默库里奥斯王位的国

[27] K.米哈洛夫斯基，1965a，第9－25页；1967b，第194－211；1966b。
[28] S.雅各比尔斯基，1972年。
[29] 弗伦德(W.H.C.Frend)，1968年，第319页；1972a，第224－229，1972b，第297－308页。
[30] 勒克朗(J.Leclant)，1954年。
[31] K.米哈洛夫斯基，1975年。
[32] 同上，1975年。
[33] W.Y.亚当斯，1965c，第173页。
[34] K.米哈洛夫斯基，1967b。
[35] U.蒙纳雷·德维拉德，1938年，第81，158－159页；P.L.欣尼，1954a，第5页。

王基里亚科斯号称“伟大的”国王；他通过13个行政长官进行统治。努比亚国王象埃及旧王国的法老一样，也是高级教士。他们不但有权解决宗教问题，而且只要双手没有沾染过人的鲜血，他们还能行使某些宗教职能[36]。

基里亚科斯国王听说倭马亚王朝的总督囚禁了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便以此为借口进攻埃及，一直打到富斯塔特[37]。大主教一被释放，努比亚人便收兵回国。基里亚科斯对富斯塔特的远征证明，努比亚并不严格局限于自卫，他们对穆斯林埃及也采取进攻性行动。

最近在伊卜里姆堡发现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埃及和努比亚关系的纸草纸文件，其中有努比亚国王和埃及总督的往来函件。最长的一卷年代是758年，内容是穆萨·卡赫·伊本·乌亚伊纳用阿拉伯文对努比亚人提出的抗议，指责他们没有遵守巴克特条约[38]。

不过，八世纪初以后努比亚国家生气勃勃的证据不止于军事远征。考古发现证明，努比亚当时的文化、艺术和文物建筑也有不寻常的发展。707年，保罗斯主教重建了法拉斯大教堂，并饰以辉煌的壁画。[39] 旧栋古拉的有些重要的宗教性建筑就是那个时期的。[40] 另有一些努比亚教堂，如象阿卜杜拉尼尔吉[41] 和塞卜阿[42] 的教堂，装饰着富丽堂皇的壁画，这在后来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装饰，一种长期保持的特色。

335

对过去已知的以及最新发现的遗址的发掘也表明，早在第八世纪时，基督教便已在平民等级——亦即村民中广为传播。[43]

可能是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努比亚国王约安尼斯为努比亚联合王国增加了南方省份阿洛迪亚。[44]

基督教时期是努比亚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单是努比亚北部，人口就有大约5万。[45] 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引进水车，在尼罗河各次泛滥期之间进行灌溉，[46] 扩大了耕地面积，生产了小麦、大麦、小米和葡萄。此外，椰枣树收获累累也提高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

与邻国的贸易增加了，并且扩大到了更远的国家。墨库里亚的居民们把象牙卖给拜占庭，把铜和金卖给埃塞俄比亚。他们的商队划着船，骑着骆驼，到非洲的腹地去，到今天的尼日利亚和加纳等地去。富裕阶级喜欢拜占庭服装，女人穿着的长袍，常常有五色缤纷的刺绣。[47]

如前所说，基督教努比亚的政权机构是以拜占庭为模式的。省的民政长官是省督，他

[36] U.蒙纳雷·德维拉德，1938年，第99页。

[37] 同上，第98页。

[38] J.P.普拉姆利和W.Y.亚当斯，第237－238页；范莫塞尔(P.Van Moorsel)、杰奎特(J.Jacquet)和施奈德(H.Schneider)。

[39] K.米哈洛夫斯基，1964年，第79－94页；J.勒克朗和勒洛埃(J.Leroy)，第361－362页；欣策(F.and U. Hintze)，1968年，第31－33页，插图140－147；惠茨曼(K. Weitzmann)，第325－346页；哥尔戈斯基(T.Golgowski)，第293－312页；M.马顿斯，1972年，第207-250页；1973年；K.米哈洛夫斯基，1974年。

[40] 见前注16。

[41] 克拉森(A.Klasens)，1964年，第147－156页；P.范莫塞尔，1967年，第388－392页；1966年，第297-316页；同一著者，《基督教考古学第八届国际大会会议记录》，巴塞罗那出版社，1972年，第349－395页；同一著者，1970年，第103-110页。

[42] 杜马斯(F.Daumas)，开罗，1967年，第40页起；1965年，第41－50页。

[43] 韦库泰 (J.Vercoutter)，1970年，第155－160页。

[44] U.蒙纳雷·德维拉德，1938年，第102页；K.米哈洛夫斯基，1965a，第17页。

[45] B.G.特里格，1965年，第168页。

[46] 同上，第166页。

[47] 霍夫曼(I.Hofmann)，1967年，第522－592页。

戴着一顶以新月为饰的头盔，再加一顶带角的冠冕作为他的权威的标志[48]。他通常穿一件统袍，中间系一条长巾。主教们做宗教礼拜穿的华丽而复杂的法衣上，系着一条圣带，流苏上还装饰着小铃铛。

努比亚人善射，这是由许多古代的和阿拉伯的作者证明了的。弓箭之外，他们也使用剑和投枪。

私人房屋用土坯砌成，有多间房间；屋顶为拱形或用木料、茅草和泥盖成的平顶。在努比亚最繁荣的时期，屋墙尤其厚实而且曾经粉刷。也有多层房屋，大概是供防御之用。有336 些地区用管道输水。第二瀑布附近的岛屿上发现了用石方砌的屋墙。努比亚北部，村庄有围墙防护，借以抵抗阿拉伯人的袭击。村民有时备有公共仓库，供他们受到围困时使用。靠近村落中心的地方矗立着教堂。

宗教建筑除几个少见的例外，都是用土坯垒造的。唯独伊卜里姆堡、法拉斯和栋古拉的大教堂才有石头或烧过的砖垒的墙。大多数教堂是古罗马式的长方形教堂，但在努比亚建筑中有时也发现了十字形或位于中央的教堂。初期的，也就是说直至七世纪末为止的装饰，只能从上述这些大型教堂推知。

关于建筑物上的装饰，除了从异教徒建筑改建而来的部分（例如在法拉斯就有）以外，都是用沙岩刻制，重复着麦罗埃艺术转借自罗马东方的古希腊艺术的传统涡形图案。这里必须提到以叶饰装点的柱头刻得十分美丽的涡旋形花纹。画在木板上的或雕刻的圣像，可能是当时用来礼拜的神像。

努比亚基督教艺术中最古老的文物建筑，受到埃及科普特教派极其强烈的影响。[49] 这主要显示在它们的主题上，例如刻成鸽子或鹰的石柱中楣，使人想起科普特石柱上的鸽子和鹰。[50]

自八世纪以来，努比亚教堂就以壁画为装饰了。1961 至 1964 年间，在法拉斯发现了120多幅保存完整良好的壁画，其中包括一些主教的肖像，他们的任职日期可以从《主教姓氏录》中找到。由这些壁画就有可能推测出努比亚绘画风格演变的大体情况[51]，努比亚其他教堂壁画残片也证实了这种演变。

法拉斯当时无疑至少是北部努比亚的艺术中心[52]。与法拉斯的伟大作品相比，在法拉斯以北的阿卜杜拉·尼尔吉[53]和塔米特[54]以及法拉斯南面的松吉提诺[55]所发现的画幅，肯定无疑属于地区性的风格。

---

[48] K.米哈洛夫斯基，1974 年，第 44－45页。

[49] 迪布尔盖(P. Du Bourguet),1964 b,第 221 页起;韦塞尔(K.Wessel),1964 年，第223 页起;1963 年；P.迪布尔盖，1964a, 第 25－48 页。

[50] J.M.普拉姆利,1970年,第132－133页；插图109－119；N.詹斯玛 (N. Jansma)和德格罗思(M.de Grooth),第 2－9 页；托洛克(L.Török),1971 年。

[51] K.米哈洛夫斯基，1964 年，第 79－94 页；参见前注 39。

[52] 同上，1966 年。

[53] A.克拉森，1967 年，第 85 页起；卡斯蒂利奥尼(L.Castiglione)，1967年，第 14－19 页；P.范莫塞尔，1966 年，第 297－316 页；1967 年，第 388－392 页；1970 年，第 103－110 页；同一著者，《基督教考古学第八届国际大会会议记录》，巴塞罗那出版社，1972 年，第 349－395 页；P.范莫塞尔，J.杰圭特和 H.施奈德。

[54] 罗马，罗马大学赴埃及考古考察团，1967 年。

[55] 唐纳杜尼 (S.Donadoni) 和 G.凡梯尼，第 247－273 页；S.唐纳杜尼和柯托 (S.Curto)，1968 年，第 123 页起；S.唐纳杜尼，1970 年，第 209－218 页。

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中叶，努比亚画家们喜欢用紫色作画。这一时期的努比亚绘画受到科普特艺术的强烈影响，而科普特艺术的传统则源出于法尤姆画像富于表现力的风格。337 这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法拉斯的圣安妮”头像（现存华沙博物馆）[56]，但也可以看出拜占庭艺术及其主题的影响[57]。

这种风格后来发展了，到十世纪中叶，白色明显地居于支配地位。这也许是由于叙利亚－巴勒斯坦绘画的影响，它具有一种把衣服画出双折绉的典型笔法和某些东正教圣像画的特色，所以易于区别[58]。耶路撒冷当时是基督教东方各国人民前来朝圣之处，努比亚绘画当时的这种发展或可归因于此。

人们也知道，当时信奉基督一性论教派的努比亚王国和同安条克信奉基督教一性论的雅各教派之间的关系已很密切。约翰副主祭[59]和阿布·萨利赫[60]两人都提到，基里亚科斯在位时期，努比亚教会的首领是亚历山大城的基督一性论教派（追随者派）大主教。于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第一次出现在努比亚绘画中；最好的例证是法拉斯的基罗斯主教的画像（现存喀土穆博物馆）。[61]

人们已经发掘出大量手工艺品，其中最丰富的当然是陶器。W.Y. 亚当斯对它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62] 发现这些陶器足以说明技术上、风格上和经济社会方面的饶有兴味的发展。在制陶方面，X 族群时期曾取得不少成就，后来当地的定模制陶法却较少创造性，基督教时代的早期陶器外形和花饰都相对较为贫乏，便表明了这一点。旋轮制陶术也已发展：由于同地中海关系中断，为贮酒和饮酒而设计的容器数量缩减了；另一方面，制作却较前精致，例如各种容器普遍加上了柄，便于手握。

早在 750 年以前，南方所用的陶器有很大一部分便是由阿斯旺供给的。这一贸易在穆斯林定居埃及之后也没有中断。338

总起来说，直到九世纪，努比亚才初步享受繁荣，他们的穆斯林邻居通常是和平的，没有给他们太大的干扰。基督教努比亚早期文化上的统一性是难于辨识的。在法拉斯，贵族阶级和行政官员讲的是希腊语，教会显贵和他们一样。神职人员也懂得科普特语，这也许是许多难民的语言。至于努比亚语，虽然为广大人民所使用，以书面形式流传下来的残迹却属于另一时期，大约不早于九世纪中叶。

基督教努比亚在800年前后的黄金时代还未到来。

（张荫槐译）

---

[56] K.米哈洛夫斯基，1965 b，第188页，图片 XLI b;1966 b，图片 II,2；1967 b，第109页，图片27和32；扎瓦德茨基(T.Zawadzki)，第289页；K.米哈洛夫斯基，1970年，插图16；M.马顿斯，1972年，第216页，插图5。

[57] K.米哈洛夫斯基，1967 b，第74页；S.雅各比尔斯基，1972年，第67－69页；M.马顿斯，1972年，第234和249页。

[58] K.惠茨曼。

[59] 《东方教父学》，第140－143页，

[60] 埃弗茨(B.T.A.Evetts)和巴特勒(A.J. Butler)，1895年；U.蒙纳雷·德维拉德，1938年，第135-136页；F.L.格里菲斯，1925年，第265页。

[61] K.米哈洛夫斯基，1966 b，第14页，图片 VI,2；1967 b，第117页，图片37；S.雅各比尔斯基，1966年，第159－160页，插图2；K.米哈洛夫斯基，1970年，图片9；M.马顿斯，1972年，第240－241页，第248页起；S.雅各比尔斯基，1972年，第86－88页，插图13。

[62] 最新研究，W.Y.亚当斯，1970年，第111－1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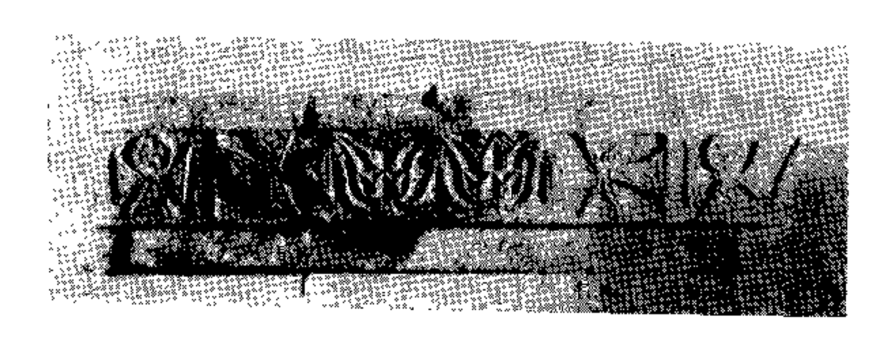
339



图片 12.1 法拉斯大教堂



图片 12.2 法拉斯地方的沙岩柱头(七世纪上半叶)



图片 12.3 基督教早期法拉斯地方有装饰图案的门楣(六世纪下半叶或七世纪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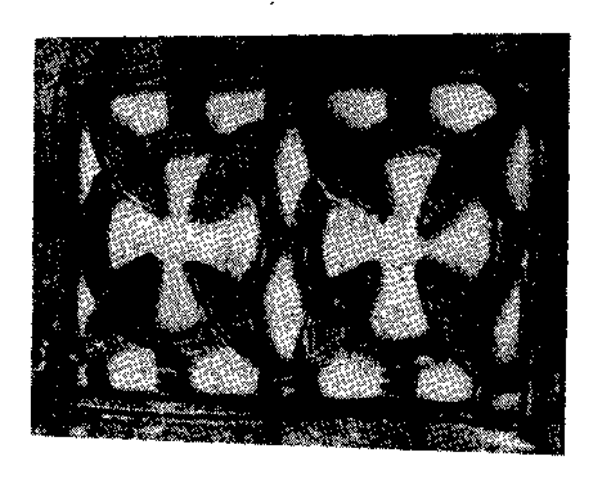
图片 12.4 圣安妮头像:法拉斯大教堂(八世纪)北走廊上的一幅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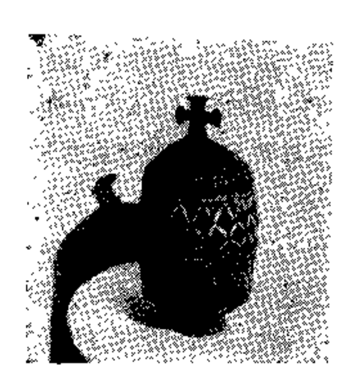


图片 12.5 法拉斯大教堂(七世纪上半叶)拱顶沙岩横梁的雕饰片断

340

图片 12.6 苏丹旧栋古拉（七世纪后期）花岗岩柱教堂的赤陶窗户





图片 12.7 努比亚基督教的陶器



图片 12.8 伊卜里姆堡教堂的东墙：拱门

341

13 阿克苏姆时期以前的文化

H. 德孔唐松

大约我们纪元前五世纪左右，脱离史前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北部各地区人烟似乎并不稠密。这些地区的原始居民情况如何人们知道得很少；不过，就我们已掌握的少量资料看来，这一带人群的发展情况同非洲之角其它地区是大体相同的。

保留至今的我们纪元前1万年间的少量石器，与非洲南部收集到的新石器时代那些人工制品相似。在这个时期，居住在这里的似乎是一些以畜牧为生的民族。在从厄立特里亚北部到哈雷里一带地区的岩石上，刻着他们那些无脊隆的长角牛图像。他们的畜群和同一时期在撒哈拉地区和尼罗河流域饲养的畜群相似。这些民族很早以来就同埃及人有来往。

在语言方面，库希特成分也很重要：这种成分起源于本地，而且已开始在其它方面显露出来。最近（1977年，菲利普森）在阿克苏姆附近戈贝德拉发现的遗物表明，早在我们纪元前三、四千年这一带就开始种植小米并使用陶器了。因此，有理由相信，从那时起，在从事畜牧活动的同时，一种显而易见的埃塞俄比亚式农业就已经开始发展起来。这些新技术很可能和较固定的生活方式有关，从而为发展一种更高级的文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尽管根据地理学家克劳迪乌斯·托勒密① 提出的证据，阿克苏姆城的修建和阿克苏姆王朝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我们纪元前二世纪，并已为大约100年后问世的《红海回航记》② 和晚近的考古发现③ 进一步证实，但古希腊和拉丁作家对于导致上述这些事件有关的那几百年的情况却几乎只字未提。

他们仅仅告诉我们，在我们纪元前三世纪中叶，托勒密二世修建了费拉德尔菲斯城，即阿杜利斯港，他之后继位的托勒密三世尤尔杰蒂斯又把这个港口扩建。普林尼在我们纪元75年说，他认为这个港口是红海最重要的停泊港之一。他还曾提到住在距红海五天路程的大山中靠猎象为生的众多阿萨切人部落。④ 人们常常把这个种族名称和阿克苏姆这个名称联系起来，但这种猜测未免过于牵强。

343

至于这个时期的其它书面材料，特别是阿拉伯南部发现的文献，据判断，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时期红海非洲沿岸发生的事情。

---

① 克劳迪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1932年；H.德孔唐松（H. de Contenson），1960年，第77、79页，插图2。

② H.德孔唐松，1960年，第75－80页；J.皮雷纳(J. Pirenne)，1961年，第441、459页。

③ H.德孔唐松，1960年，第80－95页。

④ 普林尼(Pliny);H.德孔唐松，1960年，第77、78页，插图1。

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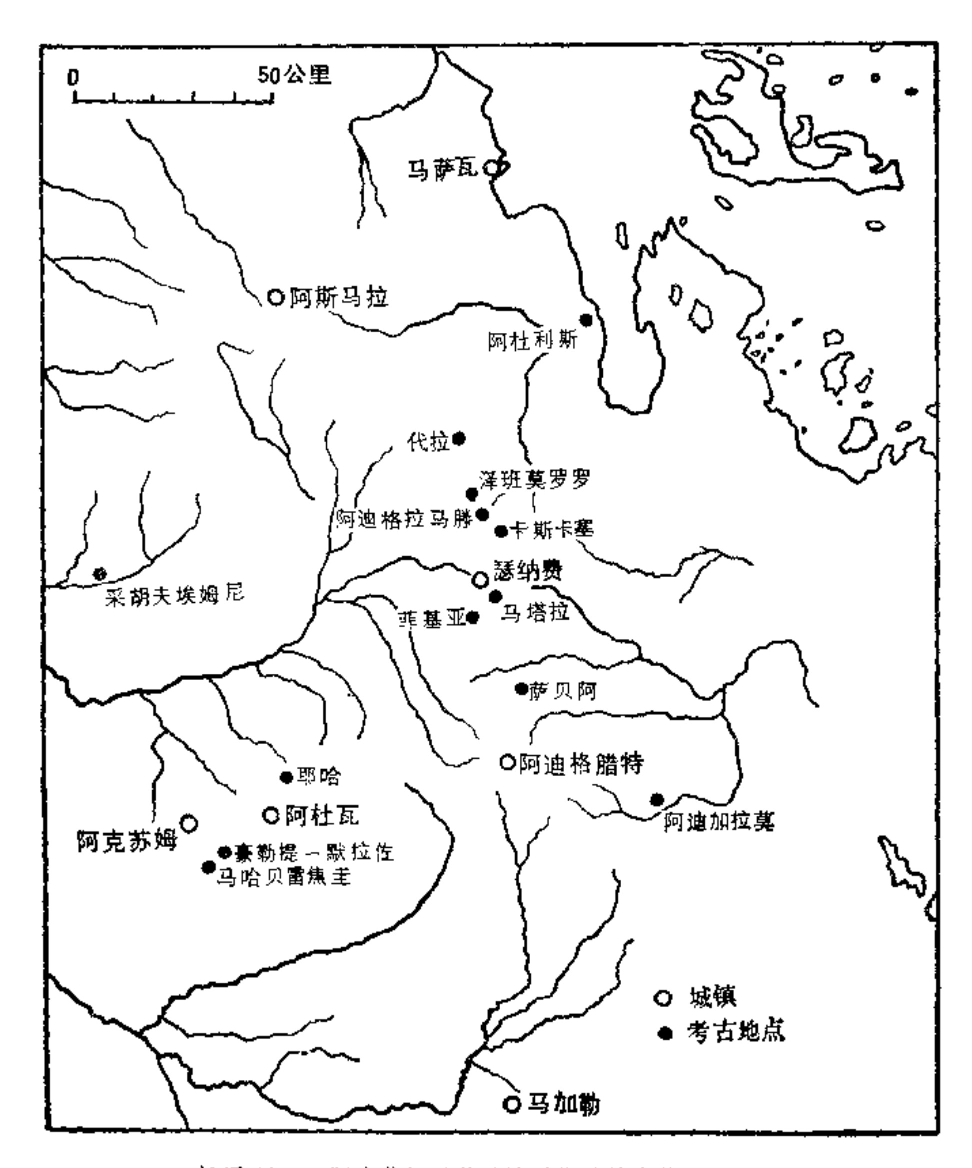


插图 13.1 阿克苏姆以前过渡时期的埃塞俄比亚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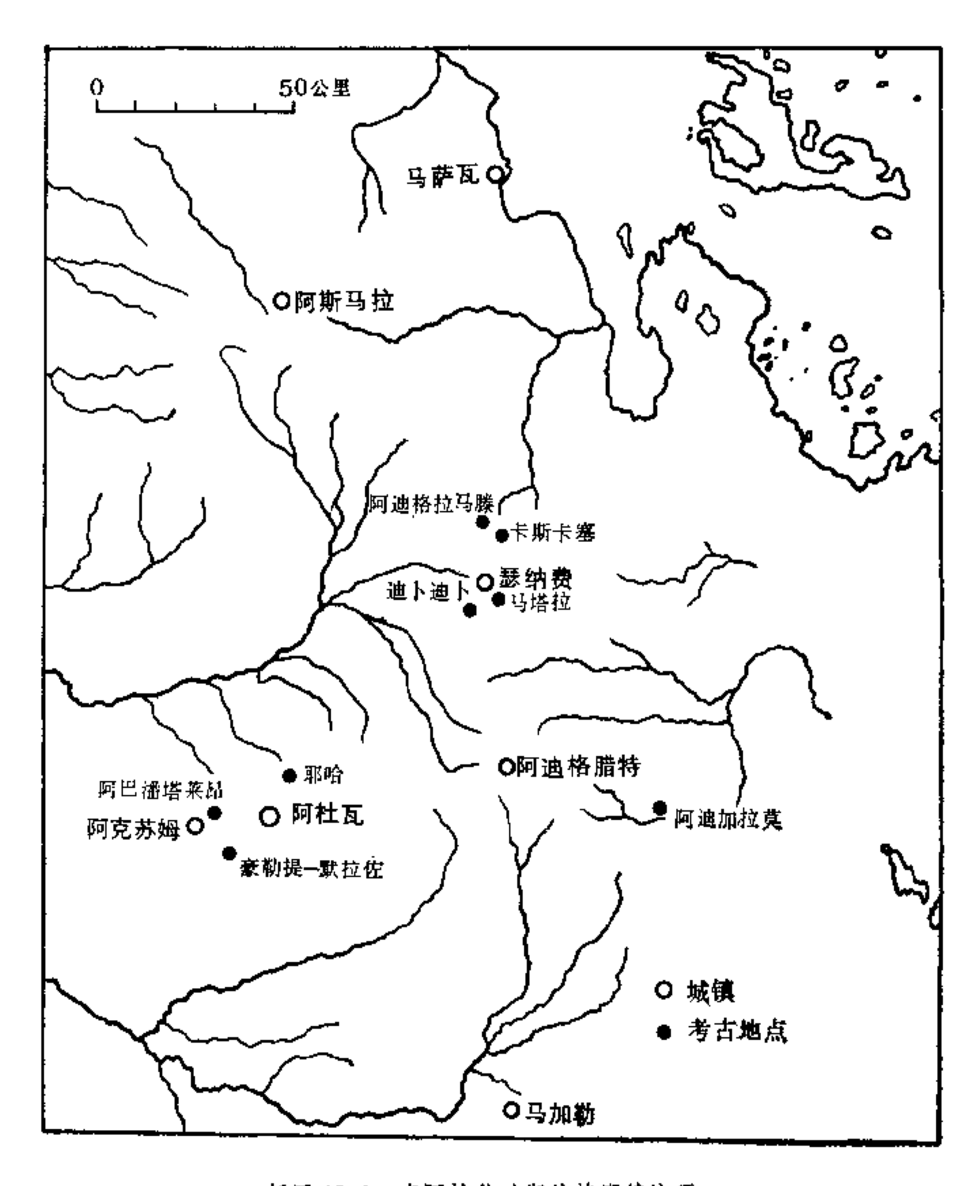


插图 13.2 南阿拉伯时期的埃塞俄比亚

除传说式记述(本章将不涉及这些传说)外，只好在二十世纪初以来业已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去寻找有关材料。这些发现使我们能够再现阿克苏姆以前时期的情景。根据F.安弗雷的研究，我们得知这个时期可分成南阿拉伯时期和过渡时期。⑤

南阿拉伯时期

这是“南阿拉伯对埃塞俄比亚北部有强大影响”的一个时期。这种影响的主要标志是在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存在着同萨巴王国统治时期在南阿拉伯流行的相类似的石碑和铭文。由于J.皮雷纳对古体字和文体研究的结果，在南阿拉伯发现的类似的碑铭可以确定是属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文物。这样确定其年代，已为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们接受。⑥大家都同意这个年代也适用于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那些文物，但C.康蒂－罗西尼提出的关于红海两岸在时间上存在差别的假说还不能肯定地排除。⑦据F.安弗雷说，“有理由认为，将来有必要把南阿拉伯时期缩短，也许有必要把这个时期再往前提”。

这个时期仅存的建筑物是耶哈的那座神庙(后来改为基督教堂)。这座庙是用巨型石块精心砌成的，有浮雕装饰和墙角石，还有建在八级金字塔形底座上面的一座长方形内殿，长约18.6米宽约15米。正如皮雷纳指出的，保存至今的约9米高的这个建筑物正面，其建造方式类似在萨巴王国首都马里卜发现的那几座建筑物，包括那座也是建在多级底座上的主要神庙，但耶哈那座建筑的设计和我们了解的南阿拉伯任何神殿的设计都不同。⑧耶哈的另一座建筑毁坏得很厉害，还残留着一些屹立在高台上的巨大长方型石柱；它位于格拉特－拜勒－盖卜里，现在正在发掘中。这座建筑物似乎也属于同一时期。⑨其他两个遗址也有类似的石柱。在阿克苏姆以南的豪勒提山顶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石柱，没有明显的次序，可能已离开原来的位置。⑩位于从耶哈到阿杜利斯途中的卡斯卡塞有六根石柱，其布局尚未了解，因为这个地点尚未进行发掘。⑪这些石柱使人们联想起马里卜(奥瓦姆庙和巴兰庙)和提姆纳(阿什塔尔庙)的那一排排巨大的四角形立柱。

345

在耶哈发现的雕刻也和马里卜的相似，例如，有野山羊图案的墙顶装饰和有凹槽及锯齿状装饰的板饰，这些东西也在默拉佐地区的豪勒提和恩达塞科斯发现，它们可能是用来覆盖墙壁的。事实上，位于阿克苏姆以南约八英里的默拉佐地区就有大量南阿拉伯时期的雕刻。除上述豪勒提石柱和饰板外，还有一些雕刻后来以被变相使用。最突出的例子是在豪勒提发现的神龛和雕像。

根据J.皮雷纳的建议叫作神龛(这个名词比以前建议的“王座”好)的文物是用当地生产的高约140厘米的一整块优质石灰石雕成的，有象牛蹄子那样的四只脚，两只向前，两只向

⑤ 安弗雷(F. Anfray),1967年，第48－50页；1968年，第353－356页。
⑥ J.皮雷纳，1955年，1956年。
⑦ 康蒂－罗西尼(C.Conti-Rossini),1928年，第110－111页。
⑧ 克伦克(D. Krencker),第79－84页，插图164－176；J.皮雷纳，1963年，第1044－1048页。
⑨ D.克伦克，第87－89页，插图195－199；F.安弗雷，1963年，45－64页；1972a，57－64页；法托维奇(R.Fattovich)，第63－86页，
⑩ H.德孔唐松，1963b,第41－86页；J.皮雷纳，1970a，第121－122页。
⑪ D.克伦克，第143－144页，插图298－301。

后。这四只脚支撑着饰有两道栏杆的底座，底座上面是一个壁龛，除颇为光滑的背面外，壁龛两侧都有雕饰。壁龛上面是一个倒拱形的顶，宽 67 厘米深 57 厘米；沿 7 厘米厚的边缘，刻着两排斜卧的野山羊，朝向神龛顶端那棵具有传统风格的树，壁龛两边的边缘上以 13 厘米宽的间档依次刻着类似的野山羊，都朝向壁龛内部。

两侧表面都有以浅浮雕装饰的同样场面：一个手执棍棒没有胡须的小人物走在手里拿着类似一把扇子的东西的有胡须的大人物前面。两人似乎都在步行。他们的鼻子都稍呈钩形，看来很象闪米特人。他们的头发以一些细小的菱形纹表示。那个小人物穿着一件素色的长袍，越往下越宽一直拖到脚踝，肩上披着一件斗篷。在神龛右侧，小人物头部上方有用萨巴文写的一个阳性专名："RFS"（Rafash）。那位大人物束有一条松宽的缠腰布，身后布头下垂，用一条带子把它束在腰部。这条带子似乎是在背后打结，有一端自由下垂。肩上披的斗篷有两个角在胸前打了一个扁平的结以固定其位置。在左侧的浅浮雕上，他用双手握住前已提到的那把扇子似的东西，但在右侧的浅浮雕上，他的左腕上却戴着一个有四股的手镯，右手拿着一根象棍棒的东西。这两幅浅浮雕的差异不大，似乎并不重要，不足以使我们怀疑这两幅浮雕描写的是同一个场面，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解释。

在豪勒提的同一遗址上，还有几座类似的雕像出土，其中只有一座大体完整。这座雕像发现时已破碎。它的碎片和那座神龛的碎片散落在一起。这座雕像是用当地有紫红纹理的优质白石灰石雕成的，身高 82 厘米，是一位妇女的坐像，双手放在膝盖上，身穿一件有垂直窄褶的长袍，衣褶的沟槽沿体形线条显示出来；衣领正面稍似 V 字形，边缘刻有滚边。围绕袍子的折边有一条平纹窄带，也刻着一条滚边。在袍子外边，她戴着一条由三股粗环拧成的宽大项圈，上边挂着一个盾形胸饰；和这块胸饰对称，在两肩胛骨之间还有一个秋千形的、有六条垂直杆的装饰品。两只手腕上都戴着一只四股螺纹手镯。她的双手平放膝上，赤着的双脚踩在一个长方形小脚踏上。无头饰，除鼻子和右耳外，头部完整无缺。她的头发是用一排排小菱形纹表示，双眼以凸出线条刻成使其生动有神，下颌肥胖，丰满的脸庞在嘴边形成一对酒窝，使她的嘴呈鸟喙状，从而产生微笑的表情，可能不是有意刻成这样的。这座雕像原来打算安放在一个座位里，因为它的双腿背面扁平而且正中垂直突起（已损毁）。[12]

除至少两座类似的雕像碎块外，还有一座无头雕像，不及上述那座雕刻得那么精致，但在其他方面并无不同，不过它只有一个三股项圈作装饰，坐在一张以一根栏杆装饰的小凳子上。

在豪勒提发现的这些雕像的姿态，和在提格雷高原西部边缘阿迪加拉莫（这个遗址从前称为阿兹比德拉，或豪伊莱阿萨劳）偶然和其他各种古物一起发现的那尊小雕像的姿态相似。[13]这座小雕像只有 40 厘米高，造型也粗糙得多，双手放在膝上，拿着两只圆筒形杯子，可能是用作接受祭品的容器。头发也以许多菱形纹表示，胸部刻有沟槽表示有悬垂物的项圈，腕上的沟槽，表示手镯可能是用某种贵重金属做的。袍子无皱褶，但有玫瑰花结，可

⑫ H.德孔唐松，1962 年，第 68－83 页；J.皮雷纳，第 125－133 页。

⑬ 希费拉库（A.Shiferacu），第 13－15 页；卡科（A.Caquot）及德鲁斯（A.J. Drewes），第18－26 页；图片 V-VIII；多雷斯（J.Doresse），1957 年，第 64－65 页。

能是镶上的，也许是用来表示刺绣品。袍子下部边缘饰以流苏。雕像底座只是以一条栏杆为装饰的凳子。

F.安弗雷发掘卡斯卡塞附近的一个重要遗址马塔拉时，在阿克苏姆时期以前的B土丘地层中挖出和豪勒提头像属同一类型的一个头部碎块，但其工艺水平低得多，细部都是以深浮雕表示。⑭

在罗马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另一座小型雕像（MNR 12113）同豪勒提发现的那些雕像有许多共同点，它表现的是一位坐着的妇女，以淡黄石灰石雕成，头部和手臂都已破损，现有高度是23.7厘米。这妇女身穿一件有凹纹的长袍，戴着一只环形双股项圈，上面挂着一串念珠，一个胸饰及其对称物。雕像下部呈底座状，上边刻着南阿拉伯人名卡南（Kanan）。据J.皮雷纳说，这种字体属于我们纪元前四世纪末。⑮这座相当粗糙的小雕像据说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但其更为准确的出处无法断定，因此可以怀疑它是否真的出自南阿拉伯时期的埃塞俄比亚。

迄今阿拉伯半岛南部只出土了一些大体类似坐式雕像的文物。这种姿势相当流行：如据认为是祖先肖像的小雕像(其中有一些是女像)，在马里卜、哈兹和亚丁博物馆里那些丧葬浮雕上的妇女坐像，“提姆纳的巴拉特夫人”(J.皮雷纳认为是南阿拉伯的伟大女神)的雕像等等，都是如此。⑯

早在我们纪元前八、九世纪，常常手持一只酒杯的海女或女神这类雕像在叙利亚-赫梯人控制下的地区如泰勒哈拉夫、津吉尔利、马拉什和内拉布等地就已很普遍。在我们纪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埃塞俄比亚的雕像和小亚细亚的雕像之间看来确实存在着联系(如布兰奇迪人和米利都的陪葬模拟像)。这些雕像都是颇为肥胖的坐式人像。他们穿着长袍，双手放在膝上。我们在这个地区发现，这个时期的雕像面部有隆起的眼睛、圆圆的脸庞和两角上翘的弧形嘴巴。这些都跟豪勒提那尊雕像的面部非常相似。这些特征在博阿兹柯伊出土的那尊弗里吉亚的女神雕像上也可看到(对此，H.塞里格曾提请我们注意)，在米利都出土的一尊雕像头部以及其他爱奥尼亚雕像上都可看到。这种表情在我们纪元前六世纪上半叶雅典雕像上已变成真正的微笑。⑰J.皮雷纳曾指出，业已东方化的我们纪元前六世纪希腊艺术或下一世纪的派生艺术风格与南阿拉伯艺术有某些相似之处。 348

在阿克罗波利斯发现的一尊雕像头部也可看出类似豪勒提雕像上的发型。在阿姆里特出土的一个希腊-波斯小头像上和在古城波斯波利斯的阿帕达纳大殿中也发现类似发式。在波斯波利斯，这种雕法既表示库希特黑人的卷曲头发也表示给他们带路的那些梅迪克人精心卷成波浪式和卷曲状的发卷，二者不加区别。⑱因此，这些以众多菱形纹表示的头发究竟是卷发的一种式样，还是卷曲头发的真实写照，就很难断定。所以，单凭这个特征也难以判断他们属于哪个种族。

这类坐式雕像的特征主要是在闪米特人居住的近东和已东方化的希腊世界发现的，而

---

⑭ F.安弗雷及G.安尼思，第60－61页。
⑮ 雅姆(A.Jamme)，1956年，第67页；H.德孔唐松，1962年，第74-75页，插图9；J.皮雷纳，1965年，第1046－1047页。
⑯ H.德孔唐松，1962年，第76页；J.皮雷纳，1967年，第131页。
⑰ H·德孔唐松，1962年，第77页。
⑱ 同上，第82页。

在曼赫特（mankhit）启发下配有对称饰物的项圈和有皱褶的袍子，却有证据说明它们是受了埃及特别是麦罗埃文化的影响；正如J.皮雷纳所说，那些有褶皱的袍子，使人想起麦罗埃王后们穿的束腰外衣以及她们从蓬特的阿蒂（与哈特舍普苏特王后同时代）那里继承的肥大模样⑲。

这些对比着重说明了提格雷的这些坐式女雕像所反映出来的多种影响，但对他们究竟表现什么人这个问题，并未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在阿迪加拉莫发现的那个似乎和那尊小雕像有联系的刻着字的底座，也不能提供任何可据以作结论的论据。我们不知道那个题词的意思是否象A.J.德鲁斯所认为的那样，是“旨在使他给YMNT一个孩子”，或者象G.雷克曼斯认为的那样，是“献给那位帮助雅马纳特（Yamanat）的人。瓦利杜姆敬献”，或者甚至象J.皮雷纳认为的那样，是“献给也门人的保护〔神〕。瓦利杜姆”。人们甚至倾向于把这些坐式女像看作王后或贵人，或者象J.皮雷纳坚持的那样，说他们代表的是伟大的女神。尽管由于同时出现几座几乎完全相同的雕像而引起困难，但那座完整的雕像的碎片是和神龛的碎片混合在一起的，这个事实有助于最后那种解释；雕像和神龛的大小相称这一事实也有助于作这样的解释。当这两种遗物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些事实也使我们认为：二者在制作时就是为了配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倾向于否定认为这座神龛是和在腓尼基、阿杜利斯或特克泽发现的无像宝座属同一类型的那种假设，并回到我们最初的印象，即象J.皮雷纳所说的，认为这个东西是“游行时抬着的神龛的石料复制品”，里边放着一尊供崇拜的雕像。除了在豪勒提发现的可能属于一件类似遗物的少数碎块外，这座神龛是这类东西当中独具一格的。尽管在南阿拉伯出土的文物没有一件与此类似（这可能只是由于目前也门的考古工作未开展所致）。但在那里已经找到某些雕像，相貌的刻法完全一样。同样的牛蹄子在G.范贝克鉴定的石制家具上和马里卜出土的一尊大理石小雕像上也可看到⑳。斜卧着的野山羊常常按间档依次刻在扁平石碑的边上。这种形式经常出现在萨巴地区的马里卜和哈兹一带地方。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最近在马塔拉发现的㉑。我们还在马里卜一个祭坛上发现野山羊和具有传统风格的树在一起，这些野山羊似乎是在吃树上的果子。不管这些野山羊是否同“生命之树”有关，它们具有宗教意义看来是毫无疑义的。格罗曼似已证明：野山羊象征月神阿尔马卡，公牛也是奉献给月神的㉒。

虽然神龛侧面的浅浮雕的技艺，同现在我们知道的显然较晚的南阿拉伯作品相比，更接近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风格，但浅浮雕所表现的人物和在马里卜发现的立体铜雕有相似之处，如头发、眼睛、耳朵、缠腰布和便鞋就是如此㉓。那个铜雕对头发、眼睛和嘴的刻法几乎和豪勒提雕像没有什么不同，而鼻子（豪勒提雕像的鼻子已经没有了）则突出表明那位大人物是闪米特类型，这个类型的人现在提格雷仍很普遍。该铜雕和代尔拜赫里出土的蓬特国王雕像极其相似，他姿态文雅、短头发、尖胡须、鹰钩鼻，在背后打结的带子和一

349

⑲ H.德孔唐松，1962年，第78页；J.皮雷纳，1967年，第132页。
⑳ H.德孔唐松，1962年，第79页。
㉑ 同上，第80页；F.安弗雷，1965年，第59页，图片LXIII，2。
㉒ 格罗曼（A.Grohmann），1914 b，第40、56－67页。
㉓ 奥尔布赖特（F.P.Albright），1958年。

端拖在背后的缠腰布，样样都象[24]。

神龛侧面的浅浮雕表示的场面，在解释上仍然有争论。最早的出版物就提出了两种设想。一种认为应当从图象本身来观察；场面描绘的是一个拿着一把扇子或一面旗标的仆人，他的右手里拿的是一根棍子或蝇拂，走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小孩子，由于他的姓名RFS是男性，可以断定他是男的。另一种设想更符合古代习俗，认为这个场面表示的是一位重要人物，不是一位神就是一位有权势的人物，保护着低于他的一个人[25]。A. 雅姆采纳后一种看法，认为RFS这个名字指的是那个大人物，他代表的是一位拿着一把扬风扇和一根棍棒的神，正在保护一位孕妇，而这位孕妇正是同"王座"[26]有密切关系的那位坐着的妇女。但J.皮雷纳的结论却说这个人物代表的是一位要人，"甚至可能是"以RFS为名的"一位教长(mukarrib)或一位首领"，他正在向坐在神龛里面的代表女神的那尊雕像呈献权力的标志——一把扇子或女用阳伞和一根棍子；走在他前面的是一位长得丰满的妇女，想必是他的妻子，正在奉献一根棍棒[27]。尽管这种解释现在看来似乎最有道理，可是从RFS的位置看来，很难设想这个名字指的是那位大人物。而且，这位母亲-女神和男性月神的象征之间的联系也必须解释清楚。 350

狮身人面像也是南阿拉伯时期雕刻的代表作，不过除了在默拉佐发现的这种雕像的一个小碎块之外[28]，迄今只在厄立特里亚发现过这种雕像。保存得最好的狮身人面像来自卡斯卡塞东北的阿迪格拉马滕。它的头发是编成辫的，就象较晚时期阿克苏姆某些陶制头像上的一样，也象今天提格雷妇女的发型。这座狮身人面像的脖子上带着一个三股项圈[29]。在马塔拉发现的一块大石匾上有两个狮身人面像，身上有锤制的小凸而，其前半身也带着这种项圈。[30]在马塔拉以南的迪卜迪卜发现另一个破毁残缺的狮身人面像[31]。J.皮雷纳指出，这些狮身人面像同较晚时期在南阿拉伯制作的属于腓尼基传统的那些鹰头狮身带翼的怪兽以及有翼狮身人面像毫无共同之处[32]。也许我们应该寻找埃及或麦罗埃狮身人面像原型；人们早就设想它们是南阿拉伯编发辫有项圈的头像的本源[33]。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雕刻得特别好的一类石刻物品就是香坛。这些香坛大多属于在南阿拉伯很有名的一种类型：常常放在金字塔形底座上的带有建筑装饰的立方形香坛。最美好的一个香坛是阿迪加拉莫香坛，据J.皮雷纳说，它胜过所有的南阿拉伯香坛；但完好程度各不相同的一系列香坛已在默拉佐的戈博凯拉发现，在耶哈也发现几个，在马塔拉或未经核实的

---

[24] H.德孔唐松，1962年，第82-83页。

[25] 同上，第73页。

[26] A.雅姆，1963年，第324-327页（还不清楚，作者根据什么认定右侧的妇女是怀孕的，而左侧的妇女没有怀孕，而这两个人物是完全一样的）。

[27] J.皮雷纳，1967年，第132页。

[28] 勒克朗(J.Leclant)，1959 b，第51页，图片XLII，a。

[29] 戴维科(A.Davico)，第1-6页。

[30] F.安弗雷，1965年，第59页；图片LXIII，4。

[31] C.康蒂·罗西尼，1928年，225页，图片XLIII，128-129号；弗朗基尼(V.Franchini)，第5-16页，插图7-8-11-1。

[32] J.皮雷纳，1965年，1046-1047页。

[33] 格罗哈姆(A.Grohamm)，1927年，插图55。

351 一些地方也发现一些碎块㉞。在戈博凯拉发现的四座一组的香坛是以截去顶端的锥形为底座的一种圆柱形香坛，属于迄今尚未发现过的类型㉟。在这种香坛上，装饰品只限于作为南阿拉伯神象征的由光轮托着的一弯新月和由一些三角形组成的腰线。至于南阿拉伯立方形小香坛，我们只有两件实物，尽管工艺粗糙，但它们似乎也属于南阿拉伯时期。一个在马塔拉出土，是在埃塞俄比亚第一个被明确地称为香坛(mqtr)的㊱。第二个是在离上述地点不远处名叫扎拉凯赛德迈的地方发现的，其侧面的浅浮雕和上述那个不同。一个侧面刻的是由光轮和新月构成的神的象征，对面刻的是具有传统风格的"生命之树"，很象豪勒提神龛上的"生命之树"。其余两侧的野山羊雕像都朝向这颗树㊲。

就象在南阿拉伯那样，除香坛外，我们还发现了奠酒用的祭坛，这可从它上面刻的让献酒流出去的沟槽辨认出来。在耶哈发现的几座平台和在胡赖宰或马里卜地区发现的类似，上面有类似牛的头盖骨形状的排水槽。这些平台中有一座上面无疑刻有一个动物的头，但因磨损严重，已无法辨认。㊳在其它平台上都有很好的阳文铭刻以及和香坛上一样的由横梁末端图案组成的腰饰㊴。上面列举的第一类样品、第二类样品当中的一个以及在马塔拉发现的一个独特的奠酒坛，都刻有这类遗物的当地名称姆特伦(mtryn),这个名词在南阿拉伯还没有得到印证。马塔拉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很厚实的供桌，和在耶哈发现的第一个供桌类似㊵。阿迪格拉马滕的奠酒坛更近似那种以横梁末端图案为腰饰、多层底座，更为精致的奠酒坛㊶。在卡斯卡塞附近的菲基亚发现的祭坛形状象一只大酒杯，上面刻有狮身人面兽或狮子头的颈部，据J. 皮雷纳说，这种祭坛更近似在麦罗埃艺术中常见的形状㊷。

除上述这些雕刻外，全部考古发掘向我们提供的实物就只有至今人们很少了解的一种陶器了。F. 安弗雷把在马塔拉和耶哈发现的山慈姑形的瓶子和有水平条隆起的带柄大罐归入这个时期。他把这类实物同在亚丁以北几英里的索巴发现的东西进行比较。后者似乎是

352 我们纪元前六世纪制造的㊸。

那些用古体字刻的铭文全部是南阿拉伯文字。据A.J. 德鲁斯说，这些铭文可分两类。一类是用真正的萨巴文刻在文物上的铭文，稍带地方特色；第二类是刻在岩石上的铭文，模仿第一类字体，但实际上被认为只不过是和萨巴文有关的一种闪米特语文㊹。据目前的研究，第二类铭文似乎只局限于高原北部厄立特里亚的阿凯莱古扎伊地区。整个说来，这些铭文提供的资料主要与人名地名有关，从中我们看到具有南阿拉伯文字体的专有名称

㉞ 阿迪加拉莫遗址：见A. 卡科及A. J. 德鲁斯合著，第26－32页，图片IX-XI;戈博凯拉遗址：见J. 勒克朗著作，1959b，第47－53页；A. J. 德鲁斯，1959年，第90－97页；图片XXX, XXXI, XXXIV, XXXVIII; J. 皮雷纳，1970年,第119页,图片,XXIV, b;耶哈遗址：见A. J. 德鲁斯及施奈德(R.Schneider)合著,1970年,第58－59页,图片XVI, 第62页，图片XIX; 马塔拉遗址：见F. 安弗雷及G. 安尼昆合著，第59、75、89－91页；图片LXIII,3, LXXI; 未经核实的一些地方的发掘材料：见R. 施奈德著作，1961年,第64页，图片XXXVIII,b。

㉟ J. 勒克朗，1959 b，第48－49页；A. J. 德鲁斯，1959年，第88、89、91、94页；图片XXXV-XXXVII。

㊱ A.J. 德鲁斯及R. 施奈德，1967年，第89－91页，图片XLIII,1－2。

㊲ F. 安弗雷及G. 安尼昆，第76页；图片LXXIV。

㊳ A.J. 德鲁斯及R. 施奈德，1970年，第59－60页，图片XVI, b-c。

㊴ 同上，第60－62页，图片XVIII, a-b。

㊵ F. 安弗雷及G. 安尼昆，第59、75、90页，图片LXXII,1－3。

㊶ A. 戴维科，第1－3页。

㊷ A.J. 德鲁斯，1956年，第179－182页，图片I;F. 安弗雷，1965年，第6－7页；图片III。

㊸ F. 安弗雷，1966年，第1－74页；第一分册，1970年，第58页。

㊹ A.J. 德鲁斯，1962年。

数量最多，而第一类铭文还可以使人们看到这个时期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的点滴情况。

这些文字不仅提到诸如上面提到的香坛或供桌等礼拜用品的名称，而且还提到许多神的名字，这些神几乎和萨巴王国崇拜的全部神祇相同。目前所知最齐全的名单出现在一块砌石上，后来这块石头又在默拉佐的恩达塞科斯教堂里使用。上面写的是："……阿斯塔尔（星神），豪巴斯和阿尔马卡（都是月神），达特-希米阿姆和达特-巴丹（都是太阳神）……"[45]。

阿斯塔尔（Astar）这个名字也出现在另外两篇铭文中，一篇出自耶哈，另一篇出土地点不详[46]；它只不过是星神阿思塔尔（Athtar）的埃塞俄比亚文拚法，在三篇许愿的文字（一篇出自耶哈，另外两篇出自马塔拉）[47]中，星神也和阿尔马卡这个名称一起出现。在马塔拉有座祭坛是献给什龙的，什龙是神的称号，业已证实它指的是金星[48]。

除恩达塞科斯铭文外，月神豪巴斯似乎只在埃塞俄比亚迪卜迪卜的狮身人面像和祭坛上的铭文中提到过[49]。

在萨巴和埃塞俄比亚最受尊敬的似乎是月神阿尔马加（Almagah,按A.雅姆的意见，叫伊鲁姆古 Jlumguh）。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马塔拉、耶哈和恩达塞科斯的铭文以外，在默拉佐的戈博凯拉发现的所有铭文以及阿迪加拉莫的祭坛和耶哈的奠酒坛都是专门献给月神阿尔马加的[50]。耶哈的神庙可能也是献给他的，就象马里卜的伟大的奥瓦姆圣殿和巴兰圣殿是献给他的那样。最后一点是，马塔拉、耶哈和豪勒提的野山羊，雕刻在豪勒提神龛上的牛蹄子以及戈博凯拉的用雪花石膏制成的公牛，都是用来象征月神阿尔马卡的[51]。

对太阳的崇拜以一对女神达特-希米阿姆和达特-巴丹来表现，她们似乎分别代表夏天的太阳和冬天的太阳。前者除曾在耶哈和菲基亚被提到外，还在阿迪格拉马滕的奠酒坛上提到。后者曾在马塔拉和阿克苏姆附近的阿巴潘塔莱昂已破碎的碑文上出现[52]。 353

耶哈奠酒坛上的铭文证实的其他诸神的作用似乎差得多。恩尔伍（Nrw）被提到过两次，有一次是和阿斯塔尔一起提的，它相当于南阿拉伯的瑙劳（Nawraw），后者也是一位星神[53]。提到上述这两位神的那座祭坛还提到伊弗姆（Yf'm），据利特曼说，伊弗姆也是一位神的名字。另一座祭坛是献给斯德格恩（Sdgn）和恩斯布恩伍（Nsbthw）的[54]。最后，A.雅姆认为，刻在豪勒提神龛上的名词RFŠ是一位神的名字。这样复杂的宗教意味着当时存在的社会结构也是复杂的。

尽管献词一类的铭文一般只提供有关高级人物的世系情况，但戈博凯拉的铭文却透露居民百姓是以若干氏族组成的。这个遗址的四篇铭文和耶哈的一篇都提到："属于格尔布氏

---

[45] A.J. 德鲁斯，1959年，第99页；R. 施奈德，1961年，第61－62页。

[46] R. 施奈德，第64－65页（JE 671，手迹 B1－B2）；A.J. 德鲁斯及 R. 施奈德，1970年，第60－61页。

[47] A.J. 德鲁斯，1959年，第89－91页；A.J. 德鲁斯及 R. 施奈德，1970年，第58－59页。

[48] A.J. 德鲁斯及 R. 施奈德，1967年，第89－90页。

[49] C. 康蒂-罗西尼，1928年，第225页，图片 XLIII,第128－129号；V. 弗朗基尼，第5－16页，插图7－8,11－14；A.J. 德鲁斯，1954年，第185－186页。

[50] A.J. 德鲁斯，1959年，第89－94、97－99页；A.J. 德鲁斯及 R. 施奈德，1970年，第61－62页。

[51] 海莱马里安（G.Hailemarian),第50页，图片 XV；J. 勒克朗，1950 b,第51页，图片 LI。

[52] R. 施奈德，1965年，第90页。

[53] A.J. 德鲁斯及 R.施奈德，1970年，第61及62页。

[54] 同上，第59－60页。

族的尔希，是马里卜的伊格德姆尔·弗克姆家族的成员或儿子”。在某些献辞中尔希这个人是和他的兄弟斯布赫姆伍一起出现的。耶哈的铭文上说，尔希曾把他的财产和他的儿子希尔姆赫献给阿斯塔尔和阿尔马卡（星神和月神）[55]。伊格德姆尔和弗克姆这两个名词很可能指的是种族集团，格尔布肯定是指种族集团。马塔拉的两篇铭文中的“马里卜的（of Mârib）”和“哈达甘的（of Hadaqan）”这种说法指的是地名而不是部落名[56]。它们可能同南阿拉伯殖民者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建立的一些居民点有关，但据L.里奇说，这些名词似乎更可能是指这些殖民者原先是从阿拉伯本土来的[57]。

从一些铭文中，特别是从阿迪加拉莫的祭坛和默拉佐地区的恩达塞科斯发现的砌石上的铭文中，我们了解到南阿拉伯时期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政治组织情况[58]。这种组织似乎是世袭君主制。它的两位君主拉普和他的儿子卢姆有同样头衔：“迪亚马特和萨巴的教长（mukarrib）、伊格德部落的斯尔恩国王”。阿迪加拉莫的祭坛上还给两位君主中的第一位加上下面的文字：“赖丹的瓦伦部落的后裔”。在一座出土地点不详的、献给星神阿斯塔尔的祭坛上也提到第二位君主。还是这位卢姆，或是名字和他一样的另一位君主，在马塔拉的两篇铭文中都曾提到，在其中的一篇，他是和名叫苏穆阿莱的一位萨巴教长一起提到354的[59]。明确指出这些国王同赖丹的瓦伦部落有联系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南阿拉伯血统很重视。至于迪亚马特和萨巴的教长这个头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它指的可能是南阿拉伯一些地区，其君主已把统治权扩展到埃塞俄比亚北部；这些名词代表的可能是南阿拉伯殖民者业已以他们故乡的省名命名的一些非洲地区；这些名词或许仅有政治上的意义而无领土上的意义。第一种设想似乎极不可能，我们只能同意A.J.德鲁斯的意见：他认为，毫无疑义，这些君主对从南阿拉伯来的或属南阿拉伯后裔的臣民行使着萨巴教长的权力。“伊格德（Yg'd）部落的斯尔恩（Sr'n）国王”这个头衔可能读作：“伊格兹（Ig'azyan）部落的查拉尼（Tsar'ane）国王”；这些头衔表明他们也统治当地土著居民，而且他们是当地伊格德（或者伊格兹）部落的后代。A.J.德鲁斯认为这个部落是盖埃兹人的祖先。

阿巴潘塔莱昂、阿迪加拉莫祭坛和恩达塞科斯万神殿等三处的三篇不完整的铭文间接提到一件似乎发生在拉普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即关于占领和洗劫迪阿马特、“它的东部和西部，它的红种人和黑种人的”事件。可惜的是，这个地区在何处、侵略者究竟是谁这些问题都仍未核实。

记述埃塞俄比亚北部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的铭文提供的关于建筑、艺术品、碑文和统计资料，都证明在我们纪元前四、五世纪那里存在强大的南阿拉伯影响。正如F.安弗雷提醒我们的，在占统治地位的闪米特文化出现以前的几百年间，南阿拉伯的影响就已逐渐渗入了：“小股小股的移民已在传播南阿拉伯文化”，这无疑是在我们迄今无从了解的经济和人口压力下进行的。[60]正如这位调查研究者设想的那样，这些殖民者曾把新的农业技术、特别是

---

[55] A.J.德鲁斯，1959年、第89、91，97－99页。A.J.德鲁斯及R.施奈德，1970年，第58－59页。

[56] R.施奈德，1965 a，第89－91页。

[57] 里奇（L. Ricci），1961年，第133页；A.J.德鲁斯及R.施奈德，1970年，第59页。

[58] A.卡科及A.J.德鲁斯，第26－33页；R.施奈德，1965 b，第221－222页。

[59] R.施奈德，1961年，第64－65页；R.施奈德，1965 a，第90页；A.J.德鲁斯及R.施奈德，1967年，第69－91页。

[60] F.安弗雷，1967年，第49－50页，1968年，第353、356页。

摇摆犁的使用带来，他们还在埃塞俄比亚修建了第一批石砌村庄，这都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从L.里奇和A.J.德鲁斯的著作里得到的印象是：在一些居民中心，南阿拉伯因素占突出地位。在这些地方，一种初期的市镇生活在寺院周围成长起来，如在默拉佐地区的耶哈、也许还有阿迪加拉莫和马塔拉。而受到尼罗河流域某些因素影响的当地基本文化则是在厄立特里亚地区，如阿凯莱古扎伊、阿迪格拉马滕和迪卜迪卜等遗址上有更多的表现。

可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整个北部地区，一种明显具有内部一致性的文化单元的出现，必然是和某一人群掌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并能延续其地位同时发生的；可是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批人究竟是由南阿拉伯殖民者的后代组成，还是由充分吸收了这种较高级的文化并把它变成自己的文化的当地居民组成的。C.康蒂-罗西尼集中注意的是：在埃塞俄比亚这种早期文明中南阿拉伯成分占突出地位。而J.皮雷纳和F.安弗雷则反对这种意向，他们强调的是这种文化的本来面目：这种文化本来就是由各种影响综合而成的，而且当它从南阿拉伯文化形式中吸取启示时，它表现出比那些外来文化的原型还好些。使用“埃塞俄比亚-萨巴时期”这个名称可能更确切地表达这种文化的特征。可是，正如F.安弗雷承认的那样，非洲文物的明显的优势可能只是由于迄今在也门进行的考古研究缺乏连续性才给人以这种印象。将来红海彼岸和埃塞俄比亚以及古麦罗埃王国的新发现很可能会使我们对其文化移入过程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个过程可能是在我们纪元前五百年间出现的。毫无疑问，从那时以后，埃塞俄比亚就已成为许多贸易渠道和各种文化影响的交叉路口了。 355

中 间 时 期

阿克苏姆时期以前文化的第二个阶段称为中间时期，它所提供的材料表明当地文化具有明显的特色，并已吸收外来的影响。

无疑，南阿拉伯渊源的某些特征仍然看得出来，但是，正如F.安弗雷明确指出的，这种文化已经不再是直接接受外来影响而是在过去接受影响的基础上本身发展起来的。铭文上那些粗糙得多的字体越来越不象原来南阿拉伯语的文字[61]。教长(Mukarrib)这个词再也见不到了，但在卡斯卡塞发现的一篇铭文提到一位国王，他的名字是南阿拉伯式的：瓦伦·哈雅纳特（W'RN HYNT），萨拉马特的后代[62]。在南阿拉伯时期，在默拉佐的戈博凯拉得到充分证实的格尔布氏族，虽已不提它同马里卜的联系，但仍然存在，因为它的一个成员向月神阿尔马卡奉献了一个有金字塔形底座的立方形香坛[63]。另外还献给这位神一个粗糙的用页岩制成的公牛小雕像[64]。在阿迪格拉马滕，后来还有人在祭坛上那篇献词之外又给太阳神达特-希米亚姆添上第二篇献辞，而且还给狮身人面像添上一个名字：瓦哈布-瓦德（Wahab-Wadd）。加上用南阿拉伯草书刻成的铭文，如代拉和泽班莫罗罗的那些铭文，

---

[61] L.里奇，1959年，第55-95页，1960年，第77-119页；A.J.德鲁斯，1962年，(著作中)随处可见。
[62] 《德国阿克苏姆考察队》，第62-63页。
[63] J.勒克朗，1959 b，第47页；A.J.德鲁斯，1959年，第92页，图片XXXII-XXXIII。
[64] A.J.德鲁斯，1959年，第95-97页，图片XXXIX-XL。

356 以及在采胡夫埃姗尼发现的瓦片上刻的字（这种字似乎既不是南阿拉伯文，也不是埃塞俄比亚文）[65]，就使碑铭文献齐备了。

除了在默拉佐地区出土的宗教建筑物以外，中间时期的建筑几乎没有什么代表作。J.勒克朗在戈博凯拉的一座东西向的长方形建筑物内发现的一切文物，有的已改作他用，有的原样未动。这座建筑物有一道长 18.1 米宽 7.3米的围墙，围墙里是一片通向内殿的空地，内殿长 8.9 米宽 6.75 米。其西侧中间开有一道门，靠东有一条长几，上边放着祭祀用品[66]。

豪勒提的雕像和神龛是在两座东西向的、遭到严重破坏的建筑物之间的走廊内发现的[67]。只有东西长度是肯定的；北边的建筑物是 11 米，南边的建筑物是 10.50 米。每座建筑物的东侧各有一段阶梯，这些阶梯可能位于东侧正中。如果是这样，那么北边那座建筑物从北到南的长度则是 13 米，南边那座为 11 米。每段阶梯都通向一座平台；这两座平台是否有覆盖物还不得而知。两座平台各有一条长几围绕，长几只有在阶梯尽头处的一段中断，几上放的是还愿用的陶制和金属祭品。陶制祭品大部分是牲畜，一般都具有传统工艺风格，但也有一些合乎自然情态的；例如有时戴着小型轭的牛，驮着东西的牲畜，伸着舌头的怪状四脚兽，几位坐式妇女，而在两段阶梯附近还有陶制狮身人面兽[68]。这个时期建筑物的共同特点，除东西向这一点外，就是它们不象以前那样是用石灰石建成，而是用蓝色花岗岩或本地页岩建成。这个特点后来在阿克苏姆时期的建筑中曾再度出现；而且在马塔拉时期第二阶段又在厄立特里亚出现；在仍未进行发掘的也可能属于中间时期的菲基亚的废墟中也已出现[69]。

这个时期的另一特点是在地下堆积了大量器物，例如耶哈和马塔拉的竖穴墓或萨贝阿和豪勒提的墓窖中就有很多器物[70]。应该指出，在萨贝阿（这个地名很象南阿拉伯地名），业已发掘的三个墓窖中有两个(据 J.勒克朗的描述)很象同时代的竖穴墓。在这些地下堆积层以及在豪勒提山上各寺庙周围发现的大量金属制品很值得注意，说明当地的金属加工业 357 在我们纪元前三世纪以后已有很大发展。

铁器的制造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引进的，在耶哈发现的主要铁器有铁环、剪刀、剑和匕首，在马塔拉也发现一把剑和一些铁环。在豪勒提各寺庙周围也收集到一些铁器碎片。

可是，发现的青铜器比铁器多得多，这也许是因为青铜更耐腐蚀。在萨贝阿发现了大量开口粗铜环，环子的一段呈长方形；在豪勒提的一座庙里的长几上也放着一个同样的铜环。这种铜环可能是用作手镯、或象麦罗埃用的那种脚镯。但也可以这样提问，这些铜环是否也用作货币。[71]在耶哈和马塔拉发现了较轻的铜环，可以认为这是些手镯或耳环；还发

---

[65] C.康蒂-罗西尼，1947 年，第 12 页，图片 II-III；A.J.德鲁斯及 R.施奈德，1970 年，第 66－67 页。

[66] J.勒克朗，1959 年，第 44，45 页，图片 XXIII-XXVI。

[67] H.德孔唐松，1963 b，第 41－42 页，图片 XXVI-XXIX。

[68] 同上,第 43－44 页，图片 XXXV-XL。

[69] F.安弗雷，1965 年，第6－7 页，图片 III；以及第 59、61、72、74 页。

[70] 耶哈遗址：F.安弗雷，1963 年，第 171－192 页，图片 CXIV-CLVI；马塔拉遗址：F.安弗雷，1967年，第 33－42 页，图片 IX-XVII，XXX-XXXIV，XLII；H.德孔唐松，1969 年，第 162－163页；萨贝阿遗址：J.勒克朗及米克尔(A.Miquel)，第 109－114页，图片 LI-LXIII。豪勒提遗址：H.德孔唐松，1963 b，第 48－51 页，图片 XLIX-LX。

[71] O.图夫内尔(O.Tufnell)，第 37-54 页。

现了一些可能是用来做木工活的宽头工具：如在豪勒提和耶哈发现的斧头，在耶哈和萨贝阿发现的头部如马刺的弯曲手斧，还可以加上在厄立特里亚的马伊马法卢发现的工具[72]；耶哈的直剪刀；在同一遗址上还发现弯剪刀，其用途还不清楚。至于农具，在耶哈、豪勒提和戈博凯拉等地曾发现铆牢的镰刀。武器的代表作是豪勒提出土的一把新月形钺斧或戟和两把铆牢的匕首以及在马塔拉发现的两把刀子，一把是铆牢的，另一把的柄上有一个新月形的圆头。在耶哈的墓葬中还发现了饭锅、秤盘和一个小铃。在豪勒提山顶上还收集到容器残片。在豪勒提、耶哈和马塔拉出土有针和饰针。还有一些小的青铜串珠据报道是出自萨贝阿、豪勒提和耶哈。

反映南阿拉伯传统的最后一类青铜器就是叫做身分证章的有孔铜牌[73]。A.J.德鲁斯和R.施奈德把这种铜牌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几何图形的小而薄的铜片，上边安着一个环并饰以对称图案，有时在图案上还可以辨认出交织大写字母或孤立的字母。在萨贝阿和豪勒提发现的铜牌和在耶哈出土的绝大部分铜牌都属这一类。第二类只在耶哈遗址发现过，是更大更厚的铜牌，安着一个柄，形状类似传统工艺风格的动物图形，如一头公牛、一只野山羊、一头狮子或一只鸟。这类铜牌上有用南阿拉伯草书写的专名，使用的似乎又是介乎萨巴语和盖埃兹语之间的一种语言。辨认得最清楚的名字是“伍尔恩希特伍”(W'RNHYTW)，这正是在卡尔卡塞提到的那位国王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在岩石上的铭文中、在豪勒提的陶器碎片上都发现类似名称，但它们都是浮雕，而不是压印。据我们所知，在埃塞俄比亚以外，只在南阿拉伯发现少数几件类似的青铜器。 358

考虑到这些青铜器表现的工艺水平很高，因此象F.安弗雷设想的那样，我们把其它制品诸如在豪勒提寺庙附近发现的一对小型牛蹄和马哈贝雷焦圭出土的一头生动有力的公牛的小雕像，说成是这个中间时期埃塞俄比亚铜匠的作品，似乎是有道理的[74]，而这些作品也进一步提供了崇拜月神的证据。F.安弗雷则审慎地作如下推论：在阿迪加拉莫、马塔拉和泽班库图尔发现的那些驼峰牛雕像的制作时间不早于阿克苏姆时期；在阿迪加拉莫，这种雕像和那些雪花石膏三脚祭坛以及加达尔的铜制节杖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期制作的。

黄金用作装饰品，例如在耶哈和豪勒提是用以制造戒指，在豪勒提用以制作耳环、小串珠和卷线。在属于这个时期的所有遗址上，都发现用玻璃质的陶瓷原料制成的无数各种颜色的小项圈，在萨贝阿和马塔拉也发现用石料制成的项圈。

其它石制器物，包括在耶哈、马塔拉和豪勒提发现的用沙岩制的小臼和盘形或长方形香炉，在萨贝阿发现的一颗图章，以及在耶哈发现的一只雪花石膏花瓶和一只用蛇纹岩雕成的圆环。

最后，豪勒提那个地下堆积层里还有两个陶制护身符，一个是普塔神的头，另一个是哈索女神的头；在马塔拉遗址下层则发现了一个代表哈波克拉特神的肉红玉髓制的护身符。在阿迪加拉莫的发掘中有四件青铜制容器，其中有一件是刻有很精致的荷花和青蛙的

---

[72] C.康蒂-罗西尼，1928年。

[73] A.J.德鲁斯及R.施奈德，1967年，第92-96页，图片XLIV。

[74] H.德孔唐松，1961年，第21-22页，图片XXII；F.安弗雷，1967年，第44-46页。

碗，还有一件是以凸出的线条刻着牛的花瓶碎片。这批物品特别有趣，因为它们起源于麦罗埃，并为古埃塞俄比亚与尼罗河流域的关系提供了证据[75]。

在这个时期的陶制品中也可以看出麦罗埃的某些影响，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76]。这些陶器造型优美而多样，后来在埃塞俄比亚就再也没有发现过。制陶用的粘土通常是有光泽的，呈黑色或红色，陶器表面通常是上釉的，上面装饰的几何图案通常是刻出的，但有时也用红色或白色颜料勾画。还发现一些刻出的装饰图案通常是用白色但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粘土填满的。除了在墓窖里发现的遗物之外，在豪勒提山顶上、在耶哈和马塔拉较深的地层中、而且很可能在阿杜利斯最古老的陶器上还有大量证据，其中大都还未发表。

359

在豪勒提出土的供品表明，当时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但另一方面在青铜、铁、金等金属加工业，在石制物和玻璃质陶土制品以及陶器方面取得的迅速进步都表明：一个专门从事手工业的阶级那时已出现。可以肯定地说，看来在南阿拉伯时期建立的一些居民点诸如默拉佐、耶哈和马塔拉，或者在较晚时期建立的如阿杜利斯，城市化的进程似乎正在发展。一方面对南阿拉伯各种传统的记忆尚未消失，而另一方面一种新的刺激因素似乎已从麦罗埃王国到来——这个王国在把金属加工技术传遍整个非洲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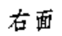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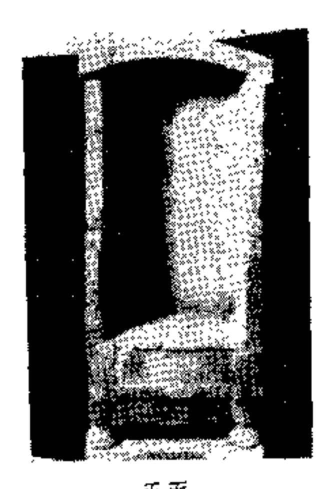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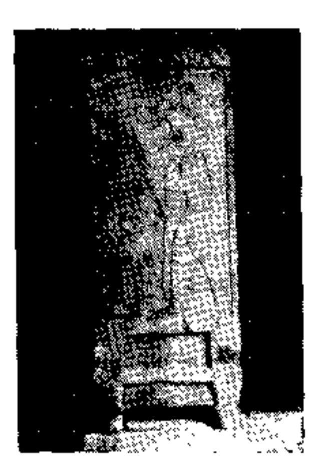
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由于麦罗埃王国的衰落，另一方面由于南阿拉伯各王国的权力也在削弱，埃塞俄比亚便控制了黄金、香料、象牙和从印度洋进口产品的全部贸易。

（姜文源译）

---

[75] H.德孔唐松，1963年，第48页，图片 XLIX，b,c；柯万(L.P.Kirwan)，1960年，第172页；J.勒克朗，1961年，第392页；J.勒克朗，1962年，第295－298页，图片 IX-X。

[76] 帕里贝尼(R.Paribeni)，第446－451页；J.勒克朗及A.米克尔，1959年，第109、114页，图片 LI-LXIII；H.德孔唐松，1963年，第44、49－50页，图片XLI，LIII，b，LX；F.安弗雷，1963年，第190－191页，图片 CXXVIII-CXLV；F.安弗雷，1968年，第13－15页，图片 XLVII-L，插图I，2，II；F.安弗雷，1967年，第42页，图片XXX-XXXIX，XLII。

右面　　正面　　左面

图片 13.1　豪勒提的"王座"或"神龛"

图片 13.2 a　豪勒提的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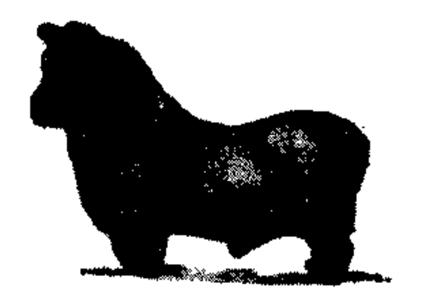
图片 13.2 b　头和肩部



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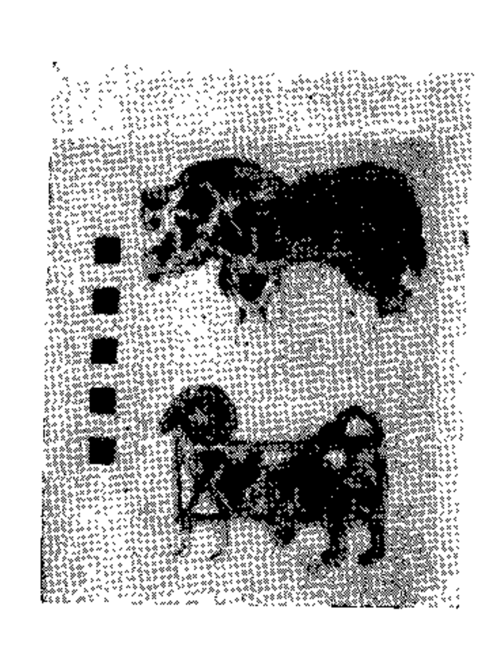
图片 13.3 阿迪加拉莫的香坛



图片 13.4 马哈贝雷集圭的青铜牛

图片 13.5 在耶哈发现的铜制身分证：（1）一只鸟；（2）一头狮子；（3）一只野山羊





14 一至七世纪阿克苏姆的文明

F. 安弗雷

根据原始资料记载，阿克苏姆王国的历史从我们纪元一世纪起延续了近1000年。其中包括在三、四、六世纪对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两次武装入侵，四世纪对麦罗埃的远征和四世纪上半叶基督教的传入。

有20位国王先后登上阿克苏姆王位，其中大多数只是从铸币上知道他们的名字。埃扎纳和卡莱布这两位国王特别显赫。其余那些君主都是根据传说流传下来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传说很不可靠。有确实记载的最早的一位国王是佐斯卡勒斯，一世纪末一本希腊文著作中曾提到他，但他是否就是流传下来的帝王表中的扎希卡希，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对阿克苏姆文明的了解来自各个方面，从古代作家普林尼(他曾提到阿杜利斯)到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希沙、伊本·希沙姆和伊本·豪卡勒等人的著作。但这些史料大都有些含糊其词，因此，我们的实证材料大部分来自当地铭文和逐渐增多的考古材料。为数不多的铭文是从十九世纪开始搜集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刻在石头上的埃扎纳的铭文。埃扎纳、卡莱布和他的一个儿子(瓦泽利亚)用希腊文、盖埃兹文和仿萨巴文刻写的其他铭文的发现，提供了各种资料；近20年来，又增加了其他类似的证据，其中包括在厄立特里亚发现的刻在岩洞里的铭文和在片岩上刻的文字。这些二世纪的资料是阿克苏姆时期最早的文献。

但是，考古调查和出土文物无疑是阿克苏姆文明实证的主要来源。十九世纪，旅行家们就已开始记载尚存的遗址、建筑物和铭文。曾发表各种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意义重大，例如德国派往阿克苏姆的考察团于1906年发表的史料极其丰富的著作。埃塞俄比亚考古研究所于1952年成立，开始了有系统的工作，彻底调查了几处遗址，其中包括阿克苏姆、默拉佐、豪勒提、耶哈和马塔拉。与此同时，古代居民图标出的地理范围也大得多了。我们现在知道的主要遗址大约有四十处，进一步的考察肯定会使数字增加。但调查研究做得仍然不够，因此，总的来说，我们的知识仍然是片断的。迄今已发现的古物大多数尚难确定其年代。实际上，具有真正年代记载的实证材料只有铭文，但就连这种记载也常常并不都是很肯定的。大量资料仍有待搜集，因此，我们只能提供关于阿克苏姆文明的一个梗概。

面　积

考古表明，阿克苏姆王国的版图就象一个竖立的矩形，长约300公里，宽160公里，

位于北纬13度到17度、东经30度到40度之间，从克伦以北的地区向南延伸至阿拉吉，从沿海的阿杜利斯向西延伸至特克泽周围一带。阿迪达赫诺实际上是这个地区发现的最后一个遗址，离阿克苏姆约30公里。

阿克苏姆初期

阿克苏姆这个名称是在《红海回航记》中首次出现的。这部书是一个埃及商人编写的海上和商业指南，一世纪末就有了。二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也曾提到这个地方。

《回航记》还提供了关于阿杜利斯的情况，这个城市在马萨瓦以南约50公里处，如今已为黄沙所覆盖。该书把阿杜利斯描绘成“距内地主要象牙市场科洛埃镇三天路程的一个大村庄。从这里到人们称为阿克苏姆的城市还有五天路程。人们从尼罗河以西的地方把全部象牙运到科洛埃，然后穿越昔埃努姆地区，最后才运到阿杜利斯”。因此阿杜利斯是阿克苏姆的出海口岸，特别是出口象牙。该书还说，犀牛角、龟甲和黑曜岩也在这里出售。在《回航记》问世以前，普林尼早已提到阿杜利斯出口这些商品，因此提到阿杜利斯的名字比阿克苏姆还早。据普林尼说，阿杜利斯是古代穴居者生活的地方。“这里是史前穴居人和埃塞俄比亚的最大商业中心……”。自从一世纪以来，罗马人和希腊人就知道有阿克苏姆人，也知道在阿杜利斯内地有他们的“城镇”。

关于这个时期最初几个世纪的物质文明情况，考古研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资料。二、三世纪的少数铭文实际上是仅有的可以推断年代的证据。虽然这些资料既少又简单，但它们的确具有一些明显的特色。它们提供了埃塞俄比亚字母最早的形式，这些字母直到今天还在使用。不过它们并不是在阿克苏姆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铭文，另外还有好几种属于我们纪元前最后500年的南阿拉伯字体的铭文。南阿拉伯字体是埃塞俄比亚字体的原型。字母的形状在我们纪元二世纪已有很大变化，已脱离南阿拉伯字体的原形。

364

毫无疑问，除文字外，还有最初这几个世纪的其他遗迹，如建筑物废墟、陶器和其他文物。但目前的研究水平还不能鉴别它们。属于三世纪或四世纪初的好几处古迹，如马塔拉和安扎的那些石碑，表明阿克苏姆文明并未完全摆脱阿克苏姆以前时期文化的影响。这些石碑无论是平刻的还是浮雕，都有新月上带有光轮的月亮象征，形状和我们纪元前五世纪香炉上的一样。同样的象征在铸币上也有发现。在埃扎纳和卡莱布的巨大石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类似南阿拉伯的文字，不过业已发生重大变化。这些碑文表明人们已经改变宗教信仰，不再祈求旧日神祇的保佑，而且所有其他象征如长着大弯角的野山羊、狮子、狮身人面像等等都已被抛弃，只有月亮的象征例外。因为在这个时期，和前一时期截然不同的一种新型的文明正在形成——前一时期叫做阿克苏姆以前时期，其原因在此。就这些遗址显示的情况看，这种现象在文化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也都可看到。

阿克苏姆的遗址

据《回航记》说，阿杜利斯和阿克苏姆是古代使用的一条大道的两端，是这些遗址中最重

要的两个，也是当地书面材料和铭文业已证实的一直保留到现在的两个古代名称。阿杜利斯是一个早已无人居住的遗址，但附近各村庄的居民仍然把这片废墟叫阿祖利。全部或几乎全部其他古代遗址的名称，肯定都已不是古阿克苏姆的旧名了。它们主要集中在这个地区的东部，北起阿拉图，南至纳兹雷特，其中包括托孔达、马塔拉、埃奇马雷以及科海托的那些大遗址。有理由认为，科海托就是科洛埃(见第十六章的地图)。

阿克苏姆

根据我们纪元三世纪据说是摩尼的一本著作记载，阿克苏姆城和阿克苏姆王国在当时很有名，书中把这个王国描写成"世界第三大国"。确实，就在这个城市里边，巨大的建筑物和许多其他物证仍然引起人们对一个伟大历史时代的怀念。高大的石碑（其中有一座是现存最高的有雕饰的独块巨石）、一张巨大的石桌、一些庞大的御座底座、巨柱残片、帝王陵墓，看来很象十八世纪一座王宫底层的大片遗迹——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各种稗史和传说，使游客缅怀辉煌的往昔。

本世纪初，一个德国考察团绘制并拍摄了所有见到的遗迹。他们在该城西部发掘了三处建筑群的遗址并证实了这都是王宫遗迹。接着进行的工作，特别是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又有一些建筑物被发掘出来，从而发现这座古代帝都的大量史实。 365

相传称作恩达西蒙、恩达迈克尔和塔卡马里亚姆的那三座大建筑物保存下来的只是其地基，但是今天，只能在德国考察团绘制的略图和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它们的形状。这些宫殿或城堡中最大的那座是恩达西蒙，四边均为 35 米，呈正方形；恩达迈克尔宫每边 27 米，塔卡马里亚姆宫每边 24 米。城堡四周有庭院和构成长方形的成套附属建筑，例如塔卡马里亚姆的庭院长约 120 米、宽 85 米。

另一座宏伟建筑的遗址埋在马里亚姆齐翁教堂下边。教堂东边低于其平台的地方，这座建筑物地基的遗址仍然存在，其宽度各处不同，最窄处 30 米，最宽处 42 米。

埃塞俄比亚考古研究所于 1966-1968 年间在阿克苏姆城以西发现另一处建筑群，并对它进行了研究。这些遗迹位于贡德尔公路以北的栋古尔，大约是七世纪修建的另一座城堡的遗址。

遗址地基从一座平顶小丘脚下向外倾斜伸展。据当地传说，这个以土石堆成的小丘覆盖的是示巴女王的陵墓。已发掘的这座城堡的遗址占地约 3000 平方米，其围墙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有一边长 57 米，另一边短半米。遗址中央残留至今的墙还有 5 米高。

共约 40 个房间的四个不规则的建筑群呈方形围绕着城堡的主体建筑。主体建筑由七个房间组成，有一个1.8米高的台阶式底座，三条室外楼梯通向室内。在这一住所和那些附属建筑物之间有三个庭院。外面的围墙凸出部分和凹进部分互相交错。在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的好几个房间里还发现埋着石墩，有的两个在一起，有的四个在一起。它们都是支撑某种上层结构的石柱(或者更可能是木柱)的基石。在主体建筑物前厅里，则以宽大石块作柱基，石块上覆以几何图形的铺筑材料。从这个遗址的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布局特征看来，这两处都有楼梯通到主要住所的楼上。

在这个遗址西部发现用烧制的砖砌成的三个炉灶。在南面的附属建筑的一个房间里，一个有火烧痕迹的砖制结构看来原是个加热装置。

栋古尔遗址是今天能够见到的阿克苏姆建筑中最好的例证。由于栋古尔遗址位于边缘地带，规模又不太大，看来它不会是帝王的住处，更可能是市民中一些头面人物的住宅。

另一座杰出的建筑物——据传是卡莱布和他儿子格布拉·马斯卡勒留下的——曾矗立在阿克苏姆东北一座小山上。两座或许可以称为礼拜堂的建筑物建在地窖上边，地窖由几个拱形地下室构成，以石板建成和覆盖。南面那个名叫格布拉·马斯卡勒的地窖由五个拱顶地下室组成，北面那个名叫卡莱布的地窖有三个拱顶地下室。这座建筑物的上部比较新，确有屡次改建的迹象。有理由认为，那些地窖比较古老，还可看出那些拱顶地下室在大约七、八世纪曾再度使用。通向卡莱布墓的那段阶梯有类似二、三世纪叙利亚北部某些建筑物上的那种多边形巨大石块。这座古建筑周围是一片大墓地，最近已在附近发现好几个墓穴。东面不远处还有一些坟墓。

在这个城市东面的巴曾，一些炉灶式坟墓是在山岩上凿成的。有些墓有一个穴，底部两侧各有拱顶室。这一带还有一个 17 级台阶的多穴墓，也是在岩石上凿成的，墓旁耸立着一座巨大石碑。古时候这座石碑并不是孤立的，因为十九世纪初有一位英国旅行者说，他曾经见过这里有 14 根已倒地的"方尖碑"。

这座古城的面积包括从那座高大石碑到栋古尔遗址一带地区，地下到处是废墟。露出地面的断垣残壁随处可见。这说明阿克苏姆曾有不少建筑物。在通常名为阿迪基勒泰和查纳杜格的那些地方，将来如能进行发掘，必将使人们对阿克苏姆昔日的繁荣有更多的了解。

阿杜利斯

这个遗址并不在海边，而是在距海大约四公里的地方，地面上残留物很少。不过，石块、沙土和植物覆盖着相当大的一片废墟。就地面上的实物来判断，遗址呈长方形，长约 500 米，宽 400 米。有几处瓦砾堆，说明已有人进行考古研究。在东北面，地面上散放着石柱残段和大量碎片。1868 年，一支英国考察队在附近登陆，曾发掘一些建筑物的遗址，但从那次以后进行的工作很少留下成果，只有帕里贝尼考察团 1906 年发掘出来的城墙和埃塞俄比亚考古研究所考察团 1961-1962 年间发现的那些遗迹还留存着。

1906 年初，瑞典人森德斯特龙曾在遗址北段发现一座庞大建筑物，此后不久，帕里贝尼又在东面和西面发掘出两处较小的建筑遗迹。这些建筑遗迹都有长方形的多层结构的基底，周围是一些附属建筑。森德斯特龙称他发掘出来的那一处为"宫殿"。这是一个长 38 米、宽 22 米的巨大建筑群，由此看来，它所占的面积比阿克苏姆那座城堡恩达西蒙还大，因为那座城堡的中央住所只有 35 米长。在基底上面，两排柱子把这座建筑分成纵长的三部分，另外两排柱子又以同样方式把它横切为三。这种长方形会堂式的设计说明它不是宫殿，而是基督教会的一座教堂。

帕里贝尼在西面发现的那个建筑物的地基也显示出同样的建筑特征。这个地基长约 18.5 米。上边覆盖一层铺筑材料，还有中殿支柱的残段。在东端，两个房间之间那个半圆形的

后殿充分表明，这是一座长方形教堂的废墟。这座建筑物的底层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结构，意大利考古学家称之为太阳祭坛。根据其它证据，我们现在可以认为这是一座属于更早时期的建筑物的遗迹，原先很可能也是一座宗教建筑，在它上面的长方形教堂是后来才修建的。

在森德斯特龙发现的那个建筑物以东，帕里贝尼还发现了另一座长 25 米的教堂的地基，上边有一个半圆形后殿的痕迹。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在后殿南边的房间里有一个供洗礼用的水槽，在建筑物中部是排成八边形的八根柱子的残迹。可见正方形和长方形的设计在同一座建筑物中结合采用。

在瑟纳费附近，阿斯马拉以南 135 公里的厄立特里亚高原上，有埃塞俄比亚最古老的遗址之一：其最低层属于南阿拉伯时期的一个庞大建筑物。

在 1959 至 1970 年间，埃塞俄比亚考古研究所有计划地发掘了马塔拉遗址，但至今仍有大量古物有待发现。属于阿克苏姆以前时期的地层仍然只限于探测深度，主要是因为在它们上面还有许多在建筑上有重要意义的结构。属于阿克苏姆时期的那一层大约有一半已经考察了。这些发掘工作揭出了四个大别墅、三座基督教堂、和一个约有 30 个房屋的普通住宅区。那四座别墅是人们现在熟悉的那种类型：在一个多层台阶的底座上有一个主要住所，周围是些小屋。和别处一样，埋在这一主要住所下面的石墩是为前厅的顶梁柱作基石用的。通向主要住所入口的那些台阶必然有带顶棚的门廊掩护：每段台阶角上都有窟窿，可能是安放木柱用的。

普通住房有两三间屋子，墙壁的平均厚度为 70 公分。壁炉、砖灶和大量容器使人们能够找到住宅的位置。

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房屋，其大小介乎别墅和普通住宅之间。这种类型的房屋同别墅的中心建筑有若干共同点——布局和台阶都近似。有理由认为这种建筑类型反映了社会存在等级制度。

368

这座城市以南和以东有巨大的宗教建筑，外观上和其它建筑十分相似：中央有一个大厅，周围是院子和附属小屋；建筑方法也一样。这些庞大建筑中的一座类似丧葬礼拜堂，很象阿克苏姆的卡莱布那座陵墓，不过没有那么大。其长为 15 米，宽 10 米。下面的地窖可经由 14 级的台阶进入。

城东另一座教堂——废墟明显分为四层，它在倒数第三层——有中殿和侧廊，侧廊以两排共八根柱子与中殿分开，这些柱子的基石仍然存在。后殿两旁各有一个房间，同中殿在一条轴线上，其朝向同所有这种类型的建筑一样。外墙长 22.4 米，宽 13.5 米。在教堂东侧、后殿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一个供洗礼用的水槽。水是通过墙外一系列连接在一起的陶管形成的一条导管沿墙引进来的。

这个遗址以南的瓜勒赛姆山上还有另一座教堂，但它的大部分墙壁已塌毁，布局已很难辨认。不过，一些用片岩铺筑过的地面和柱子基石的痕迹犹存，这个建筑物比较小。

科海托

这个遗址在马塔拉以北海拔 2600 米的高地上，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在建筑上很有意思

的废墟。十来个土堆散布在相当广阔的一片土地上，是属于阿克苏姆末期的大型建筑的遗址，很可能还有一些更古老的建筑物残迹。有几根柱子至今仍然竖立在土堆上。人们认为，大部分柱子属于同马塔拉的教堂大小相仿的一些教堂。所有这些小丘上的残墙都展示出阿克苏姆时代的石工特点。它们也是按照矩形图样设计的，和这个时期所见的其它遗址相同。其中有七套建筑容易辨认出来。除这些已毁坏的建筑外，在东北偏北方向还有一座用巨大石块建成的水坝，石块砌得整整齐齐严密无缝。它的作用是把水蓄在一般称为萨夫拉盆地的一个天然盆地东南边。这座水坝长 67 米，中段高约 3 米，这一段有两个以石块砌成的台阶，可从水坝顶部沿台阶通到水边。

由此往东有一个在岩石上凿成的墓穴，其中有两个拱形墓室。墓旁岩石上凿有一个阿克苏姆式十字架。

369 这个遗址附近的峡谷中，岩石上都画着或刻着牛、骆驼和其它动物。

城市和市场

大居民点——这个名称适用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地方和其它几个地方——形成人口稠密的社会。各家住宅鳞次栉比，聚集在为各种目的设计的大建筑物周围。阿克苏姆、阿杜利斯和马塔拉等地的出土文物表明，这些地方以前是真正的城市化居民中心。在马塔拉的普通居民区，在众多房屋之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窄胡同。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这里人口众多。他们的活动也不完全限于农业。铸币的存在说明经济已有发展。出土文物——如玻璃器皿和地中海的两耳细颈酒罐——的性质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工艺品诸如铜灯、各种金制品等表明，当时的人们并非不爱慕奢侈。

有一点应该注意：通常见到的那些建筑物或已发掘出来的那些建筑物大都属于阿克苏姆晚期。然而，还有些遗迹尽管并不都能断定其修建年代，但确实更古老，而较晚期的建筑物就是在它们的遗址上建造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这些建筑物属于不同时期，社会情况也不会有很大差别。在一世纪写的那本《红海回航记》的作者称科洛埃为“内地城镇”，并说这座城镇是“象牙的主要市场”。他把阿杜利斯描绘成一个集镇，说它的象牙是从“称作阿克苏姆的人的城市”得来的，象牙首先集中在这里。因此，阿杜利斯也必然是个集镇。而且，其他已城市化的居民聚居点也应该看作集市和交易地点，诸如阿拉图、托孔达、埃奇马雷、德贡姆、哈盖罗-德拉圭、亨扎特等等。当时的交易是否在这些城镇中进行还不能肯定；实际上，交易在郊外进行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古城镇四周并没有土围子。但迄今还没有找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证据。

阿克苏姆的建筑——一般特征

阿克苏姆建筑的主要特征是使用石料，布局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凸出部分和凹进部分有规律地交错着，在有多层台阶的底座上修建巨大建筑物。这种石砌建筑除泥浆外不用任何其他黏合剂。另外，引人注目的是这种独特风格实际上到处可以看到。前面已经说过，

所有主要的建筑物，无论是教堂或其它，都是同样的格式，都是建在多层台阶的底座上，常常是七级的坚固台阶，通向上面的建筑物。主体建筑周围是一些附属建筑物，中间以小院隔开。 370

可以肯定，这些巨大建筑物和别墅在底层以上至少还有一层，鉴于底层的高度，应该叫作第二层比较合适。由于这层的房间很小，里边又尽是些柱子，因此，很可能住室在更上面一层。阿克苏姆那些巨大建筑物是否有好几层，这个问题仍未解决。本世纪初，德国考察团一位建筑师曾尝试恢复这种建筑的原状，恩达迈克尔那座建筑的草图上画的主体建筑，四角的塔楼是四层。由于这一古建筑物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现在甚至比1906年更少)，因此，很难断定这种复原的尝试是否真正符合原来的形状；但根据照片和草图以及其他建筑物所体现的那种石砌工艺来判断，那些只以泥浆黏合起来的相当薄的石砌墙壁并不很牢固。因此，恩达迈克尔那座巨大建筑，或者任何其他大建筑是否有两层以上，是值得怀疑的。但那些特别坚固的建筑物也许有三层；设想会有三层以上就未免太牵强了。在六世纪，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在他著的《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一书中说，他在埃塞俄比亚（虽未具体提到阿克苏姆，但很可能去过那里）看到一座"有四座塔的宝殿"。这句简短的话虽然没有说出这些塔的位置，但指的却是高大的建筑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阿克苏姆人在建筑材料中增加了木料一项。门窗框架都是木料制成，在墙壁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在房间的四角石砌结构中也以木托梁加固。支撑楼上房间的地板或屋顶（可能是平的)的横梁当然也是木头的。有雕饰的石柱与横梁对接，使横梁两端突出，这无疑是当时建筑的习惯做法。

当时还有一种习惯做法，即尽量加固大建筑物的地基：在各个角上或其顶部安放长排长排的巨大石块。在阿克苏姆晚期的建筑中也曾使用这类石块。毫无疑问，阿克苏姆早期特别是三、四两个世纪那些建筑师很喜欢用巨大石块。石碑石柱和它们前面的巨大石板都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

独块巨石碑

阿克苏姆的石碑有好几种。在这个地区可以看到的许多石碑是加工粗糙的巨大石块，例如在栋古尔遗址南段的古迪特那些石碑就是这样。这些石碑散布在一片土地上，毫无疑问，在古代，这些石碑是为了标出坟墓。另一种石碑四面都很平滑，而且顶部呈弧形。有的高达20余米。这类石碑在各地都有发现，但在那个巨型石碑群附近最多。这个巨型石碑群共有七座石碑，碑上装饰性的雕刻引人注目，如今只有一座耸立，五座已倒坍破损。第七座已运往罗马，并于1937年竖立在卡拉卡拉剧院附近，至今仍巍然屹立。 371

石碑上雕刻模拟的是多层建筑。最高的那座石碑约33米，一侧雕的是九层建筑：是刻在硬石上的一所门、窗、梁接头等一应俱全的高大住所。这座想象的建筑物意义何在，人们一无所知。实际上，它和别处任何建筑都没有类似之处。其中一座石碑的三角形顶端刻着一些长矛。另一座石碑刻的不是建筑物，而是在两面倾斜的屋顶（假定它是屋顶）下边

刻着一面盾牌(假定它是盾牌)。以洞眼或钉子将徽记固定在碑上，但徽记今已无存，我们不知道原来是什么徽记，甚至也不知道后来是否加上去过。大概可以肯定，这些石碑是丧葬用的碑。但它们标志的究竟是哪位神，还是纪念哪一个人，这就很难说了。上边装饰所用的象征手法把整个问题神秘化了。石碑大小不同，可以认为这是反映不同社会地位，这种看法大概是不会错的。

大石碑前面那块巨大的石板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也同样琢磨不透。这些大石板至少最初是放在粗大的柱子上的。石板极大(长 13 米多、宽 6.5 米、厚 1.3 米)。这块石板必定是从数百米开外的地方运来的，设想这要花多大力量，就会使人惊叹不已。我们不知道这种大石块是从何处采来的。在阿克苏姆西边那座高山附近有一个古老的采石场，那里有大约 27 米长的一块巨石，当时正在进行粗加工。但我们并不能肯定这块巨大石板和雕刻的石碑是从两公里以外的采石场运来的。且不说运输问题，光是把这些巨石竖立起来就足以表明当时有一个很强大的集体组织。

在东部高原上的马塔拉和安扎，有两座约 5 米高的圆顶石碑，显示出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新月，这是南阿拉伯宗教的象征；另一个是盖埃兹语铭文。这种铭文带有纪念意义，至少在马塔拉是肯定无疑的。某些古字体因素表明，这些铭文早在三世纪或四世纪初就有了。这些独块巨石的工艺和阿克苏姆那些光滑石碑的相同工艺。

372 在阿克苏姆，还有另一种独块巨石。这些都是巨石平台。在马里亚姆齐翁宫殿附近那些巨大石碑所在地区可以看到有 12 个这样并列的平台。它们很可能是御座的底座。有些长 2.5 米以上，平均厚度为 40 至 50 厘米。表面中部呈喇叭形，上有洞眼，用来安放御座的四只腿。在马塔拉遗址上过去也有一个这样的底座。迄今已发现 27 块这样的独块巨石。

这些御座在阿克苏姆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埃扎纳的两篇铭文提到它们。在六世纪，科马斯注意到在阿杜利斯一座石碑附近有一个御座。“这个御座有一个正方形底座”，“是用最上等白色大理石制成的”，即“完全……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凿成的”。御座和石碑都“刻着希腊文字”。御座上刻的文字是大约在三世纪统治阿克苏姆的一位君主撰写的。这些石座意义何在尚不得而知。是采来纪念胜利的吗？是还愿时坐的吗？是象征王权的吗？它们和那些石碑一样都还是个谜。

在马里亚姆齐翁附近那些御座都是面向东方的，和石碑上有雕刻的那一面的方向一致。如果最初就是这样安排的，那就可能是为了朝向一座寺院，当时那座寺院可能就建筑在现在那座教堂所在地，如今那里还有许多废墟。

铭文本身刻在一种坚硬的花岗岩上。埃扎纳的一篇铭文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写的——埃塞俄比亚文、南阿拉伯文和希腊文，刻在一块两米高的石块两侧。

对巨型文物的爱好似乎也体现在雕像方面。本世纪初，在阿克苏姆发现一块扁平巨石，上面显示出凿成空洞的脚印，长 92 厘米。这块巨石原来可能是用作一座金属雕像的底座。埃扎纳那些铭文上说，他竖立的那些雕像是敬神的。其中有一篇写道：“为向生下我们的不可战胜的阿瑞斯神表示感谢，我们竖立起他的雕像，一座是金的，一座是银的，三座是青铜的，光荣是属于他的”，迄今尚未发现阿克苏姆这些雕像，不过考古调查还远远没有完成。已经发现一些用石料或金属雕成的动物，但寥寥无几。科马斯告诉我们，他“在皇宫

里"曾看到"四座铜制独角兽(无疑是犀属)雕像"。

陶 器

在阿克苏姆遗址发掘出大量赤陶器皿，有的已经破碎，有的依然完整。

这种陶器主要是实用的，有赤色的，也有赤褐色的，而以赤色的为主。许多陶罐外表 373 涂的是无光泽的暗色。有些陶罐是用石头磨光的，有些涂了红色泥釉。并无任何根据说明制罐时曾使用轮子。

这些器皿大小不等，从小小的杯子到50厘米高的大桶都有。罐、碗、壶、锅、盆和杯子并不总是有花纹的。如果有花纹，通常是几何图案，刻的、画的、用模子压印的都有。图案大都很简单，有花彩形、之字形、成组的圆盘形、格子形、螺旋形和条形等等。花纹很少取自自然物；只有几支谷穗，模压鸟或蛇。有些花纹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如在盆缘上模压纹章等。在器皿边缘、两侧或底部一再出现基督教的十字架。

高原东部出土的陶器和西部的不一样。我们在阿克苏姆地区发现一种边上有线状刻痕的器皿，但这种式样在高原东部很少见。在马塔拉出土的一只碗外缘下面有阳纹饰和棱线，在阿克苏姆地区至今仍未发现和它类似的东西，不过我们在这里却发现了一只呈人头状的带嘴的罐子，这在别处也还没有找到过。

近来的调查提供的情况使我们能够把找到的陶器按年代分类，但要注明确切年代，还必须做更多的发掘工作。

在各个遗址上阿克苏姆时期的地层里，还发现进口的陶器，主要是有把柄、边上有棱纹的罐子。这些两耳细颈酒罐来自地中海地区，在阿杜利斯也发现了很大一批。它们有时用来埋葬死婴，已证实在阿杜利斯、马塔拉和阿克苏姆有这种习俗。在阿克苏姆以前时期的地层中没有发现这类罐子的痕迹。在属于阿克苏姆时期的地层中还发现许多玻璃制的很小的管形瓶、普通瓶子和杯子的碎片，还发现阿克苏姆末期大多从印度洋进口的蓝釉器皿。(这些器皿出土时多半是破碎的，完整的很少。)还有看上去象陶制浮雕小杯子，大概是从埃及进口的。

在这些遗址上发现这样大量的陶器，说明当时消耗了大量木材。在古代自然界的树木一定比现在多。

一些特殊文物

在考古中人们还发现各式各样的文物，例如刻有几何图案或动物形象图章的石料或陶制的图章；各种金属制的小工具；陶制骰子；刀剑碎片；动物小塑像；与史前象征生育力 374 的形体相似的女人塑像等等。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在马塔拉发掘过程中发现的那盏青铜灯和一只贮藏珍宝用的盒子。

青铜灯的形状是在一根杆上托着一个椭圆形的碗，这根杆被做成传统风格的棕榈树的样子。碗上有一个圆形凸出部，上面画着一只有个脖套的狗，象是正在捕捉一只山羊的样

子。碗背面的浅浮雕似牛之头盖骨。这盏灯高41厘米；长31厘米。根据它所象征的东西来判断——似象征狩猎仪式，特别是由于有一个牛头——这盏灯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因为在那里也发现过类似的文物。

一些珍宝是在一个高18厘米的青铜盒子里发现的。这个盒子里有2个十字架、3条链子、1枚胸针、68个垂饰、64颗项圈串珠、14枚二、三世纪时古罗马皇帝（主要是安东尼皇帝）的铸币以及两个荷包。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用赤金制的，保存完好。从发现地点来看，这些东西必然是在七世纪前后收集在一起的。（这些古钱不能说明这个年代，因为其中除一个外，都带有环，说明都是当作装饰品用的。）

有时在阿克苏姆时期的地层中还出土我们纪元前五世纪南阿拉伯铭文和香料钵碎片。石料通常都已断裂，而且是阿克苏姆建设者再次使用过的。这些地层还出土少量从埃及或努比亚进口的东西，在豪勒提还有陶俑出土，据曾观察过这个遗址的H.德孔唐松说，这些陶俑“似乎和在印度见到的马都拉和笈多两王朝时期的那些陶俑有关”。同时他还指出：“我们纪元一、二世纪，恰巧是那些经过红海把印度和地中海联系起来的商人的全盛时期。”

古 钱

阿克苏姆铸币具有特殊重要性。有十八位国王的名字就是从这些铸币上才知道的。

已经找到的古币有好几千枚。在阿克苏姆周围的耕地里发现了许多古钱，特别是在雨季，雨水把泥土冲走后，发现的更多。大部分古钱都是青铜的，从8毫米到22毫米大小不等。上面铸着肖像，常常是头部和胸部，有的戴王冠，有的免冠。只有一枚上面铸的是国王坐在御座上的侧面像。

古钱上铸有各式各样的徽记。早期诸王如恩迪比斯、阿菲拉斯、乌萨纳斯一世、瓦泽巴、埃扎纳等佩戴的徽记都是日轮和新月。自从埃扎纳改宗基督教以后，铸的钱币上就都是十字架了，或在一面的中央，或在边缘那圈铭文之间。有些铸币上，国王的半身像位于两支弯弯的谷穗中间。而阿菲拉斯和埃扎纳时代的古钱中央只有一支笔直的谷穗，谷穗象征的可能是保证土地丰产的神。

375

古币上这些铭文都是希腊文或埃塞俄比亚文，从来不用南阿拉伯文。在最古老的钱币上就已经用希腊文了；埃塞俄比亚文只有在瓦泽巴时代才开始使用。铭文内容繁多，如“蒙上帝恩惠”、“祝愿人民健康幸福”、“让人民得到和平”、“他将靠基督战胜”等等。国王的名字当然也铸在上边，其头衔是“阿克苏姆万民之王”或“阿克苏姆国王”。

这些钱币上没有注明年代，因而在分类时，就引起许多揣测。最古老的那些——可能是恩迪比斯统治时期铸造的——不会早于三世纪。铸有哈塔扎名字的最晚的那些钱币是从八世纪就有的。

文字和语言

埃塞俄比亚于我们纪元前五世纪使用的那些最早的字母属南阿拉伯类型。它记下的语言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闪米特方言类似。

阿克苏姆文字虽然和阿拉伯半岛南部这种文字不同，但也是由它派生出来的。

名副其实的埃塞俄比亚文字起源于我们纪元二世纪。在形式上它们都是辅音。字体仍类似南阿拉伯文,但已经逐渐发展成自己特有的形式。书写的方向也慢慢固定下来,起初是左向右向都有，后来就都从左向右了。第一批铭文是刻在片岩版上的。篇数不多，每篇字数也只有几个。最早的铭文是在厄立特里亚的马塔拉发现的。还发现一篇三世纪时刻在金属物体上的铭文，其中提到加达拉国王。这是已知的刻有阿克苏姆这个名称的第一篇埃塞俄比亚文的铭文。其他铭文都刻在石头上。埃扎纳国王那些大铭文属于四世纪。划分音节就是在这些大铭文上首次出现的，不久就成了埃塞俄比亚文字的规律。声母体系中已加进元音符号，用以表示口语中不同的音调。

根据铭文来看，这种语言就是盖埃兹语。它是闪米特语系南支的一种。这就是阿克苏姆人使用的语言。

在阿克苏姆时期南阿拉伯文和希腊文字体也在使用,不过并不普遍。六世纪卡莱布和他的儿子瓦泽巴的那些铭文中仍然发现有南阿拉伯的字体。圣经被译成盖埃兹语约在五世纪。 376

阿克苏姆文明的兴起

我们纪元前五世纪，以南阿拉伯影响为标志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明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高原上成长起来。它基本上是一种农业文明，在我们纪元前四、五世纪颇为昌盛，以后几个世纪趋于衰落，由于目前考古资料缺乏，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判断。但其文化并未消失。阿克苏姆文明的某些特性仍然保存下来。语言和文字的某些特点、宗教徽记，一位神的名字(在埃扎纳的一篇铭文中阿斯塔尔这个名字仍然出现)、建筑和农业传统（其中之一可能就是摆动犁的使用）等等都说明在我们纪元最初几个世纪，古代遗产仍然有生命力。还值得注意的是，尤其是在东部高原上，大部分阿克苏姆建筑物是在阿克苏姆以前那个时期那些建筑物的遗址上。这说明具有连续性。

然而，在考古中发现的我们纪元最初几个世纪的一些文物却有许多新特点。铭文上使用的文字虽是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文字派生出来的，但显然已经起了很大变化。宗教也已改变。除了阿斯塔尔神的名字之外所有古代的神名已全部消失。在埃扎纳铭文中它们已由马赫雷姆、贝赫尔和米德尔并列的三个神名取代。建筑物虽仍有使用石料和木料并具有多层台阶形底座等特色，但已显示出各种新的特点。陶器在工艺、形状和图案装饰方面都已大不相同，而且还发现外国陶瓷，在各遗址上还出现玻璃器皿。在以前一直只有村庄的地方，这时小镇和城市已发展起来。阿克苏姆这个名字在这个时期的历史记载中首次出现，这个遗址在一世纪以前似乎并无任何引人注目的古代文明，这一点也许很值得注意。

经济因素

在阿克苏姆时期也象在过去那些世纪那样，农业和畜牧业是经济生活的基础。但在阿克苏姆时期，这方面的发展已具有鲜明的特色，这无疑是由下述两个因素促成的。

第一个因素是航海技术的发展。一切古代史料都表明，在一、二世纪，红海的海上贸易已发展起来。这是由于古罗马人在这个地区扩张的结果，而航运事业取得的进步则促进了罗马人的扩张。我们知道，在一世纪初，航海方法已有改进。领港员希帕勒斯指明了水手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各个风向，这无疑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斯特拉波记载，"在奥古斯都时代，从苗斯霍尔莫斯启航的船只每年已达 120 艘之多。"

其次，商业上的往来成倍增加。船只运来货物，这样就有可能与印度、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阿杜利斯既是海上贸易的中心，也是内陆贸易的中心(这是第二个因素)。在内地，一种极其昂贵的商品——象牙——的买卖日益兴隆。事实上普林尼和《回航记》的作者把象牙列为阿杜利斯最重要的出口货物。阿克苏姆是各地区象牙最大的集中地。象牙是爱好奢侈品的罗马人必不可少的东西。早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塞俄比亚大象就已经视为珍宝。军队把它用作类似坦克的武器。后来人们捕猎大象是为了取得象牙。古代作家只要谈到阿杜利斯、阿克苏姆或埃塞俄比亚(东非)，就一定把大象和象牙放在突出地位。他们虽然也提到别的东西，如河马皮、犀牛角、龟壳、黄金、奴隶、香料等等，但总是对大象特别感兴趣。据《回航记》说，大象和犀牛一样，生活在内地，但有时人们也能"在阿杜利斯附近沿海一带"捕到大象。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农诺修斯曾访问阿克苏姆，路上看见五千只的象群。科马斯记述说，有"一大群长着很长象牙的大象。这些象牙从埃塞俄比亚装船运到印度、波斯、东罗马帝国以及希姆亚尔人的地方"(见《基督教诸国风土记》, XI, 33)。1962 年，埃塞俄比亚考古研究所考察团在阿杜利斯遗址上发现阿克苏姆时代的一只象牙；1967 年，他们在栋古尔古堡的墙壁里发现陶制象俑残片。

非洲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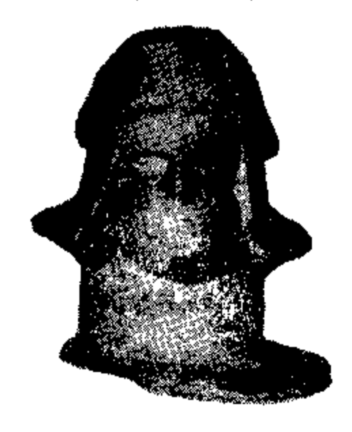
阿克苏姆文明是在我们纪元最初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但其根源远在史前时期。早在我们纪元前最后 500 年间的文化中就已出现它的萌芽。考古工作者正试图弄清它的特点，但对这个题目至今所调查的只有几个方面，古代资料的分类编目工作还很不完全。当前主要任务是弄清哪些是受外来影响，哪些真正是本地固有的。和其它各国文明一样，阿克苏姆文明也是在地理条件和历史环境影响下演变而来的，当地作出的贡献自然十分重要。这是因为，阿克苏姆文明无疑首先是这个民族自己的产物，它的民族特性通过对它的铭文、语言和传统的研究已渐渐显示出来。考古工作正逐步揭示阿克苏姆物质成就的独特性。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将来的研究工作将集中在阐释这些出土文物的重要意义方面。但我们已经知道，阿克苏姆文明的特殊性来源于非洲本土。

(刘英芳译)


图片 14.1 飞机上拍摄的阿克苏姆圈

379

图片 14.2 瓶颈



图片 14.3 阿克苏姆时期刻在一块岩石上的雌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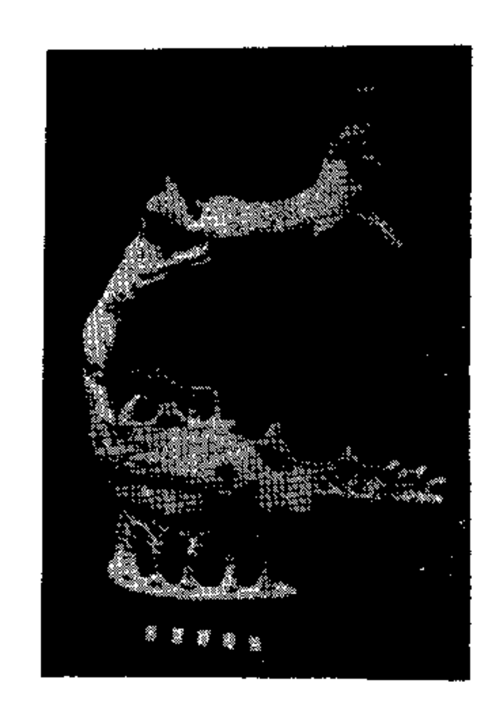



图片 14.4 御座底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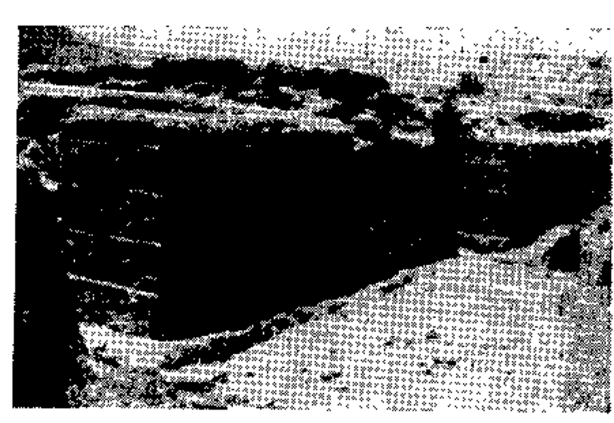
380



图片 14.5 象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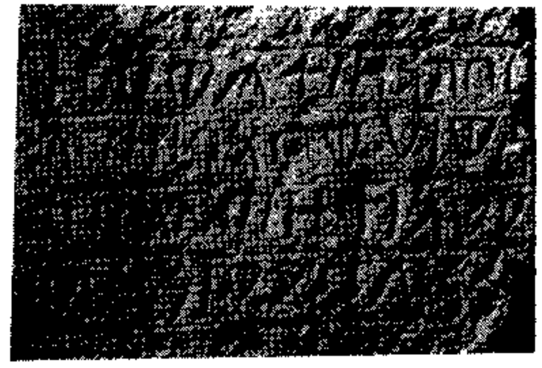
图片 14.7 亚历山大式的香盘



图片 14 8 在马塔拉发现的阿克苏姆建筑物的基石



图片 14.6 我们纪元三世纪马塔拉的铭文



15 阿克苏姆的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一至四世纪）

381

Y.M.科比沙诺夫

据二、三世纪的史料记载，非洲一个新国家阿克苏姆迅速兴起。克劳迪乌斯·托勒密（大约生活于二世纪中叶）首先提到阿克苏姆人是埃塞俄比亚诸民族之一。他知道有麦罗埃和阿杜利斯这些城市，但不知道阿克苏姆城。提到非洲东北部的情况，与三世纪一位希腊-腓尼基作家赫利奥多罗斯写的那本小说《埃塞俄比亚记》里的情况相类似。赫利奥多罗斯描写阿克苏姆使节的到来，并非以臣民和属国的身分，而是以麦罗埃国王的朋友和同盟者的身分来的。人们可以在《红海回航记》一书中找到从我们纪元105年以前至三世纪初各个不同时期的资料。这部书提到“所谓阿克苏姆人的都城”，说它是一个人们很少知道的城市，它的统治者佐斯卡勒斯（显然是阿克苏姆诸王世系表中的扎希卡希）的王国新建立不久。佐斯卡勒斯统治着厄立特里亚全部红海沿岸地区，但贝札大沙漠的霸权属于麦罗埃。这两个国家——麦罗埃人的古老的都城和阿克苏姆人的新建的都城——势均力敌的情况，和赫利奥多罗斯小说中所说的相符。《回航记》并未提到阿克苏姆人向阿拉伯半岛南部扩张领土的情况。提到扩张的最早史料是二世纪末和三世纪初萨巴人的铭文。它们记述了“阿比西尼亚人”即阿克苏姆人在也门打仗并占领也门一些领土的情形。在183年至213年间，阿克苏姆王加达拉和他儿子似乎是阿拉伯半岛南部最强大的统治者，也是反萨巴同盟的真正领袖。在三世纪末四世纪初，“一位阿克苏姆国王阿兹巴也曾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发动战争”。①

后来，希姆亚尔人统一了这一带地方，但阿克苏姆诸王仍自称是他们的君主，这一点在他们的头衔上就可看出。

383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战争在阿克苏姆国王（他们的姓名和统治年代不详）的两篇希腊文铭文中也有记载。较长的那篇铭文曾在六世纪中叶由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抄录下来。铭文作者曾征服也门沿岸地区“直至萨巴人的领土”，以及“从埃及边区到索马里香料产区”的非洲大片土地。②

大约到270年时，这个新国家的名声已经传到波斯。先知摩尼（216-276年）的《基发拉亚》称阿克苏姆为世界四个最大的帝国之一。

---

① 《铭文研究所闪米特语碑铭全集第四部，1889-1929》（雅姆（A.Jamme），1962年）中的主要铭文；雷克曼斯（G.Ryckmans），1955年，1956年。关于这些铭文的意见可参看G.雷克曼斯著作，1964年。关于对事件的记载，还可参看冯·维斯曼（H.von Wissmann）的著作，1964年。关于年代编排可参看郎代恩（A.Loundine）和G.雷克曼斯著作，1964年。

② 温斯太特（E.O.Wistedt），第74-77页。



萨珊帝国（阻塞了经波斯湾与亚洲的交通）

萨珊的扩张（以拜占庭为牺牲品）

穆斯林扩张领土以前的阿拉伯半岛居民区，在这个地区拜占庭和波斯争夺贸易控制权和政治霸权

通过红海（包括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亚洲和地中海地区的贸易

插图 15.1 阿克苏姆扩张图

阿克苏姆是靠什么资源和组织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

生产事业

阿克苏姆人大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实际上和今天提格雷农民的生产类型相同。山坡都修成梯田，把山上的溪水引入田中灌溉。在丘陵和平原上修建水坝和水池储存雨水，并挖掘灌溉沟渠。铭文中说那时种植的是小麦③和其他谷类，还种植葡萄。用牛拉犁耕地。畜养大群的牛、绵羊和山羊，其他家畜有驴和骡子。和麦罗埃人一样，阿克苏姆人也学会捕猎并驯养大象，但这些象都是留给宫廷使用的④。据铭文记述，食物中包括麦面大饼，大麦酒．葡萄酒，蜜酒，蜂蜜，肉类，黄油和植物油。⑤

各种手艺工匠如铁匠和其他金属匠、陶工、泥瓦匠、石匠和雕刻匠等都已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最重要的技术创新是铁器的使用，和我们纪元前第一个千纪比较，铁器已很普遍，从而必然促使农业、手工业和军事科学进一步发展。另一项创新是建筑中采用一种具有粘合和凝固作用的胶液，从而导致石木结构建筑的发展。

政治结构

起初阿克苏姆可能只是一个封邑，经过一个时期之后逐渐变成封建王国的首都所在地。历史使阿克苏姆的统治者面临多种任务，其中最迫切的一项就是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那 384 些各自为政的地区建立统治权，并把它们统一在一个王国之内。这项事业能否成功要看阿克苏姆统治者的力量如何，能否超过古埃塞俄比亚其他王公。当时的情况是，有时一位新统治者初登上王位就不得不在全境进行讨伐，迫使诸侯至少做到形式上的顺从。虽然一位不知姓名的阿克苏姆国王曾经采取过这种行动，并曾建起阿杜利斯纪念碑，但在埃扎纳开始统治时，又不得不重新采取讨伐行动以树立权威⑥。

王国的建立成为建立帝国的基础。从二世纪末至四世纪初，阿克苏姆一直参与阿拉伯半岛南部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斗争。此后阿克苏姆人便征服了提格雷高原和尼罗河流域之间的广大地区。在四世纪，他们征服了那时业已衰落的麦罗埃王国。

一个大帝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其版图包括埃塞俄比亚北部、苏丹和阿拉伯半岛南部那些肥沃的耕地；居民包括居住在罗马帝国边界以南、西至撒哈拉大沙漠东至阿拉伯半岛内陆的鲁卜哈利沙漠之间各国的所有民族。

这个帝国分为阿克苏姆本部和它的那些附庸王国。这些附庸国的统治者都是万王之王的阿克苏姆王的臣属，向阿克苏姆王纳贡。希腊人称阿克苏姆君主为皇帝（只有阿萨纳修斯大帝和菲洛斯托吉斯称他为暴君）；各附庸国王称为执政，僭主和总督。叙利亚作家如

③ 《德国阿克苏姆考察记》4:21；6:10；7:12；利特曼(E. Littmann)，1910-1915年；德鲁斯(A. J. Drewes)，1962年，第30页起。

④ 丁多夫(L.A. Dindorff)，1831年，第457-458页；E. O. 温斯太特，第324页。

⑤ 《考察记》4:13-21；6:7-11；7:9-13；A. J. 德鲁斯，1962年，第73页。

⑥ E.O. 温斯太特，第72-77页；《考察记》8:9。

以弗所的约翰，贝特－阿萨姆的西梅翁和《希姆亚尔人之书》的作者等人以“王上”(mlk')称呼阿克苏姆“万王之王”，对他的臣属希姆亚尔国王和阿勒瓦国王也这样称呼。但在阿克苏姆语中都称为“涅古斯”(negus)。只有在特殊场合写给外国人看时，才使用不同的头衔⑦。每个民族，王国，诸侯国，城市和部落都有自己的“涅古斯”⑧。还曾提到军队的诸“涅古斯”(nägasta säräwit)(《考察记》9:13)。这些“涅古斯”除在战时带兵打仗外，平时担任建筑施工的指挥⑨。在这些“涅古斯”中，铭文中提到贝加人四个部落国王的名字，每人统治大约1100多位臣民(《考察记》4:19-22；6:7-17；7:6-18)，而阿加博公国统治者手下的臣民不超过200至275名成年男子，或总数1000-1500人。那些附庸国位于提格雷高原和祖拉湾地区(如阿加戈、梅廷、阿加默等等)，或在特克泽河对岸(如沃尔加伊特、萨门、阿高)，或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周围的干旱地区(阿圭扎特)，还有的在阿拉伯半岛上。埃扎纳战胜以后，附庸国扩展至上努比亚第四瀑布和散纳尔之间。某些附庸国王(例如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和上努比亚)，还有自己所属的附庸，他们都是更低一级的世袭统治者。于是，上至阿克苏姆的众王之王下至分散的村社首领，一种宝塔式的权力等级制就这样形成了。

有两种征收贡赋的方式：或者是由附庸国统治者(如希姆亚尔王阿布拉哈)每年把贡赋送到阿克苏姆，或者是阿克苏姆王在众多扈从陪同下巡视四境，收集贡赋和沿途食用的东西。各附庸国王也在自己境内如此办理。还有一种折中方式，就是由各附庸国把贡品送到国王沿路指定的地点上缴。

关于阿克苏姆的行政管理体制，史料没有记载，看来这方面的发展还很不完善。国王的近亲在指导国务方面担任重要角色。由此可以理解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二世的信，为什么不只是写给埃扎纳，而且也写给他弟弟赛扎纳⑩。军事讨伐通常都是由国王、他弟弟⑪或其他亲属指挥。⑫由军队诸王统辖的次要部队，其成员是来自各村社或部落的武士；阿克苏姆国王所说“我的子民”和“我的部队”是同义语。⑬

阿克苏姆统治者沿边疆部署好战的部落定居；阿比西尼亚人在阿拉伯半岛南部⑭；贝加人的四个部落在马特利亚地区或在伯恩地方(可能位于贝根德地区)(《考察记》4,6,7)。而且，众王之王显然有一支武装扈从听他调遣，平时由宫廷成员组成，战时由他的卫队组成(类似十四世纪埃塞俄比亚的情况)。显然，宫廷官员执行政府职能，例如充当使者。已

⑦ 例如，埃扎纳的两种语言铭文的希腊文正文中(《考察记》4，6，7)，阿克苏姆统治者被称为阿克苏姆人之王和其他称号外，还被尊为万王之王，而贝札诸统治者则被称为小王。在仿萨巴文正文中，阿克苏姆国王是以来自萨巴语的字——mlk，mlk mlkn——称呼的，而那些贝札统治者则以源于埃塞俄比亚文的字——nägašt——称呼。在记载埃扎纳讨伐努比亚的那篇希腊文铭文中，他只称自己为国王，而不是万王之王。这可能是由于和他的外交政策有关的一些原因(卡科〔A.Caquot〕和诺丁〔P.Nautin〕，270-271页)。但这个头衔本身就表示很高的地位，甚至还曾这样称呼罗马－拜占庭诸皇帝：《考察记》9,13——nägaštat Sarawit。

⑧ 《考察记》8:7-12，27，29；9:9-12；11:36；A.J.德鲁斯，1962年，30页起，65-67；施奈德(R.Schneider)，1974年，第771、775页。

⑨ A.J.德鲁斯，1962年，第65页；瓦西里耶夫(A.A. Vasilyev)，第63-64页。

⑩ 米涅(J.P.Migne)，第635页。

⑪ 《考察记》4:9；6:3；7:5。

⑫ 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第275页。

⑬ 《考察记》9:12-34；10:9-10，23；11:18，30-35，37-38；卡科(A.Caquot)，1965年，第223-225页；R.施奈德，1974年，第771、774、778、781、783-784、785页；《考察记》4；6；7。

⑭ 普罗科匹厄斯，第274页；莫贝格(A.Moberg)，第105页；《圣·阿雷撒殉难记和黑人文明社会》，圣徒学报10月号，T.X.，布鲁塞尔，1861年，第7页；G.雷克曼斯著作，1953年。

经希腊化的叙利亚人艾迪修斯和弗鲁门蒂乌斯，先前曾是王家奴隶，后被提升，一位当了斟酒官，另一位提升为阿克苏姆王的秘书和财务官。[15]

我们对这个王国的历史知道得太少，无法查出它的政治制度发展的情况。不过，可以这样说：在阿克苏姆王朝兴盛时期，它的政治机构中出现了某些集权化过程。在四世纪，埃扎纳的活动集中在降服或俘获那些叛乱的附庸国世袭统治者。但到六世纪时，阿克苏姆国王已经在任命阿拉伯半岛南部诸国的国王了，如希姆亚尔的马迪卡里卜和苏马亚·阿斯瓦，纳格兰的伊本·哈里斯(圣阿雷撒之子)。而且，万王之王还在各附庸国建立武士定居地，使他们的指挥官直接听命于阿克苏姆。

关于这个王国通行的共同法律准则，可研究阿克苏姆最早的司法文献，即萨夫拉的四种法律(德鲁斯，第73页)。

商业和商业政策

阿克苏姆王国在世界贸易中是第一流的贸易大国，它自己铸造金、银、铜币就足以证明。它是热带非洲第一个铸造金属货币的国家；任何附庸国，甚至象希姆亚尔和阿勒瓦这样的国家都没有铸币。铸造货币，尤其是铸造金币，不仅仅是经济措施，也是一项政治措施，它向全世界宣告阿克苏姆是独立和富强的国家，还把它那些国王的姓名和统治的格言公诸于世。第一位把自己的金属货币投入流通的是阿克苏姆国王恩迪比斯(三世纪后半叶)。阿克苏姆的货币制度类似拜占庭的制度。在重量、成色和形状方面，阿克苏姆货币和同时期的拜占庭货币基本相同。

在生产方面，虽然为国内消费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阿克苏姆的生产和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而且是由政治上层建筑加以维持的。从罗马-拜占庭作家的记述中可以找到阿克苏姆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出口项目的一般情况。普林尼曾提到从埃塞俄比亚的红海港口输出黑曜岩、象牙、犀角、河马皮、猴子和奴隶。《回航记》曾列举从阿杜利斯输出的货物，其中包括海龟、黑曜岩、象牙和犀角。农诺修斯曾提到金砂是阿克苏姆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出口项目之一。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曾记述香料、黄金、象牙和活牲畜从埃塞俄比亚运往海外，还曾记载阿克苏姆人从努比亚沙漠地带的布勒米人那里得到绿宝石，并把这些宝石运往印度北部出售。他还宣称他自己曾在埃塞俄比亚买到一支河马牙。[16]

387

上面列举的商品，除黄金和绿宝石外，只能以射猎、诱陷和采集等办法得来。农产品和乳制品以及由工匠和手艺人制造的货品都未提到。假使有这类货品出口，数量也必然很有限，运往的地点一定在罗马-拜占庭帝国境内。著名的埃塞俄比亚小麦可能输往邻国，尽管这方面最早的、极其模糊的报道迟至十世纪才出现。与此相反，根据《回航记》的记载判断，阿杜利斯曾输入某些食品，如少量的劳迪塞(叙利亚)和意大利葡萄酒和橄榄油；非

⑮ 蒙森(T. Mommsen)，第972-973页。

⑯ 科马斯的《红海回航记》，3-6；E.O. 温斯太特，第69、320、322、324、325页；L.A. 丁多夫，1870年，第474页。

洲之角各港口从埃及输入谷类、酒类和新城迪奥斯波利斯的葡萄汁；从印度输入小麦，大米，博斯莫(bosmor)，芝麻油和甘蔗。显然，这些货品中有一些(如甘蔗)也曾运到阿杜利斯。⑰

在那个时代，向较远的国家输出牛是办不到的。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告诉我们说，阿克苏姆人在和萨苏贸易中曾供应公牛、食盐和铁。萨苏有金矿（显然是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但科马斯的记载中偶尔以一块肉换一些金块的事必然是根据广泛流传的故事写的。⑱一些零散资料提到在阿拉伯半岛发现阿克苏姆的金属制品，包括一盏雪花石膏灯，⑲一些金属货币和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化以前的一位诗人拉拜德⑳在《悬诗》中提到的一杆桑哈拉长矛。

关于阿克苏姆进口的外国工匠制品我们知道得更多些。《回航记》谈到佐斯卡勒斯国王领地的情况时说：

> 他们把埃及制造的粗糙而无皱褶的棉布制的披身运到那些地方卖给野蛮人，还有在迪奥斯波利斯制造的染色战袍仿制品，两边都经过修饰的毯子，用透明玻璃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器皿，其它用釉料泥模压成的亚宝石容器，以及黄铜……紫铜……铁。除其他东西外，还运来小斧，板斧，刀，大圆铜碗，为住在这里的外国人用的一些第纳尔*，少量劳迪塞和意大利的酒和橄榄油。他们运来供国王使用按本地式样制造的金银器皿。他们运来的外衣如战袍和带兜帽的外套等价格并不很贵。他们从〔印度中部〕阿里阿卡内地运来印度铁和钢以及棉织品（特别是布面较宽、比较粗糙的名为莫洛希纳和西格马托黑纳的布料）；腰带、斗篷、少许莫洛希纳亚麻布的衣服和类似清漆色的布料。

388

阿克苏姆时期的埃塞俄比亚运进来的货物中，某些品种可能未列入上这张清单。例如，据《回航记》记载："少量的锡"、一些玻璃器皿、束腰外衣及"蛮族所爱好的各种毛制披身"、阿西诺伊毛料斗篷、各种埃及产品都曾运抵非洲之角各港口。阿拉伯半岛南部㉑穆扎（穆哈）出产的铁器和玻璃制品运到阿扎尼亚。

若干年后，进口的总趋势改变了。至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罗马皇帝发布命令，禁止贵金属、铁和食品"输往希姆亚尔人和阿克苏姆人"，㉒这使罗马-拜占庭帝国输往阿杜利斯的货品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到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阿克苏姆同盟期间，这些限制略有放松。禁止运出罗马帝国边境的那些货物，阿克苏姆人只得从其他地方取得。

总的看来，考古中取得的材料证实并补充了《回航记》的各种记载。从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阿克苏姆、阿杜利斯和马塔拉的地层中发掘出来的文物，以及在哈维拉-阿瑟劳（在阿斯比-代拉地区）和德卜勒-达莫发现的东西，有许多并非埃塞俄比亚本地的物品，其中有一些必然是通过贸易来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外国货品来自罗马-拜占庭帝国，特别来自埃及。其中包括双耳细颈壶，显然是用以盛酒或油的；玻璃器皿碎片，金饰和以罗马银币

⑰ 科马斯的《回航记》，6,7,17。
⑱ E.O.温斯太特，第71-72页。
⑲ 格罗曼(Grohmann)，1911年，第410-422页。
⑳ 拉拜德·伊本·拉比亚(Labid Rabi'ab)，第74页。
㉑ 科马斯的《回航记》，6,7,17。
㉒ 《西奥多修斯法典》(Codex Theodosianus)，XII，2，12。
* 此处指古罗马银币。——译者注

制成的项链(在马塔拉发现的)，一块美玉(在阿杜利斯发现的)，铜制灯具和一架铜天平及其法码(在阿杜利斯和阿克苏姆均有发现)。[22]

还发现一些产自印度的物品：在阿杜利斯发现一枚图章，[23][24] 在阿克苏姆发现赤陶小塑像，[25] 在德卜勒-达莫发现我们纪元200年以前库沙纳几位国王统治时期的104枚金币[26]，在厄立特里亚偶然发现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化以前的银币和铜币，在阿克苏姆进行的发掘中也发现了这些东西，[27] 在马塔拉发现一盏铜灯。[28] 发现麦罗埃的多种手工艺品：许多地方都发现陶器碎片，在阿克苏姆发现哈索和普塔的彩陶护身小塑像，在马塔拉发现以肉红玉髓制成的荷拉斯小雕像，[29] 在哈维拉-阿瑟劳发现刻着荷拉斯骑鳄鱼的石碑(见于阿克苏姆，十八世纪时詹姆斯·布鲁斯曾作说明[30]) 和一些铜碗。[31] 这些物品中有些可能是通过贸易渠道由苏丹进入埃塞俄比亚的，但大多数很可能是战利品或贡品。阿克苏姆人需要的棉制品和铁，相当大一部分可能来自麦罗埃地区。其他非洲国家送到阿克苏姆的黄金产自萨苏或许还有贝札。薰香和香料是索马里北部出产的。 389

阿克苏姆人把非洲东北部广大地区统一起来之后，他们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罗马、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商人以这些阔人为主顾出售他们的奢侈品，大发其财。

上文谈到以化名阿里亚努斯出版的那部《回航记》中列举的货物当中，有些是特为阿克苏姆国王专用的。三世纪初，外国商人显然不得不按其财富大小向阿克苏姆国王和阿杜利斯统治者奉献相应的礼品。在那位化名的阿里亚努斯在世时，这类礼品包括一些"不太值钱的"金银器皿、"仿制的粗糙"战袍和带兜帽的外套。有意思的是，在524年前后，亚历山大大主教送给阿克苏姆王一件银制容器。[32] 阿克苏姆宫廷日益增长的财富和铺张奢侈的习惯(根据科马斯、约翰·马拉拉斯和农诺修斯等人的记述)意味着将出现质量更高、更值钱的礼品。这时很可能已经建立起关税制度。

强大的阿克苏姆王国的建立自然会带来利益，它不但使贵族富裕起来，而且使享有特殊地位的当地整个阿克苏姆社会集团即首都的市民阶层全都富裕起来。《回航记》中列举的那些货品是为居民中广大阶层进口的。由当地工匠以进口的黄铜制成的手镯，以进口的铁制成的长矛和供当地使用的其他金属制品，以及用外国纺织品制成的衣服，都成为当地市场上有销路的商品，经过这样的加工使城乡居民都可买到。最后，外国商人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在阿杜利斯、阿克苏姆和埃塞俄比亚各城镇定居下来，带来成批进口物品。酒类和橄榄油就是在这批人中畅销的。出土物品如天平和法码，图章，罗马和库沙纳铸币，显然都是曾住在阿杜利斯和阿克苏姆的罗马-拜占庭和印度的商人们留下的痕迹。《回航记》清 390

㉓ 安弗雷(F.Anfray)，1972b；F.安弗雷和安尼昆(G.Annequin)，第68页；德孔唐松(H.de Contenson)，1963c，第12页，图片20；F.安弗雷，1972b，第752页。

㉔ 帕里贝尼(R.Paribeni)，插图49。

㉕ H.德孔唐松，1963c，第45-46页，图片47-48a-c。

㉖ 莫尔迪尼(A.Mordini)。

㉗ 高迪奥(A.Gaudio)，第4-5页；H.德孔唐松，1963c，第8页，图片14；第12页，图片14。

㉘ F.安弗雷，1967年，从46页起。

㉙ H.德孔唐松，1963c，第43页；勒克朗(J.Leclant)，1965c，第86-87页，图片67，1。

㉚ 范·德瓦勒(B.van de Walle)，第238-247页。

㉛ 多雷斯(J.Doresse)，1960年，第229-248页；A.卡科和J.勒克朗，1956年，第226-234页；A.卡科和A.德鲁斯，第17-41页。

㉜ 《圣阿雷撒殉难记和黑人文明社会》，圣徒学报，10月号.24，安特卫普，1861年，第743页。

楚指明，把"第纳尔"带到阿杜利斯是特为住在那里的外国居民使用的，也就是说，既不是专为罗马臣民、也不是为非洲人使用的。众所周知，罗马货币流入阿拉伯半岛南部、印度、锡兰以及其他东方国度数量之大已达灾难性程度。带来"第纳尔"的外国人可能是从印度、锡兰和阿拉伯半岛来的商人。和阿克苏姆王国进行贸易的人，据阿拉伯传说，有来自麦加的巴努-库莱什人，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谈到有来自索科特拉岛的居民，"化名的卡利西尼斯"提到有印度人。六世纪初和埃塞俄比亚进行贸易的海外城市和国家，可从525年夏进入埃塞俄比亚海港加巴扎的船只数目来判断其重要地位。进港船只数目可在《阿雷撒殉难记》[33]中找到，N.V.皮古莱夫斯卡娅对它作过细致的分析。[34]有9只船据说是"印度的"（"印度"一词可有各种不同的解释）。7只船是从大法拉桑岛来的，这个岛上住的是法拉桑人，他们是阿拉伯半岛南部信基督教的部落，在红海贸易中居领先地位。15只船来自巴勒斯坦的埃拉特，该地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港口。22只船来自埃及各港——20只来自克利斯姆，只有两只来自贝雷尼塞。另有7只来自伊奥塔巴岛（西兰）。据可靠了解，前往阿杜利斯或阿克苏姆的罗马公民都是在埃及或叙利亚出生的。

和外商打交道的主要承包人是阿克苏姆历代国王和王国内部分据各地的、特别是阿杜利斯和阿拉伯半岛南部那些附庸。掌握大量出口货物的就是这些人。那时，在这个王国里，也象阿拉伯半岛南部和拜占庭帝国那样，可能存在贸易垄断。如猎象和出售象牙与黄金很可能大部分是由统治者垄断的。在阿克苏姆，只有国王和诸执政拥有足够的财富买外国货。

统治者占有大批畜群。埃扎纳的碑文曾提到阿克苏姆人对阿凡和努比亚那两次讨伐所获的战利品，总共有牛32,500头，羊51,000余只以及好几百头驮畜。至于这些东西指的究竟是全军所获战利品，还是国王分得的那一份，就不太清楚了，看来后一种说法可能性更大些。关于贝加四个部落重新定居的那些碑文中说，埃扎纳宣称他曾赐给他们25,000头牛[35]，这个数字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国王自己的牧场上集中了多大数量的牲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碑文记载的每笔数字都是先写文字后写数字，正如近代写法一样。可能在阿克苏姆时代，宫廷设立了掌牧官(sahafeh am)，一直到十四世纪，某些省的省长还保留这一光荣的官衔。

391

在阿克苏姆，象在古代非洲其他王国那样，畜群是一种财富，但把这种财富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却极端困难。尽管阿克苏姆人曾设法把个别牲畜、甚至属于阿布拉哈军队的一些大象装船外运，但在海上有计划地大批出口畜群是做不到的。把牛群赶到非洲内陆卖给当地居民当然是可以的——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曾谈到阿克苏姆商队把牛群赶到萨苏——但这些牲口很大一部分无可避免地要在运输途中充饥吃掉。

在那几个世纪中，只有对一种商品的需求从未减少，这就是奴隶。埃扎纳的碑文和有关阿克苏姆-希姆亚尔历次战争的史料都曾提到在战争中抓获的俘虏，外国奴隶贩子把他们看作受欢迎的商品。作为战利品夺得的黄金和白银，或由努比亚、贝札、阿高、希姆亚

---

[33] 《圣阿雷撒殉难记》，第747页。
[34] 皮古莱夫斯卡娅(N.V. Pigulevskaya),1951年，第300-301页。
[35] 《考察记》10：17-22；11：43-44；4：13-15；6：7-8；7：9-10。

尔和其他各国进贡的金银，由商队从萨苏运回，铸成货币，用来支付国王和贵族购买外国货的价款。

阿克苏姆的工业虽然未能制造大量可供出售的货物，但农畜产品十分丰富，可供商船和商队输出。由此看来，他们不但为国内消费提供粮食和商品，而且还可以和其他国家进行一些贸易。

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在记述萨苏如何把自己许多金矿中取得的黄金供应阿克苏姆时讲到阿克苏姆人组织商业活动的大致情况："年复一年（也许是两年一次?），阿克苏姆国王通过阿高执政官派人去把黄金取回。许多人为了同样目的和他们同行，因此，这些人加在一起可能超过500。"科马斯还进一步指出，商队全体成员都携带武器，并竭力设法在大雨到来以前到达目的地。他还讲到大雨到来的确切时期。从萨苏运出的黄金都是天然金块，其大小如狼豆(wolf-bean),名为坦卡拉斯(tankaras)。[56]

商队的核心看来包括国王的代理人，还有一些陪同的人，这些人可能是贵族的代理人或富有的阿克苏姆人，但不是外国人。那时，埃塞俄比亚那些统治者对经商都很内行。在《回航记》中，国王佐斯卡勒斯被称作"唯利是图的悭吝人"。贸易被看作国家的事业，而且，看来把阿克苏姆商队装备妥当，并把他们派到萨苏去的那位阿高执政官就是负贸易全责的人。埃扎纳铭文中关于在阿凡进行的战役的记述，描绘了阿凡四个部落被打败及其统治者被俘的情况，说这是因为阿凡人屠杀了阿克苏姆商队成员，任何攻击阿克苏姆商队的人都要落到这样的下场。[57]

392

阿克苏姆王国在政治上控制世界贸易路线所得到的利益并不亚于直接参与贸易。

阿克苏姆国王在降服上努比亚、阿拉伯半岛南部、塔纳湖地区以及埃塞俄比亚周围沙漠地带各部落之后，就控制了埃及和叙利亚与印度洋诸国以及非洲东北部内陆联系的那些路线。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一样，是古代世界三大海上交通要道之一，也进入阿克苏姆王国控制范围。在古代，曼德海峡是一条繁忙的海路，把红海和波斯湾、印度、锡兰、马六甲海峡以及亚洲东南部和东部诸国联系起来。从亚丁湾又分出一条支线，沿索马里海岸至东非(即克劳迪乌斯·托勒密和化名的阿里亚努斯所说的阿扎尼亚)。这条路线原来是由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航海家探明并使用的，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印度和罗马的航海家也曾勘察和使用这条路线。

在本文讨论的这个时期，红海上的贸易兴旺发达，尽管约在同一时期关于海盗的故事也到处流传。来自红海南部和亚丁湾的那些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沿岸地区的部落进行海盗活动。罗马作家把这个地区的海盗攻击特意说成是阿克苏姆和红海地区其他国家对罗马人政治态度的改变。[58]

对罗马商人说来，在阿克苏姆霸权范围以内各条贸易路线上确保安全是利害攸关的大事；他们认为阿克苏姆把各地统一起来的政策也极有利。因此，他们支持罗马-拜占庭帝国和阿克苏姆王国联合。不过，如果把阿克苏姆历代国王说成仅仅是罗马-拜占庭政策(包

---

[56] E.O.温斯太特，第70-71页。
[57] 《考察记》10。
[58] 科马斯，《回航记》，4；T.蒙森，第972页。

括宗教和商业方面)的推行者，那就不对了。他们执行的是一条独立 的政治路线，只不过在两国主要经济利益相吻合的时候政策一致而已。不妨举六世纪这方面一个例子：当时，尽管拜占庭经常有船去印度，但他们仍然认为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贸易关系更加稳定[39]。

393 阿克苏姆人和萨苏的贸易是唯恐拜占庭人知悉的一个秘密。确实，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仅仅是从埃塞俄比亚的人口中才得知有这个国家的。我们了解到，从五世纪初至六世纪初，主管埃塞俄比亚人在利比亚[40]和纳格兰[41]两国内所设的贸易据点显然是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那些教会执事。五世纪初，当阿杜利斯主教摩西乘船去印度[42]时，他很可能是去那里看望他的教徒，因为那时这些教徒已经在印度和锡兰一些港口建立了贸易据点。埃塞俄比亚人、特别是阿杜利斯市民乘船前往锡兰、印度南部和北部进行贸易的情况，在化名的卡利西尼斯和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的著作中都有记载。[43]阿杜利斯城镇的发展和它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增强，反映出阿克苏姆王国的扩张和势力的强大。在普林尼(我们纪元 60 年前后)和克劳迪乌斯·托勒密[44](公元 150 年前后)看来，阿杜利斯只不过是非洲一个小集市，化名的阿里亚努斯也说它是个村子。

在四世纪和五世纪初，阿杜利斯和非洲之角诸港口几乎未曾引起罗马地理学家的注意。不过，在五、六世纪间，阿杜利斯却已成为克利斯姆港和印度诸港之间的首要港口，而非洲其他港口的名字在书面资料中却都不见了。[45]

当时阿杜利斯的繁荣达到顶点，并不是因为它成功地抵制了任何形式的竞争，而仅仅是由于阿克苏姆早期封建国家对它的积极庇护。因此，在《红海回航记》中阿杜利斯被称为"官办市场"就不难理解了。

文　化

这个早期封建帝国的发展反映在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阿克苏姆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中。原先奉献给诸神的那些简短的碑铭，后来渐渐变成万王之王取得的那些胜利的详细记录。在这方面特别有意思的是埃扎纳的那些埃塞俄比亚文和希腊文的铭文。那篇详尽记述他讨伐努比亚之后的铭文，达到铭文体的顶峰[46]。这篇铭文表现出真正的雄辩才华、宗教热忱和运394 用自如的复杂思想。文章的主旨是颂扬一位强大无敌的国王，触怒他无异于发疯；再就是歌颂上帝，因为国王永享上帝特殊的保护。为了证明阿克苏姆对努比亚历次讨伐和其他报复行为是必要的，碑文提出许多言之成理的论据。埃扎纳被描绘成一位无可非议、心地公正、宽宏大量的国王。这篇铭文无愧为一篇文学杰作。它和民间诗歌以及埃塞俄比亚较晚期文学作品有好些共同点。

---

[39] 普罗科匹厄斯，第 275-277页。
[40] A.卡科和J.勒克朗，1959 年，第 174 页。
[41] A.莫贝格，第14页，b,110；伊尔凡(S.Irfan)，1971 年，第 64 页。
[42] 普里奥克斯(B.Priaulx)，1863年。
[43] 前引书；E.O.温斯太特，第 324 页。
[44] 普林尼，VI,172；克劳迪乌斯·托勒密，IV,7,10。
[45] B.普里奥克斯，第277页；J.德桑吉斯，1967年，第141-158页。
[46] 《考察记》11。

阿克苏姆铸币上的格言也出现和上述类似的演变。从三世纪至四世纪中叶的铸币上铸着各位国王特有的种族绰号，其中包括 be'esi (人)这个字和与阿克苏姆一支"军队"有关的一个族名。它和阿克苏姆国家的种族-军事结构有某种联系，可能是从古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民主制演变而来的。在埃扎纳及其继位者时期铸造的货币上都有这句希腊格言："愿我国事事如意！"很明显，这种鼓励性的文字反映的是官方教诲，其最早迹象可在埃扎纳的铭文中看出㊼。显而易见，国王打算使自己成为全国众望所归的人物，这和这个国家正在向君主制转变的政权的性质是一致的。后来，这句格言在希腊和埃塞俄比亚语译文中由基督教的虔诚的习惯用语所代替。

在铸币上一再改换的格言中和阿克苏姆王室碑铭中，都可以看出官方意识形态有两种互相抵触的趋势：一种是和基督教的统一密切有关的君主制思想，另一种则是来自当地传统的带有煽动性的观念。

伴随帝国思想出现的是建筑物和象征性建筑向庞大化发展，例如以独块巨石制成的石碑石柱竟高达 33.5 米，竖立在长达 114 米的底座上；以独块玄武岩制成的石板长 17.3 米、宽 6.7 米、厚 1.12 米；巨大的金属人像（其中之一的底座保留至今，但其他底座的尺寸是从铭文中得知的）；阿克苏姆国王恩达迈克尔和恩达西蒙的庞大的宫殿，特别是塔卡马里亚姆宫那套建筑占地长 120 米、宽 80 米——所有这一切在热带非洲都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好大狂反映出阿克苏姆君主国的爱好，这些庞大建筑物就是这个君主国意识形态目标的具体表现，即引起人们对当权者（这些建筑物就是献给他们的）的伟大和力量产生敬畏之心。还可看得出，伴随对庞然大物的爱好而来的是越来越注重建筑上的装饰。建筑中木石并用，以大小不等的巨石块砌在大厦的不同部位，以木料为栋梁、以碎石为填料、以粘合剂固着，大大简化了建筑者的工作，而且可以产生很大的装饰效果。墙面是粗糙方形石料的结合体，沉重的木制横梁末端雕成猴头形状，形成自然而丰富的造形和惊人的结构多变的布局。突出部分和缩入部分交错，幽深的门廊有沉重木门，末端是一段台阶，雨水槽的末端饰以狮头形的出水口，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装饰效果。室内装饰较过去更加讲究。建筑风格朝着更加华美的方向发展，这是为了适应帝国建立以来日益富裕的阿克苏姆统治阶层越来越要求舒适豪华的欲望。在这个时期，埃塞俄比亚的建筑和雕刻具有显著的独创性，然而，这并不排除接受来自罗马帝国、阿拉伯半岛南部、印度和麦罗埃的各种文化影响，特别突出的是来自基督教已经盛行的叙利亚的影响。

395

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曾提到阿克苏姆诸王那座四塔宫殿㊽。按克伦克博士复制的模型看来，它是一座城堡，那些毗连建筑物——宫殿、庙宇和其他圣殿——的布局使这座城堡成为全城最难进入之处。据 H. 德孔唐松发掘的结果看，直至基督教时代，这个地方仍筑有防御工事。㊾

阿克苏姆人的异教信仰与阿拉伯半岛南部古代宗教近似。它是一种复杂的多神教，具有对农业和畜牧崇拜的色彩。他们崇拜的神阿斯塔尔是金星的化身，阴间的贝赫尔和米德尔神

㊼ 《考察记》7：24；11：48。
㊽ E.O. 温斯太特，第 72 页。
㊾ 克伦克(D.Krencker)，1913 年，第107 页起，第 113 页起；H.德孔唐松，1963c，第 9 页，图片IX。

都是大地的象征。在阿克苏姆以前的时期，对阿斯塔尔的崇拜已很流行，一直持续到阿克苏姆信异教的时期[50]。在以后的时期，这种崇拜的痕迹仍然存在。贝赫尔和米德尔（朴素的神）在碑铭中是继阿斯塔尔之后出现的[51]。这种崇拜留下的痕迹就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基督教名称：埃格齐阿布赫尔（称上帝为 Egzi'abher，或照字义直译即贝赫尔神，或大地之神）。[52]

月神豪巴斯曾为阿拉伯半岛南部和阿克苏姆以前的埃塞俄比亚所崇拜。康蒂-罗西尼曾以实证说明：中世纪圣徒们竭力反对的那位"加德"神和对他的崇拜，实际上就是月神。[53] 康蒂-罗西尼还把这种对月神的崇拜和近代厄立特里亚崇拜象公牛的羚羊联系起来。对二十世纪那个国家各部落的种种信仰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埃塞俄比亚北部还有古代崇拜的痕迹，月亮仍然被当作一位神明崇拜。[54] 阿克苏姆人可能把月神的相貌和马赫雷姆神的形象连在一起了。

象征太阳和月亮的标记在阿克苏姆、马塔拉和安扎的石碑上和公元前阿克苏姆诸王的铸币上都有发现。这些标记可能代表阿克苏姆王朝和部落之神马赫雷姆。在埃扎纳两种语言并用的异教铭文中，马赫雷姆在埃塞俄比亚文[55] 中写作希腊名字"阿瑞斯"。[56] 阿克苏姆历代国王所有的异教希腊文碑铭[57] 都用"阿瑞斯"这个名字，只有未刻神名的森布里兹的铭文例外。众所周知，雅典的阿瑞斯是作为战神受崇拜的。因此，和他相当的马赫雷姆也作为战神受崇拜。在阿克苏姆那些铭文中，处于战神地位的阿瑞斯-马赫雷姆被说成是"不可战胜的"，"无敌的"，并能确保取胜。[58] 享有宗族始祖地位的阿瑞斯，在出自阿巴潘塔莱昂的铭文中称为"阿克苏姆人之神"。[59] 作为王朝之神，历代国王都称马赫雷姆-阿瑞斯为他们的"最伟大的神"，诸王始祖。[60] 马赫雷姆首先被认为是神的始祖和阿克苏姆人的保护者；其次是无敌的战神；第三是国王的祖先和父亲；第四，他似乎还被认为是众神之王。阿克苏姆诸王把本土以及被他们征服地区的胜利宝座奉献给他。

很明显，战争和君主国之神马赫雷姆对天上和阴间诸神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就如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王对一个民族的统治。与此同时，以马赫雷姆为化身的战争凌驾于和平劳动之上，被认为是一种更为神圣的任务，比农民辛勤劳动更光荣，尽管后者或许由于他们祖先的教诲早被看作神圣的义务。在阿克苏姆的宗教中，可以明显看出早期阶级意识的特征，亦即封建社会正在形成过程中的阶级意识的特征。

阿克苏姆人向他们的神明贡献祭品。家畜在这些祭品中占绝大部分。埃扎纳有一篇铭文[61] 记载，仅仅在一次祭祀中就献给马赫雷姆 12 头公牛。根据 A.J. 德鲁斯关于萨夫拉

---

[50] 《考察记》6：20； 7：21； 10：25； 27：1； A.J.德鲁斯，1962 年，第 26-27 页，图片VI，XXI。
[51] 《考察记》6：21； 7：21； 10：25-6。
[52] 维希什尔(W.Vycichl)，1957 年，第 249、250 页。
[53] 康蒂-罗西尼(C. Conti-Rossini)，1947 年，第 53 页。
[54] 利特曼(E.Littman)，1910-1915 年，第 65 页(50 号)，第 69 页(52 号)。
[55] 《考察记》6：2，18，26； 7：3，19，21，25。
[56] 《考察记》4：6，29。
[57] 《考察记》2：8； 《阿杜利斯纪念碑》(E. O. 温斯太特，第 77 页)；赛斯 (A.H.Sayce)，1909 年，第 189，190 页。
[58] 《考察记》2：8； 4：6，29； 6：2-3； 7：3-4； 8：4-5； 9：4； 10：5-6。
[59] 《考察记》2：8。
[60] E.O.温斯太特，第 77 页；《考察记》10：5，29-30； 8：4； 9：3-4； 6：2； 7：3。
[61] 《考察记》10：29-30 页。

铭文的一项研究,[62]说这些祭品用的是不生育的母牛和母羊(这种祭品至今仍在埃塞俄比亚一些民族中广泛流行)。这位学者指出，这篇铭文中有宰牲祭司在主持仪式时使用的一些专门术语。在其他铭文中还看到为向阿斯塔尔神贡献烧烤祭品而屠宰牲畜的事。按古代闪米特风俗，为祭神而奉献的某些种类的祭品按礼仪规定是用洁净的布包起来的。对其他祭品则无硬性规定。但早在阿克苏姆以前的时期，为献祭用的活牲畜就已经以牲畜模拟像取代了。用作祭品的以青铜和石料制成的公牛、公羊和其他牲畜的模拟像至今尚有保存，许多模拟像上还刻有文字。

祖先崇拜，特别是对已故国王的崇拜，在阿克苏姆宗教中占重要地位。向他们奉献石碑石柱已形成习惯。häwelt 这个字来源于字根 h-w-l，意思是“绕圈子走”或“进行礼拜”，相当于伊斯兰教对“天房”崇拜。人们把祭品放在祭坛上，放在凿成祭坛形状的石碑底座上，祭牲的血流入石上凿成碗形的洞孔里。阿克苏姆历代国王的陵墓被视为这个城市的圣地。在墓地发现的器皿和其他物品说明，那时的人相信死后还有另一种生活。有些间接的参考材料说明当时还存在对“山神”的崇拜，使人联想到阿拉伯半岛上类似的崇拜。

记载阿克苏姆宗教的材料虽说十分零散，但仍然可以看出这种宗教已有相当的发展，并具有复杂的礼仪和专业祭司。

在阿克苏姆早期，远近各国的宗教思想就已传入埃塞俄比亚了。在《阿杜利斯纪念碑》一书中提到海神普塞东，这位海神显然为阿杜利斯和红海南岸一带居民所崇拜。[63]萨巴人的“民族”之神阿尔马卡受到阿克苏姆国王加达拉[64]的崇拜，其圣地坐落在默拉佐，也许还在哈维拉-阿瑟劳。在阿克苏姆新近发现的石碑上，雕有埃及的生命长寿的象征[65]，与崇拜哈索、普塔、荷拉斯等神有关的物品以及圣甲虫等等，这说明信奉埃及-麦罗埃宗教的人在一段时期中曾在阿克苏姆、阿杜利斯和马塔拉居住。在阿克苏姆发现的一些小佛像[66]很可能是信佛教的商人从印度带来的。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有许多信犹太教的团体，其中有些一定是在六世纪以前来到埃塞俄比亚定居的，而基督教是在六世纪才成为最重要的宗教(参见第 14 和 16 章)。

在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半岛，由于受基督教和其他一神教的影响，这些国家也出现了它们自己特有的一神教观点。这情况在盖埃兹语铭文中反映出来：例如，埃扎纳关于努比亚战役的铭文(参看《考察记》，11)以及在瓦迪迈尼[67]发现的阿布拉哈·塔克拉·阿克苏姆(不要把这个人物和国王阿布拉哈混淆)的铭文；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发现的较晚期的萨巴铭文也有这类反映。 398

这种形式的一神教和基督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埃扎纳在上面提到的那篇铭文中，瓦泽巴在新发现的一篇铭文中以及希姆亚尔王阿布拉哈在自己的铭文中，都为传播基督教使用了一种“不明确的一神教”的词汇和概念。

---

[62] A.J.德鲁斯，1962年，第 50—54 页。
[63] E.O.温斯太特，第 77 页。
[64] A.雅姆，1957 年，第 79 页。
[65] 安弗雷(F.Anfray)，1972b，第 71 页。
[66] H.德孔唐松，1963b，第45、46页，图片XLVII-XLVIII，a，c。
[67] E.利特曼，1954 年，第 120、121 页。

由于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阿克苏姆王国的亚文化群在性质上不但是全国性的而且也是国际性的。和盖埃兹语同时使用的希腊语既是全国使用的官方语言也是国际上使用的语言。显然，象扎希卡希和埃扎纳这样一些国王都懂希腊语（《回航记》说佐斯卡勒斯国王懂希腊文，还说埃扎纳的私人教师弗鲁门蒂乌斯是希腊-腓尼基人，后来当了阿克苏姆第一任主教）。三、四世纪多数阿克苏姆国王都把希腊格言铸在钱币上。就我所知，阿克苏姆有六篇国王的铭文是用希腊文写的。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萨巴文是阿克苏姆王国早期的官方语言之一。那三篇仿三种文字（实际上只是盖埃兹和希腊两种文字）写的埃扎纳铭文，其中一篇是以后期希姆亚尔文写的，并有萨巴文-希姆亚尔文标音法中某些夸张的特点。这种文字还曾在埃扎纳、卡莱布和瓦泽巴三位国王的三篇阿克苏姆铭文中使用。[68]因此，再加上在采胡夫埃姆尼（厄立特里亚）发现的那篇铭文[69]，在埃塞俄比亚一共就有五篇"仿希姆亚尔文"铭文了。所有文字都是盖埃兹文搀杂少数萨巴文。

现在还弄不清楚，阿克苏姆国王在那些肯定是官方性质的铭文中，除正常使用埃塞俄比亚文字外为什么还同时用"仿希姆亚尔文"。但所有这些情况都证明有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影响。

除了加上元音符号的埃塞俄比亚文之外，还使用希姆亚尔文字以及由外国引进的数字，这也许是埃扎纳统治时期的某些创新之举，而这些创新又都互有联系。

加元音的埃塞俄比亚文的基本原则在整个闪米特-含米特语地区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具有印度字母的特色。十九世纪，B. 约翰斯，R. 莱普西乌斯和 E. 格拉瑟曾把埃塞俄比亚字母和印度字母作比较。1915年，A. 格罗曼曾指出加元音的埃塞俄比亚字母和布拉赫米或卡拉奥什蒂字母主要相似之处，以及某些共有的细节，如代表"u"和"短音"的符号相同。[70]看来，印度文对从事埃塞俄比亚旧式辅音改革的人曾经发生影响这个假定很可能是对的。

399

尽管最初出现在埃扎纳铭文中的埃塞俄比亚数字体系和主要符号肯定来源于希腊，但埃塞俄比亚字母的创造受到希腊文影响的假说则尚未证实。

加元音的埃塞俄比亚字母与盖埃兹文音素体系极为近似，因此，难以设想创造这些字母的人不是一位埃塞俄比亚人。这些字母，再加上一些符号，在埃塞俄比亚一直使用到今天，而且一般都认为这是阿克苏姆文明一项突出的成就。

埃塞俄比亚加元音的书写体创立之后不久，就开始影响外高加索的文字。D. A. 奥尔德罗格认为梅斯罗普·马什托兹发明亚美尼亚字母时采用的就是加元音的埃塞俄比亚字体。在这以前不久，即在五世纪末，埃塞俄比亚文字可能就由叙利亚主教丹尼尔引进亚美尼亚。[71]

那时，阿克苏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文化联系是通过叙利亚北部实现的。我们有些证据说明阿克苏姆曾有叙利亚人，以及阿克苏姆的建筑曾受到叙利亚的影响，[72]特别是那些多

---

[68] 《考察记》8：18—19；R.施奈德，1974年，第767—770页。
[69] C.康蒂-罗西尼，1903年。
[70] 格罗曼（A. Grohmann），1915年，第57—87页。
[71] 奥尔德罗格（D. A. Olderogge），1972年，第195—203页。
[72] F.安弗雷，1974年，第761—765页。

层建筑状的以整块巨石制成的石碑。还可看出这些建筑有些类似当时的南阿拉伯和印度建筑。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在第二、三世纪时，麦罗埃的影响占统治地位。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所有麦罗埃手工制品都属于这个时期。刻有阿克苏姆国王加达拉的铭文的一支青铜权杖很象麦罗埃历代国王的权杖。[73]可能是在麦罗埃和印度影响下，阿克苏姆的王家典礼中也出现了大象。

阿克苏姆王国不但是从罗马世界到印度以及从阿拉伯半岛到非洲东北部那些商路上的一个重要贸易国，而且也是渗入这些商路的文化的一个伟大中心。另一方面，非洲东北部和南阿拉伯半岛的许多文明古国，对统治它们的阿克苏姆王国的文化在好多方面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李 活译)

[73] A. 卡科和 A. J. 德鲁斯；多雷斯(J.Doresse)，1960年。

400



图片 15.1 国王恩迪比斯统治时期的金币（第三世纪）



图片 15.3 瓦泽巴的希腊文碑铭（六世纪）



图片 15.2 埃扎纳的希腊文碑铭（四世纪）



图片 15.4 乌萨纳斯国王统治时期的金币

16 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

401

特克勒·查迪克·梅库里阿

信奉基督教以前阿克苏姆的传统崇拜

直至十八世纪，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宗教——无论什么形式的宗教，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般情况都是多神教先于一神教。当代所有基督教中心都曾是异教的摇篮。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基督教以前不是首先经历过一个信奉异教的阶段。

这条规律对埃塞俄比亚也绝非例外；它也没有特殊的机缘，可以不首先实行极其多样化的崇拜就直接接受一神教。埃塞俄比亚从未经历过长时期的外国统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存在着世代相传的多种崇拜是很自然的。

在古埃塞俄比亚各族居民中，库希特人各族（贝札人和埃奎人）与各统治阶级不同，并未被闪米特文化所同化，他们崇拜各式各样的自然物，如异常巨大的树木、河流、湖泊、高山或动物。他们相信所有这些东西内部都隐藏着善神或恶鬼，必须每年或每季给它们上供或献牲。

那些未曾继承库希特人的崇拜、原属闪米特族的部落和业已闪米特化的库希特人，较上述各族要先进一些，他们崇拜自然界中天上和地下的种种形体（如日、月、星、田野和大地），以马赫雷姆、贝赫尔和米德尔三位一体神的名义进行礼拜。他们崇拜的这些神是同那些外国或半外国的神即阿拉伯半岛南部或亚述-巴比伦的阿尔马卡、奥巴斯和阿斯塔特诸神相对立的，而后者又同化于希腊的宙斯、阿瑞斯和普塞东诸神。①

那些有势力的旅行家劝说别人改信自己信奉的神，对于这种多少有些专横的同化行为，某些已接受希腊文化的阿克苏姆国王还是允许的。但这并未动摇马赫雷姆这位民族之神的基础。一个希腊人可以称阿克苏姆的马赫雷姆为宙斯，一个已接受埃及文化的努比亚人也可以称他为阿蒙，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语言相称的。

应当记住，自称宙斯之子的亚历山大大帝在我们纪元前332年率大军胜利进入埃及时，埃及祭司是把他作为阿蒙之子接待的。

402

从国王阿姆德·齐翁时期（我们纪元1313-1342年）起，以口头传说和调查研究为依据的埃塞俄比亚古代文献就有关于对巨蛇“阿韦”（arwe）崇拜的记载，和实行摩西法典的记

① 利特曼(E.Littmann)和克伦克(D.Krencker)，第4-35页；康蒂-罗西尼(C.Conti-Rossini)，1928年，第141-144页；德鲁因(E.A.Drouin)；德隆佩里埃(A.de Longpérier)，第28页。

载同时出现。② 这条巨蛇有时被认为是一位龙神，有时又被认为是示巴女王的父亲、最早的国王阿韦-内古斯——任何一位近代读者对这种说法当然都不会认真对待。

这种民间信仰肯定属于信史开始以前古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传说。一切民族在它们的古代史和中古史以前都有某些这类传说。传说中古罗马最早的两位国王是吃母狼的奶长大的，就是许多这类例子中的一个。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真实的历史加上一些传奇式的故事，结果真伪难辨。

住在高原上的提格雷人和阿马拉人的祖先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闪米特人，据说他们曾从阿拉伯半岛南部带来几种崇拜。关于这些信仰，旅行家们众说纷纭，现已为碑铭和古钱上的文字证实。

继布鲁斯、索尔特、A.迪尔曼等人进行的研究之后，德国传教团于1906年编写的巨著(1913年出版)以及1952年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的埃塞俄比亚考古研究所的发现，构成我们对阿克苏姆皈依基督教以前的各种崇拜深入了解的基础。皈依基督教以前，阿克苏姆宫廷的各种崇拜已由耶哈神庙(至今犹存)以及分散在各地的石碑石柱、古堡遗址和供品等证实。

但是，还有一点需要澄清，那就是这种较成熟的宗教是宫廷和贵族所独有的呢，还是老百姓都信奉？至于在埃塞俄比亚曾否有过犹太教这个问题，也有一些情况证实确有一批人信奉。《列王本纪》也曾简略地提到这件事。信犹太教的这批人也许还曾一度执政。

即使我们抛开《列王勋业》(Kbre Neguest)这部离奇的故事(埃塞俄比亚教士们认为这部书是历史和文学的基本著作，其中还错误地认为，阿克苏姆历代国王都与所罗门和摩西有血统关系)，仍然有一些沿袭至今的传说提到有信犹太教的人存在。男子幼年行割礼的习惯就可说明这一点；而相当尊重安息日、唱圣歌和伴以击鼓、摇击乐器和鼓掌的礼拜舞等等，则又都使人联想到犹太人和大卫王在约柜前面跳舞的情形。

403

但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在政权落入其他族群如萨巴人、哈贝桑人以及其他一些族群之手以前或以后)，这里的犹太人也和任何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一样，就变成成见和暴力的牺牲品，撤到人迹罕至的地区去了。六世纪时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发生的对奈季兰基督教徒的大屠杀以及十世纪帕拉夏人大起义，似乎和居住在笃信基督教的阿克苏姆帝国境内的犹太人遭受虐待有关，也可能是对阿克苏姆帝国在阿拉伯半岛上的政治和经济霸权作出的反应。

基督教传人阿克苏姆

由基督在巴勒斯坦创立并由其富于战斗性的门徒传遍东方和西方所有帝国的新宗教，也传到了阿克苏姆宫廷，而这时库希特人信奉的是多神教，闪米特人和闪米特化的库希特人信奉的是一种南阿拉伯的宗教。

根据一位名叫阿布迪亚的人撰写的《使徒行传》中真伪难辨的说法，一部分居民错误地

② 德吉兹梅希·黑伦收藏的《列王本纪》(Tarike Neguest)，现存巴黎，第143号，第23-35页。T.塔姆拉特(T.Tamrât)，第21-30页。

相信把基督教传入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个人是圣马太。不过，这种说法并无任何值得相信的文件佐证。

《列王本纪》说把基督教传入这个国家的这项殊荣归于著名的弗鲁门蒂乌斯。弗鲁门蒂乌斯后来被称为启蒙大师（Kessate Brhan）或和平之父（Abba Selama）。尤西比乌斯和鲁菲努斯都曾详细记述弗鲁门蒂乌斯到达埃塞俄比亚、离开该国前往亚历山大城以及回到阿克苏姆等情况。鲁菲努斯的著作特别详尽地记述了基督教传入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他这部书后来还曾译成盖埃兹文，随后又译成阿姆哈拉文。

据鲁菲努斯记述，提尔有一位名叫梅罗皮乌斯的人想到印度群岛去（他是在仿效哲学家梅特罗多拉斯），还带着两位年轻的亲戚，即弗鲁门蒂乌斯和艾迪修斯。在返航途中，他的船受到一个海港（在红海沿岸？）居民的攻击。梅罗皮乌斯遇难身亡，留下的两位年轻弟兄被带到阿克苏姆国王那里。较年轻的艾迪修斯当了斟酒者，而弗鲁门蒂乌斯，由于他有希腊文化素养，就当了国王的顾问和财务官，还兼任王室儿童的导师。根据这两位年轻人到达宫廷的年代判断，当时那位国王似乎是埃扎纳国王的父亲埃拉·阿米达。埃拉·阿米达死后，他的妻子摄政，要求这两位年轻人留在她身边治理国家，直至她的儿子成年掌政为止。

于是，弗鲁门蒂乌斯就把这位年轻的王子培养起来，让他热爱新的基督教。这样打好基础之后，他就带着他弟弟艾迪修斯告别了。艾迪修斯回到提尔帮助年迈的双亲，与此同时，弗鲁门蒂乌斯前往亚历山大城拜会大主教阿萨纳修斯，告诉他说阿克苏姆王室对基督教的态度颇为友善，催促阿萨纳修斯派一位主教到那里去。这位大主教不愿意派一位既不懂那里的语言又不了解那个国家风俗习惯的主教前往，于是就授予弗鲁门蒂乌斯以阿克苏姆教会主教职位，派他回到埃塞俄比亚去。后来弗鲁门蒂乌斯就为国王和王室全体成员行了洗礼。③ 404

因此，从这个年代开始，基督教就算传入阿克苏姆了。接受了弗鲁门蒂乌斯的教育和洗礼的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国王，看来就是埃拉·阿米达的儿子埃扎纳。有一切理由相信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示范行动受到广泛效法。不过，下述情况仍然颇为费解：弗鲁门蒂乌斯只不过是国王的秘书和财务官，后来又当了太后（索菲亚？）的助手，象他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伤害众神中最伟大的神和国王的祖先、无敌的马赫雷姆，而教给王室儿童信奉既非王室宗教又非国教的新创立的基督教呢？也许弗鲁门蒂乌斯是一位很能干的秘书、很有智谋的行政官，所以才能象鲁菲努斯说的那样，间接地对他教导下的年轻的王子们施加影响，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不过，他这种影响也绝不至于大到足以在不引起动乱的情况下就推翻并取代长期以来业已根深蒂固的原有宗教。

在承认弗鲁门蒂乌斯所起作用的同时，我们认为改宗之事应当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幸亏有碑铭和古钱上的文字记载以及旅行家的报告，我们从中得知阿克苏姆宫廷和君士坦丁堡友善相处；这两国之间曾存在大量商业和文化交流。尤西比乌斯曾在他那部《君士坦丁本纪》中提到，在君士坦丁在位期间君士坦丁堡曾有埃塞俄比亚人。阿克苏姆宫廷使用

③ 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第77-78页；沃利斯·巴奇(E.A.T.Wallis Budge)，1966年，第142-150页；C.康蒂-罗西尼，1928年，第145-160页。

希腊文字和希腊语言也有重要意义。我们纪元一世纪时国王佐斯卡勒斯就象埃扎纳本人那样，也是讲希腊语、用希腊文的。所有这一切都清楚表明希腊文化在阿克苏姆王国占有压倒优势④。

曾于312年征服马克森西乌斯并于325年主持尼西亚宗教会议的那位君士坦丁大帝既然是和国王埃拉·阿米达和埃扎纳同时代的人，那么，除了弗鲁门蒂乌斯之外，历史上未曾提到过的那些旅行家必然也曾把君士坦丁宫廷的豪华以及他倾向基督教的情形记述下来并加以夸大。所有这些必然在阿克苏姆宫廷产生深刻印象，而且必然也在弗鲁门蒂乌斯本人心目中产生深刻印象。因为他出身于希腊-腓尼基家庭，他本人就受这种文化和宗教的熏陶，最后他还发现这位国王和他的家族很愿意信奉业已在君士坦丁堡宫廷中广泛传开的新创立的基督教。

405 但是，很可能在阿克苏姆宫廷采取这个步骤时并不是毫无困难的。看来弗鲁门蒂乌斯离开阿克苏姆前往亚历山大城以及回到阿克苏姆当主教这两件事，可能就是在疑虑和困惑的气氛中发生的，而这位主教则充分利用了这种局面。

不管怎么说，被描绘成所向无敌的马赫雷姆还是被他自己的子孙出卖了，被基督征服了。十字架标记打败新月教徽这件事已被碑铭和铸币证实。

当然，由信奉一种宗教改信另一种并非容易，对于那些把神当作自己的父亲爱戴的国王来说，必然更为困难。一位国王的荣誉常常和他的神连在一起。宫廷的利益和宗教领袖的利益几乎完全一致。当埃扎纳那样的一位国王说他的神"不可战胜"时，实际上他心里想的只是他自己不可战胜。他通过这种象征寻求的正是他自己的不可战胜性。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埃扎纳不得不和他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大帝面临同样的困难。因为这位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虽曾主持基督教历次宗教会议，并在各大主教之间的宗教争论中进行仲裁，但他实际上只是在临终时才受洗的，因为他深恐崇拜旧神宙斯和阿瑞斯的那些信徒背叛他。⑤

同样，正如圭迪和康蒂-罗西尼曾经指出的那样，国王埃扎纳和他的家族出于害怕或骄傲，也并不是突然抛弃旧神改信基督教的。《德国阿克苏姆考察记》卷二中抄录的那篇著名的铭文以"在天地之主的帮助下……"一句开始，所有的埃塞俄比亚人都认为这是埃扎纳改信基督教的最早标志；这篇铭文清楚地表明埃扎纳有意使这种新宗教与贝赫尔和米德尔二神的旧信仰同化，办法是避而不提基督的名字、基督和上帝同体以及他和圣父圣灵一起形成的三位一体。⑥这位首先改信基督教的国王在四世纪首次宣布的"天地之主"(Igzia Semay Wem)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

迄今已出版的外国著作和当地的记载都没有指明基督教传入阿克苏姆的确切日期。《列王本记》也和《古埃德尔·塔克尔·海马诺特》(Guedel Tekle Haymanot)一样，都说弗鲁门蒂乌斯和艾迪修斯两兄弟是我们纪元257年到达阿克苏姆的，弗鲁门蒂乌斯是在315年

---

④ 肖夫(W.H. Schoff),1912年，第60-67页。
⑤ 潘菲利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第65、366-368、418-422页。
⑥ 塞鲁利(E.Cerulli),1956年，第16-21页。

回到阿克苏姆当主教的。⑦其他同类史料把这几个年份写成333年、343年和350年等等。所有这些日期记载似乎都是武断的。某些外国著作说埃扎纳的父亲埃拉·阿米达国王大约死于320至335年。假定以15年达到法定成年计，再将弗鲁门蒂乌斯往返的时间估算进去，那么国王埃扎纳受洗的时间可能就在350年至360年之间。⑧ 406

由于缺少可靠的文献，所以近代作家就只把基督教传入埃塞俄比亚的时间谨慎地说成是四世纪。

实际上，在菲莱发现的一篇用希腊文刻写的铭文提到阿克苏姆一位信基督教的总督阿布拉图斯于我们纪元360年拜会罗马皇帝的事，说皇帝以跟他职位相称的一切荣誉接待了他。⑨这位皇帝一定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斯二世（341-368年）。他虽然是一位基督教徒，但他信奉的却是阿里乌的教义，即否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说法，从而也否定了耶稣基督和圣父之间完全是同等的。在325年由君士坦丁二世之父主持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曾谴责过这种教义。

阿里乌的不可宽恕的敌人恰巧就是授予弗鲁门蒂乌斯以阿克苏姆主教圣职的阿萨纳修斯。这位大主教本人后来在这位半叛教的皇帝的命令下被剥夺了教职，皇帝又提名一位名叫乔治的非常偏袒阿里乌派教义的人顶替了他。

弗鲁门蒂乌斯热情支持授予他圣职的大主教阿萨纳修斯，他抵达阿克苏姆的消息，看来不会使君士坦丁堡那位皇帝高兴。他立即派人给国王埃扎纳和他弟弟赛扎纳送去一封信，慷慨地称呼他们是他的"极受尊敬的兄弟"，并以友善的口吻要求他们把弗鲁门蒂乌斯送回亚历山大城交给那里的新任大主教乔治，以便由乔治和他的同僚审查他的情况；还说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弗鲁门蒂乌斯究竟配不配担任阿克苏姆主教区的领导者。

不幸的是，我们手头没有可能说明这两弟兄接信后反应如何的文件。尽管国家的利害关系迫使他们不得不和君士坦丁堡那位强大的皇帝保持友好关系，但看来他们并没有按他的要求办事。当地所有史料都证实弗鲁门蒂乌斯一直平安无事地执行他的主教任务直至逝世。《诸圣徒传》（The Synaxarium）曾描述他执行圣职的情况，其结尾说："他〔弗鲁门蒂乌斯〕是在阿布拉哈和阿茨巴哈〔即埃扎纳和他弟弟阿茨巴哈〕统治时期来到阿格阿济〔即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度的，随即在全国各地传布我主耶稣基督的和平福音。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称他为'和平之父'的缘故。在带领埃塞俄比亚人民信奉〔基督〕教之后，他就在上帝的和平福音中逝去……。"⑩

基督教的传播

407

弗鲁门蒂乌斯和国王两兄弟（阿布拉哈和阿茨巴哈）引进并传布基督教这件事是人们广泛承认的。所有当地史料都可证实。奇怪的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直至十九世纪以前的书面材料都没提埃扎纳这个名字，看来它象是国王的异教姓名。而且，据我所知，任何铭文和

⑦ E.A.T.沃利斯·巴奇，1928年，第147-150页；圭迪(I.Guidi)，1896年，第427-430页，1906年，卷二。
⑧ C.康蒂-罗西尼，1928年，第148-149页。
⑨ 林塞研究所：埃塞俄比亚学术研究国际大会文件，1974年，卷一，第174页。
⑩ 梅库里阿(T.T.Mekouria)，1966-1967年，卷二，第203-217页。

古钱上也都未曾提到阿布拉哈这个名字，据说这可能就是这位国王的洗礼名。于是，同一个人就有了不同的名字，不论是由于好运气还是坏运气，他就象君士坦丁大帝那样，在自己在位期间，成了一个半信异教半信基督教的人。各种铭文的说法常常显然互相抵触。阿克苏姆的石碑和铸币上清楚地刻出的几位国王的名字，在当地作家列举的名单中却不重要。某些作家笔下把某个人说成异教徒，但在其他作家笔下却又成了合乎摩西法典规定的基督的信徒。

有些人认为阿布拉哈是埃扎纳的洗礼名，但在《考察记》中列为第二号、而且埃塞俄比亚学者一致认为是埃扎纳皈依基督教时那篇以加了元音的盖埃兹文撰写的著名碑文，却只提到埃扎纳这个名字。这样看来，阿布拉哈就不可能是国王受洗的名字了。当然我们并不熟悉阿克苏姆王国四世纪时流行的人名地名学。我们也不了解阿克苏姆历代国王除了洗礼用名和在位用名之外，幼年时期是否还有一个专用名，就象十三世纪和二十世纪所谓源于所罗门的阿马拉王朝历代皇帝那样。

两兄弟，特别是阿布拉哈，在这个国家里的影响十分巨大。阿克苏姆城和城里头一座大教堂就是他修建的。另外几座教堂和几所修道院也说是由他修建的，不过我们不应当忘记他弟弟阿茨巴哈和弗鲁门蒂乌斯主教曾帮了他多么大的忙，史料上未曾提到的其他宗教领袖当然也出了不少力。

看情况，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是由三位宗教领袖“阿布拉哈——阿茨巴哈——塞拉马”共同治理的——塞拉马这个名字是教会给弗鲁门蒂乌斯起的。

看来，倒向新的宗教的第一次改宗这件事曾受到在种族和文化方面都和宫廷有联系的那部分居民的欢迎，他们是源于闪米特族的萨巴人、哈贝桑人和希姆亚尔人，即提格雷人和阿姆哈拉人的祖先。他们接受他们的君主信奉的宗教并无困难。

在引进基督教之后，随着皈依这种宗教的人数日益增多，前往圣地朝拜的活动也日益频繁。在386年，一位名叫保拉的人从耶路撒冷给住在罗马的一位朋友马塞拉写信，信中说：“关于赶到这里〔耶路撒冷〕并且在这里表现了典范的德操的这些亚美尼亚人……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我们应当说些什么呢？”拉丁教会一位神学家圣杰罗姆也曾提到埃塞俄比亚人不断到达各圣地的情形。[11]

408

基督教在第五、六世纪期间在阿克苏姆王国境内的传播是教士们的功劳，所有传统文献都把他们说成是“查德坎”(TSAKAN 公正的）或称他们为“九圣徒”(TESSEATOU KIDO-USSAN)。但他们到达阿克苏姆王国这件事，也把这个王国卷入当时拜占庭帝国各大城市正在进行的神学争吵中去了。

基督教虽然诞生在巴勒斯坦一个小村子里，而且似乎是穷人和受迫害的人们的宗教，但自从君士坦丁于313年颁布利曼法(Edict of Liman) 以后，这种宗教就成为许多国家的国教了。在历代信奉基督教的皇帝支持下，各地都组织起自己的教会。教皇和各大主教把信奉基督教的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划分为许多教区。戴克里先时期那种宗教迫害和搜捕一去不复返了。原先迫害最凶的那些地方如罗马、亚历山大城、大马士革、安条克和所有其他

[11] E.塞鲁利，1943年，第1－2页。

各地，这时都已太平无事。[12]

大主教和教会请神学家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阅读《圣经》，查阅似乎可以找出能够说明基督教创始人的本性的段落上。阅读和思考产生了足以在基督信徒当中播下不和种子的各种观点。因此，原先建立在友爱、和睦和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信仰竟然变成一个战场，甚至达到在诸使徒和殉教者的继承者之间有时互相殴打的程度。

对神人一体的基督本性和三位一体的深入思考成了激烈论战的根源，情况请看下文。

在 325 年阿里乌遭谴责之后，又轮到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里引起一场激烈论战了。他公开宣传基督的人性，反对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业已确立的基督的本性是神的说法。[13]根据聂斯托里的说法，基督的这两种本性（人和神）彼此截然不同，而且互不相干。圣母玛丽亚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神）的基督的母亲，所以不应被称为神母或上帝之母，只应称她为基督之母。

但这个意见遭到亚历山大大主教西里尔和罗马教皇塞莱斯坦的强烈反对。于是聂斯托里就于 431 年在以弗所以异端罪名遭受谴责并投入监狱。

409

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弗拉维安又就基督的两种本性（人和神）提出另一种见解，但他并未否认基督是真人和真上帝。在弗拉维安看来，基督这两个本性当中的每一个都是完美的，而且两者性质截然不同，只是在基督身上合而为一而已。亚历山大大主教迪奥斯丘勒斯立即反驳这个观点。他说基督只有一个本性即同时既是人又是神。这就是基督一性论，其主要辩护人是学者尤蒂基斯。442 年在以弗所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这种短兵相接的争论堕落成喧嚣的争吵。在这次暴风雨般的辩论中，戴奥科罗斯和尤蒂基斯取胜；被他的反对者痛加鞭挞的失败者弗拉维安不久之后就一命呜呼了，于是戴奥科罗斯胜利凯旋亚历山大城。

但基督一性论者付出沉重代价才取得的这次胜利却是短命的。当他们的皇帝盟友西奥多修斯二世死去之后，他的大将马西安篡夺了政权，于是基督的本性这个热烈争论的问题再次被提出。451 年，在皇帝马西安主持下在卡尔西顿召开了共计有 636 名高级教士和教会神学家出席的宗教会议。会上的讨论乱作一团，以致无法弄清谁胜谁负。于是这个问题不得不上报罗马教皇，因为人们认为他是所有教会的至高无上的首脑。教皇利奥一世在一封信中声称他赞成基督有两种互不相干的本性的学说。于是宗教会议就谴责了戴奥科罗斯。那些反对他的人，一方面有全世界教会至高无上的首脑的意见作靠山，另一方面又有皇帝马西安的袒护，于是为了报复戴奥科罗斯对弗拉维安教长的虐待，竟然粗暴到极点，动手把他痛打一顿，然后就把他放逐到加拉蒂亚一个海岛上去了。

我们知道，自从弗鲁门蒂乌斯时期以来，阿克苏姆王国就已经属于亚历山大大主教的管辖范围，并接受从那里派来的主教和规定的教会法规。因此，阿克苏姆历代国王和历任主教自然就成了基督一性论的支持者；后来，这种理论在埃塞俄比亚又起了另一个名字叫作特瓦杜（TEWAHDO）。他们的大主教遭受虐待的消息便激起了他们对支持基督双重本性论的

[12] 不应忘记，五、六、七这三个世纪是以极其猛烈的神学论争为突出特点的，而且还伴随着对受到谴责的少数派教团的新迫害。

[13] 那个时期的教会史只好以这样极其简单的几句话概括。

人们的无比仇恨。由于在卡尔西顿宗教会议上那些胜利者对基督一性论者无尽无休的威胁和侮辱，致使他们在整个君士坦丁堡帝国境内的生活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为了摆脱这种难以容忍的生活，这些基督一性论者就向埃及和阿拉伯半岛逃去。著名的九圣徒到达阿克苏姆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是为了在信奉同一种学说的人们当中寻找避难之地才到这里来的。

《列王本纪》曾简短地提到九圣徒的到来："萨拉多巴生子阿拉梅达，后者在位期间，九圣徒从罗马〔君士坦丁堡〕到来。他们建立起〔阿斯特拉陶〕(Asterat'ou) 这个宗教和修道院法规……"。⑭据某些当地史料记载，阿拉梅达在位时期是 460 至 470 年间，另一些史料则说是 487 至 497 年间，由此可知九圣徒来到的时间必然是在这些年间。某些作家又认为他们是在六世纪初(即在卡莱布和格布拉·马斯卡勒时期)来的，这种说法可能性较小。

410

这些圣徒当中的阿加维、潘塔莱昂、格里马和阿夫茨等几位的到来和他们的使命，在后来一些修道士撰写的传记中有详尽描述。不幸的是，这些传记中堆集了大量的神奇故事以及苦行和忏悔的表现，以致今天的读者总感觉可疑。

他们来到之后就前往各地执行传教使命：阿巴·阿加维前往德卜勒-达莫，这个地方对巨蛇之神皮松的崇拜在当地居民中已根深蒂固；阿巴·格里马在瑟纳费附近的梅特拉（马德拉）停留下来；阿巴·阿夫茨留在耶哈，至今人们在那里仍然可以看见在五世纪为阿尔马卡神修建的古庙。潘塔莱昂和利卡诺斯留在阿克苏姆城里，阿莱夫和齐马则分头前往布赞和采登采登尼亚；伊马塔和古巴在盖拉勒塔地区停留。

在他们居住过的地方，今天还可以看到当时为他们修建的那些修道院和教堂。其中有一些是凿入巨石雕成的，只能攀绳进入。在戈(盖拉勒塔)镇修建的那座阿巴·伊马塔修道院也是依石凿成，里边有一幅画着九圣徒的圆形图画。

由此可见，四世纪时由弗鲁门蒂乌斯传入的基督教，后来被这些圣徒巩固下来了。当然，他们曾取得埃扎纳国王的继承人卡莱布和格布拉·马斯卡勒等热心的信徒的帮助。九圣徒在传布福音时坚持了许许多多信徒曾因之受虐待被放逐的基督一性论学说。

不过，基督教的传播不仅仅是来自拜占庭帝国的这九位修道士的功劳。在象著名的阿巴·梅塔这样的一些主教指导下，成百上千的本地和外国修道士肯定也曾在传播基督教信仰方面出过力，不过他们不象那九位圣徒那样享有名标青史的殊荣而已⑮。基督教从北部各地区开始传播，后来也在诸如伯根德、戈贾姆和绍阿等其他省份的贝札人和阿姆哈拉人当中扎根。在历代国王、王后、亲王、总督和教会高僧的诚恳帮助下，在原来传统崇拜盛行的那些地方建起许多修道院和教堂，从而使基督教受益不浅。

在阿克苏姆改信基督教以前或在阿克苏姆王国出现以前的时期，为诸神修建的庙宇往往是在长满高大树木、溪水长流的高地上。德卜勒-达莫、阿巴潘塔莱昂、阿巴梅塔德乞木扎纳和耶哈等地都有这方面的证据。在阿克苏姆诸王改变信仰后，所有这些庙宇也都改成教堂了。

411

现在我们谈谈来自拜占庭帝国各个角落的这些修道士在传布福音时使用的语言问题。接近宫廷的上层人物多少都通晓些外语，会说希腊、叙利亚或阿拉伯语；对他们来说似乎并

⑭ 埃明·拜(Emin Bey)，存放在巴黎国立图书馆里的手稿。
⑮ I. 圭迪，1896年，第19-30页。

不存在什么语言不通的问题。但这些外国修道士在他们的话能被普通老百姓听懂以前，非学当地语言不可。前往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等地朝圣的那些人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能说希腊或叙利亚语，因而可以充当口译或由他们自己直接向老百姓布道。

这个情况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几部宗教书中发现希腊式的姓名和叙利亚文字；如，Arami (Aramene), Arb, Haymanot, Hatti, Mehayn, Melak, Melekot 等等(意为：异教徒，星期五，信仰，罪恶，信徒，天使，神)。

阿克苏姆王国和阿拉伯半岛南部

很久以来人们就知道源于闪米特人的一些族群曾越过红海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定居，这也许是为了寻找比他们自己的沙漠地带肥沃富饶一些的土地。这些新迁来的人具有比土著各族(大部分祖先为库希特人，如贝札人、埃奎人等等)更高的文化，结果就把中央权力从土著手中接管过来并建设了耶哈、马塔拉、阿克苏姆和其他地方一些城市。

出于同源的其他一些族群(萨巴人、希姆亚尔人)留在本地，而那些跨过红海的人们则越来越强大，直至那里的阿克苏姆中央政府强大到某些人认为是世界第三大强国的地步。王家城堡、庙宇、象征马赫雷姆和阿尔马卡二神的圆形徽和新月徽，这一切都证明居住在红海两岸的两个民族本来就是一家。[16]

种族上和文化上的这种亲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阿克苏姆人之所以征服阿拉伯半岛南部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是他们的祖籍，也说明为什么国王埃扎纳极力强调他的正式头衔应当是阿克苏姆国王、希姆亚尔国王和萨巴国王，这和那些来自西部各地区自称卡苏，西雅莫和贝札的人或者本来就是库希特居住地区的土著截然不同。

直至四世纪初，红海对岸那些闪米特人仍然信奉传统的宗教，即对月亮的崇拜，以新月为徽记，穆斯林阿拉伯各国至今对它仍很崇敬。先知穆罕默德也许并未要求其皈依者抛弃这个徽记。阿克苏姆诸主教却与此不同，他们向信奉基督教的国王们施加压力，要他们以十字架标记取而代之。 412

阿拉伯半岛南部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斗争

长期以来，或许是自从我们纪元前 587 年内布查内扎破坏耶路撒冷并由拉吉德人占领该城以来，信奉希伯来教的一些族群就一直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罗马皇帝提图斯于我们纪元 70 年第三次破坏耶路撒冷，遭受罗马人迫害的犹太人受到阿拉伯半岛南部他们的同胞的欢迎，于是希伯来教信徒的人数就大大增加了。

而且，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之后，许多基督一性论者就离开拜占庭帝国到阿拉伯半岛避难；在卡尔西顿宗教会议之后，当阿里乌教派遭到谴责和迫害的时候，甚至有更多的人前来避难。在阿克苏姆历代国王和基督教徒帮助下，他们在那一带地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社

---

[16] C.康蒂-罗西尼，1928年，第四章。

会。在皇帝查士丁一世统治（518-527年）下，根据皇帝的命令，有许多叙利亚基督一性论者被放逐，前往希拉（纳杰夫，在今伊拉克境内），又从那里到达阿拉伯半岛南部，在奈季兰定居下来。⑰

处在犹太人和基督徒这两个教派之间，就是整个阿拉伯族群，其中包括也门人，卡塔班人，哈德拉穆特人，这些人墨守着对月亮的传统崇拜，因而很自然地受到繁荣的“克尔白”（或天房）周围地区的吸引。那时，伊斯兰教创始人、自然崇拜的破坏者穆罕默德尚未降生。三种宗教派别不得不比邻而居。但基督教徒在阿克苏姆人坚持不懈的帮助下，人口日增，组织并发展了他们的教派。他们修建了许多教堂。奈季兰和佐法尔（塔法尔）变成巨大的基督教文化中心⑱和重要的贸易城市。⑲

犹太人以他们在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才干也在萨巴和希姆亚尔形成一个集团并设法控制该地贸易。于是在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就发展起尖锐的对抗。基督徒认为犹太人是杀害神的罪恶分子，注定要下地狱烙烧；犹太人则辱骂基督徒为“异教分子”（Goyim），不信犹太教的败类和崇拜凡人的异端。

与阿克苏姆和拜占庭联合起来的基督教徒的节节胜利以及在拜占庭和阿克苏姆境内对信奉犹太教的人们的严厉惩治，促使阿拉伯半岛南部那些犹太人聚居地区形成一种凶猛的报复力量。忠于传统崇拜的阿拉伯人也受到基督徒垄断贸易的威胁，⑳终于使他们和犹太人站到一边。基督徒促使他人改宗的行为也可能促使这两种宗教联合起来，因为他们都受到基督教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帝国主义行径的威胁。

413

犹太人对奈季兰基督徒的大屠杀

查士丁一世皇帝在拜占庭执政期间（518-527年），卡莱布是阿克苏姆的皇帝。犹太人在希姆亚尔人帮助下对佐法尔和奈季兰的基督徒进行的大屠杀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这个事件主要由那个时期的宗教作家普罗科匹厄斯和瑟吉乌斯记录下来。㉑在盖埃兹文的著作里，国王的名字是卡莱布，而在这两位作者的文章里，却用希腊文的名字埃莱斯萨约斯；有时还写成埃尔·阿茨巴哈，这可能是阿拉伯文的写法，还可以看到一种变体：埃莱斯巴约斯。与此相仿，以祖拉或马斯鲁克知名的那位希姆亚尔犹太国王，登上王位时用的是犹太名优素福，而阿拉伯诸作家却称他祖－努瓦斯或杜纳斯，迪姆诺斯，迪米翁，或达米阿诺斯。㉒在记述奈季兰大屠杀情况的埃塞俄比亚著作中，他的名字又被写成芬哈斯。为了不致在读者脑子里引起混乱，我在本章中只称这位阿克苏姆王为卡莱布，称那位犹太王为祖－努瓦斯。

瑟吉乌斯曾声称他搜集的情况都是目击者提供的，下文所述那次大屠杀的情况就是从

⑰ E.A.T.沃利斯·巴奇，1928b，卷一，第261-269页。
⑱ 同上，1928a，第743-747页。
⑲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皮古莱夫斯卡娅(N.Pigulevskaya)的重要研究成果，1969年，这部书是由俄文译出的。
⑳ N.皮古莱夫斯卡娅，1969年，第211页及其后等处。
㉑ N.皮古莱夫斯卡娅根据的是其他史料。
㉒ C.康蒂－罗西尼，1928年，第171-173页。

他那里得来的（C.康蒂－罗西尼还曾把这一段译成意大利文收入他的《埃塞俄比亚史》一书）。希姆亚尔王祖－努瓦斯或称马斯鲁克在犹太人和异教徒支持下，迫害基督教徒。于是托马斯主教就去阿比西尼亚求援，也真的得到了援助。在某位名叫黑瓦纳的人率领下，阿比西尼亚军队渡过红海准备攻打祖－努瓦斯。后者因无力抵挡如此强大的兵力，于是就和这位阿比西尼亚领袖黑瓦纳签订一项和约；和约签订后，黑瓦纳就留下一部分军队，班师回朝了。在大部分敌军撤走后，祖－努瓦斯就背信弃义，大肆屠杀佐法尔的基督徒，放火焚毁了所有教堂，把留下的300名基督教驻军也都杀了。

但据那个时期的作家们描述，最厉害的一次大屠杀是523年在当时最发达的基督教中心奈季兰发生的。在殉难者中有一位极受尊敬的老贵族哈里特（阿雷塔斯），盖埃兹文称他为希罗斯。[23]

国王卡莱布出海远征

414

塔泽纳的儿子卡莱布或称埃尔·阿茨巴哈是那个时期最有名望的皇帝，或许和埃扎纳的名声不相上下。使他成名的原因之一就是下文所说的那次出海远征。

在我们纪元523年发生那次大屠杀之后，有一位名叫倭马亚的贵族设法逃回阿克苏姆，把基督徒在那里的遭遇向国王卡莱布和主教汇报了。另一些逃到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也向查士丁皇帝汇报。查士丁委托亚历山大城大主教蒂莫西捎信给卡莱布，催促他为基督徒报血仇。

不难想象，这两位皇帝听到基督徒遭受大屠杀的消息后会作出什么反应。不过，我们都知道，萨巴和希姆亚尔一带在种族上和文化上与阿克苏姆帝国的联系比拜占庭帝国的联系更为密切。于是国王卡莱布急忙召集起一支能克敌制胜的部队。据说他还从查士丁皇帝[24]那里得到12万名士兵和60艘军舰。[25]不过，其他一些作家却说他只率领停泊在阿杜利斯的他自己那些战船前往讨伐，还说他率领的部队不超过3万人。[26]

传统史料说，国王在完成他的军事准备后，曾前往阿巴·潘塔莱昂——九圣徒当中仍然活着的一位——所在的修道院，请求这位圣徒为他本人并为他即将进行的战役的成功祈福。这位老修道士答应使他取胜，于是国王就离此前往阿杜利斯附近的加巴扎海岸，当时那里正在紧张地进行备战活动。

我们纪元525年近五月底，卡莱布登上战船率领全部舰只启航驶向阿拉伯半岛南部，希姆亚尔王已在那里严阵以待。实际情况是，当国王率领部队到达时，发现敌方已用铁链把海港封锁，并有做好自卫准备的士兵驻守。

未等这次战斗结束，国王卡莱布就去寻找另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以便自己的部队登陆。事情凑巧，在战斗中被俘的祖－努瓦斯家族的一个人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个地方，于是

---

[23] C.康蒂－罗西尼，1928年，第172页。
[24] 在N.皮古廖夫斯卡娅的著作，1969年，第243页上可以看到关于这支舰队的来源的其他说法。
[25] N.皮古廖夫斯卡娅认为这些数字不准确，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见她的著作，1969年，第213页。
[26] 卡科(A.Coquot)，1965年，第223-225页。

国王率领20来只小船成功地登陆了，因而他能使希姆亚尔王的残部溃退。正当部队的主力继续战斗时，祖－努瓦斯落入国王卡莱布手中，一起被捉的还有他的七位伙伴。卡莱布正打算为受难的基督徒报血仇，于是毫不迟疑地把他就地杀死。

战役结束后，基督教部队首先攻打塔法尔(佐法尔)城，然后攻打奈季兰。这回轮到基督教士兵报仇了，他们所到之处大肆破坏，搞成一片废墟，对教敌大肆屠杀。在这次屠杀中，那些不会说士兵语言的基督教徒都在自己的手上画上十字符号，说明他们也是基督徒，应当饶他们的命。[27]

415

在奈季兰，国王出席了为纪念上次大屠杀中殉教的基督徒举行的仪式；他在回阿克苏姆以前，还下令在马里卜修建一座胜利纪念碑。[28]为了使后代记住他的名字，卡莱布还在马里卜为自己立了一座碑。[29]

国王回到阿克苏姆以前，还在佐法尔留下一位名叫苏姆亚法·阿斯瓦的人，叫他听从阿布拉哈的指挥，阿布拉哈不但在阿克苏姆宫廷而且在阿拉伯半岛南部都算是最著名的基督教将领。

他留下有1万名士兵的部队驻守。卡莱布在得胜后回到阿克苏姆时，人们以凯旋式大礼欢迎他，这当然是意料中事。但事后，这位既信教又好战的国王却不去品尝胜利果实的滋味，反而退隐到阿巴潘塔莱昂修道院过起修道士的禁欲生活，而且发誓永不离开这个地方。他把自己的王冠送到耶路撒冷，乞求约翰尼斯主教按照他在战役前发的誓把它悬挂在圣墓门外。

有些源出于希腊文或阿拉伯文的古代史料，以及从十六世纪以来当地人编写的史集，对于那次军事远征的情况以及那次报复性海战中较重要人物的姓名，记述各不相同，矛盾百出。而且，有些著述说只有一次远征，另一些却说卡莱布曾回到阿拉伯半岛，说直到第二次远征时才最后取胜。但对今天的读者说来，这些事并不十分重要。

假如传统著述中所记情况属实，那么国王在这么伟大的一次胜利之后让出王位这个决定确实令人钦佩。但另一部书却说卡莱布在位直至542年为止。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假如他在阿拉伯半岛上和祖－努瓦斯打的那一仗是在525年，而且纪年没有错，那么他在回到阿克苏姆之后接着又统治了17年。[30]

文字作品

阿克苏姆有几套供文人和宫廷行政使用的字母。在阿克苏姆的石碑石柱上，有些铭文只使用一种文字或者用萨巴文，或者用盖埃兹文，有时也用希腊文，但很少三种文字同时使用。萨巴文是萨巴各部落使用的字母，人们认为这些部落是阿克苏姆人的祖先之一，传统著作中把他们说成涅盖德约克坦（约克坦部落）[31]，说今天的阿姆哈拉人，提格雷人，古

416

[27] 伊尔凡(S.Irfann)，第242－276页。
[28] C.康蒂－罗西尼，1928年，第167－201页。
[29] E.A.T.沃利斯·巴奇，1966年，第261－264页。
[30] T.T.梅库里阿，1966b，第2－7页；C.康蒂－罗西尼，1928年，第108－109页。
[31] E.塞鲁利，1956年，第18－21页。

拉盖人，阿尔戈巴人和哈拉里人(阿德雷人)都是他们的后裔。

当时的希腊语就象今天的英语，是那个时期国际通用语；它是阿克苏姆引进的一种外语，因为当时这个王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和拜占庭帝国都有联系，特别是在似乎已采用希腊名字的那些国王——如佐斯卡勒斯、阿菲拉斯、安迪比斯、松布罗图斯等等——统治时期，联系更为密切。最后，从六、七世纪以来就变成阿克苏姆官定国语的则是盖埃兹语(起初没有元音符，后来才加上)，亦即所谓阿加伊齐安语，这是当地人给这种语言起的另一个名称，意即解放者的语言。[62]

总的看来，语言可以为进行研究的人们提供有用的线索，但它本身并不能分辨种族集团。这是因为，当地人有的可能是闪米特人的后代，阿克苏姆国籍，但文化却是希腊的；而另外一些人其祖先可能是贝札人或布勒米人，出生时是努比亚人或努比亚国籍，但他的文化却是埃及的。因此，一个说盖埃兹语或写盖埃兹文的人并不一定是阿克苏姆人。

在阿拉伯人于七世纪征服中东和北非之后，希腊语和萨巴语就让位给盖埃兹语了，这种语言开始在民政、军事和宗教等所有领域使用。希腊文只是通过人们把希腊文圣经译成盖埃兹文和教会神父(如亚历山大的西里尔或圣约翰·赫里索斯托姆等人)的某些著作得以保持其影响。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译者在盖埃兹文中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恰当的词，就用希腊词汇。这就是希腊文有所发展、至今仍在埃塞俄比亚使用的缘故。

由于十三世纪以前的羊皮纸手稿已荡然无存，现在人们知道的真实可靠的阿克苏姆作品就只限于碑铭上和古钱上的文字了。有时，一些业已相当模糊或本来就刻得不清楚的铭文使人看不出文章的意思，以致无法无脱漏地把作品恢复其本来面目。

标志着基督教时期阿克苏姆作品开端的第一篇铭文就是《考察记》列为第二号的那一篇。新改宗的埃扎纳国王在那篇铭文中描述了他战胜诺巴人(努比亚人)的情形，因为他们竟敢对国王在塔卡齐河彼岸的权力提出异议，并曾把国王的使者处死。这位打了胜仗的皇帝谴责“诺巴人虐待并欺压门古托、哈萨和巴里亚等黑、红肤色种族，并曾两次违背他们过去的誓言……”，由此人们可以相信他是具有道义观念的。这是不是他改信新宗教带来的结果呢？

可是，埃扎纳曾吹嘘说，多亏他尊为“天地之主和征服者”的那位新上帝的威力，使他杀死602名男子，415名妇女和一大批儿童，但他自己并不算干了不公正的事。看来，他这些话的意思似乎是说，是背信弃义的诺巴人挑起的战端，他们受惩罚是罪有应得。[63] 417

阿克苏姆历代国王所铸大量货币上也反映出基督教的影响，铸币上原有的古代宗教标记新月被基督教的十字架标记取代了。阿克苏姆某些国王，出于为自己扬名或获取百姓同情的愿望，把很离奇的传说刻在铸币上。国王瓦泽德或瓦泽巴(国王卡莱布之子，六世纪时人)把自己的肖像铸在货币一面，另一面铸着这样一句铭文：“愿人民欢乐”。国王利韦尔的铸币最突出，一面是他戴着王冠的头像(王冠的右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十字架)，另一面是一个十字架，看来这是为了表示他是一位热忱的基督徒。这位国王在另一枚铸币上的铭文“基督和我们同在”[64]是用盖埃兹文铸的，上边没加元音符号。这是头一次提到基督的名

---

[62] E.A.T.沃利斯·巴奇，1966年，第136-137页；C.康蒂-罗西尼，1928年，Monete axumite Tabola LX。
[63] E.塞鲁利，1956年，第222-223页。
[64] 库尔博克斯(J.B.Coulbeaux)，第59-60页，T.T.梅库里阿，1967年。

字。

在五、六世纪期间，旧约全书逐步由希腊文译成盖埃兹文。《圣经》渐渐在埃塞俄比亚流行起来，在宫廷，在宗教界，讲经已成极其重要的大事，《圣经》终于成了科学和哲学的唯一基础，不过，这却并未掩盖教会神父某些著作的光辉。

在我们纪元451年召开卡尔西顿宗教会议以后，九圣徒及其门徒到达埃塞俄比亚，加强了基督一性论在埃塞俄比亚宗教界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埃塞俄比亚教会对从西方来的所有其他著作，不论其价值如何，故意回避的缘故。人们还记得，以先知穆罕默德的伙伴阿穆尔·本·阿拉斯为一方，以宗主教本杰明和什诺达为另一方，在征服埃及期间于640年赫利奥波利斯被围困时达成的协议。埃及的基督一性论者对宗主教穆考基斯和所有主张基督有双重本性的人的仇恨，导致他们和穆斯林一方联合起来。

如前所述，《圣经》业已成为一切知识的源泉。自从基督教在人群中扎根直至二十世纪初，任何一位配得上称为学者的埃塞俄比亚人，都不是精通希腊－罗马科学或哲学的人，而是一位懂得《圣经》和宗主教西里尔、圣约翰·赫里索斯托姆以及教会其他奠基人的著作的人；而且还是一位能够评论各种不同的版本并恰当地解释基督如何化为人形和上帝三位一体的奥秘的人。

418 就阿姆哈拉王朝而论（据称他们是所罗门的后裔，阿克苏姆诸王的合法继承者），当时最受尊敬的国王就是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其次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君士坦丁大帝和西奥多修斯二世，后两位是因为他们曾给基督教以帮助。他们对查理曼、查理·马特或胖子查理毫无所知。在诸修道士心目中，最出名的圣经人物是约书亚、参孙和基甸。《赞美歌》，《箴言》，《所罗门智慧之书》，《西拉什之子之智慧书》等等，被认为是真正哲学著作，胜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弗吉尔、塞内卡和亚塞罗以及中世纪西方诸学者，他们一无所知。

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社会对大卫的爱戴和赞美超过其他任何人，认为他是玛丽亚和所谓所罗门王朝的祖先。埃塞俄比亚信教的人们喜爱《诗篇》，他们相信每天早晨读《诗篇》就可以避邪；经常诵读《诗篇》，就会象大卫那样，使全能的上帝成为自己独有的同盟者。

在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社会中，《诗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各种极不相同的场合，人们都背诵《诗篇》。例如在办丧事时，各位领唱者（Debterotches）在棺材旁边分诵《诗篇》各首，其他教士则集中诵读《丧葬之书》（Quenzete），这种书极象古埃及的《死者书》。

一些信教的人把《诗篇》用作祈祷词，另一些人则把这些诗篇用在宗教魔法方面。学者熟悉在什么情况下用哪些诗篇最适当，如为了求得幸福或避免不幸，避开即将出现的可怕的瘟疫或者在枪林弹雨中保全生命等等。他们一般引用的是《诗篇》中的6、7、10、57和其他若干篇。

为了说明他们经常求助于《诗篇》的情形，我只举两个例子。一个农民丢掉自己的牛、羊或驴，找不到了，这时他就背诵或请别人背诵《诗篇》1－16，18和10－12。

1927年，第一架飞机到达亚的斯亚贝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事件。第二天就在皇后佐迪图和塔法里公爵，即未来的海尔·塞拉西光临下组织了一次庆祝大会。所有的教士和领唱者都穿着他们的大礼服出席了。当人们问一位宗教领袖在这个情况下应当唱什么的时候，

他立即建议唱下面这些诗句："你……展现于穹苍如帷幔……以云彩为车辇，乘风翱翔……穹苍下垂你降临……乘风飞行，乘风飞行，隐没于黑暗中"(《诗篇》第104篇和第18篇)。

埃塞俄比亚从基督教的阿克苏姆承继的一部分遗产就是收集在名叫《德古瓦》(Deg-oua)的一部书中的那些礼拜赞美诗。据十四世纪当地史料记载，书的作者是阿克苏姆本地一位名叫亚雷德的人，是和国王格布拉·马斯卡勒以及九圣徒之一的阿巴·阿加维同时代的人。

仔细阅读这部宗教赞美诗之后就会看出，它的内容来自《圣经》、早期诸大主教的著作以及三至八世纪著名神学家的著作和一些伪经书籍。这些赞美词以诗体紧密排列，组成一部有若干卷的分章节的巨大诗集。然后每一节诗还可细分，第一行常常是用红墨水写的，并为每年每月的节日都写了一节。这些诗都是赞美天使、圣徒、殉教者，圣母玛丽亚和上帝的，为早晚祈祷时歌唱使用。 419

礼拜时唱的赞歌分为四节，各节的腔调象征着上帝的宝座周围那四只活物（《启示录》4：6），变化各有不同，因而同一节诗可在各种不同节日的歌唱和舞蹈中使用。我不妨把这四节介绍如下：

(1)"库姆-泽马"(Kum-Zema)是主调，极其简单。

(2)"泽马内-摇摆"(Zemane-oscillating)，是最长的调。歌唱时领唱者挥舞右手中的长指挥棒；挥动时按歌调韵律不同向各个方向扭动身躯。

(3)"梅雷芝-急转"(Meregde-skip，上下急转)，这节的调子比上两节稍急促些。这时担任领唱的修道士以左手握指挥棒，有时是拄着，右手握的是按其职位等级不同分别以铁、铜或金制成的摇击乐器。他上下挥动这件乐器。坐在一旁的两位青年击鼓伴奏，细心跟随赞歌的韵律。任何不小心敲错鼓点的人都要立即撤换。

(4)"茨发特"(Tsfat，鼓掌)是最快速的一节，可以在摇击乐器伴奏下连续唱一段时间。近尾声处，"茨发特"即由"韦雷卜"(Werebe)接替，后者是一种变化多、极其悦耳的变调，由一位颇有才华的领唱者独唱，他的声音很好听；其余的人们静静聆听，然后和他合唱、齐唱，从中速(Lezebe)慢慢过渡到快速(Dimkete)，从轻快到最快(Tchebtchedo)。这时，那两位青年站起来，把鼓绳系在脖子上，大力敲打，表达对这支神圣赞歌的热情和欢乐。

领唱的那几位把细薄纱罩在头上，身上穿着节日的大袍，把指挥棒扛在左肩上，右手拿着摇击乐器，开始以较快速的旋律边唱边跳。

这是赞歌最活跃的部分，主要领唱人作一些使人惊叹不止的动作，这时那些兴致勃勃的妇女不时从人群中发出高兴的喊声："咿利利利！"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教堂里边或外边进行的；举行的时间是在各个宗教节日，不然就是在庆祝传统的著名塔博特(Tabot,即圣匾)揭幕式上进行的，这种圣匾是仿效摩西约柜的先例做的，代表教堂所要奉献的那位圣徒。这种仪式是在皇帝、主教以及民政、军事、宗教等方面官员到场的情况下举行的。 420

当教堂主管在典礼大师——他同时又是教会的主要的"利克卡赫纳特"(LIKE KAHN-AT)——同意下，认为在场的人们确已尽兴，就示意停止赞歌。于是刚才还热闹非常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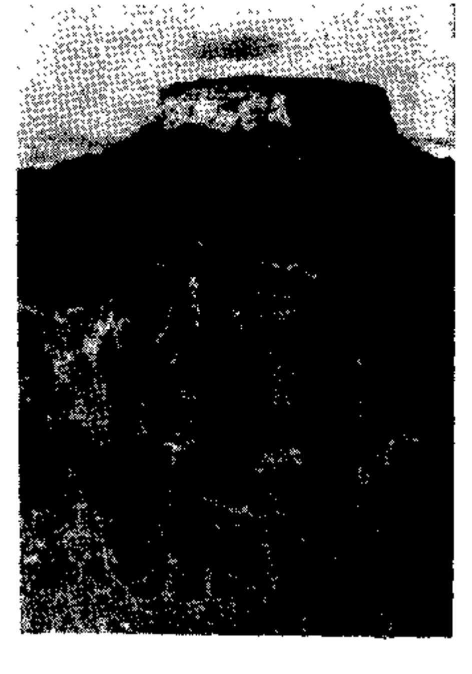
教歌舞，立即变成沉寂。然后主教起身向众人念最后祈福词。把圣匾送还原处时也以同样的赞歌和“依利塔”(ILILTA)祝贺，和取出时一样，所有的人都匍匐礼拜。

圣经文学和礼拜赞歌具有世代相传的悠久历史，部分是信史，部分是传说；我只能简略地这样说说，不敢冒昧多谈了。这些作品是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数百年来慷慨留赠给埃塞俄比亚人的遗产中的一部分。

（李 活译）



图片 16.1 戈镇教堂里的绘画：九圣徒(十五世纪)



图片 16.3 德卜勒－达莫远景



图片 16.2 国王弗鲁门蒂乌斯·阿布拉哈（埃扎纳）和他弟弟阿茨巴哈，得自阿布拉哈阿茨巴哈教堂（十七世纪）



图片 16.4 通向德卜勒－达莫教堂寺院的道路



422



图片 16.5 唱诗者按教规鞠躬

图片 16.6 德卜勒-达莫的阿巴·阿加维教堂



17 原始柏柏尔人

J.德桑热

小非洲的柏柏尔人：一个民族的起源，撒哈拉地区干旱化和来自地中海的早期影响；小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一个残留的种族成分

在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初期，腓尼基人到达非洲沿岸以前，利比亚居民的种族成分就已大致稳定下来了，在整个上古时期都不曾出现什么变化，因为腓尼基人和罗马人在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似乎微不足道。事实上，腓尼基人对于小非洲人口增长的作用是难以准确估计的。不过，假如来自腓尼基人的雇佣兵人数众多，迦太基人看来就不至于如此经常地求助于其他雇佣军了。罗马人对这一带人口增长的作用也不易估计。在奥古斯都时代向非洲殖民达到高峰时，在非洲定居下来的意大利人估计为15,000人①。此外，还应加上自愿到非洲定居的几千名意大利人。我们认为，奥古斯都时期，在非洲定居的移民最高数字是2万人左右，因为罗马属下的非洲根本不是一个大规模移民地区。至于到这个地区定居的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无疑更少得多了。

最迟在我们纪元前13,000年时，②这个地区就已经存在一种被人们很不恰当地称为伊比亚-毛鲁西亚文化了（尽管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行是9000年以后才开始的）。形成这种文化的种族是梅奇塔-阿尔比人。他们身材高大（平均1.72米），头部较长，前额较低，四肢较长（他们可能是马格里布地区人类最早的种族）③；他们有把门牙拔除的特殊癖好。在某些远古遗址上，尤其是在科伦纳塔（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大约我们纪元前6000年的遗址上，发现这个种族有渐向中等短头演变，身躯也向细小发展的迹象。这种名称欠妥的伊比利亚-毛鲁西亚文化在我们纪元前第九千纪末消失了，不过，并非是在各地突然消失的。在昔兰尼加，它被卡普萨文化所取代，而在阿尔及利亚西部④和摩洛哥，它不大明显地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在突尼斯东北沿岸地区和近海诸小岛上，⑤未发现存在这种文化的任何

① 罗马内利(P.Romanelli)，1959年，第207页。
② 康(G.Camps)，1974b，第262-268页。
③ 见巴卢(L.Balout)，1955年，第435-457页；又G.康，1974d，第81-86页。
④ 查姆拉(M.C.Chamla)，1970年，第113-114页。
⑤ L.巴卢，1967年，第23页。

迹象，在丹吉尔地区也没留下多少痕迹。一般认为这种文化曾到达加那利群岛，但看来这是极少可能的，因为古安切人虽然在人类学上看来和梅奇塔-阿尔比人相似，但在谋生方式和习俗方面却和后者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文化不可能来自欧洲，因为早在通过海峡和往返西西里岛的航海事业开始以前，它就已经兴起了。人们往往设想它起源于东方，而正如J.蒂克西埃所说，它更可能是从尼罗特苏丹的北部传来的。后来由于受到各族移民的压力，这些伊比利亚-毛鲁西亚人无疑都逃到山区避难，因而在人类学上，可以视为山区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约在我们纪元前7000年时，[6]这里出现了一种身材相当高大的人，属于地中海种族，但不乏黑人的特征。[7]由于发现的遗址在卡普萨(今加弗沙)，就称为卡普萨人。他们在一个地区兴盛起来，这个地区虽未能准确划出，但可以肯定是在内陆；不过显然并未扩展到北非最西部边缘地带，也未曾到达撒哈拉南部。他们通常定居在小丘上或靠近水源的山坡上，但有时也住在有湖泊和沼泽的平原上。其食物包括蜗牛。这种文化也来自东方，但不可能是经由海上传过来的。据推断，大约在我们纪元前4500年时，这种文化就消失了。卡普萨人的头盖骨虽与当时许多头骨类型相同，但人们认为真正原始柏柏尔人直至新石器时代才明显地出现，这是因为，卡普萨丧礼在利比亚-柏柏尔世界看来并未流传下来。[8]不过，应当注意到，标志着卡普萨人生活方式特点的使用鸵鸟蛋并加以绘饰的习惯——不妨借用康-法布雷这个生动的说法[9]——却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一直持续未断，直至史书已有记载的利比亚各族人民(如加拉曼特人)的时代。据卢西安说，加拉曼特人使用鸵鸟蛋以达到各式各样的目的，这在阿布恩杰姆(即的黎波里塔尼亚内地)的发掘中业已证实。[10]尽管如此，小非洲的新石器时代人无疑可看作卡普萨人的亲戚。总而言之，马格里布历史上形成的居民肯定是由伊比亚-毛鲁西亚人、卡普萨人和新石器时代人这三种成分混合的结果，只是各族的比例尚未弄清。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从陶器出现开始的。新近的碳-14测定结果表明，陶器的使用是从撒哈拉中部和东部向外扩展的。这个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古老的陶器类似苏丹人的陶器式样。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们纪元前第七千纪的恩内迪至霍加尔一带地区。[11]这些陶器的制作者很可能是同早期喀土穆地区的苏丹人有血统联系的黑人或尼格罗人。到我们纪元前4000年，牛无疑已驯养成家畜。在阿卡库斯地区，牛的驯养可能更早一些[12]。属于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较晚，在弗拉特斯堡的遗迹大约是我们纪元前5350年[13]，在萨乌拉河流域还略早一些；在卡普萨地区北部，这种文化在我们纪元前4500年以前还没有稳定下来。在“马格里布高地和撒哈拉北部”，这两种文化潮流之间的地区，新石器

⑥ G.康，1974b，第265页。

⑦ 关于G.康的保留意见，见1974 d,第159页。

⑧ L.巴卢，1955年，第435－437页。

⑨ 康-法布雷(H.Camps-Fabrer),1966年，第7页。

⑩ 雷比法(R.Rebuffat),1969－1970年,第12页。

⑪ 于戈(H.J.Hugot),1963年，第134页；参看：同上书，第138页及注3，第185页。关于新近的碳-14测定的年代表，参看G.康，1974b,第269页。

⑫ 雷舍(W.Resch),第52页；还可参看贝克(P.Beck)和瓦尔(P.Huard);莫里(F.Mori),1964年，第233-241页；梅特(J.P.Maitre),1971年，第57－58页。

⑬ G.康、德利布里阿斯(G.Delibrias)和托梅雷特(J.Thommeret),第23页。

时代文化的特征直至很晚才出现。来自欧洲的影响就更谈不上，不过，摩洛哥和奥兰沿海一带在我们纪元前第六千纪出现的另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值得注意⑭，但我们不敢肯定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行早在那时就已开始。巴卢把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航行开始的年代定在我们纪元前第四千纪。

新石器时代比较湿润的时期大约在我们纪元前第三千纪中期就已结束，这可从泰萨(霍加尔地区的阿塔科尔)鸟粪层的年代测定得到证实。⑮阿克尔对喀土穆地区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发现的动植物化石所作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在尼罗河上游一带也是如此。从那时以后，北非和整个非洲大陆之间几乎完全被大沙漠所隔绝，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孤岛，只有通过狭窄的的黎波里塔尼亚走廊才能和非洲其余部分畅通。不过，非洲原有联系的急剧减少却由于另一种联系而得到补偿，即恰在那个时期与马格里布的两翼建立了新的联系：一翼是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另一翼是西西里、撒丁岛、马耳他和意大利南部。⑯

426

早在我们纪元前第三千纪末期，休达地区加尔卡哈勒的彩陶片就和洛斯米拉雷斯铜石并用时代的陶器相似。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也许早在我们纪元前第四千纪就已存在海路接触⑰。从我们纪元前2000年，象牙和鸵鸟蛋就已运进西班牙，同时，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钟形器皿也在休达和得土安地区出现。在小非洲西部发现了大约在我们纪元前1500年的紫铜和青铜箭头。无疑，这些东西最早是由伊比利亚猎人运来的；不过，看来这些东西向西传播并未越过阿尔及尔地区。由于北非没有锡，所以几乎看不到使用青铜的情况。在小非洲另一端，从科尔巴至比塞大一带，出现了利帕里群岛出产并经西西里岛和班泰雷利亚岛加工的黑曜岩片，证明通过墨西拿海峡的航行业已开始。G.康⑱曾提请人们注意，从那时以后，小非洲东部就仿效其欧洲邻居的很多习俗：带有短入口甬道的长方形坟墓和在石崖上穿凿的称为"郝内特"(Haounet)的直角洞穴崖墓早在我们纪元前1300年在西西里岛上就已存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石桌墓跟撒丁岛及意大利广泛发现的那些墓相同；大约在我们纪元前1500年西西里岛上很普遍的在浅底色上绘有褐色或黑色几何图案的卡斯泰卢西奥陶器，就是卡比利亚陶器的先导；如此等等。来自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等更远地区的影响，是经由马耳他、班泰雷利亚和西西里等岛屿传来的——从爱琴海地区和后来从腓尼基来的航海者开始到达这些岛屿时就把这种影响传来了。北非这片土地，早在迦太基出现以前很久，就通过上述途径在地中海文化圈中作为一个巨大的半岛取得了一席地位；但也通过的黎波里塔尼亚走廊接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例如，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在阿特拉斯山脉南麓普遍流行一种附有墓室和祈祷室的丧葬建筑，安葬祈祷仪式可能就在其中进行。廷·希南的陵墓就是这类建筑的一个变形。⑲

应当强调指出，位于非洲大陆边缘的小非洲，由于撒哈拉地区干旱化和航海事业的出

⑭ L.巴卢，1967年，第28页；G.康，1974b，第272页。
⑮ 庞斯(A.Pons)和奎泽尔(P.Quézel)，第34－35页；G.德利布里阿斯，H.J.于戈和P.奎泽尔，第267-270页。
⑯ G.康著作，1960a，第31－55页；1961年。
⑰ 苏维尔(G.Souville)著作，卷三，第315-344页。
⑱ G.康著作，1974d，第206页。
⑲ G.康，1974d，第207、568页；1965年，第65-83页。

现，有其深刻的独创性。不过，它和非洲内陆的一切联系并未完全断绝。古代北非的气候和今天基本相同，撒哈拉边缘地带的广大丘陵也曾有很长一段时期水较多而且林木葱茏，[20]

427 由于地下含水层距地面很近，取水较易，因而马匹也可用来在撒哈拉旅行。特别是在费赞地区，地下含水层溢出地表的现象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大普林尼的著作(《博物志》，XXXI，22，)曾提到阿普希达莫威湖(apud Cidamum)，贝克里的著作(《北非概况》，原作法文，英文版由斯雷恩译，第116页）提到从内夫扎瓦至盖达米斯的沼泽区。在古代，在撒哈拉大部分绿洲中，在费赞地区和阿特拉斯山脉靠撒哈拉一边的山坡上，那些黑皮肤的人(后来被希腊人叫作埃塞俄比亚人，亦即"晒成黑脸的人")，就和利比亚－柏柏尔世界有交往；这个事实足以证明非洲当初是一个整体。[21] 这些黑皮肤的人过着安宁的生活，他们不但从事采集食物和狩猎活动，而且还以极其古老的灌溉方法从事农业。[22]

如果想象在新石器时代及有史初期存在一个完全是埃塞俄比亚人的撒哈拉，这肯定是错误的，即使我们谨慎地把"埃塞俄比亚"这个词最广义的理解为"有色人种"而不仅仅指"尼格罗人"，那也不妥。M.C.查姆拉近来认为下列设想有可能得到证实：[23] 这个时期的遗骨只有四分之一是属于黑人的，而40％以上看不出任何尼格罗人的特征。另一方面，在阿卡库斯一个被岩石覆盖的沉积层中发现的一个儿童遗骨却是属于尼格罗人种，其年代大约在我们纪元前3446年至前180年之间。[24] 在古代迦太基人的墓地，尼格罗人遗骨并不罕见，而且在迦太基军队中还有黑人辅助部队，这些人肯定不是尼罗特人。如果我们认为狄奥多勒斯的著作(XX,57.5)是可信的，那末，在突尼斯北部，阿加索克勒斯手下一位副将曾在我们纪元前四世纪末征服过一个民族，其肤色和埃塞俄比亚人类似。在小非洲南部边缘地带，有很多证据说明"埃塞俄比亚人"的存在。在整个古典时期，人们还提到属于中间种族的一些民族，特别是在托勒密的著作中曾提到黑色盖图勒人及白色埃塞俄比亚人。人

428 们偶尔也把加拉曼特人说成有些黑甚至漆黑。托勒密的著作(I.9.7，第25页)中曾说他们有些黑，在另一处(I.8.5，第31页)又说他们"很象埃塞俄比亚人"。还说有一个加拉曼特奴隶，身体颜色和沥青一样。[25] 对他们的墓地进行的人类学考察，证实了这个种族具有混合人种的特征。[26] 如果说尼格罗人的遗骨是奴隶们留下的，这种论断纯属偏见，很难置信，因为把四处白人遗骨中的两处说成是古加拉曼特人占的比例，这种结论是武断的。

看来，这些有色人种与当时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沿岸各族绝大部分居民并无任何血

---

⑳ 布策尔(K.W.Butzer)，第48页。这位作家认为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这个地区的气候曾稍有好转。但P.奎泽尔和马蒂内兹(C.Martinez)的意见(第224页)相反，他们认为从我们纪元前2700年以来干旱化过程一直在继续。

㉑ 关于北非的埃塞俄比亚人，可参看S.格塞尔，1913-1928年，第293-304页。关于"埃塞俄比亚人"这个词的含义(据认为这个名称在皮洛斯石碑上早已以埃提约科(ai-ti-jo-qo)这个形式刻上了)，参看小斯诺顿(F.M.Snowden,Jnr)，1970年，第1-17、15-16页和德桑热(J.Desanges)的评论，1970年，第88-89页。

㉒ 关于突尼斯南部诸绿洲(其部分居民是"埃塞俄比亚人")的灌溉和种植情况，参看大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第188页；贝克里(El Bekri)，第116页。关于加拉曼特人(一种混合居民)的地下水渠(foggaras)的重要意义，参看丹尼尔斯(C.M.Daniels)，1970年，第17页。但是洛特(H.Lhote)，1967年，第67-68页，持保留意见。他认为这些"埃塞俄比亚人"以采集食物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㉓ 查姆拉(M.C.Chamla)，1968年，第248页和图片8。

㉔ 萨廷(F.Sattin)和古斯马诺(G.Gusmano)，第8页。

㉕ 弗隆蒂努斯(Frontinus)，《斯特拉特》(Strat)1，11，18；在我们纪元前480年西西里战役期间。克劳迪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1901年，第743、745页；里斯(A.Riese)，第155-156页；狄奥多勒斯(Diodorus)，XX,57.5。

㉖ 塞尔基(S.Sergi)。

缘联系。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一个原有的种族群，由于中世纪的奴隶贸易，西非的人口稳步增长，因而原有族群现在大部分已被湮没了。继R.科利翁之后，圣格塞尔[27]根据突尼斯南部诸绿洲中据信是“埃塞俄比亚人”后代的形象加以推断，描绘远古“埃塞俄比亚人”的状貌如下：

> 体高中上，颅骨狭长，顶部向后倾斜，前额后倾，眉部突起，颧骨特别显著，脸形呈狭窄三角状，塌鼻子短小而翘起，但非扁平，口大唇厚，向后削的下巴，宽大的四方肩，胸部如倒锥形，往下逐步收缩直至骨盆，肤色极黑，或呈红棕色，眼睛和稍稍卷曲的头发呈黛黑色。

简言之，这种类型和某些尼罗特人相似，不过这些牧民——撒哈拉“埃塞俄比亚人”的祖先——的体格彼此很不相同。据H.洛特[28]和G.康[29]说，其中有一些类似今天的富拉尼人，另一些则类似托博人。H.冯·弗莱施哈克[30]认为其中还有科伊桑人和一种来自亚洲的既非黑人又非白人的尚未分辨清楚的种族的后裔。

利比亚-柏柏尔人（沿海一带的毛里人和努米底亚人，高原上的盖图勒人），大沙漠边缘地带的白人和混血种的撒哈拉人——如法鲁西人，尼格里特人和加拉曼特人，分布在苏斯和杰里德一带的“埃塞俄比亚人”——这些就是腓尼基人海上航行开始时小非洲的民族，在整个远古时代，情况一直是这样。

原始柏柏尔人与埃及人和海上诸民族的关系

429

在我们纪元前第二千纪，有关利比亚的史料，无论是铭文还是绘画雕像，主要与埃及有关，记载的也都是利比亚各族居民和埃及交往的情况；[31]在尼罗河流域统一以前，利比亚人就已在尼罗河三角洲西北部定居了。

早在王朝以前时期，大约我们纪元前第四千纪中叶，阿拉克山区的象牙刀柄上或许就已刻着长头发的利比亚裸体像，只用腰带吊着一块东西掩盖生殖器部位。不过，这种解释曾受到诘难，而且在埃及人把利比亚人叫作“特赫努人”这个最初的名称出现以前，我们也不能从肖像断定那就是利比亚人。据W.赫尔舍[32]说，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国王斯科皮奥的一块片岩护肘甲上，后来又出现在耶拉孔波利斯地方的一个象牙圆筒上，其年代在纳尔美尔统治时期(我们纪元前第三千纪)。这个圆筒上刻着法老的战利品和俘虏。但是，我们从萨胡拉丧葬寺院（第五王朝，约在我们纪元前2500年）的一个浅浮雕上才看清特赫努人的体形和衣着。

这些人身材高大，轮廓鲜明，厚唇，大胡子，发式颇具特色，颈后蓄发浓密，卷发披到肩上，前额披着一小绺卷发。除上文提及的腰带和遮羞布外，双肩佩戴着宽阔别致的锦

---

[27] 格塞尔(S.Gsell),1913－1928年，第294页。
[28] H.洛特，1967年，第81页。
[29] G.康，1970年，第39－41页。
[30] 冯·弗莱施哈克(H.von Fleischhacker),第12－53页。
[31] 加达拉赫(F.F.Gadallah),第43-76页（阿拉伯文，英文纲要第78-81页）。
[32] 赫尔舍(W.Hölscher),第12页。

带，交叉在胸前，还有挂着装饰品的项圈。在我们纪元前第三千纪，他们住在利比亚沙漠及其绿洲上。

大约在我们纪元前2300年，第六王朝时期，有些记载就提到特梅胡人了。这些人并不象O.贝茨揣度的那样[33]是特赫努人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新的族群；他们的肤色较淡，蓝眼睛，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金发的人。[34]他们穿的皮制外套常常露出一个肩膀。据哈库夫第三次旅行所作记载，他们居住的地区似乎与下努比亚毗邻，而且必定包括哈里杰大绿洲。[35]有人认为，他们就是在中王国时期和新王国初期定居在努比亚的C族群，[36]而且由于这一族群的陶器和第三瀑布西南400公里的霍瓦尔干涸河道一带发现的陶器相似，这一假设得到了佐证。[37]

430 这些特梅胡人似乎都是好战的武士，因而中王国诸法老不得不常常和他们打仗。在新王国时期，他们常常被描绘下来，长发在耳前下垂卷到肩后，很容易辨认出来。他们常常在头发上插着羽翎，有时也纹身。他们的武器是弓箭，有时是剑或飞镖。希罗多德在五世纪的锡尔特－利比亚人身上也注意到了这些特征。由此推断，特梅胡人确实是希腊人知道的昔兰尼加地区利比亚人的祖先。不过，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证明G.默勒的大胆假设是合理的。他认为特梅胡人就是希罗多德的著作（IV,168）中所说的埃及人的紧邻阿迪马奇德人，[38]虽然西留斯·伊塔利库斯在他的《迦太基人》（IX,223，225）一书中曾把阿迪马奇德人看成是尼罗河畔的居民，或许也象努巴人那样偶尔占据南方那些绿洲。据《迦太基人》（III, 268－269）一书记载，梅特胡人的身体也象努巴人那样被太阳晒黑了，从而使他们近似其邻居下努比亚的阿迪马奇德人，但后者仍然和特梅胡人光亮的肤色不一样。他们在凯沃出现只不过是人们提出的一种假设。[39]

第十九王朝时期，特梅胡人的侵袭对埃及的威胁更大了。在塞提一世于我们纪元前1317年把他们击退以后，拉美西斯二世把一些利比亚队伍编入埃及军队，并在远至阿拉曼的地中海沿岸一带设置了一道防线。[40]阿拉曼的石碑上的铭文证实拉美西斯二世确曾占领这一带地方，也是首次提到利博人(Libou)。希腊人就是根据这个族名给这个地区起了一个地理名称利比亚，后来这个地理名称应用于这些人活动的所有地区，以至逐步用于整个非洲。在我们纪元前1227年迈内普塔统治时期，又提到利博人的西邻梅什维什人。[41]看

---

[33] 贝茨(O.Bates),第46页。

[34] 默勒(G.Möller),第38页；W.赫尔舍，第24页。

[35] O.贝茨，第49-51页。

[36] 同上书，第249页，注3；关于词汇见251页．参照维希什尔(W.Vychichl),1961年，第289-290页。

[37] W.赫尔舍，第54-57页；阿克尔(A.J.Arkell),1961年，第49-50页．特里格(B.G.Trigger)持保留意见，1965年,第88－90页。

[38] G.默勒，第48页；W.赫尔舍，第50页，从历史语言学角度作的反诘。

[39] 麦克亚当 (M.F.L.Macadam),1949年，卷一，第100页，第20，21号；ADRMKDE和ADRMLKD。

[40] 布林顿(J.Y. Brinton),第78-81页，163-165页，图片XX,插图4；罗维(A.Rowe),第6-7页，插图4。关于后来由拉比布·哈巴奇(Labib Habachi)在扎维耶拉卡姆发现的雕有拉美西斯二世战胜利比亚人的场面的那六座新石碑的材料，参看勒克朗(J.Leclant),1954年，第75页，图片XVIII、

[41] 温赖特(G.A.Wainright)，第89-99页。关于利博人和梅什维什人那些头目的名字，参看约约泰(J.Yoyotte)、1958年，第23页。J.约约泰认为利博人距尼罗河三角洲更近一些，沙穆(F.Chamoux)，第55页，看法相反，说利博人在梅什维什人以西，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对。严格意义上的利比亚一直是在靠近马里欧蒂斯的那个地区，参看克劳迪乌斯·托勒密，1901年，第696-698页。由此可知，利博人必然定居在靠埃及很近的地方。关于这些民族后来的遭遇，参看J.约约泰，1961年，第122-151页。

来，利博人和梅什维什人都属于范围更广的特梅胡族群的一个组成部分。[42]但人物画表明梅什维什人都围着遮羞布(无疑因为他们已行过割礼)，而利博人却缠腰布。这些联合起来的部落在占领拜哈里耶和费拉菲赖两个绿洲之后，在孟菲斯西北方被埃及人打败了。凯尔奈克寺院的一篇铭文记载着利比亚人近旁存在的北方各民族：阿凯维什人，图尔夏人，夏尔丹人和夏卡勒什人。他们都属于当时正在洗劫巴勒斯坦的海上诸族群。他们出现在埃及西边有些出人意料，因而人们有时认为凯尔奈克铭文把几乎同时进行的两个战役——一个在三角洲东边，一个在西边——混淆了，[43]或者简单地把北方这几股队伍说成是脱离埃及军队的雇佣兵。 431

埃及和利比亚之间这两次最著名的战争，是在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我们纪元前1194年至1188年之间进行的。这在《哈里斯大纸草书》以及在哈布城法老举行葬礼的寺院里的铭文和浮雕上都有记载。利博人和梅什维什人曾先后试图在尼罗河一带打败埃及人的抵抗但未能成功，却接连被埃及人挫败。许多战俘被强行编入法老的军队，他们在军中优异的军事素质深受赞赏，以致在新王国将近结束时，利比亚军官在埃及军队中就已取得支配地位。还有材料提到拉美西斯三世讨伐过的利比亚人中的埃斯贝特人和贝肯人。有人试图把这两个族群与希罗多德著作(IV, 170, 171)中所说的阿尔比特人(或阿斯比特人)和巴卡勒人扯在一起，但对埃斯贝特(Esbet)一词的解释是有争议的，[44]因此，这样联系就经不起推敲了。无论如何，把梅什维什人和希罗多德著作(IV, 191)中的马赫扬人说成是一个民族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后者早已在突尼斯定居。[45]

拉美西斯三世获胜的后果之一是他能够控制西部那些绿洲，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可以通过这些绿洲，特别是锡瓦绿洲，传播对底比斯的阿蒙神的崇拜，这种崇拜沿"干旱地带"逐渐传到的黎波里塔尼亚；[46]而且，在迦太基时期，对发音相近的巴尔·阿蒙神的崇拜产生过无可置疑的影响。[47]

利比亚人定居的地区十分辽阔，上述初步证据只是使我们了解到他们极东部的一些情况。应当指出，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海上诸民族的情况，凯尔奈克的铭文上只提到一次，说他们在我们纪元前1227年迈内普塔统治时期，经常和利比亚人交往。还应注意到这篇铭文本身很可能是把几次战役混在一起写的。[48]但是，即使我们认定在利比亚人中包括这些小股的海上民族，是不是可由此推断说他们就是教给利比亚人使用双轮马车(先在埃及境 432

---

[42] W.赫尔舍，第47-48页；参看前注34。

[43] F.沙穆，第52页。

[44] 戈蒂埃(H.Gauthier)，1927年，卷一，第104，117页；J.勒克朗，1950b，第338页；W.赫尔舍，第65页，注2，读来使人想到图阿雷格(Tuareg)传说中的伊塞贝顿；参看W.维希什尔，1956年，第211-220页。

[45] 参看S.格塞尔，1913-1928年，卷一，第354页，那些理由充足的保留意见；还有他于1915年出版的同一著作，第113-134页。

[46] J.勒克朗，1950b，第193-253页；雷比法(R.Rebuffat)，1970年，第1-20页关于锡尔蒂斯地区的阿蒙神崇拜，参看S.格塞尔，1913-1928年，卷四，第286页。

[47] 莱格莱(M.Leglay)，1966年，第428-431页。这位作者不认为锡瓦的阿蒙神是将底比斯的阿蒙神和巴尔·阿蒙神联系起来的一个环节。他认为，奥兰地区以东的小非洲利比亚－柏柏尔人早在锡瓦那座圣殿建成以前就已处在埃及人的影响之下。由此看来，迦太基的巴尔·阿蒙神崇拜与当地对公羊的崇拜逐渐变成一码事了，而已证实公羊就是埃及的阿蒙神。

[48] 同样，哈布城里那些人物画也把利比亚人于我们纪元前1194年和我们纪元前1188年那两次袭击和海上诸民族于公元前1191年那次入侵混为一谈，可参看德里奥东(E.Drioton)和旺迪埃(J.Vandier)的合著，第434-436页。

内使用，后在整个撒哈拉地区使用)的那些民族呢？

这个说法得到一批第一流的撒哈拉问题专家的支持；[49] 不过，爱琴人画的双轮马车和撒哈拉人画的那些很少相似之处；关于这一点，对远古进行研究的考古学家G.查尔斯-皮卡德[50] 和研究马的专家J.斯普鲁伊特[51]等学者已经作了很好的论证。这些撒哈拉马车是一个车夫的透视画，而不是侧面画。车板不是高起来的，而是搁在距两边轮子较远的车轴中央，因而载客实际上只限于车夫一人，他的手里拿的是一种短鞭而不是武器。那些马多半产自北非地区，套的是颈轭而不是把轭放在肩隆上。画上的这些马虽然确实是伸展("飞奔")姿态，但它们的跗关节和膝盖都看不见。而且，在爱琴文献中，"飞奔"并不是上了套的马的姿态。看来，这些撒哈拉双轮马车突出的特点极象不大坚固的"游猎"车辆。

因此，看来我们应当把撒哈拉双轮马车和业已证实拉美西斯三世的敌人使用过的那种古代战车区别开来。后来在加拉曼特人(用四马双轮车)、阿尔比特人、佐埃塞人中，在迦太基附近地区阿加索克勒斯服役的利比亚人以及法鲁西人和尼格里特人当中，都已证实有那种战车。与其假定利比亚人的马车是从海上各民族那里仿制的，还不如象W.赫尔舍[52] 那样，认定他们是仿效埃及人的战车制造的，这更接近真实情况。据他说，从四、五个世纪以前喜克索人入侵以来，埃及人就一直在使用这种战车了。撒哈拉人那些双轮车源于何处仍然是个谜。那些车完全是木制的，构造很简单，可能是当地人自己创造的。[53] 而且，北非(或蒙古)马，身材矮小，面部凸出，有一条前额线，脊椎骨两头突起而中间凹陷，有五根腰椎骨，臀部下倾，看来不可能是来自阿拉伯-东方的品种，因为后者侧面轮廓方正，喜克索人和爱琴人用的就是这种坐骑。[54] 北非马可能是从东非和苏丹传入的。[55] 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我们可以看到，撒哈拉地区的石刻和罗马时代罗马境内的石刻中，阿拉伯-亚细亚种马的画象虽然有，却极其少见。[56] 不过，即使假定在这些石刻中我们没有遇到外来马的典型图象，仍然可以说，在阿拉伯人到来以前，北非马一直是小非洲占统治地位的马种，这是确实的。

433

即使我们可以赞同东部利比亚人的长剑是因袭海上民族的，但这种武器似乎并未被广泛采用。[57] 总的看来，海上民族对利比亚文明的影响并不象许多学者所说的那么大。另一

---

[49] R.佩雷，第50-51页。

[50] 查尔斯-皮卡德(G.Charles-Picard)，1958a，第46页。不过，应当指出，作者认为那些撒哈拉战车画是当地人的创作，这一评论虽然很有见地，但他说这种画法是受了罗马皇家艺术的影响这一点却是不能接受的：G.康，1960b，第21页，注46，以及H.洛特，1953年，第225-238页都曾指出这个问题。从拉美西斯三世时期至狄奥多勒斯(XX，38，2)和斯特拉波(XVII，3，7)两人所记载的时代(其史料来源都在罗马帝国以前)，利比亚人就在摩洛哥南部的锡尔泰斯托附近使用双轮战车；参看O.贝茨，第139页，和前注41。

[51] 斯普鲁伊特(J. Spruytte)，1968年，第32-42页。

[52] W.赫尔舍，第40页；G.康，1961年，第406页，注3。把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利比亚战车的绘画作品和埃及战车绘画区分清楚是不可能的。参看W.M.米勒，1906-1920年，卷二，第121页。

[53] J.斯普鲁伊特，1967年，第279-281页。但P.瓦尔和J.勒克朗的著作(1972年，第74-75页)却说撒哈拉地区埃季第亚人的战车起初是仿照埃及战车制造的，但很快就变成供游乐和炫耀身分用的车辆了，其过程如何至今仍未弄清。

[54] J.斯普鲁伊特，1968年，第32-33页。不过，作者那些颇有见地的评论(第35页)却引申出一个看来未必可能的设想，即北非马是在遥远的古代从西班牙、甚至从法国西南部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运来的。

[55] P.贝克和P.瓦尔，第225页。

[56] 埃斯佩兰迪鄂(G.Espérandieu)，第15页。

[57] G.康，1960b，第112页和注371-373。

方面，在初史时代由于种族亲缘关系在尼罗河三角洲上逐渐形成的埃及文化的影响，却决不能轻视，虽然对其传播的方式了解甚少。

迦太基兴起以前柏柏尔人的生活

H. 巴塞[58]和G. 康[59]曾正确地强调，利比亚-柏柏尔人的农业并不是从腓尼基人学来的，而是他们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就从事农耕。认为小非洲的农业是纪元前第二千纪由迦南人输入的，这不过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想。在君士坦丁东部地区拉舍菲亚和大阿特拉斯山区发现的金属时代的雕刻和绘画上绘有一种或多或少象摆动犁的分解图形。[60]在特贝萨以西的杜瓦尔塔兹宾特一带土地上发现的那些四方形图案是原始水利设施的遗迹，其年代远较当地诸王国的时代为早。使用这些设施的人当时用的工具仍然有一部分是石制的。 434

当腓尼基人即将采用一种三角形金属犁头的耕犁时，柏柏尔人就已经使用他们自己那种类型的耕犁了，不过一般认为这种犁的效力不大，因为是用一个简单的木犁头耕地。[61] 由于使用锄头的古安切人从来就不知道有耕犁，因此这种犁的出现必然结束了单纯使用锄头的状况。看来，开始时利比亚人常常自已用肩膀牵着绳子拉犁。但他们很长一个时期早已熟习套上公牛拉犁了，这在埃及壁画和大阿特拉斯山区的雕刻中都可以看到。另一方面，看来在迦太基时代以前，他们并不知道任何机械打谷法，只是满足于用笨重的牛踩出谷粒。[62]

植物学家指出，硬小麦(可能是从阿比西尼亚传入的)和大麦[63]在腓尼基人到来很久以前就在北非和蚕豆、鹰嘴豆一起种植了，[64]不过，鹰嘴豆的柏柏尔名称 *ikiker* 是从拉丁名 *cicer* 来的。

在造林方面，与上述情况相反，腓尼基-迦太基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不过，在迦太基人传播橄榄栽培法相当久以前，柏柏尔人可能已经懂得嫁接野生橄榄树了。另一方面，从地质年代第四纪初以来就开始在阿尔及尔地区存在的葡萄树，在腓尼基人到来以前，这里没有种植过的迹象。撒哈拉以前的柏柏尔人，如希罗多德著作（IV，172，182）中所说的纳萨摩尼亚人，以及“埃塞俄比亚人”，都曾种植椰枣树，不过当时在小非洲边缘地带并不象今天这样普遍。至于无花果，尽管老卡托曾在罗马出示一个新鲜无花果以表示距罗马极近的一座敌对城市已被摧毁，但这种水果仍然是柏柏尔人非常喜爱的。[65]

对墓葬进行的考古研究证实远古时代在小非洲有大批从事农耕的定居群体。由于柏柏尔陶器的过于墨守陈规，要确定这个地区初史时期遗迹的年代就特别困难。既然我们缺乏可以确认年代的其他证据，我们就只好把遥远的罗马以前时期尚未受过迦太基影响的墓地

---

[58] 巴塞(H.Basset)，第340页起。
[59] G.康，1960b，第69页起。
[60] 博博(J.Bobo)和莫雷尔(J.Morel)，第163-181页；J. 马尔赫姆(J.Malhomme)，第373-385页。
[61] G.康，1960b，第82-83页，第82页有参考书目，注287。
[62] 关于起源于巴勒斯坦和腓尼基的迦太基游乐车，参看最近出版的科伦多(J.Kolendo)的著作，第15-16页。
[63] J. 埃鲁(J.Erroux)，第238-253页。
[64] G.康，1960b，第80页。
[65] 同上书，第90页。

上收集到的材料看作"迦太基以前"柏柏尔人生活情况的佐证。

435 G.康曾很好地论证过，[66] 这些墓葬品证明柏柏尔的农村文化是极其古老的。这位学者认为，初史时期墓地陶器分布图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当准确的农业传播的地理概念。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小非洲南部的古墓中没有发现陶器，位于扎赫莱兹和霍德纳之间的撒哈拉侵蚀地带也没有发现，在穆卢亚和阿尔及利亚边界之间的摩洛哥东部地区还是没有。G.康对陶器形状的研究使他能够揭示一些当时利比亚-柏柏尔人的生活方式。这些陶器和当时各地陶器的类型很相近，有盛液体和汤用的碗、盆和高脚杯，各种浅底盘，有些象我们今天烤制未经发酵的面包、烤饼和薄煎饼使用的那种大盘子。还发现一种从初史时期直到今天都有的底部有托柄的水果碟。这些饮食器皿上穿有小孔，说明柏柏尔人从最古时起就把它们挂在墙上。另外，一种古代的过滤罐是现代所没有的，G.康猜想这种东西也许是用来将蜂蜜分离或供浸渍用的。

考古学家还证实，南部诸遗址上原来居住的游牧民族曾携带有装饰的武器，还戴手镯、金属垂饰或陶珠，定居的人们就不象他们经常戴这类装饰品。发现的一些织物残片说明他们曾穿用花条纹布。在撒哈拉岩画上还常常看到皮制衣着，从而证实了希罗多德著作(IV, 189) 中所说的情况。在锡古斯附近发现的石刻证实远古时代确实存在带有包头巾的外套，这或许就是关于无头人或脸长在胸部的人的传说的来源。上埃及边缘地带阿拉伯沙漠中的布勒米人显然也曾穿用这种外套。

努米底亚人和毛里人携带的武器是一种细长的标枪和猎刀，而定居的人们和更靠南边的人刚好相反，很少有武器随葬。正如斯特拉波著作(XVIII, 3，7)中所说，"埃塞俄比亚人"和各混血民族，特别是尼格里特人和法鲁西人，随身携带弓和箭。大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VI, 194)中曾提到大锡尔蒂斯"以北"的一种沙漠居民：朗贡普里人——这个名称是希腊人给起的，意思是"持标枪的人"。

游牧民族财富的主要来源是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在科隆贝沙尔以西的朱尔夫图勒拜一个现已荒芜的地区，发现了一幅表现挤奶情景的石刻。[67]据埃利恩的著作(NA, VII, 10.1)记述，这些游牧者并无奴隶，他们用狗干活；在关于红海地区的特罗格洛迪特人和尼罗河

436 沼泽地带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记载中也有这样的说法。但埃利恩的书 (VII, 40) 中却说另一部分埃塞俄比亚人把一只狗拥立为他们的国王(此说似乎源出于阿里斯托克雷翁)。狩猎自然是一种普遍的活动。托勒密还曾提到生活在突尼斯南部接近埃塞俄比亚人边境的一些奥雷佩伊猎人。他们是杰里德以南一带地方游猎的尼格贝尼特埃塞俄比亚人的邻居。[68]

关于利比亚-柏柏尔人的社会组织情况，除古典史料所描绘的情况外，更早一些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有人一再试图根据比较晚一些的资料重修这段历史，这种做法我们不值得考虑。摩洛哥境内拉尔布的坟丘和君士坦丁地区迈德拉森人的陵墓，都极其庞大，这些情况说明，在独立于迦太基的马格里布东西两侧，一些王国的兴起不会早于我们纪元第四世纪，此外就再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圣格塞尔那幅关于利比亚社会组织情况的出色的

---

[66] G.康，1960b，第96、97、101-104、107-111页。

[67] 同上书，第115-116页，插图13。

[68] J.德桑热，1962年，第89-90、129、228-229页。奥雷佩伊埃罗佩伊人可能是黑皮肤的雷巴亚人的祖先。

图画主要是根据罗马帝国时代的文献、甚至是根据查士丁尼同时代的诗人科里普斯提供的材料画的。

利比亚-柏柏尔人的宗教信仰

要深入了解先后处于迦太基腓尼基人和罗马人影响下的利比亚-柏柏尔人的宗教信仰是困难的。以初史时期为对象的考古学只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古代宗教习俗，就小非洲来说，甚至只能限于了解丧葬习俗。[69]因此，我们还得求助于古典作家，并尽量从罗马时代的铭文中搜寻一鳞半爪的材料，但这些资料证实的习俗在本章讨论的那个更为久远的时代是否也存在，我们没有把握。而且我们更应牢记：拿我们认为能够在中世纪和近代柏柏尔社会中搜寻到的伊斯兰化以前的遗物推测远古的情况，总是冒险的。

看来，利比亚人的神圣感具体表现在各式各样的物体上。人们常常认为超自然的力量在四周原野中表现出来，因此罗马时代的铭文提到许多受人崇拜的河神和山神。[70]神的力量还可以体现在更小的最普通的物体上。象征人类的脸或男性生殖器的图形或尖形花岗岩卵石就是受崇拜的对象。[71]庞波尼乌斯·梅拉的著作(Choz. I. 39)和普林尼的《博物志》(II, 115)说，在昔兰尼加有一块石头不许摸，怕一摸就会把南风放出来。淡水源，特别是泉和井，也受到崇拜。我们纪元四世纪时，圣奥古斯丁告诉我们说努米德人仲夏节在海中举行浸礼仪式。对树木的崇拜人们也不陌生，在公元四世纪召开的一次非洲宗教会议曾请求罗马皇帝废除"甚至对森林和树木"的偶象崇拜。夏至那天的海水浴以及对水和树木的崇拜是赞美生殖力旺盛的表现形式，据和奥古斯都同时代的大马士革人尼古拉斯(见C. 米勒著《希腊史残篇》，卷三，第462页，135篇)说，达普索利布人以最直接的方式把这种崇拜表现出来：紧随昴星西沉、夜幕降临之后，女人就撤回屋里，把灯熄灭，然后男人就去和她们幽会，交接的对象碰上谁算谁。有理由认为，这些"达普索利布人"实际上就是达普西洛-利布人(Dapsilo-Libues)，即"富裕的利比亚人"，这就可以充分说明他们为什么爱在"犯错误的夜晚"进行受胎礼了。

437

能够最明显地象征生殖力的动物如公牛、雄狮和公羊，正是利比亚人崇拜的对象。科里普斯在他的著作(Iohannis IV, 第666-673页)中曾叙述锡尔蒂斯地区的拉古安坦人(即勒瓦塔人)如何把象征他们的古齐尔神(阿蒙之子)的公牛放开、叫它去攻打敌人的情形。舍尔沙勒附近的克博尔鲁米亚王墓和杜加的王公陵墓都装饰着狮子的形象。但公羊却是主要的崇拜对象。[72]公羊崇拜很可能在撒哈拉地区变成沙漠以前就已传遍整个非洲。阿萨纳修斯在他的著作(Contra gentes, 24)中告诉我们，利比亚人认为公羊就是名叫阿蒙的那个神。还应当提及对鱼的崇拜是今突尼斯地区当时的特色，这一点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突尼斯镶嵌工艺品上有那么多鱼的形象。据信鱼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能防止恶眼伤人*。出自苏塞

[69] G. 康，1961年，第461页。

[70] 参看M. 莱格莱的近作，1966年，第420页和注7，第421页和注1；W. 维希什尔，1972年，第623-624页。

[71] 戈贝尔(E. Gobert)，第24-110页；W. 维希什尔，1972年，第679页。

[72] G. 查尔斯-皮卡德，1954年；M. 莱格莱，1966年；W. 维希什尔，1972年，第695-697页。

* 那时人们认为被人以恶毒目光瞪一下就会受灾难。——译者注

的一块镶嵌工艺品上有一支鱼形男性生殖器在两个女阴部之间射精的情景。在整个小非洲，跟鱼相对应的贝壳广泛作为女性的象征；它对活着的人是护符，对墓中的死者是个安慰。

人体的其他部位，特别是头发，被认为是超自然力的贮存处。G. 查尔斯-皮卡德提请人们注意利比亚人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的习惯。从埃及壁画时代到利比亚的安东尼浴场的赫尔梅斯方柱头象都有这种情况，也不要忽略希罗多德的著作(IV,175)[73]中提到的马开。假如我们认为斯特拉波的著作(XVII,3,7)可信的话，他说到毛鲁西亚人出门走在路上时，避免相互离得太近，生怕把自己的发型弄坏。这并不是一种卖俏的姿态，而无疑是一种宗教的恐惧，生怕自己的生殖机能遭受威胁。也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阿迪马

438 奇德妇女在捉虱子时还伴以复仇仪式(希罗多德著作,IV,168)。

一个人死后受到精心照料。考古学最能说明利比亚-柏柏尔人宗教方面的情况。G.康那篇不朽的论文[74]为我们了解其梗概提供了材料。遗体入土时，一般都是侧卧、弯腰或捲缩成一团。在这样做以前，常常把骨头上的肉都剔掉，而更经常的是把骨头或肉的表面涂上一层红赭石，认为这样可以使尸体恢复生命。尸旁放着食物，为了保佑来世还放上一些护符。还以马之类的动物为祭品，偶尔还有杀人陪葬的情况，目的是让死者保有一名忠实的仆人。其家庭成员死后也葬到他的坟里，有很多是与配偶合葬的墓，特别是在奥兰尼亚和摩洛哥一带，这说明那时曾广泛实行一夫一妻制，或者至少是有选择的多妻制。

悼念死者的祭礼是在墓前保留的一片朝阳的空地上进行的。有时是以树立方尖碑状的纪念石或石柱象征死者的生命力。希罗多德著作（IV,172）中说纳萨摩尼亚人睡在他们祖先的坟墓上，用这种办法向祖先请教未来的祸福。G.康认为这种寝伏祈祷仪式就是古坟古冢呈平台状的原因，而附有小礼拜堂和寝室的撒哈拉人的陵墓看来最适合于行这种仪式。这种习俗在撒哈拉各地居民中大概是广泛流行的，因为他们听说阿特兰特人（希罗多德著作IV,184）入睡后从来没有梦幻，都表示惊异。

希罗多德著作(IV,172)中还说纳萨摩尼亚人发誓的时候，把一只手放在一位公认极为公正而善良的人的坟上。看来这就是出现对死者崇拜的一种迹象。史前考古发现，在某些坟墓周围建起整片墓地。特别受尊敬的人们生前有一批人围绕着他们，死后在他们的坟墓周围也集聚大批坟墓。G.康正确地推测，[75]对死去的著名人物的崇拜是否会导致居民群体的形成和变迁，关于这一点，迦太基和罗马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据。每当一个王国创立之后，也就很自然地出现对已故国王的崇拜。

看来，利比亚人崇拜的主要的神不是人的形象。据希罗多德的著作(IV,188)记载，他

439 们只祭祀太阳和月亮。然而，杰里德一带的人们却往往给智慧女神雅典娜、半人半鱼的海神特里通和海神普塞东上供，而加拉曼特人的西邻阿塔兰蒂人(IV,184)却诅咒太阳。西塞罗在《共和国》一书中((Rep., VI,4)谈到马西尼萨向太阳和天上的其他神明感恩。在罗马属下的几个非洲城镇，诸如迈克塞尔，阿尔西布罗斯，杜加和苏夫图拉等，人们一直崇拜太

---

[73] G.查尔斯-皮卡德，1954年，第14页。
[74] G.康，1961年，第461-566页。我们在这里只想对这篇考古资料概述作一简短的介绍。
[75] G.康，1961年，第564页。

阳，但迦太基的某些影响仍到处在起作用。[76]

除了太阳和月亮这两个主要天体之外，铭文和书面材料都提到大量的神，一般只提一次，有时甚至是集体的名称（如 Dii Mauri）。[77] 在包姚附近发现的一块石刻上雕的似乎是有七位神的众神图。但这无疑反映在迦太基影响下传入的一种多神教，从而导致利比亚人把各种神力人格化。在不受外来影响时，利比亚人总是倾向于崇拜各种圣物而不是各种神。[78]

（李 活译）



图片17.1 克布尔鲁米亚的石狮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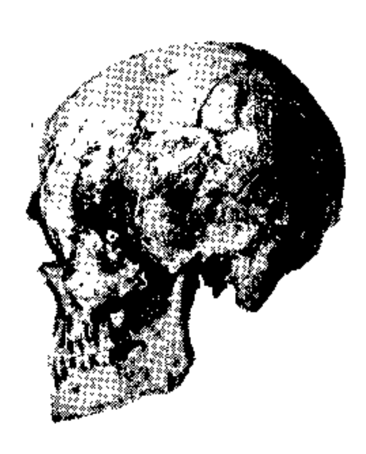
图片17.2 阿比扎尔（提格济尔特东南）的利比亚石碑：武装骑兵浮雕。左手持圆盾及三把标枪；右臂外伸，姆指和食指间有一个未肯定为何物的圆形物体，站在马臀上的小人左手摸着武士，右手也举起，握有一件武器。骑兵有三角形胡须直到胸部。马脖子上有一条护符，可能是生殖器。马前头还有两个动物，一个是四足的，也许是一只狗，另一个显然是一只鸟，或许是鸵鸟

[76] G.查尔斯-皮卡德，1957年，第33-39页。

[77] G.康，1954年，第233-260页。

[78] 关于利比亚-柏柏尔人有一位主神的说法，参看M.莱格莱，1966年，第425-431页。作者在排除了埃奥劳斯、巴利迪尔和埃乌什诸神之后，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当腓尼基人在非洲大陆出现时，底比斯的阿蒙神正在变成撒哈拉非洲和小非洲的主神。这个说法颇引人注意，但尚未充分证实。

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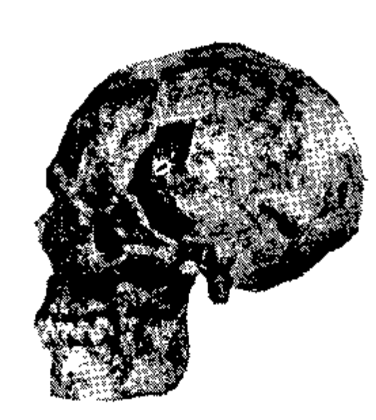



图片17.3 香普兰人颅骨：左为额面图，右为左侧面图




图片 17.4 科伦纳塔人颅骨：上为颅侧面图；下为颅顶右侧面图

图片17.5 卡普萨人颅骨：左为额面图；右为左侧面图

18 迦太基时期

441

B.H.沃明顿

马格里布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腓尼基的航海人和殖民者登上它的海岸开始的。要重现这个时期的历史真相，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史料几乎都来自希腊和罗马，而这两个民族，特别是在迦太基统治时期，正是西腓尼基人的死敌，因此史料中的描述是敌视腓尼基人的。没有任何迦太基文献保存下来①。考古学的贡献也有限，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腓尼基人定居点被大得多的罗马城镇所覆盖；不过在过去20年，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发现了大量的用腓尼基文字刻的各种碑文，但几乎都是墓碑或奉献性碑文，未能向我们说明什么问题。

在我们纪元前第三世纪以前，利比亚本地文化的发展情况同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在马格里布，沿袭卡普萨文化传统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很长一段时期，很少可以算作是独立的青铜时代的东西。因此，考古的发现表明第一千纪是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不过，从大约我们纪元前第四世纪起，腓尼基的影响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分布很广的大型石砌墓这种特殊现象，同早得多的北欧巨石器文化似乎并无联系。看来这些石墓的年代大概要确定在本章所讲的这个时期。最大的墓，如姆佐拉和迈德拉森的古墓，可能同我们纪元前四世纪或三世纪较大的一些部落单位的发展有关。这在整个马格里布有明显的一致性。

442

希腊和罗马的作家们指名提到了很多不同的部落。但是就目前所考察的时期来说，一般是把马格里布的非腓尼基居民分为三个主要族群：在西面，在大西洋和穆卢卡(穆鲁耶)之间，是毛里人，他们的居地称为毛里塔尼亚(更早称为毛鲁西亚)，后来这个名称的范围向东扩展远达谢利夫以东。在毛里人和迦太基内陆领土(见下文)最西端之间，是努米德人，他们的居地称为努米底亚。努米德这个名称来源于一个希腊词，意思是"放牧"，希腊和罗马作者误认为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即游牧生活，然而这两个地区的居民之间看来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两地都是以半游牧方式的生活为主，虽然有一些地区已经有了定居生活和经常性的农业，而且这种地区在不断扩大。此外，毛里塔尼亚同具有类似文化的西班牙南部有相当密切的交往。第三个族群是盖图勒人，他们是撒哈拉北部边沿的真正游牧民。本章

① 莫斯凯蒂(S. Moscati)著作，第113页："希腊和拉丁作家把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首先是迦太基和叙拉古之间的战争，以及后来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战争上面。这些叙述由于是在事件过后不久写下的，因此是全面的、详尽的。关于迦太基历史的其余部分，资料就很零碎。亚里士多德对布匿(拉丁语，即腓尼基)宪法的评论，波里比阿关于雇佣军暴动的记述，汉诺碑文的希腊译文，《伪斯基拉克斯书》列举的四世纪中叶迦太基在非洲的领地的清单，都是从零星散乱的文件中取材的例子。这些文件到处有脱漏，常常难以连缀起来。"

使用的名称是这些族群和各个部落的古典名称。

最早的腓尼基殖民地

根据古代的普遍传说，提尔是腓尼基人为了向西扩张而建立的城市，从这儿通向为数众多的殖民地。近东青铜时代文化在我们纪元前十三世纪被毁以后，提尔在腓尼基各城市中最为突出，这从《圣经》和其他史料中得到了证明。提尔和其它城市（如西顿和比布鲁斯）从大约我们纪元前1000年开始，成为东爱琴海和近东最活跃的商业城市，很少受到亚述帝国扩展的干扰。促使腓尼基商人进入西地中海的动机是寻找金属，特别是金、银、铜、锡的产地。这使他们很早就来到了西班牙。甚至到罗马时期，西班牙还是地中海区域的主要的产银地之一。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狄奥多勒斯·西库卢斯为我们描述的大致情景大概是正确的，他说："当地人（即西班牙人）在腓尼基人前来进行贸易，用少量货物换走银子运往希腊、亚细亚和其他国家获得大量财富之后，才懂得银的用处。这种贸易继续了很长时期，从而使腓尼基的力量大增，得以派遣许多移民去西西里及其邻近岛屿，去非洲、撒丁岛以及西班牙等地。"按照传统的说法，腓尼基在西方的最早基地，就在现代的加的斯，这个名字是从腓尼基字加迪尔衍生来的，意思是要塞，据推测这就是最初的贸易站。

443

前往西班牙新市场的漫长海路需要保护。尤其是在古代的航行条件下，当时通常的作法是紧靠海岸行驶，夜晚就抛锚或靠岸停泊。腓尼基人走南北两条路线：北线沿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巴利阿里群岛等地的南部海岸；南线沿着北非的海岸。沿后一条路线，据估计大约每30英里就有腓尼基人的一个停泊点，不过这些停泊点发展成为永久性的殖民地要取决于各种因素。这些传统的停船地点是离海岸不远的岛屿，或是两边都可以停靠的岬角。由于马格里布的居民以及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文化水平低于腓尼基人，从而政治水平和军事水平也都较低，所以腓尼基人利用这些地点并不特别困难。此外，战略因素使一些地方较之另外一些地方更为发展。意味深长的是，三个最重要的地方，即北非的迦太基和乌提卡（乌提克），西西里的莫蒂亚（莫济亚），全都位于从地中海东部通向西部的一些海峡，它们既控制着南线，又控制着北线。

迦太基的建立

迦太基这个名字（拉丁文：Carthago）相当于腓尼基文的Kart Hadasht，意即新城。这可能意味着这个地方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腓尼基人在西方的主要殖民地。但是有关它的最早期的考古资料我们所知甚少，因而无法肯定这一点。传统的说法是建于我们纪元前814年，比加的斯的建立（1110年）和乌提卡的建立（1101年）要晚得多。但后面这些日期也带有传说色彩。根据不容置疑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迦太基建于我们纪元前八世纪的中叶，就是说，同传统的说法相差约60年。希腊和罗马的作者关于迦太基建立的各种不同的传说，没有任何史学价值。来自乌提卡的考古资料也说明是上述时间；而来自大雷普蒂

斯(莱卜代)、哈德鲁梅图姆(苏塞)、提帕萨、锡加(拉克贡)、利克苏斯(在卢库斯河)和摩加多尔的考古资料，则说明时间是我们纪元前七世纪或六世纪。摩加多尔是迄今所知最远的腓尼基殖民地。在西西里的莫蒂亚，撒丁岛的诺拉(努里)、苏尔西斯和塔罗斯(圣乔瓦尼堡)，以及西班牙的加的斯和阿尔穆涅卡尔，有日期相似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物证大体上是一致的，这表明个别的航行可能早一些，但马格里布沿岸永久性殖民地的建立则不会早于我们纪元前 800 年。必须强调指出，所有的腓尼基殖民地，包括迦太基本身，和我们纪元前八世纪和七世纪希腊在西西里和意大利或其他地方建立的殖民地不同，前者经历几个世代，规模始终很小，或许最多不超过几百个殖民者。此外，这些殖民地在政治上长期从属于提尔，可以想见它们主要起停泊点和供应点的作用。 444

迦太基对西腓尼基人的领导地位

从我们纪元前六世纪开始，迦太基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出现，随即对西部的其余腓尼基人处于领导地位，并以北非为基地建立起一个帝国，对整个西地中海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原因之一是提尔和腓尼基本土的力量削弱以及它们对巴比伦帝国的臣服。看来更重要的是来自希腊在西西里的一些殖民地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最重要的殖民地如叙拉古，财富和人口迅速增长；原先它们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减轻希腊本身的人口压力的。在我们纪元前七世纪，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之间似乎还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从希腊进口的货物在马格里布的许多腓尼基居民点都很熟悉。但在我们纪元前 580 年，塞里努斯城(塞里农特)和西西里的其他希腊人试图把腓尼基人从他们的莫蒂亚和巴勒莫殖民地赶出去。看来迦太基带头击退了这一进攻。这一进攻如果成功，就会使希腊人进而威胁腓尼基在撒丁岛的殖民地，并打开他们迄今为止被排斥在外的西班牙贸易。迦太基的反击成功，使撒丁岛上的腓尼基殖民地得到巩固。也是在这一世纪中，迦太基和意大利西海岸埃特鲁里亚的诸城之间建立了同盟。大约我们纪元前 535 年，一次联合的胜利，使希腊未能把科西嘉变成殖民地。这一时期的最后一次胜利是在非洲本身取得的。一个名叫多里厄斯的斯巴达人试图在利比亚的基尼普斯河(乌基里河)的河口建立一个殖民地。迦太基认为这是入侵，用了三年时间，借助于利比亚本地人，终于把希腊人赶了出去。

腓尼基人在西方建立的领导地位所带来的负担，对于迦太基拥有的人力来说似乎是太重了。直到我们纪元前六世纪为止，他们同希腊的城邦一样，依赖自己的市民。这一世纪的中叶，在该城一个统治家族的创始人马戈的领导下，采取了大规模雇用雇佣军的政策，这种政策在迦太基此后的历史中一直奉行。在非迦太基的雇佣兵中，利比亚人占最大数量。当迦太基在内地获得领土并且强制征兵以后(见下文)，利比亚人所占的比重更大了。他们特别适于充当轻装步兵。作为雇佣兵，或根据后来的一些联盟条约，来自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北部的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骑兵成了所有的迦太基大军的主要部分；西班牙人、高卢人、意大利人、最后是希腊人的雇佣兵，在不同的时期在迦太基的军队中都有发现。雇佣军政策取得的成就超出人们通常承认的程度，迦太基靠着自己的有限人口是不大可能支持它所进行的那些长期战争的。 445

在成功地击败多里厄斯以后的30年内，西西里的希腊诸城市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严重地影响了迦太基。杰拉的统治者格隆（我们纪元前485年起义成为叙拉古的统治者）发动战争为多里厄斯报仇，并策划了一次战役，企图征服加贝斯湾一带的腓尼基殖民地。结果，迦太基从西西里反对格隆的人当中寻找朋友，在我们纪元前480年或许是趁着当年波斯入侵希腊的机会，把一支庞大的雇佣军开进岛上。有的说当时迦太基的舰队拥有200艘船只，约和叙拉古的舰队相等，比雅典少不了多少。但是，在希默拉的一场大战，迦太基的陆军和舰队全部覆没，武装干涉以彻底惨败告终。格隆没有力量或是不愿乘胜穷追，于是接受一笔数目不大的战争赔款而同意讲和。

在北非的扩张

这次战败带来了70年的和平。在这期间，迦太基避免同希腊发生冲突，但仍然能够保持它对贸易的垄断。更重要的是，它转向非洲本身去获得土地。这个变化是希腊在别的地方取得成功而使得迦太基日益孤立的时候发生的。希腊先是对波斯作战获胜，在战争中腓尼基人损失惨重；后来希腊又在意大利击败了埃特鲁里亚人。很可能迦太基人曾企图限制自己同希腊世界的贸易——我们纪元前五世纪的墓葬品看来的确很贫乏、很简朴，没有什么进口的东西。这倒不是说整个社会比过去更加贫穷了，因为墓葬品本身并不说明是富裕还是贫困。转向非洲的新政策是同马戈尼德家族联系在一起的，这家族当时由汉诺领导，他是在希默拉打了败仗的哈米尔卡的儿子。后来希腊作家迪奥·克里索斯托姆粗略地说他"把迦太基人从提尔人转变为阿非利加人"。

我们纪元前五世纪时迦太基占领了多少土地，以及这时有多少居民点发展成为城镇（尽管很小），虽还不能肯定，但已开始接近它所控制过的土地的最大数量。最重要的是征服了邦角半岛，并获得迦太基以南可观的一片土地，至少远到杜加。这包括突尼斯的某些最肥沃的土地，后来成为罗马移民最密集的地方。这个地区提供了必要的食物，并为城市人口的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许多迦太基人后来在邦角拥有地产。邦角的土地算作是城市土地，居民大概都沦为奴隶或半奴隶。其余占领地的居民必须纳贡和提供兵员。

446

腓尼基人沿海岸的殖民地的数目这时由于迦太基自身派出的移民而增多起来，虽然有些殖民地的名称我们还不知道。象最早的殖民地一样，它们是些小地方，只有几百人，建立在当地居民前来交换货物的地点。希腊人称它们为"因波里亚(emporia)"，即市场，可为佐证。

迦太基帝国和希腊在昔兰尼加的殖民地系以锡德拉湾为边界，但它在利比亚沿海的殖民地很少。最重要的一处在雷普西斯，在那里建立这个永久性殖民地大概是因为多里厄斯的远征曾到达附近地区，表明那里存在希腊人入侵的危险性。在塞卜拉泰有一块我们纪元前四世纪初建立的殖民地。雷普西斯成为沿加贝斯湾各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中心。人们知道，它在迦太基末期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它的腓尼基文化甚至在罗马统治下仍占主导地位达100多年。一般认为它的财富来源靠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因为这个地区是从锡达穆斯（盖达米斯）到尼日尔的最短商路的终点。然而，我们不知道这种贸易的内容是什么，只是有人

提到一些次宝石。在罗马时代，这个地区的农业财富来自迦太基的殖民者。在加贝斯湾的另一些殖民地有祖希斯(以产咸鱼和紫色染料著名)、吉格西斯(布格拉拉)和塔卡帕（加贝斯)。再往北，有泰奈(或：提纳)，该城的陆地领土的南端到达海边。据传说，小雷普西斯和哈德鲁梅图姆是腓尼基人而不是迦太基人所建，后者成了突尼斯东海岸最大的城市。从内亚波利斯(纳布勒)有一条路穿过邦角底部通往迦太基。

迦太基的西面是乌提卡，其重要性仅次于迦太基；它和迦太基同样是个港口，虽然现时距海岸七英里。直到后期它至少在名义上仍对迦太基保持独立。从乌提卡再往西一直到直布罗陀海峡，沿海岸有许多停泊点，但它们之中很少发展到象突尼斯沿岸的停泊点那种程度，这无疑主要是因为进入内地有较大困难。已知的或可能存在的停泊点有：希波阿克拉(比塞大)、希波勒吉斯(波尼)、鲁西卡德(斯基克达)、提帕萨和伊科塞恩(阿尔及尔)。罗马时代许多地名(除鲁西卡德外)含有腓尼基文rus意即"海岬"的语素，例如鲁苏库鲁(德利斯)和鲁斯古尼艾(纳提福)。廷吉(丹吉尔）这个地方在我们纪元前五世纪被提及，但腓尼基人在开始经常乘船驶往加的斯的时候大概就已知道它。

447

迦太基帝国

迦太基的敌人批评它苛刻地对待和剥削它的臣民，这些臣民也的确分成几个类别。老的腓尼基殖民地和迦太基自己建立的殖民地无疑享有最多的特权，它们的居民被希腊人称为利比腓尼基人(非洲腓尼基人)。看来他们有本地的官员和机构，同迦太基自己的相似(见下文)；已经知道加德斯(加的斯)、塔罗斯和马耳他的腓尼基人就是如此。他们必须为进出口的货品付税，有时要从他们当中征兵；很可能，他们还充当迦太基舰队的驾驶人员。我们纪元前 348 年以后，他们似乎被禁止同迦太基以外的人进行贸易。在西西里的迦太基臣民的地位由于离希腊城市很近而受影响；他们在我们纪元前五世纪被允许有自己的机构，并发行自己铸造的钱币，而这个时期迦太基自己并不铸造钱币。他们的贸易看来并未受到限制；仿照西西里陷于罗马时罗马人采取的办法，对他们的货物征收什一税。

内地的利比亚人的处境最坏，虽然似乎已允许他们有部落组织。看来迦太基的官员直接监督征集贡物和招收兵员。通常勒取的贡赋似乎是收成的四分之一，而当同罗马进行的第一次战争处于危急关头时，则拿走了一半。据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我们纪元前二世纪）说，许多利比亚人之所以参与迦太基战败以后发生的毁灭性的雇佣军大暴动，是因为痛恨这种横征暴敛和其他暴行。"迦太基人钦佩和尊崇的不是那些温和宽厚地对待其臣民的行政长官，而是那些能够强行征取最大量物资、对待居民最残酷的长官"。这个批评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除了上述那一次暴动外，还发生了一系列利比亚人暴动事件，迦太基人似乎无法执行旨在劝使被征服的居民默默忍受其处境的各项政策。

迦太基的贸易和探险

西　非

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认为迦太基比其他任何城市更加依赖于贸易。当他们想到一个典型的迦太基人时，他们就联想到一个商人。此外，据信迦太基是地中海地区最富有的城市。尽管如此，必须指出，贸易本身和所说的财富为考古学家留下的踪迹却是出奇地少，例如，比同时代希腊和埃特鲁里亚各主要城市所留下来的就少得多。无疑，一个主要原因是，448 迦太基所贩卖的货物大部分是不留痕迹的，主要是未经加工的金属(这是腓尼基人探险首先要取得的主要东西)，还有纺织品和奴隶；后来当它的肥沃土地开发后，又逐渐增加了粮食。在同落后部落的交易中，用廉价的制造品换取金、银、锡，还可能有铁(因为人们知道迦太基制造了自己的武器)，从而大获其利。表明这一点的是，它在我们纪元前四世纪和三世纪能够建立起一支庞大的雇佣军，同时，它铸造的金币远远超过其它的发达城市。在我们的史料特别是有关西非的史料中，显示了国家对主要贸易企业的积极领导作用。据希罗多德(我们纪元前五世纪)说，埃及皇帝尼科(我们纪元前610－594年)派遣腓尼基水手穿过红海，然后围绕非洲航行一圈。据说他们这次航行用了两年时间，曾两次停下来播种和收割小麦。希罗多德相信那次航行是成功的。这并不是不可能，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如果确有这次航行，则由此展现出的非洲大陆的广大幅员必定使人们不再想利用从红海到地中海的这条航路了。希罗多德还说，迦太基人是相信可以环航非洲的；既然如此，他们必定早已知道那次环航以及公元前五世纪初的另一次环航：一个波斯王子奉命在埃及买了一条船，设法向相反的方向环航；他似乎沿着摩洛哥海岸航行，越过斯帕特尔角很长一段路程，但被迫返航。希罗多德还对迦太基人在摩洛哥海岸的贸易作过描述。他写了我们纪元前430年的情况，他说：

> 迦太基人还告诉我们关于非洲的一部分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非洲居民的情况。他们到达该地时，就御下货物，摆列在海滩上，然后回到他们的船上去，升起一缕黑烟作为信号。土著居民看见黑烟，就来到海边，放下一定数量的金子交换那些货物，然后退去。迦太基人于是再次上岸，察看留下来的金子，如果他们认为那些金子相当于货物的价值，就把金子收起来，开船离去；如果认为金子不够，他们就回到船上去等着，直到土人增加足够的金子，使他们满意为止。没有任何一方欺骗另一方。金子如果抵不上迦太基人带来出售的货物的价值，迦太基人决不去碰金子；土人也决不在金子被取走之前去碰那些货物。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关于古老的无声的物物交换的最早描述。这种黄金交易的说法通常是与一本有很多争论的希腊文献有关。据称那是一个名叫汉诺的人沿摩洛哥海岸航行的报告的译本。这个汉诺据鉴定是我们纪元前五世纪中叶马戈尼德家族的领导人，也是同迦太基在非洲其它地方进行扩张有重大关系的政治家。由于翻译的困难，无法进行充分的探

讨。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由于已知的迦太基政策是不让所有其他商人到这个地区来，他们 449
不大可能提出一个透露情况的报告给公众看。此外，这个文件甚至丝毫没有提到航行的目的。最具体的部分谈的是在摩洛哥海岸建立殖民地。人们知道当时是有这样一些殖民地；位于卢库斯河河口的利克苏斯肯定就是一个，而汉诺却没有提到它。这个地区各部落（见下文）后来的历史显示了迦太基文化的影响。报告中提到的最南端的殖民地叫瑟恩，一般认为就是里奥得奥罗河口上的赫恩岛。这个地方在另一种希腊地理史料《伪斯基克斯书》(约在我们纪元前338年)中曾被提到。“在瑟恩，腓尼基人（也就是迦太基人）把他们的高洛依(gauloi)即商船停泊在那里，在岛上支起帐篷。把货物卸下来之后，他们就用小船把货物运上大陆，同住在那里的埃塞俄比亚人进行交易。他们用货物交换鹿皮、狮皮、象皮和象牙……。腓尼基人带来了香料、埃及宝石(疑是上彩釉的陶器)、雅典的陶器和坛子”。这里又没有提到黄金。瑟恩象是停泊港，不象是殖民地。从迦太基带来的货物看来没有错，但用来交换兽皮就值得怀疑，因为这些兽皮在离迦太基更近得多的地方就可以得到。汉诺的报告最后叙述了比瑟恩更南的两次航行，生动地描述了当地凶残的居民，夜间的鼓声，火把形成的巨流，这也许是为了使任何可能的竞争者感到惊恐。航程的最南端被说成远达喀麦隆山，不过这似乎是太远了。考古发现证明迦太基人去过的最南端是摩加多尔，但证据说明属于季节性的访问，只限于我们纪元前六世纪，而报告中找不到这个地方的名字。

如果黄金就是贸易的目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迦太基的覆灭，有关贸易的一切资料都消失了，尽管摩洛哥沿海还残存着若干殖民地。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我们纪元前146年后曾航行越过瑟恩，但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我们纪元一世纪时的罗马作家普林尼写到关于汉诺的报告时说：“许多希腊人和罗马人根据这个报告讲到许多荒唐的事情，讲到许多城市的建立，其实这些城市既无人记得，也无遗迹可寻。”说来也奇怪，来自罗马附庸国毛里塔尼亚(见下文)的水手们又开始航行到摩加多尔，但看来他们的目的是鱼而不是黄金。

大西洋 450

有一份关于另一次航行的报告，在古代很著名，但只有零星的记述保存下来。这次航行是汉诺同时代人希米尔科率领进行的。它探测了西班牙和法国的大西洋海岸，肯定远达布列塔尼。它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加强对锡的贸易的直接控制，而这些锡是从靠近大西洋海岸的各种出处取得的。一些古代的作家对这种贸易很感兴趣，这无疑是因为迦太基人透露出来的消息太少了。事实上，迦太基时期是这个海岸的锡的贸易的最后一个阶段了，这种贸易可追溯到史前时代，而不列颠的西南部为其最重要的产地之一。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腓尼基人到过不列颠；那里从未发现过腓尼基的东西(在布列塔尼也未发现过)。如果取得了不列颠出产的锡，那可能是通过布列塔尼部落的中介活动。很可能是这样：大部分不列颠出产的锡经过高卢转运到罗纳河谷和地中海，而迦太基人则从西班牙北部取得他们的大部分锡。无论如何，西班牙最值钱的矿产品是银。我们知道，在我们纪元前第三世

纪，银的产量已达到可观的水平，它的重要性无疑比锡大得多。从我们纪元前五世纪开始，加的斯的重要性迅速增长。在迦太基的西方属地中，除伊维萨以外只有它能铸造钱币。据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说，它的造船工人为地中海和大西洋近海各地所造的船只远胜他人。

地中海贸易

如上所述，迦太基在它的帝国内部实行贸易垄断，它击沉任何闯入的船只，或者同埃特鲁里亚诸城和罗马这样的可能的竞争者订立商务条约。通常不允许外国商人在迦太基以西进行贸易。这就意味着这些外国商人带到这个城市的货物要转移到迦太基的船上去进行交易。埃特鲁里亚、坎帕尼亚、埃及和许多希腊城市的产品就是通过这些办法到达北非的许多地方。迦太基的制造品从考古方面说不容易辨认，因为它们缺乏独特的风格。这种情况在我们纪元前四世纪从经济上来说甚至还是很有利的，特别是西地中海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带来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以后更是这样。这些征服为廉价的制造品建立起更大的具有世界性的市场。迦太基人由于地利得以利用这些市场。只是到了我们纪元前第四世纪，随着同先进强国的贸易的增长，以及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必须用钱币支付雇佣军的军饷，迦太基才开始发行自己的钱币。

451

撒哈拉贸易

关于迦太基人同撒哈拉各民族以及居住在更南面的民族的接触情况，还不甚了解。如果有过交往或接触，那一定是以大雷普蒂斯和塞卜拉泰为基地进行的，因为在这个地区，天然障碍最少。迦太基人总想不让希腊人进入这个地区，人们举出这一点作为证据，说明同内陆的某些物资交易是存在的，因为适合于殖民的农业土地很稀少。在我们纪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知道两个部落群：加拉曼特人和纳萨莫内人，住在锡尔特湾以南的地区。他还说，从海岸到前一个部落所在地需要走30天，那里的居民大概就是加拉马（杰尔马）地区的人。几百年之后，罗马人正是通过加拉曼特人获得更多的关于非洲内地的知识的。后来有个故事说，一个名叫马戈的迦太基人曾经三次越过沙漠。不幸，到了今日，当时存在过的这种贸易没有留下任何考古痕迹，而在文献里，只提到红玉是沙漠贸易的一项商品。可能存在着奴隶买卖，据说加拉曼特人曾乘着四匹马拉的战车追逐埃塞俄比亚人（也就是黑人）；有人提到象牙和兽皮，但这些东西在马格里布是容易得到的；来自苏丹的黄金的说法更是成问题，虽然未必不可能。近来杰尔马的考古证据表明，最早的人口增长是从我们纪元前五世纪或四世纪开始，经过随后几个世纪，出现了相当多的从事农业的定居人口。这可能是由于受到沿海迦太基城市的文化传播的影响。迦太基被摧毁以后，罗马人渗透进杰尔马和盖达米斯，偶尔到达更南的地方。有从地中海世界输进货物到内地的若干考古遗迹，但进口贸易规模不大。当时在北非还没有骆驼，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穿越撒哈拉的旅行是困难的和不经常的。即使撒哈拉古代的条件不象近代那么恶劣，缺少骆驼也会使任何大规模的贸易极端困难。因此，把撒哈拉和贯穿撒哈拉的各地区统一在一个更大的文化领

域里，一定是在阿拉伯时期的早期。

迦太基城

虽然迦太基以拥有巨大财富闻名，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个城市遭到罗马人彻底破坏，考古学也并未向我们证明这一点。这并不是说那里没有象其它规模相似的古城所有的重要建筑物。迦太基有一个精心修造的有两个停泊港的人工港口：外港供商船使用（同时能停泊多少船只不清楚）；内港有码头和棚库，可供220艘战船使用；还有一个很高的指挥楼，可以越过隔在中间的建筑物而看到大海。迦太基城的城墙极高极厚，经受了历次围攻，直到 452 最后为罗马人所破。城的总长度（包括沿海的部分）大约22英里，关键部分是穿过迦太基地颈的一段，长两英里半，高40英尺，厚30英尺。城内有一个堡垒，其围廓长约两英里，把一个名叫比尔萨的小山围圈在内，这无疑是该城的最古老部分。在海港和比尔萨山之间有一个开阔的公共场地相当于希腊的广场，但看来它不象通常希腊城市那样规划整齐和富有纪念性建筑物。城市看来是无计划地发展起来的，街道狭窄曲折，我们听说有六层高的建筑，就象提尔和西西里的莫蒂亚一样。至于庙宇，虽然据说有过很多，但在迦太基时代的后期（那时希腊文化的影响已很明显）以前，不可能是很大的，因为大多数证据说明迦太基人在宗教问题上是很保守的，长期以来是搞简单的神龛，而不搞雄伟的建筑物。人口在最高峰时达到多少，只能进行有根据的猜测；斯特拉波提出的数字是70万，这样的密度是不可能的，但他可能指的是该城和整个邦角地区。一个比较可能的数字是40万，包括奴隶在内，这就使迦太基同我们纪元前五世纪的雅典规模相等了。

迦太基的政治制度

迦太基受到希腊人和罗马人赞扬的唯一方面，是它的政体看来保证了在古代备受珍视的稳定。细节尚不清楚，也不能准保他们对事实都充分了解，但主要轮廓看来如下：腓尼基各城市流行世袭王位制，直到希腊文化时代。我们的一切史料同样也提到迦太基的王位制，例如，在希默拉战败的哈米尔卡和在非洲扩张的领导人汉诺，就被称为国王。很可能，古典作家称他们作国王时，是既考虑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也考虑到他们的宗教和司法权力。国王原则上是选举的，不是世袭的，但马戈尼德家族保持王位达数代之久。在我们纪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中，当情况需要时，他们看来也是国家的军事领袖。我们纪元前五世纪时，国王的权力开始削弱，这看来同"苏发特"(sufet)上升到掌权的地位有关。"苏发特"是罗马作家为我们写下的唯一的迦太基政治名词。这个词兼有法官和行政长官的意义。由于在我们纪元前三世纪时，每年选出两个（或许更多一些）这种官员，所以很容易把他们比作罗马的执政官。"苏发特"这个词，在北非的一些迦太基文化地区，在罗马占领后至少还沿用了100年，用来指一个城镇的主要行政长官。国王权力被削弱的情况，同希腊诸城以及罗马 453 相似。与此同时，富有的贵族的权力增大了。只有贵族能成为罗马元老院那样的国务会议成员。此外，贵族集团建立起一个100人的合议庭，显然具有控制一切政府机构的特殊职

能。虽然市民在选举国王、"苏发特"和政府官员时也有一些发言权，但可以肯定，迦太基的政治始终是受富人支配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财富在迦太基所起的作用是一种坏现象。出身和财富对于当选是十分重要的。一切事情由国王或"苏发特"同国务会议协商一致决定，只有当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才召集市民会议来进行协商。我们纪元前四世纪或三世纪时，军队的指挥权同其他政府职务是完全分离的；只是在具体的战役需要时才任命军事将领，因为国家没有常备军，因此也无须常任的司令官。有几个家族——早期有马戈尼德家族、后来有巴尔西德家族（见下文）——形成一种军事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迦太基从来没有屈服于一个有野心的军事将领所发动的政变，而政变在希腊诸城尤其是西西里岛诸城则是司空见惯的；这大概是由于监督和控制机构卓有成效。从我们纪元前五世纪初期起，除了很少一些时期外，迦太基市民都免服兵役，这种情况可能使他们未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在希腊和罗马，这种自身力量感正是民主倾向逐渐得到发展的强有力因素。

迦太基的宗教

古典作家在赞扬迦太基政治制度的同时，最严厉地抨击了迦太基的宗教生活，首先是因为它坚持用人献祭。狂热的宗教信仰也同样受到了批评。本来，迦太基的祭礼出自腓尼基，自然同腓尼基祭祀有许多相似之处。腓尼基世界的最高男性神祇在非洲被称为巴尔·阿蒙，这一称号的意思显然是指他炽烈如火，表现了他的太阳的面貌。在罗马时代认为他就是萨杜恩。在我们纪元前五世纪，至少在民间礼拜中，叫做塔尼特的女神超过了他。女神的名字显然来自利比亚，对她的崇拜是随着在非洲获得领土而发展起来的，因为这个名字显然含有土地肥沃的意思，很象希腊的女神赫拉和德墨特尔。伸出手臂的一个女性形象的粗糙艺术作品，出现在迦太基和其它地方的数以百计的石柱上。这两个神使其余诸神黯然失色，虽然我们也知道阿斯塔特、埃什蒙（也就是神医埃斯库拉皮乌斯）以及麦尔喀，即提尔老城的保护神。用人献祭的制度不仅从迦太基和哈德鲁梅图姆，而且从锡尔塔（属于利比亚领土但受到迦太基文化很深的影响）和非洲以外的一些殖民地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发掘出来的是一些神龛，其中有装着烧焦了的小孩骨头的骨灰瓮。据石碑上记载，通常是为了向巴尔·阿蒙神献祭，也常常是向塔尼特女神献祭。根据我们的史料（是有疑问的），牺牲者总是男性，每年一次，并且是那些主要家族承担的义务。这种习俗当然衰落了，但我们纪元前310年的一桩事件说明，在危机时刻，一旦认为由于忽视献祭引起神的不悦时，这种习俗就会恢复起来。迦太基的宗教观念无疑是着重于平息变幻莫测的神威。绝大多数迦太基居民的名字同神有关，无疑也是出于同样的意图。举例说，哈米尔卡意味麦尔喀所钟爱的，汉尼拔意思是巴尔所钟爱的。除了用人献祭以外，还存在着使用其他牺牲品的复杂的献祭制度；还有祭司这个职位，既有专职的祭司又有不属于一个独立的特权阶级的其他祭司。尽管迦太基人同埃及有接触，看来他们对死后生活的概念并不怎么重视，这点同早期的希伯来人相似。死后土葬是普遍现象，墓葬亦是简朴的，许多墓里有奇形怪状的赤陶小面具，据判断它有消灾避祸的意义。

454

迦太基人即便到了后期，所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也比埃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要少得多，

虽然决不是一点不受影响。对得墨特尔和科雷的崇拜，是官方在迦太基城搞起来的，但没有使传统的崇拜对象普遍希腊化。在工艺方面，迦太基的小手工艺品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小，但我们纪元前二世纪的少数遗迹，说明当时来自希腊世界的建筑方面的影响不仅在迦太基的一个地方（邦角的达尔萨非），而且在利比亚地区（杜加）都已存在。腓尼基文被用作文学语言，但没有一件文学作品存留下来。我们知道有个叫马戈的人写了一篇关于农业的论文，被译成拉丁文；马戈显然利用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希腊文书籍。我们还得知，有些迦太基人是希腊哲学的信徒。

同西西里希腊人的冲突

迦太基自希默拉大败之后，进入在非洲扩张、在其他地方保持和平的时期，这个时期到我们纪元前 410 年结束。西西里的希腊人城邦卷入了雅典同斯巴达争霸希腊的大冲突；雅典派往西西里的远征军虽遭到完全失败，但其后果却使迦太基终于卷入了纠纷。塞杰斯塔城是西西里本地人的市镇，但却同迦太基联盟，它对于把雅典人引进西西里负有一部分责任，这时遭到了希腊城市塞里努斯的大规模的惩罚性进攻，于是向迦太基求援。求援被 455 接受了，可能是因为，如果塞杰斯塔被打败，希腊的控制会使得腓尼基人在这个岛上的殖民地被排挤到西部一隅之地。此外，迦太基的领袖汉尼拔是想把这次远征变成一场为他的祖父在希默拉的惨败复仇的战争。我们纪元前 409 年，一支大约 5 万人的雇佣军围攻塞里努斯，九天后发起冲锋攻下该城；不久后，希默拉也被攻陷夷为平地，来不及逃走的居民全遭屠杀。汉尼拔于是班师回去并解散了军队，表明迦太基没有扩张领土的意图。但很清楚的是，从那时以后，这里的腓尼基人连同他们统治下的西西里其他领土，实际上建成一个迦太基的行省。但是，在我们纪元前 406 年，在迦太基的领土遭到一些叙拉古人的进攻以后，迦太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想要征服全岛。迦太基派出了一支更大的部队，我们纪元前 406 年攻下希腊第二大城市阿克拉加斯，我们纪元前 405 年攻下杰拉。但是，汉尼拔还是未能占领叙拉古作为胜利的高潮。看来是一场瘟疫毁灭了他的军队的半数，而叙拉古的新统治者也乐于讲和，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讲和条款确认迦太基对西西里西部的统治，这包括一些西西里本地城镇和幸存下来的塞里努斯、阿克拉加斯和希默拉的居民。这使得迦太基得到比过去更大的领土和更多的贡物。不仅如此，这还打破了迦太基在我们纪元前五世纪中大部分时间所处的孤立状态。从此以后，我们发现，它的进口以及同希腊世界进行的贸易都恢复了，尽管经常还有战争。事实是，希腊人没有联合起来，许多骄傲地独立的城邦四分五裂。虽然多次有人号召他们在西西里联合起来把迦太基人赶出岛去，但从未成功，因为这种号召往往是出于为了个别的城邦或个人的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叙拉古的迪奥尼修斯就是这样。他三次试图赶走迦太基人，一次是我们纪元前 398-392 年，一次是我们纪元前 383-375 年，一次是我们纪元前 368 年。每一次都极不走运，例如，在我们纪元前 398 年，腓尼基的城市莫蒂亚被攻下并加以摧毁，但就在第二年，叙拉古反而受到威胁，一场瘟疫才使它第二次得救。在大部分时间内，迦太基人都能够保有哈里库斯河（普拉塔尼河）作为他们的领土的东部边界。他们的庞杂的、仓促建立起来的雇佣军通常

可以同古希腊的装备齐全的重甲步兵相匹敌，他们的舰队一般占优势。更重要的是，它再不能与希腊世界隔绝了。迦太基城内没有希腊人居住，但道路已打开，迦太基受到希腊政治家的邀请参与希腊世界的事务，而且一般说来被承认为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在我们纪元前四世纪五十年代，当希腊诸城因内部的政治冲突而进一步削弱的时候，看来迦太基即将
456 顺利地用和平手段统治全岛。只是由于一个名叫蒂莫利昂的理想主义的科林斯人的远征，才保住了希腊的地位。可以指出，克里米索斯河一役(我们纪元前341年)，一支由3000名迦太基市民组成的精锐部队被摧毁了。据说这是迦太基空前的最大损失，这说明它多么依赖于雇佣军。

非洲本身自然免于摧毁。我们仅知我们纪元前368-367年发生过一次暴动，它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我们纪元前三世纪四十年代的某个时候，一个叫汉诺的人试图发动政变，号召奴隶居民、非洲的臣民和毛里塔尼亚诸部落响应，但看来没有形成严重的威胁。我们纪元前310-307年，迦太基人又一次同叙拉古人作战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当时叙拉古是由阿加索克勒斯统治。当阿加索克勒斯的城市被围困时，这个希腊人试图进行一次殊死的冒险，他避开迦太基的舰队，派14,000名战士在邦角登陆，烧掉他自己的船只，进攻迦太基。这时除了在迦太基城本身之外，已经没有坚强的据点或守卫部队了。阿加索克勒斯被迫离开非洲之前的三年内，在迦太基领土内大肆破坏。

同罗马的第一次战争

但是上述那些冲突，比起同一时期中在东方发生的革命性变化，规模是很小的，在这个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一个远到印度的大帝国。不过，迦太基自己很快就卷入一场至少同样巨大的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斗争，即同罗马进行的斗争。早在我们纪元前508年，当罗马还只是许多意大利中等规模的市镇之一时，它们之间有一个条约。我们纪元前348年签订了另一个条约，再次调整两个强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尽管罗马这时强大得多，而条约却十分有利于迦太基，因为罗马在商业方面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在其后数十年中，罗马以戏剧性的速度突破，成为整个意大利的统治力量。当我们纪元前293年迦太基的宿敌阿加索克勒斯在意大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时，两国感兴趣的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几年以后，伊庇鲁斯的国王皮鲁斯应邀进入意大利，试图从罗马的控制下解放意大利南部的希腊诸城，这些城邦都是由塔兰顿领导的。皮鲁斯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西西里的希腊人却向他靠拢，要他成为他们的保护人对抗迦太基。迦太基试图阻止此事，派遣一支可观的舰队去罗马，鼓励罗马人继续同皮鲁斯作战。迦太基得到了成功，但皮鲁斯无论如何还是来到了西西里，取得少许但不是决定性的成功以后于我们纪元前276年返回希腊。因此，迦太基和罗马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利害冲突。然而十年以后，它们卷入一场大冲突，给双方造成的损失是到那时为止任何已知的战争中最沉重的。虽然战争的结果具有地理政治的意义，但
457 战争的起因无疑是比较琐细的，双方都没有深远的目的。我们纪元前264年，罗马接受了梅萨纳(墨西拿)的归顺，而梅萨纳原先曾是迦太基同叙拉古对抗时的盟友。这时罗马的政治家充满自信，看来他们是估计迦太基不会作出反应，因此可以很容易地从西西里的希

腊诸城获取战利品。有些城邦也利用了罗马的这种恐惧：迦太基如果掌握了梅萨纳，就可以统治意大利；而实际上，它对意大利从无任何兴趣。迦太基决定抗拒罗马的干涉，因为这种干涉意味着完全改变在该岛存在了150年之久的均势，同时无疑也是因为他们感到罗马的政策是具有威胁的冒险主义。随之而来的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持续到了我们纪元前242年，双方损失巨大。同人们的预料相反，迦太基舰队并不优越，虽然罗马直到我们纪元前261年为止根本还没有象样的舰队。罗马海军的一系列胜利包括我们纪元前260年的米莱之役（那次迦太基舰队损失1万名划船手）和我们纪元前256年的埃克诺默斯角之役。但是我们纪元前255年，罗马舰队在卡马里纳角海面的一场风暴中损失了25,000名战士和7万名划船手。后来双方都打了一些败仗。有几年，双方都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另一件怪事是，罗马军团是已知的最精锐的步兵部队，却未能把迦太基人逐出西西里。我们纪元前256年，罗马人试用了阿加索克勒斯的战略，派一支军队进入非洲。迦太基人在阿迪斯（或：乌德纳）被打败，罗马人夺取了突尼斯作为攻击迦太基的基地。可是罗马人没有能够利用迦太基统治下的努米底亚人的暴动。我们纪元前255年，迦太基雇佣了一个有经验的希腊人桑蒂普斯将军，罗马军队被击溃。战争最后在我们纪元前242年结束。当时迦太基舰队在埃盖茨群岛海面被击败，这意味着西西里不再能得到供应，于是由于无力再战只好言和，迦太基放弃西西里，同意付出大量赔款。

汉尼拔与对罗马的第二次战争

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使得给雇佣军开支军饷都很困难，雇佣军的半数是利比亚人。一场暴动在非洲发生了，其特点是双方都采取了残暴行动。约2万名雇佣军卷入，最能干的领导人之一是个利比亚人，名叫马索。迦太基本身处于危险境地，叛军曾经一度控制了乌提卡、希波阿克拉和突尼斯；他们组织得很好，甚至发行自己的钱币，用希腊文铸着“利比安”(Libyon)的铭文（意思是利比亚人的）。斗争（于我们纪元前237年结束）的激烈程度证实了迦太基人对待利比亚人的凶暴。与此同时，当迦太基无力抵抗之际，罗马人以高压手段夺取了撒丁岛。对此不满的情绪无疑使得反对哈米尔卡·巴卡的计划的任何意见都被压下去了。哈米尔卡·巴卡是在西西里闻名的一位将军，他开始扩大迦太基在西班牙直接控制的地区，在那里，从前的控制范围只限于沿岸的一些据点。其目的有二：一方面是直接开发矿藏，以补偿西西里收入的丧失；另一方面是动员西班牙的人力组成能在战场上同罗马匹敌的军队。不到20年，他和他的女婿哈士杜路巴控制了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并创建了一支大约5万人的军队。我们纪元前221年，哈米尔卡的儿子汉尼拔接替哈士杜路巴指挥在西班牙的新帝国。没有什么证据能支持后来罗马人的观点，说是整个事件是巴尔西德家族向罗马复仇的私人阴谋，本土的政府并不支持他们。我们纪元前220年，罗马对迦太基的复兴感到不安，于是施展策略阻止迦太基巩固或扩展它对西班牙的控制。汉尼拔（和他的政府）拒绝了罗马的威胁，鉴于264和237年罗马的冒险主义政策，断定战争不可避免。我们纪元前218年，汉尼拔穿过埃布罗，向阿尔卑斯山进军，进入意大利。这一战略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只有在意大利本土才能最终击败罗马，在任何情况下，又必须先

458

发制人，阻止罗马入侵非洲，因为这时罗马控制了海上，可以方便地发动入侵。这次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持续到我们纪元前202年，罗马方面再次受到巨大的损失。汉尼拔的军事天才把各方面的力量结合成一支优秀的战斗部队——大部分是西班牙人，但也有高卢人和非洲人的小分队。特拉西梅诺湖战役（我们纪元前217年）和坎奈战役（我们纪元前216年）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是罗马最大的一次败仗。尽管如此，汉尼拔没有能够压服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意志，也没有能够削弱罗马的意大利盟友的力量。意大利盟友大部分仍忠于罗马，尽管他们的国家受到多年蹂躏。他们还为罗马军队提供似乎是取之不竭的后备人力，那是汉尼拔永远无法相比的。意大利奉行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的防御政策，不让汉尼拔再在战场上发挥他的军事天才，而西班牙又于我们纪元前206年被年轻的西庇阿·阿非利加战胜，归顺罗马。于是罗马准备向非洲进攻。

努米底亚的形势帮助了罗马。土著各部落受迦太基文明的影响已数百年。出现了比以前大得多的政治单位，同时，由于在迦太基战争中多次服役，他们力量强大了，更加老练了。最大的努米底亚部落是马萨西里人，其领土东起安普萨加（凯比尔河），西至穆卢卡（穆鲁耶）。它的首领西法克斯于我们纪元前213年背叛迦太基，但我们纪元前208年又同迦太基联合，当时他娶了迦太基一个权势人物的女儿为妻。相反，马西里人的首领迦亚，夹在459 马萨西里和迦太基的领土当中，在西法克斯背叛期间仍忠于迦太基，他的儿子马西尼萨在西班牙工作得很出色。当罗马得胜时，马西尼萨决定支持看来必然获胜的一边，同西庇阿讲和。他回到非洲时，未能成为自己部落的首领，于是纠集一支私人军队，经过两年大规模的冒险活动以后，等待着西庇阿在非洲登陆时为西庇阿战斗。他在汉尼拔最后被从意大利召回之前，在我们纪元前203年的最初几次胜利中起了主要作用。最后一战在纪元前202年发生于扎马（萨卜比亚尔），汉尼拔遭到失败。在此期间，马西尼萨把西法克斯逐出他的领土，提供了4000名骑兵，对罗马的获胜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根据和约，迦太基毁弃了它的舰队，它在非洲的领土大体上只限于从塔布拉卡到泰奈一线；迦太基还要把马西尼萨的祖先曾经持有的土地归还给他，这些土地是争执多事的原因；未经罗马允许，迦太基不得在非洲以外、甚至不得在非洲以内发动战争。

马西尼萨和努米底亚王国

迦太基此后又幸存了50年。但马格里布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主要是靠近地中海的大部分部落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一个历史上的怪现象是：在迦太基文明空前迅速传播的这个时期，其主要人物竟是迦太基的大敌马西尼萨。他是具有无穷精力和天赋才能的英雄人物，在迦太基受过教育，并且无疑是正确地估计了在他自己领土内利用迦太基文明的好处。我们纪元前206年以后，他不仅仅被罗马人看作是一个有用的背叛者，而且后来还同一些最有影响的罗马政治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扎马战役后，他被奖给西法克斯领土东部一些比较肥沃的土地，于是统治一片领土，其范围从锡尔塔（君士坦丁）以西某地延伸到迦太基的新边界。（在马西尼萨的王国和穆鲁耶之间的较不发达地区留给了西法克斯的儿子。）有一些古代作家强调：正是马西尼萨使努米底亚的农业生产大大增加。斯特拉波声称

他把游牧者变成了农民。同所有的概括一样，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但这个地区的谷物产量确有很大增长，有剩余可供出口，尽管家畜饲养仍占优势。这对于未来在罗马时代更大的扩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他产品的贸易是有限的，发行的钱币只有青铜币和黄铜币。马西尼萨的首都看来已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不过关于在马西尼萨的儿子统治下，人口达到20万的说法，则必定是十足的夸张）。考古发掘情况不怎么清楚，但它的城市面貌几乎完全是迦太基式的；已发现的腓尼基文石碑比非洲其他地方(除迦太基本身以外)都要多，毫 460 无疑问，迦太基文字在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使用得越来越多了。

迦太基的灭亡

在这个时期，作罗马的盟国，就要作罗马的附庸，而首要条件就是服从罗马的意志，避免任何可能引起罗马怀疑的行动，不管这种怀疑多么无理。马西尼萨的政治技巧表现在他能够理解这些事实。在50年中，他谋求对迦太基领土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希望在罗马同意之下，到头来迦太基本身会落到他的手中。最初，罗马并无意进一步削弱迦太基，那时迦太基自然也是一个附庸。一直到我们纪元前170年，他的领土增加很少。但是从我们纪元前167年起，罗马推行越来越残暴的政策(不仅仅在非洲)，却偏爱马西尼萨。马西尼萨加深罗马对迦太基的怀疑，同时，只要罗马一声号召，就模范地提供物资和人力。用这些方法，他把加贝斯湾的市场和巴格拉达斯流域的大部并入了他的王国。罗马元老院的意见逐渐接近卡托的意见，即迦太基最后必须予以摧毁。虽然迦太基确实显示已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大大恢复过来，但要说它对罗马会再次构成威胁，那却是荒谬的。给予迦太基人的选择是：要么放弃城市迁移到内地去，要么面对战争及其后果。他们选择了后者。于是，一支罗马军队就在我们纪元前149年派到非洲。尽管罗马有压倒优势，迦太基还是坚持到我们纪元前146年。一些利比亚人仍然支持迦太基。马西尼萨自己对罗马的行动很忿怒，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希望就落空了，但他只好忍气吞声。早已建立的腓尼基和迦太基殖民地，如乌提卡、哈德鲁梅图姆、塔普苏斯等等，大部分都倒向罗马人，从而避免了本来是不可避免的毁灭。迦太基本身被夷为平地，遗址在举行仪式中受到诅咒。这一象征性行动是罗马对于那个顽强抵制它统治地中海世界的国家一个世纪以来所积蓄的恐惧和仇恨的见证。

迦太基以后的诸王国

努米底亚

然而，又过了100多年，罗马才完全取代迦太基成为马格里布的政治和文化的统治力量。由于种种原因(见第二十章)，罗马灭了迦太基以后，只接管了突尼斯东北部的一小部分，即使这一部分也基本上未加注意。在北非的其余部分，它承认一系列王国作为保护 461 国，一般地让它们自行其是。在这些王国之中，迦太基的文化影响继续存在，甚至有所增

强，因为较老的沿海殖民地继续繁荣，迦太基最后几年斗争中有许多难民逃奔到了那里。被称为新腓尼基文的腓尼基文字的后期形式，传播得更广了。据说，罗马人甚至把灭迦太基时抢救出来的图书送给努米底亚的国王们。可能有些书是有实用价值的，如马戈的农业论文。后来诸王没有一个象马西尼萨那样强大，但努米底亚王国和毛里塔尼亚王国中无疑还继续执行着主要的发展方针。应当强调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王国仍然仅仅是地理的概念，因为在它们内部，有很多部落在进入罗马时代相当时期、有些甚至到了罗马时代以后，还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政治上的统一始终很薄弱。王室内部的一夫多妻制（据说马西尼萨死后留下10个儿子）和后来的罗马干涉加剧了这种状况。在努米底亚，马西尼萨死于我们纪元前148年，终年约90岁，由米西普萨（我们纪元前148－118年）继位。在他统治时期，努米底亚同罗马和意大利之间的贸易增加了，据说在锡尔塔有很多意大利商人。在他死后，王国由他的两个兄弟和马西尼萨的一个孙子朱古达共同统治。朱古达受到罗马政治家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的支持，正如马西尼萨曾经得到早先那个西庇阿的支持一样。朱古达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力图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的统治者。罗马人于是试图正式分割努米底亚王国，但是，当朱古达从他的一个对手那里夺取了锡尔塔并杀死了意大利居民时，罗马向他宣战了。朱古达坚持顽强的抵抗，使罗马在军事上出了一些丑，直到他被毛里塔尼亚的统治者波胡斯出卖给罗马人为止。于是罗马把马西尼萨王朝的另一个成员高达立为国王，他的儿子亨普萨尔后来继承了他。亨普萨尔在我们纪元前88－83年之间被一个对手短暂放逐以后，一直统治到我们纪元前60年；人们知道，他用迦太基文写了一本关于非洲的书，并继续进行他的王朝的开化工作。努米底亚在作为独立国家的最后岁月里，卷入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系列内战。亨普萨尔的儿子尤巴（我们纪元前60－46年）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受到尤利乌斯·恺撒的公开侮辱，他于我们纪元前49年参加了庞培派的事业，在非洲为该派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以致据说他曾得到允诺，如庞培一派得胜，他可获得罗马在非洲的行省。恺撒在塔普苏斯获胜之后，他自杀了，罗马随即对努米底亚建立了直接统治。

462 毛里塔尼亚

一般认为毛里塔尼亚王国的发展比努米底亚慢得多，但这可能是由于对情况缺乏了解。显然，阿特拉斯山的山岳地带，始终既不受腓尼基文明的影响，也不受后来的罗马文明的影响，但在象穆鲁耶河谷和大西洋沿岸的肥沃地区，定居的生活已有某些发展。正是在这些山区，各个部落在进入罗马时代甚至在罗马时代以后，还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特性。早在我们纪元前406年对西西里的远征，我们纪元前四世纪五十年代汉诺的反叛，以及我们纪元前256年罗马对非洲的入侵，都提到了毛里人。毛里的一个国王在马西尼萨的命运攸关时刻帮助过他，但是，毛里人也参加了汉尼拔驻在扎马的军队。到了后来，波胡斯一世先是帮助朱古达反对罗马，后来又出卖了他，因此得到罗马奖给的穆鲁耶以东的很大一块领土。在以后30年中，这个地区似乎分裂了。波胡斯二世统治东部，他联合一个意大利冒险家P.西蒂乌斯，站在恺撒一边对尤巴作战。博古德二世统治着穆鲁耶的西部，他也支持

恺撒。两个人都得了奖赏，波胡斯所得是向努米底亚进一步扩张自己的领土。几年后，博古德二世在罗马内战中支持马克·安东尼反对屋大维，被站在屋大维一边的波胡斯二世逐出境外。我们纪元前33年波胡斯去世，而博古德于我们纪元前31年被杀，因此，整个的广大地区没有统治者。然而，奥古斯都皇帝决定罗马不宜在这个时候进行直接统治，也许他是怕来自山地部落的难以对付的军事问题。我们纪元前25年，他立努米底亚最后一个国王的儿子尤巴为国王，尤巴从四岁起在意大利度过他的童年。于是，从我们纪元前30年到25年，又为他暂时重新建立努米底亚王国。尤巴作为一个赤胆忠心的仆从国王，在位40余年。他在毛里塔尼亚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就象马西尼萨过去在努米底亚作的一样。他是一个酷爱和平的人，文化方面完全希腊化，用希腊文写过许多书（现已佚失）。毫无疑问，他的首都约尔——后改名为恺撒里亚（舍尔沙勒）——可能还有一个陪都沃卢比利斯，在他的统治时期完全城市化了。他的儿子托勒密乌斯继位，统治到我们纪元40年，被皇帝盖尤斯召到罗马处决了，处决的原因不详。这一行动是把该地区划为行省的前奏，它激起一场叛乱，几年后才被镇压下去。我们纪元44年，毛里塔尼亚被分为两个行省，至此，马格里布就完全置于罗马直接统治之下。

马格里布的腓尼基遗产

一般说来，努米底亚王国和毛里塔尼亚王国的独立时期，经历了利比亚和腓尼基的特征相混合的文化的发展和巩固过程，而腓尼基的因素在文化方面占主导地位，虽然它只代表全体居民中的一小部分。前已述及的努米底亚农业的发展是在地理条件适宜的一些较远的地方出现的。在锡尔塔的外面，以及后来在约尔－恺撒里亚的外面，城市发展的范围不大，但在某些地方也发展得足以为罗马时代的大扩展打下基础。混合文化的力量还可从以下事实看出：石碑上的新腓尼基文字的应用持续到我们纪元二世纪；在同一时期内，"苏发特"这个词曾在至少30个不同的城镇中使用，最远到达摩洛哥西部的沃卢比利斯和利比亚的大雷普蒂斯。腓尼基-利比亚宗教在罗马时代持续盛行，也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事实。那时整个马格里布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表面上的文化统一，这也可由利比亚的难懂的字体得到证实。这种字体在我们纪元前二世纪杜加的两块碑文上用过，看来当时已在发展，后来在罗马时代也用在石碑上（大概是模仿腓尼基习惯）；这种石碑在摩洛哥，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边界，以及在利比亚都发现过许多。至于书面语言，则利比亚文和新腓尼基文在罗马时代都由拉丁文代替了；一种腓尼基口语在罗马时代后期仍然广泛流行，但是无法确定利比亚口语的地位和使用范围。利比亚文字体同图阿雷格人现代使用的字体相似，这个事实却难以解释。 463

从总的历史角度来说，腓尼基殖民地在马格里布的建立，构成了古代近东和中东的古老文明仅有的一次向西地中海地区伸展，而迦太基文明存在的时间最长。这一点连同希腊人的向西扩展，成为整个运动的一个部分，通过这个运动使整个西地中海，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欧洲西北部（那时尚是由各种各样的部落人民居住着），处于爱琴海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影响范围之内。在非洲历史中，腓尼基时期把马格里布带进了地中海世界的总的历史，突

出了它同北岸和东岸的联系。地理环境也显得特别重要，至迟到了现代，地理环境已经把马格里布同地中海世界联系起来。限于我们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要弄清利比亚当地文化的演变以及它对腓尼基文化传入所作的反应，还有待于考古学家的进一步工作。*

464

（褚律元译）

* 在本卷的下一版，拟对利比亚在本卷涉及时期中的遗产和作用作更详细的叙述。计划举行一次关于利比亚在古典时代的贡献的专题讨论会，并特别讨论关于昔兰尼加在希腊时代的作用，利比亚在腓尼基时代的作用，以及加拉曼特人的文明。——原编者注

19 罗马时期和罗马以后时期的北非

465

第一部分 罗马时期

A. 马哈朱比

罗马的占领和土著居民的反抗

我们纪元前 146 年迦太基灭亡、其领土沦为罗马一个行省以后，北非的命运就掌握在罗马和当地诸王国手中。本来最好是单写一章专门来研究当地的那些王国，从努米底亚王国的出现写起，直到我们纪元 40 年毛里塔尼亚最后一个王朝结束。从那时以后，整个北非就已变成罗马属地，一直保持到汪达尔人入侵为止。

然而，无论是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占领，还是按殖民主义者婉转的说法所谓对它的“绥靖”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后者尤其如此。罗马人从原属迦太基的领土和尤巴一世的王国向南向西的挺进，遭到顽强的抵抗。遗憾的是，我们手头的材料只有关于最突出的那些斗争的片断记载。罗马建立并巩固了它的统治以后，费了很大气力才在北非实现的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终于被无休止的抵抗所破坏；这些抵抗是以军事形式出现的，同时也有政治、种族、社会和宗教等方面的活动。关于这种抵抗和这些暴动，我们所了解的全部情况都是从纯粹反映罗马观点的那些书面和碑铭资料中搜集来的；而且，现代史学所采取的某些研究方法又进一步加深了进行历史分析的困难。直到本世纪初，甚至直到最近，历史家还是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抛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殖民时期流行的意识形态影响的某些观点。①

从记述征服阶段的那些史料中，尤其可以看出非洲战争的独特性质。在我们纪元前一世纪的最后25年间，罗马的将军们接连不断地举行战胜毛鲁西亚人、穆苏拉米人、盖图利人和加拉曼特人的庆祝活动，这就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说明尽管罗马人多次获胜，但当地的居民从来没有被彻底征服过。②

466

在这些战争中，最著名的就是攻打努米底亚王塔克法里纳斯的那次战争。那次战争是在提比利乌斯统治时期进行的，持续达八年之久，范围遍及北非南部所有地区，从的黎波里塔尼亚远达毛里塔尼亚。现代历史学家往往仅把这场战争简单地说成是文明世界与野蛮

① 有关这方面的材料见 1976 年贝纳布(M. Bénabou)著作的引言，特别是第 9 页至第 15 页。
② 罗马内利(P. Romanelli)，1959 年，从第 175 页起。

4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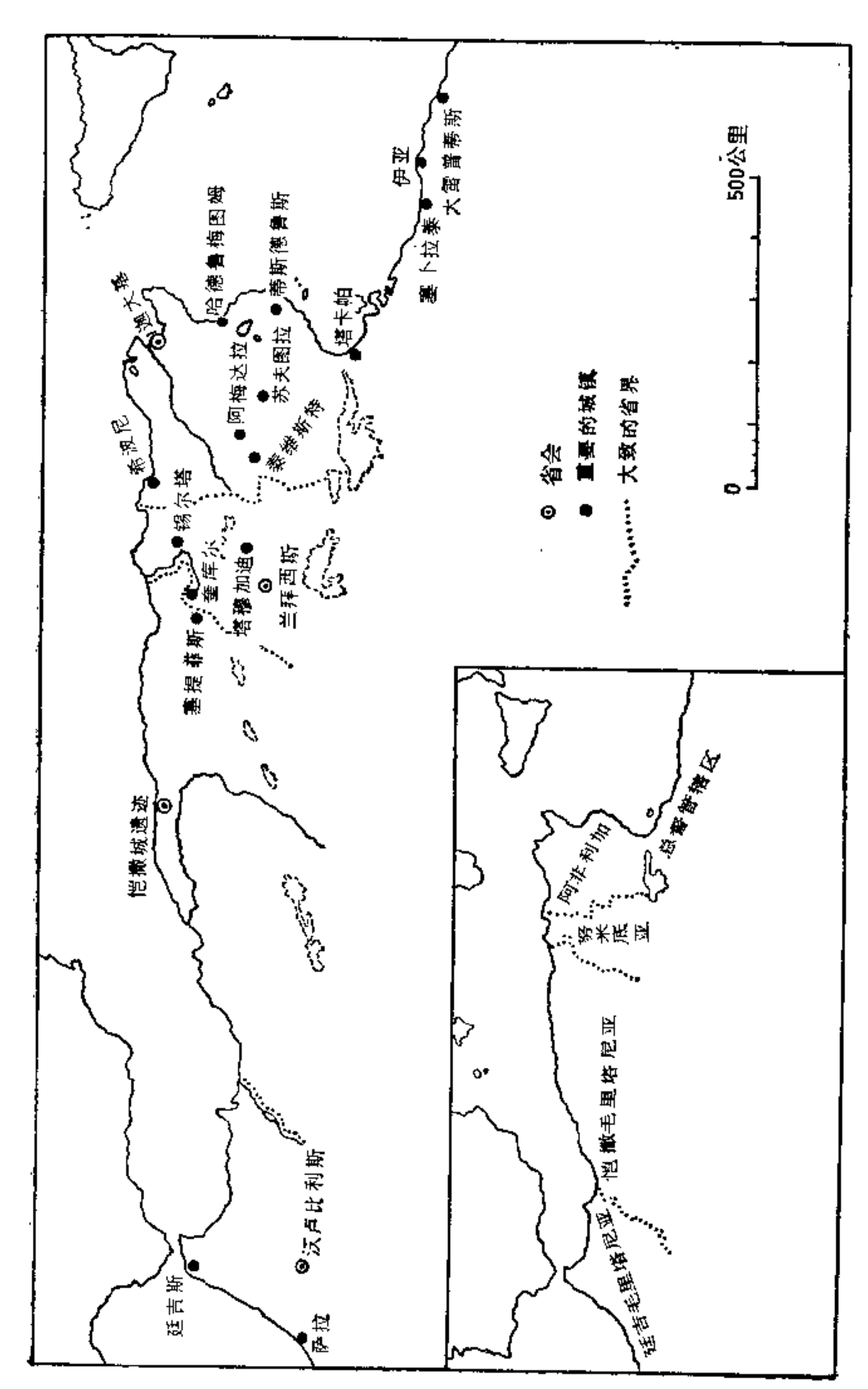


插图19.1 二世纪末罗马统治下的北非各省

人之间的斗争，说成是当地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企图阻挡罗马人向前推进和殖民定居，因而是拒绝接受优越的文明方式和更好的社会制度。[③] 然而，据塔西陀说是由塔克法里纳斯提出的那些要求，却清楚地说明了当地居民进行反抗的根本原因。这位努米底亚领袖之所以拿起武器迫使强大无比的罗马皇帝承认努米底亚人民的土地权利，是因为罗马人征服那里以后，立即没收了所有的肥沃土地。定居的努米底亚人的土地荒芜了；游牧民一向游牧的地区日益缩小并受到限制；罗马和意大利的老兵和其他殖民者到处安家，首先是在最富饶的地方定居；罗马的税务人员以及贵族、元老和骑士等等，一个个都为自己圈占了大片的地产。他们的国家遭受如此疯狂的掠夺，致使所有土生土长的游牧民，所有定居的人，除未遭受连年战祸和剥夺之害的少数城市的居民外，不是陷入极端贫困，就是被赶到荒凉的草原和沙漠中去了。因此，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武装反抗上面，他们打仗的主要目的就是收复自己失去的土地。

我们纪元一、二两个世纪中连绵不断的军事行动，以及罗马人向西南方向的推进，引起许多部落的骚动，他们在从穆鲁耶河流域一直延伸到阿穆尔山和瓦塞尼斯这一片地区，时而聚集一起时而分散各处。罗马人轻而易举地在沿海一带和东北地区站稳脚跟以后，就向现代突尼斯所在地的南部以及大高原地区和撒哈拉的阿特拉斯山一带推进。在尤利乌斯-克劳迪乌斯诸皇帝统治时期，已征服的领土的边疆西起锡尔塔，南至塔卡帕，包括奥古斯塔第三军团大本营阿梅达拉，泰莱普特和卡普萨。在弗拉维亚诸皇帝时期，这个军团在泰维斯特长期驻扎下来，把边界一直推到塞提菲斯。图拉真在位时期，奈门沙地区也合并了进去，并于我们纪元100年建立了提姆加德殖民地；最后，该军团于128年在兰拜西斯建立永久性驻地，在奥雷斯山脉中打通一条条道路，并在盖梅拉扎营驻守，以防止各部落的进攻。在罗马各省和诸部落被逐入的南方沙漠地区之间建立起边防带（limes)。这个边防带逐步向西南方向推进，壕沟道路交织其中，有一系列哨所和小碉堡加以防守，纵深50-100公里。J.巴拉德茨进行的空中考古研究发现了许多东西，其中有一条壕沟的一些残段，其边缘有土坡或土墙，在距离不等的地点有正方形或长方形堡垒加以守卫。为了监视游牧部落的行动，防止他们劫掠农业地区和劫掠由南向北前往加贝斯湾和锡德拉湾各商业城市的商队，塞雷尔人于二世纪末在边防带外面修建了一系列小堡垒，如迪米底(梅萨德)、锡达穆斯(盖达米斯)和戈拉斯(布恩杰姆)等。于是在我们纪元头两个世纪内，罗马帝国非洲各省的南部边界终于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体系。

468

然而，罗马无力根除柏柏尔人的反抗，也从来未能持久地控制南部和西部的那些游牧民族。尽管图拉真和哈德良费了很大力气，也无论塞普蒂米乌斯·塞韦鲁斯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边界地带推行如何坚定的政策，三世纪时发生的危机终于使这番事业遭到夭折。茫茫的大沙漠，骑骆驼的牧民有很大灵活性以及沿着撒哈拉阿特拉斯山脉从西到东易于通行等条件，保证了英勇不屈的柏柏尔人有着极大的行动自由。在这方面，终于把罗马的统治拖得精疲力竭的那些部落，先是在廷吉毛里塔尼亚，后来又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内地广阔的沙漠地区找到了大量的人力来源。在三世纪头25年以前，这个地区的中部和南部一直是由奥

③ P.罗马内利，1959年，从第227页起。

古斯塔第三军团守卫，以防止当地人的袭击；这个军团的兵力名义上是5000至6000人，需要时则补充大量的辅助兵力。据估计，在二世纪，兵员的最高数目可能达到25,000至30,000人。这个数字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大，可是还必须考虑到沿边防地带在已开垦荒地上定居的那些老兵仍然有服兵役的义务。必要时还从帝国驻其他各省的军团，特别是驻西班牙的军团调来部队保卫廷吉毛里塔尼亚。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阿非利加省总督还可以调遣驻469 迦太基的第十三城防旅及一支小骑兵队。至于镇压海盗和海岸巡逻，则是亚力山大港舰队的职责。驻非洲的军团人员情况最初很复杂，但后来几乎都是从当地居民中招募。不过，东部的一些部队——卡尔西顿军分团、帕尔米利亚人的弓箭手——是由习惯于沙漠战争的叙利亚人组成的。

行政组织和军事问题

我们纪元前27年1月13日，屋大维根据通过的原则，将帝国各省分别划归他本人或元老院管辖。三天以后，他晋尊号为奥古斯都。这时，早已被征服和平定的非洲，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许多传统同元老阶层有紧密的联系，也列为归元老院管辖的省份。它的西部边界跨越安普萨加——奎库尔——扎拉伊——霍德纳。在东南部，它的领土包括的黎波里塔尼亚沿海平原，一直伸展到同昔兰尼加交界的那些菲莱尼人的祭坛。这个阿非利加省，也称总督管辖区，合并了罗马帝国在北非前后设立的两个省，其中之一是早在我们纪元前146年就已被征服的迦太基的领土，称为旧阿非利加；另一个是恺撒在非洲对庞培的军队及他们的盟友努米底亚王尤巴一世作战之后建立的，称为新阿非利加。除了这些领土之外，还有恺撒划给意大利冒险家P.西蒂乌斯的四块锡尔塔殖民地。

就象在共和时期那样，罗马元老院在帝国时期继续委派驻阿非利加的地方长官。这位地方长官的官位很高，因为他是出席罗马抽签决定各省命运的两位前执政官之一。所以他享有总督的头衔，他在迦太基的任期只有一年，除非作为例外措施延长任期。他拥有司法特权，根据这种特权无论审理民事或刑事案件他都是省内最高法官。此外，他还拥有行政和财政大权。尽管省级行政机构和市政当局在原则上是自治的，却都处于他的监督之下，并由他向这些机构宣布帝国的法律和规章；重大的公共工程由他指挥执行，经费也由他批准。他对负责向罗马供应非洲谷物的部门以及财政机构的业务拥有最高的控制权，该地的财政收益按规定应上交农神庙宝库即元老院金库。他有几位曾担任过执政官职务的副总督作助手，其中一位驻在迦太基本地，另一位驻在希波尼，还有一位负责财政事务的司库官。此外，如上所述，为维持法律和秩序，他还拥有一支小部队，兵力约1600人。

皇帝可以直接干预受元老院管辖的这个行省的事务，不过多数情况下是假手一位骑士470 团出身的常驻地方财政长官间接干预——他是一位帝国官员，负责管理帝国的广大领地和征收某些间接税，如5%的遗产税，这些税收上交给由皇帝掌握的军用金库。地方财政长官也有一部分司法权，原则上只限于解决税收争端。从135年起，他添加两位助手：一位是世袭财产税务官，主管辖境的行政事务；一位是阿非利加事务第四税务官，主管财政收入。皇帝派来的这些行政官员往往和总督发生矛盾，不过还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们曾奉命对总

督进行监督。

与此同时，阿非利加省总督管辖区和元老院管辖的大多数其他省份不同，它不能没有军队。它的东北部，也就是相当于过去的“旧阿非利加”的地区，是非常安定的；可是南部各地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帝国当局需要派驻部队守卫那些认为业已平定的地区，并逐步加以扩大。这些部队主要由奥古斯塔第三军团组成，由隶属于总督的一位帝国代表担任指挥。因此，总督就处于能够掌握对元老院负责的共和派地方长官的军权的地位。但这种局面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不引起皇帝的猜忌。不久，卡利古拉就决定推行一项限制地方文官权力并缩小元老院职权和自治权的总政策，对阿非利加总督管辖区的组织进行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改革：剥夺了文官政府的军事指挥权，从而在事实上，即使不是在法律上，建立起一个由指挥奥古斯塔第三军团的帝国代表控制的努米底亚军区。早在我们纪元39年，担任这个特殊指挥职务的官员，其地位就已经介乎那些担任各省总督的帝国代表和各军团总司令派驻各地的代表之间了。④

不过，他这种地位并不很明确，因而总督和军团帝国代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方面，必然引起争论。塞普蒂米乌斯·塞韦鲁斯终于将军区身分提升为行省一级，以此来使这种地位合法化，这就是大概在我们纪元 198 至 199 年间建立的努米底亚省。⑤ 该省由军团的帝国代表，又称摄政官(praeses)进行管理，此职由皇帝直接任命和调遣。该省西部边界仍沿安普萨加(凯比尔河)左岸，通往奎库尔和扎拉伊西部，穿过霍德纳平原，然后朝艾格瓦特方向往南；东部边界从希波尼西北到卡拉马以西，沿谢里夫河右岸通往马吉法以西，一直到杰里德盐沼的西北边缘。 471

在安普萨加和大西洋之间有一个毛里塔尼亚王国，早在我们纪元前 33 年这王国就由它的国王小波胡斯在遗嘱中赠送给罗马帝国了。⑥ 后来被尊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接受了这一遗赠，趁机在那里建立了11个老兵殖民地，但在我们纪元前 25 年，他把这个王国让给了尤巴二世。我们纪元 23 年尤巴二世的儿子托勒密继承王位。小心谨慎的屋大维可能认为当时由罗马占领这个国家的时机尚未成熟，有必要由当地领袖介入才能为罗马的占领铺平道路。我们纪元 40 年，卡利古拉认为直接控制的时机已经到来，就指使人把托勒密暗杀了。⑦ 最后，在我们纪元 42 年底，克劳迪乌斯决定组成两个毛里塔尼亚省：东边是恺撒伦西斯，西边是廷吉塔纳，以穆卢卡(穆鲁耶)河为界。同努米底亚一样，两个毛里塔尼亚省都由皇帝直辖，都由一般的骑士团出身的地方财政长官治理。其中一位驻在约尔-恺撒里亚，另一位可能是在沃卢比利斯。他们在各自驻地指挥着辅助部队，同时还被授予一定的民政权力和军事权力。

在戴克里先登位以前，非洲各省的军事和行政等组织没有进一步的重大变化。尽管非洲遭受的苦难比其他省份少一些，但也无法避开波及整个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等许多方面的总危机的冲击。在安东尼执政末期，这个危机就已经是一个潜在的威

④ M.贝纳布，1972 年，第 61-75 页。
⑤ 普佛洛姆(H.G.Pflaum)，第 61-75 页。
⑥ P.罗马内利，1959年，从第 156 页起。
⑦ 卡科皮诺 (J.Carcopino)，1958 年，从 191 页起，1948 年，第288-301 页；罗斯托夫采夫 (M.I. Rostovtzev)，1957年，从第 321 页起；科图拉(T.Kotula)，1964年，第 76-92 页。

4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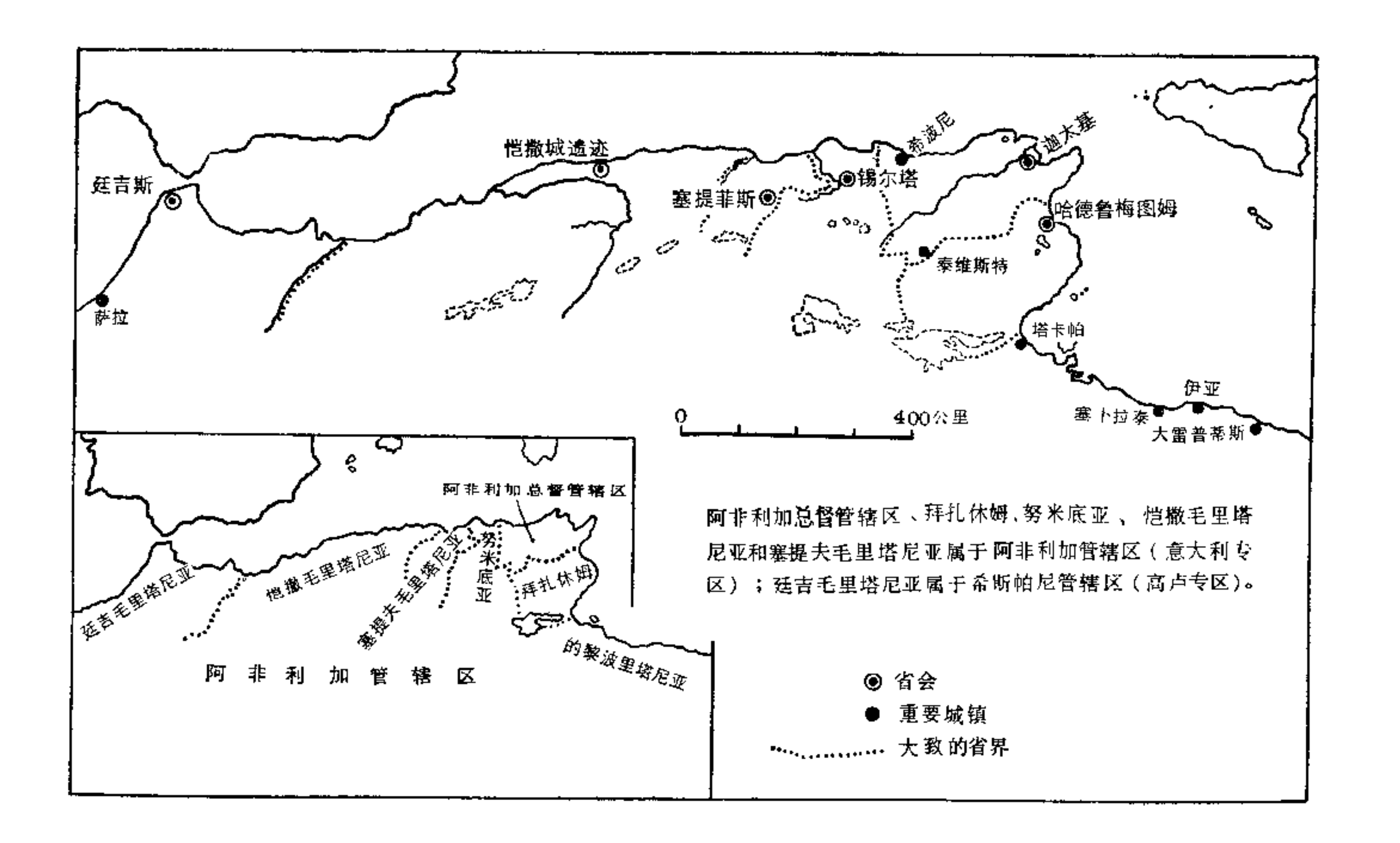


插图 19.2 四世纪罗马统治下的北非各省

胁；塞韦鲁斯时期进行的那些改革丝毫不能驱散日益密集的乌云。从238年起，形势恶化起来，到了三世纪末，一场惊人的猛烈风暴终于爆发了。在北非，摩尔人诸部落的进攻早已预示着罗马势力的衰落。253年至262年之间，这些进攻再度蜂起，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又告猖獗。⑧以前很繁荣的各省份出现了长期的财政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在二世纪至三世纪头25年期间，危机对总督管辖的行省和努米底亚的影响，既是有力的，又是隐蔽的），社会各阶级之间也出现日益增长的不平衡状态。这一切逐渐削弱了帝国的权威。此外还应该加上篡权活动和军事上无政府状态的后果。这样一来，罗马政权瓦解成了许多此伏彼起的或同时并存的政权。

但是，帝国为了拯救自己，及时对这些祸患作出了反应。在加利努斯统治时期，开始了一系列广泛措施的第一个步骤。这些措施逐步地、试验性地进行，影响到各个领域的活动：改造军队及其指挥机构，改革各省的政府和管理部门，并扩展到社会政策、宗教和对皇帝的崇拜。这是恢复工作的开始，它在奥雷利安和普罗布斯统治时期继续进行，到戴克里先时期达到高峰，形成一个体系，扎根于各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之中。最后，君士坦丁的许多革新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在当时这些革新可以说是综合了多年来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及综合了那个时代的各种宗教倾向。 472

政权和军权分开是帝国后期治理各省的突出的特点之一。这是从加利努斯统治时期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逐步形成的，后者把这项改革以明确的形式固定下来。

戈迪安三世时期，驻非洲的奥古斯塔第三军团⑨被解散，由于这种情况，北非的军事体制非改革不可。指挥权最后交给了"阿非利加"首领，非洲各省的部队都由他管辖。四世纪时这支部队同帝国早期那支部队大不相同。摩尔人各部落的进攻使得建立一支机动部队成为必要——建立一支随时准备在动乱地区采取迅速行动的攻击力量。它由军团的步兵和骑兵组成，兵员主要是从营地附近业已归化罗马的农民中招募。然而，服兵役逐渐成为世袭的和财政上的义务，这势必损害这些部队的质量。除了这批被认为是第一流的机动部队以外，还有屯边军，那就是在边防地带分得土地的农民兵。他们都免交租税，但必须负责保卫边疆击退任何来犯的部落。廷吉毛里塔尼亚的屯边军，同东部的屯边军一样，是按照传统编制组织起来的，即由侧翼部队和步兵队编成的。但非洲其他各省的屯边军则是按地理位置划分为若干军分区，归各自的屯边军长官(Praepositus limitis)指挥。考古中发现的各种文物，特别是边防带东部发现的那些文物表明，屯边军驻扎在设防的农场周围，依靠土地生活，往往以水渠引水灌溉。这样一来，他们便推动了撒哈拉边缘地带的农业和居民区的发展，并把边防带变成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地带，而不只是帝国各省同仍在柏柏尔人手中的独立地区之间的分界线。这就是罗马－非洲文明和基督教得以传播到那些不受罗马直接管辖的地区的原因。还必须提到一点，帝国政府同各部落首领一直保持着联系。这些首领为了获得津贴和争取授予帝国爵位承认他们在当地的权力，常常同意提供部队担任边界上警卫任务以作交换。 474

在进行军事改革的同时，各省的地方组织也进行了彻底的改组。不过现已证实，改组

⑧ 最后，请看M.贝纳布著作，1976年，从第218页起，从第234页起。
⑨ 同上，从第270页起。这一军团在瓦勒利亚执政时改编的事，从第214页起。

是逐步进行的，并且考虑到了每个省的具体需要和条件。为了加强帝国的权威，同时削减总督的权力（这种权力常常落入篡权者手中），也为了增加税收以资助边防，防止外来袭击，就把阿非利加总督管辖区划分成三个自治省。北边是玖吉塔纳，即名副其实的总督管辖省，该省向南延伸直达阿梅达拉和普普特一线，接近哈马马特；西边包括卡拉马、图布西亚努米达伦和泰维斯特。然而，驻迦太基的总督仍然是一位重要官员。他拥有最高荣誉(clarissimus)称号，任期届满后，往往升为高级执政官，进入显贵行列。四世纪时担任这种总督的不少是非洲血统的人。他们总是由两位帝国代表辅佐，这两个人一般都和总督有亲戚关系，其中一人驻在迦太基，另一人驻在希波尼。总督保有其司法和行政特权，然而对市政事务的监督越来越专横了；由于向总督及其代表负责的部门和官员日益繁多，行政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

拜扎休姆省是从总督管辖的省划分出来的，该省从阿梅达拉-普普特一线一直延伸到塔卡帕峡谷，西部包括马克塔、苏夫图拉、泰莱普特和卡普萨。然而，在该省南部边防带上的那些哨所不受拜扎休姆省长管辖。这个省和总督管辖省一样，没有军队。因此，在杰里德盐沼附近的那些哨所是由努米底亚负责的，西南部那些哨所则由的黎波里塔尼亚管辖。拜扎休姆省省长驻哈德鲁梅图姆，起初属骑士等级，享有摄政官头衔，但可能是在君士坦丁执政时期，在340年以后，他晋升到执政官爵位。

在东南方，新成立的的黎波里塔尼亚省包括两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从塔卡帕到菲莱尼祭坛之间沿海的狭长地带，由总督管辖，很可能是由他派驻迦太基的代表治理；另一个在内地，是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边疆地区，一直到三世纪都是由奥古斯塔第三军团的司令官、亦即努米底亚省省长治理。这个地区包括杰法拉和马特马塔斯，一直延伸到杰里德盐沼北端。最近的研究表明，同过去的印象相反，罗马人一方面撤出戈拉斯（布恩杰姆）等某些前沿阵地，一方面在四世纪以至五世纪初仍然保留海岸线以南那些据点。[10] 正是因为这个原故，的黎波里塔尼亚历任省长能够在各种情况下起到重要的军事作用。直到324-326年，他们一直都享有摄政官头衔以及随之而来的军权，驻节大雷普蒂斯。后来，驻扎边防地带的部队的指挥权就交给了阿非利加首领，不过，他并非不间断地保持着这项权力——在360年以前不久和365年，也许是由于奥斯图利亚部落的骚乱，的黎波里塔尼亚边防军的指挥权曾暂时从阿非利加首领那里收回，交给的黎波里塔尼亚摄政官。

475

努米底亚省在东部的埃杜格山脉和西部的安普萨加河口之间有一条通向大海的狭长通道，但它的领土越往南越展宽，从霍德纳盐沼东端伸展到泰维斯特峡谷。该省最初分成两个区，一个区是在省城锡尔塔周围的原锡尔塔邦联的平静的城镇地区，另一个是南方以兰拜西斯为主要居民点的骚乱的山区，但早在314年就已统一。直到316年，这个省仍然由享有摄政官头衔的一位属于骑士等级的省长掌管军政大权。316年，文官政府交给享有省级执政官(consularis provinciae)这个新头衔的一些元老院议员，以后又授予他们最高荣誉等级。这些人大多数是罗马贵族，是由于地产才把他们同这一富饶的省份联系在一起的。锡尔塔成了唯一的省城，并改名为君士坦丁，以表示对皇帝的敬意。

---

[10] 库图瓦(C. Courtois, 1955年，第70-79页)肯定罗马人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内陆撤走。这与考古成果是矛盾的。见迪维塔(A.di Vita),1964年，第65-98页及克莱门特(G. Clemente)，第318-342页。

关于四世纪毛里塔尼亚各省的行政改组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戴克里先在即位之前不久是否曾从廷吉毛里塔尼亚内陆以及恺撒毛里塔尼亚所有的西部地区撤出？从最近的研究看来，恺撒毛里塔尼亚以西的地区是否曾放弃，很值得怀疑。⑪另一方面，人们一致认为，戴克里先曾于285年从廷吉毛里塔尼亚的卢库斯河以南所有地区撤出。但看来罗马同沿海各城镇仍保持着海上的联系。这可以说明为什么象萨拉这样的地区在君士坦丁时期仍处于罗马势力范围以内。⑫ 戴克里先还把恺撒毛里塔尼亚东部地区划出来成立一个新的省，即塞提夫毛里塔尼亚省，省会为塞提菲斯，即现在的塞提夫。最后，为行政上的方便，廷吉毛里塔尼亚从非洲其他地区划分出来，并入由西班牙各省组成的主教管区。 476

为确保中央政府和面积缩小但数目增多了的各省之间的联系，戴克里先增设高级官员若干，他们的职务过去一度只是临时特派的，现在则是固定的副执政官。原则上这些副职都是一些真正的骑士，但当他们被提到高于元老院议员一级的省长之上后，就升到最高荣誉级了。每一位副执政官都管辖着由几个省组成的某一主教管区。阿非利加主教管区包括北非各省，只有廷吉毛里塔尼亚除外。各省省长除了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阿非利加总督外都被置于这位副执政官管辖之下，他驻在迦太基，对意大利-阿非利加-伊利里亚执政长官负责。

开拓殖民地和市政机构

罗马文明和希腊文明一样，主要也是一种城市文明。因此一个省份的文化和罗马化的程度取决于该省的城镇密集程度。⑬在非洲各省，特别是阿非利加总督辖区，城市生活已经高度发展；在北非全境至少有500个城市，单在总督管辖的那一个省，就有200个城市。⑭但是，人们一直没有说清楚，这一带的城市文明主要是从迦太基-努米底亚时代继承下来的。⑮

在共和时期，非洲的城市还都没有被承认享有罗马国籍；当时只有原来属于腓尼基的七个城市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在政局变动中，这项自治权也很难确保。这些城市都是在最后一次布匿战争中站在罗马一边的。它们的传统典章制度已取得正式承认，而且还豁免了土地税，或称贡赋（stipendium）。与此同时，罗马统治者也容忍非洲其他城市保留旧制度，但并不从法律上加以保护。这些城市采用的仍然是腓尼基的行政制度，由“苏发特”及显贵人物会议领导，但须交纳贡赋。⑯ 第一次正式殖民的尝试是G.格拉胡斯进行的。我们纪元前123年，按照鲁布里阿法的规定，6000名罗马和拉丁移民划给大片土地，规 477

---

⑪ 萨拉马（P.Salama），1954 a，第224-229页及1954 b，第1292-1311页。

⑫ 布贝（J.Boubbe），第141-145页及乔丁（A.Jodin）。

⑬ 关于城市结构的发展和作用，见克拉维尔（M.Clavel）及勒韦克（P.Levêque），第7-94页。库图瓦写道，当时的情况是“判断真正开化的唯一标准似乎就是日常生活能确切地反映罗马日常生活到什么程度。”1955年，第111页。

⑭ 查尔斯-皮卡德（G.Charles Picard），1959年，从第45页起。

⑮ 例如，见康（G.Camps）的文章中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前的城市一览表（1960 b，第52-54页）以及努米底亚王国时期大壕沟和穆卢卡之间的城市一览表。第275-277页。

⑯ G.查尔斯-皮卡德，1959年，从第22页起。

定每人可得200英格拉，即50公顷。算起总面积，当然还要加上公用地，说明当时有着广阔的领地。因此，人们认为，分配的土地是从迈杰尔达开始，向南一直到了大壍壕（fossa rigia），即罗马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行省的边缘。由此可见这些殖民开拓者不可能只住在迦太基；后来他们必定分散到许多小城镇去了。毫无疑问，当时还必须剥夺原来的土地占有者而把他们迁往别处。罗马第一次在非洲进行殖民尝试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由于罗马贵族对G.格拉胡斯这位改革家和民众派领袖的痛恨这一政治原因，加上殖民者是些贫贱之辈、极少真正的农民这一经济原因，这次尝试失败了。因此，这一开拓殖民地的计划到头来只是成为一种借口来推翻民众派，而让有钱人、元老和骑士们从共和国所征服的非洲领土中圈占大片田产。

在我们纪元前103年的朱古达战争以后，马里乌斯给他的老兵和盖图勒人分配了土地。这些土地可能是在阿科拉和泰奈之间的大壍壕地带，至少可以肯定是在西部，在迈杰尔达河谷中段。从碑文提供的证据来看，为纪念这次土地分配，图布尼卡的碑文中曾有记述，把马里乌斯称为这一殖民地的奠基人，以后又用马里亚纳（Mariana）和马里亚南姆（Marianum）来称呼乌基马尤斯殖民地和提巴尔市。也是在我们纪元前103年，尤利乌斯·恺撒的父亲似曾向盖尔甘奈岛殖民。但开拓殖民地的运动，一直到建立朱利亚－迦太基殖民地之后才真正开展起来。该殖民地是由屋大维自己或由三头执政在我们纪元前42年建立的，或者根据一般承认的意见，更可能是在我们纪元前44年建立的。因此，对非洲来说罗马占领后的第一个世纪是个倒退时期，对肥沃土地的无耻剥削最为突出。因此，殖民进程之所以缓慢是由于商人（主要是一些骑士）和元老院议员们的贪婪。当他们无法获得政治使命前往非洲时，就通过中间人处理他们的殖民事务。[17] 奥古斯都屋大维恢复他的养父

478 尤利乌斯·恺撒的计划，在非洲历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他倡导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和具有深远意义的行政、军事和宗教纲领。根据普林尼提供的清单（对其材料来源至今仍有许多争议[18]），不久就出现6个罗马殖民地，15个罗马行政城镇，1个拉丁城镇，1个免税城镇和30个自由市。在杜加发现的一篇碑文[19]至少可以部分地证明，德国人科内曼所设想的殖民和市政组织开始时的情况是有道理的[20]。我们纪元前29年，当朱利亚那殖民地由于一批新移民来到迦太基而最后定型时（也可能更早一些），带着小批或大批移民到达外地城市附近安家的那些罗马公民，组成一个个村庄并取得农村地产，他们发现自己的产业邻近迦太基殖民地的领土。在我们纪元前33至前25年间，奥古斯都在毛里塔尼亚也建立起不下13个殖民地。

奥古斯都以后的历代皇帝都继续执行他的政策；在马库斯·奥雷利乌斯统治时期，已有35个以上的殖民地分布在非洲各省。通常这些移民都是曾在军团中服过役、由于军队改组而被遣散的老兵，也有一些是在意大利半岛上农业危机中破产而逃出或被驱逐出境的意

[17] 关于共和国时代在非洲省殖民的问题，见格塞尔（S.Gsell）著作，巴黎，1913-1928年，以及P.罗马内利著作，1959年，第43-71页。

[18] 不仅如此，老普林尼就这些城镇的地位所提供的资料（V，22-30）也很难理解。布伦特（P.A.Brunt）著作对这个问题也有评论，第581-583页。

[19] 普安索（C.Poinssot），第55-76页。

[20] 科内曼（E.Kornemann）。

大利人。不过后者数量不大，不至于把非洲各省变成重新定居的地区。可是这些殖民地分布得很合理，是认真考虑过防御和经济方面的需要的。

考虑到土著居民在语言、种族和宗教信仰方面的特点，让他们在市政事务中真正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种态度和最终同化他们的政策毫无矛盾之处。这是因为，罗马公民所享有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和特权，对非洲社会上层阶级一直颇有吸引力。这些非洲人原属农村居民，移民们的殖民地就是在牺牲他们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并不把城镇看成罗马化的中心，而是看成压制他们的大本营。

城市的地位问题涉及许多复杂问题，这里我们只能谈其梗概。㉑首先，有所谓外地城市，它们为数众多，其居民并不算罗马公民。大多数这样的城市必须交纳贡赋，但有些也享有自由，说明它们的自治已经得到法律承认。有几个城市甚至是豁免城市，换句话说，就是免交贡赋，即免交征服者征收的税。其次，还有所谓拉丁城市：由于总宪章的规定，或是由于居住的是拉丁移民，这些城市或是享有大拉丁法准许市政长官和市元老院议员都享有的罗马国籍；或是享有小拉丁法只限于有官职或有功勋的人享有的罗马国籍；至于其他居民则享有的公民权和给予罗马公民的相差无几。第三，在一些享有罗马国籍的殖民地（它们的地位是由恺撒生前制订、死后发布的法律规定的），所有的居民都是罗马公民，当然，奴隶、外国侨民和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划属这些殖民地的那些地区的土著居民除外。因此，除由移民构成的殖民地以外，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名誉殖民地，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土著人的村镇，它们不断朝着罗马生活方式演变，于是根据罗马法而得到了正式承认。

479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郊区和村庄，通常组成城市辖区的一部分：在帝国一些大的领地内，农民很少和城市居民接触，政权掌握在帝国地方财政长官手中。最后，在非洲各省南部，特别是在毛里塔尼亚各省，那些处于部落制度的没有城镇的地区，由军事长官指挥的一些武装小分队予以监督。

不过，有关市政机构的许多情况还不清楚。例如，关于"享有罗马国籍的城镇"这个名称的定义，根据蒙森的权威说法，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城镇称为"城镇"或"殖民地"。这两种名称的差别主要是彼此地位不同，殖民地的称号更光彩一些。因此，两种城镇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据认为这是由于对这两种法人团体采取的章程法规日益趋于一致。不过，根据C.索马涅提出的说法（虽然它还远远没有得到公认），有理由认为"享有罗马国籍的城镇"只存在于意大利；由此则所有外省城镇都属于享有"拉丁法"的城镇，而且在非洲并不存在享有"罗马国籍"的城镇，只有殖民地和罗马行政城镇。这个说法或许有助于澄清各省归化过程的问题：授予富人罗马国籍的拉丁法似乎就是所有城镇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步骤。㉒

480

在充分考虑到这些细微差别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非洲的城市越来越类似意大利的城镇，到处都可以看到人民议会、元老院、在协同执政的基础上任职一年的地方长官。二

㉑ 最近的两篇文章研究了罗马在非洲的城市政策问题，这使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见托伊奇(L.Teutsch)和加斯康(J.Gascon)著作。

㉒ 索马涅(C. Saumagne)。他的观点遭到德桑热(J. Desanges)的反驳，1972年，见后者著作，第253-273页。

人委员会、四人委员会、市政官、司库官。不过，人们已经注意到，非洲各城镇的人民议会寿命特别长，而在其他各地，人民议会却都不起作用了。组成人民议会的公民分成更小的名为市议会的机构。有一个学派认为这是古迦太基遗留下来的一种制度；因此，非洲各地的市议会同帝国其他地区的市议会只是在名称上相同，在实际上完全是两回事。可是，真正的权力并不掌握在人民议会手里，而是在市元老院手里。这个机构是由100来人组成的地方性的元老院。这些元老院议员是从25岁以上的前地方行政长官中选出，偶尔也有从富裕公民中选出的。他们掌管城市财政，决定新开支，管理市属财产。他们是以社会地位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统治集团，最上层是一些荣誉成员，他们负责维护城市利益。这些人一般都是当地出生的人，沿社会阶梯向上爬，直至循军事长官这条路进入帝国最高阶层；最理想的是：身为骑士或元老院议员，在罗马当官，在接近皇帝的圈子里活动，从而有很好的机会代表他那个城市的利益，向皇帝提出私人请求，希望改善该城的法律地位，宽免税收；或为正在进入官场的一位年轻同乡说情等等。其次，按地位高低排下来就是前高级地方长官、前市政官、前司库官，最后是还没有担任过高级职务的一般市元老院议员。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其数量由一种评定等级的制度加以规定。在为数众多的小城镇中，数字不大；但在大城市则数量极大，特别是在迦太基，要相当于骑士等级所须拥有的财产。这就是说，在这些城镇，只有富人才有进身之阶。各城镇都是由地方长官主持人民议会和市元老院，处理日常事务，同各省当局保持联系并对较小的罪案和次要的诉讼行使司法权。

要履行公职，必须财力充足，而且有闲情逸致。因为这些地方长官不但没有薪金，而且在就职时还要根据职务的不同和城镇大小向市金库交纳数量不等的款项；此外，习惯上还要在若干方面表现得慷慨大方，如举行宴会，组织游艺，资助建立纪念性建筑物等。因此，非洲城镇中大多数公共建筑物（浴室、市场、喷泉、寺院、剧场）都是那些显贵人物之间的真正竞争精神的产物。一个城市的最高行政机构是每五年改选一次的二人委员会。他们负责人口普查，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统计本地居民和罗马公民总数，估计他们的财产，从而决定各人的社会地位和有关的纳税金额。

481

这项财权日益成为迫使中央当局干预市政的决定性因素。从二世纪起，不时陷入困境的城市财政就逐步受中央主管公共事务的官员的监督，以这种补救措施来解决由于好大喜功而滥用资金和经费所造成的困难。这是走向中央集权和把国家控制的官僚制度强加于地方的最初的迹象。这种官僚制度在三世纪的危机中付诸实施，在四世纪中牢固确立，取代了对地方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城市自治。

经济生活

人口

关于罗马时代的人口，我们不掌握当时的估计（即使是很粗略的估计）数字。当然，为了财政目的必须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可是普查的结果并未保存下来。因此，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常常只好采取不很恰当的方法来取得大概的数字：采用平均密度系数来计算人口总数，尤其是利用地形学的论据，同时考虑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况来设法估计（主要是城镇的）人口数字。例如，C.库图瓦就曾以主教区登记册作为出发点，经过讨论，得出结论，认为非洲那时有500座城市。在反复考虑应该采用的密度数字和各城市的平均面积之后，他确定：每个城市平均有5000居民，也就是说，在帝国早期非洲各省人口总额为400万，其中城镇人口是250万。在帝国后期，非洲各省的总人口下降为300万。非洲各省总人口数字是以J.贝洛赫的估计为根据的。他是根据奥古斯都在意大利得到的普查材料计算罗马帝国人口的。可是，C.库图瓦认为，这位德国学者认为人口密度可能是每平方公里14人，这个数字对北非来说未免太高了，因为在十七世纪中叶，那里的人口只不过800万。因此，他把人口密度减至每平方公里11人，而对城镇人口的估计是每公顷250人，和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城镇相仿。[23] G.查尔斯－皮卡德提出许多理由反对C.库图瓦的数字。他得出两点结论，即：在某些地区，非洲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尽管城镇数目不小，但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大多数人口是居住在小集镇里和住在房屋非常分散的农村大庄园。这样计算，阿非利加省总督辖区的总人口似乎就应该是350万，在非洲最繁荣的二世纪中叶到三世纪前30多年间，再加上努米底亚省和毛里塔尼亚省的人口，应是650万。[24] 482

后来，A.莱齐纳提出的有关城市人口的观点和G.查尔斯－皮卡德的不同。他和后者都认为在突尼斯的萨赫勒地区，中世纪的生活条件和人口密度同古代相差无几，根据这一点，他试图统计十世纪末苏塞的人口和150－238年间迦太基的人口数字。他最后得出的城市居民数字是130万。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结论，同时保留C.库图瓦提出的总人口数字，那么，农村人口数字就显得比较合理一些。[25] 不过，最近的研究工作又提出探讨人口问题的一种新方法：现在我们不再仅仅依靠古代人口普查提供的关于人口密度、户数和住宅的相对数字以及领取谷物救济的人数等数据，同时也考虑到每一代的墓葬数字以及新上任的地方长官根据他们的官阶和城市大小所支付的酬金总额。[26]

农 业

众所周知，在古代，农业是经济的主要支柱。罗马时期的非洲，土地是财富来源和衡量社会地位的主要的和最受重视的因素。人们也常说非洲是罗马的粮仓。这种说法有时也用来表示非洲过去曾一度非常富饶，对比之下，现在却十分贫困，从而对人口减少的原因得出一个证据不足的判断，根本不考虑造成不发达情况的许多复杂问题。在这里，我们确实不得不重复历史学家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当时，非洲确实是罗马的粮仓，这是因为作为 483

[23] C.库图瓦，1955年，从104页起。

[24] G.查尔斯－皮卡德，1959年，从45页起。

[25] 莱齐纳(A.Lézine),1960年，第69-82页。

[26] 请特别看一下邓肯-琼斯(R.P. Duncan-Jones)对人口估计方法的考订，从85页起。根据锡阿克一篇碑文提到的城镇公民分得遗产的材料，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即这城市的公民为4000，而总人口在14,000至17,000之间。

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见M.贝纳布，1976年，从335页起。

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它被迫进贡，给征服者提供粮食。例如，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有20万罗马人每月可免费领取定量为44公升的谷物，合计达100万蒲式耳之多。不管怎么说，地理学家J.德普瓦已经推翻罗马时期非洲特别繁荣以及粮食产量极高的说法。㉗

起初，罗马的征服造成非洲的农业以及整个经济的衰退。迦太基的橄榄林荒芜了，橄榄树的栽培被放弃了，因为当时意大利控制着酒类和油类市场，不让这些赚钱的农业部门受到竞争。只有谷类可以继续种植。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由于政治原因谷物种植开始有所发展。这种政治原因一直维持到罗马统治的结束：它为了保证向罗马平民提供粮食的需要。自从罗马将边界继续向西向南推进，并执行将各部落限制在一定地区的策略，同时采取积极开发土地的政策，特别是大兴水利工程之后，谷物产量随之急剧增长。我们知道，尼禄在位时，非洲就已能保证每年供应帝国首都八个月的粮食。这样算来，非洲当时提供的粮食就有1800万蒲式耳，即126万公担。

考虑到这个数字是每年纳贡的数量（也就是帝国直属领地每年的出产，由于尼禄征用了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大片地产，帝国的领地这时大为增加），加上对其他土地征收的实物税，据G.查尔斯-皮卡德估计，每年纳贡的数量略微超过非洲一般年景粮食产量的七分之一。因此非洲粮食的总产量约为12,600万蒲式耳，即900万公担。扣除种子之后，非洲剩下的粮食就太少了，无法满足当地的需要。“许多农民被迫靠小米或大麦过活，每遇干旱就必然出现饥荒。”㉘从二世纪中叶到238年的非洲大繁荣时期，特别是由于对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各省处女地的开垦，情况有所改善。但在塞普蒂米乌斯·塞韦鲁斯时期，军事纳贡变成必须定期交纳现款，非洲又不得不面临苛税的剥削。然而从二世纪起，对公共建筑的巨额投资则是各上层阶级，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兴旺的标志。事实真相是，在这个时期，帝国政府允许各省有更多的自由以发展它们的经济，而意大利却正经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在克劳迪乌斯王朝时期就已经成为问题，到这时仍未解决。不过，种植橄榄和葡萄却受到鼓励。最初只是为了利用边角小块土地或不适于种植谷物的土地，但酒类和油类贸易利润很高，刺激了这方面的发展，因此橄榄林和葡萄园迅速发展起来，橄榄林特别繁茂，甚至在类似草原的地区也是如此。

一世纪末至四世纪中叶制造的镶嵌物上绘有农村的庄园和风景。地主的住宅一般建在大果园或大花园中央，有时四周围着作坊，奴隶仍在那里忙碌地劳动。财产偶尔也刻划出来，但更多的情况是，以典型的活动或当地自然景色为背景作为象征：如山岗，表示耕作、播种、收割、移栽或摘葡萄场面的景物，以及羊群、农舍附近的家禽、蜂箱等等。

从占领一开始，罗马殖民的标志就是把广大农村划分为星罗棋布的农业单位——百人庄。非洲的土地被划成710米见方的地块，形成完全对称的棋盘形状。㉙由于征服，这些土地变成了罗马人的财产（罗马人拥有的土地），根据经常改变的复杂的财产法，它们被分为儿类。除道路通行权不受限制的毛里塔尼亚以外，其他地区各部落的土地，由于殖民者占有的地区不断扩张而日益缩小。在帝国早期，一直不断地推行将各部落控制在某些区域以内

㉗ 德普瓦(J.Despois)，从第187页起。
㉘ G.查尔斯-皮卡德，1959年，第91页。
㉙ 见薛瓦利埃(R.Chevallier)和凯梅尔(A.Caillemer)著作，第275-286页。

的大规模行动计划。在塞韦鲁斯时期，这一行动甚至更加紧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边界进一步向前推进，甚至对各部落采取暴力剥夺的行动，把他们赶进沙漠。不过，住在城里的本地人产业，因涉及罗马或拉丁移民的利益而未被剥夺，只要交纳贡赋，一般都保住自己的地产——外地诸城市很少免交这种贡赋。另一类不动产是分配给定居在殖民地——罗马的行政城镇、村庄——的罗马公民的土地，这些人包括老兵、财产不多的罗马或意大利移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著城市土地的法律地位同罗马城市地产的法律地位逐渐分不清了，因为城市法规的发展趋势是把土著城镇同化过来。最后一类包括罗马贵族获得的大地产，特别是他们在共和末期和在非洲为不动产投资提供大好机会的时期获得的那些地产。例如，我们纪元前一世纪，罗马六位元老院议员就拥有非洲各省的一半土地。但尼禄处死了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并入帝国的世袭产业。不过，在帝国后期，仍然有不少属于罗马贵族私有的大地产存在，尤其是在努米底亚。而且，普遍倾向是大产业吞并小产业，特别是在帝国后期。 485

多亏有四篇大碑文和大量非洲铭文所提供的证据使我们得以了解帝国各大领地的地位和组织。[30]这些文物把曼西安法规和哈德良法规等极其重要的文献流传给我们。这些法规并不是罗马公法那样的“法律”，而是工作条例。许多作者认为，这些条例适用于帝国全境所有的公共土地(如J.卡科皮诺)或仅适用于非洲(如M.罗斯托夫采夫)。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条例专门适用于迈杰尔达河中游隶属帝国的种植园地区，不过这种观点已被新近发现的情况推翻。总之，我们了解得比较详细的只是帝国诸领地使用的管理方法。这些领地出租给叫做“管理人”的承包人，承包人又雇用土地经营者进行管理。土地经营者自己开发这块领地上某一地区的资源；他可能既使用奴隶和农业劳动者，又利用移民的义务劳役。这些移民是自由民，他们又作为承包人的佃户耕种领地上大部分土地。曼西安法规和哈德良法规的主旨是确定承包人和经营人为一方，农民(移民)为另一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原则如下：农民的义务是交出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一，并在经营人直接管理的土地上劳动一定的天数；权利是对各自经营的地块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可以传给继承人，甚至出卖，条件是享有这种使用权的新的持有人在连续两年之内不得改变耕作周期。帝国诸领地的管理受一系列等级分明的帝国官员监督。最高级的官员是世袭产业管理部长官，他同他的幕僚驻在罗马，起草总则和实施细则。他是骑士等级中一位高级成员。在他下边，每省都有一位常驻财务长官，他也是一位高级骑士，负责监督各区的地方财务官。每区由若干庄园(种植园)组成。最下一层是驻在各种植园的税务官，多数是普通的自由民。这些种植园税务官的任务是同承包人签订合同，保证按条例行事；在承包人同移民之间发生争执时充当仲裁，并帮助承包人收租。我们从科莫达斯王朝记载星期四集市的碑文中看到，承包人和负责监督种植园管理的那些税务官勾结一起，在法定权利问题上欺骗佃农并专断地决定增加他们承担的义务。事实上，这些承包人是不可低估的有权有势的资本家，连税务官也不能不受其势力影响。象A.皮加涅尔等许多作者认为，记述星期四集市的碑文所形容的佃户景况已经预示着后来拜占庭帝国时期农民的遭遇。自四世纪以后，移民这个词的含义变成 486

[30] 关于这个问题有重要的文献目录。见G.查尔斯-皮卡德著作，1959年，从第61页起，以及注31，第371-372页。

在帝国全境耕种属于帝国或私人所有土地的一切农民。原则上他们都是自由民，但随着禁止他们离开自己耕种的土地的各种法规不断公布，他们的自由日益削减。土地所有者负责交纳对佃户的产品征收的税金。只有在耕种周期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他才能完成这项义务。这就促使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使农民的法律地位往往类似奴隶。这种趋势造成了中世纪在西方盛行的农奴制度，它是移民后裔和农村奴隶后裔的共同遭遇。

在帝国后期，非洲农业发展的模式究竟如何，仍然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总的说来，不征税因而也就是无人耕种的土地数量之大，使现代历史学家感到惊异。他们由此推断，当时土地迅速扩大，以致任其荒废。C.莱佩利近来指出，这个问题要复杂的多，情况并不象人们感到的那么吓人，至少在阿非利加省总督辖区和拜扎休姆省是这样。不能说当时人们大批逃离土地，也不能说农业产量急剧下降。在汪达尔人入侵以前，阿非利加一直是罗马的粮食供应来源，在君士坦丁堡建成之后罗马就失去了埃及的粮食供应。而且，假如我们接受那种看法，认为典型的衰退迹象当时已昭然可辨，那就无法解释已由阿拉伯资料证实的在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出现的伊弗里基亚的繁荣了。[31]然而，并不是没有粮食短缺的现 487 象，但这主要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而且应该说，在橄榄树的经济重要性上升的同时，谷物的重要性下降了；只有努米底亚例外，它仍是生产谷物的地区。

工业和贸易

大家都已注意到，在阿非利加省，纪念碑上刻的铭文和图象所提供的关于手艺人和雇工的生活情况远没有西部其他各省那么多。然而，尽管金属制品似乎在非洲各省不太流行，我们却不应该仓促得出结论。例如，可以指出，碑文上很少提到建筑工人和建筑师，但他们的建筑物却遍及阿非利加的无数考古遗址。确实，罗马时期的技术停滞不利于古代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工业是同农产品加工有关，特别是同橄榄油的制造有关。在塞费图拉至泰莱普特、以及特贝萨一带地区发现的大量的橄榄榨机残骸，足以证明油类在古代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它不但是主要的食用油，而且也是唯一的点灯用油和重要的梳妆必需品。[32]

在不同程度上与橄榄油生产有关的陶器制造业，除供应家用器皿外，还可以满足灯具和油罐的需要。在迦太基时代，地方工业集中生产日常用具，最精致的陶器工艺品最初是从希腊和埃特鲁里亚进口，后来是从意大利南部进口的。被罗马人征服以后，非洲变得更加依赖于外国工业中心了。坎帕尼亚被托斯卡纳、后来又被高卢的作坊所取代。它们的货物主要是向毛里塔尼亚出口。不过，在二世纪初，随着经济普遍恢复，一种新的制陶工业在总督管辖的省内开始发展起来。

发现坎帕尼亚黑釉陶器非洲仿制品的J.P.莫雷尔的著作[33]，P.A.费夫里尔和J.W.萨洛蒙森论彩陶的著作，以及突尼斯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最近发掘出的文物，都表明当时非洲制

---

[31] 莱佩利(C.Lepelley)，1967年，第135-144页。
[32] 见H.康-法布雷，1953年。
[33] 莫雷尔(J.P.Morel)，1968年，1962-1965年。

陶作坊的数目和规模在不断增长[84]。除普通产品外，他们还生产优质陶器，最初是绛黄色，后来是浅橙黄色的，这些陶器当时已在地中海西部各国普遍流行。从三世纪上半叶起，他们在漂亮的圆筒形两耳细颈酒罐和双圆锥形花瓶上面用浮雕的塑像作装饰，这些塑像主要是以竞技场上的比赛游戏作素材。他们还塑造出高质量的灯具和放在坟墓里或私人神龛中的小塑像。在四世纪，他们普遍生产另一种类型的陶器，专家们称之为“轻度压印D型”。488 在制陶业这个原始经济部门中，国外进口货很快就消失了，连毛里塔尼亚各省都是如此。非洲的制品和原料（油、陶器、紫色的布、玻璃器皿、木制品、以及象努米底亚大理石这样的矿石产品），当然还要加上谷物，奴隶、木材，以及供竞技场比赛用的野兽等，其销售量肯定大大超过了进口产品的销售量，进口产品可能是由制成品，特别是由金属制品构成的。

由此看来，非洲已成功地摆脱了经济上的依赖性，它的对外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迦太基时期的重要地位。为了适应内地出口资源的发展和大量粮食、油类运往意大利的需要，港口设施得到扩建。当时主要的贸易是和罗马的出海口奥斯蒂亚进行的。在奥斯蒂亚的遗址上，除船行的办事处外，还发现不下九幢的建筑物，它们是属于恺撒毛里塔尼亚的非洲船行的：穆斯卢维乌姆、希波迪阿希特斯、迦太基、丘鲁比斯、米苏斯、古米、苏莱克滕和塞卜拉泰。创办船行的那些船主共同负责向意大利运输商品[85]。早在克劳迪乌斯统治时期，他们就享有特殊的优惠，一直到塞普蒂米乌斯·塞韦鲁斯时期，他们都是按照自由结合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但不久之后，这个部门也和其他经济部门一样，实行了国家管制，特别是因为向罗马供应粮食一事至为重要，不能完全交给私人经营。于是那些船主就相应地被看成执行公务的人员。不过，对意大利的贸易仍掌握在非洲人手中。至于在迦太基时代颇为繁荣的同东方的贸易，在帝国时期却是由东方商人掌握的；到四世纪，他们仍然到非洲各港口来谈判贸易。这些商人被称为叙利亚人。尽管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他们卸下的是哪一类货物，但不难想象，他们带回去的货物种类相当繁多，而且数量很大。这从已出土的铸有东方帝王肖像的大量金币可以断定，这些金币必然是他们结算帐目时应该给非洲留下的。最后，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也应该加以考虑，不过这个问题将在下面讨论关于非洲 489 各省同撒哈拉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时去谈。

古代留下来的文献以及在考古和碑文方面的发现，使我们了解许多有关非洲内部贸易的情况。我们从这些资料中得知，在大村镇里，每周的若干个不同日子里都举办各类交易集会，就象今天的集市那样。在一些村子里，建有粮食市场，场址是一个广场，围以有圆柱的门廊，商人们就在门廊摆摊。这样的遗址已经发掘出一些。特别是在雷普蒂斯，各式各样的亭子都备有标准度量衡器具，由市政官员加以检查。其他买卖和交易是在市场上或城镇中银行家、货币兑换商人、旅店主人、布商等据有的商店和室内商场中进行的。原来打算用于征服和殖民需要的道路，很快就对贸易起了促进作用，这当然是因为它们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便利。在奥古斯都及其后几个继位人的时代，有两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道：一条经过米利亚纳河谷将迦太基同西南部联系起来；另一条经过沿海将迦太基同东南

[84] 如见马哈朱比(A.Mahjoubi)，恩纳卜利(A.Ennabli)及萨洛蒙森(J.W.Salomonson)等著作。
[85] 卡尔扎(G.Calza)，从第178页起。

部联系起来。这个三角形上的第三条边是阿梅达拉－塔卡帕之间的战略大道，这是第一条竖有里程碑的道路。在弗拉维亚王朝和安东尼王朝最早几位皇帝统治时期，道路系统有了大规模的扩展，特别是建成了迦太基－泰维斯特大道。原来的泰维斯特和兰拜西斯军事中心周围，围绕着奥雷斯和奈门沙山区建了一个道路网，并朝北伸向希波勒吉斯。从那时起，在阿非利加省总督辖区和毛里塔尼亚全境到处都修了越来越多的大路，使设防的拉皮杜姆地区一边和盖梅拉、兰拜西斯两地相连，另一边同恺撒城以及萨尔达这两个沿海城市沟通。可是在235年以后，维修保养逐渐荒废的道路网出现许多问题㊱。

人们对罗马大道的各种技术问题曾有过大量的研究：如布局、结构、桥梁和栈道，供旅行者使用的辅助性建筑物等。罗马统治者非常清楚这些道路在战略和殖民方面的重要性，非常清楚它们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作用（由国家交通部门掌管的为信使服务的驿站就是证明），以及经济方面的作用，关于这方面，人们已经特别注意到，例如，锡米苏与塔布拉卡之间的大理石贸易商路。人们还研究了交叉路口和路边各处用以储存准备上交给税务人员的粮食和油类的谷仓和货栈遗址。

490 非洲各省和撒哈拉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人们早就知道，罗马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南部的撒哈拉大沙漠地区有三个很大的堡垒，即布恩杰姆，西村和盖达米斯（在古代称之为锡达穆斯）。直到近期，它们还只是被认为是边防带的前进哨所。但现已证实，它们是座落在大沙漠和罗马控制下有定居农民居住的地带之间的边境线上。那些农民居住在设防的农场上，主要是在干涸河道的盆地上从事橄榄树的种植。在这个地区，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具有强烈的地方传统色彩，又受到迦太基的影响。许多用当地文字刻的碑文以及直到阿拉伯人入侵前夕还沿用迦太基语的情况，特别说明了当地的传统加上了迦太基的烙印。然而这种文明却也能够适应罗马人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这些堡垒控制着从海岸到加拉曼特人的领土费赞之间的几条主要道路。早在我们纪元前19年，科内利乌斯·巴布斯就曾攻打过这些加拉曼特人，据普林尼说，还曾征服他们几个城镇和堡垒，包括加拉马和锡达穆斯。后来，也许是在多米西恩统治时期，尤利乌斯·马特努斯带领一支考察队从大雷普蒂斯出发，到达了加拉马；然后在加拉曼特人的国王及其军队陪同下，远行到埃塞俄比亚人的国土以及据说可以看到犀牛的阿吉辛巴地区。这说明，罗马人之所以对费赞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这个固定的商队基地可以使他们能够到达撒哈拉非洲的边缘。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简略的史料中记载的那些危机与和解，是罗马人在同加拉曼特人的王国交往中经常感到头痛的事。近几年来的探索性考察和考古发掘补充了从上述史料获得的零星片断知识，因而逐渐增加了我们对于通向黑非洲的商路的了解，也使我们更加清楚罗马人在这方面获得的进展。这些新材料提供了有关这个边境地带（特别是布恩杰姆）的军事、民政和商业等方面的大量详细情况㊲。首先，穿越

㊱ P.萨拉马，1951年。

㊲ 特别请参阅铭文研究所报告，1969年、1972年、1975年。雷比法（R.Rebuffat）关于布恩杰姆（戈拉斯）出土文物的报道。

撒哈拉的土地是黄金产地。在迦太基时期和穆斯林－阿拉伯时期之间，商人们沿着多条不同的路线将黄金从几内亚的金矿运到地中海沿岸，而每一条路线都在北非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商队贸易还从撒哈拉带来黑奴、鸵羽、野兽和红绿宝石。罗马各省则以酒、金属制品、陶器、纺织品和玻璃器皿等相交换。这些都是出土文物，特别在费赞的大墓地出土的文物证实了的。 491

在撒哈拉境内有着向东向南的各条商路纵横交错的地区。从第二世纪和第三世纪起，越来越多地使用单峰骆驼，旅行便利，可能因此而导致游牧生活方式的复活；于是，各游牧部落就更易于为他们的牛羊群找到牧场，易于劫略商队，以及劫掠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罗马文明影响的人们定居的城镇。起初，同一个部落可能分成若干定居集团（在商路沿线或边防带上居住）和若干畜牧骆驼的游牧集团（在南部）。后来到了四世纪中叶，帝国政府越来越无力控制沙漠地带，尽管并非有意执行撤退政策，但在三世纪曾一度繁荣的沙漠地区那些小居民点，这时却只能勉强生存了。到五世纪，它们已面临灭绝的严重危险。因此，情况并不象 E.F.戈蒂埃一再主张的那样，说是由于单峰骆驼在三世纪突然大批涌入，致使畜牧驼群的部落成为对南部边境安全的威胁。看来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些骆驼是逐渐引进的。起初，越来越多地使用单峰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是对罗马当局的政策有利的，当时罗马的政策已成功地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条件，从而也成功地建立起进行渗透活动的真正的基地。但是最终它产生了反面作用，因为它使游牧部落获得必要的机动性，可以对他们被逐出的地区发动一阵阵新的进攻[39]。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塞韦鲁斯王朝的历代皇帝之所以能够制订精明的撒哈拉政策，是否可以用该王朝的创立者是出生于大雷普蒂斯加以解释？由于有这样的出身，他们大有可能取得关于这个干旱的内陆的环境、资源和道路的第一手资料。

罗马化柏柏尔人的兴起和非洲社会存在的问题

在奥古斯都及其继位者统治时期，非洲各省的居民是由三个集团组成的，这三个集团彼此间的区别，是由统治他们的法律以及他们各自的语言和风俗决定的。这三个集团是：罗马或意大利移民；迦太基人和把迦太基的风俗习惯融合于本身传统的定居的利比亚人，其中以后者占大多数；以及游牧的利比亚人，他们被严格限制在某些地区，或者完全被赶出他们被迫交出可耕地的地区。 492

人们常说，当时非洲各省并未被看成重新定居的地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在哈德良统治时期，阿非利加省总督辖区已不再建立老兵殖民地了，而努米底亚那些殖民地是那时以后为从非洲各城镇招募的士兵的福利而建立起来的。上文已经提到，努米底亚的地位稳步上升，直至完全罗马化。实际上，在 212 年安东尼宪法公布时，所有当地的城镇居民都已归化了，特别是那些最有钱的人（他们想通过这种办法逃避罗马人征服后强加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卑下地位）。安东尼宪法规定，除投降者外，所有尚未取得罗

[39] 戴莫戈特(E.Demougeot),209-247 页。

马国籍的帝国自由民都可以获得罗马国籍。塞普蒂米乌斯·塞韦鲁斯已经按照安东尼王朝历代皇帝的先例，将大批城镇提到市甚至殖民地一级。非罗马公民成了少数，因此，同简化行政和财政体系的需要比起来，同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和宗教上都要求统一的趋势比起来，法律权利上的歧视就越来越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尽管如此，凡是不住在大小城镇的人，特别是那些被驱逐到荒原地区的部落成员，都被列入投降者之列。在投降时，他们的制度、习惯以及自治权都没有得到承认，甚至没有得到默许，因此，他们仍处于罗马化社会的范围以外。

因此，种族的差别只是在城市里才趋于消失。不过，城市的数量，特别在阿非利加省总督辖区是很大的。在城市社会中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差别。元老院议员和骑士是两个最高的社会阶级，他们的地位根据财产决定，而且还在徽章和头衔上面反映出来。财产条件虽是必要的，但光是这一条还不够，还总是加上世袭的原则。除非皇帝特别恩赐授予元老院议员或骑士等级的头衔，否则头衔全是由继承来的。尽管如此，根据对现有资料、特别是碑文中记载的具体个人的经历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贵族阶层经常在吸收新成员。那些古老的罗马贵族家庭，为了维持豪华的生活，以致家财挥霍殆尽。他们越来越愿意敞开自己的官阶大门，最初是向帝国西部各省的本地居民开放，后来又向东方的希腊人开放。第一位非洲血统的元老院议员是锡尔塔人，他生活在韦斯帕西安统治时期。一个世纪以后，在170年前后，元老院的非洲人议员的数目增加到100人上下，成为仅次于意大利血统议员的第二个最大集团。类似的情况是，历史上闻名的第一位非洲人骑士是个穆斯蒂人，他曾得到提比利乌斯赐予的金戒指。到哈德良时期，在阿非利加省总督辖区和努米底亚就有几千名骑士了。在帝国早期，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从半贵族的骑士阶层中吸收的，他们执行民政和军事双重职能。后来这两种职能分开了。到三世纪，管理军事的官员就和纯粹的军人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可知，安东尼－塞韦鲁斯时期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罗马化的柏柏尔人的兴起，从而使非洲人在罗马和整个帝国都起着重要作用。

493

在帝国早期，城市中产阶级，也可称城市资产阶级，无疑是向贵族阶层输送新鲜血液的主要社会力量，从而特别保证了骑士阶层能够保持他们为完成其双重职责而必须具备的高水平的业务能力以及个人的优秀品质，这也是符合于历代皇帝本身的利益的。从这个市议员阶级提拔起来的人物，为帝国贵族阶级所吸收，而皇帝就是从贵族阶级中物色官员充任要职的。提拔任用这些官员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当时在罗马盛行的同省同乡之间抱成一团的风气。这就是为什么在二世纪初西班牙人高踞于其他各省人之上，后来是非洲人，接着又是叙利亚人继之以潘诺尼亚人充斥官场的缘故。

人们常说，由市议员组成的中产阶级是非洲罗马化城镇的脊梁柱。在帝国早期，这个阶级的成员几乎完全是从土地占有者当中的某个阶层吸收补充的。议员们住在城镇中，靠财产收入生活，但他既不拥有庄园，也不是农民。尽管他留恋自己的土地，但还是喜欢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也许很富有，为了在城里有些名气，并博得市民的好感，他必须慷慨大方，到处送礼，其规模依其虚荣心大小和慷慨程度而定。他组织全市性的娱乐活动，向穷人施舍食物和金钱，或建造并维修公共建筑物。风气所及，甚至一些毫不知名的城市，也热衷于大兴土木，与该城市的规模极不相称。他们全都下定决心，一定要有自己的

广场，要有若干有底座的雕像使广场完美无缺，一定要有自己的元老院大厦，要有自己的法院的长方形大会堂，以及浴池、图书馆、进行全市性娱乐活动用的富丽堂皇而造价昂贵的建筑，还有许多供奉官定的或传统神祇的寺院。大小城市的迅速扩展，虽然也带来一些好处，如市政机构提供的法律保护和较高的生活水准，但也和城市上层人物的财富一样，必然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基础之上。 494

关于四世纪时期城镇衰落的说法现在必需加以修正，因为碑文资料证明当时建筑活动还比较繁忙，考古学家也发现甚至在三世纪仍然有装饰豪华的住宅。尽管如此，帝国后期城市生活的社会模式却已和帝国早期流行的大不相同了。城镇上层人物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农业，但一直通过市议会进行统治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市议员）已被大地主寡头集团——市政要人——所取代，这些人通过出口自己农庄上的谷物和油料发财致富，从而得以进入帝国贵族行列。这些得到帝国政府支持的财主，跻身于市政府和省政府的最高职位。他们重建已在三世纪遭到毁坏的公共建筑或修复那些年久倒塌的建筑，他们美化自己的城市，知道这种类似崇奉神祇的活动是飞黄腾达之道。皇帝们使自己的城市政策适应于这些社会变化，其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城镇的发展。这不仅因为城镇是帝国税收制度的主要基础之一，更重要的是因为城镇是抵抗所谓野蛮民族威胁的坚强堡垒。至于市议会（帝国后期对地方性议会的称呼）的一般成员则越来越穷了。他们必须共同履行愈来愈繁重的义务。这些市议员被迫负起全市公用事业的责任(粮食供应、公共服务事业、保养公共建筑、提供祭祀费用等等)，因此他们实际上成了征收城市应交的捐税的地方税吏，他们的财产被看成是城镇财政义务的抵押品。最富有的那些市议员想方设法爬上市政要人的地位，以便取得元老或骑士贵族等级的特权庇护。其他人则加入军队，当警察，或百般钻营挤进教士圈子借以逃避市政义务的沉重负担。帝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反措施以制止市议员们逃避职守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对城市生活，换句话说，亦即对罗马统治的根基，是十分有害的。市议员还有责任强迫所有掌握一定数量财产的人(实际上就意味着全体财主)，成为自己团体中的一员。这些人形成一个真正的世袭阶级，他们的日趋衰微反映在罗马生活方式的衰落之中。这样，皇帝便把特权赐给一小撮市政要人，而这些人最后又抛弃城市，结果使整个市议会垮了台，这就激起了社会危机，并加剧了社会危机对城市本身发展的影响。

在执政官时期，通过贸易致富的城镇居民最后能当上地方行政长官或成为地方议会的成员，而医生或建筑师等专业人员则备受尊敬。但帝国后期，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城市居民中低于议员的各阶层都下降为“平民”。各种重要职位，如与粮食、运输有关的职位，都变成了世袭的，所有合法的逃避渠道全都给封闭了。 495

四世纪时在农村地区，非洲的大地主永久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庄园上的情况仍然少见。上文说过，他们继续对装饰城市和参与市政生活颇感兴趣。但在四世纪末，农业上出现了向封建领地类型发展的初步迹象。那些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越来越独立行事，越来越多地侵占日益无能的国家的特权，独立管理自己的领地，甚至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行使初级司法权。推行人头税制度以后，帝国财政部门和大地主的共同利益都要求在一定的土地产业里，劳动和土地的生产单位稳定不变。这样一来，在帝国行政部门帮助下，世俗地主和教士地主都能够阻止移民为改善自己命运而作的尝试，并成功地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至于

居住在城市里的那些中小地主，上文已提到他们想方设法逃避他们的议员职位；或是重新变成城市平民，或是接受同毗邻的大庄园主处于某种封建关系，他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长期以来，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总趋势十分明显。早在三世纪中叶，圣西普里安就已经写道，“富人获得一个又一个庄园，把贫穷的邻人驱逐出去，他们无限制地扩张自己的土地，没有止境”。㊴

在这篇短文中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讨论专家们一直在争论的祠民运动（circumcellion movement）*，只能简单地指出，据报道，四世纪时在努比亚就有着这种反抗集团；这个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的运动，虽然强烈反对天主教，却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质。

宗教生活和基督教的传入

罗马统治实际上对当地居民信仰其传统神祇并未起抑制作用。当时，在简陋的农村寺院中，柏柏尔人继续以传统的形式礼拜他们的古代神祇。不过，有些时候，他们也信奉希腊-罗马的神祇。例如，他们信奉生育之神或治病圣水，却往往以信奉尼普顿（海神）、埃斯库拉皮乌斯（医神）或塞拉皮斯（兰花神）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过去属于努米底亚诸王国的地区，迦太基的影响根深蒂固，一座当地神祇的万神殿甚至还被隐蔽起来。但非洲各省大多数居民信奉的是萨杜恩（农神）㊵以及相当于迦太基古老神祇的希腊-罗马诸神。非洲对萨杜恩的信仰仅仅是对太阳神巴尔·阿蒙的信仰的继续，正如罗马迦太基时期的主神朱诺-西莱斯蒂斯恰恰就是布匿迦太基时期的伟大女神塔尼特那样。在努米底亚-迦太基时代，也引进了对农作物女神——塞里尔斯——的崇拜。当然，罗马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非洲的宗教：还愿祭品上没有迦太基文字了，刻在石碑上的难解的符号往往由一般是源于希腊-罗马艺术的神像所取代，神殿也反映出罗马建筑的影响。但是，就其内在涵义而言，非洲宗教的特性仍然存在。这一点表现在仪式上，在石碑刻的图象上，甚至在拉丁文献辞的措词上——这些献辞始终反映着历史悠久的一些套语。

至于帝国的官方信仰，不用多久就在各城市推广了。对罗马的忠诚必须表现在遵守宗教习惯方面，因为这是罗马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爬到市政官职顶峰的地方议会成员，都热切地希望得到终身祭司的要职，以便成为僧侣阶级的一分子，享有特权向神化的皇帝和皇后转达市民的祈求和誓愿。不仅如此，由所有的市议会代表组成的省议会，每年要在迦太基集会一次，选举一位省级祭司。这是一位高等僧侣，他的职务就是以全省的名义举行隆重的官方礼拜仪式。最后，在每个城市，对朱庇特神殿的三位神，即朱庇特、朱诺和弥涅瓦的崇拜，对罗马人的祖先和保护神马尔斯的崇拜，以及对维纳斯，塞列斯，阿波罗，墨丘利，海格立斯和巴克斯的崇拜等等，是帝国宗教和希腊-罗马宗教生活的其他官定的形式。城市里到处可见奉献给这些神祇的神庙和塑像，祭坛和祭品。还有的奉献给

㊴ 关于这些社会问题可参阅加热（J.Gagé）的著作。

㊵ 莱格莱（M.Leglay），1966及1967年。

* 祠民（circumcellion）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这些人在村庄中居住的地方通常围绕着一座座殉道者的墓祠。祠民是一些属于多纳图教派的农民。一般认为，祠民运动是北非早期的农民反抗运动，兼有宗教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反抗性质。他们反对地主和有钱人，并反对皇帝干涉宗教事务，因而也具有民族运动的性质。——译者注

其他许多神祇诸如和平神、协和神、命运女神、帝国守护神、罗马元老院守护神等等。

帝国东部各地区的神祇在罗马很快得到承认。这些神祇由官员、士兵和商人传入非洲，也受到当地的崇拜。他们传播了对埃西斯、密特拉或西贝尔的崇拜，这些神祇往往被等同于当地的神祇。例如，把埃西斯神等同于得墨特尔神，把西贝尔神等同于西莱斯蒂斯神。遍及罗马帝国的神秘主义巨大浪潮，就是这样传到了非洲，不过非洲望族对拯救灵魂的东方宗教远不如对崇拜酒神巴克斯或崇拜得墨特尔女神时举行的欢宴那么感兴趣。同样，各种唯灵论，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在某些阶层中颇为流行，甚至和迦太基的某些传统调和起来了。例如，舒尔法碑文就是存在新柏拉图主义倾向的证明。有些作者甚至认为，这些碑文所表现的思想——即认为存在着一位至高无上的神祇，通过人格本体对俗世发挥作用——也许为基督教的一神论铺平了道路。 497

这一点能否说明基督教在非洲的发展早于在罗马帝国西方各省呢？当然，促使新宗教的迅速引进是因为和罗马的关系密切，也可能还因为在一些港口，特别是迦太基，存在着由犹太人居住的一些小团体。但值得注意的是，当罗马教会仍然使用希腊文的时候，非洲基督教竟然一开始就采用了拉丁文。据生活在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特图利安说，当时在非洲有大批基督教徒，他们属于各个阶层并从事各种职业。在220年前后能够在迦太基举行一次有71位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在240年左右举行的另一次宗教会议有90名主教参加。这表明，小型基督教团体分散在许多非洲城市中，罗马帝国无疑认为这构成了严重的危险。的确，这些基督教徒抵制帝国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拒绝参加对皇帝的礼拜，因而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派的姿态。尽管罗马宽大为怀，对一些新的信仰通常采取容忍的态度，但对于建立一个越来越扩大的组织网，在官方典章制度体系之外追求不同的理想的一个教派则是无法调和的。因此，基督教徒遭到严厉的制裁。180年总督下令将锡利城的12名基督教徒斩首，203年，珀佩图瓦和费利西蒂两位圣徒和他们的同伴殉难了，他们被扔进迦太基竞技场喂了野兽。但是这些镇压措施（必须说一下，这些措施只是偶尔采用的）并不能扑灭那些信徒的热忱和激情，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情愿殉难，视死如归。

这篇短文中没有篇幅回顾非洲基督教的历史，它的全盛时期是从四世纪教会赢得和平以后，至阿拉伯人在非洲确立其地位以前这段时间。这个复杂问题最好以专文论述，其中应当特别谈谈多纳图教派，当然还有从特图利安到圣奥古斯丁时期的基督教文献。圣奥古斯丁的人品和著作都是罗马生活方式在非洲的最后的光辉产物。西方应该感激他保存了拉丁文化遗产并传给后代，正如基督教徒世世代代流传他的教义那样，他的教义内容丰富、罕有其匹。 498

非洲文化

编写罗马史的人们所长期忽视的各省的艺术和边远地区的文化，现在已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这是因为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了罗马化的局限性及其在与当地社会接触中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而且，谁都不能否定的事实是：一个省份的艺术离不开它的经济、社会和宗教生活。在这一点上，为了研究和评价罗马统治时期非洲各省发展起来的艺术，就有必要考虑利比亚~迦太基艺术的深厚基础，而且，这个基础还以其特有的存在方式持续下去

并且演变发展了好几个世纪。

这里没有必要讨论主要正在由考古学家们研究的那些复杂问题。我们只需要向读者推荐G.查尔斯－皮卡德所著《罗马统治时期的非洲文明》一书，该书有重要的一章专讲非洲的文学和艺术。我们在这里仅仅指出几点。第一点，非洲文化早期的启蒙并不完全受惠于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当东方航海家经常来到非洲海岸时，这个地区通过和地中海各岛屿的接触，已经有了各种技艺的传入，如引起名为卡比利亚或柏柏尔彩陶发展的技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石棚墓室(dolmens)，突尼斯北部的石洞墓穴(haounet)，以及在摩洛哥西北部墓葬群中出土的物品，都证明了当时有定居的居民存在，乐于接受萌芽状态的某种城市文明方式[41]。后来，在迦太基灭亡以前，而主要是在灭亡以后，当地居民就采纳并改造了掺杂着埃及和东方成分(在我们纪元前四世纪以后，还浸透着希腊文化影响)的腓尼基和布匿文化。最后一点是意大利－罗马所起的作用(那是更为重要、而且更为直接地施加于当地的)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混杂的品种。常常难于辨别。然而，人们现
499 在已习惯于将非洲文化分成两种：一种是官方的罗马文化，另一种是各省的土著居民的大众文化。当然，有些墓碑中两种倾向同时并存，并且相互渗透，因而失去了各自的本来面目。

非洲建筑一般是模仿流行于罗马帝国各地的公共纪念物，因而主要是从罗马的技术和楷模中得到启发。那些装饰性的雕塑，巨大的神像、帝王像和名人像同意大利或其他各省同类作品的风格也没有明显的差别。然而，与宗教有关或与民间墓葬传统有关的建筑物或雕塑以及某些特殊的建筑或装饰技术，却有着地方特点的烙印；例如供奉当地神祇（它们虽然貌似罗马诸神，却保持着本地的特征）的神庙，某些宏伟的墓穴，以"非洲艺术品"闻名的特殊的砌墙技术，民房的建筑，以及最后浸透着罗马时期以前的影响的还愿碑等，都显然如此。在塞韦鲁斯时期，大雷普蒂斯、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其他城镇和阿非利加省总督辖区的那些塑像，都受到起源于小亚细亚的重要艺术流派的强烈影响，这种流派之所以十分容易被吸收，是因为它和非洲古老的、但仍富有生命力的传统艺术是协调的。

自本世纪初以来，出土的无数镶嵌物也显示了地方的倾向和特征。这里，我们只能再次请读者阅读专业期刊和上面提到的G.查尔斯－皮卡德的著作，他在讨论"非洲的怪诞风格"那一章的结尾说了下边几句话："因此，至少可以说，非洲已经完全清偿了它欠罗马的债务，而且还表明它有一种精神(既不是希腊的也不是希腊化的地中海东部诸国的)能从它所借鉴的东西中得到收益。"[42]

第二部分　从罗马到伊斯兰

P.萨拉马

罗马人在北非统治，在某些地区历时400年，在另一些地区则历时近500年，然后就结束了。那时北非内部情况很复杂：地区性的起义、宗教冲突、社会动乱，这一切都导致

[41] 最近问世的一些著作完全改变了传统观点。例如，G.康，1960 b和1961年；戈贝尔(E.G.Gobert)，第1-44页；蒂克塞龙特(J.Tixeront)，第1-50页；P.A.费夫里尔，1967年，第107-123页。

[42] G.查尔斯-皮卡德，1959年，第353页。

气氛的恶化；但是，丰富的治理经验和拉丁文化的威望使这种外来文明得以存在下去。

随着外国征服或当地人民反抗的盛衰变化，罗马统治结束以后、伊斯兰统治时期以前的北非，分裂成许多被征服的和独立的地区，经历了自己历史上最特殊的时期之一。[43] 500

在外国占领下的地区

在历时将近三个世纪之久的时期里，两个外来的入侵者相继侵入，接管了罗马的监护权，但从未能完全恢复其疆界。

汪达尔人的插曲

在北非，再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些日耳曼血统的征服者来得更出人意外了，再没有任何外来统治和这个地区的实际状况这么不协调的了。我们纪元406年，其他日耳曼民族和汪达尔人一样，蜂拥进入西欧，但汪达尔人却超过了他们，首先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站稳脚跟。这个地区看来已经使他们名垂久远，被称为汪达卢西亚或安达卢西亚。

不管他们是不是应邀前往干预罗马政权在北非的内部争端，总之他们于我们纪元429年在国王盖塞里克率领下以8万人之众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他们迅速前进，如同闪电。我们纪元430年已包围了希波尼城。435年罗马人承认了他们对君士坦丁地区的占领。三年后，他们攻占迦太基。442年暂时撤退，后来，在455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一次最终并吞了罗马统治下的非洲的整个东部地区；一次征服地中海西部大部分的重要岛屿——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另一次大胆远征洗劫了罗马本土。东罗马帝国打算驱逐这些入侵者，却于468年海军全军覆没，只好承认既成事实。474年终于签订条约，拜占庭和西地中海的海上主要强国汪达尔人之间确立了友好关系。

日耳曼人对北非部分地区占领了一个多世纪，这件事对这个地区有好处吗？查阅公开敌视这些篡夺者的当时文献，人们会对他们的残忍大吃一惊。但现代考订工作已成功地使这个问题摆脱了煽动性的文字。与破坏行为是同义语的“汪达尔主义”这个名词，是在十八世纪末才杜撰出来的。今天许多考古资料证实，看来情况很清楚：汪达尔人当时在北非治理不善，主要是由于懈怠疏忽，而不是有意如此。

现在我们对汪达尔政府的合法机构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王权来自军事寡头政治，二者都对过去属于罗马管辖下的非洲的大片公有和私有领地行使权力；地区性和地方性的罗马行政机构维持不变，甚至还利用了属于旧日帝国传统的省议会以支持新的王权。因此，迦太基成了新国家的富裕首府。上述这种对拉丁传统的关注也涉及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在这方面，支配农民生活组织的旧罗马法律，特别是曼西安法规，被巧妙地保留下来。城镇人口外流现象，在帝国后期就已经开始，各地都是一样，这时更加严重了。随之而来的是许 501

[43] 《从罗马到伊斯兰》这个标题取自C.库图瓦撰写的以文献目录为主要内容的著作《非洲评论》(Revue Africaine)，1942年，第24-55页。

多城市的衰落和紧缩。另一方面，有些城市如阿梅达拉、泰维斯特及希波尼等则继续在扩建。看来，这个时期的农业和贸易实际上都没有明显的下降，货币经济能够维持下去证明了这一点。对外往来似乎也很发达，汪达尔人占领的整个地区被称为“谷物帝国”。在不同时期，曾在希波尼、迦太基、图布尔博马尤斯和马克塔等地发现日耳曼式的精致珠宝，这些东西是富裕阶级财富的象征。

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情况比较阴暗一些。汪达尔人在其北非占领地区西、南两个侧翼受到“摩尔人”(对北非反抗者的统称)猛烈的袭击，以至根本无法巩固他们占领地区的边界。边界无疑是变化不定的，向西可能从来没有扩展到超出杰米拉-奎库尔地区。

宗教方面，一直存在着危机的气氛。汪达尔人都是基督教徒，但他们信奉阿里乌教派，这是传统的天主教教士不能容忍的一种异教。中央政权丝毫不想容忍在教义问题上的反抗，于是就对教士们进行了实际是有组织的镇压。我们纪元 484 年在迦太基举行了一次伪宗教会议之后，反天主教的狂热达到了最高潮。

上述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带来一个崩溃进程，而盖塞里克的继位者或由于暴行或由于无能实际上又加速了这个崩溃进程。我们纪元 530 年，格利默排挤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盟友希尔德里克自任国王，成了拜占庭帝国兴兵讨伐的导火线。[44]

502 拜占庭的插曲

自视为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的君士坦丁堡皇廷，决定将西部新建的日耳曼诸国从他们所霸占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事实证明，他们这一行动在北非最有成效。

我们纪元 533 年，查士丁尼一声令下，贝利萨留斯就统率了一支远征军在三个月内消灭了汪达尔人政权，从此这个民族就这样在历史上消失了。拜占庭的第一项措施，即著名的 534 年法令，改组了这个地区的行政机构，确立了后来一直遵循的模式：基本上是以罗马政策为基础的军事和法律并重的政策。当时没能认识到，经历了100多年纪律松弛之后，农村民众已经不愿意再接受过去那套严峻刻板的行政上的保守政策。因此，拜占庭对北非 150 年的占领，实际上只是在不断动乱的局面中在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无可否认的成就而已。

---

[44] 在古代，论述北非汪达尔时期的著作主要是由三个显然怀有敌意的“有偏见的”作者写的。最早的是天主教主教维克托·德维塔（《在阿非利加省的迫害史》Histoire de la persécution dans les provinces africaines）和鲁斯佩的“福尔詹蒂乌斯”(歌剧)；以后是拜占庭历史家普罗科匹厄斯（《汪达尔战争》）。最新版本有：J.弗雷蓬特和 O.韦赫的版本。

现代主要作品是 1955 年 C.库图瓦的重要著作，他引用许多考古资料订正和补充了若干地方。迪斯纳(H.-J.Diesner)对整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见其著作，1965年，第 957-992 页；又 1966年。

已发现的刻在木片或陶器碎片上的正式契约，阐明了土地占有的问题：C.库图瓦，莱希(L.Leschi)，米尼科尼(J.Miniconi)，弗雷特(C.Ferrat)，C.索马涅；P.A.费夫里尔及博纳尔(J.Bonnal)，第 239-259 页。

有关汪达尔人王国向努米底亚南部和西部扩张领土的情况，见 P.A.费夫里尔，1962-1967年；又 1965年，第 88-91 页：H.-J.迪斯纳，1969年，第 481-490 页。

有关制度问题，见沙斯塔尼奥尔（A.Chastagnol)，第 130-134 页；A.沙斯塔尼奥尔与杜瓦尔(N.Duval)，第87-118 页。有关王国情况，特别是城市衰落的情况，见莫兰（L.Maurin)，第 225-254 页。有关宗教问题，见 C.库图瓦，1954 年；C.莱佩利，第 189-204 页；迪斯纳的许多著作引文见德桑热-兰塞尔(Desanges-Lancel)的分类文献目录 1970 年，第 486-487 页；梅尔(J.-L.Maier)。

重新征服这个地区这件事本身就很困难。而其过程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分别在七世纪和十九世纪入侵的情况。汪达尔政权——类似后来的土耳其政权——这座空中楼阁一旦崩溃，征服者就面临当地首领们的反抗，而征服他们乃是旷日持久的任务，需要或诉诸武力或施展计谋才能完成。我们纪元 534 年至 539 年，有才能但很凶暴的将军、地方行政长官所罗门，遭到奥雷斯山区亚夫达斯人和突尼斯-的黎波里塔尼亚草原上的库齐纳和安塔拉斯游牧民族的阻击，后来被他们杀害。他的继承者约翰尼斯·特罗利塔，对柏柏尔诸王公采取比较灵活的手腕，用阴谋诡计分化他们，或以暗杀手段把他们除掉。但是他取得的绥靖效果只是一种假象（544-548 年）。骚乱并未平息，一直持续到七世纪末。人们只要研究一下拜占庭在北非的要塞分布图就可以知道，这种堡垒战略是为了阻塞入侵路线，占据所有的交通路口。这证明他们时刻都在警戒着到处出没的敌人。当年那种进攻精神已相应地为防守策略所取代，反映了他们焦虑的心情。 503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皇帝莫里斯·提比利乌斯和后来的赫拉克利乌斯曾企图以减少占领区的办法缩短边界线，结果徒劳无益。拜占庭向西扩张从来没有越过塞提夫地区。只是最边远的几座沿海城镇驻军防守，但这些城市受到了摩尔人的严密封锁，它们也预示十六世纪西班牙诸流放地所面临的那种出名的军事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庭人设法在行政和经济领域行使他们的权力，是值得赞扬的。尽管有特贝萨、海德拉、提姆加德等地强大要塞的庇护，过去的罗马城镇一直在衰落，人口也减少了。各个旧省有时经过人为的改组，接受驻迦太基执政官所委派的省长，但这与军权毫无关系。六世纪末，一位最高首领、总督或地方行政长官，实际上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自己手中。

导源于罗马方式的对内政策，自然要想方设法恢复往日的捐税收入。每年的实物进贡，即可用小麦支付的年税，也相应恢复了。在汪达尔人王族领地被没收以后，私人地产归还了原主，必要时，则一直查找到原主的第三代。不难想象，这个行动引起的法律和财物争端会有多少。在每块领地上，捐税都被认为是一种致命的负担。不过，经济生活还是比较繁荣的。在一切交易中维持货币经济，以及把对外贸易交给官方代理人掌管，使迦太基及其内地在地中海地区享有巨富之名；自从西西里海峡两岸均由拜占庭管辖以后，声名更著。然而北非的农村居民是否从中得到多大好处，则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宗教事务，新来的主子们又恢复了传统的信仰，即东正教派的天主教，而取缔阿里乌教派。在罗马统治时期的非洲盛极一时的多纳图教派虽曾一度复苏，但旋即遭到严厉镇压。人们把这看成是社会斗争现象，那是很正确的。拜占庭甚至在基督一志论这个问题上听任出现一次教义危机，毫无意义地讨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问题；在伊斯兰教进行征服之时，北非全体基督教教士已被这个问题搞得四分五裂。

从那时以后，面对柏柏尔人的经常威胁，上层官吏在行政上和军事上的广泛抗命，以及滥用职权和腐化，预示着这一政权迟早必然崩溃。一位新的不速之客——阿拉伯征服者，花了 50 年左右的时间（647-698 年），把拜占庭的统治一劳永逸地清除了。 507

除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值得注意以外，还有一些极壮丽的古迹保存至今。大规模的碉堡建筑、建立教堂和加以装饰（有时极其豪华，如塞卜拉泰的教堂或凯利比亚的教堂）表现了当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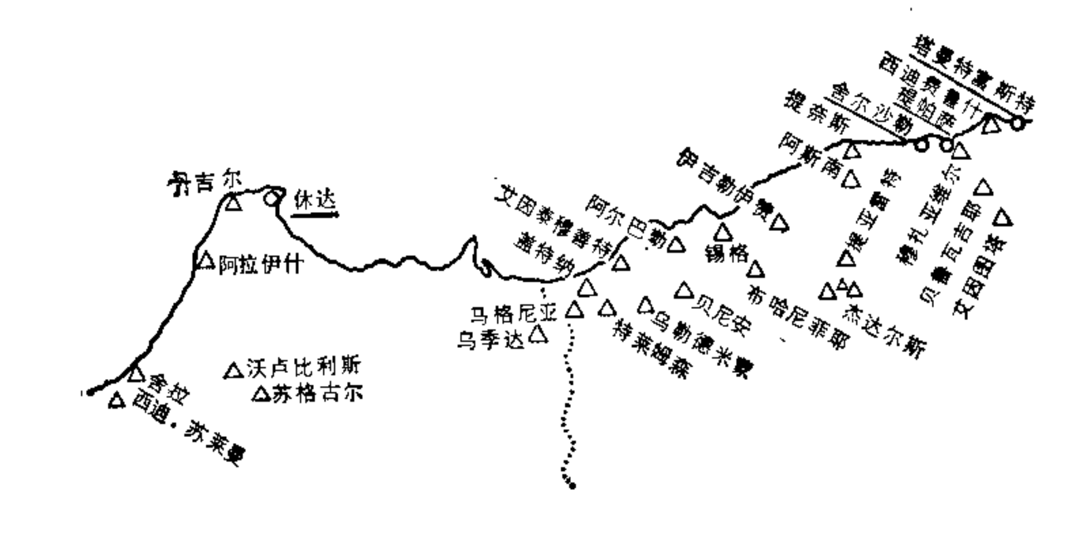


图 解

I. 在拜占庭领土上的主要军事建筑和堡垒

1. 莱卜代＝旧称大雷普蒂斯
2. 的黎波里＝伊亚
3. 塞卜拉泰＝塞卜拉泰
4. 布格拉拉＝吉格西斯
5. 加贝斯＝塔卡帕
6. 伊翁卡堡＝小马科马德斯
7. 凯布迪耶角＝查士丁尼安诺波利斯
8. 萨拉克塔角＝苏莱克滕
9. 迪马斯角＝塔普苏斯
10. 莱姆纳＝莱普蒂米努斯
11. 苏塞＝哈德鲁梅图姆查士丁尼安纳
12. 海尔盖莱＝霍里亚凯利亚
13. 费拉蒂斯遗迹＝阿弗罗迪西厄姆
14. 艾因泰布努克＝托贝努克
15. 迦太基＝迦太基查士丁尼安纳
16. 贝加＝瓦加
17. 哈马姆达拉吉＝布拉雷吉亚
18. 希拉勒堡
19. 艾因特本加＝蒂格尼卡
20. 德穆利亚遗迹＝科雷瓦
21. 坦布拉遗迹＝塔博拉
22. 泰布尔苏格＝图布西库布雷
23. 杜加＝杜加
24. 艾因海贾＝阿格比亚
25. 凯里卜＝穆斯蒂
26. 肯埃尔凯布奇＝奥诺巴里
27. 杜瓦米斯遗迹＝乌基马尤斯
28. 西迪拜拉维
29. 凯夫＝锡卡韦内里亚
30. 杰扎遗迹＝奥布扎
31. 埃巴＝奥巴
32. 卢布斯＝拉里布斯
33. 西迪阿马拉
34. 莱姆萨堡＝利米萨
35. 斯吉达姆遗迹
36. 基斯赖＝库西拉
37. 杰卢拉
38. 汉希尔＝奥加卜
39. 斯比巴＝苏费斯
40. 海德拉＝阿梅达拉
41. 加斯特尔
42. 特贝萨＝泰维斯特
43. 布·德里耶斯遗迹
44. 斯贝特拉＝苏夫图拉
45. 费里亚纳＝泰莱普特
46. 加弗沙＝卡普萨
47. 内格林＝马约雷斯
48. 巴代斯＝巴迪阿斯
49. 苏达＝塔布德奥斯
50. 比斯克拉＝韦斯塞拉
51. 图勒加
52. 图布纳＝图布纳
53. 拜莱兹马堡
54. 艾因扎纳＝老人黛安娜村
55. 艾因盖塞尔
56. 兰拜塞＝兰拜塞
57. 提姆加德＝塔穆加迪
58. 盖塞斯遗迹
59. 巴加伊＝巴盖
60. 汉舍莱＝马斯库拉
61. 乌姆基夫遗迹＝塞迪亚斯
62. 凯勒卜堡＝韦盖塞拉?
63. 舍拉格雷格遗迹
64. 陶拉＝塔戈拉
65. 姆道鲁什
66. 提费什＝提帕萨
67. 卡米萨＝图布西亚努米达伦
68. 盖勒马＝卡拉马
69. 安努纳＝蒂比利斯
70. 阿杰莱季堡
71. 斯巴希堡＝加迪奥法拉
72. 艾因布尔季＝蒂吉西斯
73. 费鲁赫山
74. 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纳
75. 费季西拉
76. 米拉＝米莱夫
77. 塞提夫＝塞提菲斯
78. 济赖耶＝扎拉伊
79. 克贝特赞比亚＝塞拉斯
80. 艾因图迈拉＝塔马卢拉
81. 瓦迪克苏卜
82. 拜希勒加＝扎比查士丁尼安纳

插图 19.3 拜占庭时期北非的军事建筑、堡垒、城镇

505

506

II. 划线的地名：拜占庭在受保护领土以外占领的城镇

贝贾亚＝萨尔达，可能是被占领的
阿泽丰＝鲁扎苏斯，可能是被占领的
提格济尔特＝伊昂尼翁，拜占庭的壁垒
德利斯＝鲁苏库鲁，拜占庭的文物
塔曼特富斯特＝鲁斯古尼艾，拜占庭的铭文
提帕萨＝提帕萨，拜占庭的硬币
舍尔沙勒＝恺撒城遗迹，文献
休达＝塞卜泰姆，文献

III. 未划线的地名：对独立非洲各城镇和纪念物的最新年代考证

	日 期
西迪费鲁什：教堂碑文	449/533年
穆扎亚维尔：墓碑文(及六世纪的文物)	495年
贝鲁瓦吉耶＝扎巴	474年
艾因图塔：教堂碑文	461年
阿斯南＝廷吉城堡：教堂碑文	475年
伊吉勒伊贺＝米纳：基督教经文	525年
提亚雷特：墓碑文	509年
弗伦达大陵墓：墓碑	五世纪至七世纪(？)
锡格＝塔萨库拉：墓碑文	450年以后
阿尔巴勒＝雷吉艾：墓碑文	494年
布哈尼菲耶＝阿凯锡伦塞斯：墓碑文	577年
贝尼安＝阿拉米利亚里亚：墓碑文	五世纪末
艾因泰穆晉特＝阿尔布拉(萨法尔)：墓碑文	544年
乌勒德米蒙＝阿尔塔瓦：墓碑文；	599年
碑文的上下文	655年

	日 期
特莱姆森＝波马里亚：墓碑文	651年
盖特纳：墓碑文	524年
马格尼亚＝努梅鲁斯西罗鲁姆：墓碑文	460年
但占领情况与特莱姆森类似	
乌季达附近地区：硬币	七世纪上半世纪
沃卢比利斯(瓦利利)：墓碑文	655年
关于阿尔塔瓦一位权贵	
苏格古尔：墓碑	七世纪
西迪·苏莱曼：硬币	七世纪上半世纪
舍拉＝萨拉，拜占庭砝码	六世纪
阿拉伊什(拉腊歇)＝利克苏斯：	
硬币	七世纪上半世纪
丹吉尔＝廷吉斯：硬币	七世纪上半世纪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之间的目前疆界

时人们令人叹服的坚韧不拔精神和信念。[45]

各独立地区

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帝国后期罗马统治下的非洲早已经历了许多政治和社会改革，我们就能够理解，汪达尔人的到来在多大程度上为解放古老的倾向开辟了道路。“永恒的非洲”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力；外国人的存在，无论远近，都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负担了。因此，从心理学角度把由柏柏尔诸王公管辖而名义上忠于汪达尔或拜占庭统治的地区和完全独立的地区加以区别，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前一种地区处于外国占领区的边缘，地方分立的程度很高，所以总是企图摆脱中央政权。在奥雷斯，拜占庭统治者实际上同意把土地正式分封给亚夫达斯人；在突尼斯高原，分给甘凡人、安塔拉斯人和库齐纳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分给卡尔卡赞人。这些“封臣”不受拘束地管理着封给他们的领地，根本不存在把这些土地从他们那里收回的问题。

508 至于前恺撒毛里塔尼亚和廷吉毛里塔尼亚的一些简直不受外来干涉的地区，其中有些离汪达尔或拜占庭那些据点很远，从429年以后就享受着绝对的独立，它们那些统治者除非为了谋取某些私人利益，否则也不干涉邻近地区的事务。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古罗马时代马格里布历史上永恒不变的主要规律之一，即中央集权的力量一旦消失，立即出现地方分裂和对抗的倾向。这时政治上的划分就会受地理因素所左右。

不幸的是，人们对罗马统治结束以后独立的北非的结构所知甚少。只有罕见的文字资料提供的线索或是考古工作中偶尔发现的遗物才向我们揭示，那里曾存在由一些巨大的社会政治联合体组成的若干王国。例如，六世纪初，在阿尔塔亚和特莱姆森地区，曾经有过“摩尔人和罗马人的国王”马苏纳的政府；其后不久，在奥雷斯，有过某个叫做马斯蒂斯的统治时期，他当过“67年首领，40年皇帝”，他“既不拒绝相信罗马人，也不拒绝相信摩尔人”。另一位当地统治者瓦塔亚是个纳贡称臣的人，他可能是霍德纳地区的统治者。毫

---

[45] 有关拜占庭统治下的非洲的古代文献，主要是以希腊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和拉丁诗人科里普斯的著作为代表。普罗科匹厄斯是重新征服时期真正的“战地记者”，他的著作有《汪达尔战争》(见前注44)以及《建筑物》(B.H.杜因编)。科里普斯详细描述了约翰尼斯·特罗利塔与摩尔人作战的事迹：《约翰尼斯》(帕奇编，迪格尔-古德伊尔编)。关于这个时期十分重要的批判性著作仍然是迪尔 (C.Diehl) 的著作。从那以后，有了许多考古方面的发现和讨论细节问题的出版物。我们只引用最新的著作。

完全谈历史的：贝尔克霍贾(K.Belkhodja)。谈占领区的地理疆域的：J.德桑热，1963年，第41-69页。

曾对碉堡进行详细研究的有：古德柴尔德 (R-G.Goodchild)，1966年，第225-250页；琼斯(A.H.M.Jones)，1968年，第289-297页；兰塞尔(S. Lancel)及普蒂埃(L. Pouthier)，第247-253页；拉絮斯(J. Lassus)，1956年，第232-239页；1971年；1975年，第463-474页；P.罗马内利，1970年，第398-407页。

有关宗教问题：尚普蒂埃(P.Champetier)，第103-120页；A.贝蒂埃，第283-292页；更详尽的：Y.杜瓦尔及P.-A.费夫里尔，第257-320页。

N.杜瓦尔(1971)主要研究了同一时期海德拉和斯贝特拉地区的宗教建筑、镶嵌物及碑文；参阅N.杜瓦尔及巴拉特(F.Baratte)，1973年，1974年，这些著作参考了完整的文献目录：参阅辛塔斯(P.Cintas)及N.杜瓦尔，第155-265页；芬德里(M. Fendri)；N.杜瓦尔，1974年，第157-173页、德安热利·多萨 (G.de Angelis d'Ossat) 及法里奥利(R.Farioli)，第29-56页。莫里森 (C.Morrisson) 对窖藏货币和迦太基铸币厂发行的拜占庭铸币曾进行分类。最近在突尼斯的杰姆附近的鲁加发现一窖金币，这无疑是在647年阿拉伯人第一次袭击此地时埋下的：盖里 (R.Guery)，第318-319页。

无疑问，恰巧处于游牧部落和定居部落交界处的前罗马边防带上的要塞提亚雷特城，早在五世纪，就是某个王朝的首都。象征着那个王朝的权威的弗伦达大陵墓至今巍然屹立。在这方面可能还应该算上毛里塔尼亚国王，强大的加穆尔，他曾于571年击溃一支拜占庭军队。最后，在六、七世纪间，在遥远的廷吉塔纳，即现在的摩洛哥北部，曾经有过一个土著民族的公国，沃卢比利斯的碑文和苏格古尔的陵墓证实了它的生命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时的社会政治组织表明它的结构并非简陋不全，也不是杂乱无章。各种新的制度是把柏柏尔传统和罗马行政结构的模式结合起来的。"摩尔人"和"罗马人"联合起来，这个形式当然意味着未罗马化的农民成分和业已接受几百年拉丁影响的城市居民之间的协作。当时对外来的行政和文化遗产并没有什么不满，有时还被引以为荣。我们所绘制的这些地区的历史地图表明，象提亚雷特、阿尔塔亚、特莱姆森和沃卢比利斯这样的一些小城镇，都保存下来了，它们至今仍信奉基督教，直至七世纪仍然流行使用拉丁文。

但对于这些长期残存的影响，我们决不可欺骗自己。决定未来命运的，不是那些小国王对早已消失的声望的恋恋不舍，而是农村广大群众一心向往的争取独立和摆脱外来统治的不可抗拒的洪流。整个地区都在献身于非罗马化，甚至是非基督教化的进程，势不可挡。509 这个进程采取何种不同的方式及历时之久暂，则因地而异。这种现象最直接、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山地居民和游牧民族到处对作为财富的传统象征的城镇和庄园发动攻击。我们知道，在拜占庭的军队到达以前，杰米拉、提姆加德、泰莱普特和其他几个著名城市都遭到彻底破坏。反复核对了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之后，特别是在发现几处钱窖之后，人们发现，除其他骚乱外，就在五世纪末，还发生过一次大暴动。与此同时，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南部那些大游牧部落如勒瓦塞人或洛亚塔部落所进行的战事表明，在五、六世纪，在一般经济和军事战术中，骆驼起着很大作用。在开阔地区要消灭这些游牧部落，拜占庭军队不得不面对拴在一起围成三层圆圈的骆驼阵，那是名副其实的活的铜墙铁壁，必须用刀剑砍倒。然而，这些敌对军事行动都是反对外国人即汪达尔人或拜占庭人的。此外，各独立地区内部也有类似的骚乱，有各地区之间的战争或地方性的劫掠。

这些动乱煽起长时期的暴力行动，直至最后达到某种平衡为止。在这些动乱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导致广大人民逐渐贫困化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例如，在我们手头现有的记载484年恺撒毛里塔尼亚主教管区数目的统计资料中，还可以找到古罗马统治时期非洲大多数城镇的名字。尽管其中许多城镇估计已经下降到村庄一级，但它们当时确实还存在。当时教堂仍在兴建，还常常用精致的镶嵌物做装饰(如在阿斯南地区)。这种事实表明还有创造性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必然以仍然存在的财富为基础的。毫无疑问，当时人们仍然在前一个时期的大发展中得到好处。然而，考古工作却几乎没有发现六、七世纪有任何与此相当的东西。这样，与这种基本属于农村类型的新社会——在中世纪前期，这种社会到处可见——开始巩固的同时，城镇继续被抛弃。

最后这个时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纪念性的遗物呢？拜占庭人定居的靠近毛里塔尼亚滨海的地区，很容易接受外来影响。例如，在提帕萨南面的穆扎亚维尔废墟中发现六世纪的精致的青铜烛台。提奈斯这个遗址之所以出名，就是由于在那里发现了古代最为著名的金

器和银器的宝藏，特别是其中还有帝国要人的官印等。为什么在这么偏僻的地方竟然存在这些东西，仍然是个谜。作者认为，所有这些珠宝都是偷来的，可能同洗劫罗马一事有关。资料表明，我们纪元455年，汪达尔军队曾偕同摩尔人队伍劫掠了罗马。

510

但我们只要离开沿海地区和外国占领的区域，马上就看出，在五世纪末建筑活动停止进行了。然而，这有两个重要的例外，它们以著名的巨大陵墓为代表，这些陵墓的建筑艺术恢复了质朴的优点，避免了不必要的外来影响。因此，如果当地环境极端贫困，那么，在摩洛哥的苏格古尔那座陵墓(可能是七世纪初的)和在阿尔及利亚的弗仑达陵墓（从年代上看是从五世纪到七世纪的(？))所反映出来的建筑气派，就无法解释了。难怪马格里布中部和西部最早的穆斯林王国、提亚雷特的罗斯特米季斯王国以及以后瓦利利（沃卢比利斯）的伊德里西王国，恰恰就是在这些地方扎根的。

这些地区的古代时期就到此结束，在这段杂乱无章的插曲中，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作用，侵蚀着拉丁的影响，展示了北非历史中的永恒标志：不可扑灭的独立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46]

（袁柱常译）

---

[46] 在古代文献中，只有一些零星资料谈到各独立地区的状况：如普罗科匹尼斯和科里普斯就曾经提到过，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的政治干预涉及摩尔人。例如《约翰尼斯》曾谈到有关土著社会的几百条细节。不过，我们的主要论据来自出土文物。C.库图瓦曾对这个问题进行卓越的直观分析，见1955年著作，第325-352页。有几位作者曾就1941年在奥雷斯的阿里斯发现的为马斯蒂斯撰写的碑文发表评论。参阅后来J.卡科皮诺对沃卢比利斯基督教徒进行的研究，见1946年著作，第288-301页。有关最近的碑文资料，见马西耶-若贝尔(J. Marcillet-Jaubert)。

关于五世纪末的大暴动，见 P.萨拉马，1959年，第238-239页。

各独立地区的经济和货币状况在特肯(R.Turcan)著作第201-257页中有叙述、J.厄尔贡(1958年)曾对珠宝进行值得注意的研究，他提出的看法认为，这些珠宝属于居住在提奈斯的一个大户人家。但这些收藏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看来更符合一个盗贼的心理。至于429年以后继续进行的建筑活动，见P.-A.费夫里尔，1965年，等。

罗马统治时期以后各王朝的大陵墓是最近人们分析研究的题目：G.康，1974a，第191-208页，卡德拉（F.Kadra）的著作更专门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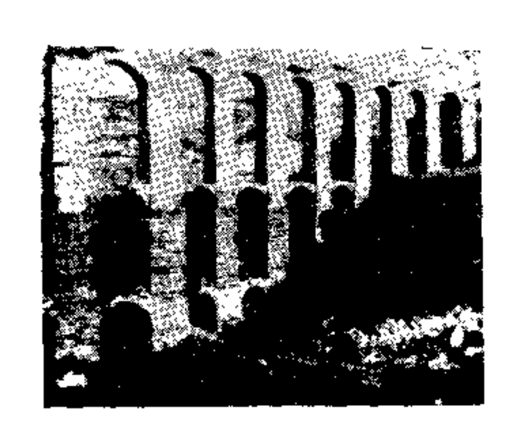
关于在穆斯林中世纪大部分时期内，特别是在特莱姆森、贝贾亚、凯鲁万和的黎波里地区，还存在一些通常操拉丁语的基督教徒的社会：C.库图瓦，1945年，第97-122页及193-266页；A.马哈朱比，1966年，第85-104页。



图片 19.1 苏塞的镶嵌工艺品：弗吉尔在写《亚尼德》



图片 19.2 舍巴的镶嵌工艺：尼普顿的胜利



图片 19.3 为迦太基供水的来自扎格胡安的高架水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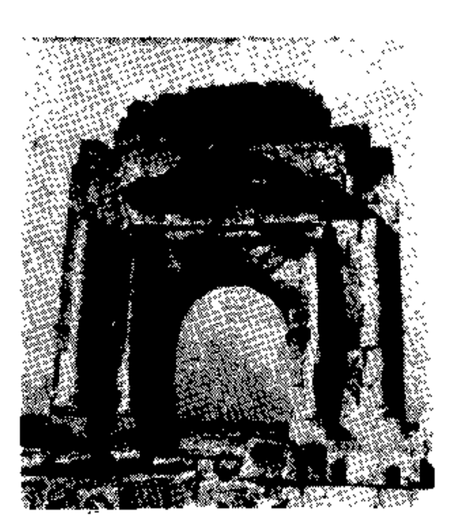
512



图片19.4　塞卜拉泰(利比亚)：罗马剧院的正面



图片19.5　的黎波里(伊亚古城，利比亚)：马库斯·奥雷利乌斯的凯旋门明细图



图片19.6　迈克塞尔(迈克塔里斯古城，突尼斯)：图拉真拱门，广场的入口



图片 19.7 (左)杰米拉(奎库尔古城，阿尔及利亚)：市中心



图片 19.8 提姆加德(塔穆加迪古城，阿尔及利亚)：大道及图拉真拱门



图片 19.9 海德拉(突尼斯)：拜占庭碉堡，六世纪，全景



图片 19.10 莱卜代(大雷普蒂斯古城,利比亚):罗马竞技场在建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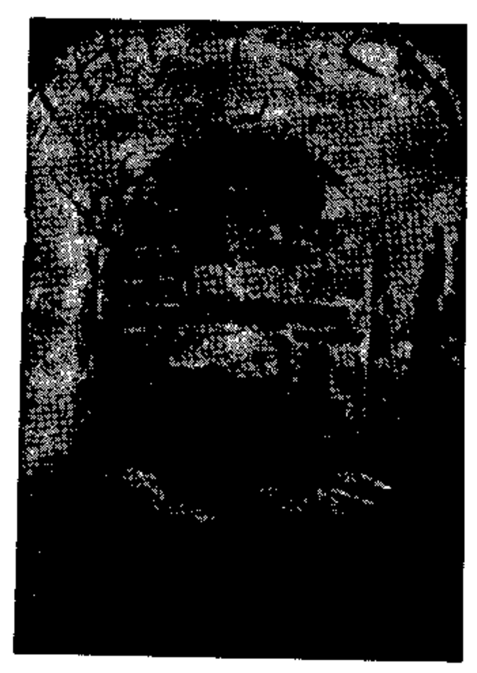
图片 19.11 斯贝特拉(突尼斯):安装在罗马城镇一条古老街道上的榨油机(六-七世纪)



图片 19.12 海德拉(突尼斯):拜占庭碉堡明细图(六世纪)



图片 19.13 提姆加德(阿尔及利亚):拜占庭碉堡(六世纪):南部壁垒、军官住宅区和小教堂



图片19.14 弗伦达附近泰尔纳提的陵墓（阿尔及利亚）：墓穴（六世纪）



图片19.15 提姆加德（阿尔及利亚）：拜占庭碉堡（六世纪）

513

20 古典时代的撒哈拉

P.萨拉马

"古典时代"的传统概念乍看起来似乎和撒哈拉问题的研究格格不入。撒哈拉问题属于独特的一类。只需举一个例子来看：在地中海地区的考古学上，古典时代大约历时1000年，从我们纪元前五世纪到我们纪元五世纪；但撒哈拉的初史时代包括"卡巴林"末期和"利比亚-柏柏尔"时期的一部分，而且这两个时期的确切年代都无法测定。因此，在这里似乎无法编制任何确切的年表。

尽管如此，在那1000年间，撒哈拉区域却是许多重大事件发生的场所，这些事件大部分还和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有关。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古典的纪年标准，这种标准对整个已知世界都是适用的。

历史学家是如何研究古代撒哈拉这个问题的呢？首先必须查阅希腊－拉丁文字资料；虽然搜集到的资料并不是完全可靠，而且还可能导致错误，但从原则上说，还是有价值的。下一个步骤就是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把原始材料一点一滴地加以订正，把整个问题搞清楚。做到了这一点，"古代的"撒哈拉就不再是只从外面来作判断，而是可以显示它的本来面目。

当时的文献和对这些文献的夸大解释

我们知道古代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他们无法亲自前往这些难以到达的地区，于是搜集了第二手材料，这些材料有颇大部分是错的，或是不真实的。那一大片沙漠，所谓"未知之境"(terra incognita)连个名称都没有。直到阿拉伯人到来才把"撒哈拉"一词用来称呼这块象个巨大盆地的广大地区。希腊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只提到"内利比亚"，这是一个很模糊的地理名词，指北非各地以南的地方；或者是指内埃塞俄比亚，那是更向南去的一带地方，因其居民有着黑色皮肤而得名。因此，有关这地区的描述令人难以置信，人和动物往往被描绘成古怪可怕的样子，纯属故弄玄虚吓唬当时的人。 516

但是严肃认真的作家虽不能完全摆脱那些传说，却也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出他们著作的质量也在改进。无疑，这是由于随着希腊－罗马在非洲的殖民事业的进展使人们对实际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早在我们纪元前五世纪中叶，希罗多德就在埃及得到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南部边境上那些撒哈拉居民及其风俗习惯的第一流材料。在他的著作里，我们读到



插图 20.1 古典时代的撒哈拉

图解

1 雷斯雷姆特，在毛里塔尼亚的阿克儒特附近：二枚罗马共和 AR 银币（莫尼，1956a，第 255 页）

1A 塔姆卡特卡特，毛里塔尼亚：我们纪元二世纪的古罗马银币（《非洲纪实》，115 期，1967 年，第 101 页）

1B 阿克儒特，毛里塔尼亚：罗马青铜饰针（《非洲古物》，1970年，第 51-54页）

2 宋维赖－摩加多尔，摩洛哥：迦太基和罗马文物，从我们纪元前七世纪到我们纪元五世纪（乔丁，1966年）

2A 吉尔角，摩洛哥：迦太基陶瓷，我们纪元前三世纪（雷比法，《非洲古物》，1974 年，第 39－40 页）

3 萨菲，摩洛哥：罗马古币珍藏，我们纪元四世纪（《南非博物馆年刊》，1934年，第 127 页）
朱尔夫尤迪（萨菲以南 15 公里）：迦太基人像之足（《非洲古物》，1974年，第 38-39 页）

4 艾字穆尔，摩洛哥：迦太基陶瓷器；罗马古钱币，我们纪元二世纪（莫尼，1956a，第 250 页；《非洲古物》，1974 年，第 35 页）
杰迪代（马扎甘）（艾宰穆尔以南 15 公里）和迈哈尔扎（艾宰穆尔以南 30 公里）：罗马钱币，我们纪元一、二世纪（《非洲古物》，1974 年，第 36页）

5 卡萨布兰卡，罗什努瓦尔：大批罗马共和 AR 银币（从沉没的军舰打捞起来的）（莫尼，1956a，第 250 页）
费达拉，扎埃尔地区的西迪・苏莱曼，布兹尼盖，斯希拉特，代希拉，泰马拉，达尔苏丹（都在卡萨布兰卡以东 80 公里的海岸上）：罗马陶瓷：罗马和拜占庭钱币（《非洲古物》，1974 年，第 29-32页）

6 伊泰勒干河，阿尔及利亚：土著墓中的罗马陶瓷（《铭文及纯文学学会论文汇编》，1896 年，第 10 页）

7 古尔德乌西夫：大批罗马共和 AR 钱币，我们纪元二世纪（莫尼，1956 a，第 252 页）

8 哈西哈杰尔，阿尔及利亚：罗马陶瓷和钱币（未刊行，法费吉特）

9 米里拜勒堡，阿尔及利亚：长颈灯残片（拜占庭遗物？）（H.J. 于戈）

10 曼宰哈，阿尔及利亚：铜铃；罗马陶瓷（J.P. 莫雷尔，《法国史前社会资料》，1946 年，第 228 页）

11 瓦尔沙漠，泰马西宁（从前的弗拉特斯堡）附近，阿尔及利亚：罗马青铜玫瑰（未刊行，斯普鲁伊特）

12 伊萨万提费尔，塔拜勒巴莱特附近，阿尔及利亚：两只铜镯（未刊行，J. 斯普鲁伊特）

13 伊利济（从前的波利尼亚克堡），阿尔及利亚：罗马钱币（洛特，《撒哈拉关系资料》，1953年 4 月，第 57 页）

14 阿巴莱萨，阿尔及利亚，廷・希南古迹：罗马珠宝和物件，我们纪元三、四世纪（康，1965 年）

15 提米萨乌，阿尔及利亚：罗马钱币（莫尼，1956 年，第 252 页）

16 沙巴－阿尔库亚，贾奈特，阿尔及利亚：古墓中的罗马陶瓷和铜镯（洛特，《利比亚A》，1971 年，第 187 页）

17 迪代尔和泰德拉尔特，阿杰尔高原，阿尔及利亚：罗马钱币，我们纪元四世纪（莫尼，1956年，第 251页）；罗马陶瓷（未刊行，J. 斯普鲁伊特）

18 廷阿勒库姆，阿尔及利亚：墓中的罗马陶瓷和玻璃，我们纪元四世纪（莱希，1945年）

19 加特，利比亚：墓中的罗马陶瓷和玻璃，我们纪元四世纪（S.帕切－卡普托）

20 加拉曼特群：杰尔马，津舍拉，廷阿本达，塔古特，沙拉伊格，艾卜耶德，利比亚：晚期迦太基陶瓷；罗马陶瓷和玻璃，我们纪元一至五世纪（M.雷加斯，H.洛特，1955年；G.康，1965 年；M.加斯特，1972年）

21 马特雷斯，利比亚：罗马化遗址，我们纪元二世纪（雷比法，1972 年，第 322-326 页）

22 锡纳万，利比亚：铁器时代第二期饰针（康，《利比亚A》，1963年，第169-174页）；罗马化遗址，我们纪元二世纪（雷比法，1972年）

23 瓦迪奈纳，利比亚：罗马化遗址（布鲁根，《利比亚古物》，1965 年，第 57-64 页）

24 沃丹，利比亚：罗马化遗址（雷比法，1970年）

25 泰格里费特，利比亚：罗马化遗址（雷比法，同上）

26 锡瓦，阿蒙绿洲，埃及：希腊化后又罗马化的遗址

27 赖扬洼地，埃及：罗马化遗址（卡顿・汤普森，1929-1930 年）

28 哈里杰站绿洲，埃及，希腊-罗马时代的大绿洲：希腊化后又罗马化的遗址

29 阿布拜拉斯，埃及：晚期罗马陶瓷（密特瓦莱，《美国考古杂志》，1952 年，第 114-126 页）

30 科尔多凡，苏丹：罗马化遗址（阿克尔，1951年，第 353 页）

31 奥贝德，苏丹：罗马钱币（莫尼，1956a，第254页）

加拉曼特人乘四匹马拉的战车追捕特罗格洛迪特人(IV,183)。我们读到纳萨摩尼亚人(IV,172－5)越过浩瀚的沙漠，在一个黑人国里发现了一条大河象尼罗河那样满是鳄鱼。①我们还读到(IV,43)腓尼基水手约在我们纪元前600年历尽艰险为埃及法老从东往西环绕整个非洲航行一周的非凡业绩。后来又读到波斯人进入大西洋之后也曾试图从相反的方向，由西往东环航一周，但未成功(IV，43)。最后，我们还读到迦太基人在西非海岸以商品换取贵重的砂金(IV,196)。

在我们的材料中，谈到这一点的有一篇著名的文献，即我们纪元前四世纪上半叶迦太基人汉诺写的那部《回航记》，该书叙述他奉命去西非海岸探险并在那里殖民的情况(见《希腊短篇地理著作汇编》I)。书中详细描述了当地优美的景色、野人、鳄鱼、和河马，篇幅虽短，却提到两个重要的陆地标志：即在另一篇史料中称它是象牙和野兽皮革的仓库的瑟恩岛(见我们纪元前四世纪的《斯基拉克斯航海记》112节)和名叫"众神战车"的大火山，这是汉诺沿非洲海岸航行的最后一站。后来在我们纪元前二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那次航海证实了这两个地点确实存在，不过他的叙述人们是通过另外的著作(大普林尼的《博物志》，V，9－10)间接知道的。

我们知道的关于罗马在非洲殖民以前的史料主要就是这些。说来奇怪，最无可疵议的

517 正是这些最古老的史料。希罗多德的记载，除了环绕非洲航行一节有待商榷外，其余都还可靠，而且大部分的见解也是稳妥的，不容作夸张的解释②。对比之下，汉诺的《回航记》侈谈地形细节却引起了人们纷纷议论。传统的历史学家都乐于认为迦太基人了解整个西非海岸远及喀麦隆的情况③。

随着罗马人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征服者在非洲地中海沿岸和埃及站稳脚跟之后，马上就同邻近地区直接接触。这包括炫耀武威而无意开拓疆土的征战以及商业的甚至科学的勘察。

例如，大普林尼的(《博物志》，V，5)最有价值的一段文字提到阿非利加总督科内利乌斯·巴布斯于我们纪元前19年对不肯驯服的费赞的加拉曼特人王国进行了一次袭击。除少数地名如拉普萨(加弗沙)，锡达穆斯(盖达米斯)或加拉马(杰尔马)确切可考外，罗马人获胜的其他许多地名则难以确定，它们有类似现代撒哈拉一些地名的读音。人们曾把这一点视为罗马人确实到过尼日尔的充分证据④。

看来更有说服力的是拉丁时期的文献记载，曾提到罗马人对非洲内地多次大举入侵。提尔作家马里努斯(我们纪元一世纪后期)和评论过他的作品的著名地理学家克劳迪乌斯·托勒密(他对非洲的记述是早在我们纪元110至120年间写的)都讲到总督塞普蒂米乌斯·弗拉胡斯从利比亚某基地出征，南行二个月，扫荡了从加拉曼特人居住的地区到埃塞俄比亚人居住的地带；与此同时，尤利乌斯·马特努斯则从大雷普蒂斯出发经加拉马，在加拉

---

① 关于这次远征问题，参看洛尼斯(R. Lonis)的著作，他证实了格塞尔(S.Gsell)关于纳萨摩尼亚人去萨乌拉河谷的各条路线的说法。

② 勒克朗(J.Leclant)，1950 b，第193-253页；卡彭特(R.Carpenter)，1965年，第231-242页。

③ S.格塞尔，1918年，第272 519页；卡科皮诺(G.Carcopino)，1948年，第73-163页；德尚(H.Deschamps)，1970年，第203-210页。

④ 洛特(H. Lhote)，1954年，第41-83页；1958年。

曼特人的国王陪同下(当时他正在向埃塞俄比亚人进军)，经过四个月不停地向南进军，到达埃塞俄比亚人境内的阿吉辛巴地区，那里盛产犀牛(托勒密的《地理志》，1,8,4)。由于托勒密使用了一种数学体系——用经纬度确定所提到的地名，以证实他那时看来已十分丰富的非洲地理知识，所以他的记述就更显得重要了。他的非洲内陆地图面目一新，提供了成百的山川、部落和城市的名称，而借助于发音的相似，他的著作所造成的印象，使得人们再一次相信他们有证据说明罗马人已完全熟悉非洲的热带地区，特别是尼日尔和乍得地区⑤。

现在这种过分夸张的说法已站不住脚了。现代的分析方法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撒哈拉的历史。

当今的治学方法

518

新式校勘

现代历史学者清楚看到了汉诺的《回航记》，关于科内利乌斯·巴布斯的故事和托勒密的《地理志》这三大著作都是成问题的。

近年来，《回航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几乎是决定性的抨击。首先已经肯定的是，在古代，凡是冒险驶过朱比角而在返航期间遇到顶头吹来的强劲贸易风的船只，都不可能返回原来的基地⑥。因此，这一点就把汉诺航程的地理范围局限于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一带。那里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已证实古时的瑟恩岛就是今天的索维赖－摩加多尔岛⑦。而且，精细的语言对比方法展示了《回航记》上的故事只不过是希罗多德的一段文字的拙劣抄袭，因而纯属伪造⑧。

第二部被驳倒的书是普林尼记述科内利乌斯·巴布斯那次袭击的故事。对原稿进行分析就可以逐一否定那些地名是指撒哈拉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因此，罗马的胜利进军只包括马格里布和费赞以南的地方⑨，而且，任期只有一年的一位总督很难走得更远。

最后，托勒密的那部巨著《地理志》所涉及的地区范围原来非常有限。它那些按照古代标准计算的经纬度，就象书中提到的山川、城市和部落那样，也只是到达马格里布的南部边境为止；而书中提到的尼日尔河只不过是阿尔及利亚南部的一条水道。由此看来，费赞就是罗马人所熟悉的地区的最南部。在“未知之境”(即大沙漠)边界上的阿吉辛巴这个问题尚待解决。⑩

---

⑤ 贝特洛(A. Berthelot)。

⑥ 莫尼(R. Mauny)，1945年，第503-508页；在《法国黑非洲学会研究报告》中重提的论点，1961年，第95-101页。

⑦ 乔丁(A.Jodin)。

⑧ 热尔曼(G. Germain),1957年，第207-248页。该著作的真实性仍为查尔斯－皮卡德(G.Charles-Picard)所坚持，见其著作，1968年，第27-31页。

⑨ 德桑热(J.Desanges),1957年，第5-43页。

⑩ R.莫尼，1947年，第241-293页，附有精制地图一幅；J.德桑热，1962年。

现代校勘学这些实验的结果是极令人感兴趣的，但在总的编年表上，也只做到第二世纪初为止。那时以后再没有地理著作流传下来。现在考古学已经证明，在第三、第四世纪来自罗马的器物曾远远深入到撒哈拉沙漠中部。古代地理的知识必然已有了增进，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罗马文献对大沙漠以南的一些湿润地区的存在并非毫无所知。

519 既然我们已经摆脱有时很累赘的古籍的束缚，我们不妨看看古代撒哈拉本身究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

它的生态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大致情况如何？它的考古遗迹向我们揭示了什么？

生态学问题

按照古气候学说，大家知道撒哈拉在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个时代已达到它的干旱过程的最后阶段。⑪ 但是我们必须说明一下：有些能抵御干旱的地方——主要是一些山区和大谷地——仍然保存着足够的湿度，使那里的生物远比我们这个时代繁茂。阿哈加尔高原，费赞、提贝斯提和撒哈拉北部仍有相当好的生长环境。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明那些现在已经绝迹的野生动物群当时能够生存的原因：如干涸河道和永久性水坑里的鳄鱼，山区的猫科动物等；但大象或犀牛这类大型食草动物是否能在提贝斯提以北，甚至在乍得疏树热带大草原(在那里，这类动物自然很多)北缘的瓜尔一带继续生存，却值得怀疑⑫。

除骆驼(下文将谈及)以外的家畜在适宜居住的安全地带和人类一起坚持下来。那时有现在的牛类以及成群的山羊和绵羊。但奇怪的是，在撒哈拉绿洲能干各种活计的驴子在岩石壁画上却找不到它的踪迹。

人类学问题

由于缺乏科学标准，当时的文献一般是把非洲内地各族人民都称为“埃塞俄比亚人”。这一点不能责怪古代作家。即使是现代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总是能很好地分析这个问题。所谓“黑人特性”，标准很不明确⑬。在很长时间中，人们总是假定：白种人在撒哈拉的出现只是较近的现象，是不断的征服，是罗马人把草原上的柏柏尔人赶出马格里布地区的结果⑭。

520 在这方面，由于最近在费赞和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地区进行的考古工作，情况愈来愈清楚了。现在人们认为在有史初期——古代只是其中最后一个阶段——撒哈拉中部和北部的居民主要是白种人：“高个儿，地中海人的外表，……大脑壳……面部比较狭长……四肢

---

⑪ 杜比埃夫(J.Dubief)，菲隆(R.Furon)。

⑫ R.莫尼，1956 b，第246-279页，参看第124-145页。

⑬ 希腊字 Aethiops 通常译为“被太阳晒黑面孔的人”；1976年1月19日到24日在达喀尔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对“古代黑非洲和地中海世界问题”曾进行坦率的讨论，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⑭ S.格塞尔，1926年，第149-166页；斯诺顿(F.M.Snowden)对整个古代文献和肖像作了精辟的分析，见其著作，1970年，第364页；参看J.德桑热，1970年，第87-95页，克拉科-鲁吉尼(L.Cracco-Ruggini)，1974年，第141-193页。

修长'——和现代图阿雷格人的形态特点一模一样。现在看来，这种体型的来源不必再到马格里布方向去寻找了，倒是应该到非洲大陆东北部去找。⑮ 至于撒哈拉各地绿洲的现代哈拉廷人，尽管并非纯种，但看来基本上还是希罗多德著作里提到过的定居的“埃塞俄比亚人”在当地的后代，⑯ 他们曾受到富有的加拉曼特人的奴役。一旦血型研究技术能得到准确的结论时，我们对这一点还会知道得更多。⑰ 另一方面，撒哈拉南部的居民，无论聚居的规模多大，很可能全是来自疏树热带大草原的黑皮肤的人。

文 明

由于缺乏绝对可靠的编年，看来很明显，对古代撒哈拉文明的发展过程很难作出估计，特别是因为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一大片区域的不同地区是否曾沿着相同的路线发展。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是从撒哈拉新石器时代⑱ 末期的文化状况着手，并在这个基础上考察各方面的发展道路。

语言和文字

在古代撒哈拉文明史上我们首先发现的一件大事的证据，不消说，就是语言的出现。这种语言在我们的时代仍可找到，但和远古的原始形态已大不相同。这种母语包含多种方言，为了方便被称为“柏柏尔语”，它属于含米特-闪米特语这个共同主干，但早已分化，另成为一支了。它的古老形态“利比亚语”已在沿地中海所有非洲地区和加那利群岛的文字中得到证实。⑲ 毫无疑问，这种语言是随着白种人从北方或东北方迁入而引进撒哈拉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已无从查考，但从马格里布的利比亚字母派生出来的称为“蒂菲纳格”文（Tifinagh）的撒哈拉文字，出现的年代颇晚。在北部各地区，我们纪元前第二、三世纪以前似乎还没有利比亚文字的确实可靠的证据。现在普遍认为，柏柏尔人是在迦太基的影响下把自己的语言写成文字的。“蒂菲纳格”这个字——法文直译为“Tifinar”——本身就是根据字根 FNR 构成的，这个字根在闪米特所有语言中都是指的腓尼基人。 521

在撒哈拉，蒂菲纳格文逐渐远离它的利比亚文古体，而“古蒂菲纳格”文则仍和它颇为相近。因此，我们在确定附有文字的叫作“利比亚－柏柏尔”时期的岩石壁画年代时必须特别慎重，否则可能出现严重错误。面且，柏柏尔语和字母可能也曾被黑人居民使用过。

---

⑮ 帕切－卡普托(Pace-Caputo)和塞尔基(Sergi)，1951 年，第 443-504 页；祖赫雷尔(L.G. Zohrer)，第 4-133 页；布里格斯(L.C. Briggs)，第 195-199 页；查姆拉 (M.C.Chamla)，1968 年，第 181-201 页，有一篇分析“廷·希南女王”遗骨的文章，第 114 页；J. 德桑热，1975 年，1976 年，1977 年。参看 B.阿马利用中世纪阿拉伯文献解释图阿雷格人的起源。

⑯ 康(G.Camps)，1969 a，第 11-17 页。

⑰ 卡巴纳斯(R.Cabannes)。

⑱ G.康对这一情况作了明确的叙述，1974 d，第 221-261，320-341，345-347 页。

⑲ 加朗(L. Galand)，1969 年，第 171-173 页——一般书目；同一作者编的大事年表：1965-1970 年；阿普尔盖特(J.R. Applegate)，第 586-661 页，拜农(J. Bynon)，第 64-77 页；查克尔(S.Chaker)；L.加朗，1974年，第131-153 页；G.康，1975 年。

社会－政治组织

气候的限制当然使大多数撒哈拉人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定居点就是如最初阿拉伯征服者所看到的那些。同那个发展阶段相适应，部落组织是基本的政治单位[20]。但这种组织引起了不断的战争——希罗多德和托勒密对此都有明确记述。

然而，有两个地区，即阿哈加尔高原和费赞地区，我们有更可靠的材料。

在阿哈加尔高原，我们纪元四世纪下半叶居于社会政治金字塔顶端的是一位妇女。当她那座完整无缺的陵墓在阿巴莱萨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立即联想到当地的传说：很古很古的时候来自摩洛哥塔菲莱特名叫廷·希南的女王，就是图阿雷格人的祖先。因此，廷·希南这个名字将永垂不朽。[21]在柏柏尔人世界，好几起最高权力归于神圣妇女的事例；无论如何，在图阿雷格人社会里，对妇女的态度是开明的。这位女王的陪葬物品——七只金手镯，八只银手镯，几件其它珠宝——根据一枚君士坦丁皇帝时罗马钱币的图纹来看，大致可以定为313年至324年之间。至于陈放尸体的木床，经放射性碳素测验，表明其年代为470年（正负误差130年）。我们将可看到，这位贵妇的财富只能用她在社会等级中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中所占的优越地位来解释。

522

在奥巴里沙漠和迈尔祖格沙漠之间狭长的肥沃谷地，从艾卜耶德河至廷阿本达之间，一系列的绿洲星罗棋布。加拉马（现在的杰尔马）是主要城市。加拉曼特人从这个安全地带出发，很快称霸整个费赞（古代的费赞尼亚），并向周围许多游牧的和定居的部落征收贡品。在希腊－拉丁文献中称作加拉曼特王国的这个庞大的地区性实体看来是非洲内陆唯一有组织的国家，它位于先属于迦太基、后归罗马的领土的南面。考古工作已证实这个王国的威望和财富，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很出名。在极为广泛的领域都听到人们提起加拉曼特文明。这个文明很可能有着等级森严的部落组织，沿袭柏柏尔人的社会－政治结构，其顶端是一位拥有无上权威的阿古克立德（agueklid）。加拉曼特人——早在我们纪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就曾提到他们——曾抵御罗马人对马格里布南部边界的入侵。他们在我们纪元前19年被科内利乌斯·巴布斯打败，最后在我们纪元69年被罗马总督瓦莱里乌斯·费斯图斯打败，从此似乎就沦为罗马帝国的附庸。在加拉马及其周围的考古研究表明，那里存在过一个约达十个世纪之久的文明——从迦太基时代最后期（我们纪元前二世纪）起，到阿拉伯人的到来（我们纪元七世纪）止。这个文明部分地是建立在对外关系上。[22]

因此，不仅在阿哈加尔高原和费赞，而且在北撒哈拉全境，在最后时期的阿杰尔高原，或许甚至在伊福拉斯高原，古代的最高政治权力毫无疑问都是掌握在白色或接近白色人种的贵族手里；他们手持长矛、短剑、长刀，身穿武士铠甲，乘在列队前进的战车上，从事狩猎或征战；受害的是尼格罗人或黑色种族群，他们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由于缺乏文

[20] 卡波-雷伊(R. Capot-Rey)，第204-367页。

[21] 雷加斯（M.Reygasse），第88-108页；H.洛特，1955年；G.康，1965年，第65-83页；1974c，加斯特(M. Gast)，第395-400页。

[22] 帕切－卡普托和塞尔基；艾尤卜(S.Aiyub)，1962年，1967 a；1967 b，第213 219页；丹尼尔斯(C.M.Daniels)，1968 b，第113-194页；冯·弗莱施哈克(H. von Fleischhacker)，第12-53页；C.M.丹尼尔斯，1965-1973年；1972-1973年，第35-40页。

献，现在还不能说和尼日尔－乍得疏树热带大草原接壤的撒哈拉各边缘地区的情况是否也是一样。白人的影响很可能没有深入到这些地方。

至于宗教，毫无疑问，整个撒哈拉的中部和南部仍信奉万物有灵论。只有撒哈拉北部的人因为和地中海世界有直接接触，才有可能在古代晚期改信基督教。一位古典作家断言，加拉曼特人和马库里泰人是在第六世纪末改信基督教的，㉓但考古调查迄未证实这一点。

撒哈拉古代艺术

523

极其精美的杰尔马古迹（大部分是墓葬建筑）看来受罗马的影响很深，因而部分地丧失了独创的风格。要欣赏撒哈拉的特有风格，我们必须到别处去探求。

许多墓葬建筑被称为"伊斯兰时代以前"的建筑。在阿哈加尔高原上至今犹存的阿巴莱萨殿宇里，我们发现廷·希南女王的陵墓周围有一道回廊，特别具有非洲建筑风格。㉔阿杰尔高原东南出口处的廷阿勒库姆，有一组具有传统撒哈拉风格的圆形坟墓，其陪葬品是四世纪罗马时代的物品，由此可以断定其年代。附近的加特墓地上相似的墓葬建筑也可以用这个办法确定其年代。㉕

在阿杰尔高原和阿哈加尔高原发现的用不加灰泥的石块建成的墓葬或敬神的建筑——平铺的地面、圆形有墙的围场、装饰用的盆状物、"锁眼"（key-holes）——虽不能准确断定其年代，但它们是属于整个这一时期的，直到伊斯兰教到来之后才代之以平顶墓和简单的石柱。至于它们当中最原始的、在法德伦发现的那些建筑，其风格应溯源于费赞和沿埃及边境一带。

在撒哈拉西北部，在贝沙尔附近的朱尔夫图勒拜墓群——可惜遭到游客的破坏——那些大建筑里，甚至还可以找到奇特的带有图象的还愿奉献物；经过雕刻或彩绘的石板，有的刻有利比亚文，有的画有马或人物，其风格和马格里布古代晚期作品相似，但尚无伊斯兰文化的成分。

在阿哈加尔高原发现的那些呈环形直立的石柱群，其年代更难断定（它们是否已经是穆斯林作品了呢?），在提贝斯提以西的戈纳奥卡和恩内里莫克图发现的那些尤其如此。我的意见是无须寻找外来影响，因为竖立糙石巨柱，或是为了葬事或是为了拜神，在所有早期文明中都很常见。在这方面，整个撒哈拉地区以通迪达鲁的遗址（廷巴克图西南150公里的尼亚丰凯附近）最为突出。㉖

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撒哈拉艺术，首先要数岩石壁画。按照史前史学家的传统分类法，所谓古代就是岩石艺术的倒数第二阶段——利比亚－柏柏尔时期，即在卡巴林时期之后、阿拉伯－柏柏尔时期之前那个时期。㉗尽管这种先后次序本身没有错，但它缺乏确切的纪

524

㉓ J.德桑热，1962年，第96及257页。

㉔ G.康，1961年，全书都可找到，1965年。

㉕ 莱希(L.Leschi)，第183-186页；帕切－卡普托和塞尔基，第120-440页。

㉖ 萨瓦里（J.P.Savary）。关于朱尔夫图勒拜带有图像的石柱实际上无论述文章；M.雷加斯，第104和107-108页；承巴卢(L.Balout)提供补充材料。关于提贝斯提那些大石柱，见瓦尔(P.Huard)和马西普(J.M.Massip)，第1-27页；关于通迪达鲁，见R.莫尼，1970年，第133-137页。

㉗ 一般采用的分类法(布日耶〔Breuil〕，格莱希奥西〔Graziosi〕，瓦尔，洛特等)；参见R.莫尼，1954年。对立观点见梅特(J.P.Maître)，1976年，第759-783页。

年基础，而把利比亚－柏柏尔时期的年代定为我们纪元前200年至我们纪元700年之间，则更是根据不足。出现古蒂菲纳格文的字体或许是最有把握的标准，虽然这种书写体一直使用到穆斯林时代。既然马和有轮车辆仍然同时并存，所以很难按年代把它们划分开来。费赞和阿杰尔高原上奔驰的战车是属于可以追溯到我们纪元前十四世纪的埃及传统呢？还是属于最早是在六世纪才获得的希腊－昔兰尼加传统？骆驼画在撒哈拉地区几乎到处都有，但它们的年代也难以断定。恐怕这类画极少属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历史时期。利比亚－柏柏尔时期的作品是吸收了新石器时代作品的优良传统发展起来的，是新石器文化的遗迹；它们证明当绘画艺术在撒哈拉以北濒于灭绝之际却在撒哈拉地区茁壮成长。

经济生活。内部交通和对外关系：一次骆驼革命？

自远古以来，撒哈拉的经济生活就和交通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古典时代，象费赞这样一些地方之所以能够致富，和它们的势力范围有关，而其先决条件是由于存在着相当大量的贸易。我们知道这些地方的内部贸易原是有很有限的，所以出现这种繁荣的原因必须从它们和外部世界的往来中去寻找。这种新情况和史前时期气候湿润的撒哈拉的情况截然不同。

但是用什么方法来全面研究这个问题呢？估计某个区域的经济地位及其影响，我们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只需研究周围地区出土的古文物就行了。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东北欧（亦即整个古典世界的北部边缘）发现了大量罗马钱币，而且在更远的地方，在印度河沿岸和在越南，也有发现，这就证明罗马对外贸易遍及广大的地区。但是关于目前讨论的这个地区，我们能够了解到什么呢？我们离开北非本部越远，出土的罗马文物就越少，到了撒哈拉南部就完全绝迹了。迄今为止，在尼日尔－乍得疏树热带草原无任何发现㉘。这说明，在古典时代，罗马世界和非洲黑人地区实际上没有接触。

525 这一点当然不是绝对肯定的。未来的考古发掘可能会提供新的材料，但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会存在很多疑点的。

例如：古代作家们极少谈到撒哈拉的物产，他们的看法已由考古学所证实。某些希腊或拉丁文献提到红宝石或玉髓，那是产自加拉曼特人、特罗格洛迪特人或纳萨莫内人的住地，即现代利比亚以南的地方。那里可能还有叫作天河石的宝石——在提贝斯提东北的多洪山区的埃古西祖马发现一个天河石矿㉙。

我认为，这一带地方的主要财源是捕捉野生动物。当然，那个时代的北非也是到处都有狮子、老虎、羚羊和鸵鸟。但是由于罗马人的需求太大，猎区必须扩大到非洲内陆地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颇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一世纪末，罗马的弗拉维亚圆形剧场举行落成典礼时，斗兽计有9000只；罗马皇帝图拉真为庆祝他在106年的胜利展出了11,000只野兽。这些野兽绝大部分产自“利比加”或“阿非利加”，即从北非运出的㉚。在进口的

㉘ 勒伯夫（J.-P. Lebeuf），1970年，有全面的科学评述和书目。热带非洲某些地区早已有自己的文化（尼日利亚北部的诺克文明）．见R.莫尼，1970年，第131-133页；基－泽博（J.Ki-Zerbo），第89页，第90页。

㉙ 莫诺（T.Monod），1948年，第151-154页；1974年，第51-66页。在尼罗河流域也有同样的宝石。

㉚ 詹尼森（G.Jennison）；埃马尔（J.Aymard）；汤因比（J.M.C. Toynbee）。

野兽中，大象和犀牛来自撒哈拉最南部的一些地方，甚至来自乍得和加扎勒河地区[31]。无论如何，在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中，象牙必然已经占有一定地位，因为到我们纪元二世纪时，北非的大象已几乎完全绝迹。然而，人们不会忘记，努比亚按一定数额向罗马提供野兽。

我感到难以置信当时就有向欧洲贩卖黑奴的交易。西罗马帝国境内当时并没有les罗黑奴。人们常说，来自马里和几内亚湾的运输队向欧洲市场供应砂金，认为这是中世纪贸易情况的先兆[32]。但这种说法仅是假设而已。我们手头有罗马和拜占庭时代黄金产地一览表，其中从未提到过阿非利加。但人们完全可以设想：塞内加尔与摩洛哥南部之间多少会有一些秘密黄金交易，因为这个地区本身既产黄金又和罗马边境远远隔绝，而阿拉伯人早在734年就迅速同这个市场建立了联系。

上述为数不多的贸易关系尚未为人们完全了解，这使人们对撒哈拉各条交通线路有何用途产生了疑问。对此，我们仍然需要审慎。当我们设法重现古代交通网的面貌时，我们仅有的几个依据是：盖达米斯或费赞尼亚等这些天然交通干线的枢纽；罗马文物在撒哈拉各地的分布情况；并把这些情况与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以前和以后的商队路线进行比较；不过，最后两方面尚存在困难。 526

当然，发现一件孤立的罗马文物，特别是一枚钱币，本身并不能引出任何结论；撒哈拉北部的居民十九世纪时仍在使用罗马钱币[33]。但是，如果发现罗马文物的地点在空间上形成某种格局，而且很可能与其他资料中所说的商队路线有联系，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对这些地点加以考虑了；因为不仅涉及钱币，而且涉及坟墓里的陶器。因此，这些物证分布的地区表明，加拉曼特文明(其本身发展依靠它同罗马的关系)的影响曾扩大到数百里以外。必须说清楚，这纯粹是加拉曼特的影响，严格地说并不是罗马的影响，尽管它为罗马器物的分布提供一条居次要地位的路线。这里，我们看到了古代撒哈拉的最突出的特点。当地各族人民通过毗邻集团辗转互相了解。无论最初促使他们发生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很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搜寻货物在罗马出售。由此看来，廷·希南女王的陪葬物品是有代表性的；可以认为那是替这位当地首领征集的一套外国器物——她对于经过其领土的人无疑要征收过境税。后世的图阿雷格人肯定是这样干的。

一般说来，撒哈拉对外贸易的交通路线似乎大部分是向北行和向东北行的，而加拉曼特人及其臣属的货物则是输往费赞地区的。从那里，业经证实的交通线通往锡尔特的各大港口：塞卜拉泰、伊亚和大雷普蒂斯。这些港口早在迦太基时代就已经是很富的城市了。从加拉马，人们还可以进入尼罗河流域——或是经由北线，通过古代作家已经熟悉的地点宰维莱、泽拉、奥季拉和锡瓦等绿洲；或是经由更靠南的一线，以基夫拉为交叉路口[34]。在撒哈拉东部这些地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到新石器时代和史前时代的交通情况这个老

[31] R.莫尼，1955年。在大雷普蒂斯（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首都和港口），该市的图腾实际上是一只大象；1940年，第67-85页。J.德桑热，1964年，第713-715页：罗马皇帝多米西恩的钱币跟弗拉维亚圆形剧场同时代，钱币上面有一只双角的非洲犀牛。据认为，阿吉辛巴可能同阿兹宾一词——当地人对阿伊尔山脉的称呼——有关。但不能肯定当时在那部分撒哈拉地区是否仍有犀牛存在。另外，阿吉辛巴和阿兹宾很可能是在广大地区流传的一对语音上同源词。

[32] 卡科皮诺(J. Carcopino)，1948年。

[33] R.莫尼，1956a，第249-261页。

[34] J.勒克朗，1950b，劳(R.C.Law)，第151-200页；R.雷比法，1970年，第1-20页。

问题，当时提贝斯提是交通线上的补给站[35]。但是看来这种往来关系衰退了，先是因为希

527 腊的贸易，后来因为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贸易越来越多地转向地中海沿岸[36]。

或许在撒哈拉东部我们也应当寻找把铁引进黑人世界的那条路线，因为这种事情是不会孤立发生的。撒哈拉和尼日尔地区，石器时代过渡到金属时代无疑是发生在目前讨论的这个时期，这个过渡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由在这方面也是各地的情况不一。在同一地区，比如在毛里塔尼亚，已找到证据，说明在我们纪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石制和金属制的器具同时存在。石器发现于宰迈莱特巴尔卡、哈西拜尔努斯和瓦迪宰加格（对阿克儒特地区的附属材料和铜器作了碳-14年代测定）[37]。铜器制作可能是受苏斯(摩洛哥南部）工业的影响，那里的工业可能早已存在。但是，金属制造的产生，至少是金器和铜器的出现也有可能是本地的现象。

炼铁工业问题就不同了，因为它需要更高的温度和更复杂的技术。人们不会忘记，冶铁工艺从高加索传到西欧地区是经过好几个世纪才实现的。因此，冶铁工艺究竟是怎样在黑人世界出现的这个问题争论很大。有些人坚持认为，它是非洲特有的发明创造；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随着外国的干预而传入的。坚持后一种说法的人又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是由于地中海地区的影响经由撒哈拉中部传来；另一派则认为这种工艺来自库施国，是沿尼日尔河至尼罗河流域那条天然通道经由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传入的。即使如此，但碳-14测定的年代表明，在我们纪元前第一、二世纪，乍得和尼日利亚北部就已经有了冶铁工艺。冶铁工业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这种可能性不应马上予以否定。但假如情况并非如此，那就很可能是由麦罗埃文化传来的[38]，那就不涉及撒哈拉中部的交通线了。

研究运输工具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撒哈拉交通线的位置和验证某些假设。我们知道这个大沙漠先是被马征服，然后才被骆驼征服。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卡巴林”时期在撒哈拉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使用有轮的车辆。我们不知道四轮货车和双轮马车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但据希罗多德说，加拉曼特人当时仍在使用这两种车辆。考古学家证实了他的说

528 法。各式各样的有轮车辆的图画在撒哈拉大量存在。系统整理一下这些图画甚至有可能画出当时穿越撒哈拉的各条马车路线图[39]。尽管我们不应当被这些线索弄得眼花缭乱，我们却必须承认，除了同大西洋岸平行的西线——从我们的古典资料来看，它的作用并不活跃——以外，经过文献或考古材料证实的一些古代旅程道路正好同初史时期那些著名的路线相符。还应补充一点，凡是供马(不论是否套上挽具)使用的通过撒哈拉的路线都需要有

---

[35] 贝克(P.Beck)和P.瓦尔。古斯丁斯基(T.Gostynski),第473-588页。

[3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3-1967年；G.康，1978年。

[37] 兰伯特(N.Lambert)，1970年，第43-62页；G.康，1974 d，第322-323和343页。

[38] 参阅R.莫尼著作中的参考书目第66-76页；参阅J.勒克朗，1956 b，第83-91页；戴维森(B.Davidson)，1959年，第62-67页；P.瓦尔，第377-404页；科纳万(R.Cornevin)，第453-454页。

[39] R.莫尼著作中的一般目录，1970年，第61-65页；H.洛特，1970年，附录第83-85页，这些画不够清楚、详细，也不够均匀一致，不能据此作出肯定的结论。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加拉曼特式的双轮马车，只在费赞和阿杰尔高原发现。而且，这些车似乎是专供检阅用的，用木材和皮革制成，就斯普鲁伊特的复制品来看，重量不超过30公斤，因而不适用于运输商品（G.康，1974 d，第260-261页；J.斯普鲁伊特，1977年）。我不相信这种加拉曼特式的双轮马车是受克里特入侵者的影响。这些入侵者约在我们纪元前第二千纪之末某个时候就在利比亚沙漠消失了。这些路线本身尚难肯定：它们很可能不过是大致的方向，更不要说那种怪诞说法认为罗马人曾乘坐这种双轮马车到达尼日尔（H.洛特，1970年）了。有些作者甚至根本不同意这些路线曾经存在过，继P.瓦尔之后，有R.科纳万，第453页；G.康，1974 d，第346-347页。

一系列饮水地点(我们知道，加拉曼特人拥有这种饮水地)，要不然就需要运输大量粮草。

至于骆驼——更确切地说是原产于近东的单峰骆驼——只是到了很晚时期才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出现。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40]。在非洲大陆，骆驼确实来得很晚。在埃及，直到波斯帝国和古希腊时期(我们纪元前四、五世纪)才发现有骆驼。设想骆驼是由尼罗河下游地区传入撒哈拉也象是可信的。但看来确定这件事情的年代很困难。我们所能依据的只是利比亚-柏柏尔人的撒哈拉岩石壁画——这些东西对查找确切的年代没有什么用处——和罗马统治下的北非留下来的大量铭文和雕刻，而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我们纪元二世纪以后的东西。另一方面，罗马港口奥斯蒂亚有一座有着雕刻图案的石碑，年代是我们纪元一世纪最后 30 年的，上面有用来在竞技场表演的大象和骆驼。我们纪元前 46 年，恺撒已在非洲俘获过努米底亚国王尤巴一世的 22 只骆驼，而尤巴一世属下各邦当时扩张到了撒哈拉边缘地带。骆驼在当时也许仍然是珍贵的动物。但是，假如在 150 年以后运进罗马的骆驼真是来自非洲，由于当时在马格里布地区骆驼仍很少见，那么它们必定是大量存在于撒哈拉，而且是从那里得来用于竞技的。

让我顺便提一下著名的叫作“斯平特里安”的那种罗马钱币——这种钱币很可能是为高等妓女使用铸造的——上面有骆驼的图像；古人认为，这种反刍动物有颇为罕见的情欲本能。 529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在撒哈拉越来越多地使用骆驼是异常重要的现象，我倒是同意这个看法。这种动物脚板柔软，能适应各种地形，它的机体新陈代谢能分泌水分，所以它特别善耐饥渴，因此它对所有的游牧民来说，真是天赐宝物，因为当天气日益干旱时，马的缺点会给他们造成严重困难。使用骆驼就等于个人和群体增大了机动性，这种好处在阿拉伯半岛早已得到承认。人们甚至认为，改变套骆驼的方法，特别是改变鞍的位置，就有可能训练出“赛驼”，亦即供参加比赛和用于作战的骆驼[41]。

撒哈拉大沙漠的所有地区都有大量“骆驼的”岩石壁画——可惜年代很难断定，不过其工艺水平显然比精致的“卡巴林”壁画晚得多。由此可以判断，骆驼的使用是在几个世纪中缓慢而按部就班地传播开来。虽然古典文献从未提到加拉曼特人及其臣民拥有这种动物，但他们必然终于用上了这种宝贵的助手。他们之所以能够同最遥远的地区保持经常的贸易关系，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在加特和阿巴莱萨地区出土的所有罗马文物都属于四世纪，这也许不仅是偶然现象。在这个时期，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北部也有大批骆驼。罗马当局通常可以在那里征用 4000 头，由雷普蒂斯城负担费用。有了骆驼还大大提高了各地游牧民进攻罗马领土的潜力。

罗马的“撒哈拉政策”

由于缺少文献，我们无法知道古迦太基对它的南部边境上出现的强大部落是否感到很

[40] C.库图瓦，1955 年，第 98-101 页；肖恩堡 (K.Schauenburg)，第 59-94 页；戴莫戈特 (E.Demougeot)，第 209-247 页；H.洛特，1967 年，第 57-89 页；科伦多 (J.Kolendo)，第 287-298 页。

[41] T.莫诺，1967 年。

惊慌。加拉马的出土文物表明，至迟在我们纪元前第一、二世纪，当时属于努米底亚王国的锡尔特沿岸各港口同费赞就已有贸易往来，它们的财富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种贸易关系取得的。

人们对罗马的历史比较熟悉。罗马政策的大致方针可以概括如下：占领马格里布的农业地带需要在其以南有战略掩护。在这些地区，有撒哈拉各游牧部落的骚扰。他们季节性地迁徙进入已经殖民的地区。这对他们是生死攸关的事，因而无法避免。这种迁徙有它的作用，可使定居者得到大草原和沙漠的产品，但也总是带来同定居部落发生冲突的危险。530 甚至连远方的加拉曼特人似乎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成为游牧部落侵略力量的后援。只要他们力量强大就是一种威胁。

在整整四个世纪里，特别是在帝国晚期，罗马历史提供的大量事例说明，来自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南部边境地区的撒哈拉人，象奥斯图利亚人、马尔马里德人，特别是马齐塞人这样一些骑骆驼的游牧部落，常使利比亚沿海和埃及诸绿洲惶惶不安[42]。这既表明他们的流动性很大，也表明他们的袭击范围确实不小。

为避免这种双重危险，罗马战略的第一步是迅速打垮撒哈拉地区最强大的几个国家，从而切断各游牧部落的后方基地。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纳萨莫内人和加拉曼特人被彻底降服。那时以后，在二、三世纪，所需要的只是保卫已经殖民的领土，办法是尽量利用地形建起一个由众多堡垒、斜坡和交通线组成的强大的防御网。这就是为什么罗马边防线的形状很不规则的缘故，它以惊人的战略技巧保卫着地中海沿岸非洲各省份[43]。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撒哈拉北部的游牧部落置于控制之下。

然而事实证明，绥靖只是暂时的。从第四世纪以后，骑骆驼的游牧民到处敲打帝国的大门，甚至比过去有更大的威胁，搞得边防驻军每天精疲力竭，难以抵御。

其后果很清楚。在驱逐罗马统治的过程中，撒哈拉人曾起过作用，虽然这一过程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因此，如上所述，尽管我们拥有的资料很不完备，但对于古代的撒哈拉，我们并非毫无所知。有几点是肯定无疑的。气候干旱化并未置沙漠于死地，人类的活动继续进行。语言和文字在那里巩固下来了；骆驼的使用使交通运输的困难越来越得到缓和。这一地区在地中海沿岸诸大国的历史上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热带非洲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无疑，正是由于这种不断发展的关系，中世纪的复兴才得扎下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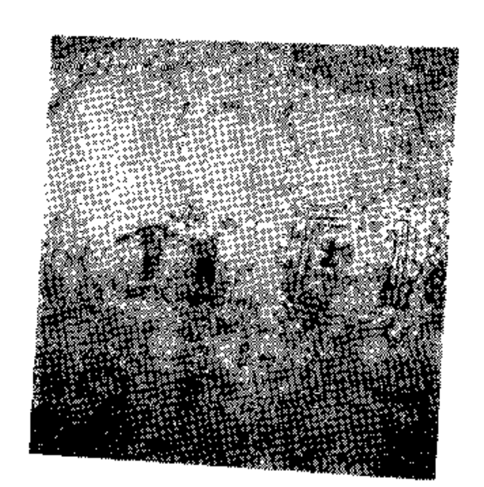
（刘衡芳译）

㊷ J.德桑热于1962年和L.克拉科－鲁吉尼于1974年搜集的文献与铭文。

㊸ 就古罗马边防带论罗马和撒哈拉之间的接触问题。关于毛里塔尼亚，参看P.萨拉马，1953年，第231-251页；1955年，第329-367页；1976年，第579-595页；同上作者的其他著作。关于努米底亚，参阅J.巴拉德兹（J. Baradez）。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参阅迪维塔(A. di Vita)，第65-98页；R雷比法，1972年，第319-3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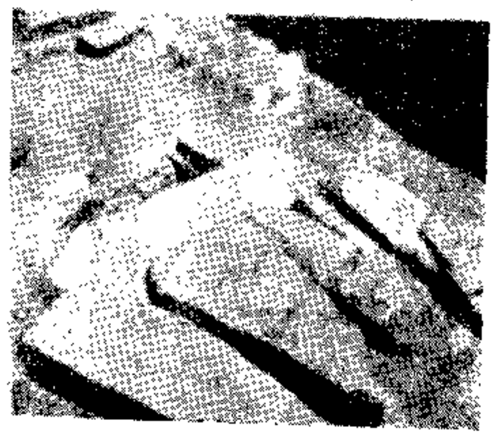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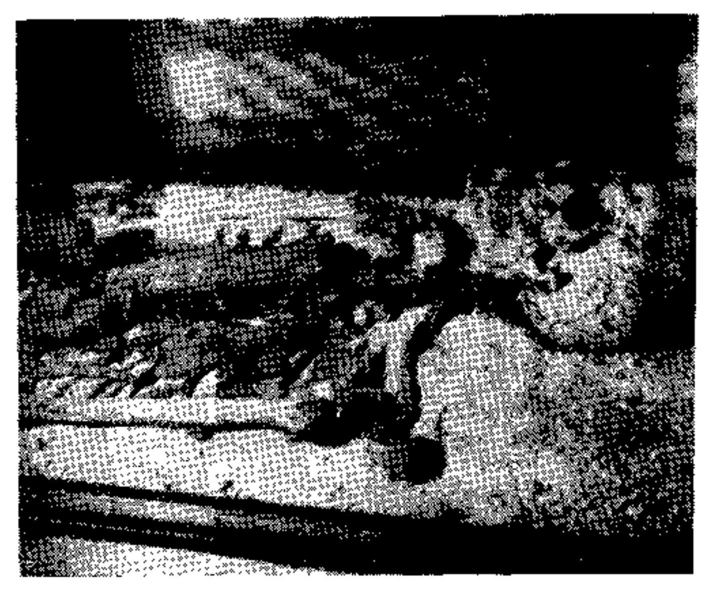
图片 20 1 定岩石画年代的标准是以其风格与色彩为基础。不过，后来各时期的年代很难断定。上面三个图例出自塞法尔(阿杰尔高原)，据说创于“利比亚－柏柏尔”时期。事实上，用“古蒂菲纳格文”刻的铭文上有哈基姆和穆罕默德这样的伊斯兰教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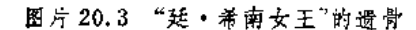


图片 20 2 位于阿巴莱萨的“廷·海南女王”陵墓：（1）正门；（2）盖地沟用的大石板

5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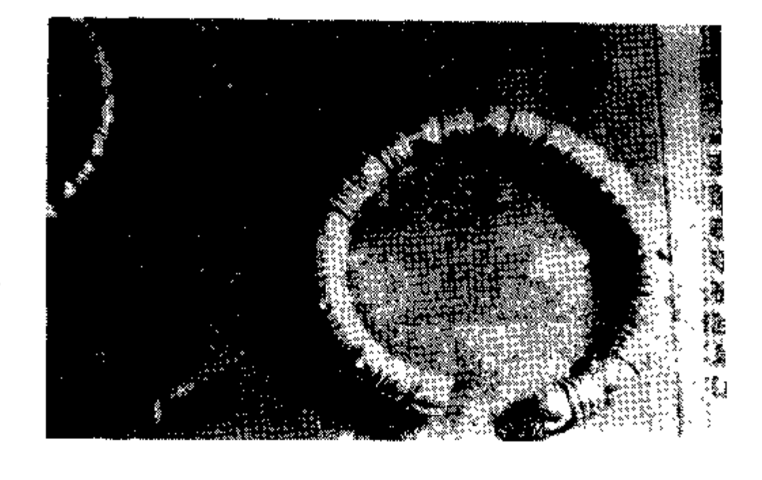
图片 20.3 "廷·希南女王"的遗骨







图片 20.4 出自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兹利坦的一个罗马镶嵌图案上加拉曼特人体形的人像。把俘虏扔给野兽这种场面一般的解释是罗马人在我们纪元 69 年打垮加拉曼特王国的尾声



图片 20.5 "廷·希南女王"的金镯

21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史前时代后期简介

M. 波斯南斯基

考古获得的情况

近来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进行的考古研究中了解到：在技术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民族曾同时生活于非洲各个地区。这是在这方面进行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之一。石器时代并非同时在各地一起终止，实行农耕作业的时期也各不相同，而且，我们在下面几章中将谈到的许多地区的居民，直至我们纪元一千纪末尾，仍然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使用的仍然是石器时代的技术。但是，任何社会都不是静止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跨越相当远的距离进行活跃的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接触表现得最强烈的地方，却是跨越人们本来认为最难跨越的障碍撒哈拉大沙漠进行的，而且这种接触竟然形成非洲历史上一种统一的力量。由于我们没有关于这个地区的确实的年代记载，因而为所讨论的这个历史时期的结束确定准确的年代是办不到的。年代还是有的，不过大都是通过放射性碳素（碳-14）测定出来的。测得的这些年代虽然还比较准确，但关于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时期，相差可达好几个世纪之多。记述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这几章，主要是研究通常称为"新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的情况，并非为这个时期规定一个终止的年代。按照这一定义，在大部分地区，这一时期的终止年代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所谓"新石器时代"这个名词，过去的用法各不相同，或是用来表示一种农业经济，或是用来区分不同的工具组合，其中包括磨制的切割工具、陶器、以及在许多情况下使用的手推磨或磨石，或者同时表示上述这两项内容。但早期的诸农耕群体不一定以同样的工具组合为标志。近来对非洲许多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工具往往具有超越自己所属时代的特点，例如磨制大石斧，在非洲某些地区首次出现是和狩猎与食物采集者约于七、八千年以前使用的那一套工具混在一起的。而在扎伊尔流域（韦莱河）大约在不到1000年前人们可能仍然在使用着同一类型的工具。看来，那些以狩猎与采集为生的人们远在他们自身成为农民以前，就通过和那些从事农业并使用陶器的邻居们的接触，而使用陶器了。在非洲几个地区，磨石首先是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上经常出现的，这些磨石同时还说明当时已能充分利用植物的残余。所谓铁器时代早期，我们指的是无间断地一直坚持使用铁器技术的时期，而不是偶尔使用铁器的时期。大体说来，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铁器时代早期的特点是比较分散的较小的定居点的出现，而不是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最早兴起是在铁器时代末期

534

5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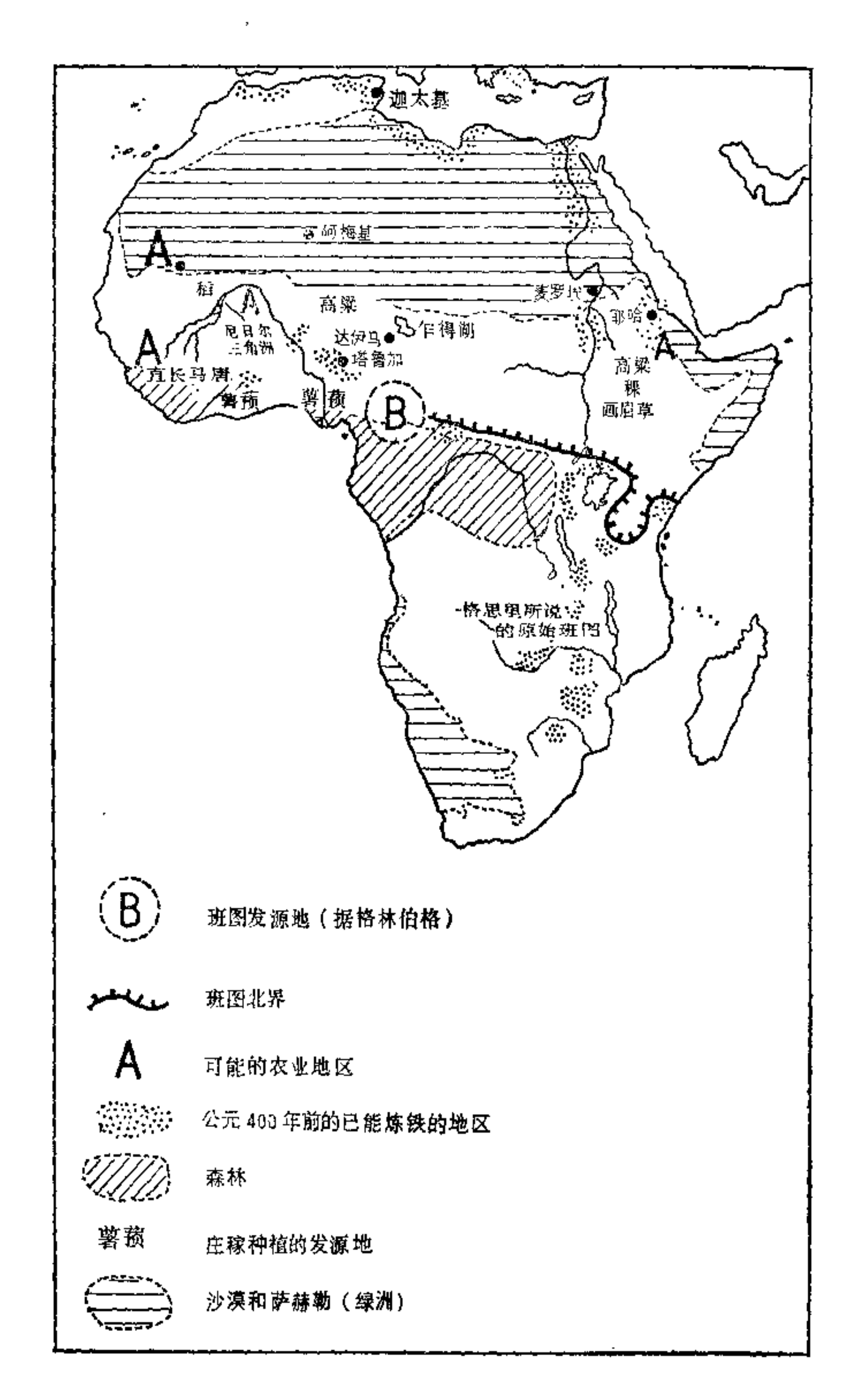


插图 21.1 班图发源地和炼铁术肇始地假说示意图

(波斯南斯基, 1972 年)。

遗憾的是，我们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居民的体质特征，知道得很少。可以肯定，早在我们纪元前十千纪，在西非(如在尼日利亚的伊沃-埃卢鲁)就有一些民族具有同这个地区的现代居民类似的某些体质特征了。这些民族被称为"原始尼格罗人"①。在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带都曾发现早在我们纪元前五千纪的尼格罗人遗骸。②在非洲南部，现代科伊桑人——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仍从事狩猎、食物采集和放牧的桑人和科伊科伊人——的祖先，身材比其后裔高大，他们占据的地区向北确曾远达赞比亚，甚至可能还达到扎伊尔东部的塞姆利基河。出自赞比亚圭绍遗址的极有力的物证就可说明这个情况，在这个遗址上出土的成套工具以及推断出来的食品单，都清楚表明这些人群是桑人的祖先，但是，4000 年前这群人的平均高度，要比现今紧靠博茨瓦纳西边的桑人高得多。③据利基于 1936 年所作解释，从大多数得自肯尼亚裂谷各遗址的我们纪元前六千纪的遗骸的体型看来，他们更接近埃塞俄比亚地区的人，而不是更接近现今说班图-尼罗特语的各族。而这些只是将近 50 年前研究出来的情况，早就应该重新评价了。辛格和韦纳④所作的生物起源论研究指出，桑人和尼格罗人互相接近的程度，大于他们和任何其他种族群接近的程度，因此可以认为他们就是石器时代非洲原始居民的直系后代。他们还指出，从西非一直到南非，各地非洲居民在生物学上都属同种。希尔诺⑤根据对非洲医学扩大研究得到的大量遗传学数据进行透彻而精密的分析，指出大多数非洲居民都有共同的特征，从而证实了在撒哈拉以南地区长时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着体质和文化上的接触。只是在一些边远地区如俾格米人居住的扎伊尔森林，或桑人居住的卡拉哈里区域，那些居民才具有较大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只有遗传上的隔离状态才能解释。在象萨赫勒地带这样的地区以及在东北非洲边缘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上，则存在着混合人种，在很大程度上是尼格罗种居民同其他独立于南方居民之外发展起来的居民之间的混合，例如在马达加斯加岛上是同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相混合，在非洲东北部和撒哈拉则是同与地中海周围和西南亚的居民有血缘关系的人相混合。 536

语言学方面的贡献

了解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铁器时代早期情况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首先要对语言背景有所领会。大多数考古学家为解释他们自己掌握的情况，都不得不引用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在我们探讨的这个时期中，有两组主要情况值得重视：第一，用格林伯格的说法，⑥就是刚果-科尔多凡语系的分裂；第二，讲班图语的人的扩散——现在从比夫拉湾到东非沿海的马林迪周围这条线以南 90% 以上的居民是班图人。关于第一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只能说科尔多凡语各分支都很古老，数目繁多，使用这些语言的那些人群往往都很小、有些

① 布罗思韦尔(E.W.Brothwell)和肖(T.Shaw)，第 221-227 页。
② 查姆拉(M.C.Chamla)，1968 年。
③ 加贝尔(C.Gabel)。
④ 辛格(R. Singer)和韦纳(J.S. Weiner)，第 168-176 页。
⑤ 希尔诺(J.Hiernaux)，1968 a。
⑥ 参见第一卷，第十二章。

人群甚至非常零散，各群所用语言与其邻居不同。所有这些人群都住在现代苏丹共和国科尔多凡省范围以内，而且大都集中在努巴山周围。科尔多凡语各支都是从尼日尔－刚果语系派生出来的远支，而且和它们周围的语群并无联系。至于科尔多凡语从原始刚果－科尔多凡语系中的尼日尔－刚果各种方言中分裂出来的年代表，我们提不出什么有用的材料，只能说这大约是在我们纪元前 10,000 至 8000 年以前的事。

尼日尔－刚果语系的分裂，也许和撒哈拉日益干旱化、各民族逐渐从萨赫勒向南扩散有关。佩因特⑦给这一分裂过程定出一个年代，即约在我们纪元前 6000 至 3000 年间。不过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阿姆斯特朗⑧曾提出，尼日利亚南部的语言有长至1万年的历史，这个看法意味着向南的大迁移比上述时期要早得多。当然，这两种看法可能都对，因为情况可能是这样：某些讲尼日尔－刚果语的人从人群主体中分裂出来以后就在丛林中过起与世隔绝的生活了。这些人可能就是伊沃－埃卢鲁原始尼格罗居民在语言上的同族。其他讲尼日尔－刚果语的人，是在建立起一种农耕生活方式之后，才从萨赫勒分散出去的。关于这种解释有一个问题，即看来在萨赫勒最早的食物生产者并不是从事农耕的人，而是从事放牧的。萨顿在第二十三章中⑨所提意见也许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这是因为，有证据说明萨赫勒的放牧者同鱼叉以及业已证实系水上作业用具的其它一些东西有关。不过，尼日尔－刚果语系内部出现分支，看来和主要是从事农业的各个人群在地理上的分隔有关；这种分隔出现在遥远的古代，因而尼日尔－刚果语系各个组成部分都有足够时间发展起自己独特的语言。

537

但当我们研究班图语时，遇到的情况却不同。在非洲东部、南部和中部有两千多种班图语，各种语言在词汇和句子结构方面都相同，由此可知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早在 1862 年就被布勒克识别出来了，"班图语"这个名称就是布勒克为这些语言起的，因为在这些语言中通常都用"班图"这个词指人。远在 1889 年，迈因霍夫就已辨认出班图语和西非诸语有联系，那时人们称西非诸语为西苏丹语。各种班图语之间的差异远远不及西非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那样大，大多数人估计这些差异大约是在两三千年以前出现的。关于班图语究竟是怎样从其他西非语言中分离出来的问题，在语言学上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其中有两种说法更经常被人们接受。约瑟夫·格林伯格⑩把非洲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他是从宏观方法入手的，并使用了约从 800 种语言中取得的词汇上和文法上的证据。从这些语言中，他通常都可识别出 200 个词素或称核心单词，他认为这些就是词汇中的基本成分，这类单词是幼儿从母亲学话时就学的，例如简单的数字，人体的各个部分，简单的人体功能如睡、吃、撒尿等等以及幼儿周围的外部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如大地、水和火。在使用这类核心单词时，他发现班图语接近其他西非语言的程度，大于英语接近原始日耳曼语的程度，而后两者的关系语言学家一直认为是很密切的。他计算出班图语词汇中有42%在今天仍然存在于最接近的西非语言中；对比之下，在原始日耳曼语中的英语词汇则只有

---

⑦ 佩因特(C.Painter)，第 58-66 页。

⑧ 阿姆斯特朗(R.G.Armstrong)。

⑨ 还请参见萨顿(J.E.G.Sutton)，1974年。他认为，"以前在具有适度的潮湿多雨环境的时期，水上生活方式曾得到扩散，进行这种活动的是原始的尼罗－撒哈拉居民"。

⑩ 格林伯格(J.H. Greenberg)，1963 年；同作者 1972 年，第 189-216 页。

34%。他因此作出结论说,"班图语甚至不能算作一个单独的原始语族……而是属于诸语族中的一支……即贝努埃混合语或半班图语。"⑪ 于是他就把班图语的发源地牢牢地规定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交界地区。已故的格思里教授⑫ 则是在若干年中埋头班图语的比较研究之后,从微观方法入手,分析了近 350 种班图语和方言。他把至少在三种互不相同的语言中意思相同的同源词汇的词根分离出来。从分离出来的 2400 组词根中,他发现其中 23% 是"通用的";也就是说,这些词根分布在整个班图语区。另有 61% 则只是在"特定"的比较狭窄的地区才使用。他用这些组通用词根,制成常用班图语索引,标明各种班图语中通用词的百分比。这样划出的等语线(即连结相等的班图语指标的线)表示出班图语保持率超过 50% 的核心地区,是位于赞比西和扎伊尔二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带的扎伊尔森林以南大草原上的一个地区。他认为原始班图语最初就是这个核心地区发展起来的。原始班图语向外扩散或称分裂,就是从这个原始班图语发源地开始的。他还研究出两种原始班图方言,即东班图语和西班图语,这两种班图语中含有他指出的那些同源词的60%以上。他利用这些单词来试图弄清楚说班图语地方的环境。他发现表示"用一条线钓鱼"、"独木舟"、"桨"以及"打铁"等义的词都很通用,而表示森林的原始班图词指的是丛林,并不是茂密的森林。于是他指出,原始班图人在扩散以前,已经会打铁,居住在原始森林的南边,并已熟悉船只和河上生活。在格思里的图解中,西北班图语(格林伯格所说的发源地区)在他的班图语索引上只占 11－18%,因此,这种语言只是原始班图语的遥远的后代,而不是它的祖先。不过他却同意,在遥远的古代在沙里－乍得地区居住着一群前期班图人。奥利弗⑬ 用图解说明格思里的想法,他曾假定一小群使用船只的前期班图人曾穿过森林打通一条路,到达南边的草原,在那里繁衍起来,最后就从那里向四面八方扩散了。

由此可见,关于班图语的远祖是在西非这一点大家看法一致,只是关于班图人究竟是从哪一个中心地点直接散布到各地去的这一点还没有一致起来。埃雷特⑭ 和少数其他语言学家曾在总的方面支持格林伯格,因为他们认为从语言学角度看来,语言上最纷繁的地区(此处是指在主要班图语地带西北方那个地区)很可能就是最初的聚居地。埃雷特还建议,应当重视格思里指出的那些词根,因为在设法划定班图语发源地时,有些词根一定比其他词根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埃雷特部分地以假定的讲早期班图语的人们的核心词汇为根据,赞同我们纪元前 1000 年以前曾存在一个森林发源地,早期班图人曾在那里耕种、捕鱼。多尔比⑮ 在细节上很不同意格林伯格,他设想出一个"西非语言分裂带",并把班图人列入这个地带。在这个地带以外存在某些语言的一致性,但在这个地带以内却是诸语纷纭,这个情况说明各族曾有迁移活动,结果造成讲尼日尔-刚果语和讲班图语的人们的扩散。愿意排出年表的那些权威人士可能会把班图人的扩散年代排在 2000－3000 年前的某个年代,并承认那些扩散者已使用铁器。同时,大家也都会同意,班图人的扩散十分迅速,有人甚至会说是爆炸性的。

⑪ J.H.格林伯格,1963 年,第 7 页。
⑫ 格思里(M.Guthrie),1967－1971 年,第 20－49 页。
⑬ 奥利弗(R.Oliver),第361-376页。
⑭ 埃雷特(C.Ehret),1972 年,第 1-12 页。
⑮ 多尔比(D.Dalby),1970年,第147-171页。

农业的作用

在讨论铁器在各民族大扩散这个设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前，还应当进一步加以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农业。在后数章中，这个问题将按地区详细讨论，但某些一般性的特征必须在这里谈谈。在类似导言的这一章中，只能介绍些梗概，至于详细情况，读者还可参考1972年非洲早期农业讨论会记录。⑯

和从事狩猎与采集活动的人们经常迁移的情况对比，农业却意味着人们可以对食物供应有某种控制和更为安定的生活。人群规模日益增大，从而有可能使更复杂的社会结构、最后还有政治结构发展起来。农业，特别是适于耕种的农业和园艺，一般也都意味着人口密度以及人口总数的增长。考古学家是通过直接和间接证据鉴定各个农业社会的。直接证据包括在考古遗址上发现的业已碳化的种子或谷类这些物证，或者使用象浮选分析法这类先进的考古学复元技术把它们复元；用孢粉学鉴别当时栽种的庄稼的花粉化石；以及对陶器上的种子印痕做出鉴定等办法。间接的证据，或称旁证，包括已发现的据认为是用来耕种、收割和加工植物食品的种种工具和器皿。遗憾的是，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绝大多数地区的气候条件有碍于更多直接证据的发现。有机物在被弃置后一般用不了多少天就分解了。热带遗址上的土壤整个说来都是多氧土壤，因而不可能把花粉保存下来。能找到花粉的地方，例如在海拔很高的沼泽和湖泊地区，距离能够为古代农业提供证据的那些适于耕种的农田却又太远。⑰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农用器具的性质都含糊不清：一把用来削菜的刀也可以用来干别的，磨石也可以用来粉碎作涂料的赭石，或舂、碾并非种植得来的食品，而这些器具通常是在晚石器时代留下的众多遗物中发现的。非洲有许多食用作物如香蕉、薯蓣和其他根类作物又是不长花粉的，而且为了不致损伤作物的块根，这些作物有不少都是用挖土木棒种植的。实际上得自这类植物并准备食用的食物，又往往是用杵在木质臼中舂碎的，这些器具保存的时间很有限，在使用这些器具的那些地区的土层下，它们很难有幸存的机会。因此，考古学家为了推断某一地区是否有农业，只好依靠更为间接的旁证，如是否存在较大的聚居地遗址；是否有看来类似永久性住房的东西；是否使用陶器；是否有正规墓地等等。从第二十六章中将明显看出在非洲以狩猎和食物采集为生的人们有时也以大的群体生活在一起，他们也常常使用陶器，而且，如果他们的捕鱼事业或其他特定的狩猎或食物采集业颇为成功，就会喜欢建设一个比较长久的定居地，如晚石器时代早期喀土穆或伊尚戈人就是这样。由此看来，我们现在可以作出的只是如下的令人遗憾的结论，即为了弄清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早期农业的情况，我们搞到的证据依然相当贫乏，因而我们的结论也只能是推测性的。但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们掌握更先进的复元技术、对非洲栽培植物的起源背景及分布情况也作了植物学方面和孢粉学方面更为深入的研究时，就有可能提供更为重要的情况了。

540

---

⑯ 哈伦(J.R.Harlan)等人。

⑰ 然而，有时孢粉学研究也能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在维多利亚湖核心地区，从匹尔金顿时期(Pilkington day)开始就是这样；资料说明在2000-3000年前这个地区的植物界曾出现巨大变化，森林植物让位于草本植物，表明由于农业民族的出现曾广泛地消出林地(肯德尔〔R.L. Kendall〕和利文斯顿〔D.A. Livingstone〕,第386页)。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人们一般都认为，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大部分地区农业的发展年代都比较晚；实际上，在大部分地区一般都是和制铁技术的引进同时出现的，只有西非一些地区例外，人们还都认为这种技术先是从西南亚传入尼罗河流域，最后才传到非洲其他各地。然而，从撒哈拉和其他地区得到的新证据却表明，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对非洲农业发源地这个正统观点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默多克，[18] 他认为大部分非洲农业的发源地是西非西部富塔贾隆高原上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的源头周围一带。默多克这个设想大部分细节现在虽然还不能充分证实，但事实很明显，薯蓣、稻米的一种非洲稻（Oryza glaberrina)、高粱、油棕，以及许多次要物产，都是西非固有的土产。然而，主要的问题是，西非这些农作物的存在，是否能够说明这个地区老早就不依赖非洲以外任何地方而独立发展了农业呢？某些考古学家[19] 曾竭力主张这个地区曾存在以种植薯蓣为基础的作物栽培业，但对迄今已搜集到的证据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面论点。[20] 显然，撒哈拉地区早在我们纪元前六千纪，的确就已存在象阿梅克尼这样的一些村庄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些群体在森林里已在利用油棕、豇豆（cowpeas）以及诸如此类的土产了；而且，从大西洋岸直至埃塞俄比亚的辽阔的大草原和萨赫勒的宽广的植被地带，野生高粱以及某些种类的小米（pennisetum）几乎到处都有。同样明显的是，当时埃塞俄比亚有好几种主要大宗物产，如埃塞俄比亚一种稷（tef）和其他谷类以及野生的无果实香蕉（Musa ensete)，而且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较早，可能至少在我们纪元前三千纪就有了。虽然有间接证据说明早在我们纪元前四千纪苏丹就有了农业，但最早的直接证据却是在我们纪元前二千纪的遗物堆（如毛里塔尼亚的提希特遗址以及加纳北部的金坦波遗址）里找到的。[21] 如果岩石画这种物证[22] 可以算作合乎情理的提示的话，那末牧畜业就有可能已存在6000年之久了，而真正的牛的遗骸则从业已准确地判定其年代为我们纪元前四千纪初的萨赫勒遗物堆中获得。

541

尽管对大部分非洲农业发展的起源、年代和发展方式等问题尚有争论，但一般都同意下述看法，即：关于农耕何时开始这个问题，除了肯尼亚裂谷省某些高度地方化的种植小米的村社可能早一些外，都是在炼铁技术刚刚出现时开始的，至少在非洲讲班图语的绝大部分地区是这样。人们广泛同意的另一点是，在非洲操班图语的地区早期农业大宗物产中有许多，象结果的香蕉，芋头（colocasias)，稷（eleusine）和高粱等等，追溯到底，不是从西非引进的，就是象香蕉那样从东南亚间接引进的。牛的最早出现是在铁器时代以前，早在我们纪元前一千纪初就在东非发现了；而且，从第二十六章中帕金顿提出的证据看来，在我们纪元一千纪初，羊似乎就已向南远远传播到南非的好望角了。牧畜业的传布，也许和萨顿在第二十三章中所描述的水上文化的传播有某种联系，正如埃雷特[23] 令人信服地提出的，说明中苏丹语对班图语的社会影响的那些证据那样。例如，他曾记述表示“母牛”的一些词以及表示挤奶动作的那些用语，是班图人从他们苏丹中部那些邻居那里借

542

---

[18] 默多克(G.P.Murdock)。
[19] 戴维斯(O.Davies),1962年，第291-302页。
[20] 波斯南斯基(M.Posnansky),1969年，第101-107页。
[21] J.R.哈伦1976年著作中所引芒森(P.J.Munson)和弗莱特(C.Flight)。
[22] 莫里(Mori),1972年。
[23] C.埃雷特，1967年，第1-17页；1973年，第1-71页。

用的，估计很可能是和牛、挤奶等活动一起搬来的。埃雷特[24]以操原始中苏丹语的人们当中的语言分化的假设为依据，推论出放牛的人们的出现早于从事耕耘的农夫。他还认为这种相互作用最早是在我们纪元前500年前后出现的。他还进一步提出[25]，坦噶尼喀湖周围地区对于东部原始班图人群的逐渐扩散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这个地区既适于种植高粱和谷类，又适于放牛。埃雷特[26]还曾指出，原始班图语中表示"锄头"和"高粱"的这些词，是由中苏丹语派生出来的，因此，我们势必设想在尼罗－撒哈拉各族和班图人的祖先之间曾存在社会上的相互影响，以及锄耕农业和高粱种植向南方传播，特别是传入班图地区的情况。作为我们纪元前1000年间出现的这些发展的结果，虽然居民可能曾有过某些扩散，但在以后几章中记述的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却清楚地指出，各农业民族的主要扩散是在我们纪元1000年间在班图非洲大部分地区出现的。

铁

关于早期农业人口向非洲南部扩散情况的任何讨论，都会遇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炼铁技术的传播究竟起源于何处。为了清除灌木丛林、森林边缘和树林，砍切工具最为方便。石器时代的伊朗没有这类工具，尽管"新石器时代"制造的磨制打光的石斧可以用来砍伐树木，或更为可能的是用来干木工活，但它并不是象今天的铁弯刀或大砍刀（panga）那样的万能的砍伐工具。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没有青铜器时代。使用铜的最早的证据来自毛里塔尼亚，看样子可能是马格里布人或与西北非洲青铜器时代有联系的人们开采阿克儒特附近储量有限的铜矿资源的结果。铜器制作的年代约在我们纪元前900至500年间，[27]这比西非尼日利亚乔斯高原上的塔鲁加地区业已证实的最早的炼铁年代（即我们纪元前四至五世纪）稍早一些。

关于非洲早期炼铁业起源的问题，人们曾作过大量揣测——应当在这里着重指出，这些说法猜测性实在太大了，而且根本没有关于早期熔铁炉和风箱式样的确凿资料。现在有几种可以接受的学派，但并无一派业已证明是正确的。较老的学派认为炼铁技术是从尼罗河流域、特别是麦罗埃传出的，赛斯[28]称该地为"非洲的伯明翰"。特里格[29]在更晚些的时候指出，我们纪元前400年以前，努比亚的铁器相当稀少，即使后来作为麦罗埃王朝标志的，也只有象轻巧的装饰品那样的一些小铁器。而泰莱科特[30]却明确指出在我们纪元前200年以前那里根本就没有熔铁的任何迹象。在埃及，铁制品尽管在早期沉积层中偶有发现，而且一般认为是通过贸易获得或以陨铁加工制成的，但在我们纪元前七世纪以前，这些东西并无任何重要性。[31]以陨铁制成的物件是用制造石器时常用的方法很费力地制造出来的。[32]

543

[24] 1973年，第14页。
[25] 1972年，第12页。
[26] 1973年，第5页。
[27] 兰伯特(N.Lambert)，1970年。
[28] 赛斯(E.A. Sayce)，1912年，第53-65页。
[29] 特里格(B.G. Trigger)，1969年，第23-50页。
[30] 泰莱科特(R.F. Tylecote)，第67-72页。
[31] 迪奥普(C.A.Diop)具有完全相反的观点，1973年，第532-547页。
[32] 福贝斯(R.J.Forbes)，1950年；同作者，1954年，第572-599页。

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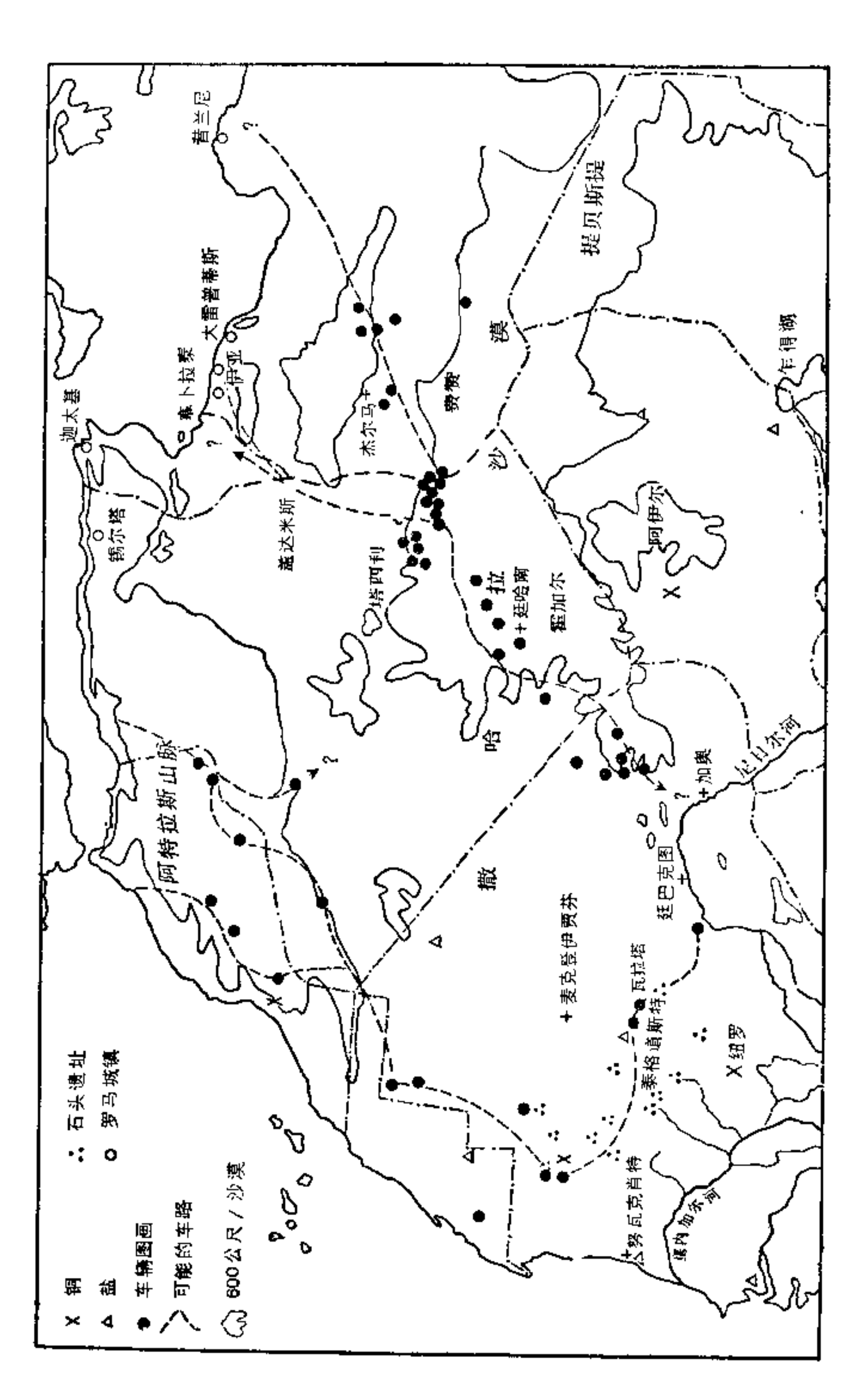


插图21.2 铜产地和穿越撒哈拉的商队路线

但是，并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说明炼铁技术是从尼罗河流域直接向西或向南传播出去的。埃塞俄比亚的铁器，如在阿克苏姆境内象耶哈这样的一些居民中心出土的那些始于我们纪元前五世纪的铁器，很可能是从南阿拉伯传来的，这一点从给牛打烙印的模子上就能看出；还可能是从同上述居民中心有联系的托勒密王朝一些红海港口如阿杜利斯等地传来的。威廉斯[33]以麦罗埃熔铁炉为依据，曾设想出由一个相当狭窄的烟囱和能产生强劲气流的风箱组成的典型的熔铁炉。他的意思就是想用今天的柱型熔铁炉之广泛分布，来说明其尼罗河流域发源地的重要性。另外，在撒哈拉的提贝斯提、恩内迪和博尔库高原地区有被称为"利比亚－柏柏尔人"的战士带着盾和矛的岩刻和岩画，而其他一些则无疑是近似尼罗河流域的人。[34]不过，这类岩画能查明年代的为数极少，而那些能够测定年代的，又似乎都晚于尼日利亚最早的炼铁年代。

早期尼日利亚炼铁术的发现，使学者们集中注意是否也可能来源于北非。腓尼基人在我们纪元前一千纪初把制铁技术从地中海东岸传到了北非海岸的一些地区。

有关双轮马车的岩画和岩雕分布很广，从的黎波里塔尼亚海岸，通过塔西里和霍加尔直至尼罗河中游；从摩洛哥海岸直到毛里塔尼亚——这情况说明在我们纪元前500年左右，545 北非和撒哈拉之间必然存在相互接触。车辆和马匹显然不是撒哈拉固有的，而洛特[35]甚至提出，马匹的奔驰姿态显示出与爱琴海地区有关。康纳[36]认为，由于炼铁术出现较晚，是我们纪元500年前后在乍得湖附近的达伊马出现的，而且这个地方很可能位于来自尼罗河流域的一条走廊上，由此推断铁必定是从北方传来的；不然，人们就会期待在乍得地区找到比在乔斯地区更早的炼铁技术的证据。其他年代比较早的炼铁术来自加纳、哈尼（我们纪元80年）和塞内加尔。下述设想当然同样是十分可能的，即炼铁术可能是从北非经过毛里塔尼亚，沿着制铜工人走的那条小路和苏丹地带向西向南传布，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炼铁术的年代就必然早于尼日利亚了。当然还可能提出把炼铁术带到热带非洲的多条路线的设想：从马格里布到毛里塔尼亚是一条，通过撒哈拉到尼日利亚是另一条，通过红海到埃塞俄比亚是第三条，还有从红海地区、印度或东南亚经东海岸到东非的其他一些路线。

最近还有人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炼铁术可能是在非洲本土发展起来的。强烈坚持这个观点的是迪奥普，[37]在本卷第二十四章中他还得到韦·安达博士的支持。赞成炼铁术是在本地发展起来的人们的主要论点是，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按照地中海模式炼铁的证据，而非洲的铁却可能是以另一种方式炼成的。熔铁需要高温（把铁矿石变成铁坯需要高达1150°C的温度，而铜的实际熔点是1100°C），而且，就铁是碳和氧同熔化中的铁矿石作用的结果而论，炼铁还涉及化学方面的知识。主张炼铁只有一个发源地的人们，举出证据说这种专门知识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是炼铜和制陶烧窑等经验产生的结果。他们进一步争辩说，从年代上看，道理也在他们一边；这是因为，有充分证据说明安

[33] 威廉斯(D.Williams)，第62-80页。
[34] 瓦尔(P.Huard)，第377-401页。
[35] 洛特(H.Lhote)，1953a，第1133-1228页。
[36] 康纳(G.Connah)，1969a，第30-32页。
[37] C.A.迪奥普，1968年，第10-38页。

纳托利亚的炼铁术早在我们纪元前二千纪初就有了，而在西亚以外各地区，直到我们纪元前一千纪前后仍然很少见。不过，主张炼铁是在非洲本土发展起来的人们认为熔铁的知识可能是通过在土窑里烧制陶罐的经验取得的，他们还认为非洲地表的红土矿比中东坚硬的铁矿石易于熔炼。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有关西非炼铁技术的许多早期遗址，如与诺克文化有联系的那些遗址或上沃尔特的遗址，都是和石器有联系的，因此，炼铁术主要是发生在石器时代晚期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

人们正在研究中的显然属于近代的刚果熔炉并没有给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增加什么新东西，而且可能永远也提供不了任何有关它早期使用情况的线索，这未免令人遗憾。不过，这些熔炉之被发现及其年代的考定，很可能为从沙巴至海洋的铁器贸易路线提供某些线索，并有可能为这一后期的发展确定某些年代。 546

不幸的是，关于早期炼铁术的上述种种理论都还无法加以证实。一些早期熔炉遗址没有一处能够为炉体提供足够的情况，关于当时所用风箱的式样的情况就更少了。已发掘的熔炉遗址太少，显然在更多的熔炉遗址被发现、被考察以前，情况将仍然是很模糊的。辽阔的地区尚未考察，而且炼铁遗址通常远离定居地区，因此，除非碰运气偶然发现，不然就会一直埋没无闻。用于勘探矿藏的原始磁力计的出现有助于加快发现，但各地早期铁器时代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能够恢复原状的熔炉几乎没有。铁器时代早期遗址作为一个整体而论，足以肯定年代的实在少得可怜，甚至关于炼铁术引进热带非洲各地区的年代，也很难有把握。例如，在六十年代初，人们认为东非的炼铁业约始于我们纪元1000年，而现在这个年代已上溯至少750年之多；加纳的情况也一样，在发现其年代为我们纪元二世纪的哈尼熔炉以前，人们经常引用的年代是我们纪元900年前后。尽管如此，某些结论还是可以作出的。首先，并无大量证据说明从尼罗河流域到西非的直接传播，因此，支持以麦罗埃为起点向外传播这种说法的证据最少。第二，在我们纪元前的时期，西非并没有能说明曾存在熔炉或烧窑制陶的确切证据，而从种族分布情况看来，也还没有大量发现能说明炼铁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证据，这些证据顶多只能涉及我们纪元第二千纪的情况。因此，关于炼铁术起源这个问题，我们只好暂时不作定论。手头确已掌握的十分稀少的一些证据，说明炼铁在西非的年代比在东非或中非要早些，这就进一步使人联想铁器是从西非向南向东传播的。炼铁术的传播异常迅速，南非的最早的年代[38]是在我们纪元400年前后，即比西非大部分炼铁业的最早年代只靠后几个世纪。

炼铁术的这种迅速传播，有人称为“爆炸性的”，和语言传播的证据相符。得自东非或中非的考古学上的证据，进一步说明我们纪元第一千纪炼铁术的传播是从西非来的。可以看出，在热带非洲广大地区出土的那些遗物，形状和装饰都有明显的类似之处。这一点只能说明这些花样繁多的器皿有一个共同的发源地（关于东非的情况见1971年索珀的说明，关于南部非洲的情况见赫夫曼1970年的文章）。在开始阶段互相类似，后来强烈的地区性差异就发展起来了。这种趋势在赞比亚[39]看得十分清楚，也许是因为在该地比在热带非洲 547

---

[38] 梅森（R.J.Mason），1974年，第211—216页。
[39] 菲利普森（D.W.Phillipson），1968 a。

其他地区对铁器时代的制陶业曾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的缘故。埃雷特[40]根据语言学方面的证据，认为“这些松散的人群是由独立的但又相互影响的居民群体形成的”，他们和未被同化的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们同时并存。从考古学角度看来，他这个结论也是很可接受的。随着这些班图居民群体越来越适应某种特殊环境，他们和较远的居民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逐渐减少，而他们的语言和物质文明也就日益分化。

非洲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

这个时期热带非洲历史的另一个需要强调的特征，就是北非对苏丹地区持续不断的日益加深的影响。“影响”一词可能易于引起误解，因为物资和思想流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来有往的。前几章里已经提到，撒哈拉既不是什么屏障也不是无人区，而是有它自己详尽历史的一个地区，不过它的历史上还有许多情况有待澄清。由于撒哈拉本来就是一片大沙漠，它的居民当然稀少，而且是以游牧为生的。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时期，当地大部分居民很可能是些牧民，他们从沙漠移向各个高原地区（如霍加尔、塔西利、提贝斯提等地），并随着季节的推移，从萨赫勒地带向南北两个方向移动。尽管近年来在苏丹地区进行的考古工作一清二楚地说明直接间接的接触确实都存在——间接的如游牧生活带来的影响，直接的如通过贸易和矿藏开发可能造成的[41]——但无论要确定当时这种实际交流的数量或描绘出它的影响，都是很困难的。我们现有的材料里包括古典文献资料，撒哈拉的岩石壁画和雕刻以及在考古工作中获得的证据。有些证据在第一卷和前几章里都已谈到，但在这个阶段作些扼要的复述还是有必要的。

在讨论涉及穿越撒哈拉的交往的文献证据以前，有必要先提一下据说是从地中海到西非的两次直接海上接触。第一次接触据说是在尼科部下服役的腓尼基水手们进行的为时近三年的航行。这情况已在第四章中谈过了。希罗多德的著作也曾记述此事，可是他并不太相信这段故事，这是因为太阳出现在航海者的右边这一事实，而这一事实却正是承认这段故事的各种理由之一。文献资料提供的事实太少，无法核对。斯特拉波和其他一些古典作家都全面否定这段故事，这一点颇为重要。历史上无疑曾有过一次航行，但他们是否曾环航非洲，却不能肯定。莫尼于1960年[42]指出，那时从埃及出发的用桨慢慢划动的船只，极不可能对付好望角或非洲西北沿岸一带的急流，而且那一带海岸大都是沙漠，他们要想得到足够的饮水和食物必然极端困难。沿这一带沙岸向北航行不是要用几个星期，而是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否定这次航行的有关旁证也很充分。第二次航行据说是迦太基人汉诺完成的。《回航记》这本书里记载的这段故事过分夸大、[43]想象也太多，所记地形细节又含糊不清，而且常常自相矛盾；尽管如此，许多作家都按这个故事的表面价值接受下来。他们

548

---

[40] C.埃雷特，1973年，第24页。

[41]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抵制把所获微薄成果的重要性加以夸大的诱惑。

[42] 1976年1月在达喀尔举行的专题讨论会（“古代黑非洲和地中海世界”）上，拉奥尔·洛尼斯先生（Mr. Raoul Lonis）提出一份有关这方面的重要论文，阐述了古代在非洲大西洋沿海航行的条件和“返航”的问题。洛尼斯以大量的文字和图解资料证明莫尼的论点未免过于绝对化，而古代船只在技术上是完全能够沿非洲海岸从南到北航行的。

[43] 例如，据说他的船队共有船60艘，旅客与船员达3万人。

说关于火焰山的那段描述，指的或许就是喀麦隆火山，或者是塞拉利昂的丛林野火；至于《回航记》中提到的名为"大猩猩"的混身长毛的人，人们都按字义认为这就是对大猩猩的第一次描述。[44] 热尔曼于 1957 年对《回航记》全文的来龙去脉和细节作过深入研究之后，指出这本书不真实，而且大部分都是近代人搞的仿古伪作。弗格森[45] 尽管知道热尔曼反对这部书的理由，而且也了解西非的地理情况，但他觉得这次航行确实有过，不过最远只到达加蓬河口。莫尼曾于 1960 年指出，为说明尼科时代的航行并不存在所引用的那些旁证，同样可以适用于汉诺那次航行。即使那次往返航行确实有过，它对西非也肯定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在西非沿岸并未发现任何确实可靠的或确已证明并核实了年代的迦太基、腓尼基或埃及手工制品。

正如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关于"哑巴贸易"的记载所暗示的那样，迦太基人肯定曾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获得黄金。但这些古代水手们是否曾到达塞内加尔河以南的地方就很值得怀疑了；沃明顿[46] 认为这条河就是波里比阿（我们纪元二世纪末受聘于古罗马的一位希腊作家）称为"班博图姆"的地方。而且，即使上面已肯定的情况，也并非无懈可击。根据当时记述迦太基人的那些资料看来，他们都是习惯于守口如瓶的人，因此，即使他们确曾进行成功的探险或贸易航行，他们大概也不会把这些事公诸于世，因为那样做只能有利于和他们进行商业竞争的对手，而且并无任何证据说明他们在大陆上的探险活动向南走得比罗马人还远些——除了塞普蒂米乌斯·弗拉胡斯和尤利乌斯·马特努斯于我们纪元 70 年进行的远征以外，罗马人进行活跃接触的地区，最远似乎是霍加尔。古典作品中曾提到加拉曼特人各式各样的迁移，但看来他们并没有影响到费赞以南地区。

549

数量大得多的关于伊斯兰时代以前的接触的证据，来自岩石画和在考古工作中取得的物证。从岩石画上看出，早在我们纪元前 500 年间，许多正规的交通路线就已通到苏丹地区了。希罗多德所记述的纳萨摩尼亚人曾到达看来是尼日尔河的那次旅行的故事，可能就是对一次真实的旅行的文字记述。这个故事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它曾提到一座尼格罗人城市，弗格森[47]证实这个城市在现在的廷巴克图地区。那些岩石画上画的大部分都是战车或大车，有的是马拉的，有的是牛拉的。[48] 洛特曾于 1953 年注意到，除了费赞附近地区以外，在阿伊尔或提贝斯提地区都没有战车画。大部分画着公牛的图画是在西边那条路线附近发现的。也许我们不应该根据战车这一点作出太多的结论。丹尼尔斯[49] 认为，这些车辆只不过是"说明这种普通形式的车辆的广泛使用，并不能说明存在着复杂的撒哈拉车道体系"。那些能够鉴定年代的车辆，例如和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村落[50] 有联系的车辆，都属于从我们纪元前 1100 年至 400 年之间的时期。根据岩石画，我们可以设想穿越撒哈拉的各条路线可以通行马、牛，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也能够通过有多种用途的驴。靠东边那条路线在塔西利

[44] 雷诺兹(V. Reynolds) 提出异议，他说古典作家对狒狒很熟悉，而那些动物是他们不熟悉的类人猿；他还说，和人一样高大的大猩猩与黑猩猩不同，它们以前的分布可能向西一直远抵塞拉利昂。

[45] 第 7 页。

[46] 沃明顿(B.H.Warmington),1969 年，第 79 页。

[47] 第 10 页。

[48] P.J.芒森和 J.弗格森，1969 年。

[49] 1970 年，第 13 页。

[50] P.J.芒森，1969 年，第 62 页。

境内有一个中枢，洛特曾指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海岸地区，象雷普蒂斯、伊亚和塞卜拉泰这些居民中心可能就是这条路线的一些终点站。博维尔[51]却争辩说，这三个原来属于迦太基人的城镇相距很近，而附近的海岸或近海内陆的自然资源又不能保证这些城镇的供应，因此，他认为这三个城镇是通往费赞地区的加拉曼特大道上的枢纽。“红玉”（可能是作串珠用的一种形式的玉髓），绿宝石和其它一些较贵重的宝石[52]，据说都是这项贸易中的交换目标；奴隶在这个时期虽然并不十分重要，但也许是当时贸易的另一项内容，迦太基墓地曾发现尼格罗人遗骨，在迦太基军队里显然也有尼格罗人士兵。用作交换的还有麝猫香、鸵鸟蛋和羽毛等可能产于热带的物品。

550

在本章开头，我们曾探讨毛里塔尼亚出土的炼铜物证。在考古中发现的证据将说明靠西边那条路线比穿过塔西利的那条东线具有更大的直接重要性。铜矿的开采也许曾对同时期南方的采金业起过促进作用。将在第二十四章提到的在塞内冈比亚的建筑用巨石，表明在古加纳国兴起以前，那个地区就已经确立了黄金和制铁等事业，而且这一点很可能就是这个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莫尼于1952年指出，在西苏丹，沃洛夫人、塞雷尔人和迪乌拉人等语言中的“金”字“urus”近似迦太基语中的“haras”，这可能是因为探矿者在摩洛哥大西洋沿岸黄金贸易的鼓舞下，向南推进去开发已知的毛里塔尼亚矿藏，从而也把他们自己的术语传到那里了。在塞内加尔古坟中发掘出来的东西中，可以看到马格里布影响的大量证据，人们必然会由此推断出，自从我们纪元前一、二千纪贸易接触开始以来其规模逐渐扩大。甚至有可能在八世纪末阿拉伯人到达这个地区以前，在西线的贸易中就有人使用骆驼了；总之，至少是在我们纪元前一世纪北非就已有骆驼了(我们纪元前46年，恺撒就曾提到掳获骆驼的事)，而到四世纪时它们就已经很常见了。到我们纪元1000年时，塞内冈比亚和尼日尔上游地区修建那些古坟和巨石建筑的人们展示出来的财富（波斯南斯基，1973年)，对伊斯兰时代以前的贸易的存在和规模说来，也许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在进行更多的考古研究以前，想知道这种贸易有多古老，或这种对外接触可能有多大重要性，是很困难的。

总之，就手头现有材料而论，我们很难超越审慎推测这个阶段，特别是关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接触问题就更是这样。例如，中非共和国布阿尔地区早期巨石建筑以及非洲其他许多地区仍然竖立着的巨大石块的存在，都说明应当由这方面的专家对巨石建筑物进行耐心而细致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吕绳良译）

---

[51] 第21页。
[52] B.H.沃明顿，1969年，第66页。

22 非洲东海岸及其在海上贸易中的作用

551

A.M.H.谢里夫

非洲东海岸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无论从内陆还是从海上都比较易于通行。从内陆到沿海比较易于通行这是人口移向沿海地带的重要因素，因而也说明为什么沿海地区的种族和文化如此复杂。另一方面，海洋一向是与外界接触的途径，因此，近2000年来非洲东海岸历史的主要特点不是闭塞隔绝而是两种文化潮流互相渗透交融，产生了新的混合文明——沿海的斯瓦希里文明。促使这一过程出现的媒介是贸易，它使非洲东海岸纳入国际经济体系，并随之带来相应的后果。

但是由于缺乏史料，要把七世纪以前非洲东海岸历史的本来面目描绘出来是有困难的。可以找到的史料，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古代钱币都是国际贸易的产物，至于国际交往建立以前沿岸历史的资料我们掌握甚少。最早的希腊罗马文献仅仅间接地（但往往很有价值)提到非洲东海岸。斯特拉波（我们纪元前29年至我们纪元19年）曾亲身经历奥古斯都统治下罗马的扩张时期，他不仅记述了当时他了解到甚至亲自看到的红海地区和印度洋贸易的情况，还辑录了如今已失传的早期地理文献的片断。① 普林尼(我们纪元23－79年)则描绘了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最有价值的是关于印度洋上的贸易和航海、关于帝都罗马骄奢淫泆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叙述。②

552

记述这个时期印度洋情况的最重要的史料是《红海回航记》③，其内容虽然贫乏，却是直接记述东非海岸的第一部著作；作者显然是一位以埃及为基地的希腊商务代理人。《回航记》记述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作者目睹的。关于其写作年代,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包括肖夫及米勒在内的许多学者争辩说，《回航记》叙述的似乎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在印度洋上仍处于繁荣阶段的贸易，也就是说，其年代大体上和普林尼描述的我们纪元一世纪后半叶这个时期相当。④ 但皮雷纳独树一帜，他认为其年代应为三世纪初。⑤ 马修提出一种折衷的

① 斯特拉波，第二卷，第209-213页。

② 普林尼，第二卷，第371-372页。

③ 英译本有文森特(W. Vincent)本、麦克林德尔(J.W. McCrindle)本、肖夫(W. H. Schoff)本(1912年，为迄今通常引用的译本)、米勒(J.I. Miller)本(近期出版的)、皮雷纳(J.Pirenne) 本 (1970 b)。再请参照本卷第16章，厄立特里亚海(亦称红海)是古希腊罗马地理学者使用的名词，指印度洋，至少从我们纪元五世纪希罗多德时代便已使用。参见W.H.肖夫，1912年，第50-51页；邦伯里(E.H. Bunbury)，1959年，第一卷，第219-221页；又见J.皮雷纳，1970年。

④ 见W.H.肖夫，1912年，第8-15页，他提出该书约成于我们纪元60年，但后来订正为我们纪元70-89年。关于《回航记》成书年月，见肖夫，1917年，第827-830页；沃明顿 (E.H. Warmington)，1928年，第52页（我们纪元60年)；惠勒(R.E.M. Wheeler)，1954年，第127页(我们纪元50-75年)；查尔斯沃思(M.P. Charlesworth)，1966年，第148页(我们纪元50-65年)；J.I.米勒，第16-18页(我们纪元79-84年)。

⑤ 引自马修(G.Mathew)，载于罗特伯格(R.I. Rotberg)与奇蒂克 (N. Chittick) 著作；再请参照皮雷纳著作，1970年。

见解，他认为是二世纪初，理由是：《回航记》问世虽早于托勒密的《地理志》，但后一书中有关东非的材料不是在二世纪中叶和书中其它部分一起写成，而是后来加上去的。⑥正如下文将说明的，没有理由接受马修的说法，因此我们的结论只能是《回航记》的问世不可能晚于一世纪末。

托勒密大约在我们纪元 156 年写成《地理志》，从该书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印度洋总的认识、特别是对东非的认识已大有进步。马修曾指出《地理志》是后人编辑的，并说"看来，最稳妥的办法是把记述东非的这一部分看作是截至四世纪末人们从地中海地区获得的知识的总结"。⑦可是托勒密曾特地声明，有关东非的材料是他从同时代的提尔人马里努斯那里得来的。⑧

记述这个时期的最后一部文献是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在六世纪前半叶写的那本《基督教诸国风土记》。这本书显然是罗马帝国及其在印度洋的贸易已进入急剧衰落的时期的著作。它提供的有关埃塞俄比亚和波斯人在印度洋兴起的情况非常有用，⑨但也显示出作者对瓜尔达富伊角以南的东非海岸一无所知。

653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缺少有关这一时期非洲东海岸的有力的考古证据来证实或补充已有的文献资料。我们手头现有的只是在最近四分之三世纪里从沿海收集到的一些钱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钱币都不是在已知的或经过发掘的考古遗址上发现的，而且遗憾的是关于这些钱币发现情况的记载也很有限。充其量我们只能说，这些古币提供的证据和现有文献资料并无矛盾；作为东非海岸一带国际贸易盛衰的标志，它们还是有价值的。

最初发现的古币共六枚，是在坦噶以北基莫尼地方"一丛约有 200 年的老树下边的'土丘'里找到的"，显然已埋藏多年。这批古钱的年代跨度很大，从我们纪元三世纪直至十二世纪。由此可见，这不可能是十二世纪以前窖藏的钱币，但那些较早期的钱币是否是在伊斯兰时代以前带到东非来的，仍未弄清。⑩第二批出土物是一枚托勒密·索特尔(我们纪元前 116-108 年)时代的金币，是 1901 年由非洲一位街头商贩在达累斯萨拉姆卖给一位德国商人的，这枚金币可能来自沿海某处。⑪

1955 年桑给巴尔博物馆首次展出几组出处不明的古币珍品。第一组装在一只标着"泰西封"(巴格达附近帕提亚和萨珊王朝的首都)字样的信封里，共有我们纪元一世纪至三世纪的钱币五枚。据弗里曼-格伦维尔说，他检查这些古币时，上面还沾有桑给巴尔"特有的泥土"，他毫不怀疑它们是在桑给巴尔某处发现的。另外两组古币也沾有这种泥土，可能是在桑给巴尔或奔巴岛找到的。它们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从我们纪元前二世纪一直到我们

---

⑥ G.马修，见奥利弗(R.Oliver)与马修合著书，1963 年，第 94-96 页；马修本人著作(1974 年)中则处处可见此论点。反对此论点的有 J.皮雷纳，1970 年。

⑦ G.马修，1963 年，第 96 页。

⑧ 史蒂文森(E.L. Stevenson)，见 I.9,I.17 两节，有关段落曾由艾伦(J.W.T. Allen)引用过，第 53-55 页，E.H.邦伯里，第 519-520、537、610-611 页。

⑨ J.W.麦克林德尔。

⑩ N.奇蒂克，1966 年，第 156-157 页，这些钱币甚至可能是在十六世纪才埋藏的。

⑪ 见弗里曼-格伦维尔(G.S.P. Freeman-Grenville)，1962 a，第 22 页。

纪元十四世纪，这种情况表明它们不是窖藏货币而是偶然发现收集起来的。⑫

剩下两组遗物解释起来同样困难。海伍德声称他曾于1913年在布尔高（邓福德港）发现一大批钱币和一只外形象希腊细颈酒壶的容器。这一容器在一次暴风雨中被打碎了。遗憾的是，他将碎片扔掉了。那些古币直到20年后才公诸于世，而且在他于1927年发表的关于这次旅行的记载里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些钱币。这批钱币似乎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第一类包括我们纪元前三世纪至我们纪元四世纪上半叶的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帝国时期的罗马和拜占庭的75枚钱币，这些似乎是这批藏品的核心。第二部分计13枚，是马穆鲁克和奥斯曼统治下的埃及十三世纪往后的钱币。1955年惠勒和马修前往发现地点做了短暂考察，1968年奇蒂克又去过一次，在地面上并未发现任何早于十五世纪的东西，不过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开始。奇蒂克的论点是，发现的这些钱币假如是窖藏的，埋藏的时间不会早于十六世纪。惠勒却提出另一种意见，说这批古币里加进埃及晚期的货币"并不一定有损于这次发现的重要意义"。⑬这些埃及货币也有可能是在古币学家把这批藏品弄到手之前的那段漫长岁月里添加进去的。由此看来，这些藏品的核心部分可能是在四世纪前半叶之后的某个时期埋在地下的。

554

另一批古币据说是由一位名叫伊迪·乌西的老农民（已死）在桑给巴尔南部的丁巴尼地方挖出来的，后来被一位业余收藏家弄到手。对这批古币只做过初步鉴定，其核心部分似乎是我们纪元一至四世纪的29枚罗马钱币和1枚帕提亚钱币。其中还包括1枚十二世纪末的中国钱币以及再晚一些的伊斯兰国家、欧洲国家的钱币，甚至晚至十九世纪末叶殖民地时期非洲的货币。⑭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正如海伍德的收藏品那样，较晚近的货币或许是在以后的阶段添加到核心部分上去的。

这些微不足道的资料便是描绘七世纪以前非洲东海岸历史本来面貌的依据。因此，本文下一段所作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尝试虽不能说是缺乏信心，但在许多方面只能是初探，一切都有待于考古工作对东非海岸早期的研究取得的进展。

大陆因素

东非沿海地区的西界是一条狭长地带，地上稀疏分布着在贫瘠少雨地区生长的一种名叫nyika灌木，因而使沿海地区形成和外围地区界限分明的自成一体的地理区域。在肯尼亚，这条灌木地带位于距海岸不远处；到坦桑尼亚，灌木地带伸向内陆，中间被鲁阿哈、鲁菲季和潘加尼等三条河谷及山脉东坡的边缘切断。因此，人口的移动大概就是绕过或穿越灌木地带沿着一些地势较为平坦的走廊例如肯尼亚的塔纳河和坦桑尼亚东北部的潘加尼河及毗邻的山脉进行的。

有关非洲东海岸居民的最早的证据见于《回航记》一书，它说沿海居民"身材魁伟"。⑮

555

⑫ 见G.S.P.弗里曼-格伦维尔，1962a，第23页。

⑬ 同上书，第21-22页；N.奇蒂克，1969年，第115-130页；R.E.M.惠勒，1954年，第114页。

⑭ 藏品目前的主人不愿公开姓名，本文作者曾获准查看这些货币，特此致谢。厄温（S.Urwin）夫人做过初步鉴定，见1972年8月23日函。

⑮ 《回航记》，16。

奥利弗认为他们是库希特人，很象从我们纪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居住在肯尼亚高原上从事农业的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已有的考古证据证明这些人"身材高大"。他们的进口货物中包括铁器。从这个事实看，沿岸各族居民当时还不懂炼铁术。在靠近沿海地区和上述那些走廊地带，有几个讲库希特语的地区，如塔纳河附近的萨涅人和乌桑巴拉的姆布古人，他们可能是早期沿海居民残存的后裔。[16]

考古方面的证据表明，在我们纪元头几个世纪里，可能有一个使用铁器讲班图语的民族，很快渗透到近海岸的内陆区域。他们很可能是从南方进入沿海一带，占据了蒙巴萨后面的南帕雷和夸莱地区。随后他们似乎又沿海北上最远抵达巴拉瓦，沿潘加尼走廊北上，于我们纪元五世纪前后到达北帕雷和乞力马扎罗地区。在扩张过程中，他们可能把海岸地带原有居民同化了。[17]

仅凭现有佐证去恰如其分地描绘国际商业联系建立以前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是很困难的。这里的居民很可能象内地石器时代晚期的库希特人那样，是以农业为生的。从《回航记》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渔业在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本文献还准确地记述了用"柳条筐"捉鱼的情形，至今海岸一带仍在使用这种方法。不过居民似乎主要是在岸上营生。他们使用大树干挖空的独木舟和小型"缝制船"，但显然没有深海独桅帆船。迟至十二世纪，伊德里西还曾评论说"僧祇人没有航海船只，他们使用的船是阿曼和其它国家制造的。"[18]遗憾的是，我们不掌握有关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材料，《回航记》虽曾提到各贸易市镇都有各自的首领，但这些首领和市镇本身兴起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国际贸易。[19]由此看来，非洲东海岸的居民在建立国际商业联系以前，在技术方面可能还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发展都处于一种相当低的水平。因此，国际贸易联系的建立是印度洋北缘的航海者采取主动的结果，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由这个局面带来的。

556

海洋因素

假如说沿海地区与内地便于通行这个因素使非洲东海岸自古以来一直成为非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海路交通却又使它长久以来就和印度洋彼岸有了商业往来、文化交流和移民关系。在考虑这个地区的历史时，我们既要考查它开展和其他地区之间交往的潜力，也要考查开展这种交往的机会。柯克把印度洋周围概括地分为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一是西南"森林"地区，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等沿海地区；二是中间"沙漠"地区，从索马里角直至印度河流域；三是东南"森林"地区，从印度直至印度尼西亚。[20]显然，两个"森林"地区互换大宗物产的潜力很有限，可是如果我们把由于自然或历史环境

---

[16] R.A.奥利弗，第368页；J.E.G.萨顿，1966年，第42页。《回航记》一书没有提供海岸上有印度尼西亚移民的证据，琼斯(A.H.M.Jones)通过音乐研究提出的证据始终未能为人普遍接受；琼斯，1969年，第131-190页。

[17] R.C.索帕，1967 a,第3、16、24、33-34页；N.奇蒂克，1969年，第122页；奥德纳(K.Odner)，1971 a，第107页，1971 b，第145页。

[18] 《回航记》，15，16；霍拉尼(G.F.Hourani)，1963年，第91-93页；C.S.P.弗里曼-格伦维尔，1962 b，第19页。

[19] 《回航记》，16。

[20] W.柯克，第265-266页。

只能在某些地区生产的奢侈品和制成品也包括在内，那么交换的潜力就可以增加。另一方面，"沙漠"地区与两个"森林"地区之间进行交换的潜力却大得多，这是因为，"沙漠"地区除了要交换奢侈品和制成品之外，常常严重缺乏粮食和只在"森林"地区才可以找到的木材。再者，"沙漠"地区位于两个"森林"区之间以及两个"森林"地区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这一地理位置使它据有战略上的居间地位。因此，七世纪以前的西印度洋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沿着东非与中东及中东与印度之间这两条清晰的路线相互影响的历史，也是中东在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起着居间作用的历史。

这种相互影响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发展起一种适当的航海技术并掌握了驾驭印度洋季风和洋流的本领。印度洋上最重要的地理特点就是季风按季节倒转方向。当北半球是冬天的时候，季风从东北方向持续吹来，一直吹到桑给巴尔，但再往南其稳定性就逐渐减少，过了德尔加杜角就很少有稳定的风向了。这种风向的格局又因撞击索马里海岸后向南流去的赤道洋流而加强了势头，从而便利了阿拉伯沿海独桅帆船出航。这些帆船可以在十一月下旬驶离母港，但大多数船只要等到一月初风势正盛时才出海，全部航程需要 20 到 25 天的时间。到了三月，东北季风开始失去势头；由于东非地处季风系统的边缘，因而在靠南的地方，季风衰竭更早一些。四月，季风就倒转方向变成西南季风了。这 557 时赤道洋流撞击德尔加杜角附近的海岸后分为两股，一股形成强大的北向洋流，便利船只北航，另一股向南流去，阻挠从莫桑比克海峡外出的船只。这正是这类帆船从东非启航的时候，但在五月中到八月中这段时间里有时气候过于恶劣，在印度洋上无法航行，只好暂停出海。因此，只要来得及办完商业事务，帆船就可以随着四月季风"渐起"之际启航，不然就在八月趁季风"结尾"出海。随着航程伸展到桑给巴尔以南，八月间启锚的越来越多了。很明显，在基督纪元初年，印度洋上的航海者就已经学会利用季风了。㉑他们在这个不知铁为何物的地区还克服了建造足够巨大的船只所面临的技术难题，设法以植物纤维把木板"缝合"起来。㉒

就这样，季风到达的可靠范围和东非商业组织的水平这两个因素就确定了季风帆船活动的正常半径。由于商业组织相当简单，交换多在异国船只与贸易城镇之间直接进行——看来七世纪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北方的帆船不可能到达比桑给巴尔更靠南的地方。直到中世纪，基尔瓦才被精心经营发展为货物集散地，以便更有效地开发南方沿海地区。

西印度洋贸易的发展

西印度洋最早的历史证据提供的情况同教科书上通常的说法相反，在我们纪元七世纪以前东非和印度间并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商业往来。甚至直至《回航记》一书问世时，印度与中东之间的贸易仍然仅仅限于少数几种奢侈品。㉓看来情况可能是这样，除金子和其它

㉑ W.柯克，第 263-265 页；达图 (B.A.Datoo)，1970 a，第 1-10 页；麦克马斯特 (D.N. McMaster)，第 13-24 页；达图与谢里夫(A.M.H. Sheriff)合著，第 102 页。

㉒ G.F.霍拉尼，1963 年，第 4-6 页。

㉓ R.E.M.惠勒，1966 年，第 67 页；G.F.霍拉尼，1963 年，第 8-9 页；巴沙姆 (A.L.Basham)，第 230 页；《回航记》，49、56、62。

珍贵物品外，印度大体上能够自给自足，特别是东非所能提供的大宗的“森林”物产就更能自给了。确实，这个时期的印度在出口象牙方面似乎甚为活跃，这个情形可能推迟了非洲象牙资源的开发。

558 非洲象牙资源的开发似乎是在亚历山大死后继承希腊事业的各国之间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促成的。塞琉西人对通往印度的陆上通道的牢牢控制使得埃及托勒密王朝历代国王只好到别处去寻找象牙。当务之急是获得打仗用的大象，不过他们也想打破塞琉西人对地中海的印度象牙供应的垄断。于是他们转向非洲红海沿岸地区，设立起一系列的猎象站一直到达红海口。历代托勒密王这个政策产生的结果是使象牙贸易得到巨大发展。[24]

托勒密五世（我们纪元前 204－181 年）丧失了叙利亚，再加上当时紧靠红海海岸内陆的象牙资源显然已经枯竭，而意大利对阿拉伯和印度商品的需求却与日俱增，这就迫使埃及转向南方海路，以便与印度保持商业联系。到我们纪元前二世纪末，索科特拉岛上就已住着外国商人，其中有克里特人，而尤多克苏斯借助一艘遇难的印度船的领航员首次直航印度。与印度通商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于是在我们纪元前 110 至 51 年间委派了“负责红海与印度洋海上事务”的官员。[25]但是尤多克苏斯开创的事业似乎并没有被后人坚持进行下去。斯特拉波写的书中曾暗示，这是由于托勒密王朝后几位国王的软弱和国内混乱造成的，当时“敢于穿越阿拉伯湾（红海）驶出海峡窥探外洋的船只还不到 20 艘”。[26]因此，那时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大都是通过阿拉伯西南部那些货物集散地间接进行的。《回航记》一书在谈到亚丁时说：“在这个城市的早期，从印度至埃及的航路尚未打通，人们也不敢从埃及出发前往大洋彼岸各港，于是双方都来到亚丁聚会，这个地方就成了两国货物的集散地。”[27]因此，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处于举足轻重的中间人地位，它分得的那一份商业利润是举世闻名的。[28]我们纪元前 115 年左右，希姆亚尔人取代萨巴人的地位，逐渐把中转贸易重心移到由马菲尔附庸国管辖下的穆扎港。[29]

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人们似乎仍然控制着沿东非海岸而下的另一条贸易路线。前面曾

559 经提过，托勒密王朝的商业之所以沿红海向南扩张，其推动力之一就是对包括象牙在内的东方奢侈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阿拉伯人为了满足对象牙的需要，很可能在这时就把他们的贸易活动扩展至东非海岸了。在我们纪元前二世纪末，东北季风显然曾把尤多克苏斯送到东非沿岸的瓜尔达富伊角以南的某处，他曾设法找到一位领航员（也许是个阿拉伯人）把他带回红海，这件事意义非常重大。[30]这些商业接触肯定发生在阿拉伯人在东非沿岸

㉔ 托泽（H.F.Tozer），第 146-147 页；斯特拉波，第七卷，第 319、331 页；普林尼，第二卷，第 465-569 页；G.F.霍拉尼，1963年，第 19-20 页；塔恩（W.Tarn）及格里菲思（G.T.Griffith），第 245-246 页；罗林森（H.G.Rawlinson），第 90-92页。

㉕ 斯特拉波，第一卷，第 377-379 页；迪奥多勒斯·西库卢斯（Diodorus Siculus），第 213-215 页；《回航记》，30；W.塔恩与G.T.格里菲思，第 247-248 页；H.G.罗林森，第 94 及 96 页；E.H.邦伯里，第一卷，第 649 页；第二卷，第 74-78 页；E.H.沃明顿，1963 年，第 61-62 页；G.F.霍拉尼，1963 年，第 94 页。

㉖ 斯特拉波，第八卷，第 53 页。

㉗ 《回航记》，26。

㉘ 斯特拉波，第七卷，第 349 页，第一卷，第 143-145 页。又见迪奥多勒斯，第二卷，第 231 页；普林尼，第二卷，第 459 页；南阿拉伯人的财富并非全部来自贸易，他们还发展了一种很高明的灌溉网：范贝克（G.W.Van Beek），1969 年，第 43 页。

㉙ 《回航记》，21-26；W.H.肖夫，1912 年，第 30-32 页，第 106-109 页；《大英百科全书》，1911 年第十一版，第二卷，第 264 页；第三卷，第 955-957 页；E.H.沃明顿，1928 年，第11 页。

㉚ 斯特拉波，第一卷，第 377-379 页。

确立任何正式宗主权*以前，而《回航记》在我们纪元一世纪后半叶成书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接触说成是在“古代”发生的了。[31] 由于缺少考古证据，我们很难确定罗马时代以前这些贸易接触开始的确切年代和沿海岸南下到达的确实地点。至今只有1枚在我们纪元前二世纪末铸造的托勒密王朝的金币，据说是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发现的。海伍德珍藏中的22枚托勒密王朝钱币最早也不过是我们纪元四世纪才埋藏的。[32]

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我们或许可以把阿拉伯人向东非海岸进行商业扩张的最早年代定为我们纪元前二世纪。但米勒却认为在肉桂贸易方面，东非构成东亚（香料的天然故乡）与索马里北部海岸之间的重要环节，而早自我们纪元前二千纪起到索马里北部海岸去买肉桂的，就不只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而且还有古埃及人。普林尼曾提到“乘木筏跨重洋”运输肉桂的事，米勒根据这一点设想印度尼西亚人曾横越大洋到达马达加斯加和东非海岸，后来又沿海岸或陆路到达索马里各港口。[33] 虽则印度尼西亚人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到马达加斯加，但现在人们认为这应发生在我们纪元一千纪中。再者，那时的移民和普林尼所说的贸易通道之间并无任何联系，普林尼所说的贸易通道很明显地是沿印度洋北缘直达阿拉伯半岛南部港口欧齐利亚。[34] 因此，米勒说的那条迂回的肉桂之路是没有根据的，同样，他把东非和印度洋彼岸各国的商业联系的时间向前推了那么远，也是没有凭证的。

罗马统治下贸易的扩张

560

在奥古斯都统治下罗马帝国建成后，地中海地区对东方商品的需求随即大量增加。帝国内外大批互不相干的经济逐渐纳入一个庞大的国际贸易体系，原料和奢侈品生产者被纳入紧密的交换关系之中，而消费者则成为这一交换关系的中心。就这样，这个体系把市场扩大，使财富得以向帝国中心转移。[35] 穷兵黩武的统治阶级把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把商业和工业留给各臣属居民经营，其后果不外是加剧了比奢侈讲排场的风气。对此，普林尼指控说：“计算起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每年从我们的帝国拿走的赛斯特斯**最低限度也有一亿枚，这就是我们的奢侈品和我们的女人使我们付出的代价。”[36]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为了扩展市场，打破阿拉伯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在红海执行了更富侵略性的政策。罗马人企图建立一条直通印度的海路。我们纪元前24年，加卢斯率领一支远征军企图控制“香料之路”的南端。远征虽然以失败告终。罗马的贸易却突飞猛进，这也许是部分地由于直达的海路胜似阿拉伯商路。大约在我们纪元前26至24年间，斯特拉

---

[31] 《回航记》，第16页；B.A.达图，1970 b，第73页，他认为时间要晚，根据是《回航记》一书写成的时间在更后；G.马修，1963年，第98页，他提出的时间是我们纪元前三世纪，这是以海伍德的藏品为依据提出的，但该藏品的历史价值尚存疑。见本书第430页。

[32] 见本书第430-431页。

[33] J.I.米勒，第42-43页、第53-57页、第153-172页。本通史起草委员会征求N.奇蒂克教授的意见，他对是否有过此类肉桂贸易持保留态度。

[34] B.A.达图，1970 b，第71页；普林尼，第十二卷，第87-88页。

[35] 奥泰尔（F.Orteil），1952年，第382-391页。

[36] 普林尼，第四卷，第63页。

* 有人建议以“依附”一词代替“附庸”，以“支配”代替“宗主权”。——**英文版注**

** 赛斯特斯为古罗马钱币，原为银币，后为铜币。——**译者注**

波曾听说“有多达120艘的船只从苗斯霍尔莫斯驶往印度，而在此以前的托勒密时代只有极少数几艘船敢于冒险远涉重洋贩运印度商品”。[37] 由于每年海上有如此众多的船舶往来，有理由设想他们是定期利用季风从红海口更为直接地驶往印度北部的。在其后的四分之三世纪里，罗马航海家更好地熟悉了沿印度西海岸的全线情况，于是他们得以横渡阿拉伯海到达印度的主要香料胡椒的产地马拉巴尔。[38]

虽然罗马人已闯入印度洋贸易，《回航记》这本书描写的却是仍然掌握在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手中的贸易盛况。印度人在波斯湾和红海的生意做得很活跃，但在瓜尔达富伊角以南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他们从马拉巴尔海岸出口胡椒，从印度西北部、南部和东部出口象牙，并以大量棉布供应罗马市场，还向索马里北部和埃塞俄比亚各港口供应钢、铁、棉布和食品。作为交换，他们带回的是各种金属，“低质量”的衣着，酒类及“大量钱币”。[39] 在阿拉伯人那方面，除出口乳香和没药外，主要是在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进行转口贸易。他们一方面和印度人分享对印度的贸易，和罗马人分享的贸易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完全垄断了与非洲东海岸的贸易：在《回航记》问世以前罗马人对瓜尔达富伊角以南一无所知这件事进一步证实上述情况。再者，《回航记》这本书对非洲东海岸的叙述虽然肯定出自目睹者之手，但它对东非海岸的叙述只用了四段文字这一事实说明，那个地区仍然处在希腊罗马经常活动的地区以外。[40]

非洲东海岸被纳入罗马经济体系

不论在罗马时期以前阿拉伯人在非洲东海岸的商业活动水平如何，但大体上可以肯定，罗马帝国经济的一体化和日趋繁荣再度促进了阿拉伯人的商业活动。罗马人对象牙的需求剧增，他们不但用它雕刻人像、制造梳子，而且还开始用它制造桌椅、鸟笼和装饰车辆，甚至还为御马建造了一座象牙马厩。[41] 在我们纪元一世纪时候，为了获取象牙，只有深入尼罗河上游腹地深处，然后再运到下游的阿杜利斯。结果，尽管人们认为非洲东海岸的象牙质量不如阿杜利斯的好，但那里的象牙供应却越发重要。[42] 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地区通过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国家希姆亚尔被进一步并入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回航记》说，尽管非洲东海岸一线的贸易城镇都有各自的头人，但希姆亚尔却通过其附庸马菲尔的头人对这些城镇行使宗主权，这个头目又把宗主权委托给穆扎人。穆扎人“向那里派遣了以阿拉伯人为船长和代理人的大型船只，这些阿拉伯人和当地土人十分熟悉并和他们通婚，他们对整个非洲东海岸了如指掌，而且还懂他们的语言”。[43] 因此，非洲东海岸不仅在商业方面被并入国际体系，而且在政治统治和社会渗透方面也如此。这种渗透可能就是逐渐产生一个混血的善于近海航行和做生意的阶级的原因，这些人成了国际贸易体系在

[37] 斯特拉波，第一卷，第453-455页；第七卷，第353-363页。
[38] 普林尼，第二卷，第415-419页。
[39] 《回航记》，6、14、36、49、56、62；J.I.米勒，第136-137页。
[40] 斯特拉波，第七卷，第333页；《回航记》，15-18。
[41] E.H.沃明顿，1928年，第163页。
[42] 《回航记》，4、17。
[43] 同上书，16。

当地的代理人。

被罗马人称为阿扎尼亚[44]的东非海岸哈丰角以南地区，在经济上或许仍未被统一进来。562 这个地区宁可说是一系列贸易城镇，各城镇都有自己的头人，各自都依靠自己狭小的内陆地区提供出口商品，乘季风行驶的独桅帆船直接和这些城镇接触。《回航记》一书提到过几个地方，如萨拉皮昂（也许就在梅尔卡以北几英里）、尼康（也许就在布尔高，即邓福德港）以及皮拉利亚群岛（已证实是拉木群岛）。这些地方可以停泊船只，但至今还没有人提到过这些地方的任何商业活动。正象《回航记》准确地描绘的那样，拉木群岛以南的海岸线确实和以北地区不同。越过群岛前行两日就可抵达梅努西亚岛，该岛"距大陆约 300 视距〔55 公里左右〕，地势低平，林木茂密。"[45]从北方来的航海者首先驶抵的大岛是奔巴岛，这也许是从拉木出发两天内能够到达的唯一岛屿。而且，奔巴岛距大陆实际上是 50 公里，桑给巴尔则是 36 公里。但梅努西亚在商业上并不重要。该岛出产一种仅次于印度产的、销路很广的玳瑁。但据《回航记》说，梅努西亚仅有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渔业。[46]

《回航记》提到的哈丰角以南沿海的唯一贸易城镇是拉普塔。据该文献记载，这个商业中心在梅努西亚以南两天航程处，托勒密说它位于"距海不远处"与城市同名的一条河旁。[47]巴克斯特和艾伦则论证说这两天航程如果是从奔巴岛北端开始的，到距海不远处的一条河结束，那么拉普塔的位置可能就在潘加尼河口以上某处，这条河原先还有一个更靠北的出海口。达图论证说，考虑到航行的条件，拉普塔可能位于潘加尼河与达累斯萨拉姆之间，[48]显然是由当地头人统治，但也处于阿拉伯西南部那个国家总的宗主权之下。不过《回航记》给人的印象却是，这种宗主权至多也不过是由阿拉伯船长和穆扎代理人行使的对 563 外贸易垄断权。这个海港最重要的经济功能是出口"大量象牙"、犀角、质地优良的玳瑁和少量椰油。用这些东西交换来的主要是铁器，特别是"在穆扎专门为这项贸易制造的长矛"、手斧、匕首、钻子、各种玻璃和"少量的酒和小麦，后两样不是为了进行交易，而是为了讨好野人的"。[49]

托勒密在二世纪前半叶指出，这种贸易在我们纪元最初的两个世纪增长很快。在索马里沿海后来又出现一个新兴商业中心，名为埃西纳。萨拉皮昂和尼康（托尼基）这时也分别被称作"港口"和"商业中心"了。但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出现在拉普塔，这时它已被描绘成一个"都会"（托勒密常常用这个词来指一国的首都），而且再也没提到阿拉伯人的宗主权了。尽管这只是一个反证，看来很可能是：贸易的增长使当地人有了足够的财富和力量去推翻阿拉伯人的宗主权，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贸易之所以能够增长，很可能是由于拉

---

[44] 该词首次出现在普林尼著作第六卷第 172 页，似乎含混地指红海以外的海域。在《回航记》（15、16 及 18）和托勒密著作第一卷第 17 页及 121 页中，该词明确指非洲东海岸。有人提出是僧祇一词的讹误，阿拉伯地理学家后来用过僧祇这个词，它在托勒密和科马斯的著作中分别称为津吉萨和津吉翁：参见 C.S.P. 弗里曼－格伦维尔，1968 年。又见W.H. 肖夫，1912 年，第 92 页，我不考虑亚丁湾各地区，它们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区，主要经济活动包括出口乳香和没药，把东南亚产的肉桂进行转口；这些活动不是哈丰角以南沿海的典型经济活动，参见 B.A. 达图，1970 b，第 71-72 页。

[45] 《回航记》，15；B.A. 达图，1970 b，第 68 页；G. 马修，1963 年，第 95 页。

[46] 《回航记》，15。

[47] 同上书，16；托勒密，第一卷，第 17 页，转引自 J.W.T. 艾伦，第 55 页。

[48] H.C. 巴克斯特，第 17 页；J.W.T. 艾伦，第 55-59 页；B.A. 达图，1970 b，第 68-69 页。

[49] 《回航记》，16 和 17。

普塔的内陆地区在托勒密那个时代扩大了。托勒密指出，拉普塔不仅西至著名的白雪覆盖的月亮山脉，而且还包括拉普塔旁边那条河流的发源地附近的马斯特山，以及该山西北方向的菲莱山脉。[50] 关于这些山脉的情况希腊和罗马的航海者一定是从当地阿拉伯人和非洲人那里听到的，这件事说明已有某种形式的商业从拉普塔深入内地。从坦桑尼亚海岸北半部穿越荒原灌木地带的一条最明显的走廊，以及这个地区任何一个大港口最天然的内陆，就是潘加尼河谷和从乌桑巴拉和乌帕雷到乞力马扎罗雪峰（潘尼加河实际发源于此）之间的一系列山脉。近来在帕雷山区的贡贾进行的考古发掘，出土了贝壳和贝壳串珠，这说明当地与海岸曾存在商业往来，不过目前这些证据的年代不会早于我们纪元500年前后。[51] 所有这些情况都支持拉普塔位于潘加尼河畔的看法。[52] 商业贸易似乎还沿海岸向南发展，远至德尔加杜角。《回航记》作者认为，拉普塔就是已知世界的边缘，而托勒密却引用一位希腊航海者的话说，这个边缘还远在南方一个宽阔而不深的海湾末端的普雷森角，这也许指的是坦桑尼亚南部那段凹进去的海岸，其四周居住着“吃人生番”。[53]

564

就这样，到二世纪中叶，非洲东海岸的大部、以及潘加尼河谷走廊至少有一部分，都已被纳入这个国际贸易体系。罗马帝国从三世纪开始漫长的衰落过程，当年曾把商业边界推进到东非海域的那种动力也随之减弱。随着帝国经济分化和历代皇帝的横征暴敛，统治阶级的财富已耗散殆尽，城市消费阶级没落，中产阶级变为贫穷，从而使市场，尤其是奢侈品市场大为收缩，使经济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国际贸易上出现的变化是香料、宝石和象牙贸易由棉花和工业品取代。正如古币证据明显中断这件事说明的那样，直接贸易可能已完全停止。不过，随着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帝国政治再度巩固，在外贸上也出现一个短暂的复苏。东非现有的古币证据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它也显示出类似的波动。前面提到的海伍德珍藏，包括6枚公元二世纪中叶铸造的罗马帝国钱币，紧接着是一段空白，再接下去就是代表三世纪末叶和四世纪的79枚钱币。在丁巴尼的珍藏中似乎只有1枚一世纪的钱币，其余已核实的罗马钱币似乎是属于三世纪和四世纪的。[54]

东非纳入这个贸易体系的各种后果是什么呢？首先，这个贸易体系在其最昌盛时可能由于供应该地区铁制品（尽管其中大多数似乎是武器）而促进了它的经济增长，还可能因为提供了冶铁知识，从而对东非历史起了催化创新的重要作用。[55] 其次，对象牙、犀角和玳瑁的需求使得当初在本地没有什么价值的资源有了价值，从而扩大了东非财源的范围，而上面提到的椰油出口也说明人们不但从东方引进这种重要植物，而且还由于榨油，而促进了某些工业活动。国际贸易可能还使集市中心初步城市化，外国商人虽然前来交易，但其主要居民还是非洲人和沿海逐渐成长起来的一批混血人种，这两种人都日益面向海外，仰赖对外贸易，成为海外贸易在当地的联系环节。从外贸中获得的利益使这批人致富，或许

[50] 托勒密，第一卷，第17及121页，第四卷，第7及31页：E.H.沃明顿，1963年，第66-68页。

[51] 索帕(R.C.Soper)，1967 b，第24及27页；又见本文作者与索帕1972年10月13日通信。

[52] 对这个地点，各作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迄今在潘加尼河附近尚未找到古代遗址。偶尔有人试图证实鲁菲季河口的一处已湮灭的遗址就是拉普塔。

[53] 《回航记》，16及18；托勒密，第一卷，第9页及1-3页，第二卷，第17及121页。

[54] F.奥奈尔，1956年，第250页、第266 267页、第273-275页、第279页；M.P.查尔斯沃斯，1926年，第61和71页。有关东非古币证据，见本书第430-431页。

[55] M.波斯南斯基，1966 a，第87及90页。

还使他们集中了足够的财富和权力使拉普塔能够宣布自治。但它并不想退出使它繁荣起来的国际贸易。它对国际贸易依赖的程度越深，它的经济可能就越畸形发展、越不平衡，因为它太过于仰仗向富饶的罗马帝国出口少数奢侈品，从而很容易受到国际贸易波动的不利影响。当哥特人开始逼近罗马的时候(罗马是在我们纪元410年陷落的)，他们也扼杀了以罗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对那些可能已需要仰仗这个体系的所有地区都带来深远影响。结果，遥远的拉普塔也可能就此凋零了。从那以后，人们在东非海岸上再也找不到这个“都会”的痕迹了。 565

东非对外关系的重新组合

国际贸易体系的瓦解可能给另一个仰赖这个体系的国家，即阿拉伯西南部的希姆亚尔造成了同样的灾难性后果。罗马对它出产的乳香和它转手经营的其它东方奢侈品的需求减少，肯定影响了它的利益，并使它无力抵抗埃塞俄比亚以及后来波斯的入侵。在海上贸易方面，大部分中转贸易也让位于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的阿杜利斯港发展成尼罗河上游象牙的出口中心，不仅向地中海地区出口而且向东对波斯甚至对一向能自给的印度出口，这个事实标志着象牙贸易的方向已出现重大改变。[56]

不过，看来埃塞俄比亚人似乎并没有能够完全取代阿拉伯人而成为西印度洋上的转运者，东方的波斯正在作为举足轻重的海上强国出现。萨珊王朝从我们纪元三世纪开始就鼓励波斯本地人从事航海，在六世纪垄断了远至印度的贸易，而且最迟在七世纪就把商业活动伸展到中国了。他们还向西扩张，以控制通过红海的另一条贸易通道，在七世纪初征服了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和埃及。约在我们纪元635年，波斯帝国在穆斯林猛烈进攻下虽已崩溃，但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波斯航海家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控制着印度洋贸易，并为整个印度洋地区留下了一套重要的航海和商业词汇。[57]

波斯人在第六、七两个世纪里对西印度洋的控制，特别是当时阿拉伯人已经没落而埃塞俄比亚人又无力取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波斯人在东非海岸的商业势力必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东非海岸可能并未象有人曾一度认为的那样，落入波斯政治霸权之下，但设拉子人（波斯人）向东非沿海移民的经久不衰的传统也许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遗憾的是，在希腊罗马作家和九世纪阿拉伯作家之间，文献资料有一段空白；迄今在东非沿海也未曾发掘出伊斯兰时期以前的考古证据，仅有的就是可能在桑给巴尔某地出土的五枚我们纪元最初三个世纪的帕提亚和萨珊王朝的铸币。尽管如此，有证据说明东非和波斯湾之间至少早在七世纪就已有商业接触，众所公认这时已进入伊斯兰时代，但也有可能上溯到伊斯兰时代以前。已经有人提到从东非(僧祇)和其他地区进口奴隶当兵、当家仆或充当农业劳动者开垦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带。到七世纪末，这些奴隶的人数显然已增加到足以举行第一 566

[56] 范贝克(G.W.Van Beck)，1969年，第45页；潘克赫斯特(R.K.P.Pankhurst)，第26-27页；科马斯，第372页；G.F.霍拉尼，1969年，第42-44页。

[57] 哈桑(H.Hasun)；G.F.霍拉尼，1969年，第38-41页、第44-65页；恺撒地方的普罗科匹厄斯，第一卷，第193-195页；里克斯(T.M.Ricks)，第342-343页。九世纪的一份中国文献资料谈到了波斯人在索马里海岸的商业活动：杜伊文达克(J.L.Duyvendak)，第13页。

次暴动的程度，不过规模更大的暴动是又过了两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此外还有报道说，早在七世纪，僧祇奴隶就已到达中国了。[58]

波斯人和波斯湾可能也已开始在东非和印度之间起到居间媒介的重要作用。罗马帝国的崩溃使东非失去了主要的象牙市场，当时印度大体上仍处于自给状态。但到六世纪初，印度为制造婚礼饰物所需要的象牙似乎已开始超过当地的供应能力。印度的婚礼规定在夫妻一方死亡时就要毁掉这些饰物，从而保证了对象牙不断出现的需求。到了十世纪，印度和中国就已成为东非象牙最重要的市场。[59]

由此看来，到七世纪末，在东非海岸和印度洋北缘之间已经重建了牢固的商业联系。印度对象牙需要的不断增长终于使两个“森林”地区建立起牢固的商业联系，印度的市场在十九世纪前一直为东非服务。作为交换，东非得到的可能是品种繁多的制成品，其中包括布匹和珠子。这种交易巩固了建立在沿海的那些城邦的基础。但非洲东海岸历史上第二个时期经历的这次变化主要是在贸易方向上而不是性质上的变化：它的象牙市场起了变化，但它的经济依靠少数几种原料以换取制成的奢侈品这一点并未改变。奴隶出口虽然567 尚未达到令人发指或源源外流的程度，但这对东非人力资源仍然是一种消耗，这种消耗甚至在十九世纪以前，可能就已经在东非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和某些地点发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了。但是这种贸易控制在沿海各族的一个阶级手中，这个阶级本身就是国际贸易的产物，他们的兴旺也是以这种贸易的连续不断为基础的。很难指望他们会主动从这种依赖关系和不发达状态中摆脱出来。

（麻乔志译）

---

[58] T.M.里克斯，第339和343页；里亚维(S.A.Riavi)，第200-201页；G.马修，1963年，第101及107-108页。关于发现的钱币，见本书第431页。

[59] 科马斯，第372页；G.S.P.弗里曼－格伦维尔，1962a，第25页；见G.S.P.弗里曼－格伦维尔著作中引用马苏迪一节，1962b，第15-16页。

七世纪以前的东非

568

23

J.E.G.萨顿

了解我们纪元100年以后东非各族人民和社会的状况，比了解较早时期的状况容易。现在正在对一世纪以后各时期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发现的情况经常导致对以前所作结论进行全部或部分的修正。

对我们纪元前后各1000年这个长达2000年的时期进行研究是困难的。它要求采取复杂而细致的方法并掌握大量资料，而考古学迄今还不能提供完整的资料。

因此，下文所作研究难免带有揣测、假设，甚或在不止一个问题上是争论性的，目的在于激发思考和探索。

这样，研究东非早期历史的途径也就基本上只能从文化方面入手，试图在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提供的全部证据允许的范围内重现其生活方式（或几种生活方式）的本来面目。将经常涉及几种语族。这类语言研究就其本身讲可能不如更广泛的文化和经济方面的探讨重要，但语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在某一社会中代代相传（尽管不断有所改变）的历史事物，也是人们用以清楚地把本族群和其他族群相区别的一种手段：如果其他族群的语言他们能部分听懂或和自己的语言有某些共同点，他们就可以承认和这些族群有某些关系，或者相反，如果语言的相互联系并不明显，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族群完全看作外人。主要由于这些原因，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通常最清楚和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对各族人民从语言学上来加以规定和分类。本章采用的规定和分类法，已在附表和附图中标明。这些分类法大体上是按照《东非史通论》一书（奥戈特和凯伦合编，1968年）定下的体系，而该书则是以格林伯格的非洲语言分类法为依据的。

南方大草原的狩猎传统

在非洲赤道大森林带以东和以南大部分地区的大草原和疏树地区，铁器时代以前若干千年间的主要居民从事狩猎和采集，他们使用弓箭并有较高的石器制作技术（基本上属于考古学家称为威尔顿型的那种广泛的传统，参看第一卷）。这些人一般的体质类型属于现在居住在卡拉哈里及其边缘地带的所谓桑人和科伊科伊人所代表的类型。他们的语言本应属于科伊桑语系，其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点是“吸气音”。现在使用这些语言的在非洲南部和西南部只限于科伊人和桑人，在东非则限于居住在坦桑尼亚中部偏北的两个互不相干的小

571

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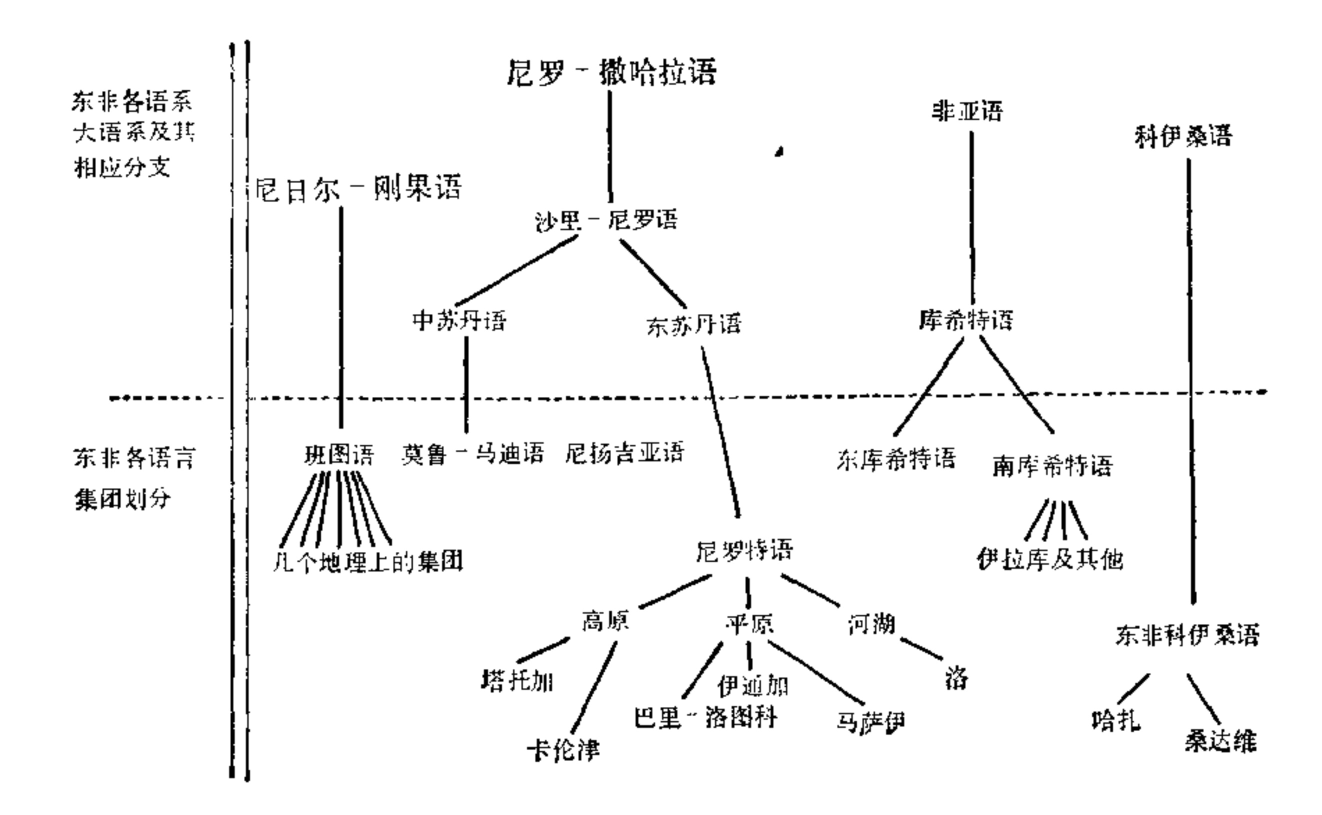


插图 23.1* 东非语系及其相互关系

* 插图23.1和23.2中"洛"(Luo)，在正文中为"卢奥"(Lwoo)。——译者注



插图 23.2 东非：政治地图及语言和民族分布图

族群——桑达维人和哈扎人。[①]

哈扎人现仍从事狩猎和采集，人数不多，流动性相当大，擅长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寻找和获取野生食物资源。[②]桑达维人则不然，他们已有相当时间种植庄稼，饲养牛羊，但对丛林仍保持一种明显的文化上的联系，对丛林的潜力有一种本能的了解。在体质上，这两个部落一般都属尼格罗种；但有些观察家在桑达维人身上发现另一种祖先的痕迹，在哈扎人身上也可能有。同周围尼格罗人通婚，或许就是他们逐步近似尼格罗人的原因。

人们看到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是，恰巧在哈扎人和桑达维人居住的土地以及位于他们之间的那片土地上有许多狩猎者岩画，涂绘在石器时代晚期常用作临时营地和家族基地的天然洞穴内壁上，这种情况和东非其他地区不同。这些岩画[③]具有社会的、而且往往是宗教上的涵义，但至今人们还不太理解；不过它们对狩猎方法，饮食和日常生活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说明。现在，在南部非洲的几个地方又发现同一时期的狩猎者艺术，同样是在岩洞墙壁上的绘画，而且，南部非洲作品和坦桑尼亚中部作品之间虽有某些明显的地区差异，但在风格、主题和技巧等方面却都可以看到不少相同之处。这两个地区的岩洞人又都采用威尔顿型石器制作技术，这种技术上的共同性又可进一步说明他们在岩画艺术上的相似之处。尽管现今已不听说哈扎人和桑达维人认真从事绘画活动（他们也都已放弃制作石头工具），但上述现象却说明，在石器时代晚期的某一段时间里，这一地区和南方地区属于同一人种和文化传统。

大草原上这种广泛的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具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上的复杂性和经济上的活力。假如食品消费的主要部分是由采集而获得的话（近来对桑族和其他族的研究已表明这一点），那么，获取肉类这一更为困难更受人尊敬的工作对保持饮食平衡和满足食欲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这一切活动都有赖于某种程度的流动性，当人群追逐猎物或开发某一地区的植物资源时，就要建立季节性的营地，而不是永久性的定居点，这样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也许还曾阻滞变革。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近几千年来，这些古老的大草原居民在大部分地区都被从事渔业、畜牧和农业的社会集团所同化，因为后者采取较为集约而多产的方法获取食物，能够保持更为永久性的基地，使他们的人口增加，居住地区扩大。

572

于是，狩猎和采集者曾经一度居住过的广大地区后来大部分就变成从事农耕的班图人的领地了。在这些班图人居住的若干地区中流传着一些故事，提到他们曾和过去住在丛莽和森林中从事狩猎的矮小的陌生人偶然相遇。这些故事虽然缺乏历史的确切性，但它们很可能反映了100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模糊记忆的梗概，那时班图人正向中南非洲这一辽阔地区移民，从而使人口稀少、生活方式很不相同的桑达维居民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并被同化。这种古老的狩猎传统可能在后来的农耕时代以对比的方式反映出来，在班图人的传奇故事中就突出地描绘狩猎者的功绩和技艺。一个王族世系的奠基人往往是一个到处游猎的弓箭手或是一伙猎手的头目。这似乎来自古老的观念，即对能把猎获的肉类弄回家的优秀猎手

① 哈扎人经常被称为"廷迪加人"(Tindiga)，这一名称不够明确。把他们的语言划入科伊桑语系曾有过争议，但很可能是正确的。把桑达维语划入科伊桑语系没有引起重大怀疑。

② 目前坦桑尼亚政府正试图对哈扎人进行农业指导，实施"村居化"计划。

③ 参看本书第一卷，第二十六章。

的力量、勇气、判断力和坚韧精神表示尊敬。

但并不是东非全境都成了班图人的天下。下文将说明，乌干达北部，肯尼亚大部以及坦桑尼亚中部偏北的一部分老早以前就被操库希特语、尼罗特语和其他语言的很多不同的居民占领了，其中有些在铁器时代就已在那里定居，有的还更早一些。在人种学和考古学方面已有若干明确证据，说明在这一带以及更靠南的地方，在古代和近代都存在着许多从事狩猎和采集的群体。其中多半大概都不能代表南部大草原上的灌木丛传统。虽然这一传统的北部界限不容易划定，但没有充分理由把这条界线划在维多利亚湖和赤道以北。一些文献有时提出，桑族类型的居民原先曾扩展到远达非洲之角和尼罗河中游的地方。但持这种看法只是根据一些颇不足信的证据或设想——即根据已发现的既少又零碎的遗骨，这些骨骼的区别不明显，或属于更古老得多的时期，那时非洲人的体质类型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完全分化；另外的根据就是在乌干达北部和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发现的同南方各地区的威尔顿型工艺有某些笼统或一般相似之处的石器时代晚期的若干石器堆，以及在某几个地方仍然零星存在这类晚期的小狩猎群和林居人。现存的这些族群的特点是，他们在社会或经济上能够独立的很少。他们往往不是实际上住在从事农耕和放牧的库希特人和尼罗特人的领地以内，就是住在他们旁边。他们说的是库希特语和尼罗特语，并向那些人提供灌木丛和森林产品——蜂蜜、兽皮、肉类等等。其中有些族群——例如肯尼亚高地上的某些多罗博人群——也许根本不是当地原来的狩猎和采集者，而是新近从事这一专业的人和在社会上不能谋生的个别返回林中的人。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某些说库希特语或接受了库希特人强烈影响的地区，这类群体往往构成主要族群中一些显然不同的阶级，而不是完全具有自己的特性的集团，他们一般从事脏活，主要是制陶和打铁，为当地社会大集体服务。这类手艺和大草原上那种狩猎和采集的古老传统当然完全不同。

573

尽管如此，东非北部这些地区在石器时代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可能曾是南部大草原的桑族类型居民同非洲东北部和中部其他居民的不同文化间的一个不稳定的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部分地由气候变化而定。关于这些地区的许多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然而，在东非或其毗连地带，至少还可以区分出另外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明显的人种实体，他们在近几千年中也是既缺农耕也少畜牧。这就是下面两节的主题。

赤道森林中的采集和诱捕传统

在刚果盆地的雨林中，特别是东面与卢旺达和乌干达西南部毗邻的边缘地区，居住着俾格米尼格罗人，他们的分布地区和人数比以前缩小了，这是由于定居从事农业的各族人民，主要是班图人，逐步扩展的结果。他们砍伐了大量森林，从而减少了俾格米人曾赖以生存的自然食物资源。这些俾格米人有许多已被同化，但还有一些仍然作为独立的人群存在至今。不过他们同邻近的班图人保持联系并操班图语。

这些俾格米人的森林生活虽然和桑人一样在经济上以猎取野生动物和采集植物为基础，但他们要适应完全不同于桑人的生态环境并掌握不同的专门技艺。如果把俾格米人和桑人都列为“狩猎和采集者”，那就忽视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上的不同点。他们彼此间

的差别，正如他们同班图耕种者之间的差别同样大。俾格米人（桑人也一样）的生活方式必574然代表着一种同特定环境紧密相连的古老文化和经济传统。对俾格米人说来，这种环境就是茂密的森林，他们那独特的体质特征和矮小的身材就是由这种自然环境决定的。

但是，能够说明俾格米人的情况及其古代地理分布区域的任何种类的历史证据都极少，虽然曾在刚果盆地作过一些极为初步的尝试，想把石器时代晚期和中期的某些遗物（卢彭巴－奇托洛人文化复合型）同俾格米人联系起来。这一复合型文化的分布情况和年代测定至少说明存在某种重要的森林和林地传统，其渊源古老，并持续到相当晚近的时期。在卢旺达以东，这个传统的较后诸阶段的情况表现得不太清楚。因此，假如这些遗物原来是俾格米人制造的，也不能说明在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在雨量较大、森林面积更大的时期，也不能说明他们已扩展至东非。历史和人种学著作中，的确也偶尔提到俾格米人从前曾在东非一些零散地区出现。这些说法有些似乎是以人种学的错误观念为依据，另外一些则来自民间故事或模糊不清的口头传说，它们曾提到过去从事狩猎和采集的矮人。由于这些记述指的是特定的民族和相当确切的某些时期，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指的是具有大草原传统的桑人类型的狩猎者，或者指东非偏北地区的一些分散的族群，即上文讲到的所谓多罗博人和其他林居人。

在这些传说中的森林人中，应特别提到肯尼亚高原东部地区的基库尤人所说的贡巴人。贡巴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在这些问题上，人们的看法颇为混乱。这首先是由于证据本来就很模糊，提供材料的人们又往往想使传说合理化；其次是历史研究人员的记录和分析都很混乱。尽管如此，在基库尤地区毕竟还存在着清楚的考古学上的证据，说明在近两千年来某个时期，有一种住在高原森林里的人，他们在山脊上建造一簇簇奇怪的圆形窑洞，并且显然住在里边。虽然这些人制作石器，但他们大概并不就是当地隐居山林的石器时代晚期遗民。他们制作陶器而且还可能和铁器有关，这些情况说明他们同早期高原班图人有某些文化联系，而且很可能还曾为这些班图人完成特定的经济任务。这些人和业已消失的传说中的贡巴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对他们进行更为充分的研究之后，就可能为局限于一地区的居民如何发展起独特的森林文化提供宝贵的实例，尽管其时期相当晚近，而且同附近从事农耕的人们有某种共生现象。从这种适应环境的总的水平来看，他们或许与刚果盆地的俾格米人有某些相似。但是，即使某些作家曾经作过不少猜测，如果设想基库尤兰森林中原有的居民（不管是贡巴人还是其他什么人）就是俾格米种人，那仍然是缺乏有力根据的。

575

非洲中部的水上生活传统

这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已在本书第一卷进行过研究。[④] 因此，这里只说说这种有趣的生活方式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

到我们纪元前5000年，气候比过去显著地变得干旱，注入湖泊的河流愈来愈少，愈来

④　参看本书第一卷，第二十章。

愈小，湖泊从原有的高水位大大下降，从而破坏了水上生活方式的地理环境的连续件及其在某些地区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它在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已成过去。可是，到我们纪元前3000年左右，气候在一段时期内又变得较为湿润，湖泊的水位也相应提高(但并未恢复到我们纪元前七千纪的高度)。当时，在肯尼亚裂谷东部，在某种程度上再度恢复了水上生活的文明，这也许是由于新来的移民或者是同尼罗河中上游接触的结果。这一较晚阶段的水上生活遗物，如少见的陶器式样和浅石碗，是在鲁道夫湖和纳库鲁湖上游发现的，时间一般在我们纪元前3000年左右。尽管在这个时期的遗址上显然找不到鱼叉，但这些人肯定曾从事渔业。但和3000年至5000年前的那个主要阶段比较，他们的食物很可能不象那样以水生物为主了。到我们纪元前2000年，气候再度干旱之后，在裂谷东部大部分地区，水上文化继续存在的条件最终遭到了破坏。

看来水上生活晚期的居民似乎基本上也是尼格罗人。还缺乏有关其语言的直接线索。但最合理的说法是，它属于沙里-尼罗语系的某一分支(尼罗-撒哈拉语的东支)。

人们往往设想，在我们纪元前8000至5000年之间的主要阶段及稍后在我们纪元前3000年左右复兴时期的伟大的水上文明，都是以尼罗河上游的河流和沼泽，特别是东非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古代沿岸地带为代表的。奇怪的是，在这几千年里却似乎缺乏这方面的遗迹。不过，到我们纪元前一千纪，在这一地区有一些在岛上、岩洞里、露天以及大湖沿岸和河边扎营居住的人们，他们的食物包括鱼类和软体动物，但也有丛林猎获物的肉，也许还有牛羊肉。他们当中究竟有没有一些人从事农耕却很难肯定；不过有某种饶有兴味的证据，说明当时维多利亚湖附近曾清除森林，这至少可以表明有过某种新的和相对集约的土地使用方式。这些人制造的陶器，通称甘雪雷陶器，和古老得多的早期水上生活传统的那种虚线波纹陶器有某些明显的共同点。据现在所知，在尼罗河流域这些陶器早已被取代，因此，甘雪雷式陶器不大可能是迟至我们纪元前第一、二千纪才传到维多利亚湖的。更可能的情况是，这里的水上生活传统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可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但迄今所能了解的只是这种传统的最近的一个阶段，即与铁器时代相衔接的最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会设想，在更靠南的东非各湖泊地区——特别是整个坦噶尼喀湖沿岸地带——还能发现那古老水上生活的遗迹。 576

目前还没有直接线索说明这些在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居住在维多利亚湖边的人们属于哪个语族，但他们说的可能是中部苏丹语(沙里-尼罗语的一支)。这个地区及其以南地区从铁器时代开始以来就居住着班图人；语言学中有一派认为，班图人在定居该地的过程中曾同化了那些更古老的人数较少的操中部苏丹语的居民，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牛羊及其驯养方法。早期班图语里没有称呼这些牲畜的字眼，就借自早先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而这些早期居民的语言后来却灭绝了。在维多利亚湖以南还没有发现可靠的考古学证据支持这个假设，但在该湖周围却可以找到一些情况，证明有甘雪雷陶器的那些遗址和中部苏丹语族有关，特别是把某些遗址与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的牛羊遗骸联系起来是正确的话。也许，一种与外界隔绝并已十分衰落的水上生活传统这时由于同东面肯尼亚高原上那种已形成的新的放牧传统相接触而重新恢复了活力。

库希特人的放牧传统

由于较干旱的气候在我们纪元前二千纪业已成为定局，不仅湖泊的水位已退到和目前差不多的高度(有些湖泊鱼类也已绝迹)，而且森林也后退了，变成了良好的山地牧场，最显著的是在东部裂谷和附近的高原地带。虽然在维多利亚湖以及其他几处湖泊和河流的沿岸人们仍能捕鱼并保持古老的水上生活的某些特点，但在广大区域内这种传统已丧失其地理环境的连续性，同时使这种文化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在中非地带大部地区，特别是在它的东端，养牛获得了新的声誉。继续住在水边并以水产为生一般都被视为落后和思想保守的表现。这种生活方式不但古老陈腐，而且在较为成功的放牧群体看来既不文明又不干净。东非最早的放牧者的标志就是不仅仅说库希特语并坚持实行割礼，而且还禁食鱼类。

长期以来，在东非那些拥有大量优质牧草而且没有采采蝇和传染病的地区，牛就已经是声望和财富的象征了。但是对牛的这种心理状态是以实在的经济考虑为基础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牛提供肉食，更重要的是奶，甚至对依靠种地获得大部分食物的人们来说，牲畜也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而且还是渡过不时出现的旱灾或虫灾饥荒的保证。再者，人们也不应忽视山羊和绵羊的重要作用，它们通常是那些专事养牛或农耕的人群的肉食的主要来源。

577

至少在3000年前，东非第一批牛就已传入肯尼亚高原和裂谷地区。这批牛大概是一种有长角、背无隆脊的品种。属于铁器时代以前整个第一千纪的好几处遗址中，都发现有母牛和山羊(或绵羊)的骨骸。这些遗址只有少数是生活场所，更多的则是埋葬地，有的在山洞中，而更通常的是在石冢(石堆)中或石堆下。显然，要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这些居民的经济情况，还有待于发现更多的居住遗址并进行细致的考察。不过，坟墓里的随葬品尽管无疑是经过特别挑选而且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但它们往往保存得比较完好，在某种程度上必定对当时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有所反映。迄今已发现的遗物中有磨盘和杵，深底石碗和石锅，葫芦和木制器皿(大概是喝牛奶用的)，篮子和绳子，磨制的石斧和加过工的象牙物件，用各种石头、骨头、贝壳和坚硬植物材料制成的珠子穿成的项链。作为一种文化的复合体，它大致相当于上文说过的“石钵文化”(属于其主要时期和晚期)，但将来大概会发现这种文化实际上包括一系列群体和多种文化变异体。

他们的经济不仅限于放牧。他们还猎取羚羊和其它野生动物．某些比较贫困的人群或许更是这样。这些人是否种植某些种类的高粱、小米或其他粮食，现在还不能肯定，但看来可能性很大。首先，在一些遗址上发现的陶器的数量表明，至少居民的一部分比单纯从事放牧的人群过着更为稳定的生活，而磨碾设备也说明存在谷物的种植、加工和食用。不过，这些巨大而扁平的磨石和附带的杵也许是用来压碾野生植物甚或非食用物品的。例如，坟墓里的一些磨石和杵就沾着用来装饰尸体的红赭石。但这种现象并不能排斥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设想当时存在某种种植业的一种较有说服力的论证是：如果在长期干旱或牛瘟之后出现严重危机，没有能力获得另一些代用食物的社会是不大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而狩猎和采集只能作为暂时满足需要的手段和分散的小人群的主要食物来

源⑤。不过，这些人实际上只住在那些有优良广阔草地的地区。这种地理分布情况说明这种文化的重点是养牛，在经济上主要是依赖畜牧业。这条很长的放牧地带的南部界线主要是坦桑尼亚北部的火山口高地，包括恩戈罗恩戈罗那块绿色盆地及其同时期的墓地。假如他们是更重视畜牧和农业结合的民族的话，那他们早就会向他们东西两侧那些肥沃地区扩展并可能继续向南发展了。 578

居住在肯尼亚和高原和裂谷地带坦桑尼亚北部的早期放牧者，他们的陶器式样和物质文明的某些其他特征似乎曾接受尼罗河中游地区的影响。但这种反映不太明显，所受影响大概是间接的。这些影响并不一定意味着牛和牧牛者是从尼罗河中游地区来的，而可能是同晚期以水产品为生的居民接触并吸收了他们的文化的结果，这些居民在更早以前就同尼罗河流域有联系，并已在裂谷的湖泊地区定居。从水上生活晚期到放牧生活早期的大约2000年间，奇特的石碗在这个地区的连续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

地区间的差异也同样重要。这是因为，自从我们纪元前第二千纪以来，就逐渐形成一条南北向的文化分界线，界线以东是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高原地带(中间有一些干旱的平原)，放牧传统已在这里牢固扎根；界线以西是包括维多利亚湖在内的尼罗河流域上游盆地，在这一带，以水产为生的经济在人数很少的居民群中仍保持活力。但对人和思想来说，这条界线从来都不是一种铁幕或屏障，在铁器时代和以前的时期实际上界线两边一直存在人的来往和思想交流。但它确实是两种广泛的有显著区别的文化传统的接合处。这一点在语言的比较分析中已得到反映，通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观察也可看出，但不如前者那么准确。

对体质类型作出概括尽管困难，但人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条线以西的居民都是典型的尼格罗型，而界线以东那些高原和平原上的居民，尼格罗种的成分较少。对语言进行的研究表明，埃塞俄比亚对东非高原的影响始终保持在这条文化分界线以东。埃塞俄比亚是库希特语系的故乡，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东北和中部以北地区的现代班图语和尼罗特语大都显示出借用库希特语的迹象。在少数地方，特别是在这个地带的南端，这种南库希特语确实一直保持下来，当然已和古代的库希特语大不相同。词语借用所提供的文化和历史的重要信息之一，就是东非早期库希特居民对养牛事业的贡献。 579

在东非历史上库希特文化这个因素也以其他方式反映出来，而且在肯尼亚的平原和高原以及坦桑尼亚北部一部分地区的各族居民中以年龄组织为基础而非以酋长为领导的社会和政治机构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不过这是个笼统的说法，并不是这些体制的一切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库希特人原先的定居地。⑥其中实行割礼的习俗必定起源于库希特人，因为具有这种习俗的人与大量借用库希特词语以及对鱼类经常表示反感的人分布在极其相近的同一广泛地区中，而后者在东非历史经历中的重要性已在上面论证过了。

---

⑤ 的确，在近几个世纪里，有某些放牧社会曾设法完全不从事农耕（甚至还轻视狩猎）。但这只有依靠同从事农业的邻族以货易货来得到谷物和菜蔬以渡过干旱季节，或掠夺从事农耕-放牧混合经济的其他族才有可能。后一种活动对中部马萨伊人各分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虽然控制了广阔良好的高原牧场，却常常感到自己的肉类供应不能满足食欲，更重要的是，在荒年或歉年之后如果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维持本社会的生存，就不得不获取新品种的公牛并立即补充奶牛群。对我们纪元前一千纪原来的东非养牛者说来，采取这两种解决办法都不可能。

⑥ 有些可能是后来同埃塞俄比亚南部和肯尼亚边境特别是在鲁道夫湖地区的东部库希特各族人民接触的结果，在目前的一千纪中，某些东部库希特人，特别是加拉族和索马里族，已远远深入肯尼亚北部和东部。这种迁移应同在这里论及的古老得多的南部库希特人的扩展区别开来。

至此，我们就可以得到操库希特语的牧人的一幅图景了。他们身材高大，肤色稍浅，大约在3000年前向南方扩张，成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部的富饶草原、平原、特别是高原的主人。这些说法似乎是在复述现在已遭否定的含米特神话。问题在于，尽管那些含糊不清的各种含米特假设中不合乎逻辑和浪漫主义的方面确实来自怀有偏见的欧洲学术界和对非洲、对黑色人种的各种荒唐看法，但这些观点所依据的事实却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其中有些看法是敏锐的，某些历史解释也是很有见识的。含米特学派的错误是对各个民族和各种思想的**起源**进行先入为主的猜测并固执成见。这个学派不能正确评价当地情况，反而特别强调某些方面的外部影响，即库希特因素和畜牧的声望，却不把这看作仅仅是东非历史和文化经历中许多部分中的一部分——在东非历史和文化中，古老的大草原狩猎传统，在湿润的几千年中确立的水上生活传统，以及同铁器、农耕关系密切的较晚近的班图文化，都是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

580

班图人的农耕和使用铁器的传统

如果说库希特人在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在东非一个地带的文化和人种上的标志是放牧生活和与之相联系的对鱼类的禁忌，那么，早期班图人在随后一千纪的标志则是铁器制造和使用。这种知识如何得来并从何处得来，这个问题仍然不清楚，已在第二十一章中讨论过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比这个起源问题要重要得多，那就是早期班图人倚重铁器并被认为是掌握铁的秘密的人。东非更早期的各族人民大概都不熟悉铁器。他们用合适的石头并用古老的技术来制造工具和武器。例如，在库希特人居住地带的东部裂谷，有一种特别优质的石料，叫做黑曜岩(即不透明的火山玻璃)，用这种石料可以很容易地制成各种用途的大小不等的极好的刀刃，包括矛头，也许还有行割礼用的刀。同一时期，另一些住在维多利亚湖周围、仍部分地坚持水上生活传统的居民群，在获得石料方面不象前者那么幸运，但他们仍能用石英、燧石和其他易磨成薄片的石头制造成套的工具。在他们南边各地区那些大草原上的狩猎者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不同的民族来讲，第一次接触到掌握铁器工艺的陌生人，在思想上必定引起过震动。

班图人扩张的主流是广阔而迅速的，并不象某些人争辩的那样经历一系列渐进的阶段。但这种扩张既不是毫无目的的游牧式的漂荡，也不是有组织的军事征服，而是一种卓绝的名符其实的**殖民**过程，是对基本上荒无人烟的地区进行开拓。班图人的扩张并未囊括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全部地区。东非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仍然未被班图人占领，这是因为，某些更早期的居民具有恢复活力和适应的能力，特别是东部裂谷狭长地带的古老的库希特各族居民；在铁器时代，这些居民的队伍又由于某些尼罗特人分支的到来而得到扩大（参看语系图和前后各节）。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2000年间，东非的班图人与库希特人和尼罗特人之间没有什么相互影响。那时想必不断出现过大量通婚和相互同化的现象，以及某些文化上互相借鉴和经济上的相互促进。在那些具有适当的草地而没有采采蝇为害的地区，班图人不久就开始用牛奶和牛肉补充其农业食品。对于那些住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和该湖以西青草茂盛的高原牧

场上的班图人来说，牛早已变得特别重要了。而住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部高原上的那些库希特人和尼罗特人，则由于有养活更多人的绝对必要以及邻近班图人及其技术的榜样和影响，反而逐渐扩大了谷物的种植。高原上某些地区在语言上业已班图化，但从文化和社会的各种特点来看，又反映出实际上为库希特基本文化所同化的迹象。这一点在人口众多而密集的基库尤人当中最为明显。他们的语言是班图语，从他们在这些肥沃山丘上从事集约农业和清除森林来看，是采用传统的班图方式。但是，基库尤的政治制度是以年龄集团区分和实行割礼为基础的，同时又厌恶食用鱼类，这些更多地是属于高原上较古老的库希特人的习俗。 581

因此，库希特人居住的高原和裂谷地带，虽基本上保持其原来的状态(在铁器时代，就实际语言分布来说，更为尼罗特化而不是库希特化)，但确曾受到班图人某种程度的入侵，特别是在具有异常丰富的农业潜力(因而也终于拥有最稠密的人口)的多雨的森林地区。另一方面，在我们纪元第二千纪，班图语的分布范围在一些地方缩小了。这种情况发生在索马里南部和肯尼亚东北部的沿海地区和内地；后来又发生在卢奥人向外扩张所及的乌干达中部和东部以及肯尼亚维多利亚湖岸地区。这些迁移活动和同化过程对这些地区后来的历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各卷中将更详尽地加以探讨。但相对地说，这些都是些较小的调整。这里更重要的是看到东非主要语系的分布和处于胚胎状态的几种文化传统业已确立。班图人的扩张已基本结束，班图人在东非的北部界线在1500年前就已大致划定。班图人的殖民活动受到早先业已确立的几种强有力的有充分适应能力的不同文化和经济的遏制，而局限在这条有伸缩性的不规则的边界线上。但在维多利亚湖周围以及由此往南的那些地区，情况就不同了。

正如上文已论证的，在班图扩张前夕，维多利亚湖沿岸及其周围沿河各地那些群体是古老的以水产为生的居民的后代。后来，他们兼营一些狩猎，可能还附带搞少量牲畜饲养甚至农业，但仍和东面的库希特高原牧民截然不同。不管这些人是否多才多艺，他们似乎很快就被班图移民的社会同化了。尽管如此，他们的遗产可能还相当丰富。特别是，维多利亚湖沿岸地区和湖中岛屿上班图人的捕鱼技术和信仰的某些方面，很可能就是起源于原先这些居民的。对湖神马加塞的崇拜肯定是一种很古老的传统。湖神是暴风雨的制造者，他的善意能保证捕鱼成功，他愤怒时会带来灾难。

同样有意思的是，考古发掘积累的文物及测定的年代表明，东班图人是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区和西部裂谷以北的高原上巩固自己的地盘并发展其大草原生活方式的。想必就是在这雨量充沛、紧靠森林边缘的地带，首先开始试种高粱和小米（适合在大草原进行大规模扩种)；也正是在这里，开始懂得饲养牲畜，形成具有独特风格和装饰(如底部微凹等)的班图陶器，并使冶金工艺得到完善（是否在这里首创还不能肯定)。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坦桑尼亚西北部、卢旺达和扎伊尔的基伍省，即沿大雨林东部边缘的肥沃区域，曾出土砖砌的炼铁炉，说明当时已有十分复杂的高产的炼工艺。如果可以将班图人从原来的森林基地向外扩散的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的话，那么这个阶段就是第一阶段或者说形成阶段，其开始时间也许是早于而不是迟于2000年前⑦。 582

⑦ 这只是森林东侧的现象，或者也同样是坦噶尼喀湖和刚果河口之间那块南侧地区的现象，还有待对后一地区作更充分的调查研究（参看第二十五章)。

再往南，在坦桑尼亚和更往南的地区，在我们纪元第一千纪早期和中期那几百年间，班图人的扩张所遇到的是更未开化但也许更单纯的局面。当时，他们以必要的工具，技能和种子等装备起来，从东非西部人口比较众多的基地奔向四方，深入林地和大草原。这些地方人烟稀少，一向是习惯于丛林生活传统的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人出没的所在。这些猎人对班图人的影响虽非无关紧要，但毕竟不如班图人在乌干达和肯尼亚所遇到的各族人的影响大。尽管如此，在每一个新殖民区域，灵活性和适应性仍然是必要的，这要看土壤和海拔高度、雨量及其年分布量而定⑧。他们无论走多远，都仍然保持着班图特性：作为班图人确实意味着不断地从群体中分出，带着一袋种子和清除场地、进行耕作用的少量工具，在一地暂住，而不是在永久性的村庄里**安家落户**。在班图人到达这一次大陆的西海岸和卡拉哈里沙漠边缘之后，这种过程并未立即停止，因为在他们穿越的那些地区还有大量土地，有待开辟。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不必求助于集约耕作法就能供养增长的人口。班图乡土史的主题往往集中于早年的氏族身上，他们的始祖据说是首先来到这里清除丛林的人。

583 当地原有的狩猎者并不一定被强行驱逐或杀害，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因了解当地情况并掌握射箭技术而受到尊重。但随着定居人口日益稠密，有组织的狩猎和采集活动的范围也日益缩小，已不再作为全部的谋生手段和集体的生活方式。许多猎人都先后被班图社会同化了。但他们大概是作为个人，通过婚姻、也许是以受庇护的身分被同化的；以狩猎群或部落的资格是不可能这样改变其文化，使自己"班图化"的。

班图人掌握新技术，魔术般地控制了土壤，使它开始提供谷类食物⑨，又有将谷物煮成可口食品的锅，以及铁制工具和箭镞(这些东西偶尔也可以同狩猎者进行交易)，他们的成功和优势地位就有了保证。他们可以同化猎人而不用担心丧失自己的特性或冲淡自己的文明。他们似乎已无必要保持人为的区分标志或禁忌(班图人一般的毁肢或禁忌并不明显)。他们有反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新语言就足够了。上文已提到，他们的经济有灵活性，按当地情况可包括狩猎、捕鱼或养牛。在不能从事这些活动或这些活动不足以维持蛋白质需要的地方，大概就以饲养山羊或种植某种豆类来满足这种需要。正常的主食大概是高粱。这种设想的根据是：这种谷物品种繁多，能适应各种地形，因而是东非和班图地区一种古老的传统谷物，而且在赞比亚，在早期铁器时代定居点进行的考古发掘，已辨认出炭化的高粱种子。⑩

这样解释班图人于铁器时代初期在东非(以及在东非以南和以西各地)的扩张和定居是根据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证据，同时也考虑到人种史的一般论据。班图语有很多分支，特别是在刚果森林以外的地区，它们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有共同的紧密联系，这说明

---

⑧ 在东非北部和近海岸地区，正常情况下可种植两季。但再往南，主要气候规律只允许种植一季。

⑨ 通常必须进行求雨活动。

⑩ 在某些较早期的著作中，对香蕉在班图扩张中的作用进行过相当多的研究。这一作物来源于东南亚，直到我们纪元一千纪某一时期才被引进到非洲东海岸，在这以前似乎不大可能。因此，班图社会必然是在大扩张已完成之后才懂得种植香蕉。当然，它是已定居的民族而不是正处在殖民过程中的民族种植的作物。在后来的班图历史中，永久性的香蕉园在人口稠密的定居的多雨地区日益重要，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湖以北和以西地区以及几片广阔的高原上。事实上，在最近1000年左右的期间里，香蕉在东非的利用和发展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

美洲淀粉类食物——特别是玉米和木薯——在东非直到最近才懂得种植。

它们大约是在近一两千年中才从同一种语言分化和演变而来的。对班图语各分支进行比较研究所发现的另一件事情是，他们很早就知道有铁并掌握了炼铁技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在非洲东部和中南部许多地区的铁器时代早期的考古遗址（其年代为我们纪元一千纪早期和中期）同班图人的殖民活动联系起来的原因之一。但是使人们确信这些遗址就是早期班图人的遗址的一个更重要的明显原因是，这些遗址的分布范围和现代班图各族的分布范围恰好吻合。如果说曾在这一广阔地区内生活的是极为不同的另一种居民，他们只是在不超过 1000 年以前才完全绝迹，这种推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584

在这些早期班图人遗址上发现次数最多而且可据以作出判断的遗物是陶器碎片，而不是铁制的工具和武器(因为这些东西一般都太贵重，不会被丢弃，即令被丢弃，恐怕在正常情况下也因锈蚀早已完全烂掉了)。这些已在前文提到过了。在班图人定居的整个广阔地区，这些陶器从最初起在各个地区就不相同。考古学家不断识别出新的类型。最著名的大概是凹底(或乌雷韦)陶器。它们是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和以西各地发现的，而且还扩散到坦噶尼喀湖北端和扎伊尔森林以南的疏树地带。除了其中某些器皿具有凹底之外，还有许多具有造型精细的上缘和雅致的漩涡形和其他式样的装饰。在凹底陶器地带以南和以东，铁器时代早期的器皿可分为两大类。在坦桑尼亚东北部和肯尼亚东南部，亦即在库希特人聚居的广大凸出地区以外，从高原边缘到沿海平原都发现一种陶器，被称为夸莱陶器。在坦噶尼喀湖南端以及更靠南的那些地方，已鉴别出大量的地区性陶器，其中包括在赞比亚发现的那些以前叫作槽形陶器的器皿。

所有这些陶器普遍地都有亲缘关系，这一点人们并无争论，但从这一点来推论班图人扩张的方向这个问题，却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最能说明问题的，并不是最普通或最典型的陶器，而是这些陶器极其鲜明的特色。在赤道和南非边境之间那些分散的遗址上收集到一系列铁器时代早期的陶器，一眼就可看出是北方陶器，特别是维多利亚湖周围和以西的凹底陶器，具有创始的特征，而越往南这种特征就越不显著。这简直就象北方陶工有意识地在他们的陶器上打上“班图”印记似的；而业已脱离传统主流的南方陶工，则把原先的班图陶器形状、边缘和装饰图案逐步简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从坦桑尼亚中部往南的所有地区，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看来，这一带的制陶工艺似乎是最早的班图移民带来的，这一带每一件陶器都很自然地表现为“班图”式。但在肯尼亚高原和维多利亚湖周围，其他各族早已制作他们自己的陶器了。因此，东部的夸莱陶器虽然可能没有凹底陶器那种始创特征，却仍需保持和强调其特殊的班图风格。实际上在坦桑尼亚东北部那些有树林的山丘和开阔的平原相连接的地方，夸莱陶器和同时期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陶器同在一地出现。这是不是班图人和库希特人接壤之处呢？ 585

根据这些陶器证据，还不足以画出一幅详尽的班图扩张图，特别是因为在有些地区几乎毫无考古方面的证据，包括坦桑尼亚南部和莫桑比克在内。尽管如此，大致的情况是，班图人从维多利亚湖以西森林边缘附近某地一个总的中心出发，通过大草原向四处散布。最近对现代非森林班图人的语言关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表明，这和班图人的历史发展和从森林向外扩散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看来情况肯定是这样：当初他们从森林里成功地向外扩散时，无论是从森林南边还是东边，第一步总是沿着森林的边缘向一个或两个方向

扩散，进入维多利亚湖周围同样湿润的地区。更大胆地向南方和东南方推进到几乎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是后来的事情。

在坦噶尼喀湖南端周围地区或它与尼亚萨湖之间的走廊地带，可能是次要的扩散中心。这不但对南方的班图人说来是如此，对东北那些"夸莱陶器"制造者说来也是这样。但要弄清后一地区的历史还有待于掌握我们纪元第一千纪坦桑尼亚南部的情况。有一种设想认为操庠希特语的人是径直通过坦桑尼亚中间地带，从北部高原扩散到南部高原的。

在现代东非班图人当中，制作陶器通常是妇女的手艺。但在西面和南面那些地区，却有人种史上的线索说明班图制陶传统最初是由殖民人群中的男性手艺人传播的。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根据D. W. 菲利普森在赞比亚收集到的考古学和人种史上的证据，是有可能作出这样的推断的。⑪假如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制陶技术很可能是同另外一项重要班图手艺即熔炼铁矿和锻造工具紧密相连的。如果缺少深谙制陶和制铁奥秘的行家，任何殖民活动都不可能成功。不过，当时很可能存在过某些贸易，虽说贸易在这种早期阶段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铁矿虽说不少，但也不会到处都有，真正的富铁矿则很少。铁的分布状况可能对班图人最初定居的模式发生过影响。上文已谈到，在卢旺达以及它和坦桑尼亚毗邻的地区，很早就对富矿进行开采并有精心制作的炼铁炉。同样，在坦桑尼亚东北部帕雷山间和山麓的那些早期遗址，也许反映了对该地区丰富铁矿的兴趣。在相距不远、没有铁矿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丘陵地带，却有更多属于这个时期的遗址。近代交易方式，即从帕雷将炼好的铁锭（也有锅）运到乞力马扎罗交换食物和牲畜，也许已有大约1500年之久了。虽然如此，仍然不应当设想这些早期班图殖民群体会开展大规模的长途贸易。当时侧重的是定居和自给自足。商业发展的迹象是到大约1000年以前班图历史的中期，才变得明显起来。在较早时期，甚至在夸莱陶器遗址（其中有些是很靠近印度洋的）也都还没有出土来自沿海或外国的物品。

586

对这些农业群体来说，另一种家用必需品就是盐了。在近代东非许多地区是用多种方法获取这种日用品。这些方法包括焚烧从土壤中吸取盐分的某种芦苇或草，将草灰溶于水中，将所得咸水过滤、蒸发。在某些地方对含盐土壤也使用这种方法。煮食坚硬菜蔬用的苏打也是用同样方法取得的。这些方法的生产率一般都很低。而且盐的质量往往也很差。有些地区甚至连这些东西也弄不到，想必是依靠交换来满足他们最低限度的需求。在东非内陆少数地区，较丰富的食盐资源如浓盐土、咸泉和裂谷地区的矿泉湖等所以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其中，迄今已知的在铁器时代早期就被开发利用的只有坦桑尼亚西部乌温扎的纯咸水泉。对其他产盐中心——乌干达阿伯特湖滨的基比罗，坦桑尼亚西南部的伊武纳——进行的调查，并没有获得在本千纪以前有任何开发活动的证据。但如果对这些遗址，特别是乌干达西南部卡塞尼和卡推盐湖作进一步调查，就有可能为早期阶段提供更多资料。此外，更靠东的班图人无疑是从沿海的小港湾中得到食盐供应的。

尼罗特人：适应和变化

除班图人外，另一个语族——或更确切地说，一系列相互关系比较疏远的语言集团——

⑪ 参见《非洲历史杂志》，XV(1974)，第1-25页，特别是第11-12页。

在铁器时代占据了东非很大一部分地区。这就是尼罗特人。虽然这些尼罗特人的体质特征在某些一般方面和班图人不同，但他们仍一清二楚地属于尼格罗人种。不过，在说尼罗特语的人中，那些向东向南迁移最远达到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部老库希特地带的人，的确曾同化了某些原先属于埃塞俄比亚人种的居民。这一点有助于说明现代伊通加人、马萨伊人、卡伦津人和塔托加人族群具有原先尼格罗人特征的原因。过去曾把这些人列入“尼罗－含米特族人”。他们继承的文化遗产进一步表明他们的祖先一部分是库希特人——但这些各不相同的族群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其中还包括从库希特语中借用相当多的词汇。但他们的语言基本上仍然是尼罗特语。⑫ 587

现在还不了解尼罗特人早期历史的具体情况。不过，从他们现在的三个分支分布情况和内部联系看，说明他们原先的家乡可能就是尼罗河上游盆地中的低地草原和沿河地区。人们可以推测，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沙里－尼罗语系的东苏丹分支当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族群，而且迅速地即使并不是爆炸性地、不时向几个方向扩张，就是因为他们在大约3000年以前，在这一古老的水上生活地带的上述地区开始饲养牛的结果。这些牛有可能是从东面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库希特人那里获得，更可能的是从尼罗河更靠下游的人们那里获得的。在白尼罗河流域一带，捕鱼业当时仍很风行，和饲养牲畜、发展谷物种植同时并存。在白尼罗河及其支流沿岸，现代各族在经济上仍然保持着同时从这三方面利用其环境的习惯。

尼罗特语族中各个分支间——高原、河湖和平原⑬上的尼罗特人使用的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别是深刻而古老的(比如说，比班图语族各分支间的差别深刻而古老得多)。而且“尼罗特母语”分解的年代虽不能确切估计出来，但可能不会晚于2000年以前。这大概是在苏丹南部某地，靠近埃塞俄比亚边境的地方发生的。近2000年来，这三个分支有代表性的人群从这一带地区出发迁入东非北部甚至中部。但是，平原尼罗特人（明显的如乌干达东部和肯尼亚西北部的伊通加族群和肯尼亚及坦桑尼亚北部的马萨伊族群）和河湖尼罗特人(乌干达和肯尼亚沿湖地区的卢奥族群)的向外扩张属于本千纪，因而是本书以后各卷关心的问题。在本卷，我们所关心的主要限于高原尼罗特人这一分支，其当今的代表是肯尼亚高原西部的卡伦津人和分布在坦桑尼亚北部各草原上的塔托加人。

从考古学来说，早期高原尼罗特人的情况至今仍无所知，但他们现在的分布状况和语言上的内在联系表明，他们必然是早在1000年前就在肯尼亚定居下来了。他们作为具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族群出现，可能是在铁器传到尼罗河上游盆地和埃塞俄比亚边缘地带的时候开始的。在这些地区以及库希特人的居住地带，关于铁的知识和炼铁术大概是从北方传来的。⑭ 这和早期班图人应用铁器一事无关，正如上文已讨论过的那样，随 588

⑫ “尼罗特”一词的含义最初当然是地理上的，意即“尼罗河的”。但在这里使用的和近来在历史著作中普遍使用的“尼罗特”，指的都不是地点，而是按语言学标准很严格规定的一种语族。参见附图。

⑬ 这些是B.A.奥戈特和J.A.凯伦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分别相当于格林伯格使用的“南部”、“西部”和“东部”尼罗特语(Nilotic)。参看文献目录。

⑭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和尼罗河中游，铁器的应用大约是在我们纪元前一千纪的中期。在我们纪元最初几百年间，铁器由东非海岸进口的事已有记载（参见第二十二章）。但并无任何迹象说明此地的炼铁术是从这种外部来源学到的，炼铁术也不是从这种来源引进内陆的。

着班图人的扩张，大概在东非西部和南部就有了炼铁术。

不管在我们纪元一千纪早期高原尼罗特人成功的原因何在，反正他们占据了原属库希特人的领地——裂谷地区及其毗邻高原和平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过当然不是全部。这多半是一个同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侵入和驱逐过程，大概一直持续到第二千纪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时，这些尼罗特人早已放牧牛群并种植谷物了。但在新的高原环境中如何最有成效地放牧和种植，他们无疑还有许多要向库希特人学习的地方。另外，他们那种按年龄周期组成的社会，似乎是尼罗特和库希特两种成分的混合体，而作为参加某一指定年龄群的标志的行割礼的习惯，却是库希特人所独有的。他们对鱼的禁忌也是库希特人的习惯。他们赶着牛群爬陡坡，就是有意识地避开位于西方的湖泊，沼泽和河流。

大部分尼罗特人留在尼罗河盆地，主要是在苏丹南部。在这里，他们并未直接受库希特人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们把饲养牲畜，种植谷物和捕鱼有效地结合起来。可是，平原上那个分支终于又分裂成三个主要的小分支。注意观察他们从西北方移向东南方在文化和环境上的适应程度是有启示意义的。在苏丹南部和乌干达北部边境地带，巴里-洛图科人仍然保持着相当典型的尼罗特式的生活。在横贯乌干达北部至肯尼亚的那些颇为干旱的丘陵和平原上，从事放牧的是伊通加族群(卡拉莫琼人、图尔卡纳人、特索人等等)，他们很少捕鱼，不过这既可能是由于习俗上的一种禁忌也可能是由于机会太少。在伊通加人的南方，平原尼罗特人的第三个小分支马萨伊人，扩展到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部的很大一部分高地和高原草地。近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这里同化了早先定居的高原尼罗特人，也受到高原尼罗特人的强烈影响，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南部库希特人的影响。他们那时不但已采用禁鱼习惯，而且还实行了割礼。实际上，在这些丰盛的牧场上，中部马萨伊人各分支近来已彻底实现了畜牧化。

589 以上所述并非对尼罗特人的扩张和同化——往往看起来带有偶然性——所能举出的全部例证。其他尼罗特分支和小分支以及非尼罗特人的同化，以及进行扩张的过程也往往需要适应新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在苏丹南部和乌干达北部和东部，本千纪(大概也包括上一千纪)，在平原尼罗特人和河湖尼罗特人某些分支之间发生的相互影响，和刚才指出的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部高原上的尼罗特人和库希特人之间以及新老尼罗特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差不多都同样复杂。关于河湖尼罗特人的一个分支卢奥人，在最近六、七个世纪期间对乌干达和肯尼亚湖滨地区的北部班图人的压力，在历史文献上有较好的记述。对另外两个非尼罗特族群则注意较少，其中之一在乌干达东北部，另一个在乌干达西北部及其邻近地区，他们现在的地盘已很有限，但在1000年或更早以前他们的分布地区显然很辽阔，其重要性也大得多。

第一个族群是由操尼扬吉亚语的人组成（包括现在的特佩特人和图索人或称伊克人)，住在接近乌干达东北边境与外界隔绝的丛山中，他们有些人从事狩猎，其他人从事相当集约的农耕。这一地区过去的确是个具有多种文化的地区，而且据信石器时代晚期某些制作工具的技术在山区群体中一直到本千纪仍然存在。周围地区大部分都相当干旱，有属于平原尼罗特人的伊通加族群在那里放牧，他们也许是和先于他们的其他尼罗特族群一起，限制了尼扬吉亚人的居住范围并在很大程度上同化了他们。尼扬吉亚语可能和尼罗特语（属沙

里－尼罗语系中的东苏丹分支)[15] 有较疏远的关系。也许，在尼罗特人迁移以前，尼扬吉亚人曾是重要的农牧业居民，占据着介于东面的库希特地区和上尼罗河晚期水上生活各族地区之间的某些区域。

上文已经提示过，这些古老而相当衰微的水上生活传统的后期代表可能属于中部苏丹语族(该语族构成沙里－尼罗语系的一个单独的分支)。近来，这个语族已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语支了，由散居在赤道森林东北边缘附近的互不相干的人群组成。其中之一(即所谓"莫鲁－马迪"人)跨乌干达西北边界居住。情况可能是，在大约两千年前班图人还未扩展到乌干达中部以前，尼罗特人也还未从北部及东北部移来以前，这些操中部苏丹语的人在上尼罗河盆地和维多利亚湖地区分布要广泛得多。在东非的这个人口稠密地带，某些文化 590 的基础比那里现在说的班图语和卢奥语更为古老。

东非的"巨石"问题

论述非洲东部及其历史的早期文献中，对古代先进的文明进行过大量探讨。他们都假定这些文明发生在湖泊交错的地区，特别是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部的高原上(有趣的是就在古老的库希特地带)。这种历史见解是根据人种史上某些点滴发现，不科学地收集到一起的"口头传说"和一些考古资料，而最后一种根据包括假想的"工程"和建筑物残迹以及用石块(即"巨石")不用灰泥垒成的梯田。遗憾的是，原始证据大部分都记录得不确切，即使在记得确切的那些地方，解释也不合逻辑，或者把很不相干的材料联系在一起以便迎合当时很流行的空想式的历史观，特别是臭名昭著的含米特观点。这种倾向被第二手作家过于热切地捡起来，毫无批判地接受下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不负责任地把假定的原始证据加以夸大。同样不合乎逻辑的是经常作出这样的推断：把分布在广大地区的不同类型的考古学上的特征，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有没有石头工程，都归到过去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种人或文化项下。这样的推断就是亨廷福德论述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部阿扎尼亚文明那种学说的基础，他把这个文明归到含米特族名下；这种推断同样也成了默多克的假设的基础，他认为以使用巨石为特色的库希特人曾一度居住在这个大致相同的地区(顺便提一下，默多克特别反对早期诸作家的含米特偏见)。

这样，巨石一词(megalithic)就成为带有特殊含义的词，对东非文化或历史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了。尽管如此，对上面所引证的作为古代巨石文明的证据的那些特征做些简单介绍和探讨还是值得的。事实上，这些东西并不全都是石头建造物。本章前已提到的代表坟墓的石冢(或石坟堆)，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部各放牧地区经常可以见到。这些石冢，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也有许多是属于两三千年前石器时代晚期的，而且大概是操库希特语的各族建造的。不过有些石冢的建造年代可能更迟一些。在坦桑尼亚的马萨伊兰南部以及肯尼亚东部和北部那些较为干旱的牧场上看到的某些石砌水井的年代，大概可追溯到开始养牛的那个时期，这是可能的，但并不能肯定。高原上某些所谓的古道也可能追溯到这一时

[15] 这种分类法是有争议的，有一种意见认为尼扬吉亚语不是同尼罗特语，而是同非－亚大语系相近(库希特语以及其他一些语系，属于非－亚大语系)。

期，但这些古道实际上只不过是牛群走过的一些小路，由于畜群不断越过山脊走下山坡去饮水，天长日久侵蚀成的，并非有意弄成一条道路。有许多小道至今仍在扩大，新的也在形成。在坦桑尼亚北部和肯尼亚的几个裂谷陡坡和山间隘口上下，那些实行灌溉的农业更591 不大可能追溯到那么遥远的古代。但另一方面，却有事实说明在有些地方这些活动至少已有好几个世纪之久了。至于山坡上的农业梯田，在数量上就少得多，作为历史论据的重要性也小得多，不管人们写了些什么。只是在很特殊或极少的情况下才建造这种梯田。有些记载甚至谈到在东非内陆竖有独块巨石的碑柱和男性生殖器石像，但究竟这类东西是不是曾经竖立在那里是很值得怀疑的！

不过，除上述情况外，关于东非巨石问题，还有一点需要讲一讲。人们还读过关于石造房屋、石围墙和地下室等书面材料。尽管在这方面也有某些不确切的记述和错误的解释，但在考古中发现的一些事实根据却应当正视。这些东西包括各种式样干垒的石墙和石砌护墙，是在两个分开的地区见到的。在文化上这两类复合体也彼此互无联系，不过有趣的是，二者都属于大致相同的时期，基本都在本千纪中期几个世纪(顺便提一句，这已远远超出本卷应涉及的时期了)。

其中第一类文化复合体包括所谓的辛夸坑穴，这在肯尼亚整个西部高原上非常多。这些坑穴都是早期卡伦津各族建造的有防护的凹陷形牛栏，并不是象从前人们相信的那样是地下室。可是牛栏旁边有房屋，是用木料和茅草而不是用石头建成的。实际上，甚至牛栏一般也都不用石头，是以土墙和篱笆围起来的；只有在多石地区，才用石板和圆石整齐地防护土围墙和牛栏入口处。这种看法有力地证明，有没有石头工程这个问题，不仅应从文化上去解释，还应很据环境之不同去作出解释。

第二类文化复合体同样也位于大裂谷西侧，不过是在坦桑尼亚边境往南相当远的地方。它包括几个遗址——其中最大也最著名的是恩加鲁卡遗址[⑩]——位于火山口高地陡坡脚下河流附近适于灌溉的地方。在这个地区，石头工程有各种用途，包括某几种防御性工程，特别是畜栏和村庄的围墙。在这些建在陡坡正面的紧凑的村落里，每座房屋周围都有一道用石头砌得很美丽的高台围墙，由一条用石头铺的台阶通到入口处。然而这里的真正房屋也不是用石头筑成，而是用木料和茅草建成的。在恩加鲁卡更值得注意的是，千百条灌溉垄沟都是用石头砌边垫底，而且，总面积达 20 平方公里的成千上万块田地也是用石块划分界线并使每块田地保持平整的。

恩加鲁卡居民的种族特征和所属语系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因为大约在 200 年前这群人592 就已经分开，并零星地被同化了。尽管他们那些干垒的石头工程质量很高而且分布颇广，但看来在这里生活和耕种的人们却似乎在相当隔绝的处境中停滞不前，其原因是：他们在极其有限的地区以内不得不过分地利用那里的土地资源和水源。他们的生活方式一直在朝一个专业方向发展，以致无法适应环境。

这也就是对如此重视恩加鲁卡而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那些历史学家的回答。这种情况不能用来支持那些认为巨石文明分布极其广泛的看法。也并不象人们曾经一度猜测的那样

⑩ 最近对恩加鲁卡和有关遗址的重新评价，参看 N.奇蒂克和J.E.G.萨顿的文章，1976 年。

(而且在好几本书里还一再重复),恩加鲁卡是一个拥有3万甚至更多人口的城市。它只不过是一个密集的农村，依靠一种高度集约的农业体系维持生活。它是很杰出的，但这只是就它所在的局部地区而言，而且是作为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农村文化发展和衰落的一个例子而言。再者，据最近调查研究和放射性碳素测定，它的主要部分的年代是在我们纪元第二千纪，这一点现在似乎已很明确。由于出乎意料的早期放射性碳素测定的结果，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曾认为某些遗址的年代属于第一千纪，现已被认为是错误的，至少不能代表全部遗址。

(毛天祜译)

593

24 七世纪以前的西非

B.韦·安达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西非社会的起源、发展和总的性质，主要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考古学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的批判性研究，却不能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外来的，通常是越过撒哈拉、从北方来的思想和人群引起或造成这一地区早期粮食生产或最初的铜、铁器制作业的重大发展，这种看法尤其是错误的。资料本身倒说明：是地区的、亚地区的和当地的诸复杂因素起了不同的重要作用；西非的新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遗址，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从其内部体系并尽可能结合那里起作用的主要生态条件来加以解释。

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

为了正确理解热带地区的动物和植物驯化史，必须对有关这方面的传统(即欧洲的)观念和论述重新进行严格的评定，有些则应彻底废弃，这一点是应该特别加以强调的。必须进行各种实验，以了解非洲的动物和植物究竟需要经历多长时间以及如何适应不同的小区生态环境才能从野生原型发展成现今的品种。而且，考古研究的范围也应该扩大。史前遗址的植物演变和土壤的研究(迄今被严重忽略了)，对于了解西非的狩猎和采集经济是在何时并以何种方式演变的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因为常常难以获得"直接"证据。

这里所说的动物驯化指的是使动物脱离自然选择的过程；规定它们的繁殖方向；使它们(以它们的功用或产物)为人类服务；以及通过选育使它们在丧失某些固有特点的同时改变其特性。这里所说的植物栽培指的是有意识地种植块茎或种籽作物和保护果木、藤本植物之类，以获取相当数量的这类块茎、种籽和果实供人类食用。

596

在文献中常见的"植物栽培业"和"植林业"之类的术语，这里都避免使用，因为它们都带有植物在种植上的优越性已经定型的涵义。从技术角度为农业下的定义(例如，斯潘塞，1968 年)①也不使用，这种定义称农业是"采用**先进的**工具、挽畜或机械动力、**发达的**收割系统和**成熟的**生产工艺进行的食物生产体系"。有些词之所以加上着重点，是为了强调这样一种定义的主观性。

生态学研究表明，第一，动物驯化在半干旱的热带和亚热带大草原地区之所以是可行

① 斯潘塞(J.E. Spencer)，第 501-502 页。

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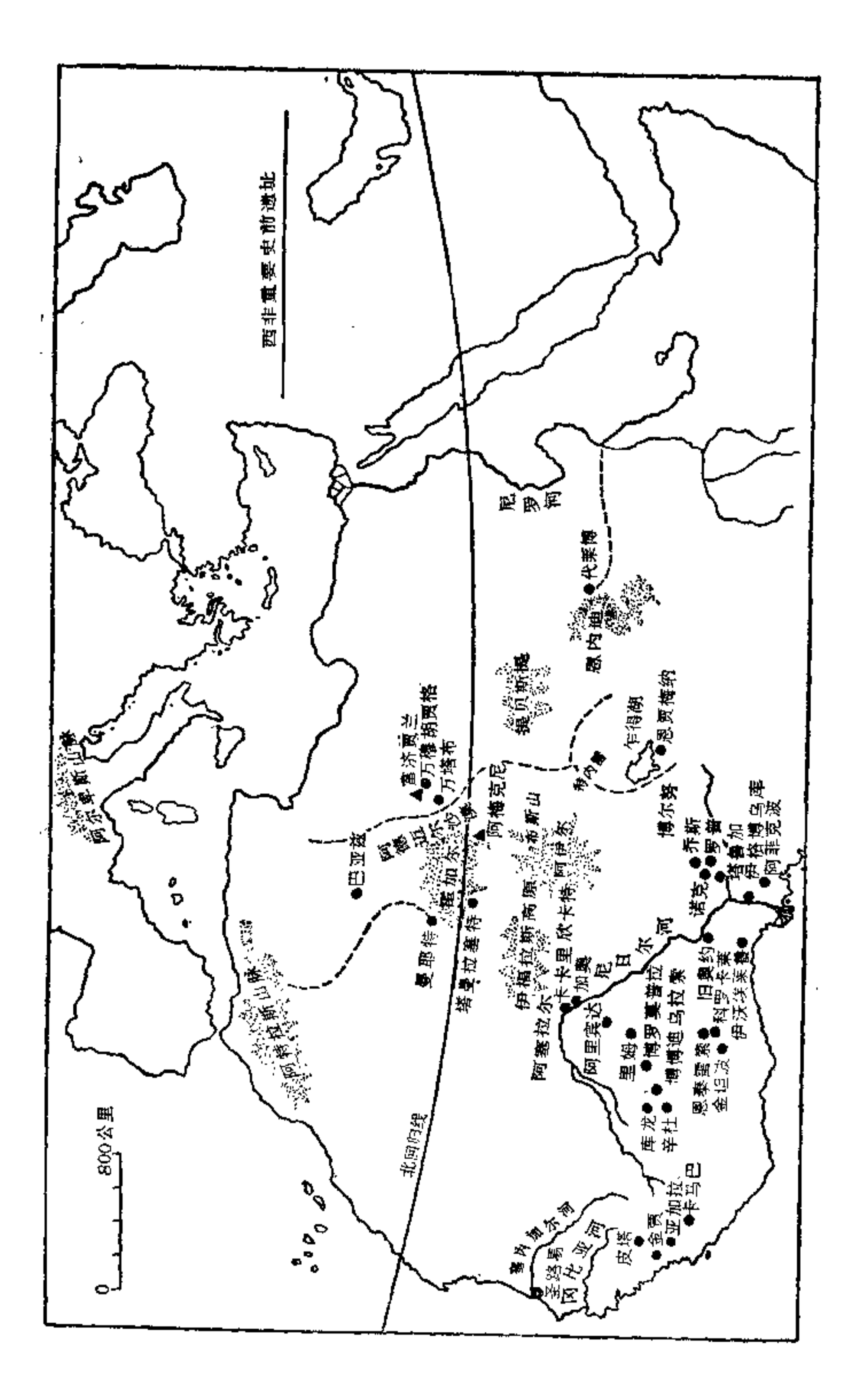


插图 24.1 西非重要史前遗址

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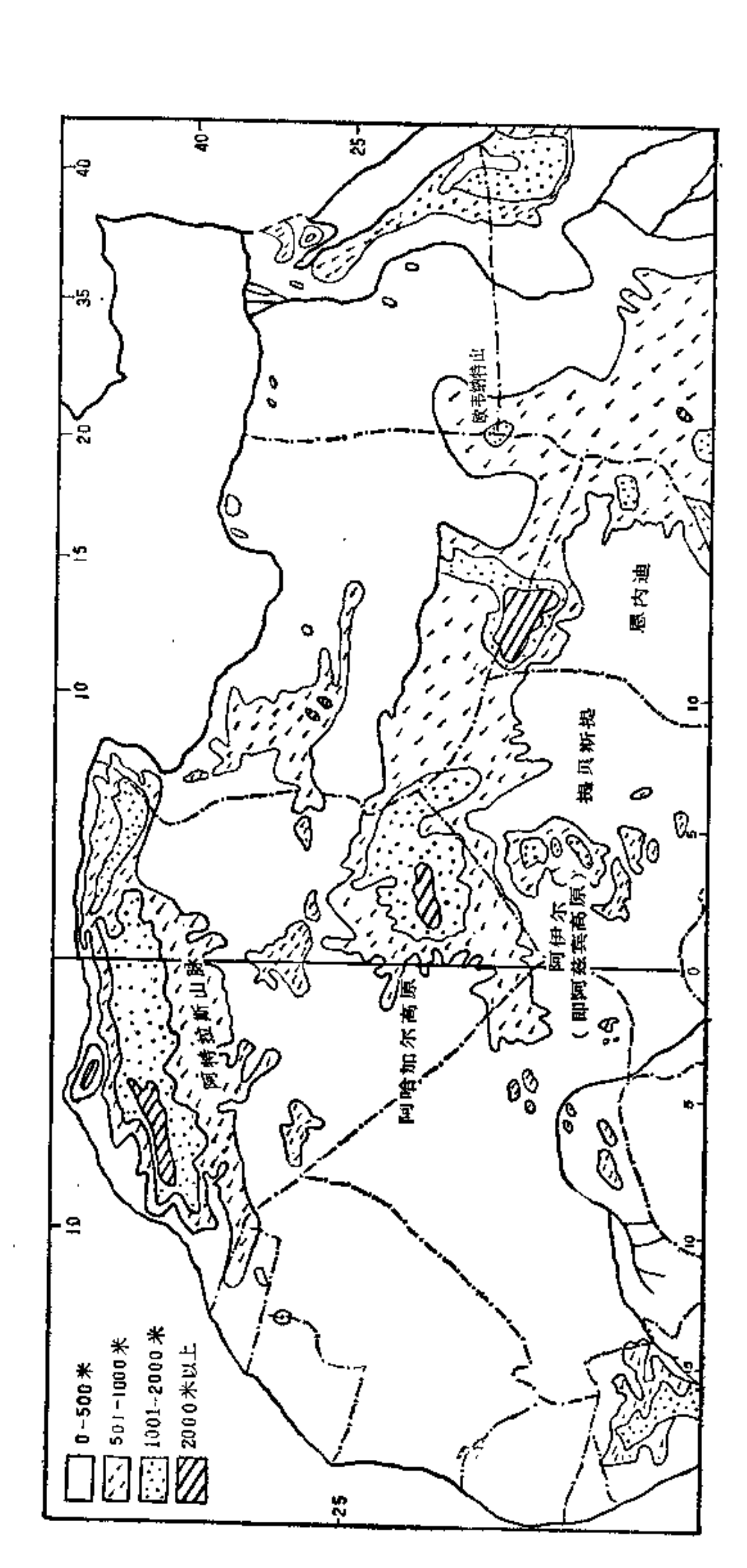


插图 24.2 撒哈拉高地地形图

的(邦斯马，1970年)[2]，是因为土壤的PH值相当高(±7.0)，所以巨量元素(氮和磷)比较容易吸收，而牧草具有较高的蛋白含量。第二，这样的研究又表明，对比之下，驯化动物之所以未能成为湿润的热带地区的食物生产的重要特点，一部分原因是土壤的PH值和巨量元素氮、磷、钙的可吸收性一般说来都比较低；因此，牧草具有较高的纤维素和粗纤维含量，并具有较高的热增值。这样，动物体内的热的产生和消散，就成为湿润热带地区牲畜的一个实际问题。为了在这样的地区保持热量平衡，牲畜的体型通常较小，它们的单位重量有较大的表皮面积，从而有利于热的消散。在事实上饲养驯化动物的地方，高温问题的解决看来是靠着选用能够适应热带环境的小牲畜。

第三，生态学研究还表明，在西非大部分地区种植的一年生植物，和在中东的这类植物完全相反，它们过去是、现在依旧是那些适宜在高温湿润季节生长的品种。除了在凉爽而且在较干燥的高原地带处，中东的谷类作物由于没有能力抵抗在高温下繁殖很快的病原体而完全不能生长。植物学的考察（波蒂埃，1950、1951、1962年；多格特，1965年；哈文登，1970年)[3] 表明，谷类作物如粟类、直长马唐和非洲稻，蔬菜类作物如豇豆和地豆，块茎作物如几内亚黄薯蓣和圆薯蓣，以及油棕与落花生，在西非各地，都是土生品种，很可能已经有了悠久的种植历史。[4]

综观古生物学、植物学、生态学、人种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全部研究成果，人们可以看出，就一般的发展情况来说，最初采用的食物生产方式是农耕(作物种植)、畜牧和混合型农业(即动物饲养和植物种植相结合)。就具体的发展情况说，这些食物生产方式又由于种植的作物和饲养的动物的种类、它们的种植和饲养的方式，以及人群所采取的聚居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597

考古学和人种史的资料确实说明，在西非曾经存在过下述情况：(1)撒哈拉北部和东部有过早期畜牧；(2)撒哈拉中部高原的坡地上存在过早期种籽作物种植复合体，可能还实行过永久性的农田制度；(3)受到来自南北两方面的影响，在萨赫勒和大草原北部部分地区存在过种籽作物种植复合体(在这方面，尼日尔河的内陆三角洲，塞内加尔、尼日尔、冈比亚诸河流上游的富塔贾隆山区的边缘，以及一般的苏丹地带，看来似乎曾经是非洲稻、粟类、高粱、䅟草粟之类作物的核心地区)；(4)萨赫勒中部、东部地区以及大草原北部部分地区(撒哈拉的干燥作用很可能曾对这些地方产生过重大影响)有过农耕和畜牧混合经济；以及(5)在最南部丛林边缘存在过块根作物及木本作物种植复合体(亚历山大和柯西，1969年)。[5]

这些早期"新石器"文化复合体的特点是，它们各有其截然不同的人造器物和（基本上是推断出来的)不同的聚居方式、社会模式以及土地使用方法。然而，在某些地区（例如，塞内加尔的捷马萨斯和毛里塔尼亚的帕拉图姆比安)，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传统互相会合重叠。

---

② 邦斯马(J. C. Bonsma)，第169-172页。

③ 波蒂埃（A. Portères)，1950年，第489-507页；1951a，第16-21页；1951b，第38-42页；1962年，第195-210页；多格特(H. Doggett)，第50-69页；哈文登(M.A. Havinden)，第532-555页。

④ 参见第一卷，第25章。

⑤ 亚历山大(J. Alexander)和柯西(D. G. Coursey)，第123-129页。

一般说来，北方的狩猎和畜牧文化复合体，有带锋刃的石器制作，包括各种几何形细石器，投射尖状器，极少或没有重石器，石刻或鸵鸟蛋壳雕刻，以及种类有限、相当简朴的陶器。而北方草原和撒哈拉中部的种籽作物种植文化复合体，则拥有很多光洁的磨制石器，各种样式的片状石器，和一系列不同品种、造型独特的陶器，却没有什么细石器或投射尖状器。南方菜蔬(块根)作物种植文化复合体，也有光洁的磨制石器，但是其主要特点是片状石器的制作，包括两面一样的片状重石器和石斧。这种技术特征，在现今的生产活动中也很明显，例如在作物种植中对锄和掘棍的使用，农田的翻耕(深耕或浅耕)和备耕方式，都充分考虑到作物的类型，土壤的性质和水源供给的状况。

598

北方早期养牛的新石器文化复合体

在利比亚西南部的万穆胡贾格(莫里，1965)和布斯阿伊尔高原(克拉克，1972年)[6]发现的家养短角牛的遗骸和对此取得的年代测定数据说明，牲畜的驯化在前一地区约从我们纪元前5590年(± 200年)开始，在后一地区约在我们纪元前3830到3790年之间。在万穆胡贾格还发现了羊的残骸。然而，短角型的牛在第十一王朝(我们纪元前2600年)以前似乎没有在尼罗河流域出现过，虽然有证据表明，埃及的考姆翁布在更新世倒有过长角型牛。

短角牛存在于撒哈拉中部至少比出现在尼罗河流域早1200年，这一事实排除了这种牛是来自埃及或近东的任何可能性。暂时还不清楚，撒哈拉短角牛的祖先是来自撒哈拉还是来自马格里布，或者，既来自撒哈拉又来自马格里布。但是对于这两个地区牛的后蹄测量的结果(A. B. 史密斯，1973年)[7]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后蹄缩小了，更新世的牲口有大得多的后蹄。

不过，文化发掘证据表明，在利比亚，很可能较早地出现了从狩猎和采集向畜牧的过渡．这种畜牧经济存在的范围，东南直到布斯高原(特内雷时期，我们纪元前4000年到2500年)，西南直到提希特(希米亚时期，我们纪元前1500年以后)。这些地区的畜牧者看来就是早先居民的直接后裔，而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提希特)大概取代了一种种植种籽作物的新石器文化，或者是同这种文化结合起来了。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将牛驯化的概念已传到这些地区，或者，这些地区处在大片驯化中心地区的边缘。对驯化野牛的遗址所作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表明，牛群的放牧区很可能从撒哈拉的腹地一直扩展到撒哈拉南部和西非的萨赫勒地带，也显示出和沙漠地区的干旱化有某种关系。

早期种植种籽作物的新石器文化复合体

撒哈拉中部高原

现有的证据说明，种籽作物的种植(**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种植**)，在这里的出现大概要

⑥ 莫里(F.Mori)，1965年；克拉克(J. D. Clark)，1972年。

⑦ 史密斯(A. B. Smith)。

比南方任何地方早得多。这种新石器早期文化形式的最早证据，主要来自霍加尔山区阿梅克尼和曼耶特的石窟遗址。在阿梅克尼，在我们纪元前6100年到4850年之间的那些遗物中，康⑧发现了两粒花粉，根据形状和大小，被认为是属于被驯化了的一种粟类，在曼耶特、庞斯和奎泽尔⑨鉴定出属于我们纪元前3600年前后一个地层的两粒花粉，它们可能是一种经过培育的谷物。于戈⑩认为它们是小麦。 599

表明这一地区存在过种籽作物种植的不很确凿的其它证据，来自塔西利地区的塞法尔的一个石窟，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大约在我们纪元前3100年。石窟内有些壁画似乎是描绘作物种植活动的⑪，而语言学的证据则说明，在撒哈拉中部很古的时候就种植高粱。⑫这一地区的史前人民，除了住在石窟，在山坡和俯视湖泊或旱谷的悬崖边缘上还有较大的永久性村落或居民点。⑬他们制作的器物多为磨制的扁平石斧、磨石和手推磨、石臼、砥石、陶器和难以归类的片状石器。

常常有人认为，⑭这种作物种植文化受到从近东经由埃及传播来的影响，但是这种看法缺乏根据。首先，在撒哈拉中部遗址发现的可能与种籽作物相关联的文化复合体，跟埃及和近东的很不相同。其次，根据考古确定的埃及作物种植的最早年代，至少晚于阿梅克尼的作物种植年代。第三，中撒哈拉文化复合体和霍布勒与赫斯特两人（1969年）⑮在利比亚西南部栋加尔绿洲及迪奈吉绿洲附近发现的陶瓷以前时期的文化复合体之间的相似点（例如，大量的磨石），不足以说明它们有任何密切关系。和霍加尔文化复合体不同，利比亚文化复合体的制作是有刃的而不是片状的石器，它包括几种镰刀、许多样式的投射石器、钻状的穿刺石器和双面石刀。这种文化复合体的年代，至少在我们纪元前6000年，甚至还可以上溯到我们纪元前8300年，它与非洲东北部和尼罗河努比亚地区的中石器时代的石器制作更为相似。所以，尽管利比亚文化复合体出现在横贯撒哈拉中部的半圆形大高原的东北端，却不可能是出现在同一高原西南端的霍加尔"新石器文化"的直接先驱。在这一地区工作的考古工作者，也许先到霍加尔地区去寻找先驱更为合适。

撒哈拉南部、萨赫勒和西非大草原的部分地区

600

西非这些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常被认为是北方影响的产物。这种观点很可能有些道理，因为这一地区石器时代晚期的某些石器制作和霍加尔的或东撒哈拉和马格里布的旧石器时期以后的文化复合体器物之间有某些近似。但是，这一地区早新石器时代（晚石器时代）的考古文物的主要传统，却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征，尤其是在陶器、工具制作以及居民点的大小和格局方面。那时的大多数居民点都座落在先前的湖泊或旱谷附近的高坡或平

⑧ 康(G. Camps)，1969a，第186-188页。
⑨ 庞斯(A. Pons)和奎泽尔(P. Quezel)，第27-35页。
⑩ 于戈(H. J. Hugot)，1968年，第485页。
⑪ 洛特(H. Lhote)，1959年，第118页。
⑫ G.康，1960b，第79页。
⑬ 梅特(J. P. Maitre)，1966年，第95-104页。
⑭ 芒森(P. J. Munson)，1972年。
⑮ 霍布勒(P. H. Hobler)和赫斯特(J. J. Hester)，第120-130页。

地上。三种主要的传统清晰可辨，多半反映了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差异：

（1）在这一地区的北部边缘，石器制作，例如特内雷和贝尔埃尔（塞内加尔）的石器制作，有有刃石器，有各种样式的几何形细石器和（或）投射石器，很少或根本没有光洁的磨制石器，聚居区较小。

（2）在中部地区，例如博尔库、恩内迪、提莱姆西、恩泰雷索和达伊马，石器制作中缺乏几何形细石器，却有各种样式的投射石器、鱼钩和鱼叉和某些光洁的磨制石器，而且聚居区面积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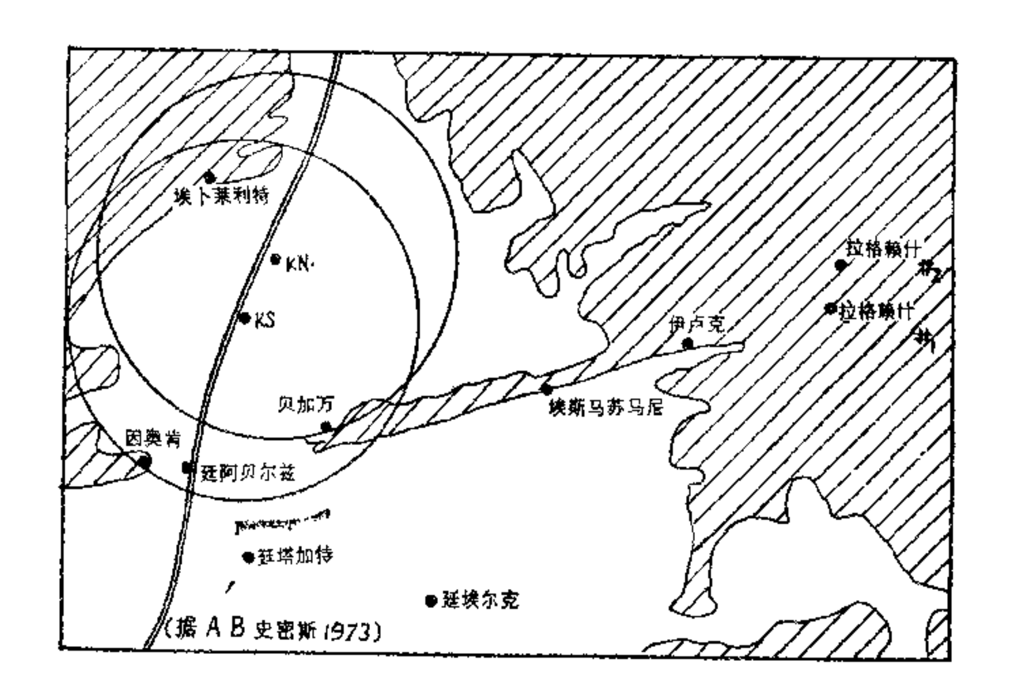


插图 24.3* 提莱姆西谷地文化复合体

601

（3）第三组石器制作在南方，主要以诺克和金坦波为代表，几乎完全没有刃器、几何形细石器和投射石器，但是光洁的磨制石器却很丰富。这些地区的特点是，聚居区比较大，而且显然更带有永久性。

提莱姆西谷地文化复合体

得自卡卡里欣卡特遗址⑯的证据显示，至少在撒哈拉最近一次湿润时期的较晚阶段（我们纪元前 2000 年到 1300 年），这一地区居住着从事畜牧的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现今某些半游牧部落（如苏丹的努埃尔人⑰、西非的富拉尼人⑱）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的差异。卡卡里欣卡特南部一些遗址很象是捕鱼和放牧的营地——因为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双瓣贝

⑯ A.B.史密斯，第 33-55 页。
⑰ 伊凡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1940 年。
⑱ 杜皮尔（M.Dupire），1962 年。
* 插图 24.3 中 KN 为 Karkarichinkat North（卡卡里欣卡特南北部）之缩写；KS 为 Karkarichinkat South（卡卡里欣卡特南南部）之缩写。——译者注

壳，鱼骨和野牛的残骸，而除了鱼钩，就很少、甚至没有人工制作的石器。与此相反，卡卡里欣卡特北部的大量陶器、动物的小泥塑和人工制作的石器（尤其是各种投射石器），都说明那里的人脱离了静止的水域，转而更多地从事放牧、狩猎，可能还有植物种植。　602

曾经居住在提莱姆西的北部、靠近阿塞拉尔周围的从事种植业的人群有过一种制作业，和撒哈拉地区的特内雷相类似(蒂克西埃，1962年)，而且年代也同样久远(根据骨骼资料测定的年代为我们纪元前 4440 年)。两处的人群都有磨石、磨光的石斧和刮削器；几何形细石器在下提莱姆西较为罕见，虽然他们的投射石器和陶器看来有所不同。在阿塞拉尔和卡卡里欣卡特，人们除了放牧牛群之外，看来还狩猎野生动物（瞪羚、疣猪、长颈鹿，等等)，捕鱼，采集软体动物和植物(扁担杆、朴树、柚木和金合欢)。对这些植物的生态学研究表明，这里曾经有过约 200 毫米的降雨量，为下提莱姆西谷地现今降雨量的两倍。康对阿杰尔高原南面阿德迈尔沙漠的研究[19]显示，那里的畜牧民有着同特内雷相似的制作业，其活动范围北至此地，并且至少是从我们纪元前第四千纪起就住在阿杰尔高原及其毗连的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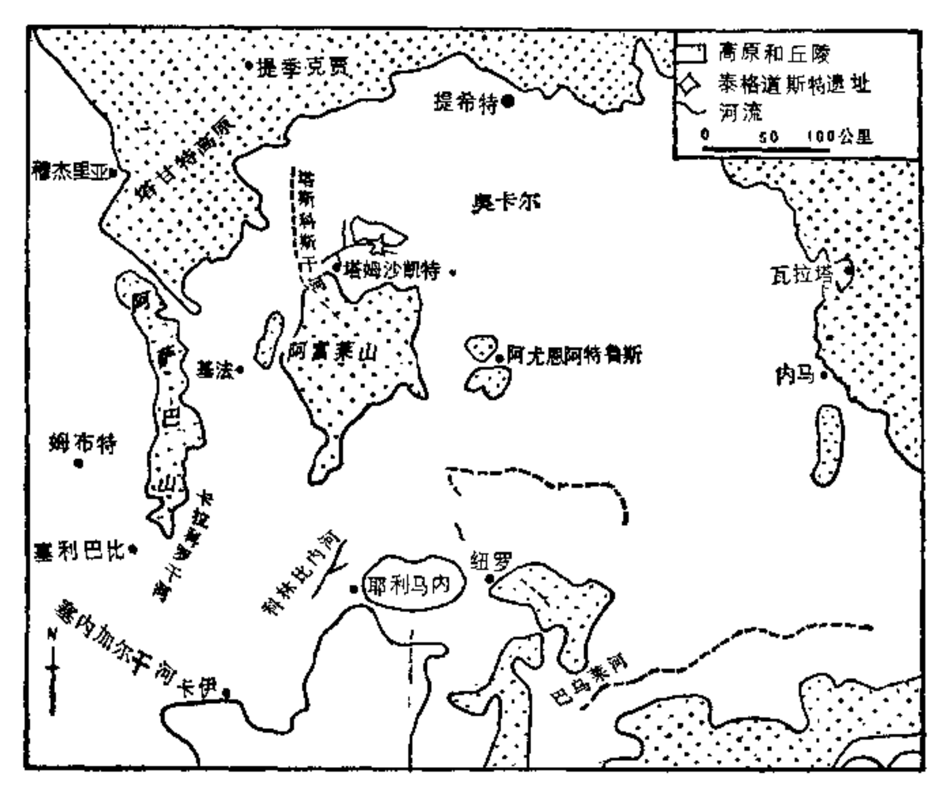


插图 24.4　提希特地区

达尔提希特地区

在毛里塔尼亚南方这一部分进行的调查，查明了晚石器时代一个年代分明、共分八个时期的发展序列，[20]其中有生活情况的资料，这使得塞内加尔/尼日尔河源地区，特别是达

[19] G.康，1969a。

[20] P.J.芒森，1967年，第 91 页；1968 年，第 6-13 页；1970 年，第 47-48 页；1972 年；莫尼(R.Mauny)，1950 年，第 35-43 页。

尔提希特地区的早期粮食生产问题显得较为清楚了。

提希特地区发现的那种发展趋势，由于更加符合于考古资料而可以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在希米亚时期(我们纪元前1500年)，有过专门培育和繁殖蒺藜草的时期；然后，到了干旱的纳格海兹时期(我们纪元前1100年)，又加强了这种早期的植物生产和繁殖，并扩大到把另外几种植物也包括在内。芒森和许多别的考古学家似乎忘记了，一种植物经过培育的形态，所反映的不是它由原始状态上升过程的开端，而是这一过程的终结。人工培育的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因植物本身和当地有关的特殊种植方法和生态学因素的不同而异。只有粟类和臂形草显示出人类为培育而作出努力的最后痕迹。这一事实只是表明，人类的努力在这些植物身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当初被培育的仅有的植物。这一事实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在嗣后几个时期粟类显著增加和臂形草继续存在的原因。

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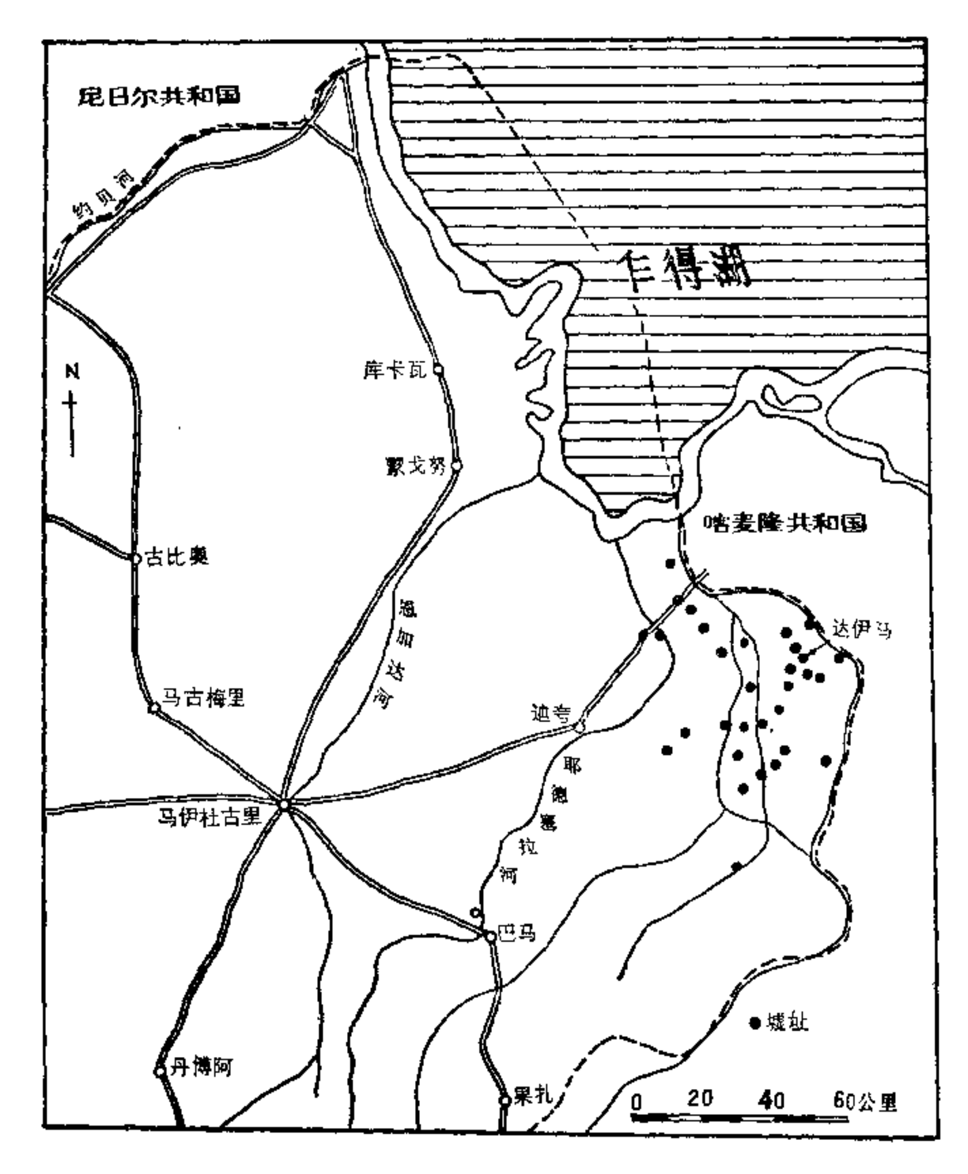


插图 24.5 菲尔基地区的定居墟址

乍得湖以南地区

这一地区称为菲尔基，由乍得湖南岸延伸出来的黑粘土平原构成，据认为是从前一个更大的湖泊边缘浅水沉积物演化形成的。[21] 这也是波蒂埃认为最先培育芦高粱和粟类（蘸草或珍珠粟）最早受到培育的地区。这块土地比较肥沃而且水源充足。虽然平均年降雨量低（在马伊杜古里为655毫米），而旱季既长且热（气温高达43°C），使得大多数河流干涸，但是在雨季，这一地区却洪水泛滥，无法通行，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绝对平坦的平原缺乏渗水性能。不过，这里的土壤一旦吸足水分，它保持水分的性能倒十分良好；而且，这种性能又由于在田地周围筑起田埂而人为地得到增强。季节性的泛滥使这一地区成了对于农民和牧民都具有吸引力的定居场所；季节变化的悬殊又大大限制了可居住的地点，而由于经常利用这些地点，住人的土丘墟址就增多了。 604

在尼日利亚北部、喀麦隆和乍得对这样一些墟址挖掘，到目前已经发现经历若干时期连续都有人居住的证据，在若干地点，其居住时间接近和超过2000年。主要在乍得从事研究工作的勒伯夫[22] 确信，这些墟址同口头传说中的萨奥人有关。即使这个说法具有不小的文化或人种学上的价值，本文作者还是赞同康纳[23] 的观点，不愿利用口头传说去识别有些是生活在2500年以前的人群。

康纳[24] 也对这些墟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座土丘位于达伊马（东经14°30′，北纬12°12.5′）。达伊马出土的证据表明，我们纪元前六世纪初，这一地区曾经居住着晚石器时代的牧民，他们饲养牛羊，使用磨制的石斧（其材料必须从许多英里以外搬运到这个完全没有石头的地方），并且用磨制过的骨头制作工具和武器。在这一层出土物中，最突出的是大量动物骨骸，这反映了生活中浓重的畜牧因素，还有许多小型的泥塑，所表现的显然是家畜。这一遗址的最早居民多半只用草木建筑，而没有任何种类的金属。

在罗普[25] 和杜岑孔巴[26] 等遗址发现的文物，有力地提示人们，也曾有一个完全使用石器的新石器文化层，在它之后紧接着就是大草原耶乔斯高原上的著名的诺克铁器时代文化（我们纪元前2500年以前）。假若情况确实如此，这一文化层多半也含有细石器，而不仅仅含有铁器时代晚期各地层也有发现的那种磨光石器。诺克人完全可能用这些石器去和北方无石地区的居民做交易，也许还做过陶器交易。在达伊马发现的陶器常常是经过装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种细陶器，有磨光的红色表面和细齿梳纹或滚花纹。

加纳中部的金坦波-恩泰雷索文化复合体 605

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已在加纳四个主要地区发现证据，表明至少早在我们纪元前1300年到1400年就有一个从事粮食生产的尼格罗种人群存在。这四个地区是：班达山区东

---

[21] 普兰(R. A. Pullan)。
[22] 勒伯夫(J.-P. Lebeuf)，1962年。
[23] 康纳(G. Connah)，1969b，第55页。
[24] G. 康纳，1967a，第146-147页。
[25] 艾约(E. Eyo)，1964-1965年，第5-13页；1972年，第13-16页，
[26] 约克(R. York)等人。

部，金坦波周围的高地，分散在沃尔特流域内地开阔林地的滨河遗址，以及最南方的阿克拉平原。

这几组遗址现在主要是按它们的环境而不是按物质文化证据加以区别的。深褐色涂料的痕迹在金坦波遗址相当普遍，表明那里或多或少是一些固定的居住场所。磨制石斧和“粗锉”(也称赤陶雪茄， terracotta cigars)在缺乏适当岩石材料的地区内广泛出现，表明曾经有过某种地区间贸易。在金坦波三个遗址所获得的证据也表明，金坦波文化出现之前曾有过另一种文化，其制陶传统、石制器具和动物残骸都截然不同，反映这里曾有较多的狩猎、采集和(或)早期种植活动。

恩泰雷索是金坦波的一个极不寻常的遗址，其意义尚难以确定。它座落在一条低矮的山脊上，山下不远处有一个滨河遗址，那里的水产资源(例如，贝类和鱼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在这里的制作品中出现了鱼叉和鱼钩，这可能是反映了专门适应滨河生活环境的需要。那里还有种类颇多、制作精细的箭镞，这种箭镞在这一地区是独特的．显示出和撒哈拉有某种亲缘关系。放射性碳的年代测定（平均为我们纪元前 1300 年）认为这一遗址大体上和金坦波处于同一时期(即我们纪元前 1450 年以后)。发现的动物骨骸，大部分是野生动物，尤以羚羊为多；但是，也认出了矮山羊的骨骸。[27] 戴维斯[28] 还认为粟类作物的穗曾被用来绘制某些陶器的滚花装饰，但是这种判断尚非定论，因为曾有人指出，[29] 利用一把细齿梳紧压着摇动也可以产生类似的效果。

森林边缘地区

继晚石器时代工艺作业之后，一种在性质上不同、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工艺文化复合体，在西非森林边缘地区以及上沃尔特北方中部开阔的草原地区出现。这种工艺存在的范围和更靠北的塞内加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即 R.沃弗雷氏所指的帕拉图姆比安）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部分重叠。

森林地区早期生产粮食的人(所谓几内亚新石器人)居住在石窟和洞穴内，也住在露天场所。住洞穴的实例有：塞拉利昂境内的延盖马，[30] 卡马巴和亚加拉；[31] 几内亚境内的卡金邦，布朗德和蒙基洞穴；加纳的博孙普拉；尼日利亚的伊沃埃莱鲁和乌帕。在伊沃埃莱鲁也发现了一些证据，它们说明，原先的居民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一样，都是尼格罗种。最著名的露天遗址包括上沃尔特北方中部里姆的谷地和山坡遗址，和塞内加尔沿海的拉伦诺、捷马萨斯和曼努埃尔角等遗址。

606

在许多这类“几内亚新石器”地区，人们占据或开发含有石英粗粒、玄武岩和燧石状变质火山岩露出地面的多石地带。而且，象里姆那样的遗址，山坡显然曾被用来从事梯田耕

[27] 卡特(P.L. Carter)和弗莱特(C.Flight)，第 277-282 页。
[28] 戴维斯(O. Davies)，1964 年。
[29] C.弗莱特。
[30] 库恩(C.S.Coon)。
[31] 阿瑟顿(J.H.Atherton)，第 39-74 页。

作。沉重的双面扁平镐状工具，半圆双面工具(戴维斯锄)和其他粗糙的双面工具，一大批各种样式的磨光石斧，磨石，一些石杵，小型石英器件——特别是骨器，以及有滚花装饰的陶器，是这种文化复合体的最普遍的特征。镐状和半圆形双面工具，似乎是从桑戈人的岩芯斧(core axes) 和镐发展而成的。有人认为，[32]它们多半是用来收取块茎和挖掘狩猎陷阱的。杵和臼(这些很可能还有与之相配的木制部分)多半是用来舂捣含纤维的热带块茎的，和现今的做法大体相似。[33]

在这种文化复合体和北方的一种文化传统相遇的地方，例如在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帕拉图姆比安和塞内加尔(在萨雷纳角和捷马萨斯之间)，上述器件被发现时通常是和叶形尖状器、带槽的刀和锋刃经过加工的刀在一起的。在捷马萨斯这样的遗址，当地的文化复合体(南方新石器文化)，根据自然地层学的断代，是在我们纪元前 6000 年到 2000 年之间，[34]它显然是在北方(贝尔埃尔的)新石器文化侵入之前，并是当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直接继续。

有意义的是，来自马里－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接壤地区的证据，似乎支持了波蒂埃的论点，即非洲稻和野生稻可能最初是用当地一种至少已有 3500 年历史的水田种植法在尼日尔河上游马里的塞古与廷巴克图之间广阔的洪泛平原内驯化的——在这一地区尼日尔河分成若干支流和湖泊(即所谓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而那种种植法很可能是从那里沿冈比亚河和卡萨芒斯河而下，传播给沿海的塞内冈比亚境内居民。还值得注意的是，植物学的证据显然排除了关于稻谷种植是在谷类种植知识传入之后这种设想。波蒂埃已经指出，[35]虽然小麦的原始品种曾给人提供可食用的种籽，从而从麦粒采集发展出小麦种植，但是，就非洲水稻来说，不可能有这种过程，因为水稻的原始品种并不生产可供采集的收获物。 607

再往东，特别是在塞拉利昂的遗址(伊沃埃莱鲁和博孙普拉)，无论是断代的证据或是森林边缘地区出土物件的性质都说明，工艺上的重大变革(即陶器、磨光的石器等等)多半和当地的原生植物如薯蓣、椰薯(coco-yam)和油棕之类的一种早期土法种植相关联。这样的变革可能是由这里向北传播的。

总而言之，资料表明，撒哈拉中部和毗邻的萨赫勒高原地区，曾经是某些谷类作物，特别是粟类和高粱的最早的独立种植中心，而尼日利亚境内的森林边缘地区则最早出现块根作物(薯蓣、椰薯)和木本作物(油棕)的土法种植。另一方面，最西部的森林边缘地区则是水稻种植中心。在专门谈到高粱时，波蒂埃指出[36]，在拥有基本的野生品种高粱的三个地区(西非、埃塞俄比亚和东非)中，西非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和东非(及亚洲)不同，这里现有的类型是独特的，而不是三种主要原型的杂交型。但是最近，施泰姆勒及其同事[37]认为，"考达塔姆"(Caudatum)很可能是高粱的比较新的品种，最初是由苏丹共和国境内操沙里-尼罗语的族群在大约我们纪元 350 年以后培育出来的。

---

[32] O.戴维斯，1968年，第 479-482 页。
[33] 肖(T.Shaw)，1972年。
[34] 德尚(C.Deschamps)、德穆兰(D.Demoulin)和阿卜杜拉(A. Abdallah)，第 130-132 页。
[35] A.波蒂埃，1962年，第 195-210 页。
[36] A.波蒂埃，1962年。
[37] 施泰姆勒(A.B.L.Stemler)，哈伦(J.R.Harlan)和德威特(J.M.J.Dewet)，第 161-183 页。

放射性碳的断代数据显示，撒哈拉中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约为我们纪元前7000年），是一切新石器文化中进行原始耕作最早的；同时也表明，向粮食生产的过渡，在森林边缘地区要比在北方的苏丹和萨赫勒地带早得多。这种变化在伊沃埃莱鲁发生的年代正好在我们纪元前4000年以后（我们纪元前3620年），一直延续到我们纪元前1500年为止。在靠近阿菲克波（北纬5°54′，东经7°56′；肖，1969年）[38]的乌帕石窟遗址，含有新石器时代陶器和锄的地层，年代从我们纪元前2935年（±140年）延续到我们纪元前95年。

几内亚新石器文化在东面的塞拉利昂和北面的上沃尔特出现得稍晚。在延盖马洞穴，对“或多或少反映制陶新石器时代开始和结束”的陶器进行热释断代（Thermoluminescent dating）测定表明，其年代在我们纪元前2500年到我们纪元前1500年之间。卡马巴的新石器层的年代，在我们纪元前2500年到我们纪元340年（±100年）之间。上沃尔特的北方中部地区（里姆），相同类型的器具制作年代，在我们纪元前1650年到我们纪元1000年之间。

608 但是森林边缘地区的几内亚新石器文化与大草原和萨赫勒地带的早期粮食生产文化复合体相比，其鲜明特点及年代测定不仅说明过渡到粮食生产的变化在森林边缘地区发生较早，而且说明并没有受到来自北方的影响。因此，这样的证据就支持了下述意见：森林边缘地区固有作物如稻米（西部）、薯蓣和油棕（东部）之类的种植由来已久，是当地人民独立取得的成就。在这方面还值得指出的是，伊沃埃莱鲁遗骸[39]牙齿上的磨损痕迹，可以解释为是由于撕咬外面有砂土的块茎如薯蓣之类的结果。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几内亚新石器遗址以在森林边缘地带、河流两岸森林中以及在林中空地最为突出，这些地方全都是薯类的天然产地。

几内亚新石器文化向北一直伸展到上沃尔特，而且后来在那里生根（虽然在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一些地方它和北方的文化重叠出现）。这一事实表明，南方的影响确实到了北方。象现今的许多热带丛林的种植者那样，新石器时代的块根作物和木本作物的种植者也可能实行过土地移耕法，至少初期是这样，因而生活在较小面不是较大的群体和聚居点里。

因此，说西非“早期新石器文化”复合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不少特征反映了为适应当地独特的生态条件而独立地发展起来的经济和社会措施），并不是说它们各自孤立，彼此毫无接触。已得到的为数不多的骨骸证据说明，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都属于尼格罗人。

在撒哈拉，新石器时代的人似乎是地中海人和尼格罗人的混血种。他们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塔西利高原地区。向南迁徙时，他们大概留下了好几群黑皮肤的后裔住在现今的大草原地带。

西非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尼格罗人各族并非生活在与四周隔绝的文化孤岛之中，这由陶器有相似的特征（例如，滚动技术和以梳齿压制的花纹装饰）也得到证明。如果年代测定的

[38] T.肖，1969b。
[39] 同上书，1971年。

数据可靠，那么这类陶器的特征就很可能是从撒哈拉中部（连同种植谷物的知识）传播到萨赫勒和大草原地带一些地方来的。另一方面，滚花却多属南方的特征；虽然作为尼罗河各地区特点的波浪形线和波浪形虚线装饰在南方是完全看不到的，但却出现在撒哈拉东部和中部的一些文化复合体中（例如，崔加尔、博尔努-乍得和南恩内迪）。

还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向粮食生产的过渡并不一定总是涉及显然革新的工具。人种史上的实例有力地提示本文作者，这样一种过渡可能主要涉及劳动习惯和土地使用方法的改变，而不一定涉及工具的变更。这类变化的实例包括修建梯田、培土作垅、饲养家畜以获取厩肥、锄地、除草、移栽、复种和水土保持。这一类的变革，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当由于某种原因而真正缺少土地时，都可能采取。农业方法上的这种改动，对社会结构和聚居格局都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一点作出普遍的结论，因为这一因素是和其他因素一同起作用的，而那些因素的类型和性质多半因地区而异。 609

现在看来，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似乎至少有四个主要地区，其中两个在西非的极北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的开阔平原，很早就确立了随季节变化而迁移牲畜的放牧形式。在滨湖地区、河谷和周围的山坡，种籽作物的种植以及有时是混合型的农业十分突出。在南方的森林边缘地区和低地，则主要栽培块根作物和木本作物。

在西非已查明两个主要的核心地区：一个靠北，在萨赫勒-苏丹过渡地带；另一个靠南，在森林边缘地区。因此，两个地区都是在季节有悬殊差别的区域，有一个季节不利于生长（高温、干旱或寒冷）。在这些地区植物就得储备养分，以便在“有利”的气候到来时能够重新萌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这类储备在南方采取块根和块茎的形式，在北部苏丹地带则采取种籽的形式。

另一方面在气候季节性变化不大或没有变化的森林和大草原地区，植物以一种缓慢而均匀的速度生长。它们不必为生存而竞争，也不必储备养分——这种特点多半对这两类核心地区居民的驯化尝试起过示范性的鼓励作用。中部大草原地区，正好夹在这两类核心地区之间，似乎成了南北两方影响的会合点。

有意义的是，在低地森林地区作物生长季节比较长，而北方的滨湖或沿河地区的土壤则较为肥沃，并且也容易耕作。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彼此有所不同，他们活动的效果也有所差异。在后一类地区，只要开出小块灌木林地用锄进行农业活动就够了。而在森林区域，农业活动的增加则往往意味着更费力地（更广阔的）清除林地，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定居点的扩大。在前一种体制下，有限的一块土地可以继续不断地耕作；而在后一种体制下，则常采取移耕的做法。开发方式的这种总的差别，在整个史前时期和有史时期，常对西非社会集团的规模大小及其特征以及聚居点的性质，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无论是早期粮食生产的发展状况，还是它的影响，都在某种程度上因作物生长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然而，在所有这三个主要文化区域，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种植的过渡，从几个方面改变了人对自己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群体的态度。人从采集者变成了生产者和“储存者”，随后又（通过远距离贸易）用毗邻集团所缺少的某些资源去交换自己集团所需要的物品。这种经济变化也促进了手工业活动和新工艺（制陶术、金属冶炼和加工等等）以及活跃而复杂的贸易 610

网的发展。此外还引起了更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这些社会变革在类型和程度上又由于建立起来的农业基地的类型不同而有差异。

早期铁器时代

铁器时代的发展状况似乎和新石器时代的进程没有显著的差别。所不同的只是，西非最早过渡到金属(铁器)时代的实例出现在萨赫勒-大草原地带的两端，而不是在南部森林边缘地区。在这方面，也象早期粮食生产的情况一样，所有文化上和年代学上的证据都有力地说明，进入金属加工这一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土著居民自己的功绩。

象在别处[40]详细阐述过的那样，关于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证据，可以依照类型，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依照年代和地层，划分成以下几种组合体：(1)陶器、铁器和磨制石器；(2)陶器，铁器和(或)其他金属器具，有时和特殊的(陶罐)埋葬习俗联系在一起；(3)只有陶器。

铁器制作和繁荣程度不同的石器制作混杂在一起的遗址，通常是铁器时代遗物组合体最古老的类型，多半反映了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属于这种过渡性制作状况的遗址，已经在西非以及在别处(例如，东非的大湖地区)好几个地方鉴别出来。这样的制作业遗物通常有：铁渣，刀片，矛头和箭的碎片，钩子和手镯，锤状石器，各种样式的斧或锛斧，石制圆盘（圆环)，手推磨和砥石。从中也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地区性趋向。例如，赤陶小塑像似乎是尼日利亚北部独特的制品，但是在加纳的某些遗址中也有出现。在尼日利亚北部发现了炼铁炉的吹风管和估计可能是炉膛壁的碎片。面粗制的片状双面工具则是塞拉利昂的卡马巴和亚加拉遗址最有代表性的物件。在上沃尔特的里姆，这种沉重的双面工具以及斧或锛斧常和瓮葬同时出现，并且显示出和它之前的几内亚新石器文化之间的联系。

地区性差异也可从铁器时代早期的陶器中看到。例如，贝卢德[41]从恩内迪发现相互有关的两种式样：泰里莫鲁式和希盖乌式；这些陶器是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产物，显然和科彭斯[42]从乍德发现的凹线陶(céramique cannelée)以及库尔坦[43]从博尔库发现的泰曼加式有关系。泰里莫鲁式陶器是和最早的开阔地村落遗址联系在一起的，其年代初步断定为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贝卢德和库尔坦都指出，这些陶器的风格和努比亚C-族群陶器的风格相似，虽然后者在努比亚出现的年代看来要早得多(从大约我们纪元前2000年起)。这类风格的陶器装饰特征——斜行梳齿纹带，阴纹十字影线，连环阴纹影线三角形，假浮雕人字纹，平行槽线，等等——在早期塔鲁加，在勒伯夫的乍得湖遗址，在辛杜和恩泰雷索二号地层和三号地层以及在塞拉利昂洞穴遗址等处发现的铁器时代早期文化复合体中也很常见。某些早期塔鲁加风格的特征，无论是在陶器或是在小型塑像的传统方面，似

611

---

[40] 安达(B.W.Andah)(原名韦-奥戈苏，B.Wai-Ogosu)。
[41] 贝卢德(G.Bailloud),1969年，第31-45页。
[42] 科彭斯(Y.S.Coppens)，1969年，第129-146页。
[43] 库尔坦(J.Courtain),1966年，第147-159页；1969年。

乎也是"伊费文化复合体"的先兆。

和上述情况相反，晚期塔鲁加陶器风格，则和里姆的新石器-铁器时代地层所发现的更为相似。两者都具有大量的螺旋形雕刻滚花的装饰花纹，还有零星例子是玉米穗滚花图案。迄今为止，已知的西非最著名的铁器时代早期社会或许是诺克人的社会，这个社会看来也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社会之一。到我们纪元前500年，诺克人无疑已经在冶铁，可能还要早一些。他们的文化之所以著名，是由于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艺术传统，尤其是赤陶小塑像。尽管诺克人已经有了制铁的知识，但是在他们认为更有效的场合仍继续使用石器。仍在使用的石器包括磨石、石臼以及磨光的片状石斧。甚至在同一时期内，属于同一种艺术传统，有些诺克人的遗址仍有显示地区性差异的本身的特征。例如，在塔鲁加就完全看不到磨光的石斧，而萨蒙杜基亚和塔鲁加的家用陶器就与卡齐纳阿拉[44]的陶器不同。

诺克人的文化不仅仅早在2500多年以前就已完全形成，而且、其影响显然是深远的。例如，达伊马的泥塑小像就具有类似诺克文化风格的特征，而达伊马的制铁活动是大约在我们纪元五、六世纪之间开始的。

康纳认为，在八世纪前后，达伊马地区原有的居民已经被充分使用铁器、基本上从事谷物种植的人群所代替，他们的接触也比先前的居民广泛得多。但是以蹲伏的姿势土葬的传统以及泥塑小像的制作，都保留下来。他们从不把他们的死人装在通常被称为"索族罐"(So pots)的巨型陶瓮内埋葬，虽然这种陶器在墟址的上层有所发现。 612

在乍得共和国境内沙里河下游，以拉密堡为中心，半径100公里以内的河流两岸人工的或天然的小丘上发现许多重要的古代村落墟址(有些长达半公里)。在这些遗址上也发现了一些与诺克和达伊马出土文物相同的遗物，其中包括：精致的赤陶小塑像(有人像和动物像)、石制装饰品、铜和青铜武器，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碎片。巨大的骨瓮在这里也曾使用过，村落四周筑有防御性围墙。勒伯夫(1969年)为这些萨奥人遗址进行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得到的数据是从我们纪元前425年到我们纪元1700年之间，这就跨越整个的萨奥一期、二期和三期。但肖[45]认为，这种分期不是根据地层学和文物材料来划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确定我们纪元前425年是指某一个含有铁器的地层的年代，其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尼日利亚南部

威利特[46]声称，"既然诺克文化，尤其是它的艺术，有那么多的特征在后来西非其他地方的文化中都有发现，那就很难不令人认为，我们所知道的那种诺克文化就是西非许多雕刻传统的始祖。"无论如何，在诺克和伊费的艺术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少类似之处，而不大可能是由于巧合。[47]例如在诺克，有一种自然主义的雕刻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我们纪元960(±130)年；而在伊费和贝宁则存在着一种精致的串珠，在约鲁巴的古代城镇也有这种串

[44] 法格(A.Fagg)，第75-79页。
[45] T.肖，1969a，第226-229页。
[46] 威利特(F.Willett)，第117页。
[47] 同上书，第120页。

珠，但较少一些。

伊费的家用陶器，可以认为是更加精致的诺克类型，尤其是在装饰上更多样化了，包括刻花(直线、Z形曲线、刺纹和弧线图案)、抛光、彩绘和(雕花的木块和搓捻的绳索印成的)滚花。粘土条也被用作装饰或被用来制作装饰品，而陶瓷片也被用来在砌屋时铺地。

伊格博乌库的发掘结果[48]清楚地表明，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铁器制作至少早在我们纪元九世纪就已经出现，但是没有任何情况足以表明它的出现不可能更早。由于铁器制作是一种要求有高度技巧的行业，所以一直为一定的集团和族系所垄断。最著名的伊格博铁匠是来自奥尼查以东的奥卡，他们最初显然是从奥卡以东乌迪的伊格博炼铁者那里获得铁(铁矿？)的，而只是在晚得多的年代才获得欧洲铁的供应。伊格博人当中金属制作的其他核心力量是：克罗斯河(东部)伊格博人中的阿比里巴炼铁匠人；分布在奥基圭-阿罗丘库山区的铁匠和铜匠；以及在这一地区南部的恩奎雷的匠人。

613

由于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充分，所以很难详细探讨这里铁器制作的发展状况。奥卡遗址和伊格博乌库遗址很靠近，许多遗物也大体相似，这说明它们之间可能有联系；但是两种文化复合体之间时间差异很大，而奥卡的匠人，至少在比较晚近的时代，并没有在艺术上和技术上(包括铸铜)显示出具有伊格博乌库制品的典型特征。

在奥卡地区的一个发掘点[49]，发现了15件铁锣，1把类似于奥卡铁匠仍然在制作的那种铁剑，和年代被断定为我们纪元1495(±95)年、还不能确认是奥卡匠人制作的大量青铜铸钟和其他物品。

还有不清楚的是，伊费和伊格博乌库之间有什么时间和文化上的关系，尽管威利特认为，伊费的年代可能比现在设想的要早得多，甚至可能比现有证据所表明的年代(大约我们纪元十三到十四世纪)更加接近诺克。如果伊费的串珠果真和几内亚沿海地区的“阿科利”(akori)珠子相同，就象弗罗贝尼乌斯以及人种学研究从尼日利亚南部取得的证据所提示的那样，那就可以设想，伊格博乌库的玻璃珠子是在伊费制造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伊费文化的年代至少要上推到伊格博乌库发现物的年代(我们纪元九世纪)。在这方面，可能也很重要的是，伊费文化在石刻、玻璃制造和粘土小塑像方面的传统的中断，和在达伊马发生的情况大致类似，[50]而达伊马文化中断的年代在我们纪元六世纪和九世纪之间。由于达伊马的一些墓葬品还表明伊费和达伊马之间有过贸易接触，十分可能，出现文化上的类似情况或许具有时间上的重要意义。因此，伊费文化的年代非常可能至少要上溯到公元六世纪。

极西部的铁器时代

极西部的铁器时代，比起诺克和毗邻地区的铁器时代更不为世人所知。例如，现有的关于毛里塔尼亚的资料就不是跟铁器时代有关而是跟“铜器时代”有关。在尼日尔河中游地

[48] T.肖，1970a。
[49] 哈特尔(D.Hartle)，1966年，第26页；1968年，第73页。
[50] G.康纳，1967a，第146－147页。

区，特别是在塞内冈比亚，关于年代情况迄今还不完全清楚。[51]

614

兰伯特在阿克儒特的发掘表明，[52]在西撒哈拉，铜的冶炼可以上溯到我们纪元前570到400年；这大致也是穿越撒哈拉的铜的贸易的年代。在一个遗址所作的估计表明，从这里炼出的铜有40吨，其中一部分产品很可能是从西撒哈拉运往苏丹。虽然阿克儒特在历史的早期就失去了重要地位——也许是由于用来炼铜的木材已经耗尽(就象在麦罗埃发生过的那样)。虽然如此，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显然继续通过苏丹中部保持着铜和铜器的供应。

从遗址出土的、收藏在博物馆的以及在各种书面资料中提到的大量铜器表明，铜的使用虽然有限，却在很长时期内遍及西非，尽管它不象木材、铁和粘土那么重要。输入的铜及其合金有好多种形式，如锭、箔、环、线和钟、盆之类，经过许多世纪没有什么变化。这些东西大概一直被用作当地制造业的原料，用于脱蜡法铸造，以及用于锤打，拔丝，绞合，等等。

非洲各族人民对紫铜(也就是纯铜)和青铜、黄铜区分得十分清楚。可惜，很多文献中却缺少这种精确性。必须进行光谱分析才能确定一个物件的实际金属含量和了解铜及其合金(青铜)的最早使用者的爱好。

尼日尔河中游地区

在这一地区三个主要区域内发现了人工土丘：定居的遗址或是坟墓(古坟)，它们是：

（1） 尼日尔河和巴尼河汇流处的巴尼河谷；

（2） 马西纳和塞古的北部和东北部；

（3） 在河曲以东远处，在上沃尔特境内。

一种主要以搓捻过的绳索滚花为装饰的大型厚壁陶器在这三个区域经常都有发现，它们常用作葬瓮。在许多地方，葬瓮常常是每两个或三个一堆同时出现，并且伴有家用器具。在上沃尔特(里姆)，主要的陪葬品是铁器和磨光的石制工具以及家用陶器。青铜器和铜器在尼日尔河河曲地区也有发现。在马西纳地区和塞古地区也有——而在东面很远的巴尼或里姆(上沃尔特)却没有——一种风格独特、形态多样的上泥釉的陶器；精致的薄壁碗、碟(有些有隆线，有底座，有些是平底的)；高脚盃；有柄大壶和圆锥形坛子等。[53]

615

在塞古和廷巴克图，这些"铁器时代"的人有一部分主要是种植粟类和水稻的农民，另外一些人主要是使用带有赤陶坠子的鱼网而不是使用骨制鱼叉的渔民。那里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建筑遗迹，上面有经过艺术加工的石头，有些遗迹在方圆好几英亩的范围内发现，表明那是一些大聚居点。但是这些遗址极少(如果有的话)经过调查研究，即使经过调查研究也是很肤浅的，虽然有许多遗址曾被法国人大肆掠夺。[54]

这些聚居点的确切规模和性质，以及它们居民的经济生活类型，尚待通过大量发掘加

---

[51] 兰纳尔·德萨皮尔(O.Linares de Sapir)，第23-54页。
[52] 赫伯特(E.W.Herbert)，第170-194页。
[53] 苏莫夫斯基(G. Szumowski)，第225-257页。
[54] O.戴维斯，1967 a，第260页。

以确定。历史年代情况也还弄不清楚。莫诺认为这类瓮葬文化是一种范围更广的"勒希姆文化复合体"的一部分，后者集中在地中海沿岸，逐渐传播到了尼日尔河河曲地带。这种看法意味着西非这类铁器时代文化出现在阿拉伯人到来（即我们纪元1000－1400年）之后。但是最近的研究结果不能支持这种观点。

例如在库加一个古坟的出土文物在含有传统的红底白绘陶器的较晚地层，所得年代为我们纪元950（±120）年。陶片表面带有粟类、小麦，也许还有玉米的印纹。但是在这一遗址和西非这一地区的其他遗址取得的证据表明，还存在一个年代更早的铁器时代地层，主要特点是含有有印纹的或无装饰的陶片、骨器和石器以及手镯。在上沃尔特一个有关的文化传统遗址，其年代甚至更早，为公元五世纪到六世纪。[55]

塞内冈比亚地区

在这一地区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塞内加尔河河口的拉奥[56]和塞内加尔北部滨河地区也发现了墓葬遗址。虽然这些墓葬大部分还有待仔细研究，但是粗略的研究表明，墓葬的构成是由木建的墓室上覆以至少4米高的坟丘，墓室里有铁制工具，铜手镯，珠子，黄金，珠宝饰物和好几种形状简单的罐、碗、大酒杯和坛子——未经彩绘，但是饰有精致的图案，主要是刻线和刺痕而没有梳齿印纹。最近的挖掘表明，这类墓葬的年代为我们纪元750年，[57]晚于本章所涉及的时期。

同本章涉及的时期关系较为密切的，是这一地区沿海几个主要由贝冢构成的遗址。在圣路易附近以及在卡萨芒斯，这些贝冢有时有大棵的猴面包树长在上面。在儒瓦尔研究过的圣路易的贝冢[58]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贝冢，发现了一些偶然有梳齿印纹的陶片、一只由铜和铁绞合成的圆圈、一把骨制的斧子和一些其他骨制品。这种贝冢人在从事其他活动之外，还收采牡蛎并用它们和内陆的居民作交易。在圣路易和若阿尔之间的沿海沙丘和礁石地区，据报道不是牡蛎的繁殖场地，[59]但从新石器时代直到铁器时代，居民都很稠密。在达喀尔的一些遗址（例如，贝尔埃尔），铁器时代的遗物层次分明地覆盖在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之上。陶器的形式和装饰虽经历许多世纪，但看来变化很少；因此，对于没有分成层次的遗址就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鉴别。

616

对卡萨芒斯河下游一个长22公里、宽6公里的地区几个贝冢所作的研究，揭示了从我们纪元前200年一直延续到我们纪元16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其中一部分和迪奥拉人早期现代物质文化相重叠。萨皮尔认为，迄今所知的最早期的文化（我们纪元前1200年到我们纪元200年）——只在卢迪亚和沃洛夫遗址发现——代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不是早期。文化上的接触和（或）影响可由这一时期的陶器得到说明，这种陶器同分布在佛得角[60]到阿

[55] 安达(B.W.Andah)。
[56] 儒瓦尔(J. Joire), 1955年，第249-333页。
[57] C.德尚和蒂尔曼斯(G. Thilmans)。
[58] J.儒瓦尔，1947年，第170-340页。
[59] O.戴维斯，1967a;1967b，第115-118页。
[60] R.莫尼，1951年，第165-180页。

尔及利亚南部[61]甚至中非这一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在装饰技术上具有共同点，例如都刻有波浪形线条等。没有发现石器，但是褐铁结核却是常见的，这说明可能曾使用铁。据报道在比尼奥纳附近发现了史前时期的石斧，据推测是在贝冢中发现的。

这一时期的考古学资料表明居民点比较分散，以小块营地为单位座落在较低的沙质山丘上，多半覆盖着草和灌木，四周环绕着森林。居民并不采集贝类动物，已报道的动物骨骸只是几种无法辨认的哺乳类动物遗骸。因此，他们如何维持生活尚不清楚。

根据对居住年限长达400年的四个遗址的调查，完全没有软体动物的遗迹，也没有鱼骨，有陶片而没有搀和着贝壳的陶器。据此，最初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沿海的“早期居民”实际上并没有适应海滨生活。奥伯维尔[62]认为茂密的森林曾一度覆盖着居苏伊高原周围的整个地区，后来这一地区的森林被大火焚毁，开辟成为开阔的水稻田。如果这种看法正确，就可能意味着第一时期的这些居民已经是种植山地旱稻的农民。

在随后几个时期(第二时期到第四时期，即我们纪元300年以后)红树河床的丰富的动物群被利用起来，农业活动也可能已经开始，虽然对稻米和其他植物遗迹尚待进行有系统的搜寻。这几个时期的地层出土的文物，也被研究人员称之为“完全符合历史上和现代的迪奥拉人的习惯做法”，从各种类型的陶器可以看到古代贝冢和附近现代贝冢的联系。 617

据我们现在的看法，这一批陶器的年代似乎太近，不足以说明这一地区种植水稻的起源。但是，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点也许是有用的：波蒂埃认为，[63]塞内冈比亚是非洲稻次要的传播中心，而主要中心是在靠近尼日尔河中部的某地。

卡萨芒斯河下游的遗址似乎代表着水稻种植的一个高级阶段。这时，由于使用铁制工具，人们有可能把红树沼泽地和难以耕作的冲积粘土地开拓成水稻田。其实，我们最好还是到内陆干涸河谷土壤比较疏松的地区去寻找最早的非洲稻种植中心。在那些地方，只要用石器剥去一圈树皮使其死亡，开出一片空地，就可以用撒播或点播的方式种植旱地稻或山地旱稻。

实际情况如何，如可能发现，那也只有依靠对关键地区进行更充分的考古调查。无论如何，现在我们知道，迪奥拉文化某些可以辨认的内容，从第二时期往后就已经存在了。有些族群居住在冲积谷地或其附近的沙质山丘上，正象今天的居民一样，他们把垃圾堆放在特定的位置。于是积累起一些整齐的贝冢，其中有和迪奥拉物质文化类似的陶器残片和其他废弃物品。在所有各个历史时期里，卡萨芒斯河下游陶瓷传统的装饰图案突出的是刻纹、刻点和印纹而不是彩绘，它们的形状是着重实用性，而不是着重观赏或礼仪用途。至于这些卡萨芒斯人是否用陶瓮埋葬死者，则至今尚不清楚，因为在遗址内或其附近，没有发现过坟墓。

象阿克尔这样的学者一直认为上文所述西非各种铁器制作传统是从埃及或努比亚传来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如莫尼等，则认为它们来源于迦太基。但是，提出这两种观点的学者，除了其他方面的不足之外，都未能分辨两个地区冶铁技术发展方式上的根本差别。在埃

---

[61] H.J.于戈，1963年。
[62] 奥伯维尔(A.Aubreville)，第131页。
[63] A.波蒂埃，1950年。

及和努比亚，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是在王朝以前时期，经过冶炼铜、金、银和陨铁，然后冶炼地球上的铁才完成的。与此相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古代炼铁中心，似乎是直接从石器进展到铁器的，铜或青铜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出现，也许只有毛里塔尼亚是例外。实际上，铜和青铜是后来以大体和炼铁相同的方法冶炼的，而在埃及和努比亚，铜和铁是以很不相同的方法冶炼的。无论是现有的断代证据还是直接取得的文物证据都不能说明炼铁技术是从上述两地传入的。例如，看来利比亚的加拉曼特人和麦罗埃人开始使用双轮车辆(很可能也开始使用铁器)，大约和尼日利亚北部诺克地区开始制铁是在同一时期(我们纪元前500年)。事实上，从某些遗址提供的年代证据看来，铁器的制作甚至是早在我们纪元前1000年就可能已经在诺克地区出现了。

618

西非制铁技术传入说，没有适当考虑到和这一过程有关的许多问题，即：人们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在哪些地点(并不一定是一个地点)采取步骤，把岩石或泥土的原料变成可以用来制造比石头更有效的武器并有其他许多用途的坚硬而耐久的新金属的。在这方面，迪奥普[64]和特里格[65]曾正确指出，“西非和南部非洲各铁器时代遗址的年代很早，这应该有助于提醒我们，不应排除制铁技术有可能是在撒哈拉以南的一处或几处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关于制铁的开始问题，过于经常地同制铁的技术精良程度问题混淆起来。更糟的是，那些认为制铁技术是从近东传入非洲的学者，通常都错误地认为，在近东和欧洲所观察到的冶金技术发展诸阶段必然适用于非洲各个地区。

西非的史前贸易和最早的国家

从费赞墓葬出土的文物表明，在我们纪元一世纪到四世纪之间，罗马的商品已经输入西非，看来罗马人在我们纪元前二世纪末叶取代了的黎波里塔尼亚沿海的迦太基人之后，他们也从苏丹输入象牙和奴隶，而以加拉曼特人为中间人。文字材料还提到深入南方的狩猎远征和侵袭；沿着费赞西南的“车道”，一路都可以发现罗马人的遗物。在罗马统治衰败以后，贸易也告衰落。但是后来，在我们纪元533年以后，阿拉伯人攻占费赞以前，随着拜占庭的再度征服而贸易又复兴起来。[66]最近的考古研究清楚地表明，史前时期远距离贸易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同撒哈拉以及北非的各族人民进行的。但是这绝不能证明波斯南斯基[67]所作的那类论断是有道理的，他声称，“要发现西非远距离贸易的起源，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从撒哈拉的沙地开始”。这种论断用意也许是好的，但是侧重点是错误的，其长远影响是有害的。首先，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西非存在着一个远距离贸易的内部体系，它比穿越撒哈拉的贸易的出现早得多，而且事实上正是这种内部贸易使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成为可能。

619

本文作者认为，现有的证据表明，从铁器时代早期，就存在着一个复杂而广泛的远距离贸易网，靠着当地的手工艺行业互相补充而繁荣起来(例如，鱼和盐的贸易)，尤其是在沿海各

---

[64] 迪奥普(C.A.Diop)，1968年，第10-38页。
[65] 特里格(B.G.Trigger)，1969年，第5页。
[66] 英文版编者注：本卷第十七章、十八章和二十章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
[67] 波斯南斯基(M.Posnausky)，1971年，第111页。

族居民和内陆务农的各族居民之间以及在南方务农的各族居民和北方畜牧成分较大的社会之间的互通有无。进行交易的当地重要产品包括铁和石头（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皮革、盐、谷物、鱼干、布、陶器、木器、可拉果以及石制和铁制的个人装饰品。

正象波斯南斯基自己所承认的，在西非早期从事农业的许多群体中间，从新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以来就进行相隔数百英里的贸易，交换磨光的石斧（在加纳当地称为"尼亚梅阿库梅"）以及陶器。属于金坦波"文化"（约在我们纪元前 1500 年）的石锉，是用含白云石的泥灰岩制成的，这种岩石显然是经过很远距离交换来的，因为它在阿克拉平原和加纳北部都有发现。在瓦希古亚附近的里姆，新石器铁器时代各地层都和制斧作坊联系在一起，这个遗址看来曾是向缺乏制斧材料的地区供应斧子的重要中心。

关于铁器时代地方性原料的进一步证据，是由于鉴别粘土陶罐的原料构成而获得的，因为发现这种陶器的地区并没有这种粘土。这种地区性贸易或许也可以对早期加纳古国基础的组成部分即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的若干方面作出解释。它的重要性肯定不仅仅表明地区性文化接触的存在，也不止证明农业社会极少是完全自给的。

在西非区域内发展起来的内部贸易和手工艺（制作业）的局面使西非和撒哈拉两大地区之间的各条商路得以形成并维持下去。这种内部贸易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促进了较大村落和市镇的成长。关于西非森林地区目前也在不断增多的考古资料继续表明，后来出现阿散蒂、贝宁和约鲁巴诸国以及出现伊格博乌库文化，基本上是由于使用铁器（也有些是使用非铁器）的早期居民非常成功地开发了他们的环境。

（江　枫译）

620

25 中部非洲*

F. 范诺敦

(D.科昂 和 P.德马雷协助)

导　言

冶金术的广泛传播和班图语的惊人扩展是非洲历史上的两个根本问题。很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并互为解释。冶金术的传播被看作是操班图语的居民向外扩张的结果；反过来，人们推测，由于掌握了铁制工具有可能向赤道森林进军，又促进了这种扩张。

语言学家们① 最先提出了班图语起源于尼日利亚-喀麦隆高原的假设。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效法他们，试图使各自学科中的发现与这种假设相吻合。② 然而，这些学科所考察的范围并不完全一致；而"班图"一词(一个语言学的名词)居然被用于"班图各族"和"班图社会"这样的人种学概念，从而又用于"班图铁器时代"这一考古学概念，实在令人遗憾。③

地理背景

本章所讨论的地区是中部非洲，即扎伊尔共和国及其邻国加蓬、刚果、中非共和国、卢旺达、布隆迪以及赞比亚北部。

这个地区形成巨大盆地，平均海拔 500 米。在这个内陆大平原的四周，地势逐渐升高，成为山脉和高原。靠近赤道的地区，全年雨量充沛，赤道南北为双雨季地带，并逐渐过渡到单雨季地带；从南北纬五度或六度左右起，只有一个雨季。

年平均气温相当高，离赤道越远，温度差越大。

621 中央盆地覆盖着茂密的赤道森林，四周环绕着热带草原。有明显旱季的地区，草莽葱茏，但在河流沿岸常有狭长的森林地带。

---

① 格林伯格(J.H. Greenberg),1955 年。

② 奥利弗(R. Oliver),1966 年；菲利普森(D. W. Phillipson),1968 a;波斯南斯基(M. Posnansky),1968年；赫夫曼(T.N. Huffman),1970 年；索珀(R.C. Soper),1971 年。

③ 在本章中"班图"一词只用于语言学上的意义。

* 本章据法文版译出，参照英文版校。——中文版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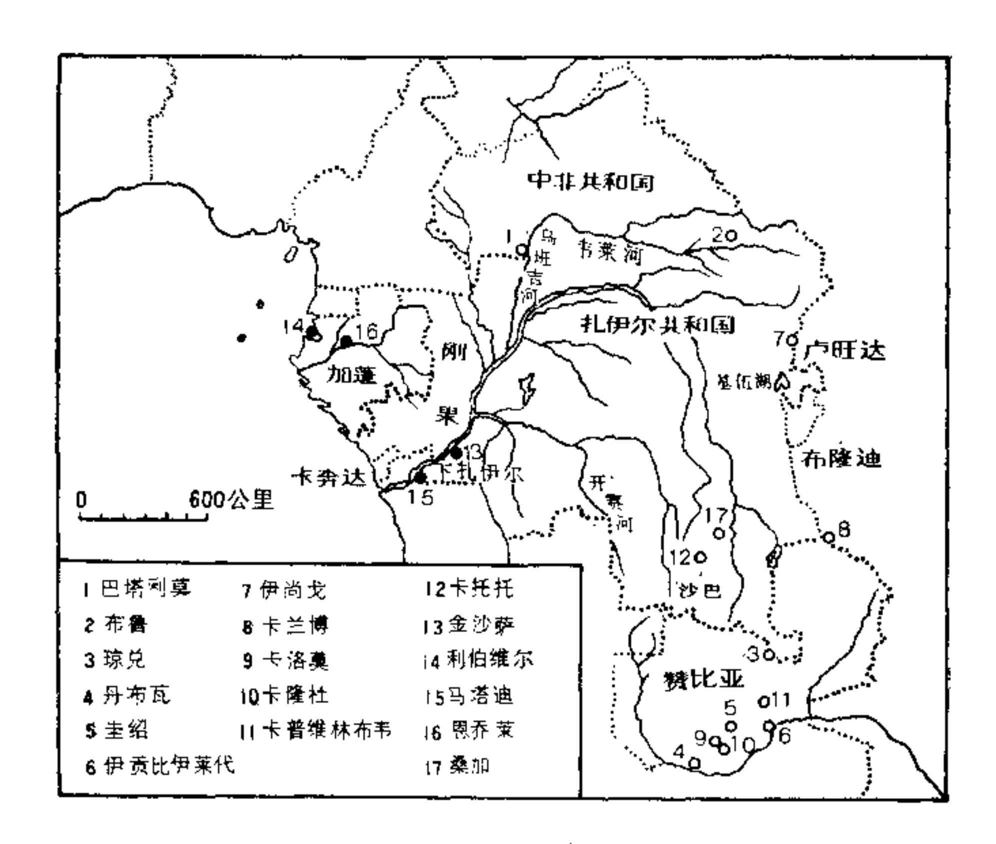


插图 25.1 中非地图（本文中涉及的地方）

晚石器时代

晚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使用的工具日趋专业化。一般对两种对立的传统加以区别，即区别奇托洛工艺文化复合体和细石器工艺文化复合体两种传统，后者以纳奇库福和威尔顿两种类型最为著名。

人们往往以晚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相对比，或从工艺方面对比（有否磨光的工具，是否同陶器在一起），或从社会经济方面对比（是否有畜牧业和农业，游牧民族是否定居，是否发展起城市）。目前，由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太少，我们只能根据工艺方面的资料来推断这种区别，而根据这些资料却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事实上，磨光的石斧和陶器在晚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中已可发现。

奇托洛文化比起中部非洲的晚石器时代的其它文化是很明显突出的。从地理上看，奇托洛文化分布在扎伊尔盆地的南部，特别是东南部各地区。奇托洛文化看来是继承了卢彭巴文化复合体的传统，主要的不同在于工具日趋小巧，并不断出现新的款式，如呈叶形似薄片带柄的箭镞，以及几何图形的细石器（扇形、梯形）。在奇托洛文化结束的时期，还发现磨光的工具。④ 从年代上看，奇托洛文化大约存在于我们纪元前12,000年至4000年之间，也许一直到我们纪元前2000年，在某些地区甚至延续到我们纪元开始时期。⑤ 622

④ 科昂(D.Cohen)和莫尔特尔芒(G.Mortelmans),1973年。

⑤ 昂富(J.P.Emphoux)，1970年。

纳奇库福文化以细石器为主，大约16,000多年前就开始出现在赞比亚北部。[6]它有前后三个阶段。最早阶段出现细石器工具，同时有大量钻过孔的石头及研磨器具。第二阶段约始于我们纪元前8000年，其特点是有了磨光的工具。最后阶段约从我们纪元前2000年开始，特征是有很大量的小型扇状石器、陶器、和少量铁器——铁器大概来自商品交换。纳奇库福文化似乎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7]

发现于赞比亚南部和南非的大片地区的威尔顿文物，纯属细石器文化的工艺。在其发展末期也出现了磨光的工具。

人们一般认为此种工艺属于原始桑族群。赞比亚中部的圭绍，保存古代遗物的特别有利条件，因此人们能够描绘出我们纪元前2000年至1000年之间这些人的生活方式。[8]

威尔顿工艺技术全面，内容广泛，有石制、木制和骨制的工具，细石工具主要是做木工活和用来作箭镞、鱼叉和刀的。细石工具还包括磨光的斧头、磨石和固定磨盘等。在木制工具中，有掘棍和箭镞，与现今桑族人使用的木制工具很相似。骨制工具中有针、穿孔器、箭镞等。

住房似乎是用树枝和野草搭成的棚屋，与卡拉哈里沙漠中桑人的住屋类似。人死后就地掩埋，墓中没有陪葬品。尸体摆放的姿势不一。

那里的居民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畜牧业。出土文物证明，他们的食物与现在当地居民的相似，基本上是种类繁多的从野生植物采集来的植物产品；猎物和水产品则是补充食品。

圭绍的居民赖以为生的地域相当辽阔，他们既猎取草原动物，也猎取森林动物。

在中部非洲有很多种细石器工艺文化，由于不曾有充分的描述介绍，所以无法归到前 623 面列举的那些工艺文化。其中有一些大概只是地方性的变种，适用于当地特有的材料或特殊的活动。

我们已经说过，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晚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有何差别。然而，传统上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工艺特点确实在某些地区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在韦莱[9]和乌班吉河地区，以及程度较小的地区下扎伊尔。这使得早期的中部非洲考古学家把这一地区的新石器工艺文化区分为韦莱、乌班吉和利奥波德三种。然而，这些所谓的工艺文化实际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只是有一些从地表拾来的或是买来的磨光的石器。每进行一次深入的研究，人们就要明显地改变原有想法。因此，以赤铁矿磨成的精制斧子（见插图25.2）闻名的韦莱文化似乎至少是部分地属于铁器时代。最近，在韦莱的布鲁发现一个制造石器的作坊。经过校正的两个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表明，这个作坊属于十七世纪前半 624 叶。在作坊里发现斧的半成品，还有吹风管的碎片、铁渣和陶器。

关于乌班吉工艺文化，现在在中非共和国班吉以南的巴塔利莫有一已发掘的遗址。在这个遗址发现了一些凿成的小斧或锛斧，有一把石斧刃部经过部分磨光，有大量非细石器的制品，还有装饰华丽的陶器——高身宽颈的坛子（见插图25.3）、平底的罐子和碗[10]。用热

---

[6] 米勒(S.F.Miller),1971年。
[7] S.F.米勒，1969年。
[8] 费根(B.M.Fagan)和范诺敦(F.Van Noten),1971年。
[9] F.范诺敦，1968年。
[10] 德贝尔·德埃尔芒(R.De Bayle Des Hermens),1972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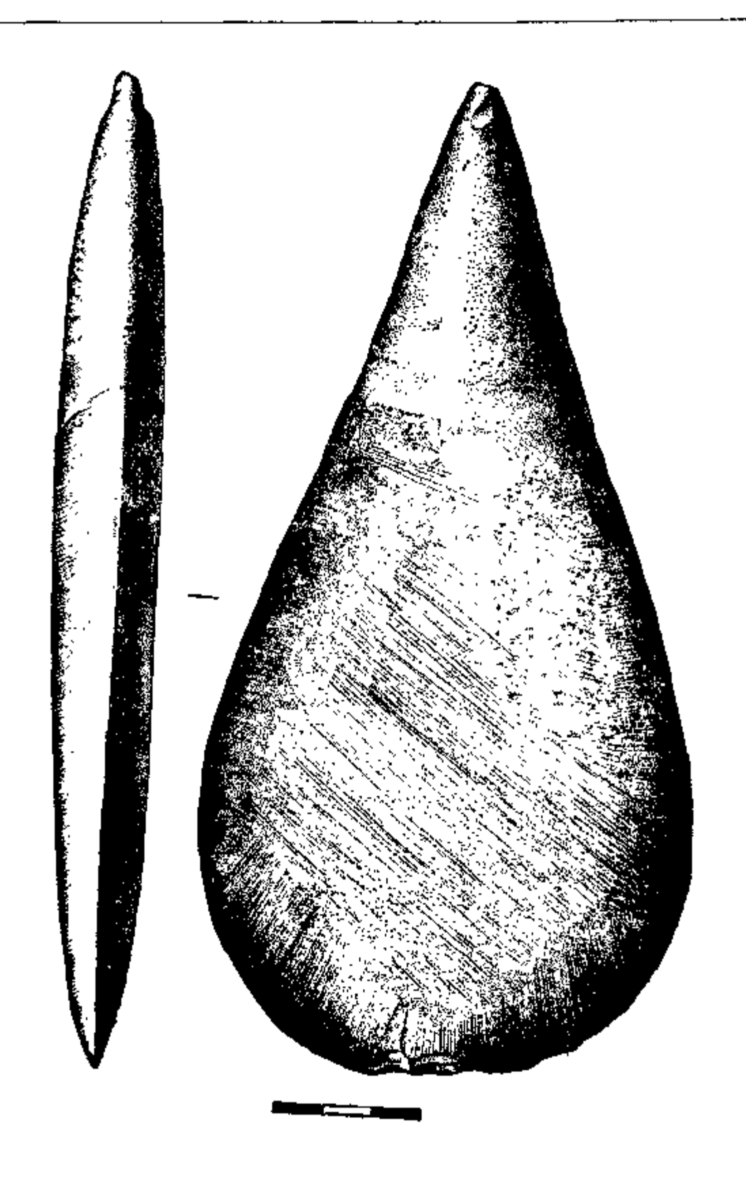


插图 25.2 韦莱磨光的石斧(赤铁矿)

释法测定出这种陶器的年代为我们纪元 380 年 (±200 年)。某些人看来，这个年代也许太近了些，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它还是不能否定的。 625

在下扎伊尔，从马塔迪到金沙萨，发现有刃部多少经过磨光的石斧，有时还伴有平底的陶器⑪。最近，在对这个地区的一个山洞进行探查时，发现有一把磨光的石斧与上述那种陶器以及木头的灰烬在一起。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它的取样经核定的年代在我们纪元前 390 年到 160 年之间。对另外一个洞穴进行探查，也找到了一把磨光的石斧，也伴有同样的陶器⑫。

在加蓬，对各遗址进行的地层研究⑬，如对利伯维尔以东 120 英里的恩乔莱进行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文化地层，里面有刃口磨光的斧、陶器和石英碎片⑭。

⑪ G.莫尔特尔芒，1962年。
⑫ P.德马雷。
⑬ 波默雷(Y.Pommeret)，1965 年。
⑭ 布朗科夫(B.Blankoff)，196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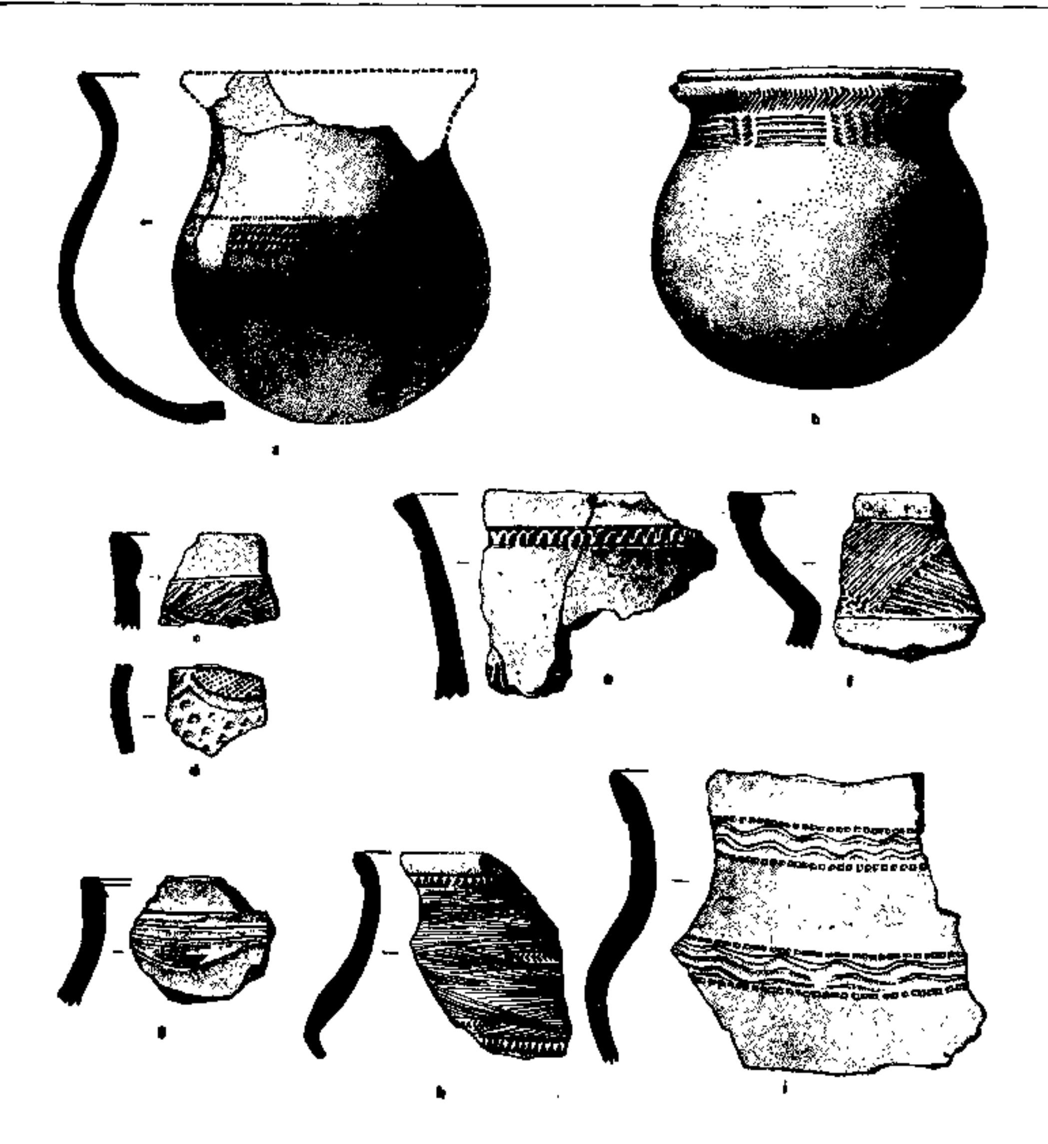


插图 25.3　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南部巴塔利莫遗址发现的古物：(a)乌雷韦式的陶罐（据利基、欧文、利基，图片IV)；(b)卡兰博陶罐；(c)(d)在坎贡加（琼见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据菲利普森，1968 a，插图 4）；(e)(f)在卡普维林布韦发现的陶器碎片；(g)在卡隆杜发现的陶器碎片（据费根，1967 年，插图 122)；(h)(i)在丹布瓦发现的陶器碎片

早期铁器时代

石器时代将要结束时期的居民和最早冶制金属的居民之间是有接触的。这一事实已得到普遍承认。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工艺上的变化是否带来了有关社会的深刻变化。

628

在确定中部非洲早期铁器时代的年代方面，我们既无史学资料（如《红海回航记》)，也没有人类学的资料。我们只有考古方面的资料。

早期铁器时代通常是和底部微凹的陶器⑮联系在一起。这种陶器（见插图 25.3a）在

⑮　在卢旺达，这种陶器是 A 型陶器（希尔诺[J. Hiernaux]及 E.马克特，196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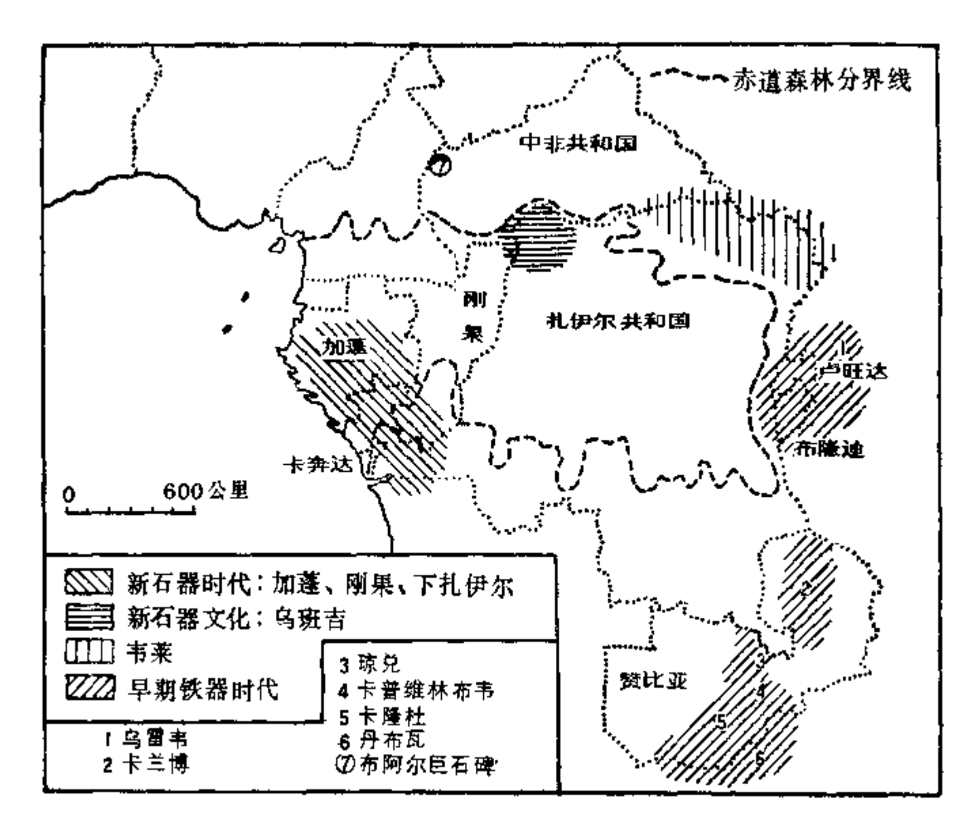


插图 25.4 中非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地区分布图

1948 年⑯第一次得到介绍，目前称为乌雷韦陶器。⑰经证实，在肯尼亚部分地区、在乌干达和大湖地区，都有这种陶器。在开赛河地区发现的一些陶器似乎也是属于分布在这大片地区内的那种陶器⑱。这些陶器的年代大部分在我们纪元 250 年至 400 年之间。然而，至少在卡图鲁卡(在坦桑尼亚的布哈亚)这一处遗址已经发现了年代早得多的陶器。⑲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发现的意义还难于作出估价。

乌雷韦陶器外观相当一致。人们常认为，所发现的各种陶器有着共同的起源，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地方性的变异，而不是属于年代上的不同阶段。事实上，它们从来不是在不同的地层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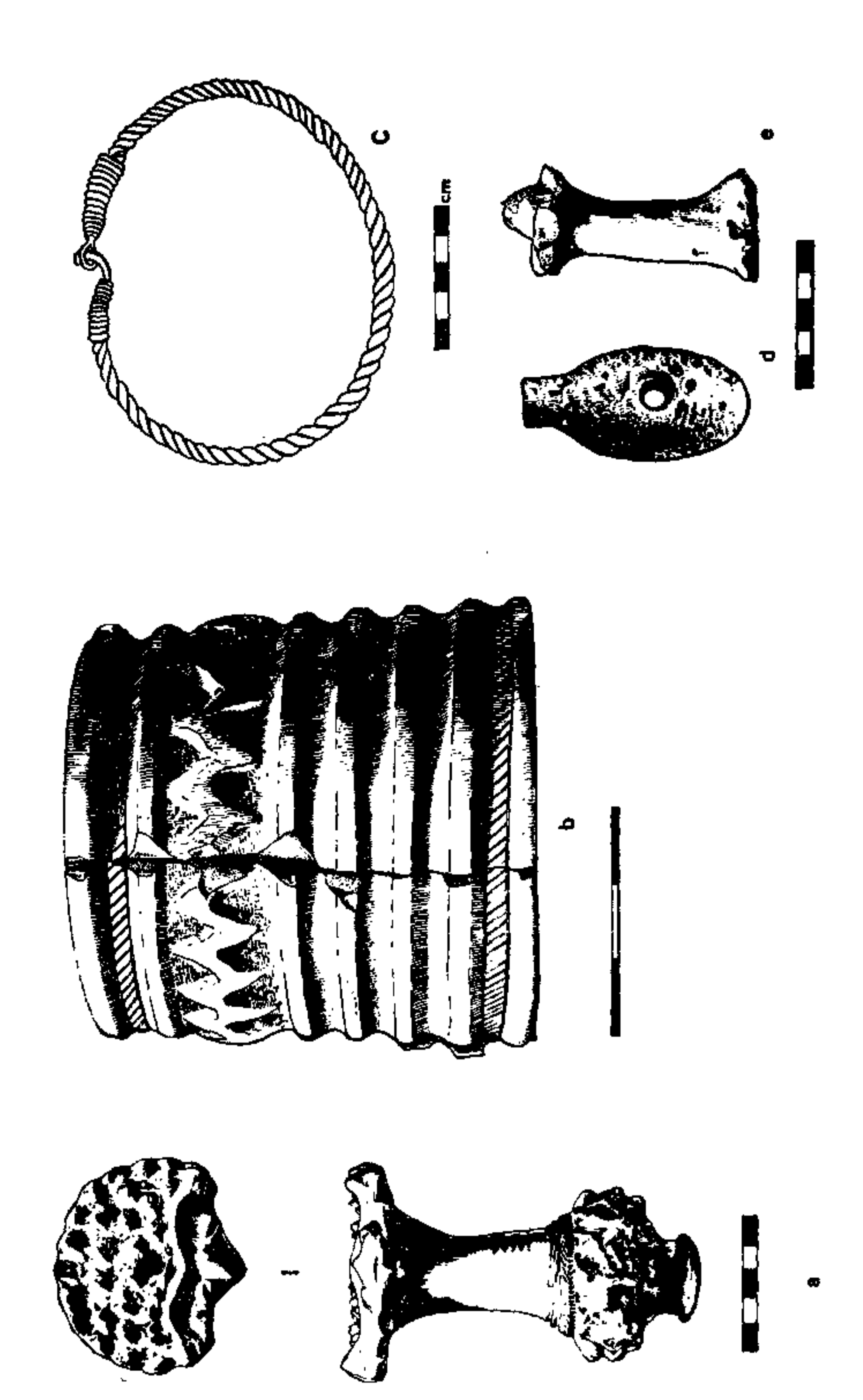
从一开始，铁的冶制似乎就与一定的文化特征(如陶器制作和建筑涂泥房屋的村庄)联系在一起。一般还认为，这个时期人们已经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在大湖地区（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以及扎伊尔的基伍地区，已证实有乌雷韦陶器的存在。长期以来，早期铁器时代的赞比亚陶器(有槽状花纹)被列为底部微凹的陶器一类。事实上它似乎可以分成好几种地区性类型。

实际上，只有 J.希尔诺和 E.马克特曾对这些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进行研究。他们最初（在 1957 年）发表著作，记述了基伍的两处遗址。在查姆富，有典型的乌雷韦陶器同炼铁

⑯ 利基(M.D.Leakey)、W.E.欧文和 L.S.B.利基，1948 年。
⑰ M.波斯南斯基，1967 年。
⑱ 南昆(J.Nenquin)，1959 年。
⑲ 萨顿(J.E.G.Sutton)，1972 年。

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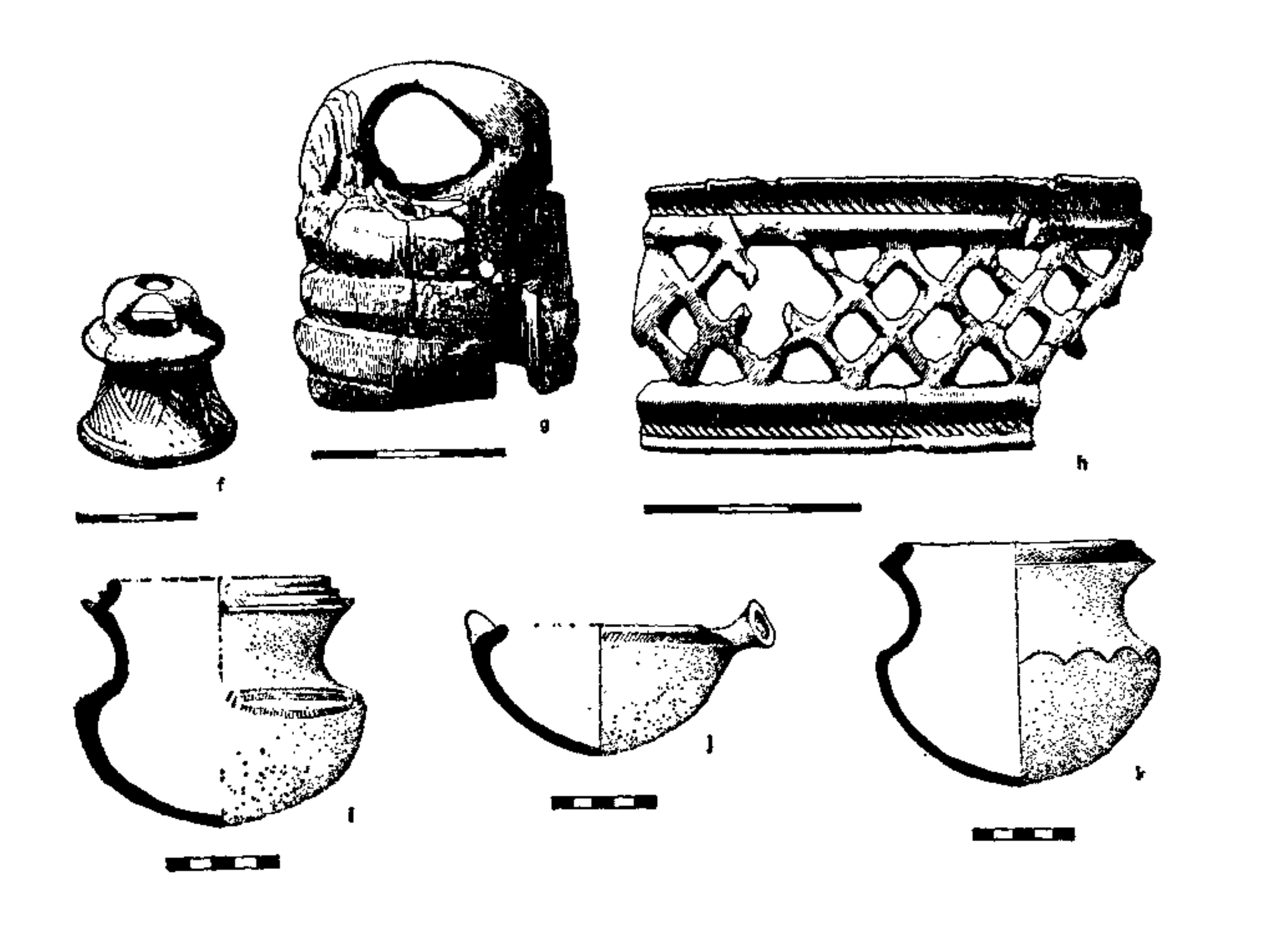


插图 25.5 在桑加发现的古物：（a）从上或侧面看都带有人形装饰的器皿；（b）象牙手镯；（c）铜项圈；（d）铁制哨子；（e）赤陶计数器；（f）石制垂饰；（g）象牙垂饰；（h）半个象牙项圈残片；（i）（j）（k）各式陶器（特武伦博物馆；J. 希尔诺，E. 德隆莱和J. 德比斯特，1971 年）

残渣及手工制的砖在一起。在比尚盖发掘出一座熔铁炉，它是用手工制的砖砌成的。这些砖往往有一面稍凹进去，上面印有指痕图案。比尚盖的陶器也是属于乌雷韦陶器类型。

这两位作者后来（1960年）又记述了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现的几处铁器时代的遗址。那里的陶器被分为A、B、C三类。只有A类与乌雷韦陶器相同，似乎属于早期铁器时代，其他两类显然年代更晚一些。

A类陶器是与铁渣、吹风管以及往往带有图案装饰的手工制的砖（很象基伍的砖）一起出现。至少在两处遗址，这种砖似乎是属于熔铁炉的。现已公布的年代有两个：恩多拉遗址的年代为我们纪元250年（±100年）；布塔雷省恩多拉镇的昔阿马库扎遗址的年代是我们纪元380年（±80年）。[20]

629

在穆基纳尼拉，A类陶器就在晚石器时代一种石器工艺文化的上层，并有一部分互相混杂在一起。[21]在马桑加诺，两类古物也混杂在一起。据此，我们或可推断，A类陶器的制造者把炼铁术带到非洲的这一地区时，当地还是居住着晚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工艺不同的居民群共居一地的情况相当广泛地得到了证实。[22]直到今天，特瓦人在这个地区的赤道森林里仍然过着狩猎生活。

最近，在口头传说称作是图西王室陵墓的一些遗址上进行了挖掘，有时可以看到早期铁器时代的一些东西。例如在鲁伦博，在红土层的一个洞里有年代为我们纪元前230年（±50年）的木灰。在这个洞的上面有一个A类陶罐。在朗布拉有一个类似的洞，里面有铁渣，吹风管碎片和很象乌雷韦陶器的碎陶片，一些晚石器时代经过加工成形的石器以及我们纪元295年（±60年）的木灰[23]。这后一项发掘成果与J.希尔诺先前取得的成果极相符合。

这个工艺文化的工匠们看来是在我们纪元300年左右来到卡兰博山谷的。他们在那里逗留了600年，也许甚至是1000年。那时的人口似乎相当稠密，人们在村庄里过着和平的生活，这些村庄既没有栅栏也没有壕沟。虽然还不了解这一居住地区的设计，但是它的面积大约是10至42英亩。

有些住房或粮仓的遗迹保留了下来。有一组坑共8个，各坑边缘笔直而平行，直径约1米多，平均深度近2米。坑里有一些陶罐、陶器碎片、模具碎片、铁器和铁渣。其中4个坑被一条环形壕沟围绕，这可能是一座建筑物的残迹。

只有一些间接的证据说明曾有过农业活动。没有任何有关畜牧业的确实迹象。

许多块铁渣（特别是从一座炼铁炉底部挖出来的那一大块炉渣）和一些吹风管的残片的发现表明，炼铁活动即使不是在生活场所进行，至少也是在它们附近进行。

在这些坑中出土的铁器有：矛头、刀尖、箭簇、手镯和脚镯、指环或趾环。手镯或脚镯及其他装饰品也有铜制的。

那时仍继续使用石器，证据是发现了许多石磨和石杵、石槌、榔头（其中有一把铁匠

[20] J.希尔诺，1968b。
[21] F.范诺敦和J.希尔诺，1962年。
[22] S.F.米勒，1969年。
[23] F.范诺敦，1972b。

用的锄头)、一个石砧以及很多粗制的刮、切和擦锉器。

白粘土和红赭石被用作颜料。

大部分陶器的口部是圆的，略向外张，外沿加厚。所有陶器都是圆底，有两只罐的底部用手指按成微凹形。罐的装饰是在烧制之前加上去的，多见于罐的肩部或更靠上的部位。图案是一圈一圈绕罐平行的水平浅槽纹，为人字纹和螺旋纹所隔断。有时由一行行三角形和小圆点的刻痕组成一系列斜行和十字形阳纹的假浮雕图案布满罐的颈部和肩部。 630

在赞比亚北方省的11处遗址中发现了与卡兰博瀑布的陶器极为相似的一些陶器，分布在面积近97,000平方公里的一片地区内。[24]

除了桑加和卡托托的古代墓地(这两个遗址很重要，下面将分别予以论述)以外，在沙巴还没有发现过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然而，这两个古代墓地出土的全部文物看来工艺水平很高，如果在此之前没有过一个更早的铁器时代，那就太令人惊讶了。此外，在赞比亚西北部沿扎伊尔边境的产铜地带，人们考察了几处露天的聚居地，其中有的看来可追溯到我们纪元四世纪。[25]

由于没有进行广泛的发掘和准确的年代测定工作，我们掌握的少量材料有极大的推测性。在奇卡帕附近发现的四个陶罐(其中两个底部微凹)，可能属于乌雷韦型陶器。[26] 另外，在姆布吉马伊[27] 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发现的许多陶罐和碎陶片，则与卡兰博瀑布工艺文化的陶器极其相似。

除了赞比亚和大湖地区以外，下扎伊尔是发现似乎可能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遗物的唯一地区。在洞穴里收集到的材料暂时辨识出六种陶器和一些铁制器皿。[28]

进一步研究这些陶器证明存在着好多组陶器，其中有的分布相当广泛。[29] 这些陶器中没有一组与乌雷韦陶器有关系。

由于没有进行广泛的发掘，我们无法给这些陶器或金属器皿编排年表。

在富纳河河源附近的金沙萨发掘出木灰(旁边还有一小块形状不规则的陶器碎片)，经测定年代为我们纪元前270年(± 90年)。虽然这个年代无可争议地属于铁器时代范围，但是必须非常谨慎地看待它，因为测定过年代的木灰同陶器碎片的联系，和有关金沙萨的另一年代(从河中心的米莫萨岛得来)的情况一样，都未经正式证实。在米莫萨岛同陶器碎片一起的木灰样品经测定年代为我们纪元410年(± 100年)。遗憾的是，经过这样测定年代的陶器碎片却从未公诸于世。[30]

然而，米莫萨岛发掘出来的陶器与在贡贝角(从前称卡利纳角)上部各地层里发现的陶器完全一样。这个称为卡利尼安的遗址，其命名来自卡利纳角，它是科莱特于1925年和

[24] 克拉克(D.Clark)，1974年。
[25] D.W.菲利普森，1968年。
[26] J.南昆，1959年。
[27] 埃兰(A. Herin)，1973年。
[28] G.莫尔特尔芒，1962年。
[29] 德马雷(P.Demaret)，1972年。
[30] 吉洛(E.Gilot)，昂西翁(N. Ancion)和卡普龙(P. Capron)，1965年。

1927年发掘的。1973年和1974年[31]，经过再次发掘，在这处遗址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铁器时代居住层，其遗物在整个岬角均有发现。在挖掘的大部分地方，最上部有一排排木灰、631 陶器、石块、焦土、一些铁渣和磨石的碎块等物，它们埋在一个居民点的土层上。这个居民点有着各种考古意义上的结构，有一些大炉床，特别是有一些坑深度往往超过2米。这些坑有时有基本完整的陶罐。有两个坑有铁器的小碎片。因此这可能是一个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区。由于正在进行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工作，我们不久将了解到更多的东西。

在中非共和国的布阿尔地区，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土丘，顶部立着方石块，有的高达3米。有时下面还有成排的拱穴。看来这些小丘是用作墓地的。然而没有发现骸骨，[32]却找到了一些铁器。[33]有六个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两个年代属于我们纪元前第六、第五千纪，其他四个年代在我们纪元前七世纪至我们纪元一世纪之间。[34]第一个年代似乎是墓丘建筑的年代，第二个年代似乎是它们在铁器时代重新启用的年代。

桑加和卡托托两处墓地位于上扎伊尔谷地，在乌彭巴墓群中。它们是扎伊尔共和国境内最著名的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

桑加墓地很久以前就被发现了，它坐落在金孔贾附近的基萨莱湖畔。1957年和1958年曾被系统地发掘过；1974年进行了新的发掘。打开的墓穴总数已有175个，但是很明显，墓地的很大部分仍然有待发掘。[35]

经过1958年的发掘以后，识别出三组陶器，看来可以为这三组陶器编制年表。基萨莱陶器(数量最多)最为古老；其次是穆隆戈陶器(穆隆戈是桑加东北一个地名)；最后一组是红釉陶器。

1958年的发掘表明，这三组陶器彼此至少有一部分是同时代的。

尽管墓地本身看不出年代，两项放射性碳素测定使我们可以判断墓地的年代是：

——我们纪元710年(±120年)；

——我们纪元880年(±200年)。

上述较早的年代得自一个墓穴，其中尸体的姿势很不寻常。穴中仅有的一只陶罐虽属于基萨莱陶器，却不典型。后一个年代来自另一座墓穴，这一墓穴没有属于上述三种陶器 632 文化的任何墓葬品。[36]因此，我们并不确切了解其年代。而这些年代的本身不明确，因而大大降低了它们的价值。目前我们可以有把握说的只是，有些桑加墓穴出现在我们纪元七世纪到九世纪，相差不超过200年。

发掘使我们对墓地本身有了一些了解，从而对桑加的古代社会概貌有了一些认识。

尽管上述三组陶器是同一时代的，但显然不属于同一类居民。铜制小十字架(一种货币)差不多都是在有穆隆戈陶器或红釉陶器的墓穴中发现的，而在基萨莱的墓穴中则简直见不到这种十字架。另一方面，所有的墓穴都有许多加工得很好的铜器和铁器。可以这样推

[31] D.科昂和P.德马雷，1974年。
[32] 在露天遗址中，除非在特殊条件下，中非的酸性土壤对遗骨腐蚀极快。
[33] 维达尔(P.Vidal)，1969年。
[34] R.德贝尔·德埃尔芒，1972 b。
[35] J.南民，1963年；J.希尔诺、德隆莱(E.De Longerée)和德比斯特(J. De Buyst)，1971年。
[36] 此外，大概在实验中也增加了一些从伴有穆隆戈陶器的坟墓中发掘出来的遗骨。

测：少数用铜制小十字架陪葬的人不同于基萨莱的居民，他们或许是铜的生产者——最近的铜矿位于南面300公里左右。

葬礼似乎颇为复杂。大部分坟墓都是朝北或朝东北的，而装有穆隆戈和红釉陶器的坟墓则是朝南的。死者大都是仰卧姿势，墓中置有陪葬物品，大概是为了方便死者在冥间的生活。陶器没有用过的迹象。同一座墓中的某些器皿十分相象，似乎表明它们是专为殡葬制造的。这些坛罐大概曾装有食物和饮料。死者身上佩带着用铜、铁和象牙制作的饰物。早产儿似乎也埋葬起来。有些墓里，死者手里拿着整捆的铜制小十字架。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墓中器皿的尺寸随着死者的年龄而增加。

我们对桑加文化所得的总印象是：那里的人们对捕鱼和狩猎比对农业更为重视。不过，在坟墓中也发现有锄头、固定磨盘，还有山羊和家禽的残骸。

没有任何富丽堂皇的坟墓，可以表明它是属于一位重要首领的。但是，精致的墓葬物品说明桑加工匠的手艺很高，他们用木、骨和石头制作物品，把铜、铁拉成丝，并用敞口模子[37]铸生铁。他们的陶器看来很有特色。

由于没有对骨骼进行分析，我们所掌握的人类学方面的资料只是对一些人体遗骸的齿科学研究。研究发现牙齿缺损的情况极为常见。[38]我们不知道墓地的整个范围有多大，否则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居民的人口规模。

桑加文化看来曾经灿烂一时，但就我们目前所知，它是孤立的文化。就考古发现的全部资料来看，它所包括的时期可能长于前面提到的放射性碳素测定的两个年代。

1974年进行了新的发掘，主要的目的是想知道这个墓地使用的时间有多久，确定它内部的确切年代，弄清墓地的范围并设法找到当时居民点的位置。这次新发掘了30座墓。它们可能使我们能够最后确定墓地的年代顺序并对其范围大小获得某种概念。但是，由于现代村庄的发展，古代居民点的遗址仍未能找到。 633

不过，在离桑加6英里的卡通戈进行发掘的结果，看来已发现了一个居住层，位于一座小山的脚下，离墓地不到半英里。发掘结果也发现有在桑加见过的那几类陶器。

卡托托墓地位于卢阿巴拉河的右岸，从桑加沿河上溯约80英里，离布卡马不远。1959年对部分墓地进行发掘，挖开了47座坟墓。[39]

有三种不同的考古发现：首先是坟墓；其次是坑穴，里面的物品与坟墓里的不同；再上面的地层里的陶器又与坟墓和坑穴里发现的截然不同。

桑加墓地与卡托托墓地的不同点，首先是后者有一墓多葬的现象，多者葬有七个人。在有些墓穴里找到了打铁用的铁锤、铁砧、成堆的铁屑和一把战斧等物品，这些墓埋的一定是一些重要人物，很可能是些铁匠。为了向死者表示敬意，一座墓中，以两名妇女和四名儿童殉葬；另一座墓中，以两名妇女和一名儿童殉葬。

卡托托的墓葬物同桑加墓地的一样丰富。这也可表明当时社会繁荣，有很高的技术发展水平。墓中发现不少锄头和石磨，这说明农业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人们一定也从事捕鱼

---

[37] J.南昆，1961年。
[38] 布拉邦(H.Brabant)，1965年。
[39] J.希尔诺，E.马克特，J.德比斯特，1972年。

和狩猎的活动。

卡托托墓葬物中完全没有发现铜制小十字架、穆隆戈陶器和红泥釉陶器，然而却发现了三只基萨莱碗——这是能说明桑加和卡托托之间有过交往的唯一证据。

这里出现了产自大西洋和印度洋两地的玻璃珠子和贝壳饰物，表明当时已有相当广泛的贸易活动。

卡托托陶器同桑加陶器一样，也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似乎更少固定格式。卡托托陶器有些装饰图案有点与乌雷韦陶器相似。但是由于沙巴地区从来没有发现过乌雷韦陶器，所以不能说卡托托陶器是从乌雷韦陶器演变而来，而只不过是一种巧合。实际上，那些共同的图案，如螺旋形、条带形、人字形以及同心圆等等，是当时非常普遍的图案。

坑穴的年代比坟墓要晚，有时它们还破坏了一些原有的坟墓。有一个坑穴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为我们纪元 1190 年(±60 年)。

在这些坑穴里，发现的陶器碎片很少。发掘出来的陶器碎片有的底部微凹，这一点也颇象乌雷韦陶器。

634　总之，在卡托托墓地发现的东西对桑加墓地的出土文物是一个补充。卡托托和桑加这两个大定居点，相距很近，并显然属于同一时代，但彼此间的联系竟如此之少，实在令人诧异。

尽管有丰富的墓葬品，但是我们对埋在这些墓地里的人却了解不多。他们是些什么人？来自何处？怎么死的？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关于他们的生活情况，我们也只有很少的资料可供参考。上述两处墓地的规模说明卢阿拉巴河上游两岸地区在我们纪元第一千纪末曾是人口很集中的地区，产生过灿烂的文化。目前在几处新的遗址正在进行的发掘工作，将使我们对那里的文化有更好的了解。

班图人的起源

上面说过，“班图”这个词原是一个语族的名称，但是后来逐渐获得了人种学、甚至人类学的含义。实际上，正是这种语言学上的分类为其它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基础。

由于缺乏文字资料，考古学并不能确定现已发现的铁器时代的资料与“班图”这一语言概念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

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陶器、铜器、残缺炊具及少量的骸骨，但正如很难说某个罐子更象是属于印欧人所专用的，也不可能指出哪一个坛子是“班图人”的。

直到现在，还是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关班图人的起源和扩散的详细情况。主要是在格林伯格(1955、1966、1972年)和格思里(1962、1967、1971、1970年)发表他们的著作之后，有些语言学家提出，目前分布于几乎半个非洲大陆的班图语，其发源地是尼日利亚和喀麦隆边界上的贝努埃河中游地区。

人们往往想把班图语的广泛传播同掌握炼铁术联系在一起。但把各种班图语有关冶炼术的词汇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各自的有关锻造的词汇差别很大。然而，通过对一些词的结构进行分析，看出来在原始班图语阶段就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例如有了“锻造”、

"铁锤"、"风箱"等词。但是这些词汇究竟是在班图语分支之前就有的呢，还是在分支过程中某一不明的阶段，从别的语言借入的呢？那些经过广泛验证的词汇也许是从原始班图语经过转义而进入现代的各班图语的，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所以，象"锻造"这个词也许不过是"打"这个词的一种专门用法。最后，其他有关冶炼的词汇在班图语和非班图语中似乎来源相同。这似乎表明，在这两类语言中这些词汇是借来的。

人们要是想到冶制金属的能力对非洲传统社会是何等重要的话，那就很难理解，如果班图人在向外扩张之前就已经从事制铁，那为什么我们在语言方面找不到任何明显的痕迹。 635

只要研究一下各种人种学著作，就会发现，尽管"班图"地区可以区分为若干文化区域，却不可能发现"班图"人有哪些共同的特点与非洲其他民族不同。

最后，对班图人的体质特点，很少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过研究。只有J.希尔诺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某些情况。他指出操班图语的各族人民形态上的相似点。但他的结论是根据现代操班图语各族人民的形态作出的。目前对古代班图人还缺乏研究，因此，要把一具完整的现代"班图人"的骨骼同其他非洲人甚至欧洲人的骨骼区别开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对于考古活动所发现的常常只是一些残缺破碎的骨骼又能辨认出多少呢？

目前，经过仔细研究的仅有的人体骨骼化石是在扎伊尔的维龙加公园的伊尚戈发现的。[40] 遗憾的是，无法断定这些骨骼化石的确切年代，而且也未能确定它们属于何种体质类型。

早期铁器时代的社会性质

铁器时代开始时期人们的生活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我们得到的资料渐渐多起来。赞比亚的各处古代遗址、位于沙巴的桑加墓地和卡托托墓地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具体的资料。

在中部非洲，古代的居民遗址不多见；已知的只有贡贝和卡兰博瀑布两处遗址，可能还有卡通戈遗址。

证明铁器时代初期已有农业生产活动的唯一证据是一些铁制锄头，它们的形状与现在使用的锄头实际上一模一样。另外，在地下挖的一些洞穴被认为是当时的储藏窖，而一些小型的涂泥的建筑物则被认为是当时的粮仓。石磨存在的情况说明不了多大问题，因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会同样有碾磨工具。

早期铁器时代的植物和家畜遗骸极少发现，也难于辨认。除了在桑加的一些墓穴中发现的山羊炮骨以外，我们没有关于中部非洲地区的具体资料。非洲有的地区有采采蝇为害，是饲养家畜的严重障碍。在历史上，采采蝇为害的地区分布是有变化的。所以，现在很难说，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哪些地区适合于搞畜牧业。狩猎和捕鱼仍是当时的主要食物来源。

---

[40] 特维赛尔芒(F. Twisse Lmann)，1958年。

636 发掘还找到了一些箭镞和矛头，以及肯定是属于猎狗的骨骼。那时可能也使用陷阱和罗网。在桑加和卡托托一些墓穴里发现的鱼钩，证明了渔业在当时有重要地位。桑加地区发现的那些三叶形火盆与扎伊尔赤道地区水上居民在独木舟里使用的火盆极其相似。

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物证明，在早期铁器时代，存在着广泛的贸易网。

当时的贸易似乎主要限于靠近大河流（如扎伊尔河和赞比西河）的地区。在远离河流或湖泊地区的遗址，则极少发现外来的物品。

有必要对当时的两种贸易加以区别：一种是地区性贸易，交换的主要是金属、陶器、筐篓、干鱼和食盐；另一种是远距离贸易，[41] 交换的主要是贝壳、玻璃珠子以及铜等金属。在扎伊尔的桑加和卡托托地区发现的贝壳和珠子全都来自东海岸，只有在卡托托发现的一枚锥体贝壳是来自约1400公里以外的大西洋。此外，在距离产铜地区很远的地方曾发现一些铜制的小十字架钱币。

尽管我们了解得不全面，但看来早期铁器时代非洲各族人民的经济大概与今天非洲各地传统社会的经济很少差别。

早期铁器时代的经济是建立在农业和畜牧业基础之上的，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食物。这种社会在经济上实际是自给自足的。

发掘出的金属冶炼的遗迹，即使是那些年代最久远的，也与人种学家所描述的那些社会中的金属冶炼遗迹没有根本的差别。[42] 然而，在同一地区，同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冶炼技术和产品类型。因此，不同的金属制品或不同的锻造工具，并不一定是由于年代上有差别，而很可能是由于它们属于不同的文化。

在基伍、卢旺达、布隆迪和坦桑尼亚西北部的布哈亚都发现了砖砌的熔铁炉，并伴有底部微凹的陶器。[43] 应当指出的是，唯一介绍卢旺达炼铁技术的布尔热瓦[44] 说（1957年），炼铁炉是用一圈烧制的砖砌成的，它与希尔诺和马克特发现的炼铁炉遗迹颇为相似。

直到目前，铜的使用总是与铁的使用一起出现。铜的开采地点是沙巴、赞比亚北部，[45] 大概还有下扎伊尔。铜的冶制当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在桑加和卡托托所发现的铜制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时期，人们似乎也已在使用铅。[46] 本世纪初期，刚果人还在继续开采这种金属。

637 陶器遗留物并不是铁器时代的确证，因为如前面所述，在晚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发现陶器。一般来讲，不可能区别哪些陶器是铁器时代的，哪些是更早时期的。

不过，在一些湖泊地区和在赞比亚，还是有典型的铁器时代的陶器，例如乌雷韦、卡兰博、琼兑、卡普维林布韦、卡隆杜和丹布瓦等地的陶器。

坛罐的做法是把粘土轻轻拍打，拉成小长条或带状，然后盘绕起来。它们的形状和装饰种类繁多，这里我们只能介绍其中几种最典型的。

㊶ 范西纳(J. Vansina)，1962年；费根(B.M.Fagan)，1969年。
㊷ B.M.费根，1961年。
㊸ J.希尔诺和E.马克特，1960年。
㊹ 布尔热瓦(R. Bourgeois)，1957年。
㊺ J. D.克拉克，1957年。
㊻ B.M.费根、D. W.菲利普森和丹尼尔(S.G. H.Daniel)，1969年。

从考古资料所能得出的判断是，早期铁器时代的社会同现代的一些社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必然同样具有多样性。

当时的农业技术不适于建立大定居点，因此有某种程度的流动性。

桑加和卡托托两处墓地是例外情况，那或是由于居住时间很久，或是由于有大批居民集中在卢阿拉巴河两岸。有些坟墓里，尤其是在卡托托的坟墓里，葬物很多，这也许是社会不平等的迹象。

大量精美的铜、铁、石、木、骨和泥制的器皿，不仅反映了当时工匠的技艺，恐怕也反映了某种程度的生产专业化。

从发掘出来的所有坟墓来看，当时的殡葬是很讲究的。死者身上佩戴很多装饰品，如手镯、戒指、项链、耳坠以及成串的珠子和贝壳。小贝壳、玻璃珠及石珠和铜制的小十字架一样，在当时还可以用作钱币。最后，中非最古的木雕出自安哥拉，其年代为我们纪元750年。[47]

结 束 语

我曾多次指出，利用某一学科一时发现的资料来支持另一学科的结论是危险的。匆忙地联系起来所得出的一般性理论，在各个学科的严格范围内往往很难站住脚。不过，要想说明早期铁器时代的社会性质或说明操班图语各族的起源，那就需要把考古方面和非考古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研究。

某些理论，例如格思里的理论，[48]提出极其严密的综合解释。他所建立的历史和地理理论对许多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具有明显的也许是不自觉的影响。

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三方面的综合解释，将班图语的分布与炼铁技术的传播联系在一起；它否认非洲会有独立的发明创造，而同炼铁技术是从"肥沃新月"地带传来的观点沆瀣一气。

晚近研究工作的发展使我们对这些理论重新加以考虑。语言学家们对于研究同源语言演变史所采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提出怀疑。一些新出土文物的年代测定使人们对中部非洲冶炼技术的起源有了新的看法。事实上，从卡图鲁卡遗址发掘出来的炼铁遗迹，经测定其年代大约在我们纪元前 500 年至 400 年之间。[49] 638

我们目前仍处于茫然无知的状况下，同时考虑到新的资料，关于炼铁术的传播和班图语的起源问题显然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更为复杂，不能对之进行矛盾百出、过于简单的解释。

因此，如果每当新的发掘提供一些新的年代时，就对居民的迁徙情况和冶炼技术的起源提出新的假设，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我们可以试着把某些相关的事实联系起来

[47] F.范诺敦，1972 b。
[48] M.格思里，1962 年和 1970 年。
[49] 这里所提的年代是用放射性碳素测算出来的，与日历上的年份不完全相符。我们纪元前的年代需按比例向前推，比例随有关的时期而不同。

看。关于冶铁技术的起源，卡图鲁卡遗址所提供的年代与差不多同一时代的麦罗埃遗址的年代看来有着某种联系。因此，可以设想，冶炼技术是从麦罗埃向南传播的。不过，要是那样的话，似乎就传播得太快了。因此，人们目前不能排除另一个起源，那可能就是在当地。

很难看出那种认为冶炼技术的传播与班图人的迁徙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的看法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尚未证明这两种现象完全无关。难道我们不能设想，“班图”人在其向外迁徙之初对炼铁毫无所知，但在其扩张过程中发现它吗？

读者将会看到，我们所掌握的关于中部非洲早期铁器时代的资料是价值不等的，而且很零碎；早期研究成果所建立起来的理论，现在在大量新资料的面前摇摇欲坠了。我们应当进行更加广泛、更加系统和更加协调的研究活动，然后才有可能对中部非洲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韩大塑译）

26 南部非洲：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人群

639

J.E.帕金顿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按语

国际科学委员会本来希望这一章象所有其他各章一样，能够严格按照第二卷所规定的年代范围来写，所以它曾请本卷的编者向作者提出这一要求。但作者认为难于对他的原稿作任何大的改动。因此，委员会在同作者讨论后，按取得一致意见的方式予以发表。然而，委员会对本文的写法，特别是第一段的写法以及会使读者产生混乱之处——将旧石器时代和当代情况放在一起同时向读者介绍——有重大的保留。

最近的研究表明，使用铁器的族群至迟于我们纪元第四世纪或第五世纪就移至林波波河以南地区。[①]尽管许多细节尚未公之于世，看来已很明显，德兰士瓦和斯威士兰铁器时代的居民是以务农和放牧为生的。他们制造的陶器同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已发现的同期陶器相仿。[②]至于这些曾明显迅速扩散的铁器时代族群是否以同样的速度继续进一步向南扩散则不得而知，但是在纳塔尔开始制作铁器的时间要稍晚一些，约在距今1050年前后。[③]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些使用铁器的族群是什么时候到达他们分布地区的最南端，即开普东部地区的菲什河一带。尽管有这些不肯定之处——毫无疑问，这将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但现已确知，这些铁器时代的居民瓦解了当地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族群，并取而代之。那些土著族群基本上不懂得冶炼金属、饲养牲畜和栽培植物。只有在不适于以务农和放牧混合为生的人居住的地方，如崎岖的德雷肯斯山脉的陡坡，狩猎者们才能避开铁器时代早期的人口扩张而生存。然而时至今日，连退避也无法使他们维持生存了。 640

第二次人口扩张是十六世纪中叶从开普地区开始的，这次扩张在许多方面更具有破坏性。十五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者最早与当地居民发生了接触；165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决定在桌湾建立一个食品补给站，这一决定加强了这种接触。在其后60年间，在食品补给站周围10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开普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放弃了他们传统的聚居方式，他们或是迁移，流落到正在发展中的殖民地充当佣人，或者死于殖民者带入的疾

① 博蒙(P.B.Beaumont)和沃格尔(J. C. Vogel)，第66-89页；梅森(R.J. Mason)，1973年，第324页；克拉普韦日克(M. Klapwijk)，1974年，第19-23页。

② 参见本卷第二十七章。

③ 戴维斯(O. Davies)，1971年，第165-178页。

病。④到十七世纪末叶，这个食品补给站已发展成为一个殖民地，殖民者同土著族群就土地所有权问题至少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战争。土著各族起初被笼统称为“奥屯督人”或“霍屯督人”，但是后来逐渐发现放牧者（即霍屯督人，他们的许多部落名称已为人所知）和狩猎者（布须曼人或博斯耶斯曼人，也被称为松奎-霍屯督人）之间的区别并使用了不同名称。这些族群使用的语言相仿，谋生技术和物质文化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连体形也无两样，所以他们显然彼此有密切关系。由于他们在这些方面同其他土著居民集团，即住在北部和东部使用铁器的农民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他们通常被当作一个单独的成分，现名为科伊科伊族放牧者和桑族狩猎者，这两个名称经常合用，产生了“科伊桑人”的名称。⑤

既然是这样，看来要把本章的叙述完全限制在严格为本卷所规定的年代范围之内是不可能的。但是作者试图阐述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持久和相对稳定的那些方面，而把这些族群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同外界的接触而在生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整个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留待与这些地区有关的其它各卷的作者去论述。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内容上的重叠。

科伊桑人

本章将叙述居住在南部非洲的南部地区，受到铁器时代农民和欧洲殖民者包围的那些从事狩猎和放牧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于欧洲殖民者读书识字，而铁器时代的农民不识文字，所以关于桑人和科伊科伊人的传统生活以及科伊桑人同其他族群关系的文献材料大大偏重于开普西部地区，而这种情况又因开普山区地带的大量考古发现而加强；这一地带的考古材料比南部非洲其它地区的资料更为丰富。本章所述内容虽多属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情况，但对于说明整个地区科伊科伊人和桑人的生活方式应能有所启发，不过涉及地方性的细节自然有所缺漏。

641

由于种种原因，已掌握大量关于科伊桑族群如何生活的证据。他们一直存在到不久以前，所以留有大量诸如手工制品遗物和动植物食品残余等考古学证据；又由于他们同有文字的社会交往，所以留下了一批关于他们土著生活方式的历史文献。此外，在土著人当中至少有一些集团以岩画和石刻的形式留下了他们自己的记载，这些岩画和石刻就成了了解其社会、经济、技术、也许还有宗教情况的有价值的资料来源。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南部非洲许多地方的环境自狩猎者和放牧者首次占据以来，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经过250年的农业活动之后，现在仍可找到材料追溯以往环境的空间和季节因素，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决定史前时代人们聚居状况的性质。

可以得到的重要食物资源，原料暴露于表层的地点以及牧场和水源的周期性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说明狩猎者和放牧者可能采取的聚居模式。虽然在开普地区已没有狩猎者和放牧者，但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却还存在有关的族群，他们的长期幸存，足以使人进行系统的研究。人类学家对其技术、经济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研究，为考古学家解释其他

④ 埃尔菲克(R.H.Elphick)；马科斯(S.Marks)，第55-80页。
⑤ 沙佩拉(I.Schapera)，1930年。

地区已经灭绝的族群的遗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总的样板。

由于科伊科伊族放牧者和桑人狩猎者都不用金属制造割、刮、砍的工具，所以他们都属于石器时代研究范围。过去人们主要是根据他们制作的石器来衡量他们的。这意味着利用考古资料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不得不考虑各种石器，并且把威尔顿型和史密斯菲尔德型石器说成是他们与欧洲人发生接触以前聚居生活的遗物。为了后面讨论方便起见，各遗址的石器之间的细微差别不拟详加列举，也不拟将这些差别作为进一步区分狩猎者或放牧者文化群的标准。相反，作者假定，晚石器时代所有南部非洲的居民或多或少都使用细石器，如刮刀、投掷尖器、锛斧和钻头。各类工具在各遗址中数量比例的不同以及其它形式工具的偶尔出现，可以解释为这些居民在不断流动中因从事各种日常工作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人们居住的地区相隔遥远，他们所能获得的原料也许很不同，谋生活动也可能大不相同，因而可能生产出十分不同的石器。然而，他们仍属于相似的群体，由相似的技术和一些非技术的特征如语言、体质类型和经济特征等连接在一起。 642

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桑人

最近对狩猎－采集者进行的人种史方面的研究，表明在这一经济范畴内的各族群的食品中，采集或收集的食物占相当重要的地位。⑥关于卡拉哈里地区昆人和圭人⑦的描述清楚地表明，虽然男人和儿童也采集“野生块根和浆果”(veldkos)这样的食物，但是整个族群是靠妇女采集的食物维持日常生活的。采集食物——大部分是但并非全部是植物——的重要性在于，食物所在的地方是可以预知的，因而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依靠的基础。由男人狩猎或诱捕得来的含有高蛋白的肉类也具有其重要性，但是由于不能预知能否捕到，所以不是日常主食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狩猎者应该改名为采集者，但是必须看到从事狩猎和采集的族群获取食物的来源以何者为主，何者为辅。这些族群靠采集食物生存，而又不时地从狩猎中得到好处。

这种生活方式曾一度扩及到整个南部非洲。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旅行者的直接记述和考古得到的零星材料都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比如，佩特森于1778年8月在纳马夸兰就“丛林霍屯督人”写道：“他们没有家畜……，他们以根茎和树汁为生，偶尔用毒箭射死一只羚羊，就可美餐一顿。”⑧汤普森于1823年6月在奥兰治河上游附近的克拉多克地区旅行时，访问了一座“布须曼卡拉尔”。* 他在谈到该村庄的居民时写道：“这些可怜的人主要靠平原上生长的某些野生球茎植物生活，同时也吃蝗虫、白蚁和其他昆虫……，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除此以外，男人们有时还用毒箭射死一些猎物。”⑨

类似的记述——包括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从开普敦到当时的开普殖民地边缘的整个地区——对桑人赖以生存的食物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些记述在提到猎物

⑥ 李(R.B.Lee)和德沃尔(I. Devore)。
⑦ R.B. 李，1972年。
⑧ 佩特森(W.Paterson)。
⑨ 汤普森(G.Thompson)。
* 卡拉尔(Kraal)指一座或一群圆形茅屋。——译者注

时很少不加上“偶然取得”的限定语，而在提到块根和球茎时则说它们是独有的常用食物。事实上，这些作者虽然提到许多种植物食品，包括草本植物，浆果和树汁，但在历史文献中最常见的是“厄因切斯”(“uyntjes”)，即葱头或球状块根。严格地说它们并不是葱属植物，而不过是鸢尾科植物(Iris family)的球茎，如“鸢尾”本身、“唐菖蒲”(Gladiolus)、“加州藜芦”(Ixia)和“肖鸢尾”(Moraea)都见诸文献。与这些植物食品一道，在文献中大量提到可搜集的动物食品，如毛虫、蚂蚁、蝗虫、乌龟以及蜂蜜。所有这些东西在日常寻找食物的活动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当然，考古学的资料可能偏重于那些食用后而留下耐久残骸的食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考古材料强调桑人在南部非洲的狩猎活动。但在那些自然条件有利于保存因而能够重新发现有机物并进行分析的地方，就能看出植物食品的重要地位。在纳米比亚[10]、开普西南部[11]、开普东部[12]、纳塔尔[13]和莱索托[14]的石窟和洞穴中，有许多植物的残余，其中最突出的是各种鸢尾科植物的茎、球茎皮和球茎底部。当然，各遗址植物食品的类型根据当地植物生长情况而有所不同，但一般说来，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大都是根茎，如球茎和块茎，并辅之以结果植物的种子。[15]

关于史前时期食物的动物部分，大多数历史记述中都普遍提到“兽类”，这表明猎取的品种范围广泛。这一点从迪凯尔德斯[16]和纳尔逊湾洞穴[17]等遗址进行大量发掘所发现的动物种类中可得到证实。这些地方发掘出来的动物种类很多，从蹦鼱到大象，甚至还有鲸鱼。但从这些遗址发现的多为较小的动物，如乌龟，蹄兔和沙丘鼹鼠以及小的区域性食草类动物如小羚羊、灰色小羚羊和小直角羚羊。食肉类动物的遗骨很少发现，这也许反映了当时这类动物只是为取得毛皮而偶然进行捕杀，较大的食草类动物如狷羚、旋角大羚羊和野牛的遗骨比小动物少得多。大象、河马或者犀牛的遗迹至今只是偶尔找到。动物遗骨数量的比例，部分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史前时期各群体把较小的动物带回他们居住的基地，而把较大的动物在猎取处进行屠宰。毫无疑问，陆地动物和较小的食草类动物是主要的猎取目标，是狩猎中最经常的牺牲品。

大量沿海贝冢在洞穴内外的发现，表明桑族群曾充分利用海产资源。“斯特兰洛普”和桑人与科伊科伊人之间的关系将在以后讨论，但是桑人曾占据许多沿海洞穴和露天的贝冢地，这一点是有确实证据的。尽管贝类是这些遗址最突出的特点，但是动物遗骸表明，他们食用的海洋动物种类繁多，特别是海豹、龙虾、鱼类和鸟类。植物食品的残余在沿海遗址中极少发现。深入内陆地区，在开普东部和西部，有证据表明人们采集淡水中的贝类动物[18]。在开普西部和莱索托[19]，食用淡水鱼已得到证实。莱索托和东格里夸兰的许多岩画

---

[10] 温特(W.E. Wendt),第1-45页。
[11] 帕金顿(J.E.Parkington)和波根普尔(C.Pöggenpoel)。
[12] 迪肯(H.J. Deacon),1969年，第141-169页；H.J.迪肯和J.迪肯，1963年，第96-121页。
[13] O.戴维斯，私人通信。
[14] 卡特(P.L.Carter),私人通信。
[15] H.J.迪肯，1969年，J.E.帕金顿，第223-243页。
[16] 施威泽(F.R. Schweitzer),第136-138页；F.R.施威泽和斯科特(K.Scott),第547页。
[17] 克莱因(R.G. Klein),第177-208页，
[18] H.J.迪肯和J.迪肯，1972年；拉德纳(J.Rudner),第441-663页。
[19] J.E.帕金顿和C.波根普尔，第6页；P.L.卡特，1969年，第1-11页。

就描绘着捕鱼的情景[20]。

因此，桑族群的食谱已有充分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资料证明，尽管发掘点的分布很不平衡，有些地区实际上尚未进行考察或者缺乏保存良好的存积物。一般说，每天的主要食物是些可采集的东西，其中包括根茎，其它植物食品，蜂蜜以及蝗虫、蚱蜢、白蚁和毛虫等昆虫。此外，再辅之以乌龟、蹄兔和沙丘鼹鼠一类小动物和较小的食草类动物，间或也有较大的动物。沿海居住的群体则捕捉鱼、虾、海豹和海鸟，并采集大量水生贝壳类动物，特别是帽贝和淡菜。河生资源，包括淡水软体动物和鱼，也得到了利用，史书上还曾有一处提到鱼干[21]。桑伯格曾记下他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在开普西部观察到的情况，他对狩猎者或放牧者制造的，或两者都制造的一种饮料描述如下：

> 在霍屯督人的语言中，格里(Gli)是一种有伞形花序植物的名称。他们将其根晒干后研成粉末，然后放在木槽里加进凉水和蜂蜜，经过一夜的发酵就成为一种蜂蜜酒。他们饮用这种酒使自己沉醉[22]。

开发这些资源的技术，在整个南部非洲洞穴和石窟中发现的大量石器、骨器、木器和韧皮纤维工具群上以及早期旅行者对这一地区的描述中得到反映。球茎和块茎是用一种木质挖掘棒挖掘的，这种木棒通过修刮和火烧制成匙形尖头，然后将一块凿有孔的石块套在木棒中间以增加它的重量。不少旅行者曾描述过这种工具[23]，并且在开普西部的德杭恩和迪普克卢夫遗址[24]和开普南部的斯科茨洞穴[25]发现了这种工具的碎片。许多岩画也描绘了妇女们使用这种加重的挖掘棒（参见插图 26.1）的情景。这些妇女还好象经常带着皮口袋，毫无疑问这是为了把食物运回家去。在开普地区干燥的石窟和洞穴中皮革制品是很常见的，但是这里面是否有皮口袋或皮革围裙，一般还弄不清楚。现在人们知道的有两种网线袋或网状物，第一种是在梅克豪特布姆和温得和克农庄洞穴[26]中的，编织得很好，可能是用来携带根茎和块茎的（网眼约 10 毫米）；第二种网眼较大，除了在开普西部的迪普克卢夫洞穴发现一块碎片外[27]，还见于佩特森札记中的一幅插图[28]。从这幅画得极好的图来判断，第二种网袋可能是用来携带鸵鸟蛋壳做的水壶。所有这些考古发掘的样品是用双股灯心草属植物的茎纤维做成的。由于这种纤维的用途，桑伯格于十八世纪称它为"纸莎草纱"(Cyperus textilis)。打孔或钻孔的石块在整个南部非洲地表上是最常见的遗物。

645

几乎所有谈到桑人狩猎活动的作者都提到弓和毒箭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巴罗曾于1797年访问了现属开普省东部的一些地区，他写道：

> 弓是用一块无节的木料制成，这种木头显然是一种"漆树"……，弓弦长 3 英尺，

---

[20] 斯米茨(L. Smits)，第60-67页；温尼科姆贝(P.Vinicombe)，1965 年，第 578-581 页。
[21] 汤姆(H.B. Thom)。
[22] 桑伯格(C.P. Thunberg)，第 31 页。
[23] 斯帕尔曼(A.Sparrman)，第219页；G.汤姆森，第一卷，第57 页；参见德格来韦布克(J.de Grevenbroek)，他说这种工具长 3 英尺；沙佩拉，1933 年。
[24] J.E.帕金顿和C.波根普尔；J.E.帕金顿，未出版的博士论文。
[25] H.J.迪肯和J.迪肯，1963 年。
[26] H.J.迪肯，1969年；格罗贝拉尔(C.S. Grobbelaar)和古德温(A.J.H. Goodwin)，第 95-101 页。
[27] J.E.帕金顿，未出版的博士论文。
[28] W.佩特森。

646



插图 26.1 岩画：妇女们手持套有穿孔石块加重的挖掘棒。每天到草原采集块根、球茎和其他来源可靠的食物是妇女们的任务(比例：2/3；褪了色的红色)

是用南非小羚羊背部的筋纤维搓成细绳做成的；箭袋用芦荟茎编成；箭用芦苇杆做成，一端嵌上一块磨光而坚硬的鸵鸟腿骨，约5英寸长……整个箭长差不多2英尺……；毒剂是从蛇的头部取出的，加进某些鳞茎状植物的汁混合而成，他们主要就是依靠这种毒剂㉙。

虽然在发掘中极少碰到完整的弓箭，但是在开普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洞穴中发现了这种工具的各个部分。有的可能是弓的碎片，芦苇箭杆，有凹口的芦苇杆，磨光的骨制尖镞和安上箭镞的箭杆，打结的兽筋和着色的芦荟碎片。这些东西就是被丢弃或散落的桑人狩猎工具的遗物。有些新月形或者弓形的小石器可能是另一种投掷尖器，这些石器用植物胶固定在箭杆上作为箭镞，本世纪二十年代被捉获的布须曼人曾在开普敦对这种箭的使用作过示范㉚。弓、箭和箭袋在整个南部非洲各地的岩画中是很常见的(参见插图 26.2)。

然而，许多野兽并不是用弓箭射杀，而是用植物搓成细绳、设在草原上的陷阱捕获的。佩特森于1779年在奥兰治河附近旅行时，曾看到"几个为捕捉野兽设下的陷阱"㉛。几乎可以肯定，在德杭恩㉜、斯科茨洞穴㉝和梅克豪特布姆㉞等遗址中发现的双股绳，大都是

㉙ 巴罗(J. Barrow)。
㉚ A.J.H.古德温，第195页。
㉛ W.佩特森，第14页。
㉜ J.E.帕金顿和C.波根普尔。
㉝ H.J.迪肯和J.迪肯，1963年。
㉞ H.J.迪肯，1969年。



647

插图 26.2 一群携带着弓、箭和箭袋的男人。猎取和诱捕动物来补充妇女采集的以植物为主的食品是男人的工作

过去作陷阱用的绳索的遗弃物。这种技术用于对付小羚羊等地区性食草类小动物可能最为有效，这类动物惯于沿着老路走，可以用灌木围栏把它们引入事前设好的陷阱。在温得和克农庄洞穴[35]和斯科茨洞穴[36]发现的两个形状奇特的木叉状物体，有人解释是陷阱的扳机。

在史书的记述中还提到其他狩猎技术，但是尚未得到考古方面的佐证。例如，十八世纪一些旅行者描述了在接近河岸的地方挖的大坑，坑中埋设着头朝上的尖桩。这些大坑通常被人认为是诱捕大型动物用的，如大象、犀牛、河马和野牛等。它们分布在南起奥兰治河东到加姆图斯河的广大地区。巴罗在访问赫拉夫里内特附近的殖民地边界时，描述了桑人的另一种狩猎技术：桑人狩猎者“在一些地方埋设成排的石桩，中间留下几个缺口，或者立起一排排木桩，用鸵鸟羽毛扎在木桩的顶端，”用这种办法把内地高原喜群居的野兽驱赶进去[37]。

648

很明显，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也懂得一些捕鱼技术，并且大都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也许最引人注意的是奥兰治河下游地区用编成漏斗形的芦苇篮子捕鱼。利希腾斯泰因和巴罗两人对此曾有记述，他们认为这类捕鱼器是“博斯耶斯曼人”使用的，大概可以肯定就是桑人[38]。这类捕鱼器放在小溪中，据记述是用“柳条、细树枝和芦苇”编成的，式样为尖形或漏斗形，无疑这与当前仍在卡富埃河和林波波河[39]使用的捕鱼器相仿。虽然迄今并未发掘出这种捕鱼器的遗物，但是在莱索托和东格里夸兰发现的一批岩画肯定描绘了成套的这类捕鱼器，它们由芦苇或木料编成的篱笆连接起来，可以捕获大量的淡水鱼，特别是一种

[35] C.S.格罗贝拉尔和A.J.H.古德温。
[36] H.J.迪肯和J.迪肯，1963年。
[37] J.巴罗，第一卷，第284页。
[38] H.利希腾斯泰因(H.Lichtenstein)，第二卷，第44页；J.巴罗。
[39] L.斯米茨。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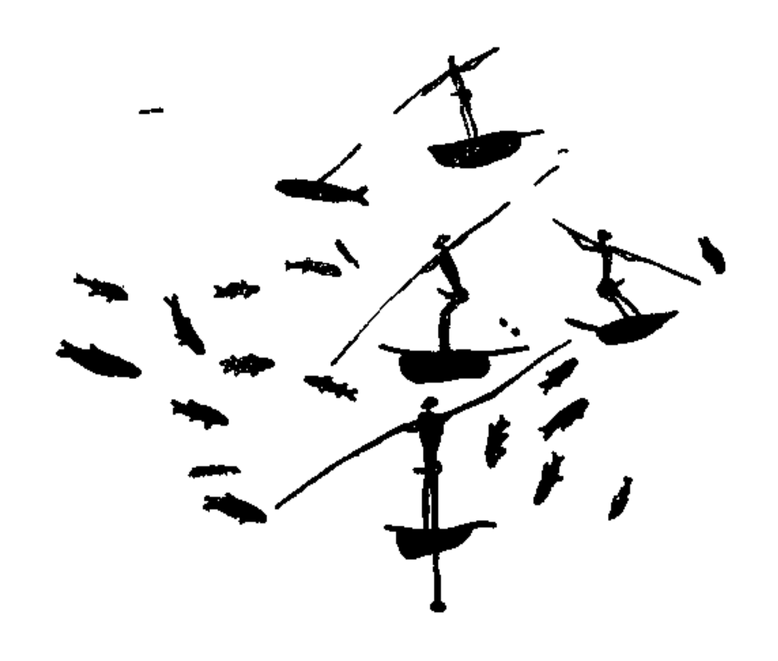


插图26.3 莱索托楚利凯的捕鱼场面。南部非洲的狩猎-采集者也从事捕鱼。他们用各种方法捕捉海洋和淡水生物。图中所示显然是使用小船或木筏

叫"巴布斯"的黄鱼[40]。淡水鱼骨已在相距遥远的开普西部和莱索托的遗址中发现，但使用何种捕鱼技术总还搞不清。卡特曾倾向于把一些V形、细长的骨钩当作鱼钩，但是他承认也可能有其它解释[41]。在莱索托的楚利凯发现的捕鱼图，渔民们好象是站在小船上，用可能装有倒刺的长鱼矛捕鱼（参见插图26.3）。可能由于这个理由，温尼科姆认为这个捕鱼图是晚近的作品，但究竟是什么年代所作，至今仍然是个谜。考古发掘的记录没有提到过船。不管怎样，当时用船捕鱼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在奥兰治河下游用篮子捕鱼的同一地点，利希腾斯泰因还提到一种捕鱼法："他们（博斯耶斯曼人）预期河水要上涨时，就事先在河滩上筑起一个大蓄水池，好象是用石墙围起来的水库。如果运气好，水退之后，会有大批的鱼留存下来。"[42]这种利用河水涨落用石头围捕鱼类的办法，据说与南部非洲沿海从圣赫勒拿湾到阿尔戈阿湾人们利用潮汐捕鱼的方法很相似[43]。由于沿海至今仍有多处捕鱼设施仍能发挥作用（有一些仍在使用），看来有理由设想沿海石器时代的居民直到最近还在使用这种捕鱼法。在捕鱼围堰附近的遗址通常都能发现大量沿海鱼类，这说明在潮水足以漫过捕鱼围堰的地方，这种捕鱼法是十分有效的。

古德温报告，曾发现一块作鱼饵用的小骨块，系在一根固定在捕鱼石堰里的线上。这说明在史前时期末可能还使用了其他捕鱼技术。事实上，在埃兰兹湾洞穴[44]和纳尔逊湾洞穴[45]曾大量发现长2-6厘米、两端磨尖的小骨片。但在这两地发现的这种小骨片都埋藏

---

[40] L.斯米茨；P.温尼科姆贝，1960年，第15-19页；1965年。
[41] P.L.卡特，1969年；P.L.卡特，私人通信。
[42] H.利希腾斯泰因。
[43] A.J.H.古德温。
[44] J.E.帕金顿，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45] R.G.克莱因，未发表的著作。

在7000~10,000年前的地层中，在年代较晚的地层中虽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极其稀少。它们可能是作鱼饵用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火地岛的奥纳人在十九世纪仍制作类似的小木片来捕捉鸬鹚，而这种东西在上面提到的两个洞穴遗址中是很常见的。

650

在南部非洲沿海的遗址中，并没有确凿无疑的鱼钩，也没有令人信服的鱼叉头，尽管巴罗曾提到过奥兰治河下游使用了木制鱼叉头[46]，他的原话是："我们发现了几个木质鱼叉，其中有些装有骨尖，固定在显然是用某种草做成的绳索上。"这类鱼叉看来是装在木杆上，嵌有削尖的骨头，但是并不一定装有倒刺。在厄加勒斯地区的沙丘里，发现了两个装有倒刺的骨制尖物，但有关情况尚未发表，其中一个曾插入一个有"科伊桑"人特征的成年妇女骨骸的腰椎中[47]。在开普南部沿海一带的遗址中发现的有孔陶制和石制物体，被描述为渔网坠子，如果属实，那就足以证明沿海的桑人曾用网捕鱼。由于发现了大量用纤维做成的绳索，和在内陆遗址中确实存在织网，所以桑人用网捕鱼的说法也许不会使人感到惊奇。

关于捕捉或采集沿海其他物产的技术尚无充分的文献记载。在一些遗址中曾发现片状骨器，这些骨器可能是用来把帽贝从其所附着的岩石上剥落下来的工具，但尚无十分令人信服的证据。虽然文献上有用弓箭射死海豹的个别记载[48]和科伊科伊人在萨尔达尼亚湾附近一块孤立的岩石顶上用棍棒打死海豹的记载[49]，但仍无法说明是如何捕捉龙虾、海鸟和海豹的。在埃兰兹湾洞穴和其他遗址中发现的支离破碎的海豹头盖骨，也许反映了是用棍棒打死的。

尽管桑人通常并不习惯于驯养牲畜和耕种土地，但有某些证据似乎表明至迟到十七世纪他们已经养狗，这显然是为了狩猎之用。达珀从未访问过开普，但是他从到过开普的人那里了解到很多情况。他于1668年写道，松奎人"养有许多猎狗，训练它们来猎取栖息在岩石间的野兔，这种野兔是他们的主要食物。"[50]在开普西部的一些石窟果然发掘出大量蹄兔或野兔的骨骸；某种迹象表明[51]，在较大的动物骨骸堆中可能有家犬的骨骸。

除了积极猎取食物外，看来可以肯定，觅食死物也是桑人维持生存的一种办法。据记载，那些生活在沿海一带的人常用死鱼和搁浅的鲸鱼充饥。另一项显然很重要的技术是制造各种盛水的容器。历史文献记载，有用鸵鸟蛋壳做成的水壶——有的还刻有花纹。这类盛水容器在许多遗址中已有发现，但往往已破碎。现在已找到完整的样品，甚至发现一些水壶的埋藏处(显然埋在一些重要地方)，但多是业余爱好者所发现，因而缺乏详细的记录。也有用动物膀胱来提水的，但是从未有用陶器提水的记载。关于陶器，将在科伊放牧者一节中进行详细的讨论。

651

总的说来，桑人的技术似乎包括各种狩猎和采集技术，使用石、骨、木、纤维、芦

[46] J.巴罗，第300页。
[47] J.E.帕金顿，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48] W.佩特森。
[49] H.B.汤姆。
[50] I.沙佩拉，1933年。
[51] K.斯科特，私人通信。

节、皮革、贝壳、象牙、兽筋和树叶等多种材料制作工具[62]。还常常用多种材料制成复合工具。石头看来只做成较复杂工具的尖端或切割、刮削的刃，石制品显然有的是用胶粘在木柄或骨柄上，有的则单独使用[63]。制造这类器物，常选用质地细腻均匀的石料如玉髓、玛瑙、硅结砾岩或者坚硬的页岩，有时也使用质地较脆的石英石。石英岩的卵石和圆石被做成磨石的上下扇，用来碾磨颜料或食物。耐人寻味的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旅行者中很少有人专门提到或描述石器的制造，这也许表明至少有某些石器已逐渐被骨器、木器或者金属制品所代替。这种使用多种原材料制作器物的局面，对那些想单凭发掘出的石器加以比较来对不同族群进行分类和鉴别的人来说，其含义是如何是不言而喻的。

考古学的研究现已日益集中在支配桑人聚居的环境方面，其结果是越来越可能用生态学的观点来描述狩猎-采集者的生活需要的模式，而早期的旅行者对这些是不熟悉的。虽然这样，历史记载和岩画资料对于大规模发掘出的动物遗骸和植物残迹进行深入分析得到的成果显然能提供补充的证据。

与卡拉哈里（沙漠）和更远地方的狩猎-采集者相比，桑族群可能显得人数很少，流动性很大。在这方面，范里贝克早期派出的远征队发现多处无人居住的风障林，100年后佩特森也提到奥兰治河口附近有同样的情况，是并不奇怪的。[64]这些灌木林屏障是供居住者防风遮雨用的，显然用后——可能只有几天时间——即被放弃。同样，桑人的群体一般极少超过20人，这也并不奇怪；在大多情况下是不到10个男女的工作小队，或者是几个较大的群体住在一个营地，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有。象巴罗所记述的150到500人的群体，和桑伯格记载的有50间棚屋的营地，是极少有的情况；那是在十八世纪后期为了防御欧洲民团的袭击才打破常规大量聚集起来的[65]。岩画中所描写的群居规模，看来证实了最常见的社会单位在20人以下，尽管也有较大的群体(参见插图26.4)。

652



插图 26.4 岩画：一群狩猎者在洞穴中，四周放着挖掘棒、口袋、箭袋和弓，套有穿孔石块加重的挖掘棒清晰可见

许多权威人士的著作中说，凡足以利用的洞穴和石窟均曾被“博斯耶斯曼人”占用，这些遗址在考古文献中有突出的记载。在纳米比亚埃龙戈山脉名为大象的隐蔽处，有三个

[62] J.E.帕金顿和C.波根普尔。
[63] H.J.迪肯，1966年，第87-90页；H.J.迪肯，1969年。
[64] H.B.汤姆；W.佩特森，第117页。
[65] J.巴罗，第275，307页；C.P.桑柏格，第174页。

或四个风障——同早期旅行者曾记述的南非草原上的风障类似——已被绘入地图并得到描述。[56] 在开普的许多遗址中，有迹象表明桑族群把成捆的草运入洞穴，铺在靠近洞穴后壁和两边，做成松软而有弹性的垫子。至少曾发现两处，人们在岩石上挖出浅槽或在以前有沉积物的地方挖槽再铺上草[57]。在沿海遗址中，港湾的草本植物特别是"大叶藻属植物"被用作褥垫。在这些遗址内，睡眠、烹饪、生火和垃圾堆显然是分开的。

在岩画中，妇女与挖掘棒、男人与弓箭的紧密关系，充分证明了桑族群有相当严格的劳动分工，这在历史文献中也一再得到证实。比如汤普森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看到一些布须曼妇女在旷野里挖掘根块"；又如达珀也曾证实有一种块茎，"是他们日常的食物，妇女们每天从河里挖取这种食物"。[58] 毫无疑问，男人们在打猎远征的同时，也采集植物食物，但是妇女们在保证日常食物供应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必须强调。 653

有充分的理由设想，桑人采集或猎取食物的大部分以及他们所需要的水，大概要受到季节变动的影响。例如，开普西南部冬雨是一种非常带有季节性的现象，五月至十月的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70-80%。这一时期也是月温度低和局部地区出现霜冻的时期。这种情况带来的重要结果，不仅仅是一种相当严格的植物生长周期，即年复一年在冬天成长、春天开花、夏季结果以及植物的地下贮存器官在整个炎热而干燥的夏天中休眠；更为明显的也许是地表水和牧草的数量在干燥的夏天和潮湿的冬天之间有显著的变化。除了食物资源随季节变化而波动外，事实上各种食物并非到处都能找到。仍以开普西部为例，许多动植物在海岸边缘、海岬、山区地带、山间峡谷和内陆干旱盆地等小区域内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桑族群在开普西部或在南部非洲任何其他地区聚居时，采取的聚居模式显然要考虑到当地的或暂时的食物来源情况，以保证全年有各种不同食物的充足供应。在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和岩画资料中，有某些佐证足以说明他们的聚居模式。

球茎在桑人的饮食方面具有重要性，在此种条件下，球茎分布的不平衡，一定对他们的聚居模式有很大影响。某些历史记述中对聚居模式的变动有所提示，并且指出是由上述植物生长的周期引起的。由于球茎事实上是植物在整个夏天贮存营养，供冬天和春天生长和开花之用，所以在整个植物生长周期内，球茎食物的大小，能否见到和味道方面必然有所不同。尤其是当贮存的营养由于植物的生长和开花耗尽时，球茎就萎缩，从而没有多少食用价值了。利希腾斯泰因曾提到球茎食物供应不足这种情况。他在谈到"博斯耶斯曼人"时写道："有几个月只能靠少量球茎生活，这种球茎只是在一年的某些季节才能在这一区域的低洼地方找到。"[59] 在谈到某种"球茎"时，他说："这种球茎植物在花刚凋谢时最适宜食用"。[60] 斯帕尔曼、巴罗和桑伯格在十八世纪后期所记述的关于开普居民计算时间的独特方法，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霍屯督人"使用这种计算方法，但也许科伊科伊人和桑人都使用这种计算方法）。[61] 用巴罗的话来说："一年的季节是用厄因地斯蒂德（uyntjes tyd， 654

[56] 克拉克(J.D.Clark)和沃尔顿(J.Walton)，第1-16页。
[57] J.E.帕金顿和C.波根普尔。
[58] G.汤普森，第一卷，第58页；I.沙佩拉，1933年，第55页。
[59] H.利希腾斯泰因，第193页。
[60] 同上书，第45页。
[61] A.斯帕尔曼，第104页；A.巴罗，第159页；C.P.桑伯格，第197页。

直译‘葱的时令’)或者‘可食鸢尾’(Iris edulis)的块根正当令的时候来划分的，在此时令前后的若干个月亮朔望各为一个季节。他们特别观察到这个时间，是因为这些球茎曾是他们的主要植物食品。”这些记述与近代对球茎生长和发展的观察结果联系起来看，使人想到至少在开普褶皱山地，主要食物是很不稳定的。

在南部非洲其他地区，有的地方降雨少但全年分布均衡，有的地方降雨量最大时是在夏天高温时期；这些地方食物来源可能十分不同，但是同样都有供应高峰和低落期。非洲旋角大羚羊、狷羚和南非小羚羊等动物群在“卡罗”地区* 的进出以及它们在夏雨草场和冬雨草场之间的移动，无疑会影响桑族居民的分布。有证据表明存在着适应食物来源变化的各种聚居模式，包括季节性流动，在特定时间对某些食物的限制，社会单位大小的改变，食物的储存以及建立广泛的亲属联系以保障本地缺乏食物时的供应等。

有人对莱索托[62]和开普西南部[63]遗址的植物残迹和动物遗骸进行分析，并且根据当地满足生活需要的潜力，提出有人曾在那里作季节性居住的假定。看来，开普西部的桑族群在冬天和初春当球茎和水果来源最缺乏的时期，就很可能转向采集沿海食物，如贝类。尽管证据还不充分，但是对海豹和蹄兔遗骸死亡年龄的分析是有启发性的。沙克尔顿对开普最南端纳尔逊湾洞穴[64]中贝壳的研究结果，为这种季节性的迁徙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对贝冢中的贝壳进行氧同位素比率测量并同现代海洋表面温度变化相比较，使沙克尔顿博士相信该贝丘只是在冬天才堆积起来。要更精确地证明桑人如何平衡一年的食物来源，还需要655 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利希腾斯泰因——他认识到生态学的重要性——的一些论述充分说明了问题。他描述了“哪怕是最瘦的、身体最糟的人”，只要“变换居住的地方”就能变成完全两样的人。[65]

卡拉哈里地区的昆族和圭族在一年中不能找到来源稳定和足够的代用食物的季节，就限制某些食物资源的使用。可以预料得到，一种食物资源的价值与可代用食物的多寡有密切关系，也与它的味道、营养价值和采集的难易有密切关系。看来，居住在更南地区的桑族群可能用类似的方法使用他们的食物资源，即限制采集食物的种类来保持均衡的供应。考古资料中迄今很少这方面的记载，但是有一个例证也许说明，以蹄兔和乌龟等小动物作为食物资源在开普西部沿海遗址同内陆遗址有所不同。在德杭恩等内陆遗址中，乌龟和蹄兔在所发现的动物中最为常见，但相比之下，这些动物在埃兰茨湾洞穴沿海遗址中则极为罕见。[66] 这可能部分地反映了获得这些动物的多少因季节变化而不同，特别是乌龟需要冬眠；但是也可能是由于沿海有多种小动物如鱼、小龙虾和海鸟等可替代的食物。在植物食品中，迄今尚未发现类似的例子，但开普西部德杭恩和迪普克卢夫等内陆遗址中植物残迹的不同组成也许能反映这种变化。[67]

---

[62] P.L.卡特，1970年，第55-58页。
[63] J.E.帕金顿，1972年，第223-243页。
[64] 沙克尔顿(N.J.Shackleton)，第133-141页。
[65] H.利希腾斯泰因，第45页。
[66] J.E.帕金顿，1972年。
[67] J.E.帕金顿，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 “卡罗”系霍屯督语“干旱”或“无水”之意。在南非专指两个特定地区：小卡罗在开普省西南部；大卡罗从开普省北部延伸到奥兰治河。——译者注

插图 26.5 岩画：一大群人，其中大多数可辨认出是男人，描写的可能是一个舞蹈场面。这类场面有很多人参加，可能与非经济活动有关。这说明，小的群体有时也许是季节性地聚到一起，从事交换和其他庆祝活动

情况一再表明[68]，狩猎-采集者族群活动单位的人数不时变化，以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当资源分布稀少时，他们就分散成较小的家族集团；当谋生方式发生变化需要用大量劳力，或者资源高度集中能够供应较多人聚居时，他们又联合成大的群体。这种模式还有利于在相邻群体之间保持亲属关系网，他们可利用不时进行大集合的机会互相传递消息，交换物品和新技术，可能还交换妇女，他们的亲属关系网就是通过妇女这条线索寻根溯源的。遇到大灾大难，这种亲属关系就成了一条生命线，一个群体可暂时使用另一个群体的资源而生存下来。此外，个人的困难也可以通过当事人离开本群体和暂时地或永久地加入另一个有亲属关系的群体而得到解决。搞清这些问题仍然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目标，目前有关这方面最明确的资料来自历史记载，以及来自也许不甚可靠的岩画。

利希腾斯泰因大概是早期旅行者中对桑人社会组织最敏锐的观察家，他特别注意到："几个家庭紧密结合成一个小群体……。取得最迫切的生活必需品很困难，这种情况排除了组成较大社会单位的可能性：由于同一地点无法供养所有的人，这些家庭有时甚至被迫分散。"[69]他在另一处谈到一个狩猎-采集群体时还说：

> "一个群体通常只由一个家族的成员组成。任何个人均无统治他人之权，亦不能居于他人之上……。离开本群，参加另一群体完全由本人自愿……，不同群体之间极少交往；除非有某种特殊情况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他们才联合起来。各群之间大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人数越少，越容易获得食物供应"。[70]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群体的规模、组成、分与合以及活动领域和平等的社会制度等说法，实际上同200年后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对卡拉哈里地区显然有关的群体所作的论述完全相同[71]。

对开普西部的岩画所描绘的群体规模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一个中等群体人数约为14人，这一数目同十八世纪后期布尔人民团成员在日记中记载的数目近似[72]。这可能就是利希腾斯泰因所说的"群体"，人数也许10至30人不等；偶尔也碰到人数非常少的情况，他们显然是为执行日常任务而分成的男人或妇女小组。然而，也有些岩画描绘三、四十人的场面，那想必意味着实际上约有百人或更多的人聚集（参见插图26.5）。这类少见的岩画很

[68] 李和德沃尔（R.B.Lee and I.Devore）。
[69] H.利希腾斯泰因，第193页。
[70] 同上，第48-49页。
[71] 托马斯（E.M. Thomas）。
[72] 马格思（T.M.O'C Maggs），第49-53页。

657



插图 26.6 族群偶尔相遇，结果往往发生冲突而不是合作。这是两个旗鼓相当的族群的冲突场面。这些人显然是男人

容易使人解释为上面讲到的几个群体之间定期的聚会。假如所画的大群人是表现跳舞一类非经济活动并位于据猜测是季节性食物潜力很大的地区，那就更令人感兴趣了。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得到这种资料，因此，这种可能性仍未得到证实。开普西部山脉地带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那里可采集到丰富的食物，如蜂蜜、毛虫、水果、球茎和乌龟等，因而在夏季几个月里可供若干群体靠近设营，以叙旧谊和互赠礼品。在德杭恩洞穴中发现的一包用树叶包好的贻贝看来曾是打算运到较远内地去的贵重交换物。[73] 可以肯定，卡鲁盆地和滨海草原冬季食物的潜力，同位于其间的山区地带夏季的食物资源潜力互为补充。这种情况能否得到确认，还有待于现正进行的植物和动物研究的成果而定。

658

近代卡拉哈里地区的群体并无在食物丰裕时期贮存食料以供匮乏时食用的特点，他们似乎把自然环境作为天然的食物贮藏所，能经常提供某几种食物，几乎不需要什么补充。看来，按照食物资源状况精心安排一条全年巡回采集路线，保留更常见的食物供困难时食用，这样，贮存食物的必要性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通常采集到的食物供当天消费，偶尔获得大动物时可以吃上几天。看来更往南的地区情况也差不多，因为考古资料中很少关于贮藏窖的记载，早期旅行者也从未谈到食物贮藏是桑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尔布在十七世纪末期曾有机会获得许多观察家关于科伊科伊人和桑人生活方面的资料，他指出："虽然原野上盛产有益身体和富于营养的水果和块根，足可大量贮存起来以应雨天之需，但是习惯上妇女们……只采集一定数量……够全家当天食用即止。"[74] 其他早期权威人士提到贮存干蝗虫，一种美人蕉植物（猪毛菜属的一种）的块根粉碎物和杏干，这些东西在经济上也许并不象根茎、块茎和球茎那样重要。在开普南部，发现与桑人洞穴遗址[75] 有关的很多贮存窖，但是资料迄今尚未发表。一些尚未证实的材料说，这些窖中发现的种子当

---

[73] H.G.帕金顿和C.波根普尔。
[74] I.沙佩拉，1933年，第205页。
[75] H.J.迪肯，私人通信。

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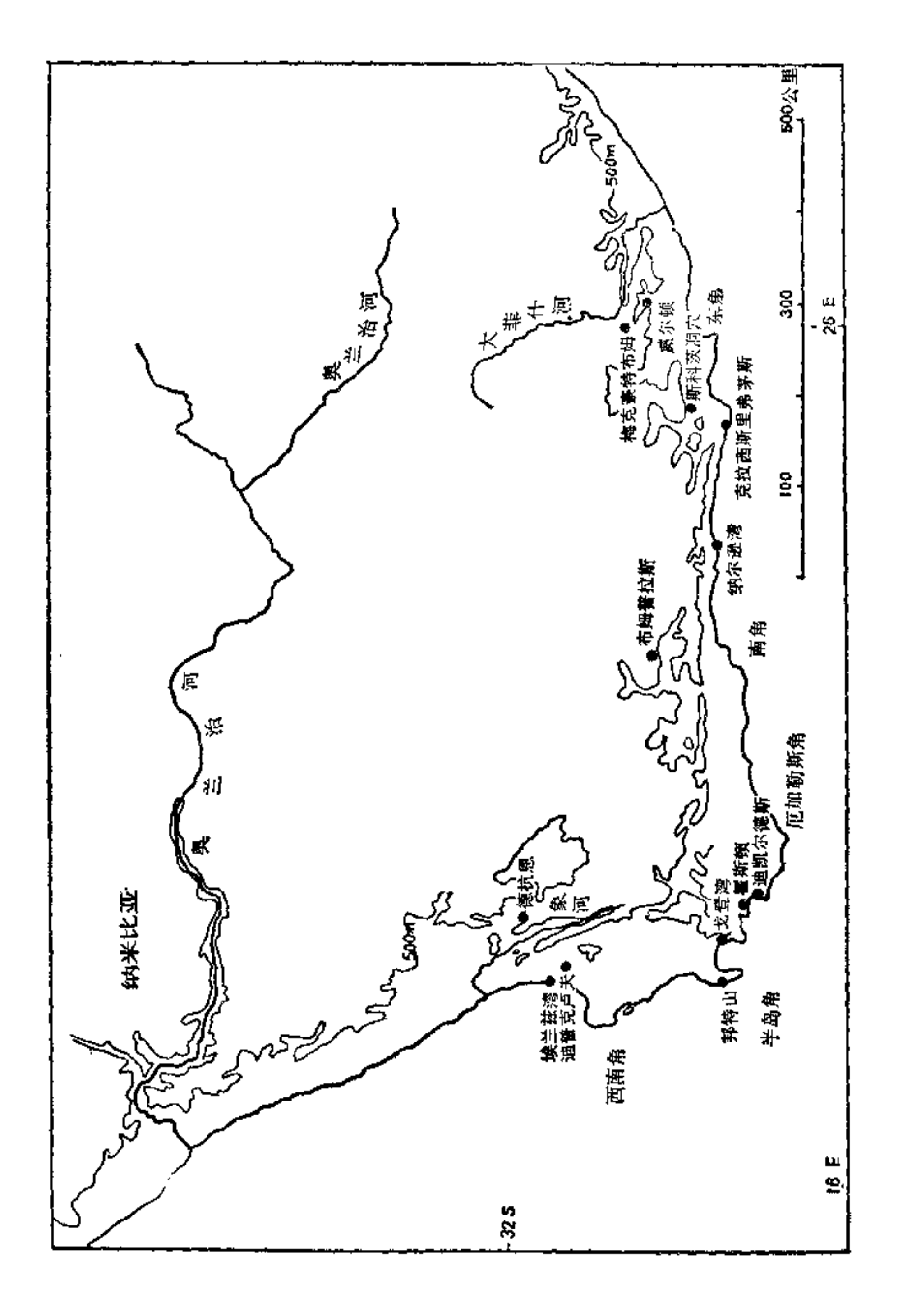


插图 26.7　南部非洲晚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其中大多数出现我们纪元一世纪的陶器碎片和家畜遗骸

初采集起来也许主要是为了榨油而不是用作食粮。

从已知的资料来看，桑族群显然是组织得很好的流动小组，他们非常熟悉能食用的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如何因时因地而不同。他们的生活基地、狩猎、捕鱼和采集的各种技术以及聚居方式，正在得到来自多方面资料来源的进一步证明。正如李所指出的，那种认为狩猎-采集者的生活经常处于灾难边缘的印象一般说来并无根据。巴罗于1798年在博克费尔德曾询问一位老年妇女(不知道她是科伊科伊人还是桑人)，情况如下：

> 当问到她是否还记得基督教徒首次到来时的情况时，她晃了一下头答道，她有充分的理由说记得，在她听说基督教徒之前，她从来没有吃不饱肚子，而现在要得到一口吃的却成了件难事。[76]

科伊科伊放牧者

要描绘殖民统治时期以前，比如说从距今2000年到殖民化之前，在特定环境条件下进行狩猎和采集活动的情况自然是很不完全的。在插图26.7上标出的所有遗址，除了邦特山和戈登湾两处遗址(未经积极寻找)之外，都有晚石器时代家畜的残骸。由于当地没有绵羊、山羊或者牛，还由于这些残骸的年代是在同欧洲人或者尼格罗牧民发生交往之前，所以不能不假定这些牲畜是从另一来源传入的。插图26.8概述从安哥拉到开普东部各遗址用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家畜和陶器碎片的最早年代，其中也包括内陆地区有关家畜和陶器的零星资料，以及目前所能得到的使用铁器、讲班图语、兼驯养牲畜的农民进入南部非洲的最早年代，以供参考。虽然表现方式可能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改变，但是看来现在已能就科伊科伊放牧者的渊源和语言作出某些大胆的解释(参见插图26.9)。

660

最明显的一点是，从安哥拉到开普南部的各遗址上，陶器碎片最早是在距今2000年到1600年间出现的。随着更多的碎片被发现，年代测定将更为精确。通过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可能最终将表明整个地区各种型式陶器出现的年代相同。已测出的年代中只有四个年代是属于距今2000年以前的，有理由假定，所有与测定这四个年代有关的实物或者是由于掺有很多杂质[77]，或者就是属于陶器时期以前的。[78]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凡是对家畜的遗迹进行专门研究的地方，就可发现家畜出现的考古年代同陶器碎片出现的年代同样早。这种情况不一定在每个遗址都是如此，但是把相邻遗址测出的年代联系起来构成当地的年代顺序时，就可看出它们是同时代的。虽说这种办法并非无懈可击，但是它可以消除单凭抽样研究引起的问题，所以还是可取的。这意味着，陶器碎片和家畜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迅速地进行扩散。这里似乎只能用"扩散"一词，因为陶器虽可独立发明创造，家畜显然是不能创造的。此外，在技术方面，发现的陶器并不是原始的粗劣器物或早期创新阶段技术尚不熟练的成品。

另外，相当重要(并非绝对重要)的一点是，早期家畜和陶器的年代联系涉及大西洋和

---

[76] J.巴罗，第398-399页。
[77] 桑普森(C.G.Sampson)。
[78] F.R.施威泽和K.斯科特；T.M.O'C马格思，私人通信；沃德利，私人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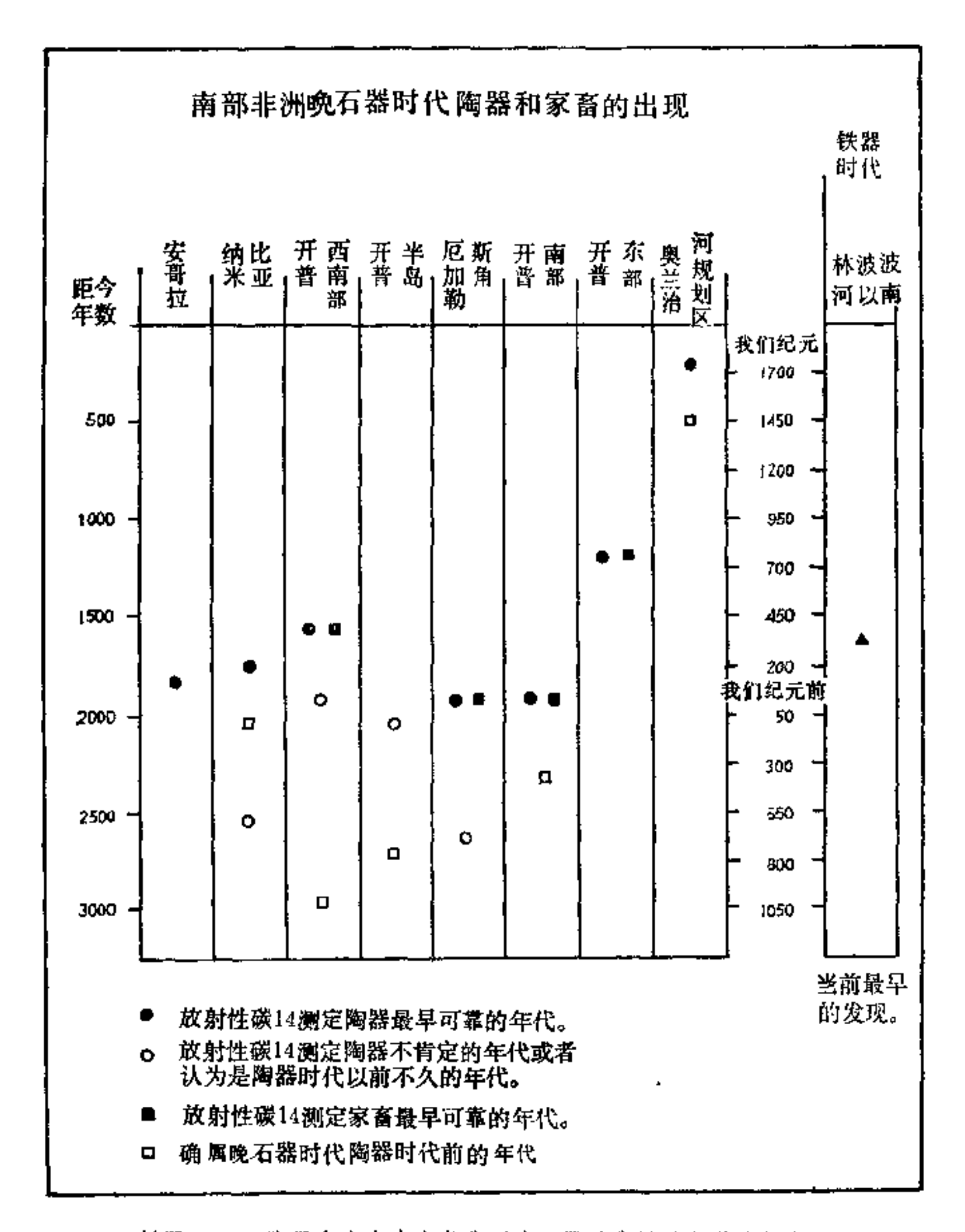


插图 26.8 陶器和家畜在南部非洲晚石器时代最早出现的年代

西印度洋沿岸的平原及其邻近山区。这种情况可能部分是由于考古学家侧重研究开普褶皱地带沙岩洞穴的沉积顺序而产生的，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有理由设想，缺少加姆图斯河以东和褶皱地带以北早期年代的资料，却是一个重要缺陷。[79] 无论如何，陶器同家畜年代的内在联系同有史可查的畜牧者——统称为科伊科伊人——的历史完全吻合[80]。

关于铁器和家畜沿着东路向南部非洲扩散的研究工作在继续深入，但现有资料表明，它们是在我们纪元第四或第五世纪传入林波波河以南地区的[81]。因此，与陶器和家畜相关

[79] C.G.桑普森；德里考特(R.M.Derricourt)，1973 a，第 280-284 页；卡特(P.L. Carter)，1969年；P.L.卡特和沃格尔(J.C.Vogel)。

[80] 梅因加德(L.F.Maingard)，第 487-504 页；R.H.埃尔菲克。

[81] M.克拉普韦日克，第12-23页；R.J.梅森，1973年，第 324 页，P.B.博蒙和J.C.沃格尔。

6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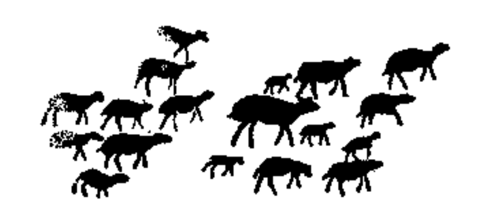


插图 26.9 一群大尾羊，这是科伊科伊人放牧并由早期殖民者看到的那种绵羊

的这一组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比北部和东部铁器时代的年代足足早二、三百年，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放射性碳无法测出的。

这种以相互关联、地区分布和年代顺序表达的格式似乎意味着放牧者大约在距今 2000 年前后带着陶器沿西海岸一条路线迅速向开普南部扩散。毫无疑问，有些狩猎族群并入了畜牧者社会，并且在人口构成和经济模式方面曾发生某些重要的调整，但迄今缺少这方面的材料。看来闯入这个地区的不是别人而是科伊科伊放牧者。

当然，对于他们闯入开普南部的起源、原因和当时的环境进行推测是颇有意思的。但是由于材料太少，这种推测必定很不精确。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的研究工作趋向于刻板地划分铁器时代和石器时代，其结果是一些洞穴、石窟或露天遗址含有陶器的表层，由于混入铁器时代的东西，往往不被当作石器时代的遗址。事实上，在这些地区很可能居住过在技术上属于石器时代的人群，但他们的经济包括放牧某种家畜。他们制造的陶器同当地使用铁器从事农耕的人的陶器显然不同。在津巴布韦，所谓班巴塔陶器一般认为与铁器时代的陶器有所区别，并且经常与晚石器时代的"威尔顿"型石器一起发现。这是否反映放牧者的扩散是在铁器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争论。但是从津巴布韦大尾绵羊岩画的分布中可以找到证据证明放牧者在铁器时代之前扩散这种设想，因为这种绵羊一般认为是与石器时代相联系的。这种羊就是科伊科伊放牧者于我们纪元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在开

663

普地区放牧的羊。

假如石器时代的牧羊者是通过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散布开来的，那就有可能起源于东非，因为据推测东非在文化上、语言上、甚至生物学上有这种前提。东非有制造带耳状柄陶器的放牧者，哈察人和桑达维人的语言中还保留"吸气音"，以及"霍屯督"居民据说具有"含米特人的"特点——这一切都不时被援引来作为南部非洲从事放牧、不使用铁器的居民起源于东北部的证据。虽然这些联系未必可信或者有的已被否定。然而，某些特点存在的连续性，诸如陶器制作、牧羊、牛羊品种、非铁器技术、磨制石器、可能还有语言(其连续性还有待证实)，将有力地证明科伊科伊放牧者的起源远在东非。从这一点又可推断，曾引起讲班图语的人群主要从东向南大迁徙的那些动乱因素，也许同样曾促使从事放牧的非农业人群从西方向开普地区迁徙（也许稍早一些，或者同时但更快一些）。在德兰士瓦、斯威士兰、纳塔尔、奥兰治自由邦和特兰斯凯找不到"霍屯督人的"或者"开普沿海的"陶器，这可能仅仅反映了在这些夏季雨量充沛的地区农业是更加可取的谋生之道，而流动性大不种庄稼的牧民，却更能够穿过纳米比亚和开普北部的干旱地区进而扩展到开普西部和南部的草原。可以设想，羊是沿着西路带来的，而科伊科伊放牧者的牛是从东部、从当时住在特兰斯凯

地区的讲班图语的人群那里获得的。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是在开普西部有为数甚多，据信为晚石器时代的大尾羊岩画，但是找不到关于牛的类似岩画，可是在讲班图语的人现在聚居的地区却有牛的图画。此外，在开普南部晚石器时代的出土物中，牛骨是否同羊骨出现得一样早，尚未得到可靠的材料证明。

因此，有理由作这样的推测：同使用石器的狩猎者有关，体质上同讲班图语的人不同的牧羊者，在从东非邻族那里得到牲畜和陶器之后，首先向西然后向南迁徙，寻找牧场，最后在距今2000年稍后一点到达开普地区。这些人可能同当地的狩猎者融合，也可能与他们战斗或者径直学会同他们一起生活。随后，他们在今天的特兰斯凯与讲班图语的人相遇并且相互影响。沿着上述路线，陶器、磨制石器和动物遗骨分布稀疏，这只不过说明他们是高度流动的，留下的零碎器物过于分散，因而考古工作者很难发现。

不幸得很，已发掘的真正放牧者的遗址还太少。除非一些露天的贝冢散见于地表的石器和曾有人住过的石窟被查明是放牧者的遗存，否则科伊科伊族群的生态状况仍将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课题。欲知他们的饮食、技术和组织方面的情况，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早期欧洲移民和旅行者的记述。例如，在荷属东印度公司供职的植物学家和内科医生威廉·滕里尼曾于1673年对开普地区作短期访问，在谈到科伊科伊人时写下了下面的话：664

> 他们的主要食物是植物……从沼泽地和土丘上挖出唐菖蒲，他们用这种植物的叶子来盖屋顶，用它的球茎作粮食……。他们常年吃这样的食物，只有在结婚和小孩出生时才宰头牛或至少宰只羊，宴请朋友。除非碰巧捕获了野兽才吃些肉，但他们经常喝牛羊奶。[82]

象这类记述别处还有。这些说法表明，科伊科伊人除特殊原因外，一般不愿宰杀家畜，也说明他们的食物主要是奶类和植物食品。在很大程度上，这与桑人的情况相同。桑人主要以采集植物根茎为食，偶尔吃家畜或野兽的肉，但没有经常的奶供应。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何以早期的旅行者总是说狩猎者身材比放牧者矮小，这是由于狩猎者没有奶喝，不能吸取它的营养的缘故。[83]

由于科伊科伊人以采集食物为主，以猎取肉食为辅，因而发现他们在技术上与桑人相类似就不足为奇了，尽管由于他们在经济上的差别对某些技术的依赖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有关桑人的记述中提及弓和箭之处较多，但是毫无疑问，十七世纪后期的纳马奎人和十八世纪后期的戈纳奎人都使用弓、毒箭和箭袋。[8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这两种人的记述中，都提到一种"标枪"，它与弓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在有关桑人的记述中则没有提到。勒瓦扬的记载说，戈纳奎人使用"陷阱和罗网"，他们把这些东西安放在适宜的地方，用以捕捉大动物。[85]他还说，在开普南部布拉克河附近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巨大地坑陷阱是"霍屯督人"，也许即科伊科伊放牧者挖的。[86]与此相类似，有些早期旅行者

[82] I.沙佩拉，第129页。
[83] H.B.汤姆，第一卷，第305页。
[84] H.B.汤姆，第三卷，第350-353页；勒瓦扬(F.Le Vaillant)，第306-309页。
[85] F.勒瓦扬，第306页。
[86] C.P.桑伯格，第1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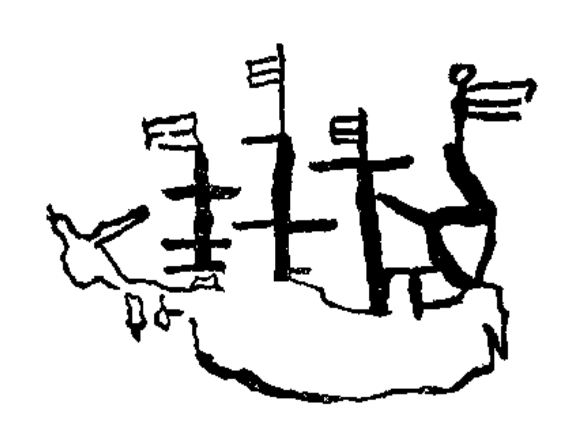


插图 26.10 画在开普西部山区的大帆船，设想可能是在萨尔达尼亚湾或桌湾看到的，从我们纪元十七世纪初起，这种船经常开到那里

665 专门记述了放牧的族群在奥兰治河使用草编围子捕鱼，用挖掘棒挖球茎和鳞茎，用口袋运送食物和用木棍打死海豹等。所有这些技术都被认为同桑人狩猎-采集者使用的技术相同。

也许，狩猎者不会做的有下列三点，那就是用灯心草盖较坚固的茅屋，制造陶器和用金属制造器皿。由于科伊科伊人以相当多的人为单位在草原上迁徙，所以他们不住洞穴，看来也许是用幼树作为棚架，上面盖上灯心草席或者兽皮建成圆顶茅屋。这些茅屋通常排成环形村庄。常有人说饲养的家畜在夜间就关在环形村庄内。到迁移的时候，他们把幼树和草席捆起来放在公牛背上，运到新的居住地点。[67] 关于陶器和金属制作的情况记载不那么明确。早期的一些作者提到当时制造的"陶器非常易碎……式样几乎完全相同"，[68]但没有任何记述说明这些陶器是桑人制作的。事实上，滕里尼曾说只有"较富裕的人才制造壶罐"，但他的意思含糊不清。[69] 十七世纪后期的纳马奎人和十八世纪后期的戈纳奎人都制作陶器。科尔布、德格来韦布克和腾里尼所说的很可能是指十七世纪后期开普地区的科伊科伊人。[70] 陶器在我们纪元最初几个世纪在开普地区的石窟和洞穴中出现，不禁使人设想这是制造陶器的放牧者扩散到这一地区的标志。也许，那种颈部呈圆锥形并带有从内部加固的独特耳状把手的壶罐就是勒瓦扬所说的标准式样。这是在开普沿海及其附近的遗址[71] 中经常出现的壶罐式样之一。这种形状及其耳状把手可能反映了当时需要有柄容器作盛奶之用。早期文献中还谈到这种容器的其他用途，包括熔化油脂。[72]

现无证据可以证明开普地区科伊科伊人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之前就已经常用金属制造器皿。但是，纳马奎人在十七世纪显然就能够用铜制成有孔的小珠和圆盘。范梅霍夫于1661年同开普殖民地的纳马奎人首次接触时，曾在记述中谈到"圆铜盘……铜链和铁珠"，[73] 但他没有说明这些东西是在何地和如何制造的。埃尔菲克在回顾开普地区科伊科伊人时，曾 666 有说服力地论证，纳马奎人可能懂得如何制造铜器，并且在积极开发纳马奎兰的铜

[67] A.斯帕尔曼，第138-139页。
[68] F.勒瓦扬，第311页。
[69] I.沙佩拉，1933年。
[70] P.科尔布，第251页。
[71] J.拉德纳。
[72] F.勒瓦扬，第311页。
[73] H.B.汤姆，第353页。

矿。[64]他还说："开普的科伊人也可能懂得制作铜器，只是这一点把握稍小一点。"[65]

科伊科伊放牧者群体的规模大约随季节而变化，但无疑任何季节都比桑族狩猎-采集者的群体要大些。佩特森提到的纳马奎人的村落有的有19座茅屋，有些是18座、11座或6座茅屋。[66]勒瓦扬记述了大菲什河附近的一个戈纳奎人"部落"，约有400人居住在"40座茅屋里，这些茅屋建筑在600平方英尺的一片土地上"，"形成几个半月形，并由各自的小围栏连结在一起"。[67]据达珀说，"科乔奎人大多住在萨尔达尼亚湾的谷地及其附近地区……，他们住在十五、六个村子里，各村之间的距离步行约走一刻钟。全部人口住在400到450座茅屋里……。每个村庄有30座、36座、40座或者50座茅屋不等，这些茅屋排成圆形，彼此相距很近。"[68]他估计，他们所养的家畜总共约有10万头牛和20万只羊。由于科伊科伊人的群体相当大，他们显然需要不断迁移，以保持家畜的牧草供应和人的植物食品来源。40名科伊科伊妇女采完一个地方的食物当然要比5名桑族妇女快得多。勒瓦扬记述了"科伊科伊人由于季节不同而被迫迁移的情况"。[69]范德斯泰尔总督谈到纳马奎人时指出："根据一年的季节变化，他们进入山区，然后又回到河谷和海岸边，哪里牧草长得最好就到哪里。"[70]情况很明显，强大的"萨尔达尼亚人"早期在桌湾定居时在干旱的夏天使用该湾的牧场，在其他季节就向北迁移到萨尔达尼亚湾。总之，科伊科伊人是不断迁移的，有大片放牧地，特别是沿海平原和山间谷地可供他们随意使用。斯帕尔曼曾提到他们可能在冬天雨季之后迁入卡罗草原。他还指出："殖民者在这方面经常而毫不含糊的经历与霍屯督人的实践是一致的。"[71]

667

斯帕尔曼于1775年越过斯韦伦丹到朗克卢夫时曾作了详细的观察，提到科伊科伊放牧者定期放火烧荒，以促进当年生草本植物和宿根植物的生长。对草原这样处理，可保持植物生长旺盛，使有用的东西比正常情况下长得更繁茂。他写道：

> 殖民者和霍屯督人都用火来清除地里的杂草。用这种方法确实把地面烧得精光，但其目的只是为了使它不久后披上更美丽的新装，用各种当年生的美草香花妆点打扮起来，这些植物以前在灌木和多年生植物的抑制下长不起来……。烧荒之后，花草的幼苗和嫩叶丛生，形成一片喜人的青翠牧场，可供野生动物和家畜食用。[72]

科伊科伊人这种放火烧荒的做法看来在殖民者来此定居之前就已经有了，因为许多早期来到开普的访问者已注意到有丛林大火发生。范里贝克司令官看到远处的山火就知道科伊科伊人即将到来。

桑人和科伊科伊人之间关系的特点是，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在桌湾建立定居点的最初

---

[64] R.H.埃尔菲克。
[65] 同上，第115页。
[66] W.佩特森，第57、104、122、125页。
[67] F.勒瓦扬，第289页。
[68] I.沙佩拉，1933年，第23页。
[69] F.勒瓦扬，第328页。
[70] 沃特豪斯(G. Waterhouse)。
[71] A.斯帕尔曼，第178页。
[72] 同上，第264页。

668



插图 26.11　篷车、马匹和坐车迁移的人，他们在我们纪元十八世纪初迁入开普西部山间的草原

几年里，范里贝克常听人谈到"某种身材矮小的人，生活贫困，十分原始，没有棚屋、家畜等任何东西。"[63] 这些人当时被称为松奎人或索亚奎人，他们部分依靠偷窃放牧者的牲畜生活。其中以贝格河为基地的一群人被称为奥比奎人——意思是"盗贼"。然而，当殖民者深入到更远的内地，更多了解各族群间的内部关系时，有时就提到他们之间存在一种依附关系，桑人狩猎者依附于人数较多的科伊科伊人。范德斯泰尔写道："这些松奎人同欧洲穷人一样。霍屯督人的每个部落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被雇用的，当陌生部落靠近时报告消息。他们不偷盗雇主的牲畜，但是经常偷盗其他村庄的牲畜。"[64] 科尔布在20年以后的记述中证实了"松奎人……为了谋生，多半当军人，在战争中充当其他霍屯督部落的雇佣军，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糊口。"[65] 这些松奎人就是曾融合于科伊科伊社会的桑人。埃尔菲克有力地论证说，科伊科伊族群向原属桑人的地区进行扩张，势必经过战争、依附关系、通婚和同化等过程而达到融合。[66] 正如埃尔菲克所提示的，看来牲畜放牧传入南部非洲的过程很可能同人口的迁徙和土著狩猎-采集者的被同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但是，要证明迁徙和同化这两者的过程，仍是考古学的难题。

669

桑人、科伊科伊人同外来的殖民者和使用铁器的农耕者部落之间的关系，可能象桑人同科伊科伊人之间的关系一样错综复杂。在西部，桑人和科伊科伊人都被赶出了他们的土地，或者被消灭，或者被同化而纳入殖民地社会。在开普西部发现的一些岩画描绘了大篷车、骑在马上的人和坐车迁移的农民手持武器（参见插图26.11）。在东部，铁器时代的农民和狩猎者之间的冲突大都没有文献记载，但也有一些岩画描绘了偷牛的情况，矮小

---

[63] H.B.汤姆，第303页。
[64] G.沃特豪斯，第122页。
[65] P.科布尔，第76页。
[66] R.H.埃尔菲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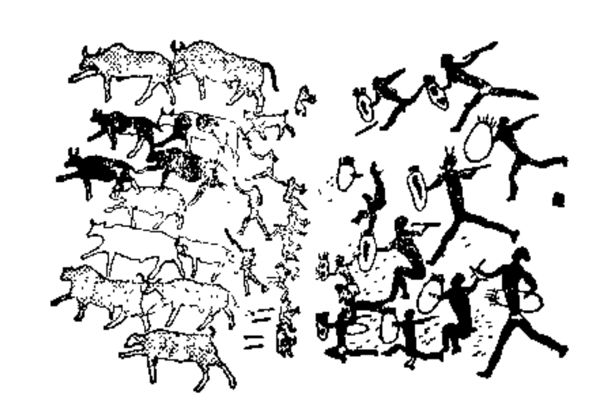


插图 26.12 一群用弓箭武装起来的、身材矮小的家畜偷盗者为保卫他们的掠夺品而同手持矛和盾的体形高大的人战斗。这种身材差别可能反映了南部非洲中部和东部地区桑族狩猎者和拥有家畜的尼格罗人之间的区别

的手持弓箭的人从体形高大手持矛和盾的人那里偷牛(参见插图 26.12)。当有文化的殖民者进入纳塔尔和到达德雷肯斯山山坡时，这种相互关系的晚期阶段才被人记载下来。科伊科伊放牧者——他们同讲班图语、兼驯养牲畜的农民的共同点可能比桑人与这些农民的共同点多些——似乎已与科萨人和茨瓦纳人族群建立了更为和睦的关系。从勒瓦扬对戈纳奎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他们同邻近的科萨人之间密切联系的历史，其中包括大量的相互通婚。[107] 670 那种认为南部非洲各族史前居民之间存在经济、语言、体形和文化的明显区别的想法大概是十分错误的。然而要认为任何这样的区别已完全消失也许是更不可能的。[108]

(宋振祥译)

[107] F.勒瓦扬，第 264 页。
[108] R.M.德里考特，1973 b，第 449-455 页。

671

27 南部非洲铁器时代的开始

D.W.菲利普森

导 言

在史学家称之为南部非洲① 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时期，这一地区传入了一种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它对整个这一地区后来的历史发展的性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纪元第一千纪早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一大批以农为生的尼格罗人来到了南部非洲。他们的经济情况、居住方式，以至他们的体形和语言都与当地从前的居民显然不同。他们带来了这个地区前所未有的冶金和制陶技术。本章即论述这些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的性质、起源和发展。

将铁器时代物质文化带入南部非洲的几个群体之间，文化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一点考古学家现在都已看到。这些群体的遗物属于一个共同的南部非洲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② 由于两个方面的特点，它与其他晚期铁器时代的工艺互不相同：一是它在编年顺序上的完整性，另一是和它有关的陶器明显地遵循一个共同的传统。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分布之广，大大超过了这里所谈的南部非洲的范围。③ 在这一体系之内，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区域性分支。它们的区别之主要依据是陶器风格上的变异。在许多地区，这种分支还可由一些互不相关的文化特点得到进一步证明。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器传统似乎在我们纪元最初几个世纪就传人它所分布的整个区域，并且在多数地区流传下来，直到被晚期铁器时代特色鲜明而更加多样的传统所取代为止。这种取代的情况发生得最频繁的时候是在本千纪之初，因地区而异。某些地区它在八世纪时就被代替了。在另一些地区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局部延续下来，而成为介于早期铁器时代与属于现代传统的陶器工艺之间的一种风格。④鉴于本书内容广泛，为方便起见，我打算对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谈到它被替代之时或我们纪元第十一世纪为止，按各个地区这一时间的先后顺序论述。这样，我就把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中，在此之后仍残存的东西，留在书中其他部分同晚期铁器时代文化一并论述。

674

正是在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这一历史背景下，南部非洲第一次出现了许多极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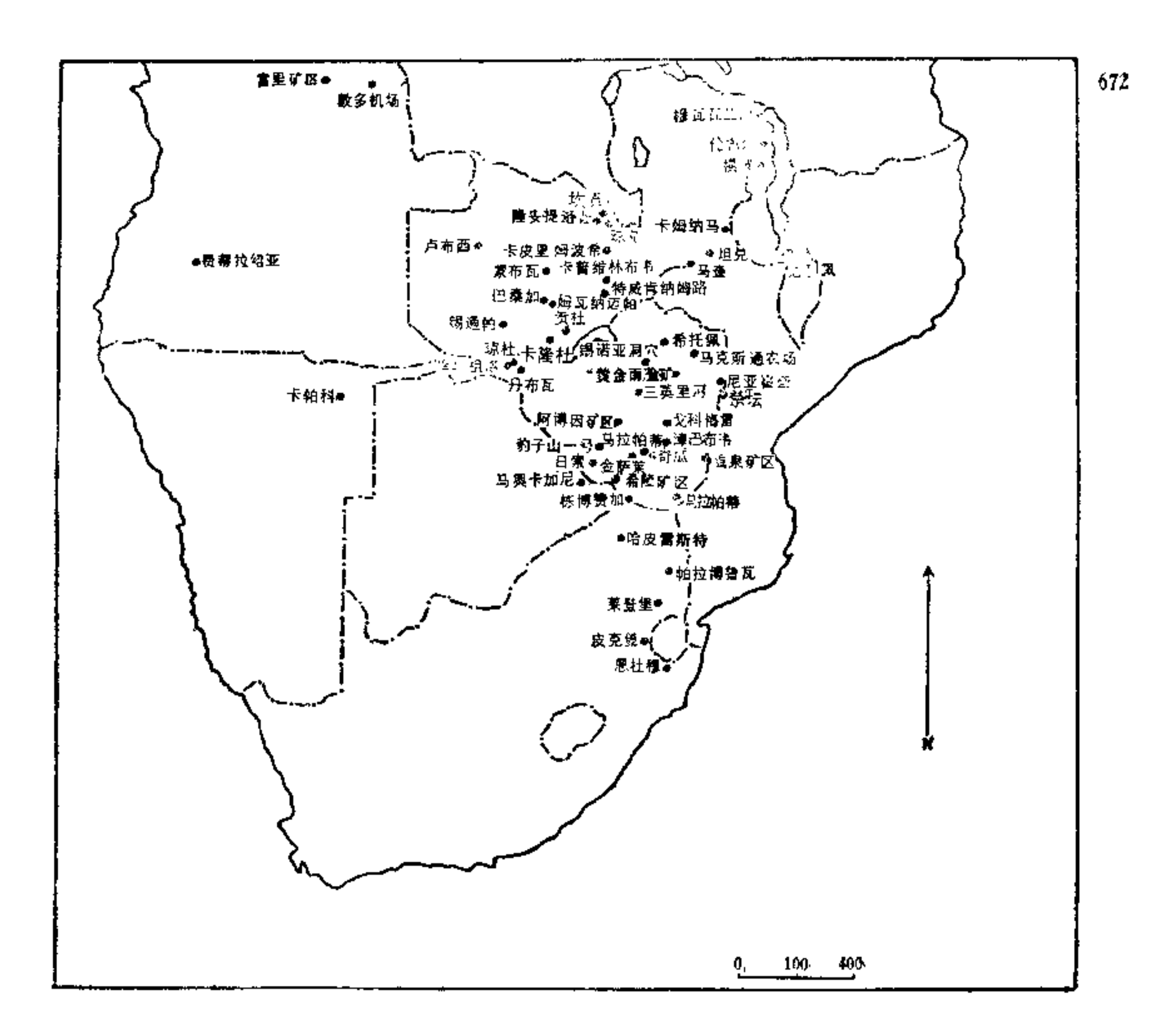
---

① 本章所涉及的地理区域(见地图，插图 27.1)包括安哥拉、赞比亚南半部，马拉维、莫桑比克、博茨瓦纳、津巴布韦、斯威士兰、纳米比亚及南非的部分地区。文中的年代均系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未经核实，请读者注意。

② 索珀(R.C.Soper),1971 年，第 5-37 页。

③ 最新说法见同上出处。

④ 菲利普森(D.W.Phillipson),1974 年，第 1-25页；1975 年，第 321-342 页。



672

插图 27.1 南部非洲：文中提到的早期铁器时代勘察地点及有关遗址

6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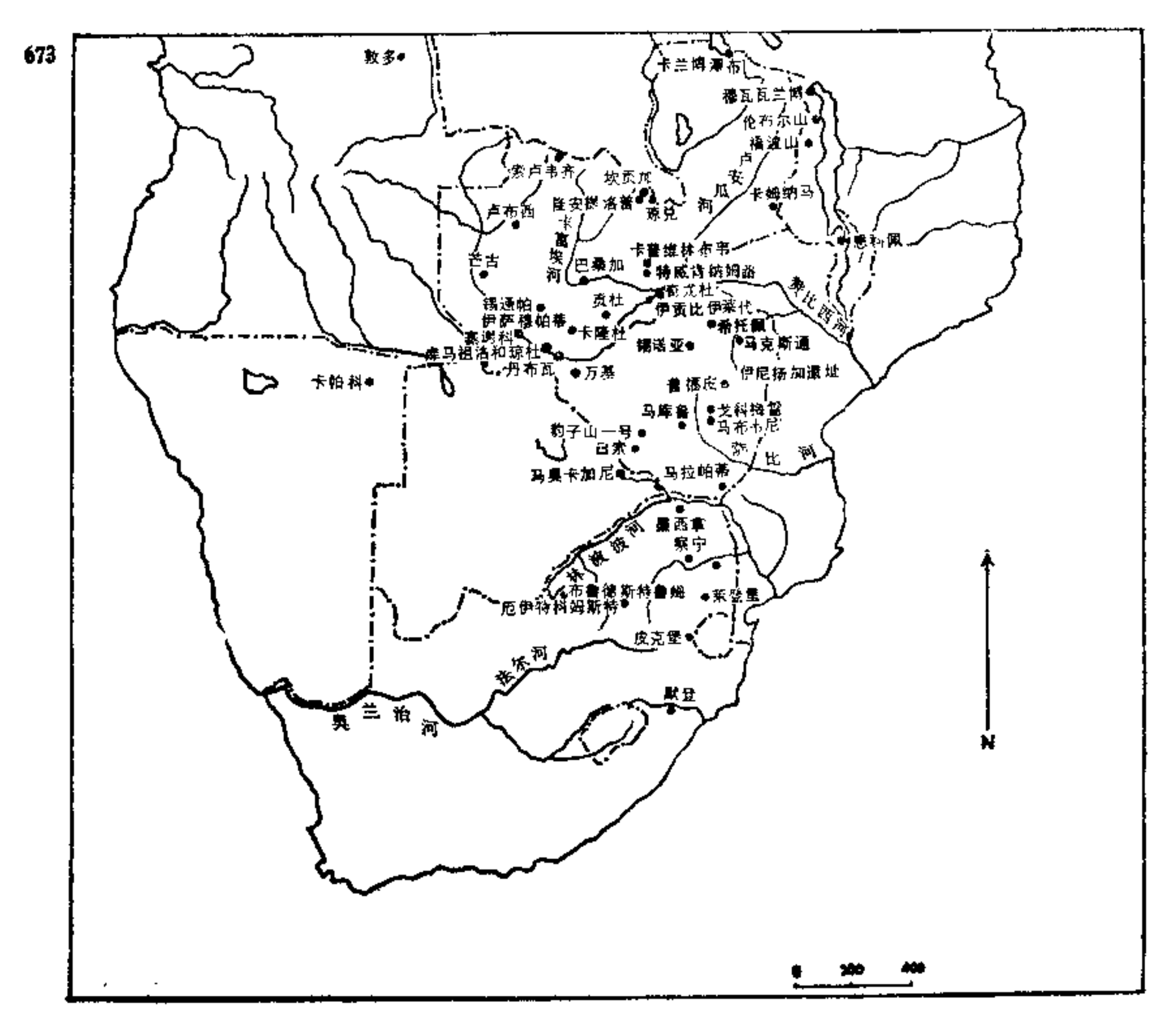


插图 27.2 南部非洲遗址

的文化特点。⑤ 这些文化特点主要是食品生产、冶金、制陶以及半永久性的村落。村里的房屋是用枝条或木棍做成框架，抹泥盖成。在地形适合及矿藏分布许可的情况下，这四个方面的文化特点似乎在这一区域的早期铁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存在。这里的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的物质文化同先于它的"晚石器时代"的文化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形成突出而鲜明的对比。从这种文化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整体来看，都说明它传入南部非洲时就已充分发展。它的前身显然不能在本区域觅得，而要向遥远的北方去寻找。例如，在任何南部非洲遗址上，都没有发现任何陶器可以从某个方面看作是早期铁器时代那种陶器的先驱。冶金术似乎在传入时就已充分发展并已效率很高，而这个地区在这个方面原来连最起码的知识也没有。早期铁器时代的家畜和农作物的品种也是南部非洲原来所没有的。鉴于这些情况以及这种文化在广大地区大致同时出现，很难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南部非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是由于大量人口的迅速迁徙，带来了一种外来的、在其他地方先已形成并充分发展了的文化。

由此可见，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显然只代表我们纪元第一千纪南部非洲人类活动的一个部分。在许多地区，"晚石器时代"的人在这整个时期继续按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生活。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未曾深入的更南的一些地区的居民，通过直接间接与早期铁器时代移民接触，吸收了某种新的文化特点。关于"晚石器时代"及其居民的情况，J.E.帕金顿已于本书第二十六章中予以论述。 675

复现南部非洲早期铁器时代的本来面目，首先必须以考古实物材料为依据。和晚期铁器时代各阶段——大约相当于我们纪元后第一千纪——的情况不同，这个时期的文化完全缺乏口头传说的资料。正如前几章已谈到的，人们也曾试图根据纯粹语言学上的证据来复现有文字前的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的历史情况，但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一般说来，历史语言学的结论同根据考古学得出的结论相比，似乎还是居于次要地位。

考古实证分区概述

赞比亚南部、安哥拉、马拉维

本章作者最近对赞比亚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进行了一次调查，并主要根据对有关陶器的鉴别区分出几种显然不同的群。⑥ 本节只谈一谈赞比亚南部发现的实物。在铜带地区和卢萨卡高原上可见到两个关系紧密的群。铜带区琼兑群的陶器的特点是口部或加厚或无差别，最常用的装饰花纹是交错三角形构成的假浮雕V字纹和以宽槽为边的梳齿印纹。发现有这种陶器的几十个村庄都位于大河小溪沿岸，一般都靠近沿卡富埃河上游各支流漫滩上有一排排树的地方。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坎贡加和琼兑两遗址的琼兑群陶器的年代为我们纪元六至十一世纪，但对陶器的类型的研究表明，另一些遗址的年代可能更早些。已

⑤ 有些特点很快传播到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地区以外。

⑥ D.W.菲利普森，1968*，第191-211页。

知的各处遗址在整个时期内显然都存在着炼铁和炼铜业。这个地区的铜矿虽然导致广泛的贸易接触，但在早期铁器时代开采的规模似乎不大。⑦

由此往南，以卢萨卡高原为中心的早期铁器时代遗址属卡普维林布韦群。它的陶器和琼兑群陶器的区别是口部增厚的情况更明显也更多见，各种梳子印纹则极少见，而由各种阴文图案代替。这种文化在卢萨卡东13公里的卡普维林布韦村显然只存在了一个短暂时期，其年代已测定为我们纪元五世纪左右。这里遗留有许多倒塌的用非洲大麻建造的建筑物，其中许多似是炼铁炉。大量的废渣和铁块证明这一带曾大规模地炼铁。在赞比亚铁器时代的遗址，铁制工具比一般更为常见，但铜似乎尚未发现。这里发现有骨骼碎片，说明已饲养牲畜。⑧卢萨卡东郊的特威肯纳姆路遗址最能说明卡普维林布韦群的后期发展情况。这里已经驯养山羊，同时仍然猎取野兽。炼铁业规模也很大，和卡普维林布韦一样，但直到早期铁器时代最后阶段才出现铜。⑨卡普维林布韦群向东南方扩散到达距奇龙杜不远的赞比西河谷，再过去一直到乌龙圭周围的马绍纳兰高原。乌龙圭有一处与锡诺亚洞穴毗邻的遗址最为有名，其年代属我们纪元第一千纪的后半期。⑩

到现在为止，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在赞比亚西部很少发现。赞比西河上游的锡奥马教区有一个村落，其年代为第一千纪中期的几个世纪。⑪卡莫阿以西的卢布西河畔有一处村落属于第一千纪的最后250年。这两处遗址发现的陶器无疑属于早期铁器时代，但与已知的较靠东面的各群有明显区别。这两处遗址都发现炼铁的证据。⑫从地理特征看，赞比西河上游地区应看作是安哥拉的卡拉哈里沙漠的延伸。这里几乎没有已确定年代的古代陶器群可资比较。但在敦多机场发现的实际上与卢布西遗址属同一时代——七至九世纪——的少量陶器，和在卢布西发现的陶器有许多共同之处。⑬如果富里矿区河里的砾石用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可靠的话，敦多地区似乎从我们纪元最初几个世纪就已制作陶器了。⑭我们有理由肯定，我们纪元第一千纪，安哥拉广大地区都存在着铁器时代的群体，但详细的资料很少。

这里顺便指出，现已在安哥拉以南地区发现我们纪元第一千纪的铁器时代遗址，如在费蒂拉绍亚，该地最早的铁器时代文化的年代为七或八世纪。⑮由于迄今只知道有铁器和陶器存在，而无其它有关器物的详细资料，这一遗址与早期铁器时代的工艺体系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⑯纳米比亚最北部的卡帕科遗址发现了陶器。临时性的初步报告说这些陶器同卡普维林布韦的陶器相近，经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为第一千纪后期。⑰

在卡富埃河谷以南、赞比亚南方省富饶的高原地区发现了几处大规模的早期铁器时代

⑦ 米尔斯(E.A.C.Mills)和菲尔默(N.T.Filmer),第129-145页；D.W.菲利普森，1972a，第93-128页。
⑧ D.W.菲利普森，1968b，第87-105页。
⑨ 同上，1970a,第77-118页。
⑩ 鲁宾逊(K.R.Robinson),1966a,第131-155页；加莱克(P.S.Garlake),1970a,第25-44页。
⑪ 沃格尔(J.O.Vogel),1973年。
⑫ D.W.菲利普森，1971年，第51-57页。
⑬ 克拉克(J.D. Clark),1968b,第189-205页。
⑭ 弗格森(C.J. Ferguson)和利比(W.F.Libby)合著，第17页。
⑮ 费根(B.M.Fagan)，1965年，第107-116页。
⑯ 范西纳(J.Vansina),1966年。
⑰ 萨顿(J.E.G.Sutton),1972年，第1-24页。

村落遗址。显然这几处遗址有人居住的时间比其他地方要长得多。最早的显然在四世纪前后。这个早期铁器时代居民点的人口密度似高于其他大多数早已有了农业和冶金业的地方。⑱巴托卡高原早期铁器时代卡隆杜群的物质文化和卡普维林布韦群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其陶器显然有差异，主要不同是假浮雕V字印纹用得很少，口部内沿显著加厚的碗钵也很罕见。这里有贝壳，说明与沿海的贸易有接触，但无玻璃珠。卡洛莫附近的卡隆杜遗址最底层出土的大量兽骨中，家养牛和小家畜不足五分之二，可见狩猎在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这里有铁制刮刀、箭镞，还可能有铁制拇指琴键（thumbpiano keys），还发现有碎铜片。⑲卡隆杜群在这个高原上一直存在到九世纪；⑳纳姆瓦拉周围的卡富埃河谷、巴桑加和姆瓦纳迈帕等地的早期铁器时代村落的年代确定为五至九世纪。㉑

就铁器时代的考古而论，利文斯敦周围的赞比西河谷大概是南部非洲勘察得最清楚的地区。这里的早期铁器时代丹布瓦群兼有卡隆杜群与津巴布韦的戈科梅雷群的特点。㉒有人认为，马齐利附近的锡通帕遗址所发现的少量陶器碎片，最能说明不太为人了解的丹布瓦群最初阶段的情况，但全盛时期的丹布瓦群，可能是从赞比西河以南铁器时代文化的一个次要中心扩散出来的。㉓在五至七世纪的卡穆祖洛遗址上发现有近似长方形的木麻结构房屋的痕迹。在其中一间房屋里发现了一块外来的玻璃，说明我们纪元七世纪这里就已开始和沿海的贸易有了接触。琮杜所见最能说明这个时期的葬礼习俗。死者尸体都单独埋葬于墓穴中，身体蜷曲，膝盖紧挨下巴。随葬品埋于附近另外几个穴中，一般有几对陶器，用以放置随葬品。各墓无例外地都有一个铁制锄头，还往往有其他器物，如铁或铜手镯、贝壳及用贝壳做的盘形圆珠。还在一个容器里发现有两枚种子，已初步辨明一枚是南瓜种，一枚是豆种。㉔丹布瓦群居民点和在它以北的卡隆杜群居民点发现的兽骨，证明当时有家养的牛，绵羊和山羊，但多数是野兽骨骼，证明狩猎仍占重要地位。本地造的铁器有锥、刀、锄、斧、手镯、矛头和箭镞。这个地区没有铜矿，发现的铜一定是通过贸易传入的。离此最近的两处铜的产地是赞比亚的卡富埃河湾地区和津巴布韦的万基附近地区。在丹布瓦群遗址发现的铜器有手镯和交易用的铜条。

678

八世纪期间，陶器的型式变化加速，结果出现了新风格的卡洛莫陶器。现在将这种陶器看作是早期铁器时代丹布瓦群陶器在维多利亚瀑布地区就地发展起来的。九世纪中叶，卡洛莫风格陶器的制作者将他们的制成品传播到巴托卡高原，而且他们似乎很快就取代了那里的卡隆杜制陶居民。㉕

在赞比亚的东方省，在我们纪元三世纪似乎就已有早期铁器时代居民定居，但人数稀

⑱ 关于早期铁器时代和晚石器时代居民之间的相互影响，见D.W.菲利普森，1968a，第191-211页；1966年，第24-49页；S.F.米勒，1969年，第81-90页。

⑲ B.M.费根，1967年。

⑳ 例如在贡杜：见B.M.费根著作，1969b，第149-169页。

㉑ 巴桑加和姆瓦纳迈帕系由B.M.费根博士发掘。关于其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见D.W.菲利普森著作，1970b，第1-15页。

㉒ 丹尼尔斯(S.G.H. Daniels)和D.W.菲利普森著作，卷二。

㉓ 有关维多利亚瀑布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的记述多系根据J.O.沃格尔先生的研究，其已出版的著作有《卢萨卡》，1971年，以及本书其他地方引用的一些别的著作。

㉔ J.O.沃格尔，1969年，第524页；1972年，第583-586页。

㉕ 同上，1970年，第77-88页。

少。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直到晚期铁器时代开始之后很久，甚至到本千纪，仍然保持着他们“晚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26] 赞比亚东部卡姆纳马群的这些遗址的陶器显然与毗邻的 679 马拉维地区的现代居民点的陶器有密切关系。马拉维湖以西大部分地区的铁器时代考古成果概要现在已经编制出来。

马拉维北部南鲁库鲁河上福波山旁的一个遗址，发现有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长期存在的证据，其年代是我们纪元二至五世纪。发现的实物有陶器碎片、野兽骨和炼铁的遗物以及贝壳盘形圆珠，但没有发现玻璃珠。这里的陶器和卡姆纳马的陶器显然相近，而与东非、特别是蒙巴萨内地的夸莱早期铁器时代器物在各方面显然也都关系密切。[27] 利文斯敦附近伦布尔山发现的类似资料，年代大约为第一千纪中叶。马拉维北部的穆瓦瓦兰博遗址似可代表当地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形式，与赞比亚北部的马兰博群有相近之处。[28] 穆瓦瓦兰博的年代为十一至十三世纪。[29] 马拉维南部许多遗址上发现的遗物，一般认为都属恩科佩群，[30] 说明在四至十一世纪期间有类似的居民点。

马拉维和毗邻赞比亚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器，从类型上看，显然是联系东非和津巴布韦现代陶器的一个环节，但它们与西面外卢安瓜河地区的琼兑、卡普维林布韦和卡隆杜的器物有明显区别。遗憾的是，在马拉维湖以东地区即使确实有过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这方面的资料仍告阙如。

赞比西河以南的非洲

在津巴布韦同样存在着属于同一工艺体系的早期铁器时代工艺，因地区不同而呈差异。我们在前面已提到同赞比亚各群的工艺有密切关系的两种津巴布韦北部地区的工艺。津巴布韦其余大部分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从根本上看有很多相似点。一般都同意把有关的陶器区分为三类：济瓦陶器大致集中在以伊尼扬加为中心的东部高地，西向索尔兹伯里、南沿莫桑比克边界地区伸延到洛费尔德。日索陶器（以前叫豹子山一号器物）[31] 在西南 680 部的布拉瓦约一带。戈科梅雷陶器广泛分布在中南部地区。分类学表明，这三类陶器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事实上，近期的考察已经表明，这三类陶器类型颇多共通之处，它们互相之间的界限也不象某些赞比亚早期铁器时代陶器之间那样界限分明。[32]

在奇比地区的马布韦尼可以清楚地看出津巴布韦早期铁器时代村落的情景，对那里的三座木麻结构建筑的遗物进行了调查，其中之一被认为是储藏室。这个储藏室原来修建在高出地面的石块上。不用胶泥而干垒成的石墙的痕迹未必与早期铁器时代的村落有关，但建筑结构显然与年代较晚些的建筑物不同。该处陶器的特点是，器物有颈，口部加厚边缘

㉖ D.W.菲利普森，1973年，第3-24页。

㉗ R.C.索珀，1967a，第1-17页。

㉘ D.W.菲利普森，1968a，第191-211页。

㉙ 此处关于马拉维早期铁器时代的论述系根据K.R.鲁宾逊先生的下列著作：1966年，第169-188页；同B.桑德洛斯基（B. Sandelowsky）合著，1968年，第107-146页。

㉚ K.R.鲁宾逊，1973年。

㉛ 关于豹子山文化，见K.R.鲁宾逊著作，1966b，第5-51页。

㉜ 赫夫曼（T. N. Huffman），1971a，第20-44页。

处有梳状斜纹花饰，还有各种敞口大碗。也发现了羊和人的泥塑，还有用铁、铜、贝壳等制成的串珠[33]。海贝壳和玻璃珠的存在说明与沿海地区的贸易有接触。绵羊是发现的唯一家畜。这个遗址的年代大致是在第一千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内。这些情况大部分在维多利亚堡北部戈科梅雷教区的一个岩洞中得到佐证，洞中发现的动物骨骼中有一只家养山羊的头角。戈科梅雷早期铁器时代村落的年代属于五到七世纪。[34]戈科梅雷早期铁器时代工艺的又一例证，是大津巴布韦的"卫城"(Acroplis)的最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它约于三至五世纪期间告终。[35]

津巴布韦东北部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济瓦陶器，最初是在伊尼扬加地区发现的；[36]最早期的济瓦陶器与戈科梅雷陶器有许多共同点，但装饰一般更加精致。目前，这种陶器以"祭坛"遗址所出土的最为著名。这处露天的遗址规模颇大，座落在伊尼扬加附近济瓦山上，年代不详。在该处发现的其他遗物还有铁制工具、铜制器物、贝珠和一枚残缺的、从外界输入的贝壳。还发现有小米和南瓜的种子，显然与早期铁器时代有关。

后期的济瓦陶器尽管已采用赤铁矿和石墨着色法，但色调已较柔和。经放射性碳素测定，济瓦陶器历经第一千纪的大部分年代。根据济瓦山麓尼亚霍奎的一座石头围墙所在的最底下几层的年代，一般认为济瓦传统的最后阶段在十或十一世纪。在这一带的早期铁器时代济瓦遗址上，发现了几具人骨，看来有尼格罗人体质的特征。[37] 681

明显属于济瓦传统最后阶段的陶器，其分布要比早期济瓦陶器广泛得多，从津巴布韦东北部向西直到索尔兹伯里的广大地区，都有发现。在阿克蒂尤勒斯的"黄金雨"金矿发现的陶器应属济瓦陶器的晚期，可能属于我们纪元第一千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期内。但是这种分类和年代都属推测性质，还有待进一步考查。[38]这类陶器与史前时期的采矿业之间的关系，详见下文。

距索尔兹伯里西北偏北约 100 公里的希托佩以及沙姆瓦山[39]附近的马克斯通农场的两处遗址，是马绍纳兰北部早期铁器时代最后阶段的最好代表。两处遗址的年代都在我们纪元十一世纪左右，据认为略早于晚期铁器时代穆森盖济陶器传入该地区的时间。马克斯通农场的遗址座落在一处山头上，山顶周围有一圈矮石墙，"用大块长条石任意堆砌而成，石料未经修整，不加挑选，既未砌紧，缝隙间也没有加楔"。[40]石墙顶部每隔不远便竖起一根石柱。毫无疑问，这座石墙与墙内的村落有密切关系。

这就表明了这个地区在早期铁器时代较后几个世纪中有了重大的经济发展。济瓦陶器只是在后期才发现与进口玻璃珠有关。类似的陶器也见于具有简陋的平台和石头围墙的遗址以及金矿和铜矿的矿址，从而表明陶器的制作者对他们居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要比他们前辈为广泛，同时也说明他们已同印度洋贸易网有联系。

---

[33] K.R.鲁宾逊，1961 b，第 75-102 页。

[34] 见加德纳(T. Gardner)、韦尔斯(L. H. Wells)和斯科菲尔德(J. F. Schofield)合著，第 219-253 页；K.R.鲁宾逊，1963 年，第 155-171 页。

[35] 见萨默斯(R.Summers)、K.R.鲁宾逊和惠蒂(A. Whitty)合著。

[36] R.萨默斯，1958 年。关于《祭坛》，另见麦基弗(D. R. MacIver)著作，1906 年。

[37] 伯恩哈德(F. O. Bernhard)，1961 年，第 84-92 页；1964 年；德维利埃(H. de Villiers)，第 17-28页。

[38] J. F.斯科菲尔德：T. N.赫夫曼，1974 年，第 238-242 页。

[39] P. S.加莱克，1967 年，1969 年。

[40] P.S.加莱克，1967 年，第 3 页；1969 年。

津巴布韦的考古发现证实牛的饲养也始于这个时期。赞比西河以南最早的铁器时代村落遗址上，显然没有牛的遗骸，只有绵羊和山羊骸骨。最早的牛骨见于八世纪的遗址，但直到晚期铁器时代开始后才比较常见。[41]

以布拉瓦约为中心的一些遗址上发掘出的日索型陶器，与更东的早期铁器时代陶器在682 制作上有许多共同点。现在看来，这类陶器并不代表该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工艺最初阶段的；属于这一工艺的陶器，似可见于马托波山区的曼道和马迪利扬瓜等遗址。从分类学角度看，这些地方的陶器碎片同早期戈科梅雷陶器和维多利亚瀑布区[42]的丹布瓦群最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器有密切关系。在第一千纪晚期日索工艺发展以前，津巴布韦西南部大部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人口似颇稀少。岩画的研究表明，有为数可观的晚石器时代的人得以在整个这一时期生存下来，在马托波山区[43]尤其如此。

在马托波的日索山发掘出来木麻结构建筑的残片和一组组的石块，被认为是粮仓的支柱，还有以梳齿印纹为主要装饰的陶器；这些材料的年代属于九到十二世纪。[44]

在发掘出日索陶器的其他遗址，特别是蓬巴杰和恩瓜帕尼，石围墙可能是属于同一时代，但二者的关系尚难确定[45]。八世纪或九世纪的一个日索地层反映了布拉瓦约迤西24公里豹子山遗址的最早铁器时代工艺。这里发现的有关遗物有贝壳、玻璃珠、铁矿渣、铜锡、绵羊或山羊的牙齿，关系不十分肯定的遗物有牛豆。覆盖在豹子山工艺(马姆博阶段)层之上的一层沉积物中常见的牛骨，在日索地层底层较小的动物群里没有看到[46]。

津巴布韦东南端努阿内齐河边的马拉帕蒂，有一个早期铁器时代村庄遗址，其年代已断定为第一千纪的最后250年间[47]。这里发现有牛骨，该处的陶器同戈科梅雷和日索陶器近似，而通过后者，又与博茨瓦纳东部马奥卡加尼山等地发现的陶器有相似点[48]。

林波波河以南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在第一千纪时期的分布情况现在已有眉目，但是实物证据不多，而且不完整。在德兰士瓦省北部索特潘斯山的马塔科马发现的陶器与在马拉帕蒂发现的陶器类似；该遗址的确切年代尚不得知，但其陶器同业已断定年代的马拉帕683 蒂陶器相似，所以它的年代大约为我们纪元第一千纪后半期[49]。在德兰士瓦省东北部察宁附近发现具有早期铁器时代风格的陶器，年代断定为三世纪或四世纪。这说明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在林波波河以南传播的时间，不比它传入津巴布韦晚多少。[50]最近在比勒陀利亚迤西的布鲁德斯特鲁姆发现内容更为丰富的遗物。R.J. 梅森发掘出13座已经倒塌的小屋及炼铁的遗迹。这个遗址的早期铁器时代陶器的年代已断定为五世纪前后，这里还发现有家养的牛、绵羊和山羊的骨骸。[51]

---

[41] T.N 赫夫曼，1973 年。
[42] 琼斯(N. Jones)，第 1-44 页。
[43] 见上文第 26 章。
[44] K. R.鲁宾逊，1966 b，第 5-51 页。
[45] 同上。
[46] T. N.赫夫曼，1971 b，第 85-89 页。
[47] K. R.鲁宾逊，1963 年，第 155-171 页；1961 a。
[48] J. F. 斯科菲尔德。
[49] 德瓦尔 (J. B. de Vaal)，第 303-318 页。
[50] 克拉普韦日克(M. Klapwijk)，1973 年，第 324 页。
[51] 梅森 (R. J. Mason)，1973 年，第 324-325 页；1974 年，第 211-216 页。

再往南，有几处铁器时代器物的年代已断定为我们纪元第一千纪，但是难以确定是否属于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52]在斯威士兰西部恩圭尼亚的皮克堡发现的铁器时代遗物，其年代已断定属于四世纪或五世纪。据发掘者的最初笔记[53]，这些与石制采矿工具，零星铁器和“晚石器时代”制品伴随发现的陶器，可能属于早期铁器时代。莱登堡一处大约同时代的遗址上，曾发现一个精彩的、大小与真人相当的赤陶人头像，它是随同被 J.F.斯科菲尔德命名为NC 3 型陶器一起发现的，但它与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的关系还有待查明。NC3型陶器的分布向南扩展到南非的纳塔尔省，该省默登地方一处遗址发掘出这种陶器，还发掘出家养的牛和小牲畜的骨骸。[54]

考古学的综合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对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在地区分布和质量上均不平衡，但一些主要的总的趋势是清楚的。就本书论述范围，早期铁器时代陶器根据其类型可分为两大支。其一，最常见于赞比亚中部和南部的陶器，以琼兑、卡普维林布韦和卡隆杜群为代表，这类陶器一直往西延伸，到何处为止尚不得而知。另一支分布在马拉维、赞比亚东部和赞比西河以南已知的早期铁器时代居民点。[55]赞比西河流域维多利亚瀑布区的丹布瓦陶器兼有上述两大支的特点。通过对早期铁器时代经济的某些方面试作探讨(详见下文)，这一分类已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 684

食物生产经济

有关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的食物生产经济之详细资料，迄今发现得非常少。较大的半永久性村落的出现，说明存在着一种在相当程度上以食物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少数铁锄和大量磨石的发现则说明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农业。但证明农作物品种和与之有关的家畜之存在的更具体的资料却只见于较少的几处遗址。

就本章涉及的地区和时间范围而论，仅有几个早期铁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可以确认为栽培作物的残余。它们是：琼杜遗址(这里发现的初步断定为南瓜和一颗豆子)，伊尼扬加的“祭坛”(发现谷子和南瓜的种子)和豹子山遗址(发现豇豆)。在卡隆杜和伊萨穆帕蒂[56]等卡洛莫文化层中找到过高粱种子。卡里巴附近(文化上不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伊贡比伊莱代遗址也发现有残存的高粱，其年代已直接断定为七或八世纪。[57]这些零星实物证明，南部非

[52] 在这里我把尼伊特科姆斯特和帕拉博鲁瓦等地的发现物排除在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之外，它们在分类学上与晚期的遗物接近。达顿（T.P. Dutton）著作中第37-40页述及纳塔尔北部发现七世纪的炼铁炉，它与何种文化有关系，也没有证据可查。

[53] 引自 B. M. 费根的著作，1967 年，第 513-527 页。

[54] J. F. 斯科菲尔德，英斯基普（R.R. Inskeep）和冯贝青（K. L. von Bezing）合著，第 102 页；R. R.英斯第326页；马格思（T. M. O'C Maggs）。

[55] D. W. 菲利普森，1975 年，第 321-342 页。

[56] B.M. 费根，1967 年。

[57] B.M. 费根，D.W. 菲利普森和 S.G.H. 丹尼尔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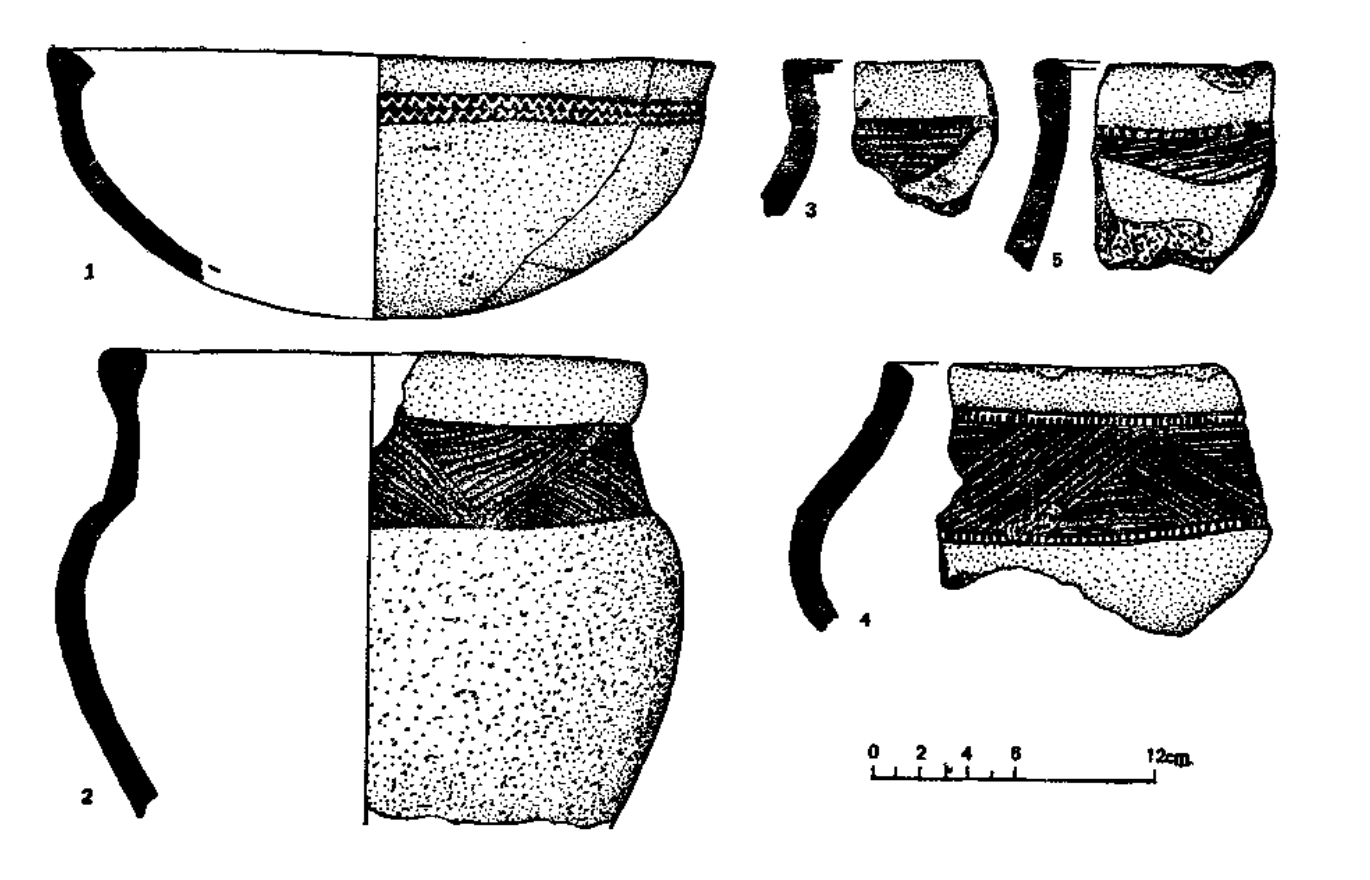


插图 27.3 在特威肯纳姆路发现的早期铁器时代陶器：1、2 根据 D.W. 菲利普森（1970 年）和卡隆杜；3-5 根据 B.M. 费根（1967 年）

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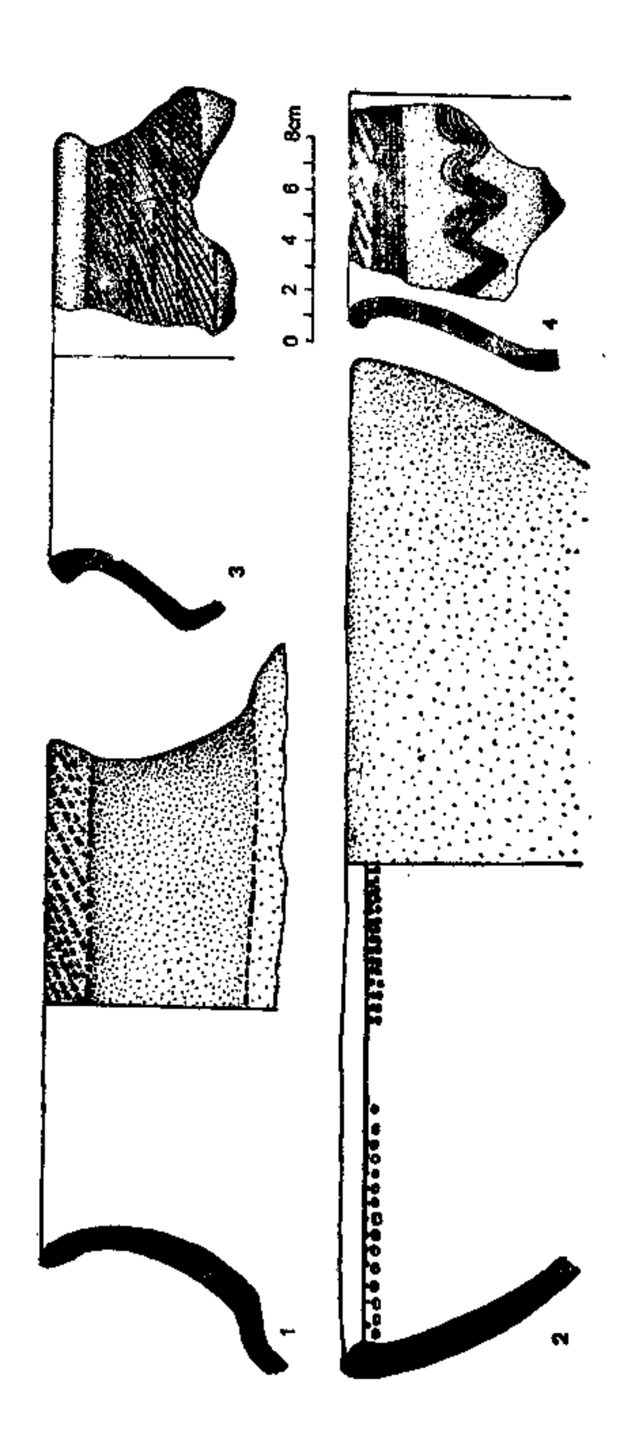


插图27.4 在马布韦尼发现的陶器。1、2根据K.R. 罗宾逊(1961年)和丹布瓦，3、4根据S.G.H. 丹尼尔斯和D.W. 菲利普森(1969年)

洲早期铁器时代的农民种植的某些农作物，但不能认为这就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农作物。

家畜的遗骸方面，证据稍多一些。绵羊和（或）山羊的骨骸在特威肯纳姆路、卡隆杜、库马祖洛、马布韦尼、戈科梅雷、豹子山、马库鲁和布鲁德斯特鲁姆等遗址都有发现。这些分布很广的遗址代表了南部非洲的整个早期铁器时代。然而，属于早期的家牛骨骸只见于卡普维林布韦、卡隆杜和库马祖洛等赞比亚南部遗址。在赞比西河以南，如加冕公园、马库鲁和马拉帕蒂[58]等地，八世纪以前似还没有牛。绵羊传入津巴布韦比牛为早，只要研究一下津巴布韦的岩画，就可以推断出来，因为在岩画中经常可见大尾巴绵羊，而牛却见不到[59]。但是，在布鲁德斯特鲁姆发现的最新材料说明，在德兰士瓦省牛可能出现得

686 早一点，那里的牛估计是从西路引进的[60]。

即使在赞比亚南部地区，牛在早期铁器时代似乎也不太常见，而它在以后各个时期的经济中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地铁器时代经济的重点在第一千纪的后半叶逐步转移。在卡隆杜几个相连的地层中发现的这个时期的动物骨骸，家畜骨骸的数量稳步增加，野生动物的骨骸相对减少，这说明从狩猎逐步转向畜牧业。[61]在大约同一时期，维多利亚瀑布区的铁锄数目明显减少，因此似有理由认为经济重点已从农业转移为家畜的饲养。[62]

采矿与冶金

南部非洲铁器时代曾经以一定规模开采的金属只有三种；按其重要性来排列，是铁、铜、金[63]。

各种铁矿在整个南部非洲分布极为广泛。在没有富矿石的地方，便似曾使用含铁量低的沼铁矿石进行冶炼。炼铁业引进本地区，似乎与本书所述铁器时代文化的其他特征的传入同时。铁矿石一般是挖掘浅坑开采，甚或不过是就地捡拾。没有迹象表明曾使用其他方式。南部非洲早期铁器时代有关炼铁炉的详细情况尚不得知，[64]但使人感兴趣的是，炼铁通常是在村落范围内进行的，稍后时期规定炼铁不得让妇女接触的禁忌当时似乎还没有通行。冶炼过程中看来采用了通风管，但这并不能证明当时已有风箱，因为通风管也用于自然采风的炼铁炉[65]。铁制品一般属于家用，例如刀、箭镞、矛头等等，当时可能很少有铁

628 及铁器的远程贸易。

铜矿在南部非洲的分布面积要比铁矿小得多。其主要蕴藏地区是：赞比西河与刚果河的分水岭，从现在的铜带向西直至索卢韦齐一带，卡富埃河湾地区，津巴布韦的锡诺亚和

---

[58] T.N. 赫夫曼，1973年，

[59] 库克(C.K. Cooke)，第7-10页。

[60] 韦尔伯恩（R. G. Welbourne），第325页，牛在晚石器时代南非的出现可以断定为我们纪元第一千纪，可能早于津巴布韦。因此，看来牛可能是从西路引进南非。这同埃雷特（C. Ehret）1967年著作第1-17页；C.埃雷特其他著作，1972年第9-27页引用的语言学证据是一致的。

[61] B. M. 费根，1967年。

[62] 这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延续达几个世纪。

[63] 锡也以小规模开采，至少在十九世纪的南部赞比亚是如此。

[64] 伯恩哈德在伊尼扬加发现的一个冶炼炉是否属于早期铁器时代，还不清楚。

[65] 例如，D.W.菲利普森著作，1968c，第102-113页。

万基地区，靠近津巴布韦边境的博茨瓦纳东部，墨西拿周围的林波波河谷，以及德兰士瓦东部的帕拉博鲁瓦地区。由此往西的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铜矿这里不予论述，因为该地区基本上没有经过考古勘查。上述各地区的铜矿在铁器时代有可能都曾经开采，但要测定与晚期相对而言的早期开采活动困难甚大。许多史前的开采遗迹已遭破坏，或由于近代的开采而大为改观。但铜制品在早期铁器时代遗址上广泛发现，尽管数量不及晚期铁器时代遗址上的多。发现的物品不能表明在早期铁器时代冶铜技术已象炼铁术一样分布在所有地区，例如，在卢萨卡地区，铜看来只在早期铁器时代的后一阶段才出现。在靠近铜矿矿床之处，譬如琼兑群遗址及津巴布韦的大部地区，懂得炼铜技术要早得多。当时显然把铜视为奢侈品，用途基本上仅限于制造铜珠及细长薄铜条绕成的镯子等供人们佩戴的小件装饰品。这种金属以铜条的形式进行交易，当时供交易用的最典型的铜条出自库马祖洛。尚未调查过早期铁器时代的炼铜炉。赞比亚铜带矿区附近、特别是隆安提洛普的早期铁器时代遗址上发现的陶器碎片，带有远方地区器物的特点，说明当时可能有人长途跋涉到这些地方来寻求铜，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后期[66]。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曾小规模地开采铜矿，而大规模开采则在铁器时代后期。[67]

南部非洲铁器时代的金矿开采，看来主要限于津巴布韦及其邻近地区[68]。据报道，赞比亚，南非等地曾发现小规模的史前时代开采点，但未经详细勘查。而在津巴布韦以及紧靠博茨瓦纳和德兰士瓦的边缘地区却留有一千多个史前时代金矿[69]。这些古老矿址大部分都为最近 80 年来的开采所破坏，仅有极少数几个古址有详细资料。因此，要判断津巴布韦金矿史前开采的年代非常困难。对这个地区的古矿进行的放射性碳素测定表明，最早的开采点在阿博因及杰隆矿，年代都在十二世纪左右。有四起报告，说到有在古矿区内或其附近发现早期铁器时代陶器的情况，这些陶器最有可能是济瓦传统后期的器物。上文讲过，阿克蒂尤勒斯附近的黄金雨矿曾经发现过这类陶器，在三刹车矿也有类似的发现。这两处矿址都在马佐埃河谷地区。再靠南一些的萨比河谷地区，在乌姆孔多附近的温泉镇矿区也发现相似的陶器。最后，晚期的济瓦陶器是在奎奎附近三英里河的矿石加工场遗址发现的，这里有许多搬动重物和砸碎矿石所留下的洞和痕迹。这个遗址是距离盖卡、格洛布和菲尼克斯等大而积古老矿址最近的遗址。所有这些矿在史前时代都是露天开采，这实际上是津巴布韦古代最常用的采矿方式。黄金雨矿和温泉镇矿区各只有一个采掘面，位于奎奎的各矿的开采规模比上述两矿大得多。盖卡有 160 个采掘面，而菲尼克斯矿的采掘面则深达 40 米。然而，显而易见，菲尼克斯的矿已经过许多世纪的开采。早期铁器时代的采矿规模都非常小，没有证据表明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开采。

689

在津巴布韦铁器时代遗址中虽曾发现大量金器，但其中绝大部分在欧洲人占领早期就被寻宝者拿走了；有关这些发现的出处及考古资料因而几乎全告阙如。有计划进行地考古发掘发现的少数金器，都属于铁器时代后期。[70]

[66] D.W.菲利普森，1972 b，第 93-128 页。

[67] 中南非洲、特别是赞比亚地区的史前炼铜活动情况的研究，目前正由M.S.比森(M. S. Bisson)先生进行。

[68] 以下论述大部分根据 R.萨默斯的著述。

[69] 金矿的实际数字当比这个数字高许多倍。

[70] 目前已知，伊贡比伊莱代的陪葬物，其中包括金器，与该遗址第一千纪后期居民的活动没有联系。见 D.W.菲利普森及 B.M.费根合著，第 199-204 页。

由于确定古代金矿的年代的证据非常稀少，目前只能就四处早期铁器时代文物遗址所提供的证据进行推测。这些遗址的年代均未确定，但根据发掘出来的陶器可以看出，其年代似不早于我们纪元九世纪，并大致不晚于十一世纪[71]。没有证据说明津巴布韦金矿的开采早于这个时代。这个结论与阿拉伯文献的记载相一致，其中首次提及在非洲东海岸买到这个地区的金子是在第十世纪[72]。

曾掘出早期铁器时代陶器的四个金矿遗址，都位于津巴布韦的东部，在马佐埃及河谷

690 萨比河谷。这两条河都为海岸及内地之间提供了比较方便的交通条件。阿拉伯地理学家们的著作明确指出，从开采金矿的最初时期开始，这种金属就曾出口，至于当时当地是否便已使用金子，目前尚不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采金的开始与玻璃珠的进口的时间似乎大致相同。如果这两件事确实有关系，则采金业的发展很可能首先是由于外部需求的推动。萨默斯认为当地的采金技术主要来自印度，据此推测，则有些金矿工人也来自印度。[73]但根据我们目前所知，这一理论难于令人信服。虽然有把握认定津巴布韦的采金活动始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后一阶段，但真正大规模的开采却要晚一些。

建　筑

在这个地区只有少数几个遗址可提供若干资料、再现早期铁器时代的建筑方式及其结构的细节。但这些资料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一时期南部非洲建筑的普遍特征，仍有疑问。在库马祖洛发现11所木麻结构房屋式样的证据，房子近似长方形，有坚固的角柱，墙最长者仅为 2.3 米。南部非洲其他早期铁器时代遗址没有类似的发现，但从其他一些遗址(例如丹布瓦及希托佩)不完整的遗物中可以看出，库马祖洛所发现的基本建造方式也常被采用，虽然库马祖洛房屋那种近似长方的形状却属独见。

铁器时代石造房屋普遍见于赞比西河以南地区。但这种造房方式似未传入赞比亚；晚期铁器时代的最后几个世纪虽然也有这样的房屋，但为数极少。[74]

但如上所述，有些证据却表明，石造房屋在早期铁器时代的津巴布韦是普遍的，虽然规模较后期小得多，也没有那么讲究。正如前述，石头建筑可能与戈科梅雷遗址、以及后来的济瓦及日索遗址有关系。在这个时期，未经加工的石块主要用于修筑田地和梯田的堰

691 以及简单的围墙。早期铁器时代的建筑者所盖的房屋，大概以前面所述马克斯通农场遗址的建筑型式最为讲究。石造建筑的传统在第一千纪末以前已经相当普遍，及至后期铁器时代更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大津巴布韦本身的石头建筑群完全属于后期铁器时代的遗物。[75]

以上综述仅限于早期铁器时代经济和技术的某些方面，但足以说明南部非洲的早期铁

---

[71] R.萨默斯及 T.N.赫夫曼提出，有可能时间还要略早一些。

[72] 马苏迪，见 G.S.P.弗里曼－格伦维尔(G. S.P.Freeman-Grenville)著作，1962 b，第15页。

[73] R.萨默斯。

[74] 据报道，赞比亚南方省的高原地带马扎布卡附近发现梯田的墙。这种墙以及在卢萨卡地区和东方省南部防御工事遗址发现的粗糙的石墙，可能都属于十八或十九世纪。

[75] R.萨默斯，K.R.罗宾逊，A.惠蒂和 P.S.加莱克合著，1973 年。

器时代为该地区后来铁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打下的基础了。

结 束 语

我们现在对南部非洲早期铁器时代所知情况大致如上。对于这个文化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的概述，主要只能看作一种考古的尝试。历史语言的研究显然也可对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这些问题曾在前面的一章中论述。

在本章所讨论的南部非洲范围内，通过考古可以看出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的两大分支。它们不妨视为同一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的初步分化，但从各自出土陶器的形状来看其差别则更为明显。其中一支分布于卢安瓜河谷与马拉维湖之间并向南到津巴布韦和德兰士瓦省北部，居民为牧民，饲养绵羊和山羊，但最初似乎不养牛。第二分支以赞比亚中部及南部的为最著名，但也有迹象表明这个分支曾向西部广大地区伸展。这个地区在早期铁器时代就有牛。将牛传到非洲大陆最南端的早期科伊桑牧民手中的可能就是这里的居民，但早期铁器时代的工艺却并未传到那里。

由于考古研究工作在地区分布上极不平衡，对于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更广泛的分支细节无法作进一步的讨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考古研究工作的分布图上，莫桑比克的全境全属空白，因而从印度洋直到马拉维湖之间整个地区的情况至今毫无所知。安哥拉的大部以及南非的许多地方迄今调查很不充分。这些缺欠一旦得到弥补，这里的综述很可能需要作重大改动。

如前所述，早期铁器时代居民带入南部非洲的文化，直到不久之前仍是该地区后来文化史中许多主要发展的源泉。在这方面历史学家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各个地区在后来所表 692 现的互不相同的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早期铁器时代。例如津巴布韦和德兰士瓦省的石造建筑传统、津巴布韦的采金业，以及铜带地区的炼铜业等，虽然直到较晚的时代才臻于全盛，却似乎都起源于各自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相应部门。在许多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与晚期铁器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估计比人们经常设想的更为显著，然而，只有经过更为详尽的调查，尤其是调查考古学家尚未涉足的地区，才有可能就早期铁器时代对南部非洲历史所作的全部贡献作出评价。

（尤 勰译）

693

28 马达加斯加*

P.韦兰

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

人们对马达加斯加居民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作过许多研究，但对他们的起源至今仍不甚清楚。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假设，其中有些具有一定的价值。大多数学者认为，附近的非洲大陆对马达加斯加种族的形成固然起了作用，但仍应强调，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影响同样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中央高原地区。马达加斯加居民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的双重影响，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他们中间存在体质上的差异，而他们讲的却都是印度尼西亚语。这种语言分为三种方言，但是它们在语言学上的统一性是无可置疑的。

过去，特别是在1962年以前，即在尚未从地下挖掘出文物史料之前，人们就在比较语言学、人种学、音乐学、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因此，在着手研究有关马达加斯加最早居民的资料以前，有必要对马达加斯加文化史有关的辅助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一简单的回顾。

语言学

马达加斯加语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这最早是1603年由荷兰人F.德乌特芒首先提出来的。他当时出版了马来语与马达加斯加语对照的对话手册，还编纂过一部马来－马达加斯加语词典。① 大约10年以后，葡萄牙人路易斯·莫里亚诺证实了上述理论，他发现马达加斯加岛西北部沿海地区居民使用一种“卡菲尔语”（即斯瓦希里语），这种语言和“该岛内地及其它沿海地区居民使用的‘布基语’（即马达加斯加语）不同……后者与马来语非常相似”。

范德顿克② 通过其研究成果科学地论证了马达加斯加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后，法弗尔、布兰兹泰特、马尔、理查森，特别是登普沃尔夫在这方面继续进行研究。根据登普沃尔夫对原始印度尼西亚语的分析，表明梅里纳语（他称之为霍瓦语）与印度

694

① 德鲁里（R. Drury），1731年，第323-392页。
② 范德顿克（Van der Tuuk），1864年。
* 本章译自法文版，参见英文版校订。——中文版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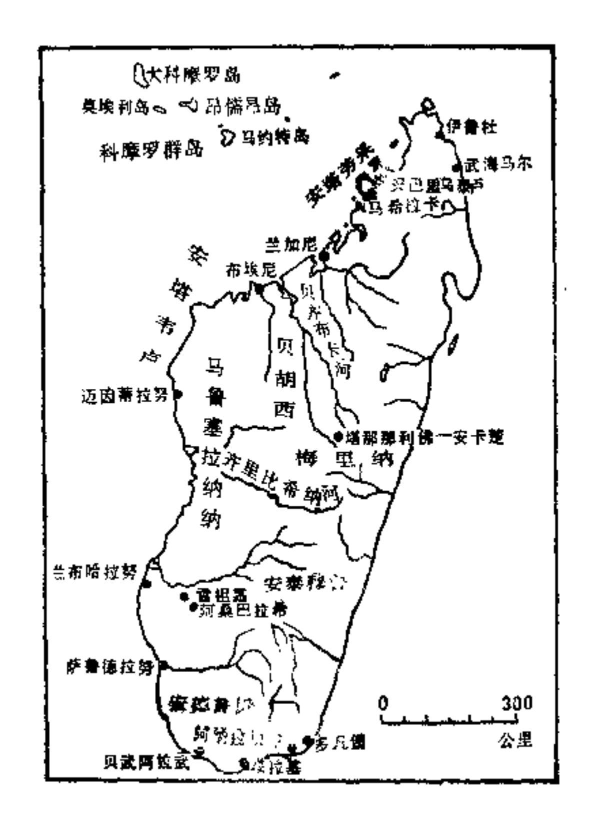


插图 28.1 马达加斯加重要遗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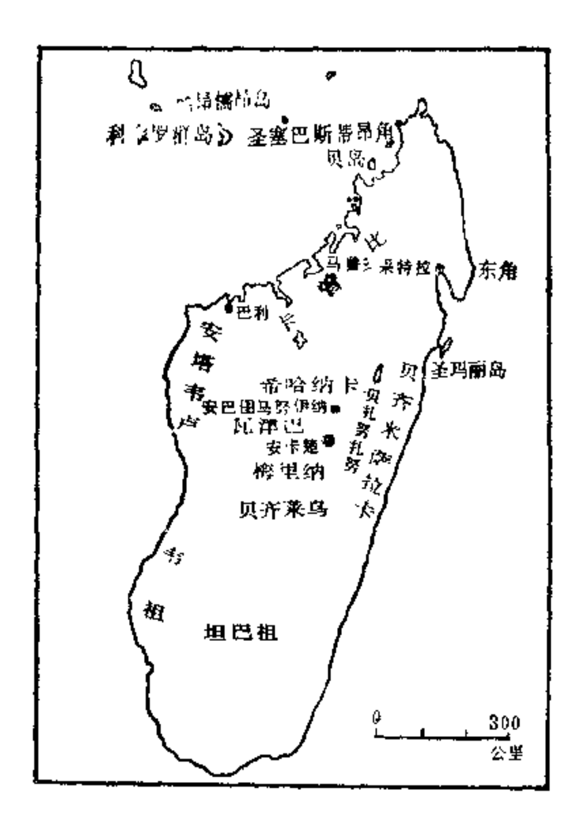


插图 28.2 马达加斯加地图（文中涉及的地方）

尼西亚语系中的其它语言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后来，达尔进一步指出，马达加斯加语不仅在词汇方面，而且在语音方面都受到了班图语的影响。这一见解，对于后面将要谈到的关于非洲语言和印度尼西亚语言相互影响问题的讨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埃贝尔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指出，在马达加斯加使用的印度尼西亚语往往由两部分组成，这反映了来源于东南亚语言的复杂影响。德兹分析了来源于印度尼西亚语的词汇，使我们得以了解移民们带来了哪种类型的文化。[③] 最后，同源语言演变史表明，马达加斯加语中 94% 的基本词汇具有明显的印度尼西亚语的影响，也使我们了解了从原始语言演变到马达加斯加语的时间进程。[④] 虽然马达加斯加语的基本成分属于印度尼西亚语系，但是我们仍应该看到印度语、阿拉伯语和非洲语等其他语言的影响。使用上述语言的民族之间或许有过接触，这一设想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印度尼西亚人在大规模向西扩散过程中与其他民族杂居和融合的有关情况。

体质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证实，马达加斯加人既属于蒙古人种，也属于尼格罗人种。拉科托-拉齐马芒加曾就马达加斯加人，特别是中央高原居民的分布和他们身上的色素的性质提出一些重要的结论性意见。他根据形态类型把当地居民分为四类，每一类型所占的百分比如下：[⑤]

印度尼西亚-蒙古人种型：37%；

大洋洲尼格罗人种型：52%；

非洲尼格罗人种型：2%；

欧洲人种型：9%。

696 人们可能对大部分尼格罗人是不是真正来源于大洋洲这一点提出疑问。最近，查姆拉夫人在对保存在人类博物馆的一些颅骨进行测定后，提出将当地居民分为三种类型：

浅褐色的亚洲型，类似印度尼西亚人；

黑人型，这类居民更象非洲人而不大象美拉尼西亚人；

混合型。一般说来，这一类型似乎最为常见。

皮加什[⑥] 在血液学方面的研究结果清楚表明，马达加斯加尼格罗人的祖先是非洲人，而不是美拉尼西亚人。

在古代伊梅里纳地区自由民等级居民的后裔中，体质类型属于印度尼西亚型的占绝大多数。而来自沿海或非洲大陆的昔日战俘的后裔，却是地地道道的尼格罗人。从生物学角度说，印度尼西亚人对于西哈纳卡人、贝扎诺扎诺人、某些贝齐米萨拉卡人和北部的贝齐莱乌人的形成似乎也起过一些作用。至于印度尼西亚人对沿海地区其他那些大部或几乎全

③ 德兹(J. Dez)，第 197-214 页。

④ 韦兰(P. Vérin)，科塔克(C. Kottak)及戈尔林(P. Gorlin)。

⑤ 拉科托-拉齐马芒加(A. Rakoto-Ratsimamanga)在确定分类时，过于受格朗迪迪埃(A. Grandidier)的"南亚理论"的影响。他没有明确指出确定这些类型的参数。

⑥ 皮加什(J. P. Pigache)，1970 年，第 175-17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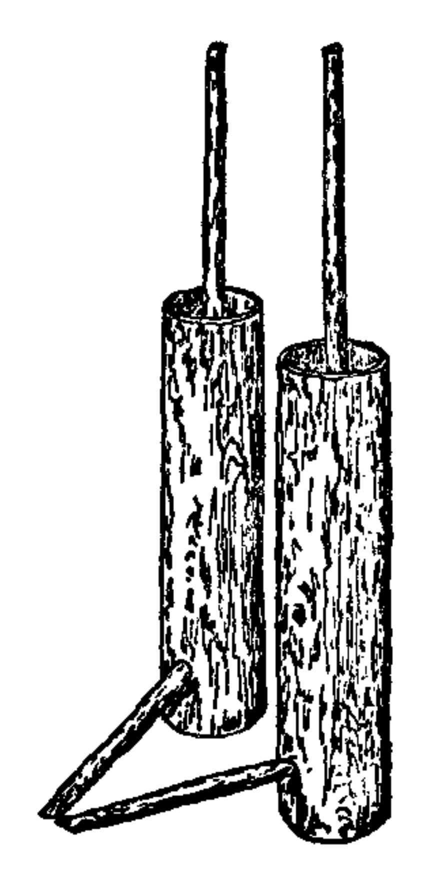


插图 28.3 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双活塞型风箱

部是尼格罗人的族群的形成有无生物学方面的影响，目前尚在探讨之中。

研究马达加斯加古代人的遗骸，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种族之间融合的过程，特别是有助于我们弄清这样一个问题：非洲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是在马达加斯加岛，还是在其它地方相互融合的。但由于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几乎没有找到任何骨骸来进行研究，因此至今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材料。⑦ 697

人种学和音乐学

H·德尚⑧最早致力于鉴别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各自对马达加斯加文化的影响。在居民从事畜牧的习惯方面，在西部地区和贝齐莱乌地区盛行的对蛇的崇拜（象征对先王的崇拜）方面，都可看到非洲文化的影响；沿海地区的社会政治组织也看到非洲的一些影响。而伊梅里纳地区的社会组织恰好相反，完全是印度尼西亚式的。

马达加斯加文化还从东方吸收了许多东西，如绝大部分的住宅样式、种植水稻的水流梯田、以崇拜祖先为特征的宗教信仰，以及一整套的工艺技术，其中包括有两个活塞的风箱、舷外装有桨叉支架的独木舟、用多孔的火山岩装配起来的地下炼铁炉、可以转动的弓

⑦ 除西部和武海马尔地区的骸骨研究外，这些地区属于早期阿拉伯人首批移民的范围。
⑧ 德尚（H. Deschamps），1960 年。

钻和开椰子的带有支架的锉刀等。人们可以在马达加斯加西海岸看到这种不大为人所知的钻头和锉刀。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东部岛屿上也有这两样东西，形状相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在塔希提语中分别叫乌(hu)，和阿纳('ana)。

霍内尔和卡尔威克斯研究了印度尼西亚文化对东非沿海地区的影响。最近G.P.默多克提到一种"马来西亚植物群"。他认为这一植物群包括早期从东南亚引进的作物。他特别列举了水稻、波利尼西亚竹芋、芋头、薯蓣、香蕉、面包树、椰子树、甘蔗等等。默多克认为，上述植物是由印度尼西亚移民在我们纪元前的十个世纪中带到马达加斯加的。这些植物先到达南亚沿海，后来才到达东非海岸。

默多克排除了印度尼西亚人不经中继站，直接渡过印度洋移居马达加斯加的可能性，他的这一分析显然是很有道理的；他所估算的移居发生的年代也是大致正确的。但是，关于如何从人种植物学方面提供证据的问题，德尚和最近的埃贝尔都指出，很早以前就被引进马达加斯加的植物中，有些带有印度尼西亚名称，有些有非洲名称，还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埃贝尔强调指出："不同国家对某种植物有同一名称，并不能证明这种植物就是外来的。"例如，马达加斯加西部沿海地区香蕉的名称是印度尼西亚语的"丰齐"(fontsy)，但这并不能证明这种作物就是印度尼西亚移民带来的，因为，香蕉在马达加斯加中央高原地区有一个班图语名称，叫"阿孔杜"(akondro)。两种叫法各有缘由，而不管哪一种叫法都可以找到充分的依据。埃贝尔还引述了奥德里库尔的话。后者的观点更为明确，他在分析马达加斯加作物起源时写道："有印度尼西亚名字的作物，并不一定来自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度尼西亚移民在当地发现了一些植物与他们本国的很相似，就给他们起了印度尼西亚名字"。需要补充的是，对那些初次见到的、不认识的植物，移民们往往由于受到他们在本土见过的同类植物的启示而加以命名。

698

上述几个论据表明，应该多么细致地处理人种植物学方面的证据。同样，在运用音乐学资料方面也是如此。C.萨克斯指出，马达加斯加曾受到印度尼西亚、非洲和阿拉伯等多方面的影响。琼斯的见解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不仅远至马达加斯加，而且直达非洲大陆。依我看来，在不否定琼斯的某些见解的同时，在印度洋两岸各自会有同样的发现，这种可能性是不应该排除的。

通过上述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马达加斯加人是印度尼西亚人和非洲人的后裔。尽管印度尼西亚人的影响在语言方面占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人在对马达加斯加拓居的过程中没有起重要作用。毗邻的辽阔非洲大陆对大多数马达加斯加人的体质特征的形成有影响，也对马达加斯加的文化和社会政治组织方面的一些特色的形成有影响。人们认为印度尼西亚人也曾到过科摩罗群岛或非洲沿海地区，可是在那里却看不出两种文化混杂的情况。

事实上，有关马达加斯加人的起源的各种理论，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马达加斯加人的祖先是非洲人，另一派则认为他们是印度尼西亚人的后代。此外，某些人如拉扎芬查拉马等人则持有完全错误的观点。拉扎芬查拉马通过对几千个词的词源不可靠的分析，认为马达加斯加岛曾经受过佛教僧侣的统治。至于A.格朗迪迪埃则夸大了亚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除了后来的马夸人以外，所有马达加斯加人的祖先，包括尼格罗人，都来自东

南亚地区；为了证实这一论点，他还把马达加斯加尼格罗人称之为美拉尼西亚人。G.费朗[9]接受了上述无视地理根据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有一定理由；他更多地强调马达加斯加人起源于非洲的因素。他将马达加斯加居民形成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可能存在过的班图语居民以前的时期； 699

基督纪元前班图语居民居住时期；

二至四世纪梅里纳人出现之前、印度尼西亚人从苏门答腊迁入时期，新来的移民征服了班图人，确立了自己的霸权统治；

七至十一世纪*阿拉伯人迁入时期；

十世纪苏门答腊人再度迁入；其中有扎芬德拉米尼亚人的祖先拉米尼人以及霍瓦人的祖先拉库巴人；

最后是波斯人迁入以及扎菲卡西朗博人(1500年左右)的迁入时期。

G.朱利安[10]也觉得非洲的影响占主要地位。而马尔扎克[11]则认为是霍瓦人把自己的语言教给了马达加斯加的所有班图人。

马达加斯加的第一批居民

在进一步深入探讨马达加斯加人究竟起源于印度尼西亚还是非洲的问题之前，需要分析一下那种认为早在远古时代就有地中海地区的移民来到马达加斯加的理论。

腓尼基人、希伯来人、还是《回航记》中的人物？

在谈到那些古代世界尽头的国家的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明显夸大腓尼基人、埃及人、萨巴人、希腊人和希伯来人在这些国家历史上所曾起过的实际作用。例如，本特(1893年)就把腓尼基人看作是津巴布韦的创建者，而C.普瓦里埃则将苏法拉地区同蓬特和奥非尔之间的地区混为一谈。

某些作者认为，古代某些远洋航行者曾经到过马达加斯加。F.德梅伊声称他在马任加找到了腓尼基人的遗迹。这一点，费朗和我自己都无法证实。A.格朗迪迪埃[12]指出，希腊人，当然还有阿拉伯人，都到过马达加斯加。他写道："希腊人和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知道这个岛屿。他们称它为梅努西亚、加夫纳和切兹贝扎特，并且对它们作了精确而简短的描述，但未能引起欧洲地理学家的重视。直至1500年，欧洲地理学家才通过葡萄牙人了解到这个岛屿的存在。"

事实上，梅努西亚这个在托勒密[13]著作和《回航记》中可以看到的唯一希腊语名称指的 700

---

[9] 费朗(G. Ferrand)，1908年，第353-500页。
[10] 朱利安(G. Julien)，1908年，第644页，第375页。
[11] 马尔扎克(V. Malzac)。
[12] A.格朗迪迪埃，第11页。
[13] 托勒密乌斯·克劳迪乌斯。
* 本书法文版为"七至九世纪"。——译者注

或许很可能是奔巴岛、桑给巴尔岛或马菲亚岛。一位叫 F.杜梅斯尼尔的人⑭写了一本题为《马达加斯加、荷马和迈锡尼文化》的著作。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清楚表明其内容纯属臆测。

有关犹太移民的传说则更为盛行。约瑟夫·白里安神甫⑮在他著的《在马达加斯加的希伯来人》小册子中坚信，犹太人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迁入马达加斯加。为了支持这一论点，白里安提出了一个论据：马达加斯加语和希伯来语中有几百个相近似的词汇。这种以词汇可能相似的简单比较语言学作为论据的误入歧途的理论，不幸，在马达加斯加简直是太普遍了。J.奥贝尔在许多著作中都阐发了这些理论；尽管这些著作都是有争议的，但官方出版社还是予以出版了。

关于某些马达加斯加人的祖先是犹太人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弗拉库的一些著作。他认为，最先到达马达加斯加东岸的外来移民是“扎费-伊布拉辛人或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圣玛丽岛及其周围地区的居民”。弗拉库在《大马达加斯加岛史》⑯一书的前言中，以该岛还存在着《圣经》中的一些名称以及行割礼和星期六禁止工作等习俗来支持他的假设。

G.费朗否定犹太移民的可能性。他认为，岛上的某些闪米特语名称来自某些皈依伊斯兰教的马达加斯加人。⑰至于星期六禁止工作，那只是个“禁忌日”的问题，是马达加斯加人一个相当普遍的习惯。该岛东部沿海的不同地区至今还以星期二、星期四或星期六为“禁忌日”。此外，在十七世纪，某些外来民族有割礼的习惯，这似乎促使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法国学者力图证明这些民族有犹太血统。也是在十七世纪，在另一个地区有一个进行类似研究的例子：雷蒙·布雷东神甫编纂了一部法语-加勒比语词典。

近来，J.普瓦里埃提出了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以前马达加斯加人起源的另一种理论。这位作者看到了穆斯林对马达加斯加的双重影响。普瓦里埃的前辈们认为，在马达加斯加岛上伊斯兰痕迹之所以较少，是因为有犹太人的影响，而普瓦里埃则认为，这些伊斯兰痕迹是从阿拉伯半岛传到马达加斯加的伊斯兰教的原始形态。然而，在东非和马达加斯加岛进行的考古发掘不能证实这一论点。阿拉伯人在八世纪大量迁入马达加斯加，使岛上的斯瓦希里文化得到更大的发展，但在我们纪元二世纪时就经常有人往来于东非沿海各地。比梅努西亚（它不可能是马达加斯加岛）更远的远洋航海的终点站是拉普塔。《回航记》的作者说，阿扎尼亚的最后一个商埠叫作拉普塔(Rhapta)。这个名字是从“缝合船只”(rapton plorarion)一词派生出来的。在那个地区有大量象牙和玳瑁。

701

拉普塔的准确地理位置尚无法确定，大致可能在潘加尼河与鲁菲季河三角洲之间。或许当时马达加斯加与沿海贸易根本没有关系，这不仅是由于航运还未能到达拉普塔，而且因为马达加斯加那时还没有人居住。

根据现有的史料和考古资料，人们完全可以认为，印度尼西亚人和非洲人在五世纪至

⑭ 杜梅斯尼尔(F. du Mesgnil)。
⑮ 白里安(J. Briant)，1945年。
⑯ 弗拉库(E. Flacourt)。
⑰ G.费朗，1891-1902年。

八世纪，最迟不超过九世纪，来到了马达加斯加岛。因此，我们应该对这第一批亚非居民的兴衰变化进行研究。

第一批印度尼西亚移民

要确定第一批印度尼西亚人登上马达加斯加岛的时间可能是轻率的，但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人是在我们纪元五世纪以后踏上旅途的，其理由将在后面阐明。这种移民活动，正如德尚所认为的那样，一直延续到十二世纪。首批到达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人接触并融合为一体的印度尼西亚移民，我们称之为老印度尼西亚人。晚些时候到达的，称之为新印度尼西亚人，是梅里纳人的祖先。后一种人，或许是选择了较直接的路线前来马达加斯加岛的，所以较多地保留着印度尼西亚人原有的体质特征。但可能因为他们人数较少，所以不得不学会早期到达的老印度尼西亚人的语言。

老印度尼西亚人和新印度尼西亚人之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移入的年代和体质特征方面，而且还反映在社会组织形式上。奥蒂诺指出，马达加斯加中央高原地区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印度尼西亚的非常相似。伊梅里纳人称之为“福科”(foko)的家族单位与人们在帝汶岛发现的一种称作“芬肯”(fukum)的社会组织形式属同一类型。布洛赫称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为“戴姆”(同类群)。与高原地区相反，马达加斯加沿海地区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操班图语的非洲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埃贝尔观察到某些原属于印度尼西亚语的马达加斯加语词汇因地而异，东部使用的词汇与西部的不同。关于历法问题，他提出了一些很令人感兴趣的看法(1960年)：萨卡拉瓦人的历法中只有少量的梵文词，而新印度尼西亚人后裔的历法中却有许多梵文词。[19]

702

新印度尼西亚人似乎仍保持着印度尼西亚人原有的一些传统，但不很严格。卡莱神甫编写的《梅里纳人编年史》谈到了印度尼西亚人在东部沿海马鲁安采特拉和曼古鲁之间登陆的情况。拉米利松在他撰写的《扎菲马米人的历史》一书中也谈到关于登陆的传说，只是把登陆地点确定为马鲁安采特拉。

那些在最早的时期或较后时期越过印度洋向西迁移的印度尼西亚人原来究竟住在哪一地区，至今还是个谜。在我看来，如果把马达加斯加语，或者更确切地说将马达加斯加语的各种方言，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印支大陆的多种语言进行同源语言演变史的比较研究，或许能够得到某些宝贵的启示：我们发现那种与马达加斯加语有共同的词汇最多的语言是与东南亚地区的语言属于同一语系(从这语系分离出许多不同的语言)。O.达尔已经揭示了马达加斯加语和婆罗洲的曼詹语之间的亲缘关系。I.迪恩也通过同源语言演变史的计算证实了这一亲缘关系。他指出，马达加斯加语和曼詹语之间的共同词汇比马达加斯加语和马来语之间的共同词汇多。当然，这并不是说马达加斯加语就一定起源于婆罗洲，也许还有其它更接近于马达加斯加语的语言。费朗在他的《马达加斯加语音笔记》一书中说，马达加斯加语与巴塔克语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与卡威语和爪哇语亦很相近。

---

[19] 这条理由似乎有争议，某些人提出，即使没有移民现象，历法也可以传播。再者，萨卡拉瓦人也可能在那些伊斯兰教徒的影响下，修改了他们的历法。

来自东南亚的原始马达加斯加人在印度洋上创造了波利尼西亚人那样的英雄业绩。根据索尔海姆[19]的看法，这些原始马达加斯加人或许过着一种与婆罗洲的伊班人大体相似的生活。伊班人把一年分成两段，一段时间进行刀耕火种，过着定居的生活；另一段时间就出海谋生，甚至当海盗。埃贝尔[20]提出了下述设想：这些勇猛无畏的航海者也许就是布基人。后来，这个走了样的名称在阿拉伯故事里指的是马达加斯加，直到今天。在斯瓦希里语中，它仍被叫作布基或布基尼。

新印度尼西亚人挖壕沟给自己的村落设防（A.米尔指出，在伊梅里纳有16,000个这样的村落），这种村落与印度支那及泰国的村落很相似。这使我感到惊奇。这种用壕沟设防的村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印度支那出现了，但其中有的是在我们纪元五世纪前后建筑的。总之，在东南亚北部地区探寻迁居马达加斯加的印度尼西亚人的渊源，那是合乎情理的，因为1500年以前，印度尼西亚的文化正在印度支那半岛广为传播。我们探寻的这种原始文化的继承者们，后来很可能在海岛上定居下来，一部分人住在婆罗洲，另一部分住在马达加斯加。

尽管我们还无法断定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哪个或哪些国家是马达加斯加原始文化的摇篮，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是在进行臆测。从五世纪以来，或许更早些，印度尼西亚的航海活动，特别是向印度的航行，已经相当活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印度尼西亚地区出现了一些强大的航海国家。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建立在苏门答腊的已印度化的斯里维贾亚帝国*（七世纪至十三世纪）、建立在爪哇的夏连特拉帝国（八世纪）、马塔兰帝国（九世纪至十一世纪）和马贾帕希特帝国**（十三世纪），以及建立在马来亚的占碑帝国（十二世纪）。

703

就目前已掌握的知识推断印度尼西亚人何时渡海到达马达加斯加，这并不比确定马达加斯加人起源于哪些国家更为容易。费朗以及后来的达尔曾经指出，即便马达加斯加语中有许多梵文词汇，那也远比与马达加斯加语有亲缘关系的其它语言（如马来语、曼詹语）中的梵文词汇的数量少得多。由此可以推断，向马达加斯加岛移民大体应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地区开始梵语化的时候。[21]如果可以肯定地说，梵语化的现象在我们纪元四世纪已经明显存在，那么，它实际开始的年代要更早些。但它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各地区的表现是很不平衡的。

通过对马来语、马达加斯加语以及从原始马达加斯加语变成的各种方言的演变史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作出有关印度尼西亚人迁移的时间的各种假设：他们可能是在我们纪元前不久和我们纪元第一千纪中较长时间之内向马达加斯加迁移的。[22]研究词汇歧异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对各种方言进行分类，从而可以作出一些同马达加斯加岛移民问题有关的推论。德尚的意见是，印度以东的海上通道很早就已开辟，而印度以西的海上航线大约在我们纪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才为人们所熟悉。在我看来，德尚的说法比不可靠的同源语言演

[19] 索尔海姆（W. Solheim），第33-42页。
[20] 埃贝尔（J. C. Hébert），1971年，第583-613页。
[21] 达尔（O. Ch. Dahl），第367页。
[22] P. 韦兰，C. 科塔克、和P. 戈尔林，1970年，第26-83页。
* 中国古代称为：室利佛逝。——译者注
** 中国古代称为：满者伯夷。——译者注

变史的对比研究更值得重视。

如果能够找到人工打制的石器，或许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马达加斯加历史最初阶段的一些情况。但直到如今，人们在这方面仍毫无所获。我认为，在岛上生活的最初的马达加斯加人已经会使用金属工具。众所周知，非洲沿海地区大约是在我们纪元一世纪到四世纪由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的。而在印度尼西亚，进入青铜时代要早得多。[23]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那里，各种不同的文化曾同时并存；甚至在十世纪之后印度尼西亚仍然可见到一些离群索居的族群使用石器。

马达加斯加岛上是否存在石制工具，这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已经发现的两件东西有些象锛斧。其中一件是布洛赫[24]在安巴图马努伊纳地区发现的，另一件是马里马里·凯隆-奥蒂诺在马莱因班迪东部的坦巴祖发现的。目前对这两件石器的真实性应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两个经过加工的石块是在过去开采火枪引火石的地方发现的。然而，这两件石器的真实性一经验证，人们便可认为，印度尼西亚第一批移民至少是在我们纪元第一千纪中叶到达马达加斯加的。格朗迪迪埃（1905年）指出，[25]两件经过加工的近似火枪引火石的石器是在兰布阿拉的次化石层中发现的。这一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事实上，在次化石时期结束以后，火器还未输入马达加斯加岛，因此这两个石块也许确实是经过加工的石器。

704

马达加斯加东部和中部的陶器和在巴乌-卡拉奈地区发现的陶制品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人们对于在非洲发现的，同属于这一古代时期的陶制品不太了解，以致不能确切地把这时期的非洲制品和印度尼西亚制品区别开来。

马达加斯加人用于祖先崇拜而竖立的石碑同印度尼西亚的极为相似。费朗（1905年）指出，马达加斯加语中表示"神"的词（Zanahary）与马来语和同一语系的占语中相应的词有着牢固的词源学方面的联系。

至于移民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人们常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纪元第一千纪里，印度尼西亚人是否已经有了能够进行如此长距离航行的船只。现已知道，当时在西印度洋已经有了所谓的"缝合船"（mtepe）。阿拉伯古老的单桅小帆船就是在这种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船身却是用绳子捆扎起来的，而阿拉伯单桅小帆船则是用钉子固定的；这两种船的帆也不一样）。在东印度洋，正如德尚指出的那样，那时已经出现能够到大海远航的船只。我们可以在婆罗浮屠寺院（八世纪爪哇）中看到这种船只最早的浮雕像：船上装有一个桨叉托架，双桅杆和帆。

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向马达加斯加移民的说法之后，余下的问题是要探寻他们究竟选用了哪条航线。许多作者认为，第一条是赤道以南的航线。从理论上说，由爪哇到马达加斯加是可以走这条航线的。尤其是每年八、九月间，从爪哇南部海岸到昂布尔角附近地区强大的南赤道海流很适于航行。西布雷指出，过去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出来的浮石就是沿着这条路线漂流到达马达加斯加沿海的。

---

[23] 范黑克伦（H. R. Van Heekeren）。
[24] 布洛赫（M. Bloch）和P. 韦兰，第240-241页。
[25] 迪恩（Dyen）和A. 格朗迪迪埃。

由爪哇到马达加斯加的直达航线不是绝对不能使用，但考虑到东克所明确阐述的几点理由，这条航线却很难是切实可行的。东克指出："在南方的冬季，这一地区没有热带飓风，因此从爪哇到马达加斯加的直达航线不一定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然而，应当指出，可以找到一些不利的因素来推倒这一假设。"直达航线几乎长达四千海里，中途是一片汪洋，没有任何可以靠岸停泊的地方。因此，应该考虑到利用印度南部和锡兰作为中继站的问题。德尚提到了我们纪元一至五世纪海盗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某些情况。

705

使用由印度南部至马达加斯加的航线，看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经过西亚南部海岸的那条航线从《回航记》时代起就已为人们所了解。后来在锡拉夫发现大量中国货币一事证明远东和中东之间的海上贸易相当频繁。在拉普塔繁盛时期，船只常从中东沿着非洲海岸南下，人们也许是发现了科摩罗群岛作为去马达加斯加岛的中继站的。晴天时，从德尔加杜角附近海面，可隐约见到大科摩罗岛上卡尔塔拉山的轮廓，从大科摩罗岛可以看到莫埃利岛，甚至可以看到马约特岛。不难想象，一艘原计划开往科摩罗群岛某一岛屿的船只，未能到达目的地，因而误航到了贝岛或圣塞巴斯蒂昂角，就象十九世纪桑给巴尔的小船，遇到坏天气而被迫偏离航道一样。

的确，科摩罗群岛上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有人居住。当地作家，特别是赛义德·阿里撰写的编年史指出，在穆斯林到来之前的贝札时期就有异教徒在岛上居住。当然，人们并不知道这些异教徒是印度尼西亚人还是非洲人。然而，这却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线索。某些作者，特别是雷皮凯和罗比诺[26]都认为，在昂儒昂岛高地的居民，即瓦马查人中有一些比穆斯林移民更早的居民的后代。这一假设尚未得到认真的考证。根据对一些地名(例如"Antsahe"一词就与马达加斯加语的"Antsaha"一词十分相近)和传统的工艺研究，我们考虑原始马达加斯加人移民有可能是印度尼西亚血统。在瓦尼，至今保留的传统类型陶器，尤其是饭锅的形状和装饰与马达加斯加的同类物十分相似。[27]埃贝尔指出，在昂儒昂禁止捕捞山里湖中的鳗鱼，这和一些马达加斯加人禁止捕捞同一种鳗鱼的作法非常相似。而且，马达加斯加的这种鳗鱼名称和昂儒昂的一样，都是由印度尼西亚语的词汇派生出来的。巴罗克斯[28]也指出，在居住方面，武埃尼地区有一种独特的传统，这可能是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一种传统。当然，科摩罗文化，如同在东非沿海的文化一样，有一些来自东南亚的东西，如装有桨叉托架的独木舟和开椰子使用的锉刀等。

706

通过对古昔马的地下发掘，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将会揭示出昂儒昂埋在地下的印度尼西亚人文化层。在古昔马仍保留着一座十五世纪的清真寺，一条道路穿过这个地方，下面有一个考古层，现已发现许多赭红色的陶器碎片和大量饭后扔掉的海贝壳。对深层的砗磲(tridacnis)进行碳-14测定表明，这个遗址已有1550年*(误差为±70年)的历史(加古苏因实验室报告)。对这一深层的发掘虽然困难但却是十分必要的，昔马的伊斯兰前考古地层中或许可找到能解开最初的马达加斯加人起源之谜的线索。

---

[26] 罗比诺(C. Robineau)，第17-34页。
[27] P. 韦兰，1968年，第111-118页。
[28] 巴罗克斯(M. Barraux)，第93-99页。
* 法文版为1,500年。——译者注

德尚认为，或许，住在非洲沿海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人构成了马达加斯加居民的核心成分。肯特也是这样认为，所不同的是，他完全是以假设的方式提出来的。人们过分夸大了印度尼西亚人对非洲沿海地区的影响。从东南亚引入非洲的"马来西亚植物群"并不一定和印度尼西亚人有关。根据《回航记》记载，甘蔗，可能还有椰子树，就没有经过印度尼西亚人之手而独立引进的。

装有桨叉托架的独木舟盛行于印度洋，这一点，正如霍内尔所认为的，肯定是印度尼西亚人影响的一种反映。德尚认为，它表明了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到达马达加斯加所取的路线。这一设想似乎是可能的，但仍有争议，因为斯瓦希里文化和马达加斯加文化接触密切，这就促进了相互之间的渗透。

如果就印度尼西亚人对东非沿海的影响范围作一估量，便会发现，这种影响相对说来并不算大。况且，如果印度尼西亚人确实在非洲东部沿海地区定居过，那么人们应该找得到某些痕迹。但实际上至今毫无发现。这就使人们考虑到，亚洲人对非洲东部沿海地区的影响，即便存在，那也只局限在相当小的地区内；他们从未构成具有殖民地的规模。在这项讨论中，应该提一下那些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所提供的有关资料。最早和最令人振奋的无疑是叙述瓦克瓦克人在十世纪下半叶侵入非洲沿海的那篇文章了。J.福布雷和M.福布雷[29]以及R.莫尼[30]都正确地指出，这篇文章十分重要，但他们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却各不相同。该文引自拉姆霍尔木兹的一个名叫博佐格·伊本·沙姆里亚尔的波斯人所著的《印度奇迹大全》一书[31]。下面是有关段落：

> 伊本·拉基斯对我说，瓦克瓦克人会作出令人惊异的事情。他们乘了上千只小船在回历334年(即我们纪元945-946年)到达这里，同当地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但并未能征服他们，因为甘拜卢周围有着非常牢固的围墙，外面是充满海水的港湾；甘拜卢位于港湾中间，犹如一座坚固的城堡。随后，瓦克瓦克人登陆了。当地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非要到这里来不可。他们回答说，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国家和中国都需要的货物，诸如象牙、龟板、豹皮、龙涎香等，而且，他们想找一些僧祇人，因为僧祇人体格健壮，当奴隶好使唤。他们还说，他们在旅途上已走了一年时间。他们在距甘拜卢有六天航程的一些岛屿上进行了抢掠，并且征服了苏法拉的僧祇人的一些城市和村庄。此外，他们还到过某些不知名的地方。如果这些人说的都是实话，而且叙述准确无误，即他们确实走了一年的路程，那么伊本·拉基斯关于瓦克瓦克人居住的那些岛屿的说法便是有根有据的；那些岛屿与中国隔海相望。[32]

707

甘拜卢或许就是奔巴岛。根据这一入侵的描述，人们可以设想，这些海盗来自东南亚，或许还经过了有"六天航程"的马达加斯加岛。不管怎么说，在十世纪的头50年，印度尼西亚人已来到印度洋这一地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材料证实这些人在十世纪以前就

[29] 福布雷(J. and M. Faublée)。

[30] R.莫尼，1965年。

[31] 德维克(L. M. Devic)，1878年，范德里思(Van der Lith)，1883-1886年，G.费朗，1913-1914年，第586-587页。

[32] 索瓦热(J. Sauvaget)，引自J.福布雷和M.福布雷。

已来到这里。

再看看由费朗发现并翻译的其他阿拉伯人的著作，便会明白，这些瓦克瓦克人是尼格罗人，其中或许也包括一些印度尼西亚人。从生物学和语言学角度看，他们构成了混血型的最初的马达加斯加人。总之，印度尼西亚人远航到非洲海岸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伊德里西的一篇文章证实了这一点：

> 僧祇人根本就没有可供航海的船只，但是一些从阿曼或其它地方来的船在他们那里靠岸。这些大船是驶往属于印度的扎巴季岛（即扎贝季岛，也就是苏门答腊岛）的。这些外国人出售自己的商品，买进当地的产品。扎贝季岛上的居民乘大小船只前往僧祇人居住的地区去做生意，因为他们都能听懂对方的语言。[63]

伊德里西在同一著作[64]的另一段里明确写道："科姆尔人以及马哈拉贾（即贾维加）地区的商人到达后，受到僧祇人的良好接待，并且同他们交换商品。"

在阿拉伯人写的文章中，常常把瓦克瓦克和科姆尔混为一谈。但十五世纪时，在伊本·马吉德和苏莱曼·马赫里绘制的航海图上明确无误地指出，科姆尔这个地理名称指的是马达加斯加岛，有时也统指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岛。这种把瓦克瓦克和科姆尔混为一谈的现象令人很感兴趣，因为很可能是瓦克瓦克人定居在科姆尔地区。

印度尼西亚人向西移民的结束

可能由于十一世纪初以后伊斯兰的影响日益增强，印度尼西亚人停止了向西的航海活动。伊本·穆贾维尔（十三世纪）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阿拉伯半岛的一个有趣的古老传统。德尚正确地认为，这一传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费朗将上述文章译成法文，[65]文章说：

> 法老帝国（或许指罗马帝国，其东部的都城是亚历山大）崩溃之后，一些渔民居住在亚丁旧址。后来，科姆尔人入侵，把亚丁据为己有；他们将渔民赶走，并在山上用石头垒起房屋。他们在一个季风季节里一起航行到亚丁。这批人死后，这种移民活动就终止了。从亚丁到摩加迪沙有一个季节风；从摩加迪沙到基尔瓦是另一个季节风；从基尔瓦到科姆尔还有一个季节风。科姆尔人用一个季风期就完成了这三段航程。回历626年（我们纪元 1228 年），一些科姆尔人驾着一艘船沿着这条航线航行；他们想驶向基尔瓦，结果却误航到了亚丁。他们的船装有带支架的桨，因为海水浅而危险。但巴拉巴尔人把他们逐出了亚丁。现今已无人知道这些人的航海情况，也不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以及如何生活的。

如果说，印度尼西亚人远航到非洲沿海的活动很早就停止了，那并不意味着远东和西印度洋的往来就从此中断了。恰好相反，有迹象表明，印度洋的贸易还有所发展。但很可能大多由越来越熟悉这条航线的穆斯林来从事这项活动。伊本·马吉德绘制的航海图正确

[63] 伊德里西(Idrisi)，国家图书馆手抄本第 2222 页；十六卷集，L卷，第 9-12 页；G.费朗，1913-1914 年，第552页。

[64] 二十一卷集，L卷，第 1-12 页。

[65] G.费朗，1913-1914年。

地标明了非洲沿岸一些城镇以及大洋对面的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和港口的纬度。在那个时候，穿越印度洋大约只需三、四十天的时间。

人们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即使印度尼西亚人不再经常来到非洲沿海，但他们仍然直接驶往马达加斯加岛；他们可能是从印度南部地区来的。新印度尼西亚人或许就走过这条航线。我们知道，这条航线的确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在1930年，一些渔民从拉克代夫群岛直接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安全到达该岛的东角。新印度尼西亚人学会了东部居民的马达加斯加方言、并和当时经营东部沿海港口的穆斯林往来。 709

新印度尼西亚人的先驱者们似乎确实到过马达加斯加岛东部沿岸，但对最初迁入的印度尼西亚人实际定居的地点问题却仍有争论。达尔发现，马达加斯加语表示罗盘点的名称与印度尼西亚语有关的词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必须将马达加斯加语的罗盘方向转动九十度才能使两种语言的有关词汇吻合起来。因此，在曼詹语中“巴拉特”（barat）表示“西”,“提莫尔”(timor)表示“东”，而马达加斯加语相应的词“阿瓦拉特拉”（avaratra）和“阿斯提莫”(atsimo)分别表示“北”和“南”。如果考虑到航海的人们总是根据风向来确定方位的，那么这种差别就容易解释了。因为给马达加斯加岛西北部沿海带来雷暴的北风正相当于印度尼西亚的潮湿的西风；而吹向马达加斯加的干燥的南风又是与印度尼西亚来自东边的干燥的信风一样的。达尔的解释只适用于马达加斯加岛西北沿海地区，他认为第一批移民就是在这里登陆的。埃贝尔则认为，这一富有诱惑力的设想是经不住认真推敲的。如果不是注意风向，而更多地考虑风的总的性能，（是雨季还是旱季的风），那就会明白，原始马达加斯加人把给印度尼西亚带来雨水的西风称作“巴拉特洛特”(barat laut)，就应该把给马达加斯加带来雨水的北方称为“阿瓦拉特拉”(avaratra)，对马达加斯加的东、西方位采用一致的标准。事实上，热季的雷暴和雨更多地是从东北方向来到东部沿海，或从西北方向来到西部沿海。因此，完全不能肯定马达加斯加人最初是在西北部沿海定居的[39]。

非洲和斯瓦希里移民

尽管人们对马达加斯加人起源于印度尼西亚人的种种假设进行了许多讨论，但这并没有使我们忘记非洲在马达加斯加居民形成过程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马达加斯加人的祖先是非洲人。德尚提出了两个设想来解释这种亚、非移民并存的现象：首先，非洲东部沿海地区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实行了融合；其次，印度尼西亚人从马达加斯加对邻近的大陆沿海地区进行了虏掠。肯特也看到了这种融合现象，认为印度尼西亚对非洲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后来又向马达加斯加岛进行殖民。但是由于目前没有任何有关公元八世纪以前非洲南部沿海地区（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的考古资料，因此我个人认为，上述理论只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当时，非洲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也完全有可能在科摩罗群岛或马达加斯加岛北部开始融合。 710

有些人常常重复这样一种假设：马达加斯加岛最早的居民是俾格米人。这种假设根本

[39] J.C.埃贝尔，1968 a，809-820 页；1968 b，第 159-205 页；1971 年，第 583-613 页。

无视地质和航海的知识。因为马达加斯加岛从第三纪起就与大陆分开而成为孤岛，而俾格米人并不从事航海，也没有参与开发斯瓦希里人沿海文化的工作。此外，被认为是从俾格米人中“残留”下来的那些部落，例如米凯人，身材也并不特别矮小。

在我看来，非洲血统的马达加斯加人的祖先是班图语居民。他们很可能象印度尼西亚人一样，最晚是从九世纪开始到达该岛的。但非洲移民活动可能一直继续到近代历史的初期(十六世纪)。可以设想，大部分非洲人是同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斯瓦希里人在同一时期、以同样的方式来到岛上的。

虽然印度尼西亚语在马达加斯加语的词汇中占有主要地位，但也应看到班图语对马达加斯加语的贡献。这一点有些类似于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克里奥尔语，它95%的词汇是由法语组成，但也包含有一些非洲语言的成分。班图语对马达加斯加语言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语汇和词的结构这两个方面。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所有方言都含有班图语词汇，这表明，非洲人移居到这个地方并不算是很晚，也表明非洲人对马达加斯加文化的影响是很本性的。马达加斯加语有着班图语影响的非常明显的痕迹，这种影响十分大，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因此如果不考虑到班图语可能就是马达加斯加语的基础，那便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此外，O.达尔还明确指出，马达加斯加语中的辅音词尾(印度尼西亚语的)变为元音词尾，也是由于以班图语为基础而形成的。词尾语音的变化是印度尼西亚人在班图语居民中间定居下来以后不久，班图语居民力图适应新的语言的过程中发生的。[87]

因此，不应该从印度尼西亚，而应该从马达加斯加本身寻找马达加斯加语变成一种带有元音词尾的语言的原因。

如果在印度尼西亚人到来之前，马达加斯加岛上所使用的语言是班图语，那么，马达加斯加语发生上述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班图语中，带辅音的词尾是极少数的例外，我本人在东非根本就没有见到过这类情况。使用没有辅音词尾语言的民族对另一种语言的词尾辅音发起来极为困难，至少在念没有辅助元音词尾的时候是如此。这一点，所有在马达加斯加教授过法语的人都是有切身体会的!

711

因此，我设想，由辅音词尾变为元音词尾是由于以班图语作为基础而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词尾语音的变化是印度尼西亚人在班图语居民中间定居以后不久、班图语居民力图适应新的语言的过程中出现的。这是移民进入马达加斯加后最早发生的语音变化之一。

人们很少知道马达加斯加如何成为班图语居民对外扩张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只知道有许多班图人从事航海活动，如格罗塔内尔所专门研究的索马里的巴琼人，肯尼亚的姆维塔人以及莫桑比克的古代马夸人等。但由于缺乏考古资料，很难确定这些人的活动与马达加斯加岛究竟有无关系。最近发现昂儒昂岛的语言基础与肯尼亚沿海的波科莫(塔纳河口地区)有关。科摩罗岛可能是一个中继站，新胡安岛也可能是如此，现在，捕捉海龟的渔民和单桅帆船[88]还经常在这一带出入。班图语居民可能是经由科摩罗群岛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因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马达加斯加岛过去使用的班图语与科摩罗群岛上的班图语有密切关系。马达加斯加语中存在着一些古代班图语的词汇，这一点也有助于证实上

[87] O.Ch.达尔，第113-114页。
[88] 《航海须知》，1969年，第159页。

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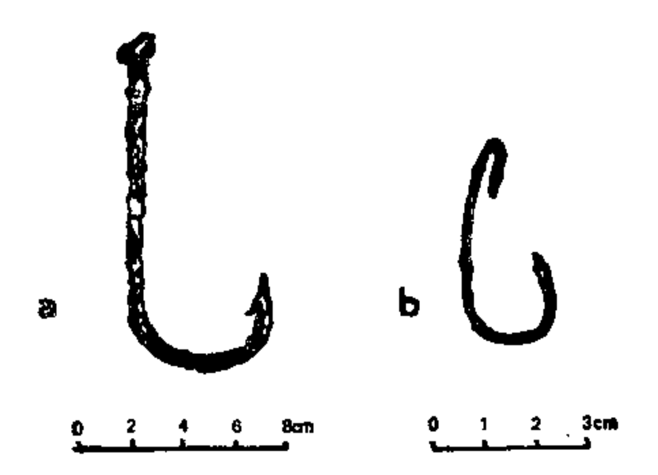


插图 28.4 塔拉基的鱼钩(十二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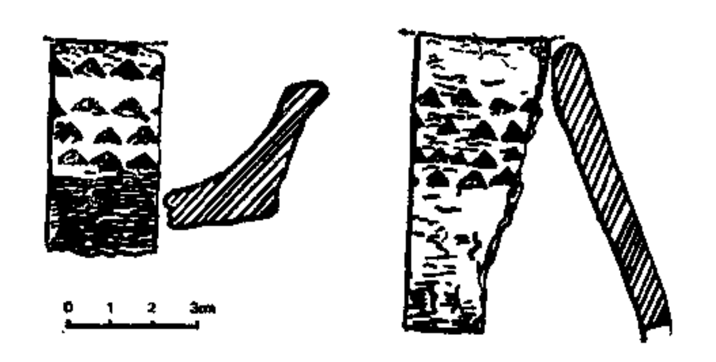


插图 28.5 金科尼和雷祖基的陶器(十五世纪)

述设想。

从伊本·巴图塔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十四世纪初，尚未完全伊斯兰化的斯瓦希里文化正处于兴旺时期。我认为，那些掌握斯瓦希里早期文化的水手们，不管他们是否已伊斯兰化，在非洲向马达加斯加移民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们还无法弄清移民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马达加斯加岛作出的贡献。但许多作者感到，马达加斯加西部和北部的居民形成情况是不一样的。梅利斯在介绍该岛西北部地区情况的著作中强调指出了沿海居民和内地居民之间的明显区别。这种区别在他们的某些葬礼中可以见到。

一些以非洲人体质占优势的居民承认他们原是来自海外，他们的风俗习惯也表现出这一点。整个西部和西北部沿海地区的维佐-安塔韦卢人就是这样。卡曾比人的墓总是建在海滩的沙丘上，他们承认与桑丹戈齐人有亲缘关系。桑丹戈齐人现居住在内地的金科尼湖附近，但他们过去并非总是住在内地，因为十七世纪初叶以来，葡萄牙人在他们绘制的地图以及他们的著作中都指出"萨兰加索人"(Sarangaco)或"桑加索人"(Sangaco)("桑丹戈齐人"的讹误)住在马兰比齐湾沿岸。不过，最近三个半世纪以来，桑丹戈齐人放弃了航海的习惯，而在早期，他们是以海为家的。或许马达加斯加中西部地区和中央高原的瓦津巴人也是如此。

居住在沿海的班图语居民从九世纪起的迁移活动，说明了非洲对马达加斯加居民形成的贡献。但我们仍然有待于解释为什么印度尼西亚语会变成当地的混合语言。毫无疑问，这些班图语居民与印度尼西亚人是有接触的，而且很可能印度尼西亚语曾经成为讲不同语言或方言的非洲移民相互沟通的一种语言。然而，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并存的现象似乎在马达加斯加继续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至少在巴利和迈因蒂拉努(马里亚诺的班巴拉)等沿海地区、在齐里比希纳(根据德鲁里的看法)和在内地的某些瓦津巴部落(根据伯克利和埃贝尔的看法)中的情况确是如此。古代瓦津巴人在经济方面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沿海的瓦津巴人是渔民；而内地的瓦津巴人则很可能用相当简陋的办法，在大自然里觅寻食物。他们采摘果子、打猎和收集蜂蜜，这就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了。德鲁里认为，齐里比希纳的瓦津巴人还在河中捕鱼。在安卡祖阿卡和安卡楚附近已经发掘出这些以采摘果子为生的居民吃剩下的许多堆积在一起的贝壳。

713

在向马达加斯加移民的初期便开始出现印度尼西亚人和非洲人在岛上同时并存的现象。到十世纪，一些居住在沿海的班图语居民大约就皈依了伊斯兰教。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穆斯林和西部及西北部沿海的居民都相信他们起源于同一个神话故事，即"穆宗比"("已消失的岛屿")的神话故事，这使我感到很惊奇。我曾用文学形式转述了我从博伊纳湾的安塔洛策人那里听到的这一神话故事。[39] 人们告诉我，卡杰姆比人和安塔洛策人的祖先瑟利马尼·塞巴尼人和通加人过去曾同住在位于非洲沿岸和科摩罗群岛之间的一个岛上。他们以经商为生，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岛上出现了亵渎神明与不和睦的现象，真主决定惩罚他们。咆哮的大海淹没了岛屿，只有几个遵守教规的人幸免于难。有些人说他们是奇迹般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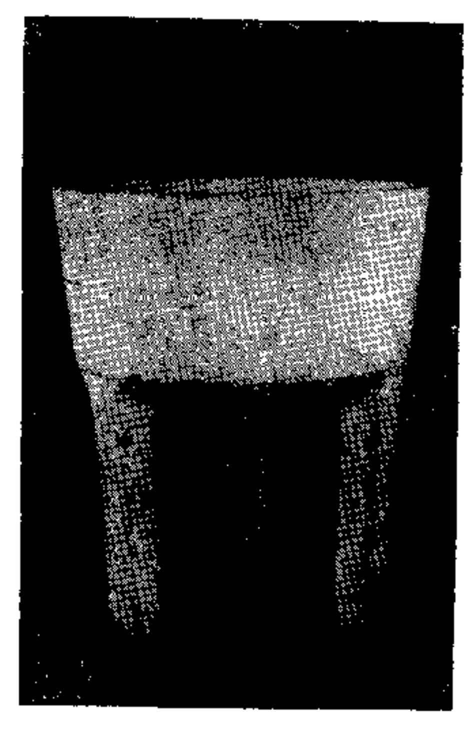
[39] P.韦兰，1970年，第256-2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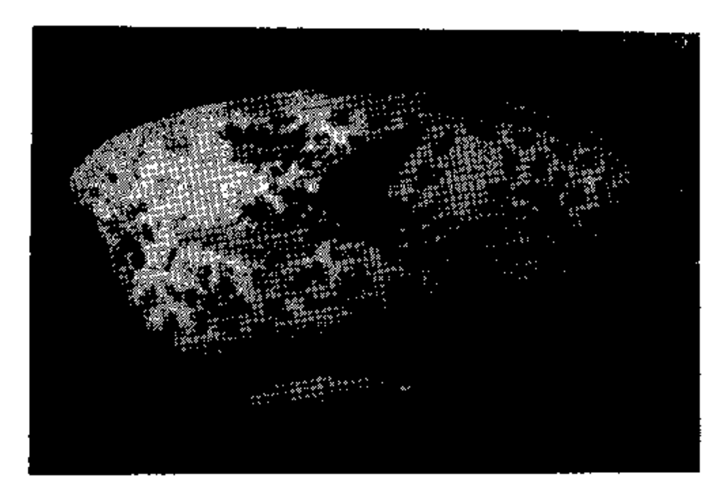
死里逃生的；而另外一些人则说是上帝派来了一条鲸把他们接走了。卡杰姆比人和安塔洛策人是这些幸存者的后裔。因此，看来穆斯林似乎真的没有试图把他们的文化强加于马达加斯加，但他们还是在非洲人向马达加斯加移民这件事上起了催化作用。

（孙慧双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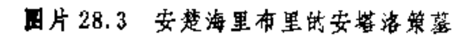
714

图片28.1　石锅，武海马尔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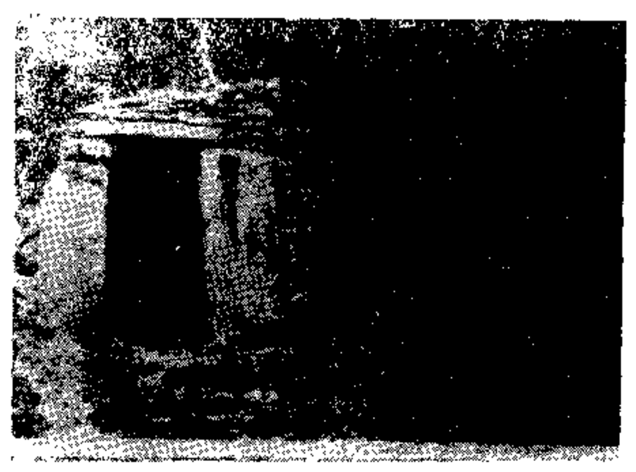


图片28.2　中国陶器，武海马尔文化



图片28.3　安楚海里布里的安塔洛策墓





图片 28.4 米安德里瓦希尼·安布希曼加(伊梅里纳)的古代屋门



图片 28.5 独木舟渔船"韦佐",印度尼西亚平衡型



图片 28.6 西南部安达瓦杜阿卡的村庄，茅草顶的小屋和最初在这里建造的小屋一样

716



图片 28.7 安布西特拉附近的水稻梯田，和菲律宾吕宋岛的梯田相似



图片 28.8 穆龙达瓦附近的马鲁武艾墓地



图片 28.9 安布希马扎拉(伊梅里纳)墓地：坟墓的"冷室"是模仿传统房屋的风格建造的



图片28.10 昂森里雕像，多凡堡附近的昂塔诺希 717



图片28 11 南部地区的泥土占卜术

718

29 早期铁器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

M. 波斯南斯基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论述了我们纪元前1000年和我们纪元第一千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区的考古情况。本章试论一下这个时期非洲历史中似曾出现过的一些主要趋势。这个时期各个领域中发生的变化都带有根本性质，经济方面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过渡到掌握了动、植物食品生产的手段；技术方面同样从主要应用石料和木材的简单技术过渡到应用多种金属和石料的复杂得多的技术。我们所见的今日非洲社会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基础：这时形成的不同语系的界限后来没有太大的变化；人口迅速增长；由于国家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日益复杂。但总的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人口和经济的许多基本方面在我们纪元第一千纪的最后250年间就已确立起来。

在论述当时出现的趋势中遇到的困难之一是考古调查的范围很不均衡。大片地区至今还没有进行考古探索，特别是在一些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多是空白点，如安哥拉、莫桑比克、扎伊尔、中非共和国、喀麦隆、达荷美、象牙海岸、马里、上沃尔特、尼日尔、塞拉利昂和马达加斯加。有的地区即使进行过一些有意义的调查研究，但也只限于局部地区，如在塞内加尔或乍得。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北非部分国家从十九世纪（例如埃及在1858年）就设立了与古代文物有关的机构，但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国家都是在获得独立、建立了国家博物馆和大学之后才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然而，近10年间发展起来的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的方法使我们对于早期铁器时代的知识大为改观，因而能够对各种经济发展的年代作出粗略的一般性结论。

采矿业

719

在这一时期中，有四种超出地方意义的矿产业已开采。开采的先后次序大致是：铜、盐、铁和金。当然，较重要的工具和武器已经用金属制作之后，石料仍继续使用。

铜

大概在我们纪元前1000-750年间，毛里塔尼亚首先开采铜矿。在该地区发现的铜制品的样式说明，铜矿的开采是由于与摩洛哥的交往而引起的。原始铜矿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得很少，但一般认为挖掘得较浅①。据我们所知，毛里塔尼亚的铜矿肯定是我们纪元

① 兰伯特(N.Lambert)，1971年，第9－21页。

年以前开采的仅有的几处铜矿。在马里和尼日尔的纽罗和塔凯达地区也有铜矿资源，这些铜矿在我们纪元1000年以后肯定还在开采，但这些铜矿最初何时发现和开采则不得而知。

阿拉伯作家和古代资料② 提供的证据说明，早在我们纪元第一千纪，在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中铜已经是一项货物，南运的铜可能换取北运的黄金。在撒哈拉西部麦克登伊贾芬发现的铜锭证明这种贸易在稍后时期（我们纪元十一或十二世纪）的重要地位。从尼日利亚东部伊格博乌库发现的遗物对于估计这一贸易的规模有极大的价值。如果这些遗物确实如发掘者瑟斯坦·肖③ 所说和韦·安达博士在本卷第二十四章中论述的那样是九世纪的东西，那就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纪元八、九世纪时，铜的贸易规模一定已经很大，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有这样大量的铜合金制品，并且估计在类似的遗址中还有更多的铜合金制品有待发现。但其他很多学者④ 不同意把这些遗物的年代定得这样早，而认为是我们纪元第二千纪开始很久后的东西。由于地质上的种种原因，非洲铜矿的分布十分集中，所以伊格博出土的大量铜器的唯一解释是进行贸易的结果。瑟斯坦·肖认为失腊铸造工艺是从北方传来的，可能起源于阿拉伯国家。除伊格博乌库能有这样大量铜器外，西非其他地区在我们纪元1000年以前极少铜器，只有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是例外，因为它们或者靠近阿克儒特铜矿，或者与西撒哈拉的商路邻近。有一个地区发掘出的铜制品的年代可以定为我们纪元第一千纪末的是塞古以北的尼日尔河谷，那里有象乌拉季和基利那样壮观的古墓。这些器物中所含的铜要不是来源于马里或尼日尔的萨赫勒地带的铜矿，就是通过贸易获得的。不幸的是，这些古墓中的大部分铜制品是在本世纪初发现的，现已下落不明，仅仅在发掘者的报告中留有引人入胜的插图。光谱分析有助于确定铜的来源，但问题在于铜合金制品，因为它们常常是用新金属和重新融化的旧金属碎块混合制成。尽管如此，最后总会找到某些可供探索的微量元素，能够说明纽罗和塔凯达的铜矿石是否在建设这些古墓的时候正在开采。 720

这个时期开采的另一个铜矿在扎伊尔的沙巴地区，该地区的桑加和卡托托已发掘出许多铜制品。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发掘者南昆⑤ 提出的文化三阶段中说，最早的一个阶段是基萨莱文化时期，以27个坟墓为代表，而其中只有两个坟墓有铜锭。这说明在我们纪元七至九世纪的基萨莱时期，虽然铜已经在开采，并用它制成装饰品，但数量不多。赞比亚北部的铜带也是在这一时期开采的，根据坎桑希⑥ 的报告，这里的采矿年代大致可上溯到我们纪元400（±90）年。但这一时期赞比亚南部的铜制品比北部多。赞比亚南部最早的少量铜制品可能从津巴布韦的锡诺亚地区和赞比亚东部的铜矿得到的。我们对上述地区的采掘方法迄今还一无所知。非洲其他地方，铜的资源十分稀少。东非的一些遗址中直到很晚才发现铜。

盐

随着农业生活方式的开始，人们对盐的需要大量增加。靠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人大

② 波斯南斯基（M.Posnansky），1971年，第110-125页。
③ 肖（T.Shaw），1970年，第503-517页。
④ 拉沃尔（B.Lawal），第1-8页；M.波斯南斯基，1973b，第309-311页。
⑤ 南昆（J.Nenquin），1957年；1963年，第27页。
⑥ 比森（M.S.Bisson），第276-292页。

概是从猎获的野兽和采集的新鲜植物食品中摄取大量所需的盐。只有在非常干旱的地区，人们得不到新鲜食物，人体经常出汗过多，盐就成为必需的补充物。在食物种类较少的社会里，例如靠农业为生的人，盐是非常需要的。撒哈拉的塔加扎和奥利勒两地的盐矿最初何时开采不得而知。根据我们纪元 750－1000 年间阿拉伯文献记载，在我们纪元第一千纪盐就是撒哈拉贸易中的一宗货物。有些地方开采盐的历史可能与开采铜的历史以及毛里塔尼亚的提希特各定居村落的形成一样悠久。铜矿区和这些村落定居生活需要盐的供应。我们对中世纪的采盐活动相当了解，将在本书以后几卷加以探讨，但对这个时期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这个时期的采矿方法可能相当简单。我们纪元前 250 年以后撒哈拉曾经历一个干燥化过程，各地的盐沉积于地表，容易得到。大概有人注意到一些干涸的湖泊、沼泽和池塘吸引着野兽。表面盐层很容易从颜色上认出来。

已知的几个早期东非采盐场是：坦桑尼亚基戈马以东的乌温扎⑦，乌干达的塞谢克，蒙博托湖畔的基比罗⑧，赞比亚的巴桑加⑨，可能还有扎伊尔的桑加⑩和赞比亚的格温贝河谷。乌温扎地区的采盐方式可能比较原始，因为在几处盐泉发现的我们纪元五至六世纪的遗物与标志第二千纪采盐方式的石砌盐水池毫无相似之处。基比罗的盐也是从盐泉得来，这里所用的熬煮和过滤等一套制盐方法可能从我们纪元第一千纪就已经有了，否则在这里采盐方法就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巴桑加的盐场早在五世纪就已使用，并且说明可能很早就用蒸发的方法制盐了，但迄今尚难确定其年代。其他地区可能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制盐，这些方法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包括在土壤含盐量高的地区，用燃烧和煮熬青草甚至山羊粪的办法，然后将这样制成的盐卤中的水分蒸发掉，并滤去其中大粒杂质。在整个铁器时代，这种采盐过程中使用的过滤器很常见，不过这种过滤器也可以用于制作其他食品，因此往往很难断定哪个过滤器是原来用于制盐的。

铁

早在中石器时代，在斯威士兰⑪就用铁矿物做颜料。很明显，自早期石器时代以来，人们就渴求得到用来文身的颜料以及用作文身颜料（后来也用于彩绘石面）的氧化铁赭石。有一块赤铁矿颜料甚至在极早期石器时代被使用工具的人带到奥杜瓦伊河流域。到晚石器时代，赞比亚、斯威士兰和开普⑫北部一些地方的锰矿⑬、镜铁矿⑭和赤铁矿已经常开采。在杜伦方丹的一些矿场进行的发掘表明，这里曾正式采掘，有巷道和工作室。从这些矿井中采掘的镜铁矿石估计达 45,000 吨，可能是讲科伊桑语的族群从我们纪元九世纪起开采的。大概就是这种采矿业的存在以及人们对金属矿及其性质的知识促进了我们纪元一至五

⑦ 萨顿(J.E.G.Sutton)和罗伯特(A.D.Roberts)，第 45－86 页。
⑧ 希尔诺(J.Hiernaux)和马克特(E.Maquet)，1968 年，第 49 页。
⑨ A.D.罗伯特，第 720 页。
⑩ 费根(B.M. Fagan)，1969 a，第 7 页。
⑪ 达尔特(R.A. Dart)和博蒙(P.B.Beaumont)，1969 a，第 127－128页。
⑫ R.A.达尔特、P.B.博蒙，1969 b，第 91－96页。
⑬ A.K.博希尔，P.B.博蒙，1972 年，第 2－12 页。
⑭ P.B.博蒙、博希尔(A.K.Boshier)，第 41－59 页。

世纪冶铁技术的迅速发展。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区，我们没有掌握这样清楚地说明开采铁矿的材料，看来，热带地区的红土层最可能是铁矿石的来源。在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河下游⑮和赞比亚的马奇利⑯则使用沼铁。这种沼铁要砸成小块，用手工挑选，然后冶炼。冈比亚河以北的塞内冈比亚巨石区似乎进行过红土的采掘(不是从地面采集)；那里的巨石本身就是巨大的红土块 将红土块用于宗教仪式的建筑和该地区在我们纪元第一千纪采铁技术的发展表明，这是朝着为冶炼而真正开采红土迈进的一小步。而大规模地熔炼红土可能是为建筑而挖掘红土这种想法的必要前提。中非共和国也有红土巨石，可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有人说非洲的炼铁技术是从本地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至今证据不足。韦·安达在本卷第二十四章中指出，与开采赤铁矿相比，挖掘红土比较容易，这可能是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之一。埋在土层下面的潮湿的红土是比较脆的，比一般岩石容易挖掘得多。可惜除了在南部非洲发现铁矿之外，在其他地区或者没有发现，或者就是发现了铁矿而没法确定其年代。在扎伊尔东北部和乌干达用赤铁矿制成的韦莱石斧可能属于铁器时代，是用赤铁矿效仿锻铁制成的。

金

在本卷论述的时期内，几乎可以肯定西非地区已开采金矿，同时还用淘盘法采集黄金。尽管这种情况在阿拉伯古籍中隐约提到，但金矿到底在哪里尚未发现，更谈不到发掘和断代，提炼黄金工艺的物证至今也未发现。这种工艺可能与以后有可靠文字记载的采金工艺⑰相类似。有根据(大多并非当时的文献记载)，证实开采金矿的两个主要地区是在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的源头附近，即在现在的几内亚和马里境内，名为班布克和布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津巴布韦东北部用浅坑面和梯段形开采法采掘金矿（菲利普森在本书第二十七章中另有论述)，但是要说这种采金活动早于我们纪元八世纪或九世纪，还缺乏无可置疑的证据。矿石好象是用舂石捣碎的。

723

从石器时代起对各种矿石进行的试验可能为后来铜和金的大规模提炼打下了基础。从发掘工作中发现了很多铜制品，因而我们能够断定以铜为原料制造工具和装饰品的年代，但属于我们纪元第一千纪的黄金却很少发现。因为黄金太贵重了，不会无人搜寻而任其泯没。如今发现的早期黄金制品只有从塞内加尔古墓中发掘出来的那些东西，其年代在第一千纪末。

石 器

几乎可以肯定，石头的开采有多种用途，最主要的是作为磨制粗细石器与制作手推磨的

⑮ 兰纳尔·德萨皮尔(O.Linares de Sapir)，第43页。
⑯ 克拉克(J.D.Clark)及B.M.费根，第354 371页。
⑰ 莱弗齐昂(N.Levtzion)，第283页。

原料。许多群体使用固定在岩石上的手推磨，人们把粮食放在露出地面的岩石上，既可以把食物晾干又可以把粮食碾碎或把植物食品捣烂。然而并不是到处都可找到这种岩石地面，因此必须寻找能够制造上下两部分磨盘所需的石料，而且往往要从很远的地方把石头运来。不幸的是，这方面的考古工作在非洲至今仍很少引起注意。今后随着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的增加和绘制出较详细的该大陆地质图，把各种奇特的岩石类型加以分类并进行岩石学分析，就将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这将有助于探索这些岩石在地质上的出处。在加纳的布罗布罗⑱曾偶尔发现几处石斧制造场，另外在该国金坦波⑲还发现一个我们纪元前一世纪的手推磨制造场。在后一个遗址的岩洞里找到大量经过局部加工的供研磨用的砥石和一些手推磨。这个岩洞基本上是人工开凿的，用大面积纵火的办法把岩石烧裂使之脱落。奇特的椭圆形石锉（又名“雪茄”）是加纳考古发掘中独具特色的一种遗物。这种石锉似乎是用一种独特的石料⑳制成的。这种石料的交易遍及广大地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广大地区常可见到一种宽约10－12厘米，长50厘米的石槽，表明人们曾在这里用粗糙的石片磨制石斧、锛斧和凿子。大概由于铁器代替了石器，所以石头的开采（即使是小规模的）、磨平、磨光以及石制毛坯或成品的交易在整个这段时期逐渐减少。但有些地区在我们纪元第二千纪仍在使用磨制石器。在东非和南部非洲磨制石器极少发现，但在西非则很常见。

在我们纪元前第一千纪，在肯尼亚，可能还在坦桑尼亚，人们用灰色带小泡的熔岩制造石碗，这种熔岩和红土一样在刚接触空气时比较容易做成各种形状。这种碗的用途不清楚；许多是在墓葬中发现的。这种碗太松软，除用来研碎柔软的植物食品外，不能用来研其他任何东西。在纳米比亚也发现过类似的石碗，但其他地方则很少发现。

另一种至今未经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存在过的活动就是寻找适于制作珠子的次宝石；其中最普通的是光玉髓和各种玉髓，如玛瑙、碧玉以及晶体石英和水晶等。用这些材料做成的珠子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发现，通常是在墓穴中，如在我们纪元前十世纪的肯尼亚恩乔罗河洞穴遗址以及一些村落遗址的墓穴中。在尼日尔的兰塔纳㉑有一个彩色石英矿，这种彩色玉石到现在还运销到尼日利亚制作珠子。一般认为这个矿的年代已很久远，但不能确定它是什么时候起开采的。石珠子虽然不多，但表明寻找名贵岩石的活动是有意识地进行的。这种珠子显然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制作，在整个铁器时代一直在制作，直到逐渐被价钱便宜的，容易制作和易于获得的由贸易贩运来的玻璃珠子取代为止。

贸　易㉒

群体之间进行某种形式的交换大概从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倘若史家们对现代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原始部落进行研究时所搜集的典型材料有指导意义的话，则古代以采集为生的人聚会时的主要活动可能是用有光泽或有使用价值的石头和蜂蜜换取肉类，有

⑱ 努诺(R.Nunoo)，第321－333页。
⑲ 拉赫兹(P.A.Rahtz)和弗莱特(C.Flight)，第1-33页。
⑳ M.波斯南斯基，1969－1970年，第20页。
㉑ 德博谢纳(G.de Beauchêne)，1970年，第63页。
㉒ 见第二十一章和M.波斯南斯基，1971年。

时甚至换取妇女。随着社会进入农业阶段，这种兼有礼仪和经济意义的交换逐渐正规起来。即使是在晚石器时代，专业化的渔民、海味采集者和猎人也必定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因而需要本地所没有的制造工具用的石头和其他材料。如需要有较高手艺才能制造的鱼叉之类的骨器也可能用来进行交易。但是，有理由断定：农业意味着过定居或随季节迁徙的生活，从而使贸易进一步发展。当时这种贸易大多规模较小而且是在当地进行的，商品种类可能包括盐、某些类型的石器，后来有铁器、珠子、贝壳，可能还有供医疗和礼仪用的植物，供农业人口食用的肉类和供畜牧业者食用的谷类与块根植物，专用器皿或供捕鱼和打猎用的毒药，还有鱼干以及各种稀缺而贵重的物品，例如外来新颖的种子、动物的爪子和牙齿、奇特的石头、骨头等等。这些可能是巫术用品，在西非市场的某些货摊上今天仍有出售。除了上面提到的磨制石器、手推磨石和盐之外，有关这种贸易的其他情况现在都不了解。 725

随着金属的出现，贸易也起了变化。铜和黄金产地有限，不象石料那样普遍，不论撒哈拉沙漠以北或东面沿印度洋地区的群体都需要这些金属。在赞比亚的我们纪元四至六世纪两处遗址卡隆杜和贡杜，和津巴布韦的戈科梅雷遗址以及非洲中部的桑加发掘出来的玛瑙贝和其他印度洋贝壳表明，这种贸易已经超出局部范围。诚然，这种贝壳往往是单个被发现的，可能被当作珍贵物品通过不同的族群辗转从沿海传到内地。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出现在那些对外部世界说来有着贵重资源的地区。在非洲中部和南部的一些遗址上发现铜锭，说明贸易日趋复杂化，而在塞内加尔古墓和桑加发现的大量遗物则说明了贸易的兴旺和财富增加促进了社会或政治结构的发展。设想这种贸易当时规模已经很大，甚至越过了撒哈拉沙漠，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贸易网已经建立起来。我们也很少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市场或集散地的证据，虽然阿拉伯文献曾提到加纳的古代首都，表明在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带来贸易繁荣之前那里可能已有市场。酋长们的住地可能被用作集散中心，从马里和塞内加尔的古墓中发现的各种遗物证明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可惜的是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只能根据少得可怜的零散资料进行推测。

在赞比亚、沙巴（扎伊尔）和津巴布韦的一些遗址上发现我们纪元 500 – 1000 年间的玻璃珠，被确认为进口物品。最近有人试图确定印度洋“贸易风”珠子的年代及来源[23]，其结果令人失望。印度洋周围地区从菲律宾到东非沿海都有这种珠子。关于最先制造这种珠子的地方，有人提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希布伦是这一地区古老的珠子制造业中心；也有人提到印度和亚历山大城。“贸易风”珠子体积小，一般是各种单色的加热空心珠。虽然我们知道印度一些工厂从九世纪就开始出口这种珠子，但哪些珠子是哪些工厂生产的不经周密分析很难确定。在伊格博乌库遗址发现 15 万多颗同类的珠子，如能断定这处遗址年代久远，那就意味着到我们纪元第一千纪后期就已存在纵贯撒哈拉沙漠的广泛的珠子贸易。 726

萨默斯[24]认为，印度洋的贸易促使津巴布韦的采金工业采用了印度的勘探和开采方法，但他的观点没有很多人支持。黄金的开采大概是在非洲东海岸的贸易影响到津巴布韦地

[23] 戴维森(C.C. Davidson)和 J.D.克拉克，第 75 – 86 页。
[24] 萨默斯(R.Summers)，第256 – 257页。

区同时或在那之前开始的。早期的采矿方法和第一千纪的黄金贸易是否与外部影响有关，现在知道的太少。本书第二十二章论述了东非沿海贸易，明确指出印度洋周围地区广泛的贸易往来影响非洲。这种贸易虽然广泛，但并不甚频繁，除了沿莫桑比克境内的马佐埃河谷和拉维河谷通往津巴布韦之外，这种贸易在我们纪元1000年以前几乎没影响到非洲内陆。

非洲历史的新主题：我们纪元750－1000年的撒哈拉以南地区

根据以上八章所列举的大量材料，现在有必要看看能否就早期铁器时代末年的非洲社会状况得出某些结论。在这一时期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从狩猎和采集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因此人口必然增长，出现了定居生活、村庄和较大的社会单位。要弄清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困难的，但看来当时非洲大部分地区只有较小的村庄，这种村庄一般是由一个或几个世系的家族再加一些有亲缘关系的氏族成员组成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一定很小，也许每平方公里只有几个人。铁器时代的到来使更多的森林地区得到开发，从而开始引起人口的迅速迁移，这之后一些群体定居下来。从同一语系分为不同语种的情况，以及从我们纪元600－1000年间在大部分地区发展起来的日益不同的陶器式样和彩绘来看，说明这些群体是互相隔绝的。根据北非现有史料以及根据人种史资料和殖民时代人口普查数字推断，估计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在我们纪元1000年以前还不到1000万。如果在过去500年里口头传说中关于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的说法(特别是在东非)可信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主要是热带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母系社会。

727

从考古发现的手工制品的分布情况来看，在西非的森林地区定居的人大概很少，只有尼日利亚南部的一些地区可能是例外。一些由于土层较薄雨量较少现在不怎么受人欢迎的地区，如乔斯高原，对当时那些技术水平低的人们似乎颇有吸引力。人烟最稠密的村落大部分在大草原的林地和称为“干旱森林”的地区。马里境内塞古和廷巴克图之间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有100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每年受河水淹浸，使本来缺水而贫瘠的地区得到了水并变得肥沃。这一地区的许多遗址表明，这里也曾经是一个受农民和牧民欢迎的地区。当时这个地区捕鱼业仍占重要地位，贸易也发展得很快。贸易之所以得到发展是由于得河流运输之便以及需要向缺少植被的地区运送烧柴、建筑用木材或草等基本用品。坦桑尼亚中部、乌干达北部和肯尼亚等比较干旱的“灌木林”地区似乎没有农民居住过的迹象；可以肯定，南非更加干旱的地区和高原地区(如莱索托)，更不会有农民居住。赞比西河、卡富埃河和尼罗河上游等沿河地带以及尼亚萨湖、维多利亚湖和基伍湖以及其他较小湖泊的部分湖滨地区，似乎都有人居住过。然而，最受欢迎的还是生物群落交错地区，即有两个或更多的生态区(森林和大草原、平原和丘陵地，等等)的食物资源可供开发的地区。西非大草原南部边缘地区和扎伊尔森林周围地区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因为在森林边缘可以慢慢地蚕食开垦，同时又可以利用森林的自然资源，如野味、包括树皮织物的木材产品和野果。森林就象能移动的边疆，新的人群慢慢地深入到森林中去，最初是为了狩猎和采

集，后来就定居下来。总的说来，我们这里所谈的主要是年降雨量600－1400毫米地区的农业居民。当然，在那些年降雨量只有150毫米的地区（如萨赫勒）也可能有畜牧业和短期的季节性农业。尽管在第一千纪初期，往南直到好望角都已经有了绵羊，那里肯定有牧民，而且在萨赫勒和苏丹地带也肯定有过牧民，但这个时期单纯靠畜牧业为生的群体已不占主要地位。所发现的家畜栏都很小。北方的农民似乎比班图区域的农民更能适应雨量小的气候，这种情况很象他们的“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并且他们在早期就能种植粟和高粱之类的作物。整个沿海地区似乎没有很多人定居过，也没有用船在海滨捕鱼的长期传统。在卡萨芒斯河沿岸和塞内冈比亚地区的其他港湾，在几内亚海岸和远至象牙海岸的咸水湖周围以及好望角附近和维多利亚湖东岸（据L. S. B. 利基的分期法属于老威尔顿文化C型），都有贝冢和鱼骨堆，在一些地方还有兽骨堆；然而这样的沿海居民一向不多，对内陆居民的影响不大。根据本书第二十二章提到的文献资料，在非洲东海岸一定有过分散的村落，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我们纪元八世纪以前，也就是越来越多的殖民者从波斯湾和（或）索马里的贝纳迪尔海岸到这里来长期定居之前的村落遗迹。 728

奇怪的是，要弄清这一时期宗教信仰的详细情况比弄清晚石器时代狩猎和采集者的宗教信仰还要困难。因为后者的岩画㉕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情况提供了许多线索。最早从事农业的人们可能曾在岩石上绘画，他们也许就是东非和中非、特别是维多利亚湖㉖周围地区和赞比亚㉗许多别具风格的艺术的创造者。对这种艺术传统何时结束我们有所了解，但始于何时却一无所知。丧葬习俗往往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达方式，死者的陪葬品在许多情况下表明人们认为死后需要这些物品。当然这不是唯一合适的解释。坟墓的规模，陪葬品的豪华及葬礼的奢侈都足以表明死者家族在政治、宗教、经济或社会等方面的地位。葬礼活动的规模也有助于我们判定主要送葬者的家族情况。然而我们要记住，不信仰宗教的社会也经常修建非常引人注目的坟墓，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有二十世纪的这类典型实例。规模宏大的坟墓或墓碑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某一个神或多个神的信仰，但肯定表明社会对未来的信心，也是统治集团或上层人物表明其延续性的一种政治姿态。然而，扎伊尔沙巴地区的基萨莱湖附近的墓地，尼日尔河中游沿岸的巨大古墓群和塞内冈比亚的巨石碑柱和坟丘，不仅是当地有人定居的证据，而且表明当时有人愿意为墓碑和（或）陪葬品付出部分财富和大量劳动。对这些现象做出充分的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进行仔细的发掘工作和出版足够的遗址考察报告。某些葬礼习俗如尸体的安放方向和墓穴排列的一致性表明信仰上已有一套规则。仅凭马里古墓的规模大概就可以说明王权制度的建立，这种王权即使不一定是神圣的，但肯定拥有最高统治者的许多权力。这样的统治者当然可以自由地或强制地（到底如何我们无法确知）在一个人口有限的地区集中大量劳力来建造象乌拉季㉘古墓那样大（直径65米、高12米）的陵墓。 729

显然，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中某种类型的国家正在出现。苏丹地带和中非卢阿拉巴

㉕ M.波斯南斯基，1972 a，第20－44页。
㉖ 查普林(J.H.Chaplin)，第1－50页。
㉗ D.W.菲利普森，1972 a。
㉘ 莫尼(R.Mauny)，1961年。

河河源周围地区是关键地区。在苏丹地带可能有三个中心地区：一个位于毛里塔尼亚南部和塞内加尔的古加纳周围地区，一个是塞古以北的尼日尔三角洲内陆，另一个是乍得湖周围地区。这些远程贸易都开始兴旺起来的地区，农业发展也可能比再往南的地区早些。关于国家是如何兴起的有好几种说法，一般的看法是以80多年前弗雷泽[29]在《金枝》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意见为依据，即王权神授说，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央集权的非洲社会的一种特征，可能是通过祈雨的巫师从古埃及传来的。因此最初的酋长们都是神化的精神领袖，他们从实行这种制度的邻近社会得到启发，其共同发源地则为埃及。后来鲍曼[30]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描述了苏丹国家的特征，再往后奥利弗[31]对此又有所发展。他们阐述的关于苏丹国家的概念有加纳和其他西非国家的目睹者写下的中世纪阿拉伯文献的支持，又为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对中非各国的记述所印证。所有这些材料都着重提到国王的神秘性，庶民对国王极其崇敬以及在国王出现过错或生病时被弑的情况。奥利弗认为骑马和使用铁制武器的战士之普遍出现对国家概念的传布，对统治阶层的形成以及对边境的控制和扩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也存在着另外一些观点。大部分非洲学者认为，传布论者的观点是不研究国家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就企图把较先进的文化因素都说成是外来的。批评这种观点的人

730 (本章作者就是其中之一)[32]认为，尽管许多非洲国家的礼仪和宗教仪式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某些实质性的差别。许多相似之处可能是后来才出现的，特别是在伊斯兰教传入非洲引起贸易发展以后出现的。国家形成的其他原因还有长途贸易和稀有矿物的开采等影响，这两点大概都是加纳兴起的因素；另外，由于在土地不太肥沃的地区为稀有资源而展开竞争，也导致国家的形成。后一种观点是卡内罗[33]对古埃及兴起的原因所提出的看法，它也完全可以适用于萨赫勒的情况。这种理论认为，一个通常具有军事技术优势的族群将牺牲弱小的邻居而扩张势力，后者便成了征服者族群的附庸。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地区也被吞并，最后，征服者族群身处少数而控制了广大地区。为了加强其威力不仅需要杰出的军事才能，还需要建立一个以上层军人集团为首的社会结构。统治集团的口头传说和礼仪会形成国家宗教，这种宗教能使统治集团的权威具有神秘性，并使之顺理成章。上层集团的首领——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征服者始祖的直系子孙，或者是始祖的再世，而具有明确的神圣性。统治者的这种神圣性并不是原来就有的，往往是慢慢地有意识造成的，但有时是偶然取得的。它是一种防御办法，用来维护首领的完美无缺的形象。

关于贸易发展导致国家诞生的说法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这种说法基本上认为贸易导致财富的增加，而财富的增加最终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财富带来庇护他人的权力和控制其他活动的能力，如矿产的开采，消费品的制造或食品的生产等等。这些活动又导致财富进一步的积聚和权力的集中。这些因素中，有些因素如在沙巴的桑加地区的财富积累和社会分化，表现得十分明显，考古学者当然能够发现。然而，比森[34]认为从桑加获得的我

---

[29] 弗雷泽(J.G.Frazer)。
[30] 鲍曼(H. Baumann)和韦斯特曼(D.Westermann)。
[31] 奥利弗(R.Oliver)和B.M.费根。
[32] M.波斯南斯基，1966 b，第1－12页。
[33] 卡内罗(R.L. Carneiro)，第733－738页。
[34] M.S.比森，第288－289页。

们纪元八世纪或九世纪的物证比这一地区出现长途贸易的时间要早。尽管当地很富，但缺少进口物品。他认为十字形的铜锭是一种通用的货币，这种货币提高了统治集团的威信和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由于统治集团擅长冶金并掌握着主要的手艺工匠，或者由于在特别有利的环境中人口增长从而对领袖有共同需要，使他们的统治地位得到公认。 731

让我们撇开假设来看一看事实。可以断言，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内，唯一存在过王国的地方是苏丹西部边境地区，那里在我们纪元700年时肯定存在过加纳王国，而且延续的时间可能长达1000年。这个王国之所以能够发展肯定是由于它掌握着贵重的矿产资源(依开采先后的大概次序排列为铜、铁和金)并控制着食盐的贸易；也可能还由于它处在农业生活方式初期发展的地区，这以提希特文化为代表。关于加纳王国的详细情况见本书下一卷；但是古加纳的发展、塞内冈比亚的巨石碑柱和塞内加尔豪华的坟墓的修建发生在同一时期，这大概不是什么巧合。它们大概是同一经济发展模式的互相关连的组成部分。

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所看到的，本文所论述的时期的结束不象在北非那样划一，然而阿拉伯人来到北非这一事实对西非和东非的大部分地区最终产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我们看到我们纪元800年时非洲大部分地区确实已处于铁器时代。在西非和中非南部地区，由于农业的发展，森林面积慢慢地缩小，人口日益增加。初期的农业革命使小规模垦殖者的数目迅速增加。这时他们大概仍在使用石器时代他们从事狩猎和采集食物的祖先曾经使用的古老而行之有效的方法获取所需的大量蛋白质。他们的狩猎工具同他们祖先所用的工具大部分相同：鱼网、骨制和角制鱼钩以及木制长矛和箭，有时也许还装有用细晶石或削尖的羚羊角或类似的天然物质制成的倒刺。在少数情况下也使用效率更高但价格昂贵的铁箭头和更便于制造的鱼钩。他们的许多神话和宗教也一定是从他们靠采集为生的祖先承袭下来的，但随着生活更加稳定，他们形成了以农业和金属制造的神秘性为基础的新的信仰。其中有些信仰大概是由传授神秘工艺的人传下来的。铁器时代的农民较前有更大的创造性，他们铸造铁锅、雕凿石鼓、编织篮子、炼铁和锻造工具。他们的宗教信仰逐渐集中在有创造力的神祇，他们的信仰体系旨在从大自然的变化无常中确保自身的安全，因为农民易受这种变化无常之害。他们的宗教礼仪和音乐大概比以前更加精细了，他们的物质文明较前更为丰富多样，他们关于传统和社会延续的观念也更加牢固地确立起来。社会发生的根本变化终于影响了以后各个时期的非洲历史。

(尤　䜣译)

结 束 语

G.莫赫塔尔

本卷试图尽可能阐明非洲古代历史的主要趋向，即在这个时期内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重要交往以及非洲各种社会和族群的状况。

本卷概括提出研究古代非洲的大纲以及研究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方针。虽然应该明确并着重指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必需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但现在看来已经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并采纳某些假设。

有关古代埃及的各章说明，在我们纪元前第三千纪以前，与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地方相比，埃及在知识、社会和物质方面都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古代埃及的文明不仅古老，独具一格，富有首创精神，而且持续了差不多3000年。这不单单是有利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而且也是努力掌握和有成效地利用这些因素的结果。毫无疑问，自然条件对埃及古代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而显著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埃及人征服环境、克服困难和解决环境所带来的问题进行的斗争，这种作用才能发挥并产生效果，使之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繁荣昌盛。

古埃及人在建立王朝以前就通过文字的发明使文明有了很大进步。文字扩大了人们交往的范围，发展了人的智力，增长了人的知识。文字的发明比古埃及人进行的任何战斗或他们所取得的任何其它成就更为重要也更有力量。文字最早出现在大约我们纪元前3200年，其发展的最后阶段——科普特语——至今还在埃及科普特教堂里使用。因此，我们可以把有将近五十个世纪丰富历史的古埃及语看作是世界各种语言中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最后我们可以说，文字的发明是埃及人在他们走向文明和繁荣的漫长道路上的重要阶段。

733

我们关于古埃及的知识，主要是由于铭文的发现和编年体的建立而获得的。这种编年体和目前应用的编年体不是同一体系，因为古埃及人是根据当时国王在位的年代来确定他们想要记载事件的日期的。但是，塞本尼托斯的历史学家曼涅托就是靠这个体系才把从美尼斯到亚历山大大帝期间的埃及统治者排列成三十个朝代。现代学者把这些朝代归纳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或帝国。

虽然埃及曾接受外来的特别来自东方的文化影响，但本卷的研究表明：埃及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非洲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埃及作为非洲的一部分，在古代又是世界文明的主要中心之一，大量的科学知识、艺术和文学发源于这个地区，特别是影响了希腊。希腊吸收了埃及法老时期到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大量文化遗产，包括数学（几何、算术等）、天文学和计时（历法）、医学、建筑学、音乐和文学（记叙文、诗歌、悲剧等）诸方面，加以发展，并向西方世界传播。古埃及文明通过希腊和腓尼基不仅同欧洲，而且也同北非甚至印度次大陆发生联系。

在埃及的居民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它至今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深入研究的课题。希望随着体质人类学这套方法的巨大进步，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对这一课题得出明确的结论。

根据本卷提到的历史记载，努比亚从上古时代起一直同埃及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由以下各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自然因素，特别是相似的地理特征，尤其是努比亚和上埃及最南端之间相似的地理特征；还有历史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本身就很重要，而且由于自然方面的因素而大大加强了其重要性；再就是反映在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社会因素。因此自从埃及第一个王朝开始，经过古王国时代，埃及人一直十分注意努比亚北部地区，把这个地区看作是他们自己国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同努比亚人不断进行贸易，开发努比亚的自然资源，而当发觉努比亚人要反抗的时候，他们就派军队去平息。由奥尼、梅库、萨卜尼和库孚菲赫(哈库夫)这些最早的旅行家和探险家先驱们率领的古王国的考察队曾深入撒哈拉，可能到过中部非洲。

埃及人对努比亚的兴趣尤其表现在大量建设神庙方面，这些神庙除了是宗教中心以外，还有意显示埃及的文明和强大，以及埃及国王的伟大和神圣。这种兴趣的主要原因就是努比亚自从远古以来一直是地中海和非洲腹地之间的贸易通道。因此，努比亚还保留着许多法老和罗马时期为保护贸易和确保这个地区和平而建筑的堡垒遗迹。 734

不过，自从史前时代以来，努比亚就已形成一个地理和社会单位。有史以来，那里就住着和尼罗河流域北部具有同一文化的居民。但是，大约从我们纪元前3200年开始，埃及人开始在文化方面超过他们的南方邻国，向文明阔步前进，而努比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停留在史前时期的水平。到我们纪元前第二千纪前半期，一个丰富多采和欣欣向荣的文明所谓凯尔迈文化在努比亚昌盛起来。凯尔迈文化虽然受到埃及文化很大的影响，但具有它自己的地方特色。然而，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初埃及势力逐步衰落以后，一个以纳帕塔为首都的本地君主国开始建立起来，它后来统治了埃及本土。努比亚在埃及第七个时期(第二十五王朝的初期)的50年统治，实现了埃及和努比亚的联合。如同古典作家们所描绘的，这个伟大非洲强国的辉煌业绩是杰出的。

努比亚迁都麦罗埃以后，经历了一个进步与繁荣昌盛的时期，并同它的邻国恢复了联系，差不多持续到九世纪为止。关于麦罗埃王国向西部和南部的扩张，它在传播自己的思想和技术以及它对东西方交流的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在研究和讨论之中。而且，就是在本卷出版之后，还应该鼓励人们努力弄懂麦罗埃文字。现存的九百件文献资料将揭示许多方面的情况。它也可以成为同法老语并行的另一种有用的纯属非洲的古典语言。

我们纪元四世纪以来，基督教开始传到努比亚，在那里神庙改成了教堂。信奉基督教的努比亚所起的作用也很大，它取得无数成就，对邻国有显著的影响。

信奉基督教的努比亚的黄金时代在八世纪，那时它处于初步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努比亚一直在基督教国王的统治之下，直到伊斯兰教传遍全国。从那时起，它开始受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冲击，极大地丧失了它的传统特点。

努比亚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作为中部非洲和地中海之间的媒介，曾经起过特殊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作用。纳帕塔王国、麦罗埃帝国和基督教王国都表明努比亚是沟通南北的

735 纽，文化、技术和物资通过这里再经过周围地区输往他方。经过坚持不懈的研究我们将会发现埃及－努比亚文明在非洲起了类似希腊－罗马文明在欧洲所起的作用。

最近当埃及计划要在阿斯旺修筑水坝的时候，又引起人们对古努比亚历史的兴趣。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修筑高水坝意味着要淹没努比亚地区的16座庙宇、所有的大小教堂、陵墓、石碑以及其它历史遗址。这些历史古迹中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受到损坏。根据埃及和苏丹的请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59年呼吁所有国家、组织以及善良的人们在技术、科学和财政方面提供帮助以抢救努比亚古迹。于是立即掀起一场成功的国际性运动，从而使大部分代表着千百年历史的，对了解古代文化起关键作用的努比亚古迹得以保存下来。

在凯尔迈遗址(那里的葬礼习俗和加纳相同)周围和栋古拉地区，特别是在西南部绿洲作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某些古代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并且有可能发现尼罗河流域和非洲内地之间在文化联系方面的其它环节。无论如何，它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象哈库夫这样一些古代帝国的探险家们所走过的路线。

埃塞俄比亚虽然一开始就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但还是建立了一个文化单位，可以看出来，它的核心是从阿拉伯半岛南部来的。阿克苏姆以前第二个时期的资料表明，那里存在着一种吸收了外国文化影响的本土文化。

从我们纪元一世纪开始延续了大约1000年的阿克苏姆王国，在文化上采取一种完全不同于阿克苏姆以前时期的独特形式。阿克苏姆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一样都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这是一种非洲的文明，是由非洲人民创造出来的，尽管在阿克苏姆以前第二个时期的陶器中可以找到某些麦罗埃影响的痕迹。

在二世纪和三世纪期间，麦罗埃的影响在埃塞俄比亚占绝对优势。新近发现的镌有埃及安开(生命的象征)的阿克苏姆石碑以及和哈索、普塔、荷拉斯诸神有关的文物，还有刻着圣甲虫的宝石，都说明埃及麦罗埃宗教对阿克苏姆信仰的影响。

阿克苏姆王国是一个位于罗马世界通向印度和从阿拉伯半岛通向北非道路上的重要贸易大国，也是一个伟大的传播文化的中心。到目前为止，人们只研究了阿克苏姆文化及其非洲渊源的少数几个方面，许多方面还有待于继续研究。

基督教传到埃塞俄比亚(同传到埃及和麦罗埃一样)使人民的文化和生活起了很大变736 化。基督教的作用和它在埃塞俄比亚的流传，它在那个国家内外的影响，都是令人感兴趣并值得在不久的将来深入研究的课题。

鉴于我们的史料来源有限，关于利比亚本地文化的演变及其对腓尼基文明传入的反应，必须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进一步研究之后才能获得更多的情况。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知识，我们只能认为，随着腓尼基人到达北非海岸，马格里布才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但迦太基人同撒哈拉人以及同生活在更南方的人的接触情况还不清楚。同时必须指出，北非文化的启蒙不完全受惠于腓尼基人，它主要是非洲人的文化。

腓尼基时期使马格里布纳入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中，这是因为腓尼基文化含有埃及和东方的成分并在同其他地中海国家的贸易中接受影响。尽管如此，在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王国晚期逐渐形成了一种利比亚和腓尼基特征相混合的文化。

虽然我们对于撒哈拉及其古代文化的知识很缺乏，也很不全面，但有几个论点是可以成立的。可以肯定，气候干燥并没有扼杀沙漠的生气，人类在那里继续活动着；语言和文字得到巩固；随着日益增多地使用骆驼，运输工具有了发展，使撒哈拉在马格里布和热带非洲的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撒哈拉既不是一个障碍也不是渺无人烟的区域，而是一个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地区，对它还需要进行研究，以揭示马格里布对苏丹地带持续不断的影响。马格里布穿越撒哈拉同撒哈拉以南地区进行频繁的文化交往，大大影响了非洲的历史①。

到目前为止，习惯上常常把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的起点放在我们纪元十五世纪左右②，这有两个原因，即文字资料的稀缺和历史学家主观地把非洲大陆的这一部分同古埃及和北非的那一部分武断地割裂开来。

尽管迄今所进行的研究还有空白和不完善的地方，但本卷的研究还是有助于说明，从整个大陆最广泛的各个不同领域里，有可能找出文化上的统一性。

关于古埃及语和非洲多种语言之间有亲缘关系的理论已经讨论过了。如果经过研究能肯定这一理论，那将证明非洲大陆语言上的统一性有深远的根源。各地区王室结构之相似、典礼和宇宙起源传说的关系（割礼、图腾崇拜、生机论、灵魂转世说等等）以及物质文明的近似（耕作工具是一例），都是将来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737

埃及、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和马格里布等社会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非常重要。基督教徒们以及在他们之前的犹太教徒们强加给这些地区的一神教是强大的，意义深远的，毫无疑问有利于伊斯兰教传入非洲。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业已肯定的非洲人的成就，所欠缺的是有些地区情况还不清楚，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许多不明确之点还有待澄清。

同样，要是写作第一、二卷的第三个条件得以完成，即根据卫星摄影加以分析，弄清自有史以来古代非洲的道路网并确定同时期已垦殖地区的范围，那将大大扩充和加深我们对于这个时期大陆内地的文化和贸易关系以及土地占用程度方面的知识。

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种族名和地名应有可能确定从大陆一端到另一端人类迁徙的情况和明确的种族关系。

我们希望本卷的问世将促进非洲国家更加关心非洲的考古工作并给予更多的帮助。

（尤　勰译）

① 见M.波斯南斯基教授写的第二十九章：《早期铁器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该章论及本书后十章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结论。

② 英语非洲和法语非洲的某些著述家都很注意十五世纪以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下列日期是参加该委员会的日期

J.F.A.阿贾伊(J.F.A.Ajayi)教授
(尼日利亚)，自 1971 年起
第六卷编辑

F.A.阿尔布凯克·莫朗(F.A.Albuquerque Mourao)
(巴西)，自 1975 年起

A.A.博亨(A.A.Boahen)教授
(加纳)，自 1971 年起
第七卷编辑

布布·阿马(H.E.Boubou Hama)阁下
(尼日尔)，1971－1978年

M.布尔夫人(Mrs M.Bull)阁下
(赞比亚)，自 1971 年起

D.查奈瓦(D.Chanaiwa)教授
(津巴布韦)，自 1975 年起

P.D.柯廷(P.D.Curtin)教授
(美国)，自 1975 年起

J.德维斯(J. Devisse)教授
(法国)，自 1971 年起

M.迪富伊拉(M.Difuila)教授
(安哥拉)，自 1978 年起

H.贾伊特(H.Djait)教授
(突尼斯)，自 1975 年起

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教授
(塞内加尔)，自 1971 年起

J.D.费奇 (J.D.Fage)教授
(联合王国)，自 1971 年起

M.法西(M.El Fasi)阁下
(摩洛哥)，自 1971 年起
第三卷编辑

J.L.佛朗哥(J.L.Franco)教授
(古巴)，自 1971 年起

M.H.I.加拉勒(M.H.I.Galaal)先生
(索马里)，自 1971 年起

V.L.格罗塔内利(V.L.Grottanelli)博士，教授
(意大利)，自 1971 年起

E.哈贝兰德(E.Haberland)教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 1971 年起

A.哈普特(A.Habte)博士
(埃塞俄比亚)，自 1971 年起

阿马杜·哈姆帕特·巴 (Amadou Hampate Ba)阁下
(马里)，1971－1978年

I.S.哈雷尔(I.S.El-Hareir)博士
(利比亚)，自 1978 年起

I.赫尔贝克(I.Hrbek)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自 1971 年起

A.琼斯(A.Jones)博士
(利比里亚)，自 1971 年起

阿贝·亚历克西·卡加梅 (Abbe Alexis Kagame)
(卢旺达)，自 1971 年起

I.M.基曼博(I.M.Kimanbo)教授
(坦桑尼亚)，自 1971 年起

J.基－泽博(J.Ki-Zerbo)教授
(上沃尔特)，自 1971 年起
第一卷编辑

M.D.拉亚(M.D.Laya)
(尼日尔)，自 1979 年起

A.列特涅夫(A.Letnev)博士
(苏联)，自 1971 年起

G.莫赫塔尔(G. Mokhtar)博士
(埃及)，自 1971 年起
第二卷编辑

P.马蒂布瓦(P.Mutibwa)教授
(乌干达)，自 1975 年起

D.T.尼昂(D.T.Niane)教授
(塞内加尔)，自 1971 年起
第四卷编辑

L.D.恩康科(L.D.Ngcongco)教授
(博茨瓦纳)，自1971年起

T.奥邦加(T.Obenga)教授
(刚果人民共和国)，自1975年起

B.A.奥戈特(B.A.Ogot)教授
(肯尼亚)，自1971年起
第五卷编辑

C.拉沃雅纳哈里(C.Ravoajanahry)教授
(马达加斯加)，自1971年起

W.罗德尼(W.Rodney)先生
(圭亚那)，自1979年起(已故)

M.希贝卡(M.Shibeika)教授
(苏丹)，1971－1980年(已故)

Y.A.塔利布(Y.A.Talib)教授
(新加坡)，自1975年起

A.特谢拉・达莫塔(A.Teixeira da Mota)教授
(葡萄牙)，自1978年起

T.齐邦古(T.Tshibangu)主任
(扎伊尔)，自1971年起

J.旺西纳(J.Vansina)教授
(比利时)，自1971年起

E.威廉斯(E.Williams)博士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6－1978年

A.A.马兹鲁伊(A.A.Mazrui)教授
(肯尼亚)
第八卷编辑，非委员会成员

国际科学委员会秘书处

M.格莱莱(M.Glele)先生
教科文组织文化研究处，法国巴黎米奥利斯街
(1 rue Mioll[illegible]75015

作者简历

导　　言　G. 莫赫塔尔（埃及）；考古学家；曾发表大量关于古埃及历史的著作；前古文物处处长。

第 一 章　谢赫·安塔·迪奥普（塞内加尔）；人文学家；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洲和人类起源的著作与文章；达卡尔大学放射性碳研究室主任。

第 二 章　A. 阿布·巴克尔（埃及）；埃及与努比亚古代史专家；有许多关于古埃及的著作；开罗大学教授；已故。

第 三 章　J. 约约泰（法国）；埃及学家；有许多关于埃及学的著作；实习高级研究学校研究室主任。

第 四 章　A. H. 扎耶德（埃及）；埃及学及古代史学家；发表了许多关于古埃及的著作与文章；古代史教授。

第 五 章　R. 纳杜里（埃及）；古代史学家；发表过许多关于马格里布与埃及历史的著作和文章；古代史教授；亚历山大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第 六 章　H. 里亚德（埃及）；历史和考古学家；有许多关于腓尼基和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开罗博物馆馆长。

第 七 章　S. 多纳多尼（意大利）；古埃及史学家；有多种关于文化史的著作；罗马大学教授。

第 八 章　S. 亚当（埃及）；埃及历史和考古学家；有许多关于古埃及的著作；古埃及文献编辑和研究中心主任。

第 九 章　N. M. 谢里夫（苏丹）；考古学家；有许多关于苏丹考古的著作；喀土穆国家博物馆馆长。

第 十 章　J. 勒克朗（法国）；埃及学家；发表过许多关于古埃及的著作和文章；索邦大学教授；法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第十一章　A. A. 哈克姆（苏丹）；古代史专家，有许多关于古苏丹的著作；喀土穆大学历史系主任。

第十二章　K. 米哈洛夫斯基（波兰）；地中海考古学专家；有许多关于古埃及艺术的著作；考古学教授；华沙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第十三章　H. 德孔唐松（法国）；非洲史学家；有关于埃塞俄比亚考古学和基督教努比亚的著作；在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工作。

第十四章　F. 安弗雷（法国）；考古学家；曾发表很多关于埃塞俄比亚考古研究的文章；法国赴埃塞俄比亚考古队队长。

第十五章　Y. M. 科比沙诺夫（苏联）；历史学家；曾发表许多关于非洲人类学的文章；苏联科学院院士。

第十六章　特克勒·査迪克·梅库里阿（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作家；埃塞俄比亚自起源至二十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史专家；已退休。

第十七章　J. 德桑热（法国）；非洲古代史学家；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洲古代史的著作和文章；南特大学讲师。

第十八章　B. H. 沃明顿（联合王国）；古罗马史学家；有多种关于北非的著作；古代史讲师。

第十九章 A. 马哈朱比（突尼斯）；北非古代史学家：有许多关于突尼斯考古的著作与文章；突尼斯大学副教授。

P. 萨拉马（阿尔及利亚）；考古学家；马格里布古代制度史专家；阿尔及尔大学教授。

第二十章 P. 萨拉马。

第二十一章 M. 波斯南斯基（联合王国）；历史和考古学家；有多种关于东非考古史的重要著作。

第二十二章 A. M. H. 谢里夫（坦桑尼亚）；东非奴隶贸易史专家；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讲师。

第二十三章 J. E. G. 萨顿（联合王国）；史前史专家；有许多关于非史历史的著作和文章；牛津大学考古系前系主任。

第二十四章 B. 韦·安达（尼日利亚）；考古学家；著有西非考古学著作；伊巴丹大学讲师。

第二十五章 F. 范诺敦（比利时）；史前史和考古学专家；有许多关于中非史前史的著作；皇家史前史和考古学博物馆馆长。

第二十六章 J. E. 帕金顿（联合王国）；考古学家；有南非史前史的著作；考古学教授。

第二十七章 D. W. 菲利普森（联合王国）；考古学家；有关于东非和南非的考古著作。

第二十八章 P. 韦兰（法国）；历史和考古学家；有许多关于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洋文化的著作；从事研究马达加斯加的工作。

第二十九章 M. 波斯南斯基。

结束语 G. 莫赫塔尔。

参考文献目录

本书出版者谨指出，尽管参考书目已力求准确无误，但由于本著作的复杂性和国际性，错误在所难免。

Abbreviations and List of Periodicals

ÄA *Ägyptologische Abhandlung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A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Washington, DC
AAW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AB *Africana Bulletin*, Warsaw University, Warsaw
ACPM *Annals of the Cape Provincial Museums*, Grahamstown
Actas VIII Congr. Intern. Archeo. Crist. *Actas del VII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Barcelona, 1972
Actes Coll. Bamako I *Actes du 1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Bamako Organisé par la Fondation SCOA pour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n Afrique Noire* (Projet Boucle du Niger), Baomako, 27 Jan.–1 Feb. 1975 1 February 1975
Actes Coll. Intern. Biolog. Pop. Sahar.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Biologie des Populations Sahariennes*, Algiers, 1969
Actes Coll. Intern. Fer.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Le Fer à travers les âges, Nancy, 3–6 October 1956, Annales de l'Est, Mém. no. 16, Nancy, 1956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Actes du 1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Archéologie Africaine*, Fort Lamy, 11–16 December 1966, Études et documents tchadiens, Mém. no. 1, Fort Lamy, 1969
Actes 7e Coll. Intern. Hist. Marit. *Actes du 7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Lourenço Marques, 1962), published 1964, Paris, SEVPEN
Actes 8e Coll. Intern. Hist. Marit. *Actes du 8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Beirut, 1966), published 1970, Paris, SEVPEN
Actes Coll. Nubiol. Intern. *Actes du Colloque Nubiologique International au Musée National de Varsovie*, Warsaw, 1972
Actes Conf. Ann. Soc. Phil. Soudan *Actes de la Conférence Annuelle de la Société Philosophique du Soudan*
Actes 2e Conf. Intern. Afr. Ouest *Comptes Rendus, 2nd International West African Conference*, Bissau, 1947
Actes XIV Congr. Intern. Ét. Byz. *Actes du X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Études Byzantines*, Bucharest, 1971
Actes 2e Congr. Intern. Ét. N. Afr. *Actes du 2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Études Nord Africaines*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 Studi Nord Africani*), *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Aix-en-Provence, 1968), published Gap, Ophrys, 1970
Acts III Cong. PPQS *Acts of the Third Pan-African Congress of Prehistory and Quaternary Study*, Lusaka, 1955
Acts IV Congr. PPQS *Acts of the Fourth Pan-African Congress of Prehistory and Quarternary Study*, Leopoldville, 1959, *AMRAC* 40
Acts VI Congr. PPQS *Acts of the Sixth Pan-African Congress of Prehistory and Quaternary Study*, Dakar, 1967, Chambéry, Impr. réunies
Acts VII Congr. PPQS *Acts of the Seventh Pan-African Congress of Prehistory and Quaternary Study*, Addis Ababa, 1971
AE *Annales d'Éthiopie*, Paris, Institut Éthiopien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Section d'Archeologie
AEPHE *Annuaire de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IVe section (Section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Paris
AFLSD *Annuale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de Dakar, Hamburg*
ÄFU *Ägyptologische Forschungen* (ed. A. Scharff), Glückstadt, Hamburg, New York
AHS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re (became *IJAHS* in 1972)
AI *Africana Italiana*, Rome
AIESEE *Revue des É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Academia Republicii Populare Romîn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É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Bucharest

AJ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journal of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Boston, Mass.
AKM *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Deutsche Morgenkindlische Gesellschaft, Leipzig
Akten XI Intern. Limeskong. *Akten des XI Internationalen Limeskongresses*, Budapest, Akademia Kiado, 1976
ALOS *Annual of the Leeds Orient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Leeds
ALS *African Language Studie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AMRAC *Annales du Museé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Series in 8°, Sciences humaines, Tervuren, Belgium
Ann. Afr. *Annuair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Centre d'Etudes Nord-Africaines; 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Afrique Méditerranéene; 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Etudes sur les Sociétés Méditerranéennes)
Annale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Paris
Ant. Afr. *Antiquités, Africaine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Antananarivo *Antananarivo*, Annual, Tananarive
Anthropologie *Anthropologie*, Paris
Antiquity *Antiquity*, Gloucester
AQ *African Quarterly*, New Delhi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Boston, Mass.
Archaeometry *Archaeometry*, Research laboratory of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Art, Oxford
ARSC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N.S., Brussels
AS *African Studies*
ASAE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Égypte*, Cairo
ASAM *Annals of the South African Museum*
Asian Perspectives *Asian Perspectives*, Far Eastern Prehistory Association, Hong Kong
ASR *African Social Research*
AT *L'Agronomie Tropicale*, Nogent-sur-Marne
Atti IV Congr. Intern. Stud. Et. *Atti del IV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 Studi Etiopici*, Rome, 10–15 April 1972, Rome,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AUEI . *Avhandlinger Utgitt av. Egede Instituttet*, Oslo, Egede Instituttet
Azania *Azania*,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E. Africa, Nairobi
BAA *Bulletin d'Archéologie Algérienne*, Algiers
BAM *Bulletin de l'Académie Malgache*, Tananarive
BA Maroc. *Bulletin d'archéologie marocaine*, Casablanca
BHM *Bulletin of Historical Metallurgy*
BIFAN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later re-named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 Dakar
BIFAO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Cairo
BM *Bulletin de Madagascar*, Tananarive
BO *Bibliotheca Orientalis*, Leyden, Neth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Bonner Jahrbücher *Bonner Jahrbücher*, Verein von Alterthumsfreunden im Rheinlande, Bonn
BS *Bulletin Scientifique*, Ministère de la France d'Outre-Mer, Direction de l'agriculture
BSAC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rchéologie Classique*
BSA Copt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rchéologie Copte* (Jam'iyat al-Athar al Q'ibtiyah), Cairo
BSF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gyptologie*, Paris
BSHNA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Naturelle de l'Afrique du Nord*
BSNAF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Paris
BSNG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Neuchâteloise de Géographie*, Neuchâtel
BSPF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ehistorique Française*, Paris
BSPPG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et Protohistorique Gabonaise*, Libreville
BSRA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Archéologie*
BWS 56 *Burg Wartenstein Symposium no. 56 on the origin of African domesticated plants*, 19–27 August 1972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Leipzig
Byzantinoslavica *Byzantinoslavica*, Prague
Byzantion *Byzantion*, Brussels
CA *Current Anthropology*, Chicago
CAMAP *Travaux du Centre d'Archéologie Mediterranéenne de l'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ed. K. Michalowski), Warsaw

CC *Corsi di Cultura sull'Arte Ravennate e Bizantina*, Ravenna 1965
CEA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Paris, Mouton
Chronique d'Égypte *Chronique d'Égypte*, Fondation Égyptologique de la Reine Élizabeth, Brussels
Cimbebasia *Cimbebasia*, State Museum, Windhoek
CM *Civilisation Malgache*, Tananarive, Université de Madagascar,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CQ *Classical Quarterly*, London
C-RAI *Compte-Rendu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Pairs, Klincksieck
C-RGLCS *Compte-Rendu des Séances du Groupe Linguistique d'Études Chamito-Sémitique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Sorbonne, Paris
C-RSB *Compt-Rendu Sommaire des Séances de la Société de Biogéographie*, Paris
CSA *Cahiers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 Paris
CSSH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The Hague
CTL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The Hague
DAE *Deutsche Axum Expedition*, Berlin
EAGR *East African Geographical Review*, Kampala
EEFEM *Egypt Exploration Fund Memoirs*, London, Trübner & Co.
E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ondon, New York, CUP
Encyclopédie berbère *Encyclopédie berbèr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et de Préhistoire des Pays de la Mediterranée occidentale*, Aix-en-Provence
Gazette des Beaux Arts *Gazette des Beaux Arts*, Paris
G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GNQ *Ghana Notes and Queries*, Legon
HAS *Harvard African Stud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BZAK *Hamburger Beiträger zur Afrika-Kunde*,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Afrika Forschung, Hamburg
Hesperis *Hespe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Marocaines, Rabat
Homo *Homo*, University of Toulouse
HZ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Munich
IJA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New York (formerly *AHS*)
JA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JAH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CUP
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ew Haven, Conn.
JASA *Journal of African Science Association*, Paris
JAR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Boston, Mass.
JCH *Journal of Classical History*, London
JEA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London
JHSN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badan
JGS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Corning, NY
JRAI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JR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Roman Studies, London
JS *Le Journal des Savants*, Paris
JSA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fricanistes*, Paris
JSAIMM *Journal of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Johannesburg
JTG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Singapore
Karthago *Karthago*, Revue d'Archéologie africaine, Tunisia
Kush *Kush*, Journal of the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s, Khartoum
LAAA *Liverpool Annals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Liverpool
Lammergeyer *Lammergeyer*,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Parks Game and Fish Preservation Board, Pietermaritzburg
Latomus *Latomus*, Brussels
Libyca *Libyca*, Bulletin of the Service d'Antiquités of Algeria, Direction de l'Intérieur et des Beaux Arts, Algiers
MADP *Malawi Antiquities Department Publications*, Zomba
MAGW *Mitteilungen der Anthropologischen Gesellschaft in Wien*
MAI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Wiesbaden, Harvasowitz
Man *Man*, New York
Mém. CRAPE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Préhistoriques et Ethnographiques*, Institut Français des Sciences Humaines en Algérie
MEJ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DC
MIOD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MN *Meroitic Newsletter*
Le Muséon *Le Muséon, Revue d'Etudes Orientales*, Louvain
NA *Notes Africaines*, Bulletin d'Information de l'IFAN, Dakar (See *BIFAN* above)
NADA *The Rhodesian Native Affairs Department Annual*, Salisbury
NAS *Nigerian Archaeology Seminar*, 3–5 July 1974
Nature *Nature*, London
NKJ *Nederlands Kunsthistorisch Jaarboek*, Bussum, Van Dishoek
Numismatic Chronicle *Numismatic Chronicle*, Numismatic Society, London
OA *Opuscula Atheniensia*, Lund
Objets et Mondes *Objets et Mondes*, Musée de l'Homme, Paris
OCA *Orientalia Christiana Analecta*, Rome
Odù *Odù*, Journal of Yoruba and Related Studies, Western Region Literature Committee, Nigeria
OL *Oceanic Linguistic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 Illinois
OPNM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National Museums of Southern Rhodesia*, Bulawayo
Optima *Optima*, Johannesburg
Oriens Antiquus *Oriens Antiquus*, Centro per le Antichità e la Storia dell' Arte del Vicino Oriente, Rome
Orientalia *Orientalia*, Amsterdam
PA *Problème de Ägyptologie*, Leiden
Paideuma *Paideuma, Mitteilungen zur Kulturkunde*, Frankfurt am Main
Plaisirs équestres, Paris
Proc. PS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Cambridge
QAL *Quaderni di Archeologia della Libia*, Rome
RA *Revue Africaine, Journal des Travaux de la Société Historique Algérienne*, Algiers
RAC *Rivista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della Pontificia*, Commissione di archeologia sacra, Rome
Radiocarbon *Radiocarbon*, Annual Supplement 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New York
R. Arch. *Revue Archéologique*, Paris
R. Anth. *Revue Anthropologique*, Paris
RE *Revue d'Égyptologie*, Paris
REA *Revue des Études Anciennes*, Bordeaux
REL *Revue des Études Latines*, Paris
RESEE *Revue des études du sud-est européen*, Bucharest
RFHOM *Revue Française d'Historie d'Outre-Mer*, Paris
RH *Revue Historique*, Paris
Rhodesiana Publication of the Rhodesiana Society, Salisbury
RHR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Paris, Leroux
ROMM *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Aix-en-Provence
RRAL *Rendiconti della Reale Accademia dei Lincei*, Rome
RSE *Rassengna di Studi Etiopici*, Rome
RSO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Scuola Orientale della università di Roma*, Rome
RUB *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Brussels
SA *Scientific American*, New York
SAAAS *South Af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Johannesburg
SAAB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Cape Town
Le Saharien *Le Saharien*, Revue d'action touristique, culturelle, économique et sportive, Paris, Association de la Rahla et des Amis du Sahara
SAJ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Johannesburg
SAK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Hamburg, H. Buske Verlag
SAs *Société Asiatique*, Paris
SASAE *Supplément aux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Égypte*, Cairo
Sc. South Africa *Science South Africa*
SJ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lbuquerque, New Mexico
SLS *Society for Libyan Studies*
SM *Studi magrebini*, Naples,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SNR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Khartoum
Syria *Syria*, Revue d'art oriental et d'archéologie, Paris
TJH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TNR *Tanganyika (Tanzania) Notes and Records*, Dar es Salaam
TRSSA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outh Africa*
Trav. IRS *Travaux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Sahariennes*, University of Algiers, Algiers
Ufahamu *Ufahamu*, Journal of the African Activist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UJ *Uganda Journal*, Uganda Society, Kampala
WA *World Archaeology*, London
WAAN *West African Archaeological Newsletter*, Ibadan
WAJA *West Af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Ibadan
WZKM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Vienna
ZÄS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Osnabrück, Zeller
ZDM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Leipzig
Zephyrus *Zephyrus*, Crónica del Seminario de Arqueologia, Salamanca
ZK *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 Gotha
ZMJ *Zambia Museum Journal*, Lusaka
ZMP *Zambia Museum Papers*, Lusaka
ZZSK *Zbornik Zastite Spomenika Kulture*

Abel, A. (1972) 'L'Ethiopie et ses rapports avec l'Arabie préislamique jusqu'à l'émigration de ca. 615', *IVth CISE*. (Chap. 14)

Abraham, D. P. (1951) 'The principality of Maungure', *NADA*, 28 (Chap. 27)

Abraham, D. P. (1959) 'The Monomotapa dynasty in Southern Rhodesia', *NADA*, 36. (Chap. 27)

Abraham, D. P. (1961) 'Maramuca, an exercise in the combined use of Portuguese records and oral tradition', *JAH*, II, 2, pp. 211–25. (Chap. 27)

Abraham, D. P. (1962) 'The early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Mwene Mutapa, 850–1589', *Historians in Tropical Africa* (Salisbury: 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 (Chap. 27)

Abraham, D. P. (1964) 'The ethno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Mutapa,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J. Vansina, R. Mauny and L. V. Thomas (eds), *The Historian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Accra/Ibad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pp. 104–26. (Chap. 27)

Abu Saleh (1969)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of Egypt and som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r. B. T. Evetts and A. J. But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eprint.

Adams, W. Y. (1962a) 'Pottery kiln excavations', *Kush*, 10, pp. 62–75. (Chap. 12)

Adams, W. Y. (1962b) 'An introductory classification of Christian Nubian pottery', *Kush*, 10, pp. 245–88. (Chap. 12)

Adams, W. Y. (1964)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excavations at Meinarti 1962–3', *Kush*, 12, pp. 227–47. (Chap. 12)

Adams, W. Y. (1964a) 'Post-pharonic Nubia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y', *JEA*, 50, pp. 102–20. (Chap. 12)

Adams, W. Y. (1965a)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excavations at Meinarti 1963–4', *Kush*, 13, pp. 148–76. (Chap. 12)

Adams, W. Y. (1965b)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of the Nubian church 500–1400 AD', *JARCE*, 4, pp. 87–139. (Chap. 12)

Adams, W. Y. (1965c) 'Post-pharaonic Nubia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y II', *JEA*, 51, pp. 160–78. (Chap. 12)

Adams, W. Y. (1966a) 'The Nubian campaign: retrospect', *Mélanges offerts à K. Michalowski* (Warsaw), pp. 13–20. (Chap. 12)

Adams, W. Y. (1966b) 'Post-pharaonic Nubia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y III', *JEA*, 52, pp. 147–62. (Chap. 12)

Adams, W. Y. (1967)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Nubian cultural history', *SNR*, XLVIII, pp. 11–19. (Chap. 12)

Adams, W. Y. (1968) 'Invasion, diffusion, evolution?', *Antiquity* (Gloucester), XLII, pp. 194–215. (Chap. 12)

Adams, W. H. (1970) *Nubische Kunst* (Recklinghausen), pp. 111–23. (Chap. 12)

Adams, W. Y. and Nordström, H. A. (1963)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Nile, third season 1961–2', *Kush*, 11, pp. 10–46. (Chap. 12)

Adams, W. Y. and Verwers, C. J. (1961)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Sudanese Nubia', *Kush*, 9, pp. 7–43. (Chap. 12)

Addison, F. S. A. (1949) *Jebel Moya* (*The Wellcome Excavations in the Sudan*), 2 Vo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1)

Aeschylus, *Works*, ed. H. Weir Smyth (1922–57) (London: Heineman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

Albright, F. P. (195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South Arabia* (Baltimore). (Chap. 13)

Albright, W. F. (1973) 'The Amarna letters from Palestin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CUP), Vol. II, pt 2, ch. XX. (Chap. 2)

Aldred, C. (1952)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Egyptian Art from 3200 to 1315 BC*. Contains 3 works: *Old Kingdom Art in Ancient Egypt* (1949), *Middle Kingdom Art in Ancient Egypt 2300–1590 BC* (1950), *New Kingdom Art in Ancient Egypt during the Eighteenth Dynasty, 1590–1315 BC* (1951) (London: Tiranti). (Chap. 3)

Aldred, C. (1965) *Egypt to the End of the Old Kingdom*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5)

Aldred, C. (1968) *Akhenaten, Pharaoh of Egypt: A new study*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2)

Alexander, J. and Coursey, D. G. (1969) 'The origins of yam cultivation', in P. H. Ucko and G. W. Dimbleby (eds),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London: Duckworth), pp. 123–9. (Chap. 24)

Ali Hakem, A. M. (1972a) 'The city of Meroe and the myth of Napata. A new perspective in Meroitic archaeology', in S. Bushra (ed.), *Urbanization in the Sudan*,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the Sudan, Khartoum. (Chap. 11)

Ali Hakem, A. M. (1972b) 'Meroitic settlement of the Butana, central Sudan', in P. H. Ucko, R. Tringham and G. W. Dimbleby (eds),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pp. 639–46. (Chap. 11)

Allen, J. W. T. (1949) 'Rhapta', *TNR*, 27, pp. 52–9. (Chap. 22)

Allen, T. G. (1960)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Documents in the Oriental Institute Museum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Vol. LXXX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s 2, 3)

Almagro-Basch, A. (ed.) (1963–5) *Unesco, Spanish Committee on Nubia: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Mission* (Madrid: Dirección General de Relaciones Culturales). (Chap. 12)

Amborn, H. (1970) 'Die Problematik der Eisenverhüttung im Reiche Meroe', *Paideuma*, XVI, pp. 71–95. (Chaps 10, 11)

Amélineau, E. (1908) *Prolégomènes a l'étude de la religion égyptienne*, Vols 21, 30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Chap. 1)

Ammianus Marcellinus, *Ammien Marcellin, ou les dix-huit livres de son histoire qui nous sont restés*, tr. G. Moulines (1778), 3 Vols (Lyons: Bruyset). (Chap. 1)

Ammianus Marcellinus, *Works*, 3 Vols, tr. S. C. Rolfe (1935–40) (London: Heineman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

Andah, B. W. (1973)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of Upper-Volta', the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ap. 24)

Anfray, F. (1963) 'Une campagne de fouilles à Yeha', *AE*, 5 (February–March 1960), pp. 171–92. (Chap. 13)

Anfray, F. (1965) 'Chronique archéologique (1960–64)', *AE*, 6, pp. 3–48. (Chap. 13)

Anfray, F. (1966) 'La poterie de Matara', *RSE*, 22, pp. 1–74. (Chap. 13)

Anfray, F. (1967) 'Matara', *AE*, 7, pp. 33–97. (Chaps 13, 15)

Anfray, F. (1968) 'Aspects de l'archéologie éthiopienne', *JAH*, 9, pp. 345–66. (Chaps 13, 14)

Anfray, F. (1970) 'Matara', *Travaux de la Recherche Coordonnée sur Programme RCP 230*, fasc. 1 (Paris: CNRS), pp. 53–60. (Chap. 13)

Anfray, F. (1971) 'Les fouilles de Yeha en 1971', *Travaux de la Recherche Coordonnée sur Programme RCP 230*, fasc. 1 (Paris: CNRS), pp. 53–60. (Chap. 13)

Anfray, F. (1972a) 'Les fouilles de Yeha (mai-juin 1972)', *Travaux de la Recherche Coordonnée sur Programme RCP 230*, fasc. 3 (Paris: CNRS), pp. 57–64. (Chap. 13)

Anfray, F. (1972b) 'L'archéologie d'Axoum en 1972', *Paideuma*, XVIII, p. 71, plate VI. (Chap. 15)

Anfray, F. (1974) 'Deux villes axoumites: Adoulis et Matara', *Atti IV Congr. Intern. Stud. Et.*, pp. 752–65. (Chap. 15)

Anfray, F. and Annequin, G. (1965) 'Matara. Deuxième, troisième et quatrième campagnes de fouilles', *AE*, 6, pp. 49–86. (Chaps 13, 15)

Anfray, F., Caquot, A. and Nautin, P. (1970) 'Une nouvelle inscription grecque d'Ezana, roi d'Axoum', *JS*, pp. 260–73. (Chap. 14)

Angelis D'Ossat, G. de and Farioli, R. (1975) 'Il complesso paleocristiano de Breviglieri-Elkhadra', *QAL*, pp. 29–56. (Chap. 19)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tr. Sir J. G. Frazer (1921), 2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einemann). (Chap. 1)

Applegate, J. R. (1970) 'The Berber languages', *CTL*, VI, pp. 586–661. (Chap. 20)

Aristotle, *Works* (tr. 1926–70), 23 Vols (London: Heinemann;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

Aristotle, *The Work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J. A. Smith and W. D. Ross (eds) (1908–52), 12 Vols (Oxford: OUP). (Chap. 1)

Aristotle, *Opera*, ed. O. A. Gigon (1961–2) (Berlin: de Gruyter). (Chap. 1)

Arkell, A. J. (1949) *Early Khartoum. An Account of the Excavations of an Early Occupation Site*

Carried Out by the Sudan Government Antiquities Service 1944–1945 (Oxford: OUP). (Chap. 9)
Arkell, A. J. (1950) 'Varia Sudanica', *JEA*, 36, pp. 27–30. (Chap. 9)
Arkell, A. J. (1951) 'Meroe and India, aspects of archaeology in Britain and beyond', essays presented to O. G. S. Crawford (London). (Chap. 10)
Arkell, A. J. (1961) *A History of the Sud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21*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2nd edn revised. (Chaps 6, 9, 10, 11, 17)
Arkell, A. J. (1966) 'The iron age in the Sudan', *CA*, 7, 4, pp. 451–78. (Chap. 11)
Armstrong, R. G. (1964) *The Study of West African Languages*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Chap. 21)
Arrianus Flavius (1807)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Ancients in the Indian Ocean*, Vol. I: The Voyage of Nearchus, Vol. II: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tr. W. Vincent (1807) (London: Cadell & Davies).
Ascher, J. E. (1970) 'Graeco-Roman nautical technology and modern sailing information.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Pliny's account of the voyage to India and that of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in the light of modern knowledge'. *JTG*, 31, pp. 10–26. (Chap. 22)
Atherton, J. H. (1972) 'Excavations at Kambamai and Yagala rock shelters, Sierra Leone', *WAJA*, 2, pp. 39ff. (Chap. 24)
Auber, J. (1958) *Français, Malgaches, Bantous, Arabes, Turcs, Chinois, Canaques – Parlons-nous d'une même langue?* (Tananarive: Impr. off. Paris: Maisonneuve) (Chap. 28)
Aubreville, A. (1948) 'Étude sur les forêts de l'Afrique équatoriale française et du Cameroun', *BS*, 2, p. 131 (Chap. 24)
Aurigemma, S. (1940) 'L'elefante di Leptis Magna', *AI*, pp. 67–86. (Chap. 20)
Avery, G. (1974) 'Discussion on the age and use of tidal fish traps', *SAAB*, p. 30. (Chap. 26)
Aymard, J. (1951) *Essai sur les chasses romaines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siècle des Antonins* (Paris: Bibliothèque des E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Chap. 20)
Ayoub, M. S. (1962) 'Excavations at Germa, the capital of the Garmantes', *Sheba*, I. (Chap. 20)
Ayoub, M. S. (1967a) 'Excavations at Germa, the capital of the Garamantes', *Sheba*, II. (Chap. 20)
Ayoub, M. S. (1967b) 'The royal cemetery of Germa', *Libya Antiqua* (Tripoli), pp. 213–19. (Chap. 20)

Badawy, A. (1965) 'Le grotesque, invention égyptienne', *Gazette des beaux arts*, pp. 189–98. (Chap. 6)
Badawy, A. (1968) *A History of Egyptian Architecture (The New Kingdom): From the Eighteenth Dynasty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Dynasty 1580–1085 BC*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 11)
Bailloud, G. (1969) 'L'évolution des styles céramiques en Ennedi (Republique du Tchad)',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Fort Lamy, 1966, pp. 31–45. (Chap. 24)
Bakry, H. S. K. (1967) 'Psammetichus II and his newly-found stela at Shellae', *Oriens Antiquus*, 6, pp. 225–44. (Chap. 10)
Ball, J. (1942) *Egypt in the classical geographers* (Cairo: Government Press, Bulâq). (Chap. 6)
Balout, L. (1955) *Pré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AMG), pp. 435–57. (Chap. 17)
Balout, L. (1967) 'L'homme préhistorique et la Méditerranée occidentale', *ROMM*, Aix-en-Provence, 3. (Chap. 17)
Baradez, J. (1949) *Vue-aérienne de l'organisation romaine dans le Sud-Algérien. Fossatum Africae* (Paris: AMG). (Chaps 19, 20)
Barguet, P. (ed.) (1967) *Le Livre des Morts des anciens Egyptiens* (Paris: Editions du Cerf). (Chaps 2, 3)
Barraux, M. (1959) 'L'auge de Sima', *BAM*. n.s., XXXVII, pp. 93–9. (Chap. 28)
Barrow, J. (1801–4)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to the Interior of southern Africa in the Years 1797 and 1798*, 2 Vols (London). (Chap. 26)
Basham, A. L. (1954)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A survey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Muslims*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Chap. 22)
Basset, H. (1921) 'Les influences puniques chez les berbères', RA, 62, p. 340. (Chap. 17)
Bates, O. (1914) *The Eastern Libyans* (London: Macmillan). (Chaps 4, 17)
Bates, O. and Dunham, D. (1927) 'Excavations at Gammai', *HAS*, 8, pp. 1–122. (Chap. 11)
Baumann, H. and Westermann, D. (1962) *Les peuples et les civilisations de l'Afrique: suivi de: Les langues et l'éducation* (Paris: Payot). (Chap. 29)
Baxter, H. C. (1944) 'Pangani: the trade centre of ancient history', *TNR*, pp. 15–25. (Chap. 22)
Bayles des Hermens, R. de (1967) 'Premier aperçu du paléolothique inférieur en RCA', *Anthropologie*, 71, pp. 135–66. (Chap. 21)

Bayle des Hermens, R. de (1971) 'Quelques aspects de la préhistoire en RCA', *JAH*, XII, pp. 579–97. (Chap. 21)

Bayle des Hermens, R. de (1972a) 'Aspects de la recherche préhistorique en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Africa-Tervuren*, XVIII, 3/4, pp. 90–103. (Chap. 25)

Bayle des Hermens, R. de (1972b) 'La civilisation mégalithique de Bouar. Prospection et fouille 1962–6 par P. Vidal. Recension', *Africa-Tervuren*, XLII, 1, pp. 78–9. (Chap. 25)

Beauchêne, M. C. de (1963) 'La préhistoire du Gabon', *Objets et Mondes*, III, 1, p. 16. (Chap. 21)

Beauchêne, M. C. de (1970) 'The Lantana mine near the Rapoa/Niger confluence of Niger', *WAAN*, 12, p. 63 (Chap. 29)

Beaumont, P. B. and Boshier, A. K. (1974) 'Report on test excavations in a prehistoric pigment mine near Postmasburg, Northern Cape', *SAAB*, 29, pp. 41–59. (Chap. 29)

Beaumont, P. B. and Vogel, J. C. (1972) 'On a new radiocarbon chronology for Africa south of the Equator', *AS*, 31, pp. 66–89. (Chap. 26)

Beck, P. and Huard, P. (1969) *Tibesti, carrefour de la préhistoire saharienne* (Paris: Arthaud). (Chaps 17, 20)

Beckerath, J. von (1965) *Untersuchungen zu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er Zweiten Zwischenzeit in Ägypten* (University of Munich, Heft 23) (Glückstadt: Ägyptologische Forschungen). (Chap. 2)

Beckerath, J. von (1971) *Abriss der Geschichte des alten Agypten* (Munich: Oldenbourg). (Chap. 2)

Beek, G. W. Van (1967) 'Monuments of Axum in the light of south Arabian archaeology', *JAOS*, 87, pp. 113–22. (Chap. 14)

Beek, G. W. Van (1969) 'The rise and fall of Arabia Felix', *SA*, 221, 6, pp. 36–46. (Chap. 22)

Belkhodja, K. (1970) L'Afrique byzantine à la fin du VI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VIIe siècle', *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Aix-en-Provence), N.S., pp. 55–65. (Chap. 19)

Bell, H. I. (1948) *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 A Study in the Diffusion and Decay of Helle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6)

Bell, H. I. (1957) *Cults and Creeds in Graeco-Roman Egypt*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nd edn. (Chap. 6)

Bénabou, M. (1972) 'Proconsul et légat. Le tèmoignage de Tacite', *Ant. Afr.*, VI, pp. 61–75. (Chap. 19)

Bénabou, M. (1976) *La résistance africaine à la romanisation* (Paris: Maspero). (Chaps 17, 19)

Bernand, A. (1966) *Alexandrie la Grande* (Paris: Arthaud). (Chap. 6)

Bernand, E. (1969) *Inscriptions méroïtiques de l'Égypte gréco-romaine. Recherches sur la poésie epigrammatique des grecs en Égypt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Chap. 6)

Bernhard, F. O. (1961) 'The Ziwa ware of Inyanga', *NADA*, XXXVIII, pp. 84–92. (Chap. 27)

Bernhard, F. O. (1964) 'Notes on the pre-ruin Ziwa culture of Inyanga', *Rhodesiana*, XII. (Chap. 27)

Berthelot, A. (1931) *L'Afrique saharienne et soudanaise. Ce qu'en ont connu les Anciens* (Paris: Les Arts et le Livre). (Chap. 20)

Berthier, A. (1968) 'La sépulture du lecteur Georges à Sila', *BAA*, II, pp. 283–92. Chap. 19)

Berthier, A. and Charlier, R. (1955) *Le sanctuaire punique d'El-Hofra à Constantine* (Paris: Direction de l'Intérieur et des Beaux-Arts,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Missions Archéologiques). (Chap. 18)

Bevan, E. (1927) *A History of Egypt under the Ptolemaic Dynasty* (London: Methuen) 2nd edn. 1961. (Chap. 6)

Bieber, M. (1955) *Sculpture of the Hellenistic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 6)

Bierbrier, M. (1975) *Late New Kingdom in Egypt c. 1300–664 BC Genealogy and Chronology*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Chaps 2, 3)

Bietak, M. (1965) 'Ausgrabungen in der Sayala District', *Nubien*, Vienna, pp. 1–82. (Chap. 9)

'Bion and Nicholas of Damascus', in C. Müller (ed) *Fragmenta Historicum Graeconum*, Vol. 3, p 463; Vol 4, p. 351. (Chap. 11)

Birch, S. and Rhind, A. H. (1863) *Facsimilies of two papyri found in a tomb at Thebes*, Rhind Mathematical Papyrus, British Museum nos 10057, 10058 (London; Oberlin, USA).

Bisson, M. S. (1975) 'Copper currency in central Africa: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WA*, 6, pp. 276–92. (Chap. 29)

Blankoff, B. (1965) 'La préhistoire au Gabon', *BSPPG*, pp. 4–5 (Chap. 25)

Bloch, M. and Verin, P. (1966) 'Discovery of an apparently neolithic artefact in Madagascar', *Man*, I, pp. 240–1. (Chap. 28)

Bobo, J. and Morel, J. (1955) 'Les peintures rupestres de l'abri du Mouflon et la station préhistorique de Hamman Sidi Djeballa dans la cheffia (Est-Constantinois)', *Libyca*, 3, pp. 163–81. (Chap. 17)

Bonsma, J. C. (1970) 'Livestock production in the sub-tropical and tropical African countries', *SAJS*, 66, 5, pp 169 72. (Chap. 24)

Borchardt, L. (1938) in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38, pp. 209–15. (Chap. 2)
Borghouts, J. F. (1973) 'The evil eye of Apopis', *JEA*, 59, pp. 114–50. (Chap. 3)
Boshier, A. and Beaumont, P. (1972) 'Mining in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man', *Optima*, 22, pp. 2–12. (Chap. 29)
Boubbe, J. (1959–60) 'Découvertes récentes à Sala Colonia (Chellah)', *BSAC*, pp. 141–5 (Chap. 19)
Bourgeois, R. (1957) 'Banyarwanda et Barundi, Tombe I – ethnographie', *ARSC*, XV, pp. 536–49. (Chap. 25)
Bovill, E. W. (1968) *The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London: OUP), 2nd edn. (Chap. 21)
Bowdich, T. E. (1821) *An Essay on the Superstitions, Customs and Arts Common to the Ancient Egyptians, Abyssinians and Ashantees* (Paris: Smith). (Chap. 4)
Bowen, R. Le Baron (1957) 'The dhow sailor', *American Neptune* (Salem, Mass.), II. (Chap. 22)
Bowen, R. Le Baron and Albright, F. P. (eds) (195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South Arabia*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Brabant, H. (1965) 'Contribution odontologique à l'étude des ossements trouvés dans la nécropole protohistorique de Sanga, République du Congo', *AMRAC*, 54. (Chap. 25)
Brahimi, C. (1970) L'ibéromaurusien littoral de la région d'Alger, *Mém. CRAPE*, pp. 77. (Chap. 17)
Breasted, J. H. (1906)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5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s 2, 4, 9, 10, 11)
Breasted, J. H. (1930) *The Edwin Smith Surgical Papyrus*,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 5)
Breasted, J. H. (1951)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2nd edn fully revised. (Chap. 2)
Breccia, W. (1922) *Alexandria ad Aegyptum. A guide to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own and to its Graeco-Roman museum* (Bergamo for Alexandria Municipality). (Chap. 6)
Breton, R. (1892) *Dictionnaire Caraïbe-Français* (Leipzig: Platzmann). Reprint. (Chap. 28)
Briant, R. P. M. (1945) *L'Hébreu à Madagascar* (Tananarive: Pitot de la Beaujardière). (Chap. 28)
Briggs, L. C. (1957) 'Living tribes of the Sahara and the problem of their prehistoric origin', *Third Pan-African Congress on Prehistory, Livingstone, 1955* (London: Chatto), pp. 195–9. (Chap. 20)
Brinton, J. Y. (1942) Article in *BSRA*, 35, pp. 78–81, 163–5, and pl. XX, fig. 4. (Chap. 17)
Brothwell, D. and Shaw, T. (1971) 'A late Upper Pleistocene proto-west African negro from Nigeria', *Man*, 6, 2, pp. 221–7. (Chap. 21)
Broughton, T. R. S. (1968) *The Romanization of Africa Proconsulari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Chap. 19)
Brown, B. R. (1957) *Ptolemaic Paintings and Mosaics and the Alexandrian Style* (Cambridge, Mass.: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Chap. 6)
Brunner, H. (1957) *Altägyptische Erziehun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Chap. 3)
Brunner, H. (1964) 'Die Geburt des Gottkönigs. Studien zur Überlieferungeines altägyptischen Mythos', *ÄA*, 10. (Chap. 3)
Brunner-Traut, E. (1974) *Die Alten Ägypter: Verborgenes Leben unter Pharaonen 2-durchgegehen Aufl.* (Stuttgart: Kohlhammer), p. 272. (Chap. 3)
Brunt, P. A. (1971)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81–3. (Chap. 19)
Bücheler, F. and Riese, A. (eds) (1899) *Anthologia latina* (Leipzig), 183. (Chap. 17)
Buck, A. de (1952) *Grammaire élémentaire du moyen égyptien*, tr. B. van de Walle and J. Vergote (Leiden: Brill). (Chap. 1)
Buck, A. de (1935–61) 'The Egyptian coffin texts', *Oriental Institute of Chicago Publications*, 34, 49, 64, 67, 73, 81, 87. (Chaps 2, 3)
Budge, E. A. T. Wallis (1912) *Annals of Nubian Kings, with a Sketch of the Story of the Nubian Kingdom of Napata*, Vol. 2 of *Egyptian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hap. 11)
Budge, E. A. T. Wallis (1928a) *The Book of the Saints of the Ethiopian Church: a translation of the Ethiopic synaxarium made from Oriental Manuscripts nos. 660 and 661 in the British Museum*, 4 Vols (Cambridge: CUP). (Chap. 16)
Budge, E. A. T. Wallis (1928b) *A History of Ethiopia, Nubia and Abyssinia, according to the Hieroglyphic Inscriptions of Egypt and Nubia and the Ethiopian Chronicles* 2 Vols (London: Methuen (Chap. 16)
Budge, E. A. T. Wallis (1966) *A History of Ethiopia*, Anthropological Publications (Netherlands: Cosferhout NB), Vol. I. (Chap. 16)
Bunbury, E. H. (1959) *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among the Greeks and the Romans from the Earliest Ages to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2 Vol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nd edn. (Chap. 22)
Bushra, S. (1972) 'Urbanization in the Sudan', *Actes Conf. Ann. Soc. Phil. Soudan.* (Chap. 11)

Butzer, K. W. (1961) *Climatic Change in Arid Regions since the Pliocene* (Arid Zone Research: Unesco), 17, pp. 31–56. (Chap. 17)
Bynon, J. (1970) 'The contribution of linguistics to history in the field of Berber studies', in D. Dalby (ed.),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Africa* (London: Cass), pp. 64–77. (Chap. 20)

Cabannes, R. (1964) *Les Types hémoglobiniques des populations de la partie occidentale du continent africain (Maghrib, Sahara, Afrique noire occidentale)* (Paris: CRNS). (Chap. 20)
Callet, F. (1908) *Tantaran ny Andriana nanjake teto Imeria* (Tanaranive). (Chap. 28)
Callet, F. (1974) *Histoire des rois de Tantaran'ny Andriana*, trs G.-S. Chaput and E. Ratsimba (Tananarive: Librairie de Madagascar), Vols. 1–3. (Chap. 28)
Calza, G. (1916) 'Il Piazzale delle Corporazioni', *Boll. Comm.*, pp. 178ff. (Chap. 19)
Caminos, R. A. (1954) *Late-Egyptian Miscellanies* (London: OUP). (Chap. 3)
Caminos, R. A. (1964a) 'Surveying Semna Gharbi', *Kush*, 12, pp. 82–6. (Chap. 9)
Caminos, R. A. (1964b) 'The Nitocris adoption stela', *JEA*, 50, pp. 71–101. (Chap. 10)
Caminos, R. A. (1975) *New Kingdom Temples of Buhen*, 2 Vols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Chaps, 2, 9)
Camps, G. (1954) 'L'inscription de Béja et le problème des Dii Mauri', *RA*, 98, pp. 233–60. (Chap. 17)
Camps, G. (1960a) 'Les traces d'un âge du bronze en Afrique du Nord', *RA*, 104, pp. 31–55. (Chap. 17)
Camps, G. (1960b) 'Aux origines de la Berbérie: Massinissa ou les débuts de l'histoire', *Libyca*, 8, 1. (Chaps 17, 19, 24)
Camps, G. (1961) *Monuments et rites funéraires protohistoriques: aux origines de la Berbérie* (Paris: AMG). (Chaps 17, 20)
Camps, G. (1965) 'Le tombeau de Tin Hinan à Abalessa', *Trav. IRS*, 24, pp. 65–83. (Chaps 17, 20)
Camps, G. (1969a) 'Amekini, néolithique ancien du Hoggar', *Mém. CRAPE*, 10, pp. 186–8. (Chap. 24)
Camps, G. (1969b) 'Haratin-Ethiopiens, réflexions sur les origines des négroides sahariens', *Actes Coll. Intern. Biolog. Pop. Sahar.*, pp. 11–17. (Chap. 20)
Camps, G. (1970) '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es des cultivateurs noirs du Sahara', *ROMM*, 7, pp. 39–41. (Chap. 17)
Camps, G. (1974a) 'Le Gour, mausolée berbère du VIIe siècle', *AA*, VIII, pp. 191–208. (Chap. 19)
Camps, G. (1974b) 'Tableau chronologique de la préhistoire récente du Nord de l'Afrique', *BSPF*, 71, 1, p. 262. (Chap. 17)
Camps, G. (1974c) 'L'âge du tombeau de Tin Hinan, ancêtre des Touareg du Hoggar', *Zephyrus*, XXV, pp. 497–516. (Chap. 20)
Camps, G. (1974d) *Les civilisations préhistoriques de l'Afrique du Nord et du Sahara* (Paris: Doin. (Chaps 17, 20)
Camps, G. (1975) 'Recherches sur les plus anciennes inscriptions libyques de l'Afrique du Nord et du Sahara', *Encyclopédie berbère*, 24. (Chap. 20)
Camps, G. (1978) *Les Relations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et du monde sud-saharien durant la préhistoire et la protohistoire* (Aix-en-Provence: GERESM). (Chap. 20)
Camps, G., Delibrias, G. and Thommeret, J. (1968) 'Chronologie absolue et succession des civilisations préhistoriques dans le Nord de l'Afrique', *Libyca*, XVI, p. 16. (Chap. 17)
Camps-Fabrer, H. (1953) *L'Olivier et l'huile dans l'Afrique romaine* (Algiers: Imprimerie officielle). (Chap. 19)
Camps-Fabrer, H. (1966) *Matière et art mobilier dans la préhistoire nord-africaine et saharienne* (Paris: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Préhistoriques et Ethnographiques). (Chap. 17)
Capot-Rey, R. (1953) *Le Sahara français* (Paris: PUF). (Chap. 20)
Caquot, A. (1965) 'L'inscription éthiopienne à Marib', *AE*, VI, pp. 223–5. (Chaps 15, 16)
Caquot, A. and Drewes, A. J. (1955) 'Les monuments recueillis à Magallé (Tigré)', *AE*, I, pp. 17–41. (Chaps 13, 15)
Caquot, A. and Leclant, J. (1956) 'Rapport sur les récents travaux de la section d'archéologie', *C-RAI*, pp. 226–34. (Chap. 15)
Caquot, A. and Leclant, J. (1959) 'Ethiopie et Cyrénaique? A propos d'un texte de Synesius', *AE*, III, pp. 173–7. (Chap. 15)
Caquot, A. and Nautin, P. (1970) 'Une nouvelle inscription grecque d'Ezana, roi d'Axoum. Description et étude de l'inscription grecque', *JS*, pp. 270–1. (Chap. 15)

Carcopino, J. (1948) *Le Maroc antique* (Paris: Gallimard). **(Chaps 17, 19, 20)**
Carcopino, J. (1956) 'Encore Masties, l'empéreur maure inconnu', *RA*, pp. 339–48. **(Chap. 19)**
Carcopino, J. (1958) *La mort de Ptolémée, roi de Maurétanie* (Paris), pp. 191ff. **(Chap. 19)**
Carneiro, R. L. (1970)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69, 3947, pp. 733–8. **(Chap. 29)**
Carpenter, R. (1958) 'The Phoenicians in the west', *AJA*, LXVII. **(Chap. 15)**
Carpenter, R. (1965) 'A trans-Saharan caravan route in Herodotus', *AJA*, pp. 231–42. **(Chap. 20)**
Carter, H. and Mace, A. C. (1963) *The Tomb of Tut-Ankh-Amon Discovered by the late Earl of Caernarvon and H. Carter*, 3 Vols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Chap. 2)**
Carter, P. L. (1969) 'Moshebi's shelter: excav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eastern Lesotho', *Lesotho*, 8, pp. 1–23. **(Chap. 26)**
Carter, P. L. (1970) 'Late stone age exploitation patterns in southern Natal', *SAAB*, 25, 98, pp. 55–8. **(Chap. 26)**
Carter, P. L. and Flight, C. (1972) 'A report on the fauna from two neolithic sites in northern Ghana with evid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animal husbandry during the 2nd millennium BC', *Man*, 7, 2, pp. 277–82. **(Chap. 24)**
Carter, P. L. and Vogel, J. C. (1971) 'The dating of industrial assemblages from stratified sites in eastern Lesotho', *Man*, 9, pp. 557–70. **(Chap. 26)**
Castiglione, L. (1967) 'Abdalla Nirgi. En aval d'Abou Simbel; fouilles de sauvetage d'une ville de l'ancienne Nubie chrétienne', *Archeologia*, 18, Paris, pp. 14–19. **(Chap. 12)**
Castiglione, L. (1970) 'Diocletianus und die Blemmyes', *ZÄS*, 96, 2, pp. 90–103. **(Chap. 10)**
Caton-Thompson, G. (1929) 'The Southern Rhodesian ruins: recent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Nature*, 124, pp. 619–21. **(Chap. 27)**
Caton-Thompson, G. (1929–30) 'Recent excavations at Zimbabwe and other ruins in Rhodesia', *JRAS*, 29, pp. 132–8. **(Chaps 20, 27)**
Cenival, J. L. de (1973) *L'Égypte avant les pyramides, 4e millénaire*, Grand Palais, 29 May–3 September (Paris: Musées nationaux). **(Chap. 2)**
Černy, J. (1927) 'Le culte d'Amenophis I chez les ouvriers de la nécropole thébaine', *BIFAO*, 27, pp. 159–203. **(Chap. 2)**
Černý, J. (1942) 'Le caractère des oushebtis d'après les idées du Nouvel-Empire', *BIFAO*, 41, pp. 105–33 **(Chap. 3)**
Černý, J. (1973) *A Community of Workmen at Thebes in the Ramesside Period*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Chap. 3)**
Cerulli, E. (1943) *Etiopi in Palestina; storia della communità etiopica di Gerusalemme*, Vol. I (Rome: Libreria dello Stato). **(Chap. 16)**
Cerulli, E. (1956)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etiopica* (Milan: Nuova accademia editrice). **(Chap. 16)**
Chace, A. B. (1927–9) *The Rhind Mathematical Papyrus, British Museum, 10057 and 10058* (Oberlin). (Chap. 5)
Chaker, S. (1973) 'Libyque: épigraphie et linguistique', *Encyclopédie berbère*, 9. **(Chap. 20)**
Chamla, M. C. (1958)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sur l'origine des malgaches', *Museum*, Paris. (Chap. 28)
Chamla, M. C. (1968) 'Les populations anciennes du Sahara et des régions limitrophes. Études des restes osseux humains néolithiques et protohistoriques', *Mém. CRAPE*, IX **(Chaps 17, 20, 21)**
Chamla, M. C. (1970) 'Les hommes épipaléolithiques de Columnata (Algérie occidentale)', *Mém. CRAPE*, XV, pp. 113–14. **(Chap. 17)**
Chamoux, F. (1953) *Cyrène sous la monarchie des Battiades* (Paris: de Boccard). **(Chap. 17)**
Champetier, P. (1951) 'Les conciles africains durant la période byzantine', *RA*, pp. 103–20. **(Chap. 19)**
Champollion-Figeac, J. J. (1839) *Egypte ancienne* (Paris: Firmin Didot). **(Chap. 1)**
Chaplin, J. H. (1974) 'The prehistoric rock art of the Lake Victoria region', *Azania*, IX, pp. 1–50. (Chap. 29)
Charles-Picard, G. (1954) *Les Religions de l'Afrique antique* (Paris: Plon). **(Chap. 18)**
Charles-Picard, G. (1956) *Le Monde de Carthage* (Paris: Corrêa).
Charles-Picard, G. (1957) 'Civitas Mactaritana', *Karthago*, 8, pp. 33–9. (Chap. 17)
Charles-Picard, G. (1958a) 'Images de chars romains sur les rochers du Sahara', *C-RAI*.
Charles-Picard, G. and C. (1958b) *La Vie quotidienne à Carthage au temps d'Hannibal, IIIe siècle avant Jesus-Christ* (Paris: Hachette). **(Chap. 18)**
Charles-Picard, G. (1959) *La Civilisation de l'Afrique romaine* (Paris: Plon). **(Chap. 19)**
Charles-Picard, G. (1968) *Les Cahiers de Tunisie, Mélanges Saumagne*, pp. 27–31. **(Chap. 20)**
Charlesworth, M. P. (1926) *Trade Routes and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CUP). **(Chap. 22)**

Charlesworth, M. P. (1951) 'Roman trade with India: a resurvey', in A. C. Johnson, *Studies in Rom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Honour of Allen Chester Johnson*, ed. P. R. Coleman-Nort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22)

Chassebœuf de Volney, Count C. F. (1825) *Voyages en Egypte et en Syrie pendant les années 1783, 1784 et 1785*, 2 Vols (Paris).

Chastagnol, A. (1967) 'Les gouverneurs de Byzacène et de Tripolitaine', *AA*, 1, pp. 130–4. (Chap. 19)

Chastagnol, A. and Duval, N. (1974) 'Les survivances du culte impérial dans l'Afrique du Nord à l'époque vandale. Mélanges d'histoire ancienne offerts à W. Seston',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Étude IX, pp. 87–118. (Chap. 19)

Chevallier, R. and Caillemer, A. (1957) 'Les centuriations romaines de Tunisie', *Annales*, 2, pp. 275–86. (Chap. 19)

Chevrier, H. (1964–70 1) 'Technique de la construction dans l'ancienne Égypte': I: 'Murs en briques crues', *RE*, 16, pp. 11–17; II: 'Problèmes posés par les obélisques', *RE*, 22, pp. 15–39; III: 'Gros œuvre, maçonnerie', *RE*, 23, pp. 67–111. (Chap. 3)

Chittick, N. (1966) 'Six early coins from new Tanga', *Azania*, 1, pp. 156–7. (Chap. 22)

Chittick, N. (1969) 'A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of the southern Somali coast', *Azania*, IV, pp. 115–30. (Chap. 22)

Cintas, P. (1950) *Céramique punique* (Paris: Librairie C. Klincksieck). (Chap. 18)

Cintas, P. (1954) 'Nouvelles recherches à Utique', *Karthago*, V. (Chap. 18)

Cintas, P. and Duval, N. (1958) 'L'église du prêtre Félix, région de Kélibia', *Karthago*, IX, pp. 155–265. (Chap. 19)

Clark, J. D. (1957) 'Pre-European copper working in south central Africa', *Roan Antelope*, pp. 2–6. (Chap. 25)

Clark, J. D. (1967) 'The problem of Neolithic culture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W. W. Bishop and J. D. Clark (eds), *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601–27. (Chap. 25)

Clark, J. D. (1968) 'Some early iron age pottery from Lunda', in J. D. Clark (ed.), *Further Palaeo-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Northern Lunda* (Lisbon), pp. 189–205. (Chap. 27)

Clark, J. D. (1970) *The Prehistory of Africa*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23)

Clark, J. D. (1972) 'Prehistoric populations and pressures favouring plant domestication in Africa', *BWS* 56. (Chap. 24)

Clark, J. D (1974) 'Iron age occupation at the Kalambo Falls', in J. D. Clark (ed.), *Kalambo Falls Prehistoric Site*, Vol. II (Cambridge: CUP), pp. 57–70. (Chap. 25)

Clark, J. D. and Fagan, B. M. (1965) 'Charcoal, sands and channel-decorated pottery from northern Rhodesia', *AA*, LXVII, pp. 354–71. (Chap. 29)

Clark, J. D. and Walton, J. (1962) 'A late stone age site in the Erongo mountains, south west Africa', *Proc. PS*, 28, pp. 1–16. (Chap. 26)

Clarke, S. and Engelbach, R. (1930) *Ancient Egyptian Masonry, the Building Craft* (London: OUP). (Chap. 5)

Clavel, M. and Levêque, P. (1971) *Villes et structures urbaines dans l'Occident romain* (Paris: A. Colin), pp. 7–94. (Chap. 19)

Clemente, G. (1968) *La Notitia Dignitatum* (Cagliari: Editrice Sarda Fossataro), pp. 318–42. (Chap. 19)

Codex Theodosianus: Theodosiani Libri XVI cum constitutionibus Sirmondianis et leges novellae ad Theodosianum pertinentes, T. Mommsen and P. Meyer (eds) (1905) (Berlin: Societas Regia Scientarum). (Chap. 15)

Codine, J. (1868) *Mémoire géographique sur la Mer des Indes* (Paris: Challamel). (Chap. 28)

Cohen, D. and Maret, P. de (1974)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récentes en République du Zaïre', *Forum-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39, pp. 33–7. (Chap. 25)

Cohen, D. and Martin, P. (1972) 'Classification formelle automatique et industries lithiques; interprétation des hachereaux de la Kamoa', *AMRAC*, 76. (Chap. 21)

Cohen, D. and Mortelmans, G. (1973) 'Un site tschitolien sur le plateau des Bateké', *AMRAC*, 81. (Chap. 25)

Connah, G. (1967a) 'Excavations at Daima, N.E. Nigeria', *Actes VI Congr. PPEQ*, pp. 146–7. (Chap. 24)

Connah, G. (1967b) 'Radiocarbon dates for Daima', *JHSN*, 3 (Chap. 24)

Connah, G. (1969a) 'The coming of iron: Nok and Daima', in T. Shaw (ed.), *Lectures on Nigerian Pre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pp. 30–62 (Chap. 21)

Connah, G. (1969b) 'Settlement mounds of the Firki: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lost society', *Ibadan*, 26. (Chap. 24)

Contenson, H. de (1960) 'Les premiers rois d'Axoum d'après les découvertes récentes', *JA*, **248**, pp. 78–96. **(Chap. 13)**
Contenson, H. de (1961) 'Les principales étapes de l'Ethiopie antique', *CEA*, 2, 5, pp. 12–23. **(Chap. 13)**
Contenson, H. de (1962) 'Les monuments d'art sud-arabes découverts sur le site Haoulti (Ethiopie) en 1959', *Syria*, 39, pp. 68–83, **(Chap. 13)**
Contenson, H. de (1963a) 'Les subdivisions de l'archéologie éthiopienne. Etat de la question', *R. Arch.*, pp. 189–91. **(Chap. 13)**
Contenson, H. de (1963b) 'Les fouilles de Haoulti en 1959. Rapport préliminaire', *AE*, 5, pp. 41–86. **(Chaps 13, 15)**
Contenson, H. de (1963c) 'Les fouilles à Axoum en 1958. Rapport préliminaire', *AE*, 5, pp. 3–39. **(Chap. 15)**
Contenson, H. de (1965) 'Les fouilles à Haoulti en 1959; rapport préliminaire', *AE*, 5, pp. 45–6. **(Chap. 15)**
Contenson, H. de (1969) 'Compte-rendu bibliographique de "Annales d'Ethiopie" vol. 7', *Syria*, 46, pp. 161–7. **(Chap. 13)**
Conti-Rossini, C. (1903) 'Documenti per l'archeologia d'Eritrea nella bassa valle dei Barca', *RRAL*, 5, XII. **(Chap. 15)**
Conti-Rossini, C. (1928) *Storia di Etiopia* (Bergamo: Instituto Italiano d'Arti Grafiche). **(Chaps 13, 16)**
Conti-Rossini, C. (1947) 'Ieha, Tsehuf Enni e Dera', *RSE*, 6, pp. 12–22. **(Chap. 13)**
Conti-Rossini, C. (1947–8) 'Gad ed il dio luna in Etiopia', Studi e materali di storia delle religione (Rome). **(Chap. 15)**
Cooke, C. K. (1971) 'The rock art of Rhodesia', *SAJS*, Special Issue 2, pp. 7–10. **(Chap. 27)**
Coon, C. S. (1968) *Yengema Cave Repor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hap. 24)**
Coppens, Y. (1969) 'Les cultures protohistoriques et historiques du Djourab',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129–46. **(Chap. 24)**
Cornevin, R. (1967) *Histoire de l'Afrique*, Vol. I: *Des origines au XVIe siècle* (Paris: Payot) 2nd edn **(Chap. 20)**
Corpus inscriptionum semiticarum ab academia inscriptionum et Litterarum Humaniorum conditum atque digestum (1881–1954) (Paris: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Chap. 15)**
Cosmas Indicopleustes,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 tr. E. O. Winstedt (1909) (Cambridge: CUP). *Topographie chretienne*, tr. W. Walsca (Paris: Cerf). **(Chaps 15, 22)**
Coulbeaux, J. B. (1928) *Histoire politique et religieuse d'Abyssinie depuis les temps plus reculés jusqu'à l'avénement de Menelik II*, Vol. I (Paris: Geuthner). **(Chap. 16)**
Courtin, J. (1969) 'Le Néolithique du Borkou, Nord Tchad',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147–59. **(Chap. 24)**
Courtois, C. (1942) Article in *RA*, pp. 24–55. **(Chap. 19)**
Courtois, C. (1945) 'Grégoire VII et l'Afrique du Nord. Remarques sur les communautés chrétiennes d'Afrique du XIe siècle', *RH*, CXCV, pp. 97–122, 193–226. **(Chap. 19)**
Courtois, C. (1954) *Victor de Vita et son oeuvre* (Algiers: Impr. off.). **(Chap. 19)**
Courtois, C. (1955)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aris: AMG). **(Chaps 19, 20)**
Courtois, C., Leschi, L., Miniconi, J., Ferrat, C. and Saumagne, C. (1952) *Tablettes Albertini: Actes privés de l'époque vandale, fin du Ve siècle* (Paris: AMG). **(Chap. 19)**
Cracco-Ruggini, L. (1974) 'Leggenda e realtà Etiopi nella cultura tardoimperiale', *Attiv Congr. Intern. Stud. Et.*, 191, pp. 141–93 **(Chap. 20)**
Crowfoot, J. W. (1911) 'The island of Mero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Egypt*, Memoire no. 19, London, p. 37 **(Chap. 11)**
Crowfoot, J. W. (1927) 'Christian Nubia', *JEA*, XIII, pp. 141–50. **(Chap. 12)**
Culwick, A. I. and G. M. (1936) 'Indonesian echoes in central Tanganyika', *TNR*, 2, pp. 60–6. **(Chap. 28)**
Curto, S. (1965) *Nubia; storia di anu civittà favolosa* (Novara: Istituto geografico de Agostini). **(Chap. 11)**
Curto, S. (1966) *Nubien. Geschichte einer rätselhaften Kultur* (Munich: Goldmann). **(Chap. 9)**
Cuvillier, A. (1967) *Introduction à la sociologie* (Paris: Colin). **(Chap. 1)**

Dahl, O. Ch. (1951) 'Malgache et Maanjan, une comparaison linguistique', *AUEI*, 3, **(Chap. 28)**
Dahle, L. (1889) 'The Swahili element in the new Malagasy English dictionary', *Antananarivo*, III, pp. 99–115. **(Chap. 28)**
Dalby, D. (1970) 'Reflection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languages', *ALS*, 11, pp. 147–71. **(Chap. 21)**

Dalby, D. (1975) 'The pr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Guthrie's comparative Bantu. I. Problems of internal relationship', *JAH*, XVI, pp. 481–501. (Chap. 23)

Dalby, D. (1967) 'The pr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Guthrie's comparative Bantu. II.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vocabulary', *JAH*, XVII, pp. 1–27. (Chap. 23)

Daniels, C. M. (1968a) *Garamantian Excavations: Zinchecra 1965–1967* (Tripoli: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Chap. 20)

Daniels, C. M. (1968b) 'The Garamantes of Fezzan', in *Libya in History* (Beirut, Lebanon). (Chap. 4)

Daniels, C. M. (1970) *The Garamantes of Southern Libya* (Wisconsin: Oleander Press). (Chaps 17, 21)

Daniels, C. M. (1972–3) 'The Garamantes of Fezzan. An interim report of research, 1965–73', *SLS*, IV, pp. 35–40. (Chap. 20)

Daniels, S. G. H. and Phillipson, D. W. (1969) 'The early iron age site at Dambwa near Livingstone', in B. M. Fagan, D. W. Phillipson and S. G. H. Daniels (eds), *Iron Age Cultures in Zambia*, (London: Chatto & Windus), Vol. II, pp. 1–54 (Chap. 27)

Darby, W. J., Ghalioungui, P. and Grivetti, L. (1977) *Food: the Gift of Osiris*, 2 Vols (London/New York/San Francisco: Academic Press). (Chap. 3)

Daris, S. (1961) *Documenti per la storia dell'esercito romano in Egitto* (Milan: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Chap. 7)

Dart, R. A. and Beaumont, P. (1969a) 'Evidence of ore mining in southern Africa in the middle stone age', *CA*, 10, pp. 127–8. (Chap. 29)

Dart, R. A. and Beaumont, P. (1969b) 'Rhodesian engravers, painters and pigment miners of the fifth millennium BC', *SAAB*, 8, pp. 91–6. (Chap. 29)

Datoo, B. A. (1970a) 'Misconception about the use of monsoons by dhows in East African waters', *EAGR*, 8, pp. 1–10. (Chap. 22)

Datoo, B. A. (1970b) 'Rhapta: the location and importance of East Africa's first port', *Azania*, V, pp. 65–75. (Chaps 22, 28)

Datoo, B. A. and Sheriff, A. M. H. (1971) 'Patterns of ports and trade route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L. Berry (ed.), *Tanzania in Map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pp. 102–5. (Chap. 22)

Daumas, F. (1967) 'Ce que l'on peut entrevoir de l'histoire de Ouadi Es Sebua, Nubie', *CHE*, X, pp. 40ff. (Chap. 12)

Daumas, F. (1976) *La Civilisation de l'Égypte pharaonique* (Paris: Arthaud) 2nd edn. (Chaps 2, 12)

Davico, A. (1946) 'Ritrovamenti sud-arabici nelle zona del cascase', *RSE*, 5, pp. 1–6. (Chap. 13)

Davidson, B. (1959) *Old Africa Rediscovered* (London: Gollancz). (Chaps 4, 20)

Davidson, C. C. and Clark, J. D. (1974) 'Trade wind beads: an interim report of chemical studies', *Azania*, IX, pp. 75–86. (Chap. 29)

Davies, N. M. (1936) *Ancient Egyptian Paintings*, 3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Chap. 5)

Davies, N. M. (1958) *Picture Writing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Griffith Institute). (Chap. 5)

Davies, N. M. and Gardiner, A. H. (1926) *The Tomb of Huy, Viceroy of Nubia in the Reign of Tutankhamun*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Theban Tombs Series). (Chap. 9)

Davies, O. (1962) 'Neolithic culture in Ghana',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Panafrican Congress of Prehistory*, 2, Brussels, pp. 291–302. (Chap. 21)

Davies O. (1964) *The Quaternary in the Coast Lands of Guinea* (Glasgow: Jackson). (Chap. 24)

Davies, O. (1967a) *West Africa before the Europeans: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London: Methuen). (Chap. 24)

Davies, O. (1967b) 'Timber construction and wood carving in west Africa in the 2nd millennium BC', *Man*, 2, 1, pp. 115–18. (Chap. 24)

Davies, O. (1968)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west Africa', *CA*, 9, 5, pp. 479–82. (Chap. 24)

Davies, O. (1971) 'Excavations at Blackburn', *SAAB*, 26, pp. 165–78. (Chap. 26)

Dawson, W. R. (1938) 'Pygmies and dwarfs in ancient Egypt', *JEA*, 25, pp. 185–9. (Chap. 2)

Deacon, H. J. (1966) 'Note on the X-ray of two mounted implements from South Africa', *Man*, 1, pp. 87–90. (Chap. 26)

Deacon, H. J. (1969) 'Melkhoutboom cave, Alexandra district, Cape Province: a report on the 1967 investigation', *ACPM*, 6, pp. 141–69. (Chap. 26)

Deacon, H. J. and J. (1963) 'Scotts cave; a late stone age site in the Gamtoos valley', *ACPM*, 3, pp. 96–121. (Chap. 26)

Deacon, H. J. and J. (1972)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Cape during the last 2000 years', Report at AGM of the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 (Chap. 26)

Degrassi, N. (1951), 'Il mercato Romano di Leptis Magna', *QAL*, 2, pp. 37–70. **(Chaps 11, 19)**
Delibrias, G., Hugot, H. J. and Quézel, P. (1957) 'Trois datations de sédiments sahariens récents par le radio-carbon', *Libyca*, 5, pp. 267–70. **(Chap. 17)**
Demougeot, E. (1960) 'Le chameau et l'Afrique du Nord romaine', *Annales*, pp. 209–47. **(Chaps 19, 20)**
Derchain, P. (1962) *Le sacrifice de l'oryx* (Brussels: Fondation égyptologique reine Elisabeth). **(Chap. 3)**
Derricourt, R. M. (1973a) 'Radiocarbon chronology of the late stone age and iron age in South Africa', *SAJS*, 69, pp. 280–4. **(Chap. 26)**
Derricourt, R. M. (1973b)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Transkei and Ciskei: interim report for 1972', *Fort Hare Papers*, 5, pp. 449–55. **(Chap. 26)**
Desanges, J. (1949) 'Le statut et les limites de la Nubie romaine', *Chronique d'Égypte*, 44, pp. 139–47. **(Chap. 10)**
Desanges, J. (1957) 'Le triomphe de Cornelius Balbus, 19 av. J.-C.', *RA*, pp. 5–43. **(Chap. 20)**
Desanges, J. (1962) *Catalogues des tribus africaines de l'antiquité classique à l'ouest du Nil* (Dakar: Université de Dakar, Section d'Histoire). **(Chaps 17, 20)**
Desanges, J. (1963) 'Un témoignage peu connu de Procope sur la Numidie vandale et byzantine', *Byzantion*, XXXIII, pp. 41–69. **(Chap. 19)**
Desanges, J. (1964) 'Note sur la datation de l'expédition de Julius Maternus au pays d'Agisymba', *Latomus*, pp. 713–25. **(Chap. 20)**
Desanges, J. (1967) 'Une mention altérée d'Axoum dans l'exposition totius mundi et gentium', *AE*, VII, pp. 141–58. **(Chap. 15)**
Desanges, J. (1968) 'Vues grecques sur quelques aspects de la monarchie méroïtique', *BIFAO*, LXVI, pp. 89–104. **(Chaps 10, 11)**
Desanges, J. (1970) 'L'antiquité gréco-romaine et l'homme noir', *REL*, XLVIII, pp. 87–95. **(Chaps 17, 20)**
Desanges, J. (1971) 'Un point de repère chronologique dans la période tardive du royaume de Meroé', *MN*, 7, pp. 2–5. **(Chap. 10)**
Desanges, J. (1972) 'Le statut des municipes d'après les données africaines',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Paris: Editions Sirey), pp. 253–73. **(Chap. 19)**
Desanges, J. (1975) 'L'Afrique noir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dans l'antiquité. Ethiopiens et gréco-romains', *RFHOM*, 228, pp. 391–414. **(Chap. 20)**
Desanges, J. (1976) 'L'Iconographie du noir dans l'Afrique du nord antique', in J. Vercoutter, J. Leclant and F. Snowden (eds), *L'Image du noir dans l'art occidental*, Vol. I. *Des pharaons à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Fribourg: Menil Foundation), pp. 246–68. **(Chap. 20)**
Desanges, J. (1977) 'Aethiops', *Encyclopédie berbère*. **(Chap. 20)**
Desanges, J. and Lancel, S. (1962–74) 'Bibliographie analytique de l'Afrique antique', *BAA*, 1–5. **(Chaps 19 and 20)**
Descamps, C., Demoulin, D. and Abdallah, A. (1967) 'Données nouvelles sur la préhistoire du cap Manuel (Dakar)', *Acts VI Congr. PPEQ*, pp. 130–2. **(Chap. 24)**
Descamps, C. and Thilmans, G. (1972) *Excavations at DeNdalane (Sine Saloum) 27 November–16 January 1972*. **(Chap. 24)**
Deschamps, H. (1960) *Histoire de Madagascar* (Paris: Berger-Levrault), 3rd edn., 1965 **(Chap. 28)**
Deschamps, H. (ed.) (1970)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noire, de Madagascar et des archipels*, Vol. I: *Des origines à 1800* (Paris: PUF), pp. 203–10. **(Chap. 20)**
Despois, J. ( ) 'Rendements en grains du Byzacium', *Mélanges F. Gauthier*, p. 187ff. **(Chap. 19)**
Desroches-Noblecourt, C. (1963) *Life and Death of a Pharaoh: Tutankhamen*, tr. Claude (London: Michael Joseph/*The Connoisseur*). **(Chaps 2, 3)**
Desroches-Noblecourt, C. and Du Bourguet, P. (1962) *L'Art égyptien* (Paris: PUF). **(Chap. 3)**
Desroches-Noblecourt, C. and Kuentz, C. (1968) *Le petit Temple d'Abou-Simbel*, 2 Vols (Cairo: Ministry of Culture). **(Chap. 3)**
Devic, L. M. (1883) *Le pays des Zendj d'après les écrivains arabes* (Paris). **(Chap. 28)**
Dez, J. (1965) 'Quelques hypothèses formulées par la linguistique comparée à l'usage de l'archaéologie', *Taloha*, Madagascar, 2, pp. 197–214. **(Chap. 28)**
Dicke, B. H. (1931) 'The lightning bird and other analogies and traditions connecting the Bantu with the Zimbabwe ruins', *SAJS*, 28, pp. 505–11. **(Chap. 27)**
Diehl, C. (1896) *L'Afrique byzantine.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byzantine en Afrique, 533–709* (Paris: Leroux). **(Chap. 19)**
Diesner, H. J. (1965) 'Vandalen', Pauly-Wissowa, *Realencyclopedie*, Supp. X, pp. 957–92 **(Chap. 19)**
Diesner, H.-J. (1966) *Das Vandalenreich, Aufstieg und Untergang* (Stuttgart/Berlin/Cologne/Mainz: Kohlhammer). **(Chap. 19)**

Diesner, H.-J. (1969) 'Grenzen und Grenzverteidigung das Vandalenreiches', *Studi in onore di E. Volterra*, III, pp. 481–90. (Chap. 19)
Dillmann, A. (1878) 'Über die Anfange der Axumitischen reiches', *AAW*, 223. (Chap. 14)
Dillmann, A. (1880) *Zur geschichte des axumitischen reichs in vierten bis sechsten jahrhundert* (Berlin: K.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Chap. 14)
Dindorf, L. A. (1831) *Joannis Mal le Chronographia ex Recensione Ludovici Dindorgii*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 Weber). (Chap. 15)
Dindorf, L. A. (1870–1) *Historici graeci minores* (Leipzig: Teubner) (Chap. 15)
Diodorus Siculus, *The Library of History of Diodorus of Sicily*, tr. C. H. Oldfather *et al.* (1933–67) 12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einemann). (Chaps 1, 6, 10, 11, 17, 22)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2 Vols, tr. R. D. Hicks (192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einemann). (Chap. 1)
Diop, C. A. (1955) *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s. De l'Antiquité Nègro-Egyptienne aux Problèmes Culturels d'Afrique Noire d'Aujourd'hui*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 1)
Diop, C. A. (1967) *Anteriorité des civilisations nègres; mythe du vérité historiqu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 1)
Diop, C. A. (1968) 'Metallurgie traditionelle et l'âge du fer en Afrique', *BIFAN*, B, XXX, 1, pp. 10–38. (Chaps 21, 24)
Diop, C. A. (1973) 'La métallurgie du fer sous l'ancien empire égyptien', *BIFAN*, B, XXXV, pp. 532–47. (Chaps 21, 24)
Diop, C. A. (1977) 'Parenté génétique de l'égyptien pharaonique et des langues africaines: processus de sémitisation'; 'La pigmentation des anciens Egyptiens, test par la mélanine', *BIFAN*. (Chap. 1)
Dittenberger, G. (1898–1905) *Sylloge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5 Vols (Leipzig). (Chap. 6)
Dixon, D. M. M. (1964) 'The origin of the kingdom of Kush (Napata-Meroe)', *JEA*, 50, pp. 121–32. (Chap. 11)
Dixon, D. M. M. (1969) 'The transplantation of Punt incense trees in Egypt', *JEA*, 55, pp. 55ff. (Chap. 4)
Dogget, H. (196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ivated sorghums', in J. B. Hutchinson (ed.), *Essays on Crop Plant Evolution* (Cambridge: CUP), pp. 50–69. (Chap. 24)
Donadoni, S. (ed.) (1967) *Tanit 1964, Missione Archeologica in Egitto Dell' Università di Roma* (Rome).
Donadoni, S. (1970) 'Les fouilles à l'église de Sonqi Tino', in E. Dinkler (ed.),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cher Zeit: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auf Grund der jüngsten Ausgrabungen*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209–18. (Chap. 12)
Donadoni, S. and Curto, S. (1965) 'Le pitture murali della chiesa di sonki nel Sudan', *La Nubia Cristiana*, Quaderno No. 2 del Museo eglizio di Torino (Turin: Fratelli Pozzo-Salvati), pp. 123ff. (Chap. 12)
Donadoni, S. and Vantini, G. (1967) 'Gli scavi nel diff di songi tino (Nubia Sudanese)', *RRAL*, 3, XL, pp. 247–73. (Chap. 12)
Doresse, J. (1957) 'Découvertes en Ethiopie et découverte de l'Ethiopie', *BO*, 14, pp. 64–5. (Chap. 13)
Doresse, J. (1960) 'La découverte d'Asbi-Dérà',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 Stud. Et.*, Rome 2–4 April 1959, pp. 229–48. (Chap. 15)
Dornan, S. S. (1915) 'Rhodesian ruins and native tradition', *SAJS*, 12, pp. 501–16. (Chap. 27)
Drewes, A. J. (1954) 'The inscription from Dibbib in Eritrea', *BO*, 11, pp. 185–6. (Chap. 13)
Drewes, A. J. (1956) 'Nouvelles inscriptions de l'Ethiopie', *BO*, 13, pp. 179–82. (Chap. 13)
Drewes, A. J. (1959) 'Les inscriptions de Mélazo', *AE*, 3, pp. 83–99. (Chap. 13)
Drewes, A. J. (1962) *Inscriptions de l'Ethiopie Antique* (Leiden: Brill). (Chaps 13, 15)
Drewes, A. J. and Schneider, R. (1967–70–2) 'Documents épigraphiques de l'Ethiopie I, II, III', *AE*, VII, pp. 89–106; VIII, pp. 57–72; IX, pp. 87–102. (Chaps 13, 14)
Drioton, E. and Vandier, J. (1962) *Les peuples de l'Orient méditerranéen*, 4th edn enlarged, 1: '"Clio", 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2: *L'Egypte* (Paris: PUF). (Chaps 2, 17)
Drouin, E. A. (1882) 'Les listes royales éthiopiennes et leur autorité historique', *RA*, August–October. (Chap. 16)
Drury, R. (1731) *Madagascar or, Robert Drury's journal during Fifteen Years of Captivity on that Island* (London). (Chap. 28)
Dubief, J. (1963) 'Le climat du Sahara', *Institut de Recherches Sahariennes*, Algiers. (Chap. 20)
Du Bourguet, P. (1964a) *L'Art copte*, Exhibition catalogue, 17th June–15 September (Paris: Palais des Beaux Arts). (Chap. 12)
Du Bourguet, P. (1964b) 'L'art copte pendant les cinq premiers siècles de l'Hégire', *Christentum am Nil*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221ff. (Chap. 12)

Du Mesgnil, F. (1897) *Madagascar, Homère et la civilisation mycénienne* (Saint-Denis, Réunion: Dubourg). **(Chap. 28)**

Dunbabin, T. J. (1948) *The Western Greeks. The History of Sicily and South Ital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Greek Colonies to 480 B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18)**

Duncan-Jones, R. P. 'City population in Roman Africa', *JRS*, 53, pp. 85ff. **(Chap. 19)**

Dunham, D. and Bates, O. (1950–7) *Royal Cemeteries of Kush*, I: 'El-Kurru'; II. 'Nuri'; III. 'Royal tombs at Meroe and Bark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s 10, 11)**

Dupire, M. (1962) 'Peuls nomades', *Etude descriptive des Woolabe du Sahel Nigérien* (Paris: Travaux et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éthnologie). **(Chap. 24)**

Dupire, M. (1972) 'Les facteurs humains de l'économie pastorale', *Etudes nigériennes*, 5. **(Chap. 24)**

Dutton, T. P. (1970) 'Iron-smelting furnace date 630 ± 50 years AD in the Ndumu game reserve', *Lammergeyer*, XIII, pp. 37–40. **(Chap. 27)**

Duval, N. (1971 -)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Sbeitla* (Paris: de Boccard). **(Chap. 19)**

Duval, N. (1974) 'Le dossier de l'eglise d'el Monassat au sud-ouest de Sfax, Tunisie', *AA*, VIII, pp. 157–73. **(Chap. 19)**

Duval, N. and Baratte, F. (1973) *Sbeitla: Les ruines de Sufetula* (Tunis: STD) **(Chap. 19)**

Duval, N. and Baratte, F. (1974) *Haïdra: Les ruines d'Ammaedara* (Tunis: STD). **(Chap. 19)**

Duval, Y. and Fevrier, P. A. (1969) 'Procès verbal de disposition des reliques de la région de Telerma, VIIe siècle', *Mélanges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pp. 257–320 (Institut Francais de Rome, Villa Farnese, Rome). **(Chap. 19)**

Duyvendak, J. J. L. (1949)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 Probsthain). **(Chap. 22)**

Ebbell, B. (1937) The Papyrus Ebers, the greatest Egyptian medical document (London, Copenhagen). **(Chap. 5)**

Edkins, Rev. J. (1885) 'Ancient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JRAS*, XVIII, pp. 1–27. **(Chap. 22)**

Edwards, I. E. S. (1970) *The Pyramids of Egypt* (London, Penguin). **(Chap. 2)**

Ehret, C. (1967) 'Cattle-keeping and milking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JAH*, VIII, pp. 1–17. **(Chaps 21, 27)**

Ehret, C. (1971) *Southern Nilotic History: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Pas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Chap. 23)**

Ehret, C. (1972) 'Bantu origins and history, critique and interpretation', *TJH*, II, pp. 1–19. **(Chap. 21)**

Ehret, C. (1973) 'Patterns of Bantu and central Sudanic settlement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c. 1000 BC – 500 AD)', *TJH*, III, pp. 1–71. **(Chaps 21, 23)**

Ehret, C. (1974) *Ethiopians and East Africans: the problems of contacts*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Chap. 23)**

Ehret, C. *et al.* (1972) 'Outlining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a re-evaluation AD 100–1500', *Ufahamu*, III, pp. 9–27. **(Chap. 27)**

Elgood, P. G. (1951) *Later Dynasties of Egypt* (Oxford: Blackwell). **(Chap. 2)**

Elphick, R. H. (1972) 'The Cape Khoi and the first phase of South African race relations', thesis (Yale University). **(Chap. 26)**

Emery, W. B. (1960)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of 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at Buhen, 1958–59', *Kush*, 8, pp. 7–8. **(Chap. 9)**

Emery, W. B. (1961) *Archaic Egypt* (London: Penguin). **(Chap. 2)**

Emery, W. B. (1963)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Buhen, 1962', *Kush*, 11, pp. 116–20. **(Chap. 9)**

Emery, W. B. (1965) *Egypt in Nubia* (London: Hutchinson). **(Chaps 4, 9, 12)**

Emery, W. B. and Kirwan, L. P. (1935)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Nubie, 1929–34 The Excavations and Survey between Wadi es-Sebua and Adindan, 1929–31*, 2 Vols (Cairo: Government Press). **(Chap. 9)**

Emery, W. B. and Kirwan, L. P. (1938) *The Royal Tombs of Ballana and Qustul* (Cairo: Government Press). **(Chaps 10, 12)**

Emin-Bey, (n.d.) 'Studii-storico-dogmatici sulla chiesa giacobina Roma Tip Caluneta Tarique Neguest ...', ms. deposited at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no. P.90. **(Chap. 16)**

Emphoux, J. P. (1970) 'La grotte de Bitorri au Congo-Brazzaville', *Cahiers ORSTOM* (Office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Outre-Mer), VII, 1, pp. 1–20. **(Chap. 25)**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74) 30 Vols (London/Chicago), 15th edn.

Epstein, H. (1971) *The Origin of the Domestic Animals in Africa*, 2 Vols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hap. 21, Concl.)**

Erman, A. (1927) *The Literatur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tr. A. M. Blackman (London: Methuen). **(Chap. 5)**

Erman, A. (1966) *The Ancient Egyptians. A Sourcebook of Their Writings*, tr. A. M. Black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Chap. 3)**

Erroux, J. (1957) 'Essai d'une classification dichotomique des blès durs cultivés en Algeri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Naturelle de l'Afrique du nord*, 48, pp. 239–53. **(Chap. 17)**

Esperandieu, G. (1957) *De l'art animalier dans l'Afrique antique* (Algiers: Imprimerie Officielle). **(Chap. 17)**

Eusebius of Pamphylia (1675) transln. *Vie de l'Empereur Constantin* (Paris). **(Chap. 16)**

Euzennat, M. (1976) 'Les recherches sur la frontière romaine d'Afrique, 1974–76', *Akten XI Intern. Limeskong.*, pp. 533–43. **(Chap. 20)**

Evans-Pritchard, E. E. (1968) *The Nuer: Description of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London: OUP). **(Chap. 24)**

Evetts, B. T. A. and Butler, A. J. (1895)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Oxford). **(Chap. 12)**

Eyo, E. (1964–5) 'Excavations at Rop rock shelter', *WAAN*, 3, pp. 5–13. **(Chap. 24)**

Eyo, E. (1972) 'Excavations at Rop rock shelter 1964', *WAJA*, 2, pp. 13–16. **(Chap. 24)**

Fagan, B. M. (1961) 'Pre-European iron working in central Af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orthern Rhodesia', *JAH*, II, 2, pp. 199–210. **(Chap. 25)**

Fagan, B. M. (1965) 'Radiocarbon dates for sub-Saharan Africa – III', *JAH*, VI, pp. 107–16. **(Chap. 27)**

Fagan, B. M. (1967) 'Radiocarbon dates for sub-Saharan Africa – V', *JAH*, VIII, pp. 513–27. **(Chaps 25, 27)**

Fagan, B. M. (1969a) 'Early trade and raw materials in south central Africa', *JAH*, X, 1, pp. 1–13. **(Chap. 29)**

Fagan, B. M. (1969b) 'Radiocarbon dates for sub-Saharan Africa – VI', *JAH*, X, pp. 149–69. **(Chap. 27)**

Fagan, B. M. and Noten, F. L. Van (1971) 'The hunter-gatherers of Gwisho', *AMRAC*, 74, XXII + 230pp. **(Chap. 25)**

Fagan, B. M., Phillipson, D. W. and Daniels, S. G. H. (eds) (1969) *Iron Age Cultures in Zambia* (London: Chatto & Windus) **(Chaps 25, 27)**

Fagg, A. (1972) 'Excavations of an occupation site in the Nok valley, Nigeria', *WAJA*, 2, pp. 75–9. **(Chap. 24)**

Fairman, H. W. (1938)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Sesebi and Amarah West, Anglo-Egyptian Sudan, 1937–8', *JEA*, XXIV, pp. 151–6. **(Chap. 9)**

Fairman, H. W. (1939)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Amarah West, Anglo-Egyptian Sudan, 1938–9', *JEA*, XXV, pp. 139–44. **(Chap. 9)**

Fairman, H. W. (1948)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Amarah West, Anglo-Egyptian Sudan, 1947–8', *JEA*, XXXIV, pp. 1–11. **(Chap. 9)**

Fattovich, R. (1972) 'Sondaggi stratigrafici. Yeha', *AE*, 9, pp. 65–86. **(Chap. 13)**

Faublée, J. and M. (1964) 'Madagascar vu par les auteurs arabes avant le XIXe siècle', *communication at the* 8e *Congrès. Intern. Hist. Marit.* and *Studia*, 11. **(Chap. 28)**

Faulkner, R. O. (1962)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Chap. 1)**

Faulkner, R. O. (tr.) (1969)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s 2, 3)**

Faulkner, R. O. (tr.) (1974, 1978)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3 Vols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Chaps 2, 3)**

Faulkner, R. O. (1975) 'Egypt from the inception of the nineteenth dynasty to the death of Rameses III',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Vol. II, pt. 2, ch. xxiii. **(Chap. 2)**

Fendri, M. (1961) *Basiliques chrétiennes de la Skhira* (Paris: PUF). **(Chap. 19)**

Ferguson, J. (1969) 'Classical contacts with West Africa', in L. A. Thompson and J. Ferguson (eds), *Africa in Classical Antiquity*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pp. 1–25. **(Chap. 21)**

Ferguson, J. and Libby, W. F. (1963) 'Ugla radiocarbon dates, II', *Radiocarbon*, V, p. 17 **(Chap. 27)**

Ferrand, G. (1891–1902) *Les Musulmans à Madagascar et aux îles Comores*, 2 Vols (Paris: Leroux). **(Chap. 28)**

Ferrand, G. (1904) 'Madagascar et les îles Uaq-Uaq', *JA*, pp. 489–509. **(Chap. 28)**

Ferrand, G. (1908) 'L'origine africaine des Malgaches', *JA*, pp. 353–500. **(Chap. 28)**

Ferrand, G. (1913–14) *Relation des voyages et textes gé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 du VIII[e] au XVIII[e] siècles*, 2 Vols (Paris: Leroux). **(Chap. 28)**

Fevrier, P. A. (1962–7) Inscriptions chrétiennes de Djemila-Cuicul', *BAA*, I, pp. 214–22; *BAA*, II, pp. 247–8. (Chap. 19)

Fevrier, P. A. (1965) *Fouilles de Sétif. Les basiliques chrétiennes du quartier nord-ouest*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Scientifiques sur l'Afrique Méditerranéenne). (Chap. 19)

Fevrier, P. A. and Bonnal, J. (1966–7) 'Ostraka de la région de Bir Trouch', *BAA*, II, pp. 239–50. (Chap. 19)

Firth, C. M. (1910–27)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 Report for 1907–8–1910–11* (Cairo: National Print Dept). (Chap. 9)

Flacourt, E. (1661) *Histoire de la grande île de Madagascar* (Paris: Clougier). (Chap. 28)

Fleischhacker, H. von (1969) 'Zur Rassen und Bevolkerungsgeschichte Nordafrika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hsichtigung der Aethiopiden, der Libyer und der Garamanten', *Paideuma*, 15, pp. 12–53. (Chaps 17, 20)

Flight, C. (1972) 'Kintampo and West African Neolithic civilizations', *BWS* 56. (Chap. 24)

Fontane, M. E. (1882) *Les Égyptes, de 5000 a 715 av. J.C.* (Vol. 3 of his *Histoire universelle*) (Paris: Lemerre). (Chap. 1)

Forbes, R. J. (1950) *Metallurgy in Antiquity: a notebook for archaeologists and technologists* (Leiden: Brill). (Chap. 21)

Forbes, R. J. (1954) 'Extracting, smelting and alloying', in C. Singer, E. J. Holmyard and A. R. Hall (eds), *History of Technology*, 4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572–99. (Chap. 21)

Franchini, V. (1954) 'Ritrovamenti archeologici in Eritrea', *RSE*, 12, pp. 5–28. (Chap. 13)

Frankfort, H. (ed.) (1929) *The Mural Paintings of El-'Amarneh*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Chap. 5)

Fraser, P. M. (1967) 'Current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ult of Serapis', *OA*, VII, pp. 23–45. (Chap. 6)

Fraser, P. M. (1972) *Ptolemaic Alexandria*,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6)

Frazer, J. G. (1941)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of Magic and Religion*, 12 Vols (New York/London: Macmillan), 3rd edn. (Chap. 29)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0) 'East African coin finds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JAH*, I, pp. 31–43. (Chap. 22)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2a)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yik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London: OUP). (Chap. 22)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2b)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s 22, 27)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8) 'A Note on Zanj in the Greek authors', Seminar on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Africa (London). (Chap. 22)

Frend, W. H. C. (1968) 'Nubia as an outpost of Byzantine cultural influence', *Byzantinoslavica*, 2, pp. 319–26. (Chap. 12)

Frend, W. H. C. (1972a) 'Coptic, Greek and Nubian at Qasr Ibrim', *Byzantinoslavica*, XXXIII, pp. 224–9. (Chap. 12)

Frend, W. H. C. (1972b) *The Rise of the Monophysite Movemen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 (Cambridge: CUP). (Chap. 12)

Frobenius, L. (1931) *Erythräa: Länder und Zeiten des heiligen Königsmondes* (Berlin/Zurich: Atlantis). (Chap. 11)

Frontinus, Sextus Julius, *Strategemeton*, ed. G. Gundermann (1888); English edition (1950), *The Stratagems and the Aqueducts of Rome* (London: Heinemann), I, 11, 18. (Chap. 17)

Furon, R. (1972) *Eléments de paléoclimatologie* (Paris: Vuibert). (Chap. 20)

Gabel, C. (1965) *Stone Age Hunters of the Kafue. The Gwisho A site*, (Boston, Mass.: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21)

Gadallah, F. F. (1971) 'Problems of pre-Herodotan sources in Libyan history', *Libya in History* (Benghazi), pt. 2, pp. 43–75 (Arabic edition, résumé in English, pp. 78–81). (Chap. 17)

Gagé J. (1964) *L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empire romain* (Paris: Payot). (Chap. 19)

Galand, L. (1965–70) 'Les études de linguistique berbère', *Ann. Afr.* (Chap. 20)

Galand, L. (1969) 'Les Berbères; la langue et les parlers', *Encyclopedia Universalis* (Paris), pp. 171–3. (Chap. 20)

Galand, L. (1974) 'Libyque et berbère', *AEPHE*, pp. 131–53. (Chap. 20)

Gardiner, A. H. (1909) *The Admonitions of an Egyptian Sage. From a hieratic papyrus in Leiden* (Leipzig: Hinrichs). (Chap. 2)

Gardiner, A. H. (1950) *Egyptian Grammar*, 2nd edn., p. 512. (Chap. 4)

Gardiner, A. H. (1961) *Egypt of the Pharaoh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eprint 1964. (Chaps 2, 4)

Gardner, T., Wells, L. H. and Schofield, J. F. (1940) 'The recent archaeology of Gokomere, Southern Rhodesia', *TRSSA*, XVIII, pp. 215–53. (Chap. 27)
Garlake, P. S. (1967) 'Excavations at Maxton Farm, near Shamwa Hill, Rhodesia', *Arnoldia*, (Rhodesia), III, 9. (Chap. 27)
Garlake, P. S. (1969) 'Chiltope: an early iron age village in northern Mashonaland', *Arnoldia*, (Rhodesia), IV, 19. (Chap. 27)
Garlake, P. S. (1970a) 'Iron age sites in the Urungwe district of Rhodesia', *SAAB*, XXV, pp. 25–44. (Chap. 27)
Garlake, P. S. (1970b) 'Rhodesian ruins.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ir styles and chronology', *JAH*, XI, 4, pp. 495–513. (Chap. 27)
Garlake, P. S. (1973) *Great Zimbabwe*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27)
Garstang, J., Sayce, A. H. and Griffith, F. L. (1911) *Meroë, the City of the Ethiopians: an Account of a First Season's Excavations on the Site 1909–10* (Liverpool: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ap. 11)
Gartkiewicz, P. (1970–2) 'The central plan in Nubian church architecture', *Nubian Recent Research*, pp. 49–64.
Gascou, J. (1972) *La Politique municipale de l'empire romain en Afrique proconsulaire de Trajan à Septime-Sévère* (Rome: 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Chaps 11, 19)
Gast, M. (1972) 'Témoignages nouveaux sur Tin Hinan, ancêtre légendaire des touareg Ahaggar', *Mélanges Le Tourneau*, 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Aix-en-Provence), pp. 395–400. (Chap. 20)
Gauckler, P. (1925) *Nécropoles puniques de Carthage* (Paris). (Chap. 18)
Gaudio, A. (1953) 'Quattro ritrovamenti archeologici e paleografici in Eritrea', *Il Bolletino*, Asmara I, pp. 4–5. (Chap. 15)
Gautier, E. F. (1925–31) *Dictionnaire des noms géographiques contenus dans les textes hiéroglyphiques*, 7 Vols (Cairo). (Chap. 17)
Gautier, E. F. (1952) *Le passé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Payot). (Chap. 18)
Germain, G. (1948) 'Le culte du belier en Afrique du Nord', *Hesperis*, XXXV, pp. 93–124. (Chap. 17)
Germain, G. (1957) 'Qu'est-ce que le périple d'Hannon? Document, amplification littéraire ou faux intégral?', *Hesperis*, pp. 205–48. (Chaps 20, 21)
Ghalioungui, P. (1963) *Magic and Medical Science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Chap. 3)
Ghalioungui, P. (1973) *The house of life; Per ankh. Magic and medical science in ancient Egypt* (Amsterdam: Israël). (Chap. 5)
Gilot, E., Ancien, N. and Capron, P. C. (1965) 'Louvain natural radiocarbon measurements III', *Radiocarbon*, II, pp. 118–22. (Chap. 25)
Giorgini, M. S. (1965) 'Première campagne de fouilles à Sedeinga 1963–4', *Kush*, 13, pp. 112–30. (Chap. 10)
Girgis, M. (1963) 'The history of the shipwrecked sailor', *Bulletin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u Caire*, XXI, I, pp. 1–10. (Chaps 4, 11)
Glanville, S. K. R. (ed.) (1942) *The Legacy of Egyp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2)
Glaser, E. (1895) *Die Abessiner in Arabien und Afrika auf Grund neuendeckter Inschriften* (Munich: Hermann Lukaschik). (Chap. 11)
Gobert, E. (1948) 'Essai sur la litholâtrie', *RA*, 89, pp. 24–110. (Chap. 17)
Golénischev, V. S. (1912) *Le Conte du naufragé*, tr. W. Golénischeff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e l'Archéologie Orientale). (Chap. 4)
Golgowski, T. (1968) 'Problems of the iconography of the Holy Virgin murals from Faras', *Etudes et Travaux*, II, pp. 293–312. (Chap. 12)
Gomaa, F. (1973) 'Chaemwese, Sohn Rameses II und Hoher Priester von Memphis', *ÄA*, 27. (Chap. 3)
Goodchild, R. G. (1962) *Cyrene and Apollonia; an historical guide* (Libya: Antiquities Department of Cyrenaica). (Chap. 6)
Goodchild, R. G. (1966) 'Fortificazioni e palazzi bizantini in Tripolitania e Cirenaica', *CC*, XIII, pp. 225–50. (Chap. 19)
Goodwin, A. J. H. (1946) 'Prehistoric fishing methods in South Africa', *Antiquity*, 20, pp. 134–9. (Chap. 26)
Gostynski, T. (1975) 'La Libye antique et ses relations avec l'Egypte', *BIFAN*, 37, 3, pp. 473–588. (Chaps 10, 20)
Goyon, G. (1957) *Nouvelles inscriptions rupestres du Wadi-Hammamat*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Chap. 3)

Goyon, G. (1970) 'Les navires de transport de la chaussée monumentale d'Ounas', *BIFAO*, LXIX, pp. 11–41. (Chap. 3)
Goyon, J. C. (tr.) (1972) *Rituels funéraires de l'ancienne Egypte; le rituel de l'embaumement, le rituel de l'ouverture de la bouche, le livre. des respirations.* (Paris: Editions du Cerf).
Grandidier, A. (1885) *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 de Madagascar*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Chap. 28)
Grapow, H. (1954–63) *Grundriss der Medizin der alten Ägypter*, 9 Vols (Berlin: Akademie-Verlag). (Chap. 5)
Greenberg, J. H. (1955)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New Haven: Compass). (Chap. 25)
Greenberg, J. H. (1963) *Languages of Africa* (Bloomington, Ind.: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3rd edn. 1970. (Chaps 21, 23)
Greenberg, J. H. (1972) 'Linguistic evidence regarding Bantu origins', *JAH*, XIII, 2, pp. 189–216. (Chap. 21)
Griffith, F. L. *Karanog. The Meroitic Inscriptions of Shablul and Karamog* (Philadelphia). (Chap. 11)
Griffith, F. L. (1911–12) *Meroitic Inscriptions*, 2 Vols (Londo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Egypt). (Chap. 11)
Griffith, F. L. (1913) *The Nubian Texts of the Christian Period* (Berli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Chap. 12)
Griffith, F. L. (1917) 'Meroitic studies III–IV', *JEA*, 4, p. 27. (Chap. 11)
Griffith, F. L. (1921–8) 'Oxford excavations in Nubia', *LAAA*, VIII, 1; IX, 3–4; X, 3–4; XI, 3–4; XII, 3–4; XIII, 1–4; XIV, 3–4; XV, 3–4. (Chaps 9, 12)
Griffith, F. L. (1925) 'Pakhoras-Bakharas-Faras in geography and history', *JEA*, XI, pp. 259–68. (Chap. 12)
Griffith, J. G. (1970) *Plutarch, De Iside et Osiride* (Cambridge). (Chap. 2)
Groag, E. (1929) *Hannibal als Politiker* (Vienna). (Chap. 18)
Grobbelaar, C. S. and Goodwin, A. J. H. (1952) 'Report on the skeletons and implement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m from a cave near Bredasdorp, Cape Province', *SAAB*, 7, pp. 95–101. (Chap. 26)
Grohmann A. (1914a) 'Eine Alabasterlampe mit einer Ge'ezschrift', *WZKM*, XXV, pp. 410–22. (Chap. 15)
Grohmann, A. (1914b) *Göttersymbole und Symboltiere auf südarabische Denkmäler* (Vienna: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Chap. 13)
Grohmann, A. (1915)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äthiopischen Schrift', *Archiv für Schriftkunde*, I, 2–3, pp. 57–87. (Chap. 15)
Grohmann, A. (1927) in *Handbuch des attarabische Aetertumskunde*, ed. D. Nielson, Vol. 1 (Copenhagen). (Chap. 13)
Grossman, P. (1971) 'Zur Datierung der Frühen Kirchenlagen aus Faras',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64, pp. 330–50. (Chap. 12)
Gross-Mertz, B. (1952) 'Certain titles of the Egyptian queens and their bearing on the hereditary right to the throne',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ap. 3)
Gsell, S. (1915) *Hérodote* (Algiers: Typographie A. Jourdan), pp. 133–4. (Chap. 17)
Gsell, S. (1913–28) *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8 Vols (Paris: Hachette). (Chaps 17, 19, 20)
Gsell, S. (1926) 'La Tripolitaine et le Sahara au 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MAI*, XLIII, pp. 149–66. (Chap. 20)
Guéry, R. (1972)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pp. 318–9. (Chap. 19)
Guidi, I. (ed.) (1896) *Il Gradla 'Aragâwî: Memoria del Socio Ignazio Guidi* (Rome). (Chap. 16)
Guidi, I. (1906) *The Life and Miracles of Tekle Haymanôt* (London), Vol II. (Chap. 16)
Gumplowicz, L. (1883) *Der Rassenkampz soci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nnsbruck). (Chap. 1)
Guthrie, M. (1962) 'Some developments in the pre-history of the Bantu languages', *JAH*, III, 2, pp. 273–82. (Chap. 25)
Guthrie, M. (1967–71) *Comparative Bant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d pre-history of the Bantu languages*, 4 Vols (Farnborough: Gregg International). (Chap. 25)
Guthrie M. (1970) 'Contributions from comparative Bantu studies to the prehistory of Africa', in D. Dalby (ed.),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pp. 20–49. (Chap. 21)

Habachi, L. (1955)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Kamose stela and other inscribed blocks found re-used in the foundations of two statues at Karnak', *ASAE*, 53, pp. 195–202. (Chap. 9)
Hailemarian, G. (1955) 'Objects foun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xum,' *AE*, 1, pp. 50–1. (Chap 13)

Halff, G. (1963) 'L'onomastique punique de Carthage', *Karthago*, XIII. **(Chap. 18)**
Hama, B. (1967) *Recherche sur l'histoire des touareg sahariens et soudanais*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 20)**
Hamy, E. T. (1969) in *African Mythology*, ed. G. Parrinder (London: Hamlyn) 2nd edn. **(Chap. 4)**
Hani, J. (1976) *La religion égyptienne dans la pensée de Plutarque* (Paris: Société d'Editions Les Belles Lettres). **(Chap. 2)**
Harden, D. B. (1963) *The Phoenicians* (London: Thames & Hudson), revised edn. **(Chap. 18)**
Hardy, E. R. (1931) *The Large Estates of Byzantine Egypt* (New York: Ams Press) revised edn 1968. **(Chap. 7)**
Harlan, J. R., Wet, J. M. J. de and Stemler, A. (eds) (1976) *Origins of African Plant Domestication* (The Hague/Paris; Mouton, World Anthropology Series). **(Chap. 21)**
Harris, J. R. (1966) *Egyptian Art* (London: Spring Books). **(Chap. 5)**
Harris J. R. (ed.) (1971) *The Legacy of Egyp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nd edn. **(Chap. 3)**
Hartle, D. (1966) 'Bronze objects from the Ifeka gardens site, Ezira', *WAAN*, 4, p. 26. **(Chap. 24)**
Hartle, D. (1968) 'Radiocarbon dates', *WAAN*, 13, p. 73. **(Chap. 24)**
Hasan, H. (1928) *A History of Persian Navigation* (London). **(Chap. 22)**
Havinden, M. A. (1970) 'The history of crop cultivation in West Afric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EHR*, 2nd ser., XXIII, 3, pp. 532–55. **(Chap. 24)**
Haycock, B. G. (1954) 'The kingship of Kush in the Sudan', *CSSH*, VII, 4, pp. 461–80. **(Chaps 10, 11)**
Hayes, W. C. (1953–9) *The Scepter of Egypt: A background for the study of Egyptian antiqu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s 2, 3)**
Hayes, W. C. (1965) *Most Ancient Egypt*, ed. K. C. Steele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 2)**
Hayes, W. C. (1971) 'The middle kingdom in Egypt's internal history',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Vol. I, pt. 2. **(Chap. 2)**
Hayes, W. C. (1973) 'Egypt; internal affairs from Thutmosis I to the death of Amenophis III',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Vol. II, pt. 1 **(Chap. 2)**
Haywood, R. M. (1938)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 IV: *Roman Africa*, ed. T. Frank (1933–4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Chap. 19)**
Hearst, P. A. (1905) 'Medical Papyrus',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1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ap. 5)**
Hébert, J. C. (1968a) 'Calendriers provinciaux malgaches', *BM*, 172, pp. 809–20. **(Chap. 28)**
Hébert, J. C. (1968b) 'La rose des vents malgaches et les points cardinaux', *CM*, 2, pp. 159–205. **(Chap. 28)**
Hébert, J. C. (1971) 'Madagascar et Malagasy, histoire d'un double nom de baptême, *BM*, 302–3, pp. 583–613. **(Chap. 28)**
Heekeren, H. R. van (1958) *The Bronze-Iron Age of Indonesia* ('s-Gravenhage: Nijhoff). **(Chap. 28)**
Helck, W. (1939) *Der einfluss der militärführer in der 18. ägyptischen dynastie* (Leipzig: Hinrichs). **(Chap. 5)**
Helck, W. (1958) 'Zur Verwaltung der Mittleren und Neuen Reichs', *Probleme der Ägyptologie*, 3, Leiden/Köln. **(Chap. 3)**
Helck, W. and Otto, E. (1970) *Kleines Wörterbuch der Ägyptologie*, 2nd rev. ed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Chap. 3)**
Helck, W. and Otto, E. (1973)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Chap. 3)**
Herbert, E. W. (1973) 'Aspects of the uses of copper in pre-colonial West Africa', *JAH*, XIV, 2, pp. 170–94. **(Chap. 24)**
Herin, A. (1973) 'Studie van een Verzameling Keramiek uit de Bushimaie Vallei "Kasai-Zaire" in Het Koninklijk Museum vóor Midden Afrika te Tervuren', thesis, University of Ghent. **(Chap. 25)**
Herodotus, *Histoires*, text established and tr. P.-E. Legrand (1932–54), 11 Vols (Paris: 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 **(Chaps 1, 10)**
Herodotus, *Works*, tr. A. D. Godley (1920–4), 4 Vols (London: Heineman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4)**
Herzog, R. (1957) *Die Nubier Untersuchungen und Beobachtungen zur Gruppengleiderung, Gesellschaftsform und Wirtschaftsweise* (Berli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Chaps 1, 11)**
Herzog, R. (1968) in *Punt*, Proceedings of the 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Cairo, 5 (Glückstadt). **(Chap. 4)**
Heurgon, J. (1958) *Le Trésor de Ténès* (Paris: Direction de l'Intérieur et des Beaux Arts). **(Chap. 19)**
Heurgon, J. (1966) 'The inscriptions of Pyrgi', *JRS*, LVI. **(Chap. 18)**

Heuss, A. (1949) 'Der erste punische Krieg und das Problem des römischen Imperialismu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CLXIX. **(Chap. 18)**
Heyler, A. and Leclant, J. (1966) in *Orientalistiche Literaturzeitung, 61, p. 552.* **(Chap. 10)**
Hiernaux, J. (1968a) *La Diversité humaine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 (Brussels: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Chap. 21)**
Hiernaux, J. (1968b) 'Bantu expansion: the evidence from physical anthropology confronted with 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JAH*, IX, 4, pp. 505–15. **(Chap. 25)**
Hiernaux, J., Longrée, E. De and Buyst, J. De (1971) 'Fouilles archéologiques dans la vallée du Haut-Lualaba, I, Sanga, 1958', *AMRAC*, 73, p. 148. **(Chap. 25)**
Hiernaux, J. and Maquet, E. (1957) 'Cultures préhistoriques de l'âge des métaux au Rwanda-Urundi et au Kiva (Congo belge)', lère partie, *ARSC*, pp. 1126–49. **(Chap. 25)**
Hiernaux, J. and Maquet, E. (1960) 'Cultures préhistoriques ...', 2e partie, *ARSC*, X, 2, pp. 5–88. **(Chap. 25)**
Hiernaux, J. and Maquet, E. (1968) 'L'âge du fer au Kibiro (Ouganda)', *AMRAC*, 63, p. 49. **(Chap. 29)**
Hiernaux, J., Maquet, E. and Buyst, J. De (1973) 'Le cimetière protohistorique de Katoto (vallée du Lualaba, Congo-Kinshasa)', *Actes VI Congr. PPQS*, pp. 148–58. **(Chap. 25)**
Hintze, F. (1959a) *Studien zur Meroitischen Chronologie und zu den Opfertafeln aus den Pyramiden von Meroe* (Berlin: Akademie-Verlag). **(Chaps 10, 11)**
Hintze, F. (1959b)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Butana expedition 1958 made by the Institute for Egyptology of the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Kush*, 7, pp. 171–96. **(Chap. 11)**
Hintze, F. (1962) *Die Inschriften des Löwentempels von Musawwarat es Sufra*,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Berlin: Akademie-Verlag). **(Chap. 11)**
Hintze, F. (1964) 'Das Kerma Problem', *ZÄS*, 91, pp. 79–86. **(Chap. 9)**
Hintze, F. (1965) 'Preliminary note on the epigraphic expedition to Sudanese Nubia, 1963', *Kush*, 13, pp. 13–16. **(Chap. 9)**
Hintze, F. (1968) *Civilizations of the Old Sudan* (Leipzig). **(Chap. 9)**
Hintze, F. (1971a) *Mussawwarat es Sufra*. Vol. I, pt. 2: *Der Löwentempel*. With the assistance of U. Hintze, K. H. Priese and K. Stark (Berlin: Akademie-Verlag). **(Chap. 11)**
Hintze, F. (1971b) 'Stand und Aufgaben der Chronologischen Forschung', Internationale Tagung für Meroitistiche Forschungen, September 1971, in 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Bereich Aegyptologie und Sudanologie Meroitistik. **(Chap. 11)**
Hintze, F. (1976) *Die Grabungen von Mussawwarat es Sufra*, Vol. I, pt. 2: 'Tafelband Lowentempel' (Berlin: Akademie-Verlag). **(Chap. 10)**
Hintze, F. and U. (1967) *Alte Kulturen im Sudan* (Munich, Callwey). **(Chaps 9, 12)**
Hintze, F. and U. (1970) 'Einige neue Ergebnisse der Ausgrab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Ägyptologie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in Mussawwarat es Sufra', in E. Dinkler (ed.),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cher Zeit.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auf Grund der jüngsten Ausgrabungen*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49–70. **(Chap. 11)**
Histoire et Tradition Orale (1975) 'L'Empire du Mali', *Actes Coll. Bamako I*, Fondation SCOA pour la recherche fondamentale en Afrique noire. **(Chap. 21)**
Hobler, P. M. and Hester, J. J. (1969) 'Prehistor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Libyan desert',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Journal*, 23, 92, pp. 120–30. **(Chap. 24)**
Hofmann, I. (1967) *Die Kulturen des Niltals von Aswan bis Sennar, vom Mesolithikum bis zum Ende der Christlischen Epoche* (Monographien zur Völkerkunde-Hamburgischen Museum für Volkerkunde, IV) (Hamburg). **(Chap. 12)**
Hofmann, I. (1971a) *Studien zum Meroitischen Königtum* (Brussels: FERE). **(Chap. 10)**
Hofmann, I. (1971b) 'Bermachungen zum Ende des Meroitischen Reiches', in Afrikanische Sprachen und Kulturen, ein Querschnitt, Hamburg, Deutschen Institut für Afrika-Forschung, 1971, *HBZA-K*, 14. pp. 342–52. **(Chap. 10)**
Hofmann, I. (1975) *Wege und Möglichkeiten eines indischen Einflusses auf die meroitische Kultur* (St Augustin bei Bonn: Verlag des Anthropos-Instituts). **(Chap. 10)**
Hölscher, W. (1955) 'Libyer und Ägypter, Beiträge zur Ethnologie und Geschichte Libyscher Völkerschaften', *ÄFU*, 5. **(Chaps 2, 17)**
Hornell, (1934) 'Indonesian influences on East African culture', *JRAI*. **(Chap. 28)**
Hornung, E. (1965) *Grundzüge der Ägyptischen Geschicht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Chap. 2)**
Hornung, E. (1971) *Der Eine und die Vielen. Ägyptische Göttesvorstellung*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Chap. 3)**
Hornung, E. (1972) *Ägyptische Unterweltsbücher* (Zurich/Munich: Artemis Verlag). **(Chap. 3)**

Hourani, G. F. (1963)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Beirut), 2nd edn 1969. (Chap. 22)
Huard, P. (1966) 'Introduction et diffusion du fer au Tchad', *JAH*, VII, pp. 377–404. (Chaps 20, 21)
Huard, P. and Leclant, J. (1972) *Problèmes archéologiques entre le Nil et le Sahara* (Cairo). (Chap. 17)
Huard, P. and Massip, J. M. (1967) 'Monuments du Sahara nigéro-tchadien', *BIFAN*, B, pp. 1–27. (Chap. 20)
Huffman, T. N. (1970) 'The early iron age and the spread of the Bantu', *SAAB*, XXV, pp. 3–21. (Chaps 21, 27)
Huffman, T. N. (1971a) 'A guide to the iron age of Mashonaland', *OPNM*, pp. 20–44. (Chap. 27)
Huffman, T. N. (1971b) 'Excavations at Leopard's Kopje main kraal: a preliminary report', *SAAB*, XXVI, pp. 85–9. (Chap. 27)
Huffman, T. N. (1973) 'Test excavations at Makuru, Rhodesia', *Arnoldia*, (Rhodesia) V, 39. (Chap. 27)
Huffman, T. N. (1974) 'Ancient mining and Zimbabwe', *JSAIMM*, LXXIV, pp. 238–42. (Chap. 27)
Hugot, H.-J. (1963)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dans l'Ahaggar Nord-Occidental 1950–7', *Mém. CRAPE*, 1. (Chaps 17, 24)
Hugot, H.-J. (1968)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Sahara', *CA*, 9, 5, pp. 483–9. (Chap. 24)
Hugot, H.-J. and Bruggmann, M (1976) *Les gens du matin Sahara, dix mille ans d'art et d'histoire* (Paris: Bibliothèque des arts). (Chap. 4)
Huntingford, G. W. B. (1963) in *Oxford History of East Africa*, eds R. Oliver and G. Mathew, Vol. 1. (Chap. 4)

Inskeep, R. R. (1971) Letter to the Editor, *SAJS*, LXVII, pp. 492–3. (Chap. 27)
Inskeep, R. R. and Bezing, K. L. Von (1966) 'Modelled terracotta head from Lydenburg, South Africa', *Man*, 1, p. 102. (Chap. 27)
Irfann, S. (1971) *The Martyrs of Najran. New Documents* (Brussels: Société des Bollandistes) pp. 242–76. (Chaps 15, 16)
Isserlin, B. S. J. *et al.* (1962–3) 'Motya, a Phoenician-Punic site near Marsala', *ALOS*, IV, pp. 84–131. (Chap. 18)

Jaffey, A. J. E. (1966) 'A reappraisal of the Rhodesian iron age up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JAH*, VII, 2, pp. 189–95.
Jakobielski, S. (1966) 'La liste des évêques de Pakhoras', *CAMAP*, III, pp. 151–70. (Chap. 12)
Jakobielski, S.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Nubische Kunst*, pp. 167ff. (Chap. 12)
Jakobielski, S. (1970)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1969', in E. Dinkler (ed.),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scher Zeit.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auf Grund der jüngsten Ausgrabungen*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171–80. (Chap. 12)
Jakobielski, S. (1972) *A History of the Bishopric of Pachoras on the Basis of Coptic Inscriptions* (Warsaw: PWN Editions Scientifiques de Pologne). (Chap. 12)
Jakobielski, S. (1975a)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1970–72', *Actes Coll. Nubiol Interm.*, pp. 70–5. (Chap. 12)
Jakobielski, S. (1975b) 'Old Dongola 1972–3', *Etudes et Travaux*, VIII, pp. 349–60. (Chap. 12)
Jakobielski, S. and Krzysaniak, L. (1967–8)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third season, December 1966 – February 1967', *Kush*, XV, pp. 143–64. (Chap. 12)
Jakobielski, S. and Ostrasz, A. (1967)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second season, December 1965 – February 1966', *Kush*, XV, pp. 125–42. (Chap. 12)
James, T. G. H. (1973) Egypt from the Expulsion of the Hyksos to Amenophis I,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hap. 2)
Jamme, A. (1956) 'Les antiquités sud-arabes du museo nazionale romano', *Antichita Publicati per Cura dell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43, pp. 1–120. (Chap. 13)
Jamme, A. (1957) 'Ethiopia. Annales d'Ethiopie', *BO*, 14, pp. 76–80. (Chap. 15)
Jamme, A. (1962) *Sabaean Inscriptions from Mahram Bilqîs, Mârib*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Chap. 15)
Jamme, A. (1963) 'Compte-rendu bibliographique des Annales d'Ethiopie, vol. 3', *BO*, 20, pp. 324–7. (Chap. 13)
Jansma, N. and Grooth, M. de (1971) 'Zwei Beitrage zur Iconographie der Nubisnen Kunst', *NKJ*, pp. 2–9. (Chap. 12)
Janssen, J. J. (1975)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Egypt's economic history during the new kingdom', *SAK*, 3, pp. 127–85. (Chap. 3)

Jenkins, G. K. and Lewis, R. B. (1963) *Carthaginian Gold and Electrum Coins* (London: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Chap. 18)
Jennison, G. (1937) *Animals for Show and Pleasure in Ancient Rome*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Chap. 20)
Jéquier, G. (1930)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égyptienne des origines à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Paris: Payot). (Chap. 2)
Jodin, A. (1966) *Mogador: comptoir phénicien du Maroc atlantique* (Tangier: Editions marocaines et internationales). (Chaps 19, 20)
Johnson, A. C. (1936) *Roman Egypt to the reign of Diocletian.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ed. T. Fran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Chap. 7)
Johnson, A. C. (1951) *Egypt and the Roman Empi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hap. 7)
Johnson, A. C. and West, L. C. (1949) *Byzantine Egypt. Economic Stud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7)
Joire, J. (1947) 'Amas de coquillages du littoral sénégalais dans le banlieue de Saint-Louis', *BIFAN*, B, IX, 1–4, pp. 170–340. (Chap. 24)
Joire, J. (1955) 'Découvertes archéologiques dans la région de RAO', *BIFAN*, B, XVII, pp. 249–333. (Chap. 24)
Jones, A. H. M. (1937) *The 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Provin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6)
Jones, A. H. M. (1964) *The Late Roman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Chap. 7)
Jones, A. H. M. (1968) 'Frontier defence in Byzantine Libya', *Libya in History* (Benghazi: University of Benghazi), pp. 289–97. (Chap. 19)
Jones, A. H. M. (1969) 'The influence of Indonesia: the musicological evidence reconsidered', *Azania*, IV, pp. 131–90. (Chaps 22, 28)
Jones, N. (1933) 'Excavations at Nswatugi and Madiliyangwa', *OPNM*, I, 2, pp. 1–44. (Chap. 27)
Jouguet, P. (1947) *La Domination romaine en Egypte aux deux premiers siècles après JC* (Alexandria: Publications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Archéologie). (Chap. 7)
Julien, C. A. (1966)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Tunisie, Algérie, Maroc, de la conquête arabe à 1830* (Paris: Payot), 2nd edn rev. (Chap. 19)
Julien, G. (1908–9)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de Madagascar d'après des documents authentiques et inédits*, 2 Vols (Paris). (Chap. 28)
Junker, H. (1919–22) *Bericht über die Grab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in Wien auf den Friedhöfen von El-Kubanieh* (Vienna: Holder). (Chap. 9)
Junker, H. (1921) *Der nubische Ursprung der sogenanten Tell el-Jahudiye-Vasen* (Vienna: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Chap. 9)
Junker, H. (1933) *Dievölker des antiken Orients. Die Ägypter* (Freiburg, Germany: Herder). (Chap. 2)
Juvenal, *Satires*, text established and tr. P. de Labriolle and F. Villeneuve (1951), 5th edn rev. and corr. (Paris: Belles Lettres). (Chap. 1)
Juvenal, *Works of Juvenal and Persius*, tr. G. G. Ramsay (1918) (London: Heineman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dra, F. (1978) *Les Djedars, monuments funéraires berbères de la région de Farenda* (Algiers). (Chap. 19)
Kahrstedt, U. and Meltzer, O. (1879–1913) *Geschichte der Karthager* (Berlin). (Chap. 18)
Katznelson, I. S. (1966) 'La Candace et les survivances matrilinéaires au pays de Kush', *Palestinskij Sbornik*, XV, 78, pp. 35–40. (Chap. 10)
Katznelson, I. S. (1970) *Napata i Meroe – drevnive tzarstva Sudana* (Moscow), pp. 289 ff. (Chap. 11)
Kees, H. (1926) *Totenglauben und Jensertsvolrstellung der alten Ägypter* (Leipzig; Berlin, 1956). (Chap. 2)
Kees, H. (1933) *Kulturgeschichte des Alten Orients*, Vol. I, Ägypten (Handbuch der Altertums III) (Munich). (Chap. 3)
Kees, H. (1941–56) *Gutterglaube im alten Ägypten* (Leipzig, 1941; Berlin, 1956). (Chaps 2, 3)
Kees, H. (1953) *Das Priestertum im ägyptischen Staat* (Probleme der ägyptologie 1) (Leiden). (Chap. 3)
Kees, H. (1956) *Totenglauben und Jenseitsvorstellungen der alten Ägypter*, 2. Auflage (Berlin). (Chaps 2, 3)
Kees, H. (1958) *Das alte Ägypten. Eine Kleine Landeskunde* (Berlin)
Kees, H. (1961) *Ancient Egypt, a cultural topography*, ed. T. G. H. James, (London). (Chap. 2)
Kendall, R. L. and Livingstone, D. A. (1972) 'Paleo-ecological studies on the East African Plateau, *Acts VI Congr. PPQS* (Chap. 21)
Kent, R. (1970) *Early kingdoms in Madagascar, 1500–1700* (New York: Holt, Reinhardt and Winston). (Chap. 28)
Klapwijk, M. (1973) 'An Early Iron Age site near Tzaneen, North-Eastern Transvaal, SAJS, LXIX. (Chap. 27)

Klapwijk, M. (1974)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pottery from the North-Eastern Transvaal, South Africa, SAAB, 29. (Chap. 26)
Kieran, J. A. and Ogot, B. A. (1968) *Zamani: a survey of the East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London) revised edn 1974. (Chap. 23)
Kirk, W. (1962) The North-East Monsoon and some aspects of African history', JAH, III. (Chap. 22)
Kirwan, L. P. (1939) *Oxford University Excavations at Firka*, pp. 49–51. (Chap. 12)
Kirwan, L. P. (1957) 'Tanqasi and the Noba', *Kush*, V. (Chap. 10)
Kirwan, L. P. (1960)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Meroe', *Kush*, VIII. (Chaps 10, 13)
Kirwan, L. P. (1963) 'The X-group enigma. A little known people of the Nubian Nile', *Vanish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pp. 55–78). (Chap. 12)
Kirwan, L. P. (1966) 'Prelude to Nubian Christianity (Prélude a la chrétienté nubienne)', *Melanges K. Michalowski* (Warsaw): abr. Nubian Christianity. (Chap. 12)
Kirwan, L. P. (1972)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and the Kingdom of Axum', *GJ*, 138, 2, pp. 166–77. (Chap. 14)
Kirwan, L. P. and Emery, W. B. (1935) *The Excavations and survey between Wadi-es-Sebua and Amdan* (Cairo: Governments Press). (Chap. 9)
Kitchen, K. A. (1971) Article in *Orientalia*. (Chap. 4)
Kitchen, K. A. (1973)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 (Warminster). (Chaps 2, 5)
Ki-Zerbo, J. (1972) *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Hatier). (Chaps 20, 21)
Klasens, A. (1964) 'De Nederlandse opgravingen in Nubie; tweede seicoeh 1962–4', *Phoenix*, X, 2, pp. 147–56. (Chap. 12)
Klasens, A. (1967) 'Dutch archaeological mission to Nubia. The excavations at Abu Simbel North 1962–4', *Fouilles en Nubie* (1961–3) (Cairo: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Egypte), pp. 79–86. (Chap. 12)
Klein, R. G. (1972)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July through September 1970 excavations at Nelson Bay Cave, Plettonberg Bay,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in E. M. van Zinderen Bakker (ed.), *Palaeoecology of Africa and of the Surrounding Islands and Antarctica* (Cape Town: Balkema), Vol. VI, pp. 177–208. (Chap. 26)
Kobisachanov, Y. M. (1966) *Aksum* (Moscow: Nauka). (Chap. 14)
Koerte, A. (1929) *Hellenistic Poetry* tr. J. Hammer, M. Hadas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 6)
Kolb, P. (1719)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or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several nations of the Hottentots ... with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utch settlements at the Cape*, tr. Mr Medley (1731), 2 Vols. (London: Innys). (Chap. 26)
Kolendo, J. (1970) 'Epigraphie et archéologie: *le praepositus camellorum* dans une inscription d'Ostie'. *Klio*, pp. 287–98. (Chap. 20)
Kolendo, J. (1970) 'L'influence de Carthage sur la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de Rome', *Archeologia*, XXI (Warsaw). (Chap. 17)
Kornemann, E. (1901) Article in *Philologus*, LX. (Chap. 19)
Korte, A. (1929) *Hellenistic poetry*, tr. J. Hammer and M. Hodas (New York). (Chap. 6)
Kotula, T. (1964) 'Encore sur la mort de Ptolémée, roi de Maurétanie', *Archeologia* (Paris), XV, pp. 76–92. (Chap. 6)
Krakling, C. H. (1960) *Ptolemais, city of the Libyan Pentapolis* (Chicago). (Chap. 6)
Kraus, J. (1930) 'Die Anfange des Christentums in Nubien', in J. Schmidlin (ed.), *Missions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2. (Chap. 12)
Krencker, D. M. (1913) *Deutsche Aksum-Expedition II. Ältere Denkmäler Nordabessiniens*, Band II (Berlin: G. Reisner), pp. 107, 113 ff. (Chaps 13, 15)
Krencker, D. M. and Littman, E. (1913) *Deutsche Axum Expedition*, Band IV (Berlin), pp. 4–35 (Chap. 16)
Kuentz, C. and Desroches-Noblecourt, C. (1968) 'Le petit temple d'Abou Simbel, I', *Memoires du Centre d'études sur l'ancienne Egypte* (Cairo). (Chap. 3)
Kryzyaniak, K. L. and Jakobielski, S. (1967) 'Polish Excavation at Old Dongola, Third Season, 1966-67', *Kush*, XV. (Chap. 12)

Labīd ibn Rabī'ah, *Die Gedichte des Lebîd, Nach der Wiener Ausgabe übersetzt und mit Anmerkungen versehn aus dem Nachlasse des Dr. A. Huber*, ed. C. Brockelmann (1891–2) (Leiden). (Chap. 15)
Lambert, N. (1970) 'Medinet Sbat et la protohistoire de Mauritanie occidentale', *Ant. Afr.*, IV, pp. 43–62. (Chaps 20, 21)
Lambert, N. (1971) 'Les industries sur cuivre dans l'ouest saharien', *WAJA*, I, pp. 9–21. (Chap. 29)
Lambert, R. (1925) *Lexique hiéroglyphique* (Paris), (Chap. 1)

Lancel, S. and Pouthier, L. (1957) 'Première campagne de fouilles à Tigisis', *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Institut Français), pp. 247–53. **(Chap. 19)**
Lapeyre, G. G. and Pellegrin, A. (1942) *Carthage punique (814–146 avant J.-C.)* (Paris: Payot). **(Chap. 18)**
Lassus, J. (1956) 'Fouilles à Mila. Une tour de l'ancienne byzantine', *Libyca*, IV, 2, pp. 232–9. **(Chap. 19)**
Lassus, J. (1975) 'La forteresse byzantine de Thamugadi', *Actes XIV Congr. Intern. Et. Byz.*, pp. 463–76. **(Chap. 19)**
Lauer, J. P. (1938) 'La pyramide a Degrés, *Fouilles á Saqqarah*, 5 Vols (Cāiro: Imprimeri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Chap. 5)**
Law, R. C. (1967) 'The Garamantes and trans-Saharan enterprise in classical times', *JCH*, pp. 181–200. **(Chap. 20)**
Lawal, B. (1973) 'Dating problems at Igbo Ukwu', *JAH*, XIV, pp. 1–8. **(Chap. 29)**
Leakey, M. D., Owen, W. E. and Leakey, L. S. B. (1948) 'Dimple-based pottery from central Kavirondo, Kenya', *Coryndon Mem. Mus. Occ. Papers*, 2, p. 43. **(Chap. 25)**
Lebeuf, J.-P. (1962) *Archéologie tchadienne; les Sao du Cameroun et du Tchad* (Paris: Hermann). **(Chaps 21, 24)**
Lebeuf, J.-P. (1970) *Carte archéologique des abords du lac Tchad au 1/300 000* (Paris: CNRS). **(Chap. 20)**
Lebeuf, J.-P. and Griaule, M (1948) 'Fouilles dans la région du Tchad', *JSA*, 18, pp. 1–116. **(Chap. 21)**.
Leca, A. P. (1971) *La Médecine égyptienne au temps des pharaons* (Paris: Éditions Roger Da costa). **(Chap. 5)**
Leclant, J. (1950a) See Rowe, A. **(Chap. 17)**
Leclant, J. (1950b) 'Per Africae sitientia, temoignage des sources classiques sur les pistes menant à l'oasis d'Ammon', *BIFAO*, 49, pp. 193–253. **(Chaps 17, 20)**
Leclant, J. (1954) 'Fouilles et travaux en Egypte 1952–1953', *Orientalia*, 23, 1, pp. 64–79. **(Chaps 12, 17)**
Leclant, J. (1956a) 'Egypte-Afrique,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a diffusion des monuments égyptiens en Afrique', *BSFE*, 21, pp. 29–41. **(Chap. 4)**
Leclant, J. (1956b) 'Le fer dans l'Egypte ancienne, le Soudan et l'Afrique', *Actes Coll. Intern. Fer.*, pp. 83–91. **(Chap. 20)**
Leclant, J. (1958–74) 'Fouilles et travaux en Egypte et au Soudan', *Orientalia*. **(Chap. 12)**
Leclant, J. (1959a) 'Les fouilles à Axoum en 1955–1956', rapport préliminaire', *AE*, 3, pp. 3–23. **(Chap. 14)**
Leclant, J. (1959b) 'Haoulti-Mélazo (1955–6)', *AE*, 3, pp. 43–82. **(Chap. 13)**
Leclant, J. (1961) 'Découverte de monuments égyptiens ou égyptisants hors de la vallée du Nil, 1955–60', *Orientalia*, 30, pp. 391–406. **(Chap. 13)**
Leclant, J. (1962) Article in *BSA Copte*, 16, pp. 295–8. **(Chap. 13)**
Leclant, J. (1964–7) 'Au sujet des objets égyptiens decouverts en Ethiopie', *Orientalia*, 33, pp. 388–9; 34, p. 220; 35, p. 165; 36, p. 216. **(Chap. 14)**
Leclant, J. (1965a) 'Le musée des antiquitiés à Addis-Ababa', *BSAC*, 16, pp. 86–7. **(Chap. 13)**
Leclant, J. (1965b) *Recherches sur les monuments thébains de la XXVe dynastie, dite éthiopienne* (Cairo: Imprimeri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Chaps 10, 11)**
Leclant, J. (1965c) 'Note sur l'amulette en cornaline: J.E. 2832', *AE*, VI, pp. 86–7. **(Chap. 15)**
Leclant, J. (1970a) 'L'art chrétien d'Ethiopie. Découvertes récentes et points de vue nouveaux', in E. Dinkler (ed.),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scher Zeit.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auf Grund der jüngsten Ausgrabungen* (1970)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291–302. **(Chap. 12)**
Leclant, J. (1970b) 'La religion méroïtique', *Histoire des Religions*, publ.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 Brillant and R. Aigrain (Paris: Blond et Guy). **(Chap. 11)**
Leclant, J. (1973a) 'Glass from the meroitic necropolis of Sedeinga (Sudanese Nubia)', *JGS*, XV, pp. 52–68. **(Chap. 10)**
Leclant, J. (1973b) *Lexikon der Aegyptologie* (Wiesbaden), 1, 2, collection 196–9. **(Chap. 10)**
Leclant, J. (1974) 'Les textes des pyramides. Textes et languages de l'Égypte pharaonique II', *BIFAO*, 64, 2, pp. 37–52. **(Chap. 10)**
Leclant, J. (1976a) 'Koushites et méroites. L'iconographie des souverains africains du Haut Nil antique', *L'Image du noir dans l'art occidental*, Vol. I: *Des Pharaons a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eds J. Vercoutter, J. Leclant and F. Snowden (Fribourg: Menil Foundation), pp. 89–132. **(Chap. 11)**
Leclant, J. (1976b) 'L'Egypte, terre d'Afrique dans le monde gréco-romain', *L'Image du noir dans l'art occidental*, Vol. I (see under Vercoutter, J.), pp. 269–85. **(Chap. 6)**

Leclant, J. and Leroy, J. (1968) 'Nubien', *Propyläen Kunstgeschichte, Byzanz und Christlischen Osten*, Vol. III (Berlin). **(Chap. 12)**
Leclant, J. and Miquel, A. (1959) 'Reconnaissances dans l'Agamê: Goulo-Makeda et Sabéa (Octobre 1955 et Avril 1956)', *AE*, III, pp. 107–30. **(Chap. 13)**
Lee, R. B. (1968) 'What hunters do for a living: or how to make out on scarce resources', in R. B. Lee and I. De Vore, *Man the Hunter* (Chicago: Aldine Press), pp. 30–48. **(Chap. 26)**
Lee, R. B. (1972) 'The !Kung bushmen of Botswana', in M. G. Bicchieri (ed.), *Hunters and Gatherers Toda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Chap. 26)**
Lefebvre, G. (1949) *Romans et contes égyptiens de l'époque pharaonique* (Paris). **(Chap. 2)**
Lefebvre, G. (1956) *Essai sur la médecine égyptienne de l'époque pharaonique* (Paris). **(Chap. 5)**
Leglay, M. (1966) *Saturne africain, histoire* (Paris: de Boccard). **(Chaps 17, 19)**
Leglay, M (1967) *Saturne africain, monuments*, 2 Vols.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Chap. 19)**
Lepelley, C. (1967) 'L'agriculture africaine au Bas-Empire', *Ant. Afr.*, 1, pp. 135–44. **(Chap. 19)**
Lepelley, C. (1968) 'Saint Léon Le Grand et l'église mauritanienne. Primauté romaine et autonomie africaine au Ve siècle', *Mélanges Ch. Saumagne (Tunis)*, pp. 189–204. **(Chap. 19)**
Leschi, L. (1945) 'Mission au Fezzan', *Trav. IRS*, pp. 183–6. **(Chap. 20)**
Lesquier, J. (1918) *L'Armée romaine en Egypte d'Auguste à Dioclétien* (Cairo: Imprimeri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Chap. 7)**
Levaillant, F. (1970) *Voyage de Monsieur le Vaillant dans l'intérieur de l'Afrique par le Cap de Bonne Espérance, dans les années 1780, 81, 82, 83, 84, et 85*, 2 Vols (New York/London: Johnson Reprint Corp.) (English tr.). **(Chap. 26)**
Levtzion, N. (1973) *Ancient Ghana and Mali* (London: Methuen). **(Chap. 29)**
Lézine, A. (1959) *Architecture Punique: recueil de documents* (Paris: PUF). **(Chap. 18)**
Lézine, A. (1960) 'Sur la population des villes africaines', *Ant. Afr.*, 3, pp. 69–82. **(Chap. 19)**
Lhote, H. (1953) 'Le cheval et le chameau dans les peintures et gravures rupestres du Sahara', *BIFAN*, XV. **(Chaps 17, 21)**
Lhote, H. (1954) 'L'expédition de C. Balbus au Sahara en 19 av. J.-C. d'après le texte de Pline', *RA*, pp. 41–83. **(Chap. 20)**
Lhote, H. (1955) *Les Touareg du Hoggar (Ahaggar)* 2nd edn (Paris: Payot). **(Chap. 20)**
Lhote, H. (1958) *The Search for the Tassili Frescoes*, tr. A. H. Broderick (1959) (London: Hutchinson). **(Chap. 24)**
Lhote, J. (1963) 'Chars rupestres du Sahara', *CRAI*, pp. 225–38. **(Chap. 17)**
Lhote, H. (1967) 'Problèmes sahariens: l'outre, la marmite, le chameau, le délou, l'agriculture, le negre, le palmier', *BAM*, Vii, pp. 57–89. **(Chaps 17, 20)**
Lhote, H. (1970) 'Découverte de chasse de guerre en Air', *NA*, pp. 83–5. **(Chap. 20)**
Lichtenstein, H. *Travels in Southern Africa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and 1806*, tr. A. Plumptre (1928–30) (Cape Town: Van Riebeeck Society). **(Chap. 26)**
Lieblein, J. D. C. (1886a) 'Der Handel des Landes Pûn', *ZÄS*, XXIV, pp. 7–15. **(Chap. 4)**
Lieblein, J. D. C. (1886b) *Handel und Schiffahrt auf dem roten Meere in alten Zeiten* (Christiania: Dybwad). **(Chap. 4)**
Linares de Sapir, O. (1971) 'Shell middens of Lower Casamance and problems of Diola protohistory', *WAJA*, 1, pp. 23–54. **(Chaps 24, 29)**
Littmann, E. (1910–15) *Publications of the Princeton Expedition to Abyssinia*, 4 Vols (Leiden). **(Chap. 15)**
Littmann, E. (1950) *Äthiopische Inschriften*. (Berlin: Akademie-Verlag). **(Chap. 11)**
Littmann, E. (1954) 'On the old Ethiopian inscription from the Berenice road', *JRAS*, pp. 120–1. **(Chap. 15)**
Littmann, E., Krencker, D. and Lupke, Th. von (1913) *Vorbericht der deutschen Aksum Expedition*, 5 Vols (Berlin). **(Chaps 13, 15, 16)**
Longpérier, A. de (1856–74) Article in *Revue numismatique*, I. **(Chap. 16)**
Lonis, R. (1974) 'A propos de l'expédition des Nasamons à travers le Sahara', *AFLSD*, 4, pp. 165–79. **(Chap. 20)**
Loundine, A. G. (1972) 'Sur les rapports entre l'Ethiopie et le Himyar du VI siècle', *Atti IV Congr. Intern. Stud. Et.* **(Chap. 15)**
Loundine, A. G. and Ryckmans, G. (1964) 'Nouvelles données sur la chronologie des rois de Saba et du Du-Raydan', *Le Muséon*, LXXVII, pp. 3–4. **(Chap. 15)**
Lucas, A. (1962) *Ancient Egyptia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London: Edward Arnold), 4th edn. **(Chap. 3)**
Lucian, *Works*, tr. A. M. Harman; K. Kilburn and M. D. McLeod (1913–67) 8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einemann). **(Chap. 1)**

Macadam, M. F. L. (1949, 1955) *The Temples of Kawa*, Vol. I: *The Inscriptions;* Vol. II: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Si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9, 10, 11, 17)**

Macadam, M. F. L. (1950) 'Four meroitic inscriptions', *JEA*, 36, pp. 43–7. **(Chaps 11, 17)**

Macadam, M. F. L. (1966) 'Queen Nawidemak', *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XXIII, 2, pp. 46–7. **(Chaps 10, 11)**

McCrindle, J. W. (ed) (1879)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Erythraean Sea* (Calcutta). **(Chap. 22)**

MacIver, D. R. (1906) 'The Rhodesian ruins, their probable origins and significance', *GJ*, 4, pp. 325–47. **(Chap. 27)**

MacIver, D. R. (1906) *Mediaeval Rhodesia* (London: Frank Cass). **(Chap. 27)**

MacIver, D. R. and Woolley, C. L. (1911) *Buhe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2 Vols. **(Chap. 9)**

McMaster, D. N. (1966) 'The ocean-going dhow trade to East Africa', *EAGR*, 4, pp. 13–24. **(Chap. 22)**

Maggs, T. M. O'C. (1971)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ize of human groups during the late stone age', *SAJS*, 2, pp. 49–53. **(Chap. 26)**

Maggs, T. M. O'C. (1973) 'The NC$_3$ Iron Age Tradition', *SASS*, LXIX, p. 326. **(Chap. 27)**

Mahy, F. de (1891) *Autour de l'île Bourbon et de Madagascar* (Paris). **(Chap. 28)**

Maier, J.-L. (1973) *L'Episcopat de l'Afrique romaine, vandale et byzantine* (Rome: Institute Suisse de Rome). **(Chap. 19)**

Maingnard, L. F. (1931) 'The lost tribes of the Cape', *SAJS*, 28, pp. 487–504. **(Chap. 26)**

Maître, J. P. (1966) 'État des recherches sur le Néolithique de l'Ahaggar', *Trav. IRS*, pp. 95–104. **(Chap. 24)**

Maître, J. P. (1971) *Contribution à la préhistoire de l'Ahaggar* (Paris: AMG). **(Chap. 17)**

Maître, J. P. (1976) 'Contribution à la prèhistoire récente de l'Ahaggar dans son contexte saharien', *BIFAN*, 38, pp. 759–83. **(Chap. 20)**

Mahjoubi, A. (n.d.) *Les Cités romaines de la Tunisie* (Tunis). **(Chap. 19)**

Mahjoubi, A. (1966) 'Nouveau témoignage épigraphique sur la communauté chrétienne de Kairouan au XIe siecle', *Africa* (Tunis), I, pp. 85–104. **(Chap. 19)**

Mahjoubi, A., Ennabli, A. and Salomonson, J. W. (1970) *La Nécropole de Raqqada* (Tunis). **(Chap. 19)**

Malala, J. (1831) *Ioannis Malalae chronographia. Ex recensione Ludovici Dindorfii*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Ioannes Malala) (Bonn: Weber).

Malhomme, J. (1953) 'Les représentations anthropomorphes du Grand Atlas', *Libyca*, I, pp. 373–85. **(Chap. 17)**

Mallon, A. (1926) *Grammaire copte avec bibliographie, chrestomathie et vocabulaire* (Beirut: Imprimerie Catholique) 3rd edn. **(Chap. 1)**

Malzac, V. (1912) *Histoire du royaume Hova depuis ses origines jusqu'à sa fin* (Tananarive: Impr. catholique) 2nd edn 1930. **(Chap. 28)**

Manetho, *Aegyptiaca*, etc., tr. W. G. Waddell (1940) (London: Heineman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rcillet-Jaubert, J. (1968) *Les Inscriptions d'Altava* (Gap: Éditions Ophrys). **(Chap. 19)**

Maret, P. de (1972) *Etude d'une collection de céramiques protohistoriques du Bas-Zaïre*, Mémoire de Licence (Brussels: University Library of Brussels). **(Chap. 25)**

Maret, P. de (1975) 'A Carbon-14 date from Zaïre', *Antiquity*, XLIX, pp. 133–7. **(Chap. 25)**

Marks, S. (1972) 'Khoisan resistance to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JAH*, XIII, 1, pp. 55–80. **(Chap. 26)**

Marliac, A. (1973) 'État des connaissances sur le Paléolithique et le Néolithique du Cameroun-Yaoundé', *ORSTOM* (Offic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Outre-Mer), roneo. **(Chap. 21)**

Martens, M. (1972) 'Observations sur la composition du visage dans les peintures de Faras (VIIIe-IXe siècles)'. *CAMAP*, VI, pp. 207–50. **(Chap. 12)**

Martens, M. (1973) 'Observations sur la composition du visage dans les peintures de Faras (IXe–XIIe siècles)', *CAMAP*, VII. **(Chap. 12)**

Mason, R. J. (1973) 'First early iron age settlement in South Africa: Broederstroom 24–73, Brits District, Transvaal', *SAJS*, LXIX, pp. 324–5. **(Chaps 26, 27)**

Mason, R. J. (1974) 'Background to the Transvaal iron age discoveries at Olifantspoort and Broederstroom', *JSAIMM*, LXXXIV, 6, pp. 211–16. **(Chaps 21, 27)**

Maspero, G. (1904) *Histoire ancienne des peuples de l'Orient classique* (Paris) 5th edn. **(Chaps 1, 11)**

Maspero, J. (1912) *L'Organisation militaire de l'Egypte byzantin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Chap. 7)**

Maspero, J. (1923) *Histoire des patriarches d'Alexandrie depuis la mort de l'empereur Anastase jusqu'à la réconciliation des églises jacobites 516–616*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hap. 7)

Massoulard, E. (1949) *Préhistoire et Protohistoire d'Egypte* (Paris: Université of Paris, Travaux et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thnologie). (Chap. 1)

Mathew, G. (1963) 'The East African coast until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in R. A.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History of East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Vol. I. (Chap. 22)

Mathew, G. (1975) 'The dating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in R. I. Rotberg and H. N. Chittick (eds), *East Africa and the Orient* (New York/London: Africana Publishing Co.). (Chap. 22)

Mauny, R. (1940) *Leptis Magna, capitale portuaire de la Tripolitaine, Africa Italiana* (Rome). (Chap. 20)

Mauny, R. (1947) 'L'ouest africain chez Ptolémée', *Actes 1re Conf. Intern. Afr. Ouest*, I, pp. 241–93. (Chap. 20)

Mauny, R. (1950) 'Villages néolithiques de la falaise (dhar) Tichitt-Oualata', *Na*, 50, pp. 35–43. (Chap. 24)

Mauny, R. (1951) 'Un âge du cuivre au Sahara occidental', *BIFAN*, XIII, pp. 165–80. (Chap. 24)

Mauny, R. (1952) 'Essai sur l'histoire des métaux en Afrique occidentale', *BIFAN*, XIV, pp. 545–95. (Chap. 21)

Mauny, R. (1954) 'Gravures, peintures et inscriptions de l'ouest Africain', *IFAN*, XI. (Chap. 20)

Mauny, R. (1956a) 'Monnaies antiques trouvées en Afrique au sud du Limes romain', *Libyca*, pp. 249–61. (Chap. 20)

Mauny, R. (1956b) 'Préhistoire et géologie: la grande faune éthiopienne du nord-ouest africain du Paléolithique à nos jours', *BIFAN*, A, pp. 246–79. (Chap. 20)

Mauny, R. (1960) *Les Navigations médiévales sur les côtes sahariennes antérieures à la découverte portugaises* (Lisbon). (Chap. 21)

Mauny, R. (1961) 'Tableau géographique de l'ouest africain au Moyen-Age d'après les sources ecritez, la tradition orale et l'archéologie', *IFAN*, 61 (Chaps 20, 29)

Mauny, R. (1968) 'Le périple de la Mer Erythrée et le problème du commerce romain en Afrique au sud du Limes', *JSA*, 38, 1, pp. 19–34. (Chap. 28)

Mauny, R. (1970) *Les Siècles obscures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Fayard). (Chap. 20)

Maurin, L. (1968) 'Thuburbo Majus et la paix vandale', *Mélanges Ch. Saumagne* (Tunis), pp. 225–54. (Chap. 19)

Medic, M. (1965) 'Vadi es Sebua', *ZZSK*, XVI, pp. 41–50. (Chap. 12)

Meillassoux, C. (1960) 'Essai d'interprétation du phénomène économique dans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nelles d'autosubsistance', *CEA*, 4, pp. 38–67. (Chap. 21)

Mekouria, T. T. (1966–7) *Yeityopia Tarik Axum Zagoué*, Vol. II. *Brehanena Selam, Matemiva Bete* (D. Eth.), pp. 203–17; *Yeityopia Tarik Nubia* (*Napata-Meroe*), pp. 2–7. (Chap. 16)

Mekouria, T. T. (1967) *L'Eglise d'Ethiopie* (Paris). (Chap. 16)

Mellis, J. V. (1938) *Nord et nord-ouest de Madagascar. 'Volamena et Volafotsy' suivi d'un vocabulaire du nord-ouest expliqué, commenté et comparé au Merina* (Tananarive: Pitot de la Beaujardière). (Chap. 28)

Meltzer, O. and Kahrstedt, U. (1879–1913) *Geschichte der Karthager* (Berlin), Vols I–III. (Chap. 18)

Mesgnil, F. de ( ) *Madayana, Homère et la tribu mycénienne* (Tananarive). (Chap. 28)

Meyer, E. (1913–31)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5 Vols (Berlin Stuttgart: Cotta). (Chap. 11)

Meyerowitz, E. L.-R. (1960) *The Divine Kingship in Ghana and Ancient Egypt* (London: Faber & Faber). (Chap. 4)

Michałowski, K. (1962) *Faras: Fouilles Polonaises* (Warsaw: Polich Academy of Science). (Chap. 12)

Michałowski, K. (1964) 'Die wichtigsten Entwicklungsetappen der Wandmalerei in Faras', in *Christentum am Nil*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79–94. (Chap. 12)

Michałowski, K. (1965a) 'La Nubie chrétienne', *AB*, 3, pp. 9–25. (Chap. 12)

Michałowski, K. (1965b) 'Polish excavations at Faras, fourth season, 1963–64', *Kush*, XIII, pp. 177–89. (Chap. 12)

Michałowski, K. (1966a)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first season (November–December 1964)', *Kush*, XIV, pp. 289–99. (Chap. 12)

Michałowski, K. (1966b) *Faras, centre artistique de la Nubie chrétienne*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Chap. 12)

Michałowski, K. (1967a) 'Pro-Preshnemû li ostayetya zagadkoy gruppa X?', *Vestnik drevney Istoryi*, 2, pp. 104–211. (Chap. 12)

Michałowski, K. (1967b) *Faras, die Kathedrale aus dem Wüstensand* (Einsiedeln/Zürich/Cologne: Benziger Verlag). (Chaps 8, 12)

Michalowski, K. (1969) *The Art of Ancient Egypt*, tr. and adapted by N. Gutermann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12)**

Michalowski, K. (1970) 'Open problems of Nub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light of the discoveries at Faras', in E. Dinkler (ed.) (Recklinghausen). **(Chap. 12)**

Michalowski, K. (1974) *Faras. Wall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 (Warsaw: Wydawnictwo Artystyczno-Graficzne). **(Chap. 12)**

Michalowski, K. (ed.) (1975) 'Nubia, récentes recherches', *Actes Coll. Nubiol. Intern.* **(Chaps 10, 12)**

Migne, J. P. (1884) *Patrologia graeca, xxv; Athanasius Apologia ad Constantium* (Paris), p. 635. **(Chap 15)**

Miller, J. I. (1969) *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22)**

Miller, S. F. (1969) 'Contacts between the later stone age and the early iron age in southern central Africa', *Azania*, 4, pp. 81–90. **(Chap. 27)**

Miller, S. F. (1971) 'The age of Nachikufan industry in Zambia', *SAAB*, 26, pp. 143–6. **(Chap. 25)**

Mills, E. A. C. and Filmer, N. T. (1972) 'Chondwe iron age site, Ndola, Zambia', *Azania*, VII, pp. 129–47. **(Chap. 27)**

Milne, J. G. (1924) *A History of Egypt under Roman Rule*, 3rd ed. rev. (London: Methuen). **(Chap. 7)**

Møberg, A. (1924) *The Book of Himyarites. Fragments of a hitherto unknown Syrian work on the Himyarite Martyrs* (Lund: Gleerup). **(Chap. 15)**

Möller, G. (1924) 'Die Aegypten und ihre libyschen Nachbaren', *ZDMG*, 78, p. 38. **(Chap. 17)**

Mommsen, Th. (1908) *Eusebiu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II, 2 (Leipzig) pp. 972–3. **(Chap. 15)**

Monneret de Villard, U. (1935–57) *La Nubia médiévale*, Vols 1–4 (Cairo: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Chap. 12)**

Monneret de Villard, U. (1938) 'Storia della Nubia christiana', *OCA*, 118. **(Chap. 12)**

Monneret de Villard, U. (1941) *La Nubia romana* (Rome: Instituto per l'Oriente). **(Chap. 11)**

Monod, T. (1948) *Mission au Fezzan*, Vol. II: *Reconnaissance au Dohone*. **(Chap. 20)**

Monod, T. (1967) 'Notes sur le harnachement chamelier', *BIFAN*. **(Chap. 20)**

Monod, T. (1974) 'Le mythe de l'émeraude des Garamantes', *AA*, VIII, pp. 51–66. **(Chap. 20)**

Montagu, M. F. A. (1960) *An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Anthropology* (Springfield, Ill.: Thomas), 3rd edn. **(Chap. 1)**

Montet, P. (1958) *Everyday Life in Egypt in the Days of Ramesses the Great*, tr. A. R. Maxwell-Hyslop and Margaret S. Drower (London: Edward Arnold). **(Chaps 2, 3)**

Montet, P. (1964) L'Égypte eternelle (Paris), tr. Doreen Weightman *Eternal Egyp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Chap. 3)**

Montevecchi, O. (1937) *La papirologia* (Turin: Societa Editrice Internazionale). **(Chap. 7)**

Moorsel, P. Van (1966) 'Une téophanie nubienne', *RAC*, XLII, 1–4, pp. 297–316. **(Chap. 12)**

Moorsel, P. Van (1967) 'Abdallah Nirqi', *Spiegel Historiael*, II (Netherlands), pp. 388–92. **(Chap. 12)**

Moorsel, P. Van (1970) 'Die Wandmalerlien der Zentralen Kirche von Abdallah Nirqi', in E. von Dinkler (ed.)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cher Zeit* (1970)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103–111. **(Chap. 12)**

Moorsel, P. Van (1972) 'Gli scavi olanolesi in Nubia', *Actas VIII Congr. Intern. Arqueo. Christ.* pp. 349–95. **(Chap. 12)**

Moorsel, P. Van, Jacquet, J. and Schneider, H. (1975) *The Central Church of Abdallah Nirqi* (Leiden: Brill). **(Chap. 12)**

Mordini, A. (1960) 'Gli aurei Kushàna del convento di Dabra-Dàmmo', *Atti Convegno Intern. Stud. Et.*, 2–4 April 1959, Rome, p. 253. **(Chap. 15)**

Morel, J. P. (1968) 'Céramique à vernis noir du Maroc', *Ant. Afr.*, 2, and 'Céramique d'Hippone', *BAA*, 1, 1962–5. **(Chap. 19)**

Moret, A. (1926) *Le Nil et la civilisation égyptienne* (Paris: 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Vol. VII. **(Chap. 2)**

Mori, F. (1964) 'Some aspects of the rock art of the Acacus (Fezzan, Sahara) and dating regarding it', in L. Pericot García and E. Ripoll Parello (eds) (1964) *Wartenstein Symposium on Rock Art of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and the Sahara: Prehistoric art of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and the Sahara.* (New York: subscribers edn distributed through *Current Anthropology* for the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p. 247–59. **(Chap. 17)**

Mori, F. (1965) *Tadrart Acacus: Arte rupestre e culture del Sahara prehistorico* (Turin: Einaudi). **(Chap. 24)**

Mori, F. (1972) *Rock Art of the Tadrart Acacus* (Graz.) **(Chap. 21)**

Morrisson, C. (1970) *Catalogue des monnaies byzantine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Chap. 19)**

Mortelmans, G. (1957) 'La préhistoire du Congo belge', *RUB*, 2–3. **(Chap. 25)**

Mortelmans, G. (1962) 'Archéologie des grottes Dimba et Ngoro (région de Thysville, Bas-Congo)', *Actes IV Congr. PPEQ*, pp. 407–25. **(Chap. 25)**

Moscati, S. (1968) *L'épopée des Phéniciens* (Paris: Fayard), 1971 edn, tr. A. Hamilton *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Chap. 18)
Müller, W. M. (1906–20) *Egyptological Researches*, Vol. II: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1906'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Chap. 17)
Munier, H. (1943) *Recueil des listes épiscopales de l'Église copte* (Cairo: La Société de l'Archaéologie Copte). (Chap. 12)
Munson, P. J. (1967) 'A survey of the Neolithic villages of Dhar Tichitt (Mauretania) and some comments on the grain impressions found on the Tichitt pottery', *Actes VI Congr. PPQS*. (Chap. 24)
Munson, P. J. (1968) 'Rec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Dhar Tichitt region of south central Mauretania', *WAAN*, 10, pp. 6–13. (Chap. 24)
Munson, P. J. (1969) 'Engravings of ox-drawn chariots', *NA*, 122, pp. 62–3. (Chap. 21)
Munson, P. J. (1970)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al comments concerning the Tichitt tradition', *WAAN*, 12, pp. 47–8. (Chap. 24)
Munson, P. J. (1972) 'Archaeological data on the origin of cultiv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Sahar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west Africa', *BWS 56*. (Chap. 24)
Murdock, G. P. (1959) *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New York: McGraw Hill). (Chaps 21, 23)

Naville, E. (1907–13) *The XIth Dynasty Temple at Der-el-Bahari*, 3 Vols (London: Office of the Egypt Exploration Fund). (Chap. 2)
Nenquin, J. (1959) 'Dimple-based pots from Kasai, Belgian Congo', *Man*, 59, 242, pp. 153–5. (Chap. 25)
Nenquin, J. (1961) 'Protohistorische Metaaltechniek in Katanga', *Africa-Tervuren*, VII, 4, pp. 97–101. (Chap. 25)
Nenquin, J. (1963) 'Excavations at Sanga, 1957. The protohistoric necropolis', *AMRAC*, 45. (Chaps 25, 29)
Nibbi, A. (1975) *The Sea Peoples and Egypt* (Park Ridge, NJ: Noyes Press). (Chap. 2)
Nicolaus, R. A. (1968) *Melanins* (Paris: Hermann). (Chap. 1)
Noshï, I. (1937) *The Arts in Ptolemaic Egypt: A Study of Greek and Egyptian Influences in Ptolemaic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 (London: OUP). (Chap. 6)
Noten, F. Van (1968) 'The Uelian. A culture with a Neolithic aspect, Uele Basin (N.E. Congo Republic), *AMRAC*, 64. (Chap. 25)
Noten, F. Van (1972a) 'Les tombes du roi Cyirima Rujugira et de la reine-mère Nyirayuhi Kanjogera', *AMRAC*, 77. (Chap. 25)
Noten F. Van (1972b) 'La plus ancienne sculpture sur bois de l'Afrique centrale', *Africa-Tervuren*, XVIII, 3–4, pp. 133–5. (Chap. 25)
Noten, F. Van and Het, E. (1974) 'Ijzersmelten bij de Madi', *Africa-Tervuren*, XX, 3–4, pp. 57–66. (Chap. 25)
Noten, F. Van and Hiernaux, J. (1967) 'The late stone age industry of Mukinanira, Rwanda', *SAAB*, 22, IV, pp. 151–4. (Chap. 25)
Nunoo, R. (1969) 'Buroburo factory excavations',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321–33. (Chap. 29)

Obenga, T. (1973) *L'Afrique dans l'antiquité – Egypte pharaonique – Afrique noir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ps 4, 21)
Odner, K. (1971a) 'Usangi hospital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North Pare mountains, north-eastern Tanzania', *Azania*, VI, pp. 89–130. (Chap. 22)
Odner, K. (1971b)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n the slopes of Kilimanjaro', *Azania*, VI, pp. 131–50. (Chap. 22)
Ogot, B. A. and Kieran, J. A. (eds) (1974) *Zamani: A Survey of the East African History* (Nairobi/London: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Longmans). (Chap. 23)
Olderogge, D. A. (1972) 'L'Arménie et l'Ethiopie au IVe siècle (à propos des sources de l'alphabet arménien)'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études ethiopiennes*, pp. 195–203. (Chap. 15)
Oliver, J. A. (1963) 'Discernible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ior, *c.* 1500–1840', in R. A.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Oxford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Vol. I, pp. 169–211. (Chap. 28)
Oliver, R. A. (1966) 'The problem of the Bantu expansion', *JAH*, VI, 3, pp. 361–76. (Chaps 21, 22, 23)
Oliver, R. A. and Fagan, B. M. (1975) *Africa in the Iron Age, c. 500 BC to AD 14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9)

Oliver, R. A. and Mathew, G. (eds) (1963) *Oxford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4)**

Orteil, F. (1952) 'The economic unific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industry, trade and commerce', in S. A. Cook *et al.* (ed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2)**

Orteil, F. (1956)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Empire', in S. A. Cook *et al.* (ed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2)**

Otto, E. (1969) 'Das Goldene Zeitalter in einem Ägyptischen Text', *Religions en Egypte hellenistique et romaine*, Colloque de Strasbourg, 16–18 May 1967 (Paris), pp. 93–100. **(Chap. 3)**

Pace-Caputo, S. (1951) *Scavi Sahariani. Monumenti antichi* (Rome: Accademia dei Lincei). **(Chap. 20)**

Painter, C. (1966) 'The Guang and West African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GNQ*, 9, pp. 58–66. **(Chap. 21)**

Palmer, J. A. B. (1947) 'Periplus Mari Erythraei; the Indian evidence as to its date', *CQ*, XLI, pp. 136–41. **(Chap. 22)**

Pankhurst, R. K. P. (196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 from early times to 1800* (London: Lalibela House). **(Chap. 22)**

Papyrus Ebers. The Greatest Egyptian Medical Document, trs **B. Ebbell** (1937) (Copenhagen: Levin & Munksgaar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yrus Rhind. The Rhind mathematical papyrus, British Museum 10057 and 10053 (Oberlin). **(Chap. 5)**

Paribeni, E. (1959) *Catalogo delle sculture de Cirene. Statue e rilievi di carattere religioso* (Rome), Monografie di Archeologia libica No. 5. **(Chap. 6)**

Paribeni, R. (1908) 'Richerche nel luogo dell'antica Adulis', *Antichita Publicati per Curia dell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18, pp. 438–572. **(Chaps 13, 15)**

Parkington, J. E. (1972) 'Seasonal mobility in the later stone age', *AS*, 31, pp. 223–43. **(Chap. 26)**

Parkington, J. E. and Pöggenpoel, C. (1971) 'Excavations at De Hangen 1968', *SAAB*, 26, pp. 3–36. **(Chap. 26)**

Paterson, W. (1789) *A Narrative of Four Journeys into the Country of the Hottentots and Caffraria, in the Years 1777, 1778, 1779* (London). **(Chap. 26)**

Pedrals, D. P. de (1950) *Archéologie de l'Afrique noire; Nubie, Ethiopie, Niger sahélien, L'Aire tchadienne, Niger inférieur, Zimbabwé, Sénégambie, Congo belge* (Paris: Payot). **(Chap. 1)**

Perret, R. (1936)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ethnographiques au Tassili des Ajjers', *JSA*, 6, pp. 50–1. **(Chap. 17)**

Perrot, J. *et al.* (1972) 'Une statue de Darius découverte à Suse', *JA*, pp. 235–66. **(Chap. 10)**

Perroy, L. (1969) *Gabon, cultures et techniques* (Libreville: Cah. ORSTOM, Offic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Outre-Mer, Musée des Arts et Traditions), 275/195. **(Chap. 21)**

Pesce, G. (1961) *Sardegna Punica* (Cagliari). **(Chap. 18)**

Petrie, W. M. F. (1901) *Diospolis Parva, the cemeteries of Abadiyeh and Hu, 1898–9* (London/Boston, Mass.: Egypt Exploration Fund). **(Chap. 9)**

Petrie, W. M. F. (1939) *The Making of Egypt* (London: Sheldon Press; New York: Macmillan). **(Chap. 1)**

Pettigrew, T. J. (1834) *A History of Egyptian Mummies, and an Account of the Worship and Embalming of Sacred Animals by the Egyptians* (London: Longman). **(Chap. 1)**

Pflaum, H. G. (1957) 'A propos de la date de la création de la province de Numidie', *Libyca*, pp. 61–75. **(Chap. 19)**

Phillipson, D. W. (1968a) 'The early iron age in Zambia – regional variants and some tentative conclusions', *JAH*, IX, 2, pp. 191–214. **(Chaps 21, 25, 26, 27)**

Phillipson, D. W. (1968b) 'The early iron age site at Kapwirimbwe, Lusaka', *Azania*, III, pp. 87–105. **(Chap. 27)**

Phillipson, D. W. (1968c) 'Cewa, Leya, and Lala iron-smelting furnaces', *SAAB*, XXIII, pp. 102–13. **(Chap. 27)**

Phillipson, D. W. (1969) 'Early iron-using peoples of southern Africa', in L. Thompson (ed.), *African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p. 24–49. **(Chap. 27)**

Phillipson, D. W. (1970a) 'Excavations at Twickenham Road, Lusaka', *Azania*, V: pp. 77–118. **(Chap. 27)**

Phillipson, D. W. (1970b) 'Notes on the later prehistoric radiocarbon chronolog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JAH*, XI, pp. 1–15. **(Chap. 27)**

Phillipson, D. W. (1971) 'An early iron age site on the Lubusi river, Kaoma district, Zambia', *ZMJ*, II, pp. 51–7. **(Chap. 27)**

Phillipson, D. W. (1972a) *Prehistoric Rock Paintings and Engravings of Zambia* (Livingstone, Zambia: Exhibition catalogue of Livingstone Museum). **(Chap. 29)**

Phillipson, D. W. (1972b) 'Early iron age sites on the Zambian copperbelt', *Azania*, VII, pp. 93–128. **(Chap. 27)**

Phillipson, D. W. (1973) 'The prehistoric succession in eastern Zambia: a preliminary report', *Azania*, VIII, pp. 3–24. **(Chap. 27)**

Phillipson, D. W. (1974) 'Iron ag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Zambia', *JAH*, XV, pp. 1–25. **(Chap. 27)**

Phillipson, D. W. (1975) 'The chronology of the iron age in Bantu Africa', *JAH*, XVI, pp. 321–42. **(Chaps 23, 27)**

Phillipson, D. W. (1977) *The Later Prehistor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Chap. 27)**

Phillipson, D. W. and Fagan, B. M. (1969) 'The date of the Ingombe Ilede burials', *JAH*, X, pp. 199–204. **(Chap. 27)**

Pigache, J. P. (1970) 'Le Problème anthropobiologique à Madagascar', *Taloha* (Tananarive), 3, pp. 175–7. **(Chap. 28)**

Pigulevskaya, N. V. (1951) *Vizantiya na putyah v Indiyu* (Moscow: Izdatel'stvo Akademiya, Nauk). **(Chap. 15)**

Pigulevskaya, N. V. (1969) *Byzanz auf den Wegen nach Indien: aus der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Handels mit dem Orient vom 4. bis 6. Jahrhundert* (Berlin: Akademie-Verlag; Amsterdam: Hakkert). **(Chap. 16)**

Pirenne, J. (1955) *La Grèce et Saba: Une nouvelle base pour la chronologie sud-arab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Chap. 13)**

Pirenne, J. (1956) *Paléographie des inscriptions sud-arabes. Contribution à la chronologie et à l'histoire de l'Arabie du Sud antique* (Brussels: Paleis der Academiën), Vol. I. **(Chap. 13)**

Pirenne, J. (1961) 'Un problème clef pour la chronologie de l'Orient: la date du "Périple de la Mer Erythrée"', *JA*, 249, pp. 441–59. **(Chap. 13)**

Pirenne, J. (1961–3)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de l'Égypte ancienne*, 3 Vols (Paris: Neuchâtel). **(Chap. 2)**

Pirenne, J. (1965) 'Arte Sabeo d'Etiopia', *Encyclopedia dell'arte antica* (Rome), Vol. VI, pp. 1044–8 **Chap. 13)**

Pirenne, J. (1967) 'Haoulti et ses monuments. Nouvelle interprétation', *AE*, 7, pp. 125–33. **(Chap. 13)**

Pirenne, J. (1969) 'Notes d'archéologie sud-arabe, VI', *Syria*, 46, pp. 308–13. **(Chap. 13)**

Pirenne, J. (1970a) 'Haoulti, Gobochela (Mélazo) et le site antique', *AE*, 8, pp. 117–27. **(Chap. 13)**

Pirenne, J. (1970b)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navigation Egypte-Inde dans l'antiquité,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Océan Indien', *Actes 8e Coll. Intern. Hist. Marit.*, pp. 101–19. **(Chap. 22)**

Pliny, *Natural History*, tr. H. Rackham *et al.* (1938–62), 11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einemann). **(Chaps 11, 13, 15, 17, 22)**

Plumley, J. M. (1970) 'Some examples of Christian Nubian art from the excavations at Qasr Ibrim', in E. Dinkler (ed.),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cher Zeit.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auf Grund der jüngsten Ausgrabungen*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129–40. **(Chap. 12)**

Plumley, J. M. (1971) 'Pre-Christian Nubian (23 BC – 535 AD) evidence from Qasr Ibrim', *Etudes et Travaux*, 5, pp. 7–24. **(Chaps 10, 12)**

Plumley, J. M. and Adams, W. A. (1974) 'Qasr Ibrim 1912', *JEA*, 60, pp. 237–8. **(Chap. 12)**

Poinsot, L. and Lantier, R. (1923) 'Un sanctuaire de Tamit à Carthage', *RHR*, LXXXVII. **(Chap. 18)**

Poinssot, C. (1962) 'Immunitas Perticae Carthaginiensium', *CRAI*, pp. 55–76. **(Chap. 19)**

Poirier, C. (1954) 'Terre d'Islam en mer malgache', *BAM*, Cinquantenaire, pp. 71–115. **(Chap. 28)**

Poirier, C. (1965) 'Données écologiques et démographiques de la mise en place des protomalgaches', *Taloha* (Tananarive), pp. 61–2. **(Chap. 28)**

Pommeret, Y. (1965) *Civilisations préhistoriques au Gabon. Vallée du Moyen Ogooué*, 2 Vols (Libreville: 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St. Exupéry), Vol. II, 'Notes préliminaires à propos du gisement lupembien et néolithique de Ndjole'. **(Chap. 25)**

Pons, A. and Quézel, P. (1957) 'Première étude palynologique de quelques paléosols sahariens', *Trav. IRS*, 16, 2, pp. 27–35. **(Chaps 17, 24)**

Porter, B. and Moss, R. L. B. (1951) *Topographic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Egyptian Hieroglyphic Texts, Reliefs and Painting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Vol. VII, pp. 264ff. **(Chap. 11)**

Portères, A. (1950) 'Vieilles agricultures de l'Afrique intertropicale: centre d'origine et de diversification variétale primaire et berceaux d'agriculture antérieure au XVIe siècle', *AT*, 5, 9–10, pp. 489–507. **(Chap. 24)**

Portères, A. (1951a) 'Géographie alimentaire, berceaux agricoles et migrations des plantes cultivées, en Afrique intertropicale', *C-RSB*, 239, pp. 16–21. (Chap. 24)
Portères, A. (1951b) 'Une céréale mineure cultivée dans l'Ouest africain (Brachiaria deflexa C. E. Hubbard *var* sativa nov. var)', *AT*, 6, 1–2, pp. 38–42. (Chap. 24)
Portères, A. (1962) 'Berceaux agricoles primaires sur le continent africain', *JAH*, 3, 2, pp. 195–210. (Chap. 24)
Posener, G. (1936) 'La première domination perse en Egypte. Recueil d'inscriptions hiéroglyphiques', *BIFAO*, XI. (Chap. 2)
Posener, G. (1956) *Littérature et politique dans l'Egypte de la XIIe dynastie* (Paris: Champion). (Chaps 2, 5)
Posener, G. (1958) 'Pour une localisation du pays Koush au Moyen-Empire', *Kush*, 6, pp. 39–65. (Chaps 4, 9)
Posener, G. (1960) 'De la divinité de pharaon', *CSA*, XV, (Chaps 2, 3)
Posener, G., Sauneron, S. and Yoyotte, J. (1959) *Dictionnaire de la civilisation égyptienne* (Paris), tr. A Macfarlane *A Dictionary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London: Methuen) 1962. (Chaps 2, 3, 4)
Posnansky, M. (1966a)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and iron-working in southern Africa', in M. Posnansky (ed.), *Prelude to East African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2–94. (Chap. 22)
Posnansky, M. (1966b) 'Kingship,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myth', *UJ*, 30, pp. 1–12. (Chap. 29)
Posnansky, M. (1967) 'The iron age in east Africa', in W. W. Bishop and J. D. Clark (eds), *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 (Lond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629–49. (Chap. 25)
Posnansky, M. (1968) 'Bantu genesis: archaeological reflexions', *JAH*, IX, 1, pp. 1–11. (Chap. 23)
Posnansky, M. (1969) 'Yam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 African agriculture', *Odù*, 1, pp. 101–7. (Chap. 21)
Posnansky, M. (1969–70) 'Discovering Ghana's past', *Annual Museum Lectures*, p. 20. (Chap. 29)
Posnansky, M. (1971) 'Ghana and the origins of west African trade', *AQ*, XI, pp. 110–25. (Chaps 24, 29)
Posnansky, M. (1972a) 'Archaeology,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 O. Ranger and I. Kimambo (eds),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African Relig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p. 29–44. (Chap. 29)
Posnansky, M. (1972b) 'Terminology in the early iron age of east Afric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dimple-based wares of Lolui island, Uganda', *Actes VI Congr. PPQS*, pp. 577–9. (Chap. 21)
Posnansky, M. (1973a) 'Aspects of early west African trade', *WA*, 5, pp. 149–62. (Chap. 21)
Posnansky, M. (1973b) 'Review of T. Shaw, "Igbo Ukwu"', *Archaeology*, 25, 4, pp. 309–11. (Chap. 29)
Préaux, C. (1939) *L'Économie royale des Lagides* (Brussels: Foundation Egyptologique Reine Elisabeth). (Chap. 6)
Préaux, C. (1943) 'Les Egyptiens dans la civilisation hellénistique d'Egypte', *Chronique d'Egypte*, XVIII, pp. 148–60. (Chap. 6)
Préaux, C. (1950) 'La singularité de l'Egypte dans le monde gréco-romain', *Chronique d'Egypte*, XXV, pp. 110–23. (Chaps 6, 26)
Préaux, C. (1952) 'Sur la communication de l'Ethiopie avec l'Egypte hellénistique', *Chronique d'Egypte*, XXVII, pp. 257–81. (Chap. 6)
Préaux, C. (1954) 'Sur les origines des monopoles lagides', *Chronique d'Egypte*, XXIX, pp. 312–27. (Chap. 6)
Préaux, C. (1957) 'Les grecs à la découverte de l'Afrique par l'Egypte', *Chronique d'Egypte*, XXXII, pp. 284–312. (Chaps 4, 6)
Priaulx, B. (1863) 'On the Indian embassies to Rome, from the reign of Claudius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JRAS*, XX, pp. 277–8. (Chap. 15)
Priese, K. H. (1968) 'Nichtägyptische Namen und Wörter in den Ägyptischen Inschriften der Könige von Kush', *MIOD*, 14, pp. 165–91. (Chap. 10)
Priese, K. H. (1970), article in *ZÄS*, 98, 1, pp. 16–32. (Chap. 10)
Pritchard, J. B. (ed.) (1969) *The Ancient Near East: supplementary texts and picture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2)
Procopius, *De bello persico, Destunis, Spiridors et Gavriil*, ed. *Istoriya voyn rimlau spersami*, Kniga I, (St Petersburg: Nauk) 1876, pp. 274–7.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Secret History*, tr. B. H. Dewing, *et al.* (1914–40), 7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einemann) *The Vandal War, The Buildings*, ed. B. H. Dewing (1954) (London); *Iohannis*, ed. Partsch (1879) (Leipzig), Diggle-Goodyear (1970) (Cambridge). (Chaps 15, 19, 22)

Ptolemaeus, Claudius (Ptolemy, Claudius) *The Geography*, tr. E. L. Stevenson (1932) (New York). (Chaps 13, 15, 22)
Ptolemaeus Claudius, ed. K. Müller (1901) *Geographia* (Paris: A. Firmin Didot), IV, 6, 5, 6, pp. 743–5. (Chap. 17)
Pullan, R. A. (1965) 'The recent geo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south central part of the Chad basin', *JASA*, 9, 2. (Chap. 24)

Quézel, P. and Martinez, C. (1958) 'Le dernier interpluvial au Sahara central', *Libyca*, 6–7, p. 224. (Chap. 1)
Quiring, H. (1946) *Geschichte des Goldes. Die Goldenen Zeitalter in ihren kulturellen und wirtschaftlichen Bedeutung* (Stuttgart). (Chap. 11)

Rachet, M. (1970) *Rome et les Berbères: un problème militaire d'Auguste à Dioclétien* (Brussels: Latomus Revue d'Etudes Latines). (Chap. 19)
Rakoto-Ratsimamanga, A. (1940) 'Tache pigmentaire et origin des malgaches', *R. Anth.*, pp. 6–130. (Chap. 28)
Ramilisonina (1951–2) *Histoire du Zafimamy* (Ny loharon'ny Andriamamilaza) (Tananarive: Impr. Volamahitsy). (Chap. 28)
Ranke, H. (1948) *Medizin und Chirurgie im alten Ägypten* (Heidelberg: Kerle). (Chap. 5)
Rahtz, P. A. and Flight, C. (1974) 'A quern factory near Kintampo, Ghana', *WAJA*, 4, pp. 1–31. (Chap. 29)
Rauning, W. (1964) *Die kulturellen Verhaltnisse Nord und Ost Afrika im ersten nach Christlichen Jahrhundert entworfen an Hand des Periplus des Erythraischen Meeres* (Vienna). (Chap. 22)
Rauning, W. (1965) 'Die Bedeutung des Periplus des Erythraischen Meeres fur Africa', *MAGW*, XCV, pp. 55–60. (Chap. 22)
Rawlinson, H. G. (1916) *Intercourse between India and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Fall of R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2)
Rebuffat, R. (1969–70) 'Zella et les routes d'Egypte', *Libya Antiqua* (Tripoli), VI–VII, pp. 181–7. (Chaps 17, 20)
Rebuffat, R. (1970) 'Route d'Egypte et de la Libye intérieure', *SM*, 3, pp. 1–20. (Chaps 17, 20)
Rebuffat, R. (1972) 'Nouvelles recherches dans le sud de la Tripolitaine', *C-RAI*, pp. 319–39. (Chap. 20)
Rebuffat, R. (1974) 'Vestiges antiques sur la côte occidentale de l'Egypte au sud de Rabat', *AA*, VIII, pp. 25–49. (Chap. 20)
Rebuffat, R. (1975) 'Trois nouvelles campagnes dans le sud de la Tripolitaine', *C-RAI*, pp. 495–505. (Chap. 20)
Rebuffat, R. (1977) 'Bu Ngem', *LAPPMO*, Cah. no. 20. (Chap. 20)
Redford, D. W. (1967) '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the eighteenth dynasty of Egypt', *NAS*. (Chap. 2)
Reichold, W. (1978) 'Les noirs dans le livre du prophète Isaïe', *Afrique noire et monde mediterranéen dans l'antiquité*, Colloque de Dakar, 19–24 January 1976, Dakar-Abidjan, *Nouvelles Editions Africaines*, pp. 276–85. (Chap. 4)
Reinach, A. (1913) *Egyptologie et 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p. 17. (Chap. 1)
Reisner, G. A. (1910)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 Report for 1907, 1908* (Cairo: National Printing Department), Vol. I. (Chaps 9, 12)
Reisner, G. A. (1918) 'The Barkal temples in 1916', *JEA*, V. (Chap. 11)
Reisner, G. A. (1918–19) 'Outline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Sudan', *SNR*, I, pp. 3–15, 57–79, 217–37; II, pp. 35–67. (Chap. 11)
Reisner, G. A. (1923a) *Excavations at Kerma* (Cambridge, Mass.: HAS), Vols V and VI. (Chaps 9, 11)
Reisner, G. A. (1923b) 'The meroitic kingdom of Ethiopia: a chronological outline', *JEA*, 9, pp. 33–77. (Chap. 11)
Reisner, G. A. (1929) 'Excavations at Simna and Uronarti by the Harvard Boston expedition', *SNR*, XII, pp. 143–61. (Chap. 11)
Reisner, G. A. (1931) 'Inscribed monuments from Gebel Barkal', *ZÄS*, 66, p. 100. (Chap. 10)
Reisner, G. A. (1936)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yptian Tomb down to the Accession of Cheo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5)
Reisner, G. A (1942–55) *A History of the Giza Necropol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ol. II (completed and rev. by W. S. Smith) *The tomb of Hetep-herès, the mother of Cheops* (Chap 2)
Reisner, G. A. (1955) *A History of the Giza Necropolis*, Vol. II, The tomb of Hetep-Heres, the mother of Cheo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2)
Repiquet, J. (1902) *Le Sultanat d'Anjouan, îles Comores* (Paris). (Chap. 28)

Resch, W. (1967) *Das Rind in den Felsbilddarstellungen Nordafrika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Chap. 17)

Reusch, R. (1961) *History of East Africa* (New York: Ungar). (Chap. 22)

Reygasse, M. (1950) *Monuments funéraires préislamiques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Chap. 20)

Reynolds, V. (1967) *The Apes: the gorilla, chimpanzee, orangutan and gibbon: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world* (New York: Dutton). (Chap. 21)

Riavi, S. A. (1967) 'Zanj: its first known use in Arabic literature', *Azania*, II, pp. 200–1. (Chap. 22)

Ricci, L. (1955–8) 'Retrovamenti archeologici in Eritrea', *RSE*, 14, pp. 51–63. (Chap. 13)

Ricci, L. (1959–60) 'Iscrizioni rupestre dell'Eritrea', *RSE*, 15, pp. 55–95; 16, pp. 77–119. (Chap. 13)

Ricci, L. (1960a) 'Notizie archeologiche', *RSE*, 16, pp. 120–3. (Chap. 13)

Ricci, L. (1960b) 'Iscrizioni rupestre dell'Eritrea', *Atti Congr. Intern. Stud. Et.*, pp. 447–60. (Chap. 13)

Ricci, L. (1961) 'Antichità nello Agàmè, *RSE*, 17, 116–18. (Chap. 13)

Ricks, T. M. (1970) 'Persian Gulf seafaring and East Africa: ninth–twelfth centuries', *AHS*, III, pp. 339–58. (Chap. 22)

Riese A. (1894) *Anthologia Latina*, ed. F. Buecheler (Leipzig: Teubner), No. 183, pp. 155–6. (Chap. 17)

Roberts, A. D. (1974) 'Precolonial trade in Zambia', *ASR*, 10, p. 720. (Chap. 29)

Robineau, C. (1966) 'Une étude d'histoire culturelle de l'île d'Anjouan', *RH*, 35, pp. 17–34. (Chap. 28)

Robinson, E. S. G. (1956) 'The Libyan hoard', *Numismatic Chronicle*, LVI, p. 94. (Chap. 18)

Robinson, K. R. (1961a) *Archaeological Report in Rhodesian Schoolboys' Exploration Society Expedition to Buffalo Bend* (Salisbury). (Chap. 27)

Robinson, K. R. (1961b) 'An early iron age site from the Chibi district, Southern Rhodesia', *SAAB*, XVI, pp. 75–102. (Chap. 27)

Robinson, K. R. (1963) 'Further excavations in the iron age deposits at the tunnel site, Gokomere Hill, Southern Rhodesia', *SAAB*, XVIII, pp. 155–71. (Chap. 27)

Robinson, K. R. (1966a) 'The Sinoia caves, Lomagundi district, Rhodesia', *Proceedings of the Rhodesian Science Association*, LI, pp. 131–55. (Chap. 27)

Robinson, K. R. (1966b) 'The Leopard's Kopje culture: its position in the iron age in Southern Rhodesia', *SAAB*, 21, pp. 81–5. (Chap. 27)

Robinson, K. R. (1966c)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cent archaeology of Ngonde, northern Malawi', *JAH*, VII, pp. 169–88. (Chap. 27)

Robinson, K. R. (1966d) 'The iron age in Southern Rhodesia', *SAAB*, XXI, pp. 5–51. (Chap. 27)

Robinson, K. R. (1970) 'The iron age in the southern lake area of Malawi', *MADP*, 8. (Chap. 27)

Robinson, K. R. (1973) 'The iron age of the upper and lower Shire Malawi', *MADP*, 13. (Chap. 27)

Robinson, K. R. and Sandelowsky, B. (1968) 'The iron age in northern Malawi: recent work', *Azania*, III, pp. 107–46. (Chap. 27)

Roeder, G. (1961) *Der Ausklang der ägyptischen Religion mit Reformation, Zauberei und Jenseitsglauben* (Zurich: Artemis Verlag). (Chap. 3)

Roeder, K. G. (1912) 'Die Christliche Zeit Nubiens und des Sudans', *ZK*, XXXIII, pp. 364–98. (Chap. 12)

Roeder, K. G. (1913) 'Die Geschichte Nubiens', *Klio*, XII, pp. 51–82. (Chap. 12)

Romanelli, P. (1959) *Storia delle province romane dell'Africa* (Rome). (Chaps 17, 19)

Romanelli, P. (1970) 'Mura e fortesse bizantine in topographia e archeologia dell'Africa romana', *Enciclopedia classica* (Rome), X, 7, pp. 398–407. (Chap. 19)

Rosenbaum, E. (1960) *A Catalogue of Cyrenaican Portrait Sculp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6)

Rostovstev, M. I. (1959)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3 Vols,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s 6, 19)

Rotberg, R. T. and Chittick, H. N. (eds) (1975) *East Africa and the Orient* (New York/London: Africana Publishing Co.) (Chap. 22)

Rouillard, G. (1853) *La Vie rurale dans l'Egypte byzantine* (Paris: Adrien-Maison Neuve). (Chap. 7)

Rouillard, G. (1928) *L'Administration civile de l'Égypte byzantine*, 2nd edn rev. (Paris: Geuthner). (Chap. 7)

Rowe, A. (1948) 'A history of ancient Cyrenaica. New light on Aegypto-Cyrenaean relations. Two Ptolemaic statues found in Tolmeita', *SASAE*, Cah. no. 12. Report by J. Leclant in *REA*, 52, 1–2, pp. 337–9. (Chap. 17)

Rudner, J. (1968) 'Strandloper pottery from south and south-west Africa', *ASAM*, 49, pp. 441–663. (Chap. 26)

Rufinus, Tyrannus (1908) *Historia ecclesiastica* (Leipzig). (Chap. 15)

Rufinus, Tyrannus, *Opera*, ed. A. Engelbrecht (1910) (Vienna; Leipzig). (Chap. 15)

Ryckmans, G. (1953, 1955, 1956) 'Inscriptions sud-arabes', *Le Muséon*, X, LXVI, 3–4, XII, LXVIII, 3–4; XIV, LXIX, 1–2, 3–4. (Chap. 15)
Ryckmans, G. (1964) 'Compte-rendu de A. Jamm: Sabaean inscriptions from Mahram Bilqîs (Nârib)', *BO*, XXI, 5–6, p. 90. (Chap. 15)

Salama, P. (1951) *Les voies romaines de l'Afrique du Nord* (Algiers: Imprimerie officielle). (Chap. 19)
Salama, P. (1953–5) 'Nouveaux témoignages de l'œuvre des Sévères dans la Maurétanie césarienne', *Libyca B* (Algiers), pp. 231–51, 329–67. (Chap. 20)
Salama, P. (1954a) 'Hypothèse sur la situation de la Maurétanie occidentale au IVe siècle', *Libyca II*, pp. 224–9. (Chap. 19)
Salama, P. (1954b) 'L'occupation de la Maurétanie césarienne occidentale sous le Bas-Empire', *Mélanges Piganiol*, pp. 1292–311. (Chap. 19)
Salama, P. (1959) 'Deux trésors monétaires du Ve siècle en petite Kabylie', *BSNAF*, pp. 238–9. (Chap. 19)
Salama, P. (1973) *Un point d'eau du limes maurétanien (Maghrib et Sahara)*, Etudes géographiques offertes à J. Despois (Paris: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Chap. 20)
Salama, P. (1976) 'Les diplacements successifs du Limes en Maurétanie césarienne. Essai de synthèse', *Akten XI Intern. Limeskong.*, pp. 577–95. (Chap. 20)
Sampson, C. G. (1974) *The Stone Age Archaeology of Southern Afric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hap. 26)
Sattin, F. and Gusmano, G. (1964) *La cosidetta 'Mummia' infantile dell'Acacus: nel quadro delle costumanz funebri prehistoriche mediterranee e sahariane* (Tripoli: Directorate-General of Antiquities, Museums and Archives). (Chap. 17)
Saumagne, C. (1965) *Le droit latin et les cités romaines sous l'Empire* (Paris: Sirey). (Chap. 19)
Sauneron, S. (1957) *Les prêtes de l'Ancienne Egypt* (Paris: Seuil) tr. A. Morrissett *The Priests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Grove Press; London: Evergreen Books) 1960. (Chaps 3, 4)
Sauneron, S. and Stierlin, H. (1975) *Edfou et Philae: derniers temples d'Egypte* (Paris: Chêne). (Chap. 3)
Sauneron, S. and Yoyotte, J. (1952) 'La campagne nubienne de Psammetique II et sa signification historique', *BIFAO*, 50, pp. 57–207. (Chaps 2, 3, 10, 12)
Sauneron, S. and Yoyotte, J. (1959) *La Naissance du monde selon l'Egypte ancienne* (Paris: Seuil). (Chap. 3)
Savary, J. P. (1966) 'Monuments en pierres sèches du Fadnoun (Tassili N'Ajjer)', *Mém. CRAPE*, VI. (Chap. 20)
Säve-Söderbergh, T. (1941) *Agypten und Nubi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altägyptischer Aussenpolitik* (Lund: Ohlssons). (Chaps 4, 9)
Säve-Söderbergh, T. (1953) Article in *BIFAO*, 52, p. 177. (Chap. 4)
Säve-Söderbergh, T. (1956) 'The Nubian kingdom of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Kush*, 4, pp. 54–61. (Chap. 9)
Säve-Söderbergh, T. (1960) 'The paintings in the tomb of Djehuty-Hetep at Debeira', *Kush*, 8, pp. 25–44. (Chap. 9)
Säve-Söderbergh, T. (1963)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Scandinavian joint expeditio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between Faras and Gemai, November 1962 – March 1963', *Kush*, 12, pp. 19–39. (Chaps 1, 12)
Säve-Söderbergh, T. (1965) *The C-Group, Nubia Abu Simbel* (Stockholm: Kungl; Boktreycheriet, P. A. Norstedt Soner). (Chap. 9)
Säve-Söderbergh, T. (1970) 'Christian Nubia, the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by the Scandinavian joint expedition to Sudanese Nubia', in E. Dinkler (ed.),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cher Zeit.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auf Grund der jüngsten Ausgrabungen*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219–44. (Chap. 12)
Säve-Söderbergh, T. (ed. (1970– .) *Scandinavian Joint Expedition to Sudanese Nubia*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Chap. 12)
Säve-Söderbergh, T. (1972) 'The Twilight of Nubian Christianity', Nubia, Récentes Recherches, *Actes Coll. Nubiol. Intern.*, pp. 11–17. (Chap. 12)
Sayce, A. H. (1909) 'A Greek inscription of a king of Axum found at Meroe',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XXXI, London. (Chap. 15)
Sayce, A. H. (1911) 'Second interim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Meroe in Ethiopia II. The historical results', *LAAA*, IV, pp. 53–65. (Chaps 11, 12)
Schäfer, H. (1901) *Die aethiopische Königsinschrift des Berliner Museums: Regierungsbericht des Königs Nastesen des Gegneeß des Kambyses* (Leipzig: Hinrichs). (Chap. 11)

Schäfer, H. (1905–8) *Urkunden der älteren Äthiopenkönige*, (Leipzig: Hinrichs), nos 1–2 (Chap. 11)
Schapera, I. (1930) *The Khoisan Peoples of South Africa: bushmen and Hottento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nd edn 1951. (Chap. 26)
Schapera, I. (1933) *The Early Cape Hottentots Described in the Writings of Olfert Dappe, 1668, Willem Ten Rhyne (1686) and Johannes Gulielmus de Grevenbroek (1695)* (Cape Town: Van Riebeeck Society) 2nd edn 1951. (Chap. 26)
Scharff, A. and Moortgat, A. (1950) *Ägypten und Vorderasien im Altertum* (Munich: Bruckmann). (Chap. 5)
Schauenburg, K. (1955–6) 'Die Cameliden in Altertum', *Bonner Jahrbücher*, pp. 59–94. (Chap. 20)
Schenkel, W. C. (1973) *Lexicon der Ägyptologie* I, 5 (Wiesbaden), coll. 775–82. (Chap. 3)
Schneider, R. (1961) 'Inscriptions d'Enda Čerqos', *AE*, 4, pp. 61–5. (Chap. 13)
Schneider, R. (1965a) 'Notes épigraphiques sur les découvertes de Matarā', *AE*, 6, pp. 89–142. (Chap. 13)
Schneider, R. (1965b) 'Remarques sur les inscriptions d'Endā Čerqos', *AE*, 6, pp. 221–2. (Chap. 13)
Schneider, R. (1974) 'Trois nouvelles inscriptions royales d'Axoum', *Atti IV Congr. Intern. Stud. Et.*, 1, pp. 87–102. (Chap. 15)
Schoff, W. H. tr. (1912)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New York/London: Longmans, Green). (Chaps 16, 22)
Schoff, W. H. (1917) 'As to the date of the Periplus', *JRAS*, pp. 827–30. (Chap. 22)
Schofield, J. F. (1948) *Primitive Pottery: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 African ceramics,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Cape Town: Rustica Press). (Chap. 27)
Schönbäck, B. (1965) *The Late Stone Age and the A-Group, Nubia Abu Simbel* (Stockholm: Kungl; Boktryekeriet, P. A. Norstedt Soner). (Chap. 9)
Schubart, W. (1918) *Einführung in die Papyrunskunde* (Berlin: Weidmann). (Chap. 7)
Schweitzer, F. R. (1970)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excavation of a cave at Die Kelders', *SAAB*, 25, pp. 136–8. (Chap. 26)
Schweitzer, F. R. and Scott, K. (1973) 'Early appearance of domestic sheep in sub-Saharan Africa', *Nature*, 241, pp. 547–8. (Chap. 26)
Seneca, Lucius Annaeus, *Questions naturelles*, 2 Vols, text established and tr. P. Oltramare (1930) (Paris: Belles Lettres). (Chaps 1, 11)
Seneca, Lucius Annaeus, *Works of Petronius and Seneca*, tr. M. Heseltine and W. H. D. Rouse (1969 rev.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einemann).
Sergew Hable Selassie (1972) *Ancient and Medieval Ethiopian History to 1270* (Addis Ababa: United Printers). (Chap. 14)
Sergi, S. (1951) 'Scavi Sahariani' (Sahara Excavations), *Monumenti Antichi*, 41, Accademia dei Lincei, XLI (Rome), coll. 443–504. (Chap. 17)
Seters, J. van (1964) 'A date for the admonitions in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JEA*, 50, pp. 13–23. (Chaps 3, 9)
Sethe, K. (1930) Urgeschichte und älteste Religion der Ägypten, in *Abschau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sland*, XVIII, 4 (Leipzig: 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Chap. 2)
Shackleton, N. J. (1973) 'Oxygen isotope analysis as a means of determining season of occupation of prehistoric midden sites' *Archaeometry*, 15, 1, pp. 133–41. (Chap. 26)
Shahid, I. (1971) 'The Martyrs of Nağran, new documents', *Société des Bollandistes* (Brussels), pp. 242–76. (Chap. 15)
Shaw, T. (1969a) 'On radio chronology of the iron age in sub-Saharan Africa', *CA*, 10, pp. 226–8. (Chap. 24)
Shaw, T. (1969b) 'The late stone age in the Nigerian forest',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364–73. (Chap. 24)
Shaw, T. (1970a) *Igbo-Ukwu: an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eastern Nigeria*, 2 Vols (London: Faber) for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badan. (Chaps 24, 29)
Shaw, T. (1970b) 'Those Igbo Ukwu radiocarbon dates: facts, fictions and probabilities', *JAH*, XVI, pp. 503–17. (Chap. 29)
Shaw, T. (1971) 'Africa in prehistory; leader or laggard?', *JAH*, XII, 1, pp. 143–53. (Chap. 24)
Shaw, T. (1972) 'Early crops in Africa: a review of evidence', *BWS 56*. (Chap. 24)
Sherif, N. M. (1971) *A Short Guide to the Antiquities Garden* (Khartoum: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Chap. 9)
Shiferacu, A. (1955), 'Rapport sur la découverte d'antiquités trouvées dans les locaux du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Magallé', *AE*, 1, pp. 13–15. (Chap. 13)
Shinnie. P. L. (1954a) *Medieval Nubia* (Khartoum: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Chap. 12)
Shinnie, P. L. (1954b) 'Excavations at Tanqasi, 1953', *Kush*, II, pp. 66–85. (Chap. 10)
Shinnie, P. L. (1965) 'New light on medieval Nubia', *JAH*, VI, 3, pp. 263–73. (Chap. 12)

Shinnie, P. L. (1967) *Meroe, A Civilization of the Sudan* (New York: Praeger;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s 6, 9, 11)

Shinnie, P. L. (1971a) *The Culture of Medieval Nubia and its Impact on Africa.* (Khartoum). (Chap. 12)

Shinnie, P. L. (1971b) 'The legacy to Africa', in J. R. Harris (ed.), *The Legacy of Egyp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434–55. (Chap. 4)

Silberbauer, G. B. (1972) 'The G/wi Bushmen', in M. G. Bicchieri (ed.), *Hunters and Gatherers Toda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Chap. 26)

Simpson, W. K. (1963) *Heka-nefer and the dynastic material from Tashka and Arminna* (New Haven: Peabod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Chap. 4)

Simpson, W. K. (ed.) (1972)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and Poetry*, tr. R. D. Faulkner, E. F. Wente and W. K. Simpson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aps 2, 3)

Singer, R. and Weiner, J. A. (1963) 'Biological aspects of some indigenous African populations', *SJA*, 19, pp. 168–76. (Chap. 21)

Slim, H., Mahjoubi, A. and Belkodja, Kh. (n.d.) *Histoire de la Tunisie*, Vol. I: *L'Antiquité* (Tunis). (Chap. 19)

Smith, A. B. (1974) 'Preliminary report on excavations at Karkarichinkat north and south, Tilemsi valley, 1972', *WAJA*, 4, pp. 33–55. (Chap. 24)

Smith, Sir G. E. and Dawson, W. R. (1924) *Egyptian Mummies* (London: G. Allen & Unwin). (Chap. 5)

Smith, H. S. (1966) 'The Nubian B-group', *Kush*, 14, pp. 69–124. (Chap. 9)

Smith, H. S. (1976) *The Fortress of Buhen; the inscriptions*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Chap. 2)

Smith, W. S. (1949) *A History of Egyptian Sculpture and Painting in the Old Kingdom*, 2nd ed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Chap. 3)

Smith, W. S. (1965a)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rts of Egypt, the Aegean and Western Asia*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ap. 5)

Smith, W. S. (1965b)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elican History of Art). (Chap. 3)

Smith, W. S. (1971) 'The Old Kingdom in Egypt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 part 2. (Chap. 2)

Smits, L. (1967) 'Fishing scenes from Botsabelo, Lesotho', *SAAB*, 22, pp. 60–7. (Chap. 26)

Snowden, F. M., Jnr (1970) *Blacks in Antiquity; 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s 6, 17, 20)

Snowden, F. M., Jnr (1976) 'Témoignages iconographiques sur les populations noires dans l'antiquité gréco-romaine', in J. Vercoutter, J. Leclant and F. Snowden, *L'Image du noir dans l'art occidental*, Vol. I: *Des Pharaons à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Fribourg: Menil Foundation), pp. 135–245. (Chap. 6)

Solheim, W. (1965) 'Indonesian culture and Malagasy origins', *Taloha* (Tananarive), I, pp. 33–42. (Chap. 28)

Soper, R. C. (1967a) 'Kwale: an early iron age site in south eastern Kenya', *Azania*, II, pp. 1–17. (Chaps 22, 27)

Soper, R. C. (1967b) 'Iron age sites in north eastern Tanzania', *Azania*, II, pp. 19–36. (Chap. 22)

Soper, R. C. (1971)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early iron age in the southern half of Africa', *Azania*, VI, pp. 5–37. (Chaps 21, 27)

Souville, G. (1958–9) 'La pêche et la vie maritime au Néolithique en Afrique de nord', *BAM*, II, pp. 315–44. (Chap. 17)

Sparrman, A. (1789) *A Voyage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wards the Antarctic Polar Circle, Round the World, and the Country of the Hottentots and Caffres, from the year 1772 to 1776* ed. V. S. Forbes, rev. tr. J. and I. Rudner (Cape Town: Van Riebeeck Society) 1975–7. (Chap. 26)

Spencer, J. E. (1968) 'Comments on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Africa', *CA*, 9, 5, 501–2. (Chap. 24)

Spiegel, J. (1950) *Soziale und weltanschauliche Reformbewegungen im alten Ägypten* (Heidelberg: Kerle). (Chap. 2)

Spruytte, J. (1967) 'Un essai d'attelage protohistorique', *Plaisirs équestres*, 34, pp. 279–81. (Chap. 17)

Spruytte, J. (1968) 'Le cheval de l'Afrique ancienne', *Le Saharien*, 48, pp. 32–42. (Chap. 17)

Spruytte, J. (1977) *Etudes expérimentales sur l'attelage* (Paris: Crepin-Leblond). (Chap. 20)

Stein, A. (1915) *Untersuchengen zur Geschichte und Verwaltung Aegyptens unter römischer Herrschaft* (Stuttgart). (Chap. 7)

Stein, E. (1949) *Histoire du Bas Empire*: Vol. II *De la disparition de l'Empire de l'Occident à la mort de Justinien, 476–565* (Paris/Brussels/Amsterdam: de Brouwer). (Chap. 7)

Steindorff, G. (ed.) (1903) *Urkunden des Agyptischen Altertums* (Leipzig: Hinrichs). **(Chap. 11)**

Stemler, A. B. L., Harlam, J. R. and Dewet, J. M. F. (1975) 'Caudatum sorghums and speakers of Shari-Nile languages in Africa', *JAH*, XVI, 2, pp. 161–83. (Chap. 24)

Stock, H. (1949) *Die Erste Zwischenzeit Ägyptens. Untergang der Pyramidenzeit, Zwischenreiche von Abydos und Herakleopolis, Aufstieg Thebens* (Rome: Pontificium Institutum Biblicum). (Chap. 2)

Strabo *Geography*, tr. H. L. Jones (1917–32), 8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einemann). **(Chaps 1, 6, 11, 22)**

Summers, R. F. H. (1958) *Inyanga.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Rhodesia* (Cambridge: CUP). (Chap. 27)

Summers, R. F. H. (1969) 'Ancient mining in Rhodesia', *Mining Magazine*, 3 (Salisbury). (Chaps 27, 29)

Summers, R. F. H., Robinson, K. R. and Whitty, A. (1961) 'Zimbabwe excavations', *OPNM*; III, 23a. (Chap. 27)

Sutton, J. E. G. (1966) 'The archaeology and early peoples of the highlands of Kenya and northern Tanzania', *Azania*, I, pp. 37–57. **(Chap. 22)**

Sutton, J. E. G. (1971) 'The interior of east Africa', in P. L. Shinnie (ed.), *The African Iron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23)

Sutton, J. E. G. (1972) 'New radiocarbon dates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JAH*, XIII, 1, pp. 1–24. (Chap. 27)

Sutton, J. E. G. (1973) *The Archaeology of the Western Highlands of Kenya* (Nairobi/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of Eastern Africa). (Chap. 23)

Sutton, J. E. G. (1974) 'The aquatic civilisation of middle Africa', *JAH*, XV, pp. 527–46. **(Chaps 21, 23)**

Sutton, J. E. G. and Roberts, A. D. (1968) 'Uvinza and its salt industry', *Azania*, III, pp. 45–86. (Chap. 29)

Szumowski, G. (1957) 'Fouilles du nord du Macina et dans la région de Segou', *Bulletin de L'Institut d'Afrique noire*, B, 19, pp. 224–58. (Chap. 24)

Tamit (1967) 'Missione archeologia', *Egitto dell' Università di Roma* (Rome). **(Chap. 12)**

Tāmrāt, T. (1972) *Church and State in Ethiopia 1270–152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 16)**

Tarn, W. W. (1930)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London). **(Chap. 6)**

Tarn, W. W. (1966)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CUP). **(Chap. 22)**

Tarn, W. W. and Griffith, G. T. (1966)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3rd edn (London: Edward Arnold). **(Chaps 6, 22)**

Teutsch, L. (1962) *Das Stadtewesen in Nordafrika in der Zeit von C. Gracchus bis zum Tode des Kaisers Augustus* (Berlin: De Gruyter). **(Chap. 19)**

Thabit, H. T. (1957) 'Tomb of Djehuty-Hetep (Tehuti-Hetep), Prince of Semna', *Kush*, 5, pp. 81–6. **(Chap. 9)**

Thom, H. B. (ed.) (1952–8) *The Journal of Jan Van Riebeeck*, tr. W. P. L. Van Zyl, J. Smuts, C. K. Johnmann and A. Ravenscroft, 3 Vols (Cape Town: Balkema). **(Chap. 26)**

Thomas, E. M. (1959) *The Harmless People (On the Bushmen of the Kalahari Desert)* (London: Secker & Warburg). **(Chap. 26)**

Thomas, W. R. (1931) 'Moscow mathematical papyrus no 14', *JEA*, XVII, pp. 50–2. **(Chap. 5)**

Thompson, G. (1827) *Travels and Adventures in Southern Africa*, ed. V. S. Forbes (Cape Town: Van Riebeeck Society) 1967. **(Chap. 26)**

Thunberg, C. P. (1795) *Travels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Performed between 1770 and 1779* (London). **(Chap. 26)**

Tixeront, J. (1960) 'Reflexions sur l'implantation ancienne de l'agriculture en Tunisie', *Karthago*, X, pp. 1–50. **(Chap. 19)**

Török, L. (1971) 'Fragment eines Spatantiken roten Tongefasse mit Stempelverzierung aus Nubien und Dessen Problemkreis', *MAI*, 2. **(Chap. 12)**

Touny, A. D. and Wenig, S. (1971) *Sport in Ancient Egypt*, tr. J. Becker (Leipzig: Ed. Leipzig; Amsterdam: Gruner). **(Chap. 3)**

Toynbee, J. M. C. (1973) *Animals in Roman Life and Art; Aspects of Greek and Roman Life.*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20)**

Tozer, H. F. (1964)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New York: Biblo & Tannen). **(Chap. 22)**

Trigger, B. G. (1965) *History and Settlement in Lower Nub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 69. **(Chaps 9, 11, 12, 17)**

Trigger, B. G. (1969) 'The myth of Meroe and the African iron age', *IJAHS*, II, 1, pp. 23–50. **(Chaps 10, 11, 21, 24)**

Tuareg

Trigger, B. G. (1970)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Christian Nubia', in E. Dinkler (ed.),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cher Zeit.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auf Grund der jüngsten Ausgrabungen*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347-87. (Chap. 12)
Tufnell, O. (1959) 'Anklets in western Asi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London*, pp. 37-54. (Chap. 13)
Turcan, R. (1961) 'Trésors monétaires trouvés à Tipasa. La circulation du bronze en Afrique romaine et vandale au Ve et VIe siècles ap. J.-C.', *Libyca*, pp. 201-57. (Chap. 19)
Twisselmann, F. (1958) 'Les ossements humains du site mésolithique d'Ishango', *Exploration du Parc national Albert, Mission J. de Herzelin de Braucourt* (1950), Facsimile 5 (Brussels). (Chap. 25)
Tylecote, R. F. (1970) 'Iron working at Meroe, Sudan', *BHM*, 4, pp. 67-72. (Chaps 11, 21)

Unesco (1963-7) *Fouilles de Nubie* (Cairo). (Chap. 20)

Vaal, J. B. de (1943) 'In Soutpansbergse Zimbabwe', *SAJS*, XL, pp. 303-18. (Chap. 27)
Valbelle, D. (1974)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I*, no. 7, cols 1028-34. (Chap. 3)
Van Seters, J. (1964) 'A date for the admonitions in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JEA*, 50, pp. 13-23. (Chaps 2, 3)
Van Seters, J. (1966) *The Hyksos, a New Investigation*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ap. 2)
Vansina, J. (1962) 'Long-distance trade routes in central Africa', *JAH*, III, 3, pp. 375-90. (Chap. 25)
Vansina, J. (1966)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hap. 27)
Vantini, J. (1970) *The Excavations at Far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Nubia* (Bologna: Nigrizia). (Chap. 12)
Vasilyev, A. E. (ed.) (1907) 'Zhitiye grigentiya, yepiscopa Omiritskago (vita Saneti Gregenti)', *Vizantiyskiy Vremennik*, XIV, pp. 63-4. (Chap. 15)
Veh, O. (ed.) (1971) *Vandalenkriege von Prokopius Caesariensis* (Munich: Heimeran). (Chap. 19)
Velde, H. Te (1967) *Seth, God of Confusion. A Study of his Role in Egyptian Mythology and Religion* tr. G. E. van Baaren-Pape) (Leiden: Brill). (Chap. 3)
Vercoutter, J. (1945) *Les Objets égyptiens et égyptisants du mobilier funéraire carthaginois* (Paris), Bibliothèqu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Vol. 40. (Chap. 9)
Vercoutter, J. (1956) 'New Egyptian inscriptions from the Sudan', *Kush*, IV, pp. 66-82. (Chap. 9)
Vercoutter, J. (1957) Article in *Kush*, V, pp. 61-9. (Chap. 4)
Vercoutter, J. (1958) 'Excavations at Sai 1955-57', *Kush*, VI, pp. 144-69. (Chap. 9)
Vercoutter, J. (1959) 'The gold of Kush. Two gold-washing stations at Faras East', *Kush*, VII, pp. 120-53. (Chaps 9, 11)
Vercoutter, J. (1962) 'Un palais des Candaces contemporains d'Auguste, fouilles à Wad-ban-Naga, 1958-60', *Syria*, 39, pp. 263-99. (Chaps 10, 11)
Vercoutter, J. (1964) 'Excavations at Mirgissa I (October-December 1962)', *Kush*, XII, pp. 57-62. (Chaps 2, 9)
Vercoutter, J. (1970) 'Les trouvailles chrétiennes françaises à Aksha, Mirgissa et Sai', in E. Dinkler (ed.),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cher Zeit.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auf Grund der jüngsten Ausgrabungen*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155-62. (Chap. 12)
Vercoutter, J. (1976) *L'Egypte ancienne*, no. 247 (Paris: PUF). (Chap. 2)
Vercoutter, J., Leclant, J. and Snowden, F. (1976) *L'Image du dans l'art occidental*. Vol. I: *Des pharaons à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Fribourg: Menil Foundation). (Chap. 6)
Vérin, P. (1967) 'Les antiquités de l'île d'Anjouan', *BAM*, XLV, 1, pp. 69-79. (Chap. 28)
Vérin, P. (1968) 'Several types of obsolete Madagascar pottery', *Asian Perspectives*, XI, pp. 111-18. (Chap. 28)
Vérin, P. (1970a) 'Un conte antalaote, Mojomby, la ville disparue', *BM*, 293-4, pp. 256-8. (Chap. 28)
Vérin, P., Kottak, C. and Gorlin, P. (1970b) 'The glottochronology of Malagasy dialects', *OL*, VIII, 2. (Chap. 28)
Vidal, P. (1969) *La civilisation mégalithique de Bouar; prospection et fouilles 1962-66* (Paris: Firmin-Didot). (Chap. 25)
Villiers, A. (1949) 'Some aspects of the dhow trade', *MEJ*, pp. 399-416. (Chap. 22)
Villiers, H. de (1970) 'Dieskettreste der Ziwa', *Homo*, XXI, pp. 17-28. (Chap. 27)
Vincent, W. (1807)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Ancients in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Chap. 22)
Vincent, W. (1809) *The Voyage of Nearchus and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Oxford). (Chap. 22)
Vinicombe, P. (1960) 'A fishing scene from the Tsoelike, south-eastern Basutoland', *SAAB*, 15, pp. 15-19. (Chap. 26)

Vinicombe, P. (1965) 'Bushmen fishing as depicted in rock paintings', *Science South Africa*, 212, pp. 578–81. (Chap. 26)
Vila, A. (1970) 'L'armement de la forteresse de Mirgissa-Iken', *RE*, 22, pp. 171–99. (Chap. 3)
Vita, A di (1964) 'Il limes romano de Tripolitania nella sua concretezza archeologica e nella sua realta storica', *Libya antiqua* (Tripoli), pp. 65–98. (Chaps 19, 20, 29)
Vittmann, G. (1974) 'Zur lesung des königsnamens', *Orientalia*, 43, pp. 12–16. (Chap. 10)
Vogel, J. O. (1969), 'On early evidence of agriculture in southern Zambia', *CA*, X, p. 524. (Chap. 27)
Vogel, J. O. (1970) 'The Kalomo culture of southern Zambia: some notes towards a reassessment', *ZMJ*, I, pp. 77–88. (Chap. 27)
Vogel, J. O. (1971a) 'Kamangoz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ron age cultures of the Victoria Falls region', *ZMP*, II. (Chap. 27)
Vogel, J. O. (1971b) 'Kumandzulo, an early iron age village site in southern Zambia', *ZMP*, III. (Chap. 27)
Vogel, J. O. (1972) 'On early iron age funerary practice in southern Zambia', *CA*, XIII, pp. 583–8. (Chap. 27)
Vogel, J. O. (1973) 'The early iron age at Sioma mission, western Zambia', *ZMJ*, IV. (Chap. 27)
Volney, M. C. F. (1787) *Voyages en Syrie et en Egypte pendant les années 1783, 1784, 1785* (Paris). (Chap. 1)
Vuillemot, G. (1955) 'La nécropole punique du phare dans l'île de Rachgoum', *Libyca*, III, pp. 7–76. (Chap. 18)
Vychichl, W. (1956) 'Atlanten, Isebeten, Ihaggaren', *RSO*, 31, pp. 211–20. (Chap. 17)
Vychichl, W. (1957) 'Ergzi'abehēr "Dieu"', *AE* II, pp. 249–50. (Chap. 15)
Vychichl, W. (1961) 'Berber words in Nubian', *Kush*, 9, pp. 289–90. (Chap. 17)
Vychichl, W. (1972) *Die Mythologie der Berber*, ed. H. W. Haussig (Stuttgart). (Chap. 17)

Wainwright, G. A. (1945) 'Iron in the Napatan and Meroitic ages', *SNR*, 26, pp. 5–36. (Chap. 11)
Wainwright, G. A. (1947) 'Early foreign trade in East Africa', *Man*, XLVII, pp. 143–8. (Chap. 22)
Wainwright, G. A. (1951) 'The Egyptian origin of a ram-headed breastplate from Lagos', *Man*, LI, pp. 133–5. (Chap. 4)
Wainwright, G. A. (1962) 'The Meshwesh', *JEA*, 48, pp. 89–99. (Chap. 17)
Wallace, L. (1938) *Taxation in Egypt from Augustus to Diocletian* (Princeton). (Chap. 7)
Walle, B. van de (1953) 'La cippe d'Horus découverte par J. Bruce à Axoum', *Chronique d'Egypte*, 56, pp. 238–47. (Chap. 15)
Wallert, I. (1962) *Die Palmen im Alten Ägypten. Eine Untersuchung ihrer praktischen, symbolischen und religiösen Bedeutung* (Berlin: Hessling). (Chap. 17)
Walsh, P. (1965) 'Masinissa', *JRS*, LV. (Chap. 18)
Warmington, B. H. (1954) *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cletian to the Vandal Conquest* Cambridge: CUP). (Chap. 19)
Warmington, E. H. (1928)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Cambridge) 2nd edn (London: Curzon Press) 1974. (Chap. 22)
Warmington, E. H. (1963) 'Africa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times', in E. A. Walke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VIII. (Chap. 22)
Warmington, B. H. (1964) *Carthage*, rev. edn (London: Robert Hale) 1969. (Chap. 21)
Waterhouse, G. (ed.) (1932) *Simon van der Stel's Journal of His Expedition to Namaqualand, 1685–6* (Dublin: Dublin University Press). (Chap. 26)
Webster, T. B. L. (1964) *Hellenistic Poetry and Art* (London: Methuen). (Chap. 6)
Weitzmann, K. (1970) 'Some remarks on the sources of the fresco paintings of the cathedral of Faras', in E. Dinkler (ed.),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cher Zeit.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auf Grund der jüngsten Ausgrabungen*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pp. 325–46. (Chap. 12)
Welbourne, R. G. (1973) 'Identification of animal remains from the Broederstroom 24/73 early iron age site', *SAJS*, LXIX, p. 325. (Chap. 27)
Wendt, W. E. (1972) 'Preliminary report on 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gramme in south-west Africa', *Cimbebasia B*, 2, 1, pp. 1–45. (Chap. 26)
Wenig, S. (1967) 'Bemerkungen zur meroitische chronologie', *MIOD*, 13, pp. 9–27. (Chaps 10, 11)
Wenig, S. (1969) *The Woman in Egyptian Art*, tr. B. Fischer (New York: McGraw-Hill). (Chap. 3)
Wenig, S. (1974) Article in *ZAS*, 101, pp. 243–4. (Chap. 10)
Wessel, K. (1964) *Zur Ikonographie der Koptischen Kunst, Christentum am Nil*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Chap. 12)

Wessel, K. (1966) *Coptic Art*, tr. J. Carroll and S. Hatton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12)
Westendorf, W. (1968) *Das alte Ägypten* (Baden-Baden: Holle). (Chap. 2)
Wheeler, Sir R. E. M. (1954)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London: Bell). (Chap. 22)
Wheeler, Sir R. E. M. (1966) *Civilizations of the Indus Valley and Beyond*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22)
Will, E. (1966) *Histoire politique du monde hellénistique 323–30 avant J.-C.*, 2 Vols (Nancy: Berger-Levrault). (Chap. 6)
Willett, F. (1967) *Ife in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n Sculpture* (London: Thames & Hudson). (Chap. 24)
Williams, D. (1969) 'African iron and the classical world', in L. A. Thompson and J. Ferguson (eds), *Africa in Classical Antiquity*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pp. 62–80. (Chap. 21)
Wilson, J. A. (1951) *The Burden of Egypt. An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Egyptian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 2)
Wilson, J. A. (1969) in J. B. Pritchard (ed.), *The Ancient Near East* (Princeton). (Chaps 2, 4)
Winlock, H. E. (194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iddle Kingdom in Thebes* (New York: Macmillan). (Chap. 2)
Winlock, H. E. (1955) *Models of Daily Life in Ancient Egypt, from the Tomb of Meket-Rē' at Theb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hap. 5)
Winstedt, E. O. (tr.) (1909)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 (Cambridge: CUP). (Chap. 15)
Wissmann, H. von (1964) 'Ancient history', *Le Muséon*, LXXVII, pp. 3–4. (Chap. 15)
Wissmann, H. von and Rathjens, C. (1957) 'De Mari Erythraeo: Sonderdruck aus der Lauten Sich', *Festschrift Stuttgarter Geographische Studien*, 69. (Chap. 24)
Woldering, I. (1963) *Egypt, the Art of Pharaohs*, tr. A. E. Keep (London: Methuen). (Chap. 5)
Wolf, W. (1957) *Die Kunst Aegyptens; Gestalt und Geschichte* (Stuttgart: Kohlhammer). (Chap. 3)
Wolf, W. (1971) *Das alte Ägypten*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Chap. 2)
Wolska-Conus, W. (ed.) (1968–73) *Cosmas Indicopleustes: Topographie chrétienne*, 3 Vols (Paris: Cerf). (Chaps 16, 22)
Word, W. (1965) *The Spirit of Ancient Egypt* (Beirut). (Chap. 3)
Wörterbuch (1971) *Der Aegyptischen Sprache Fünfter Band* (Berlin: Akademie Verlag). (Chap. 1)

York, R. N. *et al.* (1974) 'Excavations at Dutsen Kongba', *NAS*. (Chap. 24)
Yoyotte, J. (1958) 'Anthroponymes d'origine libyenne dans les documents egyptiens', *C-RGLCS*, 8, 4. (Chap. 17)
Yoyotte, J. (1958) in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 Suppl. VI, I (Paris), p. 370. (Chap. 4)
Yoyotte, J. (1961) 'Les principautés du delta au temps de l'anarchie libyenne', *Mélanges Maspéro*, 1, 4, pp. 122–51. (Chaps 2, 17)
Yoyotte, J. (1965) 'Egypte ancienne', *Histoire Universelle* (Paris: Gallimand)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pp. 104–285. (Chap. 2)
Yoyotte, J. (1975) 'Les Sementious et l'exploitation des régions minières de l'Ancien Empire', *BSFE*, 73, pp. 44–55. (Chap. 3)

Zaba, Z. (1953) *L'Orientation astronomique dans l'Ancienne Egypte et la précession de l'axe du monde* (Prague). (Chap. 5)
Zabkar, L. V. (1975) *Apedemak, Lion God of Meroe* (Warminster). (Chaps 10, 11)
Zawadzki, T. (1967) 'Les fouilles de la mission archéologique polonaise à Faras, leur importance pour l'histoire de l'art byzantin', *RESEE*, V. (Chap. 12)
Zeissl, H. von (1944) *Anthiopen und Assyer in Ägypten* (Glückstadt, Hamburg: J. J. Augustin). (Chaps 2, 10)
Zibeuus, K. (1972) *Afrikanische Arts und Volkernamen in hieroglyphischen und hieratischen Texten* (Wiesbaden). (Chap. 4)
Zohrer, L. G. (1952–3) 'La population du Sahara antérieure à l'apparition du chameau', *BSNG*, 51, pp. 3–133. (Chap. 20)

专　题　索　引*

* 阿拉伯数字为英文版页码。

人 名 索 引*

* 阿拉伯数字为英文版页码。

地 名 索 引*

* 阿拉伯数字为英文版页码。

民族名索引*

* 阿拉伯数字为英文版页码。

王 朝 名 索 引*

* 阿拉伯字为英文版页码。